

美国民权运动的奋起与挣扎

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 1954-1963

PARTING THE WATERS

分水岭

这一步，彻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方向

〔美〕泰勒·布兰奇 Taylor Branch 著

韩阳 谭颖 吕杭蔚 刘珈 译



这不仅表示旧的 [] 的开始

- ★ 荣获普利策历史奖、美 []
- ★ 《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年度最佳图书
- ★ 《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等80多家权威媒体高度赞誉
- ★ 连续17年位居历史类图书畅销榜单，全球30余国争先阅读

布兰奇所描述的这个时代，彻底改变了美国。

——《人物》

每一个关注民权运动的公民，不论肤色、地域，都必读的历史巨著。

——《纽约时报》

布兰奇的描述，非凡细致，人们可以看到马丁·路德·金最复杂、最理智的一面，以及金牧师时代前的美国。

——《华盛顿邮报》

上等佳作，极具启示意义。奇迹般再现了往日时光。

——《新闻周刊》



紫图图书
我们策划精品畅销书

建议上架类别：历史·美国现代历史

ISBN 978-7-5153-4488-1



9 787515 134488 1 >

定价：128.00元

分水岭

美国民权运动的奋起与挣扎

[美] 泰勒·布兰奇 Taylor Branch 著

韩阳 谭颖 吕杭蔚 刘珈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 (CIP) 数据

分水岭：美国民权运动的奋起与挣扎 / [美] 泰勒·布兰奇著；
谭颖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9

书名原文：PARTING THE WATERS：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 1954-1963

ISBN 978-7-5153-4488-1

I . ①分… II . ①泰…②谭… III . ①民权运动 研究 - 美国 IV .
① D7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1878 号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2 by CHINA YOUTH PRES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1988 by Taylor Branch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IABUAN, MALAYSIA.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2-8982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 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08

责任编辑：李茹 liruce@163.com

营 销：北京紫图图书有限公司

电 话：010-64360026

印 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16

印 张：62

字 数：100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5240

导 读

自从美国民权运动发生以来，研究民权运动的著作就不断涌现，可谓汗牛充栋。20世纪60-70年代的民权运动研究对象大多为全国性的民权领导人和组织。当时，学者们更多地把民权运动作为一场全国民权组织与政府联合起来反对种族歧视、进行政治改革的运动来阐释。他们大都认为，美国全国民权组织和领导人（主要是马丁·路德·金）在动员南方黑人参加民权运动的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形成了以金和他领导的非暴力直接行动为中心的研究路径。1980年代以来，在以马丁·路德·金为中心的研究继续发展繁荣的同时，很多学者对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思路进行了反思，不仅对它进行了修正，还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解释。在这些不同观点激烈交锋、融汇的过程中，美国的民权运动研究形成了百家争鸣、丰富多彩的局面。

翻阅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研究把重点放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运动(nonviolent movements)上，甚至很多著作把民权运动直接等同于金领导的非暴力运动。这些学者认为，金领导的非暴力运动摧毁了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取得了全国性立法改革的胜利，为黑人赢

得了自由、平等和正义。作为全国民权运动的象征，马丁·路德·金自然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其中关于金的传记研究为数很多。最早的金传记大部分是由熟悉他的人所写，如金的朋友 L.D. 莱迪克 (L.D.Reddick) 具体描述了在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运动期间的一系列事件，围绕的中心就是金作为一名全国性领导人而出现。小菜昂·贝内特 (Lerone Bennett Jr.) 关于金的传记记叙了金一生的主要经历。虽然他们掌握关于金的第一手资料，但这些早期的论述并不是建立在广泛考察主要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他们主要强调金作为领导者的历史重要性及其成就，实际上是制造了关于金的“历史神话”。奥古斯特·迈耶 (August Meier) 1965 年的论文和大卫·刘易斯 (David L.Lewis) 1970 年出版的传记略显客观，既颂扬了金作为一名民权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也指出了其局限性。

1980 年代以来，新一代比较严肃的学者开始质疑上述著作，反对把金作为现代黑人斗争发起者和不可缺少的领袖的观点。他们认为，“金神话”强调个性而不是社会背景，它夸大了金对黑人进步的贡献，而没有承认他实际上大大受益于其他组织者和积极分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86 年 10 月在首都华盛顿召开了一次关于马丁·路德·金研究的学术会议。会议汇集了当代马丁·路德·金和民权运动研究最富盛名的学者，集中展现了当时马丁·路德·金研究的前沿成果。他们寻求以更精确和平衡的方式来描述金真正的、充满活力的个性，评价他与民权运动的关系以及他的成功与失败。会议的成果很快就在第

二年的美国历史杂志上以圆桌会议的方式有选择地刊出，四年后又以论文集的方式集中发表。这些学者的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多深切体会到种族歧视和隔离下黑人的悲惨境地，亲身经历过民权运动的洗礼（但不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具有一定的现实关怀，又在大学中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特别注重史学研究的学术性。因此正是由于新一代学者的出现，美国学术界对金的研究开始经历从制造神话到实事求是论述的转变。在资料运用上，大量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得到广泛运用，例如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不断解密并被挖掘出来，金的各种著作、演说和布道也被编辑出版，由克莱伯恩·卡森（Clayborne Carson）教授主持的、最为学界瞩目的浩大工程《马丁·路德·金集》的编纂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大量不为人所知的细节得以披露，这对澄清“金神话”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在具体解释上，学者们基本能抛开自己主观好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尽量做到客观公正。

这一时期马丁·路德·金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尤其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的设立，导致了一波金研究的新热潮，先后又出版了好几部马丁·路德·金传记，这包括大卫·盖洛（David J. Garrow）获得普利策奖的《背负十字架：小马丁·路德·金与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亚当·费尔克拉夫（Adam Fairclough）的《重塑美国的灵魂：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与小马丁·路德·金》和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的《分水岭：美国民权运动的奋起与挣扎》（1989年获得普利策历史奖）等。

这些学者在上述所说的新的学术环境中开始把金放到地方运动的背景下进行评述，不仅仅强调金的重要作用，也关注地方激进主义与全国政治之间的关系。布兰奇所著的这本《分水岭》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它不仅讲述了金的故事，也论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地方领导人莫塞斯、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肯尼迪总统以及金黑人教会中的对手与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现了广阔的历史背景。与前两部较为纯粹的学术著作相比，布兰奇的著作更有文采、更有故事性，因此也更畅销。

那么作者布兰奇是何许人也？现居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布兰奇 1947 年出生于南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并在那里长大。1963 年，南部城市伯明翰的黑人在金领导下发起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反种族隔离政策的游行示威，警方竟使用警犬和消防水龙进行严厉镇压。这件事给少年的布兰奇心灵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1964 年布兰奇考取了美国名校北卡罗来纳州的教堂山大学，学的是美国历史。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马丁·路德·金牧师的大名家喻户晓。由于对历史和政治极感兴趣，大学期间的布兰奇对金牧师的言行达到了着迷的程度。本科毕业后，布兰奇考入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攻读政治、宗教和哲学等课程。研究生毕业后，布兰奇当起了记者和作家，他为《华盛顿月刊》《哈泼斯》等自由主义的杂志写过不少稿件，同时还独立或与人合作出版过几本书，但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1988 年，布兰奇时来运转，他

倾注6年心血的长篇巨著《分水岭》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并于次年获得普利策历史奖和国家图书评论奖。很多评论家称，这本书不仅是马丁·路德·金的传记，同时也是反映美国民权运动历史的经典著作。

当然本书的成功并非是运气好，作者的现实关怀、学术训练、讲故事的写法、生动的文采紧密结合在一起，成就了本书，很少有人能四者都兼备。可以说《分水岭》是布兰奇呕心沥血之作。记者出身的他在广泛搜集原始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采访了百余人，获取了大量的材料，全面、详细、栩栩如生地记述了20世纪50年代末至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这段时期，金及其伙伴从美国南方发起民权运动，并逐渐发展到北部、西部和西北部的全过程。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特别是肯尼迪总统及其兄弟罗伯特·肯尼迪与民权运动的关系，以及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渗透到民权运动内部并试图影响运动发展的内幕故事。通过诸多细节描述，展现了金等民权运动领袖们在运动过程中的创造性和领导能力，他们虽无任何常规权力手段，但还是想方设法找到了运用权力的各种办法，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从而生动揭示了美国黑人在白人主流社会里维护自身权利的艰难和非凡勇气。该书的出版既有历史价值，又具现实政治意义，影响和教育了许多美国人。奥巴马总统就把《分水岭》作为自己最喜欢读的书籍之一，认为此书对他的人生观有相当的影响。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布兰奇在前言中特别提到了美国

共产党员斯坦利·利维森与金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美国共产党与民权运动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确实，1930、40年代，美国共产党及其左派组织对美国黑人运动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的活动是当代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起源。但是到1940年代后期，极端的冷战反共主义破坏了共产党及其左派组织，劳工运动也衰落了。当时美国国内反共的赤色恐慌压倒一切，共产党和左派没有了群众基础和生存空间，本来正蓬勃发展的以劳工为基础的民权运动戛然而止。突出的例子就是著名的黑人左派领袖杜波伊斯在1950年被以外国间谍的罪名受审，还被没收了护照。后来1955年以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为标志而开始的民权运动基本上以黑人牧师和教会为主导，来自于印度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为指导，可以说与美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无关。最新的资料和相关著作中都表明利维森加入过美国共产党，有这样的经历，这应该是确定的。但他作为金的顾问，只是在具体的组织建设和斗争策略上向金提出建议，并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影响金转向共产主义。他之所以被金选为顾问，是因为他能干，而不是因为他的意识形态，何况当时利维森对自己的身份还是保密的，金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因此当传闻利维森是共产党时，金马上解雇了他。现在新解密的联邦调查局档案也无发现金受到利维森意识形态影响方面的证据。因此关于金受美国共产党的影响而不忠于美国的传言完全是无稽之谈，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共产党在1930、40年代对美国民权运动起过积极、正面的作用。

其实,《分水岭》只是布兰奇金传记三部曲的第一部。尽管1990年代以来,地方史、底层民众史、黑人社会内部制度史、妇女史等新兴起的主题占据了民权运动研究的主流,金研究已经降温。但是作者仍不忘初心,继续苦心钻研,笔耕不辍,分别于1998年和2006年出版了第二部《火之柱:金年代的美国1963—1965》和第三部《在迦南的边缘:金年代的美国1965—1968》,同样的鸿篇巨制、同样的妙笔生花,也同样屡获大奖。三部书整整花了25年时间,布兰奇终于得遂其愿,大功告成。读者如果读完这第一部《分水岭》后,意犹未尽,可以找来英文版的第二部和第三部连贯起来看一下,定会受益匪浅。

于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16.10月北京

前言

肤色定义了视觉感官，种族塑造了文化视角——有意无意间，我们总能感受到肤色和种族对我们的影响。这种潜在力量让人在选择基于种族的历史视角时更加谨慎。尽管在此书的写作中，以马丁·路德·金为核心，但严格来说，并不算是他的传记。他传承给我们一个世界，而重塑里面的观念无疑会把大部分读者隔离开来，包括我自己，因为那远远超出了我们熟悉的领域。如果把金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看，普遍会关注他对白人社会的影响，而忽略了他生命的本质。但我认为正是他生命的本质促成了这段动荡的历史和神话。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围绕美国时代的主线，把一连串的人物故事紧密联系起来，试图让传记和历史相得益彰。和金本人的愿景一样，本书不只用一种声音，想要把一种孤立的文化上升到更为宏大的历史。正文部分还涉及金和一些看似与他相距甚远的人，他们的阶层各异，地位不同。通过寻找他们中至少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关系，我希望能更加鲜明和全面地让读者了解他们——比如老修女波拉德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学生非暴

力统筹委员会的领导人鲍勃·莫塞斯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肯尼迪家族和金在黑人教会内部的竞争对手。

我旨在撰写有关民权运动的历史，从众人确切的看法中取材，换言之，要想寻找真相，最客观的方式之一是从陌生人、外国人和敌人的角度去看。我希望这些翔实的记录可以证明我的观点：在战后时期的分水岭，金的一生是美国历史上最精彩也最重要的隐喻。

我选用了叙述性传记史的写作方式，这多少影响了文体。比如，叙述中用到的“黑人”一词，用词的时间跨度和那个词盛行的时间段相吻合。这绝对不是为了表达我的政治态度，仅仅是想营造一种时代感，更好地去捕捉当时的诸多变化——其中包括一个尤为特别的变化：一夜之间整个社会都用“黑种人”这个词来取代“黑人”。由于小说篇幅有限，为此我请求读者谅解，这种转变会在第二卷中有所体现。

另外，我在本书的写作中还有一处遗憾——对斯坦利·利维森的记载只是略有涉及，并没有给大家提供足够的材料。从1984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寻找联邦调查局的记录原件，他们认为金的这位白人密友是共产党特工。就这一指控，联邦调查局还安装了窃听电话监控金，并且还对民权运动实施了很多附带性的干扰。美国司法部拒绝了我的要求，他们认为即使告密者

提供的有关利维森的材料已有 30 至 35 年历史，但现在公开的话，还是会危害国家安全。这简直是官僚之间赤裸裸的互相袒护。我觉得一定有些和中央情报局较劲的小侦探，但这种程度的保密真是比保皇主义的荒谬还离谱。

关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对马丁·路德·金的调查还存有其他证据，大卫·盖洛就对此做过开创性工作，这些更让我肯定了利维森的为人和历史贡献。然而，有关方拒绝公开相关资料，不给美国公众提供共同的立场进行历史性的讨论。虽然里根总统为纪念马丁·路德·金设立了一个国家纪念日，但他还是公开提出过对马丁·路德·金那一项“根本性不忠”的指控。我感到深深惋惜，一个所谓的民主政府仍然费尽心力保守国家机密，让这些指控继续存在。

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1988 年 8 月

目 录

Contents

- 导 读 / 001
- 前 言 / 001
- 第一章 先驱：弗农·约翰斯 / 001
- 第二章 洛克菲勒家族和埃比尼泽教会 / 030
- 第三章 尼布尔和桌球 / 077
- 第四章 第一首 / 113
- 第五章 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 / 152
- 第六章 领略世界 / 224
- 第七章 复生 / 296
- 第八章 政治的阴影 / 338
- 第九章 历史的一枚卒子 / 380

- 第十章 肯尼迪的转变 / 410
- 第十一章 车轮上的洗礼 / 444
- 第十二章 自由乘车运动之夏 / 486
- 第十三章 麦库姆的摩西，堪萨斯的金 / 531
- 第十四章 圣诞节前的奥尔巴尼 / 564
- 第十五章 胡佛的铁三角，金的组织 / 606
- 第十六章 救火队员最后的缓刑 / 649
- 第十七章 密西西比大学的陷落 / 684
- 第十八章 伯明翰 / 728
- 第十九章 绿林镇和伯明翰监狱 / 766
- 第二十章 孩子们的奇迹 / 818
- 第二十一章 大风暴 / 870
- 第二十二章 向华盛顿进军 / 916
- 第二十三章 翻越：梦魇与梦想 / 931
- 致 谢 / 970

第一章 先驱：弗农·约翰斯

1867 年的黑人大迁徙队伍里有一群将近 700 人的宗教团体，他们中有些人身着白袍，在一位白人牧师的带领下，离开第一浸信会教堂，一路向北，穿过小镇来到哥伦布大街，然后向东，翻过一座泥泞的山，到达里普利大街。在一处空地上，教堂会众念诵祈祷文，举行仪式，宣布第一座黑人浸信会教堂的成立。这所位于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私营黑人浸信会教堂的首位牧师，是奴隶出身，名字叫内森·阿什比。

当地大部分白人把此次分裂看作是南北战争后整个州的动乱及困顿的必然结果。由于时任美国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对杰出的前南方邦联军队的友好态度，亚拉巴马州长罗伯特·M·巴顿和新当选的州议会决定冒一次险。他公开反对承认黑人公民权的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结果只是派一位陆军准将走进位于蒙哥马利的州议会大厦，宣称如果不重新审议并推翻此条修正案的话，自己将再次取代州政府。白人士气衰落，黑人士气渐长。本镇居民人口数增长到 1.4 万，其中黑人人口占总数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两个种族的难民都或是因粮食歉收，或是丧失了抵押品的赎回权而离开农村，涌入蒙哥马利的，他们通常在路旁的树丛中草草过夜，或观看户外强制拍卖会来自娱自乐。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还表示要出台美国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即要赋予黑人男子投票权和管理权。大部分美国白人都不想就黑人宗教的权利起争端。很多人巴不得从教堂的地下室中清走这些人，即便这意味着他们先前教堂的资产要分散到哥伦布大街和里普利大街的各个角落。成立第一座自由的黑人浸信会教堂就是全新的开始：提出动议、进行辩论、组织委员会、投票选举、雇用及解雇牧师、

捐献钱财、提供砖瓦及制作教堂长椅和窗户……黑人教会从某种程度上先于黑人家庭得到法律认可，与当地白人比，他们更加包容。

10年后，黑人第一浸信会教堂中持异议的一派进行了第二次黑人大迁徙。此次分裂将永久地给两个教堂烙上无法磨灭的印记。虽然两派都尽力避免教会分裂，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因为教堂空间不足，教会发展初期困难重重引起的冲突和矛盾，但新牧师明白，教会中不少人都对它的位子虎视眈眈，因此引发了不少争执。毫无疑问，奴隶身份的划分是引起紧张关系的原因之一：农场工人地位极低，而家佣则略有特权，后者往往是黑白混血儿。当两者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后，人群中的“高人一等者”发起重建教会的运动，他们想在干松的里普利大街新建一座教堂，因为地势倾斜的哥伦布大街每逢下雨的礼拜日，路过的人就会弄得满脚是泥。他们提出了一整套的修建方案，虽然耗资巨大，但总算是能建成一座更体面、更干净的教堂。

大部分教会成员及一些执事认为分裂并不合适，是异教徒的做法。但仍有为数不少的少数派，强烈支持从黑人第一浸信会教堂中另立门户，成立黑人第二浸信会教堂。尽管分裂主义者同样承受着那个时代及他们种族所带来的贫乏，甚至组织会议都不得不在老哈维尔·梅森黑人监狱举行，但那时他们最直接的愿望就是获得一点相对的基本权利。第一场受洗仪式由一位英国牧师主持，来宾包括三位白人女教师，她们来自美国北方的一个传教士团，其影响力正逐步向南方扩散，为那里被解放的黑奴受洗，并为他们提供教育。1879年1月，新教堂出资250美元在市中心的德克斯特大街购置了一小块土地，那里矗立着一座宏伟的大楼，不远处就是亚拉巴马州议会大厦的正门。黑人教会成员把这座新教堂更名为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第一任牧师名为查尔斯·奥克塔维厄斯·布思，奴隶出身。据他记载，那时的教会成员都是“富有的优雅绅士”，他还骄傲地称，其中一位名叫比灵斯利的理发师身家高达30万美元。虽然他的说法有待商榷，但仍被载入了官方教会史。

最初，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以“执事管理教堂”的方式运作，这意味着世俗官员可参与到浸信会团体管理运作的各个环节。他们可以随意雇用自己想要雇用的牧师——不管其是否经过培训、是否合适，无须考虑主教或其他成员的看法。浸信会教友没有所谓的教会层级之分，也不需要具备神职人员的专业素养。这一情况大大方便了在不识字的白人及黑人中传教，凡是可以发声又主张信仰的人都可以成为牧师。在奴隶制犹存的时期，牧师职位是唯一向黑人开放的脑力工作。在那个时代，美国南方各州认为，教给黑人识字，准许黑人从事任何需要哪怕一丁点文化素养的工作，都是犯罪，这就导致牧师或准牧师的竞争非常激烈。只要擅长宗教演讲，比什么学历和证书都管用。而对下个世纪的大部分人来说，竞争牧师职位的人也是形形色色，有满腔热忱、道德高尚的有志青年；也有利欲熏心、追名逐利的投机者。教堂已不再纯粹是做礼拜的地方，对没有专门宣传机构的民族来说，那里可算是一块广告牌；对没有银行信用的人来说，那里算是一家信贷联盟；甚至还可以是人民法庭。除此之外，教堂还有其他百余种功用，进一步加强了牧师这一职位的重要性，此中的机会和压力赋予教会牧师职业新层次的含义。大学问家无神论者杜波依斯称，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牧师是黑人在美国大地上发展的、最为独特的职业”。

毫无疑问，这些拥有强大品格的牧师考验了教会会众行使权力的能力，这些权力正是浸信会教义所保证的。一般来说，牧师不需要教会民主。他们认为自己是受上帝的呼召，扮演摩西的角色，自己既是掌权者又是先知。他们认为教会成员最好的表现，便是像以色列子民一样孩子般地顺从。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的执事理事会是少数可以有效保护自己的教会成员不受牧师压制的团体。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确信教会成员与牧师对教会质量的影响是等同的。那些执事选择最训练有素、最有抱负的人做牧师，并把这当成一项传统，他们效仿欧洲君主与贵族之间的种种，展开巨大争斗。这些成了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中的常规事务。教会刚成立的前 10 年间，有近 12 位牧师来了又去。

相比而言，第一浸信会教堂一直是以牧师为主导的教堂，刚成立的前 57 年间，只有 3 任牧师。这些尊贵牧师的掌权方式诱导了 1910 年另一次大规模迁徙，不久后教堂便被火烧毁。当时的牧师是安得鲁·斯托克斯，他是位优秀的演说家，其组织能力也非常出色。他第一年在教堂供职时，总共为 1100 多位新教民受洗，影响力可见一斑。如果不是 1917 年发生的黑人大迁徙使芝加哥的教会民众数量一跃成为全美第一的话，斯托克斯所在的第一浸信会教堂会一直是美国最大的黑人教堂。斯托克斯非常善于赚钱。如果哪位白人房地产经纪人很难卖出某套房子，他们经常提前给斯托克斯一笔钱，让他住进去。直到白人买家组织起来将他从白人社区中赶出去，房子转手给了白人，这笔房地产经纪人给的退款就“合情合理地”属于他了。斯托克斯常常同执事们开玩笑说，白人们付钱合情合理，他们要为自己的歧视行为付出代价。他拿出其中一部分钱为教会捐款，大概是为了平息教会中的风言风语。如果说教会成员对他的这些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那么斯托克斯提议重建烧毁教堂的事则引起了异常激烈的争论。他计划在离教堂几百英尺，归自己所有的东北处转角地段上重建教堂，通过办理产权交易的方式来取得教区牧师住宅的所有权。随之而来的争论给教会组织带来很多无法修复的创伤。由于富有的教会成员比 30 年前有更多要求，斯托克斯甚至承诺说要让新教堂的门正对里普利大街，但执事中不安分的精英人物则开始计划转向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

据说，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实际上不太欢迎新教会成员，他们担心教堂信众增到 700 人的高峰，会把整个教堂的质量拉下来。教堂中的几位执事还在公众场合预测说，若没有他们的钱和支持，斯托克斯将永远不能重建第一浸信会教堂。斯托克斯丝毫不畏惧这些，继续向和他在一起的穷困教会成员布道。他们无法借到教堂场地，只能在户外会面。他还制定了一条律法：凡是教会中无法按照要求提供教堂建设金的成员，必须每天带一块砖头来新场地，无论砖头的来路是哪里：买的、偷的，还是从南北战争的废墟中挖出来的。奉献仪式进行了 5

年后，斯托克斯带领大家为教堂的建成大喊感恩，这座教堂就是后人所熟知的“每日一瓦教堂”。

之后的30年里，两个教堂之间再没有出现如此激烈的冲突，甚至开始尝试非社交性的宗教合作。社区重要领导之间经常在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召开小型会议，在第一浸信会教堂中宽敞的圣殿中召开大些的会议。教堂会众和教堂之间截然不同的传统都稳固地保留了下来。两个教堂的管理人员基本都是早前第一次黑人大迁徙中离开白人教堂的黑人的孙辈，也是那些因为诽谤和阶级的争议而分裂教堂的人的子女。此外，他们的性格也反映出一些差异。第一浸信会教堂教会秘书威廉·比斯利性情温和，开朗坚强，属于劳动人民阶层；而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教会职员R. D. 内斯比特是保险行业的高管，身材瘦高结实，皮肤为浅棕色，穿着体面，做事专业，在陌生人面前，甚至在一些朋友面前都沉默寡言。不久，他们之间又将有一个不同——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与其牧师之间的关系一直颇具争议，内斯比特和他的教会委员会即将面临一场厄运，这将是一场非常严酷的考验。

1945年夏末，内斯比特第一次去外地游历，那也是他生平唯一一次参加全美浸礼联会的年度会议。500万名会众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黑人联盟。同往常一样，白人依旧无视这五天的盛大庆典，除了饭店经理，他心里真是乐开了花，黑人牧师、合唱团成员以及教会官员长期以来连续刷新参会人数纪录——此次人数多达1.5万人。与会者专注于布道、唱诗以及选举活动。唱诗班的成员身着颜色鲜艳的衣服列队站满整个会堂。其中有经常指挥演出自己作品的公众人物、福音音乐之父托马斯·多尔西，《亲爱主，牵我手》就是他的代表作。无业的唱诗班指挥赶来找工作，老朋友在桌前重新相聚一堂，桌上摆着各式佳肴的油炸食品。会场一片喧嚣，人们相互鼓舞中，大快朵颐，与此同时，教堂还出售了不少神职人员职位，并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同年，内斯比特回到家里，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颇具名望、训练有素的候选人来填补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牧师职位的空缺。他非常符合教会的要求，因他至

少在 5 所学院上过学，并且有 4 个名字：艾尔弗雷德、查尔斯、利文斯顿和阿波恩。6 个月后，按照教堂的惯例，在经历了一系列煞费苦心的选举过程后，阿波恩正式就职。

后来阿波恩牧师带着妻子来到蒙哥马利郡，执事们原本私下表达对阿波恩的担心更加快速地蔓延开。不知为何，当时背景调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发现他还有位妻子。大家手忙脚乱地重启调查，竟然发现阿波恩还有其他几位妻子，事情变得更糟了。在阿波恩去参加 1946 年的全美浸礼联会时，教会陷入了一场让每位牧师都毛骨悚然的噩梦。在阿波恩牧师离开期间，他的妻子和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的一位军人公开交往。在阿波恩回来之前，执事们单独找她来开会。阿波恩的妻子打断了他们严肃、经过雕琢的问询，露出伤痕累累的肩膀和腿，告诉他们自己在家中经常遭到殴打，并宣布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决不悔改——这让人们大为震惊。

大家要求阿波恩牧师辞职，而他拒不屈职，还说他的私事不关别人的事。他称自己不怕执事们把这件龌龊事公之于众，其实他知道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做。执事们想要予以还击，打算通过法律手段把他赶走，提出了秘密诉讼，而阿波恩并没有把那些人放在眼里。不过，当时白人和黑人报界都没有报道这个案件。

阿波恩提出强有力的被告辩护证词，声称宪法规定政教分开，禁止法官参与到教会纷争当中。无论什么情况，执事们都无权通过教会会众的集体投票来罢免他。那些执事动用他们的关系，召来了全美浸礼联会主席 D. V. 杰米森，来为这件敏感的案子作证。不开庭审理结束后，法律裁决取决于白人法官。毫无疑问，出于对杰米森的仰慕，加上阿波恩缺乏执事们的支持，法官命令阿波恩在规定时间内离开教堂。他进一步命令 R.D. 内斯比特和其他 4 位起诉阿波恩的执事在阿波恩离开之前，不做演说，不歌唱，甚至不在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内祷告，违者以全部裁决无效论处。就这样，识人不明的执事们挽回了局面；阿波恩没有什么公众丑闻。之后，阿波恩转而在纽约的一所教堂任职牧师，时间长达 17 年，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官方历史上提到：“上帝保佑阿波恩的整个神职生涯”。

内斯比特和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的执事们等了将近一年，才寻到了一位新牧师。亚拉巴马州立大学一位新任的音乐教授给他们推荐了一位牧师，教会的情况才逐步开始好转。阿拉巴马州立大学是一所建立在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地下室的黑人学校，那所学校的不少老师都加入了德克斯特浸信会。校长的女儿阿尔托娜·特伦特·约翰斯是一位钢琴手，也是小有名气的音乐老师。20世纪之初，她在“甜蜜奥本”大街蓬勃发展的亚特兰大黑人上层社会中有着很好的声誉。在内斯比特看来，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她是弗农·约翰斯的妻子——弗农·约翰斯是现代最出色的学者牧师之一。黑人社会排名前三的最重要牧师中，除了弗农·约翰斯之外，还有两位分别是莫迪凯·约翰逊和霍华德·瑟曼。

通过约翰斯夫人的介绍，内斯比特邀请这位颇具名望的牧师来布道。整个教堂座无虚席，赫赫有名的弗农·约翰斯站到布道台上。他背诵了一大段经文，没看一眼《圣经》。之后，他足足讲了半个小时，中间没有停顿也没有看提示，所有教堂会众都听得出神。教堂的执事们原本就很敬业，但约翰斯的表现让他们大开眼界。据内斯比特回忆，当得知约翰斯想要加入他妻子所在教会的时候，执事们头一次开了先例，甚至没有对他进行调查，也没有让他第二次讲道，就为他提供了牧师职位。1948年10月，约翰斯搬入南杰克逊大街上的牧师公馆。在他做牧师的4年中，整个教堂充满敬畏、欢笑、鼓舞、恐惧和烦恼。对内斯比特这位尽职尽责的执事来说，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像约翰斯这样的大麻烦。

对所有的白人来说，弗农·约翰斯仅仅是一位“隐形人”，但对其他“隐形人”来说，他却是个传奇。生存和种族最深处的秘密在他体内猛烈地碰撞，这种碰撞让他的大脑发热，全速运转，至死方休。他祖先的故事非常可怕和混乱，甚至超越了最离奇的小说。在奴隶制时期，他爷爷用长柄大镰刀把主人劈成两半，被判处了绞刑。即使在命案发生80年后，在约翰斯家族中还暗传着：凶案发生的地方闹鬼，猎犬都不敢靠近。

约翰斯的外祖父名叫普赖斯，是个有苏格兰血统的白人。他同时拥有两个完

全不同的家——一个是和白人妻子组建的，一个是和黑人妻子组建的。这种情况虽然在父权制社会相当普遍，但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无法得到大众的认可。普赖斯杀害了一名白人，成为弗吉尼亚监狱收容的第一批犯人。有关此事黑人孩子们是这么传的：他看到一名白人男子正要强奸他的黑人情妇。他保护自己的情妇说“她跟白人女子没什么不同”。他因此获得了很多黑人的青睐，但就其本性而言，他生性刻薄，脾气古怪，有暴力倾向。他的黑人妻子在 18 世纪 70 年代去世之后，他把和黑人妻子所生的孩子都带去了和白人妻子组建的家，让他没有生育的白人妻子“凯蒂小姐”抚养。弗农·约翰斯的母亲——萨莉·普赖斯，还是一个女孩时，就要接受这种转变。很多年后，她才告诉家人，要如何尊重这些禁忌，来和一切对立的现实抗衡，甚至连一家人这样的亲密关系也不例外。她从未向父亲开口叫过“父亲”，因为他们只有作为传教士带来的、被白人夫妇领养的孤儿，才能维持体面：传教士带他们来，白人夫妇领养他们。普赖斯在 1900 年前后去世了，萨莉·普赖斯·约翰斯带着年幼的儿子弗农和丈夫威利——那个被绞死的黑奴的儿子，重新面对这样一种疏离又平等的家庭关系，耐着性子坚持完整场葬礼。普赖斯就埋葬在“凯蒂小姐”和其他白人亲戚的坟墓对面。

威利·约翰斯不久以后去世了。没过多久，萨莉·普赖斯顺次嫁给了亡夫的弟弟。就这样，年少的弗农·约翰斯成为他叔叔的继子、杀死自己主人的黑奴的孙子、为了自己的奴隶而去杀人的主人的外孙子。他只有在《圣经》中才找到了有关这种纠缠着性、家庭、奴隶制以及暴力话题的公开讨论。

弗农·约翰斯生于 1892 年，在距离法姆维尔外不远处的爱德华王子郡长大。那个地区非常偏远，那里的居民还保留着一种很特别的口音，和早期居住在那里的苏格兰口音不同。外来者都认为有点像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口音。这个小郡相对有些落后，它坐落在黑人居住区最北部的边界，那里农业很发达。弗农·约翰斯一直坚信，农业是独立和繁荣的基础。尽管很久以后，20 世纪的市场经济让他的家乡沦为威廉斯堡附近的一座鬼城。

约翰斯长着国字脸，下巴尤为方，鼻孔外扩，胸很宽阔。他开玩笑说他那双巨大的手好像弗吉尼亚火腿。要不是他戴着那副颇具学者风度的角质框架眼镜，他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视力不佳，所以在他年轻时曾许愿祈求哪怕能读一遍小号字体印刷的《圣经》也好。他经常听别人大声读《圣经》，当时他第一次表现出非凡的天赋——长篇文章只要听一两遍，就能背诵下来。在初中时，有一次他因擦掉满满一黑板的作业而受到责骂，约翰斯一字不落地凭记忆都写了回来。他很快又展现出更多出色的能力，背诵大段《圣经》中的文字，包括《圣经·新约》的整卷《罗马书》。他父亲威利因此非常高兴，威利每个礼拜日都会离开农场，作为“挂包牧师”去赚些外快。

像大部分黑人父母一样，萨莉·约翰斯和她的两任丈夫，都把微薄的教育经费花在长女身上，约翰斯只得留在农场做工。在那里，他一直有自学的习惯，这似乎更加巩固了他的天赋。他常在犁后背诗，搜寻各种书籍，废寝忘食地看。他能力出色，又有进取心，借此得以进入多所学校受教育，其中就有林奇堡的弗吉尼亚学院。大概出于年轻人的叛逆心理，他离家前往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他在院长的办公室里，说自己已经做好了听课的准备。这位学识渊博的白人自由主义名牌大学的校长，尽量保持自己的风度，彬彬有礼地对这位“一战”时期粗鲁的年轻黑人说，因为约翰斯的学分不够，奥柏林学院已拒绝了他的申请。

“我收到你的信了，菲斯克院长，”约翰斯回答说，“但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想要有学分的学生，还是有头脑的学生。”

据菲斯克和约翰斯两人回忆说，当时院长不耐烦地递给了他一本德文书，要求他读出来——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读了出来。院长立刻让约翰斯去见奥柏林大学神学院的院长，大名鼎鼎的爱德华·英克里斯·博斯沃思博士。博斯沃思用一本希腊文的《圣经》测试约翰斯，约翰斯微微一笑，完成了挑战。后来几年，他并没有学习拉丁文和希伯来文，而是一直偏爱希腊文，并收集希腊文的历史故事和诗集。虽然第一次见面，约翰斯给博斯沃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同意录取约翰斯。就这样，约翰斯作为一名临时学生进入奥柏林大学；学期结束时，正式成为博斯沃思的门徒，并成为神学院正式的毕业生。另外，他还通过博斯沃思的推荐，找到一份兼职牧师的工作来贴补己用。这一年里，约翰斯取代了罗伯特·M·哈钦斯，成为班上奖学金的获得者。哈钦斯来自美国中西部地区，在废奴主义传统上属自由主义者。他真是被约翰斯逼得忍无可忍，便随口说：除非作弊，没有哪个国家的黑奴能够取得约翰斯的分数。这句侮辱性的话语立刻传到约翰斯的耳朵里，他当即满校园地找哈钦斯，不仅骂他是“婊子养的”，还一拳打在他的嘴上。（不打不相识，这两个人以后成了好朋友，哈钦斯在芝加哥大学做校长期间，和约翰斯一直保持着良好友谊。）

在1918年春天毕业典礼前夕，约翰斯被选为年度学生代表，在纪念拱门处发表演讲，为在中国义和团运动中遭杀害的奥柏林学院学生传教士致辞。毕业后，他又被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录取，攻读研究生学位——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是社会福音神学研究者的总部。毕业后，他进入唯一一个为黑人开放的脑力工作领域，他作为宗教学者和传道士声名鹊起，并得以在教堂任牧师或在学校任教职，这些在19世纪20年代是最好的工作。但由于他天性使然，不是选择了放弃，就是很快离职，返回到位于弗吉尼亚家中的农场务农。在那里，他沿着东海岸在黑人教堂和黑人学校布道，赚取一些微薄的演讲费。他常常穿一身破烂的套装，衣服口袋里塞满书，搭乘隆隆驶来的里士满的火车离开。待他返回的时候，他弟弟总是牵着一匹才出生没多久的马驹，在火车站迎接他。约翰斯要耕作好几天才开始他的下一场演讲。

那时是斯科普斯案发生的年代，神学自由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不仅在学校和教堂争执不休，还把争论搬上法庭、提交立法机关。报纸头版都是有关创造论、处女圣母马利亚生子以及基督徒的社会责任等话题。每一派都有各自的小册子、期刊、例会以及呐喊助威的团队。自由主义者从不在年度《最佳布道文》的年鉴中发表黑人的作品，作为自由主义神学理论的狂热支持者，约翰斯被深深激

怒了。他派一些神学家负责发表莫迪凯·约翰逊和霍华德·瑟曼的几篇布道文章。当遭到拒绝后，他坐下来亲自写了一篇布道文。1926年，他写的《变形的时刻》成为第一篇黑人发表在《最佳布道文》上的作品。那篇文章中对摩西、以利亚和耶稣基督生命中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分析，成为下一代的黑人神学学生的研究重点。“有些登上山顶的经历是非常好的”，约翰斯在一篇长文章里写道，那篇文章论述了领导者的鼓舞和普通大众的经历相结合的必要性，“一颗不信奉基督的心，任凭最少的一部分人往星星的方向拉，也无法让那颗心欢欣雀跃”。

在这与外界隔绝又充满共鸣的黑人教会世界中，约翰斯已经如华盛顿的哈沃德大学的校长莫迪凯·约翰逊，还有国际著名的、在白人和黑人大学都有重大影响力的神秘学家霍华德·瑟曼那般出名。（在瑟曼的妻子与瑟曼结婚之前，约翰斯曾追求过她；约翰斯还接替莫迪凯·约翰逊，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查尔斯顿第一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一职）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同辈，但到这里，他们的相似点便戛然而止了。约翰逊和瑟曼都来自黑人贵族阶层，举止非常优雅，做到了都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应做的——定期在核心杂志上发表文章，退居到行政岗位上做管理，还会给后人留下整齐存放的与各行业杰出人物的通信。约翰斯却从不循规蹈矩，他很少去记录一些东西，也从来没想过要进入什么名流圈，他穿着配错的袜子，鞋上沾着农场里的土。

1927年，约翰斯与院长的女儿结婚，但他仍旧像混迹于那些圈子中的一位游客。大萧条时期，他性格古怪，从不循规蹈矩，他的生活方式还带有点波西米亚流浪者的风格。他会跟一位朋友跳上汽车，离开家，一走就是数月，去往各地布道，在牧师集会上搜集旧书，帮助推销新起步的杂志。在这些旅途中，他遇到的大部分人都对他的智慧和修养一无所知。有些认识约翰斯的人，问他为什么会放弃学院稳定的工作，选择漂泊的生活，约翰斯并不作答。约翰斯热爱旅行。在种族隔离盛行的南方，黑人要找到能接纳他们的摩托旅馆以及饭店非常困难，他便打包大块的奶酪和好几夸脱放在冰中的牛奶在路上吃。旅途中，他不停背诵诗

歌。在亚拉巴马州，同行的旅者听他背诵了济慈所有的诗，在到达法姆维尔之前背诵完了拜伦和勃朗宁的诗。约翰斯用诗歌的篇数来估算所行的距离，不背诗的时候便会谈论军事历史。

19世纪40年代经济复苏以后，约翰斯又开始进行他的学院巡回演讲——这次演讲对象包括专职牧师、历史学家甚至还有经济学家，加上通常惯有的一群神学家——他依然不循规蹈矩。大学的行政人员常常接到他的传唤，让去他的“办公室”，匆匆赶到后却发现他是在巴士站的电话亭里。负责接待的学生开车送约翰斯去大学的校长贵宾招待所，要为他拿包，而递到他们手中的却是从杂货店里取来的纸袋，里面塞满书、内衣还有半旧的衬衫。通常来说，他精彩绝伦的演讲往往会让人们忽视他的种种怪癖。就算现在想起来，也会觉得挺有趣。很多蒙哥马利市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的教会成员都会发现，不管怎样，约翰斯打破偶像主义的行为总会带来点麻烦事。

起初，约翰斯和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会众即使存在分歧也只是一些细枝末节，他们在绝大多数部分都能达成共识。比如，在教会成员集会时，他们厌恶哪怕一丁点在情绪上的流露。在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没有喊叫声，甚至在布道中连“阿门”都不用回应。教会成员最公开表达感情的情形，也不过是在人群中轻声表示同意。这样的克制让约翰斯很高兴。他不信奉很多教堂中非常流行的马拉松式祷告会、复兴以及极度活跃的教堂辅助节目。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不仅平时没有这些，哪怕在礼拜日的晚祷中也不会有。

不过，约翰斯喜爱黑人灵歌，那是从奴隶制时期发展起来的音乐——他认为那些音乐拥有来自历史和心灵两方面的真实性，这真实性是属于教堂的。可惜的是，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完全禁止灵歌。约翰斯提出，教会误解了这种高贵形式的本质，并准备发起运动，改变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的赞美诗集。那时教堂的赞美诗集中没有乐谱，只有歌词。整本歌词就好像一本诗集。约翰斯辩称那本赞美诗集里的歌太矫揉造作，简直太折磨耳朵了，还说里面应该包含灵歌。他试着

在许多规划会议上提出灵歌演奏的安排，不料却被告知“不要在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这么做”。最后，约翰斯采用了极端手法，邀请一群会众来唱一首并未印在祷告程序上的灵歌。他示意教堂风琴手埃德娜·金开始演奏，而埃德娜·金，身为一名忠实的德克斯特教会成员，即便是在如此重压之下，也并未遵从牧师所愿。约翰斯下巴上的肌肉抽搐着，埃德娜·金同样如此。她还是拒绝演奏《去吧，摩西》《我们很快就会自由》《我有了鞋子》以及其他灵歌。作为回应，约翰斯围绕尊严、骄傲以及虚荣心之间的重要区别展开布道，训诫了教会成员。他的“手段”还不止于此。

约翰斯在蒙哥马利的活动之一就是要把教堂入口台阶上极小的告示牌换成了一个颇为显眼的大牌子，摆在正冲德克斯特大街人行道的位上。于是，1949年，所有蒙哥马利的市民都看到了牌子上的告示：在这个礼拜天，弗农·约翰斯会围绕“死后的隔离”这个主题做布道。毫无疑问，很多白人私下里希望人死后也要有种族隔离。这个题目吸引了大众的关注，也引起了当局的怀疑。一位黑人牧师打算率先用如此爆炸性的现实题目，就种族隔离问题发言，这让当地领导人感到有点恐慌。警察局长为防止出现煽动性活动，便邀请牧师先在车站做活动的解说。

约翰斯告诉局长和警察，布道将对所有人开放，他相当赞成他们的想法，能立刻来场预演，免得大家太怕进入黑人教堂。接着，约翰斯凭记忆背出一段经文，以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作为开头——那是基督讲的一个寓言故事，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乞丐和一个富有的财主的。财主生前享尽荣华富贵，从不把拉撒路放在眼中，死后却非常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在地狱里，仰望着在天堂里的拉撒路。于是他恳求祖先亚伯拉罕，让他派乞丐从天堂泼下些凉水到地狱中，来缓解他的折磨之苦。但是亚伯拉罕回答说，他们之间有一道“巨大鸿沟”。这道巨大鸿沟，约翰斯在布道时说，正是隔离。这鸿沟把人们隔离开，让人看不到他们共同的人性——那位财主，哪怕在地狱遭受着巨大痛苦，仍旧执拗地认为，自

己作为主人，不应直接与拉撒路说话，也没有认可拉撒路的美德，而是让亚伯拉罕“差遣”拉撒路拿些水来，财主认为拉撒路不过是个仆人罢了。约翰斯说道，并不是金钱让财主下到了地狱，因为相较于天堂里的百万富翁亚伯拉罕，这位财主只是和亚伯拉罕说过话的、地狱中的百万富翁。准确说来，财主是因为自己对隔离的坚持而受到惩罚，这惩罚甚至在死后还会一直顽固地延续下去。他就这个主题布道了几分钟。约翰斯之后回忆此事还骄傲地说：“警察局中所有人都眼含热泪。”而他周日的那场布道带给教会成员的顶多是一些复杂的安慰，他指出不仅是白人想要把自己的族群隔离开来。“哪位牧师不愿让自己的教堂满是财主那样的人呢？”他问道，并开始形象地描述财主的“紫色华服”，仿佛他面前就聚集着那群身穿华丽服饰的人。他直言说出大部分做礼拜的白人所持的社会观念，说在他们眼中，这些黑人算不上什么基督徒，不过是“太阳崇拜族”而已；他也很实际地说了在“斯平特林克德黑人”中，存在同样的问题，那些人好像是在德克斯特的“时装秀”中表演。“斯平特林克德”是他自创的词语，他一直拒绝解释这个词，但大部分听众都知道，这个词一定和精英人士通常都有的死板性情有关。

约翰斯对黑人和白人都发表了态度明确的严厉声明，但白人由于“二战”后优越地位带来的相对的安全感，显然没有黑人能感受到其中的危机。在一般美国民众看来，为黑人争取利益这一具有重大转变的观念，几乎同创造一个世界政府一样难；说到底，这种想法既有些空想，又有点危险，并且极其遥远。在大众的意识里，种族问题不过是个充满人情味的故事。此时正值黑人棒球手杰基·罗宾森和布鲁克林道奇队的第二季比赛，同年夏天，黑人棒球手萨裘·佩吉开展职业性运动联盟的首秀，这时候他的年龄在39岁到48岁之间，这次他让7.8万名克利夫兰队球迷欣赏到了精彩的“犹豫球”（在投手挥臂准备投球的过程中，停滞一段时间再投掷，让击球员不能准确判断击球的时机。——译者注），尽管这个球的合法性饱受争议。除了棒球大赛外，本年度还有一场最大的“赛事”——

总统竞选，南方各州的政治家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分离出来，推举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南方人接受了“州权民主党”这个绰号，整个南方报业的编辑都为这个事件颇为懊恼。

1948年7月26日，总统杜鲁门发布执行命令，消除军方种族差别待遇——蒙哥马利种族歧视唯一突破象征主义的进步。此举在蒙哥马利激起不小波澜。这里的地区经济极度依赖于两个空军基地——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和贡特尔空军基地，每年联邦都会向这个地区投入5000万美金。自从那段内战前的光荣岁月开始，地方经济就一直下滑，即使大部分市民都不愿意承认，联邦的钱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复苏。另外，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也是因为被新式飞机吸引到蒙哥马利，他们的相遇还为这里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在19世纪30年代，钱纳德上校和比利·麦克唐纳还经常自驾飞机从城市上空飞过，两架飞机机翼用两条丝带相连，在飞行中不会扯破——以此向质疑他们飞行水准的军官们大显身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对空军的拨款让蒙哥马利的旧居民重新感受到一片繁荣，不禁令人遐想从前。那时蒙哥马利贯穿亚拉巴马州中部的大片地区，当地的上层社会真是富得流油。重建后的蒙哥马利仍旧瞧不起像伯明翰这样的钢铁城，戏称它是喷着气的粗鲁怪物，他们还认为塞玛（位于亚拉巴马河的下游）这样高调的古老棉花城只有一个看似富裕的空壳子。（在蒙哥马利高中的厕所中，最常见的涂鸦就是：“请冲厕所，塞玛需要水”。）

杜鲁门的命令提醒了大家，蒙哥马利之所以有这种种族境况，是因为政府强制把两个种族充分混合在两座大型空军基地中。这座城市无力阻止政府的命令，但地方会议可以确保不让这项制度从军事基地蔓延到城里。在蒙哥马利，白人和黑人在公众场所一起下跳棋或者同乘一辆出租汽车是违法行为。公交车系统管理条例比其他南方城市更加严格。在蒙哥马利，黑人坐在车尾，白人坐在车头，只有车厢很满的时候才能靠在一起。公交车司机有权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强加一条“浮线”，让黑人男子的腿和白人女子的膝盖保持距离。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

公交车司机可以命令黑人空出整整一排给白人让地方，或者即使车上有空座，司机也可以命令黑人站着不准坐。黑人不得穿过白人所在的区域去找座位，而是必须在前面付过车票钱，然后离开前门，在后门上车。一些怀有恶意的司机在黑人乘客还没来得及从后门上去时，便开走了。

在这种大环境下，对弗农·约翰斯来说，他能做出的最实际的行动是可以跟白人自由交谈，也可以随意谈论白人，虽然这已经前所未有的，但还是非常局限。他尖锐的谴责只会招来黑人同胞们向他寻求解决办法，而他却无能为力。那些来找他的黑人女子有的被白人男子强奸，有的遭到了白人男子的暴打。其中两位年轻女孩的故事尤为触动约翰斯。他在夜深人静时开车带着女孩去塔斯基吉医院做体检；他详细盘问受害者，以确保对方不是在说谎；他和受害者一起去警察局提出指控——其中一个女孩指控一位店主，他闯入她做保姆的人家，强奸了她，另一位是指控六位白人警察。第一件案子实际上已经送上法庭审理，但那名店主的妻子出庭作证，说自己怀孕了，因此允许丈夫在外面解决生理问题，最后店主无罪释放。第二件案子也因地方当局拒绝警察出庭而不了了之。

约翰斯非常主动地帮助其他同胞受害者，但在自己成为受害者的时候，他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一次，他上了一辆公交车，付过车费后却被告知要下车，从后门上。约翰斯拒绝照做并坐在了前面的座位上，司机拒绝开车，于是约翰斯要求司机退钱。退钱这类事并没有先例，约翰斯请求公交车上所有的黑人和白人都跟他一起反抗，但一个响应他的人都没有。当时有位在公交车上的德克斯特教会成员说，当时那么冲动的反抗很不应该，约翰斯要“更明事理”。还有一次，约翰斯走进一家白人餐馆，点了一个三明治和一杯饮品，准备外带回家。他的要求立刻引起整个餐厅一阵紧张的静默，但服务员看到他魁梧的身材和他无畏的态度，还是为他做了一个三明治。服务员做好饮料后，可能是迫于围观者给他造成的压力，他缓缓把饮料倒在牧师面前的柜台上。约翰斯又点了一杯，然后说道：“我生性不喜欢被摆布，我今天偏不信这个邪。”他话音刚落，一伙顾客跑

出去，从车中拿出一把枪，把他轰出了餐厅。“我为那个三明治，说出了我平生最短的祷告词，”他回忆说，“我当时说‘他妈的’。”

约翰斯焦虑易怒，他的字典里就没有妥协和圆滑一说。有时人们不禁想，与其说约翰斯内心为白人的人性所烦恼，不如说是为世间所有的人性所烦恼，人们根本没必要去猜测他批评的内容。他极其蔑视礼貌、奉承以及其他为保护脆弱人性所做的一般性防御，认为这些虚假的客套会让人们不真实。不过，约翰斯却觉得自己不失幽默。一天，在蒙哥马利的街上，他碰到德克斯特出色的教会成员鲁夫斯·路易斯，那是一位高大健壮、有着一双明亮眼睛的男士，说话威风十足。他在黑人圈中是位很有名的葬礼主持人，同时也是著名的足球教练和选民登记方面的领袖型人物。约翰斯叫住他，吸引来一大群人，他询问路易斯有关选民登记活动的问题。对约翰斯来说，大家的关注是最高的赞美。待路易斯回答完，他说：“回答得不错，路易斯，不过你从来不来教堂，你最好祈祷别在我还在教堂的时候死，不然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地狱般的葬礼。”一个礼拜日，德克斯特教会所有负责人聚到一起，亚拉巴马州立大学的校长康瑟尔·特伦荷穆很舒适地坐在教堂长椅上，据说他是蒙哥马利黑人，尤其是德克斯特教会成员的最大雇主。约翰斯在布道台上说：“讲到这里我要停一下，特伦荷穆博士，您要是能保证半年来一次，我才能让您在这里坐。”从此只要约翰斯在蒙哥马利，特伦荷穆决不回德克斯特。鲁夫斯·路易斯虽然不介意在此和他碰面，但来教堂的次数仍旧很少。

约翰斯所做的还远不止于此。R.T. 亚岱尔医生怀疑妻子通奸，在家中门廊枪杀了自己的妻子。虽然知道这位有名的内科医生没坐一天牢，镇上所有黑人却一点都不惊讶。亚岱尔再一次去德克斯特教堂时，坐在他往常习惯坐的位置上，约翰斯很快走上布道台，向会众宣布道：“这里有一位杀人犯，神说‘你不可杀戮’。亚岱尔医生，你已犯下了罪，愿上帝怜悯你的灵魂。”在这庄严的裁决过程中，约翰斯紧盯着台下的亚岱尔，一只眼睛威胁似的抽搐着——那只眼睛在他幼年时被骡子踢过。随后他坐了下来。尽管这次责难后，他没有对亚岱尔进行进

一步的制裁，但作为一名黑人牧师，他已经勇敢地完成了向另一个特别角色的转换：代替冷漠的白人当局来做法官与陪审团。

约翰斯的布道活动都坚持围绕蒙哥马利黑人形象和经济地位展开。他严厉责难德克斯特成员，认为他们对地位和名誉的追求胜过了对工作的热爱。蒙哥马利的黑人专业人士少得可怜：5万黑人中只有1名牙医，3名医生；相比之下，5万白人中粗略算来有43名牙医，144名医生。有工作的黑人中超过一半是工人或是家政工作人员。黑人甚至认为售货员是个好差事。而即便是这样，白人售货员数量还是黑人售货员数量的30倍。黑人中产阶级的支柱是学者，他们多是亚拉巴马州立大学的教职工和公立学校的老师，但他们的职业生涯完全仰仗那些付给他们工资的白人政治家的好意。面对如此沉重的压力，约翰斯在布道台上大声疾呼，不去建立一个相较于白人更加平等的经济基础，而是紧抓住那些头衔和象征性的职位不放，对于受过教育的黑人来说，目光过于短浅。他点名要亚拉巴马州立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回答，还挑战教堂会众，让他们说出一种目前黑人可以效力的商业名称。“他们做不了商业，”约翰斯嘲讽地说，“又觉得农业太脏。”他宣称：“如果所有美国黑人在今天都忽然死掉，全国的商业活动不会受到任何重大影响。”为了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应该承担风险，参与到普通大众的工作当中，这些却是他们最不愿意去做的，他说道。他斥责他的听众急切卖掉少数生产资本来换取名望的行为。“你们不是说想要给永恒运动一个定义吗？”他问道，“给一个普通黑人一辆凯迪拉克，然后让他停在属于他自己的土地上。”

约翰斯布道的这些教义和他的政治观点，混合了自内战时期以来黑人团体中流行的好几派思想。同布克·T·华盛顿一样，他强烈支持基础贸易中卑贱的工作，这和杜波依斯《有才能的十分之一》的想法相反，那是一位受过教育的黑人精英对领导阶层进行的首次抨击。同杜波依斯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样，约翰斯主张为了争取一切政治权利进行同步的运动。约翰斯反对华盛顿提出的有贬低别人身份又鲁莽的调解政策，其中主动要求用政治权利交换经济权利。但和杜

波依斯一样，他极度信奉最高水准的学术成就，他无法忍受蠢材的存在。像华盛顿一样，约翰斯认为一个民族的尊严和安全感都源于广大群众，在没有群众的稳定性和民族特性的情况下，一个精英想要凌驾在它们之上生活，纯属幻想。

这些都是文字——争论的文字，书中的文字，在布道台上讲出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在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哪怕是最具讽刺性的演讲也不会让约翰斯和 R. D. 内斯比特感到悲伤。毕竟，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们习惯被别人称作这类或那类罪人。约翰斯为自己骄傲，他并非只是帮大家在满是痛悔泪水的祷告仪式中化解罪恶，而是能让会众在听布道甚至布道结束后都有发自肺腑的愤怒感，虽然他知道这种愤怒也会逐步消弭。约翰斯给人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他的诗歌和口才，还有他的小买卖。其他受人尊敬的牧师，比如莫迪凯·约翰逊和霍华德·瑟曼绝对做不出的事情，约翰斯却乐在其中。那些牧师也许仅仅会像约翰斯围绕经典主题“泥土是根本”讲道。杜波依斯绝对想都没想过要这么做——他不会蓄着凡戴克式尖髯，穿着高筒靴，手持金顶手杖去做那样的事情。布克·T. 华盛顿，有着自己的专职司机和秘书以及仆人，更不会表现出一丝自己想要做生产活动的意愿。然而弗农·约翰斯会在布道中责骂这种脱离实际生活的行为，劝导大家实际工作的重要性，布道结束后，他会去教堂门口当街贩卖农产品，在州议会大厦下面，和白人卫理公会派教徒一起涌出教堂，来到大街上，在穿着考究的德克斯特男人和戴着最漂亮帽子的女人中间，漫无目的地乱转。约翰斯兜售火腿和洋葱，土豆和西瓜，卷心菜和香肠。很多德克斯特教会成员看到这位博学的牧师身着西装，站在一辆小皮卡前面，都感觉受到了侮辱。有些态度较为温和的会众说，他的行为“贬低”了教堂。

人们的这些反应无时不鞭策着约翰斯，要进行更激烈的批评。教堂会众喜欢吃美味的食物，热衷购买日常用品，为什么偏不能和提供这些东西的人有来往呢？他谴责说，那些人在奴隶制的观点上和白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认为体力劳动降低了人的身份——黑人们应该清楚，降低他们身份的，是压迫，绝不是体

力劳动。正相反，这种对体力劳动避之唯恐不及的想法恰恰怂恿了白人在奴隶制上的腐败。

约翰斯的三个女儿很快察觉到蒙哥马利气氛的转变，也意识到教堂会众的对抗会把父亲的辩论和独白推到绝境。父亲却也似乎不再总是沉醉在自己冥思的欢喜之中。他的脾气非常暴躁，有时也会在家中爆发——有一天晚上在家，他怒火中烧，不断要求妻子支持自己的某项言论。约翰斯夫人一直很欣赏丈夫的圣战，当他情绪失控的时候，她始终保持平静。她一直在弹钢琴。她决定让丈夫意识到，他一直唠唠叨叨纠结同一个话题是毫无意义的。她的行为让约翰斯十分生气，他开始大声喊叫，约翰斯夫人无动于衷，继续选择忽视，她用这种行为表达自己的不满。约翰斯变得非常狂暴，呼喊声越来越大。最后，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妻子的衣袖撕破了，这让他的侄女和女儿们非常害怕。孩子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约翰斯夫人仍旧一言不发——她弹奏着巴赫的曲子，没有漏掉一个音符。弗农·约翰斯把撕下来的布条攥了几秒钟，丢在地上，安静地走出了门。几分钟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些牛排，神情愉悦，看表情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约翰斯在南杰克逊大街的牧师住所的后院中建了一个花园，花园边竖着一块耕种说明板，边缘点缀着很多崇拜者的牙痕。一个礼拜天，在布道台后面，他提着一颗硕大的卷心菜和一个圆滚滚的洋葱，“给你们看一下我在这一小块土地上种的东西。”他把蔬菜举起来让教堂会众查看。“我留下了它们的根，证明我不是从商店里买来的”他有些淘气地说道。另一个礼拜天，他来到教堂，鞋上没有穿鞋带，可能因为他把鞋带错放了地方。当他注意到的时候，他盯着教堂会众，随口说：“只有等黑人开始制作鞋带的时候，我才在鞋上穿鞋带”。

然而，第一次把他拉下水的却不是执事委员会，而是鱼。一个礼拜日，他在卡车后备厢装了很多冻鱼。传统上，大家认为鱼贩子的地位非常卑微。空气中混杂着鱼腥味，教堂里的人起了动乱。约翰斯收到执事发来的正式信函，要求他去

面谈。当他听到执事们讲述事情经过，知道人们抱怨的根本原因后，他硬是给他们做了场布道，他详细解释了有关于鱼和鱼贩子在基督教、世界历史以及营养方面的重要性。他充满挖苦和讽刺地跟执事们说，他们传唤自己，标志着自己终于得到教会关注，然后他进行了自我辩护。“先生们，我有义务为你们提供福音书上的内容，也有权利为你们提供食物，在我看来，除了威士忌和避孕药外，我可以卖任何东西。此外，因为鱼的问题，我被宗教人士们传唤了 40 次。”执事们却还是拒绝在许可证上签字，约翰斯突然提出辞职，走出了教堂大门。内斯比特受命去找他，并希望跟他和解。

虽然这件事上约翰斯是成功了，但事情并没有因此好转。内斯比特本人再三对约翰斯做出妥协。大家都知道内斯比特就个人而言很同情约翰斯，而且他本人也不爱说教，对牧师并没有什么敌意。约翰斯继续销售他的农产品，内斯比特无法阻止约翰斯，反而成了众矢之的。之前想要除掉约翰斯的教会成员，看到他们竟然可以逼迫约翰斯主动辞职，便更加明目张胆地反对约翰斯。有一次约翰斯在布道的时候忍无可忍，用手重重捶在《圣经》上——在德克斯特教堂的任期内，他从未在讲坛上翻开过《圣经》，但至少有三三次，他用尽力气捶在《圣经》上。甚至还有好几次，风琴手只是弹奏几首最保守的赞美诗，拒绝为他弹奏其他乐曲。约翰斯每次都生气地走出教堂。内斯比特照例去追他，他沿着德克斯特大街追出几个街区，求他继续进行讲道。

要不是因为仍有客人不远万里来到蒙哥马利，来听约翰斯讲道，并对他的布道大加赞赏的话，教堂人员会更快地联合起来反抗他。结果围绕这个恼人的问题，教会内部出现了分歧：有人说约翰斯是最高贵的人，也有人说他非常卑鄙；有人说他学识渊博，也有人说他普普通通；有人崇拜他超高的智商，也有人惧怕他们对他们尊严的种种挑衅。他非常喜欢提醒大家当初摩西在西奈山上和上帝的对话，摩西也是拒绝自己的身份，不愿作为法老王领养的孙子带领希伯来奴隶出埃及。像摩西一样，约翰斯在人们崇拜和反叛的两极之间激昂地摇摆。与摩西不

同的是，并没有政治奇迹来支撑他的领导能力。他在 1950 年再次提出辞职，仍旧被驳回。

约翰斯常把牛奶和奶酪装进车里，然后开车去往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家庭农场，在那里过几天农耕生活。农场里的动物或是农具都会给他带来轻微的伤害——他年届 60，已经有 30 年算不上是一位纯正的农民了。

1951 年的春天，他再次开车前往弗吉尼亚州。这次并不是去农场，而是为处理一场危机：三 K 党因为一次罢课对约翰斯家进行恐吓，在他哥哥的院子里烧了一个十字架。这事儿还要从 1951 年 4 月 23 日的早上开始说起。在法姆维尔的 R. R. 莫顿中学（校名以布克·T. 华盛顿的助手兼继任者命名），校长接到电话，告知他警察要逮捕两名在公交车站的学生。校长没意识到这是个骗局，于是匆忙赶往镇上。那之后不久，一条讯息传到了各个班级，校长召集全体师生开一场联合大会。450 名学生和 25 名教师排队进入礼堂，一阵乱哄哄的交头接耳后，师生们震惊地发现——就在舞台幕布被揭开的那一瞬间，他们发现出现的并不是校长，而是一位名叫芭芭拉·约翰斯的 16 岁学生，众人陷入一片可怕的沉默。芭芭拉宣布，这是一场特别的学生会议，要讨论学校现在糟糕的教学条件。之后她让老师们都离开。此时，老师们开始渐渐明白，这一切未经校方认可，现在处境十分危险，事态已经向少年违法犯罪的方向发展了。其中几人走上讲台，站在上面，这时芭芭拉·约翰斯脱下鞋子，重重地敲打校长椅。“我让你们全部离开这里！”她向那些老师喊道，她在支持者的队伍中召集了一小群骨干力量，把老师们赶了出去。

芭芭拉是弗农·约翰斯的侄女，他弟弟罗伯特的女儿。她小时候经常跟她的伯父一家一起生活并跟她表姐阿尔托娜学习钢琴课程，回答伯父约翰斯寒冬般严苛的问题——孩子们都要下棋、看书并回答问题，他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任何一个话题向家中的某个小孩“开火”。芭芭拉曾叛逆地把一本漫画书藏在她的裙子里面，在约翰斯家族中，她的火暴脾气和约翰斯如出一辙。如今她让同学们一起

回忆自 1947 年以来的悲惨经历：当时那里为那些容纳不下的学生盖了三所纸糊的临时棚户——学生们不得不穿着厚外套，坐在棚户里面挨过漫漫寒冬；她的历史老师还兼做他们的校车司机，开的那辆巴士是从白人学校接的二手车。历史老师在早晨开完巴士后，还不得不收集木柴，在棚户中生火，但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很久以前，那里许诺黑人校长建立一所新学校，而这许诺就如同陈旧的新年计划惨遭丢弃。黑人成年人想要修正这些不公待遇，并没有成功，现在轮到学生们抗议了。芭芭拉说，即使改进来得太晚，无法让他们受益，至少可以让她的弟弟妹妹们受益。于是，她号召大家“罢课”，全体同学在她的带领下，列队走出学校。

大部分当地白人丝毫没注意到这场纷争，在黑人大人们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芭芭拉·约翰斯和她的小团队就已经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们提出上诉，而那些律师还不知道此次倡议的发起人只是一个孩子。他们同意到法姆维尔开会，但前提是不和“那些孩子”谈判。律师们告诉前来集合的 1000 多名黑人，任何斗争都非常危险，罢课是违法行为。学生们有人大声反驳说他们人太多，监狱根本装不下。律师们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能通过诉讼换来更好的黑人学校——除非多所学校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争取。学生们停了下来，短暂地思索了一下扑朔迷离的前程，便大喊同意。此次罢课事件几天后，反抗的潮流迅速席卷了整个黑人团体，压倒了一直起支配作用、十分顽固的保守派领导阶层。一位年轻牧师，自称是弗农·约翰斯永远的“信徒”，当众发表了一篇强有力的演说。“凡是不支持这些孤立无援，又刚刚迈出人生第一步孩子的人，都算不上是男人。”他宣称，集会投票表决继续抨击种族隔离。罢课事件一个月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在 1951 年 5 月 23 日提出了起诉。与此案一起提交的还有四件类似的案子，该案件作为颇具历史意义的布朗反抗托皮卡教育会案的一部分，会移交到美国最高法庭审理。

如果这场学生罢课运动再晚发生个 10 或 15 年，芭芭拉·约翰斯或许能作为

杰出代表出现在公众传媒上。而在那个时代，白人社会对此类事件一向不予过问，爱德华王子郡以外，黑人学生提起的诉讼也一直都是以败诉告终。1951年，在蒙哥马利，约翰斯在法姆维尔的家中没有电话，他通过信件了解到这起争端。那时电视刚进入大众视野，“青少年”一词从那时才开始普遍使用。无论种族，未成年人在政治运动中起领导作用，这一想法任谁都接受不了。三K党在约翰斯家的院子中烧掉一个十字架，也许当时人们还以为他们攻击的目标不是芭芭拉，而是她声名狼藉、总挑动争端的伯父。

弗农·约翰斯从蒙哥马利赶来，厨房中弥漫着紧张气氛。他弟弟罗伯特比约翰斯小20岁，是位农民，性格温顺，为人实际得多，他丝毫没有掩饰他的恐惧，他的妻子也是如此。两个人都非常担心自己任性女儿的安全，惶惶不可终日。大人们要开会，她被赶到自己的房间，默默等待大人物的决定。弟弟和弟媳对约翰斯的反应感到不可思议：约翰斯显然并没有把家乡的这次麻烦太当回事。他们让约翰斯带着芭芭拉一起回蒙哥马利，等到外面的怒气平息了再回来。约翰斯答应了弟弟的请求，罗伯特恳求他在漫长的旅途中小心驾驶——他一直不太相信哥哥的驾驶技术，尤其是他知道哥哥有时候一面开着车，一面还要背诵诗歌。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便出发了，芭芭拉·约翰斯从学生领袖骤然变成了背井离乡的学生。她的父母往她伯父的绿色别克车上堆了一些奶酪和牛奶，还有一只非常大的西瓜，中间也没有跟她讲话。当她看到伯父这个传奇人物像典型的黑人那样，把车停在路边吃西瓜，她感到非常难堪。伯父没有对她的惊人之举提哪怕一个问题，这令她的怨恨逐渐加深。她非常恼火地揣摩着她伯父的沉默——也许他虽告诫黑人们要为自己的民族站出来，但其间无论发生什么危险他都要自己担。也许他劝诫黑人们勇敢地维护他们的权利，但这么做所招致的危险他会独自承担。也许他要保护她，无论是像保护一位家庭成员那样，还是像保护一个小女孩般——尽管这两种情况都没让芭芭拉感受到。她听着那些诗歌，揣摩着自己是否能够理解伯父这个年龄的人，并思考着他的真实想法。最后，她终于对他的

沉默得出了确切结论，最有可能的解释便是伯父对她的所作所为非常自豪，只是不愿意去赞美她，因为他没有赞美过任何人，因为担心他的赞美会暗示出他曾经没有对她抱这么高的期望。这种结论让她的骄傲很快压倒了她的仇恨，她下定决心，在蒙哥马利，绝口不提自己在法姆维尔的功绩。

芭芭拉·约翰斯注意到的头一件事便是伯父身上日益增加的压力。在德克斯特教会内部，每天都有关于阴谋和背叛的谣言传来。还有一个小细节也显示出最近教会的状况并不好：从自家厨房拿来饭菜帮助教会的女性会众越来越少。约翰斯仍在街上兜售东西，他对教会成员的批评越来越多，认为他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各自的小世界里，一点儿也不团结。“你们连彼此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常常在布道台上大声叫嚷，还号召教堂会众大声重复教会新成员的名字。他辩称，如果他们和自己阶级的群众都如此疏离，那么怎么会有希望团结成一个齐心协力的种族呢？黑人群体的这种隔绝问题简直让他发狂，黑人受到太多白人媒体的误导，把他们同胞的形象进行物化——尤其是他们在看到警方暴力受害人的报道时，简直变得麻木。这是亚拉巴马州充满暴力的一个时期。那时法官和陪审团会只因为一名黑人偷了白人妇女 1.95 美元，而判处其死刑（虽然后来州长福尔松做了减刑）。那时警官总会对黑人实施相对白人而言更严重的法律制裁，法院对此的限制也极其有限。一件蒙哥马利的案子深深刻在了约翰斯的脑海中：官员们借口一位黑人男子超速将他拦下，并用拆轮胎棒把他打了个半死，当时黑人民众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围观。

此事件没过多久，约翰斯就叫来他的大女儿阿尔托娜，严肃地说：“跟我来，迪伊宝贝，我要做一次布道。”他的态度着实把他的女儿吓坏了，他们走出牧师住所，穿过州议会大厦的庭院，到达山下的德克斯特大街。一路上阿尔托娜一言不发，约翰斯打开教堂布告栏的玻璃柜子，把一盒金属字母递给她。她把字母在人行道上排开。同往常一样，约翰斯想了一会儿，然后指示她张贴下个礼拜日新布道的标题：“在蒙哥马利谋杀黑人不犯法”——她在明亮的阳光下笨手笨脚

地摆弄着这些字。任务完成以后，她跟随父亲沿原路返回到山上，如来时那样一言不发。

那天晚上约翰斯家的电话响个不停。电话那头气势汹汹的白人们威胁说除非约翰斯把那个标志移走，不然就烧毁教堂，焦虑的德克斯特教会成员被白人们的愤怒情绪吓得不轻，沮丧情绪你一言我一语地蔓延开来。一位警官来到教堂，传唤约翰斯，他欣然前往。他被包括警长在内的几位警察押送到巡回法院审判。他们对他提出煽动骚乱、诽谤警察局、扰乱治安这几项指控。审讯过程并不正式——法官、警察局长和几位有影响力的市民聚集在一起，审问约翰斯，他们都在揣摩这位非同一般的黑人的想法。当约翰斯被问到为什么把一块指示牌放在教堂外时，他回答说是为了吸引大家注意即将开展的布道，法官轻轻点头。当法官建议他最好把指示牌拿下来时，约翰斯用一段简洁的演讲，阐述指示牌在历史上的意义——在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以及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政治权威如何迫使人们摘下那些指示牌。接着法官问他，为什么会就如此有煽动性的话题进行布道，比如种族间的屠杀。“我去南方布道的时候，所有黑人的境况无非是从肉体 and 灵魂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多半选择委曲求全。而我要告诉他们的是，苟且活着着实不值得。”法官很快便释放了约翰斯，但他警告说，如果他再不悔改，肯定会惹祸上身的。

虽然周六晚上三 K 党在教堂的草地上烧毁了一个十字架，但还是有一大群人聚集到教堂来听约翰斯讲道。他相当详细地拿屠杀黑人和“私刑处死耶稣”做对比，并给大家讲述了杀手和牺牲者所付出的代价。布道最后，他还预言说，只要黑人不起来反抗，“任其发生”，这种暴力会继续延续下去。他做完演讲后，群众一拥而出，来到街上，大家互相交流着心得，发表各自的意见，情绪高昂。

出乎意料的是，之后的第二周，白人法官上门找到约翰斯，向他表达了对烧毁十字架一事的同情。他想和约翰斯探讨一下他在法庭上引用的那段典故。接着他问约翰斯，就他个人而言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的。约翰斯说：“正好，我听说您

有一本联邦将军威廉·特库赛·谢尔曼的回忆录。”由于谢尔曼烧毁了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大片地带，如果确有其事，对一位南方白人来说，此书着算是稀有收藏。约翰斯想要借这本书。法官笑着说，他非常愿意把书邮寄给他。接着，法官直言不讳地说，他一直坚持劝说警方让约翰斯布道，他认为，与其禁止这么做，让他讲道反而对社区造成的麻烦要小得多。此番言论激怒了约翰斯，他之前还请这位法官下周来听他的布道。那位法官给他寄来了谢尔曼的回忆录，但并没有亲自去教堂。约翰斯借此定下了布道的题目“当强奸犯是白人”，从此他再也没有那位法官的消息，后来他把那本书还了回去。

这些布道和其他所有布道一起，进一步加剧了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内部政治的复杂化。约翰斯对种族问题的发言让很多教会成员感到不悦，他们虽然表面上假装喜欢他的发言，但背地里总是绞尽脑汁想利用他卖鱼的“古怪行为”破坏他所做的一切努力。有些人开始倾向于约翰斯，他们还说要是约翰斯不再做那么危险的布道，他们倒是愿意买些他的鱼；还有人为他在种族问题上布道的勇气感到骄傲，谴责其他教会成员在政治问题上的怯懦，说是正是这些懦夫迫使牧师做出诸如卖鱼这样的奇怪行径。在约翰斯看来，不管以上这些人或反对，或支持，他们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本质。在1952年年初，他又连续两次提出辞职。

两次辞职都与教会政治无关，仅仅是他想在销售手法上有所改变。约翰斯为了给德克斯特的顾客提供方便，开始在教堂里储备星期天要卖的货品。在布道台上，他总是巧妙地在布道时加上点对商品优惠活动和地下储藏室中产品质量的评论。销量增加了，这导致有些教堂成员认为约翰斯所作所为已经越界，他已经走上通往“污秽”的道路。尤其是有些女性领军人物被激怒了。这让约翰斯陷入了大麻烦，因为大部分教堂会众都是女性。她们为教堂的常规运作发挥了很大的主动性，从教堂的音乐到饭餐再到花束，根本离不开她们的贡献和打理，黑人社会倾向于母权体制，这种不争的事实扩大了她们的实际力量，这种力量远远超过教堂花名册附着的那张名单。

第二件起决定性的事件发生了。约翰斯和鲁弗斯·路易斯竟然把载满西瓜的卡车开进亚拉巴马州立大学的校园，侵犯了主要教会成员的地盘，人们见到博学的弗农·约翰斯在校园中卖西瓜，纷纷围上来，整个教会和所有会众因为这事儿受尽同行的奚落。亚拉巴马州立大学的校园既是黑人先锋队伍所在地，又在此地享有相当大的声望。执事们在会议上与约翰斯争论不休。约翰斯再一次甩袖而去。随后内斯比特再次履行了他的使命，只不过这次他没有挽留约翰斯，而是告知约翰斯，执事董事会建议教会同意他的辞职——他的第五次辞职。教堂因此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氛围相当紧张，德克斯特教堂会众以多数票表决同意了约翰斯的辞职。

弗农·约翰斯先他家人一步离开蒙哥马利，他一路向北，在沿途黑人学院和教堂中做巡回演讲。1952年12月，他回到了位于弗吉尼亚州法姆维尔的家。正好遇到瑟古德·马歇尔和斯波特伍德·罗宾森同其他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一起，上诉到州最高法庭，向法官说明约翰斯家乡的办学条件。芭芭拉·约翰斯和伯父阅读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布朗案的报告，令他俩以及其他所有人惊诧的是，白人当局关闭了法姆维尔整个公立学校体系长达五年之久，且并未在种族隔离的措施上有所妥协。在此事结束前很长一段时间，芭芭拉·约翰斯一直怀有强烈的愧疚感，因为无论如何这事儿都是由自己而起，却留给他人来承受运动造成的后果。她认为，她一定要帮伯父分担这次错误带来的后果。

R. D. 内斯比特这边还有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需要一名新牧师，现在大家一直因为约翰斯的事责备他，只有找到合适的新人，他才能从这里脱身——他先前推举的两个人——阿波恩和约翰斯都不太理想。一些教会成员认为，教会跟牧师连续七年争议不休，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内斯比特不由得对威廉·比斯利产生了羡慕之情，长期以来，比斯利是在第一浸信会教堂和自己职位相当的人，第一浸信会教堂就是内战后他们共同的祖先迁移到的地方。比斯利刚刚顺利完成牧师换届，安排拉尔夫·D·阿伯纳斯牧师接任“每日一瓦教

堂”的牧师——那是自1867年从白人教堂大批出走之后算起的第七任牧师。

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这边一直不省心，执事和教会成员们对竞选牧师的人非常挑剔。他们让软弱的候选人饱受侮辱，让强势的候选人没有把握。现在他们做决定可比从前谨慎多了。整整一年多，他们拒绝了所有的候选人，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从教堂形象的角度来看，他们把自身重塑成了一群不那么迫切需要新牧师的教会会众。同先前一样，他们依旧拖了很长时间，然而教堂中出现了让内斯比特和其他人都担心的问题：教会的人起了内讧并在决策方面优柔寡断。毕竟没有牧师的教堂算不得一座真正的教堂，内斯比特再次出山，开始寻找新的牧师人选。

1953年12月的一天，距约翰斯的离职已有一年半的时间，内斯比特刚刚完成了亚特兰大区域办公室朝圣者人寿保险账簿的审计工作，正和当地区域经理W. C. 佩登谈话。佩登了解弗农·约翰斯给教堂带来的麻烦，他为人还算仗义，内斯比特便对他推心置腹地讲述，自己是如何费尽心思寻找一位新牧师，符合德克斯特教会成员的标准是多么困难——他完全信赖佩登。他说，他所需要的是位更加传统的牧师，那人要受过良好的教育及训练，无疑还要符合德克斯特教堂的传统——要找个比约翰斯的穿着打扮、性情、举止更为传统的人，一个不会引起争议的人选，他可以更年轻一些，不那么出名也没问题，也不会和执事们抗争。

佩登突然一个激灵，猛地站起身来。“内斯比特，我想我确实知道有这么个人符合你的要求。”他说。他所说的这位年轻人非常完美，他一路名校，是一位富裕、有名望的牧师的儿子。佩登跟他们家族私交甚好，知道这位年轻人现在正在亚特兰大度假。就这样，他安排内斯比特和马丁·路德·金见面了。

第二章 洛克菲勒家族和埃比尼泽教会

内斯比特要寻找的这位叫马丁·路德·金的年轻人，出生在一个十分不同寻常的家族。这个家族刚开始也是奴隶阶层，短短三代的时间便在亚特兰大黑人精英社会中出类拔萃，如今是为一个叫埃比尼泽的教会工作。他们勇往直前的家族故事带有几分浪漫主义色彩，尽管会有个中曲折，但还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其中有一条奇特的白线贯穿故事始终：在金还未在白人世界遭遇阻碍时，却和一位看似最不可能跟他有关联的人联系起来，那人即是约翰·D·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对亚特兰大黑人的影响，可以追溯到 1882 年 6 月的一场礼拜仪式。那天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伊利浸信会教堂，他和夫人一同出席了仪式，一起参加的还有他夫人的家族。教会邀请两位到访的女士站到讲道台上，代表亚特兰大女子浸信会神学院恳求援助。这所学院是在一年前为黑人女子开办的。当时还有一段闻者落泪的辛酸历史。将近有 100 多名未受过教育、衣衫褴褛的女孩挤满亚特兰大教堂的地下室，地面上满是泥土和灰尘。唯一的专用教室是一片储煤区。那里有 4 位坚强的老师，她们都是来自北方的白人未婚女子，都接受过大学教育。原来，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女性第一次争取踏入学校、参加废奴主义者社团的时候，这两位发言的老师在克利夫兰教过洛克菲勒的夫人。洛克菲勒夫人为自己从前的老师感到十分骄傲。礼拜结束时，亚特兰大到访者开始为学校募捐，净捐款数达 90.72 美元。洛克菲勒自告奋勇，悄悄决定另外捐赠 250 美元。这是他赠予黑人教育的第一份礼物。

洛克菲勒身为兜售假药的推销员之子，娶了劳拉·斯佩尔曼，从一位水果蔬

莱商一路发展到现在，着实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很有钱，但还不像那些敛财大亨般富有。只有他自己和几位合作伙伴知道，在那一年，他创造了自己的股票抵押秘密关系网——也称为信托，通过这种方式，他聚集了整个国家工业发展的垄断费用。但洛克菲勒本人几乎没有改变。他总是沉默含蓄，却又勇猛果敢。他信奉《旧约》，对自己的计划十分有把握——正如耶和華没有丝毫疑虑，就杀死敌人以及敌人的妻儿那般。他还是个身无分文的孩子时，总去主日学校，独立地寻求在浸信会信仰方面的发现。那里的施洗礼者要追溯到16世纪的德国再洗礼派，作为背叛马丁·路德的一群人，在与天主教教堂分离后并没有走得很远。他们是一群极端的民主主义者，对复杂的神学信条以及教会中培养神职人员的权威方式都怀有敌意。就这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神职人员都认为那群人很危险，不好惹。洛克菲勒本人一直非常痛恨穷人的懦弱和民主之路上乱七八糟的障碍，但他始终依靠群众的教堂。

他和妻子一方的斯佩尔曼家族也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他娶了劳拉·斯佩尔曼后，把妻子的姐姐露西也接入家中。从那时起，露西一直在他家生活了将近60年，终生未嫁。1881年，他的岳父去世以后，洛克菲勒把他的岳母接来同住。从他们鲜为人知的私生活看来，斯佩尔曼家族作为一个大家庭，在生活上似乎对洛克菲勒造成巨大影响。与洛克菲勒相比，斯佩尔曼家族的人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对公共事业非常热心，在精神上也非常独立。劳拉·斯佩尔曼高中的学年论文题为《我能划我自己的独木舟》。约翰·D·洛克菲勒在同一所学校上学，他课堂上朗诵的诗题为《忧伤并快乐着》。

在洛克菲勒给那所女子神学院献礼两年后，这个有势力的家族乘火车来到亚特兰大，参加了这所简陋的黑人女子学校举办的三周年庆典。包括小约翰在内的“神秘嘉宾”都被要求做演讲，但只有斯佩尔曼夫人做的演讲稍长一些。她骄傲地回忆说，她在克利夫兰的家是索杰纳·特鲁斯和奴隶们“地下铁道逃亡”的驿

站。就在典礼要结束的时候，受托人宣布，今后这所学院以斯佩尔曼——即洛克菲勒夫人家的姓命名。这条消息让学生们欢呼雀跃，中规中矩的女校长起身让大家安静下来——她一向不喜欢过度的情绪表达，尤其是那种在黑人宗教集会上常见的大声呼喊。她呼吁学生们要忠于学校，永远不要给学校的新名字丢人。

洛克菲勒通过位于纽约的浸信会国内分会的亨利·莫尔豪斯博士，自掏腰包在亚特兰大西部买了一块很大的地。1886年，新斯佩尔曼校区第一座砖瓦建筑洛克菲尔德礼堂开始建设，在此之前，他先把斯佩尔曼的学生安置在那里一处古老的联盟军营中。他把毗邻的土地给了两所黑人男子浸信会大学，其中一所大学以莫尔豪斯博士的名字命名——莫尔豪斯博士以后成了斯佩尔曼董事会的主席。继1900年洛克菲尔德礼堂建成之后，很快又有两座礼堂建成：一座是帕卡德礼堂，另一座是贾尔斯礼堂，分别以前往克利夫兰寻求资助的两位女士的名字命名。同年，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宣布自己的家族出资资助学院建设，围着斯佩尔曼学院绿树成荫的四方校园建四座建筑。这仅仅是个开始。三所学校将会一直有足够的土地，还有许多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为以后的发展备用。那时没有人意识到，这次战略性的收购将会让亚特兰大20世纪的人口数在美国城市中雄踞榜首。城镇不断扩张，土地不断被征用，白人开发者通常不会选择城市西部的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黑人教育建筑群所在的位置集中了一群专业人士，他们沿着标志着阶层分布的阶级线向外扩张。于是，亚特兰大并没有按照一贯的发展情形，成为周遭围绕着白人的黑人中心城市。两个种族都会住到各自的郊区地带。

早些年里，三位斯佩尔曼家族的女士经常来学院走访，并和行政人员保持稳定的通信。她们的关注使斯佩尔曼学院成了亚特兰大最美丽、资产最雄厚的黑人大学。学院的新校长通常是来自新英格兰的单身女性。校长越更换与洛克菲勒家族的关系越密切。不过，所有的女校长都非常严格，她们不仅要求学生们具备维多利亚时代的精致还要有布克·华盛顿式的实践能力。19世纪20年代前，斯佩尔曼学院一直要求学生早上四点半起床、洗漱、熨衣服。学校对学生在操持家务

和古典文学修养两方面的要求都非常严格。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末，学生未经特许都不准离开校园，即使是在夏天，她们也要戴上手套和帽子。

在精美的斯佩尔曼学院旁边，男生们涌入浸信会大学两所摇摇欲坠的教学楼。尽管亚特兰大大学的教职工在全国首屈一指，教职工队伍中有全国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之一——杜波依斯；莫尔豪斯学院却被一种特殊声望的光环所笼罩。“莫尔豪斯学院学生”成了社会和文明的典范，他们在向备受珍视的斯佩尔曼学院女生求爱决斗上也极具优势。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两所学校都提升了自己的课程标准，超出了战后重建时期初级学校的标准，有资格授予大学学位。莫尔豪斯学院最先在 1897 年授予了 3 个学位。第二年的毕业生中，有一位名叫 A. D. 威廉姆斯的学生，他在 1899 年 10 月 29 日娶了斯佩尔曼学院的詹妮·C·帕克斯为妻。他们的女儿艾伯塔是他们唯一活过婴儿期的孩子——她正是马丁·路德·金的母亲。

威廉姆斯是一位奴隶牧师的孩子，他年幼时便从农村的家中逃出，来到亚特兰大，做了一名牧师。1894 年，他在已有 8 年历史的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任职，那对他来说已经是最好的出路。当时教会只有 13 名成员，地方非常小，设施也还不完善，教会的建筑被抵押了出去，银行还威胁他们会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威廉姆斯牧师接受了这个挑战，组织了一系列复兴教会的活动，并找到了一些投资者，还清了房屋抵押贷款。他着手招募新成员，教会人数很快达到 100 人。经过他的努力，教会逐渐扩大规模，最初小教堂的空间开始不够用了。他在业余时间上了大学，娶了詹妮·帕克斯为妻——他在另一方面成功证明了自己，作为莫尔豪斯学院毕业生，他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1900 年，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已经非常成功富裕，它可以通过购买丧失抵押品贷款赎回权的建筑，来吞并另一个大一点的教堂。几年后，教士威廉姆斯已有经济能力为独生女艾伯塔，这位刚满 3 岁、蹒跚学步的小女孩，购置一台“里卡和儿子”牌的“立式大钢琴”上课用。

那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兴起，势头正劲，这十几年里，威廉姆斯

一直与早期进步主义时代的大浪潮逆流而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对当时的种族关系是不小的挑战，南方白人和北方白人都觉得跟黑人竞争，简直是有伤体面，毕竟在那时来看，黑人地位卑微是“科学证明”了的既定事实。南方白人厌恶美国战后重建的政治体系，他们通过商议好的煽动活动，广泛发起暴力运动进行抵制。那时第一次规定不允许黑人在任何立法机关任管理职位，并由多数人决议通过。自那时起，黑人渐渐被迫退出管理行列；后来黑人的投票权也被剥夺了，先是在和白人有分歧的问题（比如民粹主义和定期有关禁酒令的提议）中关键票的操作上，最后到所有投票的重大操作上。北方人默许了南方白人重获的领导力。当时流行的理念是种族纷争——这个自从内战后就没有一点改善，既妨碍了商业发展，又使得改革运动的轨迹偏离了生产领域，阻碍了美国为在全球影响力上赢得统治地位做出新的努力。事实上，有些自由主义者呼吁，种族主义是进步运动的关键，只有白人在政治层面提出种族问题，社会才能进步。很多支持废奴主义的老刊物，比如《亚特兰大周刊》上发表了题为“盎格鲁-撒克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文章。

那个时代最畅销的书有1900年由美国书业和圣路易斯的圣经会出版的、查尔斯·卡罗尔所著的《黑人即是野兽》；1906年出版的、罗伯特·W.舒弗耳德所著的《黑人：美国文明的威胁》；1905年出版、托马斯·迪克逊所著、为三K党历史演义故事之一的《同族人》，10年后，根据此书拍成的故事片《一个国家的诞生》，获得了巨大成功，从此确立了好莱坞电影在美国文化中的稳固地位。

1901年春，华盛顿最后一位黑人国会议员被遣送回北加利福尼亚的家中。同年年末，罗斯福总统请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共进晚餐。将近一个星期，民主党人都就此事在报纸头版上谴责总统。专业政治评论员在《纽约时报》上谴责总统在做出这一步前“未经深思熟虑”。甚至连罗斯福的拥护者都倾向于依据新时代的情势看待这场争议。“阳光照在美国公民身上，也照在其他国家的异教徒身上”，一位纽约人向《纽约时报》写道，“上帝的荣耀不可能为一个被遗弃的贫穷

黑人隐藏，上帝令他来到世界，为让他得智慧，为让他得以教化。”就在同一年，总教练约翰·马格鲁试图规避对黑人选手的限制规定，在专业棒球赛上，让二进手查理·格兰特冒充印第安人，但是没有成功。

1906年，威廉姆斯的社区发生了亚特兰大种族暴动，这凸显了种族情绪的最丑陋面。随着那一年州长初选的到来，候选人承诺剥夺黑人公民投票权，报纸也刊登了一些关于强奸和侮辱白人妇女的政治故事。偏自由主义的《亚特兰大宪法报》上常有这样几个案子搬上头版：该报以一篇题为“黑人威胁奥里·布莱恩小姐”的文章把情绪推向了高潮。报道中配有一张布莱恩小姐的肖像，下面有四栏文字，是她父亲呼吁众人来帮助他处以一个名叫卢瑟弗雷泽的黑人私刑。据称那名黑人和布莱恩小姐搭讪，但和她并没有身体接触。接下来的三天里，白人暴徒杀死了将近50名黑人。《宪法报》的通栏大标题包括“州长下令出动全部军队”“一夜之间赶走黑人”“说得太多导致他的厄运”“暴乱的终结全部取决于黑人”“他用一具死尸挡住子弹”，还有一则从特拉华州发来的侧栏新闻，题为“用九条皮带鞭打，为黑人侵犯的白人妇女报仇”。

1906年的暴乱，以及两年后发生在亚伯拉罕·林肯的故乡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一场类似的暴乱，激怒了亚特兰大大学的杜波依斯。他加入北方白人慈善家行列，与他们一起在1909年创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年轻的牧师威廉姆斯在埃比尼泽教堂的成就，让他成为社区的领袖，同时成为亚特兰大分会的主席。对他而言，这次叛乱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幸运，鉴于市中心发生叛乱的地方距来自维多利亚家园显赫的白人家族住宅区很近，他以相当低廉的价格买了其中的一处。房子位于奥伯恩大街，距离亚特兰大最早出现的黑人商业群只有几个街区，这为他吸收教会成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更妙的是，那条街上的商业区和他的住所之间，还有些可利用的地方，可以建一座理想又安定的新教堂。这座两层安妮女王式房屋真是不错，但是因为地段特别优越，价格也相当昂贵——这座房子供威廉姆斯一家三口居住未免太大了：屋内共有5间卧室，天花板高

12 英寸，门廊成弧形，地下室配有新式煤炉。他们出租了部分空间，以抵部分房款。

1909 年，他们带着年幼的女儿艾伯塔，搬到了位于奥伯恩大街 501 号的新居。自幼年起，艾伯塔的长相就一直很普通。她样子呆板，身材有些矮胖，大家觉得她是个谦逊羞涩的恬静姑娘。邻居们也都认为她放在一小群人中并不起眼，亲戚们总说她看起来“有点胆怯”。她没有她父母的那份自信，也许是因为她的父亲成就斐然，母亲又有着“埃比尼泽第一夫人”的头衔。然而她从父母那里学到了很多，她成长为一位敏锐的观察者，洞悉教堂政治。她拥有一股巨大的能量——她顺从，学习能力强，对自己熟悉的领域颇有把握——这些领域一直都是教会和家庭，她的优雅和天赋将她指引到此。在这两个地方，她仿佛找到了庇护，在那儿她既是组织者，又是安慰者和调解者。她是全国浸礼会的辅助工作人员，一生都在埃比尼泽教堂任全职风琴手。

埃比尼泽教会成员认为威廉姆斯是位非常有能力的牧师，而他在教堂外的名声和影响根本上源于他在房地产和民事诉讼上的能力。他召集人们开会、明确团体目标，大家都推选他在他自己提议的委员会上任主席。他成为亚特兰大浸信会牧师联盟的主席，接着又成为全国浸礼联合会佐治亚州代表团的议会政党领袖。后来，作为全国浸礼会的财务主管，和其国内外传教委员会中的一员，威廉姆斯掌握着那个时代教会中最有影响力的职位委托权和任免权。他开始着手建立一座全新的埃比尼泽教堂。为表彰他的社会服务，1914 年，莫尔豪斯学院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他把艾伯塔送往妻子的母校斯佩尔曼学院学习。

那时，约翰·D·洛克菲勒雇用了律师、保镖和幕僚，组成严密团队来保护他，让那些试图求得他钱财或要求他拿钱的人无法得逞。1914 年的春天，“勒得罗大屠杀”事件让他在公会运动历史上成了实实在在的恶棍。科罗拉多的民兵袭击并烧毁罢工工人人们的帐篷城。他们枪杀了 6 名男子，烧死了 13 名妇女儿童。

一年后，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去世了，俄亥俄州官方人员威胁他如果到俄亥俄州埋葬自己的妻子，就必须缴纳3亿1100万美元税款。于是，他不得不把妻子的尸体存放三个月之久，直到他的律师团队和俄亥俄州官方人员达成协议。那时洛克菲勒已经年迈，正值新所得税法和新遗产继承法相继出台、美国政府控告美孚石油公司垄断。在重重压力下，他加快了自己做慈善的进程：他为新洛克菲勒基金捐赠了1亿美元，他还另外捐赠了5000万美元给他的普通教育委员会，用于资助浸信会大学——其中有1000万美元用于建造一座小教堂以及扩建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剩余的捐款用于在斯佩尔曼学院风景秀丽的校园周围增建新的宏伟建筑。1918年，贝茜·洛克菲勒·斯特朗大厦和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大厦竣工。当时艾伯特·威廉姆斯正在那里接受大学教育，迈克尔·金是在那时遇到了艾伯特。迈克尔·金，以后会更名为大家所熟知的大马丁·路德·金，再以后被人称作金爸爸。

迈克尔·金一直默默关注着艾伯特·威廉姆斯，但不敢跟她讲话。对他来说，自己和这个著名牧师的女儿社会地位之间的差距，大过这姑娘和约翰·D·洛克菲勒之间的差距。艾伯特衣着讲究，讲一口标准的英语；反之，迈克尔·金眼中的自己就像一个半文盲的乡巴佬。他连续几周策划和艾伯特·威廉姆斯碰面，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位“成功人士”。他不断练习如何跟艾伯特介绍自己：“嗯，我在两个地方讲过道。”他想要这么说——然而他还是很明智地明白这并不可行。

迈克尔·金生于1899年12月，在位于佐治亚州斯托克布里奇外佃农的农场上长大，是家中的次子。金打小就忙着鞭笞骡子、耕种土地，错过了大部分的小学教育。他还有位叫詹姆斯的酒鬼父亲，脾气非常暴躁。一天深夜，金的父亲和母亲关于是不是该做鱼起了一点争执，喝得烂醉的詹姆斯·金开始殴打他的妻子迪莉娅。那时迈克尔·金只有14岁，但按他的年龄来说，已经非常强壮了。他把怒气冲冲的父亲从母亲身边推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到的。詹姆斯非常气恼，反复发誓要杀掉他。最后金的母亲变卖了很多家畜，为他买了一辆二手

的福特 T 型车，让儿子逃往亚特兰大。迈克尔·金当时作为亚特兰大轮胎工厂的工人，对他来说，这辆汽车绝对是超出想象的嘉奖。除了能表明地位、方便出行外，这辆二手福特 T 型车还意味着，他可以去追求自己最梦寐以求的职业——为没受过教育的黑人们开放的神职工作。他可以开着这辆车在礼拜天到雇用他的小教堂里去做兼职。有些小教堂会雇用未受训的巡回牧师，他们要找的牧师不但要讲道讲得好，还要能顺利抵达乡下偏远的小教堂。金在 20 岁前找到过两个这样的小教堂。长久以来，他以雄心勃勃的奴隶后裔的姿态，终于成为一名职业牧师，从前他还曾去过穷得只能购买一架风琴的教堂。

与很多同僚的做法类似，金加入了国家浸信会的大军。很快，年轻的金开始参加地方会议。一次，他开车去佐治亚州琼斯波罗，听国家财务主管做的演讲。A. D. 威廉姆斯牧师并没有出席，但其他演讲者还是在习惯上突显他在全国浸礼联会的尊荣地位，对他赞不绝口，还不忘提及他整个家族成员对基督教发展的贡献，其中还包括他在斯佩尔曼学院读书的女儿，她刚刚在埃比尼泽教堂组织了一个新的唱诗班。年轻的金对此印象极深，据他自己回忆说，当晚他便告诉朋友们，自己将来要娶艾伯塔为妻，那时他还从未和艾伯塔会过面。朋友们都嘲笑他。

出于一个巧合，后来可以称之为天赐良缘——金得知了艾伯塔的住址。金的姐姐先于金很久就从斯托克布里奇而来，她在威廉姆斯家中住宿。而她在“目标家庭”里寄宿并没给金提供多大方便。那是 1920 年，威廉姆斯的女儿艾伯塔在斯佩尔曼学院寄宿。连莫尔豪斯学院中来自名门望族的优雅绅士都只有周六特定的时间，才能拜访斯佩尔曼学院的女生。这一切还要在斯佩尔曼教职工的监管下进行——根据教职工的悉心记载可以得知，他们一个月的累计见面时间不能超过 20 分钟，并且这求爱的一瞥也只有在斯佩尔曼女生好意回应男生的名卡才得以实现。在其他时间，斯佩尔曼学院明文规定不允许有访客，并且严禁书信往来。

对金来说幸运的是，艾伯塔·威廉姆斯摔伤了脚踝，不得不在家中休养数周，直至康复。在那段时间里，他一有时间就去找他姐姐。但他从不敢踏入艾伯

塔的私密闺房。威廉姆斯家的管教十分严格，他姐姐奉劝他，稍微往前冒险一步，不但会让金自己遭到驱逐，还会连累她自己。于是，迈克尔·金开始花很长时间擦拭他的T型小汽车，希望威廉姆斯小姐能够偶尔坐在前廊上看到他。每当她在前廊的时候，他就壮着胆子一直看她，想着有什么合乎礼节的借口，能让自己开口和她搭讪。他对自己在两个地方讲过道的行为发表了一番评论——他的第一次冒险很快在悲惨的撤退中结束了。他感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是位农场工人发出的。然而，他还想，在那样短短几秒钟里，她可能没时间说出太多责难的话。在事后检讨的过程中，他姐姐第一百次警告他，如果他不接受教育，就永远别想走进艾伯塔·威廉姆斯的世界。金认为要论常理，论起他在主日学校成员的记忆中，或是论起讲道时展现的激情，自己长期以来的表现应该相当不错，但他姐姐的话确实也在理，不能太唐突。

金参加了一所黑人地方学校的几次考试后，客观评估了自己的知识水平，他要从五年级开始学习，这让他着实吃了一惊，那时他已经20岁了。突然之间，多年的耻辱带给他的痛苦又向他袭来。他最终认识到，必须摆脱作为牧师的尊严，把自己当成傻子，和孩子们一起在教室中完成学业——晚上要学习，就是在睡梦中也要学习。他要上大学，达到艾伯塔的水平，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过那个水平——不然这门婚事着实无望。

迈克尔·金下定决心要克服羞耻心，绝不选择逃避。他坐在一张极大的书桌前，夹在比他年纪小得多的孩子中间，开始了自己的学业——学习如何发对每个单词的音。几个月过去了，他还是孜孜不倦地学习。一次空闲时间，他沿奥本大街做定期巡逻，非常走运地碰到正沿街而行的艾伯塔·威廉姆斯，她刚离开斯佩尔曼学院，准备回家住一晚。金暗想既然现在他的求学计划正在进行中，干脆大胆地接近她搭讪。但他一张口便有点胆怯了，喃喃地说她也许不记得自己是谁了云云的话。“不，我不会忘记我见过的牧师，”她微笑着回答说，“我父亲可不准我那么做。”

这是金印象里她第一次开口说的话。这番话为他打开了整个教会政治世界的大门。对威廉姆斯牧师来说，像迈克尔·金这样的文盲牧师，是国家浸信会事务以外的领域，却也同属于他教会的重要参与者，就好像住在埃比尼泽教堂附近的人是他家中的成员一样。他们应当为人所知、得到尊重、接受培养——不仅是威廉姆斯自己要这么做，他的整个家庭都应该这么做。这关乎社会公正和家族事业，关乎上帝的事务和他们的事务。他女儿非常了解自己的角色。

金当场问她是否愿意和自己交往。她显得非常诧异，略失沉稳，但是并没表现出不高兴——这反应透露了一条信息，让金察觉到一个事实：过去没有人约过她。莫尔豪斯的男生没人给她递过名卡。金站在奥本大街上，向她追问这件事，她许诺说这要征询她父亲的同意。很快他们以一种老派的方式开始了交往——六年的爱情长跑：喝茶、参加教堂举办的聚会、周日午后开T型车一同兜风。

一起兜风的时候，他们都在一旁钦佩地看着那些正在施工的建筑工人，威廉姆斯牧师为埃比尼泽浸信会新建一所教堂，工人们正在为此而忙碌，建成后的新教堂十分壮观。那座教堂在1922年竣工。金告诉艾伯塔，总有一天他也会拥有一座那样的教堂，他有很多计划。奥本街如今变得像一条黑人产业展出地，当他们经过比如亚特兰大人寿保险公司那样的新兴产业公司时，他总会表明自己也要参与进那份事业的意图。他想要参与进银行业，比如新公民信托公司。实际上，镇上的人都密切关注信托公司资产的积累，即使镇上的理发师也能像聊家常一样告诉你当下的数额。最重要的是，金常说，他想要一个大型砖场，就好像那些在“主教一条街”上的一样。那里是开办莫里斯·布朗学院的卫理公会教派主教们的住宅所在地。他总是以一种绝对权威和至高无上的自信，说出自己将来要拥有的一切，用仿佛耶和华的口气说：要有一座砖场。他像学徒一般从威廉姆斯家中学习，这无疑强化了他的性格。成功就是拥有一定的常识，恪守一些恰当的格言，和塑造一种成功者的形象。对金来说，威廉姆斯牧师对教堂政治所采取的精妙手段都合情合理，比如他的道德标准是，一位欺骗群众的牧师不可能长久地成

功下去，就好像其他很多牧师的所作所为。最后，金终于明白牧师必须用文凭来装潢自己的原因——这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做给别人看的，能让自己从众人中脱颖而出。公众都认为威廉姆斯是名博士，拥有两个莫尔豪斯学院的学历，但是金发现，他其实只在莫尔豪斯学院待过一年。即使强大如他，也在努力尽量远离自己卑微的过去。

威廉姆斯牧师从一些教会成员那里听说，金对埃比尼泽布道台垂涎已久，还打算娶他的独女。威廉姆斯牧师对此非常介意，他不同意这门亲事。他还把艾伯塔送去弗吉尼亚州深造，金却忠实地等她归来，足足等了一年。那一年中，金忙碌地补习自己连续好几年落下的功课。当他在1926年完成了高中同等水平课程的学习后，艾伯塔的父亲还是没有准婚。金十分清楚威廉姆斯如此反对的原因，他从莫尔豪斯学院教务主任办公室里拿了一堆入学测试卷，做得一塌糊涂。学院教务主任当面告诉金，他“不是读大学的料”。虽然他现在已经受过一些教育，但是仍旧举止笨拙，言语朴实。金体格健壮，声音粗犷，他走出教务主任的办公室，经过吓坏了的秘书，走进莫尔豪斯学院校长约翰·霍普博士的办公室。霍普是杜波依斯的恩人，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一直非常受人钦佩，很多黑人父母连续好几年都会用他的名字为孩子取名。金做了即兴演讲——关于他是如何总能做出一些人们都认为他做不到的事情；五年前他还大字不识一个，如今他已经有阅读能力了；不管考试成绩怎么样，他还是想上莫尔豪斯学院；如果给他机会的话，他会再次证实人们低估了他的能力，霍普一言不发。最后金终于停了下来，徒劳地等待回答，结果还是绝望地从办公室退了出来，一切就这么结束了。然而就在他要离开校园的时候，一位秘书追上了他。金回到霍普的办公室，霍普默默地递给他一个信封，让他拿给教务主任。主任读了信，丝毫不掩饰他的反感，但他只能按照校长的意见准许金到莫尔豪斯学院就读。

之后不久，1926年的感恩节，迈克尔·金和艾伯塔在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结婚了。威廉姆斯牧师安排了三位于亚特兰大最有名的牧师来主持婚礼仪式，并把新

娘交到新郎手上。蜜月归来，这对新婚夫妇搬进了位于奥本街的威廉姆斯家，他们两人住中间一层的卧室。虽然老威廉姆斯夫妇为他们独女的出嫁感到高兴，但绝对不允许女儿离开家——绝不允许她住进如今半工半读的迈克尔·金仅能负担的那类廉价住所。往后的日子，艾伯特·威廉姆斯·金继续住在她童年家中，很明显不再是因为丈夫缺钱——就在金成了亚特兰大收入最高的黑人牧师之后，她仍在那里住了好几年。他在成为非常有权威的人物之后，还是会屈从于这个家庭的支配，尤其是这个家族的女人。同约翰·D·洛克菲勒一样，金一直和他夫人的家族住在一起，直到终老。

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如今接替他 88 岁高龄的父亲管理家产。1927 年 3 月 19 日，他带领随从到斯佩尔曼学院参加小礼拜堂的告成典礼。这则事件登上了白人报纸的头版。在他罕见的发言中，洛克菲勒称赞了斯佩尔曼的姐妹们——他的母亲还有他的露西阿姨——她们把家产都用在这座小礼拜堂的建筑上，这座教堂以她们的名字命名。典礼充满了骄傲和喜庆，而且人们非常关注种族政治。每一份努力都是在加强一个观念，黑人教育是有益的，不会对社会秩序或者政治秩序构成什么威胁。观察者都注意到，很多白人高官都在这个项目上做出了贡献——从主任牧师的儿子到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自己。庆典还有两位黑人发言人，其中一位正是 6 个月前主持金和艾伯特婚礼的牧师之一。

洛克菲勒开始着手浸信会教堂的项目，此次是要建一座比小礼拜堂大得多的教堂——他要建造纽约河边教堂。洛克菲勒家族第二代把兴趣转到那些有可能触及金家族下一代的神学争议上来。他越来越不安地看着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那场与斯克普斯案齐名的激战，那场激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重塑了神学世界。福斯迪克是位有声望的牧师，虽然他是浸信会教徒，可是就连久负盛名的纽约第一基督教长老会教堂都会请他去讲道。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直到 1922 年，福斯迪克做了一次题为“原教旨主义者会取得胜利吗？”的讲道。在讲道中，他竭力为像阿尔伯特·施韦泽这样的自由主义神学者做出的努力辩护，因为他们使

得宗教信仰同科学以及现代历史知识得以和解。他声称，基督教信仰不需要和有些教义紧密联系，比如耶稣由童贞女马利亚从圣灵感孕而生这一信条，指出童贞女生子并不是只出现在基督教中，而是普遍出现在很多古代人物故事中——比如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奥古斯都·恺撒，还有佛陀、老子、筏驮摩那、琐罗亚斯德。他还抨击了教义中的其他内容，比如有关耶稣之死的信条说，耶稣的死是“为了履行神圣正义的使命而做出的牺牲”，而在神学上却有必要说是为替代信耶稣的罪人们“赎罪”。

福斯迪克的讲道在全国上下激起了一片运动潮，人们让长老会教会法院以散布异端邪说为由审判他，还要求把他从第一长老会教堂中驱逐出去。（年轻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代表福斯迪克做了法律辩护，称长老会教会法院不能指控一位浸信会教徒散布异端思想）有一位来自纽约的牧师称呼福斯迪克为“神学界的杰西·詹姆斯”。1924年10月，《纽约时报》几乎天天报道此事件的发展，标题诸如“听福斯迪克博士布道人群把第五大道挤得水泄不通——人群阻碍了交通”。这场运动最后终于迫使福斯迪克在1925年3月离开教堂，洛克菲勒问这位流放的牧师有没有兴趣到派克大街浸信会教堂来做牧师，在那里他可以教《圣经》研读课。若把福斯迪克的骄傲心智比喻成一口深井，那么洛克菲勒银行的全部存款也填不满，因此在他眼中并没有觉得洛克菲勒高高在上。他拒绝了洛克菲勒，说他不能默许浸信会教徒的严苛条件，让所有教会成员全身进入水中受洗，倘若把教会成员淹死了怎么办，洛克菲勒仍然坚持劝他去。福斯迪克仍旧拒绝，推托说他不让大家知道，他又成了坐落在纽约最豪华地段精英教会的牧师。洛克菲勒说，如果教堂迁址，你会答应吗？现在福斯迪克感到有些焦躁，他回避了这个问题，并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派克大街教堂竣工才三年，而且对于洛克菲勒来说，这笔开支也不是小数目。福斯迪克还说，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全美国最有钱的人的牧师。“我欣赏你的坦率，”洛克菲勒停了一会儿，回答说，“但是如此一来，更多人会因你倚仗我的财富来批评你，却不再会由于你的神学理论

而批评我，你不认为是这样吗？”在洛克菲勒的一再说服下，福斯迪克答应了他的请求，教会符合福斯迪克提出的条件：他们放弃了那座在派克大街的新建筑，在纽约更贫穷的地段建了一座新的教堂，名字还去掉了浸信会教堂的标签。洛克菲勒在环河路上游的一处中间地带，购置了一大片土地，虽然该区域距离黑人住宅区很近，但中间还隔着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他把从前那里的公寓楼夷为平地，并为这座 13 世纪哥特风格的巨大环河教堂建筑捐赠了将近 400 万美元。1930 年 10 月 5 日，超过 6000 人涌进来聆听福斯迪克在新教堂的第一场布道。再历经两代，马丁·路德·金博士也将会在这里发表一些他平生最重要的讲道。

环河路教堂建成的时候，年幼的金还在襁褓之中。金于 1929 年 1 月 15 日出生在威廉姆斯家中。他父亲为他取名为迈克尔·路德·金，但是人们都叫他“M.L.”或者是“小迈克尔”。他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克里斯汀，下面有一个他一岁零五个月的弟弟 A.D.，他弟弟以家中男长者他们祖父的名字命名。恰好是股市大跌的那段时期，把 M.L. 和 A.D. 的诞生隔开了。那段时间非常艰难，教会会众没钱付给牧师，只能用食物来代替。

1931 年 3 月的一天，威廉姆斯牧师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葬礼后，服丧期还没有结束，家庭成员便开始理智地考虑教堂的实际问题。成员们知道，他们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埃比尼泽教会的磐石已经逝去。那个时期，经过经济大萧条的劫掠，教会人数缩水到 200 人，会众捐款数额骤降，教会入不敷出。教会背负着拖欠房屋贷款的严重债务，面临着失去家园，甚至不复存在的可能。除非有一位新牧师——一位比起已故的威廉姆斯牧师更强大、更受尊重的牧师——才可能会扭转教会的命运。

这一切逆境让教堂充斥着更多的混乱，教会和去世牧师的家族存在分歧。大部分执事们想找一位比迈克尔·金年龄更大、更有经验的人，毕竟迈克尔·金只在三流乡村小教堂中做过牧师；可他们想要找的那类牧师一般已经找到合适的教堂了，并且如今教堂陷入了这种极端困境，人家不会离开自己的教堂来这里。在

家庭内部，艾伯塔·威廉姆斯·金强烈表达了自己的建议。“金”，她说——她总是直呼丈夫的名字——“我不想让你去埃比尼泽教堂。我永远也不想做那里的第一夫人，我只想当‘旅行者休息栈’教会的第一夫人。”她的意思是，在埃比尼泽教堂，她永远也不想取代她母亲的位置。而威廉姆斯太太想让女婿来接手教堂。其原因正好和她女儿相反，如今她失去了丈夫，就要失去自己在教堂的地位——除非那位神职人员还是她家中的一员。迈克尔·金这方对威廉姆斯家两位女性的立场不置可否。

在有关埃比尼泽教堂问题上犹豫不决了七个月之后，威廉姆斯女士终于决定放弃自己生活中标准的女性教会形象，去参加舞会。她仍然是第一夫人，她宣布迈克尔·金注定要继承她丈夫的事业，成为一名牧师。她的演讲影响了教会成员，让执事们推翻了从前的想法，一致推举金成为新牧师。在征得艾伯塔同意之后，金答应了威廉姆斯女士和教会的请求。

1932年1月，金承担了在埃比尼泽教会的义务。地方银行很不客气地向他介绍了情况，并把法院的制裁挂锁挂在教堂大门上。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获得足够的贷款，让银行把这个挂锁移走，这样他才可以继续讲道，并为教会筹集资金，让教堂有偿还能力。如今他的事业处于险境，他的幸福也卷入家庭生活的微妙逆流中。难得的是，他仿佛天生就有牧师的性情，这让他更好地适应了生活中的严峻考验。作为一名牧师，迈克尔·金拥有所有弗农·约翰斯没有的特质——他为人实际，做事有条理，说话简单直白，对所处理的事和所要面对的人完全一心一意。他的才能，仿佛只体现在他亟待解决的任务上，和反叛没有什么关系，和在原教旨主义上的神学争论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他的才能和19世纪20年代最受欢迎的宗教书《无人知晓的人》的主题非常协调。广告经理布鲁斯·巴顿为了推广此书，加上了副标题——“你们难道不觉得我注定和我父亲的事业有关？”

金是位讲究实际的牧师，他充满活力。那时出现了一批黑人福音传教者，如圣教父和格雷斯爸爸，他们靠自己的能力吸引一大群人，以此喂养饥民。金提

出一条理念：埃比尼泽教会成员必须帮助自己教会的成员，让其在经济上和精神上两方面得以富足。教会成员必须齐心协力、互帮互助，在这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教堂不仅是一座避难所，还是能让大家实现成功的地方。他在讲道中融合了很多他所积极支持的基督徒原教旨主义，他的语言简单直白。如果有位理发师加入了埃比尼泽教会，他会在布道台上强烈要求教会成员光顾那位理发师的店。如果这位理发师有钱了，他很快就会提醒那位理发师：他和教会应该是互惠互利的关系。

他非常清楚有些人对他存有偏见，认为他在岳父的教堂中布道，住的是岳母的房子。金甘愿冒一切危险，只为许下一个诺言：如果教会成员能齐心协力地跟随他，听他的话，他们会得到更多奖赏。这样做不仅能立刻确立他的权威地位，还能拯救教会的财政情况。相应地，他在集中管理教堂方面迅速采取了行动。他的第一步也是最激进的一步，便是废除埃比尼泽更小单元的独立预算——比如主日学校、浸信会教育训练联盟和很多其他社团和附属机构。自那以后，新牧师颁布法令，所有分散的小机构都要向教堂的中央财政机构上缴钱财。在金大刀阔斧的改进过程中，有一项就是打破匿名捐款的传统。晚餐时间再也不会再在社团成员中传递奉献盘，因为他认为从前匿名捐款的方式便宜了那些不捐款的人。为确保在最大程度上控制每位教堂成员的捐款，金设立了开放的记录系统。每位教会成员的奉献都会记录在教堂官方记账簿上，记账簿供大家随时监管。同时也保留不记名捐款的习惯，但不记名捐款的钱不会体现在账簿上。

这种新体系触动了很多教会成员的敏感神经。以后将不再会有“占便宜”的教会成员，也不再会有“说大话却不掏钱”的人。教会社团筹集资金，再不会只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花费钱财，而对教堂本身的花费不闻不问。现在金牧师把一切揭露出来。无疑，在教堂情况很乐观的时期，他的改革应该会遇到非常多的抵制，但是现在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正处在非常时期，经济大萧条正要把暂时的

困难变为永恒的噩梦。面对一切暴露出的现象，教会成员在震惊之余，意识到艰难的局面影响到的原来不只是他们自己，而是已经影响到每一个人。教会账簿的使用成了打破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的有力手段，教会成员从那时才开始认识彼此。金在布道台上，用平实响亮的语言赞许捐出每一分钱、每一元钱的人；向教会承诺，成员一旦拆除了彼此之间的隔阂，会共同再建许多象征意义上的墙，把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建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

金通过集中预算对教堂财务进行了集中控制后，创造了一整套新形式的社团——一共 12 个，分别按照一年中的 12 个月划分。凡在 1 月出生的教会成员要加入 1 月社团，以此类推。他似乎把它们看作是以色列的 12 支派。社团内部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组织自己的活动，为比如“最美婴儿”和“最好学业成绩”的比赛，推荐内部参赛人选。如果有教会成员想要给教堂捐款，这笔款项不能存到某个人的个人账户中，而是存入社团的集体账户中。12 个社团进行特别捐赠，并为教堂承担特别的项目。金鼓励社团之间为了埃比尼泽教会的利益，展开有益的竞争。

基于金对奥本街上黑人保险公司的细致观察，金有了自己最精明的创新之一，那时人们称赞保险事业是黑人资本主义给国家树立的榜样。大部分黑人都不是大业主，没有火险或车险的需要。黑人保险公司依据他们的客户的需求——都是小客户，对保险单进行调整，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他们的保险产品用于支付葬礼和医疗账单，偶尔用在教育上。这些保险公司雇用了一队队营销专员，以最实际的方法从穷人那里收取保险费：频繁少量地收取，一周不超过五分钱。金意识到这种付款形式，恰恰是教会在大萧条艰难时期需要的。更有创造性的是，金注意到，保险公司不是等着顾客带钱到办公室，而是挨家挨户上门收钱，那么教会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式。因此，金努力吸收保险业务员和经理加入埃比尼泽教会。

同往常一样，他的推销技巧设想了很多种类交叉互动的方式：保险推销员

可以在埃比尼泽教会成员中寻找新客户；与此同时，教会成员可以在教会内部满足个人的保险需要。此外，不方便外出的人或生病的人可以直接把给教会的捐款交给上门的保险推销员。3月出生的保险推销员每周去拜访自己3月社团的成员，收取用于亚特兰大人寿保险的五分钱硬币以及另外为埃比尼泽准备的主日捐款。在其他方面，金认为还可以运作一个附加项目，帮助在家中的人，顺便向他们收款。这些上门的保险推销员，可以为那些不方便出门或患病的人朗诵周日学校的课程。或者更实际的是，他们的妻子或者其他埃比尼泽教会成员也可以在他们的家中，为他们朗诵课程。出于这一想法，这成为早期教堂的一项附加服务。

从一开始，迈克尔·金就把自己的成功与幸福之梦，与教会这个集体捆绑在一起。他总是谈及自己作为中心领导的必要性，他公开炫耀说自己有多少数量的担保贷款额，控制着多少数目的投票，往教堂建筑基金中投资了多少钱，为当地黑人报纸《世界日报》找了多少广告商，让多少学生进入莫尔豪斯学院和斯佩尔曼学院。很少有人讨厌他的性情，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人们认为这性情是牧师普遍有的，而大部分原因则是由于这正是他个人表现出来的。他的咆哮是他领导能力的核心表达，大家因这个爱他、尊重他。就算有人怀疑这种性情是起补偿作用，产生于他在家中较为卑微的地位，也没有人会对此借题发挥。简简单单地说，他就是迈克尔·金——他总是和人握手、鼓励他人并要求他人。他在任何地方都让自己成为焦点，他对过去总有很多要求，对未来总有很多承诺。他多角色、多身份的关键总是在于埃比尼泽教堂。金向众多教会成员讲道的时候，就好像在跟一个人讲话一样：“今天早上我想要告诉你的是：埃比尼泽，你做得到。”

在他刚上任的短短几个月里，实实在在地把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从破产中拯救出来。教会成员的人数呈几何数字迅速增长，从200人直达大萧条时期的4000人高峰。他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在上任第一年年底，教会就支付给他黑人牧师的最高工资。他在教会任职的第二年，正值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刚在白宫就职总统，也许他在他的世界中制造的声响比不上罗斯福百日新政期

间在华盛顿制造的声响多，但的确让经济萧条灾难的情势好转了一大步。1934年的春天，迈克·金接任埃比尼泽教堂神职人员已经两年多，他要求教会成员把他送去欧洲、非洲、圣地巡游一整夏。在那种艰难时期，这是连当时最富有的人都会嫉妒的旅程。一位黑人佃农的儿子居然实现了这种梦想——而且就在他找到第一份全职工作，掌握基本读写能力不久——这简直比“美国梦”还让人羡慕。

在小迈克尔·金只有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离开教堂、三个孩子、妻子以及岳母，登上一艘远洋客船前往法国；从巴黎搭乘火车去罗马，穿过地中海去往非洲的突尼斯，从那里横穿北非去往埃及首都开罗。结束了在埃及的旅程后，他穿过尼罗河很快进入圣地。在那里他游览了《圣经》中提到的耶路撒冷的一些著名地点，比如耶稣诞生地伯利恒。之后他乘船返回欧洲，去参加在柏林举行的为期一周的世界浸礼会联会。对金来说，这为他辉煌欧洲之旅画上了最完美的句点。他坐在从全世界各国赶来的代表中。过去的历史和当今之事所带来的激荡情绪弥漫着整个柏林会议。金和与会的牧师不仅听到有关暴躁的德国新首领阿道夫·希特勒的消息，还前往一些宗教历史遗址，比如马丁·路德曾经攻击大公教会的地方，以及后来重浸派攻击路德的地方。

迈克尔·金牧师在1934年8月胜利回国，《世界日报》向亚特兰大所有黑人宣布这场胜利，大标题为：“热烈欢迎牧师金赴欧归来”。这篇报道列出了埃比尼泽招待会上所有发言人的名字——他们对他大加赞美、为他奉上各式佳肴。这是金的时刻，他人生中的分水岭。他为纪念这个重大时刻，把自己的名字从迈克改为马丁，正式更名为马丁·路德·金。为了保持一致，他把自己儿子的名字改为小马丁·路德·金。

改名对于金来说，算是青年时期的一件大事。对他来说，这标志着对未来的伟大憧憬，无论是在宗教上还是种族上，都是一份有关光荣传统的身份声明。在宗教历史上，更换名字是常有的事，大家通常认为换了名字就像换了身份，就像重焕新生一样。雅各布变为以色列，扫罗变为保罗，西蒙变为彼得，每位新上任

的教皇，第一步便是为自己选择一个特别的名字。在民权运动时期，最迟钝的白人也能识别“黑鬼”和“黑人”的不同，后来就是能识别“黑人”和“黑种人”的区别。关于“黑种美国人”和“美国黑人”之间的不同，也存在微小的争论。在那个政治危机时代，关于各种名字的纷争也许已经遮掩了一种深入几代人文化的社会形态。关于奴隶后代的集体身份和个人身份的问题从来没有消停过，还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直接导致称呼的频繁变化。

在奴隶制时期，奴隶是主人的财产，只有主人能更改他们的名字，因此奴隶的名字在拍卖市场不断变换，有时主人突发奇想就会为奴隶更名。那时被解放或是逃走的奴隶最常提到的欢乐感受便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名字。名字不再是偶然的。“名字让我们第一次在这个世界有了一席之地。”拉尔夫·艾里森写道。战后，一些摆脱奴隶身份的人在新出版物上提出把他们看成一个种族的问题。“黑人”和“黑种人”这两个称谓都带有普遍的蔑视（后者可以追溯到早期的贩卖奴隶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不仅因为奴隶主喜欢用这些词，还因为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排除了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白黑混血儿——他们论肤色不能算是黑种人。“有色人种”被认为在包含范围上更加准确，然而其缺点却是不能区分从前来自亚洲国家和印度群岛的奴隶。此外，“有色人种”这个词意味着白人不是有色的，或者说“有色”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在个人特质上附加的特性。还有些人主张“非裔”这个词，但这个词到底是和种族关联，还是和起源地关联，引起了一场持续的争论。19世纪末，在新奥尔良发动了一场运动（白人报纸很晚才采用这种尊重黑人的方式。《纽约时报》在1950年才肯大写英文“黑人（Negro）”的首字母），呼吁大写英文单词“黑人（Negro）”中的第一个英文字母，自此“黑人”一词开始被广泛接受。

称呼问题从未让所有人都满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1909年成立之初，采用“有色人种”这个听起来较为尊重的称谓；然而第二年，第一份黑人所有的日报在国内发行，为了支持他们自己的创造——“种族”一词，拒绝接受所有之

前对黑人的称谓。此举在语义学上相当于服用安慰剂。在《芝加哥卫报》上，“有色人种”变成了“族人”，“黑人成就”变成了“种族成就”。这一新实践主要缘于《自由卫报》的创办大亨罗伯特·阿尔伯，因他对肤色表现出的极端敏感。他生在奴隶家庭，母亲嫁给一位德国人之后，他被寄养在白人家庭，阿尔伯讨厌“黑人”这个词以及一切与黑颜色有关的一切——甚至到了拒绝穿黑色衣服的地步，他还认为要娶皮肤足够白的女子为妻才能“说过得去”；在芝加哥歌剧院白人迎接他的时候，他要说出感伤又莫名其妙的话，以传达一种期望：他希望人们把他当美国外交官，而不是非洲外交官。然而阿尔伯是“种族”一词使用的大赢家。

有关名字的争论触及美学、价值观及身份认同的最深层困境，有些时候从最普通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前黑人常用一种办法来阻止白人称呼他们名字（不包括姓氏），就是不取名字仅用姓氏。摩西·梅雷恩斯为他的儿子简单取名为 J. H. 梅雷恩斯。此举确实需要一些勇气，因为很多问起男孩名字的白人，不太喜欢对方只告诉他们“就只是 J.H.”。直到他的儿子在 1950 年应募加入空军，才遵从规定，选择了和首字母匹配的名字，取为詹姆士·霍华·梅雷恩斯。而只有当他申请密西西比大学，“黑人梅雷恩斯”这个名头尽人皆知的时候，在名望这种绝对力量的驱使下，律师和记者才开始搜寻他用过的正式名字来大做文章。

金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获得了“马丁”这个名字。金牧师改名的原因和具体过程，其中存有太多沉默和混淆。发布出的说法中存在两个矛盾重重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在 L. D. 莱迪克 1959 年出版的关于小马丁·路德·金的优秀传记中，此书在金家族的大力配合下得以完成。按照莱迪克的说法，金牧师的父母从他出生的那刻不同意他的本名，是迪莉娅·金强烈要求选择迈克尔这个名字，于是此名一直沿用至迪莉娅 1924 年去世。迈克尔·金为自己改名为马丁——这个他父亲一直喜欢的名字。

莱迪克自己意识到了这个故事存在的问题：它解释了金牧师为什么在 1929 年给儿子取名为小迈克尔·路德·金，而在 5 年后，才把儿子的名字改为马丁。

而在他所记录的金家族的回答中，金的父亲和接生婴儿的医生沟通有误，导致“迈克尔”这个名字出现在了出生证明上。此外，据莱迪克记录，金在孩子出生后就发现了这个错误，还专程赶到医院，以确保出生证明上的名字改为“马丁”。但改名这事儿并不顺利，由于在医院又出现了混淆，他直到1934年才把儿子的名字改过来。

在迈克尔·金自己1980年的自传中，他回忆说自己一直用他母亲所取的“迈克尔”，直到他父亲在1933年去世才改名，也把他儿子的名字从“迈克尔”改为“马丁”，就是为了满足他父亲临终前的心愿。这个版本的解释成功排除了10年的拖延以及医院中发生的种种混淆，但这两个版本的矛盾让两个故事都疑点重重。根据金牧师的版本，他改了他和儿子分别叫了35年和5年的名字，仅仅是应他酒鬼父亲的要求而改。金牧师和他父亲的隔阂从当初父亲扬言杀掉他开始，后来他们之间只保持着冷冰冰的礼貌。难道尽管他深爱的母亲一生都想让他叫“迈克尔”，他还是改了名字？

这些解释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或者说并不全面，一部分原因是选择这个特别的名字，会让人联想起新教徒信仰的创立者。莱迪克和金似乎都对正式改名的时间达成一致——1934年，也就是金去欧洲的那一年（提及此，还有一个独立的佐证，小金的出生证明一直是家族秘密，美国国务院记录显示改名是在1934年4月12日办理的，改名为小马丁·路德·金）这表明小金是在5岁零3个月的时候正式改名。这场旅程通往金雄心壮志的顶峰，从文盲到从莫尔豪斯学院毕业，再到结成一段惊世骇俗的婚姻，最后成功把埃比尼泽教堂从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洪流中解救出来。对于迈克尔·金，从初到亚特兰大的土老帽儿，转变为马丁·路德·金，让他有一种成为大明星的感觉。

改名字给金带来了不少麻烦。在走法定程序的过程中，他必须要和亚特兰大白人官方打交道。接着他还必须通知他的朋友们、教会成员，以及许许多多和他有业务往来的人。在他这方，存在很多的矛盾情绪，也有来自他身边人的阻力。

1934年，他把自己在亚特兰大通讯录上列出的名字从过去的“金，迈克尔牧师”改为“金，马丁·L牧师”。1936年，他又换回了“金，迈克尔牧师”。他在埃比尼泽布告栏上的名字和在信件及法律文件上签署的名字，一直是“M.L.金牧师”。对他的朋友来说，他和他的儿子一直是“大迈克尔”和“小迈克尔”，或者是“金牧师”和“迈克尔”，以及以后的称谓“金爸爸”和“M.L.”。金牧师的儿子从来没有在通讯录上列出自己的正式名。

如果说金牧师的确打算为自己的新名字做一个自豪的声明，而他的同辈以及他儿子却拒绝贸然地使用它，在历史上也说得过去。老金与马丁·路德攀亲，是他典型地想要在气势上压人。他的儿子对此畏缩不前，他在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之后，唯一一次在公众面前谈论这个名字，说“也许”他是“赢得”了他的名字。金牧师表明了心愿，给儿子时间去准备，让全世界的陌生人认可马丁·路德·金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亚特兰大，大约有三分之二的黑人成年男子失业。对此M.L.最早的记忆就是他家附近买面包的长队排了好几个路口。不到20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读研的时候，他在自传中还描述了自己对那条长队的印象，说那条长队的景象促成了他“如今的反资本主义情结”。

他还记得儿时想要模仿姐姐克里斯汀的强烈愿望。1934年，埃比尼泽一位客座牧师高度赞扬对年轻灵魂的救赎，M.L.看到自己的姐姐起身，第一个为信仰宣誓。过了一会儿，他冲动之下做出决定，“我不能让姐姐超过我，所以我要紧接着赶紧冲上去。”他哭笑不得地发现，自己完全不知道接下来的洗礼会如何进行。他只知道感觉很特别，仿佛担负着整个教会的期望。很久之后，他才对宗教略有些领悟。他想要赶超克里斯汀的心如此之切，他甚至要求和他姐姐同一年九月上一年级，这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年。他一直待在学校，直到有一天他给老师生动描述了他的生日派对，他伸出五个手指，说蛋糕上有5根蜡烛。他因为年龄太小被送回家。第二年，他为赶超克里斯汀，成功跳了一级，然而克里斯汀也

跳了一级，年轻的 M.L. 在高中时代一直想要赶超他姐姐。

克里斯汀与她的母亲很像，很安静，聪明中透着坚毅。她比哥哥弟弟学习都要好得多，她聪慧优秀，在小 M.L. 心中，她的地位颇高。他非常崇拜她的学识，相较之下，自己总是掌握不好有些语法，还在拼写方面频频犯错，感觉很窘迫。即便是成年以后，他还是对自己乱七八糟的拼写感到好笑，还向他的姐姐或秘书寻求指导。最小的孩子 A.D.，不像他的哥哥姐姐那般早熟，而是更加蛮勇，爱冒险和叛逆，这让他显得与众不同。他喜欢扔石子，也喜欢偷偷骑自行车。比起打架，M.L. 更加喜欢玩耍。但有一次，A.D. 不断骚扰克里斯汀，让 M.L. 实在忍无可忍，抄起电话把他弟弟打晕了。

有一次，A.D. 从一个栏杆上快速滑下，正好撞到了威廉姆斯外祖母，把她重重地撞倒在地。之后，外祖母的亲戚跑到她家，挤满房间，有人喊着，有人悲啼，都非常担心外祖母的身体，这时一种深深的恐惧牢牢占据了 M.L. 的心。他冲进楼上的房间，从窗户往外跳了出去。孩子们发出一阵新一轮的哭喊声，给金家族的家长们带来了恐惧。当威廉姆斯太太逐渐苏醒后，他们不得不跑出去看他们的大儿子。他一动也不动，听说他的外祖母仍然活着才恢复了正常。只有以后，人们才慢慢理解，此举是因为外祖母受到的伤害给他带来了沉痛的打击，让 M.L. 盲目地去自杀。

在威廉姆斯太太看来，所有的外孙子、外孙女都很特别。无论他们还是孩童的时候，还是长大成人后，他们都称呼自己的妈妈为“亲爱的母亲”，虽然充满爱意，但这称呼过于正式，还夹带点小诙谐。但他们始终为威廉姆斯外祖母专门保留了“妈妈”的称谓。M.L. 和外祖母的关系甚至比自己的亲生母亲还要亲密，她总是跟别人说 M.L. 是她最疼爱的外孙。

1934 年发生了很多大事，M.L. 受洗，金牧师去欧洲旅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一次丑恶的公众争议中四分五裂，再一次反映出周围环境危机四伏，反映出媒体对种族及种族身份问题的看法和观点过于集中，阻碍了公众的视线。像

往常一样，杜波依斯是中心，他作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始人，还是其下二十四年期刊《危机》杂志的编辑。他巧妙地攻击布克·华盛顿关于种族和解的政策，号召全面反对对黑人不公平的待遇，这些黑人确定了他的地位，让他继华盛顿在 1915 年去世之后接替其职位。作为一名无人匹敌的学者和评论家，杜波依斯的散文优雅中透露着冷酷，外加不留情面的分析，非常有名。他的文章有很多是有关黑人高贵品质的传承和事业正义性的。作为一名政治领袖，他却承担着优秀知识分子应承担的责任。甚至连他的支持者都说他的性格有些不随和，为人十分桀骜不驯，这激发大家去搜寻有关杜波依斯的逸事。一次，有人称赞杜波依斯，作为哈佛大学的首位黑人博士十分荣耀，他只是冷冰冰地回答说，“我向你保证，这是哈佛的荣耀”。

19 世纪 20 年代，杜波依斯颇为失意。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最主要的是，他对自己名义上的老板沃尔特·怀特产生了怨恨。自从 1906 年目睹了一位可怕的未成年人引起的亚特兰大种族暴乱，怀特成了著名的私刑调查记者。他利用自己较浅的肤色之便，假装成一名白人记者，潜入实施私刑的地区。作为一名颇具天赋的推荐人和议案说客，他甚至可以对几位最高法院法官和 20 多位美国参议员直呼其名。怀特和杜波依斯一样自负，毫不隐瞒自己的信念：他认为杜波依斯这个老头子太古怪，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推进反对私刑和种族隔离方面，已经没办法起到建设性作用。杜波依斯尽管越来越依赖怀特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并且杂志《危机》的发行量直线下滑，他还是拒绝在杂志上推进协进会的项目。他认为这些项目都太普通，还评论说白人缺乏头脑，让事态更加严重。1932 年，怀特指派一位名叫罗伊·威尔金斯的年轻人，到杜波依斯位于纽约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办公室工作，挟制杜波依斯，事情很快到了要摊牌的时候。

威尔金斯身为密西西比奴隶的孙子，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被父亲抛弃，不久后母亲就去世了。他被明尼苏达州的叔叔收养，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他叔叔作为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长的管家，在黑人上层阶级拥有稳固的地位。威尔金

斯在德卢斯快乐地长大。他的流氓父亲在几年后忽然出现，要认领他，迫使他的叔叔和婶子打了一场抚养权官司，最终他父亲败诉。之后，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求学，后来作为《堪萨斯城呼召》的编辑崭露头角，威尔金斯努力工作，成了一名白手起家的贵族。为那份报纸工作的日子里，他是一位极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工作中，他仅仅写些犯罪故事，或者是为推动发行量而编出一些陈腐标题，绝不越界。不过，在夜里，他会穿上自己的无尾正式晚礼服，闯入堪萨斯黑人上层社会金光灿烂的生活。他在一场时装秀上邂逅了未来的妻子。在女方父母强烈的反对下，他还是成功“攀上高枝”。女方父母是浅肤色的天主教徒，布克·T·华盛顿和杜波依斯都曾是他们的座上客（在不同时期），他们一点也不想要威尔金斯这样有着墨黑肤色又缺乏教养的人做女婿。然而他还是成功了，这要归功于他多面性的性格。他说话总是直言不讳，像极了演员吉米·斯图尔特的简洁风格。他以普通人的标准来衡量政治上的选择，认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目标应该为：达到不同种族间的公平竞争。他能在暴乱中镇定自若地说出“这是我们必须出牌的牌”。他想要把一生都奉献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但是当纽约的呼召传来，他还是没能抵抗“搬进埃奇库姆大街 409 号”的诱惑。他从堪萨斯城赶往纽约的途中了解到，那是“纽约黑人住宅区最好地段”。

在纽约，威尔金斯很快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杜波依斯极度厌烦这一切——威尔金斯觉得自己能让《危机》这本杂志成为大众读物，至少在经济状况上过得去。从威尔金斯的打字机中打印出的第一篇文稿是关于黑人田径明星的体育故事，威尔金斯淡淡地回忆着，杜波依斯决定让他“在种族里最令人敬畏的文学思想家和社会思想家中雪藏”。此后，杜波依斯不再让威尔金斯接手这份杂志，认为他是最傲慢的新闻工作者，而且明显是沃尔特·怀特官僚政治的同盟。威尔金斯必须打造自己政治评论家的角色。很快他便开始了第一个行动，威尔·罗杰斯在初次为美国广播公司录制的节目中，用了四次“黑鬼”。威尔金斯精心安排了一场电报攻击罗杰斯、全国广播公司和节目主办方。广播网官方声明他们没

办法进行干涉，还引用了罗杰斯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但在两周后，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日那天，全国广播公司审查了所有节目中有关种族、种族隔离以及私刑的内容。威尔金斯不依不饶，全国广播公司在跟他的笔头大战中发现一个折中办法：威尔·罗杰斯转而用了更加为大家所接受的“黑人（darky）”一词，并且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交涉，停止播送之前那些有辱黑人的节目。

1934年，杜波依斯的境况更加困苦。他虽然名声在外，但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如今他已经66岁，没有存款，已经被更年轻、更实际的人所替代。除了这些问题，他还被自己日益增长的悲观情绪所困——南方种族隔离还是一如既往，北方种族隔离情况比他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做出努力前更糟糕。这些想法煎熬着他，在1934年1月发行的《危机》中，他发表了一篇令人震惊的文章。他宣称，黑人们应该面对一个事实：尽管所有的公义明摆在那里，他们也做出了最大努力，但他们至死也是种族隔离的状态。因此，憎恨种族隔离，很明显就是憎恨黑人这个群体，欣然接受学校、学院和各个行业中自发的种族隔离要好得多——既是为了心灵幸福又为了为以后的战斗聚集力量。

这篇社论不仅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内部，甚至在整个黑人新闻业界引发了一场风暴。几乎没有人支持杜波依斯，就连他的长期崇拜者们都认为他的这些言论是在支持白人种族主义论点——他居然称黑人在种族隔离下过得更好。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内部，他的官僚敌人谴责他提出“接受种族隔离”的邪说。罗伊·威尔金斯——甚至在45年后，杜波依斯的名声已经被黑人权力运动恢复后——还提起了那篇惊人的社论说，那是由于杜波依斯因挫败而产生的幼稚表现，并称杜波依斯“捡起一块砖头扔向他所能看到最大的那块窗玻璃”。一位认识并且崇拜杜波依斯的学者找到了证据证明他的真实动机，原来他是想要为黑人大学说些好话，好让他的朋友约翰·霍普把他聘回亚特兰大大学。（在与支持黑人教育的白人慈善家交涉的过程中，杜波依斯对布克·T·华盛顿的攻击重重反击

到自己身上)自那时以后,人们发现与其摒弃他的观点,不如直接把他踢出局来得容易。沃尔特·怀特和其他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官员明白,他们不能公然跳过黑人教堂和黑人大学抨击所有种族隔离的机构。他们不想在反对一些形式的种族隔离的同时,支持另一些形式的种族隔离,唯恐听上去前后矛盾。杜波依斯想要把这些矛盾带到表面,这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紧张起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董事长约书亚·斯平加恩颁布法令,命令反种族隔离政策的实施要排除所有黑人教堂的集会以及学校,还有其他非综合性机构的集资活动。要不是后来悄悄撤销了这个政策,说不定这个组织都会因此彻底关门。

1934年的前半年里,杜波依斯继续激昂地在《危机》杂志中战斗。他蔑视所有关于表象和策略的言论,这段时间他写成了很多让他出名却有些不成熟的散文:“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羞耻又严苛的自我要求计划,这计划只为让我们争先恐后地爬到一处不需要我们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卑躬屈膝,如同一条被人鞭打的狗喘息不已。不,是被上帝鞭打,让我们直立在泥潭中,让白人世界下地狱吧,我们才不要在客厅里舔靴子。”在出版的杂志中,他继续辱骂他的老板,指控怀特无论如何算是位白人,其之所以和种族隔离做斗争,是因为他想和白人在一起。他还发文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其他官员进行人身攻击,并宣布自己的活动源于内部政治,对种族隔离也非常有益。私下里,他要求开除一部分人——首先是罗伊·威尔金斯,接着是沃尔特·怀特。杜波依斯所做的也不过就是对共谋者用法语发发牢骚,对手们的做法可比他厉害多了。他们反击杜波依斯,对外讲一些有关他渴望进入白人世界的故事,以及他从白人世界借鉴而来的矫揉造作。他们想要借用他攻击马库斯·加维民族主义的言论让他难堪,他们甚至散布杜波依斯性生活方面的谣言,强调他对浅肤色女人的喜爱。

与他所处的时代不协调的是,杜波依斯在那一年结束了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工作,回到了亚特兰大大学,重新加入教职工队伍中。在学校,他开始了和弗洛伦斯·玛蒂尔达·里德进行的持久战,弗洛伦斯是斯佩尔曼学院的校长,

1927年小约翰·D·洛克菲勒把她安置在亚特兰大大学，任财务主管。在纽约，罗伊·威尔金斯接手了《危机》杂志，他想要发表一篇文章，充分利用杜波依斯的丑闻做文章，他写到，H. L. 门肯称赞黑人是超越所有其他族群的一类人，因为他们愿意在公开场合指责对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教义推动此组织机构重新承诺与种族隔离做斗争，并且埋葬面对白人霸权主义存在的根本分歧。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争论显示，和从前及过后出现的情况一样，种族隔离和种族扩展可以看作愚蠢怯懦，也可以看作是明智勇敢，这取决于历史情绪和历史环境。实际上，杜波依斯的爆发意味着当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团体在一段时期内会更加自由地去选择攻击目标，不必再担心责难。纽约办公室没有人想要再次开启和杜波依斯进行的激烈争论，那场争论让杜波依斯告别了他职业生涯最辉煌的一段。

在亚特兰大，金牧师冒险参与进这场有关杜波依斯问题的双边政治中。1935年，他带领几百人来到法院，在那里登记投票。而这次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传统活动成功被领导阶层的党派之争和一小部分人抹杀了。很多黑人因为担心在经济方面遭到报复，公开表明自己不会登记投票。其他人反对这场游行，因为它“惹是生非”，还有一些人因这要和白人政客进行交涉而反对。1936年，一群老师想要把自己工资提高到和白人学校的老师一个水平，金成了他们的发言人。这场活动与杜波依斯的新挑战照应起来，一些人正是因为杜波依斯曾给出的理由反对它。他们声称，种族隔离机构的改进，是对种族隔离的强化。亚特兰大一些较为贫穷的黑人反对这个理念，认为在很多人连工作都没有的情况下，不应该首先关心相对有特权的老师。一些老师自己因为怕丢掉工作，便回避了。就这样，加之白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党双双给出的消极反应，直接导致了矛盾的产生，远远超过老师们关心的问题。几场会议之后，金便放弃了这个计划。

金牧师被自己在埃比尼泽教堂持续的成功所驱使，他一直站在民权运动的前线，尽管在那些年里并没有取得什么引人注目的民权进步。他在筹集资金上发挥了作用，筹款购置了一台沃立舍风琴，并为此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安置典礼。那

架风琴有两千根管线和两本操作说明书，颇具特色。这架琴成了教堂风琴手艾伯特·金的骄傲。显然埃比尼泽教堂在加速扩建，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奥本街上更加古老、更加著名的对手惠特街浸信会教堂——那座教堂新建筑的建造计划止步不前，随后才完成了一半就拆掉了。最终那里著名的牧师 J. 雷蒙德·亨德森在绝望中辞职，给他的教会成员留下的，是内部人员彼此间就挪用教堂公款所进行的无尽争吵。

金牧师在接手一座破产教堂不到六年的时间里，便成了奥本大街的主人，然而他卓越的表现却仅仅维持了几个月。惠特大街教堂雇用了新牧师威廉姆·霍尔姆斯·鲍德斯，在一些方面他简直和金牧师如出一辙——他也是牧师的儿子，来自佐治亚州农村，同样也私下里请求过约翰·霍普校长让他进入莫尔豪斯学院。他坚信金钱是衡量教堂和牧师的标准，他在礼拜计划中列出教会不动产的价值。他们最主要的不同是，鲍德斯获得了神学院的学位以及北方白人学院的硕士学位。惠特大街教堂把他从莫尔豪斯学院教职工的队伍中雇来。他的妻子在斯佩尔曼任教。在学历意识很强的亚特兰大城，鲍德斯家族在教养方面的确领先金家族几步。他还同金有一个突出的区别，鲍德斯是亚特兰大第一位拥有固定广播节目的黑人牧师。广播节目名为“七分钟迈克尔说”。这档节目里面充满命令性的语言和完美的措辞，给他做了不少宣传。让金牧师感到错愕的是，小迈克尔急切要听鲍德斯的讲道，他想要学习里面的华丽辞藻。

自鲍德斯借钱拆除惠特街上建筑周围的脚手架，翻新了建筑，鲍德斯和金长达 40 年的竞争便迅速展开了。报纸跟踪报道了这座建筑的进展，故事发展扣人心弦。19 个月后，大批的人都挤入奥本街，想要进入新建的教堂参加献堂礼仪式。（金在两年后才重新建了埃比尼泽教堂）鲍德斯积极地和同街上的牧师进行对比。他也毫不避讳地在公众场合，指责金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水准，这一切在次年的电影《乱世佳人》的冲突中就可以看得出。

25 年前，《一个国家的诞生》宣告了好莱坞电影刚刚诞生，1939 年，又一部

以种族和内战为主题的里程碑式的电影横空出世，标志着好莱坞电影造诣完全成熟。与《一个国家的诞生》一样，《乱世佳人》对当时空前一致国家舆论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其共识建立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心理回避的基础上。其结果就是，在大部分文化中，有关美国重建之后种族关系的精确历史记录，哪怕是在最领先的学术成就中，都没有微乎其微的存在。斯佩尔曼学院和几十个这样的学校的“艰险旅程”，连同上百所较小的学校的故事；上千位传教教育家、几十位黑人政治家用维多利亚式华丽修辞术进行的、记录他们心路历程的演讲都无迹可寻。有关重建白人法律主权方面上不得体的现实性也被抹杀。国家共识变得如此强烈，让种族的主题在潜意识中沦为扭曲的图像——就仿佛在那两部电影中捕捉到的那样——世故的白人想当然地认为内战发起的原因跟种族没有任何关系。让人不舒服的现实从公认的历史中漂洗出来，剩下新电影最想要表达的——浪漫，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浪漫却也随风而逝了。

《乱世佳人》的首映礼一扫生活的平淡。《纽约时报》的报道基调相当愉快，连《工人日报》的戏剧评论家都迫不及待地赞美这部电影，结果，这位评论家却因评论中充满资本主义的“歪理邪说”而被美国共产党炒了鱿鱼。在亚特兰大，克拉克·盖博带领盛大的队伍在桃树街游行。当时，部队技术员已经安装了防空聚光灯，这样，第二天晚上的首映礼上，电影明星们就会沐浴在灯光之中。游行队伍前往都市礼堂，青年联盟正在那里为电影明星举行一场《乱世佳人》舞会，众多名人以及被选中的亚特兰大人都参加了。那天晚上，都市礼堂是宇宙的中心。金牧师也想办法参加了舞会，是唯一一位黑人牧师。埃比尼泽教会唱诗班，在金夫人的指挥下，为来宾们演唱了四支动人心弦的灵歌。

随后的周二，亚特兰大浸信会牧师联盟的例会上，鲍德斯和其他几位牧师对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认为金不应该让唱诗班出席那种活动，因为舞会不仅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而且显然是罪恶的。舞会最明显的目的就是让人跳舞、喝威士忌，这违反了浸信会的教义。更强硬的牧师对此进行了谴责，他们认为黑人

唱诗班成员身着围裙、杰迈玛阿姨戴着头巾，对全是白人的观众唱小夜曲有失身份，况且，连电影中扮演黑人奶妈的哈蒂·麦克丹尼尔都没能参与舞会。更保守的人士则强调了跳舞的种种罪恶。金左右为难，寸步难行，辩称特殊情况下的有罪行为情有可原，但他仍并不能避开大家对他的一致谴责。

尽管这种难堪对金和鲍德斯之间的关系改善没什么帮助，但除了纷争不断的牧师团体，也基本没有带来太大影响。金收获了越来越多切切实实的成功。他对社区和经济的贡献很大，因此，莫尔豪斯学院推选他为学院理事会成员，而且市民信托银行也将他纳入了理事会。那一年《乱世佳人》上映了，更重要的是，当年的浸信会世界联盟在亚特兰大召开了全球会议。而五年前，金参加的全球会议则是在德国举办的。无论黑人还是白人，参加过全球会议的亚特兰大牧师不多，作为其中一员，金成为了组织者，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种族关系方面，那一周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黑人牧师 J.H. 杰克逊在约 3.5 万名听众面前发言，这些听众挤在之前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庞塞·德莱昂公园里，欢欣鼓舞。杰克逊是芝加哥橄榄山浸信会教堂的牧师，该教堂之后超过了拉尔夫·阿伯纳希在蒙哥马利的浸信会教堂，成为全美最大的黑人教堂。杰克逊被认为是国家黑人教堂的天之骄子。大会期间，杰克逊住在金在奥本街的家里。之后几年，他在管理国家浸礼联合会期间，金是他的助手。而他也频繁地暂住在金的家中。年轻的 M.L 从 10 岁起就知道杰克逊了，对他十分尊敬，但金没有想到，这位著名的演说家以后会成为自己在教会内部的劲敌，会想摧毁自己。

作为莫尔豪斯的信托人，金牧师认识本杰明·梅斯博士。博士之前是莫尔豪斯的老师，之后则成为著名的神学家。因此，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保罗·田立克将他纳入了二人创建的私人智囊团信托中，该信托的目的则是解决上帝与人类之间的重大问题。梅斯 19 世纪 30 年代时，作为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德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而出名。1940 年莫尔豪斯学院校长一职空缺时，梅斯成为该职位的主要候选人。很快，洛克菲勒的准合伙人，也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副校长、斯佩尔曼

学院的董事会主席，就邀请梅斯担任斯佩尔曼学院第一位黑人院长。这是一个阴谋。洛克菲勒的准合伙人想排挤掉独裁的弗洛伦斯·里德，说她各方面都不错，但并不是一位职业教育家，而此前她也只是做过洛克菲勒的秘书而已。这位准合伙人请求梅斯管理斯佩尔曼学院，这比莫尔豪斯学院的职位更高。洛克菲勒阵营中的这个密谋拖延了梅斯。最后，梅斯不愿拿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做赌注，所以拒绝了斯佩尔曼学院的邀请，去了莫尔豪斯学院。毕竟，去斯佩尔曼学院的话，梅斯就注定要在不熟悉的战场上艰苦奋斗。

年轻的 M. L. 金和本杰明·梅斯同时走进了学校——金成为亚特兰大大学实验中学七年级的学生，梅斯则成为莫尔豪斯学院的校长。M.L. 金的父亲常带着三个孩子到莫尔豪斯学院和斯佩尔曼学院参加音乐会和讲座，因此，那一年中，M.L. 和梅斯校长的碰面相当频繁。表演结束后，金牧师总会到舞台上或化妆间去祝贺表演者，对成人和学生一视同仁。每次，金都会向大家自我介绍并介绍自己的孩子们。莫尔豪斯四重唱演唱组中的男高音被这位强大牧师的直率和活力所吸引，因为金牧师对每个人都做出中肯的评价，鼓励他们，而且，他为自己的孩子们深感骄傲。

每天早上，年轻的 M.L. 金都要搭乘一班种族隔离的市区公交车到实验中学上学。公交车从奥本街穿过亚特兰大市中心，来到洛克菲勒和北方浸信会教友上世纪购买的庞大校园。有时，金会带着小提琴到学校去，好学习拉琴，而他的小提琴琴盒以及他得体的衣着，肯定给乘客们留下了一种端庄严谨的印象。学小提琴是他母亲的主意，M.L. 闷闷不乐地顺从了母亲的意愿，但他的琴声一直都像是沙哑的哀鸣。根据家族故事记载，A.D. 拉得好一些，而相比之下，M.L. 在钢琴上的表现更为出色，但他没有耐心学习基础乐理知识，还非常想弹奏美妙的旋律，因此，他很快就跟不上课程进度了。成年后，金和自己信任的朋友们在一起时，偶尔还会弹琴，不过只是弹奏《月光奏鸣曲》的片段，他承认这是自己唯一会弹的曲子。

5月一个周日的下午，正是M.L.在实验中学的第一学年要结束的时候，威廉姆斯外婆成为橄榄山浸信会教堂妇女节的发言人。她的外孙们在楼上学习，但过了一會兒，M.L.就溜到楼下，到奥本街观看市中心游行。那时，美国提出了租借法案，战争的消息也从欧洲传来，小孩子们都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兴奋——军服，军乐和游行令人兴奋。M.L.正看着游行的人，这时，一个年轻朋友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他外婆去世了，让他赶快回家。

家族的女家长当时正坐在橄榄山的讲台上，一场突发的心脏病夺去了她的生命。年轻的金悲伤无助，泪眼模糊地回到家中，他心底最深处有着难以释怀的痛苦。他本能的反应就是自责：倘若自己没有放纵对游行的好奇心，偷偷溜到街上，外祖母也许仍然活在世上。他对外祖母特别的感情和人类生命终结的寒流碰撞在一起，彻底击垮了他——他再次从楼上的窗户中跳了出去。家人再次给了他力量，但这次再没有好消息给他安慰了。连续几天，金失声痛哭，睡不着觉，显然哀恸不已，邻居和亲戚看到葬礼上他那副威严沉着的样子都惊讶不已。人们说他一夜之间长大了。

在金十年后的自传里，他把外祖母的去世列为童年时期的大事件，据他所说，这件事“对我在宗教方面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他详细回忆了外祖母的去世对自己的影响，他毫不隐瞒自己的情感，而情感足以弥合所有的矛盾。在一篇文章中，他说外祖母的去世刺激他第一次严肃思考“永生方面的教义”，而那段时间里，他的父母则安慰他说“外祖母仍以某种方式活着”。“我想这就是我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坚信永生的原因。”他总结道。然而，在同一本自传中，他描述了外祖母去世之后的那段时间，自己开始了对宗教怀疑主义的长期坚持。第二年，金13岁时，公开的异端邪说在埃比尼泽达到了顶峰。“当时，我否定了耶稣复活一事，这震惊了整个主日学校班内的学生。”在一个原教旨主义者教堂听到此番言论，还是出自牧师的爱子之口，这毫无疑问会引起轰动。金没有记录过自己公开说过的话，但自那时起，他开始记录了，“疑惑无情地涌来”。金大二那

年，他提到自己“后悔去教堂”。外祖母去世的压力困扰着金，加上他好奇的本性，很多压力加在原教旨主义这栋大厦上，而终于在他面前坍塌下来。外祖母的去世让年轻的金第一次有了信仰和疑惑并存的感觉，因此他总会去直击宗教问题最尖锐的部分。外祖母会把纯粹的爱和内在的威严结合在一起，她去世后，金就失去了一位这样的亲人。

对金的父亲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岳母去世带给他的自由抵消了他的痛苦。这种自由让他实现了自己毕生的目标——真正拥有自己的家。葬礼结束后没多久，金的父亲便购置了一栋黄色砖房。他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房子。”那栋黄砖房距离威廉姆斯在奥本街的家只有几个街区，之后他的妻子几乎一生都住在那里，他们所有孩子也都在那里出生如她去世的母亲一样，金太太也有几分独立自主，她拒绝出售或抵押那座老宅子，拒绝以此获益，购置大马路上的新家。作为她母亲财产的遗嘱执行人和唯一继承人，她把这老宅子过户到自己名下，对外出租赚钱。这样，一家人搬到了金的新家中，而金太太则仍然保留着威廉姆斯家族的老房子。

新的砖房位于“主教一条街”，卫斯理学院为进一步巩固学区建设迁址到另外镇上另一边的亚特兰大大学校园之前，黑人大主教都住在那里。如今，住在奥本街商业区附近的市中心早已过时，有钱的拓荒者在黑人学院校园外的森林区里建造了现代住宅。开始，那里被称为猎人山，之后则被简单称为西区。在实验中学时，M.L. 认识了许多住在那里的黑人的子女，这让他对社会环境变得更加敏感。当时，盛行的说法是西区比东区好。关于东区男孩和西区女孩约会是何等特别的笑谈广为流传。收入、家庭历史、肤色和宗教派别划分了截然不同的阶层——上到第一公理教会极为优秀的精英分子，下至为不识字的人开设的最古老的浸信会教堂和其他教堂。前者是肤色非常浅的黑人，有时，他们会主持礼拜，但他们讲的不是音乐，也不是教义，而是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他们的思想理所当然是深刻的。那个时代的黑人教会里有很多阶层，但只有少数是健康的、可

以发挥作用，并可以解决相关问题的。年轻的金辩称自己的社区是“一个健全的社区，虽然我们之中没人是‘上上层’”。一位黑人作家说这个街区里“主要是中低层人士，还有上等下层人士”。金高中时代一位最好的朋友将这一说法细化为“上等下层阶层、中等下层阶层以及中等中层阶层”。

也正是这位朋友给 M.L. 起了第一个伴随他终生的外号“花呢君”，因为金总是穿着花呢套装。年轻的金喜欢时髦的打扮——他穿着考究，对自己的衣着十分挑剔。随着金升入高年级，他还因精心设计的维多利亚时代求爱方式而出名——他颇有绅士派头，以信传情，对爱情诗有着近乎无耻的推崇。他总是花言巧语，夸夸其谈，还能自如地逃脱别人的轻蔑。他总是非常低调，花呢布料和粗布工作服都可以轻易驾驭。金交友广泛，这也意味着“花呢君”不过是和“烟丝”“公鸡”“麻袋”和“鼯鼠”一样，都是他众多外号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快了金学习的节奏。亚特兰大大学实验中学创建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高质量的老师，可以让黑人毕业生同白人毕业生完全一样，熟练掌握技能。然而战争让亚特兰大大学流失了很多学生，于是学校便关闭了。因此，年轻的金进入了城里唯一一所向黑人开放的高中。学校位于西区。他继续乘坐巴士上学。考试成绩证明，从前在实验学校的学习让他在私立学校名列前茅。作为一名 13 岁的十年级学生，他于 1942 年的秋天进入了布克·T. 华盛顿高中。金到那所学校的时候，同盟国刚刚登上北非大陆。接下来的春天，金牧师和其他莫尔豪斯信托人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严重的财政危机。战争带走了大部分本来会到莫尔豪斯学院就读的学生。而且，就算梅斯院长为学校资金筹集做出了惊人努力——即“雄兔计划”，因为他无情地向莫尔豪斯学院的人索要钱财和捐赠物——学校也无法逃脱继续亏损、濒临破产的局面。理事会主席建议莫尔豪斯学院在战争期间关闭一段时间，但梅斯想到了另外一种方法，可以勉强维持学校的运行：学院降低入学的标准和入学年龄，录取年龄更小的大一新生。之后，15 岁的金在当年秋天入学了，而他则坦承自己的阅读水平和八年级的学生差不多。

与此同时，在和亚特兰大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杜波依斯长达十年的游击战中，斯佩尔曼的校长里德终于获得了胜利。尽管她不是学者，也不是教育家，但她是洛克菲勒的代表，这层关系赋予了她一种凌驾于所有师生之上的力量。她是莫尔豪斯董事会成员，同时作为亚特兰大大学的财务主管，负责签署所有支票。怨声载道的黑人教职工给她取外号，称她为洛克菲勒的白人“监工”。她对杜波依斯的致命一击简单而安静：从1944年的秋天开始，杜波依斯的名字不再出现在教职工薪水册上。76岁的老杜波依斯写过三本书并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1934年，杜波依斯吵着离开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后，他这份教职工作非常不愉快地戛然而止了。亚特兰大大学没有下发通知，也没有举办仪式，就把杜波依斯甩开了。而之后将近二十年里，等着杜波依斯的则是动荡的文学和政治生涯。

总的来说，重大事件——如广岛原子弹一般惊人，又如避孕药早期研究一样微妙——也未能影响莫尔豪斯学院中专心致志的金和他的同学们。在莫尔豪斯学院，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是，关于莫尔豪斯学院只两种学生：一种已经在莫尔豪斯学院就读，另一种则希望到莫尔豪斯学院就读。梅斯校长在向全体学生的每周致辞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自己的威信和口才能激起学生们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不过他承认自己失败了。梅斯校长的一些言论成为他传奇生涯的一部分，他经常用其中的一句话责备学生，说他们根本不关注“比汉堡大的事。”

金在莫尔豪斯结交的大部分朋友私下都对神职抱有叛逆情绪。一位名叫鲍勃·威廉斯的男高音独唱家几年前曾和金碰过面，他结束了短期兵役后回到了莫尔豪斯学院。威廉斯出身牧师家庭，但一心想成为如自己的偶像罗兰·海耶斯一样的歌剧演员。年轻的塞缪尔·库克只有15岁，和金一样，决定不像父亲一样在布道台上做神职工作。沃尔特·麦考尔是位退伍军人，曾经为了钱在教堂讲过道，但非常厌恶神职工作。麦考尔的职业规划是做兼职牧师养活自己的同时，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成为像瑟古德·马歇尔一样的律师，帮助自己人。麦考尔认为，做牧师比做律师更容易养家糊口，不过，做律师比牧师更能服务大众。他认

为——理想主义者必须依靠法律，而负担家计的人必须依靠教堂——这让当时的白人学生困惑不已。彻底的文化反转是当时黑人真实情况的写照。此外，另一个事实是，三分之二的黑人大学生都是女性，如此，每位黑人大学男生，至少能在同学中找到两位可结婚的对象。

金到莫尔豪斯学院学习的目的本是成为一名医生，但他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在他看来，生物科学太过冰冷和精确，并不适合自己。之后，他像自己的朋友沃尔特·麦考尔一样，将目光放在了法律上。当时极度贫穷的麦考尔在格罗夫斯大厅的地下室中做非法校园理发师，为学生们理发，每次10美分。他对所有的顾客说自己疾病缠身，尤其是关节炎，他还会提到自己经济上的窘迫。有一次，金剪好头发后，告诉麦考尔自己手头紧，不能立刻付钱。结果，麦考尔被这个文雅的富家子激怒了。两个人走出大楼，“到一片草地上”摔跤，吸引了一大群人，金在摔跤比赛中获胜，不过，之后五年的时间里他给了这位退伍老兵不少钱。赢得麦考尔的尊重后，金让麦考尔相信，自己的父母真的没给很多零用钱。不久后，金便付了自己理发的钱。两个人不打不相识，人们称他们为“马克和迈克”，是性格截然不同但相处和谐的一对。粗暴、叛逆的麦考尔似乎有一个更加艰难的叛逆期，后来他称之为“革命性阶段”。他痛恨宗教的优点——尤其是围绕着天堂和十字架那些幸福的讨论——而且是以宗教思想为出发点。他和金还有小团体中的其他成员去教堂时，他们总是坐在楼上看着下面的人们，仿佛自己是人类学家。

金记得，莫尔豪斯学院还有学院里的人对自己种族身份的反应让自己惊讶不已，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意识到没有人害怕的感觉。”从以下两方面看，他的意识存在矛盾：一是这与他自己的记忆矛盾——记忆中，金牧师一直在家中、在埃比尼泽教堂里保护他，让他摆脱种族懦弱以及种族羞辱的阴影；二是他的感觉完全不对。莫尔豪斯学院的学生并没有摆脱种族恐惧，种族恐惧已经成了他们的一部分，甚至存在于他们和白人里德小姐的上下级关系中。几乎没有学生能和白人相处自如，也几乎没有人反对亚特兰大种族隔离的法律。而恐惧总会成为金那

个宿舍每晚的话题。对在莫尔豪斯学院的金来说，让他感到陌生的并非恐惧是否存在，而是怀疑恐惧是否存在这种想法。

在家里时，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金牧师不愿意在家中谈及种族问题。少数种族隔离问题公然冒犯他的尊严时，金牧师总是勇敢地捍卫自己，这些小插曲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金牧师的传奇——有一次，一位售货员坚持让金的父亲和金去种族隔离区，再为他们服务，而金的父亲则愤怒地走出了商店。对自己的无畏夸口的同时，金的父亲想到了一种理论和日常方法，避免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他的情感一直植根于恐惧。金的父亲把种族问题简单化了：他是对的，种族隔离是错的，白人对黑人的憎恨是个只有上帝才能解开的谜。他的儿子在这种观念下长大，却惊讶地发现莫尔豪斯学院的人正自由地解谜。在莫尔豪斯的校园内，金第一次开诚布公地谈论了种族问题。有关种族问题的无数理论中，大部分都出自社会学系。社会学系的教授认为，种族行为是全部社会行为的子类别。他们想要把种族恐惧从一项禁忌，概括为一门能用逻辑解释的知识。金决定攻读社会学，为自己法律职业生涯做准备。沃尔特·奇弗斯是金的指导教师、启蒙老师，他认为种族偏见可以模糊地解释为：在对白人有利的经济制度下必然的副产品。

在宗教方面，自外祖母威廉姆斯三年前去世至今，金逐渐深化的否定思想是他的理论来源。金回忆道，多年以后，他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前两年将他逐渐逼到了“怀疑状态，”这段时期，金非常厌恶自己的教会背景。他直说这非常痛苦，但也感到释怀。金写道，在莫尔豪斯学院，“我已经摆脱了原教旨主义的枷锁”。莫尔豪斯的氛围让金自由思考，让他有了一种复杂的兴奋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个人的因素也加剧了他成长的痛苦。这些因素包括他与过世的外祖母不同寻常的感情，也包括种族和宗教恐惧在父亲身上的汇聚。而金的父亲一直想靠赤裸裸的权威破除这种恐惧，不过这看起来既有欺骗性，也太软弱了。在感知的周期中，偶尔金牧师仿佛有力量超越他的原教旨主义。金牧师还是一位父亲，必须要以身作则，说明如何管理教堂，如何融入社会，并敢于说出有益于千万人的答案。

这些压力之下，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金都表现得很内向，但并没有妨碍他结交新朋友。他和麦考尔花了大量时间，体验违反浸信会教义的小罪恶，比如跳舞、玩牌之类的。在莫尔豪斯学院，金一直努力做到衣着考究文雅。他的校园模范之一便是格拉德斯通·钱德勒教授。那位教授抽雪茄，身穿时髦的呢子大衣，发明了很多益智的小游戏帮助学生们学习作文课上的多音节词。在这门课上，金名列前茅，因为炫耀自己的学问、玩文字游戏带给他无尽的快乐。如果钱德勒教授要求金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好吗？”金则会回答：“据我推测，我在物理上的平衡正处于有机静态。”在“马克和迈克”身边的朋友们看来，金为人友善，做事有礼有节。他委婉却坚定地摆脱了年幼时的宗教束缚，转而成功成为莫尔豪斯学院风趣绅士的典范。金大学二年级结束时，鲍勃·威廉姆斯完成了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学习。一段时间后，威廉姆斯听说自己年轻的朋友决定要成为一名牧师时，第一反应就是难以置信地大声笑了出来。

1946年的夏天，因为工头坚持称金为“黑鬼”，金辞去了他在亚特兰大铁路快运公司的工作。那时，全世界正逐步适应世界大战带来的变化，不断恶化的种族问题已不再是新鲜的议题，而白人们也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个称呼。通货膨胀失控、害怕大萧条再次出现的情况下，经济战争爆发了：工人罢工、公司打手出场，政府紧急项目也出台了。苏联和美国逐渐将全球分化成两个阵营，双方都声称自己坚持的主义能消灭邪恶帝国的野心。亚洲殖民地和非洲殖民地的人民谴责民主国家的虚伪，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主权。同样地，美国的黑人士兵则要求在美国享有自己在海外为别国争取的权利。白人们拒绝了这些要求，尤其是在南方，私刑事件铺天盖地地重新出现在报纸头条上。那年夏天，暴徒在三周之内暗杀了至少六名黑人退伍军人。佐治亚州发生了自1918年以来的第一起多人私刑事件。六名老兵中的一位就因此而死：一伙蒙面人在门罗附近，将那名老兵、他的妻子以及另一对黑人夫妇从车里拽出来，让他们在一条沟前站成一排，并连续开枪。据报告说，四个人的遗体上有180个弹孔。此事件之后，门罗的州调查员

还抱怨说“镇上的上流人士都对此闭口不谈”。不过，联邦调查局还是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提交给了拒绝撤销起诉书的大陪审团。当地黑人则邀请了亚特兰大的牧师威廉·霍姆斯·鲍德斯主持这场葬礼。

在白宫总统办公室中，门罗死刑事件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向杜鲁门总统报告的众多事件之一。“我的上帝！”杜鲁门惊呼，“没想到事情已经到了如此恶劣的地步。”他承诺要采取行动，此后不久便任命了特别委员会立法，处理剥夺黑人公民权利方面的有关事宜。当时，黑人领导人都害怕走进白宫会让自己麻烦缠身，更不用说走出白宫的时候还得到了总统的承诺。因此，杜鲁门的做法使他一夜之间成了英雄。金的朋友塞缪尔·库克帮助组建了第一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学校分部，很快，学校分部就支持了一些争论，比如黑人是否应该拒绝参军来抗议种族隔离等。那个秋天，大批参战军人涌入校园，学校的氛围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些都是已经参加过战争的军人，现在却要 and 莫尔豪斯招收的“小毛头小子们”一起。库克虽然刚 17 岁，但由于他在足球队中人气颇高，已于去年春天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因此，他要面对为广大学生服务的挑战。

金对学校中有关公共事件的骚动没有一点兴趣。作为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和拉里·威廉姆斯、沃尔特·麦考尔一起学习布道上。他们是紧密团结的三人组。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在宗教方面的叛逆日臻成熟，他们开始探寻牧师职业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那一年，每个月有三个周日，他们都会出现在惠特大街的塘台上，学习鲍德斯的习惯、组织风格以及有力的布道——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鲍德斯无须重复永生的教义，就能调动起别人的情绪。果不其然，鲍德斯欢迎他们的到来，而金牧师则非常不喜欢他们缺席。埃比尼泽教会的成员拉里·威廉姆斯和鲍德斯在过去的一年里交往甚密，因此，鲍德斯便邀请拉里到惠特街做助理，这被金牧师视为阴谋的证据。于是，金牧师便要求自己的儿子断绝与威廉姆斯的来往。

M.L. 拒绝如此，个人信仰与家庭和谐的冲突中，他的处境愈发微妙。事实

上，他对布道合情合理的探究使之超越了鲍德斯，朝着不太正统的方向发展，但他无法告诉自己的父亲。父亲的不满非常真实，而且确实是针对他的。此外，他还意识到那些世俗的宗教都太不明确，无法支撑教堂的运作。金牧师总是谈论如何维持教堂。M.L. 从很多方面尝试过穿越这片危险的心理区域。在他大三结束那年，他不再把律师梦挂在嘴边，别人问起以后的打算时，他都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

来自家庭的压力太过沉重，于是，1947年夏天，金再次加入了莫尔豪斯烟草项目中。该项目是战时风险投资项目，学院已经与康涅狄格州的种植者签约，同意提供学生工人，帮助收割烟草。金三年前就去过，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走出亚特兰大；不过这次更像是工作，而非探险。之前的一次投票显示，金是两位最懒惰的工人之一。现在，金充分展现了天生的活力，将之变为顽皮但坚定的抗拒。有时，在营房附近会提供啤酒。对金来说，一次夜巡的警察过来问话，是夸张行为达到顶点的标志。不过，这只是虚惊一场，问话过程没有暴力行为。金没有被关进监狱。然而，对任何年轻人来说，想想回家要解释这种情况就会让人异常紧张，更别说金还是金牧师的儿子了。消息必定会传到金父亲那里。

回到亚特兰大后，金对几位密友说，要先告诉父亲他最想听到的事——继承父业，成为牧师——以期减弱此事的影响。这一消息让金的父亲喜出望外，他打算衡量儿子做出这一打算的诚意，之后就安排 M.L. 立刻进行试讲。他以埃比尼泽教堂会众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告知大家——自己的儿子已经“受到了上帝的召唤，即将担任神职”。金的朋友们明白，当时的金因朋友们对此事的嘲笑非常敏感。但不久之后，他们便开玩笑说金绝对是受到了“烟草地上的当头烈日”的召唤。

在约定好的礼拜天下午，一大群人熙熙攘攘排队走进教堂地下室，金的试讲就要在那里进行。越来越多的人走了进来，金牧师非常自豪，他最后大声说道：“人满了！人满了！”然后就挥手让有些人注意到，站在布道台上年轻的 M.L. 金

没有父亲威严的仪表，身材也不如他父亲魁梧，但他说话总带着一种权威，足以让人们忽略他不那么强壮的身材。尽管各种人的期待不同，金没有大谈特谈耶稣，而且使用了很多华丽的辞藻，但试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说，这个男孩只有18岁，比起谈论上天堂，年轻人总会更多地探讨怎么过上好日子。显然，金非常有天赋，他似乎将生命诉诸情感，铿锵有力的男中音谱写了信念的乐章。埃比尼泽全体教会成员都站起来庆祝。金牧师说，年轻的M.L.很快就会成熟起来，成为埃比尼泽教堂的助理牧师。只有年轻的金和他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几位朋友知道，他第一次在布道台上的演讲借鉴了一篇名为《生活靠自己创造》的布道文，那是河岸教会的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在纽约发表过的文章。

金在莫尔豪斯学院的最后一年风头正劲。他和拉里·威廉姆斯两人就像年轻的王公贵族般围着校园散步，那时拉里·威廉姆斯已是鲍德斯的助理牧师。每当鲍德斯让威廉姆斯替他主持葬礼时，威廉姆斯总会让金和自己一起。两个人不是在一起讲经布道，就是一同忙着去主持别人的葬礼或婚礼。他们还一起上课、做功课，沉浸在当地女性对他们的钦佩中。有时，沃尔特·麦考尔会取笑朋友们忘乎所以，然而，他的经历与金和拉里毫无二致。金的叔叔约尔管理着南卡罗来纳州谢迪格罗韦的教堂，他们三个人都为能成为在那里布道的外地牧师而深感自豪。金曾从他叔叔的教堂坐飞机回家，成为家族中第一个乘飞机的人。金和威廉姆斯常常去那里，他们还给彼此取了新外号——金的外号为“谢迪”，威廉姆斯的外号为“格罗韦”。莫尔豪斯学院的学生叫他们两人“海盗帮”，以此说明他们是学校女性最青睐的人。金的朋友们仍然觉得“花呢君”这个外号适合他，能凸显他做作的习惯动作——金总在跳上讲台时合上讲道文件夹，好让所有人都看到他是脱稿讲道。这种习惯让金牧师非常生气，因为他希望儿子能按照手稿布道。

金在莫尔豪斯的最后一年，一条重大消息从华盛顿传来——杜鲁门成为第一位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致辞的美国总统。前一年杜鲁门任命的委员会发布了名为《保障如下权利》的报告后，大部分人都非常惊讶，因为杜鲁门竟在事先没

有征求公众意见的情况下，发布了一项计划。这份报告把“公民权利”应用于日常政治用语中，以此替代了“黑人问题”这个词。接下来的2月里，更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距圣雄甘地在新德里被暗杀后仅仅三天，杜鲁门就向国会发布了特别的民权信息，其中一项便是要求提出联邦反私刑法。在种族问题上，《亚特兰大宪法报》的编辑拉尔夫·麦吉尔是南方最负责的自由主义者，他抨击了这一要求，认为这对南方白人来说太过激进。于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便将拉尔夫·麦吉尔称为“狡猾的人”。随即这两人觉得有必要来段道歉的小插曲，并重新划定自由主义日益缩减的舒适领域。在莫尔豪斯学院，多数现实主义认为，新法案是杜鲁门在北方重燃连任希望的最后一搏。他们由此预测该法案最终将不了了之，但仍有传言表明，战后世界可能会开启全新的时代。从前支离破碎的信心，现在因战后的善意以及地球不断缩小的严酷现实而重获支持，新的情绪形成了。

那年冬天，金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但他谈到的问题与热点问题相去甚远，他在学校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教育的目的》的文章。他写道，大部分莫尔豪斯学院的学生都把接受教育当作一种“可以让人不断践踏大众的剥削手段”，这非常危险。金认为，如方法得当，教育提供的是“高贵的目的，绝不是置人于死地的手段”，他还想要把学习从“追求高效”的道德真空中拯救出来。“最危险的罪犯是那些有理智却没有道德的人。”金就此举例说，一位身份不低于前佐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的人物曾是重点大学的优等生，“是佐治亚州的聪明人之一，甚至是全美国最聪明的人之一，但他却说我是下等公民。”

这篇文章是金早期所写，完全是他旧时的风格——对自己选择的话题全面地进行强烈抨击、建立具有煽动性的联系（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莫尔豪斯学院学生的利己主义和塔尔梅奇的种族主义联系起来），把宗教和才智综合到一起，通过自我斗争的方式来表达新颖观点，同时他还沉溺于对陈词滥调的喜爱中。那一年，金满脑子想的都是教育。既然他已经选择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就要有目的地

接受教育。他知道，如果自己想在不久地陷入怀疑主义的前提下，在原教旨主义学说方面提高自己的布道水平，就需要一些大道理来配合自己华丽的辞藻。在这关键的方面，他的训练才刚刚开始。他想要去神学院——去鲍德斯、福斯迪克、约翰斯这些最优秀的牧师学习过的地方。他尤其想要去一所白人神学院。这样，回答那些尖锐问题时，他就可以证明别人之前一直说的话——他和其他人一样出色。金想离开亚特兰大一段时间，离开金牧师。自从参与神职工作以后，他在父亲的控制下，做出一点让步。那一年，金牧师让自己子女的助理牧师做了一件事，而一年前，他还不能让那个斯文的叛逆学生做：金牧师让 M.L. 公开向埃比尼泽教堂的会众道歉，因为他和拉里·威廉姆斯一起参加了基督教女青年会举办的舞会，而这是一种罪过。金牧师还想阻止儿子参加新的跨种族学生委员会，却以失败而告终。那个委员会的成员是来自亚特兰大的白人学院和黑人学院的学生。金牧师称金应该和自己的种族在一起，不要冒险，免得白人学生“背叛”他。但金认为这个想法很荒谬。

学年结束前，莫尔豪斯学院按照惯例，要举办一场学生演讲庆典，这在黑人学院中独一无二。学校每个系部、大部分社团和协会都要挑选出一名优秀学生代表，代表该组织向全体学生发表年度演说。一连串的演讲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其中有一天在塞尔大厅的地下室里举行了义务性教堂宗教仪式，最后以高年级学生的讲道结束。在那个场合，校长梅斯和全体教职工一致推选金代表班级演讲。金的一些同学仍鲜活地记得金充满激情又极具条理的演讲是如何让大家震惊的——尤其是他那句宣言“恣意妄为定会受罚，此乃世上不可违的道德法则，就如同世上不可违的自然法则”。

那年春天，金到宾夕法尼亚州克劳泽神学院的就读申请成功通过了。他首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然后告诉姐姐，再告诉弟弟，最后才告诉父亲自己要到那儿去读书。金牧师对此嗤之以鼻，接连好几天都持反对意见。他觉得儿子并没有深入学习的必要，也不想让儿子离开自己，或者说他不想失去自己的助理牧

师。克劳泽神学院是一所白人神学院，以研究神学自由主义学说而著称，金牧师对此非常怀疑。然而最后，一如既往地，金牧师不仅同意了儿子去克劳泽神学院，还同意为儿子支付相关费用。父子二人都不知道克劳泽神学院会给金年轻的生命带来怎样的巨大影响，不过两人之中，至少有一个急切地想去探寻一番。

1948年6月，克里斯汀·金和她弟弟先后在姊妹教堂参加了毕业庆典。那年姐姐20岁，弟弟19岁。整整一夏天，金都在布道，为离家做准备。让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沃尔特·麦考尔，将和自己一起到克劳泽神学院求学。他们会一起把“马克和迈克秀”带到广袤的北部，跟他们见过最聪明的白人一较高低。

第三章 尼布尔和桌球

夏末时节，金到了宾夕法尼亚的切斯特，那是费城外的一个工业小镇，也是克劳泽神学院的所在之处。1948年可以说是多事之秋——柏林封锁、轰动一时的对阿尔杰·西斯的首次指控以及杜鲁门与托马斯·杜威竞争时颠覆性的胜利都发生在这一年。然而，对金和同学们来说，在克劳泽神学院的最初几天才是最令人难忘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希望浸润在谦恭进步的宗教气氛中，得到结合了当代知识的信仰。同学们关于自由主义的看法多少与一个白人学生的一致。那个白人学生带了一书包的研究来，希望能证明自己的理论——从生理角度看，约拿可以像《圣经》中说的那样，在一只鲸鱼的肚子里活三天三夜。

但学生们接触到的是非传统的自由思想，远比那个紧绷的时代年轻人的叛逆更极端。这一点从光着身子在家外面玩耍的小孩身上就能看出来，他们的父亲就是享誉世界的《新约》学者M. 斯科特·恩斯林。很快，学生中就流传起恩斯林从不庆祝圣诞节或复活节的事，他认为从历史角度看，那些都是对宗教灵魂的曲解。有些学生尽力在克劳泽教堂克制自己的惊讶，因为教堂前面桌子上的金色大十字架在其他浸信会教堂会因不许盲目崇拜而被禁止摆放。尽管有些学生不承认，但几乎所有学生都被教堂正下方的东西震惊了——娱乐室里面有3个台球桌，还有一个沙狐球球台。和众多学生一样，金认为自己很现代，支持跳舞，但他经常绕开桌球房，因为打架和打桌球是低级乐趣。那时，金见到了现实中的台球厅，就在神学院教堂的下方。学生上传教课时，偶尔能听到下面打破新架子时野蛮的声音。

新生班的黑人学生选择克劳泽神学院恰恰是因为那是一所声誉颇高的白人学校。每个黑人学生都想挤进陌生的环境，盼望能成为屈指可数的黑人学生中的一位，甚至是唯一的那个。然而，事实带给他们的震惊不亚于那些桌球台——32位学生的班级里，有10位黑人学生。沃尔特·麦考尔一直在工作攒学费，当年他延迟入学后，黑人学生人数达到了班级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整个班除了他们，还有3个中国人，几个印度人，一个克己却很受欢迎的日本人，一个巴拿马黑人以及其他几个外国人。这些人与白人学生共享教室、宿舍及咖啡店，以至于从密西西比来的一位白人学生为了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餐前祷告时甚至念叨着“哦，无上的佛祖、耶和华、基督、琐罗亚斯德……”还提到了异教的神。神学院教派的复杂程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便是下一时代的黑人革命也未能做到。

克劳泽神学院的管理部门致力于向学生灌输平等主义。他们去掉了宿舍门上的锁，黑人学生甚至觉得克劳泽神学院的哲学不仅没有种族隔离，甚至也没有种族安全。无论昼夜，学生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出入别人的宿舍。这一安排影响了人身安全的观念，甚至改变了私有财产的概念，所有事都只能依靠相互信任。为了打扫学生的房间，克劳泽雇用了一些有礼貌、效率高的女仆，她们和教职员工一样都是白人。

克劳泽神学院的校长埃德温·奥布里几年前在芝加哥大学教本杰明·梅斯，学年伊始，他把新生们集中到教堂，直白地说他们是人数最多的班级，也是他知道的神学院里水平最差的班级。他说自己迫于压力不得不扩招，但绝不会放松教育质量。奥布里预言一些学生很快会退学。他是对的——1951年毕业时，刚入学的学生中一小半顺利毕业，包括11位黑人中的6位，但奥布里没说他自己准备辞职。

如克劳泽神学院一样，在神学方面，奥布里也不符合时代潮流，他是经典自由主义在日渐保守地带的壁垒。宗教自由在25年前斯科普斯和福斯迪克案后控

制了国家高等院校，容不下学术的优越及其吸引力。宗教思想越来越隐晦，也越来越世俗，再也无法控制强烈的公共利益，而正是强烈的公共利益将福斯迪克推上了《泰晤士报》的封面。同时，宗教保守人士建立了自己的神学院，在困惑复杂的时代中，将非常流行的号召优化为更简单的信息。金在克劳泽神学院的学习生涯将见证比利·格兰汉姆和诺曼·文森特·皮尔的重要崛起。在反对这些趋势上，克劳泽神学院未能为学生争取到胜利。

奥布里是英格兰人，开始想将克劳泽神学院塑造为精英学者的小学校，之后面临关闭危险时，奥布里才试图将神学院的自由形象作为救命稻草，在1948年进行扩招，可黑人学生和南方白人学生的人数超出了预料。这一试验让奥布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很多克劳泽神学院的理事已经认为自由形象正是招生困难的原因之一。奥布里当年就会请辞，由看守校长接任。看守校长步履缓慢，少言寡语，学生们都说他是“伪君子”。金在克劳泽神学院的第三年和第四年，校长是来自维克森林大学的桑基·布兰顿，他是努力布道的温和派，通过筹款及软化学校形象，让克劳泽神学院又多存在了20年。现在回忆起来，金在克劳泽神学院的班级可以说是神学史上独立空间中绝望的种族赌博。但对学生们来说，美国理想主义也达到了高峰，大家都信誓旦旦地谈论着征服贫穷和疾病，结束殖民主义并在自由帝国内建立国际兄弟关系。

在克劳泽神学院的第一年，金所学时间最长的两门学科分别是M.斯科特·恩斯林教的《新约》以及詹姆斯·B.普里查德教的《旧约》。两位教授都是功成名就的语言学家，用最初的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手稿整理《圣经》中的历史谜团。恩斯林指出了很多描写耶稣时矛盾的句子——比如《马可福音》中“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就和《马太福音》中的“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这些句子总是基于《圣经》作者不同的目的和历史环境带来更大的教训。恩斯林受传统的阿尔伯特·施韦泽的影响，是激进的《圣经》批评家，只要他认为《圣经》中的说法从历史角度看是想象的，就会毫不犹豫地争论

一番——例如，他曾声称耶稣和施洗者约翰从未谋面。普里查德教的是古犹太教，也是一门同样严肃的课程。当时，他的《古代近东文本》正要收尾，那是一本鸿篇巨制，日后将会成为标准参考书。普里查德十分了解古近东文化的建筑和历史，他告诉学生，埃及的当代文学从未提及摩西以及犹太人的大规模离开——波斯人、希泰人、苏美尔人，甚至是埃及人自己都没提过。由此，普里查德认为摩西是未经证实的历史人物，很可能是传说中的人物，而走出埃及本身可能是比《圣经》中描述的更小但更具代表性的事，他还将自己的观点告诉了这一领域中四五位著名的西方学者。

克劳泽神学院中通过了上述两个科目的学生都把这两门课当作笑柄，普里查德在第一学期毁掉了摩西在《圣经》中的形象，而第二学期，恩斯林则毁灭了耶稣。金不仅通过了这两门课，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在普里查德的课上，金得了B，这个成绩可算名列前茅，因为只有两名学生得了A（其他4位和金一起毕业的黑人学生都得了D）。出乎普里查德意料的是，金这样的南方浸信会教友竟能如此迅速地适应克劳泽。其实，金不仅在学术上大放异彩，而且颇受教授过门学科的教授青睐，很快就成了普里查德女儿们的保姆，穿得西装革履，手里还拿着一大摞书。

沃尔特·麦考尔冬季学期回来时，发现自己的朋友完全变了个人。多年前莫尔豪斯那个成绩平平的学生，现在完全沉浸于功课中，而且成绩非常好，简直可以成为毕业演说的人选。这一突然变化很可能是金一生中最明显的性格变化，一部分是出于他想要在白人文化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强烈愿望。第一次与白人学生竞争时，金非常想证明自己不仅能成功，而且可以非常优秀，就算很多白人已经接受了良好的大学教育。这种渴望和金非常强烈的种族责任感让他深陷身份矛盾的泥沼，杜波依斯40多年前说过的一句描写黑人学者的话非常适合金的状况：“他经常感到自己的两面性，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他有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相悖的努力……”对金来说，这意味着要想高贵地代表自己的种族，就不得不按

照自己对白人的看法表现，而不是像白人眼中的黑人那样。金极力想摆脱白人对黑人的成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很吵，总是大笑，不爱干净，整个人一团糟”。在克劳泽神学院，他对迟到有一种“病态的自觉”。金的穿着无可挑剔，在课堂上也是“严肃得可怕”。简而言之，他自己的两面性就体现在他一副专注学者的形象上。

这些事并不足以让金在黑人学生中出类拔萃，其实，是对更深层次东西的热情造就了他突然的卓越。和很多同学不同的是，金很欣赏普里查德和恩斯林那种严谨的怀疑态度。克劳泽的神学训练方法就是打碎学生的宗教信仰系统之后，重新建立尽可能理性的宗教知识体系，让“信仰的飞跃”成为敬畏最不重要的因素。克劳泽神学院努力想成为德海军新兵训练营一样的地方，不过相当不确定成品会出落成什么样。在这一艰难的过程中，领先的感觉让金非常享受。在金的血统和他父亲的权威起共同作用前，他就已经凭实力打开了走向宗教怀疑主义的道路，他发现克劳泽神学院在宗教思想方面的自由一点都不亚于其在种族混合班级、不上锁的宿舍以及白人女仆上的自由。在离家 600 英里的地方，金必须自食其力，他知道自己用一种无法定义的方式沉浸在宗教、道德和历史思想中，任何特权都无法收买。他突然就着迷了，矢志不渝。他房间里很快就堆满了书籍，他有时甚至会通宵阅读。

金在克劳泽神学院第一年学习到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里，有一位是华特·饶申布士。他原是信奉德国路德教的，后来改信了浸信会，他 19 世纪末在纽约盗匪出没之地当牧师的经历让他完成了《基督信仰以及社会危机》，此书的发表被公认为美国教会社会福音运动的开始。（这本书是金日后经常特别引用的书，对他的宗教信仰有很大影响。）一般来说，宗教强调虔诚、形而上学和超自然的事，而饶申布士却否定这些，将基督信仰解释为彰显于社会道德中的兄弟精神。他把基督事工（为了神的工作而甘心忙碌的基督徒）看作《旧约》先知的延伸，那些先知谴责骄傲、自私及反抗，说这些都是对神圣的历史计划的侵犯，而神圣的历

史计划将基督教让所有人能在“爱之圆满”的理想中达到极致。饶申布士乐观地称牧师的工作“就是将神职人员的教导应用于公共道德中紧迫的问题上”。

乔治·W.戴维斯教授的父亲是匹兹堡炼钢厂工会的积极分子，他将金引荐给了饶申布士。戴维斯教授是克劳泽神学院唯一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也是最崇拜甘地的人。金在神学院读到的《甘地：印度棕色皮肤的奇人》正是戴维斯的私人藏书，金对书中的思想及甘地明显的种族特征大为赞赏。在克劳泽神学院，金从未接受和平主义，实际上，他还因为A.J.马斯特认为原子弹变革了战争与和平的重要道德问题而写文章进行了抨击，但金却把戴维斯当成良师益友，他在克劳泽神学院所修课程的三分之一都是戴维斯教的。二人志同道合，戴维斯是践行饶申布士社会福音的典范，而用金的话说，他在克劳泽神学院“接受自由传统很容易”。此外，金还喜欢戴维斯的平易近人。

在克劳泽神学院，并非所有的教授都将自己现代的《圣经》批判实践于政治自由中。在这一点上，恩斯林做得最为明显，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饶申布士及整个社会福音运动的蔑视。饶申布士认为宗教之本是山上训诫，但对恩斯林和阿尔伯特·史怀哲来说，那不过是耶稣期望的却从未成型的神圣秩序建立前的“道德要求”。于是，至于山上训诫对谦逊的赞扬，恩斯林便不予理会，更是对世俗的羁绊进行了尖锐的指责。恩斯林说这些训诫与世间常事并无关联，而社会福音关注的是重要的政治争论，这远非宗教对最高实在之本质的适当关注。恩斯林的批判明智辛辣，很好地掩饰了自己怪异的行为和个人信仰。他这样一个人每周竟至少要参与三次浸信会教堂礼拜，为什么这样做只有他自己明白，他的学生们都迷惑不解，因为在学校，浸信会教堂礼拜上的陈词滥调是他决不能容忍的。教职员工们都认为恩斯林是托利党的代表人物，而学生们则多少把他当作偏执的人。恩斯林推荐金作为毕业演说致辞人的信中，表达了对南方来的黑人能在克劳泽神学院表现如此出众的惊讶。

在社会信仰方面，克劳泽神学院学生们的分歧比教授们的更大。1948年的

种族试验让一些新来的白人学生很失望，而很多黑人学生却颇为满意。暗自涌动的紧张感让学生们无法在餐厅安心就餐，而由于宿舍没有锁，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麻烦，有时还会演变成敌意。宽容是学院的特别反应，种族和谐则是学院推荐的良方。金谨遵克劳泽神学院的态度，认为对爱与理智的信仰能带来超越种族仇恨与个人恩怨的最基本的善良。在这一点上，只有一位黑人同学不赞同他。这位同学就是约瑟夫·柯克兰，他是同学中唯一的北方人，也是除了金之外唯一一位牧师家的孩子。柯克兰熟悉世间百态，也很坚强，反抗自己的那位独裁者，也就是他聪慧过人的父亲。他父亲拥有3个博士学位，早年就成了费城最大的黑人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后来成了彩票赌博的兜揽人，还在黑人贫民窟私卖威士忌。柯克兰的父亲认为社会福音运动就是让克劳泽神学院的教授们酗酒，走进脱衣舞俱乐部，直接暴露在自己平常只能从远处观察的公众之中。柯克兰认为社会福音运动者们对每个种族中社会鸿沟的认识非常天真。北方种族一体化非常普遍，柯克兰便时常取笑对此大惊小怪的南方人——提醒他们这种政策从未离开校园一步，也没影响到切斯特。他尤其取笑金的转变。在克劳泽神学院，能不必打工赚学费的学生本就不多，金是唯一一个可以这样做的黑人学生。柯克兰嘲笑金的“工作就是弄支票”，而他自己则因拒绝父亲的资助而颇感骄傲。金第一次到柯克兰的宿舍时，拒绝了冰啤酒，说啤酒是“黑人的负担”，柯克兰只回了一句：“那又如何？”

金的演讲之才在克劳泽神学院向来突出。同学们都十分钦佩他的传道技巧，在金每周四进行学生布道时，同学们都会挤满教堂，而那些乱出主意的人看到金进了礼堂，也会跟着走进布道班。多年之后，有些白人学生只依稀记得金，但金布道时的词句、主题和效果倒记得一清二楚。比如有些人就记得在一次教堂布道时，金说过“他们有热情，但没有知识”。金将演讲者的细节做得非常完美，比如在讲台上藏起笔记很难让人察觉，他演讲的风格也相当正式。金说自己的演讲是“宗教性报告”而不是布道，实际上，正是金内心知识与热情之间的斗争——

以及种族、阶级和神学的基础，产生了足够的能量，让他的布道令人关注。在克劳泽，布道课让金得到了很多好成绩，也让他收获了很高的威望。在神学院的3年里，金至少有9门课是与布道演讲有关的课程。

布道方法这门课的教授是罗伯特·凯顿，他讲课的时候全神贯注，用古典形式进行论证，这非常适合金。作为“高等”浸信会教徒，凯顿被学校“低等”或“踩踏恶魔的”浸信会教徒指责说本质上是圣公会教徒，所以凯顿偏好低调、冷幽默、结构严谨的陈述以及诗人和剧作家例证的自由挥洒。他组织了克劳泽神学院的戏剧俱乐部，也一直做指导。凯顿在课堂上说自己有多了解《圣经》，就有多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学生中也流传着英国莎士比亚博物馆曾想让他当馆长的说法。现代诗人中，凯顿欣赏W.H. 奥登和T.S. 艾略特，但为了布道者对浪漫的渴望退一步，他为金介绍了一些自己会在公共事业中一直引用的英文诗人，其中包括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以及威廉·卡伦·布莱恩特。也许不那么幸运的是，凯顿还介绍了圣奥古斯丁的修辞，圣奥古斯丁喜欢用截然不同的陈词滥调组成生动的对句（“肉体欲望的尘土玷污了清明的友谊之春，情欲黑暗的地狱模糊了友谊的光明”），尤其是说到罪恶时。和圣奥古斯丁一样，凯顿强调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说服公众，最具天赋的演讲者回答了最难的问题就可以了。金渐渐接受了演讲的“三词箴言”：证明、描绘、说服，为的是赢得头脑、想象和心灵。

讲到布道技巧，凯顿说布道者首先应该在已有的布道结构基础上准备提纲。已有的布道结构包括梯形布道、亮点布道、事例布道、双向布道及倒序布道等。梯形布道通过一步一步增强辩论效果达到布道者想要的结论；亮点布道是从多个角度证明一个观点，就像珠宝师从各个角度观察珍贵宝石的样子；事例布道通常从扣人心弦的生活故事开始，达到相当高度的灵魂训诫后，再讲述多个衍生出的小教训，重新引回教众的生活之中。凯顿解释了这些布道结构后就直接让学生尝试，有些学生就是因为在凯顿布道方法这门课上怯场而离开了克劳泽神学院。金在现实和压力下成长起来。凯顿的布道方法用其终生所学的艺术形式给金童年时

想用的愿望加上了规则和风格。

布道班是神学院的实验室，也是校园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因为比之咖啡时间或其他社会习俗，公共演讲更能显露每位学生的个性，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友谊。将凯顿老练而正式的结构与自己琢磨的布道方法进行对比时，黑人学生得到了很多乐趣。他们开玩笑说，凯顿有梯形布道法，他们有“灌木丛兔子法”，意思是看到众人有所触动时，要重复主题，就像猎人看到有动静的灌木丛，就会假设里面有兔子而开枪；凯顿有分类布道法，他们有“手掌三点法”。金和沃尔特·麦考尔最喜欢偷听自己的黑人同学在校外真正的教堂里布道，两人都擅长模仿。为了羞辱同学，麦考尔会对自己听到的内容进行粗俗拙劣的模仿，大声喊出来，充满了对耶稣和圣灵化身的情感火花，之后金会用同样夸张的方式讲述恩斯林理性历史主义的“正确”版本，说耶稣是很有天赋的犹太先知，不过个人问题缠身。

贺拉斯·惠特克是来自南方的黑人，被公认为班上仅次于金的布道者，他和金还有麦考尔一起，在受人尊敬的J.派厄斯·巴伯尔家度过了很多夜晚。巴伯尔是当地牧师，是第一位到克劳泽神学院任教的莫尔豪斯毕业生。巴伯尔十分健谈，是小有名望的业余哲学家。1948年，克劳泽黑人学生成了他的固定听众，让他可以用最喜欢的方式度过闲暇时光——享用完巴伯尔夫人烹调的豪华晚餐，他就会开始讲述苏格拉底对话法。巴伯尔吹嘘自己是“浸信会教堂最深处的神学家”，有时，巴伯尔会突然提到些废话，有时也会突然旁征博引，警告说不许天主教牧师踏进他家门一步，但他从不会让人觉得无聊。对巴伯尔来说，看到学生们基本上对所有事的最新想法都感到不舒服是种乐趣。他后来写给金的信里说：“田立克简直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存在本身’……康德已经证明过了。”巴伯尔喜欢脑力的角逐，把这当作履行了教堂略为乏味的职责后的放松。学生们把巴伯尔过分的热情变成了社交之地，带着约会对象前来享用美食，在年轻女士面前炫耀自己的才学，这些女士要么是深为震撼，要么是很有耐心，才能听得下去。

第一年里，金的一位约会对象是亚特兰大的胡安妮塔·塞勒斯，金高中时就认识她。塞勒斯迷人稳重，也很聪明，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克里斯汀·金以及其他几位来自斯佩尔曼的朋友准备毕业作品。塞勒斯在亚特兰大黑人精英阶层聚集的新西区长大，父亲是亚特兰大最杰出的丧仪承办人，这就是塞勒斯的社会地位。那时人们对“攀高结贵”很不满，德尔塔妇女会想吸收她们为会员，可她们却轻描淡写地回复说妇女会的动机行不通，因为她们不可攀附。这种态度，再加上塞勒斯其他的品行，让她成为金父亲中意的儿媳之选。亚特兰大有些庆祝活动，于是金就在纽约拜访了塞勒斯几次，还邀请她到克劳泽度周末。塞勒斯和克里斯汀·金一起到了神学院，跟金还有金的朋友们在 J. 派厄斯·巴伯尔家待了不止一晚。

入读克劳泽神学院后的第一个暑假，金可以算作埃比尼泽的全职牧师，他和塞勒斯见面次数太多了，传言便说他们坚固的友谊正转变为恋情。一天下午，正在林荫大道的家中招待塞勒斯的金突然说自己想让她见个人。金立刻就催塞勒斯梳妆，要打扮到最好看。没再多解释，金就带着塞勒斯到埃比尼泽附近的自由浸信会教堂。金按响了教堂办公室的门铃，被请进去和一位牧师喝茶。尽管要遵守教会礼仪也很正式，但整个会面让人愉快。之后，金感谢了塞勒斯的体贴有礼，就没再提过这次拜访了。这件事让塞勒斯迷惑了几天，后来才从克里斯汀·金那里得知那是牧师间的交往。金之前的女朋友一直是“东区人”，是自由教堂的成员。带塞勒斯去拜访前女友的牧师，是表明他已经变心了，也含蓄地给了牧师拒绝的理由。此外，那也是出于对自由浸信会教堂牧师的尊重，这样，如果金之前的女朋友问自己的宗教顾问金成了什么样子，他也有话可说，而金的前女友很有可能问。这些以及千百种其他暗示组成了布道者的规则，金可以说深谙此道。

金的父亲看到儿子完全掌握了政治和社交礼仪非常骄傲，而金沉浸于克劳泽神学院的道德标准中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年，金受到社会福音运动的感染，竟敢喝啤酒、吸烟，还每每在父亲到克劳泽神学院时当着父亲的面打桌球。

金很过分，他带父亲走进教堂下的桌球室，邀请父亲一起，还表现得如同打桌球是很正常的事，骄傲地展示着自己辛苦练就的桌球技术。金知道父亲会强烈反对，而父亲确实这样做了，但金非常相信自由基督教义的说服能力，“……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马太福音》第15章11节所说）。金对父亲说这不是烟雾缭绕、充满罪恶的桌球室，只不过会有些打家劫舍的计划，金的父亲并不认可，因为那是罪恶司空见惯的借口。用父子间即将成为常态的谈话方式，金轻轻地嘲笑着父亲老派守旧，而父亲则指出自己在世界上的成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意志的战争陷入了僵局，反叛的潜力在约尔·金身上也可见一斑。约尔·金和金的父亲一起到克劳泽神学院看望了侄子几次，每次都问为什么金的父亲能容忍儿子吸烟、打桌球而不让别人这么做，就算是和金的父亲差不多大的自己都不可以。金的父亲对这类问题怒火中烧，而约尔也知道永远不会得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最后，一路长途开车从克劳泽回亚特兰大后，约尔决定亲自尝试一下侄子的大胆。和金的父亲一起走向林荫大道的房子时，约尔点了一支烟，金的父亲一言不发地背着手走上了前门的台阶。接着，就在约尔认为危机已经过去的时候，金的父亲忽然转身，把烟按在约尔的手背上熄灭，火星飞溅到约尔的头发表上，还落在他的西装上，约尔·金永远不明白金如何敢冒犯父亲却不受罚。

父子间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在1949年的圣诞假期又爆发了。当时金决定一边在埃比尼泽布道，一边在家学习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当时，共产主义是大众的兴趣所在，阿尔杰·西斯伪证案在纽约二审，而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金读了《共产党宣言》及对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解读后，才开始计划反对共产主义，可正是共产主义让他余生不懈奋斗。金因为其“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伦理相对主义”而拒绝接受共产主义，这分别是指马克思认为的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以及列宁认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金拒绝这些科学的信条。

在金的父亲看来，金华丽的辞藻不过是对陌生定义的诡辩。金的父亲声称，优秀的布道师不必阅读大量的书籍就知道共产主义与基督教背道而驰，严厉谴责把共产主义宣传物带进家门的行为。这是一个痛点。对金来说，更艰难的是，他大部分忠诚而智慧的导师不断要求他往反方向走。马尔文·沃森是莫尔豪斯宗教学院的主席，是黑人学者中的一员，很多黑人学者都是坚定的浸信会布道者，而沃森则悄悄收集了共产主义信条的书籍，因为苏维埃在种族问题及被压迫人民的问题上有清晰明确的承诺。沃森多次寄给金成熟而和蔼的批评，都是以“亲爱的下一个小教授！”亲切问候开始。他让金不要因埃比尼泽对其演讲辩证逻辑的反应而泄气。“有些人是睡着了，”沃森说，“但无论讲什么，他们都会睡着。”

金在克劳泽神学院的最后一年，他父亲用全新的方式送他到学校。金的父亲不再是从桌球台旁愤然走开的严厉人物，也没有尽快离开，而是穿上最精神的三件套，金表的链子从背心口袋中垂下来，还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到来——他与别人热切握手，赞美教授的学识和学生的虔诚，告诉所有人金明年拿到神学学士后会到埃比尼泽跟自己永久就职。金这位神学院的学生暗自忍下了这场表演，后来才告诉朋友们自己的父亲有些夸张了。金并不打算学年结束后到埃比尼泽，他不想去任何一间教堂。当年初秋时，金给埃比尼泽写了一封公开信，感谢“缺少牧师时”各位成员的支持，还强调自己的父亲仍管理着教堂。金还跟自己的顾问也就是他最喜欢的社会福音教授乔治·W·戴维斯坐下来探讨了他可能获得宗教哲学博士学位的一流学院。金的首选是耶鲁大学——戴维斯就是那里毕业的。11月，金已经向耶鲁大学、波士顿大学以及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神学院递交了申请。尽管金在克劳泽神学院成绩出众，耶鲁大学还是没录取他，但另外两所学校在圣诞节前就决定录取他了。这样，金不仅要做出决定，还要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与母亲讨论要怎么告诉父亲。

金在克劳泽神学院的最后一年第一次阅读了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作品后，就决定要继续学业。他的经历没有改变预定计划，可看上去却几乎改变了其他所

有事，包括他对宗教最根本的看法。读尼布尔的作品前，金是出于好玩、懒惰和声望而想攻读博士学位。克劳泽神学院各个方面都出乎金的意料，他也乐在其中。金想继续学习，而知道自己的未来会不可避免地与其父亲的计划不符时，他还没最后下定决心。金想成为博士是因为这将让他有更考究的同伴（被高贵的名号吸引，金和朋友们通信时都会在自己的名字后开玩笑似的加上一长串高等学位名称，就像英国经院学者们那样），读过尼布尔的书之后，比起继承来的思想，金第一次对自己的选择失去了信心。社会福音运动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光环，他从未对某种思想学派如此着迷，就算对尼布尔的也没有，尽管尼布尔影响了金的内外，也是包括甘地在内影响金最深的现代人物，但他与尼布尔之间的联系因时间、种族和公共形象的复杂纠缠而十分隐晦。

1932年，金3岁，而就是在那一年尼布尔出版了标志着美国神学古典自由主义开始终结的《道德人与不道德社会》。1928年，尼布尔到纽约协和神学院执教，他毕业于耶鲁神学院，之前在底特律当了13年牧师，他名望颇高，是“一战”后亨利·福特汽车工人和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黑人移民的支持者。尼布尔还是享誉世界的和平主义者，曾在唯爱社当过好几任主席。因此，《道德人与不道德社会》让几乎所有对宗教感兴趣的非原教旨主义者都背叛了，社会福音运动认为理智与善意在现代社会的稳步前进中能根除社会的邪恶，而尼布尔则攻击了这个假设。尼布尔的主要目标是最后一个有很多人追随的哲学家——美国的约翰·杜威。尼布尔嘲讽杜威所说的无知是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提出那是“我们掠夺性的个人兴趣”。尼布尔说，并没有证据表明受到更好的教育后，人类会变得无私，或者掠夺性会减弱，战争、残酷和不公平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生而有罪。

尼布尔谴责自由世界正“努力逃避基督教对罪恶的训诫”。学者们单单听到这句话就畏缩了，而现代神学家们则十分震惊，他们的一位偶像揭露了先进历史的中心思想。像尼布尔一样承认邪恶是人类本性中的永久部分，就是用上帝怎样

容忍这种痛苦、为什么容忍这种痛苦这两个问题迷惑神学家，也是对历史意义流行的理智观点提出质疑。这样的想法让基督教回到了如圣奥古斯丁或马丁·路德一样强硬的现实主义者手里，圣奥古斯丁认为每个人都不得不“不顾自己，钟爱上帝”，马丁·路德则认为人类是急需恩典的怯懦的罪人。

尼布尔并没有这么过分，尽管后来他确实给予了圣奥古斯丁过时的尊重，说他是“看透了并非思想支配自我，而是自我支配思想”的人。尼布尔自己找到了人在社会大群体中的个性和与其相反的个体性格之间的差别。人类本性可以对理智、公平的号召，甚至是宗教精神的爱的圆满做出回应，但国家、企业、工会及其他大型社会团体总是自私的。尼布尔辩称，社会只会对权力做出反应，也就是说虔诚、教育、慈善、改革以及福音传道永远不必奢望不卷入权力斗争而根除不正义的现象。例如，尼布尔曾嘲笑道德说教可能给底特律及其他地方的美国黑人带来基本政治经济权利的说法。“无论多少白人……想要完全投身于黑人的事业，但除非强迫，美国白人就会永远不会承认黑人拥有平等的权利。这一点通过历史证实的教条主义就说明了”。

《道德人与不道德社会》在学术界产生了轰动，尼布尔成了打破传统的领军人物。如《基督教世纪》主编的主流自由主义者们在尼布尔作品中残留的马克思主义而备感困扰，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们则因他批评斯大林而对他怀恨在心。一位共产主义评论员谴责尼布尔在自己的政治分析上涂抹“基督教酱汁”后，断定他“还不如恶棍”。惊恐的社会福音运动评论者们暗示尼布尔对罪恶的强调说明他背叛了进步，甚至不配当原教旨主义者。同样的强调也让尼布尔受到宗教保守主义者的喜爱，但他们不能赞扬尼布尔，因为尼布尔总是质疑《圣经》字面的真理，还批评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太过保守。

1950年秋天，金读到《道德人与不道德社会》时，尼布尔再次转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公众人物。1932—1950年这18年间，希特勒将尼布尔不道德社会和永恒的罪恶从神学家语义上的发明变成了世界上最受争议的主题。尼布尔独自

出力帮助学者逃出德国，把保罗·田立克带到纽约协和神学院和自己一起教书，而且，“二战”期间还创立了《基督教与危机报》，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和平主义者的影响，而他自己曾经就是和平主义者的领导。“二战”期间，他和埃莉诺·罗斯福、休伯特·汉弗莱以及其他著名的自由政治家一起成立了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这一组织的目的是在自由主义者中间扩大反共产主义的影响，正是这一主题将约翰·肯尼迪送进了白宫。冷战期间还有反抗纳粹的战争期间，尼布尔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名声的影响。

金从《道德人与不道德社会》中接触到了早期的尼布尔——那时的尼布尔还是伟大的神学家，和金一样有内在的动力。尼布尔在1932年震动了宗教界，而1950年的金宣称世界上有邪恶。尼布尔说，两种教义都希望看到温顺的人得到支持，但精神力量太胆怯也太纯洁，不足以对抗严酷的邪恶世界。对尼布尔来说，他们共同展现了时代压倒一切的悲剧——即“现代人类失去了道德力量里的信心”。尼布尔说的“道德”是指调解正义不科学的领域，这结合了爱和政治、唯心论和实在论。道德是宗教与政治的妥协，是不道德社会特质的需要。

关于道德的讨论在很多方面点醒了金，道德是牧师的传统退路。对宗教有疑惑时，无论是金已经经历过的还是以后要经常经历的，牧师不能谈论救赎，却总能谈论十诫和山上训诫。如果种族正义不是上帝的事业，但至少是道德的事业。听到宗教保守主义者说社会福音运动太过世俗，不算虔诚，金并没有太困扰，但听到尼布尔说社会福音运动因为没有涉及世间的邪恶所以不算道德事业则是另外一回事。之前，金和克劳泽神学院的黑人朋友们一直为了拿学位顺其自然，认为如果自己和学校的白人表现得一样好，传播社会福音，尽可能帮助更多的黑人全面发展，同时鼓励先进的白人进行种族启蒙，那么无论自己受到的宗教谴责是否平复，都是为社会做贡献。然而，如果尼布尔是正确的，任何社会福音传教士就都是骗子，而其中的黑人就是灵魂受益者，享受黑人神职人员的巨大奖励的同时，还在传播希望的谬论。这样的预期深深困扰着金，和克劳泽神学院的其他黑

人学生相比，金对自己的特权深感愧疚。父亲对成功的不懈追求让金难堪，他总是对金钱极为敏感。尼布尔书中让人惊诧的暗示是父亲强调信仰中的罪恶和诚实是正确的，牧师应该和别人一样努力获得成功。由此可见，社会福音运动只会让金变成伪君子。

尼布尔反对自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起就逐渐发展的政治和宗教理想主义。列夫·托尔斯泰非常关注与山上训诫中相似的5个字：“勿与恶者敌”。“为什么我总在寻找别有用心者？”托尔斯泰问。“‘勿与恶者敌’意味着不要与任何人为敌，不要反抗暴力，换言之，就是不要违背爱的律法。”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晚年，这位伟大的俄国小说家成了现代和平主义的智慧之父。他的书《天国在你们心中》对当时还在英国读书的年轻人莫汉达斯·甘地有重要影响。托尔斯泰暮年时，甘地与他通信，还将自己在南非成立的第一个公社命名为托尔斯泰农场。

在自己的书中，尼布尔抨击了和平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甘地发明了一种方法，能让宗教信仰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同时免受世俗的污染。尼布尔认为，甘地在开始反抗南非有色人种的法律时就摒弃了托尔斯泰，甘地领导的罢工、游行、抵制以及示威都是高压的形式，这些尽管都是非暴力的，但与“勿与恶者敌”直截了当的意义背道而驰。尼布尔认可甘地做的事，但并非意味深长地解读将甘地的追随者们置于普通人的伦理冲突之上。在尼布尔看来，这种信仰毫无根据，是危险的自我正义。

尼布尔直白地说，尽管甘地的方法有政治性，也给世界的进步带来了一线希望，但那只是“一种高压手段，为社会生活中道德和理性因素和谐的关系带来了巨大希望……这意味着非暴力运动对被压迫群体来说是非常有策略性的方法，因为被压迫的人属于绝望的弱势群体，没有发展强大力量而反抗压迫者的可能”。尼布尔放大了这束希望之光，认为这可能适用于美国黑人的事业。如果甘地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美国的条件，进行艰难而漫长的运动，那可能会朝着获得正义的方向取得进展，甚至能反抗不道德社会自私的力量。对黑人非暴力运动如

何进行提出了几点建议之后，尼布尔总结说：“宗教想象绝对可以为政治生活做出更大贡献。”

如尼布尔一样，金允许自己的宗教和政治思想沿着同样的道德路线前进。至于存在以及上帝的本质看上去已经融入了更简单且更具存在问题：宇宙是否友好？尽管尼布尔明确区分了爱、完美、上帝与公平、现实、人类的区别，但他还是试验了自己“道德人与不道德社会”的理论，将其置于一个统一体中。金后来在学生论文中改述了他的话，说：“正义与爱永不可分割。正义是爱的负面应用……正义是一种检验（如果必要，则使用暴力），检验个人寻求克服自身不安全感而牺牲别人安全感这一抱负。正义是给集体心理以爱的信息。”

对金来说，尼布尔书中非常吸引他的另一点是其张力。尼布尔将福音派自由主义者对山上训诫的热情与怀疑论者对人类本质固执的坚持结合起来。尽管在这些问题上，尼布尔任由自己发挥，比之大多数虔诚的自由主义者，他在甘地身上看到了更大的前景，此外他还将甘地的方法打磨成宗教与政治防御性最强的组合。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张力对金很有吸引力，他自己的小世界就是由各种对立面组合而成的——平静与野心、知识与热情、教堂和国家、黑人和白人。金最真诚的演讲总会用圣奥古斯丁式的冲突，让正义的万里晴空与压迫的午夜风暴对抗。含蓄地说，面对正义是进是退将影响金对宇宙是否友好的判断，进而会影响其对上帝本质的认识。尽管还是学生，但金认为宗教只在其优势方面活跃，还认为怀疑和信仰同等重要。在一份明显受黑格尔和尼布尔影响的报纸上，金写道：“如果一种状态暗示着一种否定，而一种否定也暗示着一种状态，那么信念就与怀疑并存，有神论也与无神论并存，如果一对概念中的一个被质疑，那么可能给宗教本身带来灾难性后果。”

金在晚年从没阻止别人用大量笔墨将他描述为甘地的追随者。金的默许一部分是因为公共关系，他知道在美国大众市场，追随甘地的黑人这一概念中有一种特殊的安慰。金提到过自己在一天晚上就买了6本甘地的著作，但他从未说明这

些书，也从未描述过。他私下里基本上从不提及甘地，而他对甘地主义的评论与他对非暴力的大致看法从来没什么区别。相反，金在自己每本重要作品中都引用尼布尔的话，大部分都摘自《道德人和不道德社会》。金承认自己对尼布尔“甚为迷恋”，因为尼布尔“让我困惑不已”。

“尼布尔对当代神学最大的贡献，”金写道，“就是他反驳了新教徒自由主义长篇大论的虚假乐观主义，没有陷入神学家卡尔·巴斯反理性主义，也没有陷入其他辩证神学家的半原教旨主义中。”这对金来说意义重大，但对金的读者来说并非如此。他在公开场合说得稍多，然而，私下里，金将尼布尔描述为对自己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人，还说甘地式的非暴力运动“不过是尼布尔学者权利的计谋”。金用余下的大部分大学时光研习尼布尔，因为从和平主义和种族到罪恶，尼布尔碰触了金每一个温柔的地方。

1950年11月25日，金参加美国教堂历史（他需要探讨1500—1760年福音主义运动在美籍印第安人中对基督教义的传播）这门课的期末考试3天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人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出发，把共产主义当作全球性的敌人。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显然是因一封和平请愿书大感愤慨，便指使美国司法部对W.E.B. 杜波依斯进行刑事控告，理由是他作为未登记的苏联代理人在美国发行请愿书。《纽约时报》将杜波依斯含糊地定义为“因与黑人运动有关系而广为人知的作者”，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及《危机》杂志的创始人，也就是82岁的杜波依斯被戴上了手铐受审，面临不确定的刑期。哈利·贝拉方提当时只有24岁，是纽约默默无闻的演员，比金年长差不多两岁，他当时也是法院外乱糟糟的示威者中的一员。贝拉方提对杜波依斯着了迷，通过阅读“二战”时在黑人水手间传看的杜波依斯的书籍，他在政治方面觉醒了。对杜波依斯的控告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震动不安，即使后来联邦法官并未受理此案。罗伊·威尔金斯对这一事件持观望态度，他明智地指出这一指控是对黑人的侮辱，其他人则警告黑人小心“所谓的和平组织”，并赋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宪章进行针对共产党员

渗透的内部清洗。

战争、阴谋以及政治迫害并没有太影响克劳泽神学院学生生活的和平。M. 斯科特·恩斯林讲到历史的耶稣时依旧会让新生震惊，而新生也在教堂下的3张球台上恣意潇洒时装成桌球圣手。马丁·路德·金是那一年学生会的主席，作为学生领袖之一，他要帮助新生适应克劳泽神学院的氛围，因为这氛围会影响学生的信念和娱乐。马克和迈克依旧会打桌球直到凌晨3点，最近常有一位名叫史密斯的白人朋友和他们一起。肯尼斯·李·斯纳菲·史密斯是弗吉尼亚州的浸信会教徒，刚从杜克大学学成归来，成为克劳泽神学院的教职员。史密斯和麦考尔年龄差不多，比金大5岁左右。金个子不高，只有5英尺7英寸，而史密斯还没金高。史密斯曾教过尼布尔，也注意到了尼布尔对金的影响，金想要广泛阅读尼布尔的书籍，但学业并没留给他多少时间。

那一年中，金对史密斯教授固定的女朋友贝蒂逐渐有了好感，贝蒂的母亲是德国移民，在克劳泽神学院餐厅做厨师。起初，两位男性朋友——学生与老师、黑人与白人之间——刚开始的竞争仅限于善意的戏谑，完全是善意的。毕竟，史密斯刚从对社会福音精神十分狂热的杜克大学回来，那里的教义中没有妒忌。可无论如何，金开始公开追求贝蒂之后，丑陋的紧张感很快就麻木了两人在球台边的友情。金追到贝蒂后，烈火燃烧了。

金的朋友们紧张地享受着神学院的三角恋故事，可后来金却变得严肃起来。金说自己已坠入爱河，而贝蒂也爱着他。朋友们开玩笑说他们的——金的、史密斯的还有贝蒂的——神学观点和种族自由主义正经历着最无情的测试，但没人认真对待这些笑话。金没有笑，其他两个人也没有。金对自己的手足无措毫不遮掩，便四处寻求帮助。柯克兰直白地说金自己更清楚选择厨师的女儿做妻子的结果，无论那个女孩是白人还是黑人。马库斯·伍德更委婉地提醒金说在牧师界，找到接受跨种族家庭的教堂非常困难，而金之前曾多次向他提到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迎娶贝蒂，还生气地指责生活中阻止两个人做他们最想做的事的残忍而愚

蠢的力量。一天深夜，金的衣服因在校园草地上度过浪漫之夜而被弄皱后，他敲响了惠特克的窗户，想再次谈话。惠特克带他梳理了一遍现在看起来很平常的问题，于是，金最终崩溃了。金告诉惠特克，他现在能承受父亲要说的一切，但无法面对这将给母亲带来的痛苦。

金强迫自己退出，在苦涩中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金最好的朋友沃尔特·麦考尔正在经历名副其实的身体与灵魂的威胁，这很残酷，麦考尔的女朋友用私生子指控他。所有安抚的方法均告失败后，开庭已经不可避免了。窘迫的麦考尔只好痛苦而秘密地寻求克劳泽神学院的一位教授帮忙，请他为自己做证，说自己在神学院表现良好，有神职人员的品质，也非常有希望成为神职人员，所以他看上去既不可能是孩子的父亲，就算是，也不可能抛下孩子。教授帮麦考尔做了证，于是法院做出了有利于麦考尔的判决。对麦考尔和克劳泽神学院来说，案件口述时的道德影响应尽可能处理得低调精细。斯纳菲·史密斯是为数不多的知道这件事的自由主义教授，他抓住无罪判决，认为这洗清了所有人。然而，恰恰相反；在之后麦考尔写给金的信中，他证实了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那么这一纸判决就说明克劳泽神学院在神权方面的名声让法庭相信了一个谎言，也因此让麦考尔免除了对那个女人和孩子的责任。

这种道德放射现象总让宗教组织在涉及性和神职人员的问题时拥有寻求安静而私密的解决方案的强大动力。种族成为第三个因素时——在上述案件中，大家担心麦考尔的丑闻可能会为反对克劳泽神学院招收黑人学生的人提供武器——这种组合就变得异常敏感，于是谨慎和虚伪自然就占据了管理位置。从历史角度看，这种逃避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出现了400万黑白混血儿，可实际却没有一个记录在案的在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让法律或教会蒙羞的例子。

在克劳泽神学院，金艰难地做出了判断，跨种族的婚姻要付出的代价比他愿意为得到一个女人的爱或完成至爱社区的梦想而支付的高得多。金知道负责任的做法是遵循家庭在这一职业上不成文的准则：牧师必须结婚；牧师要尽早结婚；

牧师所选的妻子对自己和以后的事业都很重要；未来的伴侣必须符合一定客观条件。黑人牧师对妻子的选择有时被提高到次于国家事务的高度，由于在黑人文化中，牧师声誉更高，而且女性资源相对丰富，所以比白人牧师更有优势。在潜在的紧张感下，很多实际的考量本质上说都与政治相关。金告诉惠特克，他从克劳泽神学院毕业后第一年的年底就要结婚，尽管目前为止他还不确定新娘是谁。

1951年夏天，金的父亲对儿子想攻读博士学位的决定很不满，这种不满甚至超过3年前儿子要去克劳泽神学院时的。按照金父亲的想法，神学院的学生很可能被过度教育，但至少他们都愿意在教堂布道，可博士们都想去大学教书。这确实就是金的计划。金在写给波士顿大学的申请信上说：“有很多年我都想在大学或神学院教书，神学的教义应该像其他学科一样科学、严谨、现实。总之，学术研究是我的目标。”金的父亲已竭尽全力反对，但如往常一样，在金坚持要继续学业时，父亲总会宽容。接着，父亲的态度从屈服变成了大度，同意支付儿子继续学业的费用。父亲还送给金一辆新的绿色雪佛兰，作为在克劳泽神学院以第一名毕业的奖励。这辆雪佛兰有“自动低速设定变速器”，和金十分羡慕的贺拉斯的车一样。

金决定在波士顿大学而不是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埃德加·S. 布莱特曼在波士顿大学的出现是金做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他多年来一直是著名的人格主义神学院的榜样人物。金在克劳泽神学院的顾问乔治·W. 戴维斯和克劳泽神学院很多教授一样，都是布莱特曼的追随者。就连恩斯林也说他是宗教哲学家，十分敬重。布莱特曼学派的重点放在犹太教手稿中强烈个人化的神以及如圣奥古斯丁一样的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他们有时在描述上帝时会仅仅使用一长串人类的情感，去掉任何会引人反对的品行，还提高了无尽的力量。在布莱特曼的带领下，人格主义者们反对神学要捍卫自己。如当代其他事一样，宗教拜倒在科学的石榴裙下。神学大部分的先进学派都认识到自己在经验的奇迹以及永恒而精确的真理方面远不及科学，便按比例缩小了自己的承诺，还用科学的方法

进行了模糊的模仿以保护自己。卡尔·巴斯把上帝称为“全然他者”。田立克用自己杂乱的象征主义技术语言来定义上帝。亨利·尼尔森·威曼称上帝是“人类生命最依赖的……是构成最重要的条件的最高价值”。连尼布尔在耶鲁大学时也对听众说耶稣是“对自我这一谜团以及存在这一最终谜团的揭示”。神学曾统治所有科学以及所有人类，现在却只能望洋兴叹地耸耸肩。金分享了自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模糊化的倾向，但用同样的模糊方式，这位有疑心的传教士从来世退回到了道德上，他欢迎人格主义的教义，宗教经历中有丰富而主观的含义。

1951年，金装点了绿色的雪佛兰，准备从亚特兰大到波士顿的长途旅行。朝鲜战争还在继续，进入了僵持阶段。杜鲁门总统刚在美国全境电视广播中露面，宣布在旧金山进行日本和平条约会议。威利·梅斯刚要结束在纽约巨人队效力的第一季，电话公司正准备将直拨长途电话引进新泽西。金北上的路上，在布鲁克林稍作停留，在加德纳·泰勒的康科德浸信会教堂进行了客座布道，与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在哈勒姆区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的布道竞争，以示作为美国最大的清教徒集会的区别。以客座身份出现在泰勒的布道坛是任何教派的黑人牧师梦寐以求的事。金得到这一荣誉是在22岁，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声誉，另一方面是金的父亲与泰勒同在国家浸信会大会共事。

在布鲁克林布道后两天，听着在波士顿大学由大师埃德加·S. 布莱特曼上的第一堂课，金在笔记本的第一页潦草地书写了一番。“哈特福特·路考克说不朽的唯一证据就是‘值得留存的生命’。”对正式的布莱特曼来说，这不过是不成熟的疾风，但金很喜欢。金也喜欢布莱特曼，15门博士课程中，金准备修10门布莱特曼或他在教职员工中人格主义主要门徒L. 哈罗德·德沃尔夫的课。金几乎马上就与德沃尔夫教授建立了个人关系，教授是和善的内布拉斯加人，一直活跃在卫理公会。圣诞节前，德沃尔夫就将金将要写给自己的众多论文中的第一篇发还他了，这篇论文的题目是“J.M.E. 马克塔格特备受批评的人格主义”。德沃尔夫教授给了A，还说这篇论文“十分优秀，批评犀利，是卓越的论文”。于是，

金很快就成了德沃尔夫教授最喜欢的学生之一。

波士顿大学里没有克劳泽神学院的学院氛围，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大学的大规模喧嚣。研究生经常不知疲倦地奔忙于教室、图书馆、公寓和校外工作之间。威曼·迈克劳林是系统神学的黑人学生，在学术能力方面与金不相上下，晚上则在洛根机场做行李搬运工。迈克劳林晚上会借着壁橱的灯光学习到很晚，这样就不会打扰室友了。

无论何时走出公寓，金都会穿着定制套装，有意识地培养适合学者的习惯。他在笔记本背页不停地涂涂写写，练习华丽的签名，直到名字中“金”这个字的最后一笔可以与“马丁”的“马”字相连。和很多学生一样，金会装烟丝、吸烟，也会经常把玩着烟斗，带着高不可攀的语气讲话，也练就了哲学家洞穿一切的眼神。严格意义上说，金是个哲学家，因为金是在哲学系注册过的学生，也计划攻读宗教哲学的学位。

金再没上过布道课，因为在克劳泽神学院的学习已经让他不必在教室学习这门课了，但金还是在高级布道技巧课上表现积极，有时还包括舞台指导的技巧。“布道时，我常会使用无言的结局，”1952年，一位朋友写给金的信上说，“这样做效果很好。我图文并茂，结束时听众以为我还要继续，接着我突然说：‘我们祈祷吧。’”金开始独立设计书面布道的保留节目，他最初的几种模式是受教室里想法的启发，后来他在凯顿教过的布道结构中加入了自我的解说和心灵上的转折。从斯宾诺莎认识论理论看，知识有3个层次，可以与道德生活的3个层次相联系，金曾写过一篇题为“完整人生的3个方面”布道文，这篇布道文贯穿了他的事业。金另一篇典型的布道文是《人是什么？》，这是他在波士顿大学的第一年读完尼布尔的作品后受到启发所写的。在尼布尔的启发下，金还写了《对一个困惑问题的回答》，是关于邪恶的持续性的布道文。

金通过组织辩证团体和哲学俱乐部，和十几个波士顿大学黑人研究生一起，培养了一些社交生活。对哲学或宗教感兴趣的研究生每周有一晚在一起聚餐，一

起对上帝或知识进行考究的讨论。一名学生会读一段正式的文章，其他学生就表达自己或批评或支持的观点。金在波士顿大学的学生生涯里，哲学俱乐部一直存在，还颇受欢迎，有时白人学生也会来参加，甚至德沃尔夫教授还送来了一篇供大家讨论的文章。夜晚开始时，大家还恪守礼仪，后来大家就点了烟，说了一些抽象的术语，但参与者中的核心人物后来才会进入长谈。

“噢，我上周参加了一场隆重的葬礼，”一次晚上聚会的时候金说道，“我们安葬了吉姆。”

“哪个吉姆？”有人问。

“吉姆·克罗。”金回答。

大家意识到金在用种族歧视的俗语开玩笑后，就大笑起来。“没错，我们为吉姆做了件好事，”金拖着长音慢慢说，“我们让他入土为安了。”

乔治·托马斯是因为吉姆·克罗和其他被当作笑柄的政治事件而对辩证团体失去兴趣的几个黑人学生之一。道格拉斯·摩尔是托马斯在黑人研究生中的死党，两个人一起组织了“精神细胞运动”以进一步推进世界和平事业。他们一起反对朝鲜战争，在校园集会上谴责原子弹，还一起开车到美国参与反对弗朗哥的游行。在波士顿大学，摩尔和托马斯一起偶尔会让神学院的学生参与在希尔斯成立神职人员工会的尝试，或抗议麦卡锡主义，但他们从未让金参与过。金一直很清高，埋首课业之中。在辩证团体，对政治的讨论大部分局限于为论文选择“种族相关”的主题是否明智和博士论文。大家普遍认为这样做会降低自己在黑人和白人眼中的影响力，金也赞同这一点。这就是现实主义。主流黑人学生都认为托马斯和摩尔这样的行动派有些“不食人间烟火”，这正是其中一位写给他的原话，还说“世界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上，在波士顿大学，金的学生论文基本没有涉及种族或政治问题。金选了一些课，教授都是种族公平方面广为人知的十字军战士，比如艾伦·纳特·查尔莫斯，但金和德沃尔夫一样，大部分工作都是和富有同情心的非行动派一起进行的。

金的公寓位于马萨诸塞大道上，在赛瓦依舞厅的对面，去过金公寓的同学都知道他身边摆着一圈4英尺高的书。金的室友叫菲利普·勒努德，来自莫尔豪斯学院，他做饭，金洗碗。拜访者渐渐发现金经常给家里打电话，通常是跟他母亲聊，一次得说上两三个小时——电话费由家里付。金会把所有事都告诉母亲——自己的朋友和教授、银行透支、银器丢失、布道任务、衣着服饰、辩证团体聚会、食物问题以及女性朋友等。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谈话都会最终转到恋爱这个话题上，因为这不仅母亲最关注的事，也是金的父亲最关注的。金的父亲从不掩饰想看到儿子结婚的愿望。自1951年夏天，金与胡安妮塔·塞勒斯之间莫名地未能开花后，金就一直深感不安。

金非常想结婚。他经常和菲利普·勒努德一起进行4人约会，而且金还在自己布道的教堂里遇到过其他人选。长久以来，金发明了一套对合格女人评分的暗号系统，称吸引人的女性为“医生”，称漂亮的为“宪法”，说她“业已成型，天资丰满”。和其他黑人学生一起，金对戏剧中一个被当作波士顿大学白人的“消遣”的学生很感兴趣。他们崇拜那个女生，批评她，也无休止地嘲笑她——但总会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因为没人真想为那个女生的小把戏负责。否则，金的单身风格非常符合战后的趋势。有“宪法”经过时，金会用手肘顶顶男性朋友的肋部，要到电话号码后，就通过试验自己的方法，与每一位有希望的女士联系。1952年年初，金和一位朋友推荐的女士通了电话。说了朋友的赞美之词以解释自己为什么要电话后，金开始了自己的开场白。“您知道每个拿破仑都会遇到自己的滑铁卢，”他说，“我就像拿破仑，正处在自己的滑铁卢之战中，而我已开始祈祷。”“荒谬，”柯瑞塔·斯科特说，“你根本不了解我。”

金并没有气馁，继续谈论着情景剧和诗作，还对自己的课业评价了一番，很快说明自己是个钱财颇丰的人，他的吸引力里穿插着直白与讽刺、权威与幽默。金的开场获得了成功，柯瑞塔没挂断电话，这意味着要说服她第二天和自己出去吃午餐只是时间问题。金开着自己的雪佛兰来接她，带她到了一家餐厅。吃饭

时，金了解到柯瑞塔是在亚拉巴马州郊区农场长大的，父亲害怕白人，但还是靠自己的双手建造了一幢精致的房子。通过不懈努力，俄巴底亚·斯科特积累了数百公顷的土地，一跃跻身穷苦黑人农民中的精英阶层。虽然他的女儿们也要到田地里摘下棉花，在洗衣盆中浣洗衣物，但她们从家庭的打磨中收获颇多，足以让她们到邻镇的私立学校学习。那所私立学校是内战后公理会传教士建立的，此后一直是教会学校。之后，柯瑞塔·斯科特跟着姐姐一起北上，就读于安提俄克学院。从安提俄克学院毕业后，凭着一点奖学金，斯科特来到了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

柯瑞塔很想成为古典歌手，但前途尚未明朗。尽管她拥有难得的天分，能让从良好教堂的独唱歌手一跃成为全职的专业歌唱家，却没有足够的资金能让自己开展事业。柯瑞塔在灯塔山的一家时尚公寓和爱尔兰女仆一起做工，换得食宿。至此，柯瑞塔的大学学历、与有教养的黑人结成的社会关系、随时能像歌剧女主角一样的优雅举止让她不必在波士顿最上等的地方之一生活时挨饿。经受着种族、贫困以及音乐世界竞争带来的多重痛苦的折磨，尽管对现实主义有灵敏的嗅觉，柯瑞塔依旧拼命保持自己的端庄和乐观。

金知道所有一切。他经常开玩笑说要是没有自己，那她回亚拉巴马州摘棉花时肯定要被刺伤手指。然而，他们第一次共进午餐时，金赞美了柯瑞塔的模样，尤其赞美了她的刘海儿，之后，他们从灵魂食粮聊到了饶申布士。金的身高让柯瑞塔·斯科特有些失望，但随着谈话的进行，金的形象逐渐高大起来。更让柯瑞塔大吃一惊的是，金送她回音乐学院时说她会成为自己的贤内助。金告诉柯瑞塔：“找妻子时，我看重4点：性格、智慧、品质和相貌。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这4点。希望能再次见到你。”柯瑞塔只好不安地回答说得查看下日程安排。

金和柯瑞塔的恋爱是浪漫与实用主义的奇怪组合。金说话时有诗一般的抑扬顿挫，还带她去听了音乐剧和戏剧，与她共度优雅的夜晚，但金毫不掩饰自己是在有意识地选择妻子，而柯瑞塔和其他在考虑之列的女生必须符合一定标准。在

姐姐的帮助下，柯瑞塔在金与勒努德的公寓做了一顿饭，“通过了”金的厨艺测试。当金问她是否愿意成为牧师妻子时，斯科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说愿意谦卑地对待黑人浸信会教堂里未受过教育的“珍妮大婶们”。出人意料的是，金让她在那个夏天绕道去自己家拜访实际是对斯科特的另一个考验。斯科特一口说出自己可能去不了时，金一下就爆发了。“算了，”金对斯科特说，“所有事儿都算了。”和在相似争论中冒犯了金的胡安妮塔·塞勒斯不一样，斯科特在压力之下重新考虑了一番。

斯科特在8月份到达了亚特兰大。几周前，共和党人刚在芝加哥大会上提名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为总统候选人，而芝加哥大会也是第一次被搬上电视的大会。这是斯科特第一次走进金的世界——大教堂、大房子、大城市、高端的黑人社交俱乐部以及强大的关系网——这吓坏了斯科特。斯科特觉得金的母亲对自己很冷淡，而他的父亲则根本就是忽略自己。对埃比尼泽教堂的领袖来说，斯科特不过是儿子又一个女朋友，是需要引导的乡下女孩。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是音乐会歌手，但没多少人有展示的机会。金父亲的冷漠并没让斯科特惊讶，因为她早就从金和他在亚特兰大的密友口中知道了这位家长想让儿子迎娶一位出身西区名门望族的女儿。斯科特还听说，金在如此重要的策略性选择上不能独立做决定，“最终决定权”在金的父亲手里。这些传言很让人不安，但与金家人的会面更让人忐忑——金的家人很强势却也很友善，很礼貌却也很冷淡。果然，斯科特发现金的世界里最有人情味、最讨人喜欢的就是自己的男朋友。

回到波士顿后，一些迹象表明金的心思不在学习上。那个秋天，金的第一份哲学论文得了D+，教授的评语也非常尖刻，使用了“不要如此冗长”“显然”，还有“为什么？”等词句，还圈出了无数语法错误。重整旗鼓后，金从同一个教授处连续得了3个A，论文主题分别关于笛卡尔、威廉·詹姆士和大乘佛教。接着，就好像是计划好让金不得安宁，老朋友们都用他如此长时间的单身生活突袭他。金在克劳泽神学院的朋友贺拉斯·惠特·维特克在信中责备他说没能在两

年前他自己定下的最后期限前结婚。维特克猜测可能是“一次失足”还在让金分心。几周之后，金又收到了一封小 W.T. 汉迪寄来的信，他在金来到波士顿大学的第二年离开了，日后成了卫理公会教堂的主教。汉迪在信上写道：“我知道你还在寻欢作乐，因为你是城里最受欢迎的单身汉，我很好奇，当让你稳定的力量逐渐消失时，你会如何应对。马丁·路德，记住‘我们对你期望很高’。阻止我们看到期望开花结果的因素只能是马丁·路德自己。然而，我知道他不会允许自己失败或影响自己，也不会让他亲爱的父母蒙羞。”

那年秋天，金的父母来到了波士顿。当时儿子往家打电话的次数没有以前多了，自柯瑞塔·斯科特夏天的到访后，他们很忧心，必须得当面问清楚。金的父母很快就注意到金在马萨诸塞大道上的公寓十分整洁，也知道整洁不是自己儿子或非利普·勒努德的特长，明白这是女人的功劳。他们更把焦点放在柯瑞塔·斯科特身上了，因为她似乎经常与儿子在一起。金的父亲依旧很直白，当着斯科特的面，就开始问金他的那些女性朋友，还用名字称呼那些女生。每提到一个，金就耸耸肩，但父亲用正式的方式提到柯瑞塔时，金却没什么回应。柯瑞塔能来和家人一起共享茶点和用餐时光，金很满意，不想再继续回应这种挑衅了。金的父亲却不想罢手。父亲再也不能从儿子嘴里问出什么的时候，他便开始直接向柯瑞塔发难。金的父亲表示柯瑞塔想成为世俗歌手的事业计划与浸信会教堂牧师的妻子的身份不太相符。柯瑞塔没说什么，金的父亲变得有些得意，说自己觉得她与金之间的感情不过是大学生式的迷恋，恐怕连一年也撑不过去。这次，柯瑞塔还是什么都没说。

金的父亲突然变成了一副耶和華式的口吻，说：“让我直接问你吧。柯瑞塔，你对我儿子是认真的吗？”

实在是陷入了为难窘迫的境地，柯瑞塔便想接着他的话开个玩笑。“不是，怎么了，尊敬的金先生，”她说，“我没有太认真。”

最终，金的父亲还是开口了。他说这样很好，又说了一大堆话来表明自己的

立场。他说很高兴柯瑞塔对自己的儿子没什么严肃的打算，因为自己很确定金已经问过很多亚特兰大还有别处的女孩是否愿意嫁到金家了。他提到了一些，说柯瑞塔不过又是一个，而自己还没打算同意儿子结婚，让他们满意的人选肯定要比柯瑞塔·斯科特更适合。“马丁·路德和一些亚特兰大出身良好、家庭优越的女生出去过。”金的父亲说，“我们几家人认识多年，是我们尊重的人，我们永远不会伤害他们的感情。柯瑞塔，我说的那些人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可以贡献。”

这种情感爆发让柯瑞塔承受不住。“我也能做贡献。”柯瑞塔突然反抗起来。

金的父亲没理会柯瑞塔那一瞬间的愤怒，继续热情洋溢地谈着胡安妮塔·塞勒斯。“我们很喜欢那个女孩，”他说，“我不知道马丁·路德会怎么决定。但听你说并不认真，我很欣慰。除非你比我更了解我儿子，我劝你最好还是别认真。”

整个过程中，马丁·路德没说一句话，这让斯科特非常失望。金把母亲带到了另一个房间，说自己准备迎娶刚刚被父亲无情批判过的那个女孩。金知道母亲肯定会告诉父亲。他自己送斯科特回家的时候也对斯科特这样说了。听到这个消息，斯科特深感安慰，但下一秒钟，金就批评她没能给父亲留下好印象，这又让斯科特觉得受到了伤害。

金的母亲把儿子的话告诉了丈夫，这让他有些不安。在他们后来的拜访时光里，金的父亲在4个人的谈话中一直尽力做到有礼貌。突然有一刻，金的父亲承受不住了。他毫无预兆地一拳砸在桌子上，吓坏了所有人。“你们的心思都在恋爱上！”他大声喊，“你的学习怎么样了？”

这一下把儿子的话吓出来了。“我马上就拿到博士学位了，”金平静地说，“之后我就娶柯瑞塔。”

片刻之后，金的父亲又一拳捶在了桌子上。“你们最好会结婚！”他命令道，好像自己才明白过来。

经过一段痛苦的时间，金终于在婚姻这件事上与父亲重修旧好，过了几周，

德沃尔夫教授就圣奥古斯丁的神学上了一堂6个小时的课，圣奥古斯丁是北非的主教，沉溺于女色差不多30年后，终于成了全面基督教神学的第一位伟大的天才。圣奥古斯丁让基督教在哲学方面成了与摩尼教、新柏拉图主义和占星学同受人尊敬的宗教，而那3种宗教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地中海学者眼里是基督教的主要竞争者。圣奥古斯丁关于教会权威的教义帮助罗马教廷挺过了中世纪——也就是罗马帝国毁灭后的800多年。在1月的考试中，德沃尔夫的考题是解释圣奥古斯丁关于邪恶的复杂理论，在圣奥古斯丁的理论中，他希望上帝运用他无上的仁慈，化解其在邪恶方面的权威。金开头写道：“邪恶的问题困扰着有神论者，而不是无神论者。”他的文章最终得了A。

金为题目是“基督教徒如何战胜邪恶”的布道文写了大纲。这篇布道文运用了梯形布道结构，包括3个逐渐深入的方面，每个方面又含有多个不同部分。“战胜邪恶的第一步是发现我们最恶劣的地方。”金写道，接着他用非正统的方式将邪恶解释为“我们最常被引诱去犯下的罪过”。接着，他号召人类对自己诚实，还使用了多重心理转向以渲染语言的不透明度：“应该正确定义潜在的错误，否则，我们就看不到自卑恐惧下的骄傲了。”金说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运用上帝的恩赐开始与邪恶做斗争，之后，金就开始阐述关键的第三步：“重点不是根除邪恶，而是培养美德。”通过举例，金对比了尤里西斯的方法和俄尔普斯的方法。前者通过往水手的耳朵里灌蜡并把自己绑在船的桅杆上来抗拒海妖的诱惑；后者采用的方式则是弹奏竖琴，他的琴声很动听，让海妖的歌声黯然失色。金赞成俄尔普斯的方法。“邪恶无法驱逐，只能排挤，”金总结道，“单纯地说‘我没有罪’并不能控制肉欲，这需要运用德行排挤罪恶的能力。”直到最后一句，金才指明肉欲是自己这种方法要对付的具体的罪恶。

金用一句晦涩的语句表明人类需要靠诚实来战胜邪恶，他对肉欲的关注更增加了这句话的神秘感。在文章中，“对自卑的恐惧”可能是指对失去男子气概或失去爱的恐惧，而且金可能是在警告这种困扰可能会让人们忽视胜利的骄傲。不

只圣奥古斯丁，还包括尼布尔、马丁·路德以及之前提到的大部分神学家，他们都认为人类的骄傲为包括肉欲在内的罪恶打开了大门。否则，金可能是指那个时候对自卑的普遍理解，也就是种族低劣——警告这一点不利因素让黑人忽略了其种族的劣势，也忽视了隐藏在种族之下的骄傲。或者，他根本就是在说肉欲与种族变成强大的内在力量时，二者的某种组合。无论如何，金与这些罪恶抗争的理论还存在着很多逻辑漏洞。金暗示说，如果俄尔普斯采用了与那些诱惑人的海妖相同的音乐形式，而只是技高一筹，那么，美德和肉欲在本质上就是相同的。让善与恶进行竞争而非相互抗争，金将这种竞赛的本质从拔河变成了赛跑。这两种力量并肩移动，覆盖了相同的领域，因此有相互混淆的危险。也许就是由于方法中这一明显的缺陷，金再没将《基督徒如何战胜邪恶》的提纲扩展为完整的布道文。这篇提纲混在他的论文中，再没下文。

布莱特曼教授病了很久，那一年4月过世了，金一下失去了指导老师。之后不久，金就将自己的注册信息从研究生院哲学系转到了神学系，德沃尔夫成了他新的指导老师，帮助他在下一年完成博士阶段的课业。金不得不请求系里同意他在等待第二轮德语能力测试期间多修几门课。在金努力学习德语时，外面的世界正忙着应付新闻汇编中说的“变革之年”。3月，斯大林去世了。6月，英国庆祝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礼。美国新上任的总统艾森豪威尔仿佛对朝鲜战争停战一事非常乐观，还恢复了复活节儿童在白宫草地上滚彩蛋的传统。6月19日，艾瑟尔·罗森堡和朱利叶斯·罗森堡夫妇向苏联泄露原子弹机密罪名成立，在新新监狱被处决了，而那一天正是金婚礼后的第一天。

金订婚的那个春天，他还是会参与辩证团体的聚会。在后面的长谈中，金由于支持屈服于婚姻的束缚而备受嘲讽。团体成员都说婚姻让金更呆板了，他们中的一些私下里还抱怨说柯瑞塔·斯科特太“挑剔”，意思就是说斯科特太“小资”。刚参加完自行组织的辩证学家大会，这种批评简直是恶毒至极，但有些人却觉得斯科特与众不同。在金的朋友们努力学习后放松时，更喜欢和他们一起跳

吉特巴舞的女士，金之前大部分女朋友会这样。斯科特拒绝这样做，因为在她的概念里，音乐非常古典。每每演出时，斯科特都会穿上正式的圈环裙礼服，鼓掌时则会把手刚好抬至肩膀的高度，用哲学家的目光盯着远处的白云。这种矫揉造作让金在波士顿大学的同学们认为斯科特是个“装模作样”的人，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她的这种做派将会破坏金与如沃尔特·麦考尔这种朴实朋友以后的关系。然而，在男性团体中，有一些人对此有不同意见。金的朋友们都认为斯科特是个聪明且意志坚强的女士，也熟悉社交礼仪，“并不随波逐流，也绝不虚伪”。斯科特在记忆人名方面很有天赋，经常能让新加入的人感到轻松自在，而她总是彬彬有礼的样子——这些足以让她成为牧师的妻子。此外，斯科特抱负远大，绝对忠诚。

1953年6月18日是金与斯科特结婚的日子，婚礼当天，斯科特上述品质中的大部分就表现出来了。斯科特原想在父母离塞尔玛不远的房子前院进行低调私密的仪式，但让她紧张的是，自己的婚礼是这些地区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斯科特非常害怕城里来的金的族人会瞧不起自己朴实的乡下亲戚，只把他们当作农场工人；此外，她也不想表现出自己在极力取悦金的亲戚。这些已经让所有新娘的心七上八下，而在仪式前，金的父亲还把她和新郎叫到房间里谈了一次，让斯科特更焦虑不安了。金的父亲说后悔还来得及，强烈建议两个人到了情不自禁想结婚的时候再结婚。“我不由自主就会去布道，”金的父亲说，“你们结婚时也应该有一样的感觉，就好像着了魔要去做一件事。好好想想，你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斯科特经受住了这番奇怪的话，也熬过了大多数婚礼上都有的繁文缛节。斯科特结婚前几年，就想从结婚誓言中删掉只遵从丈夫的承诺，因为她觉得不公平，而且她非常坚定，金的父亲最后也同意了。婚宴终于结束了，在新人可以离开时，金因劳累过度睡着了，是斯科特开的车。由于亚拉巴马州的法律规定度假村、汽车旅馆、酒店均不得接待黑人，他们的新婚之夜只能在黑人控制范围内最近的公共场所度过——那是一个殡仪馆，属于斯科特家族的一个朋友。

柯瑞塔·斯科特完全遵守着金家的传统，发现自己一下就被卷入了金家的世界。金的父亲在他们婚礼后的周日在埃比尼泽为她施洗。她和丈夫在金家位于林荫大道的家里度过了余下的夏日时光，金的父亲为斯科特在公民信托银行谋了一份出纳的工作，因为他是那家银行的董事。夏日结束后，全家都去了迈阿密参加历史性的聚会——国家浸信会大会。大会主席 D.V. 杰米森已经连续多年负责大会事务，尽管他已经看不到了，需要有人搀扶着四处走动，但这么多年都没人强烈反对。这一年，在得到了一大笔抚恤金和特殊津贴后，杰米森退休了。牧师们都因对新选举的期待而感到很兴奋。金的父亲在亚特兰大的老对手威廉姆·霍尔姆斯·鲍德斯在副总统的帮助下参加了竞选，而且很有可能成为继任者。但受人尊敬的 J.H. 杰克逊要挑战他，杰克逊是知名的演说家，也是金的父亲的朋友，1939 年，他在浸信会世界联会的广大教众面前打破了亚特兰大的种族隔阂。在积极的竞选中，杰克逊在国家浸信会大会的章程里加入反独裁的修正案，禁止主席的自我接任，这让年轻的牧师都备受鼓舞。金的父亲是杰克逊的竞选干事，而金则是助理官员。约尔·金从他密歇根的新教堂赶来。金在克劳泽神学院的大多数黑人同学也来了，分属大大小小教堂的数万名牧师也是远道而来。大家都记得 J.H. 杰克逊当选时的那种疯狂的状态，也记得他们“通宵未眠”地庆祝，站在椅子上，挥舞着扫把扫除旧秩序。

大会后，柯瑞塔·斯科特·金陪着丈夫北上去波士顿，金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停留，进行了客座布道。刚在新公寓里安顿好，金就开始和德沃尔夫教授继续讨论他将在课业最后一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最后，金选定了主题——比较保罗·田立克和亨利·尼尔森·威曼对上帝的看法——这个主题风险不大，能得到比较好的成绩。由田立克和威曼分别领导的教派——协和神学院以及芝加哥大学，在自由新教神学的顶峰相互对立，但对德沃尔夫和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上帝的看法本质上完全相同。田立克和威曼都是超验主义者，与人格主义者截然不同。因此，对金而言，论文的结论确定无疑：他会批评田立克和威曼，因为

他们对上帝的看法太死板、太投机、太主观，因此不能在宗教的国度回应人类的渴求。金的论文很大程度上是学术讨论，源于将人格主义作为批评的工具而不是批评对象的策略性选择。尽管德沃尔夫偶尔会要求金根据神学的实验标准解释清他的人格主义，但金非常明智，知道把人格主义当成信条比当成系统好。

金给田立克写了信，问他是否知道与自己论文主题相关的其他论文。田立克9月22日在瑞士的安息日给金写了回信，称自己不知道。“此外，”田立克还写道，“我对此很感兴趣。”那年年末，出于某种原因，金也就同样的问题给尼布尔写了信，尼布尔的秘书代他回信说不知道。金已经从田立克本人那里得到了协议许可，而他的主题与尼布尔的著作也没有关系，所以看上去金给尼布尔写信完全是出于尊重。

在论文与神学大师的观点保持一致的情况下，金还试探了黑人学院教职员工的看法，其中莫尔豪斯学院的人占了大多数。教堂方面，金也已经知道了全国各大浸信会教堂是否有空缺。那年冬天，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南方找工作。他计划和梅斯教授谈话，看莫尔豪斯学员是否有教书的工作，之后就去其他学院走访，发现能引起他兴趣且有空缺的学院就去布道。通过朋友马尔文·沃森，金得到了在田纳西州查特努加市的第一浸信会教堂试讲的机会，他还把到蒙哥马利亚拉巴马州立学院教堂布道列入计划，那里的院长正是莫尔豪斯的毕业生。自始至终，金都在缓慢而谨慎地给父亲做工作，让他明白儿子最好独立走出去看看，而不是待在埃比尼泽。制订好这些计划，把新婚的金夫人留在波士顿后，金和辩证团体的一个成员12月18日一起出发了。南下的路上，金说起查特努加市的第一浸信会教堂时都会有些忧心。因为第一浸信会教堂很难取悦，最近刚拒绝了一位他们的朋友，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而那位朋友的试讲也非常精彩。

新年前，塔斯克基学院宣布将中止发行其自1912年开始出版的年度《私刑报告》。公告中说，过去两年内，在美国没有私刑事件上报，自1949年以来，不过只有6件。因此，塔斯克基学院每年将改为报告黑人就业情况及其收入数据。

消息公布时，金在亚特兰大，为1月3日在查特努加的试讲做准备。他父亲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确认金是否能在家里待一会儿，因为有人想就教堂事务与他会面。金同意了，他父亲将R.D.内斯比特引进厨房时，金正坐着享用猪排。内斯比特并不认识金一家人，金一家人也不认识他。他穿着昂贵的商务西装和宽大的吊带裤，还拎着一个手提箱。自我介绍后，内斯比特说他已经向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推荐了金，他有可能成为那里的新牧师，而内斯比特本人则是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神职人员选拔委员会的主席。

尽管金知道那里由于弗农·约翰斯备受争议的离开而有空缺，但并没有多做打探——可能是因为金觉得那是个小教堂。金感谢了内斯比特，却并未答应，说自己已经答应了查特努加市的第一浸信会教堂，下周日拜访时做决定，那时他已经没时间到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试讲了。

“这么说吧，金，我是个老浸信会教徒了，”内斯比特说，“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如果他们想要你，就不在乎等你。你周日去的时候不用给他们答案，我希望你先在德克斯特试过之后再做决定。”

金的父亲对这种招收企图不满，便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马丁·路德，你不会喜欢德克斯特的，”他说，“那是个大的黑人教堂。”他提到了几个颇有影响力的德克斯特教堂的成员，他们因为让牧师的生活十分悲惨而为人所知。

内斯比特谨慎地看着金的父亲，说他提到的牧师里有几位已经去世了，而现在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因吸引了全国最好的几位牧师而扬名。

金抬起头，开始打算起来。他已经决定1月17日下午到蒙哥马利布道，那么1月17日早上在德克斯特试讲也没什么损失。如果他在那之前决定接受查特努加的那份工作，他也可以直说。于是，金对内斯比特说，如果17日早上可以的话，他愿意在德克斯特教堂试讲。

周六的时候，也就是1月16日，金对自己在查特努加的前途有了新的评估。他收到了满是溢美之词的信，却没收到确定的录用通知。他还得继续等第一浸信

会教堂的消息，但直觉告诉他已经没多大希望了。金便把心思放在了其他可能性上，也放在关于田立克和威曼的论文上。

一通电话打到金的家里。“金，”一个沙哑的声音说，“我是弗农·约翰斯。听说你明天会在蒙哥马利我之前待过的教堂布道。我本该到第一浸信会教堂布道的，但我现在困在亚特兰大。我可以搭你的车去吗？”

“约翰斯博士，这是我的荣幸，”金回答说，“您在哪里？”

“我在镇中心的公交车站。”

“好的，约翰斯博士，请您在那里稍等。我几分钟后就可以出发，我在那里接您一起过去。”

第四章 第一首

带他走，上帝——今天早上——

用牛膝草洗净他的身体和心灵，

把他挂起来，晾干他的恶行。

让他倾听智慧的声音，

让他的话成为真理的大锤——

锤打罪恶的铁石心肠。

真主上帝，今天早上——

让他透过望远镜永恒，

让他遥望时间的纸墙。

上帝，让他的想象变得芬芳，

拥抱永恒的运动，

让他充满您非同凡响的力量，

涂满拯救的圣油，

点燃他的舌头。

詹姆士·韦尔登·约翰逊，《上帝的长号》

金接上那位传奇老人，开始了去蒙哥马利长达4小时的旅程。那天天气凉爽，但在他们看来，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中部的农场风光甚为美丽，尤其是农民出身的约翰斯更是这样认为。金打开收音机，开始收听大都会歌剧院上演的多尼采蒂的《拉美莫尔的露西亚》，那是他最喜欢的歌剧之一。两个人傍晚到

了蒙哥马利，金把约翰斯送到第一浸信会教堂的牧师住所，约翰斯就住在牧师拉尔夫·D·阿伯纳斯家。金只在浸信会大会和亚特兰大的学生聚会上听说过阿伯纳斯，但他马上意识到约翰斯与阿伯纳斯是熟识，因为阿伯纳斯热情地欢迎了约翰斯，好像约翰斯是他长久未见的叔叔。约翰斯四处闻了闻，很高兴。“胡安妮塔，谢谢你，”他对阿伯纳斯的妻子说，“我知道你正在做先知的晚餐，做好了吗？”

“没错，约翰斯博士。我已经做好了。”女士回答。

“那好，金，谢谢你，”约翰斯说着，匆忙朝金欠了欠身，“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说完，他径直走向餐桌客人的座位。

阿伯纳斯夫妇邀请金一起用餐。“谢谢，但布鲁克斯博士在自己家为我准备了晚餐。”金说。之后，他犹豫了。先知晚餐烘焙慢炖了一天，牛排、洋葱、萝卜叶、玉米面包还有多种佳肴的香味已经溢出了牧师住所。“我想布鲁克斯夫人已经准备了晚餐，”金说，但他并不确定，“但是，上帝啊，闻起来太香了。好吧，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就留下来。”阿伯纳斯夫妇笑起来，安排金坐在约翰斯旁边。

两位客人不吝其词，享用美味时极力赞美了胡安妮塔·阿伯纳斯的厨艺，而且爱与人交往的阿伯纳斯也是个好主人。“金，我想告诉你一些事，”阿伯纳斯说，“德克斯特教堂的人这个星期肯定对我很恼火，他们会觉得我请约翰斯博士过来就是为了和他们作对，让你不能过去试讲。他们都在说波士顿来的年轻博士本来很可能留在德克斯特教堂，现在阿伯纳斯却从中作梗，让约翰斯同一天到第一浸信会教堂布道。好吧，这不是真的。第一，我不知道你要来。第二，我没邀请约翰斯博士来布道。他写信说自己去新奥尔良时要经过这里，很乐意替我布道。我说他来我的教堂布道是我的荣幸，我的确这么觉得。约翰斯博士，我说得对吧？”

约翰斯证实了阿伯纳斯的说法。他告诉金别在意自己看重第一浸信会教堂更胜于德克斯特教堂的忠实追随者。因为德克斯特教堂“重要的”成员，也都

“刻薄”，他们第二天会去听金的布道，而不是他自己的，那些人才是金要努力争取的。“如果你成了我的继任者，而且那个叫兰德尔的黑人还在理事会，你最好小心些。”约翰斯建议道。

这番话引得阿伯纳斯开始讲述自己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德克斯特教堂和第一浸信会教堂集会时的区别。“金，我这么看，”他庄重地说，“约翰斯教授和我的看法一样，因为刚开始就是听他说的。在我这里，你可以谈论耶稣，可以站在布道坛上大谈耶稣。但在德克斯特教堂，他们甚至不想让你提到他的名字。”

牧师们大笑起来。“他们更喜欢听你谈论柏拉图或者苏格拉底之类的，”阿伯纳斯继续说，“如果你不得不提到耶稣，那么他们会希望你能尽量低调简短地一带而过。没错吧，约翰斯博士？”

“没错，”约翰斯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理解柏拉图的要义。”

“说得对，”阿伯纳斯继续说，“在我的教堂，你可以随意谈论耶稣，但你是唯一一个要布道的人，集会帮不了你。人们很少会说第一浸信会教堂的闲话，但会议论德克斯特的教堂。自从斯托克斯教士开始管理教堂，传教士布道时，大家只能听。一旦斯托克斯的客座教士开始呼喝、攻击、分化，他马上就会跳出来打断说：‘你这样会让我的教众倒退。’他就会这么说的。德克斯特教堂也是这种情况。约翰斯博士，对吧？”

约翰斯认可这个看法，尽管他私下里认为阿伯纳斯把这两座教堂描绘成贵族社会的姐妹花时的急切表明，他夸张了自己教堂集会时的优雅高尚。德克斯特教堂的大多数成员都认为第一浸信会教堂是个“喧嚣吵闹”的地方，这种说法真是简单明了。

阿伯纳斯讲了很多故事，目的有两个：恭维约翰斯，并尽量让约翰斯背诵下来。比如，他讲了一个跟两座教堂里的鬼魂有关的故事，是说亚岱尔博士对妻子的谋杀以及第一浸信会教堂争权时期老 D.V. 杰米森打败家庭牧师斯托克斯成为国家浸信会大会主席后的内部谋杀。阿伯纳斯说约翰斯宣布要和他一起在婚宴上

卖西瓜而打断了蒙哥马利最负盛名的黑人物理学家的女儿的婚礼，是对德克斯特教堂极大的羞辱。阿伯纳斯讲了约翰斯《谋杀黑人是安全的》这篇布道文的始末，还回忆了6年前第一次听到约翰斯布道的情景，当时他只是亚拉巴马州立学院的学生，而约翰斯才刚刚成为德克斯特教堂的新牧师。尽管阿伯纳斯忠实于第一浸信会教堂，后来还成了这里的牧师，但他承认自己算是约翰斯的信徒。在约翰斯的街边小摊中，阿伯纳斯是女人内衣方面的冠军销售员，这是一种能经常给牧师们带来快乐的话题。

“金，”阿伯纳斯说，“我也记得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情景。我敢说你已经忘了。那是1950年的夏天，我当时还是亚特兰大大学的学生。那个夏天你父亲为你打翻了布道坛。于是，我在某个周日去了埃比尼泽，看你能不能布道。你就信仰的本质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布道。布道结束后，我跟着人流往外走，你握了握我的手，问：‘你对这次布道满意吗？’我回答说：‘满意，非常感谢你。你保佑了我的灵魂。’你记得吗？”

金不置可否，阿伯纳斯立刻将他从尴尬中解脱出来。“你知道吗？”阿伯纳斯咧嘴笑了一下，“就在第二天，我原本打算带去姐妹教堂看戏剧的女伴打电话说身体不适，不能去了。好吧，当时我已经买了票，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自己去了，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我看见告诉我身体不适不能来的女孩正挽着之前保佑我灵魂的那个年轻牧师。就是你，金。”

这个故事既让金有些高兴，也让他有点尴尬。“好了，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阿伯纳西。”金说。金告诉了他们柯瑞塔的事，还恭喜阿伯纳斯和胡安妮塔的婚姻。之后，金再次赞美了自己刚狼吞虎咽了的晚餐，就告辞了。夜色尚早，金就去了蒙哥马利黑人商业区——那里有个加油站，亚拉巴马州立大学校园边上还有几家外卖店。金用帝王咖啡厅的付费电话给布鲁克斯家打电话时，看到自己在莫尔豪斯的老朋友走进了门。那是罗伯特·威廉姆斯，男高音独立歌唱家，他之前没钱交学费继续学业，就去了协和神学院宗教音乐系的朱利亚音乐学院。威廉姆

斯现在在亚拉巴马州立大学执教。两人8年未见，相互寒暄时，威廉姆斯还嘲笑金成了牧师这件事。金说自己现在还不是真正的牧师，还问威廉姆斯自己应不应该到德克斯特教堂去。

威廉姆斯对这件事的前景摇了摇头。“迈克尔，我不知道，”他笑了一下说，“那里有好多倔强卑鄙的人。如果说谁能教化他们，只能是你了。”金感谢了威廉姆斯对自己的信任，接着就开始嘲笑他没加入德克斯特教堂，也没有按时去教堂。

在布鲁克斯家住了一晚后，第二天一早，金就踏上了德克斯特教堂的布道台，用他最完美的文章《完整人生的3个方面》做了演讲。当时的场景和金很相称——这间教堂不大，木制的，很精致，是在黑人之前拥有的房屋的基础上建成的，就在蒙哥马利中心的大道旁，从白色的州议会大厦走过来就到了——而且看上去弗农·约翰斯只吸引了一小部分听众。看起来，德克斯特的很多成员都来听金的布道了，一部分原因是金名声在外，流言说他很可能真的会填补神职人员的空缺。大家被金的风度举止和热情洋溢的话语打动了，于是罗伯特·内斯比特当天下午就带着德克斯特教堂的一些领导到布鲁克斯家和金进行初步商谈。

金承认德克斯特的做法让自己深有感触，但他有很多选择，做事不喜欢操之过急。内斯比特说的和金差不多。他们都知道，在德克斯特的备选中，有一位是金的老同学，也是他最好的朋友——沃尔特·麦考尔，麦考尔几周前在德克斯特试讲得非常成功。执事们非常欣赏麦考尔，已经邀请他进行第二次试讲，这个机会非常珍贵。如果麦考尔第二次试讲也非常成功的话，他就能得到这份工作。麦考尔非常想得到德克斯特教堂的工作，因为他遗憾地与几家有名望的教堂擦肩而过，而且很不愿意到佐治亚州的小学院当男生训导主任。对金来说，最尴尬的就是在好朋友非常努力且有希望的时候，进入德克斯特旷日持久的筛选程序里，但他和内斯比特都很有礼貌，举止得当，消除了这之中的紧张感。

那天晚上，金又到阿伯纳斯家吃晚饭。约翰斯已经搭下午的火车到新奥尔良去了，所以没在一起吃晚饭，这让阿伯纳斯能更坦率地说出德克斯特教堂让人心

痛的争议。他说，约翰斯根本没想到德克斯特会接受他的辞职申请，就算是第五份也一样，突然的解雇让约翰斯很恼火，而且更让他不高兴的是，他无处可去。约翰斯的妻子在弗吉尼亚州教书，但约翰斯就是拒绝腾出德克斯特教堂的牧师住所。他在那里又度过了第二年大部分的好时光，对同意他辞职的德克斯特执事们的命令无动于衷。德克斯特教堂和约翰斯之间的争端越来越难看，最后执事们切断了他所住的天然气和电，最后也断了水。约翰斯毫不示弱，不肯就范，他点蜡烛读书，自己运水，还靠烧以前攒下的旧报纸取暖。长期以来，表面上受人尊敬的弗农·约翰斯会在牧师住所住下去，直到德克斯特教堂选出新的牧师；私下里，大家都知道约翰斯年纪大了，脾气也不好，就是要和赶走他的执事们对抗到底。

“约翰斯是个麻烦。”阿伯纳斯笑着说。然而，他很了解约翰斯和德克斯特，便给了金两点实际的建议。第一，从长远角度看，当牧师比当预言者好。预言者都很杰出、孤独、浪漫、不切实际，是最高水平的牧师，没有固定的教堂，但根据牧师中流传的说法，预言者最后都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一个悲剧，或者说是非常可笑的人，就像没有王国的国王。第二，金应该小心的是，德克斯特教堂根本不会让牧师待很久，他应该避免成为德克斯特想要的那种牧师——布道坛上的学者，不在意教堂的组织结构。要想在德克斯特教堂生存下去，牧师必须削尖脑袋，挤进委员会、财务处或人事部门——总之，就是进入教堂的控制部门中。否则，最善言辞的牧师也斗不过根深蒂固的权力。

回到波士顿后，金把自己的职业选择说给辩证团体讨论。他还在考虑本杰明·梅斯让他在莫尔豪斯教书的邀请，但蒙哥马利的那个小教堂在他脑海中越来越清晰。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把金对镀金学者的热情带到了顶峰，因此德克斯特教堂的盛名对他有很大吸引力。（在写给感谢亚拉巴马州立大学牧师同意自己去布道的信里，金说自己很享受“本质上真实”的友谊。牧师的回信则嘲笑了金的华丽的修辞。）此外，挑战自己，超过像弗农·约翰斯一样的预言者的想法也吸引着金。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征服德克斯特臭名昭著的男爵的领地。金确实很像

他父亲，他父亲从不遮掩自己对牧师权威的看法——一次，他在浸信会牧师的会议上讲述了要是埃比尼泽的成员敢在教堂里站起来，要求看支出报告的话，他会威胁说要用椅子打破那个人的头，来制止这种不忠的行为。

几周之内，事情把金推向了德克斯特。沃尔特·麦考尔到蒙哥马利进行第二次试讲，布道文题目是“完整人生的4个方面”。这明显是对金的布道文的润色，反映了麦考尔强烈的竞争欲望，想要超过自己的朋友，可也许正是这一点破坏了他的表现。无论如何，他第一次试讲有多成功，第二次试讲就有多失败。之后与内斯比特的会面中，麦考尔非常沮丧。“我比不上金。”麦考尔顺从地说。那天对所有人来说都不好过。从个人角度看，内斯比特和差不多德克斯特的所有人都喜欢麦考尔，但教堂的态度明显倾向于金，一是因为金的阶层，二是因为他的原创性。这件事不必通知麦考尔。他和金也通了电话，相互安慰，说彼此还是朋友。

就在那个时候，查特努加第一浸信会教堂也邀请了另外一位牧师试讲，金自己也尝到了被拒绝的滋味。这验证了金之前的预感，自己的尝试失败了，但他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太年轻、太有学究气、太有政治感还是因为受到了某些人对父亲，甚至是祖父模糊的憎恨的影响。对神职人员选择委员会来说，没有什么是偏执或者微不足道的事，牧师觉得这既危险又迷人。与自己的导师马尔文·沃森商谈之后，金小心地朝德克斯特靠拢，他与内斯比特通了电话，说自己愿意进行第二次试讲，而且，如果德克斯特教堂愿意，他也想和全部执事会面，但同时，金还在考虑其他选择。之后，金和内斯比特通过电话进行了协商，内斯比特大胆地给金施压，让金尽快做决定：自己可以打破教堂的传统，不让金再进行另外的试讲，还每年给他4200美元的薪水。教堂方面说，每月第一周周日的布道（或圣餐）的薪水是100美元，每月其他3周布道的薪水是75美元，这会让金——这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成为蒙哥马利薪水最高的黑人牧师。

内斯比特的条件让金站在讨价还价的有利位置，但就是不能拖延。1954年4月14日，他给内斯比特写了信，说自己接受这份工作。“然而，”金还说，“我

认为我的接受建立在以下条件上。”他的条件包括：条件良好的牧师住宅，夏末自己完成博士论文的研究前往返于波士顿和蒙哥马利的交通费由德克斯特教堂负责，德克斯特教堂要理解自己期望的薪水随着“教堂的进步发展”而提高。金的条件很像在谈业务，但他的条件好像并没有德克斯特教堂想的那样苛刻。4月18日，与选拔委员会简短会面后，内斯比特完全接受了金的条件。由此，德克斯特教堂结束了有史以来牧师空缺时间最长的一次。

波士顿雷希诊所的罗斯玛丽·墨菲医生为金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金身高1.72米，151斤，脉搏每分钟70次，各个身体指标均正常健康。金很幸运，健康无虞的身体让他有足够的力量战胜妻子和父亲对他来德克斯特教堂的反对。落后的亚拉巴马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是柯瑞塔最不想居住的地方之一，而她终其一生都挣扎着想要离开那里。在波士顿，金正与内斯比特协商时，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让她在古巴作曲家阿马德奥·罗尔丹《音乐的动机》一曲首次公演时担任独唱之一，还有交响乐团伴奏。柯瑞塔定期在白人长老教会教堂唱歌。她知道，在蒙哥马利，之前的荣誉将只能是梦了。于是，柯瑞塔不遗余力地劝说，想让丈夫在北方找一份工作，留住他们在北方已经获得的成就。尽管金试图安慰妻子说在德克斯特的工作只是暂时的，但柯瑞塔还是请求金放弃他所谓的一家之主的权威。跟父亲一样，金对妻子在婚姻中的看法非常传统，他提醒妻子说自己在她接受求婚之前就已经说明这一点了。可即使如此，柯瑞塔到了蒙哥马利后的几个月都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金的父亲觉得很受伤，因为儿子拒绝了本该由他接任的埃比尼泽教堂的工作，所以他想让儿子害怕，便警告儿子说，德克斯特教堂臭名昭著的男爵们会践踏他，在蒙哥马利等着他的只有危险、羞辱和事业的毁灭。对于这番话，金回应时的语气里混杂着不同寻常的技巧、魅力和倔强。德克斯特的工作是他的第一次考验，他将用父亲管理埃比尼泽教堂的方式管理德克斯特教堂。“我要成为牧师了，”他告诉自己的妻子和父亲，“我要管理那个教堂。”

金在 25 岁时开始了自己的事业，那一年见证了冷冻快餐和芯片的发明、乔·迪马乔与玛丽莲·梦露的婚姻以及纽约埃利斯岛移民中心的关闭。关于氢弹试验的第一部新闻电影里，没穿衬衫的美国工程师抽着烟，戴着遮阳帽，正在遥远的太平洋上调试索具。在将“上帝之下”这句话加入效忠宣誓誓词的仪式上，总统艾森豪威尔说，没有“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我不关心具体是什么”，美国政府形式就不复存在了。这一说法让自由派学者和保守派学者都深感烦闷，但公众似乎很认可。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94%的民众信仰上帝，68%的民众相信有来生。

5月17日——金作为德克斯特教堂牧师进行了第一次布道后两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没有提前通知，就宣布了法庭对布朗诉讼教育委员会案的判决。这件事让媒体强烈关注，美联社还在中午12点52分发布了公告，说沃伦正在整理意见；之后，下午1点12分时，公告说沃伦的“宣读还未进入法庭意见”，所以记者还不能评论其结论；最后，中午1点20分时，公告板上显示法庭投票以8比0的结果，判决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违宪。

世界为之震颤，之后就不是这样了。黑人社区的街道上没有庆祝活动。在亚特兰大的斯佩尔曼学院，大二学生芭芭拉·约翰斯对其在案件中的角色仍缄默不言，也知道同学们无言的理解。他们似乎很担心这种无罪辩护意味着像斯佩尔曼这种学校将消失。沃伦宣布判决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总统便知会了哥伦比亚特区，说希望国家首都华盛顿身先士卒，带头守法，在收到法院的具体命令前废止种族隔离政策。《纽约时报》的詹姆士·赖斯顿抨击说布朗案的判决冒险涉及了社会学，说“比起学校设施的平等，法庭更看重思想与心灵的平等”。南方的政治家们先是宣布遵守法庭的判决，之后又改变了主意。

谢尔曼·亚当斯是艾森豪威尔的幕僚长，一心想着政治形象，希望在委任沃伦这件事上，民主党人不会责怪自由党人。多个领域的专家自己也不确定对这件事的看法，主要是因为两个种族之间的差异鸿沟太宽，视线看不透，想象也看不

透。讽刺的是，比起自己对布朗案的看法，美国民众似乎更确定他们想让外国人怎么看。美国之音立刻将沃伦的判决翻译成34种语言，向全世界公布这一好消息，但国内很多主流媒体却沉默不言。《美国备忘录》从未提及19世纪最高法院最重要的判决，因为这一判决太有争议了。

布朗案宣判前10天，法国军队在奠边府投降了，这在全美掀起了巨大的情绪波动。这件事的焦点是一位随军的法国年轻女护士，她是唯一一位上战场的女护士。越南人——新闻报道中至今仍称其为“当地人”或“赤色分子”——胜利后，这位护士被送回了法国占领的河内。热纳维耶芙是女子爵奥热·加拉尔·泰尔罗布的女儿，当时，发现自己成了西方人眼中团结的象征，没人比她自己更惊讶了。这个清秀法国女护士的故事里有所有东西——英雄主义、战争、性别、纯洁、高贵的出身、政治和道德象征主义。两个月后，热纳维耶芙回到纽约，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封面，成了“奠边府的天使”，25万纽约人也在百老汇进行了盛大的游行。对所有事情还有些手足无措的女英雄，有点不情愿地去了华盛顿，在那里接受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为她颁发的自由奖章。热纳维耶芙也成为继独立战争英雄拉斐特将军之后，第一位被邀请参加上下两院联席会议的外国公民。

金正打算搬去蒙哥马利，麦考尔从福特河谷州佐治亚的一所不大的黑人学院写了一封信，抱怨说打破纪录的高温都要把南方所有的河流湖泊都晒干了。干旱似乎是对麦考尔个人遗憾的呼应，麦考尔对金说：“事情似乎都有利于你。”“我以为你已经忘了好男孩。”麦考尔在说主题之前又加了一句，其实，麦考尔想说的是“一位天使”。麦考尔宣布他将迎娶一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女士，希望金能来当伴郎。但金和朋友们都知道，麦考尔是个安定不下来的人，果然写了没两句，他就开始说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另一个小妞”。“她在北卡罗来纳工作，但是佐治亚州奥尔巴尼那里的人。”麦考尔写道，“金，她真的很漂亮，但她没有南卡罗来纳州那个女孩所拥有的东西。我不想和她分手，但我已经准备好结婚了，所以不想再继续玩了。”

之后，麦考尔又开始说他拒绝与之结婚的那个女士以及他拒绝抚养的孩子，这让人很痛苦。他给了那位女士 50 美元让她抚养孩子，但那是个错误，因为这给那位女士带来了婚姻的“一丝希望”。“她用长途电话和一大堆信把我身上的阳光赶跑了，”麦考尔烦躁地说，“所以，我决定不再给她抚养费，也不会再给她任何形式的帮助。老天，如果我给了她一丁点希望，她就会一直纠缠我到死。我不喜欢采取这种态度，但我觉得这么做是明智的。”他用简单的“向柯瑞塔问好”结尾，因为柯瑞塔对他来说太正统了。

这封信从头至尾都是麦考尔的风格——露骨、热烈而冷酷，多愁善感却如磐石般坚硬，被女人的天性惹恼了。金非常清楚，麦考尔说的婚礼离确定下来还早着呢。10 周之后，金写给麦考尔的一封信中还问及他的“婚姻状况”。那时，金已经在蒙哥马利生活了，在德克斯特教堂布道。金写信给麦考尔以及大部分他认识的人，的目的是寻求帮助，因为金想要发起一场运动，以暴风之势得到这座新教堂。

1954 年 9 月 5 日，金作为住家牧师第一次站在德克斯特的布道坛上，他手里拿着一份让人惊讶的文件——《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 1954—1955 财年的建议》。金向大家宣布，他将分发这份文件的副本，请他们虔诚地参考，在之后的业务会议上有所行动。礼拜后，德克斯特教堂的教众都拿到了那份文件的副本，并且他们从第一句话里就看出了这个布道坛上长相孩子气的年轻人不想成为教堂神父们的牺牲品。“当布道者被称为一个教堂的牧师，”金宣布，“主要原因就是他已经得到了某种权威。”从那时起，金就宣告了在权威这一主题上，他响亮明白的前言配得上摩西、圣奥古斯丁和他自己。

权威的来源具有双重性。第一，他的权威来自上帝。号召本身蕴藏着上帝想要发出这种号召的假设。这一事实清楚明白地说明牧师的权威不只是人类授予的，更受到了神圣的鼓励。

第二，牧师的权威来自人。号召暗示着人们愿意无条件接受牧师的领导。这

意味着领导绝不可能从长凳爬上神坛，而总是从神坛走到长凳的。这既不意味着牧师是我们盲目跪拜的人，好像他一贯正确，有超人的属性一样；也不意味着牧师应该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干涉各个附属机构的执事、理事和工作人员，假定他有不必要的独裁权威。但这确实说明牧师应该受到尊重，应该被当作涉及教堂政策和项目时的核心人物。牧师永远不应被当作想要独立而遭受了不公平对待的人的傀儡，也不能“把自由当作恶行的保护伞”。因此，教堂的发展与董事会和牧师领导的全力配合不可或缺。

作为独立章节，金的序言可以说是很大胆。很可能的是，金能让会众把这当作一种决心，但他正式通知的那些教堂里有权势的人会等待时机，长久下去，这种决心的效果就越来越差了。金没有冒险，序言之后为教堂财政及组织的调动具体提出了 34 条建议。第一条是他直接从父亲 1932 年鼓舞埃比尼泽教堂的会众时借鉴的：所有教众应根据其出生的月份，分属 12 个俱乐部。“每个俱乐部都应该在当月最后一个周日以其名称为教堂做出特殊贡献，”金写道，“此外，教堂周年纪念时，每个俱乐部都应该捐出至少 100 美元。”第二条里，金提出教堂应该开始“为期 4 年的翻新扩建项目”。他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包括从 1955 年的新地毯和“电力冷水喷泉”到 1959 年全新的宗教教育大楼。

提出这两条令人震惊的财务建议后，金又提出建立一系列新的委员会、董事会及理事会。社会及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发展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会员，在选举讨论“论坛及大规模会议”前提供赞助。“德克斯特的每个会众都必须登记成选举人。”金写道，可当时在亚拉巴马州，只有不到 5% 的黑人登记注册了。一个新委员会筹钱为德克斯特高中毕业生提供大学奖学金；一个将负责建立幼儿园，好让小孩子的父母能更放心地到教堂；还有一个委员会负责发展新会员。甚为自得的德克斯特教堂从未做过以上事情。

金的最后 12 条建议回到了财务和教堂管理的关键问题上。他提出每位执事都应负责住在自己家附近的 25 位教堂会众（“说服会众遵守自己的誓言是执事的

责任”)，此外，金还列出了父亲在埃比尼泽应用得很成功的集中起来的财富和预算。从此，就不必再进行临时集会、特殊收款或匿名捐赠了。金这样写道：“我建议1954年11月1日前，各个附属机构应将各自的财富上缴至教堂总财政处。”德克斯特要通过支票而非现金运转。牧师单独决定支付给客座牧师的费用，不必通过执事或董事。不必找人保管钱款或清点数额，所有钱款应立即存入银行。金用华丽的语言说，如果做到了上述一条或多条，“德克斯特教堂将上升至让未来几代都震惊的高度”。

金的计划是宣告领导权力，并通过迅速一击达到目标。采用可能是最关键大胆的策略，金为自己提出的一系列委员会提名了具体负责人员。这说明，金在第一天就对教堂会众非常了解，所以才在牧师最谨慎的领域——人员分配上冒险行此举。在金指定的人中有亚岱尔博士——弗农·约翰斯说他谋杀了自己的妻子，佩特斯博士——弗农·约翰斯在他女儿的婚礼上羞辱了他以及鲁夫斯·路易斯——就是和约翰斯一起到亚拉巴马州立大学校园卖西瓜的人。

这份名单以及整份建议都要进行投票以决定是否通过。通过提前拟好名单，金让教堂大多数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对自己的改革产生了兴趣。把委员会和财务计划归于摩西对牧师权威的定义之下，金给了会众明确的选择：要么确定自己的权威，通过自己的建议，要么就挑战他的权威和建议。在热月忠实分子的反攻中，他们明确表示如果贵族们进行了抵抗，那金还没来得及庆祝自己的到来，就得离开德克斯特了。

金对自己的争辩很骄傲。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准备这些建议，甚至还参考了全国最成功的黑人教堂的组织结构报告。甚至在德克斯特教堂让步后，他还将文件副本寄给了其他牧师寻求建议和意见。回复的人都为金对牧师杰出性的描述鼓掌叫好。马尔文·沃森说序言的构思“精巧得当”。另一位朋友回信时只简单地说金在权威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很好”。在这一点上，很少有牧师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对此共同的批评是金可能操之过急了，计划中有太多组织、太多责任重

叠的委员会以及太多的额外工作。“教堂里积极的活动不一定说明这一领域的事业有所发展。”沃森警告说。

金知道积极的活动会将自己与会众和这个城市绑在一起。金精力充沛。每天早上，他五点半就会起床，花3个小时写论文。之后就会去教堂，在葬礼上布道，或是监督地下室的画作，或者和6月俱乐部的成员一起弹奏音乐。金会参加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聚会，给镇上其他黑人牧师打电话促进感情，还加入了当地的莫尔豪斯俱乐部。蒙哥马利是莫尔豪斯校友的避难所，以至于亚拉巴马州的一个绰号是“小莫尔豪斯”。金也很快发现莫尔豪斯一位熟人艾略特·芬利的家里有桌球台。他有时晚上会过去打桌球。（“老芬利说到了8号球就能打败我了，所以我得给他个教训。”）晚上，金会再花几个小时写论文。在德克斯特的第一年，他回了两次波士顿，和德沃尔夫讨论论文，还要在博士学位检查委员会面前答辩；他参加了十几场国家浸信会的秘密会议；在德克斯特进行了46场布道；从纽约到路易斯安那州为教堂和学院进行了二十多场演讲。金很为自己眼花缭乱的行程骄傲，还向教堂报告说，除去上述所有事，他还读了26本书和102本杂志。

连冷漠的R.D.内斯比特都对执事们说新来的牧师头两个月就“革新了”德克斯特教堂。金让委员会成员们埋头于自己喜欢的工作，于是他们也就无暇顾及他们不喜欢的工作了。提交建议6周后，金就报告说单独一个周日就筹集了2100美元。这个数额是他年薪的一半，其他牧师都认为这对一个只有300名会众的教堂来说是让人吃惊的壮举。可以预见的是，在让各个附属机构11月1日前上缴无论是放在银行还是独自保存的钱这件事上，金遇到了最拖延的情况，还有最有独创性的错过期限和无心之失。但金凭着自己的命令和坚持，还是按时收齐了。

最后期限的重要性不只在在于树立新牧师的权威，因为10月的最后一天，金的父亲将大篷车开上了蒙哥马利的高速公路——车上有金的母亲和她的唱诗班，还有将近100位支持者——他们是来参加金在德克斯特教堂就任的正式仪式的。

金对父亲说，他已经从德克斯特教堂传奇般的男爵手里得到了财务管理权。

金已经给保罗·田立克写信说想面谈。11月，田立克从苏格兰亚伯丁回了信，他正在进行吉福德讲座。田立克正狂热进行着《系统神学》第二卷的写作，新想法和新概念不断涌现，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对同事嘟囔，自言自语：“我必须改进我的系统。”尽管田立克本人非常繁忙，但还是愿意就金的论文中田立克对上帝的想法谈谈，但遗憾的是，金信中说的希望在波士顿见面的日子里，他都不会在哈佛，因为他得写作、到处走动，还要在到哈佛就任前再讲一年课。他信里还说明了自己在芝加哥或纽约的空闲时间。

尽管金在与田立克见面之前就能完成论文，不过单单能和最负盛名的新教神学家见面就已经让金非常满意了。金在黑人教堂和白人教堂世界的顶峰开始了事业。他的“两面性”看起来变成了坚毅和稳重，他对田立克抽象概念的兴趣没将他在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实际范围内追逐权力的天性赶出去。金文雅高贵的举止之下——他的高谈阔论和软呢帽从未缺席——开始只有一些苗头表示金是个稳重的人，他对权力的追求还没有暴露出来。一个苗头是金与德克斯特教堂不太老成的会众交好，这些人发现金从不会问一些让人害怕的问题。“你在做什么？”这句话是对一个人非常友好的邀请，让人们提到一些安息日的情况、俱乐部计划、即将到来的集会以及其他职业身份的甜蜜负担。但这个问题会冒犯一些人，他们只能回答自己在种地或者为白人熨烫衣物，因为他们过的就是这种生活。就连像弗农·约翰斯那样的老农民也问过别人在做什么，还用了一种让人满意的语气——但金不这样做。这位新牧师总是直视会众的眼睛，问他们过得如何，通常还会问一些个人问题，比如他们的健康还有他们的孩子。此外，尽管还有其他要进行的工作，金会一直继续这种对话。有些人珍视这种区别，除了他们，这对别人来说不过是一件小事。

另一个苗头就是金布道的方式。开始，一些老会众抱怨金牧师不是“上帝的使者”，说他不注重拯救，也不描述天堂的装饰。很快，这些抱怨就消失了，而

且，会众逐渐习惯了金的热情。除了保持德克斯特教堂的传统，在演讲中就宇宙潜藏的意义旁征博引外，他还通过凯顿布道中的漏洞释放了之前的高压。此外，金的听众对热情下的思想以及无尽的喜悦和痛苦反响强烈，把它们变成了节奏，又把节奏变成了音乐。金很沉稳，从不叫喊。但他布道时像个想要叫喊的人，这让他 在集会时有一种令人振奋的气场。从小男孩到年纪大的听众，金都有一种圣人的威严气度。才第一年，金就光芒万丈，不仅是在德克斯特教堂，在全国最大的几家黑人教堂也颇负盛名，因为他到哪里都能“博得满堂喝彩”。

1954年11月下旬，金在亚特兰大友谊浸信会教堂进行了客座布道，赞誉的余波越过教堂，传遍了家乡。金成了一股热潮，他的巨大成功让父亲陷入了往常的情感混乱中——骄傲、担忧、嫉妒、爱还有恐惧。12月2日，金的父亲给儿子写了一封信，里面夹着自己结算更正后的支票簿。（尽管金已经结婚离开了家，但琐事还是由父亲处理，因为他父亲精于此道，也在亚特兰大银行业很有威望。而蒙哥马利没有黑人银行。）信以“我亲爱的马丁·路德”开头，金的父亲写了一些埃比尼泽的新闻。“卢埃拉·艾伦的丈夫昨天去世了，”他写道，“我肯定你记得她，她就是那个经常坐在教堂左边，靠着墙一言不发的那个。除了这件事，教堂里其他的事都进展顺利。”接着，金的父亲提到了自己刚刚接到的电话，“关于你周日在友谊浸信会教堂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传达了强有力的信息，警告儿子说成功会威胁到的不仅有诱惑和罪恶，还会带来毁灭。“年轻人，你看，你人气高涨。就像我说的，你祷告时一定很虔诚。你这样的人，正是魔鬼竭尽全力想毁掉的人。”

1955年3月2日，一辆从德克斯特大道开往法院街的巴士靠站停车，几个白人上了车。司机瞥了一眼后视镜，发现白人区坐满了白人，而黑人区和中间的“无人区”都坐满了黑人。司机转身，指着中间的一排座位。“你们站起来。”司机对坐在那里的4位黑人女性说。两位顺从地站到过道，但剩下两位假装没听到，目视前方。司机觉得自己有保护座位的职责，便对那两个无动于衷的女人连

哄带吓。接着，司机走下车，叫来了巡警，而巡警后来又找来了一辆警车，警车里坐着另外两个警察。很快，警察就开始施加压力，让黑人把座位让给站着的白人们。知道抵抗没有意义，他们便想把种族隔离争端变成骑士精神。一个男人遵从了，但没人愿意让出最后一个座位，一个名叫克劳戴特·科尔文的高中生据理力争，她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说的话让两个种族的乘客都有些不满。一位白人女士在警察面前保护了她，说后面黑人区没有位置了，所以科尔文可以坐在无人区。但另一位白人女士则说如果允许科尔文蔑视警察，那“他们就会造反”。警察宣布逮捕科尔文时，她哭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愤怒。警察把她拽下车时，她奋力挣扎；警察给她戴上手铐时，她更是尖叫不止。

4天后，《广告报》刊登了一封信，信中，一位白人乘客说处理巴士事件的警察没有使用暴力，甚至没有提高嗓门。然而，蒙哥马利的黑人却就是否有必要给高中女孩戴手铐而争论不休。对他们来说，就算有让人憎恨的种族隔离法令，科尔文也有权力坐在座位上，她受到了羞辱、责备，司机的心血来潮让她被捕了，而对科尔文以及所有在无助恐惧的沉默中见证了这次逮捕黑人的乘客来说，对法律的执行是让人羞耻的不公平。检察官丢给科尔文一本书，说她违反了种族歧视法令，袭警还扰乱社会治安。她可能得去监狱，而不是去布克·T·华盛顿高中了。

私下里，E.D. 尼克松就科尔文的案件咨询了克利福德·杜尔。这两个人简直有天壤之别：尼克松是黑人，是火车站的行李搬运工，手掌有茄子那么大，还有碳黑色的脸；而杜尔实则是亚拉巴马上流社会的白人律师和罗德学者。他们之间在堂吉诃德式的团体中有广泛的联系，因为几十年来，这些团体都想构建支持人权的网络。E.D. 尼克松是联邦成员，56岁，半生都是A. 菲利普·伦道夫客车搬运工兄弟会亚拉巴马分会的主席。E.D. 尼克松是崇拜伦道夫的。在伦道夫传奇的事业生涯中，他敢因为杜波依斯敦促黑人走上“一战”的前线而抨击他，接着又与普尔曼公司斗争了12年，才让第一个黑人工会得到认可。伦道夫是只老狮

子——高个子、白头发，还很威严，说话时很优雅，带着一点英国口音——尼克松简直是亚拉巴马版的伦道夫。尼克松在蒙哥马利的黑人中很有名，因为他认识所有的白人警察、法官和政府工作人员，还常因为遭遇不幸的黑人找他帮忙而去找那些人。尼克松很少得到支持，但他通常会知道些消息。一次，他挤进了州长办公室，还成了自重建时期以来，第一个为当地政府选举投票的黑人。尼克松没受过多少教育，而且，城里很多受过更多教育的黑人还因为他的缺点中伤他。

在种族问题上，克利福德·杜尔是南方白人自由主义者中冷酷无情的先驱。他曾是新政第二梯队里的智囊团一员，荣耀的过去让他认识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人。比如约翰逊、林顿和伯德女士都是他的老朋友，而杜尔还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雨果·布莱克有亲戚关系。但在杜尔冷战时期反抗最敏感的禁忌时，这些关系都是靠不住的。杜尔辞去了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一职，为杜鲁门调查计划的几个早期受害者辩护。对杜尔来说，忠诚听证会是不符合美国风格的调查，在听证会上，由于联邦调查局匿名举报人提供的信息，无辜的人就被贴上了行为异常或颠覆分子的标签。这一案件让主流政治家疏远了杜尔，而他回到家乡当律师时，情况就更不好了。

和蒙哥马利一个新政拥护者奥布里·威廉姆斯一起，杜尔资助了田纳西州的高地民众学校。20多年来，高地民众学校就是社会福音运动的特别“工作室”，是南方少数几个黑人白人同校的学校。高地民众学校的建立者是迈尔斯·霍顿，他曾是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在协和神学院的学生。尼布尔曾是高地民众学校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而顾问委员会成员有时会包括埃莉诺·罗斯福、诺曼·托马斯还有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杜尔辩称高地民众学校是在种族民主方面明智且爱国的试验，但在对约瑟夫·麦卡锡听证过程中以及布朗案后，他的同盟让他自己、他的妻子弗吉尼亚、迈尔斯·霍顿以及奥布里·威廉姆斯在詹姆士·伊斯特兰的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陷入了困境。平时很明智的杜尔愤怒地爆发了，和伊斯特兰打了起来，他被守卫控制的照片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此后，杜尔

失去了自己在蒙哥马利的大部分客户。他成了没落贵族，耐心地解释着为什么自己认为正是这一系列的事件让他落入如此境地。他的妻子远没有这么宽容。弗吉尼亚来自南方，相貌美丽，有着早期女权主义者的刻薄，早在高地民众学校听证前，就说伊斯特兰是“下流的臭鼬”。

蒙哥马利发生了科尔文被捕事件后，E.D.尼克松和杜尔跟科尔文本人、科尔文的亲属、巴士上的目击者以及刚毕业一年、周末还兼职做牧师的年轻黑人律师弗莱德·格雷会面协商。杜尔认为格雷很阳光、有进取心，也很有前途，他曾就蒙哥马利法庭的怪癖指导这个年轻人，现在，他们权衡了科尔文议案的前景，想把这次辩护变成对种族隔离的攻击。格雷同意为科尔文辩护，并非常想获得成功。

尼克松的第一步是协商谈判。他想和警务处处长戴夫·伯明翰见面。尼克松知道伯明翰是和蔼可亲的平民主义者，和州长詹姆士·“亲亲吉姆”·福尔松风格一样。之后很快，一个临时科尔文委员会成立了，成员还包括新的浸信会牧师——受人尊敬的小马丁·路德·金，这样，尼克松就到了伯明翰的办公室协商，很快就有了初步协议。巴士司机应该对每个人都有礼貌，巴士前半部分是白人区，后面是黑人区，取消无人区，以免司机让乘客离开，让别人坐下。伯明翰说，如果巴士司机采取这种对策，他也会让警察做相应的事。

计划一帆风顺，直到被放在杰克·克伦肖的桌子上。克伦肖是巴士公司的律师，他凭直觉一下就否定了这个计划。如果白人登上巴士，发现里面已经全都是黑人了怎么办？他们会站在过道上吗？如果会，那州法律规定的白人区在哪儿？克伦肖说巴士公司不会同意会被解释为违法的文件，尤其是运营执照马上就要更新的时候。克伦肖说这份计划很卑鄙。如果警察想变更种族隔离法律，他们就应当堂堂正正地改。碰了钉子的尼克松委员会回去找伯明翰，要求他单独执行这一计划，可警务处处长令人痛苦地退后却步了。

这时，克劳戴特·科尔文在简短的审讯后被判有罪。5月6日，大法官尤

金·卡特把科尔文的支持者弄糊涂了，他的裁决可称得上非常狡猾。他驳回了种族隔离的指控，宣布 E.D. 尼克松的计划由于宪法的规定不能上诉至联邦法庭。驳回妨碍治安的指控说明他想要双方谅解。保留袭警的指控——3 项指控中最荒唐的那个——他是在表明自己绝不容忍挑战权威的行为。最后，他判决科尔文需要缴纳一小笔罚款——这一处罚比预想的轻多了，“毁了”她牺牲者的形象。很多支持科尔文的黑人都认为科尔文实在是太幸运了。

即便如此，弗莱德·格雷还是想上诉，但杜尔和尼克松都认为这个案件已经失去了带动力。在黑人领导内部存在着一些混乱。颇具影响力的妇女政治离世会的成员——大部分为金的教堂里社会及政治事务委员会服务——对这一事件中可能的目击者进行了一番令人沮丧的调查。目击者中的很多都非常害怕，随时可能否认自己说过的话。妇女政治理事会的成员报告说，科尔文自己不会退却，但她还不成熟——闲言碎语很容易就会让她崩溃爆发。更糟糕的是，科尔文怀孕了。就算蒙哥马利的黑人愿意为一个未婚先孕的少女挺身而出——当然，他们不会这么做——科尔文自身的状况会让她变得更脆弱。科尔文的一些朋友觉得这种说法高人一等，所以很不满。女性领导人批评当地的牧师没能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施加更大的压力，谈判中也没有更雄辩有力，这是除了官司之外让女性更失望的。而牧师们则拿出律师的意见为自己辩白，律师说不应该用激动的情绪影响审理氛围。最后，E.D. 尼克松做了一个决定。尽管尼克松对自己地区的方言非常敏感，还经常说自己的方言能抵抗受教育更多的人的气焰。尼克松说：“我永远不会把车停在借款商店前面。”他的实用态度大受欢迎。尼克松决定，靠科尔文行不通。科尔文的家人同意这个意见，交了罚款。

那年 7 月，拿到博士学位后的一个月，金飞往新奥尔良，看是否能在迪拉德大学找一份新工作。内战后不久，公理会教友就开立了迪拉德大学，一直受到芝加哥慈善家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及其继承人的资助。迪拉德大学的大楼都是经典的白色，坐落在树木勾勒的大草坪上，那片草坪和斯佩尔曼的一样漂亮。此

外，迪拉德大学的名声和其他南方男女合校的黑人学院一样好。迪拉德大学的校长是 A.W. 登特，是金的父亲在莫尔豪斯时的同班同学，他希望金可以到新成立的劳利斯纪念大学教堂担任主持牧师。在这个岗位上，金可以在宗教系和哲学系教书，而不必受制于普通教职员工的紧张日程。他可以在教堂布道，但不必履行教堂牧师其他枯燥的职责。这种安排对金来说十分理想。从登特的角度看，这份工作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教堂直到 9 月才能完工，学年中任何事都不好开展。然而，金不介意这一烟雾，他想在德克斯特教堂再待一年，而且，他也需要时间思考怎样告诉梅斯博士，尤其是思考怎么告诉自己的父亲。

这么快就找一份教师的工作偏离了金的计划，他原想像莫迪凯·约翰逊、尼布尔和霍华德·瑟曼一样，先做几年牧师再到学院教书。金之所以提前实行计划，是因为他等不及了——不是因为他在德克斯特失败了，恰恰是因为他在德克斯特的成功。父亲的预算系统奏效了：德克斯特已经还清了自约翰斯时期就欠下的 5000 美元，雇用了新员工，还注入了 1000 美元用以建造新大楼。金把德克斯特教堂变成了蜂窝，而现在他知道唯一的问题是：蜂窝不会再变大了。在蒙哥马利第一浸信会教堂如日中天时，传奇的斯托克斯一年内为 1000 人施洗过，金的父亲建立埃比尼泽教堂的时候，从每年为 200 人施洗发展到后来每年为 4000 人施洗，但金在标志性的一年里只为 12 个人施洗过。不到 30 人加入了教堂，其中很多人都是亚拉巴马州年流动人口的一部分。德克斯特教堂要想发展，唯一的方法就是变成所有阶层共享的大教堂，而用新大楼资金做出任何实质性改变的唯一方式就是离开州议会大厦脚下虽有声望但过于狭小的地点。金知道自己的会众绝对不会同意任何一种方法。

金并不满足，决定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当地分会开展事业。在当地分会的一次小聚会上，金做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然后接受了在执行委员会里的职务。他的任命书由罗萨·帕克斯寄来，帕克斯是分会秘书。作为城中心百货商店的裁缝，帕克斯还做些缝缝补补的兼职额外赚些钱。她通过 E.D. 尼克松进入了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因为尼克松在让位给朋友之前，在分会做了5年主席。帕克斯的背景和性格让她牢牢跨在区分蒙哥马利政治活跃的黑人的阶级错误上。要不是亚拉巴马州来的专职人员和上层人士接管了这一组织——他们威胁说要这么做，因为布朗案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带来新的希望——帕克斯可能就会被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政治理事会的人取代了。事实上，帕克斯是尼克松这个圈子里与理事会成员最投契的女士，她戴着无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写信不会出错，自己打字也不会出错，从不会自降身份，参与党派之争。作为工作站不知疲倦的工人和有着中产阶级风度，常去做礼拜的人，罗萨·帕克斯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家公认的给予多于得到的人之一。她的品格体现了人性图像上几个最高标志之一，足以抵消十几个反社会的人。作为卫理公会派教徒，帕克斯扮演着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青少年理事会的教师和母亲的角色，他们都在帕克斯家附近路德派的教堂见面。

那个教堂是三一路德教堂，它本身就很让人不可思议。对黑人来说，三一路德教堂最大的魅力在于其由世界路德理事会作为宗旨支持的附属私立学校。多年以来，这是唯一一家接收黑人学生的体面学校，很多有雄心的家庭对路德教堂死板的祷告仪式忍气吞声，好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三一路德教堂的集会堂比德克斯特教堂的更小，但在教义和崇拜方面却享誉很高。德克斯特教堂的牧师大部分是大学教授，而三一路德教堂的牧师只是几个高中教师。

几年来，尼尔森·特劳特一直是三一路德教堂的主持牧师，他是信奉路德教的黑人，总感觉作为会众很少的教派首领，被黑人宗教的主流排挤在外。特劳特的大浸信会派及卫理公会派的牧师同僚们既不把三一路德教堂当回事，也不把这个教堂牧师放在眼里。特劳特觉得，自己能做的就是让同僚中的几个出席标志着他在蒙哥马利最高成就的仪式——新牧师住所的落成仪式，它就紧挨着教堂。拉尔夫·D. 阿伯纳斯和金一起去了。这两个浸信会教徒经常一起出席这样的场合，特劳特都觉得他们是个组合——鲁莽先生和温和先生。阿伯纳斯想带着金穿过人

群，将他介绍给入选的新人，但阿伯纳斯的方式冒犯了特劳特，因为他一下就对金表现得特别谦恭，却对其他人相当傲慢。特劳特发现和金随意聊天非常轻松，在非常私密的情况下，感到足够轻松时，作为路德派教徒的特劳特问金，他作为黑人浸信会教徒，为什么会叫马丁·路德。金用探寻的目光看了特劳特一会儿，接着笑了，用另一个问题回答了这个问题：像特劳特这样的黑人怎么会成为路德教教徒？特劳特笑了，说浸信会牧师之间的竞争太激烈，而路德教徒正极度需要黑人。

很多年后，特劳特将成为西半球第一位黑人路德教主教。1955年，要离开蒙哥马利时，特劳特没预见到他新的牧师住所带来的社会摩擦——这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继任者会是个黑人。然而，路德教的政策又变了，新的白人牧师罗伯特·格雷茨当年结束了在俄亥俄州的神学院训练后，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传教士分配名单上，他的同事都要去非洲或南美传教——而他被分配到了南部亚拉巴马州的三一路德教堂。格雷茨深感责任重大，在自己的信纸上都印上了一句圣经箴言：“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带着妻子和自己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格雷茨就去了蒙哥马利，他们是和黑人教众一起住在特劳特牧师住所的白人牧师家庭。

格雷茨夫妇马上就发现新地方的社会氛围非常严峻。之前，蒙哥马利的白人允许三一路德教堂的牧师和自己住在一起，向黑人路德教徒布道，这和同意医生紧急情况下去妓院救治的社会原因相同。然而，鉴于格雷茨一家现在就住在妓院，他们不得不放弃了一点自己的可接受性。当地的白人无论在哪儿都躲着他们，无论是在自助洗衣店还是在超市都避开他们。在很多方面，格雷茨夫妇感觉自己就像是黑人一样活着，但白皮肤让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误会。比如，他们总坐在电影院楼上的黑人区，但电影院的主人总担心卖票给他们会触犯亚拉巴马州“赞助”跨种族公开会面的法律而被处罚。（严格意义上说，根据这条法律，格雷茨在自己的教堂布道也不合法。）电影院老板的解决方法是让他们免费

入场。蒙哥马利的检票员很快就认识了格雷茨家的每个人，知道赶紧带他们走进电影院，以此将买票入场的白人的愤怒减少到最小。格雷茨牧师多次想付钱，认为自己不应该从自己的基督徒身上获利，但电影院老板却不肯接受。

格雷茨一家不敢嘲笑这种荒唐的行为。这里的气氛太紧张了。此外，每天的排斥让他们很受伤，一点都不好笑。不只是白人对他们有敌意。三一路德教堂的会众之前很开心能拥有像特劳特这样的黑人牧师。他们中的很多都大肆宣扬说不需要让白人告诉自己该怎么生活。起初，就连那些尽力欢迎他们的人身上都背着沉重的负担，因为对格雷茨一家来说，没什么是自然而然的。除路德教堂礼拜仪式之外的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么说吧，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利用自己最自然的防守方法，他们变得很真诚——特别真诚，就从神职人员的角度看也是相当真诚。在蒙哥马利人际关系委员会的会议上，格雷茨牧师见到了蒙哥马利为数不多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中的大多数，包括杜尔。和格雷茨一样，杜尔也很真诚，其他的人，有的胆小羞怯，有的杰出优秀，还有的受到攻击。朱丽叶·摩根是和善的市图书管理员，到了晚上就成了隐士，把自己和母亲关在黑漆漆的屋子里。在城里的黑人牧师中，金经常参加这种会议，尽管他总是迟到。格雷茨发现金平易近人，总是在自己这个被种族孤立的新人遇到困难时给予支持，还总是问一些细节。他们逐渐熟悉之后，格雷茨认为金作为黑人学生在北方白人众多的地方上学的经历让在三一路德教堂的他看到了希望。

10月，金去了佐治亚州，和沃尔特·麦考尔住在一起，也和他一起布道，其间，一个白人女性登上了高地街的公交车，要求司机让黑人玛丽·路易丝·史密斯起来让座。史密斯拒绝了，之后被逮捕定罪，因违反种族隔离法律被罚款9美元。黑人活动家马上就疾风一般投入了战斗准备，只是E.D.尼克松的公告让这次活动未能成行。尼克松说史密斯不会像春天时的克劳戴特·科尔文一样有号召力。她的父亲酗酒，家住在郊区透风的隔板贫民区。如果打官司的话，新闻记者就会去采访她，尼克松说：“我们站不住脚。”最后，史密斯交了罚款。

尼克松的判断深得人心，但妇女政治理事会抱怨说史密斯的不足之处和案件的本质没有关系。

金回到家，史密斯被捕一事已渐渐平息，他为德克斯特教堂的集会准备了一份正式报告，回顾了就任的第一年，展望即将到来的第二年。这一次，金没有提出新的建议。他简短的说明信说的都是钱的问题。“我想提出一个让你们思考的问题作为结尾，”他写道，“一美元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否能买到这么多？”

一个女孩，3周之后出生了，体重九磅半。金的母亲很快就从亚特兰大过来帮忙。佩特斯博士是主治医生，是个保守派，坚持说母亲生产前或生产后一个月都应该卧床。他允许金的母亲在自己做好的半隔离区内走动，但孩子的亲生父亲只是特殊的探访者，必须遵守医生的规定。通常情况下，金的角色就是高兴地看一眼，逗孩子，抱抱她，招待拜访者但不让他们进去。此外，金还把自己从佩特斯医生和女人们那里学来的知识说给别人听。

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天，只有两件小插曲打扰了这个家庭的幸福。一是金告诉家人自己准备竞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当地分会的主席。柯瑞塔坚决反对，金的母亲也支持柯瑞塔。突然宣布这件事看上去仿佛是为吸引父亲的注意力而使出的花招。金的妻子和母亲说有了孩子之后，他最不需要的就是新工作，尤其是教堂事务和在外布道已经让他经常出差的情况下。妻子和母亲对金想竞选的理由一点都不惊讶，鲁夫斯·路易斯鼓励他去，还说他有希望竞选成功。金一家人商量了很久，其间金与路易斯和 R.D. 内斯比特一直有联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内斯比特的办公室开过很多会议。金的兴趣很快就引起了 E.D. 尼克松的注意，他给金打了电话，说自己管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很多年了，已经准备好有人来接替自己的工作。尼克松说自己欣赏金，但如果他竞选的话会反对他。这种警告和家里人的一致反对最终让金退却了，但他喜欢说自己也许会改变主意来戏弄妻子和母亲。

另一个小插曲与孩子的名字有关。柯瑞塔为了让孩子的名字与众不同，想叫

她尤兰达·丹妮丝。金想给女儿取个简单的名字，说尤兰达发音比较难，而且还会让人想起中产阶级黑人急切地从名字中彰显地位的趋势。柯瑞塔赢了。金给女儿起了“尤姬”这个小名取悦自己，说如果再有个女儿，就给她起个像玛丽·简这样普通的名字。

1955年12月1日，尤兰达两周大的那天，罗萨·帕克斯很晚才离开蒙哥马利公平百货大楼，搭乘平常乘坐的巴士回家。巴士上有36个座位，很快就坐满了，14个白人坐在前面，22个黑人坐在后面。司机J.P.布莱克看到有个白人站在车厢前半部分，就让坐在白人区后面那一排的4位黑人乘客起来站到后面去。没人听他的。布莱克最后只得从司机的座位走过来，强硬地对4个黑人说：“你们最好别找事，赶紧站起来。”之后，3个黑人站到车厢后面去了，但帕克斯说自己没坐在白人区，所以不该让座。她坐在无人区。布莱克说哪儿是白人区是他说了算的，还说帕克斯就是坐在了白人区。因为在他看来，设立无人区就是为了给司机酌情权，让两个种族不要起冲突，而他正在这样做。帕克斯再次拒绝后，司机说种族隔离法律给了他管理无人区的权力，也让他能在紧急情况下行使警察的权力，执行种族隔离法令。司机说如果有必要，他会逮捕帕克斯。帕克斯则说如果你必须这么做就做吧。她还是不为所动。帕克斯说话的声音很轻，在汽车平常的噪声下，布莱克有点听不清。但车厢里的人都没说话。布莱克告诉帕克斯她已经被正式逮捕了。但直到布莱克把蒙哥马利真正的警察带来之前，帕克斯都没有起身。

在警察局，警察做了笔录，让帕克斯按了手印还把她关了起来。这不得不让帕克斯觉得事态严重。在文明社会中越过区分黑人和黑鬼的界限，帕克斯有理由希望这一举动不仅能刺痛黑人的羞耻心，更能引起白人的少许文明的关注。当帕克斯能给家里打电话时，她母亲接起电话，马上就悲伤地问：“他们打你了吗？”

帕克斯的母亲很慌张，给E.D.尼克松的家里打电话求助。尼克松夫人深感震惊，立刻给丈夫在城中心的办公室打电话。那个办公室多少算是他不必四处奔

走时处理民事业务的地方。

“她为什么被捕了？”尼克松问。

“我不知道，”尼克松夫人不耐烦地回答，“赶紧去救她。”

尼克松叹了口气。他妻子下命令的语气就好像他能指使那些白人做任何事一样，比如释放囚犯。然而，尼克松也很着急，因为他知道，帕克斯在监狱多待一分钟，危险就多一分。如果在监狱发生了什么，那帕克斯的事就毫无转圜之地了。尼克松给弗莱德·格雷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但他今天不在办公室。给格雷所有可能去的地方都留言后，尼克松终于鼓起勇气自己给监狱直接打电话，问接待警员罗萨·帕克斯的被控罪名是什么——但被告知说这不关他的事。尼克松挂断了电话，知道事态严重。作为世界知名的黑人领导者，他没享受到应有的礼貌待遇，这肯定说明有人违反了种族方面的法律。

尼克松给克利福德·杜尔打了电话，告诉他自已知道的事。杜尔承诺说自已会尽力从监狱探探消息。很快，杜尔给尼克松打电话说罗萨·帕克斯被控的罪名是违反亚拉巴马州公交种族隔离法令。这是全部消息。杜尔自告奋勇说愿意一起去保释帕克斯，尼克松马上就同意了，还告诉杜尔等他一起去监狱。尼克松在杜尔家门口停车时，弗吉尼亚·杜尔也和丈夫一起等在外面，准备一起去。弗吉尼亚之前雇用过当裁缝的罗萨·帕克斯给3个女儿做褶边裙，所以知道她。后来，弗吉尼亚在迈尔斯·霍顿在高地民众学校的跨种族工作时度假一周，对帕克斯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工作赞许有加。帕克斯做得确实不错，说自己看到了种族之间和谐的新希望。弗吉尼亚·杜尔知道可怕的牢狱之辱落在了这样一个人身上后，很是愤怒。

尼克松签署保释文件时，警察把帕克斯从囚室中带了出来。很快，帕克斯、尼克松还有杜尔夫妇就到了帕克斯家，和她的母亲还有丈夫——理发师雷蒙德坐在一起。气氛很紧张，超过了少言寡语的罗萨·帕克斯能容忍的程度，她讲了事情的经过，也很庆幸至少眼前的危险已经解除了。尼克松深知帕克斯一家的心

情，便和杜尔到旁边他们听不到的地方说话。他询问了杜尔的法律意见：这是不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案件？他们是否能用这个案子上诉以成功废除种族隔离法令？

杜尔详细地回答了，很担心帕克斯的家人。杜尔说在他看来，这个案子唯一的缺陷就是这些指控首先会由州法院审理，而不是联邦法院。但要想移交案件，有很多方法。此外，大环境很有利。这个案件中没有其他的指控掩盖种族隔离这个问题，而罗萨·帕克斯能给白人法官留下好印象。这对尼克松来说就足够了，直觉早就告诉他，罗萨·帕克斯是蒙哥马利黑人象征的不二代表——她足够谦虚，能得到大众的认同，言行举止和衣着打扮也足够庄重，能赢得社会上层的尊重。

尼克松请求帕克斯的丈夫和母亲暂时让帕克斯离开一下，这样帕克斯就能和自己还有杜尔夫妇单独谈话了。尼克松问帕克斯是否愿意打官司，就采用她之前就知道的那种为科尔文和史密斯斗争的方式。罗萨·帕克斯只听了一次就明白了尼克松的意思，但她知道这对自己的家庭来说是重大决定。帕克斯说要和家人单独交流一下，她选择先和母亲谈，再和丈夫谈。这一提议让母亲和丈夫都很烦心。雷蒙德·帕克斯几乎快崩溃了。妻子之前被抓进监狱的事让他刚经历了原始且无助的恐惧，他接受不了妻子主动重新回到禁区的想法。现在，之前的逮捕又被当作偶然事件的希望，如果妻子坚持如此，那就是故意行为了，是政治问题。“罗萨，那些白人会杀了你的。”雷蒙德说，请求妻子不要这样做。

罗萨·帕克斯最终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如果你们觉得这对蒙哥马利来说有用，或者能带来好处，我非常愿意。”她说。之后，杜尔夫妇和尼克松就离开了。那是周四，已到了深夜。睡觉前，尼克松拿出便携式磁带录音机，梳理了一长串需要通话的名单。同时，弗莱德·格雷得知了关于这次逮捕的消息。和帕克斯谈过，同意做她的代理律师后，格雷给妇女政治理事会的几位朋友通了电话，包括乔·安·罗宾逊。罗宾逊是亚拉巴马州一位离了婚的英语教授，是家里12个孩子中最小的，在佐治亚州的一个100公顷的农场长大，父亲告诉她农场是她祖父留下的，而她祖父曾是个富有的白人农民。在众多兄弟姐妹之中，罗宾逊是唯一

读完大学的，于1949年从克利夫兰再次南下。她是在金的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新政治事务委员会工作的女性团体领导人中的一员。和众多蒙哥马利的黑人职业女性一样，尽管自己开车，很少坐巴士，但她对罗萨·帕克斯并不陌生。那天晚上，罗宾逊刚从格雷那里得到消息，就给理事会里最亲密的几个朋友打了电话。所有人对这件事的反应就像消防员收到火灾警报一样。就是这样。

把南方城镇的黑人女性不能在夜里独自外出的规定抛之脑后，罗宾逊和朋友们以批改试卷为由，午夜在亚拉巴马州立大学自己的办公室碰了面。她们起草了一封抗议信。“有一位黑人女性被捕入狱了，就是因为她不肯在公交车上站起来把座位让给白人。”这是信的开头。后来，灵感不断涌现，她们又做了多次改动。“我们如果不采取行动制止逮捕的发生，之后就会继续，”女人们写道，“下一次被捕的也许就是你、我、她。这位女性的案件将在周一审理。因此，我们请求每位黑人周一不乘坐巴士，作为对逮捕和审判的抗议。”她们忙着工作，觉得紧张感不断逼近。由于蒙哥马利的黑人接触不到报纸和收音机，她们意识到通知蒙哥马利黑人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教堂和妇女理事会的联系人，也明白印制这样有煽动性的信件的最佳地点就是她们此时此刻待的地方——亚拉巴马州立大学，用那台油印机。这需要秘密行动，因为正是亚拉巴马州议会为大学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如果白人们知道了州政府雇用的教师用纳税人的钱购买的设施用于谋划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活动，那很多人都会受到严厉处分，资金来源也会被掐断了。于是女人们决定天亮前完成这浩大的工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绝不透露一个字。很快，她们就放弃了晚上睡觉的想法。

罗宾逊决定给E.D.尼克松打电话，告诉他女士们要做的事。大大出乎她意料的是，这通凌晨3点钟打过去的电话很快就被接起来了，尼克松还知道了帕克斯案更多的消息。尼克松早就开始忙碌起来，想在乘坐卧铺车往返亚特兰大和纽约之前安排好帕克斯案的辩护。他立刻同意了罗宾逊想要进行为期一天的巴士抵制运动的想法，说自己也有类似的想法。尼克松告诉罗宾逊，自己打算第二天马

上就把蒙哥马利的黑人领袖召集到一起开会，决定如何打官司，也将决定如何组织抵制运动。罗宾逊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

包括 E.D. 尼克松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事情发生的当晚，在罗萨·帕克斯家进行的长谈仅限于以法律手段反对逮捕的前景，并没有提及抵制，而且没人否认天亮之前，女士们已经写好了号召抵制运动的信件。这些事实证实了金最初的声望。然而，从这一主要争端衍生而来的主观争论依旧存在。尼克松被通俗观念轻视了，金的支持者们也用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他。于是，被这种待遇公开伤害后，尼克松可能就夸大了他的角色作为回应。而蒙哥马利的女性比尼克松受到的忽视更大。

尼克松早上 5 点开始打电话。他先打给了拉尔夫·D. 阿伯纳斯，接着是他自己的牧师，最后是金。尼克松时间紧急，金接起电话时，尼克松都没顾得上问自己是否吵醒了孩子，也没打招呼。反而，他直奔主题，说起了帕克斯的被捕，告诉金自己决定打官司，还说了周一抵制巴士的计划，问金是否愿意支持此事。

“尼克松，”金马上说，“我思考一下再给你打电话。”

尼克松说好。他还得打几个电话，但他告诉金下午想在德克斯特教堂会面。因为德克斯特教堂位于蒙哥马利的中心，镇上各处工作的人到那里都很方便。当然可以，金说——他只想在为尼克松的特殊计划表态前好好想想而已。尼克松再给金打电话时，金自己已经和阿伯纳斯以及其他牧师谈过了。为这一计划表态后，金帮阿伯纳斯给尼克松列出的名单上剩下的人打了电话。

尼克松要打的最后几个电话中，有一个是要打给乔·阿兹贝尔的，他是蒙哥马利《广告报》的编辑。“这是你遇到的最能引起反响的新闻。”尼克松对他保证，让阿兹贝尔和他在火车站见面。阿兹贝尔去了。尼克松穿着白领衣服，戴着服务员式的帽子，以秘密线人的身份告诉了他整件事情，除了罗萨·帕克斯，谁都没提，接着他就跳上了去往亚特兰大的火车。

尼克松在路上时，大约 50 位黑人领导在德克斯特教堂的地下室里集会，对

是否允许争辩进行的讨论时常拖延而且经常陷入混乱，最后，大家多少同意了尼克松提前安排好的计划。人们都着手去散布消息了。金和留下的人成立了委员会，起草新传单，其实是对女性政治理事会早已传播了上千张的那份传单的压缩。“12月5日，周一，不要乘巴士去上班、到镇上、去学校或去任何地方……”传单上说，“如果你要上班，请乘坐出租车、搭车或者走路。”传单的最后一句话上有一条新的信息：“周一晚上7点将在霍尔特街浸信会教堂举行大会传达下一步的指令。”这次会面在一片嘈杂中进行：有人在德克斯特教堂油印机上印制传单；还有人在给蒙哥马利的18家黑人出租车公司打电话，提醒说周一他们就成了英雄；还有些人凑在一起商讨无数的细节。会议午夜才结束。

第二天是周六，蒙哥马利数千名黑人要么已经看到了传单，要么就是已经从别人嘴里听到了消息。三一路德教堂的格雷茨听到了一些传闻，但他对自己教堂教众的不懈追问却没带来什么切实的消息。他毕竟是个白人，没人想告诉他，免得在蒙哥马利犯了众怒。格雷茨备受打击，决定亲自给除了会众之外，他在镇上最好的朋友打电话。这个人把他的教堂作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青少年理事会见面的地方。“帕克斯夫人，”格雷茨开口道，“我一直听说有个人在公交车上被捕了，而且马上就有一场抵制运动。这是真的吗？是谁被捕了？”

先是一阵沉默。“是真的，”帕克斯十分羞怯地说，“是我，格雷茨牧师。我就是那个被捕的人。”

“你？”格雷茨惊讶极了。他马上冲到帕克斯的家，问了一些详细情况。第二天早上，站在三一路德教堂的布道坛上，格雷茨发表了被他自己称为罗萨·帕克斯被捕事件的基督教分析。接着格雷茨宣布自己和家人将关注抵制运动，还敦促会众也这样做。赞同的低语声在会堂里传播。在德克斯特教堂，金也发表了类似的演讲，阿伯纳斯在第一浸信会教堂也是这样做的，别的牧师在各自的教堂也一样。

尼克松乘火车回来了，发现乔·阿兹贝尔写的文章刊登在早上的《广告报》上了，题目是“黑人团体准备抵制巴士”。这并不是报纸上最有影响力的关于种

族的文章。这与佐治亚州轰动的头版有很大区别。佐治亚州报纸的题目是“佐治亚理工学院嚎叫的暴民”，这篇文章冲破了警方在州议会大厦拉起的警戒线，他们反对州长马尔文·格里芬最近的声明：由于佐治亚理工学院队的对手匹兹堡大学队里有一个黑人候补跑位，且糖杯橄榄球赛的工作人员允许匹兹堡的球迷坐在未隔离的区域，所以佐治亚理工学院不能参加马上举行的糖杯橄榄球赛。佐治亚州州长自布朗案后声名鹊起，却发现自己在体育领域进行反对时并不走运。他很快就退却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他最佳的组织机构里的孩子打破了他办公室窗户和门上的玻璃让他受到了震动。

阿兹贝尔关于蒙哥马利的新闻温和多了。“蒙哥马利计划周一抵制巴士的黑人计划在晚上7点在霍尔特街浸信会教堂进行一次‘高度机密’的会议。”他这样开头后，之后的文章都是大大方方从前两次的传单上摘抄下来的，这些传单由白人女士的女仆转到了白人女士手里，再传到了掌权者手里。报道中说，蒙哥马利已经被“铺天盖地的”传单淹没了，霍尔特街浸信会教堂的牧师也表示大规模的集会欢迎所有种族的人参加。阿兹贝尔没多说一次宣传得如此广泛的会议为什么会被在报道中称为“高度机密”的会议。他没必要这么做。因为白人不会参加，而且会议的目的涉及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可能性。这种会议不言自明，都是“高度机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这个词完全颠覆了这个词的本意。E.D. 尼克松不在乎报道的不准确性，也不在乎新闻明显想要警告白人读者这一事实。对尼克松来说，这则新闻是有效的宣传，它将把消息带给更多的黑人。

周一早上，天蒙蒙亮，尼克松就起床了。金夫妇也是。金喝着咖啡，柯瑞塔一直从前窗往外看，紧张地等着第一辆车。柯瑞塔看到透过黑暗的巴士前灯的灯光，马上就把丈夫叫了过来，两个人一起看着行驶过来的公交车。是空的！南杰克逊线的早班车通常都坐满了上班的黑人女仆，现在它的引擎还哼哼着，刹车也吱吱作响，但它只是一个空壳。下一辆车也是这样，再下一辆还是。蒙哥马利的黑人们不顾早上的清冷、对白人的恐惧和他们对工资的极度渴望，把城市公交变成了灵魂舰队。

金惊喜万分，跳上自己的车，看看城市中其他地方是否也如此。的确是。金开着车四处转悠了几个小时，看着公交车载着为数不多的白人从旁边经过。

在新任警务处处长克劳德·塞勒斯的命令下，警车跟在巴士后面，车上的警察头戴警盔，配有短枪。塞勒斯之前在广播的警察专属频道亲自说明了自己的理论：黑人的暴力会鼓动其他黑人不坐公交车。乔·阿兹贝尔在头版新闻里称：“据报道，黑人‘暴民团伙’被组织起来，恐吓今天乘坐蒙哥马利巴士的黑人。”塞勒斯本想让巡警在黑人暴民吓跑乘坐出租车的黑人之前赶走他们。可惜事与愿违。困惑不解的黑人乘客一看见全副武装的白人警察在公交站前走来走去，就不敢过去了，不想卷进什么麻烦事。塞勒斯的这一计划，恰恰吓坏了抵制行动中自己想安慰的黑人们，反而让事情恶化了。警察们迫于官僚主义压力，要逮捕暴民。由于实际上所有的黑人都在抵制巴士，按照他们的领导理论，那所有的暴民都应该在怂恿其他黑人。但暴民在哪里？晚上7点15分，警察逮捕了一位19岁的大学生，因为他正想把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老太太扶进自己的车。警察说这位学生为了不让这位老年人乘坐巴士才让她搭车的，但他们也知道这不是警务处处长塞勒斯说的那种暴民。于是，警察没再逮捕其他人。

罗萨·帕克斯被定罪的早上，弗莱德·格雷递交了上诉状后，E.D.尼克松走出法庭为帕克斯交保释金。法庭走廊上的场景带给他的震撼不亚于凌晨时分空空如也的公交车：大约500名黑人挤在走廊里，人群涌出法庭大门，站在台阶上，大街上也都是人。尼克松认出人群中只有几个人是帕克斯的家属，知道了空荡荡的巴士绝对不是意外侥幸。这次冲撞和配枪警察更为焦虑的眼神一时间甚至让尼克松有些晃神。尼克松让大家散开，保证交过保释金后，把罗萨·帕克斯毫发无损地带出来。有几个声音喊着要是几分钟之内帕克斯和尼克松没出来，他们就涌进法庭把他们救出来。蒙哥马利有了新气象。

所有的黑人领导人早在下午聚在一起讨论晚上的大集会之前就知道了。尼克松、阿伯纳斯和一位卫理公会教派一位叫弗伦奇的领导牧师先见了面，为巴士抵

制事件起草谈判要求，辩称如果不提前做好，那就逃脱不了往常陷入争论的混乱局面。会议主席刚要把尼克松、阿伯纳斯和弗伦奇的想法介绍给各团体时，就有两三个小派别里的人说这些提议应该油印出来发给参与集会的所有人。这样，黑人就不必讨论而投票，在场的白人记者们也不会得知他们的计划。那个小派别里的另一个人建议领导人姓名应该保密，包括在场的诸位。他们一直都在讨论秘密行动和安全的好处，直到 E.D. 尼克松愤怒地站起来。“怎么在秘密情况下进行抵制巴士运动？”他大声问，“我告诉你们，你们牧师之前 100 年都靠这些洗衣女工活着，却没为她们做过任何事。”尼克松威胁说要是他们想退缩，就告诉参与集会的人说他们是懦夫。他谴责所有让女人承受逮捕的打击，自己却像“小男孩”一样退缩的牧师和其他人。“我们一直都穿着长袍，”他说，“是时候脱下来了……如果我们生而为男人，现在就是展现男人雄姿的时刻。”

尼克松言辞激烈的奚落进行到最后一句时，迟到的金来了。也许是为了在大家看着自己这个新人走进来的疑惑目光中有所维护，也许是稳定被威胁的人的心绪，免得演变成灾难性的骄傲之战，金在所有人回应这个长篇大论前开口了。“尼克松，我不是懦夫，”他轻松地说，“我不想让别人把我当成懦夫。”所有的领导人都应该公开行动，金还说，还应该留下自己的名字。

鲁夫斯·路易斯抓住了这一时机。他和尼克松一直相互看不惯，几十年来在班上是对手，还有些个人恩怨。路易斯害怕尼克松的威胁言论是提前计划好想给某人信号，那个人好提出让尼克松成为新抵制组织的领导，由此可见，金的到来太及时了，他的话对尼克松来说既是挑战也是应和。这些念头在路易斯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他抓紧机会，提议让马丁·路德·金当选主席。之前和路易斯商量过的康利牧师赶紧附议。这一挑战后是一阵沉默，各个小教派的成员面面相觑。先是一阵犹豫和讨论，最后没有别人被提名——尼克松没有，阿伯纳斯没有，其他有威望的资深牧师也没有。理想主义者事后会说是金的天赋成就了这一显而易见的选择；现实主义者会嘲笑这件事，说金名气并不大，他最大的优势不过是没

有债务，也没有敌人；愤世嫉俗的人说功成名就的牧师之所以让位给金，是因为看出了这件事里的责备与危险远胜于荣誉。没有一位领导人曾向整个蒙哥马利承诺保证克劳戴特·科尔文得到正义，如果有个人能做到，会获得怎样的荣誉？从长远角度看，压在罗萨·帕克斯身上 14 美元的罚金会给刚刚从私刑中冷静下来的社区带来什么？

选定其他官员和组织的名字——蒙哥马利进步协会后——有人提议说在接下来对要求的谈判过程中，应该暂停巴士抵制运动。他说直到今天，巴士抵制运动都是个了不起的成功，但如果继续下去，人们早晚会麻痹，会重新搭乘公交车，这样，白人们就会嘲笑新的蒙哥马利进步协会，也绝不会再让步。其他发言人也支持这个说法，认为最好把抵制这一武器当作威胁而不是过度使用，浪费了机会。同意之前，这一提议暂时被搁置了，因此牧师们便可以选择赞美诗、祷告词和集会的发言人。之后，所有的提议很快就被整理好了。领导人们都等着看那天晚上会来多少人。

金跑回家，六点多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金欲言又止，告诉柯瑞塔自己被提名为新抗议委员会的主席。然而让他松了一口气的是，柯瑞塔并没有反对这个既成事实，实际上，她平静地说无论金做什么，她都会支持。金说自己没时间吃晚饭了，他半个小时之内得在集会开始前离开，之后，他得在蒙哥马利唯一一个一体化组织基督教青年会资助的宴会上发言。金满脑子想的都是他要在霍尔特街进行的演讲——他作为新的抗议领导人的亮相，这是大家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声音。他走进书房，关上门，琢磨怎么才能用这几分钟构思出一篇重要的演讲，因为平常他准备一次普通的布道都要 15 个小时。金的大脑飞速运转。良心告诉他要回答两份报纸上都提到的一个引起众怒的指责——黑人是从白人公民理事会处学到的抵制策略。而白人公民理事会正用这一方法对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黑人进行严苛的经济报复。金绞尽脑汁地选择正确的词汇，好把巴士抵制运动和非基督教教义的高压区别开。他刚在纸上写了几条，就到了要走的时间。

家里有桌球台，金来自莫尔豪斯的朋友艾略特·芬利开车送他参加集会。金可以利用在车里的几分钟思考。去霍尔特街路上遇到的拥堵让他又有了几分钟，之后又拖延了几分钟，后来他们意识到，车已经开不过去了——教堂被围住了。虎视眈眈的媒体后来估计集会人员有 5000 人，黑人们估计的人数是这个数字的 2 ~ 3 倍。无论精确的人数是多少，教堂里只能挤进一小部分人，马路上还有四处停泊的汽车旁都是人，于是就用上了扩音器，好让外面绵延了数公里的人听到里面的会议进程。克利福德和弗吉尼亚·杜尔一直没能挤进 3 个街区之内。格雷茨是唯一一个挤进教堂的白人支持者——是除了记者和摄影师外唯一一张白色的面孔。“芬利，你看出来了吧？”金打算步行过去时说，“这可能会变成一件大事。”金花了 15 分钟推开人群往前走。不一会儿，霍尔特街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叫他去布道坛。

金沉默地站了一会儿，和无数陌生人打招呼，他们有的聚在窗台上，有的挤在走廊里透过窗户往里瞄，还有的站在凳子上探着头看。金声音低沉，用介绍性的节奏发表自己的演讲。“我们今晚相聚在此——为了一件严肃的事。”金呼吸平稳地说，声音抑扬顿挫。他停顿下来时，人群中只有一两声“没错”附和着，而且声音不大。金看得出人们群情激昂，只是等着听金接下来的话。“我们之所以聚在这里，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是美国公民——而且我们下定决心要得到公民权利——充分得到，”他说，“但具体来说——是因为蒙哥马利的巴士事件。”普遍赞同的低语声传到了他耳中，接着，金的声调渐渐提高，接下来的话短促有力。“这种情况并不新鲜。这种问题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就在前几天——确切地说是上周四——蒙哥马利最出色的公民之一——蒙哥马利最出色的黑色公民之一——但也是蒙哥马利最出色的公民之一——被赶下公交车——被逮捕之后关进了监狱——因为她不肯放弃——不肯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个白人。”

每次停顿，人群中都会传出几声“没错”和“上帝保佑”。他们跟着金的节奏，但激昂的情绪略逊于金。接下来，金说到了法律，说即使有种族隔离法令，

这种逮捕也是疑点颇多，因为黑人和白人区在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说明。“律法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金说着，这时人群中传来一声强有力的“该死，没说清”。“我现在讲话——带着法律权威讲话——并不是我拥有法律权威——而是我知道法律权威支撑着我——法律——法令——城市法令从来没做过明确的说明。”这个例子说明，金作为演讲者，非常小心地处理着各种区别，但听众显然如坠雾中。金又回到了罗萨·帕克斯这件特殊的事上。“既然这种事必须发生，那我很高兴它发生在了帕克斯夫人这种人身上。她的品格无可挑剔，她对基督教的忠诚无可置疑。”说得没错，一小群人应和道。“而因为她拒绝站起来，就被捕了。”金重复了一遍。人们有些躁动，跟着金不紧不慢的节奏。

金稍稍多停顿了一会儿。“我的朋友们，你们知道，终有一天，”他大声说，“人们会摆脱压迫这一铁蹄的践踏。”无数“没错”传回他耳中，这时，个别的响应被逐渐响亮的欢呼和欢呼下的掌声淹没了——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内。震撼人心的声音一波接一波，仿佛永远不愿消逝。就在这一波雷鸣般的声音终要衰弱时，教堂外无数人又一波的呼喊将这一波声音再次推向高潮。巨大的轰鸣声似乎带动了人们的腿——脚踩在木质地板上的声音——直到后来，这种声音变成了其他的东西，与其说能听到，不如说是能被胸腔的震动感受到的东西。巨大的声音震颤着大楼，久久不肯散去。然而，一句话多少让声音小了些，推动黑人应答式的礼拜超越了政治集会，变成了金之前从不知道的东西。灌木丛中有太多只兔子。大家终于安静下来，金的声音再次响起。“朋友们，终有一天，人们会摆脱被扔进屈辱的深渊的命运，他们在那里经受着长久不休的绝望的凄凉，”金宣布，“终有一天，人们会摆脱被推出7月灿烂的阳光而留在阿尔卑斯11月刺骨的寒风中的命运。终有……”金正酝酿着新的排比，但大家的声音压过了他。没人知道这么大的动静是被金触动之后的回应，还是单纯的出于骄傲，因为一个演讲者竟能如此轻松地运用这样的修辞。“我们等到这一天了——我们等到这一天是因为我们厌倦了。”金重复道。

可能是被人群中爆发的力量震慑到了，金马上就转而解释抵制运动下的圈套。“现在，让我们宣布我们不是为了鼓动暴力，”他说，“我们已经超越了暴力。”人群中有个声音说：“重复一次！重复一次！”“我要让蒙哥马利以及全国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基督教徒，”金说，说到“基督”的时候还特意一字一顿的，“今晚，我们握在手里的武器就是抗议。”金刚停下来，人群中就传来声清脆的赞同声。他和听众进入了慢跑的节奏。“如果我们深陷在集权政体的地牢中——我们便不能抗议。但美国民主的伟大光辉就是为了权利而抗议的权利。”赞同的呼喊逐渐减弱后，金开始陈述自己最后一个避免暴力的理由，就是与三K党和白人公民理事会的反对者区分开来。“不能在蒙哥马利的巴士车站燃烧十字架，”他说，“不能把白人拖出家门，扔在路边后杀害。我们之中不能有任何人站出来公开蔑视国家的《宪法》。”

金停下来。教堂里很安静，只有嗡嗡的说话声。“朋友们，”金慢慢地说，“我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决不妥协，我们勇敢而坚定——要在这个城市赢得巴士上的正义。我们没有做错。我们正在做的事没有错。”人群中发出期盼的低吼，大家已经感觉到金的目的呼之欲出了。“如果我们错了——那么这个国家的最高法庭就错了。”金大声喊出来。他已经掌控了全场，声音马上变得稳重而低沉。“如果我们错了——那么全能的上帝就错了！”金喊着，人群如他说到他们厌倦了的时候再次爆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吵闹声漫过来，触碰到教堂的天花板，达到了顶峰。他们漫过了罗萨·帕克斯，也漫过了巴士的律法。金最后的号召融化了对神明的亵渎，到了他的信仰边缘和听众的心头。声音一直膨胀，直到金穿透它，说出了紧张到不可承受的那一点。“如果我们错了——那么拿撒勒的耶稣不过就是乌托邦的梦想家，从来都不切实际！如果我们错了——那么正义就是谎言。”这让人一时难以消化。金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再发表极具震撼力的结尾，在混合着气愤和狂喜的氛围下：“我们在这里，在蒙哥马利——一边工作，一边斗争，直到正义从善如流，直到公正喷涌如泉！”阿摩司的这番话几乎让所有人屏住了

气息。阿摩司是以色列的先知，是卑微的牧羊人。和祭司一样的以赛亚一起，是《圣经》里金最喜欢的正义之人。

金稳定了情绪，开始说团结的重要性、抗议的庄重以及劳工运动的历史先例。相对而言，金的主题比较世俗，但即使金说的尼布尔的观点都很深奥难懂，大家还是跟着他的思路。“今晚，我要告诉你们，仅仅谈论爱是不够的，”他说，“爱是基督教信仰的顶峰。但还有一个方面叫作正义。而正义才是真正的爱。爱用正义惩治那些反对自己的事物。”金说上帝不只是充满爱心的上帝：“上帝也会站在国家前，说：‘安静些，我是上帝——如果你们违背我的意愿，我就斩断你的权力——把你丢出世界的怀抱。’”金的大胆言词溢出来，听众随着他平稳的节奏不断呼喊鼓掌。“站在爱身边的总是正义，”他说，“我们不仅要使用说服这个工具——也要使用高压。”他再次号召大家团结统一、协同工作。他诉诸历史，鼓励听众按他说的做，这样未来的圣人回头看蒙哥马利的黑人时会说他们“具有道德勇气，敢于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金说他们可以做到。“上帝允许我们在一切为时未晚之前这样做。”有人说：“噢，没错。”金说：“我们进行运动时——让我们仔细思考这些事。”

金从布道台走下来时，听众回到了不知所措的沉默中。结尾太过突兀。大家按照布道的规则，都等着金的结论带来的第三次热潮。几秒过后，记忆和情绪才压过了失望。金走出教堂时，掌声不断，人们竞相伸手，想碰到他。德克斯特教堂的会众从未见过金如此随心所欲，十分惊讶。阿伯纳斯之后上台，在布道台上宣读了谈判要求。抵制继续进行。金本应该找时机，但刚才言辞激昂得让他成为公众人物。金发表了第一次政治演讲后，他身上显现出了新的交流能力，让他面对那些对他以及所有先知都又爱又恨的陌生人时能不卑不亢地讲话。金当时 26 岁，还有 12 年零 4 个月的生命。

第五章 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

霍尔特街群众大会过了几天后，在印度那格浦尔附近，一所卫理公会教会学校传出一阵划破清晨寂静的低吼声，听到吼声，一位老师冲了出来想搞清楚事由。结果，当他冲进隔壁小屋时，发现同事詹姆斯·劳森仍然在高呼、鼓掌和跺脚。这种快乐的放纵是他一直忧虑的暴烈言行，而劳森的举动给他敲响了警钟，因为他知道劳森理性人格的本质——这个4岁就戴上眼镜的男人，是个举止出众且绝不喜怒形于色的人物。而现在，即使西奥波利斯破门而入，劳森还在手舞足蹈，这只能和一件事有关，那就是《那格浦尔时报》英文版上的报道——美国一个小城里发生了抵制运动，成千上万的黑人拒绝乘坐实行隔离的公共汽车。

这只是开始，劳森哭着说，这是他长期以来的梦想，是他入狱的原因，是他走遍半个世界要在其发源地寻求的东西，然而，他只发现没有甘地的甘地主义消失在强权政治和口舌之争中。劳森沉浸在那些带有讽刺意味的新闻里——圣雄精神正在爆发，地点就在离俄亥俄州他家南部只有六七百英里的地方。他立即感觉到他将开始了解马丁·路德·金（M. L. King）——这个被《那格浦尔时报》描述为和劳森的年龄、种族和职业一样的人。

在蒙哥马利，深居简出的城市图书馆员朱丽叶·摩根，目睹空荡荡的公交车运行了好些天，她给《广告报》写了一封信。“自从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以来，出租车从来没有像上周在蒙哥马利被利用得如此之好，”她写道，“不过，就在我们的黑人公民乘坐出租车或者从克洛弗代尔中心步行到莫比尔路时，激励他们的，

与其说是拯救巴黎的出租车军队精神，不如更像是甘地精神。”摩根断言，抵制者“汲取了甘地的精神，也从梭罗获得了心灵的营养，而正是梭罗影响了甘地”。她建议她的白人公民同胞重新阅读埃德蒙·伯克的演讲《与美国和解》，并警告他们要反对“法利赛人的热情”。“有人感觉，这些天的蒙哥马利正在创造历史，那是她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时刻。”她总结说。

这最后一句话证明她是有点傻，甚至那些钦佩她有高贵学问的白人也这么认为。不过就是黑人女佣改了一下她们常用的交通方式而已，哪个心智健全的人会把这种事写得比蒙哥马利过去所有的辉煌事迹更重要？摩根的信令她长期饱受年轻人的骚扰，他们向她的窗户扔石头、在街头侮辱她、在图书馆捉弄她。而她反复无常的敏感易变又驱使他们越发变本加厉。过了一年多一点，她被发现因中毒死于家中，显然这是自杀。关于她的死因，白人公民理事会强调她是因为情感脆弱或有心理问题的嫌疑，而黑人就认定她是由于那封“马恩河战役”的信而被迫害致死。

只有极少数和最古怪的人看到了抵制运动中的历史可能性。最开始，为数不多费心给《广告报》投稿的人中，多数是白人妇女，她们只是把这件事看成黑人单纯要求一个过得去的待遇，因而认为这个要求情有可原。一个女通讯员猜测，这场纷争的背后一定有人操纵，但为数众多的种族隔离者并没有为解决问题去操这个心。在其头版社论中，《广告报》把蒙哥马利改进协会（MIA）的主要诉求描述为种族隔离政策框架下的折中——公车座位先到先得，黑人从后门上车，白人从前门上车，取消预留座位。编辑小格罗夫·霍尔劝蒙哥马利的白人干脆利落地接受建议，这事就算了结了。而MIA这种非常中庸的要求又导致一些民权团体，如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对抵制公车运动不以为然，他们把这个运动视为一种野猫运动，对于取消种族隔离没有什么作用。

作为抵制者本身，他们带着宗教激情上床睡觉，但这种激情又总是在第二天早上被冰冷的现实所冻结。他们不得不疲于应付从家庭到工作中的穷亲戚、暴风

雨、机械故障和复杂的倒班工作；工作时间内，他们不能迟到，不能和雇主争执，要避免被解雇；回家后还要面临另外的困境，他们也许不得不找一条往返杂货店的路，然后煮饭吃饭，还要应付孩子和做家务，家里的这些事结束后，可能会在晚上再次走出家门去参加群众大会，最后又如此这般返回家。带着群众大会上被阿伯纳斯“唤醒”和被金鼓舞的激情，他们在疲惫中心满意足地入睡，然后在黎明刺骨的寒意中再循环一遍前一天的过程。在这个大部分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体中，最常见的职业是女佣和散工工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便利且廉价的现代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现在，他们放弃了公交车，但留下的物质和信念上的问题却大得惊人。

公车抵制一天天进行着。蒙哥马利治安专员在第一周就暗示，他将下令逮捕那些收取资费低于最低 45 美分票价的出租车司机，很显然，这是针对救急的 10 美分的票价，因此，“出租车军”注定是在劫难逃。金立即打电话给大学好友、全国浸信会牧师西奥多·贾德森·杰米森，他是国家浸信会联合会的一位领导，地位比金高得多。杰米森与金交情很深，可以直呼金为迈克，他在 1953 年夏天领导了巴吞鲁日市的公共汽车抵制活动，在当局禁止出租车资费减价以及私车提供出租车服务时，他组织了大规模的拼车行动。在杰米森关于那次行动的回忆中，金搜集了每一个关于如何组织一个庞大的拼车系统的有用细节。就在那天晚上，他在群众大会上做了宣讲，向人们解释他们为什么必须坚持抵制运动，又不需要 18 个出租车公司的车资减价支持。金勇敢地宣布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他们可以组织一个类似巴吞鲁日市的拼车体系。要做到这一点，车主必须自愿提供用车，司机必须是驾驶志愿者。没有直接的付费交易，但乘客可以向蒙哥马利改进协会捐款，通过这样的方式，协会可以反过来补贴拼车的费用。

金竭力用最激动人心的演讲向人们描述他的建议，但他知道，复杂的新系统将引发一系列实际问题。富裕的黑人出借给抵制运动的汽车，无疑会遭到破坏、破损、污损，或者被学生司机或乘客滥用。在当时的美国，汽车仍然是社会地位

的主要象征之一，因此，对志愿者来说，把自己的汽车用作公共交通工具是一种患难与共的激进行动。而对乘客而言，却可能因为越来越依赖于比他们境况好的人的施舍而心生怨恨。虽然明白这些事情，但当信众一致应和他的建议时，金还是被兴奋冲昏了头脑。他决定不去顾虑那些问题，而且相信人们会按照他的建议去行动。第一天晚上，150多名车主报名把自己的汽车借给抵制运动。难以驾驭的蒙哥马利各个黑人阶层现在承诺要在日常生活中融为一体。12月8日的群众大会后，数千名与会者无不带着乐观主义的高昂情绪散会，却把最严苛的数学难题留在了前方，或者交给了上帝。每天都有3万~4万黑人乘客拒绝乘坐公交车。就算大幅减去步行者和单纯留在家里的人，拼车体系也还将需要接载2万人，等于每辆志愿者提供的汽车每天要接载130多人。金知道，杰米森在巴吞鲁日市的抵制活动中，即使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拼车系统也才维持两周就终告解体。

在12月8日第一次谈判会议上，在一大群记者、抵制运动参与者和白人观众面前，3位回避与金的辩论。专员“黏糊”盖尔（由于要监督政府员工，他被指定为市长）最后建议谈判各方退下，大家以闭门会议的方式更坦率地进行讨论。谈判中，公交公司的律师杰克·克伦肖毫不退让，坚决不做任何改变，就像他在科尔文案所表现的一样。MIA提出的要求中，有一条相当模糊，那就是要求公交车司机更有礼貌。对此，克伦肖没有异议，但对于MIA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在黑人乘客为主的路线聘请黑人司机，克伦肖说，这是私营企业的事情。至于MIA提出的第三个也是重点要求——公交车座位的安排，克伦肖说，改进协会的计划是非法的。当克伦肖靠着椅背和其他白人谈判者低语时，金认为自己听到的谈话内容是这样的：如果白人在这一点上妥协了，黑人就会大肆吹嘘这种胜利，这将是不可接受的。后来，克伦肖回忆说，他之所以反对改进协会的那个计划，是因为那将可能导致一个黑人男子和一个白人女子腿碰腿挤在一起。4个小时后，傲慢与深重的伤害感使谈判陷入僵局，会议暂告结束。

在12月17日的第二次会议上，金做出了一个让步。MIA不再要求公交车公

司立即雇用黑人司机，而是改为要求公司在有岗位空缺时，有雇用意向地接受合格黑人的申请。在商会的会议室里，3个著名的白人牧师主导了这场棘手的、探索性的协商。被谈判代表乔·安·罗宾逊形容为“庄严、虔诚、几乎神圣”的一位卫理公会牧师，试图以雄辩的演说强调双方共同的宗教价值观，并以此舒缓紧张气氛。然而，到最后，MIA谈判团还是对他失望了，因为他把抵制运动描述为人性弱点的一个夸张反应。的确，他承认公共汽车司机对黑人乘客在行为上表现得粗暴无礼，但他相信司机们对白人也同样如此。灵魂的领域要比公交车的座位更广阔也更崇高，基于这个原因，看到宣讲福音的牧师成了政治运动的领导，他感到非常遗憾。在他之后，长老会牧师亨利·“杰布”·罗素博士（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罗素的兄弟）指出，当一方对另一方施加伤害的时候，用善意的基督教信仰来进行讨论问题，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建议MIA领导人首先取消抵制，建立一个有利于谈判的氛围，这是他由始至终坚持的观点。

第一浸信会教堂的牧师亨利·帕克，试图弥合实质性的分歧（这个教堂与88年前诞生的阿伯纳斯曾经任职过的教堂同名）。他说，这个问题比大多数人认为的要简单得多——从已知的大多数公交车的事件来看，问题都发生在白人座位后面的那一排，由于座位属性的不确定，黑人随时需要让出座位，因而导致了事件的发生。为了消除这种混乱，他建议在所有公交车中安装标志，将前10个座位指定给白人，最后10个给黑人，中间的那些座位则由在专属区域内没有座位的乘客乘坐。金和其他黑人强烈反对这个固定标志的建议，因为令他们深恶痛绝“仅限白人”的标志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从蒙哥马利公交车撤除。白人代表回答说，他们对于任何其他确保消除混乱的建议都敞开大门。他们提请黑人代表团予以注意，MIA的建议存在技术上的缺陷：假设一辆车上就像MIA所设想的那样，从后面往前的座位完全被黑人坐满；在某个站点，10名黑人乘客下车，留下分布零散的座位，此时刚好又有10名白人乘客上车，那么，这些白人乘客将坐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遵守州的法律，确保在汽车上和黑人分开乘坐？因为在这类

假设中不停地兜圈子，双方代表团都疲惫不堪。圣诞节前6天，商会谈判室里白人代表团新来了一个人。有人小声告诉金说，此人叫路德·英格尔斯，是蒙哥马利白人公民委员会秘书。当英格尔斯站起来发言时，金跳起来表示反对，说对方不是谈判委员会的成员。“此外，”金相当烦躁地说，“只要委员会里有公开声明反黑人的成员，我们就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有人回答说，市长已经批准英格尔斯出席，金说，市长没有征询MIA代表的意见就增加己方成员，这样的行为不公平。

金的声明激起了第一浸信会牧师帕克对英格尔斯的辩护。“在委员会里，他有权利做和你同样的事情。”帕克愤然说道，“你只管明确表达你的观点，那就行了。”帕克牵头发言后，其他一些白人也批评金：英格尔斯还未曾说过一个字，就把敌意和不信任掺杂进会议中。这些言论又在双方代表之间，就什么是客观事实、是谁首先发起攻击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吵。每一方都设法推动己方的建议得到接纳，而另一方又总是集体投票表决阻止建议的通过。一些白人批评金控制黑人方面的讨论。他们说他很顽固，是谈判的一个障碍。这一指控弥漫了整个房间，气氛凝滞了，直到阿伯纳斯站起来表态：金博士就是他和所有其他黑人成员的发言代表。于是，谈判在一个相当充满敌意的气氛中继续。最后，金提议休会。他说，白人带着“成见”来开会。

这一次不需要帕克牧师带头反击，白人妇女、一直担任会议秘书的洛根A.希普夫人站起来发言道：“你才是带着成见来开会的人。”她冲着金说话时激愤得发抖。“我绝对不是带着成见而来，你竟然这样说我们，这实在太可恨了。”作为证据，她说她已经决定投票赞成雇用黑人公交车司机。黑人已经可以被雇为司机，她说，毫无疑问，他们也同样适合当公交车司机。一个白人也附和希普夫人说，他已准备投票同意MIA的一些建议。

几个小时后，因为“可怕的内疚感”造成的负担，金离开了完全徒劳无功的会议。他带着期望来谈判，希望能找到更多开明的白人，希望那些人能像克劳泽

神学院和波士顿大学的白人所做的那样，承认他道德主张的合理性；他还希望能把那些顽固白人自我防卫的仇恨暴露出来，这些人就像他在生活中遇到的更加凌辱黑人的白人种族隔离者。可是他发现，白人真诚地认为道德在这个问题上是中立的。他们说白人公民委员会或多或少和 MIA 一样，自然对应一个种族的利益集团。白人曾谈到，一个大国的外交官也可能要为捍卫本国的利益而防备小国。他们的技术手段使金失去了整个人生的道德基础。金愤怒和怨恨的沮丧言辞只会断送谈判，同时还会使更多理智的白人确信，如果眼下确实有一场道德的战斗，那么是他们而不是金他们处于优势地位。由于充满了自责，金打电话给帕克牧师，为他所有的冒犯言辞道歉。接电话的帕克为此吃了一惊，因为他从未听到过金这样的开场白。在电话里，金一开始就表现得谦逊而有风度，并且展示了平等的态度，这同样让帕克吃惊。金的电话令帕克变得有点神经质，在陈述早已准备好的观点时，他只是例行公事地把内容背诵了一番。

帕克没有再提议召开更多的会议，而 MIA 也承受着继续坚持抵制运动所带来的沉重压力。他们打破了巴吞鲁日市的拼车历史纪录，并还在挣扎着往前走。每天的交通混乱略少了些，但压力和疲劳却与日俱增；然而每一次群众大会都有新的内容。为了鼓舞士气，他们选出一些走路上班的女性作为英雄，在以女性为主的群众大会上宣讲。一个比较保守的部长对众人说，一天清早，他看到步行上班的一群女人，她们是那么骄傲和高贵，她们为公平正义而行走，她们终将和女王平起平坐。同样是这位布道者，他还转述了一位老妇人告诉他的话：如果双脚不能走了，她宁愿爬着走也决不乘坐公交车。另一位传教士告诉人们，他努力想让波拉德妈妈坐上车，但这位几乎人人都认识的老太太始终没有上车。牧师宣称，波拉德妈妈没有因为自己年老力衰而置身于抵制运动之外，反而拒绝了他所有恳切的建议。他用波拉德妈妈不经意说出来的一句话来激励大家：“我的双脚是很疲惫，但我的灵魂是安宁的。”这句话成了抵制运动的经典名言。

金走上讲台说，他知道每个人都在担心圣诞购物怎么办。他建议大家共同支

持抵制运动，拒绝到商店消费的同时回归圣诞节的本意。他请大家把计划购买礼物的钱分成3份，一份存入自己的储蓄账户，一份捐给慈善机构，一份捐给MIA。如果他们非得去什么地方过节，那么他们应该探访那些有需要的人，或者去教堂，或者参加群众大会。只要恢复圣诞节的真正精神，人们就可以互赠经久不衰、再多钱也买不到的礼物。

由于黑人拒绝购买圣诞礼物，导致了圣诞销售额的急剧下降，这让蒙哥马利的商店业主皱起了眉头，但他们并不是很惊慌，毕竟黑人的消费额只占业务的一小部分。这种销售额下降的影响效果反而在大量供货商中扩散，而城市公交线路可消受不了这种打击。芝加哥母公司的总部很快就收到了其财务困境的报告，蒙哥马利分公司的几个经理以实际的数字，痛苦地表明了他们面临的财政窘境。从开始，他们就公开声明抵制行动99%会产生影响，但这让蒙哥马利的政客们很不舒服，因为政客们对记者们通报有关情况时总是轻描淡写，把运动的影响降到最低。1956年的第一个星期，公交公司的经理们把即将面临破产的情况告诉了3个城市专员，他们说，白人根本没有行动起来弥补黑人乘客的损失。而无论市长和白人公民委员会如何敦促白人光顾公交车，大多数白人市民都还是宁愿自己开车，而不愿意“爬到”公共汽车上去。因此，公交公司要求紧急加价，专员们别无选择只好批准，但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动机，那就是要确保一件事——这事如果要怪，选民怪谁也别怪到他们头上。

在批准涨价的3天后，大约有1200人在蒙哥马利市礼堂参加白人公民委员会的集会。首先发言的是从阿肯色州来的两位嘉宾，他们告诉观众要发起白人真正的抵制，其中阿肯色州议会成员将共同合作，对那些被确定为参加反种族隔离活动的黑人积极分子，他们将切断其信贷、物资、销售和所有其他形式的经济支持。正当发言者挖苦一些胆小懦弱的阿肯色州商人害怕失去黑人客户的时候，一个洪亮的声音在礼堂后面响起：“我没有任何黑人的客户！”说话的是克莱德·塞勒斯，他是主管警察的蒙哥马利市专员。塞勒斯昂首挺胸地从过道走上讲台，原

来保持安静的人认出了他，顿时，在场的人们一排排地站起来报以长时间的鼓掌。塞勒斯登上讲台自我介绍，他向人们保证，永远不会“拿南方人生来就有的权利交换 100 张黑人选票”。他的话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那天晚上的集会以他戏剧性承诺加入白人公民委员会而达到高潮。第二天，《广告报》头版就刊登了塞勒斯和一名阿肯色州演讲者握手的大幅照片，标题上面写着“塞勒斯获赞白人公民会议”。报道说他“出尽了风头”。

金的父亲 1 月 8 日到德克斯特讲道时，发现儿子处于近乎无法承受的压力之下。抵制运动已经持续了一个月。交通主任鲁夫斯·刘易斯几乎已经把所有的黑人自有车辆拉进了拼车系统，每辆车每天接送乘客在 275 ~ 350 人，并且，如果有车主要退出拼车，也已经无车可替。MIA 的资金也开始入不敷出，这意味着路易斯越来越依赖于好心和善意，人们在群众集会上受到的激励在第二天艰辛的抵御行动中消减。因此，在老马丁·路德·金布道后的第二天，MIA 领导人决定讲和。他们要求和塞勒斯和其他两个城市委员召开第四次谈判会议，这一次是弗莱德·格雷而不是金，提出了新的 MIA 计划。这本身是一个和解的姿态，而格雷符合法律的陈述清楚表明，MIA 正在屈从政府方面关于座位问题上的技术性观点。他宣布，MIA 现在愿意做出重大让步：黑人会主动填补位于车尾的空位，白人乘客则应向前移动填补前方空位。这就意味着，在乘客和上下站人次较多的情况下，两类乘客将要不断地重复再分隔，而实际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座位腾换都是黑人的事情。在一部满员的公交车上，许多黑人乘客都将始终无法放心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们将被迫保持警醒，以便在车尾出现空座的时候起身去填补。但至少，他们不必在空荡荡的白人座位预留区站着，当公交车司机预料有白人乘客将要上车时，他们不会再因司机的命令而不得不起身腾出座位。

城市专员断然拒绝了新的提议。因为存在长远性的技术缺陷，比如，当出现需要换位移动的时候，相关的乘客中谁应该起身的问题就会出现分歧，这时候怎么办？但更强大的反对原因来自政治和心理上的因素。在新建议下，白人乘客将

不得不往前挪动，以便填补前面的空座，同时给站在后面的黑人腾出空间。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法律从来没有要求白人为黑人腾挪位置。城市专员在白人专属座位的问题上寸步不让，他们认为这是种族隔离法律的一个必要条件。他们立场之强硬，在看到了 MIA 的示弱后更是有增无减。

在接下来的 MIA 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委员沮丧地承认，他们没有搞清楚这场较量的本质。问题的解决，如果说它确实曾经可能达成妥协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通过得体的言谈寻求最大可能的妥协。根据会议的正式记录，委员会一致认为，谈判已经失败并转而成为一种长期的僵持，它将检验“哪一方能坚持得更久，或者哪一方被对手拖垮”。这种新的战略形势对 MIA 来说意味着凶多吉少。它可以一直坚守到被迫投降，或者可以尝试发起一场豪赌来谋求力量上的此消彼长，从而扭转步步后退的局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蒙哥马利的黑人面临战略劣势的情况和 1862 年的南部同盟支持者一样，当时北方联盟的勇敢反击造就了南方的传奇人物罗伯特·E. 李和“石墙”·杰克逊。

这种历史转折事件恰恰最合《蒙哥马利广告报》编辑小格罗夫·霍尔的心意。霍尔绝不仅仅是一个小镇的传统白人公民。他蔑视宗教虔诚和大多数的社会正统观念，他行事古怪到用八哥鸟来装饰公寓，并且还弄了个山茶花大阳台。霍尔是一个花花公子，他似乎很享受关于他这个单身汉优雅做派的传闻——他的讽刺幽默、他的苏格兰威士忌、他的音乐收藏，然后凭着杂糅在一起的这些东西迷倒一连串带点野性的年轻貌美的女人。虽然霍尔是在缺乏大学教育的背景下继承报社编辑工作的，因此，他特别珍惜自己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个人形象。他视门肯为偶像——尽管门肯有一个著名的讽刺，说南方这块土地上到处充斥着自命不凡的小丑。乖张的霍尔很乐于以门肯式的言论给南方同胞的特点揪小辫子，当克莱德·塞勒斯在市政会议厅好莱坞式亮相后，霍尔嘲讽道：“总之，蒙哥马利的警察部队现在是白人公民委员会的一个分部。”

1 月份，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抵制运动已经够长时间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

值得关注的新闻就要结束报道，无奈之下，霍尔把汤姆·约翰逊召到他的办公室，向这位年轻记者布置了一项任务：找到“谁在 MIA 的背后”，或许会有黑人告诉他。约翰逊接受了这个令他提心吊胆的挑战。此前，《广告报》从来没有就一个严肃新闻的主题走进过黑人的生活。由于报纸在蒙哥马利的黑人中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约翰逊首先采访镇上的警察以及每一个精明的白人头领。他发现最常见的看法是，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在暗地指挥抵制运动。这个指控无处不在，但又很含糊。进一步调查后，约翰逊发现疑点很有趣地汇集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全程参与抵制运动的工作，但自称没有左右运动的方向。嫌疑人很谦逊，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伪装。对于这个初步的调查结果，在和霍尔讨论后，约翰逊写出了他关于抵制运动系列报道的第一篇文章，文章主要内容谈论的就是牧师格雷茨。约翰逊认为，作为一个白人男子的格雷茨，似乎是唯一有资格担任神秘主脑角色的人物。凭着这个论断，霍尔和约翰逊勇敢地带领自己的读者跨越种族的障碍。

约翰逊的报道“公交车抵制行动的构成”刊登在 1 月 10 日的报纸上，让白人公民第一时间看到了关于 MIA 内部运作的具体新闻，包括 MIA 的运营费用（已经花费近 7000 美元）、拼车体系中的汽车数量（高达每天 350 辆），以及领导者的想法。约翰逊把这些事实组织起来以显现格雷茨的轮廓，但他并没有明确写格雷茨是“抵制行动背后的主脑”。他自己并不相信这些传言，部分是因为他发现格雷茨几乎有一种自杀式的直率。格雷茨对盘问处之泰然，他自愿扮演报道中的角色，不介意被描述为带着孩子般单纯的信仰，全然不顾政治现实的形象。格雷茨后来举例回忆说，他一度被介绍给 NAACP 的沃尔特·怀特，后者称赞他这个年轻白人做了许多事情，帮助推进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事业。“当然，我只是桥梁，”格雷茨告诉约翰逊，“但它适合我。”这样的陈述让约翰逊感到失败（他认为怀特是个“纵火犯”），同时也让他毫不怀疑，格雷茨根本不可能具备暗中指挥抵制行动所必需的阴险狡诈。

接下来的周六早晨，约翰逊按照约定来到德克斯特大街牧师的办公室，金正在那里整理第二天布道的文稿——“如何在邪恶的世界里相信良善的上帝”。第二天刚好是金的27岁生日。在众多记者中，约翰逊最先发现金的外表和言行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得多。金说话不紧不慢并且很正式，似乎要用一道尊严的长城保护自己。约翰逊在笔记本上满满地记录了各种信息，包括《论蒂利希和威曼》这篇论文的完整标题，他回到报社办公室后告诉霍尔，金“不过如此”。得益于编辑的便利，他阅读了本子上记录的金在《论蒂利希和康德》一文中的摘句，甚至还有尼采语录，这被约翰逊当作证据，证明金渴望用哲学上的行话来打动人。但约翰逊又不得不承认，也许这些摘录对蒙哥马利的黑人能起到作用，因为他看到，金已经受到城里一些最年长的黑人牧师非同一般、近乎谄媚的尊重。金在抵制行动中发言的权威性，使他完全可能成为领导人。与格雷茨不同，他似乎具备战术机动能力。金曾告诉约翰逊，作为MIA的领导人，虽然他寻求隔离框架下的让步，但他个人的主张却是“立即实现种族平等”，因为身为一名福音使者，他认为种族隔离是一种邪恶。这样坦率的说法刚好印证了蒙哥马利白人长期以来的观点，他们认为激进的黑人领袖们并不真是为了应对隔离问题，他们在撒谎。

约翰逊写了许多关于金的历史背景，其中包括其外祖父威廉姆斯担任埃比尼泽牧师的确切年份，甚至在威尔·杜兰的《哲学史》中找出“辩证法”的定义，帮助读者弄明白金经常谈到的这个词。在《广告报》上全面刻画黑人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尽管充满敌意的读者可能从中得出推论，认定金是一个自命不凡而狡猾的人，但约翰逊本人相信，文章的语气基本上是中性的，而霍尔却希望它更直白。如果愤怒的白人反对，霍尔将告诉他们，这个城市的祖先装作了解当地黑人的一切，但其实早就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是什么激发了这场反叛？也许是该花时间来学习一些相关的事情了。在这篇文章中，约翰逊明确表态说，自己对金只有一个判断，那就是文章标题：“金牧师是抵制行动的幕后老板”，但在文章中，他模棱两可地说“在蒙哥马利白人社区，人们似乎并不确定公交车抵

制行动直接指挥者的身份”。然后他又说“谁是抵制行动公认的领导者？这个人似乎是牧师马丁·路德·金”。

《广告报》1月19日刊登了约翰逊的文章，正好使它卷入蒙哥马利日渐上升的沮丧和不信任的旋涡。蒙蔽了双眼的人越来越可能因为各种混合在一起的无知和恐惧而争斗。就在同一周，治安专员塞勒斯告诉杰西斯抵制仍在继续，只是因为白人公民的“袖手旁观”。90%的黑人想坐公共汽车，他宣称，但他们不敢，因为他们受到了黑人精英指挥下的打手队的恐吓，这些精英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乘坐公交车。塞勒斯的讲话在报纸的头版刊登，与约翰逊的文章互相呼应，一个流言直接针对金本人，指称其没有资格指挥抵制运动。他是个局外人，白人之间互相传递消息，也告诉黑人说：金从来没有坐过蒙哥马利的公交车，他是个冠冕堂皇的布道者，他最感兴趣的是怎样把名字登上报纸。“那些黑人干的事太可怕了，我们这些黑鬼快过不下去了。”这句据称出自抵制运动的穷人“步兵”之口的话，成了白人群体里到处复述的最佳笑料。

各种神话在种族之间和种族内部的循环散播强化成新的版本，产生了光怪陆离、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些急需女佣的白人妇女忍无可忍，直接到鲁夫斯·路易斯的“拼车载客点”接送女佣，城市专员抓住这件事做文章说，她们的接送行为只是为了保护女佣，使之免受打手队的恐吓，绝不是支持抵制运动。白人对抵制运动的愤怒日渐加强，一些对此感到害怕的黑人都支持 NAACP 保守的想法，建议把案件提交法院——哪怕这意味着是一个挑战隔离政策的激进措施，但其他人则更强力地推进抵制运动，目的就是避免引爆 NAACP 的火药桶。与此同时，城市专员们正专注于一个事实：几乎没有一个公交车的老主顾会对白人说，他们支持抵制行动。普通的黑人市民会对杜尔斯这样的 MIA 支持者说，他们平时乘坐的公交车那天“出了故障”，或者，他们走路是出于健康上的原因，又或者，必要时，他们“就戒掉公交车，留下来坚持抵制运动”。听到这些荒诞不经和自欺欺人的说法，心胸狭隘的城市专员们为了把黑人骗回公交车，他们设计了一个无

耻的政治赌局。

1月21日是周六，这天晚上，一个名为卡尔·罗文的记者声称，他在明尼阿波利市美联社的电报上看到了一则新闻：周日的《广告报》将会透露消息，黑人已经同意结束抵制行动。所有的黑人都将在周一早上回来乘坐公交车。这则新闻说，和解条件已经达成，包括黑人将得到司机更加礼貌的对待，高峰时段启用“全黑人”专用公交车，正常运行时段保留现有的座位安排。罗文曾经到蒙哥马利报道过抵制运动，他很难相信MIA的领导人会接受条件如此之低的解决办法，于是打电话到蒙哥马利，向金核实这则新闻的真实性。

听着罗文阅读美联社电报条上的内容，金感觉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冷静。他承认，他对这样一个交易一无所知。私下里，他担心一些MIA同事可能已经背叛了他，而他还蒙在鼓里。金知道，反对派很有可能私下和白人密谋，尤其是，在公众眼里，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年轻的局外人。通过谈判达成体面的和解，或者长期坚持下去直到迫使对方妥协，这两个方案现在看来都希望渺茫，而他就几乎必然是蒙受羞辱的天然替罪羊。令人窒息的压力可能造成MIA领导内部的失血。但他们是谁？罗文告诉他，《广告报》的新闻并没有明确提及相关黑人代表团成员的名字，只说包括“3位杰出的黑人牧师”。金要罗文打电话给塞勒斯专员，确定这则消息是否属实，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弄清楚牧师的名字。

罗文同意照办。金挂断电话后就一直等候罗文的打探结果。这则新闻选择的时机别有用心，它给蒙哥马利带来的冲击，将分秒不差地在黑人教堂周日上午的礼拜上引发大规模的混乱：大量抵制者会对条件如此低微的条款极为愤怒，而其他人会因为苦难终告结束而高兴，还会因为让白人损失了钱财而自豪。抵制运动本来就脆弱的心理将被击垮，而MIA的领导人也将面临抉择，要么签署和解协议，要么承认这个协议的条款不是他们提出来的。

罗文的电话来了，他汇报说，塞勒斯已经证实了这条消息，但以保密为由拒绝说出3个牧师的名字。罗文能打探到的顶多是牧师隶属的教会：3人分别来自

浸信会、长老会、圣洁会。金立刻把心思扑到这些线索上。圣洁会？罗文肯定吗？在蒙哥马利黑人中，并不存在“杰出”的黑人圣洁会牧师这回事，而且，在MIA领导层中也没有任何圣洁会的牧师。一丝希望在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根据罗文的线索，他也许有可能发现同谋者，除非他们不存在。浸信会传教士为数众多，谁都有成为嫌疑的可能，但长老会的黑人牧师就极为有限，调查可以从这里入手。

经过这样的分析，找到嫌疑人的希望大大增加。金挨个儿给MIA的领导人打电话。他的语气和用词令人感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前所未有的，甚至比拼车系统每天接载两万人还要严峻。于是，在半小时内，所有核心牧师传教士都集中到了金的客厅里。金告诉大家，第二天早上的报纸上将刊登这条令人震惊的新闻。同事们当即的反应让金感到极大的宽慰——他们都认为和解是不可能的，并且都反对和解。这条新闻令每个人警觉，但没有人会对这个新闻潜在的破坏力妥协并束手就范。总之，他们的反应和金当初的反应一样，这说明他们没有背叛行为，从而坚定了金对他们的信任。

当务之急是要把勾结市政委员会的3个牧师找出来。他们在午夜前查出了这3个人的名字，其结果如事前所期望的那样对他们非常有利：与城市专员会面的人既不是MIA成员，也不是有影响力的市民，而是3名农村牧师。他们说，市长盖尔叫他们去讨论还没有详细说明了“保险事宜”，他们到那儿以后，市长就递过来一份公交车解决方案的副本，整件事就是这样。城市专员们厚颜无耻的行为表明：他们正在操纵一个精心算计的赤裸裸的骗局，企图迅速解决公交车问题；如果不成功，也至少可以分化黑人，让抵制行动没法长期坚持下去。集中在金家里的牧师们正面临着一个可预见的灾难性前景——敌人的诡计很可能会奏效，因为专员们为了做这些事情可以动用权力，也有能力搞突然袭击，但黑人缺乏可以和《广告报》对抗的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决定叫醒每一个蒙哥马利的黑人牧师，再加上格雷茨，希望他们在讲坛

谴责《广告报》刊登假新闻。有一半牧师回家打电话通知其他同行的时候，金和剩下的牧师深夜出门，这些牧师承认他们知道乡下各个夜店的位置。这是周六的晚上，罗文警告，黑人的传统聚会场所除了教堂外还有这些地方，金他们能在这里找到大量的同胞。在这些夜店中，有一些气氛很接近舞厅，比如像鲁夫斯·路易斯的“公民俱乐部”，但还有一些群众聚集在偏僻的鲜有人注意的乡下。金这样着装和举止的人绝不会涉足那些地方，只有工人、农民和女佣，才会在那里出入。他们脚踩工作靴，身穿肮脏的工作服，迷失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和味道浓烈的酒水中，时不时浑身汗臭地抱在一起跳舞。当金和那几个古板拘谨的传教士挤进这些声色犬马的地方时，他们不得不尽力把所有人的视线吸引到自己身上来。就像警察突袭或者发生打斗一样，金和牧师们停掉了音乐，清了清喉咙做自我介绍，然后向人们讲述白人妄图通过耍奸计来达到取消抵制行动的目的。金告诉大家，不管第二天早上的《广告报》说什么，抵制运动都将继续进行，他还说，大家要把金牧师和其他牧师亲口所说的话传递出去，让每个人都坚决抵制乘坐公交车，并且，通知大家周一晚上去参加群众大会。金讲完以后，场地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和附和声，在有些地方，金可能还要回答一两个问题，一切结束后，他们就分开人群走小道奔下一个小酒吧而去。

周一上午，就在《广告报》宣布抵制运动已经达成和解后的第一天，街上行驶的公交车依然空荡荡的。公交公司经理的声明很简洁：“没有增加黑人线路。”现实赤裸裸地揭穿了城市专员此前一天公开的厚颜无耻，但他们并不愿意就此接受现实。面对公众的嘲笑，碰了壁的他们又立刻掉转枪口集中火力再次挑起战斗。市长盖尔立即发表声明，由《广告报》的编辑乔·阿兹贝尔在第二天的头版做了报道，后者将其冠以“变来变去的声明”。盖尔首先指责3个黑人牧师口是心非，致使这份他已经批准的周末协议瓦解。他还说，城市专员曾试图“用真诚和诚实结束抵制”，但现在，“是时候坦率地说一次了”，政府“已经懦弱得太久了”。市长又说，黑人认为他们一直“被白人围困在角落里”，但白人“不关

注”“不关心”“不担心”那些抵制公交车的黑人乘客。“对白人来说，黑人坐不坐公交车并不重要，”他重复道，“当黑人们渴望结束抵制，或者有这个可能的时候，我的大门随时向他们开放。但是，除非他们准备结束抵制，否则不会有更多的讨论。”

这番谈话后，市政厅紧接着宣布：弗兰克·帕克斯和盖尔两位专员步塞勒斯后尘，一致同意加入白人公民委员会的行列。第二天，盖尔市长又在报纸头版敦促全城白人妇女停止帮助她们的用人。“黑人都在背后嘲笑白人，”他说，“黑人抵制公交车，白人反对抵制行动却给黑人当司机，这事在黑人眼里，简直是太滑稽、太可笑了。”塞勒斯专员也在同一时间宣布，他已经做出指示，要求蒙哥马利警方对站在街上等车的黑人采取强硬措施。帕克斯专员宣布，几十名商人已经主动解雇了支持抵制运动的员工。3个专员都说，他们意想不到公众对新的强硬措施给予了如此强烈的支持——市长盖尔举起厚厚一沓贺电；塞勒斯说，人们到他的办公室来志愿协助警方；市政厅电话交换机接线员说她快被称赞市长的来电淹没了；编辑乔·阿兹贝尔发现全城白人都群情激昂，有个男人对他说“我倒希望黑人尽管走下去，最好走到拇指囊肿、脚长水疱”。

刚刚还沉浸在周末成功破解危机的喜悦中的MIA领导层，此时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公然对抗城市当局8个星期是一回事，但因此而羞辱他们并在城里的各个讲坛直呼他们骗子又是另一回事。同样是周一，郁郁寡欢的金向MIA提出了辞职，因为他认为，自己领导下的MIA，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机会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了。没有人愿意拿起桌子上的辞呈，因为所有其他有资格接任的人都知道，更换领导人就意味着分裂，而分裂必然导致败局。西伊是最受人尊敬的资深牧师之一，他被大家推举出来挽留金。西伊引用弥赛亚的话说：“你还年轻，在灵性上有很好的训练。”他告诉金：“我将尽我的努力，而你能做得更好。”

MIA执行委员会对金投出了全体一致的信任票。然而，他们接下来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制定新的策略。尽管希望很渺茫，但鲁夫斯·路易斯还

是准备带着一帮人合伙运营一条黑人自己的公交线路，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得到政府的批准，它将有效减轻拼车系统的压力。然而，市政府几乎可以肯定会驳回路易斯对特许经营权的申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隔离主义者的指责，认为他们把公交运营的经济效益分赠给黑人。委员会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如果路易斯计划最终失败，那么，他们将亮出终极武器——就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在公交车抵制运动发起的第一周，弗莱德·格雷就给纽约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律师写过信，并且一直在为诉讼成功的可能性暗中寻求建议，因此，他深知，一旦委员会启动诉讼，就相当于在社会上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亚拉巴马州白人的反应将可想而知。他还和克利福德·杜尔以及本州几位经验很丰富的黑人律师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大家一致认为，联邦诉讼是最有希望的方法，如果胜诉，将可以通过法院下达执行命令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当然要比就罗萨·帕克斯的案子提起上诉要有希望得多，后者正陷在州法院毫无进展。杜尔警告格雷，他的原告一定要立场坚定，否则，白人权威带来的巨大压力，很有可能导致原告撤回诉讼，一旦出现这样的结果，对方紧接着就可以对格雷本人提起刑事检控，指控他犯有“诉讼教唆”罪，或者做了虚假法律陈述。杜尔说他认识的一个黑人律师就是被这样的手段赶出了本州。

联邦诉讼的道路上布满陷阱，数以千计的技术和政治圈套在等着他们。格雷向委员会报告说，诉讼委托人的选择是个难题，他需要那些曾经在公交车上遭受凌辱，并且愿意以原告的身份站出来的人；他至今未能找到合适且其本身也愿意当原告的蒙哥马利黑人男性个体。但他已经发现了几个妇女，包括克劳戴特·科尔文和她的母亲。他告诉委员会，他应该在几天之后就可以立案了。这个案件的提告本身似乎很合法，但要解决它可能需要几年，即使是最好的结果也需要好几个月。对MIA领导层来说，格雷的汇报让他们面临艰难的选择。如果他们取消抵制行动等待最终的法庭审判结果，那么他们当初还不如不发起抵制运动；而如果他们继续坚持抵制行动的话，设立永久拼车体系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将是委员

们第一次要正视的问题，而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已经不堪重负的拼车系统每天都在产生新的裂痕。在这样的压力下，MIA 委员会的成员把票投给了弗莱德·格雷和战略委员会，同意了准备下周提起诉讼的终极建议做出了决定，委员们没有任何庆祝的举动，他们在暗暗预测着他们自己的这个抉择。那个周一，在城镇的另一头，白人市民正举行庆祝活动。在经历了周末的惨败后，白人技术性扳回一城，这足以令他们兴高采烈，而此时的黑人却在哀叹自己成功解救危机之后带来的恶果。抵制运动发起以来，双方每一次行动似乎都因为对方新一轮的反应而相形见绌。事实上，从公交车司机最初对罗萨·帕克斯说的那句话开始，事情就注定会一直这样循环下去。

从第二天开始，蒙哥马利警察到处截停拼车系统的车辆，他们盘问司机、检查汽车的头灯和雨刮、抓住一些小毛病开罚单，而虚构司机的违法行为则是常有的事。拼车司机调整了策略，他们就像驾校新手一样，在公路低速行驶，要转弯时，夸张地早早打开转向灯，但警察还是照样给他们开罚单。乔·安·罗宾逊是一个从言辞到驾驶的每一件事都一丝不苟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收到了不下 17 张罚单——不是因为“太快”就是因为“太慢”。日渐增多的交通罚款变成了政府财政收入，而这些钱本来可以作为 MIA 支撑拼车系统的基金。司机们无不忧心忡忡，害怕汽车保险会被取消，或者驾驶执照被吊销。背后的非议也在增加，一些人说，鲁夫斯·路易斯运作拼车系统的方式太专断，其他人说他对司机太过同情，以至于远甚于对乘客的态度。

1 月 26 日是星期四，这天下午，金从德克斯特教会办公室下班并开车回家，同车的有他的秘书和从莫尔豪斯过来的朋友鲍勃·威廉姆斯。当经过市中心的一个拼车站时，他停了下来接载了几个候车的乘客，这时，两名开摩托车的警察在他后面冒了出来。这时候，坐在金车上的所有人都试图保持正常的乘坐举止，但过了 3 个街区这两辆摩托车仍然紧紧尾随其后。威廉姆斯告诉金，也许可以试试减速蠕行，说不定警察就自行走掉了。但是，警察一直跟到了下一个拼车候

车点，当乘客准备下车时，其中一名警察开着摩托车来到驾驶座一侧的窗边停下，对金说：“出来，金，你被逮捕了。你的车在限速 25 英里的街区开到了 30 英里。”

金惊呆了，他没有抗议而是交代威廉姆斯通知柯瑞塔。金从车里出来，旋即发现自己的前面是一辆电传警车，他低声对自己说：“没事，不会有事的。”即使意识到警车正在驶离市中心，金对警察都没说一句话，恐慌攫住了他：为什么他们不去监狱？离市中心越来越远，警车穿过了一个个的陌生街区正往乡下开去，金的恐惧感也越来越强烈，他仿佛已经看到一群行私刑的暴徒，又感到自己的脖子上已经套上了绞索。当警车在黑暗的道路中拐了个弯驶向对面的大桥时，他的心被恐怖的河水淹没了，吓得浑身发抖的他不得不花些时间来消化前方刺眼的霓虹标志的含义——“蒙哥马利市监狱”。终于，他从潮涌般的恐惧中清醒过来，第一反应就是高兴自己不会死，随后便感到难堪，因为他甚至从来不知道监狱在哪里，还一直以为是在市中心；接着，他又自责，自己竟然因为被逮捕而吓得几乎失去理智，尤其是在他之前已经知道有一些抵制者被关进监狱；最后，当他再次意识到自己也将被关进去的时候，虽然不像刚才般如此惊魂，但他还是感受到冰凉刺骨的恐惧。当他走在监狱的走廊里，闻到监室散发出来的臭味时，最后一层畏惧又翻涌上来。直到走进他的牢房，听到典狱长说：“到了，就是这里，进去，到那些人待的地方去。”他麻木地站着，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铁门关闭的啞啞声，这道铁门成了他人生的分水岭。

他很快从麻木中恢复了过来，当他还在盯着木板条床铺和角落的厕所看时，其他囚犯已经认出了他。而后，金自己也认出了一位因为参与抵制运动而被捕的小学教师。一群醉鬼和普通罪犯拥到金的面前，他们和那位教师都想知道金犯了什么事。进监狱对他们来说不代表世界末日，当然，每一个新囚犯也有各自不同的故事。金的故事还没说完，一名囚犯就打断了他的话，他想让金帮忙把他弄出去。另一个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然后其他人都跟着附和起来。终于，金

大声喊起来：“伙计们，在我能协助你们之前，我要先把我自己弄出去！”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哄的一声爆笑起来。金就是这样一个高尚和平凡混合在一起的人——一半是受过教育的领导者在正式场合的发言，另一半是和所有囚犯一样的“我自己”的哀怨。不过，对他来说，第一次被捕的冲击已经结束。

阿伯纳斯是收到威廉姆斯和柯瑞塔警报后第一个到达监狱的人。他极其迫切地要把金营救出去，于是和强大的警察官僚机构进行了激烈的交涉，但那天晚上，阿伯纳斯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件事太复杂，而且，也来不及当晚就拿出足够的保释金。阿伯纳斯只好冲出来到处讨要现金。他离开时，经过关满德克斯特会员和抵制运动支持者的监牢。看到阿伯纳斯，又看到狱卒跟在后面走了过来，里面的金想，自己就要被保释出去了，同牢房里的其他人也都这么想，其中一人嚷嚷道：“出去以后别忘了我们。”金大声回答道：“不会的！”但他很快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等着他的是做指模记录。他按下了指纹，却打破了希望——他再次回到了监室。当狱卒再次来传唤他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不再抱任何希望。当一大群黑人几乎包围监狱时，他控制住了自己，因为他意识到，这时候感到害怕的不再是他而是狱卒。这一次，狱卒自己为金做了担保，急急忙忙释放了金。在被捕并陷入极度恐慌的几个小时后，金走出了监狱大门，并向一大群祝福者发表了演讲。后来，到晚上的群众集会时，阿伯纳斯才知道这次事件的变化和逆转，于是退还了已经不再需要的担保现金。

金被捕的消息传到了蒙哥马利的所有黑人中，顿时激起了四起的传闻、恐怖的故事和报复的誓言。在群众大会现场内外，挤满了激愤躁动的人群。在会场里，金和其他 MIA 领导人担心，迟到人士可能因为无法挤进这次会场而做出一些暴力的举动。此外，他们还希望分享金的故事，并尽可能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群众大会团结一致的欢乐气氛。因此，领导层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向围在场外的群众宣布，这一场大会之后，将在另一个教会立即召开第二场群众大会。得到这个通知的场外群众立刻散去直奔第二个教会，他们大多数采用了步行的方



式。未几，第二个教堂也挤满了人群，于是，第三个教堂接棒而上。

那一夜，这个场面一再重复上演，最后召开了不下七个群众集会。很多人参加了不止一个大会。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没有人能相信这事真的发生了。以德克斯特会员为主的金的几个朋友和同事互相传话讨论，最后决定，不能再让金开车了，因为这样做过于危险。为了保护他，他们将组成司机和保镖的队伍。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否决金的任何异议，并从当天晚上就开始行动。里士满·斯迈利径自去取来了他的0.25小口径巴雷塔手枪。后来给金当了多年司机的鲍勃·威廉姆斯被那晚的情景深深感动，他在大会后回到自己的工作室，一直工作到凌晨，改编了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合唱作品——《神啊，我只是不能回头》，他在亚拉巴马州的唱诗班当周就演唱了这首歌。

第二天早上，金一醒来就面临新的一天的压力。对他来说，时间在深深的恐惧和激昂之间切换得太快。第二天晚上，柯瑞塔已经睡着了，而他却心潮起伏，辗转难眠。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听着，黑鬼，”电话里传来一个声音，“我们已经对你采取了一切行动，下周之前你会后悔到蒙哥马利来。”金怒吼着挂断了电话。安眠的希望越发渺茫，在头脑完全清醒前，他在一楼来回踱步了一会儿，然后到厨房冲了一壶咖啡。一些打电话来的黑人只是对他的被捕感到好奇，而有些人则是为了抱怨拼车系统。他对打来的电话从来没有指望过什么。电话中传递过来的画面变成种种压力集中在他身上——对白人的仇恨，过重的负担，得罪了正直的中产阶级黑人，有勇无谋或穷困潦倒的普通百姓。他联想到群众大会上人们的声音，眼前浮现讲坛下那一张张兴高采烈的面孔，仿佛汇成了黑色的海洋向他涌来。而电话中黑人的声音产生的效果和群众大会上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景象相反，它带来的压力如同白人的电话让他想起克劳泽神学院的经历。没有也不可能想象要有多么强壮的内心来承载和包含这所有的一切。年轻的金有无限潜能自由思考任何事情，但现实麻痹了他也规定了他，他能思考的事情受到了层层束缚。金坐在厨房里的桌子旁，把脸埋在双手中。他承认自己害怕了，如果人民

想要从他这里寻求力量，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了，到时候，人们就会因为犹疑而动摇。想到这些，他要多大声就有多大声地开始祷告起来，他没有说出神的名字，但把自己心中的疑虑全部坦白了出来。祷告结束前，他说：“我走到自己不能独自面对的地方。”当他说完这句话时，突然间，恐惧开始融化。他强烈意识到，这就是他所谓的“内心的声音”在告诉他，要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奇迹发生了，他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和面对一切的勇气。这是金的人生中第一个超然的宗教体验。那一刻并没有像弗农·约翰斯所说的那种辉煌的景象，也没有听到洪亮的声音，但差别不过是语言描述上的不同而已。金瞬间醒悟过来，同时也证实了他的一个信念，即宗教的本质不是一个盛大的形而上的理念，而是个人的感悟，是立足于经验的东西，在一个人因为处于最脆弱和最崇高的时刻而身陷困境时，它神秘地开辟了超越人类困境的道路。

第二天是周六，金在德克斯特 MIA 的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傍晚。他处理了一堆杂事，其中包括给罗伊·威尔金斯写了一封信，感谢 NAACP 给 MIA 的“资金捐赠”——这是在金公开批评 NAACP 看不起抵制运动之后没多久，NAACP 提供的捐赠。为了他们未来长期的共同合作，金第一次和他尊称为“威尔金斯先生”的著名民权运动领袖交换了意见，这次交流着重于金钱的问题，同时略带怀疑的色彩，并且礼貌得令人窒息。这是危机重重的一天，其中令人警觉的是一个传闻，有情报指出，警方打算突袭 MIA 设在鲁夫斯·路易斯“公民俱乐部”的办事处。那天，金花了很多时间打电话到处寻找备用点，但要在市中心找到合适的地方并非易事，尤其是在蒙哥马利，黑人的自有物业属于稀缺资源。这个情报来得越来越密集，以至于金和其他 MIA 领导不得不在当晚带着公民俱乐部的可靠会员，秘密将 MIA 文件资料搬到各自的汽车尾厢里。第二天早晨，他们又把这些文件悄悄转移到第一浸信会教堂的地下室，而此时，阿伯纳斯正在教堂的楼上做晨祷。几个星期后，E.D. 尼克松在属于全黑人瓦工联盟的一栋大楼里，找到了 MIA 总部的永久活动场地。

在周一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委员投票决定就蒙哥马利公交车的种族隔离提起联邦诉讼。他们都知道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步。为了保证战术的一致性，他们决定通知城市里所有的牧师和他们的教友，抵制运动和发起诉讼各自独立运作。如果政府同意 MIA 目前的隔离政策改良方案，黑人会回到公交车上，并就其他条款继续等待诉讼结果。如果政府想把两件事合起来，即使 MIA 愿意取消诉讼，政府也将提供一个隔离政策的修改方案，那么 MIA 将乐见其成。坦率地说，金和他的同事们对政府不抱希望，并且理所当然地预料他们 NAACP 式的诉讼方式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还会增加市民的敌意。为了与前方可能的灾难相抗衡，MIA 的领导人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愿景：未来，人们就不再需要做技术上的假设，不会再为了什么情况下什么人得起身换座而纠缠不清，黑人将取得全面推翻公交车上所有种族隔离政策的伟大胜利，到那时候，人们想坐哪里就坐哪里，一切将变得非常简单，那就是自由。

那天晚上，阿伯纳斯的教堂里挤满了人，金试图在这个 2000 人的群众大会上向大家做出解释。为了提振每个人的勇气，使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支持诉讼决定和抵制运动，他把看似胜利的远景描述得近在眼前，同时把步步进逼的恐惧驱散。这不是他最好的演讲。他说完之后，波拉德妈妈站起身，慢慢地走到教堂前面。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自从被奉为抵制运动的步行英雄后，一些更心直口快的老人在群众大会上从座席上被接到台上讲话。他们讲述民间智慧，还讲述发生在有权有势的白人家里的日常生活故事——女主人如何为抵制运动偷偷塞给他们 5 美元，同时警告他们不要告诉男主人，然后在那之后的同一天，男主人又塞给另外 5 美元，也警告他们不要告诉女主人，这些发言已经成为群众大会上的一种特殊享受，人们无不为此感到快活并得到灵感。

波拉德妈妈拿出了大家默认和理当享有的权利对金说道：“孩子，到这儿来。”金走过去后，波拉德妈妈当众给了他慈母般的拥抱。“你今天不对劲，”波拉德妈妈说，“你今晚的演讲不够有力。”

“不是的，波拉德妈妈，”金回复道，“没事。我很好，和以前一样。”

“我可不是傻瓜，”她说，“我知道一定有什么不对劲。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了？还是那些白人骚扰你了？”

波拉德妈妈看穿了表面微笑但内心慌乱的金。还没等他说什么，她把脸凑近他大声说：“我一直告诉你，我们始终和你在一起。但是，就算我们不和你在一起，上帝也会看护你。”说完这些，波拉德妈妈一步步慢慢走回到她的座位，这时，人群爆发出轰鸣，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金后来说，正是有了她安慰的话语，他才获得了英勇无畏的能量。

这时，一个传信人向着阿伯纳斯悄悄走了进来，随后，阿伯纳斯冲入地下室，然后再返回，看上去非常担心。金立刻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他意识到一定出了什么事。此时，金正站在教堂前面，捐献盘在人们手中传递着。他看到阿伯纳斯与其他 MIA 牧师在窃窃私语。随后，更多的传信人进来又再被派遣出去。也许 MIA 的记录已被查封？风琴声中，金冷静地看着发生的一切。一对送信的夫妇似乎想走过来，但又因为犹豫而止步不前。最后，一位引座员向金招手，让金走到讲台一侧，想要给他传递消息，但西伊插了进来，他对引座人摇头示意，阻止了他的行为。金见状挥手把阿伯纳斯叫了上来，低声问道：“怎么了？”

阿伯纳斯和西伊互相看了看，然后支吾着说：“你家被炸了。”

“柯瑞塔和孩子没事吧？”

“我们正在核实。”阿伯纳斯痛苦地回答道，他本来想在金开口之前就能得到答案的。

金的内心极为震惊，但在表面上他依然表现得很平静，对于这些天的情绪过载，他几乎已经形成了惯性的应对。金对阿伯纳斯和西伊点了点头，走回到教堂的中心，告诉众人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他不得不先行离开的原因，并劝慰他们都应该平静地回家，众人听到这个消息，有人发出了惊叫声，而成千人都惊得倒抽了一口凉气，金说完话便迅速从教堂侧门走了出去。

快到家的时候，金在不祥的景象和声音中穿行。左冲右突的小男孩们拿着敲断了一半的汽水瓶准备战斗，男人们则挥舞着刀枪，还有人就站在路障前与白人警察对峙，而白人警察则叫喊着试图驱散他们。一个暴怒的男人被警察控制，他挣扎着要摆脱警察，不惜挑战白人准备射击的手枪。在警笛声中，愤怒的嘶吼和叫好的鼓噪此起彼伏，在这些声音背后，夹杂着黑人妇女郑重高唱的《我的国家属于你》。在 MIA 几位领导层的左右护卫下，金踩着前廊碎了一地的玻璃走进了客厅。这时，屋里已经挤满了德克斯特的成员。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一群第一次到金的家里来的人，其中包括几名白人警察、记者乔·阿兹贝尔、市长盖尔、塞勒斯专员和消防队队长。金从他们身边挤过走进里屋，只见一群人正围着柯瑞塔和出生只有 10 个星期的小尤姬。看到金进来，大家让开了座位。金紧紧抱住柯瑞塔，为家人的平安感谢上帝的保佑。然后，他表现出一位指挥官的凛然的冷静。他知道，还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做。扔炸弹的人是无组织的，而屋外的事态却正面临爆发骚乱的危险。他身体前倾，对还穿着睡袍的柯瑞塔低声说：“亲爱的，你怎么还穿着睡衣？”

金回到前厅，从塞勒斯和市长那里签收犯罪现场报告。两位官员都向他保证，他们谴责爆炸事件，并会尽一切力量来惩罚犯罪行为。“听着倒是挺好，塞勒斯先生，”一个命令式的声音在金背后喊道，“但就是你的‘强硬政策’创造了爆炸的紧张气氛。你必须承担这次事件的责任。”说话的是斯迈利，是金在德克斯特的理事会主席，他弟弟就是那位带着巴雷塔手枪给金开车的司机。而屋子里的每一个人人都知道的更重要的一点是，斯迈利身为布克·T. 华盛顿高中的校长，他的职业生涯完全取决于城市专员的态度。

塞勒斯和盖尔没说什么。乔·阿兹贝尔和其他几个白人记者正想离开房间回去发新闻稿。他们都是国家出版物的特约评论员，知道这次炸弹事件会很好卖。但他们却没法走出去，因为屋子已经被愤怒的人群包围，并且都是已经带着武器的黑人。一个怒气冲冲的警察冲了进来说，人堆里有人说，除非金保证一切安然

无事，否则绝不离开。

金走出来站在前廊，举起手来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试图用平静得夸张的语气平息众人的愤怒。“一切都好，”他说，“大家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使用武器，带了武器的同胞请把武器带回家。记得耶稣说过，带剑而生必将因剑而亡。我们不崇尚暴力。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我要你们爱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对他们施以友善。这就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事情。我们必须用爱来对待恨。”顿时，围聚在一起的几百人静静地聆听着金的演说，他们深深被金的话语所打动。“抵制运动不是我发动的，”金说，“是你们大家让我来做代言人。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我想要大家知道，即使我停下来了，运动不会停止；即使我停下来了，我们的奋斗不会停止。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在做正义的事情。上帝与我们同在。”

金后退了一步，和大家一起齐声念“阿门”。但是，塞勒斯走上前来刚一开口，人们才平稳下来的情绪又突然躁动起来。暴乱的人群齐声嘘他。当警察试图厉声喝止他们时，嘘声更响了。

金再次举起了手，“别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他对大家喊道，“请大家听专员讲话。”

塞勒斯重新开始说，他保证为金全家提供警方全方位的保护。市长盖尔第二个发言，他宣布政府将悬赏 500 美元捉拿涉事嫌犯。两人说完以后，金敦促人们解散。“回家好好睡一觉吧，”他说，“回家吧，不要担心。像我和我的家人一样，大家要冷静。我们都没有受伤。我没事，我的妻子也没事。”人群中有人叫道：“让她出来给我们看一下！”当柯瑞塔走出来和金站在一起后，人群开始陆续散去，随后记者和白人官员也离开了。离开的人各自都有自己版本的故事，第二天，这些故事就一遍遍在整个城市传播，有一个传闻说，现场有一个白人警察，他亲口承认，要不是那个黑人牧师，他必死无疑。许多黑人会把金举起手的形象与甘地著名的姿势或者耶稣平静面对翻腾的海水的形象相提并论。而斯迈利的故事则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迅速散播了出去：想象一下吧，一个黑人校长竟然当众斥

责治安专员。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那个漫长的夜晚最令人震惊的事件。

金把受到惊吓的家人转移到布鲁克斯之家——两年前他到蒙哥马利的第一天晚上，先是和弗农·约翰斯做了祈祷，然后一起吃了晚餐，后来就留在那里过的夜。金的父亲和柯瑞塔的父亲俄巴底亚·斯科特先后赶来。距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房门每一次的响动，都让屋里躺着的人惊恐不已。两位父亲一直没睡，他们努力想把孩子们带离此地。金的父亲尤其愤怒。“好了，儿子，”他说，“你该回亚特兰大了。”金搪塞着说，炸弹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不过他必须考虑在蒙哥马利与这件事利害攸关的重要原则。金的父亲打断他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两人都感到害怕。父亲强调运动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种危险比罗萨·帕克斯当时所面对的要大得多。儿子说，是的，这件事的性质现在远远不是公交车座位的问题。与此同时，柯瑞塔也坚决回绝了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回家的要求。两位父亲后来都没有再坚持，金把妻子带到一边，为妻子战士一样的举动深情地表示感谢。金尽力让妻子知道自己有多么需要她，柯瑞塔被深深地打动了。

第二天，也就是2月1日，弗莱德·格雷向联邦法院提交了诉讼文件，恰好也是在这一天，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出，要求把普通邮资从3分钱涨到4分钱。这两个行动同时登上了全国各地报纸的头版，而金的家里遭到炸弹袭击的消息两天后才见报。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当然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但抵制运动也在同一时间上到蒙哥马利以外的社会层面。

2月寒冷的黎明危机四伏。1号晚上，一枚炸弹在E.D.尼克松的院子里爆炸，引来了另一群愤怒的人。3天后，《广告报》报道，格雷的一位委托人说，看到自己被列为原告，感到“很惊讶”，她告诉市长盖尔：“你知道的，我可不想做那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吉纳塔·里斯在市长的一个亲戚家当女佣，此前，两个种族主义者径直找上门来，强迫她做出并遵守违心承诺，在这样的压力下，她崩溃了。自从遭到炸弹袭击以后，警车一直停在金的房子外面，但是，现在却停到

了那位撤回诉讼的女佣屋外。MIA 抵制者把这件事作为一个警示信号，这位女士因为巨大的恐惧而退出了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她成了白人阵营里的人，这样一来，她就比金更值得警察的保护，这就是白人警察迅速对她采取保护措施的原因。然而，弗莱德·格雷却因此陷入了杜尔曾事先警告过的麻烦。

3 天后，白人学生在亚拉巴马大学发动暴乱，在学校执行法令的命令，允许历史上的第一名黑人学生入学。一时间谣言满天飞，有的说，因为一些白人看到奥瑟琳·露西乘一辆凯迪拉克车进了校园，异常愤怒的他们激发了暴乱；也有的说，是因为看到露西用 100 美元的钞票缴纳了注册费。基于这种反应，大学理事会暂停了露西的入学资格，理由是为她的安全着想。为了能够入读这所大学，露西和有色人种协进会合作，与校方周旋了 3 年才赢得官司，但现在，校方竟然控制她而放任暴徒的行径，露西和 NAACP 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再次向法庭提起了诉讼，要求恢复学位。愤怒和困惑的罗伊·威尔金斯在纽约表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发生暴乱这种事。他说，事件本身已经成了其他“常规事件”中的一件，因此，他发现，“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则，它被抹上了油，被润滑，并且一直在发挥着作用”。

在蒙哥马利，骚乱后的第二天，兵役局取消了弗莱德·格雷的牧师缓役。4 天之后，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州白人公民议会在蒙哥马利体育馆举行集会，共有一万人参加了这次被形容为世纪最大的种族隔离集会，在舞台上 3 名蒙哥马利市政府专员成了大会的中坚分子。“我相信你们不会允许 NAACP 来掌控你们的州，”明星发言人、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宣称，“胜利的处方就是南方白人组织起来，要武装起来。”这次集会 3 天后，蒙哥马利的法官挑选了一个特殊的大陪审团来调查城市的种族骚乱，检察官在陪审团面前传唤了超过 200 名黑人证人，为谁是否抵制运动领导人的问题做证。社会上的传言泄露了大陪审团的意图：根据 1921 年的一条法律，抵制运动属于“没有正当理由或法律

的理由”而被禁止的行为，他们准备裁定针对 MIA 领导人的刑事控告罪名成立。在证人出庭期间，因为被指控诉讼教唆，弗莱德·格雷被警方逮捕，并在做了笔录后签字按押。乔·阿兹贝尔在《广告报》上写道，整个城市正濒临“全方位的种族战争”。

金 2 月 20 日去菲斯克大学，为该校的宗教重点周布道，因而逃过了警方的逮捕。在即将卷入金的生活的外地人士中，第一个出现的是拉斯廷，当他还在纳什维尔时，贝亚德·拉斯廷就到了蒙哥马利。他与外地的运动家开辟了“双车道交通”，这个为他带来经验的行动，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黑人教会精神的局限，而后者真正是抵制运动持续至今的精神支撑。拉斯廷是一个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和平主义者，一个流浪歌手，他身无分文却周游世界，是经验老到的非洲和前哥伦布艺术的收藏家和放荡不羁的格林尼治村哲学家。拉斯廷到达蒙哥马利时已年近 46 岁，在此之前，他一直或多或少地过着无业游民的生活，并致力于实现世界和平与种族互爱的理想。对于见到拉斯廷后的第一感觉，阿伯纳斯和尼克松可能会这样描述：英俊高瘦，精力旺盛，阴谋诡计，点子多多，说话滔滔不绝，语调高亢而自得，但带有刺耳的西印度群岛口音。由此可见拉斯廷是个有趣的人物，如果狄更斯或雨果想创作出一个他这样的人物，恐怕也还是得耗费点脑力的。

拉斯廷 1910 年出生在一个黑人膳食供应商家庭里，是家中 9 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西切斯特市，有一条宽阔而绿树成荫的街道，拉斯廷家 16 个房间的豪宅就坐落在那里。不像脏兮兮的姐妹城市切斯特（克劳泽神学院所在地），西切斯特市拥有开明富裕城市的所有优点。拉斯廷家的房子还是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贵格会的礼拜会地点。拉斯廷就是在那里接受了完整而进步的教育实验。拉斯廷知道这栋豪宅并非属于他家物业，但他一直没弄明白他们究竟是如何搬进去的。通常的回答是，白人“并不需要它”，但喜欢在其附近有自己喜欢的厨师和餐饮服务商。也有人认为，拉斯廷母亲的娘家人是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后裔，他们曾经状告本镇很久以前收回了自己继承自祖先的财产。无论如何，

关于他家房子的渊源，拉斯廷永远无法找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哈登当总统那年，拉斯廷 11 岁，这个早慧的孩子赢得了太多的学校比赛，因而招来同学的嫉妒，他们奚落他，说他是爹妈是谁都搞不清的家伙。这些对拉斯廷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但更多关于他家庭的嘲笑和质问却颠覆了他的整个世界。一直被当作大姐的佛罗伦丝，其实是他的母亲；而他的母亲和父亲，两位没有受过教育的膳食供应商，实际上是他的祖父母；他的其他兄弟姐妹实际上是他的叔叔阿姨。自从他出生以后，所有的家庭成员一起创作了一部小说，一部关于非法的孙子是合法的儿子的小说。此前，家里对佛罗伦丝的男朋友很有争议，也对这个人视若无睹，但现在，当年轻的拉斯廷试图重新调整自己的情感时，他突然醒悟到，他必须把这个男人以继父的身份来看待，这是他要面对的最大的情感震荡。这个人，就拉斯廷所知，和他长期不见踪影的亲生父亲一样，因为是一个西印度群岛人而颇具争议性。美国黑人向来厌恶来自那里的移民，讨厌他们的傲慢、他们的英国口音和他们极端的肤色意识。拉斯廷听着黑人称西印度群岛人“猴子猎手”长大，他努力控制自己对那些人的偏见，包括同一屋檐下的那一位。震惊之下的第一反应就是更仔细地听新继父讲话，结果，就在几周之内，他居然捡起了那个华而不实的西印度口音，并从此伴随了他一辈子。

大学时，拉斯廷因为抑郁症和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中途退学，出了校门的拉斯廷去了哈莱姆的亲戚家并住了下来。他在餐馆当侍应，在街角卖唱，谈爵士乐，谈革命，为白人做私房菜，去城市学院上免费的夜校，剩下来的就是锻炼自己的生存艺术，他就过着这样的生活，直到 1931 年。那一年拉斯廷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拉斯廷的音乐才华在 20 世纪 30 年代得到了蓬勃发展。忠实于国际劳工联盟精神的拉斯廷学到了一种惊人的歌种，这种歌混合了工人歌曲、英语牧歌和经典民歌。在纽约的咖啡馆，他找到了为民谣歌手利德贝利伴唱的工作，然后和乔希·怀特（Josh White）一起旅行了近两年。他每到一处就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吸

收新团员。拉斯廷的个人素质使他堪当组织者的理想人选——他的演讲或歌唱能吸引观众，会熟练地写作小册子，还能主持召开会议。因为无所畏惧、自由独立，并且既能够与白人也能够与黑人和睦相处，年轻的拉斯廷迅速成长为共产党的招募员。

1941年6月，拉斯廷提出了辞职，又开始了独自漂泊的生涯。

几个星期后，他获得了与客车搬运工兄弟会总裁 A. 菲利普·伦道夫见面的机会。而在此之前，拉斯廷还一直鄙视伦道夫。现在，突然之间，伦道夫这位最激进的黑人领袖，已经公开威胁，如果罗斯福总统不颁布命令，禁止在国防工业中执行种族歧视政策，他将于3月份在华盛顿发动大规模的游行。基于拉斯廷的才华，伦道夫给了他一份3月份华盛顿运动中的临时工作。后来，罗斯福做出了妥协，签署禁止国防工业种族歧视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伦道夫让拉斯廷到和解协会（FOR）去面见 A.J. 马斯特。于是，年轻的拉斯廷以和解协会秘书的身份开始了职业生涯，他成为四处游走的甘地主义者。和解协会的领导人意识到，只要希特勒不停止战争，他们到哪儿都招不来和平主义者。于是，他们决定强调反殖民运动中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这些争取黑人权利的活动家，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跷跷板习惯，他们突然在甘地主义的圈子里脱颖而出。战争期间，FOR 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组织，名为种族平等大会（CORE）。就像年轻的黑人詹姆斯·法默一样，拉斯廷同时为 FOR 和 CORE 工作。他们都膜拜《战争没有暴力》的作者、甘地的游历门徒克里希纳拉尔·奚里哈兰尼。这本书成了 CORE 的半官方的“圣经”，奚里哈兰尼让大眼睛的年轻美国人知道，甘地主义政治并不要求过沉闷禁欲的生活，他们无须避忌喝醉酒、抽雪茄、追女人这类行为。

但它确实需要做出牺牲，由于贵格会会员有一个不合情理的特权，即可以在医院承担战争义务，但拉斯廷于1943年放弃了他的权利，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被关进了路易斯堡监狱。在获释后，他成了解放印度委员会的头领，并屡屡因为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外示威而被捕。1947年，拉斯廷加入了

CORE 发起的乘坐公交车穿越南部联邦的行动，以此来检验最高法院的一个新的裁决，即在州际公交路线上，不能强迫黑人乘客坐到公交车的后面。怀有敌意的白人以殴打来应对挑战，然而，拉斯廷他们却因违反当地种族隔离法而被定罪。他们一路展示诉讼案例，直到有一天罗伊·威尔金斯把“自由乘客”叫到他的办公室说，NAACP 律师不记得他们的跨境公交车票放在哪里了，但这是至关重要的证据，因此，他呼吁这次行动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否则“你们都将变成戴锁链的囚犯”，威尔金斯说。车友们顿时哗然，他们指责本地有色人种协进会官员在压力下崩溃了，但拉斯廷却以甘地主义的立场表示，愉快地接受惩罚也许可以是比合法规避更好的结果见证。“如果我们起步了，那么我们就得继续走下去。”他面带微笑对威尔金斯说。囚犯经历过后，他应甘地的国会党的邀请去印度旅行了6个月；而后又到了非洲，在那里，他和克瓦米·恩克鲁玛这样的年轻非洲反殖民主义者一起工作，并为支持南非抵抗运动成立了委员会。他的旅行故事成为甘地主义知识分子的圈内传奇。

拉斯廷遭受了更多囚禁和一些殴打，有一次在新奥尔良，他被打掉了几颗门牙。1951年6月25日，他率领混杂着宗教理想主义者和FOR成员的一群人，为抗议朝鲜战争而从中央公园游行到时代广场。途中，有一名路人被他们的演说激怒，以至于夺走了他们的示威标志，扯掉了标语牌，并挥舞着棍子冲向拉斯廷。拉斯廷冷静地递给该男子第二根棍子，邀请他两根棍子一起上。那男人一下子蒙了，他不知所措地扔掉了棍子，但后来他对另一位游行者劈头盖脸地砸下他的拳头，而拉斯廷则兴奋地对路人大叫说，这是非暴力的力量在接受打击。

他也许刚刚才进行了一个庄严的演讲，然后就可能突然露出一副龇牙咧嘴的笑脸，并说他得出去把什么人“甘地”进来，好给咱们的游行弄些钱。他有强烈的荒诞主义意识，还有恶搞的天赋，这两个天赋加上他把加里·格兰特的口音改得怪腔怪调而显得更加突出。在格林尼治村放荡不羁的文化中，这都是被人们大加赞赏的魅力。他常常在白马酒馆喝酒，和他一起的有狄兰·托马斯、诺曼·梅

勒以及其他文人，回到他的公寓后，他又会用大键琴自己伴奏，给大家唱些晦涩小调。他的个人生活是个谜，甚至连他的大部分朋友都不了解，但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个同性恋。这种倾向性观点也许适合或解释拉斯廷生活中的古怪之处，比如，他有为公园大道的富人烹饪美食的爱好，再比如，有几个人持续地赠送他金钱或者艺术品礼物。在那些年的格林尼治村里，同性恋本来并不会引起什么轰动，但拉斯廷还是开始陷入公开的麻烦中，他的政治同僚担心，在他的心灵深处可能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冲动。

几个类似的事件使得 FOR 面临被卷入公共丑闻的威胁，马斯特对拉斯廷和其他 FOR 的高级领导人说，他爱拉斯廷就像爱儿子一样，但如果再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他将别无选择，只能解雇拉斯廷。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再发生什么事。但是，1953年1月21日，拉斯廷和其他两名男子在一辆停着的汽车后面被捕，地点在加州帕萨迪纳，他们被判犯有道德罪，必须接受30天的监禁。拉斯廷第二天辞去了 FOR 的职位。刑满获释后回到纽约的拉斯廷成了落魄到谷底的人，他失去了马斯特圈子里领导层的信任，包括所有那些能使其为世纪斗争而奋斗的能力。拉斯廷的人生被击溃，他成了无业游民、私生子、黑鬼、前科犯和一个同性恋，无论从哪个社会标准来衡量，他都不合格。但拉斯廷坚信他不仅可以挽救自己，还可以用积极的道德观影响整个国家。对他来说，这是来自宇宙的逻辑，是时代的浪漫。他先于其他人看到了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中的机遇。

拉斯廷坐车离开纽约出发去蒙哥马利，同一天，金到达纳什维尔参加菲斯克大学宗教重点周的活动。拉斯廷选择的时机很微妙。就在那天早上，拉尔夫·D·阿伯纳斯收到城市专员和一群白人商人所谓的最后通牒：如果黑人即刻接受他们此前拒绝了的和解条件，所有参加了抵制行动的人面临的将是“没有任何报复”；如果仍然拒绝和解调解，那就让法律来说话。阿伯纳斯猜不到其中的意味，因为整个镇都在疯传大陪审团已经归还了一大堆刑事起诉书。因为没有可供讨价还价的结果，他只好走到外面告诉记者说，现在能提供的消息不外乎隔离和公交涨

价。“我们已经在寒风和冷雨中走了10个星期……”他说，“现在天气转暖了。我们会继续走下去，直到我们的父母官出台更好的建议。”

这都是给公众听的大路话。阿伯纳斯立刻召开了执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目前一切都进展极为良好，大家都同意这一点，但是，如果领导人和拼车司机全都进了监狱，抵制运动还可能进行下去吗？那些白人到底打的什么算盘？大家一致认为，白人想对抵制运动实施“斩首行动”，他们最想抓的就是金。这是个令人颇感心安的想法，但没有人说出来。倒是几个人说，就算失去了金，他们也会坚持下去。一时间，空气中充斥着逃避的气息，因为房间里的人谁也没有被逮捕过。最后，西伊像着了魔一样站起来，他对大家说：“我们都知道他们想要把我们和金博士分开。”他说：“金也知道。他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不安。我知道这个危险随时随地会发生，但我要说，让我们一起去坐牢！”

这些话在房间里炸响。一位正向门口走去的牧师收住了脚步，然后他打破了沉默，说道：“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提问，但它遇到的是一个情绪上的反应——委员会成员和旁观者都腾地站了起来对西伊表示支持，一种故作勇敢的声势让所有关于战术和步骤的谈话都变得不着边际。那天晚上，他们一致决议，要在圣约翰 AME 教堂举行一个大型群众集会。这个将有4000人参加的集会的任务是，对政府给出的结束抵制的条件进行投票，票面只有接受和不接受两个选项。

第二天早上，阿伯纳斯将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用电报正式通知全市的 MIA。此后没多久，贝亚德·拉斯廷就敲响了他的房门。阿伯纳斯很赏识拉斯廷提供的一些参考意见，但除此之外，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谈话在一片嘈杂声中进行——信使不断地进出、警卫在走廊上急速地走动，因此，阿伯纳斯恳求拉斯廷不要长时间讨论抵制的事情。他还建议拉斯廷把酒店的窗帘拉上，门紧锁，房间的灯也关掉。

尼克松给了拉斯廷更长的接待时间，这是因为他没有 MIA 领导那么忙。此

外，尼克松迅速和拉斯廷建立了信任和融洽的密切关系，因为 A. 菲利普·伦道夫是他们共同的恩师，拉斯廷的蒙哥马利之行也正是得益于伦道夫为他筹的款。阿伯纳斯周围的人几乎都处于战时状态，对此，尼克松解释说，那是因为他们预料执行官现在随时可能开始围捕被起诉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拉斯廷很温和地给了一个更加甘地主义的建议，类似于给攻击者递上一根棍棒。那天晚上，离开尼克松后，拉斯廷走到南杰克逊街看了看金的房子。为了保证安全，泛光灯已经沿着屋顶串接起来以照亮房屋四周。虽然志愿者站在屋外守着，但金和他的家人在城外，而拉斯廷早就学会了接受自己的失望。

那天晚上阿伯纳斯往纳什维尔打电话，他最后告诉金说，大陪审团已经发回了该市史上最大批的起诉书，这事确定无疑了。执行官、检察官和白人记者已经在法院里忙了一整天，现在到处都在说，他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第二天就要开始收网。金答应阿伯纳斯，第二天第一件事就是回蒙哥马利。他马上订购了先到亚特兰大再到蒙哥马利的机票——他去纳什维尔之前先把妻子和女儿送到了亚特兰大，本来打算让她们在那里住上一个星期。接下来，他取消了在纳什维尔剩下的日程安排。当第二天的早班机在亚特兰大降落时，他知道，在他可能走入蒙哥马利未知的监狱深渊之前，必须先得通过来自家庭的严峻考验。自炸弹事件以来，母亲已经卧床三个多星期。至于父亲，老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自己的儿子应该去德克斯特。因此，金知道，这场危机来得简直糟糕透顶。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巧合是，金的父亲将要签署一份促成 15 万美元贷款的法律文书，这笔资金将用于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的建设计划。在 1956 年，全国没有几个牧师有足够的信用去筹借这样一笔款项。一段时间以来，作为老金本人描述的教堂计划的核心部分，他一直在做工作，而且，在老金的心目中，这个很有野心的数额只能多不能少。在亚特兰大机场大厅里，当金走向情绪低落、脚步沉重而缓慢的父母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毁了本来应该是他们生活中值得骄傲的一天。

从机场开车回布尔瓦家中的路上，开车的老金爆发了。他怒指儿子根本就不

应该回蒙哥马利。第二天早上，他们的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那天的蒙哥马利《广告报》报道说：115名黑人令人难以置信地同时被起诉，警官们开始了大规模的围捕。这条新闻连亚特兰大的电台都做了播报。老金说，他已经和他的亚特兰大警察局局长朋友——赫伯特·詹金斯谈过，并得知蒙哥马利侦探曾经到亚特兰大来，希望能搜集到可以借机逮捕金的旧案。詹金斯说，蒙哥马利当局想把金赶出亚拉巴马州。“这事太严重了！”金爸爸说。在这件事冷却下来前，儿子至少应该留在亚特兰大，在这里，他能得到黑人强有力的支持，甚至还有一些很有权势的白人支持他，比如警察局局长詹金斯和市长哈兹菲尔德。

像往常一样，金听任父亲自说自话。老金说，他肯定自己是对的，但考虑到儿子的疑虑，为保险起见，他事先邀请了梅斯博士和其他一些最受金敬重的人士下午到家里来。这些有一定身份并且具有成熟的判断力的人个个都很关心金，因为他们从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了。为了他自己，金也许会愿意听他们的话。当这个议题摆出来时，金同意留下来开一个高峰会议，尽管推迟出发意味着会错过到蒙哥马利的转机航班。

在约定的时间，金家聚集了梅斯博士、亚特兰大大学校长鲁弗斯·克莱门特、当地非洲卫理公会（A.M.E.）教堂主教、《亚特兰大世界日报》的编辑以及6个奥本大街最有影响力的富人。金的父亲重申了关于他们的利益的讲话。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他比他开车回来时变得更加情绪化。在场的那些人都轻声表示同意。金对此一点也不奇怪，他知道，以他父亲的精明任性，持不同意见的人原本就不会被邀请。接着，到会的领袖们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发言支持老金，直到金痛苦地打断众人的发言。“我必须回蒙哥马利。”他说，朋友们被逮捕、被抓进牢里的那一刻，他怎么能躲在亚特兰大？

房间里顿时静了下来，终于，当着大家的面，老金哭了。那天，他本来是要和这几个人交流那笔六位数的保证金的，但现在，他在寂静中的呜咽声又使寂静更加折磨人。金带着哀求的眼神向梅斯博士看去，后者随即开口说，也许年轻的

金有自己的观点，在座的人也许可以把自己的影响力发挥起来，保护在亚拉巴马州的金。他的话从多方面打开了紧张局面，尤其是给大家指出了可行的做法。在场的一名律师跑去打电话给黑人律师第一人——瑟古德·马歇尔。他很快就带着好消息回来了，马歇尔给出了重磅承诺，他将投入 NAACP 的全部法律辩护基金为年轻的金抗辩。马歇尔的承诺和其他人的保证使老金平复了情绪，但他随即又说他要亲自回蒙哥马利去支持儿子。他会陪儿子去坐牢。老金又恢复了常态，但与此同时，他又被困住了，至少在时间上他就赶不上，航班时间表已经让儿子等不及了。老金要走，但还有贷款的事情要处理。而且，他不想坐飞机只想坐车，但问题是，他既不想让金开车，也不想自己开车，还不想让各自的妻子开车，总之这都太危险了。他得找个司机，然后在早上出发。

因为在亚特兰大的种种耽搁，金错过了蒙哥马利一场别开生面的戏码。按照抵制诉状，第一个要被抓捕的就是 E.D. 尼克松，但还没等警官上门，他就按照贝亚德·拉斯廷的建议，走进了县法院执行官的办公室里，说：“你是不是要找我？好了，我来了。”警官们困惑地面面相觑，然后迎接尼克松入狱。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他完成了笔录，按了指纹，拍了照，然后交保释放。法院里，一些黑人在到处乱转，尼克松微笑着刚一走过去，他的壮举就口耳相传开始在蒙哥马利的黑人中传开了。尼克松已经把被捕的恐怖过程改而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在牙医手下过一遍要快得多还一点也不疼。不久，尼克松的老牧师庄重地走进法院，新闻快讯说，实际上他已经让执行逮捕的警官成了大家的笑柄。

这样的行为牵动了连锁反应。一发生什么事情，马上就会传得人人皆知，这又引来更多的被告和看热闹的观众。一些带着微笑来的人是被迫的，但在离开监狱的时候又总是真诚的。当人群增至数百人后，掌声和鼓励的话就开始振奋情绪。那些已经交保出狱的人建议其他人想法尽快汇出 300 美元保释金。那些被警官抓捕的人，比如阿伯纳斯，穿过人群时，和人们又是挥手又是拥抱的。很快，警官撒出去的法网就要空了，因为如此之多的黑人都自愿走在到市中心来的路

上。笑声开始在人群中渲染。有个笑话传得到处都是：一些爱刨根问底的黑人打电话询问，在得知自己不在被捕名单上时，他们倒反过来心里不痛快了。一些白人警官被这种善意良好的幽默感染，自己也开始享受起这种氛围来。眼看着刑法精神被逆用，警长巴特勒恼羞成怒，他跑到外面大吼：“这不是杂技表演！”但他的举动全无效果。监狱的那扇门，几个世纪以来都只会令人联想到恶臭扑鼻的囚室和不堪言状的暴行，但现在正变成一个光荣的通道，走在这条道上的罪犯，如同好莱坞首映式上的明星们一样，变得声名显赫。

拉斯廷在幕后乐得呵呵的。事态继续发展，出现了保释金短缺的局面，这对那些还未被逮捕的抵制者形成了威胁，因为这可能导致他们得不到迅速释放。拉斯廷说服一个朋友给他电汇了一笔 5000 元的贷款，然后把这笔钱都移交给了尼克松。那天的工作结束后，拉斯廷像前一天晚上一样出去散步。但抵制者劝告他说，蒙哥马利当局正迫切要找到一个“局外人”，他们指责这个“局外人”造成了目前所有的麻烦。拉斯廷没有听从劝告，这一次，他去了吉纳塔·里斯家——这位四面楚歌的女人已经把自己从 MIA 的诉讼原告名单中撤了出来。两辆警车仍停在她家外面。拉斯廷走上前去，对值班的警官轻描淡写地说想看望里斯太太。不用说，对方谁也没见过或者听过眼前的这个人，他们小心翼翼地盯着拉斯廷。最开始，他们询问拉斯廷只是怀疑这个人可能想伤害里斯太太，但后来，拉斯廷说得越多，对方就越想追查他的身份。他们疑窦丛生的问题构成了威胁，因为他的真实身份可能使 MIA 曝光于丑闻中。“我是贝亚德·拉斯廷，”他昂首挺胸站直了，大声说，“我是来这里为《费加罗报》和《曼彻斯特卫报》工作的记者。”拉斯廷在这头大加渲染这两份报纸在法国和英国的重要地位，警官在那一头把这些话都做了记录。然后，为了能和里斯太太聊一聊，拉斯廷又花了 10 分钟，在一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交谈后，拉斯廷终于把里斯太太的大门“说”开了，而结果证明，其实并不值得费那么大的功夫。“我必须得那么做，要不然我就活不到今天。”她告诉他。

翌日早上9点，金家老小到达了蒙哥马利牧师公馆。迎接他们的是电视摄像机和一群抵制者——这群人还沉浸在前一天从监狱里出来时的兴高采烈的情绪中。几分钟后，金和父亲以及阿伯纳斯就出发去法院，后面还跟着一小队德克斯特会员。路上，阿伯纳斯向他们介绍了县监狱里的程序（和金一个月前关进去的市监狱相反）。他还介绍了自己的被捕情况，并且认为这是他经历过的最棒的一件事。再次面临坐牢的金简直没法相信他的话，而完全大惑不解的老金压根就不信，直到他亲身经历了法院里的节日气氛：众人热烈欢呼他们3个人的到来。金又经历了一次入狱的过程，不过，这次的拍照多了个环节，那就是脖子上挂着7089的监狱号牌直垂到胸前。走完一遍程序后，跟着就被释放的金随即被他的追随者围在中间。他是第24个做笔录的牧师。

按照尼克松和阿伯纳斯的建议，金邀请拉斯廷参加当天晚上的战略委员会的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从那天晚上起，群众大会从此改为祷告大会。当时的想法是希望借此扶持人们的宗教承诺以应对未来长期的严峻考验。他们还决定，每次集会的议程都将围绕5个祷告来组织，这5个祷告的主题中包括为非暴力的精神力量祷告、为坚持走下去的身体力量祷告，以及“为所有那些反对我们的人祈祷”。甘地的方法被直观地体现在工作计划中，拉斯廷对此印象颇为深刻。他私下里告诉金，自己走遍世界各地，还没有见过哪里的运动能够比肩在蒙哥马利发生的这场运动。他想帮助金把这句话传递出去，尤其是在信仰非暴力的人们中间传扬。这样将会有很多人撰写文章介绍这里的事情，抵制运动将筹集到更多的基金，人们会得到专业的技术培训。诚然，他意识到“外来鼓动者们”会面临很多危险，尤其是北方人，但如果金认为他在幕后工作更合适，那么他愿意这么做。金第一次注视着拉斯廷说，所有可能得到的帮助他们都需要。

拉斯廷去了阿伯纳斯的教堂，晚上的群众大会在那里举行。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教会下午四点多就挤满了人群，他亲眼看着众人唱圣歌，然后花3个小时为自己祈祷。会议开始时，迄今被逮捕过的90个人全部走上教会讲台。瞬

间，大多是平民百姓的观众全都站了起来，在滚滚的欢呼声中，家长们纷纷带着孩子走上去触摸英雄。金说，抵制的精神属于“所有人，所有白人和黑人”。阿伯纳斯宣称，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抵制运动的团结一致足以证明，它“不是一个人的表演”。两位领袖感受到运动所得到的巨大支持，他们提议把第二天当成感恩日，大家不拼车、不坐出租车、不开私家车，每个人都将走在“双P日”（“Double-P Day”）的路上，明天，将同时是祷告和朝圣的日子。

那天晚上的大会并不比以前的所有大会更有激情或者内容更多，唯一的区别是，现场多了35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第一次，蒙哥马利的公交车抵制运动吸引了特派通讯员的新闻队伍。但是，让拉斯廷倒霉的是，没有一个记者认识这个来自《费加罗报》的男人，倒是有几个记者认识这个在格林尼治村名声如雷贯耳的人物。当他们几个和《广告报》的主办记者聊起这事时，后者不断与当地警方联系，这样一来，对拉斯廷身份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事情变得严重起来，以至于有传言说，为了调查他，还把电话打到了巴黎和伦敦。

拉斯廷清楚地知道这些险恶的迹象。他打电话给在纽约的FOR执行董事约翰·斯旺姆尼，向马斯特和其他领导传递了紧急信息。拉斯廷向他们描述自己在蒙哥马利的所见所闻，并说MIA的人在非暴力方面既有天赋又不成熟。（说到后者，就像一个展览，拉斯廷脑子里浮现出他第一次到金家时的情形：一个人看到他，立刻端起沙发上已经上了子弹的手枪，拉斯廷大叫着阻止了这个人的进一步动作。）这些人必须有一个合格的非暴力主义者来教导他们。现在全国包括拉斯廷自己也就只有四五个这样的人，他告诉斯旺姆尼说，可悲的是，他不会在那边停留太久。他知道自己没有权利对老东家有所要求，但他恳求斯旺姆尼相信他的判断，并派专人坐下一班飞机到蒙哥马利来。

拉斯廷参加了周六在德克斯特的礼拜仪式，然后花了一个晚上在金的家里详细了解抵制运动的历史。柯瑞塔记得几年前听过拉斯廷在安提克发表的演讲。无论是她还是金都对拉斯廷左翼政治运动的悠久历史不予置评，但金讲话时头头是

道的样子和马斯特一样。他告诉拉斯廷说自己试图实践非暴力，但他不赞成马斯特式的和平主义，因为他认为不可能存在一个连警察权都没有的社会。拉斯廷对此只是含糊其词地支吾了一番，但尽管如此，金所表达的内容仍然不是他所期望的蒙哥马利传教士的观点。

拉斯廷在敌对的两个阵营里都处境糟糕。尽管他对 MIA 人们的爱在不断增加，他越来越多地想象自己能在抵制运动中发挥作用，但他的处境在一小时一小时地恶化。有消息传来，白人们正在议论说，《费加罗报》从没听说过拉斯廷这个人，报社正悬赏追查骗子的身份。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个有影响力的伯明翰黑人记者得到消息说，拉斯廷就在城里。由于掌握了拉斯廷的底细，他冲进了正在召开的领导碰头会报告说，白人肯定能查到他的资料，然后用这些信息来诋毁抵制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现在，拉斯廷成了一个交叉火力点。周一，有消息指出，白人可能会以欺诈或煽动暴乱之名逮捕他；而那位知道内情的黑人记者则要求 MIA 领导把拉斯廷赶出城去，否则就要在他供职的报纸上掀开拉斯廷的老底。拉斯廷进退两难。过去，他曾是 FOR 的一名成员，但是现在，他渴望扮演新的角色，那就是一个以独立非正式身份成为非暴力主义战术策略家，他已经变得相当迷恋于这个愿望。随后的场面简直就是西部片的浓缩版。格伦·斯迈利来到蒙哥马利替换即将离开的拉斯廷。匆忙之间，颇为伤感的拉斯廷简要介绍了抵制运动的情况，然后把这位相识了 15 年的老友介绍给了金，一切结束后，在金不得不把拉斯廷藏在一辆汽车尾厢里偷偷送到伯明翰以前，拉斯廷打起精神强颜欢笑和大家道别。

和拉斯廷一样，斯迈利也曾有过入狱的经历，同样是因为坚持和平主义而拒绝为“二战”服务，后来，斯迈利也是以 FOR 成员的身份四处旅行。但是从外形和气质来看，这两个老朋友相互之间就完全不同。只要不是谈及暴力或种族的话题，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斯迈利无论言谈还是举止，都是个温和的白人卫理公会牧师。到蒙哥马利后，斯迈利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纽约的汽车牌照都换到了佐治

亚州，他给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撤掉他家周围的枪支。斯迈利认为，金最突出的个性就是他的倔强——无论他有多么害怕，他都会在随后几乎是愤怒地把恐惧弃置一旁。“别跟我玩花样，”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就想知道是否可以让我的内心非暴力。”在这种时候，斯迈利就会为自己给不出更多甘地主义的建议特别困扰。在以后的4年里，他随叫随到地在蒙哥马利进进出出，并且常常赶来参加午夜召开的MIA战略会议。4年里，始终不变的是，金总会在深夜两三点钟跳起来说，要是他们不去弄些灵魂食物回来，主的工作没法继续。而斯迈利自己，令他和亲戚们惊讶的是，他居然学会了吃猪耳朵三明治，而且还爱上了它。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路德教牧师罗伯特·格雷茨身上。

金第二次在蒙哥马利被捕的那一周里，内阁秘书马克斯韦尔·拉布召见非洲裔美国黑人供职白宫第一个人E. 弗雷德里克·莫罗，由于莫罗屡次向拉布提交备忘录，希望敦促总统公开赞成废除种族隔离，拉布对此厌烦不已，干脆把莫罗召来狠狠地数落了一番。他说，最让他感到气愤的是：明明艾森豪威尔已经做了所有民权方面的工作，比如，在首都的公共设施几乎全都废除了种族隔离，还有，在布朗案中对NAACP的立场给予了官方的支持，但黑人选民似乎还是更喜欢伊斯特兰和伯德的民主党。他指责黑人选民们不领情，并说自己现在很反感整件事，不打算再为这种事冒险了。

莫罗像往常一样咽下反对意见退了回去。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的莫罗，之前曾是CBS-TV的公共关系专家。来白宫后，他提出要在白宫秘书组那里找一个秘书，结果只来了个哭哭啼啼的马萨诸塞州女人，说她过来只是为了引证其天主教信仰的义务。自从莫罗来了以后，女性员工们都严格执行规定，决不孤身一人进出他的办公室，以免招来不正当性行为的怀疑。小心谨慎的莫罗已经在白宫上班近9个月，但还没有正式宣誓就职。这又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话题。莫罗和其他所有人都知道，由于他的存在，政府已经从黑人媒体处得到了赞誉，但如果他也履行宣誓就职这个传统仪式，就只会在白人选民中产生负面效果。（莫罗不会为另

一个3年职位宣誓。政府为他举办了一个私下的、未经宣布的、没有总统见证的仪式，这个仪式对其此前的工作具有官方追溯力。)

被拉布数落过后几天，艾森豪威尔的幕僚长、密友谢尔曼·亚当斯把莫罗叫进了办公室（莫罗正是经亚当斯的聘用才得以进入白宫的）。亚当斯又开始担心种族问题了。前一年是密西西比州——爱默特·提尔被私刑处死一案就轰动一时，除此之外，还出现大量性质稍轻的暴行，正是因为这些种族事件产生的政治压力，才促使他雇用莫罗。而今年又在亚拉巴马州出事。一位联邦法官废除了亚拉巴马大学暂停奥瑟琳·露西学籍的决定，其唯一结果就是校董会第二天就永久开除了露西。这起案件是一系列疯狂行为的集中体现；露西还没有入学就先是被暂停，而后被开除学籍。亚当斯担心的是暴乱的前景：亚拉巴马州的白人在吹嘘骚乱已经“产生作用”，它已经恢复了隔离；至于黑人，最新的FBI情报报告表明，共产党的影响在扩大。亚当斯说，黑人领袖还不够成熟，控制不了暗藏的暴动。莫罗没有争辩。他敬重亚当斯为人的亲切厚道，但并不代表他认同亚当斯对公民权利问题上的长远观点。事实上，莫罗知道，在那些敦促艾森豪威尔在民权问题上尽可能不作为的人中，亚当斯是其中最强势的人物。

实事求是地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在民权事务上，在谢尔曼·亚当斯和司法总检察长赫伯特·布劳内尔之间，存在着—场争取总统立场的斗争。布劳内尔提出了国会讨论新的民权法案的计划，对此，总统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956年3月9日提交一份有关种族分类通报，届时，政府将在内阁会议上讨论决定是否批准、修改或取消这个计划。事实上，自重建以来，还没有这样的立法得到通过。

胡佛和助手们带着一堆画架和显示图表来了。他窥探了黑人发起抗议的内心世界，但措辞使用曝光秘密式的语言，其分析不仅肤浅而且错误连篇。关于蒙哥马利的情况，他们不仅描述得极为粗糙，说错了几个日期和法律，还歪曲抵制运动的性质。然而，内阁会议室没有人比这些人了解得更清楚，但又有什么关系

呢，反正事实本身就不是最重要的。从政治的角度上说，胡佛在政府两派之间的缝隙里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他没有表达对民权运动的同情，却在整合者中挑出危险分子来绘制令人震惊的画面。作为一个很明显将发展为颠覆性事件的例子，胡佛向内阁报告说，芝加哥市市长理查德·戴利差不多等于公开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直指总统在爱默特·提尔被私刑致死的案子上，没有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赶紧说，戴利市长不是共产党员，”胡佛严肃地补充说，“但他却要承受共产党人设计出来的压力。”这些评论暗示了政治上的险恶，胡佛说，共和党的民权立法将反映共产党的影响力，但他的话到这里就戛然而止。相反，对那些由激进种族隔离主义者制造的反黑人暴行，他允许美国联邦调查局提出最严重的指控。特别对密西西比州的情况，他含糊其词的方式把那里的白人公民议会描述为新型组织——这种组织“要么可以控制不断上升的紧张局势，要么成为令紧张局势可能显现的媒介”。总的来说，他的表现为布劳内尔的计划留下了足够的政治空间，但任何反私刑立法除外。胡佛带来的FBI的一份图表显示，自从1939年FBI开始对私刑开展非正式调查以来，私刑的数量已经从每年20件下降到每年不足3件，显然，胡佛不想在这方面承担正式的法律责任。

布劳内尔迅速在内阁发表讲话，他的计划是要提交法案创建一个独立的公民权利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致力于收集涉嫌侵犯投票权和对黑人进行经济报复的事实。此外，该法案将在司法部创建一个民权分部，加强总检察长的法律地位，从而在联邦法院谋求执法投票权。布劳内尔结束演讲后，农业部部长埃兹拉·塔夫脱·本森和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马里昂·福尔瑟姆就先后发表了反对意见的陈述。本森是想等到共和党控制国会时再提交法案，而福尔瑟姆则说，任何超越事实调查委员会的机构和行为都是不明智的，因为它将“预设”它的调查结果。

总统打断会议的发言。“你们觉得总检察长跑得太远了，那么他快在哪里呢？”他边问边答道，“在我看来，这些建议都是改进措施。”和往常一样，他的话转移了辩论的基调。跟着，一些人刚就法案的实用性提出异议，布劳内尔立刻

就请求允许继续进行讨论。“好吧，”艾克说，“但是，请用冷静和理智来陈述你的文稿。应该也愿意倾听这些声音的，是众多正直的人而不是极端分子。你要像在最高法院一样陈述简练。注意态度，别把自己变成第二个萨姆纳（美国社会学家，代表作《社会阶级间的负债》）。”

谢尔曼·亚当斯在内阁会议上可能赢得的最大胜利就是延迟法案的提交，布劳内尔为了获得最终许可，他必须把一整套历史性法案带回白宫讨论。而在此期间，《南方宣言》的发表却使亚当斯受益。该宣言等于颠覆宪法的整合，并对整个地区承诺将发起激烈的反抗。签署该文件的议员中，90名是南方国会议员，其中包括全部南方州参议院议员；但是，在南方民主党议员中，两名来自田纳西州的自由派议员埃斯蒂斯·基福弗、艾伯特·戈尔，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得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不在其列。约翰逊私下说，宣言的唯一作用是，把黑人的选票推到北方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的阵营中。在白宫，亚当斯就是希望看到这一点。他设法削弱几个布劳内尔的建议，并确保其依照重大法案的惯例提交给国会时，人们确信它只是来自总检察长，而不是来自总统的立场。

《广告报》的编辑格罗夫·霍尔断言，政府大规模的控告是“蒙哥马利史上最愚蠢的行为”。从当地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行动事与愿违，反而重新提振了抵制者的士气，严重削弱了监狱长久以来给黑人带来的耻辱感，而在过去，监狱本来是控制黑人的一个社会性武器。这才只是个开头，接下来的日子里，由于被政府这种大规模的诉讼行为吸引，成群的记者蜂拥而来，他们对事件的各种报道激发了规模巨大的公众支持，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从遥远国度的金钱源源不断汇入MIA的账号。当神气活现的城市父母官发出一份份诉状时，他们自以为可以给对手带来致命的打击，却轻率地忽略了一种可能：对于蒙哥马利以外的观众而言，这出戏不可能是场好戏。“现在大家都承认，这事办得可真够蠢的。”霍尔写道。

对于古灵精怪的编辑霍尔来说，他发现自己就像“100多名国际新闻界记者的老保姆和印第安导游”，光怪陆离的种族问题，无论是波澜壮阔的事件还是平

淡无奇的细节，因为媒体的涌入都让他产生了强烈的个人感受。一个早期效应是，霍尔以护送《纽约时报》记者彼得·基斯的身份，冒险到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面见金。这次会面，就霍尔的感觉而言，金“很大程度上是谜一样的人物”，一个自重而不幽默的人；在金谈到死亡、痛苦和暴力的时候，霍尔发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死亡观脉络”。不过，霍尔承认，金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哗众取宠、巧舌如簧的江湖骗子。霍尔还发现，金关于哲理的讲道，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圣经》教义的有力注释”。他承诺，会把这些判断和许多其他得罪白人读者的内容都在报纸上付印。后来，霍尔接到一个气急败坏的来电，他问对方是怎么知道有人在操纵抵制行动的。她回答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说法足以让乐不可支的霍尔也一并将其发表在报上。

就在关于抵制行动的案件将要开始审理的时候，黑人记者与国内的“战地记者”的营地中，又涌进了日本、意大利、荷兰、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记者。这些外国记者中，有印度报业托拉斯的卡马斯、《法国晚报》的丹尼尔·摩根。英国《伦敦经济学家》派来的是基思·凯尔，《曼彻斯特卫报》派来的是著名记者阿拉斯泰尔·库克。（讽刺的是，鉴于该报的左派观点和拉斯廷对其名字的引用，库克可能是最同情当地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外国记者。他笔下的金是“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猫爪”。）不用说，在这些记者中，霍尔最喜欢的似乎是法国的摩根。在《广告报》原定的文化发布会之前，摩根打电话来说，“很抱‘现’，霍尔先‘森’。我必须爽‘那个’约了，因为我已经约到了金牧师。”对霍尔来说，这种讨好式关注使得金就像前一天蜇到身上的蜂针——这个细小的、颤动着的玩意立刻就能让人感到瘙痒和刺痛，但最要命的是，你不能不管它。当地检察官宣布，当务之急是要集中精力处理一个专门的案子并使之成为判例案件，所以，他们搁置了另外 89 件的诉讼，单独对金提起公诉。

为期 4 天的审判于 1956 年 3 月 19 日开庭，金坐在辩护席上，左右两边坐着 8 名律师。金的团队中分两组人，一组是给金做指导的律师团队，一组是 MIA

证人团队，他们负责提供一系列虚假证据来形成抗辩证词。霍尔特街浸信会的牧师表示，决定开始抵制行动那天晚上，他们想不起来当时是否看到金在教堂。格雷茨做证说，他不记得曾经听到金呼吁人们抵制公交车。他们闪烁其词地否认金有参与抵制的任何行为，在这个基础上，对神的敬畏和对律法的信奉相结合成就了一个抗辩。等金的律师团队试图证明抵制并非“无正当理由”，他们传唤了一连串黑人女性出庭做证，用她们在公交车上曾经亲眼所见或者亲身经历的各种冷酷蛮横行为做证。

没有哪一种法律策略比审判结果更重要，它在各方面都成为象征性的成果。法官是德克斯特大街对面教堂里一个男士查经班的教员，在控辩双方做完辩论总结后，当即宣判金罪名成立，并判处金支付 500 美元的罚款，或者接受一年的强制劳役。报纸准确地记录了这一时刻，下午 4 时 39 分，金走出法院，对欢呼着涌上来的人群说，公交车抗议活动将继续下去。就在这时，有人高呼：“国王驾到！”紧接着，其他人跟着高呼“国王万岁！”“金就是王！”晚上，人们回到霍尔特街，回到所有的一切的起点，在那里举行了好几场大规模群众集会，在那天晚上的第一场大会上，金是这样被介绍给人们的：“今天，站在这里的这个人，为了你和我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金向大家宣告说：“这个判罪和所有他们对我的诋毁全部加起来，半分也减少不了我的决心。”

此前近 4 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成了蒙哥马利黑人里的公众人物，但现在，他的名声远扬外界。杜波依斯熟悉自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以来的很多黑人领袖，他自己就怀疑消极抵抗的作用，但他写道，如果消极抵抗能征服种族仇恨的话，那么甘地和金这群黑人就一直在向世人展示一条征服战争本身的道路。金登上了《射流》杂志的封面，他被称为“亚拉巴马州的现代摩西”；《纽约时报》在庭审期间刊印了名为“新闻人物”的文章，文中对金的描述是这样的：他相信“所有人从根本来说都是善良的”，他在讲坛上的演讲“能以其深深的信念征服听众……他特别喜欢读康德和黑格尔”。

金迅速意识到，审判给他带来了惊人的个人影响力，并且远远超出了蒙哥马利。抵制运动开始以来，他第一次北上筹款，并在纽约受到了热烈欢迎，一家报纸这样描述道：“这样的欢迎（城市）通常只为布鲁克林道奇队保留。”上万人试图挤进加德纳·泰勒的协和浸信会教堂聆听金的演讲。由此，MIA 筹得 4000 美元。市议会的会长也亲临教堂。疯狂的崇拜者成群挤在金的身旁，黑人媒体报道了女人们宠溺的叹息。

远离家乡的大众追捧来得猝不及防，但金必须为争取其他方面的支持继续在纽约游走。他向哈里·贝拉方特发出了私人会晤的邀请，地点设在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在哈莱姆的教堂。贝拉方特回应得很谨慎，可能还有点反复无常。当时，贝拉方特已经录制完成但尚未发布使他成为国际明星的 *Calypso*——这是首个销量达到 100 万张的个人专辑。贝拉方特很好奇金坚持要和他单独见面的原因。他对牧师和领袖地位的黑人一向警惕，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这些人从来没有支持过杜波依斯和保罗·罗伯逊，而这两人恰恰是他的偶像。他最终赴约无非是出于对这个新牧师的好奇而已。在交谈中，金对贝拉方特说，自己听说对方极为关心种族斗争，尤其体现在其演艺事业的职业生涯中。金对贝拉方特政治层面的恭维令其受宠若惊，但打消贝拉方特抵触情绪的却是金的表现——金的谦恭和其周遭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贝拉方特发现，金绝非他此前所担心的乡巴佬或者神棍，而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台下的金既有果决的一面，又有几乎是母鹿般脆弱的一面，正是这种两相混杂的个性打动了贝拉方特。“我需要你的帮助，”金再三说道，“我不知道这场运动将走向何方。”

在蒙哥马利，一个星期之中发生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而金和 NAACP 的罗伊·威尔金斯也已经陷入了持续到后来很长一段时期的资金争吵中。金在给威尔金斯的一封信中抗议说，NAACP 似乎是在“以我们的运动为名”为自己揽财。威尔金斯为他的账务辩护说，所有来自抵制运动募捐所得款项都要由他经手处理，NAACP 预料将承担大笔 MIA 法律费用，但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他补充

警告金说：“我看不需要强调你都很清楚，只要在资金的筹集和分配上有任何分歧的迹象，那都将是致命的。”NAACP已经奋斗了20年，他们一直在用法律手段来实现诸如学校这类公共机构的整合。因此，眼见自己的法律战已经进入了高潮阶段，他们自然不太愿意认可群众抵制运动这种全新而激进的方法。由于两人间关于法律支持的谈判进一步陷入僵局，在对金的审判开庭期间，他的8名律师只有一名是瑟古德·马歇尔的人。而就在庭审期间，NAACP还发表了滑稽的声明说，在对消极抵抗方法的有效性做出判断前，它将等待抵制的最终结果。

审判使金成了国家的象征，威尔金斯也变得愈加爽快。金被定罪过后3个星期，他通知金，NAACP除了为MIA支付在联邦起诉公交车的种族隔离案件和罗萨·帕克斯个人案件的律师费用外，还将为金支付所有律师费用，其他所有受审的群众被告的出庭应诉费用也将一并负担。另外，由于在金的案件中，亚拉巴马州的一家企业收取了9000美元的费用，威尔金斯也表示愿意支付一半。匪夷所思的是，当初出茅庐的MIA声誉日隆，以至于名望胜于NAACP时，威尔金斯仍然延续了这种慷慨的资助；而那个时候的金，即使这些钱已经不再必不可少，也仍然大言不谢。MIA的案子可能会在美国最高法院结案，金的理由是，NAACP律师在那里漂亮地打赢过一场民权案件诉讼。“我们非常依赖NAACP，对此，我们非常有自知之明。”金在写给威尔金斯的和解信中如是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教会刚刚向NAACP支付1000美元注册成为其终身会员。就在那一周里，威尔金斯邀请金到旧金山参加NAACP的年度会议。

1956年6月1日，距离NAACP召开会议还有几个星期，亚拉巴马州的总检察长约翰·帕特森得到法院一个非比寻常的命令：最大限度地禁止NAACP在亚拉巴马全州范围内的活动，包括集资、征收会费和新会员的邀约等。这个命令来自帕特森的请求，因为后者断言“组织、支持和资助蒙哥马利黑人居民非法抵制行动”的就是NAACP。法院的命令坐实了这个由来已久的传闻，并使取缔该组织的行动获得了法律效力。NAACP抵制执行该命令的附加要求，拒绝向帕特

森交出其成员和捐款人名单。为此，法官对 NAACP 以蔑视法庭为由判处 10 万美元罚款。为了作废这些处罚，NAACP 花了 8 年时间，多次将案件提交最高法院。然而，在这 8 年里，亚拉巴马有色人种协进会始终处于被迫解散状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令人震惊的事态发展把金和威尔金斯捆绑在一起成了共同被告。不过，威尔金斯不太可能忘记的是，恰恰是金带领的抵制运动导致了 NAACP 在整个亚拉巴马州的被迫关闭。在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案件的关键时刻，其他南方州试图仿效亚拉巴马州的局势，使得 NAACP 面临的不利条件越来越严峻。

帕特森命令产生了一个看不见的效果，那就是促使亚拉巴马州的一些前 NAACP 领导人与金结成了紧密的同盟。这些人中，最不寻常也是最明显的就是伯明翰的弗雷德·夏特沃斯，这个快活且不修边幅的男人从小生长在亚拉巴马州的边远林区。直到 1941 年前，为了背负养家糊口的责任，夏特沃斯一直是游走于亚拉巴马州的卡车司机和水泥工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自己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宝贵的天赋，那就是他的记忆力，这使得他非常适合做一名乡村牧师。接受了神的“召唤”后，夏特沃斯投身于大学和神学院的学习，这期间，他除了购买一头奶牛以维持他和年轻妻子的生活，用“二战”的废料盖了房子之外，还每个星期天讲道不下 5 次。夏特沃斯的第一个全职讲坛在塞尔玛。他曾为牧师的特权而与他的执事们争吵不断，最后，如其所说，因为看到了上帝的显圣，他接受了上帝的劝诫，他决定鼓舞和征服他的执事们。

就在帕特森接到法院命令后没几天，夏特沃斯就接收到神的另一个启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他把这个启示解释为，对于派系横生的 NAACP 而言，现在的消亡是另一种变相的好事，神告诉他，应该像蒙哥马利的金一样用自己的组织代替 NAACP。在几次到蒙哥马利移交捐款后，他认识了金，并且萌生了一个强烈吸引他的想法，那就是成立一个独立于官僚主义的 NAACP 之外的组织。在法院发出命令禁止煽动黑人的情况下，他公开号召成立一个新的组织，这种明目张胆规避法院命令的宣传吸引了白人新闻媒体的关注，

同时也对伯明翰警察局局长尤金·“公牛”·康纳发起了挑战——康纳以好斗著称。一个担心不已的黑人牧师竟然告诉夏特沃斯说，自己已经接收到来自天堂的显圣，上帝要他告诉夏特沃斯取消会议。“主什么时候要你来向我传达他的启示？”夏特沃斯气冲冲地回答道，“上帝早就让我向他求告。”紧张不安的普通民众在宣传效应的影下，挤满了6月5日晚上的教堂，正是在那天晚上，夏特沃斯宣布成立自己的组织——亚拉巴马州的基督教人权运动。这个行动第一次把他推上了前台，以一个足够勇敢或者说足够疯狂的牧师身份去公然反抗“公牛”康纳。

在蒙哥马利，金和其他MIA领导人正在庆祝他们实质性的胜利。6月4日，3个联邦法官组成的小组讨论了弗莱德·格雷2月提起的诉讼（诉讼提起于金的房子被炸两天后），三人小组经过投票，以2：1的结果做出了对MIA有利的裁定，判定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种族隔离法令违宪，并予撤销。蒙哥马利和亚拉巴马州的律师随即做出上诉决定，案件被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尽管种族隔离的法律在获得最终裁决之前仍然有效，并且，对于抵制者来说，这意味着几个月来的步行和拼车行动要继续进行下去，但蒙哥马利群众集会上却发出了无数欢呼声。第一次，他们在白人的法庭上站在了胜利者的一侧，现在，他们将继续在最高法院斗争，力求后者维持3位南方州白人法官的裁决。他们在法律上赢得最终胜利的概率大大增加。

乐观情绪爆发式迅速蔓延开来。每一个困难，每一个为去世的忠实步行者举行的葬礼，都在不断地鼓舞激励着人们坚持走下去，哪怕再走半年。大家都知道前6个月一直很艰难，但他们正走向巅峰。现在的MIA很有钱，不断购买全新的旅行车，并且自己经营着十几辆规模的车队，从而大大减少志愿者私人用车的损耗。在联邦法庭上获得胜利的时候，MIA的存款总额已经超过12万美元，这些钱分散存放在从纽约到俄克拉何马州的各个银行里，但亚拉巴马州除外，这样就可以保证这些资金的安全，避免被总检察长帕特森以法律手段突然抄没。金认为现在的MIA已经足够安全，他决定和柯瑞塔与阿伯纳斯一起去

度假。他驾驶的车在奔往加州海岸的路上绝尘而去，这次，他是去旧金山参加 NAACP 的会议。

他们离开后不久，牧师乌利亚·菲尔兹在蒙哥马利举行新闻发布会，指责抵制的领导层充斥着腐败。他在会上说数千美元的资金被挪用，领导们已经变得“太本位主义，他们只对怎么延续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感兴趣”。“这是一场少数人借多数人得利的运动，我再也无法确定自己在这场运动中的位置。”菲尔兹声明道。他的公开辞职制造了大规模逮捕以来最轰动的新闻。菲尔兹是一个直言不讳、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和金年龄相当的领导。当他还是亚拉巴马州的一名学生时，就蓄了一把山羊胡，这成了他区别于其他更具形象意识领导人的格格不入的标志。在学生时代的一次竞选中，他作为一名反叛者击败了广受拥护的兄弟会候选人，后者现在是金在德克斯特大街教堂的门生。菲尔兹认为，以他们的社会活动记录来看，当选 MIA 主席的应该他而不是金，而对于阿伯纳斯的权力逐渐增大，以至于成为组织中的二号人物，他公开表示嫉妒。眼见金应全国各地的要求四处演讲，而自己却只能在匹兹堡乡下小露一面，这让菲尔兹心生怨恨，很是恼火。

他算准金和阿伯纳斯同时不在蒙哥马利的时机，谋划策动重组执行董事会，他希望其他心怀不满的领导人能群起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在蒙哥马利抵制运动中，金和伟大的人民群众之间建立了强有力的纽带，而这一点却被菲尔兹严重低估。普通群众称菲尔兹为叛徒，他自己的教会全票通过免除他的牧师职位。金中断加州度假的安排赶回蒙哥马利。在家里，他面见了“叛徒”。此时的菲尔兹已经名誉扫地，以至于金在处理这件事时，对他的保护要多于对他的追究。在群众大会上，金发表了长篇讲话否认菲尔兹的指控，但呼吁 MIA 成员原谅这个回头的“浪子”。捍卫自己的领导权对金来说实在太容易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因为他并不用应对涉及菲尔兹指控的基本事实。实际上，MIA 的账户上的那几千美元的确被挪用，用来支付拼车系统汽车司机和各色骗子的海量汽油和想象出

来的卡车备胎的费用。交通委员会的改组就是为了尝试堵住报销制度漏洞。而指责 MIA 领导层专横霸道和利己主义的，却不止菲尔兹一个人，还有好些尼克松这样的人对此多有恼怒。这些人认为，就是因为自己不够精致优雅，文化程度不够高，所以才会被撇在一边；而一些世俗的人认为，因为他们不是牧师，所以被排除在外。但无论如何，从现在开始，这样的批评将永远只能在私下进行。菲尔兹的叛变以及对他的迅速铲除表明，既不能对 MIA 进行公开批评，以防白人对手拿来做文章；也不能批评金个人，否则就是不可容忍的事情。

金飞回旧金山参加 NAACP 的第 47 届年会。会场上，数百名代表挤上来和他握手，其中包括密西西比州 NAACP 干事梅格·埃弗斯。埃弗斯邀请金去密西西比，他说：“你到场就能带来更多的希望……任何人都不如你。”他对金寄予了热望。由于 NAACP 的限制，人们只能支持那些在法庭上与种族隔离做斗争的律师，因此，在会议期间，代表们被这样一个想法迷住了，那就是，在一个有近 5 万黑人的城市里发起群众运动。于是，他们在会议楼起草多项决议，支持抵制公交车的非暴力方法，由此引发了威尔金斯和瑟古德·马歇尔和他们长时间的拉锯战，而这就等于把金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仿佛成了一个捣乱的来客。他努力想让自己不那么扎眼，越少人看到他越好，但记者们还是注意到了他。就废除学校种族隔离问题，他们问他是否认为非暴力的方法可能有效，他回答说自己还没有想太多，但他们也许可以这么做。这个评论把瑟古德·马歇尔惹火了，他宣称：“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是大人的工作，不应该委托给一群孩子。”于是，有记者用他的话引证金是“给大人跑腿的男孩”。威尔金斯则是更多地使用外交手段来遏制了会议失控的威胁，最终，一番运作之后，会议只通过了一项决议，仅仅是呼吁执行董事会对蒙哥马利模式的运用给予“谨慎考虑”。

一直有声音批评金，指他疏忽了自己的教堂，对此，金颇为在意。7 月份，金开办了时事通讯《德克斯特回声》，以此保持和他的会员的联系。他有自己的专栏，名为“来自牧师的讲道坛”，谈论得最多的是教会的财政问题。为了弥补

暑假期间减少的捐款，金监制了第二届年度最漂亮宝贝比赛，并借此盈利 2000 多美元。至于赛果，由于获得 8 月俱乐部 645.6 美元的捐款，金的女儿尤姬成了获胜者，当时她只有 8 个月大。

金到中西部做巡回演讲。他不在的时候，《德克斯特回声》发表了图片新闻公告，宣称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陈列了金的照片。正当金前往加拿大参加黑人殡葬业者会议时，尼克松打电话来说民主党将在芝加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A. 菲利普·伦道夫已经为金搞到了邀请，金将在民主党的政纲草拟委员会前做证。在众多老资历和讲究礼节的领导人中，金表现得更加清醒。他告诉尼克松自己不想去做证，除非得到罗伊·威尔金斯的批准。尼克松打电话给威尔金斯，对方答复说：“我同意，尼克松兄弟。他应该到那里去，哪怕这会部分转移人们对我的注意力。”于是，尼克松立刻放心地为金做出了安排，他告诉民主党，公民权利是“时代的最高道德问题”之一。也许是因为专注于安抚如威尔金斯这样的全国性领导人，金疏忽了一件事，那就是关于在民主党大会出场这件事的安排上，他没有给尼克松以足够的信任——或者，尼克松是这么认为的。此后，尼克松只在有必要的时候才和金说话。两人之间冷淡的关系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这成了金的一部分——他在新领域中获得了成功，但这种成功又是晦暗的，因为会随时惹恼四面八方的人和事。

8 月 25 日，两三根捆在一起的炸药束在格雷茨牧师的前院爆炸，附近的住户窗户也被殃及。格雷茨从外地回来发现警方已经从他家中没收了其个人的文字记录和信件，理由是这是对爆炸事件进行调查的一部分。侦探赶来询问格雷茨本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格雷茨两岁的儿子，他大叫起来：“走开，你们这些坏警察！”格雷茨对此从不后悔，后来他还承认，对于儿子的好斗情绪，他当时有一种瞬间激增的自豪感。第二天的《广告报》报道，市长盖尔怀疑是格雷茨自己往自家扔的炸弹，为的就是激发外州对 MIA 的捐赠。他说：“也许这只是一个宣传噱头，这样可以在运动中提高黑人的得利。”爆炸事件后两天，金给白宫写

了他的第一封抗议信，信中，他告诉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黑人的生活“毫无法律保护”。内阁部部长马克斯韦尔·拉布敷衍式地回答总统说：“一直在关注蒙哥马利的局势。”

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阿德莱·史蒂文森此前表示，希望不要把民权议题带入竞选中，这遭到了罗伊·威尔金斯尖锐的批评，本就不放心黑人选票的史蒂文森现在更不放心了。威尔金斯还指责这位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的轻率暧昧，言辞激烈，以至于史蒂文森的朋友埃莉诺·罗斯福威胁要退出 NAACP 的董事会。史蒂文森回复威尔金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唯一决定我们竞选进展的问题。”10月份，史蒂文森对事件的关注促使他参加哈莱姆的一个集会，在那里他批评艾森豪威尔的声明过于被动，等于“什么也没做”，这让他想起最高法院做出的在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决定。“我支持这个决定！”史蒂文森哭了。他的支持者认为，他的发言把他和艾森豪威尔区分开来，让人感觉他对黑人更友好；而他的批评者说，这意味着没有候选人会说，我支持国家的法律，但同时拒绝表态将如何执行它。而艾森豪威尔就是这么做的。

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策略和史蒂文森不一样。10月10日，他到艾比斯球场观看了布鲁克林道奇队和纽约扬基队之间的世界系列赛。弗雷德里克·莫罗以嘉宾身份和总统坐在一个包厢里。官方正式报道中并没有提及莫罗的存在，但消息立刻通过黑人媒体迅速传开了，它指出，因为怕疏远南方民主党人，史蒂文森恐怕不太敢参加黑人的社交活动。第二天，艾森豪威尔邀请哈莱姆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牧师到白宫参加一个私人会议，这又成了一个大新闻，因为民主党人鲍威尔流露出赞成艾森豪威尔竞选连任的态度，他说，总统将会为公民权利做更多事情。

当年竞选期间发生了两大世界危机，一个是反对苏联统治的匈牙利起义，另一个是第二次中东战争，因此，竞选令人难忘地结束于这两起事件中，而黑人问题就成了热点事件外的一点余音。艾森豪威尔就苏伊士运河袭击发表了“维多

利亚中期时代风格”严厉的个人评论。如果美国支持这种公然的殖民主义，他说：“反击很可能在全世界从达喀尔到菲律宾群岛排着队来对付我们。”他含蓄地威胁要切断美国对欧洲的石油供应，以此来帮助救援纳赛尔——尽管艾森豪威尔厌恶这个人，并使英国挽救帝国的最后努力遭到惨败。

对战争的恐惧使艾森豪威尔很可能以近 10 万张选票的压倒性优势获得连任。在大选之夜，一名助手兴高采烈地踏着舞步走进艾森豪威尔的酒店套房，他告诉总统共和党历史上第一次赢得了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投票。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众所周知，在抵制公交车系统的 11 个月里，政府私人性质地努力帮助黑人，这令蒙哥马利的白人公民大为光火。选后分析表明，这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黑人首次把选票大量投给共和党——艾森豪威尔得到了黑人大约 60% 的选票。共和党战略家期待来一次美国政治的重大调整，他们希望把财政保守派，受过教育的郊区居民、黑人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开明的多数派。这是令史蒂文森心灰意冷的多方面选举结果中的一个。“我对黑人相当困惑。”他说。

在蒙哥马利，市政府官员上书州法院申请禁制令，以 MIA 拼车系统没有获得市政交通系统的牌照为由禁止其运行。该禁令是金的律师们最担心的法律武器，因为他们知道，在法院做出实质性判决前，法庭命令有规范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的一个主要例子是，总检察长帕特森取缔亚拉巴马 NAACP 的命令，而 NAACP 为此经历了长期未决的诉讼。因此，蒙哥马利类似的禁令将意味着，一旦抵制运动的领导人运营拼车系统，就会被控藐视法庭罪而遭到强制性监禁。法律裁决的滞后性令所有优势从 MIA 一方转向城市政府一方。

在《广告报》上，格罗夫·霍尔怒骂政府这一举措在抵制运动快一年后才来，已经为时已晚，它只能是“另一个失策”，因为隔离问题本身现在已经到了美国最高法院。霍尔想督促城市父母官考虑更多的根本性防线。他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给金带来安慰，而且，金本来就什么也没得到。但在金看来，最高法院的决定还是一个看不到前路的未知数，而已经提出的禁令所带来致命的影响，可能

就只要几个小时的路程。其威胁性在于，它将摧毁拼车系统累积起来的效益——MIA 自有的旅行车、整个预算支持体系、组织起来的司机系统。抵制者将不得走进快速逼近的第二个冬天。

11月13日星期二，艾森豪威尔获得压倒性胜利一周后，由于政府的代表律师告诉法官尤金·卡特，他不应该只禁止拼车，还应该对MIA执行强制性罚款1.5万美元，这样可以补偿城市的税收损失，于是，满面愁云的金坐上了被告席。在法庭上，金把拼车行为描述为一种自愿行为、一种“共享座驾”合作行为，但一个出其不意的政府证人做证说，MIA在他的蒙哥马利银行存了18.9万美元，结果，这个证词被政府律师用来揶揄金的说法。法庭上双方发起的许多论证即使在当时看来都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保守的政府律师指责说，拼车系统是“私人企业”，因此应该加以规范或取缔；金更新了他的失忆防御战术，他说自己记得很清楚，抵制行动是自发性的，没有任何组织或领导。

在庭审小休期间，美联社记者悄悄走到法庭前面递给金一张纸条。纸条里面是记者从美联社收报机撕下来的新闻快报：“美国最高法院今天宣布，维持特殊3人法官小组的裁定，判决亚拉巴马州关于公共汽车上种族隔离的州法和地方法违反《宪法》。最高法院行动没有听取任何辩论，它只是宣布‘准予维持原判的请求并且维持原判’。”

事情结束了，一股热血涌上头来，金冲到法庭后院把消息告诉了阿伯纳斯、尼克松和柯瑞塔。这时，原告席上骚动起来，政府律师也得到了消息。新闻通过人们在法庭上的低声耳语迅速扩散开来，直到一个黑人耐不住性子打破肃静，大声宣布道：“全能的上帝已经从华盛顿传来声音了！”法官卡特为了恢复秩序，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敲击小木槌，并最后做出了禁止拼车的判决——即便最高法院的裁决已经令他的判决变得无足轻重。

蒙哥马利的黑人现在已经不在意这个禁令了。他们正忙着举行庆祝活动。那天晚上举行了两场盛大的群众集会。大会一开始西伊就报告说，三K党正准备

进军蒙哥马利。无所谓，他哭了。“我们不怕，上帝与我们同在。”讲坛上的西伊说完这句话便泪水长流。《广告报》是这样报道的：“几个女人宗教狂喜般尖叫起来。”报纸还报道了金步入会场的精确时间：晚上7点23分。金的到场引发了群众的全体起立和长时间的热烈鼓掌，直到阿伯纳斯设法使会场安静下来并带着众人一起阅读《圣经》。当罗伯特·格雷茨走到讲台上时，现场出现了短暂的沉寂。这位瘦削的白人牧师长着一对招风耳，他给大家朗读的是《哥林多前书》的著名篇章《爱之歌》：“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说孩子话、懂孩子事、想孩子事；但我已身为男人，我将不再孩子气。”还没等他说完这句话，教堂里的每一个人都欢呼雀跃起来，那是顿悟的力量敲响的新生自尊的和弦。

法律的技术性原因推迟了裁决的执行。在其相应的命令到达蒙哥马利前，最高法院的决定还不能生效，但金得知，针对拼车的恶意禁令已经开始执行。这意味着在这期间，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仍然是法律，而MIA却将无法提供可替代运输系统。为了熬过这种延迟同时又不会引发白人的法律骚扰，MIA的领导们激发了人们最后的力量，号召大家继续坚决抵制乘坐公交车，直到取消隔离的命令到达为止。是的，他们会坚持走下去，但这种坚持，在效果上其实是到达终点后，为庆祝胜利挣扎着再绕场一周。

获得胜利的幸福感激励着人们。金在听到判决后，发表了洋溢着青春热情的声明，有些地方出现了不着边际的修辞。“我们时常身处生活中躁动不安的大海汹涌的低喃（原文如此），”他说，“多少个日夜里，逆境的狂风肆虐。”但他还是劝告大家要采取谨慎的做法。“我们再坚持三四天的步行或者与朋友分享座驾就可以了。”可是这一次，后来的事情证明，金的法律专家们的估计太过乐观了，法院文书到达之慢，历经了5个星期，也就是说，他们艰苦地绕场一周跑了5个星期。

许多知名人士从第一天开始就给金打电话。马哈丽雅·杰克逊想来蒙哥马利献唱以庆祝胜利。几个黑人神学院的校长纷纷表示可以为抵制运动的基督教精神

提供神学评估。这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提议启发了金，他打算组织一个星期的讲习会和礼拜，并将其称为非暴力主义和社会变革讲习会。就像那些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人士一样，记者卡尔·罗文、小说家莉莲·史密斯、唯一神论白人领袖荷马·杰克也都同意到这个黑人浸礼会教堂来。老金的对手威廉·霍姆斯·伯德斯从亚特兰大赶来发言；加德纳·泰勒从他巨大的“百万美元”布鲁克林协和浸信会教堂来了，巴吞鲁日市的杰米森也来了。

金的讲习会于12月3日召开，地址设在霍尔特街浸礼会教堂，也就是在差不多一年前，那里举行了第一次群众大会，他也第一次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在讲习会上，他宣称，上一年里讲了6课：“（1）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为了共同的事业团结在一起；（2）我们的领导人没有屈服；（3）威胁和暴力并不必然吓倒那些充分觉醒和非暴力的人；（4）我们的教会除了传递个人救赎的福音外，还为了强调社会福音而正变得斗志昂扬；（5）我们已经获得了尊严和命运的新感受；（6）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强大武器，那就是非暴力抵抗。”

在金看来，首先应该是领导力和团结的课程，接着是教堂的战斗性，最后是非暴力的“发现”。作为抵制运动经验的升华，表单的内容精挑细选、排序得当。非暴力就像抵制运动本身，在或多或少的偶然中开始。抵制运动领导人的职责被激发、被重演、被坚守。直到六年多后伯明翰新的斗争中，金关于领导力的理念才涵盖深思熟虑的斗争创新或者有意识的、优先选择的战略和战术，而现在，他的领导力理念还是强调学识的展示：在讲习会的致辞中，他谈到很多博学的事情，包括工程技术、殖民主义、时间的步伐等，但演讲整体上显得杂乱无章。金在演讲中引用的名人名言，远自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近到鲍勃·霍普（Bob Hope）。他的赞美诗是对正义的向往，是在勇气的冥思中颂扬殉难的价值。但是，一旦他摆脱了抵制的特殊压力，他的演讲就明显失之于不切实际的抽象。

12月9日这个周日，是金可喜可贺的一个大日子。当天上午，弗农·约翰斯

走上了德克斯特的讲坛，他在布道中为纪念教堂从第一浸信会教堂分设出来 79 周年做了宣讲。当天下午，金在第一浸信会主持了规模庞大的仪式，讲习会就此达到了高潮。来访的唱诗班一个小时的音乐使人们热血沸腾，接着是弗农·约翰斯克制止他的骄傲，按捺下他对全国浸信会的厌恶，用他独特的低吼做了祈祷。然后再有金的朋友鲍勃·威廉姆斯的独唱，而随后出场的就是 J.H. 杰克逊。此前，杰克逊从来没有公开赞同抵制运动，他当天的讲话也几乎没有提到抵制运动。然而，由于杰克逊是当时美国黑人掌控的规模最大、最有权势的教会协会的头号人物，因此，当他出场时，仍然受到恭敬有加的多达 8000 人的盛大欢迎。每当金和阿伯纳斯谈到通过激进教会来扩展运动的话题时，他们就梦想着能拥有杰克逊这样的权势。在去年 9 月召开的全国浸信会（NBC）会议上，杰克逊邀请柯瑞塔到他在芝加哥的教堂举行了独唱音乐会，他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对金的认可。现在，杰克逊把金列入黑人浸信会的顶级成员的名单中——包括杰克逊、加德纳·泰勒、杰米森父子，但略逊于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金在牧师队伍组织中的声望已经超过了他的父亲。在讲习会那份一长串议程中，金的名字以及所有关于他的一切都以大写字母拼写，除了杰克逊外，再没有其他人能有这个待遇。

12 月 20 日，最高法院的通知书到达蒙哥马利联邦法院，执行法警将通告送达市政府官员。那天晚上，金在群众大会上告诉大家：步行结束了。他强调了解，并且说抵制运动为公平正义带来了胜利，它将恩泽两个种族。他说这不是一场战胜白人的斗争，但很多白人政治家似乎不这么认为。市长盖尔和治安专员塞勒斯为了置身事外，各自找个理由留在城外。当地法官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法令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到达而作废，他谴责最高法院的决定“既不基于法律也没有依据”，而是一个“邪恶的推定”。

第二天早上，金穿着西装、戴着礼服帽子，后面跟着弗雷德·格雷、阿伯纳斯、格伦·斯迈利，以及一群摄影师和记者，一起登上了黎明前的公交车。“欢迎乘坐！”公交车司机很有礼貌地说。汽车隆隆地行驶在城市街道上。金坐在公

共汽车前排的座位上，身旁坐着斯迈利，车上的摄影师拍下了这一场景。司机在半道停车接载了格雷茨时，竟然和混坐一车的人们合伙开起玩笑：他对格雷茨嘟嘟地按着喇叭，斯迈利则随意地靠着汽车前门向外探出身子，对格雷茨大声嚷嚷说：“你今晚几点请我吃饭？”那口气，仿佛自己坐的是一辆私家豪华轿车而不是一辆公共汽车。金和车上的人们哄堂大笑起来，格雷茨在笑声中上了车。这是纯真的一刻，却来得如此不易。

金请求贝亚德·拉斯廷到蒙哥马利来。他只能在庆祝胜利的超凡盛典后才能发出邀请，因为他们两个人都知道，拉斯廷的现实存在可能是一个危险。当地白人仍然记得这个神秘的《费加罗报》的冒牌货，而金自己也感觉到一个来自同事，尤其是牧师群体的更大的政治威胁。如果同性恋者出现在他们中间，那就如同在他们中间插入了邪恶的楔子，这是不可容忍的事情。对于金身边的一些黑人来说，记忆更深的不是情义款款的拉斯廷，而是怪诞傲慢的拉斯廷，正是这个人在2月份的时候给他们的阵营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更糟的是，拉斯廷刚刚在他的杂志《解放》里刊登了尼克松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尼克松与其说是分享发起抵制运动的心得，不如说是主张自己在这场运动中的贡献。这就导致尼克松又遭到金的更多知识分子朋友的嘲笑。金如此强烈地希望拉斯廷在人们眼中遁形，以至于他请求拉斯廷飞往伯明翰而不是蒙哥马利。鲍勃·威廉姆斯在那里接到了拉斯廷。坐上了汽车后座的拉斯廷按照金的要求一直低着头，直到汽车安全抵达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牧师寓所。

12月23日，拉斯廷到达的这一天是周日。当天一早，金的家里就遭到了猎枪的射击，每个人都被吓坏了，好在没人受伤。拉斯廷到达的时候，金正在检查家中的损坏情况。除了要和拉斯廷私下会面以外，金还得应付一大堆事情，包括纽约的筹款、伦道夫为改善金和威尔金斯两人关系的尝试、金未来要出版的文集、可能去印度和甘地会面的旅行，以及最重要的，由于南方各地的黑人都渴望在他们当地的公交系统中废除种族隔离，他们纷纷请求金给予帮助，对此，金要

给他们一一答复。就在金和拉斯廷刚刚开完他们其中的一个战略会议时，老金就像联邦调查员突袭一样突然闯了进来——猎枪袭击消息让极其愤怒的他冲到了蒙哥马利。柯瑞塔赶忙问他要不要来点吃的。

“我不是来吃饭的”老金嚷嚷道，“我是来祈祷的。”他吩咐儿子双膝跪下，然后自己就放声祈祷起来。退到隔壁房间的拉斯廷听到老金和上帝的对话，对话的方式让人感觉是上帝在告诉年轻的金抵制运动已经结束，现在神有政治以外的事情要他去做。祷告持续了一段时间。末了，老金更是直奔同样的主题，而随之而来的争辩迅速造成了紧张气氛，结果，金流下了愤怒和失望的泪水。年轻的金直到最后才为自己辩解了一下，他直言不讳地说，他就是要做他觉得必须要做的事情。不知为什么，争辩就此戛然而止。那一刻的气势如此之强，以至于拉斯廷觉得他亲眼看到父子之间的一种独特危机。

第二天是平安夜，在蒙哥马利，一个15岁的黑人女孩独自站在公共汽车站点等车，一辆轿车突然停在旁边，5个男人从车里跳了出来，在把女孩暴打一顿后迅速逃离现场。同一天在伯明翰，弗雷德·夏特沃斯宣布，他将在圣诞节后第一天带领一群人分别坐上公交车的前排座位。然而，他的考验在圣诞节的夜晚就提前到来，那天晚上，他和他的一个执事待在屋里，一束15支、几乎摧毁整栋房子的炸药就在地板下爆炸，夏特沃斯和他的执事被甩到了地下室。警方调查人员打着手电，在浓烟中听到地下室传来的声音，只听见这位仅穿着睡衣的传教士带着哭腔喊道：“我不要光着身子出来！”警方用毯子裹着，把夏特沃斯救了出来，又从倒下的木方中把执事拽了出来，并且说，两人在这场爆炸中都还能幸存，堪称奇迹。几个官员劝夏特沃斯离开镇子，但后者高声宣布自己将永远不会离开。“上帝会把我的名字从炸药的名单上抹掉。”他宣称自己的命运意识得到了更新。第二天，他带领200名追随者坐上了伯明翰公交车的白人座位上，但超过20人被逮捕，并因违反种族隔离法律的指控而被定罪。

在蒙哥马利，几个狙击手用猎枪向一辆整合式公交车开枪。事件发生后，金

发表声明，呼吁城市当局“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这种暴力行为。城市专员帕克斯是少数几个站出来做出回应的白人之一，他宣布，如果枪击事件继续发生，该市将不得不暂停公交车服务。这是一个让金的追随者感到灰心的声明，因为他们相信，停止运行亚拉巴马州的唯一整合式公共设施，正是狙击手们要达到的目的。两天后，另一辆非隔离公交车遭到伏击，这次是枪手们躲在丛林后对汽车进行排枪齐射，事件中，一位黑人孕妇因被子弹击中双腿而被送院救治。于是，城市专员暂停了夜间公交车服务。

金发出了邀请函，呼吁召开非暴力整合第一次黑人领袖会议。来自10个南方州的60个牧师做出了回应，并于1957年1月初在亚特兰大的埃比尼泽聚集到了一起。他们代表的是南方地区人数可怜的那一小部分黑人牧师，但在这个队伍中包括许多非常有影响力的独立政治家。弗雷德·夏特沃斯来自伯明翰；牧师斯蒂尔（C. K. Steele）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他受蒙哥马利运动的启发，领导了塔拉哈西的公交车整合运动；威廉·霍尔姆斯·鲍德斯从亚特兰大赶来——就在会议之前，他在亚特兰大发起了自己的非暴力公交车示威行动，触怒了佐治亚州州长，使该州民兵处于警戒待命的状态；来自纽约的贝亚德·拉斯廷默默起草了会议决议和组织机构章程。

阿伯纳斯和金同行，并留住在亚特兰大金父母家里。1月10日的子夜2点30分，会议才刚开始，金的母亲摇醒阿伯纳斯接听一个紧急电话。“阿伯纳斯，他们把我们家炸了，”战栗的胡安妮塔·阿伯纳斯从蒙哥马利打来电话说，“不过，我没事，宝宝也没事。”她在电话里告诉丈夫，房子的门廊和前厅差不多被摧毁，赶来的警察似乎也被吓到了，因为他们此前还听到了其他爆炸声。警察说，哈钦森街浸信会教堂被毁，教堂的屋顶塌陷。出事街区周围陷入无声的恐惧中，有些人吓得不敢出门，另一些人则不敢待在家里，于是，人们要么往外打电话，要么开车在街上转。

在亚特兰大，金的家里灯火通明，阿伯纳斯转述了这一消息后，屋里一片嗡

喻声。牧师们做了祈祷，然后阿伯纳斯大声说出了自己对第一浸信会教堂的担心，他悲伤地说：“我不要斯托克斯牧师的教堂挨炸。”愤怒的老金来来回回地踱步。“嗯，他们是会炸它的。”他说。阿伯纳斯情绪激动得不能自持，他不停地给妻子打电话，直到最终两人成功联系上。阿伯纳斯在电话中了解到，蒙哥马利的恐慌气氛越来越严重。在那之前还发生过另一起炸弹事件，爆炸声响彻全城。哈钦森街浸信会确实被炸了，人们已经看到了废墟；另外，格雷茨家也再次被炸。阿伯纳斯太太的电话断了一会儿线，但她很快打电话回来说刚刚又发生了另外一起爆炸，就在他们的家附近，她感觉到爆炸的轰鸣；还有，另一所教堂也被炸，她不知道最新被炸的是哪间教会。

后来的报道证实了阿伯纳斯的担忧，最后这次被炸弹袭击的教堂正是第一浸信会。他和金天亮前离开亚特兰大赶回蒙哥马利，柯瑞塔和拉斯廷则留下继续主持会议。经过他们的调查，那天晚上总共有4个教堂和两户人家遭到炸弹袭击。在4个教堂中，第一浸信会遭到的破坏最小，只是地下室被炸裂，礼拜堂以上的建筑基本没有受到破坏。尽管如此，城市当局仍然以建筑结构不安全为由指责教会继续使用教堂。

处理完蒙哥马利的调查后，金急忙赶回亚特兰大参加会议的投票议程，议会的传教士们将投票建成一个组织，后来，这个组织几经改名，最终定名为南方基督教领导联合会。金被大家选为总裁。选举结束后，金以新成立的组织名义分别给总统艾森豪威尔、司法部部长布劳内尔以及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拍发了电报。对于金的要求，谢尔曼·亚当斯代总统答复说艾森豪威尔不可能在南方安排一场反对种族隔离暴力的演讲；布劳内尔的一名助手的回复是，司法部将研究爆炸案和其他事件，但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主要权限还是归属州政府；尼克松则没有回复。

阿伯纳斯留在蒙哥马利的第一浸信会教堂，以便督促志愿者们在周五和周六疯狂赶工，他们要在两天内加固好地下室的横梁，并清理完所有碎片。城管监

察员精明地坚持规定，他们借口人的体重可能会导致临时支架倒塌，不允许任何人上楼，阿伯纳斯一度因此而感到绝望，因为他有可能无法在礼拜堂举行主日仪式。阿伯纳斯同意了监察员的指令。于是，一台钢琴被抬进了地下室，一个临时讲台也搭建起来。周日，会员们坐在地下室的椅子上，人们面色焦虑地看着头上新加的木头和地上的瓦砾。礼拜仪式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直到教会职员威廉·比斯利的母亲、比斯利太太站起来发言。“我不喜欢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这位教会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会员说，“牧师兄弟，你不可能让教堂永远没有忧困和烦恼。我记得1910年的时候，教堂被火烧得只剩下地上的一个大坑。有两个德克斯特贵妇人优雅地从边上走过，她们说：‘瞧啊，这是什么玩意？后代们会说，这个坑就是第一浸信会大概的位置。’可是她们错了！斯托克斯博士盖起了这座教堂。我希望你来一次信心表决，要让大家坚信，教堂将会再次被建起来！”地下室里的会众顿时欢呼雀跃起来，教堂钢琴家多萝西·波西也情不自禁地弹奏起了《哈利路亚大合唱》。

第一浸信会里飙升的激情部分派生于社区对抗，而MIA的领导人沮丧地发现，当善意被最大限度激发的同时，新生的心理危机也暴露出了丑陋的一面。对此，即使是那些熬过了抵制运动的人也无法解释，只能说，MIA社群正承受着一种天然的失落。一旦过了共同努力阶段，危急关头的情绪就很容易令他们陷入抑郁或嫉妒。在MIA领导层中，只有阿伯纳斯的教堂和自家双双被炸，他的威信因此而急剧上升，一些人对此心生不满。同样，由于在最近的这个恐怖之夜里，格雷茨的家遭遇两次炸弹袭击（一个勇敢的邻居剪断了引燃的导火索，避免了一次11支的炸药束的爆炸），其形象也变得高大起来。谣言榨汁机传出这样的消息说，格雷茨家的一个炸弹其实是要针对MIA内部的一名卫理公会牧师，格雷茨因为遗憾没被炸到而越发消沉——到后来他曾一度精神崩溃。牧师乌利亚·菲尔兹，也就是去年夏天的“叛徒”暂时恢复了领导职位，因为他回归的贝尔街浸信会教堂在炸弹之夜受损最为严重。

E.D. 尼克松这次没有遭受炸弹袭击，他越来越公开化地对金的做法和重要性表现出敌意。爆炸事件之后不久，尼克松给金写了一封信，开头是语带挖苦的“亲爱的先生”，他在信中辞去 MIA 司库的职位，并且抱怨他像“被人当成孩子一样戏弄”。金的同党对待尼克松尖酸刻薄的俯视态度，就如同有人站出来公开指罗萨·帕克斯为“抵制运动的花瓶”一样。在这种心态下，金周围那些最老于世故的领导人一致同意，未来废除种族隔离的目标应该是蒙哥马利机场。格雷茨、弗莱德·格雷和其他几个人反对这一荒谬自私的观点，因为只有为数极少的 MIA 成员曾经坐过飞机。但包括阿伯纳斯在内的领导人都想拿机场当目标，并且已经把视线从公交车移到了机场。

令人不安的潜流将可能使 MIA 不再是美国种族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抵制运动的影响力将波及各地并产生持续的影响，但蒙哥马利已经完成了对历史的贡献。金本人也正承受着相应的失落：他为炸弹事件担忧，为公交车上种族平等的倒退难过；来自 MIA 内部的批评伤害着他，因为他们指责他旅行过多、得到了过多的瞩目；而 MIA 领导层相互之间吹毛求疵、一盘散沙的状况，又让他闷闷不乐。本能地，他把担忧和失败归咎于自己，他内疚不已、痛苦不堪，而过分的内疚又发展成自责。阿伯纳斯的地下室礼拜过后的周一晚上，在 MIA 的群众大会的宣讲中，金公开祈祷希望得到神的指导，他说：“主啊，我们为蒙哥马利的自由而奋斗，我不希望以任何人的死亡作为获得自由的代价。我绝不想死，但如果一定要有人死，那就让我去吧！”听到他的高声呼喊，观众席炸开了锅，人们以一种宗教狂热爆发出一波疾呼“不要！不要”。金因为激昂的群情变得有点过度紧张。他一言不发、全身僵直、双手紧扣讲台，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直到人群自己平静下来。会场陷入了一阵令人局促不安的沉默，但随后就被一阵惊慌的低语打破。金始终一言不发，最后，是两名牧师挽着他的胳膊，把他领回到了座位上。

两个星期后的星期六晚上，鲍勃·威廉姆斯在德克斯特牧师寓所值班。柯瑞

塔和尤姬还在亚特兰大。这天晚上还是像往常一样不断有或友好或敌意的电话打进来，但总有什么东西让金强烈地感到不安，以至于他从床上爬起来去叫醒威廉姆斯。“威廉姆斯，我想我们今晚最好还是离开这里。”他说。二人迅速回到了威廉姆斯家。几个小时后，就在天亮前，一枚炸弹在牧师寓所拐角边上爆炸。房子前面部分的结构被炸毁，紧邻的黑人的士站也受到破坏，3辆出租车的车窗被飞溅的火药炸碎，司机因为被玻璃割伤而被送去医院。在人们报警等待警察到场期间，有人冲进实际上空无一人的牧师寓所寻找金，结果又在门廊前发现了一束12支的炸药，导火索正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一个小时后，警察排出人墙，把近乎骚乱的人群挡在警戒线外，就在这种紧张的戏剧性场面中，亚拉巴马州的首席弹药专家拆除了炸弹。两名黑人因为声讨警方未能抓住肇事者而被逮捕，后来被判犯有煽动暴乱罪。接到电话后，金赶到现场发表了演讲，这才平息了人群的骚动。

那天上午，在德克斯特的讲坛上，金把自己一年前在厨房里得到的那个启示（刚好就发生在第一次炸弹袭击之前）告诉了他的会众。他说他听到了内心的声音，它告诉自己要忽略那些萦绕心头的困惑和恐惧，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一名《广告报》的记者由于炸弹事件也出席礼拜仪式，他的报道撩起了格罗夫·霍尔恶毒的快意。在《广告报》的版面上，霍尔嘲讽地把金的描述称为“厨房演讲里的幻象”，他曲解其意，暗示金为废除种族隔离而战斗的意志不过是来自于金和上帝的一个所谓的厨房对话。几天后，在亚拉巴马州外的一所卫理公会学院的刊物上，霍尔看到一条不起眼的通讯，文章中，撰文教授指出，金在抵制运动中的非暴力姿态已经堪称基督教圣徒。霍尔就这篇文章的内容发表了措辞严厉的社论，并配以标题“金博士进入卫理公会教会圣徒之列”。这篇社论引发了整个南方激烈的争论。一些亚拉巴马教堂切断对卫理公会高等教育的全部资金支持。

出租车场炸弹事件后的几天，蒙哥马利警方指控7名白人男子涉嫌该案及此前的大多数爆炸案。正义的希望在美国内部激增，直到陪审团首先宣告前两个

被告无罪，尽管他们已经签署了认罪书。大约在同一时间，由于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否决了金的上诉——他因“非法抵制”而被地方法院定罪。这是一个技术性的裁决——弗莱德·格雷错过了程序上的申报期限，但由于害怕败于同一个技术性程序，金沮丧地决定不再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并为此而痛苦地支付了500美元罚款。他痛恨败诉，尤其痛恨的是，抗议的合法性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裁决。他希望其他89名被告中有人能得到以《宪法》为依据的审判，要么被判无罪，要么得到严谨的裁决——判定参与抵制者有“正当理由”，但蒙哥马利检察官驳回了所有的案件，从而封锁了这条通路。与此同时，检察官撤销了对其余白人涉嫌爆炸案的指控。

这是为法官卡特所接受的一揽子方案，但是金谴责这种双特赦，因为它邪恶地把抵制行动与爆炸案件等同起来，而根据亚拉巴马州的法律，大多数爆炸犯罪都属于死罪。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公开抨击这种关联行为。他知道，这样做最终不仅将一无所获，还会使他面临进一步扩大他和89名MIA领导人之间的嫌隙。金的无助证明检察官的举动在政治上的精明——将错误归咎于黑人领袖，宣告其有罪，给他们每个人上诉的机会，最终裁决他们都是罪犯，这一系列的事情可以安慰种族隔离主义者，而金自己交的罚金就提供了证据证明。大量黑人民众吞下了当地法律和随机暴力的历史性记忆，相对于一直以来遭受的数倍于此的报复，抵制案对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失败简直微乎其微。悄然之间，夜间公交车服务已经恢复，白人也停止了炸弹攻击。

1957年1月20日，弗雷德里克·莫罗参加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游行。游行过后，他和妻子经特别邀请，成为坐在总统就职观礼台上的第一对黑人夫妇。当月，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使、《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鲁斯的妻子、克莱尔·布思·卢斯以粉丝身份给金写了一封自我介绍信。这位共和党的世界主义者刚从意大利的任上回国，她在信中写道：“意大利共产党人没有一天不指责我们南方发生的事件，在他们眼里，这件事证明了美国的民主不过是一个

‘资本主义的神话’……这些美国人宁可否定他们自己《宪法》的行为，其影响已经令我们的国外敌人大为获益。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为争取平等而斗争的所有人中，没有人比你更合法、更符合基督教的方式。”

在卢斯写信的事过了几个星期后，《时代周刊》安排的一名通讯员撰写蒙哥马利的新闻特稿，文中以同情的笔触对金的形象做了全面的描述，还提到 MIA 群众集会上传唱《信徒精兵歌》的事情。《时代周刊》在纽约的编辑反对在初稿中提及这个细节，他说这首歌的好战精神和杂志中关于金的甘地主义倾向的描写有冲突。“尤其是，《时间周刊》这样描述金的甘地主义培养方式，“他把能找到的印度甘地的所有文章都读了又读。”在疯狂校改主要稿件的过程中，大量经过调整的金形象被塞了进来。一名艺术家为杂志准备了一幅帅气逼人的金的特写肖像画，这幅画几乎填满《时代周刊》封页著名红色边框内的全部版面。

《时代周刊》把金树立为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个永久固定形象。《纽约时报杂志》紧随其后刊载了抵制运动大事记，并且主要以金为主线，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劳伦斯·斯皮瓦克则邀请金参与他的节目——《与媒体见面》，金因而成为第二个登上这个节目的黑人。抵制运动后，金的身上笼罩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光环，他告诉《时代周刊》，他和他的父亲为自己选择了新教创立者马丁·路德的名字，并且说：“也许我们已经赢得了使用这个名字的权利。”金是骄傲的，但也是没有把握的“也许”。抵制运动带给他不可磨灭的触动——惊慌失措、焦头烂额、心胸开阔、激情燃烧。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在家中自己世界里的扰攘，仅仅是要更迅速地推动他走向更广阔的领域。

2月，就在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那期杂志上市之前，金一晚上都在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那里是弗农·约翰斯40年前上学的地方。学校有一个刚从神学院毕业、名叫哈维·考克斯的人，他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官员，在他的安排下，金为一个普通集会做了演讲。随后，考克斯举办了一个私人晚宴，受邀的学生和教师在金的面前都彬彬有礼但多少有些害羞。席间，金发现自己孤零

零一个人坐着，两边的席位都没有人，但有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直接坐到了餐桌的正对面。他介绍自己叫詹姆斯·劳森，并且说，自一年多前在《那格浦尔时报》第一次读到金的名字以来，他就一直期待着这次的见面。金顿时来了兴致。他问起了关于印度的事情，并说自己希望能尽快去一趟；劳森则描述了他的卫理公会传教工作。劳森取道非洲回国，其间，他在非洲和一些独立运动领导人相处了一个月。金再次感到眼前一亮。他告诉劳森他刚刚收到克瓦米·恩克鲁玛的邀请，出席一个标志着英国殖民主义在加纳宣告结束的仪式。

两位男士谈话很投机，他们很快发现各自都有相似的经历和兴趣。他们共同认识的人有很多，他们读过的神学书籍也有许多是相同的。劳森的父亲是个共和党牧师，他在传递爱的福音的同时，屁股上还挂着把手枪以防白人的骚扰。劳森说，母亲的爱影响了他的一生。作为高中和大学时的一名冠军辩手，劳森早在1946年就主张，针对苏联所进行的预防原子战争的行动是正当的。两年后，劳森已经决定，由耶稣证明的爱的法则不允许暴力，除非为了他人放弃自己的生命。他认定《兵役法》和《种族隔离法》在本质上是宗教良心的否认，并将这些认识联系起来发展成一系列理论。1951年，在卫理公会的时候，他以和平为理由拒绝被征召入伍，为此蹲了一年多联邦监狱。贝亚德·拉斯廷到俄亥俄州来劝导他，格伦·斯迈利也同样来劝导了一番。

这些名字几乎就像劳森说到的所有事情一样，在金的心头迸出似曾相识的火花。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即使彼此间刚刚认识，也几乎已经可以心有灵犀。而且，他们个性不同却有着共同的追求。作为活动家，劳森在许多方面走在金的前面，但金所发起的非暴力群众运动已经实现了劳森的梦想。现在，金说，他试图找出在整个南方地区推广蒙哥马利模式的方法，但到目前为止，他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浸信会或有色人种协进会，但他不确定实际将意味着什么，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一无所获。劳森尖刻地评论说，NAACP本质上就是局限于少数黑人中产阶级的律师组织，还是一个符合这些人谨小慎微脾性的宴会组织。金

沮丧地承认劳森也许是对的，但他反问道，数以百万计的白人和黑人之间，每天都发生着种族隔离事件，你如何凭空建立一个组织去解决这些问题？

晚餐结束后，金征求劳森的意见，希望他到南方来寻找或创造解决问题的方法。劳森说，他是有这个计划，但要先完成因为坐牢和到印度传教而中断的学业，一俟毕业，他就会着手去做这件事。

“我们现在需要你，”金恳求道，“我们南方没有任何黑人领导能够理解非暴力。”劳森答应尽快。两人开始了一种联合，一直持续到1968年劳森邀请金到孟菲斯去帮助环卫工人，而现在，他们共同分享着没有宿命含义的美好愿景。

第六章 领略世界

这次抵制运动渐渐地化作人们的记忆，那是一个关于空荡荡的汽车和疲惫的双脚的故事，而金则在南方力图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来传播他所谓的“蒙哥马利经验”。他收到大量的演讲邀请，也受到听众狂热的欢呼，他希望演讲能够带动一个群体的变革，如同18世纪40年代的“大觉醒”一样。更实际的是，他知道演讲只能起到启蒙的作用，但是仅仅有启蒙是不够的，真正的变革需要能量。到最后金想出了好几个计划，在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组织的同时，他花了很多力气去注册登记几百万新的黑人选民，争取大众传播机构，控制神职人员组织的影响，获取高层白人领袖的支持，他还发动了一个“非暴力队伍”的证人群。当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敌对势力威胁到这些成果时，金就要改变策略，不断尝试各种方法的组合。为此，他咨询了一些自称种族政治专家的人。但是，对多数白人来说，要推翻他们日常生活固守的安排是一件不太有希望的事情，因此，这些自称的专家往往是各色人等的怪异组合——虔信派教徒、纵火犯、世界大同主义者，以及其他理想家。金慢慢学会了辨别哪些是疯子的胡言乱语，哪些是堂吉珂德式的承诺。

在抵制运动期间，有一些局外人不请自来地拜访金，哈里斯·沃福德就是其中之一。沃福德是个有着明显南方血统的纽约人，他曾就读于耶鲁法学院，但是他对世界联邦主义运动的兴趣却是自小有之。在“二战”之后，他在政治理想主义驱动下来到印度，花了几年时间观察甘地主义，并同他的妻子克莱尔合著了《火中印度》一书。这对夫妻回国之后，坚信甘地主义在美国最适合运用的地方就是种族问题。让他的家人震惊的是，他在华盛顿州霍华德大学法学院注册学习

了两年，成为该校自1910年女权运动以来的第一个白人学生。其后，他在卡文顿和布尔灵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迪安·艾奇逊在华盛顿的大牌律师事务所。在那里，他主要负责应对大公司客户和那些少数鼓吹整合的灵魂人物，比如汉兰达平民学校的迈尔斯·霍顿。1954年，在给霍顿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希望我们能利用一些甘地主义的技巧。”沃福德的人脉甚广，从《时代周刊》的卢斯和麻省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到著名的黑人布道者莫迪凯·约翰逊，他都有联系，但在这两个社交圈里他都是个谜一样的人物。

沃福德在1956年开始试图引起金的注意。他给金寄了一份以甘地主义分析抵制运动的文章，同时还附上了他本人的著作，以及他写的一份关于非暴力行动的小册子。由于这封信没有得到回复，他又寄了另外一封信，在信中自我介绍为“你身边的战略家”，并提出这个问题：“难道现在不正是直接开展甘地主义非暴力反抗的时机吗？”金的一个助理在这第二封信上写下了“请审阅”的字样。金以潦草的笔迹回复道：“谢谢你的来信。”意思是说请助手拟写一份感谢的回信。沃福德并没有因此而被挫败，他开始搜寻金在北部露面的预告，并最终在纽约和金碰面。沃福德在匆忙中强烈建议金应该去印度见一见真正的甘地主义，而他可以帮忙筹集路费。

金有些动心，于是邀请沃福德来安排他的国外巡回演讲事宜。在抵制运动后不久，黑人兄弟会奥米加·珀西·菲友谊会在巴尔的摩举行“全国大会”，沃福德夫妇陪同金夫妇参加会议。柯瑞塔在大会的才艺比赛中表演了唱歌，但金在演讲中首先激烈地抨击了奥米加会员们一味追求吃喝享乐的行为，当演讲谈及黑人中产阶级时，他转入已经准备好的标准主题，他鼓动他们联盟而不是回避那些较之不幸的同胞。沃福德夫妇起先为其言辞的大胆而震惊，其后又再次震惊于听众对他的演讲的反应之热烈。这些兄弟会员欢呼鼓掌，完全没有因为金指责他们的世俗之罪而感到冒犯。金成了英雄，他一边演说，其他黑人组织的代表就一边有节奏地跺着脚回应他。此外，金挤出时间快速参观了几个教堂和当地共济会，这对

他而言是无法抗拒的事情。而在这一连串旋风式的拜访黑人机构的行动中，沃福德夫妇举止自然，证明他们具备与不同种族交往所需的经验。

在巴尔的摩，金和沃福德还会见了利比·霍尔曼·雷诺斯基金会，他们表示有兴趣资助金的印度之旅。由于事先得到了金的通知，贝亚德·拉斯廷作为金的保护人也出席了这次会面。拉斯廷非常希望金能够去印度，但又不想让沃福德来安排，因为他们两人自从1942年联邦主义大会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当时的拉斯廷认为，非暴力就意味着即使对希特勒也不能抵抗，对此，还是高中学生的沃福德予以了抨击。由于拉斯廷和沃福德两人都认识到金在非暴力主义运动中的巨大潜力，因而他们都竭力争取甘地主义导师这个角色。为了与沃福德在基金会的交情抗衡，拉斯廷也带了自己的资助人来到纽约，他就是斯坦利·利维森。

利维森后来成了金最亲近的白人朋友，也是他一生最可靠的战友。他们是在一个不落俗套的情形下被介绍认识的——在那个时代，这种情形是一种典型的“黑人方式”。利比·霍尔曼·雷诺斯控制着与其同名的基金会，她在娱乐界以情绪激烈的悲情歌手闻名，并且曾是演员蒙特哥马利·克里夫特的情人。她曾被控谋杀其烟草业巨头的丈夫，但最终被裁定无罪，从控罪中脱身以后，她继承了丈夫庞大的产业，因此，她这种晦暗模糊的形象很难与金或者甘地相称。然而，正是她那放荡不羁的个性才使得她可能资助一些别人都不肯资助的事情。金关于印度之行的讨论对象包括她，沃福德和拉斯廷这两个甘地主义对头（一个有头有脸，另一个差不多就是个逃犯），以及利维森自己。

尽管利维森从上大学时就是个左派激进主义者，但在他心里，资本主义却有很坚实的影响。时年44岁的他身为律师，却从不读法学书籍，也不接法律事务，他是因房地产投资而致富的，他握有几个汽车特许经营牌照，但是自己从来没有学过驾驶。利维森长期任职美国犹太人协会（这个协会比美国犹太人组织规模要小一些，而且更加偏向自由主义），专门经营AJC及其他一些公民自由主义或者其他激进事务的募捐活动——比如挽救罗森堡夫妇、废除麦卡锡时代反宪法的

《麦卡伦法案》以及其他限制政治观点的法案、帮助遭受《史密斯法案》摆样子式公审的受控方。自1949年以来，在《史密斯法案》之下，已有将近100位美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被关押或者递解出境。利维森频繁地与辩方委员会合作，在美国共产党被迫害最厉害的时期成为其事实上的财政支柱。

利维森是个绝对独立的思想家，有着五花八门的政治兴趣。1954年参议院谴责了约瑟夫·麦卡锡的权力，司法部减少了根据《史密斯法案》起诉的案子。此时，处境艰难的南部黑人想要根据布朗决议努力尝试整合公立学校，利维森和A. 菲利普·伦道夫及其他人一起加入了支持黑人的队伍。早在1956年爱默特·提尔被谋杀以后，他和拉斯廷，加上伦道夫、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博士、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还有其他一帮宗教和人权组织，共同组成了一个叫作友情会的紧急救援机构，主要在密西西比州为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筹款。1956年5月，参加麦迪逊广场公园集会的友情会的受惠者中，就包括曾经参加蒙哥马利抵制公车运动的群众。在拉斯廷亲自把利维森介绍给金夫妇之前的几个星期，利维森还亲自为柯瑞塔·金和哈里·贝拉方特在杜克艾灵顿的音乐会募集了绝大部分广告费。

金的直率风格令斯坦利·利维森印象深刻，他在那一刻决定要更好地了解金。至于金，他没发现利维森有什么可反感的事情，至少不反感他参与的所有激进行动。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不接受共产主义，但他从不动摇对麦卡锡主义受害者的支持，也一直赞成对共产主义者为被压迫者所做的宣传。他高度认可美国共产党在种族问题上的成就。共产党在种族平等方面所倡导和实践的行动，远远超出了国内任何其他政治组织。

本·戴维斯和金两人都知道利维森，他也是莫尔豪斯人，还是美国20年来四五个最有权势的共产党人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初，当莫尔豪斯学院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工作时，戴维斯声称他的职位是学校给最有钱、最有出息的年轻人所预留的职位：大学校长的司机。每天早晨，戴维斯身着盛装坐着自己的皮尔

斯——阿罗汽车到达学院，然后跳出来，戴上一顶司机帽，一本正经地坐上校长约翰·霍普全新的绿色道奇车履行职责。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戴维斯在亚特兰大黑人顶尖贵族区里悄悄住下来，一直到1933年他担任安杰洛·赫恩登辩护律师。赫恩登是来自芝加哥的不到20岁的共产党员，因为向黑人散发传单，并宣告共产党可以结束种族隔离和失业，他面临死刑判决——后来降为18年囚禁。赫恩登煽动叛乱案的上诉，是大萧条期间仅次于斯科茨伯勒强奸案的最轰动、时间最长的种族案审判。戴维斯非常惊愕于他直接接触的这些官方和非官方的根本仇恨，他的思想变得异端起来，认为美国民主和自己高高在上的黑人特权都不过是幻想。在放弃了两者，也放弃了家人的祝福之后，他加入了纽约共产党，从此以后，他的名字一直流传在亚特兰大黑人间的密语中。由于霍华德·拉什莫尔臣服于电影《乱世佳人》的“种植园”的谄媚，身为中央委员的戴维斯把拉什莫尔开除了共产主义报社。在“二战”期间，戴维斯还按照克里姆林宫的指示，强令贝亚德·拉斯廷停止反种族隔离的工作。在纽约市议会的定期选举中，戴维斯公开以共产党员身份参选并获胜；戴维斯担任纽约市议员，直到“二战”结束以后的1949年，那年他自己遭遇《史密斯法案》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审判。在被判阴谋颠覆罪关入亚特兰大监狱三年多以后，戴维斯在斯坦利·利维森的帮助下，募集资金为几十名共产主义追随者就相关控罪进行了辩护。

利维森见到金的时候，正值美国共产党面临被消灭的危险。由于剩下的党员中有许多人是FBI的线人，埃德加·胡佛曾一度考虑接纳一个提议，即在1957年2月召开党代会时，让这些线人投票支持共产党的一个派系，从而得以控制共产党。

在大会召开之前，3个敌对派系组成了一个人数极少的核心小组，小组成员为找到避免共产党解散的替代方案而发生了争吵。以约翰和莉莲·盖茨为代表的自由派想要摆脱对苏联的屈从，使美国共产党“美国化”。以本·戴维斯为代表的强硬派蔑视改革派的投降，但要对抗那些早已认识到的弊端，戴维斯能够想

象的唯一对策就是相当于另一场俄国革命的大变动，事实上，他为了追随克里姆林宫已经放弃了一切。戴维斯怒斥了撤退到亚特兰大、加入一支小心谨慎的 NAACP 小纠察队的建议。以阿尔伯特·“多克”·布隆伯格为代表的中间派则忠于共产党领袖尤金·丹尼斯；布隆伯格是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教授，还是外联专家，负责联系同情该党或者与该党合作的外界团体，正是以这个身份，他把斯坦利·利维森介绍给了核心小组。就各种妥协方案对本党与劳工和民权组织友好关系前景的影响，以及如何筹集资金为被起诉的党员抗辩的问题，领导们征求了利维森的意见。

在大家争辩的当口儿，利维森抽出身来打电话到蒙哥马利找马丁·路德·金。自从巴尔的摩会面后，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就扩展整合运动给金发建议和战略草案。当隔壁房间的人们听到利维森电话的内容时，一场新的辩论爆发了。盖茨夫妇愤怒地指责利维森正在让金遭遇不必要、不合理的危险。他们说，在这样一个全国最高级别共产党人的聚会上，如果间谍或 FBI 窃听器监听到这个电话，将置金于死地。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他们说，本党人士应该远离他，避免给他带来保罗·罗伯逊式的毁灭性打击——罗伯逊因为受到他们的鼓励承认苏维埃，结果遭受毁灭性打击。所有这一切激怒了本·戴维斯，他反驳说，盖茨派从来不批判，反动派倒总是指责本党。美国需要 100 个罗伯逊，他坚持认为，如果利维森可以再造一个金，那更好。争论让房间里的气氛炸开了锅，直到利维森回来，他耸耸肩说，金不是共产党员，他可以照顾自己，如此，争论才停止。

不久后的 2 月 9 日，全国大会在纽约的东村召开。贝亚德·拉斯廷作为观察员出席了大会，如其事先所预料的一样，很多热忱的人只要脱离共产党，他们都将可以致力于和平主义和废除种族隔离的工作。这次大会本身充满了苦涩和黑色幽默，告密者周旋于著名人物中间。以盖茨为首的自由派的决议以临时的多数票获得通过，但注定难逃不可避免的逻辑问题：民主化和美国化共产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遗弃它。最后一次大规模脱党很快就使共产党成了一个空壳，而这个空壳

又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专制、更盲目地亲苏。参加预备会议的核心领导成员都退了党，只有本·戴维斯还留在党内，他年纪最大也最强硬，因而也无法改变立场。对于金、利维森、拉斯廷，以及其他许多人来说，戴维斯的教训比罗伯逊更能说明问题。在6年的职业生涯中，戴维斯把自己和苏联扭曲和颠倒的战略牢牢焊在一起，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教条，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迫害和控告跟着他走到生命的终点——纽约甚至试图不发给他驾驶执照。在讲求实际的金眼里，戴维斯是一个极度悲剧性而不是极度邪恶的人物。

同样是在2月份，金、利维森和拉斯廷在进一步寻求他们认为更加切实可行的战略。金最重要的想法是，力量来自于领导人的声望和威信。为了寻求美国最高领导人对他事业的认同，他把目光聚焦在白宫。在欧柏林劳森会议后不久，他重新召集了亚特兰大牧师会议，此前，这个会议曾经在蒙哥马利的教堂爆炸夜中断。会议为了如何给自己定名而经历了摇摆不定且冗长的辩论，但他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发送几份紧急电报，这些文稿由斯坦利·利维森和贝亚德·拉斯廷起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恳求是，请求艾森豪威尔总统重新考虑他早前的回应——他当时认为自己不可能在南方就敦促法律和秩序的执行而发表讲话。电报还呼吁就遵从整合的裁决召开一次白宫的会议。“缺乏及早和有效的补救行动，”电报中说，“在道义上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发起到华盛顿的祈祷朝圣。如果你，我们的总统，不能来南方解救饱受折磨的人们，我们将不得不带着我们的人到首都来找你，我们要唤起全国人民对暴力和恐怖组织的关注。”

艾森豪威尔准备去佐治亚州南部度假，那是一个为期两周的狩猎假。在这之前，在罗得岛纽波特那里的一个教堂里，他听了一场应要求举行的新民法讲道会。在走出教堂时，艾森豪威尔握着海军牧师的手说：“你不能对道德立法。”这一著名评论迅速成为新闻，它等于否决了牧师们的电报要求。尽管它让金感到沮丧，但这句话为他提供了有利的材料，令他在众多的布道中谈及总统如何曲解法律的基本功能。艾森豪威尔是正确的，种族情谊首先是良心和道德的问题，金

说，但法律的目的是在平常生活的次要领域内建立正义。所有的法律，无论是寻求禁止谋杀或者禁止逃税，它们管辖的都是外在的行为而不是主观的态度。因此，金争辩说，人们渴望的民权法，其真正的目的是摘下“仅限白人”的标识，是确保黑人的投票权，从而使他们随心所欲地投票。“法律不可能让一个人爱我，”金说，“但它可以阻止这个人对我施以私刑。”

金想亲自把他的案子交给艾森豪威尔——看起来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总统躲开了。艾森豪威尔支持黑人享有基本的公民权，这就是为什么他在1957年允许重新提交关于投票权的立法提案，但他看不上黑人的合作。这种不愉快扩大到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法律，以及其他任何可能推动白人和黑人最低限度接触（甚至在公共场所）的提案中。有着40多年军旅生涯的艾森豪威尔，在军队的种族隔离条件下，他始终认为黑人天生就是下属。他们屈尊是那么的自然，他的俯视就如父亲一般，这一切都看似善意。当他在奥古斯塔的鲍比·琼斯高尔夫球场和朋友们传递最新的“黑鬼笑话”时，只有他的私人秘书因为尴尬而回避。在佐治亚州托马斯维尔度假期间，艾森豪威尔带着队伍在财政部部长汉弗莱的农场里打猎——他们坐在白骡子拉的柳条车厢里，赶骡车的那些人被一个朋友称为“带色老家臣”。他在农场里打到了第一只野生火鸡，也在那里收到了金发来的电报。此前，艾森豪威尔从来没有为讨论民权问题在白宫接待过黑人代表团，不回复金的电报也不意外。

金会见的第一个国家领导人结果是一个非洲人，即克瓦米·恩克鲁玛。他与柯瑞塔赶去参加加纳的独立仪式。这个国家原来叫黄金海岸，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一个独立的国家。金承认自己受到了尊重和厚待，他据此判断自己声望的高低和离开蒙哥马利的距离成比例——离家越远，声望越高。在纽约，记者把他从一大群一路随行的黑人中单独挑出来，却很少注意那些更著名的领导者，比如拉尔夫·邦奇、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莫迪凯·约翰逊，以及A. 菲利普·伦道夫等人；在大西洋上空，航班的机组成员通过《时代》杂志的封面认出了金，他

们邀请金进入驾驶舱，机长开玩笑地把他让到飞机控制台前；在阿克拉这个新独立国家的首都，恩克鲁玛以私人午宴招待金。在招待会、晚宴和舞会上，金都与美国官方代表团团长、副总统尼克松迎头碰上，然而尼克松在这几次碰面中都没有费心回应金的电报，他倒是非常精明地承认，他在加纳所见证的国家诞生的喜悦，是即将到来的世界变化的一部分。世界上有 30 亿人口——他从小就喜欢这么说，苏联和西方集团大致各有 10 亿，第三个 10 亿就在加纳这样新兴的贫穷国家中。尼克松说，剩下的这 10 亿的人口掌握着平衡世界的影响力，而白人在这第三个 10 亿中，只占极少数。在阿克拉，尼克松亲切接待了他的黑人形象大使同乡，他还邀请金到华盛顿就公民权利问题举行私人会谈。金离开家绕行了半个世界来争取听众，自然没有错过这堂政治课：作为南方州政治上的无名小卒，外交逻辑弥补了他原本欠缺的名望。他在加纳的经历帮助他坚定了信念，他的时代精神被提升到为保护被压迫人民的境界。他所看到的一切都在向他确认这一点。

这是金和柯瑞塔头一次周游世界，他们取道罗马、日内瓦、巴黎和伦敦回国。一路上，他们到处都听到人们叽叽喳喳地唠叨，说地球南部的殖民地将成为动荡不安的地区。4 月份，金走上德克斯特讲坛作旅途报告。他的会众为他的这趟外出得以成行补贴了 2500 美元——这相当于他半年多的薪水——而金，就像父亲一样，给予他的会众最好的报答就是重演旅途中的高潮时刻，实际上，正是有了他们的帮助才使得出行成为可能。这一次，他的讲道远远超出了日记或游记的范畴。他的演讲有一种行动之前的具有先见之明的自我意识。

金从简单的开始说起，他提醒听众们非洲的位置，告诉他们那里有多少人、多少个国家，以及一些国家的名字。他为大家勾勒出黄金海岸从殖民地到胜利的 1957 年 3 月 5 日的历史过程，他向大家描述了 500 名国际贵宾观看英国统治的议会被关闭时的胜利时刻。“那天晚上，再没有哪一件事比这件事更令我难忘了，”金告诉他的会众说，“这件事就是，恩克鲁玛和他曾经的狱友、现在的部长们一起走进来看到的情景：他们没有戴皇冠，没有任何一件装饰物，他们是戴

着囚帽、穿着囚服走进来的——那是他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的好几个月监狱生涯的见证。”他告诉大家自己印象深刻的景象之一就是：恩克鲁玛和肯特公爵夫人在国家庆典舞会上共舞。先是他们相拥着旋舞，那是新总理和英国皇室的代表共同起舞。对金来说，显然被恩克鲁玛的见解迷住了，而公爵夫人“在一架平等的飞机上与贵族共舞”的话，更几乎使经伦敦回程成为旅途的一个诱惑。“当我们走向白金汉宫时，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脑海里浮现的那些念头，”金继续说道，“我在那里看到了整个英国；看到了皇室所有的盛大场面和仪式；我想到了所有曾经从白金汉宫走过的国王和王后；我看到了卫兵换岗的漂亮仪式和他们漂亮的坐骑。眼前的一切如此美丽。”他深情地沉浸在这些宏伟场面的描述中，但随后，萦绕心头的殖民主义问题以伏击的方式突然降临。“我想到了很多东西，”他说，“当我身处美丽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时，我想到了所有美妙的赞美诗和圣歌，那是所有走进教堂的人都会唱诵的内容，可是英格兰的教会在立场上，从来没有反对过这个制度，它们认可它，并且赋予它道德的形象。长期以来，大英帝国的剥削都得到了英国教会的批准。我的脑海里还浮现了别的一些事情。即使教会不表明立场，上帝还是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上帝……曾经说过，人类的尊严和价值必须在每个人身上得到体现……似乎就在今天早上，我还能听到上帝在这么说。”

演讲过程中，金的情绪突然高涨起来，他试图摆脱权力和盛名的诱惑，他要在世俗荣耀和精神胜利这两个古已有之的两极之间开辟出自己的道路。“后来我又能再次听到以赛亚的启示，”他说，“因为它对我具有意味深长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凹凸之处要变得平坦，崎岖之地必成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華亲口说的’，就是事情美妙之所在，众生都应该能同时看到它。从公园街的高楼大厦到贫民区的地库，从大英帝国的尖塔到非洲的黑沙漠，无论是富得流油的有钱人还是凄惨麻木的赤贫者，无论白人黑人，无论黄色或棕色人种，芸芸众生都应该同时看到耶和华的荣耀。从蒙哥马利可以看到！从纽约可以看到！从加纳

可以看到！如同施洗约翰所见，我能看到浩浩荡荡的人们正迈向伟大的永恒，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此时此刻，他就在我们身边。上帝答应我们，到时我们将与神同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得到号令，要打破和推翻殖民主义、剥削制度、帝国主义的束缚与壁垒，直到不再有人遭受他人的蹂躏，到那一天，人人都将尊重人类的人格尊严和价值。从那以后，我们将生活在迦南的自由之地。摩西可能看不到迦南，但他的孩子们会看到它。他甚至在山顶就足以目睹它，并且他所看到的足以向他保证，那就是迦南自由之地。”金的讲道以要会众同唱传统的浸会邀请赞美诗结束。在管风琴奏出的音乐声中，会员从整洁的小教堂鱼贯而出，他们带着的不仅仅是对伦敦和加纳的认识，更带着金自己版本的未来启示。

走出讲坛，金仍然用蛊惑的方式来寻求影响力。他推迟了去拜访尼克松的邀请，因为他担心这个会面可能危及进军华盛顿的祈祷朝圣——这个行动的出发点原本就在于政府拒绝倾听黑人的不满，而金想要实现这次游行计划。在加纳的时候，他曾和伦道夫讨论过，而在纽约，他们向罗伊·威尔金斯提出了这个计划，并且采用的是一种迫使对方赞同的方式。对威尔金斯来说，他并不喜欢游行，但可以接受这次朝圣活动，因为这个活动被表述为大众恳求支持政府投票权法案的祈祷朝圣。金同意就投票权问题向人们发表讲话，而把废除学校种族隔离这一重要问题留给威尔金斯和 NAACP 来全权负责。

为了准备朝圣，领导人倚重于新结成的联盟——友谊联盟。斯坦利·利维森专注处理资金问题、合同和广告事务；而贝亚德·拉斯廷则起草战略备忘录，并在教堂地下室分发编好的鼓舞士气的讲话稿；威尔金斯独自一人在华盛顿周旋运作。为了获得使用林肯纪念堂平台的许可，他的人上书政府提出请求，但当局对此搪塞敷衍，因为他们认为，允许成千上万带着不满情绪的黑人聚集在首都的心脏地带，就算不是灾难也是自找烦恼的方案。威尔金斯和他的华盛顿代表克拉伦斯·米切尔让白宫的助手们相信，金曾经打算 3 月份到华盛顿抗议艾森豪威尔的“无所作为”，但 NAACP 阻止了这个计划。他们还告诉白宫的人，NAACP 的

律师瑟古德·马歇尔私下评论金是“机会主义者”和“一流的蛊惑家”。由于采用了这种迎合政府的方式，NAACP成了更负责任的黑人运动务实派。马克斯韦尔·拉布向他的白宫上司保证说，金“纯粹个人特征”的计划已经被修改，这样一来，总统将“不会受到负面影响”。争取白宫对使用林肯纪念堂的许可，这是大家的共同目标，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NAACP阵营推进了一些偏狭的利益。这就是内部政治。

金在撰写讲话稿时，知道这将是他的职业生涯中听众人数最多的一次大型现场演讲。在朝圣之前的一次巡回演讲中，他和他的私人编辑们、拉斯廷和利维森反复打磨文字。拉斯廷极力反对金的草稿中最重要的一句话——“给我们选票！”在一份正在修改的草稿中，他代之以“当我们已经获得了选票……”

金皱着眉头静静地研究了这些改动，然后说：“拉斯廷，这句话我就是说不出口。”

“那好，”拉斯廷说，“告诉我你想说什么。”

“给——我们——选票”金一字一顿拉长音调地说着。他简直就是唱着读出了这些字词，仿佛是要强调：他关心的是这些文字听起来的实际效果，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拉斯廷做了个深呼吸，然后开始解释。“金，有色人种再不希望谁‘给’他们任何东西了，”他说，“为什么你不说‘我们要求选票！’或者类似的话？‘给我们’就像撒了一堆土下来。”

金用拉斯廷所谓的温柔的眼神看着他说：“嗯，拉斯廷，我不介意你批评我的想法。但是，我不喜欢你对我句子的批评，因为在文字上，我的感觉要比你好。”争论就这样结束了。拉斯廷并不服气，他担心金的失误会导致空谈家们给他打上软弱和无能的烙印。

1957年5月17日，正是布朗案裁决3周年，这天举行了祈祷朝圣。大约3万人聚集在林肯纪念堂前，整个意气风发的活动历时3个多小时。集会由伦道夫

主持，马哈丽雅·杰克逊献唱。在威尔金斯演讲时，一架军用直升机在上空嗡嗡作响，但轮到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演讲时，直升机却飞走了。这个小插曲促成了一个笑话，人们开玩笑说，就是因为鲍威尔在上次选举中支持艾森豪威尔，所以他借此获得的影响力对飞机也起作用。其他大部分发言者都是传教士，他们包括莫迪凯·约翰逊、威廉·霍尔姆斯·鲍德斯和弗雷德·夏特沃斯。还有一批正在冲出黑人市场的新生演艺界名人，他们是：小萨米·戴维斯、鲁比·迪伊、西德尼·波蒂埃，以及哈里·贝拉方特。金的演讲排在最后。当伦道夫宣布他出场时，人群早已忘记了保持虔诚礼节的规则。留在蒙哥马利的柯瑞塔通过电台听到了人们山呼海啸的轰鸣，此时，她的丈夫正发表关于南方黑人几乎被完全剥夺公民权的强烈抗议。金一连数句：“给我们选票！”效果如同外交礼炮的致敬轰鸣，让贝亚德·拉斯廷听得既震惊又颇受打击。即使金脱开讲稿，离题解释“eros”、“filios”和“agape”这3个表示“爱”的希腊单词的区别，观众们都报以起劲的欢呼。拉斯廷明白了，他以前高估了内容的重要性。新闻评论人士说，金的表现证明，他在蒙哥马利的领导地位绝非侥幸得来。拉斯廷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不过他还是疑惑金的一个能力：金演讲用到的素材似乎只适合于抄录在大学生的笔记本上，但他能借此激励截然不同的广大听众。

金给副总统尼克松写了一封刚好可以在朝圣那天送到的信。这封信是为了提醒尼克松别忘了在加纳时提出的邀请。对于在华盛顿召开会议的日期，金提出了4个建议，尼克松也迅速做了确认。按照流行的说法，这次会面最终变成黑人领袖和尼克松或艾森豪威尔举行的第一次“高峰会议”。更可喜的成果来自金在朝圣集会上的表现：在演讲结束后仅3天，内阁部部长马克斯韦尔·拉布找到金在纽约下榻的斯塔特勒酒店，部长对金说，艾森豪威尔本人很高兴马上就能看到他。

见面时金应该对尼克松说什么，以及如何会在会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拉斯廷和利维森就此进行了预测、辩论，并和金一起进行演练。他们竟然起草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包括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可能提到的问题，并给出了如何回应的建

议。“假如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重要概念，那它就是无党派道路。”他们给金写道，这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尼克松可能会引诱他公开发表有利于共和党的声明。这两个顾问知道金很容易轻信共和党的花言巧语，因为老金和全国浸信会所有最强大的传教士几乎终身都是共和党人。他们通过反复强调和施压，敦促金以“超人的警惕性”反对党派偏见，理由是“本次会议对种族关系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1957年6月13日，在阿伯纳斯的陪同下，金来到美国国会大厦的正式会见室。他在那里会晤了副总统尼克松以及陪同尼克松的劳工部部长詹姆斯·米切尔。会晤开始前，这4个人摆出不同组合的姿势给获准入内的摄影师拍照。拍摄完毕后，会晤闭门进行。在寒暄了一番后，金就开始了大段的独白，他讲述了黑人在南方所受的压迫，重申了他此前提出的要求，即艾森豪威尔总统应该到南方来发表讲话，应在南方呼吁遵守最高法院关于在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裁决，以及落实黑人的投票权。金说，如果总统不能来，那么尼克松就应该来。尼克松回答说，他也许可以在南方某个地方安排一次关于政府合同的总统委员会会议。他请金和阿伯纳斯帮忙选择最佳地址，最终，他们3人敲定的会议地是新奥尔良或者亚特兰大。在讨论过程中，尼克松确立了自己和两个传教士之间的联盟基调。他们所对阵的，是参议院中势力强大的南方民主党人，这些人既不想发表讲话，也不想召开听证会；既不支持学校废除种族隔离，也不要什么新的《民权法案》。尼克松说，对于那些终极法案，因为共和党掌握的选区在公民权利方面的问题上影响不大，一些共和党人就会大意或者偷懒，而民主党中的自由派人士由于没有机会击败南方的阻挠，他们就会很容易表现得“哗众取宠”。

副总统对政府通过《民权法案》的政治议题过于投入，以至于忘记了会议的时间。两个小时过去了，70名记者还在外面等着。当金和阿伯纳斯终于出现时，闪光灯照亮了他们的面孔。正当记者们一拥而上准备提问时，贝亚德·拉斯廷从侧边走出来宣布，金博士不会回答任何问题。在一片喧嚣哗然中，拉斯廷成功地把金和阿伯纳斯转移了出去，并坐上了门外等候的汽车。因为没能现场采访到金

的谈话，一些黑人记者尤其生气。关于和尼克松会谈的内容，金只给了他们含糊的回应。为金所认同的拉斯廷的逻辑是，他不能讨论这个无党派之争或者不与政府相悖的会谈。

私下里，金告诉拉斯廷说，尼克松是一个热情与实用主义相混合的人物，其基本立场是，他愿意为《民权法案》提供帮助，但前提是，他这么做不会造成政治上的危害。金对副总统保留的主要看法是：他似乎对所有话题都表现出同等的嗜好和信念，从而掩盖自己的内在本质。尼克松是“有魅力的”，金在一年后这样写道，那是一封介于奉承和怀疑的公开信。“我会说，尼克松拥有一种天赋，它让人相信他是真诚的。当你接近尼克松时，他以显而易见的诚意令你几乎放下武器……所以，我会如此总结说，如果尼克松不真诚，他就是美国最危险的人物。”

尼克松则私下告诉他的白宫同事们，金曾许诺，如果投票权议案成为法律，他将发动大规模选民登记运动。金和阿伯纳斯都透露，他们在1956年大选时投的是共和党。他还说，金和阿伯纳斯认为，大多数黑人新选民也会把票投给共和党。在一个单独的通信中，尼克松说，他认为艾森豪威尔会很享受与金的谈话。他向总统保证，金不是“一个信奉暴力的人，也不信奉报复性的亲黑人行动”。

1982年来的第一个《民权法案》在参议院的辩论耗时121小时31分钟。在这场辩论中，南卡罗来纳州的斯特罗姆·瑟蒙德长时间不间断地把持发言权，时间达到了创纪录的24小时多一点。除了这些毕生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外，立法的纷争也向常规的政治分派发起了挑战。多数党领袖、得州的林登·约翰逊明显要运作一个法案的通过，而这个议案实际上更像是他自己的而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在主席台上居高环顾参议院议席，约翰逊经常像转动大风车一样挥舞双臂，向前推动参议院的事务。他以他认为的政治重心，删减议案至可接受的最低限度形式，然后在党内对双方进行合情合理的说服：他告诉自由派，这是可能范围内最有效的形式，而对南部民主党人，他又会说这样的效果是可能范围内最弱的。约

约翰逊威胁、哄骗，为投票讨价还价。为了这个极有可能通过的法案，虽然不像是真的，但约翰逊的对手、最保守的共和党领袖、加州的威廉·诺兰扮演了冲锋陷阵的首领角色——诺兰家族是《奥克兰论坛报》的所有者，而这份报纸出了名的对黑人不友好。

由于极有分量的劳工组织加入了南方阵营，各方政治联盟进一步复杂化。劳工组织辩解说，还正是由于民兵可以根据单个法官发出的禁令而采取行动，才导致太多的罢工遭到打击。有鉴于此，劳工领袖们才会拥护一个修正案，即对于被控违反法庭关于投票权命令的政府官员，要保证给他们以陪审团的公正审判。威尔金斯强烈辩驳道，若这样的修正案生效，将使投票权条款失效，因为人们普遍承认，在黑人投票权的案子中，没有一个南方陪审团会反过来对州政府官员定罪。然而，还是有许多劳工领袖加入了反劳工的南方阵营，而威尔金斯就和他的死对头、参议员诺兰站在一起。

高潮时刻出现在8月2日午夜之后，约翰逊删除了法案中的一项条款，即授权司法部为强制学校废除种族隔离而提起诉讼，然后对陪审团审判修正案进行投票。共和党人和一些自由派民主党人夹在黑人和艾森豪威尔之间是一方阵营，而约翰逊、南方人和劳工组织共同结为另一个阵营。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约翰·F.肯尼迪在最后一分钟走到了约翰逊这一方——这是民权领袖们不会马上忘记的一个叛变，陪审团审判修正案最终以51:42票获得通过。挤满参议院的记者听到尼克松副总统谴责了参议院的行动是“一个反投票权的表决”。尼克松在衣帽间揪着约翰逊的衣领，勉强承认暂时失败的同时，发誓要在明年通过一项更加强硬的法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克拉伦斯·米切尔惊讶地看到坚韧不拔的保守派、少数党领袖威廉·诺兰居然在办公室因为公民权利的挫败而流下了眼泪。在随后上午的内阁会议上，艾森豪威尔称陪审团审判修正案是他的政府最严重的政治失败之一。投票权是他坚决支持黑人运动的一个领域，议案遭到阻碍，使得艾森豪威尔再次面临来自黑人的其他问题上的压力，而他在这些问题上，私

下里是同情那些南方人的。

修订后的《民权法案》不到一周之后在参议院通过。再次证明，时机本身比内容更重要。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称赞该法案为“‘二战’以来的伟大成就之一”，而《纽约时报》则称之为“本世纪国内任何一届国会行动中意义最深远的一次”。这样的热忱肯定在民权领袖自己的头脑中撑开了轻信的范围。罗伊·威尔金斯在华盛顿约瑟夫·劳的办事处召开了一次会议——劳是知名白劳工律师，他和雷因霍尔德·尼布尔以及其他人士创建了美国民主运动协会（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 ADA）——会议讨论的唯一议题是，是否力促艾森豪威尔否决这个毫无价值的被削弱的法案。在拥挤的房间里，这个论点白热化地争论了一整天，几张桌子堆满了咖啡杯和电话留言条。威尔金斯最后决定接受该法案，金也跟着宣布他也同意该法案，这导致黑人报纸抨击他们两人态度中庸。“你怎么这么糊涂？”《芝加哥后卫报》这么质问金。威尔金斯用他习惯的风格为自己的决定辩护：“你在用小勺挖水沟的时候，一个男人走来给你一把铁锹，如果因为他没给你推土机而拒绝了他，我看你的脑子多半是坏掉了。”

虽然金和威尔金斯都承认1957年的《民权法案》，但法律的作用是突出他俩之间的差异。对威尔金斯来说，这部法律意味着NAACP的立法活动获得了初步收益，尽管微薄，但他说，民权不再是一块“处女地”。对金来说，这部法案的教训是，黑人应该减少对白人机构的依赖，要自己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在参议院最终通过《约翰逊法案》的同一天，金打电话给协会的传教士，通知他们到蒙哥马利来召开另一次会议（SCLC）。传教士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改了他们新组织的名称，协会从此定名为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根据金的建议，他们采取的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永久性组织结构，目的是尽量减少与NAACP的摩擦。金的SCLC被确立为由主要是教会和民间团体的分支机构组成的共同体。不像NAACP，SCLC没有个人成员，因此，协会的分部就不会为招收会员而产生竞争。SCLC领导人强调，他们是一个辅助机构，其目的是使该地区的黑人领袖

们在计划活动时，确保与 NAACP 的行动平行而不交叉重叠。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在 1960 年总统大选前，完成 200 万黑人新选民的注册。

这种模仿外交的方式对威尔金斯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他意识到，围绕在金周围的这些传教士代表了南方那些著名的黑人教会组织，而这些组织正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有着共同目标的两个组织，而且是其中一个已经，并正在卓有成效地工作的时候？”蒙哥马利 SCLC 会议召开几天后，《匹兹堡快递报》提出了这个问题。威尔金斯看到 SCLC 进入了一个真空状态，这种状态有一部分是金自己创造的。有色人种协进会陷入 25 个独立的诉讼中，这些案子都对他们在南方的运营权发起了挑战，而且大多数都是由敌视 NAACP 的州和直辖市发起的。协进会已经有效地在亚拉巴马州取缔了 NAACP 的先锋行动，之前就把目标瞄准了金的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威尔金斯担心，金提出的那种大规模行动，将可能置 NAACP 在南方的事业于死地。NAACP 长期致力于在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斗争，现在这 25 个由敌对白人发起的大规模行动，让他们的战略家看到，这将对 NAACP 事业最大的威胁。小石城危机适时论证他们的观点。

9 月 4 日，阿肯色州州长欧瓦·福伯斯给国民警卫队下令，要防止 9 名黑人学生到此前为全白人的中央高中注册入学。学校管理人员早在 3 年前的布朗案裁决之后，就已经开始预备着这一天的来临。现在，他们在学校走廊巡逻，敦促那些不太好约束的学生对“事件”保持克制，并且要他们每时每刻为自己、为学校、为国家着想。但是，在福伯斯的军队像禁止那 9 个新学生一样禁止黑人服务人员进入学校后，一些教职员工不得不自己做饭、自己打扫教室，因而发了些牢骚，但大多数教师都表现出无懈可击的正直，而且大部分白人学生的表现也同样如此。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整合，但那些在窗口向外叫嚣“黑鬼滚蛋”的，基本上都来自同一个闹事的小团体，这些人都是些行为不检的家伙。

当天的事件在社会上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最后演变为众所周知的小石城危

机。一大拨儿愤怒的白人暴徒每天早晨聚集在中央高中门外，就是要确保部队把学校门口的黑人学生赶回去；相应地，一大拨儿记者赶到小石城报道部队、暴徒、学生、州长，还有最后出场的艾森豪威尔总统。长时间的拖延和军队围城的戏码使小石城成为现代电视时代新闻盛会的第一现场。福伯斯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他叫板联邦法院的权威，拒绝撤销他下达给部队的命令。法律专家一致认为，福伯斯动用州的武装部队对抗联邦政府的权威，已经带来了内战以来对《宪法》的最严重考验。人们纷纷给总统发电报，要求总统采取坚定的立场，而金和威尔金斯也在其列。

危机进入第十天，福伯斯飞往罗得岛纽波特，在那里和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一个私人协商会议。福伯斯似乎有一个分裂的人格。这一刻，他是一个痛苦的政治家，他想要寻找一个方法，以结束已经闹得不可开交的对抗；下一刻，他又是一个宣传天才，他咆哮着说，联邦图谋把他锁上链子拖走。白宫的助手们对州长的个人心理困惑不已，这种表现似乎是为出入公共场所而设计的。福伯斯的父亲曾用假名给报纸写过几封抨击儿子种族主义的信，有人说他相信州长的真正动机是要为难那些逃到郊区、把种族问题留给他的白人贵族。无论动机如何，福伯斯很是恼火艾森豪威尔，因为后者先是同意声明草案，随后又在他回家发布消息之前改变文字。艾森豪威尔多次表示，法律必须遵守，但他能想到的几件事情都要比使用联邦武力制服福伯斯的部队糟糕。福伯斯利用这些声明断定：总统正在秘密和种族隔离者一起工作。

危机在高态势下又持续了一周，联邦法院以一纸铁证如山的藐视法庭的传票把福伯斯逼到了死角，这位愤怒地和国会议员、律师、白宫助手和其他调解人谈判的州长，开始表示愿意改变部队任务：原来是为了保护白人学校免遭9个黑人孩子“入侵”，现在改为保护9个黑人孩子免遭暴徒伤害，此时，白人暴徒的人数已上升至一个营的规模。“现在开始受难！”报纸头版以这句话刊登了州长宣布投降的挽歌。然而，9月23日，星期一，他直接从现场撤走了国民警卫

队，把学校留给了暴徒，再一次出卖了白宫。到那天上午，愤怒的白人已经殴打了至少两名黑人记者，打烂了学校的许多门窗，这些暴徒贴近黑人学生想要虏获他们，以至于小石城警方要拼死疏散这几个孩子。中央高中午餐前再次隔离了黑人，而学生们也加入了暴徒庆祝胜利的欢呼。

就在福伯斯再次允许暴民四处乱窜的第二天早上，艾森豪威尔的耐心消失殆尽。再也不能放任危机，他让自己坚信，小石城的问题不是种族融合，而是类似谢斯叛乱（Shays' s Rebellion）这样的问题。“好吧，如果我们不得不这么做，而且我也没有看到其他任何选择，”他告诉总检察长布劳内尔说，“那就让我们运用最佳军事原则，要让人们知道，我们派出的军队足够强大，它不容挑战，也不导致任何冲突。”听到总统的话，布劳内尔顿时感到肾上腺素激增，这种感觉他始终不曾忘记。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五角大楼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说，美国法警的计划已经作废，他要调用第101空降师的经过防暴训练的部队。艾森豪威尔命令泰勒以最快的速度调配军队，并部署到中央高中所在地。泰勒在天黑前就把1000名士兵送到了小石城。

小石城的学校整合在第二天早上得到了恢复，美军的进驻解决了军事问题，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发生战斗。那些很小型的抵抗发生在学校内部，而且是学生风格的抵抗。学校里有一个捉弄黑人的运动，这个运动既给这9个新学生也给学校管理人员制造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考验。在学校外面，无所不用其极的威逼恐吓语言和讲话者的能力形成反比。由于州长福伯斯已经陷入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他的声明忽而变得高度的幻想，忽而又掉进种族恐惧的深谷。在一次不着边际的广播讲话中，他指责“占领军”中的白人士兵，说他们居然允许黑人女学生进入中央高中的女浴室。按照福伯斯自己的标准，他是失败了，同时还让他的州遭到国际上的揶揄。但阿肯色州的政治家不情愿地承认，他的表现足以使他在下次选举中成为不可战胜的人物。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名叫斯普尼克号。

这一成就通过新闻传来，既在美国政界中产生了忧虑不安的震动，也让骄傲的美国政界很受伤。一夜之间，几乎美国的一切人和事——它的道德、它的科学家、它的数学老师，甚至它的道路系统都成了二流货。氢弹科学家爱德华·特勒告诉艾森豪威尔说，苏联的人造卫星让美国遭受了比珍珠港更惨重的失败。一个蓝带委员会在报告中措辞尖锐地指出，如果不迅速大幅增加武器的支出，不增加用于每一个美国公民修建地下“防核尘掩蔽所”的应急项目费用，西方是毫无防御能力的。“太空的控制，”约翰逊宣布说，“意味着世界的控制。”美国第一个比拼苏联壮举的卫星发射尝试，在电视镜头众目睽睽之下，以起飞两秒即爆炸的方式结束，成了国耻。记者对艾森豪威尔的提问除了关于卫星问题以外几乎别无其他。福伯斯从新闻中的消失就像他的出现一样突然，因为人们对整个种族问题的关注已经随着卫星事件而相应退却。

就在金逆势奋斗的时候，来自 NAACP 的竞争几乎成为他在自己同盟军中遭遇到的唯一障碍。战术上，他知道他的事业必须超越公交车抵制运动的层次，但黑人要如何在他们已经排除了的图书馆、学校、公园、餐馆和其他设施中进行抵制呢？公交车系统为大批蒙哥马利的黑人提供了政治杠杆，抵制乘坐只是一种行动，但可以有效地发挥杠杆作用，并且无须面对面与白人的权威进行非法的对抗。除了公交车系统外，没有其他种族隔离的机构能提供这样的优势。

由于缺乏现成的答案，金报复性地以他最显著的天赋每周 4 场演讲，一年下来就是 200 场。一本杂志在采访金之后，估计他每年出行 78 万英里。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哪怕真实距离只有这个数字的四分之一，让他乘坐螺旋桨商用飞机平稳飞行，也足以一年绕行地球 8 次。他获得了全能传道者的名誉，他对人们宣讲整合，其对象既有精英之士也有谦卑之人，既有饱学之士也有无知之人，既有实用主义者也有理想主义者。这一切他都做了，然而，他却中了传道者的诅咒。不管他接受多少欢呼，或者多少热泪纵横的面孔向他保证生命已被改变，明天报纸上的内容和今天的几乎没什么两样，种族隔离依然如故。人们全心全意地听

讲，但也仅止于此。而金本人，他更有把握的是人们会想什么而不是会做什么。在这样一些条件下，演讲术的逐渐加强对他就像一种麻醉，他越来越需要它，因为他享受这种体验，但这是一个对结果日渐不满的体验。

要让更多的人听到他的启示，通过公共媒体的传播就是一个改进办法。“我们需要每周一个半小时的赞助，”利维森半真半假地给金写道，“我们已经有了明星。”电视是黑人没有企及的领域，利维森最多能做的就是，帮助金获得哈珀兄弟出版社（Harper & Brothers）的写作合同——写一本关于蒙哥马利的书。这个冒险计划有作者的声望和大量读者群的保证，但文化和商业的压力还是约束了这个项目。出版商希望金要讲述智慧但又不能太过枯燥；要鼓舞人心但又不能太“黑人”。所有的编辑都告诫金要突出对读者的亲近或认同。对白人读者讲述的部分，他将被毫不隐讳地标榜为“他的人民的领袖”。这些语态和语调的复杂性即使对金而言都很有难度。他严重拖稿，超出了出版商设定的最后期限。对出版商来说，金是一个还没交出作品的作家，他要讲述的是一个过期就烂尾的故事。

压力不断之下，纽约的编辑飞到蒙哥马利命令金停止布道。“布道的准备和宣讲会耗尽你创作的能量，而你写作这本书的身体和灵魂需要这些能量。”他在后续的信中写道。金没有在意命令，但他最终接受了最后条件，在他的3500美元版税垫付款中拿出2000美元，支付给哈珀的工作人员爱米娜·波普尔，用以回报她身兼作家和编辑的指导。几天之内，波普尔就开始发挥编辑网络中枢的作用，她在金、利维森、拉斯廷、哈里斯·沃福德和MIA历史学家L. D. 莱迪克几个人之间飞来飞去，不断更新完善书稿。金私下对利维森吐露，写书计划“一直是我所遇到的最困难的工作”。

在他们相识的第一年，金对利维森身份的依赖是：顾问、业务经理、一流纽约政治引路人，对金一无所求的最重要的朋友。金的其他顾问，即使他们试着克制，也都会在他身上寄予个人的渴望、野心，或者把自己最迷恋且深信不疑的理论强加到金身上。但利维森似乎避开了这种轻浮和幻想，只要在高效工作，他就

能做到毫不惜时。他和金很少讨论重大问题，因为他们非常一致地同意不在两人之间谈论这类话题。就个人的投资策略问题，利维森给了金非常详细的建议，并指出“普通股走弱时，债券就表现好”，他甚至介入金的纳税记录。对金来说，利维森活生生地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改革者不必是傻子、受害者，或者是失败者。并且，还有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就是，利维森和金的父母相处得很好。利维森第一次到亚特兰大拜访金的时候，金的父亲带他回家吃饭，金的母亲为他做了自己的儿子最爱吃的柠檬馅饼。在亚特兰大，这样跨种族的喜庆场面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亚特兰大市长办公室里有一些老金的白人朋友，即使是他们也不曾到金家里来一起吃饭。相较于金的那些黑人顾问，比如拉斯廷等人，金家给予了利维森更多的热情，因为他们认为那些黑人顾问可能给儿子带来危险。金的父亲是出了名的偏爱有钱人。

巴尔的摩会议是“一个最不寻常的年轻部长”会议，此后不久，利维森就对妻子说，金是他在世界上唯一真正的朋友，这番话惊呆了他的妻子。利维森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金讨论政治。金打电话来的时候通常是在午夜，然后，他们直率而友好地聊上好几个小时。金并不曲意奉承利维森的衣着品位，而利维森到南方来的时候也不会假装喜欢吃水煮卷心菜。他们的关系似乎根植于一个不偏不倚的中立区，这是一个理想天真、超越种族的地带。金拒绝接受利维森不可知论的表白。“你不知，利维森，”他取笑说，“但你相信上帝。”

金寻求以大众传播作为两种传播运动的备选方法。他想，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群众集会，夜复一夜地用理想——他在蒙哥马利所展示的前景，把人们团结在一起，在特殊城市或城镇对种族隔离发动攻击，那么，这也许是可行的。说也奇怪，他的模型是“十字军征伐”，而这个概念由福音传教士葛培理的理念发展而来。葛培理那些熟练的组织者会用几个月的时间来为每个目标区域做准备，在葛培理抵达当地开始为期两周的夜晚群众集会之前，他们编制邮件列表、争取教会的赞助商和志愿者团体、安排宣传活动和特别的公交线路。对金来说，就像葛培

理一样，他首先还是一个推动者，因而，这种基督教风格的设计非常有前途。

在葛培理看来，金的论题足以令其得到邀请，在1957年麦迪逊广场花园68号十字军布道会上做一次祈祷。作为一个开明的白色原教旨主义者，这位福音传道士在黑人中的声誉正在提高。小石城危机期间，葛培理的黑人工作人员之一发表了一篇题为“天堂没有色界”的文章，其中就汇集了葛培理反对种族隔离主义教义的观点。葛培理在哈莱姆区举行群众集会，他的十字军委员会里就包括金最亲密和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朋友——友谊联盟的加德纳·泰勒和托马斯·基尔戈。在他们的建议下，葛培理和金在纽约进行了3次私人战略会议，之后他成了可以用迈克（金出生时的名字）称呼金的少数白人之一。两人在一连串布道行动中分享着成就感，他们借群众组织和大众传播推进着福音的力量。在金这边，甚至有葛培理——金的十字军布道梦想，它将首先在北方实现听众在种族上的混合，然后在边境各州，最后推进到南方腹地。然而，这些梦想因为政治和纯宗教之间所强调的问题而陷落。基尔戈和泰勒发现，葛培理越来越不愿意谈论种族问题世俗的一面，否则他就要谈到将要失传的异族复兴戏剧。此外，种族的两极分化使得葛培理更加难以举行种族完全混合的会议。像无数南方温和派一样，他被迫做出了选择。这个选择使得金在此后一年里写信给他的“葛培理兄弟”，恳求他不要让种族隔离主义政治家登上圣安东尼奥十字军布道讲台。两位传教士心照不宣地同意将彼此的合作视为隐私。

金没有轻易撤销他为全国浸信会联合会制订的计划。全国浸信会500万会员和两万多名传教士的规模令NAACP相形见绌，令SCLC数以百计的组织成员或者以此为基础的传教士在数字上看上去微不足道。金的目标是要把庞大、笨拙、政治迟钝的全国浸信会变为一辆社会改革的汽车，这是对最精明的传教士政治家们的挑战。在1957年9月的大会之前，当杰克逊答应下台时，金痴迷地讨论这个计划。但是，正如许多传教士所怀疑的那样，杰克逊明显重新考虑了他的章程职责。当时机成熟的那一刻到来时，一名杰克逊的助手跳起来，要求保留规则使杰

克逊继续担任总裁，并引导了掌声通过的巨大欢呼。这次选举结束得比卡车司机工会的选举还快。随后，杰克逊逐步稳固势力，并反对联会陷入民权运动中，他变得更专制也更保守。和金关系密切的传教士们在自己的教堂里渐渐走向造反，他们开玩笑说，葛培理貌似比杰克逊更有可能回归民权事业。

金固执地要求策划一个新运动的方案。10月18日，在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的第一次执委会会议上，他给聚集一堂的传教士们提交了一个详细的活动计划，他称之为“公民圣战”，这是葛培理十字军东征的修改版本，目标直接定位于黑人的公民登记。福音会的群众集会吸引了那些未登记的黑人，接着，人们开始注册类别，并支持委员会所做的那些尝试。金敏锐地意识到，他的董事会成员几乎全部同时是NAACP的官员，他试图让大家放心，罗伊·威尔金斯赞成十字军行动，但持怀疑态度的传教士告诉他，即使是这样，“十字军”这个词也没有下达到当地的NAACP分会。

几乎是仓促间的铤而走险，金宣布了他的计划——在2月份同时启动至少10个城市的“公民圣战”。且不说NAACP的怀疑，这个计划之所以看似野心勃勃实则有勇无谋，是因为在当时，初出茅庐的SCLC除了拥有教堂里的传教士和金以外其他一无所有——那些人像贵族理事会一样守规矩，他们听到的是理想与幻想的长篇演讲赞词，面对的是协商的姿态，他们的工作步骤绝大部分是由指令、委派和搁置组成。当金意识到SCLC甚至还没有一间办公室的时候，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包括老金）负责讨论最佳城市的选址。接着，在场的大多数人就开始谈论他们最希望看到的第一个在SCLC领薪水的人的个人素质，见此情景，金指定一个委员会选出一名负责人。讨论完几个不重要的房屋管理议案后，委员们提出休会。

5天后，金主持了德克斯特信众的年度工作会议。那天的会议是一个3周年紀念——3年前，他大胆地突然发起行动，第一次集中并指挥了骄傲的会众。尽管自那以后，他给教会带来了名望，但他还是使用了道歉的口吻。他为自己“把

教会的责任落在了后面”忏悔，他报告说，教会只增加了为数极少的新成员。他的谈话大部分都是在回顾，没有提出新的方案，只建立了两个新的教会委员会。其间，他痛苦地描述道：“在我身不由己的生活中，这几乎是难以承受的一个进度表。”在感谢会众没有因此而批评他，还给予他安慰的支持时，他感伤的音调令人印象深刻。“当我被批评的时候，白人和黑人都试图把我打倒，并且降低我的影响，”他说，“你们总是来鼓励我，对我说：‘我们会陪你到尽头。’”在他报告期间，一名速递员从医院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柯瑞塔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马丁·路德·金三世。金宣布了喜讯，但缩短了自发的庆祝活动时间，以便重新恢复工作会议。一群教会最有影响力的妇女不满地凑在一起。她们认为她们的牧师早就该到医院去了，现在还不去医院是不体面的事情，但她们自己不能中断会议。最后，其中一名妇女打电话给医院说，金博士被“拘留”了。

金的演讲表明，他正经历着一个忧郁期。他的布道在自我怜悯的程度上比平时更强烈，然而他又倔强地决不屈服。早在12月的时候，蒙哥马利改进协会的第二届年度讲习会上，讲到非暴力和社会变革时，金追忆了使抵制运动强化的不分阶层的团结精神，然后他话锋一转，谈到了种族和睦的最大障碍——被打上黑鬼烙印的普遍性羞辱。他说白人几百年来一直仗恃曲解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他们会说，现在，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就。这是大前提。然后是小前提：神，如大家所知，不是黑人。然后得出结论：因此，黑人不是人。”除了反驳了这个三段论以外，金还批驳了“黑的诅咒”。他指出，当挪亚念出诅咒时，他是喝醉了；金继续批驳他称之为种族隔离更现代的辩护：种族混合将延缓白人的进步，从这个判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黑人的“暂时”低劣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这种论证困扰着金。一些观念基于过去施加给黑人的恶性影响，为今后的种族隔离进行了辩护，金对这些观点加以否定的同时，他呼吁黑人提高自己的操行。他们未必能买到巴黎的香水，他说，但他们总可以买得起5分钱的肥皂吧。他历数黑人犯罪、领救济和非婚生子女的统计数据。压迫不是这些行为的借口，

他宣称，因为“生活最首要的事情就是，任何人都能够在道德上善良、正直、讲伦理和有人品”。

在批评黑人下层阶级缺陷的时候，紧接着，他在一番激烈的演说中，把抨击对象对准了那些专业人士。“我最近遇到比以前更多的学校老师……他们不会去熟记一个动词，哪怕它和那张动词表一样大，”他说，“……身为一个大学毕业生，站起来讲的是‘you is’这样的错误，你没有任何借口！其中的一些人现在正在教育我们的孩子，正在残害我们的孩子。”他把所有的内敛一扫而空，高声喊道：“我今晚就要做一个黑鬼！”他对与自己同样地位的上等人使用了辱骂的词汇。他告诉听众自己出席过的一个兄弟联谊会，他谈到阿尔法·斐·阿尔法在会议上夸耀地宣布，他的会员们为白酒花了50万美元。“一小撮黑人，”金尖刻地说，“……一星期里花在威士忌上的钱，比所有1600万黑人整整一年为联合黑人学院基金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支出的钱还多。这是个悲剧。这就是个悲剧……我知道它正刺痛着……”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近乎狂乱的讲话，尖锐的现实主宰了他为一次不堪重负的演讲外交所做的个人奋争。对协会战火纷飞往事的怀旧，本身可能已经拖垮了他的情绪。金在蒙哥马利的朋友、参谋、历史学家莱迪克毫不客气地描述那个星期为“彻底的失败”，它令金“心烦意乱”。紧接着，他的为“公民圣战”领导招募结果并没有提高他的思想状态。他在小心起草的信件中指出，推动公民注册与NAACP的目标并不冲突，金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拉尔夫·邦奇、杰克逊，以及其他全国杰出黑人以他们的名义支持十字军全国顾问委员会，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推辞了。邦奇告诉金，他全力支持有色人种协进会，不想引起任何“公众心中的误会”。城市联盟的莱斯特·格兰杰拒绝了金的邀请，他在签名回条处写了显然毫无诚意的评论：“多喝一点就醉倒。”罗伊·威尔金斯警告金说，在金2月份发起行动之前，他规划了自己许多天的全国旅程，他还通知金，他刚刚给NAACP的南方分会干事下令，把选民登记作为“1958年的第一个活动”。由于

对这些令人气馁、令人沮丧的信件缺乏有准备的应对，金叫秘书给威尔金斯回条说他会稍后回信。用那张含糊其词的条子，他结束了一个大学同学所说的他“分歧的一年”。

新年伊始，斯坦利·利维森和贝亚德·拉斯廷为了拯救“公民圣战”，谋划安插一个很特殊的人担任特别幕僚长。金的航班要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中转，在这期间，他们安排了一次和金的单独会面。两人谨慎地建议金授权他们招募艾拉·贝克。贝克作为搭档，和利维森、拉斯廷在友谊联盟组成了工作上的三驾马车，她于1940年加入NAACP，并以她在南方青年分会中非凡的组织能力成为一个传奇。在1946年辞去全国分会主管职务后，她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纽约分会会长，成为第一位担任这样级别职务的女性。从那时起，她一直以自由民权顾问的身份，靠着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和亲戚们的微薄补助，过着四处奔波的生活。

不出拉斯廷和利维森所料，金拒绝了他们的主张。他不太确定一个女人可能发挥的作用。金认为，SCLC理事会可能会更喜欢一个传教士，而且，他无论如何要和评选委员会协商一下。利维森和拉斯廷没有理会所有这类反对意见。这是紧急情况，他们说。圣战原定于2月12日林肯生日这一天，在南方21座城市同时展开，但SCLC至今还没有中央办公室。明摆着的事实是，SCLC正得过且过地走向灾难。它的评选委员会还在各个为SCLC工作的传教士候选人中来回周旋，而所有候选人又都希望是兼职工作，这样至少可以保留自己的教职。相比之下，贝克就没有家庭或工作的负担。她不需要SCLC为她花钱，因为纽约那边会提高她的生活费，而且，她比任何SCLC有希望找到的人更有工作经验。利维森和拉斯廷告诉金，虽然他们不知道贝克是否会接受这份工作，但他必须让他们设法去说服她。金最终同意了，条件是：贝克承诺不在SCLC拿钱，并且只是“行动”导师的头衔。

带着有条件限制的授权，利维森和拉斯廷离开了机场，他们庆幸自己的先见

之明，预先估计到金最初对贝克的排斥。两人知道，贝克的到来会被推迟，原因不外是拟定教会协议时所有绕弯子的讨论和金对职业女性高高在上的态度。贝克对这两个问题都很敏感。她有几个可以付托忏悔的亲密朋友，只有他们知道，她在很久以前曾和一个传教士有过一段简短而痛苦的婚姻。现在，她自豪地说，她从不属于任何男人。虽然是纽约基尔戈教堂的一名忠实会员，但贝克对传教士们自身的成见发表刻薄的言论，她称他们为“荣耀追求者”。对利维森或拉斯廷说这一点也不奇怪——她痛恨那些忽略她的知识，无视任务的繁重，只当她是一名“志愿者”的新闻，为此，他们必须花大量时间游说她以打消疑虑。

相较之前的承诺，艾拉·贝克提前飞到亚特兰大并住进了奥本大街的萨沃伊酒店。她白手起家——甚至连个电话或者打字机都没有，在一个月后的圣战启动日，她已经编制完成所有 21 个城镇的事项列表，制作和分发了宣传印刷品，搜集了各个州注册《登记法》的资料，并且，她已经成了一个帮助黑人在登记注册时克服法律障碍的谋略家。开幕当天的活动基本上是 SCLC 的领头传教士互换讲坛的教堂集会。金本人到了迈阿密会场，在那里他宣布了圣战的目的。这是一次慷慨激昂但非比寻常的致辞。“我们现在就要投票权，”他说，“我们不想为挤牙膏式的自由再花另一个 150 年。”

人们普遍热情和踊跃地参加了各地同时举行的集会，但是《登记法》的苛刻标准导致注册成功的人为极少数。一个月后，美联社发表了一篇报道指出，SCLC 发动圣战所提高的黑人注册人数可以忽略不计。留在亚特兰大的艾拉·贝克为圣战辩护时，援引了正在进行登记的十几个城市的报告，但她私底下赞同美联社的批评。对于努力贯彻查明、指导、运送和其他方式支持潜在注册人的大量嘱托，SCLC 的牧师们表现得兴趣寥寥，贝克也相信这一点。一个 SCLC 传教士竟然告诉金，他自己在圣战日就已经“包装好了教堂”，所以不需要贝克那些“多余的印刷品”。对贝克来说，这个抱怨例证了讲坛最糟糕的心态。她告诉金说，他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要为其他牧师树立榜样，要说服他们相信：在选

民登记这样一个危险的运动中，大量激动人心的事情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贝克小心地避免与金发生激烈的争执，但在她到亚特兰大来的几个星期里，微妙的火花还是在他们之间迸飞，她要找到金只能通过打电话，但没有人比她运气更糟。金对秘书说，他没有接到过任何一个来自贝克的电话，秘书汇报说，贝克“有点莽撞”。

由于常驻负责人的甄选仍然陷于评选委员会的谈判中，贝克在 SCLC 的应急工作贯穿整个春天，并且看不到尽头。她把南方意欲成为选民的人所遭遇的迫害发给利维森，使之编入友谊联盟的简讯，她还在密西西比州的克拉克斯组织了一场 SCLC 选民讨论会。当金在一个半空的房子里做公众集会致辞的时候，到场的人还不够 200 人，这种情形是他少数几次演讲中的一次。金就投票权问题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而 SCLC 代表们又拍发了一系列电报，他们在电报中恳求艾森豪威尔总统安排一次接见。

回到蒙哥马利，金发现信件像往常一样大量积压。新墨西哥州一个因法定强奸罪被判服刑 198 年的人恳求帮助，他宣称自己是清白的。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女孩在信中问：“跳舞是罪过吗？摇滚歌曲是罪过吗？我喜欢它们是罪过吗？”一个传教士同时也是一名兼职大学教授，他想知道金没有回应他前两封信的原因，那两封信都谈到他在 5 月 11 日向密西西比大学提出申请，想要成为第一个入读该校的黑人。这件事最近变得很紧迫，因为密西西比州当局把这名教授关进了州精神病院，他们毫不掩饰地认为，只有发了疯的黑人才会寻求进入密西西比州大学。金发表了抗议声明，艾拉·贝克则要求一名 SCLC 的代表去疗养院拜访这位新“病人”。在这个过程中，金接到白宫打给他的第一个电话。一个总统助理问他是否能到华盛顿来讨论与艾森豪威尔可能的会见。金问：“什么时候？”并且说：“我可以后天来。”

白宫官僚机构的转变加快了金的突破。此前，谢尔曼·亚当斯已经要求罗科·西西里亚诺接手内阁部部长马克斯韦尔·拉布刚刚辞去的民权方面的职能

(西西里亚诺是一名石油公司的劳工律师，同时还是总统的个人事务特别助理)，但西西里亚诺并不欢迎这个委派。西西里亚诺在白宫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给予联邦高级雇员更高薪酬的立法，另外，他还支持有争议的“长周末”的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来下令，一些联邦假日定在周一。任何一个“自由派”的鉴定都会伤害到西西里亚诺倡导的这两个奋斗目标，并且，他对公民权利的事情一无所知。不过，他无法拒绝亚当斯。

在翻阅了拉布第一次提交的民权文件后，西西里亚诺注意到，5年来，黑人领袖持续不断地要求召开一次和总统的会谈，但是白宫官员都挡开了。此外，由于总统的主要黑人支持者、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最近因所得税问题被起诉，导致总统的公民权利立场受到重创。西西里亚诺决定探索让艾森豪威尔摆脱守势的方法。他打电话给金——这位亚拉巴马州黑人传教士的名字目前还没有在共和党人中引发特别的敌意。

像往常一样，总统接见之前是激烈的内讧。当金6月9日独自一人走进白宫时，西西里亚诺和弗雷德里克·莫罗迅速明确表示只有两个议题：众多黑人领袖中谁应该见艾森豪威尔，他们都会对总统说些什么。西西里亚诺和莫罗属意的只有金和伦道夫，他们有针对性地想把鲍威尔和威尔金斯排除在外。金只是对威尔金斯的问题提出了异议，他说，他“不可能”不和NAACP领袖一起来见艾森豪威尔。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金敦促白宫幕僚把城市联盟的执行董事莱斯特·格兰杰加上。谢尔曼·亚当斯试图阻挠会议，最起码也要阻止威尔金斯参加会议，但随后，众议院小组委员会指责亚当斯一个金额不大的腐败行为，从而揭开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惊动一时的私人丑闻。亚当斯毁于“羊驼毛大衣”的丑闻，他旋即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辞去公职。尽管白宫受到的阻力因为亚当斯的麻烦而减弱，但拟议的会议又遭到来自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紧随其后的攻击。鲍威尔对自己被排除在外感到愤怒，他发表了保全面子的讲话；说事情全是出自他的想法，而且他本人也已经拟定了将出席会议的黑人的名单。白宫新闻秘书詹姆

斯·哈格蒂以一句简洁的否认斥责了鲍威尔，而随后的抗议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弗雷德里克·莫罗为了躲开打给他的电话而不得不离开华盛顿。迫于这位陷入困境又反复无常的传教士同行要求得到支持的压力，金让拉斯廷和利维森代他写一封含糊其词但小心谨慎的信。就像利维森写给金的信一样，两位顾问以鲍威尔“坚持原则”为“条件”发表了一份慎重的声明。利维森希望这个含蓄的警告会“帮助亚当成熟”。

1958年6月23日的前一天，金、伦道夫、威尔金斯和格兰杰熬了大半个晚上，写了一份联合声明。第二天是周一，他们一早抵达白宫。迎接并将陪同他们面见总统的是西西里亚诺、莫罗以及新司法部部长威廉·P. 罗杰斯。3名政府官员把4个黑人留在西西里亚诺的办公室里，他们则给艾森豪威尔做最后一次会谈之前的内容提要。在他们交谈期间，西西里亚诺焦急地看着他的两个同事，想要提醒他们之前已经同意的一个需要小心处理的内容点，但不管是罗杰斯还是莫罗都没有做出回应。有些恼火的西西里亚诺鼓起勇气说：“总统先生，有两个词通常会导致一些负面的反应，我会建议你在和他们交谈时不要使用。这两个词就是‘耐心’和‘宽容’。”

艾森豪威尔皱起了眉头，他回答说：“嗯，西西里亚诺，你觉得我要回避善意的英语单词吗？”

“不是，先生，”西西里亚诺不安地说，“我只是想提示一下，某些事情可能导致错误的反应。”

预先商定好的会议形式给了金一个优势，因为他是在他这一方唯一的传教士。金的3个同伴都拥有熟练的谈判技巧，但艾森豪威尔远没有准备好要和他们讨价还价，他不过是想听听而已。金他们为已经在民权事务方面有所增强的白宫领导拟订了一个9点计划。当伦道夫给总统读完这个计划的内容后，金做了简短的布道，内容是关于精神领袖的力量。他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积极语调，把这种力量的作用描绘得生动形象——总统可以在诸如演讲、白宫会议，以及关于种族融

合道德要求的简单陈述中，将这种力量辅以手势加以运用就能获得有益的效果。金的任务就是通过激发艾森豪威尔的责任感和荣耀感，设法把他引诱到更大的活动中。金讲完后，威尔金斯表示支持3个立法建议，莱斯特·格兰杰以一反常态、不露锋芒的汇报结束发言，他告诉艾森豪威尔，黑人现在的痛苦比他有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强烈。格兰杰说，艾森豪威尔呼吁黑人要耐心，这使得黑人领袖中的温和派更加困难，如果这些领袖眼下不能尽快指明取得更大进步的方向，那就会有更多人分裂出去。

格兰杰一说完，总检察长罗杰斯就开口为总局辩护。就在4名黑人发言的时候，他已经浏览了9点计划的前言。前言中谈到了愤怒、失败、绝望，并且包含威尔金斯最喜欢的句子——政府不能指望通过“偶尔开一片阿司匹林和一个善意的处方”来治愈种族隔离。罗杰斯不喜欢这篇前言。因为担心前言会被发给记者，他抱怨伦道夫的序言丝毫不像他刚刚为总统做的口头介绍。罗杰斯的讲话很威严，因为他把种族问题视为他在政府内部的职责。

艾森豪威尔接过总检察长的话头说，他非常沮丧地听到，政府苦干5年的结果是，使黑人的痛苦感达到了高点。如果痛苦是进步的结果，他想要大声问一句，向前推进是明智的吗？和罗杰斯一样，艾森豪威尔把自己当成了受害方，将自己的苦恼与4位黑人领袖所描述的黑人的痛苦对应。格兰杰被总统的语气所打动，他安慰说，黑人痛苦的原因既不在总统个人，也不在政府。除了需要艾森豪威尔为投票权立法给予更强有力的支持外，大家一致同意本次会议具有建设性。

金和他的3个同伴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到白宫的费什厅，与聚集在那里并补充了十几个黑人记者的白宫记者团见了面。“我可以说，我们收获丰厚……”伦道夫说，“总统在整个问题上表明了他深刻的关切。”自从上次和尼克松副总统会面后，因为担心发生可能疏远政府或者白宫事后否认的情形，金一直保持沉默，现在，出于同样的逻辑，黑人领袖们也都拒绝透露更多内容，这导致记者见面会陷入瘫痪。4个人遭到了恼火的记者们的痛击，只好用些政治空话来搪塞。由于仅

仅是在这一个月里拒绝发表批评艾森豪威尔的言论，在严厉指责他的麻木和不作为后，威尔金斯就疲于招架人们对其原因越来越尖锐的质疑。最后，当华盛顿新闻俱乐部的第一个黑人成员提出要求，想知道艾森豪威尔是否给他和其他人“洗了脑”，威尔金斯赶紧终止了新闻发布会。

在公众眼里，艾森豪威尔会议始终是一个空洞的静物画，有框架但无实质内容。在白宫，这被认为是一个祝福，西西里亚诺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这次会议“空前成功——即使这个领域的成功基础不牢靠”。私下里，西西里亚诺很在意自己的预言。在《商业周刊》出版了亚当斯白宫工作人员的一张照片，其标题鉴定他为“罗科·西西里亚诺——少数派”后，他判定民权事务的任命将危及职业生涯。西西里亚诺大发雷霆之下，直接跑去新任白宫幕僚长、威尔顿·珀森斯总长的办公室。“我不能再干这件事了。”他说。蒙哥马利人珀森斯没有反对，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再也没有指派任何人负责民权政务。

8月上旬，甘地信托基金主席迪瓦卡带领一批著名的印度人到蒙哥马利来参拜金。虽然印度人很高兴地听到，他仍计划访问印度，迪瓦卡对前路的艰辛特别有担当地警告了金。通过指出甘地的教训，他建议金准备着不仅仅是谈论痛苦，还要亲自承受身体的牺牲，他的生活道路取决于这样一个过程。金说他准备好了，但他的注意力目前被转移到对他声望的最新宣扬。印度人离开后，他把他的新书送给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并在封面上题献。斯坦利·利维森8月15日给他写信，告知了哈珀兄弟出版社已经安排印刷第二版的好消息，尽管这本书不会马上在下个月付印。

拉尔夫·D.阿伯纳斯麻烦不断。在MIA中，关于下一个废除种族隔离的目标的争议持续了19个月还没完，争议时间之长，连为修复被炸弹破坏的阿伯纳斯教堂的运动都已经结束了。一个领导的派别仍想攻击当地机场的隔离设施，而格雷茨和一群非神职领袖则要整合公园、游乐场、市政设施。尽管做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准备，但没有哪个计划有结果。在众多其他有效的对抗措施中，城市

专员很坚决地宣布说，他们会在公园被整合前关闭所有的公园。由于金频繁地出城，制定新战略的压力重重地落在阿伯纳斯的肩上，而同时身兼 SCLC 司库的阿伯纳斯却发现找不到替换自己的人。8 月，艾拉·贝克再次提醒她办公室仍然缺一名秘书和一台油印机。对于一个宣称正在 10 个州运作选民登记的组织来说，这些基本需求的短缺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上个星期五，也就是 1958 年 8 月 29 日的晚上，阿伯纳斯在第一浸信会他设在地下室的办公室里工作时，他的一个教会成员的丈夫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我想你知道我是干什么来的。”爱德华·戴维斯说，“我是来杀你的。”说着，他从衬衫里抽出一把小斧头，用斧头的手柄攻击阿伯纳斯。吓坏了的阿伯纳斯在打斗中抓到了电话，但紧跟着，戴维斯就用一把手枪抵住了他的后背，就在这时候戴维斯犹豫了——要么是对开枪的计划犹豫，要么是因为顾虑抑制了愤怒，结果阿伯纳斯得以一边疯狂地跑出办公室一边尖叫：“他要杀我！”他从秘书阿弗雷德·布朗身边跑过，冲上楼梯奔出门外。

戴维斯紧随其后，手中高举的斧头在空中乱舞。他追着阿伯纳斯一直跑到哥伦布大道两个街区的中间。吃惊的现场目击者中，有两名是坐在警车中的蒙哥马利警官，他们在戴维斯追上阿伯纳斯之前设法抓住了他。当戴维斯看到警察追过来的时候，他扔掉了斧头。但是，戴维斯扔掉斧头的理由，到底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还是因为阿伯纳斯在最后爆发的愤怒，报道中存在互相抵触的描述，但毫无疑问，现场乱作一团，人们震惊不已。戴维斯几乎仍然处于狂暴中，手枪被他扔出去砸向警车尾部，结果掉下来以后打在路面上。一向在逮捕行动中草率从事的警察先是大吃一惊，随后便勃然大怒。更惊人的是，在警察局里，戴维斯宣称，他之所以攻击牧师，是因为阿伯纳斯和他妻子曾经发生过性关系，当时他妻子才 15 岁。对蒙哥马利仅次于金的民权运动领袖这个骇人听闻的控告，很快导致维维安·麦考伊·戴维斯受到讯问。维维安因新闻中对丈夫言行的报道感到耻辱，她愤而声讨道，警方给她定了个行为不检的罪名把她也给逮捕了。

同时，惊魂未定的阿伯纳斯带着瘀伤和轻微割伤回到警察局，他拒绝签署对戴维斯的拘捕令——后者否认自己曾经碰过在街上发现的那把枪。一名警官根据自己的目击陈述签署的命令，戴维斯夫妇始终逃不过一起被控告的结局。

到了早上，这个丑闻弄得蒙哥马利满城风雨。故事每一个确凿的细节——挥舞着斧头追出教堂，光天化日之下一直追到大街上——这太震撼了，它如此不可挽回地把最忌讳的话题——性和神职人员公之于众，汇成了街谈巷议的八卦洪流。城里几乎每个黑人都知道戴维斯就是个“大二”——这是个不太清楚起源的绰号。戴维斯好些年前曾经是亚拉巴马州橄榄球队的明星中卫，大学毕业后，他到空军服役，退役后就直接回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他的职业生涯模式把他归入规规矩矩的蒙哥马利黑人中产阶级中，但许多人怀疑，他的性格是否符合一名教师的举止规范要求。花里胡哨、风流成性的“大二”名声在外，又同时出了名地猜疑嫉妒。许多人都记得他著名的一句话，当时亚拉巴马州的球队教练要他放弃一次过度风流的约会，转而保存体力打球。“嘿，她给我房子和汽车，”据说戴维斯是这么告诉教练的，“你为我做了什么？”因为这种态度，戴维斯被赞为是个人物，但和阿伯纳斯一个布道者的气度相比，显然就太不正经了。这也可以借此衡量对他指控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他恰恰就是那种人，只要相信有人给他戴绿帽子，就可能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来——比如挥舞着斧头、拿着枪到城市最古老的黑人浸信会教堂里发起攻击。

若干年后，金私下对同事透露，他不仅之前就知道阿伯纳斯在蒙哥马利有婚外情，而且他自己也和她们中的一些人有关联。他的坦白如果属实，就要追溯到他在蒙哥马利任职期间的不忠行为，这样一来，戴维斯的丑闻必触及一些他生活中隐藏最深的秘密和最尖锐的恐惧。

9月3日，蒙哥马利市政厅的刑事庭召开戴维斯案的初步听证会，金一早就去了那里。法庭挤满了以黑人为主的人群，走廊和过道上，排队等着入场旁听的人们挤成了几条队列。在法庭里，白人法官勉力维持秩序，白人检察官准备概述

一件充满淫荡事实的案子，而观众则热切地等着听双方黑人律师宣誓说实话之后怎么互相抗辩，这个辩论让蒙哥马利仅有的两名黑人律师陷入对抗。尽管阿伯纳斯形式上是控方目击证人，但为了对付戴维斯预料中的证词，他还是聘用了弗莱德·格雷为他辩护，而戴维斯就聘请查尔斯·兰福德就他所受到的刑事指控进行抗辩。金和柯瑞塔紧随阿伯纳斯夫妇之后到达法庭，但他们发现，警察晃着传票命令阿伯纳斯站出来——他们只允许他一个人入场。“我在等着见我的律师弗莱德·格雷。”金告诉一名警官，他希望格雷能够帮他们在里面弄到座席。

“你他妈要是不滚出去，就真需要一个律师了。”警官说。正当金往法庭里面望去，指望着格雷能赶来帮忙时，警官的耐心陡然尽失：“够了，小子，不滚是吧，等着。”他边说边示意两名法警。结果，那两人粗暴地从后面揪着金，推搡他走向门口。突如其来的暴力举动把旁观的黑人们吓得倒抽了一口凉气，其结果就是只能让法警紧紧捉牢金。他们粗暴地把金推到走廊后，焦躁地警告柯瑞塔不准发出抗议的声音，他们咆哮道：“老实点，不然你也去坐牢。”

一名正走向市政厅的摄影师碰巧看到了这一非同寻常的场面——腕戴着金表、身穿着棕色西装、头顶宽带翻檐儿浅顶软帽的金，表情痛苦地被一名警察推着，而另一个警察则狠命反扭金的右臂，以至于他的手从后背扭到了肩膀处。一队黑人在远处跟着，发生在金身上的事吸引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力，相对于法官洛的法庭，他们对金的兴趣大得多。一厢是摄影师不停地按快门，一厢是警察一路把金沿着阶梯往上推进了警察局，他们把他的肩膀按到前台桌上，其中一人大喊大叫着说，金因为游荡被控告。几分钟后，他们进了牢房——摄影镜头范围之外的地方，一名警察从后面一把揪住金外套里面的衬衣领子向后拽，另一个就搜查近乎窒息的金。随后，有人把脚踏在金的背上，一脚把他踹进了一个空牢房。金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名他认识的警官走过，温和地对他说，他不会允许任何人来这里打扰金。金为此非常感激。

此后，金很快就被允许交保候审。当金走出警察局，从一大群支持者中找到

妻子和朋友们时，人群中有些人哭了。他在台阶上对人们发表了简短的演讲，他说他将坚持为获得公平对待的权利而奋斗。“即使这意味着更多的逮捕，甚至是死亡。”然后他告诉人们他很好，要人们和平散去。这个演讲就像一场群众集会，它让人想起了抵制公交车运动时的场景，现场的人们又重新感受了一次那个不堪重负的时期。很快，法庭里传出消息，维维安·麦考伊·戴维斯别有深意地站在丈夫一方。她因行为不检而被定罪，并被处罚款 25 美元，她对法庭表示，她愿意支持爱德华·戴维斯不承认其挑衅罪的指控。阿伯纳斯被传召发言，他证实了戴维斯对他的指控，但他表示，这些指控并不属实。法官决定于 11 月对争议性证据进行全面审讯。

对于外地的新闻媒体来说，戴维斯审判立刻成了晦暗暧昧、法律冒险和无关紧要的本地新闻。金被逮捕的照片和报道迅速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其冲击影响之迅速，第二天的《广告报》就登载了罗伊·威尔金斯从纽约发来的义愤填膺的电文。国际通讯社也都使用了这些照片。在大规模逮捕事件发生两年半以后，四面八方的消息又再次大量涌入蒙哥马利。MIA 的执行委员会一直或多或少地召开特别会议。金和他最亲密顾问流动团会面，讨论应该如何应对他意料中的有罪判决。

第二天一早，金很快就被审判、定罪，并被判处缴纳 14 美元或监禁 14 天的处罚。案件宣判后，让法官洛大为震惊的是，弗莱德·格雷明确宣布说，金选择服刑。金站起来简短地证实了他的决定，并且要对这个选择做一个充分的解释，法官同意接受他的要求。于是，阿伯纳斯拿出了一份准备好的文件副本。在语气和内容上，金的声明与甘地的一个著名宣言惊人地相似——当时，甘地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遭遇英国法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法官布鲁姆菲尔德于 1922 年 3 月 18 日宣判前，甘地发表了那个著名的宣言。“大人，毫无疑问，你相信你是为了公平和正义而做出了这个决定，”金这样开始道，“……我的行为动机来自良心的激发。”

金的决定令法庭嗡嗡作响。记者和观众都嚷嚷着想要拿到阿伯纳斯任意递出的这个声明的复印件。阿伯纳斯随后和柯瑞塔走到了大街上，那里聚集了一大群人，因为没有看到金本人，大家都很失望。阿伯纳斯试图解释金没有出来的原因，但警方不可能允许他发表演讲。于是，阿伯纳斯大声喊道：“让我们到德克斯特去！”队伍走过了7个街区到达金的教堂，这是已经计划好的重拾抵制运动中的“城市步行”精神的行动，被压制了两天的阿伯纳斯现在情绪高涨。他主持了一个赞扬金的临时群众大会，其中包括柯瑞塔的一个讲演，然后向MIA成员宣布了计划，他们决定在金服刑的14天里，坚持在城市监狱外保持不间断的轮班守夜。

这些庄严的计划后来变成了所谓的“后勤喜剧”。回到市政厅，金坐在看守区和一群等着进监狱的同日被告交上了朋友，但是，在囚车开出来开始押运囚犯的时候，一名警官却禁止金上车。不知所措的金又回到看守室，等待聚齐第二组犯人，然而，等来的却只是再次被禁止上车。这一次，警方通知他回家，因为有人支付了罚款。金坚称一定是搞错了。他质疑从法院内部出来传话的人，最后他自己到议事厅去向洛法官抗议，说他希望到监狱服刑。法官耸耸肩回答说，他无力改变事实，因为一位匿名人士已经支付了14美元。金没再被关进监狱，而是被放了出来，并且，他很快发现自己孤独地站在市政厅外——在第一次被逮捕并关进城外监狱时，他曾经非常惊恐，然而，当他被同一个地方拒之门外时，他依然感到害怕。现在，角色的转换多少让金有点泄气，当他赶到德克斯特的集会现场时，已经太迟了。人群早已散去并开始了监狱外的守夜行动。与此同时，在市政府的治安专员克莱德·塞勒斯被记者逼得走投无路，他公布了为金支付罚款的记录，他承认自己就是支付罚金的人，而且是自掏腰包交的钱。他宣称，之所以这么做，就是避免因为白白供养金14天而浪费纳税人的钱。他说，金在法庭上的陈述“不过是一个宣传噱头”，塞勒斯挖苦金这么做是企图促销他即将出版的新书。

当晚，伯特利浸信会的群众大会引来了 500 人——按照抵制运动时的标准，这是一个适中的人数，但以当天的混乱而言却是一个相当大的规模。在听闻塞勒斯支付罚金的说辞时，人们哄堂大笑，表现出良好的新闻触觉。一名南方的治安专员为一个自己憎恶的黑人偿债，其目的仅仅是让他待在监狱外面，这个离奇的举动凸显了新闻中金选择入狱服刑而不是轻微罚款的报道。笑声以另一种方式缓解了人们对亚拉巴马州司法中种族歧视法案的阴郁心情。人们在群众大会上谈论亲见警官几乎扭断金的手臂的事情，以及其他虚虚实实的暴行，而这些谈话内容则被 MIA 支持者们放大了影响——金和他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情感纽带相连。甚至爱德华·戴维斯对案子都掺杂了这种休戚相关的情感。查尔斯·兰福德不再担任戴维斯的辩护律师，他把戴维斯丢给了抵制期间代表蒙哥马利市政府的白人律师。这个变化如同化学反应般重新组合了案件各方，这样一来，在人们眼里，因为和检察官、法官，以及针对被害人阿伯纳斯的白人权威的沆瀣一气，戴维斯就成了一条走狗。在群众大会上，人们不带半分异议地投票支持阿伯纳斯。金旋即站起来发表了一个略带自责却充满激情和向往的演讲，“我很高兴我能体验那么一点点，”他宣称，“我很高兴我能体验……这让我觉得和你的感受更近一些。”

金的世界里有许多杰出的传教士，他们持有更职业的磨难观。几天后，在底特律的全国浸信会联会，J. 雷蒙德·亨德森拦住阿伯纳斯和金两个人进行了严肃的教牧辅导。早在 27 年前，亨德森就成了老金在小麦街的第一个竞争对手，他在后来的抵制运动中提供了资金，并对运动给予了支持。现在，他担心这两个著名的年轻传教士没有评估他们的危险程度。回到洛杉矶家中的第一个晚上，亨德森因为担心而无法入眠，在黎明前，他分别给两人写了一封信，作为警告，他向他们指出了许多危险——阴谋、税务丑闻、暴力，尤其是女人们“毁灭性的影响”。“他们自己常常和异常杰出的那些人一起，为摆脱绯闻事件而感到满意，”亨德森在给金的信中写道，“对于一个人的伤害而言，敌人用那些方法并不高明。白人妇女可以是一个诱惑，你必须要学会更加小心，你真的必须要提高警惕。”

亨德森的信中带有一种紧迫感，他称金为“一个聪明人”，并建议金和家人都搬离蒙哥马利。亨德森很友好，甚至很温柔，但也很固执。他的信忽视了一个牧师的基督教职责，更忽视了一个可能受到伤害的女人的感情。在金的公众声望问题上，亨德森所有的这些警告都显得颇为狭隘。

金飞到纽约庆祝《迈向自由》一书的出版，这个折磨人的文学考验终于结束了。他把书亲笔签上名赠送给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首席大法官沃伦、哈里·杜鲁门和尼布尔，还让斯坦利·利维森免费赠书给其他一些著名的人士——包括德怀特·麦克唐纳、乔治·米尼、海伦·道格拉斯和江滨教堂名誉牧师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还有各类传教士、国会议员，以及新民权委员会的成员。哈里斯·沃福德读完赠书当天，刚好看到金遭遇蒙哥马利警方暴力的新闻照片，他写信给利维森说，种族隔离主义者可能使一本不温不火的图书变成一本畅销书。

9月17日，金在纽约宣传这本书，出场了电视广播网的直播节目——戴夫·加罗韦的“今日”秀。那个周末，他在哈莱姆的布隆斯腾百货公司给购书者签名题赠。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图书签名会，因为布隆斯腾百货并不卖书。在鞋品部后面放置了一张桌子，金就坐在桌子后面。络绎不绝的纽约公民——主要是黑人和犹太人，涌向这个谦恭的位置。他们几乎所有人都衣冠楚楚——穿着最好的衣服，戴着最好的帽子，陪衬最好的珠宝。金的出版商聘请了一位摄影师，他让NAACP主席亚瑟·斯平加恩和金并排站在一起照了一张相，随后指挥其他人入位。在这中间，一个女人挂着廉价耳环，戴着亮片眼镜，穿着蓝色雨衣，从涌动的五十来人中走出来。“你是马丁·路德·金？”她问。“是的，我就是。”金爽快地回答，仿佛在问候粉丝。

当女人从雨衣下伸出手时，只见弧光一闪。金本能地把胳膊猛地往上一抬，刚好使锋利的刀片先割破左手后才深深插入胸口。在袭击者要拔刀第二次行刺时，金旁边的一位机敏女人把攻击者的手从刀柄上敲了下来。袭击者没有试图逃跑，她只是向后退了几步，大叫：“我对他跟踪了6年！我很高兴我做到了！”

她的尖叫打破短暂的静默，现场一片混乱，“抓住她”和“怎么回事”的呼喊盖住了试图制服女人的嘈杂声，而女人则不停地用刺耳的脏话咒骂金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埃尔克斯家族的大女儿统治者内蒂·卡特·杰克逊是促销活动的赞助商之一，她厉声喝住那些心思全在金身上的人，她命令道：“不要碰那把刀！”金的领结左下方几英寸的胸口处露着刀柄，他靠坐在椅子上。“没事，”他像石头一样平静地说，“我很好。一切都会过去的。”杰克逊告诉他要静下来、不应该说话。当保安把袭击者推搡到外面交给警方后，尖叫声和呐喊声全都平息了下来，此时，杰克逊正为金擦拭轻伤的左手上的血液。一群旁观者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心有余悸地盯着她的每一个动作。

金被送到哈莱姆医院，45分钟后，警探押着袭击者走进急诊室，那里的轮床上正躺着等待救治的金，胸口上还插着刀片。此时，警方已经查明了袭击者的身份。这个名叫伊佐拉·维尔·库里的女人时年42岁，是佐治亚州一个名为阿德里安的小镇居民。由于担心金可能死于刀伤，侦探想要让他验明女人并做记录。他们成功地和神经紧张的医生达成协议，然后谨慎地把那个女人带到金能看到的方。还没等金开口，库里就哭叫起来：“就是他！我要把他报告给我的律师！”她傲慢而直挺挺地站着，骄傲得像个女王。这种行为加剧了侦探们另外的担心——他们可能要放弃他们的刑事案件而交给庇护所。库里已经语无伦次地叫嚷着迫害和折磨的言语，她对金的愤怒已经破坏了她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如果她是个疯子，侦探知道，她就是一个危险人物。一名警方女舍监在她的上衣里面发现了一把全套装置的意大利全自动弹簧刀。尽管越来越虚弱，但金仍然冷静而清醒。而库里经过金的确认后，又再次被推了出去。

一个小时后，当纽约州州长埃弗里尔·哈里曼到达哈莱姆医院时，金仍然在等待救治，（哈里曼在后来激烈的连任选战中输给了纳尔逊·洛克菲勒）。当哈里曼轻拍受害者的手时，金勇敢地向他保证，一切都会好的。哈里曼从医生那里了解到，X光片显示，刀片刚好扎在心脏和肺之间，位置之凶险导致医生迟迟未能

采取措施，医院正在组织一组外科医生准备移除刀片。州长在走廊里一直等了四个多小时，直到医生告诉他，精细的外科手术已经成功完成。医生们不得不切除金的两根肋骨和部分胸骨，这才得以安全拔出刀片。它就插在主动脉边上，他们说。后来，一个外科医生告诉金，哪怕是一个喷嚏都能让刀刺破主动脉并且让他丢掉性命。

检察官安排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周日来提审伊佐拉·维尔·库里。在治安官文森特·劳叙述相关事实时，她一直挑衅地站着，直到劳说，她被指称用一把刀刺伤了金。“不是，”她尖声打断了劳的叙述，“那是一把开信刀。”侦探支持了库里的纠正。她曾经带过一把和普通厨刀完全不同的刀具到城里行刺。那是一把细长的日本小刀，刀片带有柔和的曲线，手柄镶嵌象牙。就像她的意大利全自动折刀一样，这把刀也是个时髦的武器。作为一个自诩的刺客，库里有着昂贵的外国口味，这又和她的现实身份极不协调——她是一个居无定所的黑人女佣，自从多年前离开破碎的家庭后就一直独自漂泊在外，同时，她还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很快，治安官又重新开始他的叙述，但库里再次打断并宣布，她在谴责“被共产主义者混在一起”的金，还补充说她已经“把情况报告给了联邦调查局，事情正在调查中”。这些话把她送到了贝列佛医院，在那里，她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无期拘留的命令下达到精神病刑事犯麦迪亚湾州立医院，库里从此永久消失于公众社会，只留下一个神秘而难解的恐怖行为。

金回到家里调养身体，他的生活进入整个成年阶段唯一相对平静的一段时间。好几个星期以来，他既没有在德克斯特讲坛以外的地方发表任何演说或者宣讲，也没有外出旅行。从弗吉尼亚州传来消息，那年秋天，该州通过了“大规模抵抗”的法律，白人领袖把1.2万名白人和黑人孩子锁在公立学校门外。一个名为怀亚特·蒂·沃克的神学院老熟人向金求助，希望金能出现在抗议游行队伍中。“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迈克，是你的支持。”他写道。金恳求沃克免除对他的邀请，理由是他的健康不允许。也是因为疗伤，金没有参加伦道夫为整合学校发起

的青年行军。在这次活动中，哈里·贝拉方特和轻松快活的贝亚德·拉斯廷率领 1000 名学生从纽约走到华盛顿，通常比较矜持的斯坦利·利维森也赞扬了这个新颖的抗议活动。“如果年轻人能够通过这场战斗从昏睡中被唤醒，”他给金写道，“除了深入影响社会各个经济阶层外，它将在全国各地产生广泛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它和出现于 30 年代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相似性，当时的学生运动是为了支持一个伟大的自由问题——工会组织的权利……因为在民权领域中看到了这种运动的兴起，我深受鼓舞。”

11 月 21 日，爱德华·戴维斯的案子从白天到晚上持续审判了一整天。种族、性和宗教因素混杂在一起，使得证词的每一个字都受制于相反的解释，如同许多黑人观众所认定的那样，白人检察官真的在帮助被告戴维斯，而辩方也真的要起诉受害者阿伯纳斯。维维安·戴维斯在出庭作证时情绪失控，因为她要证明在亲戚家中和阿伯纳斯所发生的两种“自然和非自然”性行为，同时，她迫切要求解释，她所形容的非自然性行为就是别人所谓的口交。她的丈夫作证说，她已经对他承认了自己的婚外情，并且曾在 5 月份以前警告过阿伯纳斯，要他离她远点。

阿伯纳斯在反驳过程中提供了关于他和被告谈话内容的完全不同的版本。戴维斯实际上为了钱来找他，提议刺杀 MIA 的白人对手。阿伯纳斯作证说，他拒绝了戴维斯。这个证言抹黑了戴维斯但还不至于支持一个理论——黑人普遍相信，但检察官和全白人陪审团普遍难以接受——对 MIA 怀有敌意的白人雇请戴维斯，采取引人注目的诽谤欺骗手段来摧毁阿伯纳斯。当戴维斯激烈否认阿伯纳斯的故事时，法庭上的一些黑人笑了起来，但戴维斯的辩护律师们还是削弱了故事的合理性。他们暗示说，无论是戴维斯的性格，还是光天化日之下对传教士的野蛮攻击，似乎都不符合阿伯纳斯所描述的被他赶走的雇佣杀手形象。并且，没有证据证明戴维斯曾经因为什么事情收到过钱，他不太可能为了钱而采取最终导致进监狱的行动，也不太可能为了钱而毁坏他妻子的名誉，同时还给自己打上本

群人中政治叛徒的印记。辩方的基本论点是，戴维斯的行为是动机盲目、出于非理性嫉妒的犯罪行为。

陪审团只用 13 分钟就达成了一致，他们裁定免除对戴维斯的所有指控。这个裁决并不令人惊讶，而且它也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即使一个白人被告，在相同的事实条件下都完全可以逃脱有罪判决。在法庭外，案件的社会效应对事件的影响提供了更真实的测试。戴维斯很快和他的妻子离婚，而她也离开蒙哥马利寻求新的开始。阿伯纳斯本来就不想控告戴维斯，他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他给事件打上了这样的烙印，“黑恶势力企图分化并进而征服我们社区的另一个徒劳尝试。”阿伯纳斯感谢，“全国朋友们在我历经磨难的过程中，向我表达了深厚和坚定的信赖，以及持久的忠诚。”

那天晚上，阿伯纳斯在金以及其他朋友的陪伴下，跑到德克斯特地下室去宣泄压力。他烦躁不堪、几欲疯狂，维维安·戴维斯的证词湮没了他平常的诙谐情绪。朋友们用他们观察到的情况想办法鼓励他，他们说，他其实是很成功的，因为他的教堂或者社区没有人相信戴维斯夫妇强加给他的那些指控。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测很准确，这件事很快为人所遗忘。其原因有许多，包括阿伯纳斯在教堂的声望和强烈的政治风向干扰，它们都有助于保护阿伯纳斯在蒙哥马利黑人中的地位。种族间的巨大鸿沟里，不存在足够坚实的基础以支持任何近乎客观意见的看法。阿伯纳斯的丑闻例证了回避的力量强于金所经历的任何事情，包括克洛泽时沃尔特·麦考尔遇到的父子争议。维维安·戴维斯所述的关于阿伯纳斯的那些下流事情，很快就被金用来戏弄阿伯纳斯。

在亚特兰大，不同性质的人际关系紧张因素加剧了 SCLC 的公民权圣战的低效。约翰·蒂利，一个巴尔的摩老传教士最终被聘为 SCLC 的执行董事，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聘用。蒂利为金描画了 SCLC 的主要功能纲要图，和“将使主要或基本功能成为可能的次要的功能”。他在这一领域的才华打动了 SCLC 评选委员会，但这些人并没有登记几个选民，这就加剧了艾拉·贝克对牧师联谊

会的反感。由于对贝克极为恼火，金立刻成为传教士风格及其缩影的对立面。私下里，他风度翩翩，不求闻达，乐意倾听、服务和努力工作——所有这些品质使得贝克在不利条件下，延长义务服务 SCLC 整整一年。然而，在 SCLC 内部，金是牧师的传道者，这给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阿谀奉承，而很少有人能在黑人教堂外得到这样的对待。在 12 月上旬 MIA 第三次讲习会上，印好的程序单要求“赞颂金博士的领导”，当时有 6 个不同组织的牧师做了正式演讲，还有一个半小时预留给“场地里的普通发言”。受挫于 SCLC 的零偿付能力和其陷入瘫痪的选民登记运动，艾拉·贝克认为这种活动不只是一种空谈，其本身还是有害的。最终，她直接问金为什么默许所有赞美传单——他的朋友召开会议，设计表彰他的印刷品，准备在大会上分发。“这不是我的意思，”金告诉贝克，“是别人要这么做。”

金的所有选择似乎都殊途同归。什么也不做就是接受赞誉；行动——进一步把自己暴露于危险中，就是寻求赞誉；即使疯狂的犯罪行为都给他带来赞誉；连阿伯纳斯的私人丑闻也间接达到了同样的效果。金认为自己不配这些赞誉，他需要设法做出改变。在 1958 年冬天的半隐退期间，金的妻子把他描述为“罪孽缠身的人”，他害怕自己犯哪怕是最细微的错误，还痴迷于他个人的历经苦难才能救赎的观点。朋友 L.D. 雷迪克（L. D. Reddick）即将完成金的第一部传记，他在书中写道，被刺杀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自然转折点”，并大胆地推荐给金一个优先事项上的“周到的重新排序”。雷迪克要金更多地磨炼和约束自己，参与更多的政治组织，抛弃更多的世俗关注。总之，他想让金在其为之奋斗的事业中重塑自己。

1959 年 1 月的华盛顿，众多引人注目的变革之一是参议员林登·约翰逊的办公室装修。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以超出 28 票的结果赢得 1958 年大选，林登·约翰逊也成为多数党领袖。他加宽新寓所，并聘请了一名纽约室内装饰设计师，其房间的装饰风格，将一个男人对权力的舒适感广而告之。结果这座寓所成了绿光

和金光闪耀的混合物，并很快被冠以泰姬陵的绰号。以此为起点，约翰逊迅速采取行动，新一届参议院打上了他的个人印记：他以辩论终结规则控制了参议院的漫无休止的辩论惯例，从而掌控《民权法案》的命运。他把参议员一个接一个地召进来，奉承、笼络，或者胁迫他们。不管有多少自由派在1958年当选，约翰逊告诉每个人，改革者现在认为辩论终结规则有可能会急进放松，但他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会毁掉南方民主党，他说，更糟的是，它会正中副总统尼克松的下怀，利用北方自由派民主党人图谋为共和党赢取黑人的选票。由于其令人印象深刻的个人影响力，约翰逊诱使许多民权支持者帮助他扼杀了新参议院的辩论终结改革运动。

2月4日，司法部部长威廉·罗杰斯在共和党领袖的白宫会议上说，尽管辩论终结失败，但政府必须提交新的《民权法案》。1957年的《投票权法案》存在技术上的缺陷，他说，最起码，一个新的提案将减少对现行法律的政治阻力。大多数共和党领袖，尤其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尔斯·哈勒克，不想在《民权法案》中提出任何新的内容。他们让艾森豪威尔总统想起他自己的推测，1957年的法案将延续一二十年，但艾森豪威尔说，他乐见任何新法案的提出，以处理被证明是反对黑人投票权的手段。白宫幕僚长劝告罗杰斯，法案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立刻送到国会，因为总统已经私下承诺，要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逊以充分的通告。

这个消息让罗杰斯感到相当震惊。“对不起，总统先生，”他飞快地说，“我认为，告诉约翰逊我们要做的事情，这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他会窃取我们的法案，并且让人听起来觉得整个想法出自于他。我认为他在给你下套。”

艾森豪威尔皱起了眉头。“你真的以为林登是这个意思？”他问。他传了一个口信，要约翰逊马上到白宫来。共和党领袖散去，留下罗杰斯和总统单独闲聊，直到多数党领袖抵达。“比尔，如果林登试图绕到我的办公桌这里来，挡住他，”艾森豪威尔说，“我不能忍受他揪住我的衣领。”果然，冲进了总统办公室

后不久，约翰逊就跳起来要绕开桌子，罗杰斯见状迅速插了进去，他不仅用肩膀挡住了撞击，还挡住了约翰逊的指戳——这是约翰逊谈话时特有的补充手势。到会面结束时，艾森豪威尔感到满意的是，约翰逊要的只是为《民权法案》获得尽可能多的必要支持，以确保它能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但当法案全年冷落在委员会中时，这种保证变得毫无意义。

民权问题广泛侵入艾森豪威尔的政治交易，其中包括他与尼克松副总统不稳定的联盟。在去年秋天灾难性的竞选运动中，尼克松曾尝试一个不寻常的宣传组合。尼克松鼓吹人造卫星提高了防御能力，但被艾森豪威尔阻止。为拉选票，尼克松对民主党进行谩骂，其说辞包括“社会主义者的避风港”和其他更恶劣的内容。与此同时，由于过于具体地谈及民权问题，在被艾森豪威尔阻止后，为了拉到选票，尼克松又在种族关系上对自由派和黑人做出含糊的承诺。尼克松的每一场推广活动都被指责党派偏见过多，他们之间风格上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要更新对尼克松诚意的怀疑。1958年的选举迫使艾森豪威尔重新评估自己的职业生涯。

那年冬天一个政治集会上，尼克松建议政府大力推动税收抵免的制定，使得私立学校的学费可以纳入抵免范围。他对这个设想的解释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想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但苦于学费的负担，他的计划就是要帮助这些家庭。他希望共和党人通过迎合人们对社会阶层水准的怨恨，引起人们对特权的丧失感的欢迎，不停宣讲他所谓的“中产阶级的消失”。受到尼克松演讲的感染，艾森豪威尔当着其他共和党领袖的面反驳说，中产阶级并没有消失，这个群体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裕也更为庞大。总统说，正在消失的是劳工阶级，他们正把数目惊人的孩子送去上大学。艾森豪威尔强调自己的人生经历中社会进步的惊人幅度，但尼克松通过一场额外的个人辩论来坚持其立场。新的专业人士和其他正在上升到中间阶层的人们感觉到威胁，他坚持说。中产阶级则相信他们正在“下沉”。在政治上，尼克松正开始减少对理论的依赖，他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对地位

的渴望——就像他自己一样。他变得不像是个民权者，他更贪婪，更像个人口统计学家。相比较而言，艾森豪威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纽约的2月初，金与他的印度之旅的同伴柯瑞塔和雷迪克会合。此时，恰逢雷迪克为金写的传记《没有暴力的东征》刚刚出版，这又平添了启程时的兴奋。在最终集结地，拉斯廷提供了一沓关于印度的新材料，其中包括一篇文章谈到甘地的香提塞纳，或者叫“非暴力大军”，拉斯廷称这篇文章是对“甘地运动最新理念的最新思考”。金需要时间把甘地主义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吸收，这就可能帮助他避免趋于成为荣耀的餐后演讲者而停滞不前。就个人而言，他想研究甘地一生的斗争，从而协调自己的生活与哲学。在这些报告中，金发现了很多逗乐自己和柯瑞塔的内容。金专程前往学习的甘地，是一个放弃了财富、性生活和缠腰带以外所有衣物的人，而金夫妇却带着装满了礼服和裙子的箱子，预备在英国统治时期兴建的最优雅的酒店里穿着。临行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超重的行李支付一大笔关税。

雷迪克对这种事情相当恼火，认为金太被动——他对金忠心耿耿，但生性敏感易怒，而且极有主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雷迪克自己在旅途开初提出的一个节外生枝的建议，差点毁掉这趟出行。他说服金取消在伦敦的逗留计划，改为在巴黎与自己的老朋友、《土生子》的作者理查德·赖特共处几日，然后赶到苏黎世，乘坐在那里中途停留的、计划从伦敦到德里的航班。开始的一切都进展顺利，直到金一行人得知，从伦敦出发的飞机，已经根据指令绕过苏黎世的浓雾直飞德里。地理、天气和语言，所有这些因素都和他们过不去，其结果是，当本该搭载他们的飞机正飞越伊朗上空时，他们自己却坐在穿越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火车上。在德里，大约有500人聚集在机场，许多人还拿着花环。一直到调查人员宣布，金虽然购买了航班机票，但并没有在伦敦登机，机场里的人群这才带着疑惑散去。

金拼了命地想在印度之行的第二天晚上到达德里，但终究未能如愿。到本该

与尼赫鲁总统在砂岩宫共进晚餐的钟点时，还在孟买的金已经放弃了努力。像普通游客一样的金和他的同伴们孤独地坐在机场大巴上，看着挤在孟买狭窄的街道和门口一大群面容憔悴、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感到畏缩。错失与尼赫鲁的会面固然不幸，但眼前突然展现的印度最严峻的困境也并没有给他们一丁点的安慰。

两天后，星期天的那群人中，有一小群人又到德里的帕兰机场欢迎尴尬的金一行人。资助金出访的两个组织都各自安排了整个行程期间的导游——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派出的是詹姆斯·布里斯托尔，甘地信托基金派出了斯瓦米·维什瓦南达。二位导游都给金带来了一条非同寻常的好消息。尼赫鲁已经同意，将已经错过的与金共进晚餐的时间重新改到当天晚上。专家认为，这只能说是一个奇迹，它的降临使尼赫鲁愿意为这个没有外交身份的人修改自己的日程安排。

总理迎接金一行时，身穿那件令他蜚声国际时尚界的白色夹克，胸前还别着一枝玫瑰。作为女主人出席的是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其他宾客还有尼赫鲁的红颜知己蒙巴顿夫人和帕米拉·蒙巴顿，她们分别是前英国驻印度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的妻子和女儿（蒙巴顿勋爵曾于12年前与甘地和尼赫鲁总理就印度独立的细节进行过谈判）。晚宴上，尼赫鲁总理就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和金随后的经历发表了富有见地的评论，因而给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理强烈捍卫印度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他认为面对美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结盟”政策不是被动消极而是积极进取的战略，它能敦促两个超级大国减少仇恨和骄傲的蒙蔽从而增进相互的了解。由于金多次提及想要多了解些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尼赫鲁觉得有责任提醒金：自负得惊人的圣雄不可能谈论现代印度具体问题的处理，更不会谈论金在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尼赫鲁的回答令金略感失望。但在将近4个小时中，两人就种族、殖民主义、甘地主义和非暴力运动的讨论基本没有中断。与会客人有礼貌地听着，却因为没有中间休息而多少有些疲劳。柯瑞塔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会见的盛况和礼遇。

两天后，在一连串的务虚演讲和茶会结束后，朝圣者们又早早起来去搭乘6

点去巴特那的航班。在那里，他们与甘地的著名门徒贾亚普拉卡什·那拉扬会面。在去那拉扬偏远的修行圣地，或者称之为精神村庄的路上，这名先见者说他相信应该废除印度的工业和所有的中央集权组织，因为这些东西对宗教和乡村生活有致命的影响。而为那拉扬所反对的尼赫鲁则认为，印度一定要变成现代工业国家。金有礼貌地听着，被他的纯净赞歌所打动。但金也注意到，那拉扬是靠乘坐工厂制造的吉普车去修行圣地的。在去往加尔各答的路上以及在印度的东海岸，金他们注意到把社会威信等级和肤色深浅关联起来绝非易事。拿那些可怜的贱民来说，他们肤色不是最深的。并且，街头乞丐肤色各异。金清楚地知道，当同样深肤色的人们还在反抗白人统治的时候，印度人正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的肤色庆祝。但是肤色的意义在印度人内部更难确定。他们注意到的迹象之一就是：报纸的征婚广告通常注明了对新娘浅色皮肤的偏爱。

和那拉扬会面后，他们不仅参加了一个愤怒的劳工领袖会议，还赶去参加了全印度牛只拍卖会。金和各种类型和怪诞的甘地主义者交谈——有穆斯林、神秘主义者、富有的实业家和愤世嫉俗的官僚。他和班加罗尔的首席部长讨论了经济发展问题，还和一群非洲学生辩论——这些非洲学生一致认为恩克鲁玛的非暴力方式绝不可能废除刚果的殖民主义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金一行人就这样一路回到了西海岸的孟买——他们错过航班后进入印度的计划外口岸，并在摩尼总统府待了下来——甘地本人每次到孟买时都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但摩尼总统府既没有家具可言，也没有暖气、热水和淋浴，只有两个印度风格的厕所——就是在地板简单挖两个洞的那种。然而，金他们并没有抱怨。将自己的房间让了出来的东道主 S.K. 德发现，金只为孟买瘦弱而无家可归的乞丐发牢骚。这种反应让德想起了之前的一位客人：这位名叫亚瑟·凯斯特勒的客人曾在小说中把闹鬼描述为孟买的一个特色。

金一行人于3月1日到达艾哈迈达巴德，那里是甘地的修行地，也是甘地食盐进军的出发地。随后，在偏远的吉申格尔北部村庄里，金会见了印度的“行走

圣徒”、最尊敬的甘地主义者维诺巴·巴韦。温文尔雅、胡子拉碴、超凡脱俗的维诺巴没有家，没有实质性的组织，不敬重超出自己道德诉求的纪律。他发起了旨在重新分配土地给失地农民的捐地运动，多年来，他一直穿梭往返于印度各地，请求富裕的地主捐出五分之一的自有土地。金在农村与维诺巴不期而遇——在闹哄哄的朝圣者和名人追寻者中间，维诺巴裹在一团飞扬的尘土中冥想。透过这团烟尘，金惊愕地发现维诺巴难以置信的含糊。像西方的东方宗师漫画一样，维诺巴说话含糊其词、以问代答，还拐弯抹角地信口而谈。金的大脑一直在把他的印度经验转换到美国的环境中，维诺巴让他想起“神经病”这个触动美国黑人中产阶级恐惧最深的词。记不记得就在去年，一个受过教育的古怪男人，因为申请入读密西西比大学这个愚蠢的行为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即使身处民权活动家之中，克莱农·金还是在逃遁——一个神经病是不值得为其去战斗的。

金的热望无助于解决他胃部不适的问题，并且这两种状态都让他无法指望参加第二天早上原定的“和维诺巴一起行走”的活动——一个几乎已经成了甘地朝圣者的应尽仪式。他知道，维诺巴总是每天凌晨三点半起来步行，这样他就可以腾出行走9英里的时间，在七八点的时候开始一天的祈祷和会面。月光下长途跋涉的景象带着神秘莫测激发了金，他想要来一次“美国式”的步行。第二天早上，他和雷迪克坐车追上了步行的维诺巴。

在听了各种纠缠不清的甘地理论后，金向维诺巴提出了一直让他纠结的问题：在外交事务上，作为第一个让非暴力原则变为现实的国家，难道不应该由印度通过解除自己的武装来为世界树立榜样吗？这样做的风险是什么？是否会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敢消灭世界上第一个非暴力民族？这次巡回提出问题的金成了最好的流动听众。而在这个论题上，金觉得他摸到了门路。突然间，这个伟人变得非常迷人，或者至少在刹那间是这样。判断一个疯子其实是一个天才，任何一个观察者都会遇到令人不安的窘境，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划分这两种性质的界限在哪里？是金或者维诺巴在画这条线吗？尽管单方面解除武装行动和无政府状态

或反工业地方自治主义一样，都是一种幻想性的建议，但就像过去从来不曾做到的家庭纺车、修行处以及经济原始主义的其他形式一样，这个建议的可能性吸引着金，是他一直在寻求的灵感——如何尽可能延伸宗教和政治允许的蒙哥马利巴士抵制精神。他可以倡导国际性的非暴力——以一个黑人、一个自然人、一个美国人、一个牧师和一个战争研究者的身份。

在3月9日他的告别新闻发布会上，金很谨慎地说，他正在提出的是“一个产生于和维诺巴交谈过程中的建议”。他解释说，美国和苏联没能用“信仰和道德勇气”停止军备竞赛，正因为美国和苏联都失败了，这才有他的这个建议。记者们点头深表赞同——谴责超级大国的黩武主义在印度是雄辩主题。“也许，”金继续说，“就像印度不得不带头向世界展示民族独立可以通过非暴力来实现一样，印度必须要以身作则并呼吁世界性裁军，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立即加入，印度应该宣布自己将单方面裁军。”

新闻发布会的气氛瞬间恶化。记者像怀有敌意的提问雨点般向金袭来，他们认为在印度裁军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因为印度正面临来自巴基斯坦的威胁——美国正忙着重新武装印度的这个死对头。金博士怎么能看不到嗜血的巴基斯坦人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屠杀非暴力的印度人？金试图平息记者们的忧虑，努力降低风险，并力图提醒他们，甘地非暴力的真正考验走进了人们生命中最严厉的审判中。大部分的记者不停地重复说，金不了解那些巴基斯坦人，他们在电讯中普遍以令人愉快的方式报道了“黑人甘地”的离开，同时掩饰了金不可思议的想法。

回国时，金选择了途经埃及和希腊的航线，并于3月18日回到了纽约。在哈里和朱莉·贝拉方特的私宅、金称之为“宫殿公寓”里，举行了一个愉快的晚会，主人在私家影院里招待客人观看了好莱坞电影《安妮·弗兰克的日记》。贝拉方特还为SCLC另外准备了一场慈善音乐会，金的衣锦还乡因此而锦上添花——歌手一个晚上的演唱会收入可以为SCLC筹集数倍预算的资金。4天后，金走上德克斯特讲坛做印度的旅行报告。他把圣雄甘地最著名的食盐进军中的描述，提炼出

圣雄的品质——那是他所发现的最引人注目的品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甘地的“绝对自律”，金相信这是成为甘地圣徒的关键。圣雄曾经在他出版的日记中严厉批评自己，这个事实证明了他反复致敬的“神奇的内在批评能力”。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惊人的外在批评能力，”金开玩笑说，“我们总能在别人身上看到邪恶，我们在压迫者身上看到邪恶。”印度人民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的不公正，他说，但他们也受迫于甘地而承认自己种姓制度的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发端之久远，远远早于第一个英国人踏足印度土地之时。他让人们为甘地精神中更伟大的力量而感动，从而尽力驱散甘地殉难的悲哀。随后，他以基督教的祷告结束了报告，祷告的内容很像10年前一个精神失常的密西西比白人学生在克劳泽自助食堂震惊食客的言论。“上帝啊，我们仁慈的天父，”金吟诵道，“我们感谢你，你为所有的民族，在所有的文化中定义了男人和女人。我们叫你这个名字，有人叫你安拉，有人叫你埃洛希姆。有人称你为耶和華，有人称你为梵天。有人称你为不动的推动者（Unmoved Mover）。”

从印度回来的1959年春天，金才刚过而立之年，在这一年里，有预兆的事件几乎总是在安静良好的秩序中急剧发生。5月，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去世；此后不久，世界上第一艘装载带有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的潜艇从纽波特下水潜入大西洋海岸；也是在纽波特，18岁的史坦顿岛人琼·贝兹以其银铃般的女高音，演唱传统民歌使她受到国人瞩目；在4月1日的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约瑟夫·P·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为儿子约翰获得1960年总统选举提名而举办了第一个私人战略会议；在肯尼迪秘密会议上，民调专家路易斯·哈里斯给出了证据：营销专家正在从广告界进军政治界；同样在佛罗里达州，五角大楼也证明了正在成长起来的公关力量，当它介绍未来宇航员的第一支队伍时，成功把7个高度紧张且常常难以相处的飞机试飞员装扮成一种新的美国人格类型标本——乏味的英雄，而这7个新教白人男性全部来自小城镇，并且最后裁掉了6人，但历史上的人物就在这种反复一致的宣传中创造了出来，它让人们认为这批走进未知

世界的人都是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类型。

在纽约，贝亚德·拉斯廷组织了 A. 菲利普·伦道夫的第二次青年进军华盛顿活动。在向首都行进的路上，走在庄严的示威游行队伍的前头，拉斯廷情不自禁地打破了他自己的沉默，他不仅低声打趣路边伸长脖子傻看的旁观者，还咕哝着队伍中那些怪人的俏皮话。“社会混乱”，拉斯廷愉快地赞扬道，他开头说的是“一切都清楚了”。这是他个人风格的改变。当游行队伍到达华盛顿后，金出席了集会并发表了关于投票权的演讲。“你们是否意识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如果 300 万黑人的名字加入南方的选民册会是怎样的情形？”他问人群。但集会的影响并不足以唤起民权圈子以外的人们的兴趣。

意味深长的是，这次行动引起了一个圈外人的注意，他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胡佛看到联邦调查局的一份报告说，A. 菲利普·伦道夫公开感谢斯坦利·利维森帮忙安排了这次行动。这份报告似乎重新唤起了胡佛对利维森的兴趣——联邦调查局在好些年前就已经给利维森挂上了共产党员的标签。联邦调查局的文件还指出，利维森与金“联系密切”，而金则被形容为“这次游行示威背后的推动力量之一”。言外之意很清楚——在华盛顿游行和金的职业生涯中，利维森在其中起到了战略谋划的作用。胡佛指示 FBI 的纽约办事处报告利维森的参与细节。他的命令把金、利维森和种族示威合在一起，以恶意颠覆为名加以标记。

引起胡佛反应的既是他对共产主义的敌视也有他对黑人的偏见，而且两者都很强烈。首先这位局长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官僚，有着对重大历史潮流的敏感。20 年前，美国联邦调查局为防备纳粹间谍而迅速扩大规模。在大萧条中期，联邦调查局的暗探队伍不过 500 人多一点，在珍珠港事件后，该局人数增至 3 倍多，后来又因诺曼底登陆再增 3 倍。情报局虽然属于执法部门，却有着优于执法部门的长处，这一点，胡佛从来不需要做进一步的训导：情报局享有更大的威望和更小的公共失灵危险。它通过保密的神秘性掌握更大的自由和权力，为具体化国家价

值观和象征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避免遭遇战后裁员，他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僚战，以使美国联邦调查局成为新的世界情报机构首领——即便他不会说外语，并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踏足美国以外的国家。由于落败于新创建的中情局，胡佛报复性地从杜鲁门总统那里榨取了一个分量很重的安慰奖：负责“背景调查”和联邦雇员忠诚度调查。这些工作不仅在整個麦卡锡时代维持了调查局的人力资源水平，还大大增加了胡佛作为国家安全捍卫者和神使的政治影响力。

由于1956年后美国共产党的最终瓦解，胡佛预料到这个已经完成的任务类似“二战”结束时所带来的危险。党的灭亡恰逢法院和司法部根据《宪法》做出裁决：除非涉嫌间谍活动，否则排除对共产党员的合法性检控。由此，在逻辑上已经不需要成千上万的密探，面对这个现实，胡佛立即授权新的活动，通过对共产党人和其他抗议团体进行法外骚扰来保住他的人手。从1956年起，正式的反情报程序行动使联邦调查局深陷国内间谍活动。通过秘密行动和无耻的政治审查，联邦调查局已经不只是一个传统的情报机构，它更像美国中央情报局。胡佛把反情报程序行动当作高度机密，因为它违反了《宪法》对国内警察权力的基本限制。在复阅档案文件多年后，胡佛最好的传记作者的结论是，胡佛大量缺乏明确法律依据的FBI工作“导致他每当被人质疑FBI秘密行动的权限时，都采取粗暴的防守方式”。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而反情报程序行动却有助于局长维持想要的密探部署。1959年，重新开展调查斯坦利·利维森的时候，纽约的FBI办事处给内部安全稽查队分配了400名特别密探，分配负责调查有组织犯罪的只有4人。

眼下，对胡佛而言，利维森的事情是一个有远见的预防措施，局里工作人员调配的严重倾斜尚且不为公众所知，胡佛的管理就更没有遇到任何严重的政治挑战。要是政治家们试图表明，共产党人已经被彻底消灭，而且胡佛为此而曾经让联邦调查局一大群人不适当地扮演了野牛猎人的角色，局长就准备举出利维森这样的例子来证明威胁的存在。直到那时，利维森也还没有特别理会胡佛。事实

上，那年稍后，胡佛还授权特工们招募利维森当线人。经过多次尝试后，曾经神经过敏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向胡佛保证，虽然利维森拒绝当线人，但他没说什么不友好的话。

胡佛对金的敌意一直近乎柔和，因为民权运动对 FBI 内部分区的威胁并不急迫。时代的基调使金和胡佛在遇到例如马克·帕克私刑事件这样的民权危机时，仍能自主地走到同一侧阵营中。1959年4月，一群蒙面男子劫持了因被控强奸一名白人妇女而关押在密西西比监狱的帕克。金第二天立即打电报给总检察长罗杰斯，敦促对帕克的失踪进行联邦调查。一些已知的事实说明，也是金所宣称的，“暴民的行动几乎看起来好像是受到了邀请”。罗杰斯表示同意。密西西比州州长詹姆斯·P. 科尔曼也认同这个看法，并向联邦调查局提请了帮助。以密西西比的政治标准来看这种行为，科尔曼注定是个“温和”派。

无论如何，当帕克浑身都是刀伤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珀尔河上后，胡佛派出了一支60人的特工队伍到达波普勒维尔。这是自1955年埃米特·提尔案以后最轰动的一次私刑调查工作，特工提取了3名私刑者的口供，又得到了其他人的证明，还确定了同谋绑架的执法人员。在当地检察官拒绝让大陪审团看到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后，胡佛授权特工们自愿为密西西比州大陪审团提供证词。当陪审团故意怠慢 FBI 的证人后，检察长罗杰斯公开将密西西比州的调查烙印为“对正义公然且蓄意的歪曲”。司法部寻求用效力不强的联邦法令提起指控，但密西西比州的联邦大陪审团拒绝依从。一个杰出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就这样被糟蹋殆尽，留下杀手逍遥法外，所有证据封藏的结局。

持续强加在金身上的惊动一时的不公正事件已经不多了。但与此同时，在路易斯安那州，州政府官员审查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注册选民之后，从名单上剔除了一万名黑人，以此来摧毁 SCLC 的选民登记的努力。尽管选民资格被撤销的事情鲜有新闻报道，但民权工作者仍然沮丧不已，以至于艾拉·贝克要凭着她的意志再次离开纽约的家回到亚特兰大。虽然被 SCLC 排挤，并且早就对那些不紧

不慢的传教士感到气馁，但贝克还是用5周时间紧急访问各个城市，最远的是西北部的什里夫波特。她和牙医辛普金斯相处得很好——在牵头运作SCLC活动中的人中，唯有辛普金斯不是传教士。两人尽最大努力重整圣战，但召集到法院登记的人数也只有区区250名。负责登记的柜台官员只和其中的46人谈了话，最后给予登记的只有15人。按照这个速度，要想恢复圣战之前本已稀少的登记总数，将需要数十年时间。

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失败案例在整个南方地区持续增多。金从印度回来以后，针对这种境况采取了完全异于他性格的一个行动，而且这个行动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也几乎是仅此一例：他把人解雇了。在指出圣战“一直没有与其开销相匹配的高效方案”后，金要求SCLC执行董事约翰·蒂利立即辞职。SCLC董事会又再次开始寻找综合条件完全相同实则绝无可能的替代者——这个人必须是一个牧师，他的地位要足以使董事会对他有信心；他还得愿意为了全职从事民权活动而退出自己的教堂（包括金本人在内，没有一个董事会成员愿意这样）。在寻找蒂利的继任者期间，金请艾拉·贝克回到SCLC，这一次是聘请她担任执行董事。董事会同意并规定，贝克的工作只是“代理”性质而不是永久职位，在此期间，寻找继任者的行动还应继续。贝克再次搬到亚特兰大办公室，在熟悉的困境下继续处理业务函件——屋顶漏水、没有空调，SCLC财政的悲惨状况让一切变得更加困难。

金因为急躁而解雇了蒂利。他找不到一件事情能重新激发抵制运动的精神——无论是他的几近殉难、他的白宫谒见，抑或是他的千场演讲。回家后的金决心带着在印度学到的知识开始新的征程。4月份的时候，他给自己的黑人神学导师之一、威廉·斯图尔特·纳尔逊写了一封信，他说SCLC“之所以未能在南方众人中传达甘地主义哲学，是因为没有花时间认真研究它”。金提议那个夏天在亚特兰大召开为期3天关于非暴力的讲习会，他希望组织一场美国式的食盐进军。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决定最好把一年一度的讲习会从蒙哥马利搬出来。

“自打从印度回来，”他在给尼尔森的信中写道，“我对这个想法越来越激动。”

非暴力抵抗种族隔离讲习会于7月份在斯佩尔曼学院召开。令人失望的是，到场签名的与会者不足百人，尤其是没有实质性的亚特兰大本地代表。不过，所有非暴力小团体的每一位领袖都做了发言：像金和阿伯纳斯所做的一样，贝亚德·拉斯廷、詹姆斯·劳森以及格伦·斯迈利全都指导了研讨会；《甘地传》的作者理查德·格雷格指导了一组讨论；雷迪克就甘地反对印度种姓制度的运动做了报告；梅尔文·沃森是金在莫尔豪斯学院的指导老师，他演讲的主题范围从狩猎台一直到斯大林主义，还带领做了祈祷仪式；什里夫波特的辛普金斯博士主持了一次会议；因为领导了里士满的元旦大型游行，新人怀亚特·蒂·沃克以其可供引证的经验，主持了另一个会议；而搭档艾拉·贝克的是威尔·坎贝尔——一个既是传教士又是作家的南方开明白人。

他们正在寻求新的手段和新的突破。民权斗争的经验告诉他们：基督徒精神因为政治而需要被改进，甘地主义要因美国文化而修改。这两个系统必须经过合成、形塑和调校，然而究竟要怎么做，却没有人知道。问题明白如单词“黑鬼”，解决方案含糊如“美国化非暴力”——有上百种语义上的差别。发言者们把非暴力变成一门社会科学，以一种对实践者和实践对象都能产生复杂影响的态度来谈论它。谈得很多的话题是人们如何应对暴力的内容，以及甘地主义者如何准备亲身接受殴打：拉斯廷、斯迈利和其他人，以他们过去20年的发现，向大家告知了消除敌意的非暴力招数；劳森在抨击他称为非暴力的一些常见的怪诞说法时指出，当看到被动示威者像胎儿一样蜷缩成团时，大多数暴力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只会更恼火，然后会踢踹示威者肝脏、打断示威者的脊梁骨，他建议反抗者尽量保持与那些打人者的目光接触。

劳森认为，理论研讨需要“与具体情况下的实际应用相平衡”。自从接受金的召唤从俄亥俄州搬到纳什维尔以来，劳森一直在和学生志愿者一起测试他的非暴力想法。他呼吁他的纳什维尔研究小组以“研讨会”替代课程班，并始终围绕

一个“项目”来开展研讨。他们的项目可能是示威，可能是游行，也可能是纠察线，还可能结合3种方法用以反对种族隔离的剧院或者顽固的投票登记员。那年秋天，劳森正打算针对纳什维尔的种族隔离百货商场进行示威测试。CORE的戈登·凯里曾帮助怀亚特·蒂·沃克组织里士满的游行，他正计划在迈阿密实施静坐示威。

劳森和其他新的美国甘地主义者以化学家的细心推进他们的项目——着眼于孤立行为和控制反应，每一个步骤都经过了精心策划、执行和评估。精密的培训发展了自信，但也使非暴力变成一个深奥的专业。在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中，能指望花几个月的时间来亲自准备游行示威的只有极少数人。然而，人们会把这一小部分人描绘成怪胎，甚至这些人自己的支持者也不例外。北卡罗来纳州的很多非暴力活动都可以追溯至道格拉斯·穆尔的影响，但这位激进的人士在波士顿大学时一直被金疏远。穆尔此前已经在北卡罗来纳州领导了一场静坐行动，并和那家种族隔离的冰激凌店打起了官司。在公车抵制期间，由于对金的表现感到惊讶，穆尔给金写了一封信，痛苦地谈及“心中的事情”，并建议金组织甘地主义突击队的干部队伍，他写道：“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纪律严明的百人队伍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打破北卡罗来纳州各地的种族隔离中枢。”但穆尔只收到来自金的秘书的象征性回复。现在，不到两年后，在金的SCLC董事会中，穆尔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在北卡罗来纳州，再没有其他传教士如此在意这个非暴力研讨会，以至于要独自长途驾车来参加会议。

面对非暴力的似是而非的论点，金不可避免地要和道格拉斯·穆尔这样的人结盟。新甘地主义者怎么会希望组建一支由非暴力怪胎和空想家组成的队伍？就算能找到大量的新兵，又如何做到将如此艰苦的修养有效传递给他们？以进取精神专门研究接纳殴打，并且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中以耐心坚持到底，非暴力要寻找的就是这样的人，因而，它似乎成了一种自我局限的教条。

那年夏天的某日，一条解决问题的线索在蒙哥马利冒了出来，当时阿伯纳斯

叫金顺便走访一下第一浸信会。金立刻参加阿伯纳斯、弗莱德·格雷和一个名叫约翰·刘易斯的18岁男孩等3人的会议。需要阿伯纳斯建议的这个男孩，是纳什维尔的一名神学院学生，并且已经成为劳森的非暴力研讨会的忠实成员。由于立志于成为亚拉巴马州白人大学中的第一名在册黑人学生，刘易斯想起诉位于他家乡的特洛伊大学（Troy State College）。由于被刘易斯信件和电话的诚意深深打动，阿伯纳斯和格雷为刘易斯支付了从纳什维尔到蒙哥马利的公交车票，这样他们就可以估量他个人抵抗危险的能力。

金邂逅的是一个外表有点像自己但又全无优雅的小伙子——矮小而壮实，皮肤黝黑，圆脸为温暖甚于为好看而长。刘易斯说话结巴，即使口吃给了他平和的心态，他也几乎无法讲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他说，他以前“长出”家乡如此之久，以至于想不起来少年时代曾经见到过哪怕一个白人。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决然不会选择他作为整合试验案例的类型，因为他似乎就是一个再多教育也改善不了的黑人。然而，在刘易斯身上有一种照耀他所有缺点的炽热光芒。他说，他已准备好为去特洛伊大学上学而死，但如果追随非暴力原则，他很可能会避免这样的命运。会议结束时，这两个传教士同意想办法为诉讼筹钱。格雷同意接下这个案子，但前提是要获得刘易斯父母的许可，因为刘易斯还是一个未成年人。

在回纳什维尔的公交车上，追星族刘易斯为见到并且和金博士说了话而不停地自言自语。令刘易斯感到自豪的是，在金成名于公交车抵制运动以前，他就发现了金这个人。那是在1955年，刘易斯偶然收听了一场布道，名为“保罗致美国基督教徒书”，金在讲道中假想圣·保罗的风格和神学，批判了基督教徒的自私和兄弟情谊的失败。刘易斯仍记得收音机前的他，内心是何等的震撼。在那一个小时的的时间里，他的牧师梦想已经聚焦到一个新的偶像身上。

刘易斯早年的奇幻生活为他打上了怪小孩的烙印。他在一个没有自来水管也不通电的小农场长大。尽管如此，他总是逃避田间农活儿，这让他的父母很是恼火。刘易斯说，农场工作就像是拿大自然做赌注，所以他反对干农活儿。开始的

时候，他的父母还据此认为，他是为了偷懒才提出这种稀奇古怪的借口，但在了解到儿子的强烈意愿之后，他们唯一可以希望的就是懒惰成为儿子事业的动机。年轻的刘易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对猪、狗等大多数农场动物都没有感觉，但长时间的研究让他坚信，鸡是无辜的生物，它们值得被收养。因此只要一有鸡被杀了当餐食，刘易斯便会哭得歇斯底里，除了绝食抗议，他还会好几天不和家里人说话。大约8岁的时候，刘易斯不再对鸡执迷，转而将这种情感转接到了宗教热情中。

不久，年轻的刘易斯便开始了他对鸡的说教，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偷偷地溜到鸡舍里对着鸡群喊叫，并结结巴巴地信口为它们做些东拉西扯的祈祷。就寝成了鸡舍里的宗教仪式，这时的他会凝望着这群叽叽叫的教众，为它们祈祷，让它们静静入睡。10岁那年他发展了完整的侍奉。如果小鸡死了，他会将小鸡放在一个小的猪油罐里埋起来，并一定要让鲜花相伴。他还为刚出生的小鸡施洗。有一次，他为一只小鸡做祈祷时浑然忘我，在施洗时让小鸡在水里泡得太久，以至于这件事成了他最糟糕的童年记忆之一。奄奄一息的小鸡从水里被拉出来时的恐怖情景一直让他噩梦连连。

布道一直是刘易斯这个农家孩子的梦想，直到1957年他成为家里第一个完成高中学业的人。怀着到莫尔豪斯学院追随金博士的梦想，他写信去索取了一份册子，但一眼发现他的家庭根本无法负担那里的学费。他最终选择了他能找到的免学费的学校——纳什维尔美国浸信会神学院。作为一个只去过一次城市的乡村男孩，刘易斯此前对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来自于搭乘电梯的奇迹感，因此，纳什维尔的独立大学生活就是混合惊吓与冒险的突击。当在教堂里听说有人提供金博士非暴力哲学的课程时，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种完美的感觉。詹姆斯·劳森和刘易斯同期到达纳什维尔。在1958年秋天，当劳森作为和解协会的地方联络员来到纳什维尔的这段时间里，他每周开设非暴力课程。若是碰巧不在镇上，他的同事格伦·斯迈利就会代他上课。刘易斯发觉这些课程要远比他在校学习的常规

课程更有吸引力，因此，在这门独特课程的学习中，他比任何人都坚定。在完成英语和数学的补习课之前，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关于甘地、梭罗和美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先驱们的知识。在纳什维尔充实了两年，受到金的激励并经过劳森的训练后，刘易斯激动地乘车从蒙哥马利回到家，做好了为社会福音运动冒险的准备。

在那个秋天，劳森把一车纳什维尔的学生送到了汉兰达平民学校，并且拉上了他在神学院的室友詹姆斯·贝弗尔。一年多前，贝弗尔曾拒绝参与劳森的研讨会，他答应拜访汉兰达是因为觉得这次出行听起来更像是去度假。贝弗尔被视为天生的学院领袖。他成长于一个分居的家庭——母亲住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父亲在克利夫兰（贝弗尔青少年时期曾在那里的轧钢厂工作过），他则往返穿梭于两地之间。贝弗尔是一个性格急躁、心直口快、善于社交的人，在就读纳什维尔神学院之前，他和他的兄弟刚好签下摇滚唱片的合约，但突然的宗教信仰转变促使他来到学院。有传闻说他是在避开自己并不想要的新生儿。无论如何，他成了一个天赋展露的传教士，他闻名于过道中口若悬河的高声说教，尝试大胆的理论 and 奇怪的即兴创作，他说些天花乱坠的故事并让自己陷入一种狂热之中，有玩笑说，贝弗尔给人洗脑后也需要给自己洗个澡。贝弗尔对社会福音和刘易斯的非暴力理论都不感兴趣，但刘易斯是个不屈不挠的说客，怀着获得支持的希望，他劝诱贝弗尔去汉兰达。

在汉兰达发言的几个人中，迈尔斯·霍顿是第一个打击贝弗尔统治感的人。学生们说，种族隔离断言他们是劣等人，但他们已经把自己从中分离了出来，霍顿就学生的这些说法提出了问题。他让学生们对自己到底是谁、自己在说什么产生了怀疑。贝弗尔从来没有听到一个白人说话如此直白却又如此巧妙。这个人就像苏格拉底，总是提出假设并挑战之，同时进一步向更深层次的核心掘进。这种效力让贝弗尔感到紧张，一股沉重的压力向他袭来。在后面的一个会话中，当另一位发言人训斥这群学生的怯懦时，他非常愤怒。那位发言人说：“就看看那些波兰学生，他们正忙着帮助政府治理国家，而你们却在这里忙着缠五朔节花柱，

搭伙看电影或者玩桥牌，你们感觉如何？”贝弗尔的脾气噌地一下就上来了，他在这场严厉的演讲中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刘易斯和赛提玛·克拉克为课程留了下来。克拉克是金抱以罕有希望的另一个人，她在汉兰达把希望渗透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60岁的克拉克是奴隶的女儿，曾属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波因塞特家族（这个家庭以冬日里盛开的一种花命名）。她专门从事成年人的扫盲工作，还把几乎没有文化的人培养成老师。克拉克在教育领域里的非凡天赋启发了迈尔斯·霍顿，使她负责“公民学校”这个汉兰达实验性项目。在一个每周例行的研讨会上，克拉克承诺把佃户和其他没有受过教育的黑人变成潜在的选民，用基本的读写能力武装他们，并能对民主权利有所掌握。她甚至希望设计一个能让知识呈几何增长、迅速把有天赋的文盲训练成这一领域的老师的教学系统。在性格上，她奇迹般地在坚韧的热情和永恒的耐心之间保持得恰到好处。人们认为克拉克是个圣人般的人，这一点即使那些预言她会失败的知识渊博的批评家也不予否认。有一位到访汉兰达的教授抱怨道，约翰·刘易斯并不是一位合适的领导者——他说话结巴，拆分不定式，阅读方法糟糕。“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克拉克反问道。意思到了就行。再说，需要他引导的人们已经了解他了，贝弗尔也是。她预言贝弗尔会回来的，并且劝导大家要耐心。一如既往地，她在阶级分化的鸿沟两侧做工作，而自己心灵却能免受摩擦的伤害。

那年秋天，艾拉·贝克特地来到汉兰达，试图探索将克拉克的公民学校项目和 SCLC 尚不成熟的“公民圣战”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她早就听说，克拉克正在招收的老师几乎全部来自她认为南方最有前途的人力资源——女性黑人群体，同时，她也听说克拉克的项目针对的是那些完全不识字的黑人，在需要登记的黑人群体组成中，这部分人占据压倒性的成分。但贝克知道，正是这些因素会引起 SCLC 传教士们本能的怀疑。扫盲学校涉及烦琐乏味的工作，没有日息也不受神职人员的控制。而且，因为公开依据普遍性的黑人愚昧，扫盲学校给领导们呈现

了形象问题，但领导们还在挣扎于建立举止恰当的“新黑人”公众认知。出于这些原因，在回到亚特兰大后，贝克淡化了她对学校的热情，她只要求得到“授权以进一步探索这一领域”。

非暴力讲习会后，金自己也感到气馁。在 SCLC 的年度会议中，他走到委员会前，直截了当地承认“公民圣战”已经失败。筹资和注册情况惨淡，总数远远少于 18 个月前启动时宣称的目标。金说道：“诚实促使我们承认，我们真的还没有触及这个领域的表层。”他的诊断是，认为 SCLC 和 NAACP 互相麻痹；而他的疗法是，召开一个区域性会议，希望能在选民登记上与南方 NAACP 分会和其他当地组织达成合作协议。实际上，他想绕过 NAACP 总会，但与会的现实主义者指出，这个方案绝对躲不过威尔金斯的注意。

无奈之下，金只好指望公关。他抱怨“SCLC 不曾见之于报刊或其他媒体”，因此提议聘请一个专业的公关，聘任期至少为 6 个月。金心目中的人选是贝亚德·拉斯廷，但他没有马上说出来，因为害怕重燃在抵制运动中将拉斯廷逐出蒙哥马利的论战。金很明白，将一个前共产党员推荐给一群浸信会传教士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并且，他也希望先取得大家对这个想法的支持。集中在一起的牧师们投票决定开始寻找一个宣传助理，并且用另一种方式。他们把金的想法恭敬讨论进了冷宫。过了不久，《喷气机》杂志发表了一则不署名的八卦新闻，文中说：“神职人员的南部投票活动几乎陷于停顿。”它还提到了蒂利的离开、没有达到 SCLC 宣称目标的可怜的登记总数，以及金自己刚对同僚承认的其他失败迹象。文章总结道：“与此同时，NAACP 已悄悄地扩展其南方投票登记影响力，并且它在许多州的得利正在提高。道德：头条新闻不会做这个。”

周刊把威尔金斯对金所做评论浓缩成这句话，并公之于世。文章的字句深深刺痛了金，以至于他立即打电话给《喷气机》的华盛顿办事处主管，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一周后，他在 SCLC 的会议中拿出了一份旨在消除那些已经散布的错误观念的提案。会上，几乎所有人都把关注点投向了公共关系领域。金要求召开

一次记者发布会来陈述 SCLC “正在拓展活动”；要发表一篇“寄给至少 5000 人”的新闻信札，信中所述内容和记者发布会上的一致，并请求募集资金；并且，“在经过虔诚和认真的思考后”，他以公关工作的名义向大家推荐了贝亚德·拉斯廷。这场 SCLC 的危机如此紧迫，以至于让金收起了素日的温文尔雅，直言敦促他的同事去冒一冒“风险”。在认识到“可能涉及严重危险”后，他向大家保证，一旦产生令人尴尬的公众反应，拉斯廷便会“悄然辞职”。

此外，金建议另外安排一个 SCLC 寻求和平的特派团到 NAACP 的纽约总部去，目的是“清除那些看来是由 NAACP 的高层人士种下的异议种子”。金想和威尔金斯做交易，但 SCLC 的传教士很快指出，如果金聘请背景为威尔金斯所熟知的拉斯廷，他的谈判筹码就会减少。一如既往的，金要达到一个目标，似乎总是要成为另外一个目标的抵押品。推荐被无限期搁置——至少要等到拉斯廷旅行回来，因为他新近参加了一个深入非洲法国殖民地的政治大篷车旅行。

1959 年年末，赌注最终还是押到了金的身上——金决定直接投身苦苦挣扎了近三年的 SCLC 的巩固工作中。这个决定让他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搬到 SCLC 的亚特兰大总部，也就是说，他不必再把累计好几个月的时间花在亚特兰大机场中转候机，因为几乎任何进出南方的事物都要经过亚特兰大，金也不例外。当然，回亚特兰大也意味着回到埃比尼泽和父亲身边。刚满 60 岁的老金一直不停地提醒儿子，希望他能回到传承于整个 20 世纪的自家讲坛。

金知道，回亚特兰大却不回埃比尼泽会令父亲伤心，并且无法弥补；他也知道，埃比尼泽的会员正在减少——一定程度上，他怀疑，是因为父亲已经开始厌倦，只是为了拨款而接受会众，而且他常在礼拜仪式中在教堂讲坛上准备布道。金的弟弟也刚辞去在这里从事助理牧师的工作，他不再叛逆，这足以使他成为一名牧师，但又不足以忍受父亲对自己的日常监督。不像弟弟，金相信自己可以创造一种共生的合作牧师工作：父亲可以继续管理教堂，他可以吸引大量新人。但实际上，迁居亚特兰大的绝大部分重担似乎都将落在柯瑞塔身上。她会和她的婆

婆一起成为埃比尼泽的第一夫人，并且要依靠金的父亲、这个曾经强烈反对他们婚姻的人生活。

几个月来，金一直劝诱阿伯纳斯和他一同到亚特兰大去做 SCLC 的全职执行董事，但阿伯纳斯回绝了金，因为他热爱在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浸信会工作，他也乐见继金之后担任蒙哥马利 MIA 主席的前景，更重要的是，他无法面对在亚特兰大没有讲坛的生活。无论金向他保证多少次，说他在亚特兰大每周日都能到地方讲道——甚至可能赚到比常驻牧师更多的宾客费——阿伯纳斯还是断言一切都将不再相同。只要能找到一个办法，能让他始终保持掌舵人的身份，他愿意追随着金，几乎到哪里都行。

金最终失去了耐心。“做决定吧，”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可能一直这么等下去。”

阿伯纳斯很受伤，他说：“你从来没有用这种语气对我说过话，迈克。”（阿伯纳斯和金已经习惯在谈私事时以对方的原名互称）这不公平，阿伯纳斯抱怨说，金自己筹划着搬回埃比尼泽，却期望他离开他的讲坛。

金似乎马上陷入了自责，沉默许久后，他说：“大卫，我告诉过你，我还记得小时候看着父亲走长凳的情景。”

“我知道。”阿伯纳斯平静地说，“走长凳”是指布道讲到一半时，牧师从讲坛上一跃而下欣喜若狂地讲道，同时在长凳间上下起舞，逐个跨过会众中那些昏昏欲倒的身体。阿伯纳斯知道，金视“走长凳”为他的传承中最杂耍、最原本的形象。

“他走长凳，”金既屈辱又惊叹地反复道，“他当时这么做是为了养活和教育家人。现在我必须去帮他，难道你不明白吗？”

“我知道，迈克，我知道。”阿伯纳斯说。他不再反驳，但也没有同意去亚特兰大。放过争议，恢复了原有的幽默后，金给阿伯纳斯两周时间做决定。

而金自己的决定，尽管形成得很艰难，却被执行到极致。他打电话叫来 R.

D. 内斯比特（早在6年前他还是学生时，内斯比特就第一个发现了他，当时他在金的父亲家里吃了一盘肉排），两人坐在德克斯特牧师住宅的门廊前，金告诉内斯比特，他将于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辞职，并于1960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生效。在11月29日这个星期天，金在德克斯特讲坛宣布了他的决定。他首先试图使自己名誉和责任全部加身，他对大家说，他过去一直在做“5~6个人”的工作，他要出行和演讲，不仅仅是为蒙哥马利而是为满足全国的要求工作，同时还要承受“为人所知的综合应力”。由于总是在“给予、给予、给予，未曾想过退却”，他说，他已经变成一个“身心疲惫的残骸”。他暴露了自己堂皇而生冷的自怜，那是未经润饰的殉道者的自怜。两天后，他在媒体滔滔不绝的声明中展露了他的另外一种情绪。“以平等为目的，充分而大胆地推进南方运动的时代已经到来，”他说，“……我坚信，这个心理上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必须通过非暴力抵抗，以社会改革的技能培养我们的青年和成年领袖。我们必须采用带动人民群众的新的斗争方法。”

同样在周二，佐治亚州州长欧内斯特·范迪瓦公开对记者回应称，金正搬回亚特兰大。“无论小马丁·路德·金到哪里，他身后总是尾随一波的犯罪，包括持刀伤人、爆炸、煽动暴乱、教唆、破坏财产等，”范迪瓦宣称，“出于这些原因，佐治亚州现在并不欢迎他。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保持着种族间的良好关系。”

亚特兰大是南方最显眼、最具自我意识的城市，金对自己回归亚特兰大的外交感到担心。亚特兰大有一个开明白人寡头集团，它的成员可以直言不讳、稀松平常地称自己为“权利组织”，这样的城市在美国的大都市中恐怕是独此一家。而这里的黑人领袖在他们的圈子里也做了完全相同的事情。因此，金明白，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宪法报》的主编拉尔夫·麦吉尔说亚特兰大的白人很警惕，就像“听闻大瘟疫正在靠近的中世纪城池里的市民”。金要回归的这个城市拥有“甜蜜奥本”大道、黑人银行和舒适的家，它们绵延分布在越过亚特兰大大学建筑群的西区。金的父母早已搬到了西区，因此一直到现在都

承受着跨城往返埃比尼泽的长途通勤，但金决定将自己的家搬到一个离教堂不远的小出租屋里，位置坐落在不那么受欢迎的东区。这让人有些吃惊，就像他那辆1954年的老式庞蒂亚克车，当金盘算着在不怎么受人尊敬、散布着贫民窟的东城区买房子的时候，这消息就已经在亚特兰大的黑人圈子里传开了，有言论说金家太过谦卑。他们家没有奢华的娱乐活动，金每年仅从 SCLC 象征性地支取 1 美元，从埃比尼泽领 6000 美元的中等水平的薪水，金的生活水平被认为与其世界地位严重不符。

金告诉黑人记者，他并不是来接管黑人领袖的职位的，而是来尽其所能“提供协助”的。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他低调处理自己的返乡，从而安抚亚特兰大在任的黑人领袖。在那些人中，很多人把金当成一个小男孩。“我在他们身边长大，”金告诉 SCLC 的一个同事，“如果我犯错误，他们非吃了我不可。”但他对资产阶级生活标准有着深刻的敏感。这个想要“给我一些豪言”的孩子，和那个最早的记忆来自大萧条时期面包生产线的孩子是同一个人。他是矛盾的——像是一位谦逊的王子。他会停下来和街上遇到的最穷的人亲切地交谈，但同时他又让 SCLC 发布一篇特别新闻稿，宣布他已经被邀请去哈佛大学的小教堂做演讲。虽然柯瑞塔和他政治价值观一致，但她从蒙哥马利带来了自己的厨师，而且，她先期搬到这个新城市的东西让她能自如地像亚特兰大的贵族一般生活。为了再找一个保姆和跑腿的人，她还拨通了斯佩尔曼学院院长妻子的电话，让她挑一名合适的学生送过来。

金把家搬回到亚特兰大标志着 50 年代和 60 年代之间的过渡。在纳什维尔，詹姆斯·劳森连续几个周六都派出十几个最守纪律的甘地主义者学生，其中就包括约翰·刘易斯。这些学生一起到市中心百货商店的隔离区域去。他们拒绝执行命令造成了混乱，但他们的礼貌始终如一且方式新颖，从而将矛盾缓解到大致类似于派对闯入不速之客的水平。随后，这些学生回到劳森的研讨会上评估他们的试验示范效果。

在旧金山的 AFL-CIO 年度大会上，A. 菲利普·伦道夫一天内在台发言了 3 次，每一次都在工会成员中谋求反对官方隔离政策的行动。对 AFL-CIO 的主席乔治·米尼来说，一次都嫌多。“谁他妈的任命你为全美国黑人的监护人？”他在讲坛上咆哮道。受这种公开侮辱的刺激，伦道夫在 AFL-CIO 外组织了一个黑人劳工联合会，就是为了给米尼施加压力。

在白宫，古巴革命政府所采取的财产充公和其他反美行动令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焦躁。他气冲冲地对助手说“卡斯特罗现在就像个疯子”，他大致同意了以海上封锁来扼制古巴的计划。与往常一样，艾森豪威尔让自己始终保持警惕。在过去 10 年里，他以长辈的耐心和军人的稳健，多次解决了爆发新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现在，他不打算因一个小岛而变。同样，他认为一些人要为制造狂热要求增加武器开支的气氛负责，他对那些人克制着怒火。他相信，基于贪婪和焦虑的请求比基于军事判断的请求要走得更远，并且正在颠覆政治和军事职业水准。进入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军队官员通过政治家和记者进行游说，谋求已经被政府拒绝的武器开支，他将这一行为斥责为“近乎谋反”。

和斯坦利·利维森一起，金面临搬去亚特兰大的最后一个障碍：国家税务局和亚拉巴马州税务局都在对他进行烦人的税务审计。审计员要金证明，超出他的申报收入、在他的银行账户过账的钱不是应税收入——这个要求击中了金的软肋。由于所有开支费用和捐款收支都经由他自己的账户，他发现几乎不可能证明这些款项可以合法扣除。亚拉巴马州审计员尤为难缠，他拒绝把 SCLC 或 MIA 收到的捐款归入免税项，这让金备受煎熬。金在抗议中缴付税金要比对抗更容易。他向国家税务局补税近 500 美元，给亚拉巴马州的临别赠礼是一张金额为 1667.83 美元的支票。

为了金在德克斯特的最后一次礼拜仪式，金家人于 1960 年 1 月底回到蒙哥马利。德克斯特的会众送给他们一套雕花银质茶具，并且对他们的告别表达了无尽的柔情。第二天晚上，阿伯纳斯主持了一个奢侈得多的“爱与忠诚的见证”仪

式，谦卑和庄严的两极情感让彼此间沐浴在几乎无处不在的温暖和谐中。当讲到蒙哥马利的黑人一直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饱受压迫时，拥挤的人群顿时报以“阿门”的震响——抵制胜利的种族隔离公交车上，他们中间依然有太多人被要求走到车厢后面去，他们依然没有黑人公交车司机，也没能拥有一个黑人警察“在上学时护送我们的孩子穿过街道，就像白人孩子得到的护送一样”。听众中，没有几个人获得允许去投票，甚至金本人也没能把“白人”和“有色”的标牌从公共场所的入口处移除。这些悲叹仅仅突出了对金崇拜之情的对比，在人们眼里，金是像耶稣一样的人，他受到的尊崇如同骑在驴背上的救世主。至少由9个教堂唱诗班组成的合唱团在仪式开始前演唱了一首游行赞歌，名为《融合之歌》，歌中把传统的浸信会叠句“当我们全都去了天堂”改为“当我们全都知道了正义”。

在仪式过程中，另外5个合唱团向金表达了敬意。在金MIA的领导职位正式移交给阿伯纳斯之前，蒙哥马利各大黑人行业协会和社团——理发师、商人、美容师、医生、牧师以及其他群体——都纷纷走上前来向金致敬。搬运工协会最后一个向金致敬，他们的赠礼是一个装满现金的木头箱子——一个宽及金的双肩，深度为下巴到腹部的箱子。金像国王一样接受了这一切，但随后，他以令人们摇头纳闷的手势，指挥着把钱分别划给MIA与SCLC。“我花掉了箱子里的每一分钱。”他打趣说。间接地因为这个会计把戏而提高了声誉，“我不敢说自己配得上这样的赞扬。”他认真地补充道。他说完后，他们一起唱起了《以爱相连》这首歌，并在歌声中得到了祝福。

金切断了他和蒙哥马利最后的维系。在许多方面，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带来了多年的挫折。即使他出国旅行也如同他的白宫谒见一样带来烦恼，而且，他投入上千次演讲中的巨大能量也暴露了他幻想一般的希望，那就是，他更大的目标可以通过政治福音来完成。这些事情对金而言，其麻烦要比他身边的大多数人可能猜测到的更甚，但它们给他带来的收益也比他可能知道的更多。过气的荣耀逐渐让兴奋不再，天生的智慧带来早年的成名。这些都强化了他业已显著

的稳重。雄辩家的形像已经使他迅速蜚声全国，以至于在短短几年就结识了一生中的熟人，其中一些还是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人物。演讲还帮助金学会读懂听众中每一类人群，并且首先承认自己演讲这个特殊天赋上的局限。

比之“爱和忠诚的见证”这场仪式中发生的事情，命运的设计堪为巅峰之作。就在同日，也就是2月1日晚，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周边几所黑人院校的学生们，因为4个大一男生的报道而激动起来——即使引发4个男生行动的所有的言语都是新神话的材料。在一次闲谈中，其中一人说：“我们还不如现在就去。”另一位回答说：“你说真的？”第一个人说：“当然，我就是这个意思。”然后，4个人就去了伍尔沃斯市中心的商店，并溜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专供白人的午餐柜台前就座。黑人女服务员对他们说：“你们这帮家伙给我们的族裔抹黑。”同时拒绝为他们服务。但4个大一新生不仅整个下午都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还许诺第二天早上10点钟回来继续他们所谓的“静坐抗议”。那天晚上，在北卡罗来纳州A & T的校园中，4个瞬间闻名的学生和推选出来的学生干部开会，并且，其他人第二天早上自愿加入的传闻也开始扩散。随着校区间的电话响铃的振动，消息被迅速传递，甚至传闻格林斯博罗学院的一些白人学生也想加入。学生领袖对行动进行了安排，以便学生们可以轮流参与活动，同时避免缺课。周二，19名学生和那4名新生一起到伍尔沃斯坐了下来。到周三，“静坐”蔓延开来时，学生人数增加到了85名。

第七章 复生

没有人来得及讶异格林斯博罗静坐如此之不同。在过去3年里，类似的示威活动在其他至少16个城市发生过。那些城市里的示威活动很少成为新闻，它们迅速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并且对其他地方没有丝毫的催化效果。相比之下，格林斯博罗界定了新的10年。几乎可以肯定，规划的缺乏促成了最初的冲动。由于没有做计划，4名伍尔沃斯的学生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自我施加的限制。他们没有明确战术目标，没有做训练或演练的准备工作，也没有为可能有武力来对付他们而纠结。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预料到伍尔沃斯的白人领袖会纠结于混乱和尴尬中——而不是威胁逮捕他们。在惊讶地发现了种族隔离的白人世界所做的防御后，学生们从恐惧害怕转而变得兴高采烈。

自发性和不限名额的格林斯博罗静坐，最初只是发生在伙伴群中的灵光一闪——是几个活动家正朝着相同目标摸索的结果。第一个晚上，第一批4名抗议者自己联系了弗洛伊德·麦基希克——一位特立独行的律师和有色人种协进会青年委员会的领导。麦基希克曾参与道格拉斯·穆尔牧师的达勒姆冰淇淋店案和其他小型静坐活动。在得到通知后，麦基希克和穆尔赶往就在达勒姆附近的格林斯博罗。同一时间，这个消息在另一个平行的信息渠道上迅速传开——白人占大多数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有一名副会长在格林斯博罗，他在事发第二天的2月2日，在“静坐”这个词出现在公共媒体前，把消息传了出来。

第三天，抗议的人数超过了80人，道格拉斯·穆尔把一连串的新闻简报电话告知在纳什维尔的詹姆斯·劳森。他报告说，这次抗议活动将持续扩大，虽然已经有成年人到达本地来做幕后的工作，但热情的学生志愿者过于热切而没有

吸纳成年人的组织纪律。静坐“指挥中心”设在北卡罗来纳州农业技术州立大学，中心的运作简单干脆、具有军事化效率——为新加入的抗议者就非暴力行动做简要的指点、平息谣言、根据需要派遣生力军。最重要的是，穆尔报告说，对静坐的声援即将在达勒姆来罗利和其他北卡罗来纳州城市启动。穆尔知道劳森已经准备举行新的纳什维尔抗议活动，他敦促劳森加快工作进度，使运动能够扩展到其他州。劳森答应尽力而为。随后，穆尔又打电话给其他人，包括一个打给了FOR的格伦·斯迈利。CORE的高级职员戈登·凯莉也接到了麦基希克的电话——她曾经在去年为怀亚特·沃克的里士满游行和迈阿密静坐活动工作过。静坐第一周的周末，凯莉从纽约飞到达勒姆。周六，400余名学生参加了格林斯博罗的静坐活动，而克雷斯和城里其他大型廉价商店都被添加到静坐目标名单上。当天，一个炸弹恐吓中断了示威游行。后来，三K党徒和青年帮派成员挤进商店里恐吓示威者。整个星期都在拼命保持礼貌的商店经理们现在威胁要施以法律手段。

在严重的报复降临格林斯博罗前，接下来的周一，在罗利、达勒姆和温斯顿—塞勒姆的北卡罗来纳州周边城市都爆发了新的静坐活动。3天后，在出发去市中心的种族隔离午餐柜台之前，学生们聚集在格林斯博罗附近的海波因特（High Point）的一个教堂里，当时，从伯明翰赶来的弗雷德·夏特沃斯正在为该教堂的牧师做周中宣讲。在北卡罗来纳州以外南方腹地的所有人中，夏特沃斯第一个目击了静坐活动。他看到衣冠整洁的学生在良好的秩序下出发，就像在人民战争初期阶段快乐的士兵，他听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其他城镇也发生着同样的情形——只不过规模更大一些。夏特沃斯立刻打电话给亚特兰大SCLC办公室的艾拉·贝克。他不是第一个向她汇报静坐活动的人，但他是SCLC传教士内层权威圈子中第一个发出声音的人。他如此这般地告诉贝克：“你必须告诉马丁，我们必须跟进。”还补充说，静坐将“震动世界”。

在海波因特静坐后的第二天，运动首次跨越了州的界线。一个南方基督教领

袖会议 (SCLC) 传教士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石山通过电话向麦基希克报告说，他的责任就是“准备出发”。他们在周五的时候从他的教会出发前往午餐柜台，而在同一天，罗利警方逮捕了坐在格林斯博罗市卡梅伦村伍尔沃斯商店的 41 名学生。戴着手铐、双目紧闭、心跳怦然的罗利学生拖着脚步跨过了监狱的门槛，但是，像 4 年前公交抵制者们一样，他们很快就被保释出狱，由此，他们发现自己的身份并没有因为入狱而被碾碎，他们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并不觉得自己像社会渣滓。一股救援潮令他们的情绪高涨起来。

纳什维尔的周五晚上，劳森主持的会议结果成了静坐运动的第一个群众大会。大约有 500 名新加入的志愿者，随着 75 名非暴力讨论会的老手挤进了第一浸信会教堂。考虑到只有一小部分学生接受过培训，劳森和其他成年人主张推迟。这不是游戏，他们说。这个城市早晚会把示威者关进监狱，而他们的组织——纳什维尔基督教领导会议，金的 SCLC 在当地的分支机构——连 100 美元的准备金都不到，他们需要时间来筹集保释金。然而，这样那样谨慎的告诫还是被学生们高涨的情绪淹没，于是，劳森亲自举办非暴力速成班直到深夜。他列举出 100 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告诉众人应该如何应对；如何避免违反《游荡法》；如何进入或从黑人餐台移动到白人有序更替的餐台；如何占据需要去浴室的学生的座位；甚至如何打扮：女生穿丝袜和高跟鞋，男生穿外套打领带。如果有疑问，他强调，新人采取的应对方式，应该以此前已经示范过的研讨会成员的方式为准。

半夜，在紧张不安的祈祷和“祝你好运”的低声祝福中，他们分头散去。劳森的后勤计划在第二天早上执行得很顺利。教会的汽车从第一浸信会教堂经纳什维尔 4 个黑人学院（菲斯克大学、田纳西州立学院、梅哈里医学院和浸信会神学院）附近的指定接载点跑了一圈。当所有人都聚集在第一浸信会集结区时，劳森带领 500 名强者出发了。内战期间，白人的纳什维尔曾历经南北两军 12 次控制权的异手，但当衣着整齐的黑人大学生鱼贯进入市中心的商店等待餐饮服务时，

这个城市正在从一种此前从没有遇到过的侵袭的力量中慢慢醒来。

纳什维尔的学生，注定要把他们自己树立为南方非暴力行动团体中，最大、最有纪律、最不屈不挠的一群。他们把静坐运动扩展到第三个州。他们的成功有助于形成学生团体的模式——从校园招募、在教堂里驻扎、由传教士提供建议。初期的结果令人鼓舞，为了交流劳森打电话给金、艾拉·贝克和道格拉斯·穆尔，同时也和其他人互相交换情况汇报。他们每个人又依次打电话给那些可能有助于开辟其他阵线的熟人。截至2月底，静坐运动在南方8个州31个城市启动。但大部分白人和黑人媒体对静坐运动的新闻依然鲜有关注，这主要是因为人们习惯于把学生的古怪行径视为一时兴起的行为。穆尔预测，静坐很快将结束这种自得。“如果伍尔沃斯和其他商店认为这只是另一种内裤袭击，”他告诉记者，“那么他们目前还没有这个领域的社会学家。”

最早的一波学生抗议活动在金作为埃比尼泽的新任联合牧师的前两场布道前的两个星期内持续进行着。雪上加霜的是，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又传来恶意谣言，说亚拉巴马州的官员们对其在1月18日从金身上榨取的退缴税不满意。闲言碎语从法院大楼内流了出来，以至于州律师把金的名字置于大陪审团的审视之下，给他安上足以使其饱受数十年牢狱之灾的罪名。日益猖獗的谣言使金警觉起来，并提前寻求法律和财务援助。他向哈里·贝拉方特和演员西德尼·波蒂埃发去紧急电报，同时请求罗伊·威尔金斯为他介绍全美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威尔金斯推荐了他的两个有色人种协进会委员会成员。金言辞谨慎地写了一封信给其中的一位，休伯特·T. 德兰尼法官，请求他接待他的“特别助理”贝亚德·拉斯廷，以便听其就某一机密事件做简要介绍。随着静坐活动进入第三个星期，金本人也在纽约开始和他的潜在被告人进行磋商。

在从纽约回去的路上，他中途停靠北卡罗来纳州拜访道格拉斯·穆尔，还去了位于达勒姆市中心的F.W. 伍尔沃斯午餐柜台，和他同去的是从蒙哥马利来的阿伯纳斯。伍尔沃斯午餐柜台已经关闭，公司领导徒劳地希望，延期开业能让学

生忘却抗议。当晚，金在这里的一场集会上发言，声援北卡罗来纳州中部各个城市中持续进行的静坐活动。“我们受够了压迫者的铁蹄蹂躏，”他说道，重复着他在公共汽车抵制运动中的首场发言中的那句煽动性台词，“种族隔离中的价值体系和民主、基督教义截然相反，世界上所有的逻辑学家的逻辑论证都无法让他们互相印证。”

这些都是金的演说中常见的主题。一个明显的不同是，他对这场抗议活动的明确要早于他人，他这样描述道：“（这场抗议活动）注定会成为当下熠熠生辉的史诗事件之一。”在黑人和白人推选出的领导者中，唯有他把学生作为成人政治中的成熟力量来赞扬：“你们这场斗争的新鲜和崭新之处在于，它由学生发起、领导和维持。正是在这种崭新的斗争中，美国学生走向成熟。现在，你们在全世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占有了光荣的一席之地。”金的发言透露出了尊敬的语气，这在那个时代是十分不同寻常的，当时在大众的眼中，学生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被归类为年轻、预备性的角色，而静坐这种新颖、未经法律批准的抗议方法所引起的主要反应是人们困惑的蹙眉和广泛的猜疑。即使是主流黑人报纸也小心谨慎地报道静坐活动。这些活动被人们当作青少年新潮的玩闹——尽管其部分目的还算不错。他们没有得到成人民权组织的控制和批准，因而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会也没有为遭到拘捕的首批学生进行辩护。

过去3年里金一直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寻找一种非暴力的方式以对抗种族隔离法律，学生们今天却采取了行动，他为此而大加赞扬。金曾经绕行半个地球，只为了努力克服晦涩的甘地难题，他无数次宣称已经准备好了为自己的信念牺牲，但他一直没有那么情愿地在相对安全的教会之外实践自己的想法。而简单、孩子气的学生们却快刀斩乱麻地直接绕开了金试图解开的深奥的非暴力原则中的所有复杂难题。他宽容的品性使他能够轻易地给学生以应得的表扬，萦绕在他心中的顾虑无疑加深了他对学生的钦佩之情。即便是现在，金也没有准备好加入学生们午餐中心静坐的队伍当中，没有准备好亲身去试一试种族隔离法律。在

达勒姆他没有承诺会这么做，但这一做法的吸引力还是促使他向聚集在一起的学生们劝诫道：“不要害怕坐牢，”他宣称，“如果我们因为捍卫自己权利而遭到官员们逮捕的威胁，那么我们一定要回答我们愿意也准备好了要填满南部的监狱……因此，我恳请你们继续斗争。”“填满监狱”对金来说是一条新的战斗口号，从黑人和白人的标准来看都具有煽动性。

就在金刚刚开始热情地鼓励学生的抗议活动的时候，他对危险的预言在另一个地区得到了应验。两名佐治亚州司法长官代表在达勒姆演说发表的第二天，带着亚拉巴马州下发的指控金伪造证据的逮捕令来到了埃比尼泽教堂办公室。金没有反抗，被作为犯人带走关押在县法院，震惊和谣言波浪一般从奥本大街迅速蔓延至西部地区。金的父亲冲进法院，他带领着一群律师和其他有名望的黑人试图揭穿金被控罪名的本质。他们打听到金所犯的是重罪，并对此提出质疑，随后法院确认了这一消息，最终他们接受了这一使他们揪心的事实。然而，进一步消息却表示金的罪名来源于亚拉巴马税收问题，这让律师们感到疑惑，然后是义愤，其中的一些律师清楚地知道金已经缴纳了所争议年限的退缴税。一个接受并缴纳了州定税额的纳税者被提起诉讼并成为罪犯几乎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即便如此，正常的诉讼程序也应该是由州政府指控逃税——一项轻罪。金是亚拉巴马州历史上第一位因逃税重罪而被提起诉讼的公民，他所面临的技术指控是伪造 1956 和 1958 年的纳税申报单并签名。州长约翰·帕特森作为领导镇压公共汽车抵制运动和州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检查总长，对亚拉巴马政府为了拿金在政治上惩一儆百而用尽权力的推论从未否认。当签署将金从佐治亚州引渡的文件时，帕特森愉快地当众讽刺道：“如果你想跳舞，”他说起了俏皮话，“你就得付乐师费用。”

静坐活动和伪证指控交织在一起，对金来说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并残忍地打击了他。就在他决定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动员理想主义青年抗议者填满监狱时，亚拉巴马州政府对准这个行动最为敏感的部位来了一击。一旦逃税的罪名成

立，即使是被白人法院定罪，锒铛入狱的金的公众形象将蒙上一层阴影，他将成为说谎、贪婪、道貌岸然的布道者。这些都是金在教堂布道时，最为虔诚地决心要摒弃和尽其所能去改变的缺陷。作为一个布道者，他这一生的奋斗开始于反抗他眼中愤世嫉俗的精神食粮和对原教旨主义教义的剥削性使用。州长帕特森的做法是对他奋斗目标的嘲笑。这不仅带来使他失去对自己身份认同感的威胁，还对他信仰的基础发难。金前所未有地为将来感到心神不宁。被逮捕当天传讯过后他回到家里，取消了在芝加哥和加利福尼亚的演讲。他觉得自己无法面对观众，无法昂首挺胸，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有勇气了。可是后来他想通了，如果他不继续前行那他就已经输了。突然感到一股力量涌入心间，金重新预定了演讲，并在当天下午乘坐随后的一班飞机飞往芝加哥。

尽管针对金逃税的指控并没有成为美国主流报纸的头版，但相关消息已经在支持民权的团体里传开。罗伊·威尔金斯公开宣称有色人种协进会将竭尽所能支持金。黑人报纸公开指责对他的指控带有政治色彩。尽管源源不断的支持给了金很大的鼓舞，但他承认这是不够的。即便是那些赞美他品格的人也不能理直气壮地断言他是无辜的。人们心中还是有一些怀疑——他们辩称，即使金在纳税上犯了一些小错误，但他是以黑人领袖的身份被迫害的。如果金被定罪和收监，那么他将会证实人们这些怀疑。绝望中的金想要组建另一个审理委员会以对抗亚拉巴马法院的完整审判。他试图召集有声望的白人领导——哈佛法律学院和神学院的院长、全国基督教促进会会长、南部浸信会主席——组成一流的委员会来审查他的税务记录，但没有成功。

亚特兰大市最有名望的黑人教士们会面，起草声明以谴责对金的指控，黑人刊物对该事件以通栏标题进行了报道——在同一天，一群实力相当的显贵们低调碰面，其显而易见的目的是阻止亚特兰大学生静坐运动的威胁。教士塞缪尔·威廉姆斯博士——金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哲学教授，兼任浸信会牧师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特许官员——也加入了后面这场由亚特兰大大学所有6所学院的院长所参

与的会议。莫尔豪斯的院长本杰明·迈斯告诫学生们在亚特兰大“任何冲突的爆发”都会被归罪于金，最终学生们同意起草一份申诉声明，这份声明是模仿《独立宣言》而写的。和其他城市不同，这是亚特兰大的行事风格。学生们做出妥协的同时并没有说明发表这份宣言之后他们是否会静坐。朱利安·邦德毕业于莫尔豪斯学院，他的父亲是亚特兰大大学院长、两个黑人学院的前院长，他童年时代的启蒙教育由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亲自教授，他还旁听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课程。现在，这份需要呈交学院领导的宣言，草拟工作大部分由朱利安·邦德负责。

2月26日，周五，劳森研讨会的学生们已经在纳什维尔完成了第二周的每日静坐活动，当天警察局局长宣布他们的宽限期到了。他警告说市中心的商家要求如果学生们继续示威，那么他们就进行侵权诉讼或申请以扰乱治安行为的罪名逮捕示威者。这些是学生们需要做好准备应对的挑战。约翰·刘易斯连夜制定了非暴力的行为规范，引导学生克服被逮捕的恐惧。由神学院院长秘书将规范的内容敲在打字机蜡纸上，结尾加上刘易斯诚挚的告诫：“记住耶稣、甘地、梭罗和马丁·路德·金的教诲。”

第二天，当队伍默默行进到市中心，回到指定的店铺时，每个学生都拿着一张油印单。充满敌意的白人青少年叫嚣着“胆小鬼”和“黑鬼”。警察放任其中的一些白人用石头、拳头和点燃的烟头袭击劳森毫不反抗的队伍，随后他们逮捕了77名黑人和5名白人支持者，上百名白人围观者对此鼓掌表示欢迎。当警察对约翰·刘易斯说“你被捕了”的时候，这位一生都在致力于避免任何违法行为的人陷入了恐惧。他被搜身和戴上手铐，并被塞进囚车，此时的他试图屏蔽一切，除了他制定的那份行为规范。随后，囚车载着他和其他人驶向监狱，刘易斯已经不再恐惧，取而代之的是一阵从未体验过的兴奋。他相信，他们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就算以最严格的标准来看，正义也无疑站在他们这一边。一时间他们热情高涨，以至于刘易斯和几个其他的研讨会元老在周末约定将他们的甘地

见证活动升级。

2月29日，周一，是审判的日子，研讨会指定的发言人在法庭上站了起来，打断了对被告判决和罚款的声调平乏的宣布。戴安·纳什——芝加哥本地人，和刘易斯一样专注于民权运动但口才更好——告知法官几位被告人决定在监狱和罚金之间选择前者。她紧张地宣布：“如果我们缴纳罚金，那便助长和支持了逮捕被告人并判定其罪名的这种不公正和不道德的行为。”纳什、刘易斯和其他14人被带进了监狱，做到了一年半以前金本人在蒙哥马利没能成功做出的甘地式姿态。他们所树立的榜样的情感力量十分具有感染力，被告人同伴中有超过60位改变了主意，将准备好的罚金重新放回口袋，和他们一起走进监狱。一边是本地最好的一些学生，而另一边是攻击他们的白人暴徒。当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之时，他们的这座城市选择了将前者投入监狱，这使法院大楼之外的许多黑人震惊。一些人还因非暴力学生在遭到这种待遇的同时自己却独善其身而感到羞愧。詹姆斯·贝弗尔便是受此影响最深的人之一，他不再躲在浴室自言自语了，这次，他带领了新一波的示威，追寻着刘易斯的足迹一路来到了监狱，在那里，他受到了激动得手舞足蹈的刘易斯的欢迎。

静坐活动的壮观景象对于贝弗尔的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在觉醒的黑人群众中类似的转变快速蔓延开来，以至于市长本·韦斯特不得不出面调和。为了换取示威活动的暂歇，他提出释放被拘的学生，同时委任由黑人和白人组成的委员会，对市中心商店内的种族隔离问题提出解决建议。于是纳什、刘易斯、贝弗尔和其他学生像英雄一样从监狱里凯旋，他们成功地迫使一个南方城市同意了一项成熟的民权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被否定的要求。当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紧接着便传来范德堡大学的受信托人在不开听证会或经学院批准的前提下，即刻将詹姆斯·劳森从神学院开除的消息。这条消息占据了《纽约时报》的头条，随后全国的报刊都开始报道范德堡大学和全体教员之间激烈的冲突。大约400名范德堡教师选择辞职以示抗议，并最终使劳森复职。与此同时，勇敢无畏

的戴安·纳什带领一批抗议者来到位于灰狗巴士总站的午餐中心，这里不受和市长签订的《停战条约》的限制。让整个城市吃惊的是这里的管理人员平安无事地满足了学生们的午餐要求。正当范德堡的受信托人对劳森打击报复的同时，种族隔离藩篱却在灰狗巴士被打破。早期静坐活动的模式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不断的惊奇、彻夜的会议、连续的胜利和挫折，同时，黑白两个种族中的老一辈不时受到年青一代的挑战。

2月25日，一场计划会议在蒙哥马利阿伯纳斯的家中举行。会议结束后，35名亚拉巴马州立大学的学生走进州议会大厦的地下室，他们到自助餐厅要求用餐，但遭到了拒绝，随后他们又走了出去。这场表面上波澜不兴的事件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它让人们看到了蒙哥马利和纳什维尔之间的区别——以亚拉巴马州的标准来看，大都市纳什维尔具有邻近边境州的灵活机动性。几乎在学生离开州议会大厦的同时，州长帕特森就召见亚拉巴马州立大学主席H. 康瑟尔·特伦霍姆，这位黑人团体中的显贵在许多年前曾因为“访问了半年”教堂而被弗农·约翰斯羞辱。州长开门见山，命令特伦霍姆辨认出所有要求在白人餐厅用餐的黑人学生并将他们开除。帕特森并不担心他会像范德堡大学的劳森事件那样触动全国对于学院自由的敏感神经。事实上，他还叫来记者报道宣传他的指令，以强调其强硬路线。“亚拉巴马州的公民们不愿意把纳税人的钱花在教育违法者和种族鼓动者上，”他回忆和特伦霍姆的对话时说道，“如果你坐视不理，那么你们学校休想从政府拨款中拿到一分钱。”管理亚拉巴马州五十多年的特伦霍姆只回应了记者一句话：“除了顺从我别无选择。”第二天，怒火难平的学生领袖们对于州长公开羞辱他们主席表示抗议，强调他们只不过是要求在公共建筑内用餐罢了。从伯明翰赶来的弗雷德·夏特沃斯宣称帕特森对特伦霍姆的恐吓“本质上反应了极权主义”。

在那个周五的夜晚，大约4000名黑人，包括亚拉巴马州大部分学生聚集在哈金森大街浸信会教堂——这是抵制运动以来人数最多的集会。学生领袖伯纳

德·李发现和自己同台的有夏特沃斯、阿伯纳斯，以及刚从亚特兰大回到蒙哥马利接受伪证指控的马丁·路德·金。李得到的群众掌声，其热烈程度不亚于3位亚拉巴马最著名黑人所得到的掌声。李陶醉于群众的崇拜之情中，飘飘然于自身地位的提高——一周之前，他还只是一个社区大学的学生、有着3个孩子的已婚父亲，以及蒙大拿州战略空军指挥基地的老兵。他常说，他在基地看守的核武器威力巨大，在核弹面前，“二战”只能算是“小小的烧烤”罢了。李的外号是“果冻”，因为他就是爱果冻。李的这些举动以及在社会上的历练，促使他在过去的两年间成为校园餐厅抗议活动的领袖。而李所获得的这些经验，又在两天前把他推到了州议会大厦抗议活动的第一战线。如今，发起签名反对帕特森州长的正是李，他的大名也得到了同学们一致的赞扬。在集会上，大家对李的发言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他因此而被推上了新一轮运动的舞台。金笑着对李说：“小子，这里的人真的爱你，不是吗？”

当晚，参与抗议的3位牧师在阿伯纳斯家举办了私人宴会，他们邀请了李，并向他介绍了牧师参加政治活动时的习惯——这次的启蒙教育同样让李难以忘怀。舞台之下的讨论热火朝天，话题从《圣经》到讲坛笑话，再到高深的非暴力策略，不仅如此，让李惊讶的还有3位牧师在谈话间消灭了一大堆炸鸡。李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他第一次意识到可能会成为一名牧师。他把将近4年的会计学位学习、以前的规划以及对妻子和家人的牵挂都无情地抛之脑后，开始向着他的未来目标——成为金的随从或者影子进发，这种身份认定非常的全面，以至于李可以夸耀自己的情绪和冲动，甚至健康周期，都完全和金步调一致。

在纳什维尔第一次大规模逮捕抗议学生的当天，蒙哥马利各方情绪高涨，全市到处流传着学生要在市区午餐柜台静坐的消息。传言引起了几个愤怒的白人巡查队的注意——他们都配备了棒球棍。蒙哥马利还没有开始静坐行动，但在白人义务治安员和普通黑人顾客之间，偶尔也会闪出暴力的火花。周六，一个白人男性和黑人妇女在人行道上扭打了起来，他的一个同伴趁其不备重击对手。于是，

周日的《广告报》就刊登了事件的照片，并配上了文字说明，这样一来，冲突的性质或涉事人员的姓名就变得确凿无疑。在场的白人摄影师和记者都表示，站在旁边的警察对此置若罔闻，敲打在黑人妇女头上的球棒断裂声隔着半个街区都能听到。州长帕特森宣布事件的调查工作将交给地方官员。L. B. 沙利文——在公交车抵制运动后接替克莱德·塞勒斯成为治安专员——指责黑人学生是事件的肇事者，他还指责《广告报》不该刊登相关照片。编辑格罗弗·霍尔把两拨儿人分为“莽撞、被误导的年轻黑人”和“白人暴徒”，指出更该受谴责的一方，他在为自己报纸辩护的同时，还击了治安官的指责。“沙利文的问题并不在于一个架着相机的摄影师，”他写道，“沙利文的问题在于那个挥舞着棒球棍的白人。”

在袭击发生后的周一，金在蒙哥马利法院大楼表示接受所得税指控并认罪。在完成讯问笔录、按压指纹并缴纳了4000美元保证金之后，他被释放。随后，他穿过繁华的购物区步行了6个街区，途中经过黑人妇女周六遭遇袭击的地点。他告诉跟着他的小部分黑人说，他要立即向世人表明重新致力于非暴力的决心，是要展示他的黑人绝不能被自己吓倒的信念。之后，金回到阿伯纳斯家参加热烈的战略会议。学生们希望举行静坐活动，以效仿南部其他地区的同龄人。但大多数蒙哥马利的成年黑人担心的是在亚拉巴马州的生存。特伦霍姆院长在州政府的支持和学生的尊敬之间举步维艰，巨大的压力使他几近崩溃。最后，学生们做出了让步，同意将静坐改为在州议会大楼前的台阶上举行祈祷仪式。

第二天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团体走上市区的街头。伯纳德·李做了简短的发言。一位女学生演唱的高音版《上帝的祈祷》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声乐老师也是金的老朋友罗伯特·威廉姆斯，这位老师承诺绝对会让她通过本学期的乐理课考试。所有的学生齐唱《星条旗永不落》并步行返回学校。第二天，尽管特伦霍姆院长痛苦地哀求，希望对涉事学生仅仅给予留校察看的处罚，但亚拉巴马州大学董事会仍然开除了伯纳德·李以及其他8名“元凶”。从街头进军到开除学籍，学生们面临的挑战在加速升级。

金回到亚特兰大准备接受审判，但来自纳什维尔、蒙哥马利和整个南方新爆发地区的快讯像炸弹一样向他袭来。蒙哥马利举行祈祷仪式的同一天，在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堡县，400多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克拉福林学院的学生在市区游行，到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午餐柜台静坐。提前预警的警察和特殊状况行动小组通过集中部署兵力，发射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的方法拦截学生示威者，最后，有388名学生遭到逮捕。当浑身湿透、几乎窒息的学生们被赶进一个封闭的公园，在被警察的凶狠手段惊呆的同时，他们对自己的沉着冷静也感到惊讶。查尔斯·麦克杜是奥兰治堡游行示威的领导者，他在混战中被警方押上警车后看到的场面：一位女生因为被高压水枪击倒而伤了腿，体格庞大的当地足球明星大卫·迪肯·琼斯把她搀扶起来；琼斯脸上并没有愤怒，而是一种平静的悲伤。这一幕时常在麦克杜的眼前浮现，尽管他并没有把它用于非暴力，或者，甚至在基督教的演讲，但他坚信，在顺从和人性的教义中，潜藏着一种无法回避的力量。

奥兰治堡是3月份第一个举行游行示威的城市，接下来又有40多座城市爆发学生示威活动，此时，静坐运动已蔓延至佐治亚州、西弗吉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阿肯色州。在蒙哥马利，亚拉巴马州立大学的学生在群众大会上发誓，威胁说如果让此前被开除的9名同学复学，他们将不会在春季注册入学。于是，在州政府持续的重压下，学校行政部门决定禁止未注册的学生去餐厅就餐。对此，阿伯纳斯承诺将领导一个从城市各个黑人教堂出发的祈祷行军，以此表示对学生的支持。而另一边，警长沙利文则公开警告“如果这些黑人坚持州议会大厦前炫耀嚣张气焰，通过集会蔑视政府”，那么警察将展开报复行动。当阿伯纳斯带领军队走出德克斯特教堂，正试图向不远处的议会大楼进发的时候，他发现警察、消防车和大群从外县召集的警戒暴徒挡住了去路。他只好折了回去。第二天，同学们想通过举着标语牌在校区里行进的方式重拾计划。因为夹在老板和公交车抵制运动的记忆之间，学校管理员惨遭煎熬，他们试图通过把学生赶出校区来保护学校。几乎在学生被赶出校园的同时，大批警察到达现场，他们要防止学

生在市里游行示威。当增援警力带着催泪瓦斯滤毒罐、卡宾枪，甚至还有两支冲锋枪到达现场的时候，被困在校园一侧边界大街上的学生们漫无目的地乱转着。最终，在第一次蒙哥马利逮捕行动中，警察拖走了 35 名学生。在事发之后，人们在争辩谁的行为最为不妥的过程中出现了对立，一位女教授对此感到焦虑，她训斥了一些受挫的女学生。在事件中，她对其中的 5 名被赶进巡逻车后座的女生说：“你们不要挤在一起，让他们再调一辆车来。”结果，警察立刻把她抓了起来，罪名是干扰执法。

由于白人当局全部出动，蒙哥马利学生运动一度遭到打压，阿伯纳斯发现自己已经被城市黑人领导层孤立。尽管他竭尽全力想要召集这些领导人，但就连自己 MIA 理事会都拒绝批准任何支持学生的声明或群众性集会。不同于公交车抵制运动，学生静坐运动遭到了公然的暴力镇压，并对亚拉巴马州黑人社区经济中心造成极大的危害。压力之下，每个人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夏特沃斯私下批评阿伯纳斯，说他接替金执掌 MIA 才 5 个星期，就已经无法控制理事会。阿伯纳斯厉声呵斥道：“弗雷德，听好了，我可不是独裁者！”他还指出，夏特沃斯自己也没能在伯明翰的静坐运动中为学生争取到更多成年人的支持。

和静坐运动的广泛性一样，南方各个城市打压静坐运动时的气氛和方式也差异广泛。示威突出显示了黑人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分歧。一边是学生抗议活动的迫切性，一边是最具影响力的黑人固执地踌躇不前，处于夹缝中的黑人领袖并不止阿伯纳斯一个。对于仍然在四处奔波的金来说，承担着内部分裂双方不断施加的压力。但是，即将在亚拉巴马面临的刑事审判加重了他肩上的负担，为此，他急需那些准确来说很少由学生持有，更多由保守的上一代人所把持的商品：金钱、律师和会计。

金打算用他自己发明的办法，同时在两个方向上解决问题。3 月 5 日他将艾拉·贝克在 SCLC 的职位交给怀亚特·泰·沃克担任。这一做法表明他不会再等待阿伯纳斯了。他需要协调理事会牧师的意见，其中有许多人从来都只把贝克当

作文书管理员，但他坚持要求出任这个职位的人，必须持有贝克的活动家观点，同时要和金是同代人。沃克是一个性格鲁莽的人。他高中时写了一篇长达5页的论文，内容关于在美国实行苏维埃经济模式的计划。他还梦想对主要种族隔离主义领袖执行天衣无缝的暗杀技术。进入大学以后，他购买了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这让他看上去像沉思中的托洛茨基。然而，他的野心并不仅于此，他还想成为最富有的实业家、最优秀的画家和最激进的革命者。不论做什么，他都习惯和同伴吹嘘，他说可以在过程中搞到100万美元。

沃克的大学指导老师把他带上了布道讲坛，天赋又把他带进了弗吉尼亚州匹兹堡市（Petersburg）历史悠久的吉尔菲尔德浸信会（Gillfield Baptist Church）。就像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一样，组建于1797年的吉尔菲尔德是黑人贵族的区域中心。在沃克到来的1952年之前，吉尔菲尔德的会众按照肤色彼此隔开，浅肤色的黑人坐在一边，深肤色的坐在另一边。就在沃克想在布道中宣讲反对阶级鸿沟的内容时，弗农·约翰斯恰好失意潦倒地从蒙哥马利流浪到匹兹堡，于是沃克向这位著名的牧师讨教。沃克十分崇拜约翰斯，他模仿约翰斯的布道风格、向他借阅书籍，甚至为他的一间农场合作社卖鸡蛋。一天沃克正开着车送约翰斯去参加合作社会议，行至半途，车上的收音机突然传出布朗案的判决新闻，于是，这两位牧师停车走到弗吉尼亚州460号公路的路肩，他们跪了下来做了感谢的祷告。

6年后，通过自愿坐牢，沃克证明了自己对静坐运动的狂热，而此时，金给他的工作邀请还没到达匹兹堡。他藐视监督者的作用，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几位牧师和若干学生去了全白人的匹兹堡公共图书馆。传媒意识刚刚在他心中萌芽，诱使他人生中第一次戴上了牧师的硬领。因为对弗农·约翰斯的炽烈崇拜，他做出违反种族隔离法令的古怪举动来：在聚集的警察和记者面前，沃克要图书管理员为他找出道格拉斯·索撒尔·弗里曼所写的罗伯特·爱德华·李·约翰斯传记的第一册。沃克之所以这么做，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弗农欣赏李身上

的一些品质，但鄙视李的理想；另一方面，弗农在讨论内战话题时，常常引用弗里曼书中的内容。于是，沃克忍不住地想，他想要在白人图书馆借阅关于李——南方白人最珍爱的英雄的图书，他们是否会来逮捕他？果不其然，匹兹堡警察局局长礼貌地走上前表示，他可以帮助沃克和在图书馆内的其他人把保释金捎带回去，这样他们就免去了牢狱之灾，但沃克要求对他和其他普通囚犯一视同仁。于是，所有人在牢里待了3天才最终接受保释。

由于薪资和讲坛安排的复杂原因，沃克对 SCLC 的邀请迟迟没有答复，以至于拖延了好几个月，但他的被捕入狱只会使金聘请他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他向沃克和他的同伴们发了一封电报以示支持。不久之后，他又给在伯明翰刚刚被捕的弗雷德·夏特沃斯发了一封电报，并且，他欢迎学生们在3月中旬不断升级的“进监狱”运动中借用他的名字。因为领导1000名学生的游行活动，帕特·史蒂芬斯被捕入狱，她在塔拉哈西市监狱的囚笼里发表声明：“我们可以选择出狱上诉，但我们坚信马丁·路德·金是对的，他说：‘为了赢得平等的权利，我们必须填满监狱。’”史蒂芬斯和其他4名学生是第一批将刑期服满的抗议者，总计60天。金称赞他们说：“没有什么比愿意为了正义事业而承受苦难更加宏伟壮丽。”

只有在亚特兰大金才会绝口不提对于静坐运动的称赞。3月9日，由亚特兰大学生汇编发行了《为人权上诉》，也是在这一天，他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电报，抗议蒙哥马利的“恐怖统治”，但只字未提学生的那份刊物。6天后，当学生们不顾学校领导的忠告发起静坐示威时，他也没有予以评论。学生、警察甚至是目瞪口呆的旁观者都近乎一致地保持克制。斯佩尔曼学院的女生们穿长袜、戴手套、骑着车去警局做笔录。几乎所有被逮捕的77名学生在警察记录本上仅仅登记了所在学院的名字。

在黑人和白人权利机构呼吁理性和协商的综合影响下，亚特兰大抗议活动仅仅持续了一天就被打压了。一些学生领袖尖刻地抱怨他们上一辈人的自负和蓄意阻挠。《亚特兰大世界日报》的编辑C. A. 斯科特要求学生支付刊登其宣言的所

有广告费用，对于这个行为，学生们说，无论是出于贪婪，还是出于欲望——保护自己免受白人的援助抗议活动的指控。学生们痛恨斯科特那篇居高临下的社论——斯科特在文中赞扬学生有一个值得争取的目标，但又不断地敦促他们停止制造麻烦，把问题留给更加沉稳的大人去解决。

纠纷闹到了金这里。C. A. 斯科特不仅是老金的老朋友，还是埃比尼泽的受托人，因此严格意义上说他也是金的老板。此外，作为南部唯一一份黑人日报的编辑和运营伙伴，斯科特还帮助调节金展示给其主要委托人的个人形象。金从小就被教育要透过斯科特这样权势人物的眼睛看世界，而另一方面，他自己又实事求是地意识到自己对这些人物的依赖。埃比尼泽的另一个支柱杰西·布莱顿就金所处的困境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暗示。过去几年间，作为国民银行总裁的布莱顿还同时建立了平行于自己银行职业的会计事务所，金的父亲便是该公司的受托人。自从金在亚拉巴马遭到指控，布莱顿就一直在仔细检查他的财务记录，希望能帮他准备一份可抗辩的账单。让金不安的是，布莱顿对待他的方式，或多或少和斯科特对待学生刊登宣言时的方式相同，也就是一种商业交易的方式。布莱顿一开始就不假思索地向金收取了 1000 美金，理由是“他为了决定工作文件的程序模式，花了两周时间研究案件资料”，在查账快结束时，他为审计两个税单收取的费用比金在埃比尼泽干一年挣得还多。

就连律师们都认为布莱顿是趁火打劫——既然是金家的老朋友，这种贪婪就不该出现。然而，律师们的感情对金并没有什么安慰效果，特别是鉴于他本来就与律师存在财务上的麻烦。金的律师团队共有 5 名成员，牵头的是威尔金斯推荐的 NAACP 会员——来自芝加哥的威廉·明和纽约的休伯特·T. 德兰尼法官分别是享有很高声誉的法庭律师和诉讼专家。来自伯明翰的亚瑟·D. 肖尔斯是金的 3 位亚拉巴马律师中较年长的一位，在 1956 年 NAACP 遭遇禁止令以前，他曾是 NAACP 在亚拉巴马州的主要律师，目前禁止令仍然有效。弗雷德·格雷和小 S.S. 西伊是较年轻的律师，他们要负责大部分准备性工作。虽然从法律或政治的

角度上看，辩护联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员，但他们所组成的团队不是十分灵活。几个律师彼此并不认识。他们分别来自3个州的4个不同的城市中，分属5个事务所。他们重复彼此的调查工作，对各自的责任划分进行争论，同时金还得支付他们律师费。更糟的是，他们还会因为收费问题发生口角，北方的律师抱怨南方律师的收费超出了自己的资历所值，而南方律师则抱怨北方律师虽然能力极强，但不愿透露自己的价格，连合伙律师都不行。他们难得达成一致的地方在于律师们普遍认为在亚拉巴马陪审团面前，金几乎不可能赢得税务诉讼。律师们的判断使布莱顿的清账从本质上变得毫不相关，也让他高得离谱的收费变得更加让人难受。律师们试图通过制造法律问题诱使上诉法庭推翻依据税法判定的伪证罪。

金发现自己在向任何可以给他希望的专家寻求鼓励，不论希望有多牵强或专家有多昂贵。他顺从的天性在形势严峻的案情面前被发挥到极致，直到他意识到一味地向专家寻求帮助只会孤立那些可能会帮助他的人，这将造成无法承担的后果。他发现虽然他所支付的费用比他预想的要高，但却比最有声誉的律师为最大的案件提供辩护时应收取的费用低。因此，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情感，它混杂交织着伤害和感激、无助和信任。他没有斯坦利·利维森直言不讳的个人自信——利维森当着各位律师的面指出，他们应该为自己关注律师费重于金的反迫害辩护而羞愧。在全心全意帮助金的专业人士中，最坚定和无私的是利维森，他默默地坚持游说，通过自己的榜样力量保护金免遭怨恨。这些品质使利维森得到了金的爱戴，不过金太过害羞，不敢直接提出要求，也不好意思将自己的利益和民权运动的利益画上等号。关于个人和政治债务的区分，金和利维森以及哈里·贝拉方特等人进行过长时间的哲学讨论，他感到吃惊的是，自己和他们刚好相反。金坚持认为他不能允许一分钱的“运动资金”用在自己的私人开支上，为此，他试图制定无懈可击的指导方针。他强调，交通罚单很显然是个人债务。那么所得税指控书呢？有哪些条件使它成为政治债务呢？他如何才能证明将运动资金用于为自

已辩护的合理性呢？贝拉方特和利维森对这些诡辩失去了耐心，他们说，仅凭州长帕特森的声明，这次的税务指控就毫无疑问地被划分为政治范畴了。

在纽约，贝亚德·拉斯廷是马丁·路德·金辩护委员会和“南方为自由而战”组织的执行董事，这两个组织已于3月底前在纽约筹集了足够的资金，用以在《纽约时报》购买一个整版的广告页面。筹措资金的呼吁启事由拉斯廷和哈里·贝拉方特共同起草。广告以“倾听他们渐高的呼声”为题，简要介绍了官方对静坐运动的反应以及对金提起公诉和加以威胁的经过。其中写道：“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学生们在州议会大楼门前的台阶上高唱《我的祖国是你的》这首歌以后，他们的领袖就被学校开除，好几卡车的警察就手持霰弹猎枪和催泪瓦斯，环绕了亚拉巴马州立大学的校园……”广告继续写道，针对金的伪证指控是南方政府采取的策略的一部分，是“要对这场具有积极意义的运动实施斩首行动，从而打击非洲裔美国人的士气，削弱他们奋斗的意志”。

3月29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这则呼吁启事，随后，捐款向金的辩护委员会涌来，捐款总额是广告费用的好几倍。一周后，亚拉巴马州总检察长宣布，州长帕特森命令他研究起诉《纽约时报》和广告刊登者的可能性，罪名是诽谤亚拉巴马州政府的官方代表。4月8日，蒙哥马利治安专员沙利文写了4封一模一样的信，收信人分别是广告赞助者名单上的4位亚拉巴马牧师——阿伯纳斯、夏特沃斯、莫堡的约瑟夫·洛厄里和S.S.西伊，信中要求他们“充分和公正地撤回完全虚假和诽谤性的广告”。收到通知的4位牧师，在吃惊之余还感到不寒而栗，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份广告的存在，更别提他们的名字是如何被人使用的。

一时间，表达恐惧和不在场证明的电话接踵而来。4位牧师痛苦地向金抱怨，他们并没有允许使用他们的名字。他们还担忧地指出广告文本存在技术错误：蒙哥马利的学生们所演唱的不是《我的祖国是你的》而是《星条旗永不落》，警察也从未“环绕”亚拉巴马州立大学的校园，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像是包围校园，相反，警察只是在校园的一侧边界集结。压力很快被转嫁给了拉斯廷，他只是简单

地回复金，说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都肯定够不上中伤的标准。此外，拉斯廷还说，这4个抱怨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牧师，本身是SCLC理事会成员，在没有威胁信的情况下，如果不列上他们的名字，他们反而会抱怨得更大声。在双方彼此咆哮和争吵的初始阶段，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不太可能成为最高法院受理的有着重要意义的案件。对于金来说，纠纷最让他沮丧的是，只要他呼吁求助，似乎总会陷入更深的困境，让求助变得更加困难，这已经成了一种定式。

在汉兰达民间学校，自从去年夏天以来，迈尔斯·霍顿一直在为自己打一场令人绝望的法律战。当时，田纳西州的一名原告带领一路人马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赛提玛·克拉克的一个研讨会。警官们带走了20名囚犯和一卡车证物，包括一个装满冰块的洗衣盆、软饮料、啤酒以及一罐硬币。由于缺少证据和碍于《宪法》，颠覆的罪名不成立，原告Ab.斯隆利用洗衣盆和硬币罐设计了一个法律圈套。对于学校里的人来说，这些证物仅仅用于吸引访客凑钱买饮料，但对于田纳西州政府来说，这些证物是该校无证销售酒精饮料的关键证据。因此，斯隆认为应该取缔汉兰达这个非营利组织，此外，由于霍顿并没有拟定股东章程，因此，根据田纳西州的法律，一旦执照失效高地被取缔，汉兰达学校的一切资产，包括土地、建筑甚至图书馆，都将被州政府没收。这是很值得诺丁汉警长运作的充公计划。在法庭上，斯隆把汉兰达学校形容为一所“综合性的妓院”，要在两年内废弃学校的设施。在一桩同时执行的案件中，他依据禁止私人酿酒的法律，成功使滴酒不沾的克拉克被判定犯有刑事罪。

由于提起了上诉，这些悲观的判决被短暂推迟。克拉克召集参与静坐运动的学生并主持了第一次区域会议。大约400名来自19个州的学生在汉兰达度过了4月的第一个周末，他们在这里互留电话、彼此探讨哲学、交换自己最信奉的示威注意事项。由詹姆斯·贝弗尔带领的四重唱小组演唱了《最好把隔离丢开》(You Better Leave Segregation Alone)和其他的“嘟·喔普”风格的原创和

声歌曲，这些曲目点燃了观众的热情。学生们热情洋溢，他们毫不掩饰对新朋友和汉兰达学校的惊讶。居意·卡拉旺是汉兰达的住校民歌手，他教给大家一些学校保留节目性质的老歌，这些歌曲都是从19世纪30年代劳工运动歌曲演变而来：《我们不会动摇》（We Shall Not Be Moved）、《紧盯战利品》（Keep Your Eyes on the Prize）、《这是我的一点光》（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我将在前台坐下》（I' m Gonna Sit at the Welcome Table）和《困难终将克服》（We Shall Overcome）。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全新的体验，参加会议的学生们探索精神高涨，以至于会议结束不到两周的时间里，许多学生又到北卡罗来纳州参加由艾拉·贝克组织的第二次会议。尽管SCLC的资金因为金即将到来的刑事审判而几近枯竭，艾拉·贝克还是说服金为会议提供800美元的资金保证。贝克和格伦·斯迈利、道格拉斯·穆尔在自己的母校——位于罗利市的萧尔大学——为会议做准备工作。3人同意詹姆斯·劳森以“学院院长”的身份参与会议，而穆尔则是院长助理。

4月15日，来自9个州的大约150名学生涌入了北卡罗来纳州，而就在10周前，这里还爆发了第一次静坐运动。这些学生中很少有人听说过劳森的名字，但他当晚发表的主题演讲立刻为自己吸引来了众多拥护者。他的演讲跟金相似，透露出理想主义和渊博的学识。“爱是非暴力运动的核心，”他宣称，“爱是连接上帝与凡人的力量，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量。这种爱是一种极致，它既使有敌意仍然充满爱和宽恕。爱能容纳邪恶造成的痛苦，同时它拥有更持久的吸收邪恶的能力，并由始至终坚持爱。”然而，在演讲中劳森又将上述气势磅礴的发言和尖锐的现实主义相平衡。“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有当上了祖父母才能体验到普通的人生。”他说。他把令人难堪的批评直接对准了NAACP，批评其“太过保守”，指责杜波依斯主办的NAACP刊物《危机》不过是“黑人资产阶级的杂志”。劳森谴责NAACP将过多的精力用在筹集资金和打官司。劳森坚持认为，把有着政治本质的任务堆积给法庭，是不公正和不明智地将法庭暴露于不名誉的

策略。他抨击 NAACP 摇尾乞怜，没能建立他称之为：“我们最伟大的资源：一个不再受到种族歧视迫害的民族，他们有条不紊地践行着《宪法》。”

劳森是一位强硬派成员，他比金更为直接地打破了批评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禁忌，而金则满足于夸赞学生们“从仅适用于渐进式的长期变革的策略中跳了出来”。像劳森一样，金的演讲一个不落地吸引了所有学生，他仍然是这次会议上的名人，但相比之下，劳森的坦诚有着揭开秘密的吸引力。许多学生把劳森当成自己的私人发现。总的来说，两位领袖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非暴力激进主义热情。是会议决定性的、生气勃勃的热情，让学生们欣然接受了“非暴力”，并将这个词汇加进他们为自己组织所取的名字中：非暴力学生协调委员会 SNCC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他们是第一个这么做的民权组织。

这种宗教热情伴随着喧闹的学生政治，一场激烈的角逐发生在一位亚特兰大莫尔豪斯学院的校友和一位弗吉尼亚州怀亚特·泰·沃克的门徒之间，但最后是马里昂·巴里获得了新组织的总裁职位。巴里是劳森在纳什维尔代表团中最有政治技巧的人。那年夏天 SNCC (发音同“snick”) 计划派代表参加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代表大会，因此，进一步的战争又将爆发。艾拉·贝克和金就学生代表团的组成，以及他们如何前往洛杉矶参加民主党会议发生了短暂争论。实际上，贝克和金之间紧张关系的温和暗流，是萧尔大学的八卦主题。一些学生震惊的是，一个妇女居然敢和金这样地位的男人产生矛盾。贝克的性格本身就反映了一种文化。两年多来，贝克受够了 SCLC 高高在上的牧师的冷漠和纡尊降贵，现在她接受了静坐运动与被害人获救的特殊热情，准备再一次离开 SCLC 转身投入这场运动中去。她开始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学生事业，鼓励他们变得独立、提醒他们注意礼节，教育他们应对长辈的缺点。

几年以后，一个 SNCC 的历史将记载贝克“粉碎了”金试图在萧尔会议上主导学生的计划。这种夸张的看法严重地夸大了当时的派系分裂。学生提交给两大主流政党政纲委员会的证词，撰写人是贝克而不是金，也是贝克试图缓和劳森对

NAACP 的批评。“这里并没有冲突。”她告诉记者，NAACP、SCLC、SNCC 只是因为“强调的重点不同”而有所区分。在领导理论方面，贝克更接近金而不是詹姆斯·劳森的观点。劳森强烈反对运动中任何形式的身份地位区别，甚至是选举，他是一位极端的地方自治主义者，他认为领导等级制度会招致不满，其本质和他们一直在反抗着的种族等级制度无异。在他的影响下，纳什维尔学生运动被结构化，发言人的岗位采用轮替的方法，任何有意愿的学生都能担任。

弥漫在萧尔大学内的精神力量与其说是加剧领导间的分歧，不如说是消融了这些分歧。就在金准备离开罗利前往华盛顿参加《与媒体见面》电视节目的录制，并将在镜头前为静坐运动辩护之前，劳森和道格拉斯·穆尔把他叫到萧尔大学体育馆的露天看台上进行单独谈话。劳森压低声音向金宣布，如果金还把几年前聘请他们的事当真的话，那么他和穆尔就舍弃一切成为 SCLC 的全职员工。

金激动地回答道：“哦，是的！”他惊叹道：“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好的消息了！”很显然，他意识到这两位朋友的决定意味着何等巨大的牺牲。他们不仅要离开自己的布道坛，还愿意为他们的同龄人金工作，而金成为非暴力主义者的时间远比他们要晚。

劳森知道，就接替艾拉·贝克的职位一事，怀亚特·沃克将和金进行磋商。当他问起这件事时，金回答说它并不会影响到劳森。金还说，劳森和穆尔的重要任务是，要在南方向所有新加入的学生宣传非暴力。他表示将想办法募集资金。劳森和穆尔将去往新的城市，培训非暴力队伍以及举行示威活动。金可以负责召集支持的力量。也许他们3个可以一次再攻陷两个城市。在穆尔开始因 SCLC 理事会而取笑金之前，他们3个就已经不再抱有多少幻想了。那些浸信会教友真的愿意将两个惹是生非的循道宗信徒的名字加入工资名单中去吗？穆尔讽刺道，尽管浸信会教友懂得君主政体，但只有冷静的循道宗信徒才能建立完整的体系，这是众所周知的。信心满满的金很快便向他们保证，会在两周时间内将一切安排妥当。

回到亚特兰大，金的5位律师私下全都悲观地预测，金在未来10年躲避牢狱之灾的可能性并不乐观。因为他们还未就辩护策略达成一致。更糟糕的是，尽管他们对彼此和案子渐渐熟悉，但5个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拿出最有利的辩护论据。他们目前处于困境当中。NAACP的律师过去几年在民权案件中接触的都是《宪法》议题，他们的经验并不适用于涉及税法的刑事案件。对于这件案子的事实——金的收入是否超过他在纳税申报表上所填数额——律师们估计陪审团会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他们还一致认为，金通过上诉法庭驳回陪审团裁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便是律师们脑海中的凄凉景象。

威廉·明是芝加哥一位著名的庭审律师，他为辩护团队承担了一个微妙的使命。律师们急切地想要知道情况有多糟糕，金到底有多少未申报的实际收入，但布莱顿令他们绝望——这个人似乎只要泡在支票存根和银行对账单里就很快乐了。明私底下将一位名叫昌西·艾斯克里奇的年轻律师介绍给金，这是他从律师所一手培养出来的律师。明介绍说艾斯克里奇是一位接受过会计训练的税务专家，并让金帮忙劝说布莱顿接受艾斯克里奇的帮助。明需要动用在法庭上用过的一切手段促使客户接受他的要求。他不仅要求金承担第二位会计的费用，还要求金撇开父亲的朋友和恩人杰西·布莱顿——这是个很敏感的人，一定很反感外人的插足。律师们已经开始烦恼不安，担心证人席上布莱顿因为愤恨难平而造成危害，因此，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敏感度让明的要求更加急迫：他向金施加压力，要其自证清白。但对于每年经手的成千上万的资金，即使在和律师私密协商的时候，金也仍然坚持声称自己从未挪用过一分钱。不过他曾对新闻记者坦白：“税表上有可能存在一点无意之失。”

在金声明自己无罪时，艾斯克里奇听到律师中有人笑出声来。随后，他和他的这位新客户单独留在埃比尼泽的书房里。当他询问金如何填写税表时，金不大好意思地说，他几乎完全依赖日记。在艾斯克里奇的追问之下，金解释说，他总是将自己的日常收入和支出写进袖珍日记本中，里面也包含他的行程安排，但

布莱顿曾说过，他对日记不感兴趣，并且说日记不能充当财务记录。听到这里艾斯克里奇立刻振作了起来。他表示，作为税务证明，日记是可以被接受的——尽管很少有被告会主动呈交，因为这往往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但对金来说，这是个好消息。艾斯克里奇询问日记在哪里，金回答他也不知道，但柯瑞塔也许知道。于是他往家里打了个电话，柯瑞塔说日记应该被遗忘在一个老行李箱里。随后，在艾斯克里奇的要求下，他请求柯瑞塔立刻找出日记并送到教堂。

很快，艾斯克里奇就读到了那本小册子。毫无疑问，每一页上都有金的手写注解，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旅行开支、捐款和演讲费用。对于收到的每一张支票上的数额，金计划分给 SCLC 或 MIA 或德克斯特教堂的数额，以及自己用多少（如果有的话）都有记录。让艾斯克里奇感觉神奇的是：一个银行记录混乱不堪的人，却有一本精确记录的日记。金解释说，写日记是父亲从他童年时代就开始训练的习惯，父亲教育他保持节俭的第一条准则是制定精确到分的预算。金爽快地允许艾斯克里奇研究自己的日记，当 5 位主要律师和金聚在一起召开马拉松式协商会议时，这位年轻的税务律师回到酒店面对日记、计算器和试算表，度过了不眠不休的一天。

金的协商会让人筋疲力尽，但又经常被一系列来自纳什维尔和蒙哥马利的新闻快讯所打断。第一条消息是纳什维尔检察官亚历山大·卢比家被炸弹夷为平地，两栋毗邻的房屋受到损坏，同时震坏了附近玛雅医学院的 147 扇窗户。正在房屋后间睡觉的卢比和妻子幸免于难，伤情并不严重。纳什维尔警长称此次袭击为谋杀，他说：“扔这么多的炸弹肯定不仅仅是为了吓唬人。”邪恶的爆炸袭击让纳什维尔感受到了阵痛，但也更强地团结了纳什维尔人。事发当日清晨，3000 多人（包括许多白人）在市区游行了 10 英里。

市长本·韦斯特在市政厅接见了庞大的示威人群。他发誓秉公执法，尽全力缉拿投弹者，他辩称自己没有权力命令店主们该怎么做，从而在静坐危机中维护自己的领导位置。“我们都是基督徒，”他最后说道，“让我们一起祈祷。”听到这

句话，一位学生尖叫道：“那我们能一起吃饭吗？”祈祷结束后，戴安·纳什挤过人群来到话筒前，她问市长是否愿意呼吁所有市民抵制种族歧视。“我呼吁所有市民结束歧视，放下偏见和摒弃憎恨。”韦斯特回答道。

“你的意思是也包括午餐柜台吗？”纳什紧接着追问道。她和市长面对面地站着，虚张声势的姿态让人群陷入沉默。

“小姑娘，”韦斯特回答道，他努力地让自己看上去和蔼可亲，“我7年前在机场任职的时候，就已经停止实行种族隔离了，从那以后大家一直相安无事。”

纳什不依不饶地问：“那么，请问市长，你会去建议取消午餐柜台的隔离吗？”

韦斯特是一位温和的白人政客，在一群情绪激动的人面前当众被讥讽，他只能用一个词回答这一关键性问题：“会。”顿时，人群一片欢呼。市长拼命拐弯抹角地提醒每个人：决定权在店家。但纳什对此毫不关心。她已经得到她要的答案。

就在那天下午，紧接着纳什维尔的新闻快讯，金获悉蒙哥马利治安专员L.B.沙利文以诽谤罪起诉《纽约时报》和4位来自亚拉巴马州的SCLC的牧师（他们的名字出现在由拉斯廷撰写的广告上），沙利文还要求赔偿50万美元。据称，州长帕特森、市长詹姆斯和前治安专员克莱德·塞勒斯都将以类似诉讼支持沙利文的起诉。这些案件都很离奇——《纽约时报》的广告中并未提及上述原告的名字，每一个所谓的诽谤，都是广告文本在叙述内容上微不足道的错误。尽管如此，这几个人还是对广告很愤怒，声称其中的影射内容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他们的诽谤指控主要基于拉斯廷的一个综合性描述：在广告中，他把采取行动镇压静坐运动的南方执法人员统称为“违宪者”。

从一开始，沙利文案就面临着美国法院系统微妙的政治困境，面临着把法官推向几乎是超现实的极端讽刺的种族敏感性。最终，为回避事实的种族内容，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创造了一个新的法律规范。他们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定义诽谤的法律概念：没有提及名字，基于允许新闻报道付费广告的标准——广告本身

不是出自记者之手，且经过编辑部。所有这些都源自一个为金的税务案件筹款的人，但金自己要面对更残酷、更直接的讽刺——正当他和本来就不怎么相信他的律师们会面，而且律师们甚至都不确定他们是否能收到律师费用的时候，又有消息传来，让金在税务案后再遭新诉讼的亚拉巴马州官员，现在正在提交惩罚性赔偿请求，这一次，他们所针对的是那些想要共同承担金的辩护费用的人。这场诽谤官司的作用立竿见影，使金筹措资金变得更加困难。随后，亚拉巴马州的白人当局正式向报社发出通知，任何愿意为金刊登有偿消息的报纸，都将面临亚拉巴马州政府的起诉。对于律师来说，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意味着：在他们为第一个官司制定好辩护策略之前，就要面临第二个烦人的、将拖上好几年的官司。此外，他们几乎不太可能在这两个官司中拿到律师费。

就像为生计用生命做赌注的人，凭着坚强不屈的男子汉气概，金和他的律师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还在睡前说了一两个关于当天灾难的笑话。第二天一早，疲倦但显得惊讶的昌西·艾斯克里奇把几个律师叫到沃勒瓦吉酒店。“弟兄们，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他拿着試算表宣布，“金博士没有挪用一分钱。”

听到这一条消息，明惊讶得屏住了呼吸，他无法相信某个刑事被告人可能的罪行，居然不如他已经向报纸承认的那么严重。艾斯克里奇解释道，他把金1956年日记上的所有数额都整理了一遍，计算出来的结果比他在纳税申报表上申报的数额多出微不足道的368美元，而这点出入也可能是因为计算误差。艾斯克里奇告诉他的同事，尽管要证明金的确按照日记上所记录的用途花钱，需要花费很多工夫，但就他个人来说，他完全相信金的日记上所说的都是实情。实际上，他坚信金会是他今后所遇见的最诚实的一个人。

目瞪口呆的律师被留在沃勒瓦吉重新评估辩护策略，而刚刚成为金的门徒的艾斯克里奇，带着振奋人心的消息火速赶到了埃比尼泽。金矜持地阅读艾斯克里奇的研究报告，当他最终完全清楚这份报告所带来的影响时，他才突然从书房冲出来，像是对待久未谋面的亲人一样，他一把抱住了艾斯克里奇。从那时起，来

自芝加哥的税务律师便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艾斯克里奇对金忠心耿耿，并因此渐渐疏远家庭，一心一意地投入民权运动当中。就在金被刺杀的那一刻，他就站在金倒下的孟菲斯市的那个阳台上。

到了正午，如释重负的金向艾斯克里奇请假离开，他要坐飞机赶去纳什维尔，在菲斯克大学的体育馆内的大型晚间集会发表演讲。当晚，人群中有一小部分是白人。演讲还没开始主办方就因炸弹威胁而中断了集会，警察疏散了体育馆里的人群，同时开展搜查行动。这样一来，就被耽误了好几个小时，任何常规的集会都将因此而取消。然而，自从发生了卢比爆炸案后，学生们的情绪极其高涨。为了让站在体育馆外的学生们能够听到里面的声音，主办方在外面架起了扩音器。当听见金称赞劳森所带领的队伍是“南部最有组织、纪律性最佳的”队伍时，人群中沸腾了起来。金宣称，他们的精神比任何恶意针对他们的投弹手和种族隔离法律都要强大。种族隔离终将完结，他说，尽管他还不能确切地说出是什么时候。（结果，仅仅 20 天之后，纳什维尔运动便打破了市区的六大主要午餐柜台的种族隔离。）“谎言不能永存，”他表示，“我们不绝望。宇宙与我们同在。孩子们，一起努力吧，别厌倦。”

幸运的是，金并不习惯于相信高潮时刻，如同他一向反对在低潮时屈服。当他刚刚带着纳什维尔的乐观情绪回到家时，来自他处的内部斗争就爆发了。第一炮攻击来自罗伊·威尔金斯的一封措辞强烈的信件。信的开头写道：“对于詹姆斯·劳森牧师在罗利会议上对 NAACP 所做的批评，我们非常困惑和痛心，”威尔金斯强调，“我们对这个毫无道理的攻击很委屈。”他威胁金要为引发历史性的分裂而负责。“我知道你是带着不分裂协会的决心加入我们的，”他警告金，“我们寻求相同的目标，有着相同的敌人。如果我们内部的裂痕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的那些敌人肯定会比过去 40 年间的任何时候都要高兴。”最后，威尔金斯要求金将功补过，并称“设想中的其他干扰性要素”只能私下面谈。金大概猜到“其他要素”可能指的是他聘请劳森和穆尔的计划。

劳森收到了间接走漏的二手消息：就在他纳闷金迟迟不给他加入 SCLC 的进一步通知时，他接到 FOR 尊敬的 A. J. 马斯特打来的神秘电话。马斯特要求劳森去波士顿罗根机场见他，他将捎给他一条不能在电话里说的消息。在机场的会面中，马斯特告诉劳森最近他频繁接触马丁·路德·金，二人就非洲的问题进行磋商，他还说金恳请他转达一条最令人不快的消息：罗伊·威尔金斯不同意劳森加入 SCLC。金说，如果他同意劳森或穆尔加入，那么 NAACP “将和 SCLC 一刀两断，永远不再来往”。

劳森难以相信这个消息。暴怒、泄气、悲伤，一连串的情绪之后，他问马斯特，为什么他认为金会因为如此琐碎和被误导的事情而让威尔金斯决定 SCLC 的聘用政策——尽管威尔金斯对学生会议上的演讲很恼火？劳森点燃了一支烟，喃喃地说道，如果威尔金斯真的因为他的组织被指责为贪图名利和懦弱而暴跳如雷，那么他就应该做出改变。但与此相反的是，他竟然逼迫金把 SCLC 变得更像 NAACP 的样子。马斯特回答他说，只能从金说话的语气和神态猜测，金并不认为威尔金斯是虚张声势。可能是因为金的理事会里有太多 NAACP 的杰出人士，马斯特推测，还有一个可能是，金顾及自己即将面临两场昂贵的、有可能会打到最高法院的官司，认为不能牺牲 NAACP 的善意。

“我想马丁低估了他的力量。”劳森疲倦地说。最终，他和马斯特一致认为，目前最好的做法就是放过这件事。劳森对马斯特表示感谢，他还说，穆尔是自己非常尊敬的人，而对善良的金来说，送走穆尔对劳森如此尊敬的人是一种折磨人的姿态，他决定对金绝口不提此事。然而，激烈指责的结果却使劳森更加独来独往。而道格拉斯·穆尔这边，他从金那里直接得到了消息，金一遍又一遍悲伤地诉说着自己的别无选择。穆尔彻底失望了，他和奇迹般爆发的静坐活动渐行渐远。第二年，他在比属刚果谋了个传教士的职位。

金已无暇悔恨。就在苦苦挣扎于诉讼费用和审前准备的同时，金把结束长期混乱的 SCLC 工作人员领导关系作为第一要务。他进一步对怀亚特·沃克施加了

招募压力，而沃克的无理要求，伴随着他公职生涯的第一个重要人事决策，迅速被提交到金的面前。沃克给出了 SCLC 与昏睡状态决裂的前景，但前提是要满足他的物质和地位要求。他准备着要完成牧师职位的重大跨越。如果被选中，他发誓要整顿纪律。秘书们绝不可在办公桌上喝咖啡。早上 9 点钟，他必须听见他们打字机的声音。如果 SCLC 需要更多秘书，他会想办法筹钱。沃克毫不介意让别人知道他用威胁和侮辱的方式来为 SCLC 争取利益。“说真的，”他对金说，“我刚好就这么坏。”

他把自己当成金的代理人、大管家和私人“狗腿子”。沃克注意到，像金这类天性乐于助人的领袖，迫切需要承担灾难责任的人。这个人既要能帮助提升金的形象，又要在照片里站得离金越远越好。他将眼看着金收获荣誉，而作为回报，他要求在组织内部获得完全的权威。金必须授予他无可争议的权力，以便在他认为适当的情况下雇用和解雇人员。金的副手们，尤其是纽约的贝亚德·拉斯廷，在经沃克正式批准之前，不得再以金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艾拉·贝克如果愿意，可以继续留在亚特兰大的总部，只要她明白自己是在为沃克打工就可以。除了这种特权以外，沃克还要 SCLC 聘用他在弗吉尼亚州的两个朋友——他说，想要管理好一个组织，身边没有自己的人怎么行。他还要求协会给自己支付 8000 美元的工资，这是他在吉尔菲尔德做牧师收入的两倍，比金从埃比尼泽那里挣得还多，可沃克一点都不觉得有问题。沃克解释说，金的收入低是自我克制，而他并不像金那样存在金钱方面的顾虑。

在金看来，沃克的整套计划里面最主要的缺点就是沃克本人。他有头脑有热情，但对非暴力精神兴趣寥寥。同时，沃克的军事权威思想势必会和 SCLC 的实际情况相抵触。它从本质上是一个魅力超凡的体制，对金的决策影响远远超出了 SCLC 的牧师们。不知道金用什么办法说服了自己，使他最终相信，他既可以利用沃克的所有优点，同样也能控制沃克那招人烦的性格所带来的任何负面影响。他使用了一个微妙的小手段，那就是让沃克接手这份工作之前先和斯坦利·利维

森和贝亚德·拉斯廷私下见个面。沃克竭力反对，他说利维森和拉斯廷连董事会成员都不算，为什么要见他们？就跟他们聊聊，金温和地答道。结果，5月初，在纽约的喜来登亚特兰大酒店，3人会面谈了两天。双方对会议的结果都很满意，沃克树立了权威，拉斯廷和利维森则阻止了沃克寻求权力的举动，比如他想取消金在纽约地区的所有支持机构，将所有的筹款活动集中在亚特兰大。他们说，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大部分资金都来源于纽约。最后，他们3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一签署，金马上就寄出了大量信件给董事会成员和其他的关键支持者，几乎是乞求他们至少向 SCLC 再多捐 100 美元。8 月要支付的工资将翻倍。“把一个人从富裕的教堂挖来却无法支付其薪水将是最尴尬的事！”金这样写道。

沃克从原单位辞职了，但他继续在弗吉尼亚州以鲜明而耀眼的布道声援静坐者。他歌颂团结，宣称静坐运动的支持者需要把勇气和行动统一起来。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团结在一位领袖周围，那个领袖就是马丁·路德·金。沃克把金比作摩西，他宣讲金受到的迫害，讲他的需求、他的榜样、他的教导还有他的战术（私下里，沃克直接把金叫作“领袖”）。群众一致高声赞同。在纽波特纽斯的一次集会之后，一名观众穿过人群来到台前和沃克握手。这位曾在哈佛进修过哲学的年轻人脸上满是体贴的关切。这是他从沃克的拥趸中挤到前面来唯一能做的事。“沃克牧师，”他说，“为什么你一直说只有一位领袖？你不觉得我们需要很多领袖吗？”

提问的人叫鲍勃·摩西，是纽约一所高中的老师，当时正在弗吉尼亚州拜访自己的叔父。摩西和他那位在《圣经》中重名的人物——以色列最初的立法者摩西在性格上完全不搭调。他有精神信仰但不信教，关心政治但不激进。他向沃克提出的问题准确无误地预示了他和金最尖锐、最核心的分歧。他们都信仰兄弟会的精神，但金信仰神的必要性，就像其他领袖所宣扬的那样。摩西则不然，他的观点和黑人教堂，尤其同沃克的观点大相径庭。沃克只嘲弄地看了他一眼，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开了。摩西耸了耸肩。摩西写下了沃克演讲时提到的马丁·路

德·金辩护委员会的名字和地址，回到纽约后，他向贝亚德·拉斯廷毛遂自荐当义工。

5月16日，金走进了蒙哥马利法院，接受法院对其个人所得税指控的传讯。为了防止发生种族示威活动，治安官副手们骑着马，带领大批增援州的骑警和城市警察驻守在法院外围。在气氛紧张的审讯室内，金和5位正式出庭律师一同出现在辩护席上，而坐在他们后面专门为黑人设立的区域里的，还有他的新法律助理、来自芝加哥的昌西·艾斯克里奇。金的律师提出了许多法律异议并提起了上诉，而法庭本身存在的种族隔离也作为其中之一记录在上诉材料中。他们赢得了一点时间，但就在当晚，从亚特兰大涌来的大量电话，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中断战略会议。由于金第二天不用出庭，结果他成了一个激烈游说的目标对象。亚特兰大大学的学生想让金帮助他们庆祝布朗案判决6周年，他们打算从亚特兰大大学游行到州议会大厦集会，但州长范迪维尔以防止任何黑人踏足议会大厦的草坪为由，宣布他刚刚调派了州骑兵。范迪维尔的警告在黑人领袖中引起了震动，亚特兰大大学的6个学院院长都在问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自从3月份的一日示威后，这些学生还仅仅是静坐活动的旁观者，现在他们恳求金给予支持。然而，学生的长辈却认为，让金为了一次夭折的学生游行专门跑到佐治亚州来，实在是件愚蠢透顶的事情，而范迪维尔对金的反感也是政府机构的一个问题。

第二天早上，学生们聚集到一起，他们不知道要不要游行，也不知道金会不会来。克拉克学院的布劳利博士在6位院长中立场最为极端：他让人从体育馆外面把门锁上，意欲阻止学生游行。但有人从窗户爬出去弄开了弹簧锁，克拉克学院的学生们汇入了学生的大潮，他们祈祷、商讨和歌唱，随后，1500多人涌上了街头。学生们从西区一路游行到了州议会大厦广场，结果，他们发现州长的确已经向骑兵下令不准学生通过。学生大军沿着历史上黑人从城市迁移的相反方向，从那里穿过市中心向东撤退到奥本大街。伯德斯同意让他们在惠特街浸礼会举行集会。学生们从广播里听到新闻报道说，金特意从蒙哥马利飞来加入他们的

活动，但也有相反的谣言传播着。直到队列前面的人看到伯德斯和金一起出现在惠特街的台阶上。两位布道者愉快地向学生们挥手致意，好像在问候凯旋的朝圣者一般。游行队伍中爆发出胜利的欢呼声，集会开始后，金赞扬了学生们的非暴力精神，以及他们能够站出来的勇气。金赞扬了伯德斯，伯德斯也赞扬了金，每个人都表扬了学生们——就连一开始极力阻止他们游行的学院院长也表扬了他们。6位院长都出现在集会的讲台上致谢，承认他们之前的担忧是错误的。他们的善意非常真诚，因而没有人会不满或嫉妒他们荣耀的位置。

在亚特兰大学生游行的大部分时候，白人群众静静地站着，看着这条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一位迷惑不解的妇女就事论事地说：“我不知道学校里竟然有这么多黑鬼。”她的评论上了报纸，这也是当时非常有代表性的全国性的想法。对于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直接受到示威活动威胁或启发的美国人来说，黑人大学生以如此巨大的数量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让他们始料未及的启示。此时，白人终于能够把黑人当作一个阶级和一个种族的劳动者，因为以他们所知道的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往往会被定义为著名的、非凡的人物，并且和普通人区别开来。即便在北方，黑人白领出现在市中心的商务区也是一种罕见的现象。现在，突然有这么多大学生开始堵在路上，或者填满监狱，主流文化中不少人都在想：他们将要如何适应更大的行动计划。

对于那些数以百万计没有亲眼看到游行的人来说，民权问题仍然是个遥远的话题，它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好奇心、预言或希望。在人们家乡以外的地方发生着的静坐行动，和野猫式煤矿罢工、政府批准发明一种口服避孕药一起，被刊登在报纸内页不起眼的位置上。1960年春天，出现在报纸头版的新闻往往是国外发回国内的报道。甚至最突出种族问题的报道也是来自非洲而不是来自南方——在南非沙佩维尔，一群黑人为抗议颁布种族隔离的身份证法律而和平示威，但警察向示威人群开枪，造成69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背后中枪——这则新闻震惊了全世界。艾森豪威尔政府谴责了南非政府的镇压行为。数百万美元的外资从南非

撤走。美国报纸头版上出现了非洲人民烧掉身份证的画面，这些照片预示着骚乱和最终的反抗。然而，在南非政府不经审判就直接将 1.3 万名黑人嫌疑人关进监狱后，紧张局势消退了。无论是非洲黑人还是他们的白人自由主义支持者，他们都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为何国家权力不受法律约束或者不受良心谴责。

5 月，沙佩维尔惨案后不久，秘密特工在阿根廷逮捕前党卫军上校阿道夫·艾希曼，并将其押解至以色列。在那里，他坐在防弹玻璃后面，因其对犹太人犯下的纳粹战争罪行受到了审判，并最终被送上绞刑架，所有这些都令他闻名于世。学者们都在讨论，这位平淡无奇的技术专家是如何适应其邪恶的化身，并且在希特勒死亡长达 15 年的时间里，被当成全世界的邪恶象征。就在同一时期，这个世界同样遭遇了另一个恶魔——热核战争的幽灵，就像艾希曼一样，它真实得让人难以理解。5 月初，1.6 亿美国人全都加入了全国范围内的防空演习——自从美国政府确信俄国人有能力把核弹头扔到西半球以来，这已经是第七次防空演习。和以往一样，学生们都钻到桌子下面，华尔街股市停盘，电视屏幕一片空白，人们以美国领导人为榜样胡乱窜进地下防空洞。半小时内纽约的用电量降低了 90%。

5 月 5 日，在精力旺盛的民防官员不停地用全国防空演习折磨政府高官时，有消息称赫鲁晓夫公开声明苏联击落了一架美国侦察机，这一消息传到了艾森豪威尔顶级机密的北卡罗来纳州指挥碉堡。美国对此本能的反应是保护 U-2 的机密。在假定中央情报局（CIA）的飞机连同机上飞行员都坠毁的基础上，艾森豪威尔下令放出消息称该飞机是一架偏离航线的气象飞机以掩盖事实。第二天，总统返回华盛顿签署 1960 年《民权法案》时，他向记者确认了气象飞机这一消息，又过了一天，赫鲁晓夫挖开了陷阱，他宣布苏联活捉了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并且马上就要向全世界证明他驾驶的根本不是气象飞机。谎言被揭穿，故事本来应该结束了，但艾森豪威尔在震惊之下，又授权编造了另一个假消息。白宫虽然承认那的确是一架侦察机，但转而宣称鲍尔斯是叛徒，指责他是未经命令而自行

飞到苏联领空。而这一苍白无力的声明连一天都没能撑住，白宫承认了赤裸裸的真相，但艾森豪威尔从来不会让自己承认：是他亲自批准了每一架 U-2 的飞行任务。“我要辞职。”他在白宫沮丧地说。在公开场合，他从没有失去信心。一周后，艾森豪威尔飞往巴黎参加峰会，会上，他看到赫鲁晓夫口水飞溅地挖苦美国是一个强盗国家，于是走出了会场。5月17日，艾森豪威尔飞回美国，而此时，金正在惠特街教堂迎接亚特兰大大学游行的学生。

U-2 事件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几百万人否认其重要性，人们打起团结的旗帜，按老规矩谴责俄国人。而在这背后，始终挥之不去的是艾克的耻辱记忆，是人们对这一弥天大谎的记忆，是中央情报局在模糊不清而险象环生的背景下的首次亮相，它第一次戳穿了自从艾森豪威尔领导“二战”胜利后，美国人膨胀的清白无辜感。

尽管来自国外的头条新闻令人不安，但国内是表现出一派平静乐观的气氛。毕竟，危机发生在千里之外足以令人兴奋，而国内没打垮的新一代创造了“经济奇迹”，并且毫无下滑迹象，麦卡锡时代的艰难苦涩终于被甩开。美国人战胜了小儿麻痹症，接下来就该是癌症了。大部分员工成了白领，经济学家苦苦思索过剩之谜，不知道人们还想要什么。《时代周刊》称：“担忧结束了！历史上第一次不再担忧社会能否生产足够的产品。”那年，汽车随处可见；汽车收音机多半传出珀西·费思乐队的《夏之旋律》(Theme from A Summer Place)——那年春天排名第一的流行音乐；年底，大人孩子都跳起了一种新兴的“扭腰舞”——来自费城的孤儿歌手恰比·却克以一曲《扭腰歌》(The Twist)引领了这股潮流；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关系变得和谐起来——大人们变酷了，青少年不那么疯狂了。

贯穿全年的总统大选的筹备，那是在从大屠杀的威胁到流行娱乐的咯咯声之间随处可见的文化核心。民主党提名竞选吸引了大量候选人，但每一个都有致命的缺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几乎获得了国会中每个民主党领袖的支持，但是他和其他人都很清楚，在过去 100 多年中，没有一个纯种南方人在总

统选举中获胜。比如最著名的民主党人阿德莱·史蒂文森，曾两度败给艾森豪威尔。和约翰逊一样，他不愿意因暴露参选意愿而导致失败，所以就当众上演了一出哈姆雷特的“是，或者不是”的戏码。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没有这种约束，但他不怎么出名，而且，鉴于其民权和工会拥护者的身份，他的号召力据信也将因为这个名声受到限制。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1956年的政党代表大会上竞选过副总统，因此他的起步已经具备一定范围的政治关系网，不过他还年轻，而且又是天主教徒。

民主党人内部早期的争论给副总统尼克松带来了优势，他几乎就是其党派的名提名人了。除了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有可能成为威胁以外，共和党人没有一个是尼克松的对手。他的确想竞选，但勇气不足。尼克松的经验比其他共和党人都更为丰富，而且，至少他现在还以副总统的身份形式上接着艾森豪威尔的衣钵，他非常精明地警告自己不要大意自满，以免犯类似1948年杜威败给杜鲁门的错误。民主党仍然是国会的少数党，他一直这样提醒自己的支持者，而且他也不是艾森豪威尔。“如果不能意识到我们是在为自己的存亡而战，那就无异于在抽鸦片。”他这样对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人说。

肯尼迪赢得了威斯康星州（汉弗莱老家的邻州）和新教徒大本营西弗吉尼亚州的初选，汉弗莱也因此遭到淘汰。未公开的参选人抱怨肯尼迪的才智和魅力正在带领党派走向失败，民主党人领袖厌恶地看着这个竞选中的领先者。只有两位参议员看好他能提名。埃莉诺·罗斯福继续为史蒂文森助选，他刻薄地称肯尼迪是他百万富翁老爸的傀儡，是反对麦卡锡主义战斗中的懦夫。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继续支持约翰逊这个长袖善舞的南方人。前总统哈里·杜鲁门说他支持斯图尔特·赛明顿或者约翰逊参议员，就是不支持肯尼迪。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杜鲁门还在电视上叱责了肯尼迪。“参议员，你确定你已经准备好面对这个国家了吗？换句话说，你确定这个国家已经准备好面对你了吗？”他这样问道。

种族问题在竞选中扮演着重大角色，除了因为民权运动以外，更因为民意调

查显示出黑人投票呈现分散和多变的趋势。候选人都在极力争取黑人投票，但是他们争取选票的方式必须在白人中尽量引起最小的争议。当3月3日的《Jet》杂志刊登了一张约翰逊和一位黑人领袖的“独家”合影，该杂志心思缜密的读者们就立刻知道林登·约翰逊是真的打算竞选总统了。高度敏感的约翰逊从未允许任何媒体刊登这张照片，他怕的就是会因此在得克萨斯州失去选票。两个月之后，戴上全新隐形眼镜的约翰逊在3个主要的州进行“非候选人”巡回活动，在此期间，他欢迎黑人进入他在国会大楼里被人戏称为“泰姬陵”的办公室，为此，他让每一个他能逮住的人作陪。

尽管有不少人支持约翰逊，但很多人不是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肯尼迪问题则与他相反，因此也更有优势，但候选者本人担心他的战略无法赢得某些集团的选票，比如黑人群体。他允诺了竞选助手的游说，参加了NAACP的一个晚宴，他唯一想要与之合影的杰基·罗宾逊拒绝了他，理由是自己是共和党人，这使得肯尼迪的不安全感达到顶峰。被刺痛的肯尼迪尴尬地离开了，他说，他认为罗宾逊是汉弗莱的支持者。后来他得知的确如此。但罗宾逊认为，比起支持汉弗莱，他更像是一名共和党人。而且，假如汉弗莱没能赢得提名，那么，这位前道奇队的明星可能就支持尼克松了。雪上加霜的是，肯尼迪又听到传言说就连罗伊·威尔金斯都对他有疑虑，并且私下同情林登·约翰逊。“在黑人这边我们有麻烦了。”竞选经理罗伯特·肯尼迪如是说，并随后指派哈里斯·沃福德全天候负责处理黑人选区事宜——沃福德是金在抵制运动中结识的甘地主义白人律师。

肯尼迪议员对自己没有种族政策可施感到非常紧张，他决定亲自做一次考察。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他在行程中腾出了一个空当，把随行顾问、策划和制造话题者撇在一边，让司机在哈里·贝拉方特位于纽约西区大道的公寓楼外等他。在向贝拉方特做完自我介绍，并感谢他同意接受如此仓促安排的拜访后，肯尼迪开门见山地道出了来意。他说他知道贝拉方特支持的是史蒂文森。他认为这没什么不对，他也可以理解。但肯尼迪前瞻性目光关注的是秋季对抗尼克松的竞

选活动。他担心杰基·罗宾逊对他不利，并请贝拉方特帮他两个忙：他想知道一些类似杰基·罗宾逊这样的人支持尼克松当总统的原因；他请求贝拉方特帮他组织一个黑人明星助选团，以抵消罗宾逊可能“叛党”造成的政治破坏。

贝拉方特深信史蒂文森将赢得民主党的提名，在和肯尼迪交流的前几秒内一个又一个惊讶向他袭来——这位候选人这么早就推断自己将在竞选中赢得提名，他敏锐的直觉告诉他杰基·罗宾逊将是一个他必须强力应对的政治难题，他能够克制急躁情绪，不失风度地问出尖锐的问题和请求帮忙。短暂的惊讶后，贝拉方特和肯尼迪寒暄了起来，他说他可以理解罗宾逊和其他著名黑人不看好肯尼迪的原因，对他们来说肯尼迪是个陌生人，不是朋友，甚至连熟人都算不上，肯尼迪也没有对民权事业表达过支持。不过，贝拉方特也坦率地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杰基·罗宾逊会支持尼克松。他认为尼克松是该被诅咒的家伙，因为他扮演了麦卡锡政治迫害领导人的角色，在那段时间，杜波依斯被捕，保罗·罗伯逊被驱逐出境，贝拉方特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列入了黑名单。贝拉方特说，仅就公民自由的理由，如果肯尼迪赢得了提名，他将尽全力帮助肯尼迪击败尼克松，赢得大选。随后，他们就长远的战略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贝拉方特建议肯尼迪，首先要和马丁·路德·金建立紧密的关系。

“你为什么这么看重金？”肯尼迪问道，“他能做什么？”

贝拉方特顿了顿。很显然，肯尼迪这么问并没有贬低或者争辩的意思。在参议员看来，金确曾领导了亚拉巴马公车抵制运动，但目前是一个面临所得税控罪审判的陌生牧师。贝拉方特或杰基·罗宾逊有着近乎普遍的号召力，他们有能力帮助候选人，在不疏远白人的同时改变黑人选民的立场，与这两人相比，金有什么呢？贝拉方特尝试着向肯尼迪解释他的信念，在普及性的意义上，黑人选民的选票投票权已经不再有争议，因为公民权利已经具有神圣事业的地位。他说自己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但他看见也感受到了金对他的影响。然而，金的影响力并没有体现在白人或黑人的报刊上。“忘了我吧，”他对肯尼迪建议道，“忘记杰

基·罗宾逊和其他我们曾讨论过的人吧！如果你能加入金的事业，并得到金的忠告，那么你就得到了一个同盟，一切将因此而大为不同。”

肯尼迪一直在点头，又问了几个问题，并感谢贝拉方特为他提供的信息，但他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也没有透露任何计划。在近3个小时的会面结束后，他下楼重新回到车上。贝拉方特几乎立即打电话给金，向他通报了和肯尼迪会面的情况，他描述肯尼迪不做作、不易动情，但反应非常敏捷。他建议金尽最大的努力去了解肯尼迪。哈里斯·沃福德给了金同样的建议，他一直在努力推动肯尼迪和金的接触。和贝拉方特一样，沃福德是史蒂文森的忠实追随者。实际上，即使是加入了肯尼迪阵营之后，他也一直和这位不情愿的伊利诺伊州候选人保持着联系。他写了一封信向史蒂文森推荐金，又将复印件以“绝对保密”的方式送到金手上，希望这样做可以确保肯尼迪阵营中没有人发现他和敌人仍有交集。

5月22日，因被控伪证罪，金坐上了蒙哥马利法院法官詹姆斯·J·卡特的被告席。审判期间，就种族隔离问题，旁听席和陪审团席都提出了法律动议并发生了徒劳无功的争论。但到第三天，检察官堆积如山的999份证据——大部分是存款单和开给金的支票复印件。这桩官司顺利地进展着，直到金的芝加哥律师威廉·明昂首阔步地走进法庭，反复询问控方第一证人、州级税务审计员劳埃德·D·黑尔是否在1月份的时候到过德克斯特牧师寓所，并要求补缴税款。在公诉方进行了一连串数字轰炸之后，明决定反将他们一军，他反问黑尔州政府如何估算金的收入。黑尔承认他的计算是在拜访金的同一天自发进行的。此外，他也证实，关于金在1956年到底挣了多少钱，当年的这个问题亚拉巴马州政府仍然没有查清楚。黑尔的回答对辩护极其有利。明盯着黑尔仔细端详，他发现，黑尔显然因为想要努力客观地描述金而苦恼，于是，明决定提出一个极为危险的问题——明问黑尔到牧师寓所当天是否曾经告诉过金，他的纳税申报单上没有证据显示欺诈。黑尔回答说确实说过。现场众人听到证人的回答后，无不惊得透不过气来——一位亚拉巴马州的白人公务员居然在本州最引人注目的、公然的政治

审判中，给了一名黑人最安慰的证词。

检察官看来情绪激动，因为他们暂停了案件的诉讼程序。辩方则保持克制。虽然真相就隐藏在数字的疑云之下，但金从未在亚拉巴马法庭上赢过官司。辩方派出律师 R. D. 内斯比特向陪审团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德克斯特的受托人试着强迫金接受上调工资的提议，而金坚定地予以了回绝。莫尔豪斯的校长梅斯则带领着一群杰出人士出庭，他们来为金的品德信誉做证人。尽管如此，辩方关于法庭对原判做出误判裁定的希望看来仍然很渺茫，以至于律师们在激烈的内部争论后决定走一步险棋，派金自己出庭做证。就如同预料之中的那样，控方反复盘问金，并对金每天在袖珍日记上记录财务收支的描述嗤之以鼻，并穷追猛打地向他提出问题，刻意将陪审团的政治敌意最大化。为了能够坐实黑尔此前的证词——州政府埋下税务陷阱的那天他们在牧师住所的对话，辩护律师们宁愿让金出庭做证，这是一个高昂的代价。在金走下证人席位后，辩护律师派出会计和埃比尼泽受托人 J. B. 布莱顿作为最后一位证人出庭，据他描述，为了估算金 1956 年的合法差旅费扣除额，他发明了地理学—中间值—飞机票价的会计算法，这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尽管如此，根据推出的所有数据，他精确地得出金未申报的收入仅为区区 235.16 美元。布莱顿证实，就算是这个结果，也可以用另一个替代费用公式来解释。听完了布莱顿的证词，昌西·艾斯克里奇自言自语道，布莱顿只不过是把精简过的会计术语嫁接到艾斯克里奇自己的计算结果上罢了。不过，艾斯克里奇很清楚，布莱顿的规劝也许会奏效，因为辩方有同等权利对混乱的津贴提出主张。

5 月 28 日早晨，律师们做结辩陈词，法庭上剑拔弩张。更多的记者涌进法庭想要见证庭审的高潮，其中的一位黑人记者因为坐在了白人听众的席位而触发了当天的第一次争执。法警命令他移开。陪审团商讨了 3 小时 45 分钟，这其中的每一刻，焦急的人群中都有人做出全新的猜测性解读。当法官宣布“无罪”时，金的父亲和母亲以及妻子柯瑞塔热泪盈眶，激动得不能自持的德兰尼起身赞

扬法官的判决。人群中高喊“哈利路亚”，有人泣不成声，有人如释重负，卡特法官用小木槌重重地敲击桌面，命令法警们一排排地将法庭清场，命令占多数的黑人听众排成单行鱼贯走出法庭，防止欣喜若狂的黑人现场游行。法庭外有公路巡警的特别小分队，他们负责防止人们聚集成群。但当天的情形是，黑人们因为太激动太震撼反而没做出什么举动，他们完全服从警察的指令，以至于在到达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时，他们还保持着一个纵队的队形。在别人告诉金法庭的裁决前，他还准备着被带进牢里。在重新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后，在法庭外，他向围挤在身边的记者说了一句话：“这代表了巨大的希望，它说明南方仍然有成百上千的善良白人，尽管他们在种族整合上的看法和我们有分歧。”德兰尼法官仅仅表示，这次宣告无罪是“我34年律师生涯中最令人惊讶的事情”。

金走进了返回德克斯特的浩荡队伍，他要去参加自发的教堂仪式。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他和阿伯纳斯请求年轻人领唱《困难终将克服》这首歌。这首黑人战歌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的前福音时代，后被南卡罗来纳州的烟草工人带到了汉兰达学校，在那里又被改编成抗议歌曲。自从4月份赛提玛·克拉克的汉兰达研讨会召开以后，这首歌便在静坐的学生中迅速传播开来。这首战歌旋律简单，情感真挚而顽强，适合发生危机、哀悼和庆祝的场合，这也是当天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许多成年人的感受。

离开德克斯特教堂时，柯瑞塔和阿伯纳斯分开行动，以保持教堂演讲继续进行，金则带着父母乘车回到亚特兰大的家中。第二天早晨，面对挤满埃比尼泽的返乡人群，金进行了名为“苦难的自传”的披露性布道。他说，以前之所以没有说出他所遭受的全部迫害，是因为害怕别人会怀疑他想博取同情。现在他将一切细节和盘托出，从公车抵制运动的炸弹事件，到在哈莱姆地区险些丧命的遇刺事件，以及在刚刚结束的审判中所受的一切侮辱。金在这场布道中畅快淋漓地将所有细节尽数道来，放松下来的金在布道中哭了，但这冗长的陈述却是如此甜蜜，又是如此聚焦自我，以至于金似乎被自己的苦难记录所吸引——即使并不愉快。

金之前的布道也涉及过此类话题，它可以延伸到弥赛亚无辜的悲伤，不过金并不会完全屈服于忧伤的情节剧，他也肯定不会相信被宣判无罪是自己的神秘力量使然。他拿亚拉巴马州政府经过一番斗争最终同意为他提供几年的免费住房一事开玩笑，称这项决定只是借口，说不定那 12 个陪审团成员发现自己和金一样，也是可恶的税务稽查的共同受害者——他们大概觉得税务政策比种族隔离政策更可恨；又或者这批陪审团的成员和以前的不一样，他们发现真相太过扎眼，以至于无法忽视它的存在。无论如何，种族隔离依然存在。金对受到欢迎的判决结果表示感谢，但并不打算对此多做解释。“是陪审团出了状况。”他对会众说。

第八章 政治的阴影

在金被判无罪后的那个周一，由于认为有人会怀疑亚拉巴马州的骄傲已经在伪证罪的起诉中被消费，州长帕特森向这些人发出了措辞强烈的通告：基于《纽约时报》上拉斯廷为金筹集辩护资金而撰写的广告，他提起了赔偿金额 100 万美元的诽谤诉讼。帕特森的案子不同于早些时候由蒙哥马利治安专员沙利文提起的诉讼，在那个案子里，尽管金并不是广告发起人，但沙利文还是把金本人列为被告。基于对州长正式行动做出的反应，《纽约时报》已经刊文表示，收回所有冒犯亚拉巴马州政府官员的言论，但州长仍然提起了诉讼。同时，帕特森实施了一个让金感到更加贴身的报复：他给亚拉巴马的特伦霍姆院长下令，要求其解雇学院中十多个金的朋友和支持者，其中包括金的传记作者雷迪克、老朋友罗伯特·威廉姆斯，还有乔·安·罗宾逊——在罗萨·帕克斯被捕当晚，她曾帮助起草妇女抵制请愿书。结果，雷迪克被直接解雇，而其他人士则以辞职的方式减轻特伦霍姆做出决定的痛苦。

除了亲自上阵伤害金、威胁其组织的覆灭，长期的争斗也加剧了帕特森在总统选举中实现政治目标的困难。帕特森支持参议员肯尼迪参选总统，他们在 1956 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形成了政治联盟。事实上，帕特森在 1959 年就已经开始公开支持肯尼迪，其时间之早、热情之盛，以至于让肯尼迪相当难堪。金试图使肯尼迪和民主党远离帕特森的种族隔离诉求。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找到足够强大的力量，既可以令他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又不过于尖锐，从而避免让总统候选人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认为自己和帕特森而不是和金更相近的选

民。这项任务既微妙又非常残酷。帕特森的游说有多公开，金大部分的游说就有多机密。

在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中，金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盟友，他就是切斯特·鲍尔斯——前任康涅狄格州州长以及驻印度大使。鲍尔斯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他在民主党的民权纲领方面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哈里·杜鲁门认可的总统候选人名单中，他绝对是公认的政治家，但他和金一起分享对甘地非暴力主义的热情，他还是哈里斯·沃福德的老熟人。这3个人与贝亚德·拉斯廷以及其他许多人一起共同合作，为民主党起草一个“理想”的民权纲领，并在反对南方的过程中以相应的战术推进它的实施，其中的战术就包括计划在洛杉矶会议中心组织一条纠察线。这些谋划者工作隐秘。对沃福德来说，由于知道肯尼迪不喜欢书呆子鲍尔斯，他尤其不希望肯尼迪老板知道自己正和金以及鲍尔斯一起干活儿。更糟糕的是，肯尼迪的高级助手认为鲍尔斯是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对手，并且认为他在利用民权问题帮助自己成为自由派候选人黑马。

沃福德在肯尼迪竞选阵营中担任的是没有安全感的职位，大致类似于弗雷德里克·莫罗在白宫的情况。他掌控的是国家政治活动中传统上独立和次要的职位，负责以任何必要手段“拉到黑人选票”。虽然他的顶头上司萨金特·施莱弗娶了肯尼迪兄弟的妹妹，但毕竟只是姻亲，而且还被嘲笑为太过自由。此外，在肯尼迪家族内部，人们给施莱弗起了个绰号叫“童子军”。泰德·索伦森是肯尼迪参议员最亲密的助手，他建议沃福德在第一次会面时，不要发展和施莱弗过于密切的联系，因为他们的内部圈子视施莱弗为“共产党议员”。一如往常，这只是半开玩笑的话，但其态度令沃福德生畏。那些最接近肯尼迪的人正拼命争取普通选民的投票，力求赢得胜利所需的过半票数。如果他们认为萨金特·施莱弗——在族长约瑟夫·肯尼迪的芝加哥商品市场大获成功的经理，本人革命前马里兰州的一个家族的后裔——多愁善感、不切实际、较为激进的话，他们很可能不会倾心于金。

沃福德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按照哈里·贝拉方特的建议，为肯尼迪和金安排一次会面。最后，双方以共进早餐的方式，于6月23日在肯尼迪父亲的纽约公寓里实现了会面。结果证明，这是一个匆忙的介绍和一次普通的谈话。在华盛顿，就像任何一个媒人一样，沃福德正焦虑地等待着，他希望会面双方能够相互喜欢。在会面结束后，他收到双方相当中性的报告，但他选择对此做出正面的解读。肯尼迪说的是，他觉得在自己赢得金的支持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而此时急于出国的金却告诉沃福德，这次会面虽然愉快，但肯尼迪缺乏对于民权问题的深度理解。

在与金会面后不久，就午餐柜台的静坐运动，参议员肯尼迪发表了最直接的竞选声明。他对一群非洲驻美外交官说：“这是美国的传统，要站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即使这个站起来的新方法就是坐下来。”这样备受好评的言论可能一定程度上是金游说的结果，但肯尼迪的言论似乎对杰基·罗宾逊更有针对性。在与金共进早餐一周后，肯尼迪与罗宾逊举行了一次高峰会议，其结果是，肯尼迪公开发表了一封信，承诺全力支持黑人的权利。罗宾逊告诉记者，他“几乎和过去一样不重要”，但他也没有为肯尼迪背书。

此时，金已经飞到里约热内卢参加世界浸信会联盟大会。在那里，他呼吁他的浸信会教友，要承认政治自由的宗教关联。好几个保守的牧师对金感到不舒服，但福音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为金主办了一个荣誉晚宴，以此表示对其教会抱负的支持。在里约热内卢，金收到了一个涉及总统政治阴暗面的肮脏信息。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的一位使者用信息联系金称，如果金不取消在洛杉矶民主党代表大会外示威的计划，鲍威尔会向媒体透露金是个和拉斯廷有勾搭的同性恋者。金在恐慌中打电话给与他合作发起纠察线的A.菲利普·伦道夫，但当国际电话接通时，伦道夫刚好不在，因此在纽约接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经常在伦道夫办公室工作的拉斯廷。极度不适的金逐渐向拉斯廷透露了威胁内容。两人不停地互相询问威胁是否会来真的。他们都知道，反复无常的鲍威尔有本事干出

政治恐吓的丑恶行径，但无论如何这已经超出了界限。如果鲍威尔真的把威胁兑现，由于指控内容并非真有其事，这件事本身微不足道。但仅仅是这个言论，就将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危害，尤其是很多记者和大多数活跃的黑人传教士都知道拉斯廷的同性恋“问题”，这将是令指控有资相信的佐证。

伦道夫的第一反应就是找到鲍威尔。他知道鲍威尔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鲍威尔的几个国会助手已经被判有罪，罪名是将其部分政府薪金退回给他。鲍威尔本人则刚刚在另外一个税务审判中，因为陪审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逃过一劫。他还面对其他的审判，包括即将开庭的、由一个哈莱姆女人提起的诽谤诉讼，事关他在电视上抨击警察腐败时，把这个女人称为“购物袋女人”。最糟糕的是，由于鲍威尔1956年为艾森豪威尔站台，坦慕尼协会的民主党人对此仍在激烈地谴责这件事，他们正通过全国的民主党同盟运作，力图阻止鲍威尔担任众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的主席职位。按照资历，鲍威尔本来有望成为美国国会历史中的第一个常设委员会的黑人主席。

伦道夫对形势做了全面的预判：鲍威尔正在努力保护自己的正规军，而金和伦道夫正在与标新立异的自由派密谋；鲍威尔青睐林登·约翰逊和斯图亚特·赛明顿，此两人是民主党国会领导层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伦道夫正在讨好有组织劳工，因为他正在谋求他自己的主席职位；在同一时间，他与劳联—产联（AFL-CIO）主席乔治·米尼为工会种族问题争吵，并逐渐发展为公开的对峙，而鲍威尔还保持着和杰克逊的友好关系。一番计算后，伦道夫决定不介入这个烂摊子，也绝不和金交谈。他的方法很简单：他指示拉斯廷给正在里约热内卢的金打电话，告诉金伦道夫正在继续推进他宣布的计划，这样如果金撤出洛杉矶的示威，则伦道夫别无选择，只能说金是在按鲍威尔的要求照做。实际上，这是和平的反要挟。

拉斯廷打了电话，这个至少是一个对他和对金都同样困难的电话。他绝对是个同性恋但也绝对不想公开承认。此外，拉斯廷知道，他的个人性倾向不仅再次给金带来了负担，也可能给同性恋事业本身惹出麻烦。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令

人愉快的想法。金收到拉斯廷一个消息，那是一个近乎同意公开表明性取向的信息。他按计划从里约热内卢飞往洛杉矶。一切都没有改变，除了这4个人之间的个人情感，并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如前。

在洛杉矶，因为一个没有达成一致的争议，人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把会议正常的混乱推升到过度亢奋的状态。肯尼迪拾获了少量代表的支持，据说几乎已经足够赢得选战了，但他的领跑地位并未得到党内中坚的支持；埃莉诺·罗斯福和沃尔特·李普曼公开呼吁肯尼迪靠边站，把位置让他们青睐的更老练的阿德莱·史蒂文森；黑人选民不喜欢肯尼迪，罗斯福夫人声称，并补充说肯尼迪可以当史蒂文森的竞选搭档，这样，他会在“成长和学习”中做得更好；林登·约翰逊的一位发言人指责肯尼迪参议员患有阿狄森氏病，并且说他“如果没有皮质酮，可能活不到今天”；患病是真是事，后一句话则未必，但由于肯尼迪在竞选中一直努力打造青春而有活力的形象，因而断然否认了一切；林登·约翰逊则暗指战前担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的约瑟夫·肯尼迪是一个绥靖孤立主义者，并以此贬损肯尼迪的声誉。“我可不是张伯伦式保护伞政策的男人！”他嚷嚷道，“我从来不认为希特勒是对的！”

会场周边的酒店挤满了各路政治交易商，政治交易的谣言满天飞。休伯特·汉弗莱并非候选人，但在抵达斯戴勒—希尔顿酒店的几分钟后，他的长期支持者约瑟夫·劳就气喘吁吁地冲到了酒店门外。劳是牙医协会（ADA）创始人、资深民权说客，他趁看门人不备冲进了酒店，但在半途被反应过来的看门人坚决地赶了出来。“我必须见到休伯特！”劳一边嚷嚷，一边意乱张皇地拍打酒店大门——他有一个提议要迫切达成交易：如果汉弗莱立刻表态支持肯尼迪，并确保其获得总统竞选提名，肯尼迪可能会选汉弗莱做他的竞选搭档。劳绕到另一扇门，这一次他明白无误地听到肯尼迪的，也是公民权利和劳的头号敌人——林登的捧腹大笑。就在劳可以强行入内，并准备搞清楚约翰逊在干什么之前，汉弗莱的助手将劳推到走廊，一拳砸在他下巴上。即便脑袋嗡嗡作响，劳还是恍惚明白



自己来得太迟了——汉弗莱将支持史蒂文森，但这只是约翰逊计划的一部分。这个秘不示人的复杂计划分3步：第一步，汉弗莱将组织他的小集团支持史蒂文森对抗肯尼迪，并使第一轮投票久拖不决；这样一来，现实的代表将放弃肯尼迪和史蒂文森，转而提名约翰逊，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则是约翰逊将提名汉弗莱为自己的竞选搭档。

在神殿礼堂，威尔金斯、伦道夫、金和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共同和谐地主持了一个会议，共有250名黑人代表参加了会议。每个总统候选人接到了邀请，他们或是亲自到会，或是发来信息。当肯尼迪独自前来时，刚一走到门口，迎接他的是会场里此起彼伏的嘘声，以至于NAACP的克拉伦斯·米切尔不得不对人们高喊保持礼貌。肯尼迪的诙谐坦诚在他退出时赢得了零星的掌声，但比起休伯特·汉弗莱得到的待遇，这实在不算什么——汉弗莱宣称，他将为民权战斗，而不仅仅是为了在政府里谋上一官半职，包括总统。当所有候选人离开后，克莱顿·鲍威尔第一个发言。他开始鼓吹并呼吁发起一场“不抵抗而阻力巨大的革命”，所有代表都为此欢呼雀跃。接下来是金，他的讲话音调更深沉、节奏更缓慢，但所表达的内容更加高远，他宣称：“在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有决心获得自由。”

去年4月的罗莱会议上选出了3名静坐学生领导人代表，这次他们获准在政纲草拟委员会前做证，并宣读了一份主要由艾拉·贝克起草的声明。金也做了证明，但随后便消失在克拉伦斯·琼斯和迈克尔·哈林顿的公司里。琼斯和哈林顿是拉斯廷为大会民权议程招募的员工。前者是一名加州娱乐业律师，娶了一个富有的白人出版业女继承人，在金被控伪证罪的辩护中，他非常不情愿地为金提供了一些付费的法律研究。在外貌和举止上，琼斯和他的工作伙伴是一对奇特的搭档——英俊的琼斯有着黑檀木的肤色，他开跑车、穿西装、喷古龙水、挂欧洲风格的配饰，他的工作风格清新爽快；而哈林顿有一张爱尔兰人沧桑而不失顽皮的脸，他穿蓝色牛仔裤，戴道奇队的棒球帽。在公司里，两人一起向金介绍了当地

民权活动人士在过去一个月中的内讧。

7月11日是周日，也是会议正式开始的前一天。金、伦道夫和威尔金斯领导了一场从洛杉矶的街头到体育竞技场的游行。参加游行人数的5000名，是预期的两到三倍，他们为NAACP发起的一个集会而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保罗·巴特勒作为神秘嘉宾出现在集会上，他向游行者表示了欢迎，并承诺该党将很快颁布一个民权纲领以满足大家的诉求。巴特勒的讲话令全场响起了一片欢呼声。金和威尔金斯像克莱顿·鲍威尔一样向人群发表了讲话，不同的是，鲍威尔在集会结束、纠察线拉起来之前就不见了踪影。

纠察队员分成若干小组和班次，发誓要24小时蹲守，直到里面的代表批准鲍尔斯民权纲领。纠察队的组成团体五花八门，分别用几十到几百不等的数字编号，其中包括从纽约一路开车过来的一车康奈尔大学白人学生，还有教会团体组织和伦道夫客车搬运工兄弟会的休班会员。漫长的日夜蹲守场景为记者提供了次要专题报道的素材。金值了几次纠察队的班，被混杂着记者、好心人、敌对的种族隔离分子的人群殴打，但他泰然自若的表现给哈林顿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后，哈林顿和琼斯轮流带着金逃到藏身处，在那里，哈林顿发现自己和黑格尔、马克斯·韦伯进行了长时间的深情对话。金在这类主题上的谈话，比如社会福音和社会主义的伦理原则之间的相似性，使哈林顿确信，和他谈话的人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极大地改变了哈林顿对这位南方黑人浸信会牧师的期望。

克拉伦斯·琼斯对于金轻松自在的一面印象尤为深刻。金取笑琼斯他加州天堂般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住的是峡谷边、带有可伸缩屋顶的牧场房子，客厅里种的热带树可以穿过屋顶向外生长。在琼斯把金介绍给妻子安后，金非常喜欢安，他很快就开始称她为“医生”——自打高中以来，他就把这个荣誉称号赋予优雅和有魅力的女性。“琼斯律师和琼斯医生，”金会说得非常郑重，他称赞这对夫妇像好莱坞明星一样相得益彰，“难道不是吗？”

在比特穆尔酒店，罗伯特·肯尼迪站在凳子上，把众多简报中的一份递给了竞选工作人员。在这样的人群中，他似乎不再是那个政治上权威脆弱和脾气多变的人。眼下他的声音和身躯似乎比平常更加单薄。“记住，”他大声喊着发出当天的指令，“全都是鲍尔斯政纲。”就在竞选工作人员分头工作的时候，哈里斯·沃福德把他的惊讶吞到了肚子里：罗伯特·肯尼迪已经完全认可了这个政纲，包括影响深远的民权纲领。迄今为止，肯尼迪甚至还没有读过民权纲领，沃福德担心肯尼迪：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或许，他做了一个经过估量的决定——支持民权纲领有助于保住北部代表的支持，同时与约翰逊的威胁相抗衡；或许他只是简单地下了一个命令，因为在那个时刻，无论他能从更复杂的选项中想象出多少政治利益，都不如命令的简洁性更有价值。无论如何，肯尼迪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在力推他们的代表支持草拟中的政纲。与此同时，激烈反弹的南方代表组成了一个联盟，向全体大会提交了一个少数族裔民权纲领，但被大会否决。经过多次战役后，肯尼迪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赢得了南方以外近三分之二的选票。

周四凌晨，庆祝的欢呼声仍在酒店走廊里此起彼伏，但新鲜出炉的总统候选人和他的顾问们就已经在为副总统的选择争论不休。第二天一大早，参议员肯尼迪决定给林登·约翰逊一个惊喜，他带着给约翰逊的副总统提名信登门拜访。这个提名纯属意外，就算约翰逊拒绝，他也能在这件事上获益。肯尼迪没有直接行动，他只是把那份提名信放在外衣口袋里，但特意露出几英寸，并且放下衣服时让它在约翰逊面前闪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喘不过气来的肯尼迪把弟弟拉到酒店的另外一个房间。“你不会相信的。”肯尼迪喊道。“什么？”罗伯特说。肯尼迪回答说：“他想要提名。”“哦，我的上帝！”罗伯特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各方一整天都优柔寡断，闪烁其词。参议员约翰逊和他的妻子，还有《华盛顿邮报》的出版商菲利普·格雷厄姆“大概就像3个墨西哥跳豆”，此时他们坐在床上等待，担心肯尼迪是否会改主意。罗伯特·肯尼迪带着极为微妙的外交使

命赶来，他暗示约翰逊，由于北方的激烈反对，肯尼迪可能会将约翰逊从提名名单中删除。相反，约翰逊的人则直接给参议员肯尼迪本人打了一个痛苦的电话，结果，肯尼迪在电话中回复说：“鲍比没有与时俱进。”约翰逊把电话递给罗伯特·肯尼迪，以便后者能够听到哥哥的决定。这一刻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它同时羞辱了约翰逊和罗伯特·肯尼迪，为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个私仇盖上了封印——为保护哥哥的总统候选人形象，肯尼迪为混乱承担了责任，同时，他又为了自保而告诉朋友们说，约翰逊含泪恳求保留提名。约翰逊为了自保，向媒体讲述“那个胡说八道”、没有哥哥的有见识的罗伯特·肯尼迪如何试图抛弃他。

第二天晚上，大部分充满敌意的情绪已经不为人所见。当阿德莱·史蒂文森介绍肯尼迪时说，这个年轻的参议员“将领导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广阔时代，不只是为了我们本身，也是为了我们陷入困境而战栗着的整个世界”。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微笑着的年轻的面孔，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观众还不熟悉他。让人不习惯的还有他的波士顿口音。他的演说显示出他的情绪和品位，展示出肯尼迪是一个渴望高贵浪漫的热心的亲英派。在简短的讲话中，肯尼迪提到了8位美国总统、4位英国国王和2位英国首相。在演讲中，肯尼迪援引劳合·乔治的评论说，一个疲乏的国家是一个保守的国家，他宣布，美国既不能疲乏，也不能保守。他呼吁全国既不要悲观也不要自满。“不管我们是否寻找，新边疆就在这里，”他说，“在边疆的那一边，是未知的科学与空间领域，是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的角落，是未解答的贫困和过剩问题。”肯尼迪以马丁·路德·金最喜欢的《旧约》先知以赛亚的语录结束演讲，“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展翅如鹰；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肯尼迪的个性是尽可能抓住广播和纸质媒体对他广泛而细致的关注，而金与肯尼迪不同，他创造出的轰动几乎完全局限在他的周围环境中。在洛杉矶，他走到哪里都引起人群的轰动，但在会议的新闻报道中，他是民权现象的一部分。当金回到家乡亚特兰大，公众给他发来的邮件都聚焦在诸如他使用“Negro”一词

这样的问题上。像之前的其他人一样，一名记者严厉批评金使用起源于奴隶制的名称，并因为不适合指代混合肤色人群而拒绝使用所谓的“black（黑人）”，他告诉金，正确的术语是“非裔美国人”（形成于纽约的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致力于促进种族命名的公众教育）。另外一位名叫马尔科姆·X.的记者反对金的一个种族隔离攻击，他邀请金去听黑人穆斯林领袖伊莱贾·穆罕默德在哈莱姆集会的演讲。“然后对他的教学做出一个更加智能化的评估。”当时的白人媒体把马尔科姆·X.称为煽动性的反白人演说家，他在著名的神学学校开设辩论技巧的讲座课程，比如金在波士顿的母校。相当奇怪的是，他给金写的信发到了NAACP的纽约办公室，而金则指示他的秘书在谢绝邀请信中，用礼貌的“亲爱的X先生”来开头。

虽然在前进中相对默默无闻，但金马不停蹄的艰苦旅行几乎和总统候选人一样：他从洛杉矶飞回家在埃比尼泽讲道，然后到布法罗参加国家浸信会联合会另一个为期一周的预备会议。其间，他收到了一个好消息：亚拉巴马州的原告撤销了他的伪证罪第二被告的指控。接着，他飞到俄克拉何马州，在参加完SCLC的两个筹款活动后，又飞到芝加哥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伦道夫几乎把洛杉矶的行动完全移植到芝加哥来——步行、集会、组织圆环形示威人墙。拉斯廷已经从纽约送出两名先期组织者，而金则在昌西·艾斯克列奇护送下度过了一周的大部分时间——昌西是金的律师兼会计师，他破译蒙哥马利伪证罪的审判日志。

对于民权运动来说，芝加哥的一切都要更大一些。游行吸引的人数是洛杉矶的两倍多，纠察线也相应地更为完整。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办了两个而不是一个集会，地点都在黑人浸信会教堂。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成了第一次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刚刚结束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历时8小时的谈判会议，最终与他的谈判对手、副总统尼克松达成联盟，并就其原则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他们两人公开誓言要强化对共和党政纲中的民权纲领。他们在大会召开最后一分钟达成的协议，被保守党领袖巴里·戈德华特谴责为“共

和党的慕尼黑”“不道德的政治”和尼克松对“共和党左翼领导人”的“投降”。

戈德华特的敌意帮助洛克菲勒成了集会上的英雄——利伯蒂浸礼会教堂那天下午满满当当地挤进了近 6000 人。罗伊·威尔金斯向群众介绍洛克菲勒时，说他“把一块意大利面板做出了一个骨干支架板”。随后，洛克菲勒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其间，33 次被人们热烈的掌声所打断。那天晚上，在伯明翰的金和弗雷德·夏特沃斯也向规模更大的一群人发表了讲话。共和党领导人似乎站在他们一边。《纽约时报》率先在头版头条上宣布：“尼克松说人权纲领必须强化。”这句援引自尼克松的话为静坐运动的人们所青睐，却让南方人对他的投票“踌躇不定”。第二天，报纸头条做出引读：“尼克松赢得民权斗争。”

艾森豪威尔总统抵达芝加哥后，举行了满街缀满礼花和彩带的盛大游行，并为大会发表了电视讲话。作为目前为止美国最受欢迎的人，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的秘密武器。然而，4 天前出台的尼克松—洛克菲勒协议已经加剧了他对尼克松个人能力的怀疑。让总统烦恼的不是尼克松谈到如此之多的民权条款，而是他对增加国防预算的呼吁（“美国的安全事务不得有价格上限。”洛克菲勒和尼克松在他们的联合声明中宣布。）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尼克松，声明他对此很反感：尼克松怎能指望继续保持艾森豪威尔的和平繁荣纪录？他怎能迎合肯尼迪关于艾森豪威尔出卖国家安全的指控？他怎能运行一个经济良好的共和党政府？又怎能没有任何军事理由的情况下，甘愿财政赤字而购买武器？尼克松局促不安地回答说，是洛克菲勒偷偷把武器问题塞进他自己的那份声明中的。这就是尼克松的困境。他需要洛克菲勒和总统两个方面的支持，但他知道，艾森豪威尔对洛克菲勒的个人评价，远低于后者的实际行动效果。总统对纽约州州长很是不屑，认为他是一个亲自推动白痴方案的弱智败家子，典型的例子就是：洛克菲勒建议，在每一户美国家庭地下室建设一个联邦政府资助的防空洞。

尼克松试图消除分歧，但艾森豪威尔结束游行进入芝加哥圆形剧场时，洛克菲勒协议、U-2 灾难以及其他累积的对他军事知识的侮辱使他怒气冲冲。在电视

讲话中，他几乎没有提到理查德·尼克松和共和党。相反，他宣称“正如约伯也有毒疮一样，我们有一个狂热的专业悲观主义者，这个人……满口指责美国已经成了一个二等军事强国”。

洛克菲勒立刻证明了艾森豪威尔对他的鄙视——他在介绍提名人时叫错了尼克松的名字：“他就是明年1月接替艾森豪威尔的人——理查德·M.尼克松。”全场顿时一片哗然，机警的乐队指挥赶快奏响了音乐，总算是盖住了全场的喧哗声。理查德·M.尼克松若无其事地走到主席台前，向他的听众发表了接受提名的演讲——这是一个长度两倍于肯尼迪版本，既不引经据典也不诙谐幽默的演讲。

尼克松以他喋喋不休的自我辩论风格，延伸和转移了自己的论点。鉴于艾森豪威尔的自尊和肯尼迪的指控，他觉得有必要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因为“美国的声望正处于历史低点”，他最后重复说：“成就事业不是因循守旧而是革故鼎新。”尽管有这些辩论上的缺点，但这次演讲是尼克松一生中最成功的一个。他的政府问题调查全面而负责、没有积怨或威胁地传递技术性理解；他唤起了普通民众的传统理想主义：“我知道，我的美国同胞们，今晚我知道我们必须抵制仇恨，我们必须消除疑虑，但首先我们要对得起这个世界千百万的爱和信任，因为他们把美国当作世界的希望。”

获得大会提名后，尼克松在民意测验中领先肯尼迪。私下里，艾森豪威尔批评尼克松选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前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做竞选搭档，他认为洛奇在民权问题上过于自由，在竞选活动中过于文绉绉而缺乏效率。总统要的是一个富饶的得克萨斯州，他需要这对竞选搭档给出一个普遍能接受的理由，那就是，他们能够证明自己能管理好数以百万计的人员和资金。还有，艾森豪威尔偶然发现自己对大会上的种族主义迹象的愤怒：当时，他正自豪地坐在露天剧场贵宾休息室里，和他一起搭乘“空军一号”赶来参加大会的弗雷德里克·莫罗大步走上主席台，做一个简短的历史性电视讲话：“100年前，我的祖父是一个奴

隶。”莫罗这样开始了演讲：“今晚，站在你们面前的我，是一个美国总统值得信赖的助手。”就在莫罗说这番话的时候，电视台切换了信号，转播中断，艾森豪威尔不由得对着电视屏幕痛骂了一顿。由于害怕得罪南方州，两党提名大会上的黑人发言都被电视转播供应商切掉。虽然种族问题在强烈升温，并促使两党政纲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清晰立场，但电视台仍然对它过于敏感。

金回到了家乡亚特兰大，在他看来，在民权问题上，肯尼迪和尼克松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基于自己的原则和两位候选人都有相对的优点，金倾向于在秋季大选保持中立。这样一来，就使得他不仅与极具党派色彩的父亲，也与《亚特兰大世界日报》发生了分歧——后者的运营人正是金的家族友人以及埃比尼泽受托人斯科特（C. A. Scott），《世界日报》几乎是共和党大会一结束就在头版宣布：“尼克松和洛奇是最佳人选。”

在莫尔豪斯校园，金加入了学生领袖的会议——自从4月的SCLC会议以来，这个会议就定期召开。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情绪高涨，因为成人世界整个夏天都回荡着春天时静坐行动的声音。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的政府官员正在采取步骤“悄悄”结束闹市区许多商店的种族隔离。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两个连锁药店已同意结束午餐柜台的种族隔离。当这个消息在NAACP大会公布后，鼓舞欢腾的青年代表将威尔金斯抬了起来，就像抬起了一个获得比赛胜利的足球教练。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美国总检察长威廉·罗杰斯曾代表副总统尼克松展开民权斗争，其后，又直接参与连锁店在整个南方的业主谈判。来自美国司法部的新闻表明，就算业主愿意并且能够立刻整合他们的午餐柜台，他们也还是担心南方立法机构会制定更多要求隔离的法律。与此同时，客运公司官员宣布，他们将在整个南方公交总站的餐厅废除种族隔离。该公司被围攻的官员又声称，因为属于公共服务，他们将继续保持隔离的午餐柜台和洗手间，不过，所有种族的客户将可以自由地在任何地方就座。

胜利和胜利的传闻鼓涨着学生领袖们的希望。他们的运动已经不仅仅把握住

了这片土地上最高官员们的关注，还把种族隔离主义者推入了防守和可笑的妥协境地。在亚特兰大会议上，学生们讨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们准备进入新的领域，并且向其他种族隔离机构，比如教堂和公共公园等发起攻击。每个人都认同他们极其糟糕的弱点，相对于静坐创造的巨大机遇，有组织的学生运动规模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SNCC(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金的SCLC办公室里仅仅是一个角落，大小还比不过一间3人理发店，其唯一的成员还是从协和神学院告假的学生志愿者。他们的亚特兰大会议只能召集9个学生代表，其中一人代表哥伦比亚特区和整个佛罗里达州。没有来自农村的代表，也没有代表来自境况艰难的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而且，参加他们会议的观察员，比如金、记者卡尔·罗文和最近被解雇的教授L. D. 雷迪克等人，在数量上远远多于SNCC自己的代表人数。面对所有这些缺陷，SNCC代表借鉴了SCLC的一个战术。他们决心招收更多的会员以便两个月后召开另一次会议，到那时，他们希望把SNCC建设成为一个常设机构，于是，他们大胆向参议员肯尼迪和尼克松副总统发出了会议邀请。

私下里，一些亚特兰大学生运动的领袖对金有一种时代特征的担心。他们担心，他们的支持者之一可能是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他们怀疑一个纽约人准备参加他们未来的会议，他将会加入他们的纠察线，会和他们的朋友交朋友。他年纪比他们大，比大多数人更复杂，有着怪异的习惯和高尚得不真实的志愿者精神。经过多次内部讨论，亚特兰大学生们把他叫来进行了一次近乎审讯的问话。一无所获之下，学生们决定把他们的疑虑交给金，因为男人在接受问话时说，他是作为SCLC的夏季志愿者来南方工作的。金承诺调查此事，于是，他把嫌疑人召到埃比尼泽。

在上述那些很不幸的气氛中，金和鲍勃·摩西互相自我介绍。调查过程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说得很少，走动也很缓慢。调查一开始是长时间的沉默。忠诚调查，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谈话主题，每个男人都天然地保护这块领地。金被一

些大事频繁地分散了注意力，于是，他把自己的角色从调查者撤回到布道者的习惯状态中。而摩西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并没有陷入对金英雄式的崇拜，但又因为太过尊重金而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也没有抱怨正在进行的运动的方法。他耐心地等待着金向他发出挑战。金确实这么做了，但很和缓。虽然身体虚弱，戴着眼镜，轻声细语几近耳语，但就是在这样的金身上，摩西却发现了东方神秘主义的强大存在。而摩西虽然有点怪异，但他也设法展现他镇静而超乎世俗的内心。

从表面上看，他们相互间以这样的身份会面。世界著名领袖和身份模糊的志愿者、法官和被告、浸信会传教士和怀疑主义者，但这些等级的标识之下，两人是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中天然的竞争对手，注定要成为民权运动的圣战中对比鲜明的象征。他们的个性在内心深处撞击着，提醒他们彼此之间是如此相近，却又是如此难忍的不和谐。不只是在第一次紧张的会面，他们从来不承认他们之间的共性范围。

25岁的摩西只比金小6岁，在哈莱姆出生长大。他在孩提时代就被视为一个极其敏感的孩子。后来，他考上了专为天才学生开设的史蒂文森高中，即便在那里，他也仍然与众不同——他培养了自己对中国哲学家老子思想的喜爱。摩西的祖父曾是全国浸信会的早期领导者，一个杰出但霸道的布道者。当年祖父带着全家搬至纽约时，不幸身染沉疴，又正赶上大萧条的艰难时期，结果，祖父摩西的病弱使年龄最小的那几个孩子失于教育，摩西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一辈子苦于缺乏教育或专业素养，摩西的父亲和母亲都非常鼓励儿子的书呆子倾向，同时灌输给他一个志向，那就是，做一个在更好的白人院校取得成功的人，而不是传统黑人群体的人——在他们眼里，那些黑人过于“社会”。1952年秋季学期，当摩西获得入读纽约州北部汉密尔顿学院的奖学金时，他们全家都欣喜若狂。

突然之间，作为仅有的3名黑人学生之一，摩西进入了白人中产阶级文化的一个新天地。因为种族原因，他被排除在所有重要的大学联谊会体制之外，于

是，他被吸引到一个整合的基督教研究小组，其成员认为自己周围的世界充斥着虚荣和欲望，于是从“二战”的启示抽丝剥茧，最终接受原教旨主义的最后审判为当下世界的保护盾。为了到街头传教，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纽约城和学校之间往返，摩西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在许多个周六的晚上，他站在灯火辉煌的时代广场，在乡下传教士、西印度占卜者和其他学生传道者中轮班——举着他的《圣经》，敦促如织的人流悔改。尽管他的声音太柔弱以至于不适合这样的街头任务，但他的几个汉密尔顿教授认为，他的热情是关乎宇宙问题的更加折中主义的好奇。摩西成了一个哲学专业学生。他用法语阅读加缪的著作，再次开始他的东方哲学家的研究，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和平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因为受到教授的欣赏，摩西被安排参加了在海外举办的贵格会研讨会。他在法国度过了一个汉密尔顿的暑假，和一群和平主义者生活在一起，那些人的信仰测试已经在希特勒占领期间完成。第二年夏天，他又去了日本，生活的两头是贵格会和佛教禅宗和尚的家。他这些形成著作的经验，加上他对伟大的哲学家理论的掌握，使得他成了一个异类，但有着比街头传教士更受人尊敬的教师气度。1956年，摩西进入哈佛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班。

摩西在金离开两年后来到了波士顿，但要在哈佛水平上和白人学生竞争，他仍然对自己的能力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两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保罗·田立克这位世界著名神学家，是金在波士顿大学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但金从未见过田立克，现在田立克是哈佛大学哲学和宗教研究的教授。摩西选了田立克的课，此时，职业哲学家的主流世界观正经历一个历史性转变，摩西对田立克的认识也深受这个转变的影响。田立克早已落伍，他关注的都是关于真理的古老问题，还使自己置身于现代分析哲学之外。一般来说，除非能找到一种能使单词像数字一样精确和科学的方法，分析哲学家们早已经搁置的古代谜题。他们的论文布满公式和逻辑符号，用数学证明而不是说服能力来衡量一个哲学研究的质量。不久，摩西进入了哲学研究生的小团体，但这些研究生对田立克的课从头到尾都

不以为然，他们嘲笑说“诗歌而已”，意思是说田立克在玩文字游戏。摩西吸收了足够的分析训练以理解哲学，但在分析哲学以外，他还是渴望听到宗教和哲学的诗歌。

就在摩西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1958年2月传来消息，他的母亲突然去世。摩西在震惊之余前往纽约参加葬礼。过后，他的父亲带着行李离家短途旅行，名为逃避与恢复之旅。就在摩西将要动身回哈佛之际，警察打来电话通知他说，他们在街上遇到了摩西先生。他显然已经疯了——胡言乱语、自伤、叫嚷嚷地说自己是电影明星加里·库珀。摩西先生被送到了贝尔维尤精神病院，在那里治疗了好几个月。他出院没多久，刺伤金的伊佐拉·韦尔·库里也被警察送到了同一家医院做评估。

摩西离开了哈佛，回家照顾他的父亲。他在纽约赫拉斯曼高中找了一份数学老师的教职来供养他们两人。当1960年南方的静坐运动开始时，他还在这个学校。他去马丁·路德·金辩护委员会纽约办公室做义工，为贝亚德·拉斯廷工作。多年以前他曾见过拉斯廷，和他讨论关于以良知为理由拒绝服兵役的问题，不过拉斯廷已经不记得这事了。现在，摩西发现像在哈佛学业中断之前一样，他再一次思考同样的道德哲学方面的问题。拿着贝亚德·拉斯廷为他给艾拉·贝克写的一封信，他乘坐汽车南下去为金工作。

亚特兰大和哈佛哲学系一样出乎摩西意料。在SCLC办公室里只有3个人：艾拉·贝克正准备回纽约，以便给怀亚特·沃克的到来腾地方；第二个人是金的秘书朵拉·麦当劳，每天忙着接电话、为金做电话记录、回复邮件以及在打字蜡纸上打筹集捐款信件；第三个人简·斯坦布里奇是来自协和神学院的志愿者。金一直在外面参加不同的政治聚会，没人能想出来每天让摩西做些什么。开始的时候，他一直在找，干活儿的大队人马在哪儿呢？那些屋子中，哪间有忙于装填信封的志愿者，哪间有时刻准备上门拉票的人，又是哪间有参加培训然后去活动现场的组织者？——可是，那种纽约风格的蜂窝式组织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

摩西终于明白了一个现实：SCLC 就是一个教会办公室，不过是有 3 个整天响个不停的电话而已。他和斯坦布里奇交上了朋友，还花了很多时间和她争论保罗·田立克有什么优点。通过她，他接触到了亚特兰大学生运动的头目。这些人几乎每天都在忙于参加示威或是计划会议。急于找些事来做的摩西立即加入了他们，在拒绝雇用黑人职员的亚特兰大超市外面示威。有些天里，学生们忙着参加长长的会议的时候，摩西就是唯一示威的人。为了找些同伴，他又找到城里另外一家示威队，并加入了他们。有一天，警察把他和他的同伴逮捕起来。在新闻报道中，他被称为来自 SCLC 的罗伯特·摩西。不久之后，亚特兰大的学生们把他叫来，问他是如何找到另一家示威组织的。他回答说是在听一个名叫“哥德尔定理的后果”的数学讲座时听说的。学生们怀疑这个超级聪明的纽约志愿者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他的话对消除这种怀疑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在金的教堂调查中，摩西的消极使金最有价值的一个特点归于无效，那就是他作为聆听者和纷争解决者的耐心。金被迫展开了攻势，金列举了他所听到的关于纠察队、逮捕行动以及摩西的 SCLC 志愿者身份的事情。摩西没有对金历数的这些事情发起挑战，于是，金解释说，南方大会教育基金赞助了纠察队的行动，它从罗斯福总统夫人老的跨种族团体衍生出来，由奥布里·威廉姆斯和迈尔斯·霍顿等人资助，目前由卡尔和安妮·布雷登运作。早在 1954 年，当克利福德·杜尔在新奥尔良的听证室里失去理智的时候，参议员伊斯特兰就曾调查过这个团体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金对摩西说，“不过我建议反对 SCEF 的人继续参加示威游行。有人认为他们是共产党人，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必须小心。”

摩西没有同意，但他也没有反对。作为 SCLC 的志愿者，他认定自己一定会遵循协会的政策。他唯一的回应就是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提出了疑问：金博士是否介意让摩西把募捐信带到巴特勒大街基督教青年会，以便让他能够集合志愿者们进行校对、写地址和装入信封？他认为他能通过这种途径更快地把募捐信寄

出。金衷心赞同这个想法，简短的碰头会结束于一份手工拟定的协议书。

除了刚才对摩西的警告，金自己与 SCEF 的领导们保持友好的关系。艾拉·贝克和拉斯廷也一样。在处理与摩西的争议中，金的手法有权宜之计，甚至虚伪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稍稍反映了更大和更惨痛的实用主义、信念和个人忠诚的矛盾。拉斯廷的清洗是最大的麻烦。自从金要求他的 SCLC 董事会聘用拉斯廷作为协调员和宣传人员起，牧师们之间的内部阻力再次产生。拉斯廷过去的共产党党员背景使他们迟迟不做决定。在对拉斯廷的《纽约时报》广告诉讼失败后，他所受的压力日益增大——牧师们承认这真的不是拉斯廷的错，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批评了拉斯廷——此后不久，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发出了古怪的勒索威胁。这些事情，连同在抵制期间秘密接送拉斯廷进出蒙哥马利的记忆，支持了拉斯廷总是一个负担的论点。面对这些冰冷的事实，金既感觉到对原则的忠诚，又感觉到自己对拉斯廷的个人感情，但当他意识到年近 50 岁的拉斯廷希望他能提供一份安稳的工作时，所有的这些感觉都被大打折扣。金最终任命了一个由牧师托马斯·基尔戈管辖的 SCLC 的委员会。作为艾拉·贝克的牧师和金在纽约的传道导师之一，基尔戈带着金的祝福，通知拉斯廷有关委员会达成的结论，拉斯廷应当和金断绝联系。拉斯廷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认为金没有和他面对面讲清楚，而且，把如此个人的事情交给委员会处理是一个错误的做法。他在委员会辞职以保护马丁·路德·金，为《纽约时报》诽谤案筹款的行动戛然而止，律师们正追着金缴付律师费。

摩西来亚特兰大时，对推荐拉斯廷这件事的纷争一无所知。他和艾拉·贝克迅速建立的友谊可能也会使得金的引荐不大自然，因为怀亚特·沃克在众说纷纭中到来后，贝克正要再次离开。为了建立自己的地位，8月1日，沃克决定把由一个女人主导的 SNCC 办公室逐出他们的办公楼——尽管他帮助斯坦布里奇在大街上寻找办公室，甚至在到达亚特兰大前，沃克就让金向南方各地的记者们发出有金签名的信件，赞扬沃克的才能。沃克在首个 SCLC 的宣传手册上吹捧沃克

和金相似，他们都是“国际知名的”民权领袖。总的来说，金相信，与沃克的天赋相比，他的错误实在微不足道，但是对于摩西，沃克的新班子只会进一步让他疏远金和亚特兰大的学生。

简·斯坦布里奇建议在没有 SNCC 代表的州开展招募活动，摩西抓住了这个机会，同时又可以借此逃离令他不适的亚特兰大。他想看看南方的乡村，实际上也喜欢独自出行。于是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怀亚特·沃克负责提供公交车票；摩西同意自己支付所有其他的费用；艾拉·贝克提供的一份概要有助于亚特兰大和得克萨斯州边界之间的联络；斯坦布里奇梳理了 SCLC 的邮件列表，并发信件要人们接待摩西。人们兴奋不已，其中亚特兰大的 7 个白人教堂出现了“下跪”祈祷，在这样的最后一阵兴奋过后，摩西于 8 月 13 日被斯坦布里奇送上了一辆灰狗巴士，从亚拉巴马腹地消失了。斯坦布里奇自豪地写道：“学生暴力协调委员会现在有一个分会代表了。”

摩西和斯坦布里奇不是最后，也不是最早被这场运动的浪漫、宗教和危险敲打的人。从塔拉迪加，从夏特沃斯在伯明翰的家，从亚拉巴马的乡村教堂到密西西比，摩西用令人眼花缭乱的印象派风格写信向她汇报招募的情况。“我扫过门前的草坪、草坪上的椅子、厨房的椅子、后阳台、稻草和高背椅上的紫色天鹅绒。”他在他的第一封信中建议道。摩西打印出了他所遇到的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感兴趣的几十人的名字和地址。

“你做得太棒了。”斯坦布里奇回信写道。她写信给摩西通报 10 月份 SNCC 大会越来越振奋人心的进展情况。即使离开了 SCLC 也不会放弃学生的艾拉·贝克从纽约来访，只是为了帮助计划的实施。A.J. 马斯特和贝亚德·拉斯廷也都要来。“如果贝亚德有任何能够做到的地方，”斯坦布里奇给摩西写道，“他一定会照做。”

通过阿姆齐·穆尔这名“二战”老兵和加油站大亨，摩西在密西西比的克利夫兰迎接了他的未来。穆尔对于选民登记的努力，以及扼杀他生意的反对运

动，已经足够戏剧性，以至于早在 1956 年就受到了埃德加·胡佛的关注；支持他事业的最主要的原因一直是友谊关系的建立，也就是在那一年，他和拉斯廷、艾拉·贝克和斯坦利·利维森成了朋友。4 年后，穆尔仍然拥有加油站，而且与前妻有着良好的生意关系——他前妻的美容院建在从机械区分隔开的一块地方。“阿姆齐是我遇到过最出色的人，”摩西在给斯坦布里奇的信中写道，“不过以后，我应该通过贝克小姐进一步认识他。我会明确地或暗中地信任他，并经常和他联络。他近两年在邮局每天工作两小时，生活就像一间砖房里的一堵砖墙，就像扎根在乡间的一棵水边的树。”

阿姆齐·穆尔接过了摩西的招募工作后，进度有些放缓。他说，在密西西比为 SNCC 招募年轻人固然好，但如果 SNCC 派一个工作队到密西西比工作，在新民权法的保护下注册选民则更加好。“阿姆齐认为，而且我也同意，这里的成年人会支持年轻人，但永远不会创设一个足以成事的强大计划。”摩西在给斯坦布里奇的信中写道。逐字逐句地，他写信时的陶醉逐渐发展成头脑清醒的幻想或者启示。“阿姆齐认为如果我们能提供汽油，他就能找到一辆公共汽车，”他写道，“这个念头是用于解决第二和第三国会选区，一共大约 25 个县的问题……它主力冲击下一个夏天……没有人过分乐观，这些是肮脏的工作，但是我们正在找些肮脏的人去做，所以算我一个，因为我不仅变得卑鄙，我还变得肮脏透顶。”

“你的信件让我难以置信，”斯坦布里奇回信写道，“发生的事情正合我的个性，我太激动了。就是这个选民登记计划了！”她告诉艾拉·贝克、拉斯廷和其他所有她能找到的人。带着希望、坐着灰狗大巴出去寻找大批学生的摩西，现在让她拼命筹集资金，用来打印二十多万份，以便更好地教育新选民。

8 月 26 日，在亚特兰大的竞选宣传中，副总统尼克松在机场受到了十几名当地最具影响力的黑人的欢迎。摩西也在几天后乘坐灰狗大巴回到城里，带回了更多的地址和主意。他回归的一刻同时值得庆贺和遗憾。和他希望留在南方的愿望一样强烈，他告诉斯坦布里奇，他还有最后一年的教学合同，他不能违

约，也不能离开他的父亲。他得在劳动节后到北方教授数学课了，但他承诺一定会回来。

同年夏天，来自威斯康星州小镇上的白人律师开启了他的探险之旅。高高瘦瘦的约翰·多尔平日沉默寡言，但坦率直言。1960年，还在法院诉讼实习期间，有客户付钱请他去加利福尼亚州办理一桩父权案件，他把这看作是迈向成功的一步。司法部民权司主任哈罗德·泰勒一直通过电话来跟踪他的工作过程。

为加快《民权 1957 法案》和《民权 1960 法案》的落实，司法部部长威廉姆·罗杰斯聘请了泰勒。这是一个时代的现象，不管是和共和党的单纯政治合作，还是泰勒的任何朋友，都对民权司第一助理这个高位不感兴趣。泰勒和多尔唯一有联系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曾就读普林斯顿大学，他的一些朋友绞尽脑汁想到了多尔，尽管他还没有步入事业发展的快车道，但终究是个好律师，或许，他对这份差事感兴趣。于是，泰勒在电话里就把工作给了多尔，连见都没见。

多尔细细琢磨了好一会儿。他关于普林斯顿的记忆只有一样——南方学生总是说外地人干涉复杂的黑人问题是一个糟糕的错误。此外，他的成长一直伴随着对南方一党制体系的愤懑，他认为这一制度让无人挑战的南方议会主席得以操纵国会，使他的家乡处于不利地位。一直以来，多尔接受的教育告诉他，黑人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与南方政治寡头在国会的延续息息相关。他坚定地认为，如果他能帮助在南方建立一个正直的、威斯康星式的两党制，将是对历史和对威斯康星州的贡献。早上 6 点，他打电话给加利福尼亚州的泰勒，简洁地说：“我干。”

1960 年 7 月，多尔到了华盛顿，并立即投身两个官僚政府的争斗中，他的职业生涯也就此开始。对于多尔来说，这是第一次经历法律正义思维与政治谋算的较量。多尔上任后，根据《民权 1957 法案》，公民权利部门只有 3 个悬而未决的案子，它们无一不是里程碑式的案子，被告律师全都用尽了浑身解数。最重要的是，律师们已经说服南方联邦法官宣布部分新法案违宪侵权，这就迫使美国司

法部要赶在案件进入下一个程序之前，战胜提起上诉中的相反意见。他们发现，南方人多年来都在使用这种方法，而且，同时使用的其他方法还有回避和拖延。比如，一些被控拒绝为黑人办理登记的官员宣布辞职，这样一来，律师就以被告人身份不明确为由，将案件撤出司法部。1960年的法律弥补了这一缺陷，允许司法部将州政府列为被告。但是，这项新法律的《宪法》挑战才刚刚开始，并将持续10年。

面对这一抗辩挑战，泰勒的前任早已下定决心，不管需要多长时间也要顽强地赢得这3个判例案件的胜利，这样就可以确定一条承担执行法院命令义务的路径——它将合法并经得起考验。也只有这样，假设，回到著名的1957年“陪审团”修正案，它将使政府被强制执行法院命令，并将能够对拒绝执行命令的被告发挥作用。在3起初始案例悬而未决期间，泰勒的前任没有审理其他案子，因为在没有说服力的情况下，多余的案子会有成为不良案例的风险。这种推理将在原本枯燥无趣的教学活动中占上风，但挑起了司法部部长罗杰斯的政治紧迫性。对罗杰斯而言，判例案件作为民权执法上的一个“无为”策略，很容易受到政治攻击。因此，他需要更多的案子。

多尔很快明白，司法部里的政治斗争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四面性，而不是律师行业里公认的两面性。不久，他便在总检察长民权计划的执行中遇到了第二个官僚主义障碍，行动迟缓无作为的联邦调查局。从田纳西州海伍德县的案子开始，多尔了解到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微妙之处。在田纳西州，除了孟菲斯，还有两个黑人主要聚居地，海伍德县就是其中之一。1960年时，那里的投票争端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当时，民权司接到一个投诉，指白人农场主有系统地驱逐意图投票登记的黑人佃农，于是，该司首先要求FBI对此展开调查。胡佛最初是试图规避问题，他说，根据《民权1957法案》，很难证明驱逐黑人佃农与他们试图登记投票存在关系。

民权司要求FBI无论如何都要进行调查，而胡佛也像往常一样及时而有效地

配合了这一要求。可当地的 FBI 只是访问了一下最初的黑人投诉者，然后提交了一份与早已见诸报端的新闻并无二致的报告，显然，这个报告对司法部的律师几乎毫无用处。

联邦调查局并非生来效率低下，这种情况也并非不可避免。即使在民权案件上，特工们也完全可以像一年前处理查尔斯·麦克·帕克私刑案一样，动作聪明一点，力量集中一点。但是民权司律师的结论是，高度敏感的联邦调查局官僚状态，从疾如闪电的主动到粘滞如沥青的阻抗，胡佛的态度都可以对其加以细微的调整，从而使之完成任何事情——而这些又全都在一种渴望合作的姿态下进行。海伍德县的案子就曾遇阻：在司法部多次要求下，FBI 拖到 1960 年的夏天才做出回复，在 FBI 提交的报告中，司法部提出的具体问题得到的是可能性极低的答案，并且，除此以外没有更多内容。7 月 22 日，多尔刚到华盛顿不久，海伍德县的一位白人女士将两份在白人中间流传的名单复印件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单子上列出了那些被驱逐、被信贷压榨或遭受其他报复形式的黑人的名字，她认为这是错误的。联邦调查局向司法部简单提及了这位女士的说法，他们既没有提供名单作为证据，也没有核实该女士的信息，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努力都没有。如此多的疏漏必然引发了民权司更多要求的提出。私下里，联邦调查局总部的主管们给泰勒和司法部的其他主管人员打电话，建议调查缩短时间或延迟，特别是在选民登记日期间。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出现，只可能增加人们对特工的敌意。每一个联邦调查学院的毕业生都知道，J·埃德加·胡佛明确地以小镇银行家的角色模型建设调查局。这对于特工们跟踪偷车贼、银行劫匪和其他流浪汉这些平常的工作大有裨益，但扭曲的形象很难让特工们接受自己真实的另一面。

像多尔这种水平的律师，多是依靠调查局获得基本信息，他们别无选择地必须按照胡佛的游戏规则办事。在游戏过程中，律师们精心发明了“训练”或“拳击”的备忘录，旨在消除留给 FBI 分局特工自由裁量权的一切痕迹。他们的点拨

是，具体的问题要向具体的人提问，然后根据可能反应的推测，就可以提出一系列后续的问题。按照这种方式，所有这些要求很快就接近形成细致入微的巨大网状架构，最终，每一个问题都能变成长达 200 页的文案。

多尔长年担任乡村律师，他能够意识到这种离奇的指导过程对双方都是一种贬低，根本不可能如实反映田纳西州海伍德县或是其他任何地方的情况。因此，他决定明年夏天自己到处走走，找几个人好好聊聊。其实，这都是他在威斯康星时常做的事情。也许，因为他到华盛顿还不久，并不知道联邦调查局是多么热衷于他们的格言：“起诉方起诉，调查局调查。”几乎是未经考虑的，多尔跑到华盛顿这个政策制定圣地的外面冒了一次险。在海伍德县，他找到一个黑人教师，问他如何看待乡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很快，多尔竟发现自己会开车去偏远地区参加教会例会。第一次参加例会的晚上，他走进一个灯光昏暗的教堂，里面挤满了曾经试图投票登记的黑人佃农。在被叫到前面去以后，他紧张地说他是来自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今天是过来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出于好奇，他现场提问是否有人收到过驱逐通知。结果，几乎教堂里的每个人都举起了手。

此刻内心的震荡，多尔永生难忘。他久久地凝视所有人的脸，心下怀疑，怎么可能如此大范围地发生阻止黑人投票的驱逐？可当他从佃农手里拿到 50 张宣誓书时，他不再怀疑了——这些佃农都保留了驱逐他们的通知单，并且愿意公开做证。多尔又在县里多走了些地方，找到了其他一些愿意做证的白人。据这些白人证实，有组织白人团体目前已经得到法律意见，从而可以在不违反联邦法律的同时，阻止黑人选民登记。多尔迅速把近 50 个白人列为被告，在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他返回了华盛顿。他知道还需要联邦调查局的配合，还不得不讲一些政治上的官僚语言。但不管怎么说，这一行他是开了新眼界，这几天的收获比收集成千上万页备忘录还要多得多。此后，他开创性的标志便是在行动上部分地把自己当作一名 FBI 的特工。像鲍勃·摩西一样，多尔作为自己的“工作队”也被卷入南方农村的民权活动中，这将可能使他再也回不到威斯康星的家。

劳动节后的星期二，3.5万名焦虑的全国浸信会（NBC）教友涌进费城议会厅，参加会前音乐盛会。这次大会被誉为本年度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黑人室内集会，其人数之多，即使按照NBC梦幻般的规模标准，也堪称壮观。全国各地的代表纷纷赶来见证金和J.H.杰克逊伟大的对决。这次的总裁之争，不是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竞争，而是金在1960年时合并党派力量的对决。许多年来，金一直在考虑挑战NBC总裁的事情，并且，自从1月份与合谋者达成协议后，他就一直在狂热地谋划着——这是一个传教士职业领域内可以采取的最大胆的政治冒险。如果能够成功，北方的造反者就会同意成立SCLC——唯一以教会为基础的民权组织——作为其“官方附属机构”。金坚信，通过争取制度化的黑人教会，他就可以打破渺小的SCLC严重的地方主义狭隘，避开和全国有色人种协会自相残杀的冲突。

当然，金并不是挑战J.H.杰克逊的候选人。他太年轻了，仅此一点，他就没有这个机会——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数量致命的传教士群体将会投票反对他。尽管埃比尼泽是一个强大的教会，但在派系林立的、体量如泰坦尼克般庞大的联盟里，它几乎不足为外人道。加德纳·泰勒是金推举的候选人，他名声在外，曾被白人牧师选为纽约州教会委员会主席。在布鲁克林的康科德浸信会，他那雷鸣般的暖人心的演说吸引了1.1万人的会众（在公交车抵制时期，金第一次到纽约之行向1万名群众讲道，地点就是泰勒价值250万美金的新教堂）。所有的传教士都知道，这场老杰克的政变并非无事生非之举，事实上，就因为之前对杰克逊略微不忠，已经有人被大会撤掉了州总裁的职务，并且还一度有几位牧师被送进了监狱。如果这次行动失败，每一个公开支持泰勒的都会被打上烙印。各种忧虑交织在一起，使得大部分的拉票活动都是隐秘和偷偷摸摸的，他们用暗语来代替“亚拉巴马”和“俄亥俄”。

玛哈丽雅在传教士的两个对抗阵营里始终保持王者一般的存在。作为福音女王，她相当大程度地人格化了大会的特性，她还是“一战”期间黑人沿密西西比

河搬迁至芝加哥的大迁徙的代表人物。她说自己是美食爱好者，人生旅程始于新奥尔良，在那里，她学会了烹煮短吻鳄的幼崽。到了芝加哥以后，她这一代的黑人教当地人建牲畜围栏，还教当地人做猪肉肠。在芝加哥，年轻的玛哈丽雅·杰克逊很快爱上了福音音乐之父托马斯·A. 多尔西。他们俩被圣公会诬陷说在教堂内“乱叫”、用野蛮的旋律贬低自己的种族、硬抢牧师的风头。杰克逊在她心爱的全国浸信会会议里闷声隐藏了20年，在这期间，她曾给小艾瑞莎·富兰克林换尿布，在音乐筹备会上认识了来自亚特兰大的金妈妈。后来，她对大会的政治见解发生了转变，同时，在1950年因为出场埃德·沙利文的电视节目而一举成名，最终，她以全国浸信会“官方独唱家”而成为浸信会机构里的名人。

玛哈丽雅决心保持现状以维持现有的生活，她成了金的知心朋友，但同时又是老杰克的忠实附庸。金在几周前的共和党大会期间曾住在她家。她的随行人员包括一名新律师昌西·艾斯克里奇。昌西第一次亮相就卷入了大会诡异的气氛中，以一系列教会服务为核心的大会从上到下涌动着激增的政治纷争。艾斯克里奇观察到她努力维护其中立性，从这名歌者身上，他学会了对什么人讲什么话才是安全的。发生在信奉个人崇拜的追随者们之间持续不下的争战，触及了深层次的宗教信仰、政治和种族信念，空气中弥漫着分裂的气味。秘书长T.J. 杰米森是杰克逊前任的儿子，也是1953年巴吞鲁日抵制公交车运动的发起人，还是金的老朋友，并且以抗议领头人的身份担任了金的第一位顾问。就个人而言，他相信泰勒和金代表和维护的一切，但是他还是痛苦地决定支持杰克逊，因为他的总裁野心必须得到杰克逊的倾力支持。于是，那些泰勒党的支持者放言，表示不相信秘书杰米森为总裁选举计票。

周三，全国浸信会费城大会受到了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戴维·劳伦斯的正式欢迎（劳伦斯曾受肯尼迪议员指示，在洛杉矶发表林登·约翰逊副总统的提名演说），第二天大会进行了总裁选举。周五，《纽约时报》第60页刊载了一则短小的电讯，这是当时唯一提及此事的白人报社。《纽约时报》说：“黑人浸信会选了

一个布鲁克林牧师。”其中还引用了加德纳·泰勒胜利演讲——选举会把国家浸信会“推到民权斗争的最前方”。这则短讯相当准确地陈述了泰勒党的政治希冀，但这与事件之间的联系极其表面。

大会上所发生的种种简直就像疯人院。周四早上，老杰克在众支持者的前呼后拥中进入会议厅参加事务会议时，引起一片哗然。欢呼声好容易渐渐平息，泰勒党又奏响了他们的声音，他们早就为此刻做好了准备，还雇了两个低音制服鼓手，以完全不亚于前者的气势，证明他们是不会被吓倒的。当杰米森要敲下槌子开始议事时，泰勒党提出要“清理议事厅”，目的是区分投票代表和观众，同时，各州点名选出总裁。出人意料的是，当杰克逊认可这些行动时，现场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到真正开始执行的时候，现场又再次欢呼起来。一些杰克逊党的人开始怀疑总裁是否要放弃竞选。但在随后，堪萨斯州分会的总裁出人意料地宣布，他领导的提名委员会发现杰克逊博士比泰勒博士更有见地，并一致同意推举杰克逊连任，他对大会采纳委员会的建议表示感激。这一刻，所有程序都停了下来，现场完全失控，赞同者的喝彩欢呼和反对者失望的呐喊声此起彼伏。疯狂的辩论家们辩论这项动议能否取代点名选举。

喧嚣之中，杰克逊命令采取行动，区分委员会提名报告和投票本身两件事。泰勒党大批涌向了票数显示台，低音鼓手也迅速就位。预选对手游行通过大厅，厅里到处是举着泰勒或杰克逊牌子的支持者。两个牧师和一个女人还在用前臂砸钢琴的琴键，会场上是此起彼伏的吼叫：“我们要杰克逊！”“我们要泰勒！”“清理议事厅！”“赫鲁晓夫！”这些声音间或高过震耳欲聋的噪声。杰克逊试图要求口头表决结束这次活动，但有人猛地拔掉广播系统的电源。站立在讲台下的记者后来写道，尽管距离杰克逊不到6英尺，但是他们完全听不到台上在喊些什么，而且除了持续整整一个小时的噪声，他们什么也听不到。在费城一名巡警的请求下，秩序终于恢复，代表们开始合唱《荣耀归主名》(Glory to His Name)和《主啊，站在我身边》(Oh Lord, Stand By Me)，但很快，刚开始议

事，混乱的场面又再次上演。最后，杰克逊敲了一下无声的木槌，然后出了会议厅，在一群白人警察的护送下回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酒店。

在他之后，杰克逊党的副手宣布杰克逊获得提名委员会的口头批准再次当选，杰克逊已经中止了今天的会议。接着，成千上万的人涌出议会厅，有人欢喜有人忧，分析着今天轰动的选举。会议厅里，泰勒党副手做出了继续会议的紧急决定，好像杰克逊的离开仅仅是发脾气而已。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名大会的副总裁——一名在总裁不在期间，能够代表总裁讲话的副总裁。泰勒党在混乱、嘈杂，以及对手的敌意中，挣扎着继续点名唱票，约莫3个小时后，最终统计结果显示：泰勒以1864票对536票赢得了选举。

在台下的金立刻站起身来，在平息了大众骚乱后，他开始了讲话。金公开同情泰勒党，提议选举泰勒党人担任NBC的官员。在这份精明的政治名单上，T.J.杰米森和其他一些顽固的杰克逊党被清洗，但有几个杰克逊党留了下来，以努力促进两股势力的和解。金的名单经唱票获得了通过，就在这时，加德纳·泰勒才进了会议厅。与此同时，杰克逊党的人也纷纷重返会议厅，意欲阻止下台的后果，他们不断叫嚣着，而此时胜利的泰勒站在台上，尽管支持他的牧师在为他鼓劲，却也一度被迫陷入沉默。一段时间后，J.H.杰克逊在杰克逊党的簇拥下也重返了议会厅。他设法回到主席台，一副要驱逐篡位者的神态，结果泰勒迅速抢过了麦克风。两个竞争对手在台上僵持着，互相死死盯着对方。这样过了足足几小时，直到十点半城市官员开始熄灯才结束对峙。金走出议会厅时对记者说：“人们以压倒性优势支持泰勒博士。杰克逊博士不愿意体面地放弃，这确实是不幸的事情。”有记者悲哀地指出，众多噪声制造者中，有几位代表野蛮敲打音乐会的大钢琴，而且这一行为竟累计持续近5个小时。

第二天，泰勒党的一队律师说服了一名美国地方法院的法官，签署了一份命令，要求上缴所有会议记录和钱财给正式当选的加德纳·泰勒总裁。几乎在同一时间，杰克逊的律师团通过另一联邦法官给加德纳·泰勒也下了禁令，要求泰勒

停止一切违背合法当选总裁 J.H. 杰克逊命令的行为。计划终止了，带有实际目标的第 80 届全国浸信会会议也比计划早两天结束。最终，没有传教布道，没有售出主日学校的一本书，没有精心排练的唱诗班表演，就连早早付费的酒店房间也是空无一人。但是两派之间的斗争在联邦法院持续了几个星期。两名白人法官显然是稀里糊涂地签署了互相对抗的命令，他们急切地寻求费城民事上诉法庭第一也是唯一一名黑人法官的建议。律法中没有适用教会纠纷的条例，所以，所有法官最终放弃了他们的裁判权。杰克逊保留对董事会、金库和大会财产的控制权，他愤怒并且决不屈服。昌西·艾斯克里奇回到了芝加哥，他很快认识到的是，在杰克逊的故乡，他通过浸信会牧师获得的法律业务正在枯竭。金意图通过借全国浸信会的权力用于民权运动的梦想，至少还要再等一年。

在巴尔的摩，经过近 10 年坚持不懈的谈判后，城市的白人和黑人浸信会人士终于走到了一起，共同讨论种族紧张局势下教会的作用问题。会议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一直争执不休的陌生人群如今平和地聚在了一起。为此，两个不同种族各自选出代表讲述共通的宗教历史。黑人牧师选的是弗农·约翰斯，他希望他的学识能够让白人教徒眼前一亮。约翰斯又是巴尔的摩某些白人牧师的间接雇员。他是马里兰州浸信会中心专门提供成人教育的黑人牧师，这个项目是由白人南方浸信会和全国浸信会联合主办的宣教计划。

在指定的日子里，150 名牧师在第七浸信会教堂一起吃午餐。无论是对座位安排、美食祈福、歌唱《耶稣让我靠近十字架》(Jesus Keep Me Near the Cross) 或午餐本身，大家都没有任何争议。但当白人牧师开始基督救赎的主题，讲到“在羔羊的血中洗净”时，弗农·约翰斯在座位上明显地抽搐起来。等到白人牧师刚结束，约翰斯腾地一下突然站起来。没等别人介绍自己，也没有按照计划热情地问候大家，他就高喊起来：“我对于南方白人教会失望的一点就是他们花所有时间想被钉上十字架之后的耶稣，而并没有去想耶稣死前的事情。许多黑人牧师的内心早已遗忘。”

约翰斯转向刚就座的白人牧师说：“你除了宣扬耶稣的死，别的什么也没了。”然后接着说道：“如果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那所有的神要做的就是周五降临，让他们直接杀死他，然后在复活节的周日吊起他。这就是你讲的内容。你根本就没怎么听说他3年时间里对人的教导。人的信仰在同胞的爱中显现，敬爱神而厌恶自己同胞的人是骗子，而且真理不在他那里。就因为这样，耶稣得罪了自己教堂位处领地的统治者，也得罪了来自罗马的殖民当局。这就是那些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原因。”

听众一个个瞠目结舌，许多人似乎要向后倒。约翰斯气急败坏地向听众迅速解释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还讲了另一个关于神如何斥责亚伯拉罕把陌生人从帐篷推出的故事。他接着说道：“世界上有一种差距，它存在于耶稣的理想和世人的实际之间。”他说：“但是耶稣没有疯，是我们疯了。教会没有正式谴责山上宝训，只是让它滑落。我只想讨论受难前的耶稣，我一点也不在乎耶稣受难后发生了什么。”

说完，约翰斯再次坐了下来。这番演说已经占了大部分时间，不像平常还有时间整理陈词滥调或开场的玩笑话。在场的每个人都涨红了脸，也没了食欲。就这样，巴尔的摩黑人和白人浸信会教徒临时的兄弟关系因为一个集体活动而就此被扼杀，而且约翰斯也被迫辞去马里兰州中心的职务。他再次回归游说讲道的生活。老人用生硬而不可取的方式为金在费城会议上支持的世俗宗教进行辩解，最终的结果同样是灾难性的。

对于没有直接参与的人来说，约翰斯的崩溃、鲍勃·摩西和约翰·多尔的旅程、全国浸信会的内战都是毫不起眼的事件。全国政治问题和宗教问题的焦点是总统竞选。一场争议爆发了，诺曼·文森特·皮尔和一群德高望重的新教牧师曾质疑允许罗马天主教进入白宫，说：“我们的美国文化岌岌可危！”肯尼迪议员在休斯顿发表了正式演讲，直接回应了这一挑战，他赞同“美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没有天主教士告诉总统（他应该是一个天主教徒）如何行动，也并没有新

教牧师会告诉他的教民投谁的票——没有教堂或教会学校获得任何公共资金或政治偏爱”。肯尼迪的休斯敦演说有效地将宗教问题在剩下的竞选活动中推入地下，结果它和同样爆炸性的人权问题关联了起来。两候选人都认为自己在会前承诺和正式政纲上过度扩展了种族问题。他们低估了9月26日肯尼迪—尼克松历史性4轮电视辩论中第一场的问题。两候选人都就国内事务达成一致，他们都认为美国是富有、强大、自由的国度，但是为了满足它自己，为了应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意识形态的威胁，它仍然需要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强大、更加自由。

民权人士对肯尼迪竞选工作人员的问题进行了低调和隐藏式处理。竞选指挥罗伯特·肯尼迪把他们安排在K街的办公楼里，独立于康涅狄格大道的国家总部以外。萨金特·施赖弗和哈里斯·沃福德要给分部命名为“民权办公室”，这在竞选团队内部存在很多争议。在肯尼迪兄弟的亲信中，科罗拉多州的律师拜伦·R. “离心机”·怀特最坚定地认为，这个名字对边际白人选民具有煽动性。最后终于达成了妥协。为了回报办公室名字的保留，沃福德和施赖弗同意在一次重大的、候选人也承诺到场的公共活动中，不使用“民权”一词。最后，他们的民权哈莱姆大会变成了《宪法》权利民主党全国大会。

对施赖弗和沃福德而言，两个黑人团体不合时宜的内讧——互相争夺文具特权、办公场所，以及与候选人公众场合露面机会的权利，这无疑进一步弱化了他们办公室的地位。一对夫妇自称他们通过和参议员肯尼迪谈及在玛莎葡萄园岛的度假屋，与肯尼迪建立了社交关系。然而，在知道丈夫是吉米·霍法的卡车司机工会的律师以前，罗伯特·肯尼迪就对这对夫妻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是“交际弄臣”。肯尼迪雇用了一名远离汉弗莱竞选的黑人律师，但新的人选也只是忙于与社会名流的鸡毛蒜皮的对抗中，直到在俄克拉何马州引起全面警报危机——曾有人看到他在中途将一名白人女士带上了竞选运动的飞机。这些事情没有哪一件能帮到沃福德和施赖弗。他们认为所有对手都是肯尼迪兄弟随意漠视的无效思考结果。黑人竞选工作人员也已经在巡回演说中离开了。

施赖弗很知道怎样吸引路易斯·马丁先来调节纠纷，然后将所有对手排挤掉。马丁是一名不同凡响的危机处理人，冷静、有趣而富有。他曾收购又再出售保险公司，曾在密歇根州创办了一份报纸，也曾为《芝加哥卫报》从事编辑工作12年，还曾主持黑人报业协会。从1944年起，他就开始参与总统竞选运动。施赖弗很是钦佩马丁的率直，所以，就肯尼迪阵营可能赢得黑人选票的最重要的一步问题，他请马丁给出建议。“作为报界的老人，我可能会先入为主，”马丁说道，“但我认为，你们追随黑人报界。他们因为斯帕克曼和基福弗是南方人就宣判了他们的政治死刑。如果你们不采取措施，他们将对林登·约翰逊做出同样的事情。而且，我知道，不给他们钱的话，报社绝对不会为你做任何事。”

这句话冷酷无情而玩世不恭，但句句击中施赖弗。他知道这正是民权人员更需严肃对待的事情。肯尼迪竞选的内部口号是“坚韧”。那些只顾理想主义或其他别的想法，而没有优先想到个中艰难的人都是失败者。施赖弗立刻意识到，路易斯·马丁在某种程度上了解黑人世界的内部运作方式，它可以有效传递给罗伯特·肯尼迪、劳伦斯·奥布莱恩、维泽·怀特以及其他参与肯尼迪竞选的其他人士。马丁知道通过购买广告位来安全地转账，而且他似乎也确切知道多少钱可以缓和一个编辑对林登·约翰逊的敌意。这些都是需要跨越种族鸿沟的领域，就连哈里斯·沃福德都感到迷茫。

施赖弗认为，马丁简直就是天赐的礼物。从跟马丁谈论竞选工作那天起，施赖弗就没踏实过，直到说服他到华盛顿才算好了。“我会给你弄到钱的。”他许诺说。新来的员工及时赶来解决芝加哥威廉姆·道森这一微妙棘手的问题。他是黑人议员的教长，而且，经由芝加哥市市长戴利的推荐，罗伯特·肯尼迪还任命其为竞选活动的名誉主席。道森上任第一天就抱怨公民权利这个名称攻击了“我们善良的南方朋友”，因而拒绝上班，直到K大街的办公室升级到适合他的身份才算完。这让施赖弗和沃福德陷入窘境，作为白人，他们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有着良好社会人脉的黑人，而且，这个黑人在种族问题上比他们两个还要保守。马丁

说不用为道森的事情发愁，他只不过是戴利政治机器里的一个老朽政客而已。听了马丁的建议，他们给道森专门设计了私人办公室，又称“汤姆叔叔的小屋”。只要不是正式场合，就把道森一个人晾在一边。

路易斯·马丁也并非总能创造奇迹，比如他就未能劝服杰基·罗宾逊支持肯尼迪。正如几个月前肯尼迪议员担心的一样，这位当今在世界最广受爱戴的黑人在9月初宣布支持尼克松。他甚至走出来全职为共和党竞选拉票。在肯尼迪竞选阵营内部，这件事是一场灾难，因为它夺走了候选人身边顾问的关注。对他们而言，罗宾逊之后最重要的支持者是亚当·克雷顿·鲍威尔。自洛杉矶的共和党会议后，议员鲍威尔就一直开着游艇在地中海巡游。其间，黑人媒体言之凿凿地传言他正准备和第二任太太歌手黑兹尔·斯科特离婚。近两个半月的地中海巡游期间，鲍威尔发回无线电报，指使他的使者与肯尼迪的人开始谈判。密使径直找了萨金特·施赖弗谈判。施赖弗一下意识到这是需要支付现金酬劳的。肯尼迪高级助手们仓促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最后一致决定把谈判的事情交给路易斯·马丁来处理。

鲍威尔的使者雷·琼斯提出协定，用30万美元现钞购买完整的、全国性的鲍威尔组织完成黑人投票，前提是必须先付款。马丁听后放声大笑，似乎在提醒琼斯，他不是在与那些轻佻的白人新手谈判。马丁知道永远不会有什么全国性的鲍威尔组织，这笔钱无非是入了鲍威尔自己的口袋，这个计划不过是个精心策划的骗局。他和琼斯之间的关系迅速变成了强硬而对抗性的关系，使他们达成了50万美元鲍威尔做10场背书演讲的初步协议。结果，暂时的僵局又再次出现：如果鲍威尔先行演讲，琼斯不相信肯尼迪方面会如约付款；而如果先付钱，马丁又不相信鲍威尔会如约演讲。最终，纽约市市长罗伯特·瓦格纳充当中间人，这才解决了问题。肯尼迪的姐夫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付钱给瓦格纳，然后瓦格纳在鲍威尔每完成一次演讲后支付5000美元。马丁与鲍威尔最后一次联系时，试图劝说鲍威尔在大选后再公布离婚消息，但是鲍威尔只答应延期至他为

肯尼迪第一次演说之后。

鲍威尔在从地中海回程的途中批准了这个安排。这一切都发生在为期两天的哈莱姆宪法权利全国大会之前。大会于10月11日召开，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埃莉诺·罗斯福和400位民权领头人聚集在一起，就如何处理民权事务的问题，他们要准备一份报告。参议员肯尼迪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本应在布朗案裁决6年后召开这样的一次大会，他的话引起了一阵欢呼声。接着他宣布了大胆的竞选承诺，要以总统行政命令结束联邦住房补贴的种族歧视。他还强调：“就是签字的一瞬间！”在现场的欢呼声中，他陷入了一时的快感，而后宣称，种族自由是美国的观念，不是俄国人的。他高喊道，非洲没有小孩叫列宁、马克思或斯大林，或者，就那件事而论，也没有孩子叫理查德·尼克松。现场一片同意的呐喊。“但有孩子叫乔治·华盛顿，”他继续说，“也有孩子叫托马斯·杰斐逊！可能还有一对叫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的情人！”

“杰克，注意点！”鲍威尔从后面大叫，场下哄的一声笑了起来，这是在笑话鲍威尔花花公子的名声。10天后，鲍威尔离婚的公告成了黑人媒体的重大新闻。肯尼迪的顾问们迟迟没有发布民权会议上承诺的报告，而更出人意料的是，金进了监狱。

金错过了纽约的会议，因为他要参加SCLC的理事会年会，这次的会议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召开。这标志着SCLC已经连续3年在密西西比或路易斯安那州附近召开年会。巧合的是，在这第三年，密西西比当局给黑人传教士一个坏消息。克莱农·金因为申请入读密西西比大学而被关入精神病院两年后，也就是莱德·肯纳德·克莱德离开招生面试处、被逮捕于密西西比州南方学院的住所一年后，哈蒂斯堡的警察以肯纳德偷窃为名对其予以逮捕，随后，警察在肯纳德的谷仓里发现了5袋鸡饲料。年轻的黑人男孩招认了他偷盗和私藏赃物的行为，但声称这都是肯纳德的主意。基于证词，黑人男孩最后被判缓刑，允许保释。他又重新回去工作了。由于麦格·艾弗斯公开抨击审判是赤裸裸的陷

害，肯纳德的刑期缩短为7年。因此，重刑犯的他不能申请到密西西比任何一所高校就读。

在亚特兰大，金发现自己承受着3个方面的压力：学生们希望他加入静坐示威；他父亲和很多本城的黑人领袖则希望他能支持尼克松；哈里斯·沃福德和路易斯·马丁等其他人则希望他支持肯尼迪。弗兰克·西纳特拉也是这样想的。所有这些压力在10月的SNCC会议上同时向他压了过来。10月14日，SNCC在亚特兰大摩利亚浸信会教堂举行，有超过200人参加了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金在会上做了非暴力哲学演讲。贝亚德·拉斯廷原本也要进行演讲，但学生们取消了对他的邀请，这是因为AFL-CIO官员威胁，如果拉斯廷出席会议的话，他们将取消资金支持。拉斯廷争议成了那个周末最充满敌意的内部问题。摩西的通讯员简·斯坦布里奇竭力争辩，她认为动机与自由结社的原则不相干。她的意见因为资金对大会的必要性而遭否决，于是她退出了SNCC以示抗议。拉斯廷因为当面被拒也退出了大会，这是夏天被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威胁一事后的雪上加霜。在未来动荡的3年里，他对金、对南方运动都已经无事可做了。

阿姆奇·穆尔从密西西比赶到并提出了新想法，他建议非暴力SNCC学生在密西西比安营扎寨，为黑人选民登记。他只得到了礼貌的回应。无论如何，登记注册工作寂寞而抽象，它被淹没在群众游行的兴奋情绪中。戴安·纳什提出了反种族隔离机构纳什维尔行动计划，主要内容是针对种族隔离的商店、餐厅、剧院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开展一系列活动。詹姆斯·劳森无情地压制学生们深化他们的非暴力承诺，认为他们已经挥霍掉春天走出监狱以来“最好的时光”。“与其让大人们四处奔走寻求保释，还不如坚持让他们奔走呼号，尽快终结导致我们入狱的体系问题。”他宣称道，“如果历史再次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那一定要牢牢把握住！”

劳森再一次影响了学生们，他的影响力与金的相比毫无二致，甚至略胜一筹。他那篇“进监狱，不保释”的演说创立了一种先锋精神，它长久地影响着金

和亚特兰大学生运动领军人们间的关系。在亚特兰大大学楼里，他们充分汲取南方黑人学生最大和最受尊敬的凝聚力，但是他们渐增的抗议与其他地区的非暴力抗争相比，似乎还是微不足道。他们仍然只有一天的监禁来提高声誉，但这个行动并没有取得废除种族隔离的胜利。鲍勃·摩西发现，亚特兰大学生的组织无可挑剔，非暴力的抗争装备精良。他们收集了大量的双向无线电、防弹衣还有防雨水的压膜纠察标志，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打破自身的禁忌，他们是一群精英，但在同一时间里，身份变化所带来的判断标准却令他们不舒服。

亚特兰大学生领头人恳求金加入目标为入狱的静坐行动，因为金的现身将是实力的提升、是头条新闻的保证，是仅凭学生行动所不能企及的强大政治压力。金自己 29 岁的弟弟 A.D. 正在莫豪斯学院努力完成学业，现在也向他提出了请求。一同请愿的还有朗尼·C. 金（与金没有关系）、斯佩尔曼学院院长、亚特兰大学生运动联合领袖赫希尔·沙利文。发出请求的还有一个人，就是伯纳德·李，李曾经被亚拉巴马州驱逐的经历使他成了英雄，在转入亚特兰大莫里斯·布朗学院成为高年级学生后不久，学生们就选举他为主席。

金一时间被骄傲、恐惧和政治几股力量吞噬了。他告诫说，如果加入行动，那么公众的注意力都将从学生转移到他自己身上。更糟糕的是，一些重要的民权领袖很可能不再帮助学生团体，只因为学生们和金走得太近。他说，现实就是这样，也许他们应该像 SNCC 领袖经常建议的那样，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学生们反驳道，亚特兰大是金的家乡。里奇是城里最大的百货商场也是这次运动的首选目标，也是金和父母还有埃比尼泽会员们一直购物的地方。亚特兰大最宝贵的财产之一就是里奇的赊货牌，学生们鼓励黑人放弃对里奇商店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不行，学生们说，金永远不能是里奇商店的入侵者。因为里奇是亚特兰大的象征，是南方希望的象征；而金则是黑人希望的象征。

“好吧，也许我应该做这件事。”金说道，可他自己也并不确定。学生们在家里、在埃比尼泽以及 SNCC 会议和间歇的时间，对金软磨硬泡。当他离开镇上

要去做演讲时，一行代表团跟随至机场，起飞前，他们一直和金挤在机场中央大厅里。金从抵制运动开始便认识的 FOR 分会秘书格伦·斯迈利，刚巧也经过机场，只不过是去往另一个方向。结果，他刚好看到金被 6 名学生围堵的情景。金双手捧着脸，快被逼哭了。斯迈利赶快插进来打招呼，而在航班起飞后，金才算是脱了困。

华盛顿，离总统竞选只剩 3 周时间了，压力落在了路易斯·马丁和哈里斯·沃福德身上。肯尼迪的竞选阵营在整个种族问题方面，在尼克松竞选的搭档亨利·卡伯特·洛奇身上拿了不少分。洛奇跟在肯尼迪后面赶上了一次哈莱姆集会的潮流。他既承诺又预言地说，尼克松政府会任命一名黑人内阁成员。肯尼迪参议员立刻反击说这个声明“是最严重的种族歧视”。他和林登·约翰逊各自承诺，肯尼迪政府在内阁成员的任命上不会考虑种族或宗教背景——他们只看“资格”。尼克松副总统也公开表明了同样的立场，也算是对洛奇言论的温和斥责。近两周的时间里，洛奇陷在这件事的争议中无法自拔。尽管这个插曲让肯尼迪得分，可归根结底，白人选民才是关键，而这正是沃福德和马丁畏缩不前的现实原因。洛奇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提供了一条攻击共和党的安全之道，那就是共和党过度同情黑人。

沃福德和马丁在研究一个对黑人旁敲侧击的方法。马丁在办公室里的口头禅是“让我们把所有的马拉上赛道！”——报纸、有色人种协进会、教堂、鲍威尔以及黑人名人们。金是完全不在肯尼迪跑道上的一匹马。沃福德和马丁致力于与金达成协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尽管金告诉他俩自己不会正式表态支持任何一方候选人，但又暗示，愿意为肯尼迪的民权承诺说些好话，前提是肯尼迪能够做一点稍微引人注目的事情来证明它。其实，金早就有想法，他希望肯尼迪能来南方拜访一下，比如在 SCLC 会议期间。金说会议的地点很重要，因为黑人选民对政治的虚伪性很敏感。在法院裁决未执行、民权纲领未展示的时代，金和肯尼迪的会面无无论在纽约还是芝加哥都没有丝毫意义，可如果是在亚特兰大或蒙哥马利，

则意义不同凡响。

电话中，金和马丁以及沃福德讨论了不同城市的利弊和几个特别声明。这就是谈判的范畴了。两位肯尼迪的人清楚，他们将不得不向怀有敌意的上司们，并最终向候选人们推销他们的拟议交易，他们试图说服金妥协，把会面地点改到其他城市，比如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或者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城。两人认为肯尼迪的人对金属意的“无党派声明”不会过分在意——对于他们的老板们来说，选民只有两类，要么支持肯尼迪，要么不支持肯尼迪。如果金拒绝公开支持他们，那么他就应该灵活选择谈判城市。在协商时，路易斯·马丁警告金，大选前主要的民权示威会毁掉任何可能的协议。示威是肯尼迪竞选战略家们最憎恨的事情，他们绝不想让北方黑人选民感觉肯尼迪和镇压示威的南方官员站在同一战壕里。同时，示威也可能使肯尼迪与金这样的人接触，这也将是一个风险，它可能导致失去巨大的南方白人选民集团的支持。民意调查显示，肯尼迪很可能是100多年来首位丢掉南方的民主党候选人。

肯尼迪的压力也从好莱坞传到了金这儿。通过哈里·贝拉方特和克拉伦斯·琼斯的联系，金说服了弗兰克·辛纳屈、小萨米·戴维斯以及其他辛纳屈圈子里的艺人们，在1月份为民权运动义演筹款，地点设在卡内基音乐厅。肯尼迪从初选开始就是选用辛纳屈演绎的《深深的希望》(High Hopes)作为竞选歌曲。但是，由于金拒绝参加肯尼迪在加州的活动，在辛纳屈看来就等于拒绝回报他的义演，因而不高兴起来。他通过萨米·戴维斯给金传话说，如果他冷落辛纳屈的朋友、肯尼迪参议员，那他也别指望得到辛纳屈的帮忙。为对抗这种含蓄的威胁，斯坦利·利维森联合贝拉方特一起支持金的无党派承诺。利维森写信建议金“务必对萨米·戴维斯强调一点。既然你专注于争取南方的选票，如果你明确表示党派立场，那将大大削弱你所有努力的效果。有时，我认为人们太过看重你的人格魅力而不是把你当成一个领导者、一个承担数十年责任并引领巨大变革的领袖。弗兰克和萨米以及其他的人，既不是有大智慧的领导也不是道德楷模，所以

他们能轻易地做出决定而不需要高度的决策，或者站在你身边支持你”。

SNCC 会议期间，金收到了利维森的信，信中谈到了洛奇争议性的黑人内阁成员设想，也谈到包括金弟弟在内的、亚特兰大学生对金的纠缠——金巡回演讲回来时，学生们在他父母家里又一次堵住了他。他一边嚼着青菜（金妈妈的炉子上总有萝卜青菜），一边将面包浸到菜汁里，学生们则在一旁逼问，说他们 48 小时内随时待命，计划不等人。就在他们越来越过分之时，老金猛地冲进了厨房，满脸怒气地说：“M.L.，你不必去，这示威是学生们的，不是你的。”

像保龄球一样，学生们被老金一击全倒。金用他一贯的温和抵御父亲的观点，而且只要可能，他都会对父亲表示赞同；而当学生们围上来重新动员他时，他依然保持和原来相似的态度。在这期间，金接到了沃福德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沃福德认为可以在纳什维尔找到一个时间间隙，实现一次肯尼迪和金的会面。在他看来，纳什维尔对金“足够南方”又不“太过南方”，但结果证明，认为“太过南方”的是肯尼迪战略家们。南方政客们电话里震耳欲聋的吼叫导致纳什维尔计划的取消。上百的电话和无数善意的谎言后，沃福德再次打电话通知金，会面地点由纳什维尔改到迈阿密，时间定在第二天的下午或傍晚。金对这样的变更不是很高兴，于是，沃福德反复论证肯尼迪的观点——迈阿密是一个“南方腹地的城市”。虽然是这么说，但沃福德心中并没有多少底气，他说自己已经尽力了。

金仔细考虑了一下，然后对沃福德坦言道，他接受迈阿密的理由是，那里的一个学生运动与亚特兰大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可以互相呼应。“我愿意去。”沃福德回答道，肯尼迪的人肯定会对示威不悦，他们才不管金在不在那里。他认为最好不要告诉他们示威的事，不然那些人恐怕会阻挠迈阿密计划。金说他曾劝过学生，希望他们等总统选举结束后再举行示威活动，但他自己的心思不在这上面。沃福德表示理解，因为，金坚定的甘地主义公民不服从信仰，偶尔也会像阳光照耀在他这个为肯尼迪竞选活动紧张劳碌的公司律师身上。路易斯·马丁早就看穿

了这一点，他调侃地建议沃福德可以成为一名牧师。

“好，就这么定了。”金对沃福德说，“但你应该告诉肯尼迪先生，我必须给尼克松先生发个形式上的邀请。”

沃福德心沉了一下，问道：“你真觉得必须要这么做吗？”

金回答说：“是的，不过尼克松先生未必会接受，但我还是要给他这个机会的。”

金挂了电话，他好像已经给自己策动了一个安全的选择，他的政治声望将从坚韧不拔却又危险重重的抗议示威中超脱出来。学生们会生气，但如果是因为跟一个，甚至是双方总统候选人会面而错过示威，那么这就是一个能被学生们接受的正当理由。另一方面，老金也会因为儿子不参加示威而松口气，但又不高兴儿子向肯尼迪靠拢。

沃福德挂了电话，他觉得这个最新的转变是属于只要有可能，就应该直接向肯尼迪本人汇报的事情，因为肯尼迪的助手一定会拍摄照片，于是他决定照做。当肯尼迪正准备出发去迈阿密，沃福德看准机会挤出一两分钟的时间，以便向肯尼迪解释金同时给尼克松发出邀请的事情。肯尼迪立刻回答说：“见鬼去吧！要是尼克松够聪明，他肯定会接受邀请。如果他去了，我就会丢选票。跑南方这一趟，我的风险比尼克松大得多，但金借平等来骗我们。告诉他，我不去了！”

第二天，10月18日，星期二，老金和亚特兰大浸礼会的首领们联手将认可票投给了尼克松—洛奇组合。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市里最老的黑人——他们是在对“林肯的党”的忠诚中长大的，尽管有从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民主党不断浸入，作为社区里地位较高的商家，他们还是强化了自己共和党忠诚者这一身份。今年更有一个额外的因素促使他们以浸礼会保守派的身份与共和党联合：肯尼迪的天主教宗教信仰。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们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在一份支持共和党的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一天，在迈阿密，报纸的头条分别刊登了肯尼迪和尼克松在美国退伍军人

大会上的演说。尼克松呼吁，要对古巴共产主义“不可容忍的癌症”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而肯尼迪却指责说，尼克松对经济手段的偏爱说明他缺乏军事行动的决心，这个指责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掌声。“我从来没想过火线撤退。”肯尼迪说。他还嘲笑尼克松与赫鲁晓夫进行著名的“厨房辩论”时说的话：“你们虽然在火箭上比我们先进，可是我们却在彩电上比你们领先。”肯尼迪接着说：“我想我宁愿要一台黑白电视”。这话为他又一次赢得了老兵们的笑声和欢呼。

同样在那一天，亚特兰大学生运动领袖朗尼·C. 金打电话给艾比尼泽的牧师，为示威活动做了最后的请求。“你是我们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而且你又出生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他对金说，“如果你能来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对我们的活动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金问道：“L.C.，你们明天准备去哪里呢？”L.C. 回答说：“我会在里奇那座桥上。”金同意说：“好吧，明天10点我会在桥上和你见面。”他说完这句话，也就迈出了他深思熟虑后走向监狱的第一步。

第九章 历史的一枚卒子

80名示威者把手表同步校准，同时在第二天即10月19日的上午11点，在8个不同的种族隔离的商店要求提供服务。里奇公司的综合大楼横跨福赛思街，两侧以廊桥连接，其6楼的玉兰厅对购物的人来说是最优雅的餐厅。金的小组先是走进设在廊桥中的一个快餐店，被拒绝提供服务，但公司官员也没有让聚在一起的警察逮捕他们。然后，他们又坐电梯到玉兰厅。里奇公司董事长亲自出面，在未能说服示威者离开的情况下，他根据本州《私人房屋反侵入法》通知了警察，逮捕了示威者。

作为第一个被逮捕的唯一非学生被告，金当晚首先在法庭上面对法官杰姆斯·E. 韦伯（James E. Webb）发言，后被韦伯裁定为取保候审，保释金为500美元。“我不能接受保释，”金说，“我宁愿在监狱里待1年，或者10年。”在简短而紧张的法庭致辞中，金解释说他并不想坐牢，也不想“扰乱秩序”，但是他决定选择监狱符合一场运动的原则，这场运动的原则“远远超越”餐厅种族隔离和其他南方的风俗。他敦促法官撤销指控。在韦伯予以拒绝后，金被推搡出去，度过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监狱之夜。在金之后，35个学生也接二连三地被迅速送进了监狱。

新囚犯发现自己处在县监狱里一个特殊的牢房中，由黑人警卫看管和提供游戏、书籍以及电话信息，于是兴奋取代了紧张。第一顿牢饭——洋葱牛排——打消了他们特殊的囚犯享受优惠待遇的多余疑虑。本来，他们计划着赶快服完刑出狱，现在，这个计划在高品质的餐食的诱惑下已经不复存在，学生们意识到最坏

的时候过去了。他们开始把热情转向创建一个共同的饮食法，借此一起度过几周甚至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伯纳德·李热切地宣称要睡在金的上铺。他毫不掩饰开心地说，女牢房里的狱友宣称嫉妒男狱友有金相伴。对一般学生尤其是李来说，金就是一个特别奖。金和他们一起组织了监狱的常规生活——一起唱歌，一起研讨，对他们进行有关非暴力的简短讲道。李很高兴地发现，玩跳棋时他可以经常击败金，而金则会琢磨着棋盘，开玩笑地发誓说，要是能有一张台球桌，他立刻就可以再扳回一城。

牢房生活并不无聊，特别是每小时都有外面的新闻传进来，全都是他们的被捕如何吸引亚特兰大市内市外关注的报道。市长威廉·哈茨菲尔德举行了会议。亚特兰大警察局局长赫伯特·詹金斯表示，他个人关注这场示威。第二天，也就是周四，记者清点人数发现，聚集在种族隔离目标商店外面的黑人学生纠察员多达2000名，这一天，又有3名囚犯走进了牢房，其他22人进了市监狱。没有人当懦夫——他们全都没有保释出狱。

周五，监狱当局允许金和学生领袖举行一次媒体见面会，在采访中金平静地、几乎害羞地谈及他加入学生抗议活动的原因。“我必须实践我布道的言出必行。”他说。金骄傲地谈到狱友，其中有亚特兰大综合性大学的6名学生会主席中的5个，还有两个“大学校花”以及其他所有模范生。至于他自己的牺牲，金只提到造成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在年度预定的讲座旺季的收益损失。“我本该周日在克利夫兰。”他说。克利夫兰牧师对该事件为SCLC做出了7000美元的担保。

那天晚上，8500万美国人观看了肯尼迪和尼克松之间的第四场以及最终的辩论。受制于外交政策问题的协议，辩论成为美国政治上一个无法识别的里程碑，因为它突出了自“二战”以来生长在美国政府内部的隐秘成见。尽管后来坚持认为他的中央情报局简报并没有涵盖这个内容，但此时的肯尼迪批评共和党人没有确切地做到他们该做的事：通过秘密斗争来帮助古巴流亡者谋划推翻卡斯特罗。尼克松此前已经在帮助启动这项计划，但现在决定通过反对他自己的政策来保护

行动的机密性。他批评肯尼迪在辩论中对该运动提出了“可能最危险的不负责任的建议”。尼克松声称：“如果美国遵循肯尼迪指示的秘密战争，我们将违反至少5项不干预美国国家内政的条约承诺。”在整个辩论中，肯尼迪和尼克松暗语互相攻击，有时候双方都不尽解其意，而大多数的观众就被撂在了一边。至于广岛之前的曼哈顿项目，观众所知极其有限，而对中央情报局的了解就更少得可怜。

虽然参与肯尼迪的竞选工作，但哈里斯·沃福德对表面现实的反应几乎和他人一样，他发现自己很难赞同尼克松，因为那会让他不自在。电视辩论的第二天上午，沃福德在家里听到电台报道说三K党为了反对学生纠察员而在亚特兰大的街道上游行。此时，金正在县监狱度过他的第四天。沃福德作为金在亚特兰大市之外的少数朋友之一，他知道金有多么想避免这种折磨，也因此，他总是自责无法为金做点什么。冲动之下，沃福德开始往亚特兰大打电话，在他的联系人中，有一位名叫莫里斯·亚伯兰的著名律师，他同意与市长哈茨菲尔德谈谈让金出狱的事。

亚伯兰发现，市政大楼里的哈茨菲尔德正处于旋涡中心，来自于全国各地支持和反对金的电报每小时都在涌进来。警方官员纷纷冲进来报告说，白人和黑人纠察员之间爆发冲突的威胁日益严重。而哈茨菲尔德自己则在市议会厅和众多本市最具影响力的黑人领袖谈判，他提议，就市中心的所有商店废除种族隔离的议题，双方开始进行深入的谈判，并公开这样说，如果黑人出狱后，要在休战期间避免示威。亚伯兰从市长那里得知，问题的症结是金和学生们拒绝接受保释，并且只有撤销指控，他们才愿意出狱。这个立场让调停人哈茨菲尔德身陷官僚主义和种族政治的纠缠。作为市长，他可以安排对市监狱囚犯的撤诉，但金和其他人是因为受到州的指控而关押在县监狱候审，他对此没有管辖权。这种指控只能通过州的检察官或刑事诉讼的原告方，即里奇百货才能撤销。无独有偶，此时的里奇百货所有人理查德·里奇正湮没在恐惧之中，如果他让步，黑人会涌向他的商

店要求完全废除种族隔离，那就会把白人主顾赶到自己的竞争对手那头去。相对当前在丑陋的种族冲突中的暴露，这个命运还略微更糟一些。公司董事长告诉他说，只有用手铐才能把金和示威者赶出玉兰厅。一听到这个，里奇顿时就崩溃得直掉眼泪。

对于这种令人生畏的挑战，像哈茨菲尔德这样狡猾的老政客自有其最佳应对办法，那就是，在各方同意之前就宣布大家想要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法需要的不仅仅是些蒙混过关的瞎话，还带有政治风险。因此，市长正想办法避免承担这种事带来的所有政治责任。亚伯兰告诉哈茨菲尔德，他刚刚接到肯尼迪的竞选助手哈里斯·沃福德打来的电话。听闻这个消息，市长灵光一闪，他突然想到的是，如果他声明是参议员肯尼迪让他释放金，那他就能大大获益。这不仅能够以国家的重要性为名巩固当前的停战休战局势，使得州长范迪弗和其他民主党人难以公开指责，还能为肯尼迪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北部赢得黑人选票。哈茨菲尔德对这突如其来的灵感想得越多感觉越好。他不仅可能让他的城市从危险的令人尴尬的种族冲突中脱身也许还可以选出美国总统。

很快，亚伯兰从市长办公室打电话给沃福德，向其告知哈茨菲尔德的大胆建议。沃福德听后差点昏过去，这个建议令他更加强烈地感觉自己正身处肯尼迪竞选运动的政治外缘，艰难的个人经历使他很清楚自己的上司最不想做的事情，在南方种族冲突中跟金扯上关系。沃福德疯了似的恳求亚伯兰和哈茨菲尔德别动手，除非参议员肯尼迪赞成这个计划。他还提醒亚伯兰，他那天一早打的电话完全是私人性质而非政治性质。沃福德承诺他寻求肯尼迪参议员的许可，但是绝不乐意忍受进一步的戏弄。他只是半心半意地尝试去找那个正在堪萨斯州做巡回政治演说的候选人。然后沃福德再次致电亚特兰大市长办公室，报告称无法取得联系所以取消计划。这一次，哈茨菲尔德被敲了一记闷棍，急于找到解决方案的他一把夺过亚伯兰手中的电话说：“现在，哈里斯，我敢肯定，如果他采取这个立场，那将有助于他赢得全国那些还在犹疑中的黑人选票，所以我要去跟那帮人表

明立场，告诉他们是参议员肯尼迪要我这么干的，是他要我释放马丁·路德·金。他为什么要羞于承认呢？无论如何我都要释放金。”沃福德恐慌的电话又立刻打了过来。他向市长倾诉各种在竞选中向他砸过来的言论，他告诉市长，肯尼迪面临可能失去佐治亚州、南方，甚至整个竞选的危险，其原因就是沃福德自己与公民权利有牵连。哈茨菲尔德并不相信这些，但他向沃福德承诺，自己会跟肯尼迪本人取得联系。于是，哈茨菲尔德用沃福德的私人号码，往堪萨斯州打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去追寻肯尼迪的行踪。结果，他要么听到乐队在后台的演奏，要么听到警察说肯尼迪刚刚离开。最后，哈茨菲尔德放弃努力，他回到市议会厅，与老金等一干人继续谈判。压力之下，他在自己的停战条件后面援引了肯尼迪的名字。一名潜入议会室的记者迅速把肯尼迪参与其中的新闻发往全国。

很快，包括肯尼迪在佐治亚州的竞选战略顾问在内，愤怒的南方政客们致电哈茨菲尔德，他们要他明确解释民主党候选人是如何并且为什么会被拖进金的纠纷中的。在一番巧妙的掩饰后，市长致电沃福德并警告说：“现在，我知道我的运球比你预期的跑得远，哈里斯，我的孩子，”他说，极力装得随意，“但我需要一个腾跃的支点而你刚好给了我，所以现在我飞起来了。”哈茨菲尔德叫沃福德别让肯尼迪迫于南方州长的压力否认其声明。面对这个新的紧急情况，沃福德设法赶上了肯尼迪在堪萨斯州的飞机。他的报告令肯尼迪震惊——“哈茨菲尔德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然后就是好一阵诅咒和愤怒。皮埃尔·塞林格、肯·奥唐奈，以及其他高级助手签字认可起草一份保护肯尼迪的声明，后悔莫及的沃福德等着看他们会否叫哈茨菲尔德为骗子。结果，发表的声明含混不清，没有明确表态：“参议员肯尼迪指示，要为他就当时情况下的所有事实做出查询，并对正确做法形成一份报告。参议员希望最后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个处理办法达到了让新闻最小化的主要目的，几乎不会受到媒体的关注。

哈茨菲尔德试图在市议会厅把他的计划推销给黑人秘密会议，并以此来度过周六剩下的时间。在县监狱，大量紧急消息传进传出，金和学生们听到的哈茨菲

尔德的计划是他们先交保出狱，他则保证让州法院撤诉。金等人对此并不买账。执着于“进监狱，不保释”的口号，他们坚称可以在监狱里等到指控真的被撤销，或者等来对他们的审判。市长必须在还可以看得清局势的时候绕开最后的障碍。他命令无条件释放关押在市监狱的学生，发誓在周一上午把金和其他人弄出县监狱，然后宣布胜利。他说周一不会有黑人或三 K 党的示威，他也将会在同一天开始和市中心的商家进行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谈判。黑人代表团的发言人博德斯牧师对这个协议、市长以及城市都表示称赞，他告诉记者说：“这是我们在亚特兰大市举行的最好会议”，又补充道：“到天堂的最短路线是从佐治亚的亚特兰大市出发。”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哈茨菲尔德分别访问理查德·里奇和州检察官，并分别告诉他们，另一方已经同意撤诉。

第二天，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打着一一条印有粉红色大象的灰色领带，在布鲁克林 4 个不同的黑人教堂进行周日布道。洛克菲勒设法为共和党拉选票却没有提及理查德·尼克松的名字。把费劲的党派白热化问题留给他的牧师同伴杰基·罗宾逊。州长给他的“浸礼会伙伴”演讲哥林多前书的爱情诗。“我们要让爱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成为现实，”他说，“伟大的精神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博士发现自己今天在监狱里，因为他有勇气去爱，在美国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那天的东道主之一，老金的老朋友桑迪·雷告诉会众，他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会紧跟共和党人，尽管他对选单不那么满意。“坦白说，我们大多数人希望州长能够成为候选人。”

同一天，老金外出到克利夫兰宣讲洛克菲勒。他代替入狱的儿子为 SCLC 募捐者在 6 个地方布道，然后立刻飞回亚特兰大，为的是能及时在周一上午赶回到县监狱外面，加入等待释放囚犯的欢迎人群。

监狱官员通知黑人律师他们收到了法院拘票，将以其他指控关押金，顿时，危机感以新的形式回归。被人出卖的哭声响了起来。律师最终确定，拘捕令由邻县迪卡尔布的一名法官行使职权发出，该县是埃默里大学的所在地。之前的 5 月

份，金和柯瑞塔开车将作家莉莲·史密斯送到埃默里医院治疗癌症。那天，一名迪卡尔布警察截停他们进行查问——就像巡逻的警员发现人种混合旅游团时常做的行为。警官发现，金搬到佐治亚州已经3个月，但仍然在使用亚拉巴马州的驾照，于是，金被控不当驾驶的轻罪。法官奥斯卡·米切尔判处金12个月的缓刑监禁，并罚款25美元。现在米切尔法官要求富尔顿县把金收押，等候召开听证会，以判定里奇事件是否违反了他在5月交通案件中的缓刑条款。

金的狱友因这个消息而发起反抗。当监狱官员遵守哈茨菲尔德的协议处理释放的文件时，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宣誓要跟金同进退。他们指责哈茨菲尔德不守信用，以至于市长花了好一段时间才让他们相信，当他听到法院拘票时他跟他们一样难过。他怀疑这是州长范迪弗一方的政治阴谋，因为州长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自己曾亲自与肯尼迪参议员交谈过并得到保证：候选人“没有权威、意图或欲望”干预佐治亚州的刑事程序。尽管哈茨菲尔德在他自己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这个举动进行了反击，他的陈述也只是模糊地谈到某人曾以肯尼迪的名义敦促释放金，他也竭力说服愤怒的黑人不要放弃交易。他认为米切尔法官不会针对金，因为交通指控是极小的轻罪，而且在现在的里奇案中，这些指控都已经被撤销了。金的律师说迪卡尔布问题能快速清理掉，他可以找到一沓的技术佐证。为了安抚金的狱友，老金和其他成人领袖获准进入牢房演讲。“马丁会没事的”。老金说。金本人则亲自发表讲话，敦促他的狱友遵守协议。最后，当其他37人遗憾而平和地齐步走出监狱奔向自由时，他度过了第一个独自一人的牢狱之夜。

在夜间的静默抗议之后，周二一大早，学生们在富尔顿县监狱外面重新集合，等待因为米切尔法官的听证会而被转移到迪卡尔布县的金。一群白人神学院学生在亚特兰大负起了鼓励静坐的使命，加入安静祷告的人群中。当他们第一眼看到金时，他们希望尚存的不安瞬间就变成了冰冷的恐惧。金露面了，被两名迪卡尔布的警探押着，戴着手铐、脚镣，以及手镣。金被迅速地拽向警车推进后座

的一条警犬旁，学生们感到安静得可以听到镣铐碰撞的声音。警车扬长而去，留下无助的学生。金尽量不去看身边那条凶猛的德国牧羊犬，他觉得自己突然回到了差不多5年前在蒙哥马利首次被捕时的恐怖情景，当时对私刑的幻想让他崩溃。现在，既然他已经在玉兰厅给了白人当局一个小小的法律空子，那就将是他们而不是他来操纵他暴露于危险之中。

近200名金的支持者——包括城里的罗伊·威尔金斯，还有来自于亚特兰大大学的4名学院院长——挤进了米切尔法官的听证会。亚特兰大人对迪卡尔布县很陌生。比不熟悉更糟的是恐惧，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县官员最近已批准三K党游行穿过同一个法院的走廊。听证会弥漫着一种潜藏的种族暴力的气氛，求生的本能更适合于谋杀案的审判而不是交通案件。法务官杰克·史密斯要求严厉惩罚金，说金“没有后悔或自责的迹象”。金的首席律师唐纳德·霍洛韦尔提出了品德证人和一系列论据，但是米切尔一记敲槌，撤销了金的缓刑，并勒令其在州筑路队服苦役4个月，判决立即执行。震惊的观众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霍洛韦尔跳起来提出请求，对当前裁决和原始的交通判决提起上诉，在这期间可保释金。但米切尔法官否决了这个请求，他命令治安官的副手们把金带走。

法庭上情绪激动者如高贵的塞缪尔·威廉姆斯——莫尔豪斯哲学教授、牧师、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董事会成员，亚特兰大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纵身向前大声抗议不公。副手们把他按倒在地上，很快就把他扔进牢房与金关在一起。当威廉姆斯镇静下来后，他被带到法庭听米切尔法官的演讲然后获释。法官允许金的家人隔离探监。当金看到含着眼泪的妻子和姐姐克里斯汀时，他说：“柯瑞塔，亲爱的，你必须坚强。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个样子。为了我，你必须坚强。”他语带哀求，牢狱生活6天后的疲惫悄悄爬上他的脸。柯瑞塔崩溃大哭。老金心烦意乱至极以至于叱责了她。“我不会让你看到我哭，”她说，“我已准备好去战斗。”

金试着居中调停。“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这一次我不得不去服

刑。”他说。大家没再多说什么，家人不久就离开了监牢。柯瑞塔已经怀孕6个月，为了监狱里丈夫的第三个孩子，她也不能自怨自艾。

此时，市长哈茨菲尔德正努力使他的城市摆脱迪卡尔布诉讼波及外界的余震。他声明：“我已经对所有的新闻机构提出了要求，要在他们的新闻中明确报道。这场听证会不会发生在亚特兰大市。”另一方面，州长范迪弗的新闻发言人热烈称赞米切尔法官的决定。“我认为，最高刑罚对马丁·路德·金来说是为他好，”他说，“可以让他成为一个守法公民，教他尊重佐治亚州的法律。”在SCLC，怀亚特·沃克避开了黑人记者，他们都想知道他为什么不组织示威人墙以回应迪卡尔布县法院的判决。“局势太紧张。”他说，远离“主场”的操作太危险。

但是，沃克抢先于头条新闻用电话发出警报。眼下，他已经忘了党派之争、抗议，甚至种族隔离，他认为现在唯一的问题是金的生命。州筑路队充斥着凶恶残暴的囚犯和法官随意驳回的杀人犯。金必须被释放，否则他就会死在筑路队里。这是紧急消息，沃克和一群同事发给每一个他们认为有相当影响力的人。斯坦利·利维森致电律师、工会领导人、洛克菲勒的助手、政客等；哈里·贝拉方特致电每个认识的艺人以及总统竞选的双方助手——罗伯特·肯尼迪、萨金特·施莱弗、弗雷德里克·莫洛、杰基·罗宾逊。与此同时，唐纳德·霍洛韦尔赶紧准备一份人身保护令，指出佐治亚州法律不允许法官在轻罪案件中拒绝保释。这是不容置疑的法律依据，但金身边的人已经对法律失去了信心。

在华盛顿，哈里斯·沃福德对当天的警报做出了回应，他为肯尼迪起草了一份庄严的抗议声明。这份声明立即在华盛顿的竞选总部受到抨击，并被连线到肯尼迪正在做演讲的芝加哥郊区，不可避免的，接二连三打进来的电话在佐治亚州响个不停。很快，沃福德就听说州长范迪弗答应让金出狱，条件是肯尼迪对此事不发表公开声明。范迪弗想在佐治亚州释放一个信号，表明其清晰而强有力的种族隔离主义的决心；怀亚特·沃克描述为盖世太保的战术被他说得就像一个小

的战术演习。州长和他的盟友在肯尼迪竞选阵营的内斗中快速地赢了一个回合，而失败者哈里斯·沃福德那天晚上接到了肯尼迪参议员打来的不失时机的安抚电话。“我们最希望的是把金弄出来，不是吗？”肯尼迪问。

沃福德同意了肯尼迪的话。不过，当柯瑞塔不久之后打来电话，问她能否帮上忙时，他感到很痛苦。沃福德不能告诉她关于范迪弗的协议，他担心公开消息会使范迪弗违背他的诺言，而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其他好消息。郁郁不乐的沃福德下班后和路易斯·马丁出去喝啤酒，一起琢磨点子。他们想帮忙，但是必须确保他们不会被竞选政治绞杀。在这些束缚中，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一个重要人士致电柯瑞塔以示鼓励。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但他们会让他们好受一些。他们知道，假如他们能把姿态保持在引起白人关注的阈值之下，那么在政治上将不无裨益。如果不激怒范迪弗和他的盟友，那么肯尼迪竞选团队就可以在黑人选民中私下传话。

受到这一主意的启发，沃福德设法联系到他的老恩师切斯特·鲍尔斯。鲍尔斯当时刚好在家设晚宴招待阿德莱·史蒂文森，他欣然同意立刻致电柯瑞塔表示他个人的祝福，同时向她保证会尽己所能让金获得自由。他打完电话，并在史蒂文森走后致电沃福德，称他的电话振奋了柯瑞塔的精神。他告诉沃福德，目前唯一的障碍就是史蒂文森以互不认识不便通话为由，拒绝和柯瑞塔讲话，连问候一声都不愿意。鲍尔斯和沃福德对这位朋友的变化无常很困惑。这也许可以归结为政治慎重——如果肯尼迪当选，史蒂文森希望成为国务卿；又或者更有可能如沃福德所想：史蒂文森纯粹就是在黑人面前不舒服。这个特质是沃福德曾亲身观察到的，也是在大选初期史蒂文森被肯尼迪取代的因素之一。

午夜时分，各种电话还没消停，而迪卡尔布县监狱拥挤的牢房分好的床铺上，金和其他8名犯人已经睡着了。这时候一个声音把他吵醒了。“金，起来！”随后又多叫了几声，接着手电筒的光线直刺他的眼睛。金抓起衣服，踉踉跄跄走向辅警，然后被一声不吭地戴上手铐和脚镣。在黑夜回响的铁链撞击声中，金被

领出了牢房，推上了警车。当他问对方要把他带到哪里去时，谁也没有回答他，于是，他陷入了沉默。

霍洛韦尔在周三早上8点前致电监狱，通知当局他已经带着人身保护令动身前来。但他被告知已经不需要了，因为金已被转移到里兹维尔，那是个最安全的监狱。霍洛韦尔吓得直往后退。不到一小时，这个新闻就席卷了整个亚特兰大的黑人圈，警报电话再次出现。当柯瑞塔联系到哈里斯·沃福德时，她近乎歇斯底里。她说她刚接到金到达里兹维尔州监狱时获准打来的电话，他们毫无预兆地在深夜时分把他强拉出监狱。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沃福德带着最新的详细资料去找路易斯·马丁，这些资料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对范迪弗的信心。一再复述的里兹维尔新闻表明，黑人和白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分歧越来越大。镣铐、强硬的警察、法官的独断专行、夜间突然押运到230英里外的佐治亚农村，这一切都令所有认同金的人不寒而栗。那些更超然的人则把这起案件看作南方的无知，认为迟早会反转过来，对他们来说，金在什么时候、如何被转移到里兹维尔的问题就相对不那么重要；而莫里斯·亚伯兰认为，金在里兹维尔比在迪卡尔布县监狱更安全——沃福德本想在肯尼迪竞选阵营中激发新的关注，现在，这种漠然砍掉了他所有的努力。事实上，肯尼迪的助手们不愿给他回电话，因为那是避免他唠叨的最好办法。

沃福德致电自己的上司萨金特·施赖弗。最近，施赖弗正忙于家乡伊利诺伊州极为困难的选情，他想让商人为肯尼迪和约翰逊助选。施赖弗待在芝加哥，而候选人的随从就像风暴一样席卷而过。肯尼迪参议员在奥黑尔机场与50名伊利诺伊商人刚刚用完竞选早餐，就和他的顾问挤在跑道附近为他特别保留的套房里，等待坐飞机离开。沃福德打电话时发现施赖弗在那里，而施赖弗给他的关注，就像总统候选人身边最亲近的官员通常给予低层助手的那种关注。在紧急对话中沃福德脱口说出头条新闻——金被劫去州监狱，范迪弗不做人，柯瑞塔歇斯底里，竞选民权办公室电话应接不暇。他说他和路易斯·马丁已放弃让肯尼迪做

一个公开声明的想法，但他们脑海中有更简单也更少争议的主意。“要是参议员能致电金太太并给她祝福，”沃福德说，“那将会在全美国的黑人社区引起反响。他要做的很简单，只要说他挂念她并希望一切好起来。他要做的就是表示一点心意。他甚至还可以说他不了解该案件的全部事实……”

“好的，好的，”施赖弗急忙说，“你得给我一些有用的电话号码。”除了钱和宣传，有用的电话号码在竞选中是最珍贵的东西。

沃福德迅速说出哈茨菲尔德、莫里斯·亚伯兰，以及其他人的电话号码，他以为施赖弗是要给这些人打电话。“不，不，”施赖弗说，“没有时间打那么多电话。”“她在哪里？告诉我她的电话号码。”他记下了金在亚特兰大的家庭电话号码，把它放在口袋里，返回去挤到肯尼迪身边。

施赖弗等待着，希望索伦森、奥唐奈、塞林格、劳伦斯·奥布莱恩，以及肯尼迪参谋团的其他成员会匆忙走开去打电话或打字。他不想在他们面前提到沃福德的想法。即使他们当时不马上扼杀这个想法，那些喜欢猜测《纽约时报》会如何上演预期戏码的助手，也会对此不以为然——对于当天早晨头版刊登的金的新闻，他们认为平静的肯尼迪不可能做任何事情。终于，肯尼迪参议员说他不舒服，然后上床躺下。施赖弗趁机一个人跟了上来。他温和但又急切地重复着沃福德的主张，强调金在监狱的“糟糕的待遇”，以及金太太的崩溃情绪。“我认为你应该给她打个电话，杰克。”他总结道。

肯尼迪疲倦地从床上坐起来。“妈的，”他说，“这是件体面的事。为什么不呢？给她打个电话。”

施赖弗迅速地从口袋里掏出纸，拨了号码。于是，金卧室里的电话响了，柯瑞塔正在打扮准备约见莫里斯·亚伯兰。老金认为情况严重到需要一个白人律师的影响力，比如亚伯兰而不是霍洛韦尔那样的人，所以正要带着柯瑞塔出去。柯瑞塔接起电话，施赖弗说：“稍等一下，金夫人，参议员肯尼迪找您。”随后把电话交给躺在床上的候选人。

在打完招呼后，肯尼迪说：“我知道你一定很艰难。我理解你现在怀着孩子的心情，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惦记着你和金博士。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请随时打电话给我。”

“我真的很感谢你的关心，”柯瑞塔说，“我非常感激你能帮忙。”

这个电话只打了两分钟，柯瑞塔放下电话后立刻打电话给金妈妈，明白无误地把这个爆炸性消息传了过去，而施赖弗则在助手们到达之前从套房的后门偷偷溜出去，随后，肯尼迪参议员匆匆登上了飞机。

在里兹维尔州监狱，穿着条纹囚衣的金被单独监禁，直到看守人处理完他进监狱的相关事宜。他的存在已经引起了犯人的特别关注。一些黑人囚犯发信息提醒他；他们曾写信向他求教如何为各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提出上诉；其他的信息通知他说，会为他筹划一个绝食运动，但金劝阻了这个想法。

那天下午，他给柯瑞塔写了在监狱里的第一封信。开头是：“你好，亲爱的。”

“今天，我发现自己跟你和孩子们相隔遥远……我知道，要适应全部经历对你来说非常困难，尤其是在你怀孕的情况下。但就像我昨天跟你说的，这是我们必须为我们人民的自由去背负的十字架……我有信心相信，现在这个降临到我们家的极端的痛苦，会在小的层面上使亚特兰大成为一个更好的城市，使佐治亚州成为一个更好的州，也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只不过具体会好成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但是我有信心，我相信。如果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痛苦就是值得的。”

“……我了解到，这里的每个人，不论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都能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接待访客。我希望你能想办法过来……也请怀亚特过来。我有一些非常紧急的事情需要和他谈。请带给我下列书籍：《迈向自由》(Stride Toward Freedom)、保罗·田立克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第1卷和第2卷、乔治·巴特里克(George Buttrick)的《耶稣的比喻》(The Parables of Jesus)、E. S. 琼斯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喇叭和光环》(Horns



and Halo)、一本《圣经》、一本字典，还有我的参考词典，名叫《你的话语权》(Your Word Power)，这本书是一本红色封面的旧书，它可能在书房或者在楼上我的一个包里。同时也从我的文件里带来这些的布道：《人是什么》《三个维度》《死亡的邪恶》……还有收音机。”

“代我真诚地问候家里人。请告诉他们不要为我担心，我会适应一切的痛苦。希望星期天看到你。永远爱你，马丁。”

在去底特律的竞选航班上，肯尼迪参议员对皮埃尔·塞林格随意地提到，他从芝加哥给马丁·路德·金的妻子打过一个私人电话。这并不是一个忏悔也不是一个警告，不过，塞林格和其他人毫不困难地猜到是施赖弗绕过他们偷偷地塞了一些东西，那可能是烦人的沃福德促成的。塞林格非常担心，于是给罗伯特·肯尼迪打了无线电话。

大体上说，塞林格现在对沃福德的顾虑，正是肯尼迪的助手们所推崇的用大胆的、非正统的回旋腾挪来挖掘政治财富。竞选中的最大英雄是那个律师，他撬出了艾森豪威尔国务院的一份秘密调查，证明U-2事件以及古巴和刚果危机使美国的威望在世界各地下降。为了避免肯尼迪受到将机密情报用于党派目的的指控，律师帮忙把这个调查泄露给《纽约时报》，但要对方保证隐匿消息来源。然后，肯尼迪参议员引用《纽约时报》的新闻，自在地宣布要求公开该调查，并且对他所谓的“生存威胁”好一顿敲打。在竞选的最后一个月，肯尼迪制造的有关威望方面的头条新闻比其他任何方面都多。此刻，塞林格和他的同事担心的是，沃福德刚好借他是肯尼迪的人为由，把这些精明的策略运用到一个愚蠢的问题上。

这正是沃福德和路易斯·马丁所想到的。为了在竞选团队中保护自己，沃福德先致电柯瑞塔·金，告诉她最要紧的事：不经沃福德的同意，绝对不能把肯尼迪参议员的来电告诉任何记者。然后他和马丁开始把记者引向亚特兰大的一则新闻，巧妙并间接地提到亚伯兰和其他人知道那通电话却试图隐藏其来源。然而，

游戏突然结束，因为《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致电沃福德，问他为何柯瑞塔·金说没有沃福德的许可她无可奉告。（沃福德忘了告诉她，她不仅要听从他的指示，还要对这些指示保密。）沃福德耸了耸肩，然后给柯瑞塔回了个电话，告诉她现在可以说了。

在肯尼迪的华盛顿竞选总部，当听说记者们都盯上了这条新闻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强压住怒火致电萨金特·施赖弗。施赖弗说出了在芝加哥机场发生之事，此后，肯尼迪滔滔不绝地大骂和贬低，致使他们之间的家庭关系从此不堪重负，他说：“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搞砸了整个竞选。”他挂掉了施赖弗的电话，立马命令沃福德和马丁到他的办公室报告。

民权办公室接到了传唤电话，那简直就像是刽子手的呼叫卡。“嗯，我想你最适合去告诉鲍比到底发生了什么。”沃福德对马丁说。

“他说我们俩。”马丁抗议说，还试图想笑起来。不过他同意了沃福德的提议，毕竟，沃福德作为始作俑者已经暴露无遗。最终，马丁先沃福德几分钟到肯尼迪的办公室，希望舒缓紧张的气氛。

在刚才和施赖弗谈话中断的地方，罗伯特·肯尼迪在马丁这里续了回来。他平静的外表是个不祥的预兆，接下来便是一连串的诅咒。马丁等着开口为自己辩护，但他发觉肯尼迪的爆发与事实出奇的不沾边——他担任竞选活动的指挥官才13天，却已经有100万个难题压过来，他的咆哮其实是因为神经质的挫折感所致。“嗯，我们这样做的原因之一，”马丁抓住第一个插嘴的机会说，“他们借之前的无证驾驶的交通指控把金博士从亚特兰大带走。然后他们判他4个月的监禁，还不准保释，又在深夜把他弄去了州监狱。这些全部发生在一天之内。”

“他们怎么能这样做呢？”肯尼迪怀疑地问，“法官是谁？怎么可以对轻罪拒保！”

马丁断定肯尼迪可能忘记了金是黑人的关键事实——在南方政客抗议他们在金的案件中所受干预时，他们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这个细节。“嗯，他们就是这么

做的，”马丁说，“他们想把他作为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黑人来惩罚，以儆效尤。这就是它会在竞选中危害我们的原因。我听说杰基·罗宾逊想让尼克松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要把整件事归咎于民主党，并且谴责是民主党人搞的鬼。”说到这里，马丁收了口。虽然在他来的路上编造了这个杰基·罗宾逊的新闻，但据他所知，还真可能是确有其事。

肯尼迪停顿了数秒，然后说：“哦，该死的。”言谈中一句疲惫的脏话可以在好几个方面释放压力。

沃福德进来了，肯尼迪又开始叱责他不服从命令，把肯尼迪参议员推向爆炸性的政治争议。他吩咐民权办公室在竞选期间不准再惹出有争议的事情，不发宣传资料，不开新闻发布会，不玩小花招，不得搞出任何上报纸的事情。交代完毕以后，他匆忙地结束了召见。两人走后，肯尼迪叫助手约翰·席根塔勒开车送他去机场，他要赶飞机去纽约做演讲。在路上，他大声地说着自己的怀疑，他不知道该怎么做能把火力从牵涉金案的哥哥身上吸引开。暗地里，他对所有涉事者愤怒不已，除了参议员肯尼迪。席根塔勒劝他什么都别做。

那天晚上，肯尼迪的竞选飞机也在纽约降落。当候选人走下飞机，一个记者问他早些时候致电金夫人是否确实。“她是我的朋友，”肯尼迪说，其实他从未见过柯瑞塔，以后也不会见，“我关心这个事。”当他和记者擦肩而过时，记者听到他轻声地说他的阵营有个叛徒。

记者得到肯尼迪的确认后，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在第22页用两英寸的条幅指出，肯尼迪参议员曾致电金太太表示同情，而共和党的发言人说，副总统尼克松对金的案件不发表评论。《纽约时报》把它作为小新闻来处理，而全国大多数的主要新闻媒体给它的关注更少。在政治上，肯尼迪和尼克松的不同反应，正是沃福德和马丁曾经希望看到的结果，他们本来有机会在黑人选民中宣传这件几乎被白人忽视的事情。但现在，罗伯特·肯尼迪明确下了禁言令，他们只能遗憾地看着机会溜走。

那天早上，在亚特兰大，当唐纳德·霍洛韦尔驱散了强烈得多的悲观情绪，他大肆宣扬一个消息：米切尔法官改变了主意，他签署了一个金额为2000美元的保释命令。简直高兴得发疯的怀亚特·沃克突袭了SCLC的库房，租了一架私人飞机，拉上了拉尔夫·D.阿伯纳斯，并赶在其他3架装满律师和记者的飞机之前飞往里兹维尔。在3个不同的监狱待了八天八夜之后，金终于自由了，时间定格在下午3点46分。下午5点57分金的家人在亚特兰大城外接到了金的飞机。有记者第一次见到金，当他看到金的飞机降落并拥抱柯瑞塔时，他写道：“他看起来脆弱……不是柔软，不是天真，而是某种伤感。”

老金护送儿子上了一辆凯迪拉克轿车，车子大得足以容纳整个家庭，包括孩子们，还有克里斯汀的丈夫，几架飞机先后降落后，进城的车队上演了凯旋的游行。在回亚特兰大的途中，在富尔顿县边界，100名静坐的老兵在车里等着。一看到他们，金的大篷车就在路边停了下来。人们的快乐从车里满溢出来弥漫在公路上，大家唱着《我们一定会胜利》这首歌，一起乘坐汽车前往埃比尼泽参加一个自发的群众大会。金是感恩的对象，而老金则是这帮快乐满溢的人群的家长。他谈到上帝、勇气以及恐惧，然后选择那一刻公布当天早些时候他答应过哈里斯·沃福德的事：“我本想出于宗教信仰的缘故投票反对参议员肯尼迪，”他说，“但现在他会是我的总统，无论他是天主教徒还是别的教徒。在那样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的儿媳妇是需要勇气的。他有道德勇气站起来，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会把我所有的选票装在一个手提箱里，我要带它去找肯尼迪，把所有选票全都倒在他的大腿上。”

欢呼着的人群认可了老金的话，当拉尔夫·D.阿伯纳斯说现在是要“放弃尼克松了”的时候，人群再次喧腾。但是金自己，几乎很显然地经历了从监狱到政界突然转向的浓缩过程，他更多地谈到把监狱当作信仰的一种考验的个人观点。“我们必须掌握创造痛苦的艺术。”他说。关于总统选举，他说他永远不会让一个候选人的宗教信仰决定他的投票。

就在金乘坐的从里兹维尔飞往亚特兰大的飞机在机场降落时，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一档节目——《亨特利·布林克利报告》的主持人戴维·布林克利致电哈里斯·沃福德，他要验证一则通讯社消息——肯尼迪参议员的弟弟亲自致电米切尔法官以确保金的释放。沃福德否认了这一消息，他告诉布林克利说，这个说法简直是无稽之谈。在约翰·席根塔勒的命令下，竞选总部的新闻办公室也否认了这则消息。

当罗伯特·肯尼迪当晚打电话来核对时，席根塔勒告诉他那个新闻是谣言：“猜猜佐治亚州那个疯狂的法官在说什么？他说是你打电话让他无须交保即释放金。”

在电话线的那头肯尼迪停顿了好长时间。“他说的吗？”

“是的，”席根塔勒回答，“不过别担心。我……否认了。”

又一个长时间的停顿，肯尼迪说：“嗯，你最好……收回它。”让席根塔勒惊讶的是，他相当羞怯地承认是他从纽约给法官打去了电话。肯尼迪解释说，一想到一个法官徇私枉法的行为“搞砸了我哥哥的竞选，让国家在全世界面前看起来很荒谬”，他就一肚子气。

很快，席根塔勒叫来哈里斯·沃福德帮忙起草一份给媒体的声明，内容是关于肯尼迪致电法官的原因。这个惊人的消息让沃福德百感交集。出于个人角度和政治立场，他欣喜若狂的是，肯尼迪那激进的大转变可能就是导致金被释放的原因，但作为一名公司的律师和前法学教授，他强烈反对肯尼迪致电一个现任的法官，因为这种做法明显违反了诉讼道德。在电话中，肯尼迪试着找借口。“难道我们不可说我是在询问金博士的宪法保释权利？”他问。沃福德熬夜写了一份声明，语气在骄傲和道歉之间摇摆不定。

也是在当天晚上稍迟一些的时候，一个电话惊醒了在华盛顿的路易斯·马丁。“我是鲍勃·肯尼迪。路易斯，我特别想让你知道我今天给佐治亚州的法官打了电话，目的是想把金博士弄出来。”

马丁惊得从床上滚下来，就在那一瞬间清醒了。“什么？请再说一次。”他说。肯尼迪自己又重复了一遍。他从纽约的一个电话亭致电米切尔法官，表示任何一名体面的美国法官都会在日落前让金保释。

对于肯尼迪前一天还在长篇大论地激烈攻击，而现在却 180 度的大转弯，对此，马丁决定不去追问原因。“你已经成了一个博爱的家伙。”他大声笑道。

次日早晨，马丁走进竞选总部举行发布会现场，听到肯尼迪的新闻发言人还在否认罗伯特·肯尼迪致电米切尔法官的消息。尽管《纽约时报》在那则有有关释放金的早间消息中把电话内容都登了出来，他们还在这么干，好在他们还不至于否认肯尼迪参加竞选。对马丁来说，这种混乱就是一天工作的全部。最后，新闻办公室拿到了沃福德帮忙起草的肯尼迪声明。伴随着金的释放，由于不再有引人注目的焦点内容，这件事很快就从全国白人报纸的版面退下。然而，它的余波却在黑人新闻中引起强烈的关注。《匹兹堡快递》把一个观察者的观点引为“普遍共识”，他说：“这些白人伙计现在让马丁·路德·金博士成为美国最伟大的黑人。”

在肯尼迪竞选的民权办公室，马丁和沃福德向施赖弗报告称，金的案子具有极度的敏感性，它在黑人选民中引起了惊人的“巨变”。因为罗伯特·肯尼迪自己打破了不准让案件牵连竞选的禁令，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寻求许可利用这个巨变。他们设计了明确的方案——利用肯尼迪对金一案的支持来大量吸收黑人选民，同时把白人选民的倒戈危险降到最小，并将其打印成小册子，然后在总统大选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在全国黑人教堂分发给众人。他们不登任何的报纸广告，就算是黑人的报纸也不例外，也不做任何可能渗入白人新闻的事。他们将建立一个牧师的“虚拟委员会”，这样可以掩盖小册子的来源，从而保护肯尼迪的竞选。小册子中将不会包括肯尼迪发言人的声明，事实上，它只包含金一家人以及黑人牧师们对肯尼迪参议员致电柯瑞塔一事的声明；它不会提及罗伯特·肯尼迪致电法官的事情；这本提议的小册子将被命名为《“无可奉告”的尼克松 VS 热心的

候选人、肯尼迪参议员》。

这本小册子作为巨大的赌注出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撰写、打印、装运并分发，肯定会妨碍民权办公室为了平衡竞选而做出的全部有计划的努力，但是马丁保证这可以做到。施赖弗面临着要在小册子和其他事情之间做出选择，他立即选择了小册子。此外，他命令沃福德和马丁不准跟罗伯特·肯尼迪提到小册子。施赖弗答应承担责任，还答应绕过竞选团队找钱。施赖弗的决定猛地把沃福德和马丁扔到后勤见证奇迹去了。他们的决定不寻求金对肯尼迪明确的支持，而是用了金发表的声明——他“深深地感谢肯尼迪参议员，是他的强大力量使我获释”。在紧急情况下，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大多数落在金身上的政治压力不是来自于肯尼迪或尼克松的竞选，而是来自于他自己的父亲。在与共和党黑人领袖的老卫兵闹崩后，他遭到严厉的批评——混淆政治与个人情感。老金像战场上的指挥官那样为他立场上的改变辩护，称这是唯一的光荣之路。肯尼迪对他儿子的好意，他认为需要报答，他还用“好心必有好报”这个牧师的古老法典来辩说。老金表明了立场，却烦恼了起来：他自己的儿子，一个接纳了善意的人，一个比他更倾向于肯尼迪的人，竟然拒绝加入他的行列。他儿子的一些顾问为肯尼迪工作，却敦促金在总统竞选中保持正式的中立，他被激怒得无以复加。老金不喜欢中立。在金获释后的那个周末，他截获了哈里·贝拉方特打来的一个电话，他拒绝让他的儿子听到任何来自纽约的愚蠢思考。“你就是不明白，”老金告诉贝拉方特，“你不能让一个人做着肯尼迪的事却不报答人家。”

“我同意，”贝拉方特说，“我的观点是如何报答。我不认为马丁应该永远做任何一个候选人的吹鼓手。他不该像个政客那样玩低水平的游戏。”

“在这些事情上你还太年轻。”金爸爸说，然后生硬地说了一句再见就挂了电话。

金周末飞到芝加哥，继续他的演讲计划，也顺便逃离来自家庭的主要压力。

当他回来后，他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他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其中解释说，他不能为候选人站台，因为“我在南方新兴的社会秩序中的角色，也因为美国要求我保持无党派……但是因为担心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我想清楚地表明，我非常感谢参议员肯尼迪在我被捕期间对我的真诚关心”。金的正式中立让老金不满，认为他太软弱，而他亲近肯尼迪的消息又被当作异端，打击了该市的共和党机构。几乎在金发表声明的同时，威廉姆·霍尔姆斯·鲍德斯和浸信会权威牧师，除了老金，都加入“坚决重新认可”尼克松的队伍。传教士们解释说，针对“最近在佐治亚州，特别是在亚特兰大市的政治发展”，这第二次的特别聚集是必要的。

那个周日，哈里斯·沃福德在华盛顿国际机场和肯尼迪参议员见了面，他要赶在候选人上飞机前快速处理业务，因为接下来就进入竞选活动的最后一周了。3周前在哈莱姆区决议通过了一份文件定稿，肯尼迪曾承诺签名发布给新闻媒体，但现在他直接问沃福德是否真的需要签署文件才能当选。沃福德承认决议可能是多余的，不用说，他有信心的主要原因是和金一案有关的那份新的小册子——当天印刷机印出了首次发行的5万份小册子，因为其廉价的蓝纸被称作“蓝色炸弹”。不过，对肯尼迪来说，这仍然是个秘密。

肯尼迪决定直到选举之后才发布民权承诺书。他把未签名的文件交给沃福德，说：“你可以把我和你一起记录在案。”然后，他背上他3岁大的女儿卡洛琳走向飞机。在路上，他只说那些沃福德曾听他在公开或私人场合下说过的关于金案的看法。提到老金在“手提箱选票”宣言中所说的话——投票给肯尼迪而不在乎他的天主教信仰，肯尼迪对沃福德若有所思地说：“这真是一个固执得要命的声明，对吧？想象一下，马丁·路德·金有一个偏执狂的父亲，”他笑着补充说，“嗯，我们都有父亲，不是吗？”

不完全巧合的是，在蒙哥马利，治安专员沙利文起诉《纽约时报》和金的4个SCLC同事诽谤的案件也在那一周开庭审理。阿伯纳斯、夏特沃斯、约瑟

夫·洛厄里，以及西伊坐在被告席上，旁边是哈丁·班克罗夫特和其他《纽约时报》高管。辩护律师已经禁止金出席法庭，甚至不准他在蒙哥马利出现，他们担心金的出现只会加剧陪审员的对抗，而金也的确没有到场。这场诉讼起源于静坐示威爆发后的亚拉巴马州伪证起诉，9个月后的开庭审理，完全效仿在里兹维尔监狱审判中金以傲效尤的惩罚。

当一个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被选中时，辩护就已经是预示不详的出师不利；随之而来的就是在法庭上因为“黑鬼”粗鲁称呼进行的激辩，最终原告律师赢了，他告诉法官他仅仅是遵循一生的发音习惯；蒙哥马利广告编辑格罗弗·霍尔以原告第一位证人的身份做证说，他虽然不是特别喜欢专员沙利文，但作为一个观察专家，他认为如果指控是真的，那么《纽约时报》广告中“盖世太保”的指控就会被大多数蒙哥马利市民看成是对沙利文的诽谤。在这一点上，《纽约时报》的律师团试图让霍尔承认，广告不仅没有伤害沙利文半分，反而使他成了整个亚拉巴马州的英雄。

这是一个奇怪的审判。双方都懒得去处理该广告声明的实质性真伪。双方同意，贝亚德·拉斯廷是罪魁祸首——辩护否认为拉斯廷所拟文字担责，原告称被告应该质疑拉斯廷关于亚拉巴马当局迫害金的断言。弗雷德·格雷以及《纽约时报》的律师团声称，他们的委托人是无辜的旁观者，不幸被拖进了拉斯廷和亚拉巴马州之间的纠纷；而沙利文的律师则声称，沙利文是北方强大利益集团的牺牲品。第三天，陪审团做出了有罪裁决，并裁定赔偿沙利文50万美元损失。沙利文和他的律师团摆出了胜利姿势的照片登上了南方报纸的头版，而辩护律师则向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蒙哥马利审判就像亚特兰大对金的审判，都沿着一个隐藏在民主政治内部的地质断层展开。存在于南方和执政党之间的可控种族冲突，有可能因为种族矛盾实现双方同时得利。在1940年的民主党大会上，国家民主党帮助富兰克林·罗斯福赢得了第一难对付的黑人选票，靠的竟然只是简单邀请了一位黑人牧师做祷

告。祈祷期间，参议员“棉花艾德”史密斯拂袖而去，直接回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家。受到英雄般欢迎的他在那里取悦人们，任意发表难听的演说，谴责北方人邀请一个“厚嘴唇、蓝牙龈、卷发的塞内冈比亚人”在约翰·卡尔霍恩的民主党面前做祈祷。现在，20年后，国家民主党希望金案中的两个肯尼迪电话可以得到在北方的黑人选票。同时，范迪弗州长和帕特森通过坚决反对黑人的行动，不仅提高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声望，矛盾的是，也帮助说服南方白人在总统选举中把票投给传统的民主党仍然是安全的。

每个人都知道，这些都是致命的不稳定的组合。尼克松和肯尼迪都没有公开提到金的被捕、沙利文审判或相关之事。事实上，在20世纪最紧凑的总统竞选的最后几天，他们越来越远离敏感事务，比如种族问题。相反，尼克松让他的秘密武器艾森豪威尔总统继续为他进行巡回演出，而艾克则在庞大的全国民众面前，用20世纪50年代的共和党的成就来打竞选的防守战。他宣布900万个新家园已经建成，高校招生增幅达75%，经济增幅达45%，一切太平。和尼克松一起，艾森豪威尔攻击肯尼迪面对国家在国际上的声望时“哀叹美国的实力”“无力地谈论相关的军事力量”，并且“绞着双手”。尼克松在累瘫之前，为他最后一天的竞选飞行了7000多英里，当他身处洛杉矶大使酒店总统套房时，已经筋疲力尽。

肯尼迪从加利福尼亚向东挺进，在那里他透露了一个计划：在全球贫穷国家中建立一支非武装的美国志愿者和平队。他警告说：“敌人现在通过非军事手段在前进。”在抵达康涅狄格州时，他说：“作为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我的观点是，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它必须变得更伟大。”对于即将来临的风暴，他反复引用林肯的话“我知道有一位神，我知道他恨不公”，然后飞到波士顿，最后，当他到达位于海恩尼斯港的自家大院时，也已经筋疲力尽了。

远离这些政治关注的孪生风暴，绕开竞选专业人士的注意，肯尼迪竞选阵营的“蓝色炸弹”通过教堂、这个黑人文化最有效的专用沟通“地铁”散播开

来——近 200 万小册子通过公共汽车、火车和飞机运送到教堂，历经复制和捆扎、接收和拆零，以及上万名牧师的称赞和发放。种族的界限使民权办公室很容易在其组织内部进行保密运作，但就算是保密者也不知道所有这些后勤秘密可能创造的奇迹。沃福德和施赖弗不知道，就算是路易斯·马丁一开始也只是隐约地知道，那就是他们主要的发放网络，几乎全部来自于全国浸信会的加德纳·泰勒一派，这个派别为了国家教会的控制权仍在与 J. H. 杰克逊进行着殊死争斗。肯尼迪的“虚拟委员会”位于费城——教会 9 月份在那里闹得四分五裂。加德纳·泰勒派的联合主席在 3 年前被 J. H. 杰克逊在全国大会上开除并送进监狱，而“蓝色炸弹”的封面代言则引用一段加德纳·泰勒的话。泰勒的全国电话装置被激活，专门用于应付肯尼迪一金的突发事件。

不是所有的泰勒派牧师都曾支持肯尼迪，也不是所有的杰克逊派牧师都曾倾向于尼克松。但是金在里奇案后被捕不久，杰克逊公开谴责静坐，说一些黑人“种族整合谈得太多，而种族提升却谈得太少”。这引起了所有人的特别关注。然后，接二连三的新闻传来，戴手铐的金被拖到里兹维尔，肯尼迪对此表示同情。这个突然的打击力剪断的不只是老金的共和党情结，还有大量黑人浸信会牧师内部的交叉关系。黑人浸信会内部的裂缝转向，加之潜伏在美国政治中的种族断层，于是地震的隆隆声响了起来。

萨金特·施赖弗和路易斯·马丁觉得 11 月 6 日星期天应该是“蓝色炸弹”大量分发的日子。两人待在芝加哥的家里，在竞选的最后两天疯狂工作。马丁告诉了施赖弗对他们工作造成影响的黑人教会争斗。那天早上他们冒险去了奥利韦浸信会，想了解信徒们在做什么。奥利韦浸信会是 J. H. 杰克逊的讲坛，在全市拥有的会众最多。施赖弗带着他的孩子们站在教堂入口处的街对面，看到所有的信众都拿着蓝色小册子，他惊呆了。正如预期的那样，带着小册子的信众并没有被赶出来。不知通过什么办法，他们事先就拿到了小册子，并且连同《圣经》一起带进教堂。他们拿着册子在杰克逊的教堂里称赞约翰逊的死敌，鉴于目前教会的

敌对程度，这就好像拿着《人权法案》进入克里姆林宫或拿着路德会小册子进入枢机团。

几乎所有经过的人好像都在谈论金的遭遇和肯尼迪的慰问。施赖弗突然意识到这本小册子触及了某种超然的东西，它超越了竞选阴谋和最痛苦的传教士政治。在异于自己文化的普通民众之间见证了这样一种无声的震颤，这让他感到敬畏，并感觉它在肯尼迪竞选活动中撼动着自己身边的某些东西。

金对竞选的参与并不积极。周一，他安适地待在自己的世界里，在奥本大街的布朗纳兄弟秋季美容诊所对 1500 名美容师发表演说。在选举日，《亚特兰大世界日报》最后一次敦促黑人投票给共和党。弗农·约翰斯的老朋友约翰·卫斯理·多布斯在头版声称，肯尼迪的波士顿和种族隔离的亚特兰大相比，黑人警察更少。他把这个不足归咎于天主教。多布斯说他不能理解的是，虽然执政党拒绝让“即使是沃尔顿先生或马丁·路德·金”这样的黑人成为政府成员，但怎么能因为这个原因就把票投给民主党呢？任何自重的黑人都该这样。

那天金本人未能获准投票。佐治亚州官员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裁定，是因为他在亚特兰大住的时间不够长。而亚拉巴马州的官员却说，在外地参加蒙哥马利的投票需要支付 1.5 美元的人头税，但现在也为时已晚。像两位候选人以及上百万昏昏沉沉的电视观众一样，金没有等到结果揭晓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拂晓时，选票统计还在进行中。已经清点出来的三分之一票数中，肯尼迪和尼克松的总票数徘徊在 48% 和 52% 之间。当参议员肯尼迪 9 点从卧室出来的时候，他的助手索伦森跟他打招呼，告诉他赢得了加利福尼亚，也因此赢得了总统选举。但实际上，索伦森说错了加利福尼亚的结果，但他说对了选举结果。在全国范围内，肯尼迪得到了 34 221 463 票，尼克松得到 34 108 582 票，肯尼迪以 0.2% 的优势领先。极小的改变——伊利诺伊的 5000 张选票和得克萨斯的 2.8 万张选票，将可能让白宫大门为尼克松而不是肯尼迪而开。

沮丧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这个结果是对他 8 年政绩的“否认”，因而深

受打击。艾森豪威尔首先指责亨利·卡伯特·洛奇不该对外承诺会有一个黑人内阁成员，说洛奇“对内阁的组成多管闲事”，他为此还私下里被气得直冒烟；他还说洛奇“让我们在南方，也许就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得克萨斯州，付出了成千上万张选票的代价”。不过很快，总统又反口说，尼克松竞选阵营对黑人选票的关心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最后他把失败归咎为约翰和罗伯特·肯尼迪给金打的“几个电话”。

在本能反应与深思熟虑之间，艾森豪威尔想到要在全美国范围内进行一次侦探，以搜寻1960年的选举秘密。似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乎决定性因素的私人理论——不管是芝加哥偷来的票还是尼克松第一场辩论时的化妆师。在众多分析师筛选的结果中，他们很快就发现肯尼迪之所以获胜，其最惊人的要素是在黑人选民中以40%领先。1956年，黑人对共和党 and 民主党的投票百分比大约为60:40。1960年，这一比例变为30:70，他们转投给民主党的这30%，让肯尼迪在一些关键州得到更多的选票，从而赢得选举的胜利，这些关键州包括密歇根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和卡罗来纳州。在大选之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思拉斯顿·B.莫尔顿宣布，他的党对获得黑人的选票太过想当然。

识别问题的关键要比解释问题容易。作为民主党在黑人中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肯尼迪以这样的身份进入选举年——当然比共和党对手尼克松更不受欢迎，因为尼克松的民权记录一般而言还是可信的。在夏天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于强硬的民权纲领这个最引人注目的争议，尼克松予以了毫不动摇的坚持；而肯尼迪则因为选择林顿·约翰逊作为他的竞选搭档激怒了黑人。竞选期间，两位候选人没有说过任何关于民权的过激的话。分析人员推测肯尼迪可能凭借其外表以及优雅的举止拉近了和尼克松的距离，但彻底击溃尼克松的，恐怕得恳求一个耀眼而神奇的力量相助。

在事后剖析期间，金的案子作为被忽视的线索一跃成为全国的关注焦点。大多数人都第一次听到传奇的追溯，肯尼迪那个“封在胶囊里”的电话，以及两个

候选人在民权方面不同反应的一再重述——肯尼迪对金的困境做出过反应，而尼克松没有；一些记者披露了肯尼迪小册子的精华所在；其他记者写消息澄清分别有两个肯尼迪电话——一个是由参议员肯尼迪打给柯瑞塔·金，另一个是由罗伯特·肯尼迪打给法官米切尔；《纽约时报》在竞选之后的一个月依然跟踪报道双方的情况，并公开了一份已经起草但从未发表的艾森豪威尔白宫声明，称金的里兹维尔审判“根本不公正”。

原来，尼克松的竞选团有很多人，比如总检察长罗杰斯、E. 弗里德里克·莫罗、佐治亚州共和党黑人等，其中有人曾恳求尼克松为金说话，但是尼克松拒绝了。当新闻报道金的里兹维尔审判时，尼克松正带着希望一路前往南卡罗来纳州——那里及南部腹地令他心烦意乱。尼克松对金这件事的反应是绝口不提金，并且在随行人员中隐藏了因司法部的投票权诉讼而不受南方白人欢迎的罗杰斯。对尼克松来说，不幸的结果是，他不仅仍然没能拿下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或亚拉巴马州，还在北方选举人票较多的州失去了太多黑人选票，最终惨遭失败。在后来的声明中，尼克松暗示艾森豪威尔的白宫要对未能发布司法部起草的声明负责任。尼克松说，这样一个有权威的间接的回应，其效应本来可以和肯尼迪的电话相抗衡，而且不会危及南方的白人选票。然而，他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他提到的声明起草于金从里兹维尔释放后的第四天，那个时候它已经毫无作用了。撇开政治和个人信仰，在华盛顿的尼克松竞选团队身上，紧紧束缚着致命的艾森豪威尔现政府的官僚主义，他们的行动依靠备忘录、信件，还有通行证，而肯尼迪的人只靠电话行事。

金的被捕案在政治史上臭名昭著，和这些事有关联的那些人，因为骄傲和其他人为因素而保持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肯尼迪的核心顾问团——那帮现实主义者反对所有介入案件的建议，事先谁都不知道肯尼迪的电话，也不知道“蓝色炸弹”——淡化了整件事的重要性。对于民权司的技高一筹，他们如此急切地需要否认那些愚蠢的投弹手，于是，他们固执并愚昧地认为，即使没有金案，“作为

经济问题的结果”，肯尼迪也会在黑人选民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与此同时，《亚特兰大世界日报》的经营者、坚定的共和党埃比尼泽成员们快乐地宣布尼克松赢得了亚特兰大的黑人选区，尽管那里上演过肯尼迪一金的戏码。编辑对这些选举结果给出了反驳的理论，肯尼迪热席卷了最熟知金案的黑人地区，结果更有可能表明：金在家乡受到的尊敬不如在别的地方多，有威望的共和主义在亚特兰大黑人区足够强大，从而挺过了最后一个选举。

莫里斯·亚伯兰和老金都对一个技术细节感兴趣——在这个国家，除了金以外，没几个人会受它影响，儿子正式拒绝、父亲同意支持肯尼迪。不论是策划背书的亚伯兰，还是声明支持的老金，都突然想到，省略或强调金的痛苦都不可能独自影响黑人选票，因为金并没有指示他的追随者如何投票。直到生命的尽头，老金都还把肯尼迪的胜利归功于自己的“满票手提箱”声明。

在华盛顿，事后才关注金的消息困扰了总统当选人，他担心，作为一个受过黑人选民恩惠的男人，这种新的感受会削弱他对这个分裂的执政能力。在选举期间，肯尼迪为了适应这种形象进行了调整，他宣称他的政府不考虑寻求新的《民权法案》，也不考虑在参议院支持挑战阻挠议事规则。这些做法稳住了他的南方支持者，却打击了罗伊·威尔金斯的热情，后者立即批评肯尼迪在上任之前放弃了民主政纲。

对于金案曾怎样影响他的胜选，总统当选人在公开场合不置一词。罗伯特·肯尼迪天生好竞争，但有一种忏悔的、自嘲式的幽默，他缺乏哥哥那种强硬而偏倚的讽刺。几年后他大笑着说，他致电米切尔法官是受到佐治亚州州长厄内斯特·范迪弗的建议，而当时的范迪弗是金最强势的政治敌人。这个揭露似乎不符合权谋政治家以及人道主义者对肯尼迪电话的解释，因为范迪弗畏缩于把金弄出里兹维尔的承诺，除非他说服了罗伯特·肯尼迪承担政治风险，那才讲得通。肯尼迪的动机仍然是一个谜，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楚。选举结束后，他对此事的公开评论反映了激烈的矛盾，如同人们质疑金案的离奇反弹关乎胜利与体面之间

的全部关系。一个记者问他，给米切尔法官打电话是否开心，肯尼迪的回答令人费解：“我当然很高兴，不过对于你所认为的让我高兴的原因，我却希望我不是为那个原因而高兴。”

在选举后的兴奋期，《时代》杂志记者西奥多·怀特费尽心思写了《总统的缔造，1960》。这本书销量超过400万册，引起了竞选报道的根本性改变，要不是借用美国总统的概念本身，它不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怀特通过他的中心论题——总统已经获得神圣浪漫的光芒——来表达战后的信心膨胀。他认为在现代革命的时代，可怕的办公室责任压倒了对于权力与皇室的传统美国式怀疑。“寂静，完全个人的寂静，围绕这种力量，”他写道，“寂静在白宫西翼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是最深奥的，当总统，不论有多少顾问，必须独自坐着。”怀特独创的用大写字母表示椭圆形办公室，横扫了多种语言的标准用法，成为现代美国的一种象征。

“60年代，约翰·F.肯尼迪的总统办公室，首先是一种智力训练。”怀特写道。他比大多数人更科学核实黑人选票，并把肯尼迪一金的电话作为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站在历史的大门口，剥离出一个开创性事件的关键，安然漠视那些与他自己的中心例证相反的事实，他几乎翱翔在论文中。怀特的庆祝没有为错误的判断、赛后的混乱留下空间，金的插曲磕磕绊绊地贯穿始末。他丢弃大部分来自施赖弗、沃福德，以及其他人的证据，把对金的同情描述成“神来之笔”。在谋求黑人选票过程中，罗伯特·肯尼迪的电话被其组织作为“指挥决策”来执行。怀特进一步评价金被捕事件中的斡旋是1960年的整个竞选中“对战略的最精确结果的反映”。最后，关于他对致电举动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描述，把所有事实展露无遗：“现在，决策不仅要顺次简洁而坚决地沿袭，而且组织要跟进决策的指引，组织的各个部分都要通过自己的磨合期，都要参加道路测试，要有完全相同的啮合效率，那种机器般啮合的嗡嗡声，让人宽慰地想到美国轰炸机机组人员飞出天宁岛和塞班岛的情形。”

许多令人不快的事物扭曲或模糊了选举关键的解释，实际上，选举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一种神话了的成年礼。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无处不在：给一个黑人牧师带来幸福的两个小电话成了民主党胜利的必要原因。这个事实既深深地影响了共和党县长，也同样影响到民主党市长；既影响到政治界的学生，也影响到十字军在民权问题上的两个面。如此小事却能以毁灭性的影响无声地鞭打黑人世界，并且见证不同文化的凝聚力和波动性。这一现象的核心不是哪个牧师，而是马丁·路德·金赋予它名字以象征性的共鸣，它回荡在公民权利的小选区内外。以前，金一直对大多数的大世界有一种好奇，因为在那些世界里有着令人不安而原始的意义。但也许，世界之大，在意义上其实只是从公交车最后一排到第一排的距离，又或者只是城市两端的距离。现在，作为一个历史的信号，一个总统选举结果的催化剂，他成为那些可能影响白人和黑人共同国家历史的人。

第十章 肯尼迪的转变

选举次日，在无数记者安营扎寨进行报道的海厄尼斯港内，正在打橄榄球的当选总统肯尼迪收到了英帝国老牌政治家的一封电报。温斯顿·丘吉尔在电文中说：“在您当选之际谨此致贺。”各种贺词随后纷至沓来，肯尼迪在应接不暇之际召集了一次家庭餐会，餐会来宾都在设想着肯尼迪家族会对整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一种颇受人支持的观点是摆脱中央情报局的阿伦·杜勒斯和联邦调查局的J.埃德加·胡佛，因为他俩作为根基极深的元老级官僚与肯尼迪的变革精神格格不入。当选总统对餐桌上的戏言颇为认同，不过第二天一早，他就表示有意继续任命杜勒斯和胡佛。随后在特勤局特工的护卫下，肯尼迪飞往棕榈滩度假去了。

在肯尼迪南飞之时，约翰·刘易斯及其两名同伴在纳什维尔“水晶”餐馆吃饭——这是一家处在快餐业雏形期的连锁店。当他们正吃着10美分一个的汉堡包时，一名情绪非常不稳的女侍将清洁粉和水倒在约翰·刘易斯等人的背上和食物上，但3名黑人仍然不为所动地吃着东西。刘易斯两小时后带着他的朋友詹姆斯·贝弗尔重返“水晶”餐馆，后者是纳什维尔学生运动的新领袖。他们要求与餐馆经理对话，但这一要求以餐馆正在进行紧急熏蒸清洁为由而被拒绝。经理将前门锁起来，打开熏蒸机后就从后门走了，而贝弗尔和刘易斯则被困在餐馆的熏蒸雾气当中。贝弗尔在两人被困期间平静地讲起了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从尼布甲尼撒王的熔炉中得救的故事。异常情况和飘出的烟雾很快招来了一辆消防车，一位黑人牧师恳求消防员破门救人，还有一名新闻摄影师抓拍到了两人在室内不断喘息的情况。就在此时，紧张的餐馆经理拿着钥匙回来试图大事化小，但他视黑人如害虫的态度，已经在熏蒸黑人的行为中表露无遗。对于贝弗尔和刘易

斯而言，这种事不过是司空见惯了的众多遭遇之一。

金既经历了肯尼迪令人激动的胜利，也感受到了贝弗尔和刘易斯所受到的莫大羞辱。他了解两个世界的滋味，对两类人也颇有洞察。在政府交接之际，金代表莫里斯·艾布拉姆强烈呼吁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任命他为首席检察官。此外，他还请求肯尼迪任命本杰明·梅斯出任民权委员会负责人或大使。在听闻佐治亚州参议员阻挠上述任命后，他撰写了数封私人抗议函。金在任命权方面所做请求并未产生效果，但协商本身就是一个崇高的新职责，这是他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从未企及的高度。

大选结束后，他再次横渡大西洋——这一次是作为尼日利亚政府的嘉宾，参加尼日利亚脱离英国统治的独立仪式。此后，他回到纽约参加了一次面向全国播出的电视辩论，就支持静坐示威与《里士满新闻》主编詹姆斯·J. 基尔帕特里克展开辩论。金有些焦虑地说：“整个美国今天都在关注着这场命运的交锋。我认为这些学生通过非暴力、直截了当和充满勇气的行动，以不失尊严的方式直面命运的挑战。”自布朗裁决后，弗吉尼亚州以其主权为名反抗联邦要求整合的命令，基尔帕特里克因拥护弗吉尼亚州的做法而声名鹊起，他硬说静坐示威潜藏目标是生殖问题——即全面的人种通婚。基尔帕特里克对全国广播公司的听众说：“我们认为保留过去 2000 年来对西部文明有重大影响的种族特性绝对有益无害，而推动种族通婚绝非保留种族特性的可行之策，这样只会使种族特性不可避免地受到摧毁。”除了生殖问题和文明问题外，基尔帕特里克还引用了大量过往针对静坐示威的法律禁令，并谴责静坐示威是“不良行为”的一种“粗野表现”。他采用的微妙花招之一是以第三人称称呼金，似乎金根本就不在场一样。金之所以从直播间离席，相信是因为无法招架基尔帕特里克或明或暗的全面攻击。

金回家后发现，父亲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百货店外示威游行——在大选前，市长哈特斯·菲尔德曾商定过一个暂停时限，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到期，老金与其他黑人长辈感到有责任向学生们坦陈，如果不通过示威施压，运动可能就会归于失

败——此刻，老金正手拿“吉姆·克罗必须下台”的标语牌，和他并肩走在游行队伍中的是摇滚歌手克莱德·麦克法特，这是一个不可能出现的组合，但变成了现实。很快，亚特兰大黑人社区包括性急的年轻人、大学生教师在内的几乎所有群体都加入了抗议队伍，甚至连共和党的中坚分子约翰·卫斯理·多布斯也来了。在政权交接时期，金和肯尼迪的人没能实现面对面接触，哪怕是私下接触也没有。金并未受邀参加就职典礼，而且他和罗伊·威尔金斯一样也未进入当选总统的私下邀请名单，因而失去了提出民权纲领的机会。金的名字在当时非常敏感，同时，正在进行的让南方政客大伤脑筋的示威活动也和他高度相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围绕着投票权与资金这两大尖锐政治诉求，金和肯尼迪之间的双方阵营或多或少地在渐渐靠拢。

怀特·沃克注意到，在不少激进的县，自由派慈善家正在扩大民权领域的慈善承诺，这被人视为一种制度危机。然而，对于获得大量资助的前景，沃克和金却报以急切的应对，他们很快学到了几个全新的词汇：拨款提案、筹资渠道、提前预算、项目评估等。在斯坦利·利维森鼓励下，他们在纽约与泰克尼克和菲尔德基金会负责人及其他人进行了会面，他们还和多位学院院长讨论，为因静坐示威被开除的学生设立奖学金。在汉兰达的迈尔斯·霍顿提议，希望 SCLC 接管赛提玛·克拉克蓬勃发展的民权学校，他不希望克拉克遭遇汉兰达可能消亡的打击。

在一个目标城市多方面攻击种族隔离的景象吸引了金和沃克——克拉克培训登记工人和老师、SNCC 的学生静坐示威、金的布道和沃尔的统筹。更直接地，金和沃克所乐见的是，一些有影响力的基金会官员深爱克拉克。因为如果他们通过 SCLC 赞助克拉克，他们也可能来补贴其他 SCLC 项目，比如急需资金的选民登记活动。

到 1 月份时，沃克成为几个奖学金基金会的中心，SCLC 正通过这些基金会为大量被捕学生提供教育支持。各种设施配置从赛提玛·克拉克的公民学校转移到了 SCLC，两个为选民登记集资的主要的提案也随之提交。同时，通过对罗伯

特·肯尼迪参选后的回顾，肯尼迪的人正寻求一种自上而下的选民登记策略。

民权选民的特点是摇摆不定、政治诉求低，但具有潜在的决定性。这就是金从大选时的电话事件中得到的教训，他的顾问们也非常精明地承认，这是隐藏在选举结果中的另一个迹象。费耶特县是艾森豪威尔司法部的约翰·杜尔为保护黑人而提起诉讼的田纳西州的两个县之一，在这个县里，1200张新黑人选票帮助该县共和党自重建以来第一次赢得竞选。共和党之所以对肯尼迪阵营取得压倒性优势，其原因被解释为南方黑人对帮助他们获得投票权的人的回报。对于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政治助手而言，形势决定了他们要有意识地采取一种“委派再委派，选举再选举”的策略——它出现在哈里斯·沃福德的一个政治备忘录中。

这种重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的想法是坚持指派黑人工作、登记足够多的黑人以渲染南方官员对立法建议更多的同情。这是一种长期积淀的政策，它不会造成过于广泛或者重大的影响，以至于触发种族隔离主义者对他们的反弹。如同选民登记一样，在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政策方面，肯尼迪家族计划在官司和登记运动中“一个黑人接着一个黑人”地解决问题。为此，一个友好的记者感叹时间不等人，他写道：“时间以年为计地流逝，但除此以外也不可能有其他策略了。”

哈里斯·沃福德不是部长，却也还属于肯尼迪的圈内人——虽然在这个圈子里涉足不深，但沃福德却是其中唯一能融合各种关系的人，这使他能同时帮助金和肯尼迪的司法部。在政府交接期间，他从金那里知悉 SCLC 想获得基金会拨款的野心，并向其推荐他认为能帮上忙的基金会高管们；接着，他告知一些基金会里的朋友，肯尼迪政府最有政治智慧的人已经决定推进黑人选民登记；最后，他告诉肯尼迪圈内的联系人说，金正为同样的目标寻求基金会的资助。这样一圈下来，他对金的帮助才算完成。

作为牵线搭桥者，沃福德发现，每一方都乐于听到另外两方的热情。让金的人高兴的是，神经质的肯尼迪方面决定在选民登记中“让事情办起来”；同一时

间，在联邦政府的隐性保障下，基金会的人对帮助新边疆和南方黑人的前景激情满怀；而肯尼迪的人则被这个不张扬却资金充裕的妙计所吸引。三方都知道，带倾向性的肯尼迪角色一旦引起公众关注，他们将损失巨大。

如同新政府在投票权这个敏感领域秉公行事的责任一样，税收减免和政治声誉正处于险境中。因此，探究性会议都在一种秘密的气氛中进行。在一个令人瞩目的干冷而积雪的日子里，约翰·F. 肯尼迪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讲。

肯尼迪就像狂风中的大力水手，用演讲为国家注入了一股能量。他的激动感染了金的同事。在伯明翰，静坐行动的刑事审判把黑人扔进了连续的危机旋涡中。弗雷德·夏特沃斯走进圣詹姆斯浸信会教堂每周举行的群众大会，他在讲坛上赞扬肯尼迪并且感叹道：“我们现在拥有一个多么棒的总统啊！”他的感叹提醒着人们，正是他和自由运动把肯尼迪送进了白宫。激动的夏特沃斯走下了讲坛，在会众中仅有的、特别显眼的两个白人男子身旁坐下。这位矮小而好斗的传教士热烈地握着他们的手。一番大惊小怪的欢迎之后，他饶有趣味地向大家介绍这两位警方谍报员——公牛康纳向所有群众集会都派遣了这类谍报员。“这是侦探琼斯，”他大声公布说，“他和其他白人选了尼克松。”夏特沃斯做了一个演讲，打碎了所有人对共和党的忠诚，他说：“艾克当了8年总统却从来没有为黑人做过什么，也从来没有一个黑人和艾克打过高尔夫球。”他把会议交给了一个牧师主持，后者开始热烈地宣讲《以西结书》中不忠枯干骸骨的内容，以至于十几人激动得不能自持。而传教士自己，最后要靠执事为他披上自己的大衣和戴上围巾才能平静下来。这是宗教狂热的老式仪式，只能通过摇滚明星（最出名的是詹姆斯·布朗）的表演介绍给白人青少年。

对于金自己来说，肯尼迪对于自由的理念与他有多大交集仍是未知之数。肯尼迪从未在他的就职演讲中提及种族隔离、民权或者种族。在一定程度上，这位新总统正用他的政治礼物呼唤自由，使黑人和南部的白人民众欢呼雀跃。金发现肯尼迪有值得令人鼓舞之处，因为他偶尔会谴责种族偏见是“非理性的”，

而且与艾森豪威尔相比，他看来更乐意与黑人打交道。肯尼迪在就职当晚和黑人妇女一起跳舞，并在就职晚会的讲台上把路易斯·马丁和他的妻子介绍给他的政治“家族”。

这些就是信号。当然，肯尼迪和金在明星效应上有交集。总体来说，肯尼迪的知名人士支持金，反之亦然。弗兰克·辛纳屈为肯尼迪监制晚会，并担任主角，带来了一个混合各种族的演出阵容，包括奈特·“国王”·科尔、杰米·杜兰特、玛哈丽雅·杰克逊、西德尼·波蒂埃、莱昂纳多·伯恩斯坦、艾拉·费兹洁拉、彼得·劳福德和哈里·贝拉方特。劳福德是新总统的妹夫，是辛纳屈的赌场狂欢党和制片“鼠帮乐队”的一分子，其出位行径使他经常登上小报和粉丝杂志。唯一没有出现在晚会上的成员是萨米·戴维斯。他近来与一名瑞士演员的跨种族婚姻使他和金一样，成为主流政治集会上的争议焦点。

刚好在就职前一周，辛纳特拉重新召集了一群名人，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搞了一场5个小时的演出向金致敬。萨米·戴维斯、迪恩·马丁、贝西伯爵、托尼·班尼特、尼普西·拉塞尔和其他受欢迎的艺人加入了辛纳特拉的演出阵容。尽管这场演出没有引起国际的关注，却为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筹集了5万美元，并使人们觉得金在名人中具有一呼百应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有雄心壮志的政客无法忽视的。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顾问们建立了厚厚的一沓备忘录，用于讨论洛克菲勒参与其中的要点。至于洛克菲勒可能因与辛纳特拉那帮张狂、小混混般的团伙扯上关系成为污点，这种担心已经被证明是多余的，因为鼠帮乐队“在大众眼中已经深深与杰克·肯尼迪密不可分”。顾问们认定洛克菲勒通过购买一个400美元的包厢票就可以脱身了，除非捐献者会按名字和类别列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出于政治考虑，他需要购买最昂贵的800美元的包厢。最终，洛克菲勒花了800美元。他还拍了一封亲切的电报到卡内基音乐厅，肯尼迪总统也这样做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金从纽约飞到芝加哥、费城和盐湖城接连演讲。在芝加

哥，他与马哈丽雅·杰克逊一起，后者正准备在他另一个欧洲之旅中为教皇若望二十三世献唱。他们参加了一个奢侈的南方黑人食品筵席，其间有消息说柯瑞塔已经开始分娩第三个孩子了。“你最好给他起名叫马哈丽雅。”杰克逊笑道。金忙着在宴席和电话之间来回穿梭，接收来自亚特兰大医院的消息，她就不断地这样戏弄金，以致金摆出了投降的姿态，同意让杰克逊或她其中一位密友给他的女儿起名。他说，如果是个男孩，就以之前在蒙哥马利的教堂命名，叫德克斯特吧。之后响了几个电话，他回来高兴地宣布：“他就叫德克斯特。”

1月28日，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新总统召开了一个不寻常的周六会议，内容是审议秘密入侵推翻卡斯特罗的古巴计划，这个最高机密禁止所有随从参谋知悉。五角大楼的领导人迫切要求更强的武力，以确保军事行动的成功，而国务卿迪安·拉斯克（Dean Rusk）迫切要求要么不行动，要么不动声色，以保护美国在全球的外交地位，免得被冠以非法入侵的罪名。肯尼迪总统不断表示过他希望一起取得两个目标——成功和匿名性。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提议达成此目的，必须放胆一搏和采取欺骗的行为。白宫一共召开了10场会议，最终导致了4月的猪湾入侵事件，1月28日的会议是第一场。尽管古巴指控由美国资助的入侵迫在眉睫，而且联合国已经对此进行了讨论和投票，由于政府未有战争的准备，这仍不是公众的话题。

在金的世界里，各处的改革者意图获取对他们自由计划的认同，而肯尼迪却决意隐瞒。2月1日，也就是首次格林斯博罗静坐的周年纪念日，詹姆斯·贝弗尔和他的学生群体宣布一项非暴力运动，目标是要在纳什维尔的电影院废除种族隔离。南方各地的其他学生群体正在准备“进监狱”的示威。据《纽约时报》回顾，当年的电影院、教堂和公共沙滩都挤满了人，黑人示威呈现出全民运动之势头。在伯明翰，面临60~90天苦役的弗雷德·夏特沃斯为这个判决提起了上诉。此外，因为亚拉巴马当局获得法庭准许，他们扣押了他的汽车，以此部分了解他卷入的沙利文案件的诽谤判决，为此，他又另外提起了上诉。除了夏特沃斯以

外，以涉及沙利文案件为由，亚拉巴马当局还扣押了其他 3 名黑人被告人的私人财产，包括阿伯纳斯的汽车和他继承的一些土地——汽车拍卖了 400 美元，土地则拍卖了 4350 美元。金对亚拉巴马官员这些无耻的迫害表示抗议，但是除了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外，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公众认为种族问题总体上是可以避免的。在肯尼迪总统的首个电视转播的记者会上，记者们并没有向他提到这方面的问题。

对于在肯尼迪就职后第二天，密西西比一名叫 J.H. 梅雷迪思的寂寂无闻的空军老兵的一封信，我们仍知之甚少。梅雷迪思在听了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后受到启发，他认为自己对于民主权利所能做的最大贡献是设法入读密西西比大学。他写了申请信，然后迅速找到密西西比的全国有色人种协会（NAACP）秘书梅加·埃弗斯寻求帮助。此前，两名黑人尝试入读密西西比的白人大学，却惨遭迫害，埃弗斯对这两个黑人的悲惨命运心痛不已，因此，他对梅雷迪思的抱负不为所动，但也意识到梅雷迪思为达成目标有着军人般的固执，于是埃弗斯让他与瑟古德·马歇尔在 NAACP 的律师接触。

当总统坚持委任他的弟弟罗伯特为司法部部长时，作为最直接负责民权发展的内阁成员，人们不禁为这名年轻的肯尼迪家族成员捏了一把汗。肯尼迪给各司法部门，包括民权司，发出了一条简短的指令“告诉我你在做什么”。由于上司已经辞职，作为留用的共和党人，只有 7 个月经验的约翰·多尔代表民权司做了答复。多尔刚有过一些成功的法庭经验，包括在田纳西州发生的驱逐黑人佃农案中，他曾说服法官相信，那是对黑人登记投票的非法报复，由此，多尔代表美国政府为 300 多名佃农赢得了作废驱逐令的法庭命令。其他那些被驱逐的佃农在所谓的“自由村庄”扎营，他们正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着，因为多尔的努力，这些佃农的境况得以见诸全国各地黑人报纸的报道中。在一个支持苦苦斗争的佃农们的接力活动中，马哈丽雅·杰克逊在电话中高歌一曲。佃农们则以命名一条泥路为“马哈丽雅·杰克逊大道”作为回报。

多尔在居民眼中几乎和英雄差不多。根据 1960 年的新民权法令所获得的南方各县的投票记录装在手推车上运到了他的办公室，在墙边堆得高高的。当多尔和他的同事一起翻看这些记录时，他把别针放置在一张南部地图上，标识那些对黑人选民最过分、最系统和最有效的压制行为的县份。一些诉讼已经提出来了，许多其他的诉讼也在准备提起。在多尔给罗伯特·肯尼迪的报告中，这方面的概述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和他在艾森豪威尔属下的前任一样，罗伯特·肯尼迪迅速推断，投票权是司法部门在民权领域最强大的政治和道德机会。把多尔塞入他的计划会议后，肯尼迪轻快地说：“我想继续投票。”他让多尔继续留在他的新管理位置上，尽管他是一名共和党人。

寻找一个民主党人代替多尔上司的想法，在肯尼迪的寻觅专才计划中得到通过。这个计划由萨金特·施赖弗领头，哈里斯·沃福德甄选他自己最想要的人才担任政府的职位。在施赖弗的心目中，基于沃福德的法律教育背景、经验和他在肯尼迪大选中的贡献，以及他对于人民和民权问题的个人学识，他是最具资格统领民权司的可用人选。然而对于沃福德来说不幸的是，尽管有施赖弗对他的引荐，可是他遇到了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有“奇才”之称的全美足球运动员拜伦·R·怀特这个对手。怀特还是罗德学者和肯尼迪的国家公民主席。虽然沃福德反对怀特，认为他固执且没有幽默感，罗伯特·肯尼迪仍任命怀特为司法部副部长。对于沃福德的低下评价，怀特进行了全力回击。他说服了罗伯特·肯尼迪，让他相信沃福德从来无法向怀有敌意的南方议员们掩饰他对于甘地、金和非暴力反抗信条的长期同情。

颇具心思的怀特作为一名中立候选人、沃福德的朋友和伯克·马歇尔的法律伙伴被引荐给了肯尼迪。怀特早在耶稣大学法学院就认识马歇尔了。马歇尔是备受尊敬的公司律师，曾代表标准石油、杜邦公司和其他具有实力的客户，在过去 10 年中打过一些最大的反垄断案件。在他的生涯中，只有两件事——均在沃福德的招聘中有迹可循——与身穿灰绒西装的律师的公众形象略有出入：他曾经

在黑人为主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执教过一个司法课程。另外，他还曾在哲学家斯科特·布坎南领导的一个行政阅读小组中读过阿诺德·汤因比的著作。马歇尔不认识任何的民权领导者，也没有向任何的民权组织做过贡献，也未曾对种族问题表现出过兴趣。对于怀特来说，正是由于他在民权问题方面缺乏专业才能，才引荐马歇尔领导民权司。人们忽略不处于其他的法律领域就是一种资格，但是种族问题是如此的具争议，之前任何的个人兴趣记录都会成为一份政治声明。沃福德自己也有一半同意，尽管他反感白人，他仍将马歇尔的名字放在引荐的名单上。

罗伯特·肯尼迪邀请伯克·马歇尔到他的办公室谈话。很快，这就成为司法部门的一场传奇的“沉默的接见”。像肯尼迪一样，马歇尔的说话声线有点呢喃，尽管与53岁的司法部部长相比，他没有那么凌乱。另外一点也和肯尼迪一样，他有可能是寡言少语。当他们见面时，马歇尔知道他被考虑出任一个职位，但他不清楚是哪一个。他推测可能是反垄断局的职位，对此他计划拒绝。在谈话中，他们顺带提到了民权司，但两人均没有对此说太多，除了必须实施相关的法律外。由于两人沉默的时间比聊天的时间多，他们在一小时中的较大部分时间都不怎么说话，仅由其间的小声细说打破了这种沉默。当谈话结束时，马歇尔认为他在司法部门就职的机会已经告吹，但是出乎肯尼迪助手的意料，肯尼迪认为他就是民权司职位的合适人选。在他看来，马歇尔是一个绝顶聪明不易犯错的精英律师，对于重大错误能保持镇静，不会造成争议，而且非常诚实地声称他知道所有的答案。

在金自己的过渡期中，他与官员和任命的角力很大程度上倚重于政治和宗教的结合点上的加德纳·泰勒。和哈里·贝拉方特一道，泰勒帮助金设计了一个绕开那些基金和其他大型的经费来源的选民登记计划，直接向黑人礼拜者发出“每人一美元”的呼吁。当亚拉巴马的官员继续充公同事的财产时，泰勒向亚特兰大筹集了5000美元，用于为卷入《纽约时报》诽谤案的官员进行辩护。与此同时，泰勒告知金，如果阿伯纳斯和夏特沃斯在亚拉巴马觉得受到严重压制，以至

于必须放弃南方，从而在北方更安全地讲经布道，金必须让他们带着他的祝福离去。1961年年初，在布鲁克林黎巴嫩山的浸礼会上，泰勒赞助了阿伯纳斯。

在教会的分裂中，金和阿伯纳斯都是“泰勒”的人。分裂的结构会决定他们在全国神职人员中的地位。当1月份，泰勒对法庭认可他在费城选举的最后上诉中失败，J.H. 杰克逊让国家教会理事会中宣布泰勒的传教士们为非法的分离主义者组织。作为回应，泰勒公开抨击这是一把刺向教会民主的隐藏的匕首，发誓推出一个全国性的“真理饱和计划”，以维护9月份在堪萨斯城的下一次大会上提出的要求。托马斯·基尔戈和其他几个人离开他们在教会的职位，用了足足13周在全国巡游，为泰勒拉选票和筹款。当许多教会停止了他们的演讲安排后，金也在静静地做着同样的事情。

作为种族平等大会全国行动委员会的成员，泰勒正在寻找一名新的全国总管。他的选举委员会取得一致意见，CORE（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这个作为寻找种族融合的甘地主义直接行动先锋，不应在学生以静坐的方式引起全国关注时寂寂无闻。CORE的领袖委派了一名使者到亚特兰大为金提供该职位。金回应说，他已经扩张过度，他只会把占主导地位的CORE的北方知识分子白人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黑人牧师融合在一起时，才考虑该职位。显而易见，这是不切实际的，于是他几乎立即就拒绝了这一邀请。

由于金不考虑这一职位，CORE内部转为把重点放在詹姆斯·法默身上。法默是1942年的初创会员，父亲是得克萨斯州首位获得博士学位的黑人。他身材魁梧，此时41岁，比金大9岁。法默的成长有点神童的意味，他年纪轻轻就凭着良好的人脉在白宫获得了罗斯福总统的接见。他最早期的记忆来自博学的父亲，那是父亲坐在田间树下饱读拉丁文、希腊文、德文和阿拉姆文的情景。法默曾在1940年中期从CORE离开，部分原因是与贝亚德·拉斯廷和A.J. 穆斯特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冲突，自那以后，法默在哈莱姆的甘地静修院生活过一段时间，并来回奔忙于工会组织的工作，最后，他在全美有色人种协会安定下来。他

过去曾经历私人情感上的挫折——他的第一任妻子在怀有身孕时，在发现他的白人情妇给他的情书不久后流产，随后便与他离了婚，而这位白人情妇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但是他在古板的 NAACP 表现出了膨胀的野心，但感到受阻于协会中的等级制度。法默迫切地谋求老朋友们的协助以获得 CORE 的工作机会，在金拒绝 CORE 的邀请后，他最终成了加德纳·泰勒的正式人选。

罗伊·威尔金斯听到闲言碎语后，在法默鼓起勇气辞职前，把他叫来开了个会。最让法默欣慰的是，威尔金斯好像并没有怪罪他的脱逃。法默起初认为，威尔金斯一定会觉得办公室又脏又乱、会员稀少的 CORE 简直微不足道，根本不会对 NAACP 构成威胁。但当谈到事业起步和小组织时，威尔金斯越是怀旧感慨，法默就越相信，连舒适安逸如威尔金斯者，都认为经过 30 年发展后的 NAACP 已经裹足不前。威尔金斯劝告法默上任伊始就要下狠手。“我应该听米妮的，”威尔金斯说道，“她说过：‘罗伊，你要全面肃清，他们都是沃尔特·怀特的人，只忠心于他。把他们清出去，安排自己的人进来。’”威尔金斯告诉法默，他后悔当时心慈手软，不然就不至于现在被一群人束缚并可能被架空了。“第二点就是，”威尔金斯带着疲惫的笑容说，“你将骑上一匹小野马，而我骑的却是一头恐龙。”

预言很快应验了。在法默第一次召集的 CORE 干部会议上，戈登·凯里指出 CORE 应该启动第二次和解之旅，近似于 1947 年贝亚德·拉斯廷等人组织的公交车和解之旅。时至今日，他记忆中的那次行动有着比历史纪念更多的内容。当年，最高法院做出裁定，禁止在州际公交车上实行种族隔离，并且，这个裁决刚刚被延伸到一个新的案例中，即服务州际公交车乘客的候车室和餐馆禁止实行种族隔离，然而，法院的判决并未能在南方得到广泛实施。早期的乘坐公交车行动就是对这项裁决的非暴力测试。凯里的想法是，CORE 虽然在人数上无法匹敌声势浩大的静坐示威学生，但可以把一支训练有素的“非暴力”跨种族干部队伍派到整个南方的公交车上，在检验公交设施的同时，展现他们应对种族隔离暴力的

勇气，从而多方面推广 CORE 的理念。法默赞同凯里的提议，并将他组织的第一个和解之旅改名为自由之行。

1961 年 2 月 1 日，起诉《纽约时报》和 4 名亚拉巴马 SCLC 传教士诽谤的第二次审判在蒙哥马利结束。市长厄尔·詹姆斯去年 11 月就曾试图从判归治安专员沙利文的损害赔偿中分一杯羹。辩护律师注意到，詹姆斯市长和 5 名陪审团成员都为准备内战百年庆典而蓄起了胡子。为此，律师提出反对说，这个明显的标识造成了一种不利于被告的气氛。法官沃尔特·B. 琼斯在南部联邦百年纪念式上，被选作杰斐逊·戴维斯的替身主持宣誓就职仪式。在当庭的审判中，琼斯不仅驳回了律师的异议，还严格执行审判中的种族隔离，命令伯纳德·李（Bernard Lee）离开法庭里的白人区。在驳回各种无效动议后，法官琼斯迅速将案子交给了陪审团，预计再追加被告 50 万美元的诽谤罚款。此外，还有 3 个类似的案子悬而未决，其中一个是由帕森特州长提起的诉讼。

就在同一天，整个南方的黑人学生都在举行格林斯博罗静坐活动一周年纪念。这些活动中，有些是纯粹的纪念仪式，但另外一些活动，比如纳什维尔非暴力研讨会在城市种族隔离剧院外成立警戒队，揭开了精心策划、旷日持久的战役序幕。静坐周年纪念活动只得到媒体零星的关注，但是，从南卡罗来纳州罗克希尔地区传来的、在抗议者自身松散网络内部传递的电讯却引起了高度的关注。警方拘捕了 10 名在麦克罗伊午餐柜台前静坐的学生，当地法官判处学生们要么缴纳 100 美元罚金，要么在筑路队做苦力 30 天，结果 10 名学生中有 9 人庄重承诺要去做苦力；他们中有一个人就是预备着当囚犯、带着牙刷参加静坐的，另一名学生给反对他们的、心痛的家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请试着理解它吧。我们进监狱不是因为犯罪、偷窃或者杀人，而是为了所有黑人的福祉。”

“罗克希尔入狱”事件是民权运动的一次情感突破。其哲学原理正是依据了甘地的理念：为原则而快乐地承受痛苦，可以成就有效的政治见证。这对于读过

或听过詹姆斯·劳森演讲的学生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此时的 SNCC 在整个南方正陷入策略困境的讨论中，罗克希尔行动的及时性就在于，它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避免缺少保释金的严重局限。“宁入狱，不保释”显而易见的优点是，它减轻了抗议活动的财政负担，示威者不需要花一分钱，而白人政府却要支付牢狱的“食宿”费用。它明显的缺点是，蹲监狱并不仅仅意味着过去意义上的被捕、关禁闭及保释，它要跨越巨大的鸿沟。学生们光是要面对的原始恐惧就有：被铁链成群锁在一起、幽闭、被狱警或敌对囚犯殴打，至于失去大学学分，那就更不用说了。

SNCC 因为这件事在亚特兰大巴特勒街基督教青年会召开了为期 3 天的会议，并在两天后开始了入狱。这次会议上的观察员和顾问人数远远多于 9 名学生代表，其中的艾拉·贝克是最具指挥能力的一位。一天晚上，罗克希尔约克县监狱的一个电话中断了会议。汤姆·盖瑟用自己监狱里分得的一个通话机会，打电话来呼吁支持。他保证说，在剩下的锁链连身的日子里，所有 9 名学生都将坚持呼吁支持。但他认为，若非得到增援，他们的榜样作用将会消失。盖瑟的电话打断了在亚特兰大舒适聚集的学生们的沉思。电话那头是把“不惜赔上身体”作为运动标记的人，他们的呼吁无法抗拒。但在其他城市发动同情“入狱行动”的想法，被拒绝以推迟或者有困难等原因。他们很快意识到最好的支持就是最直接的办法：他们可以亲自去罗克希尔，并且到监狱里加入那 9 个学生。一个接一个在亚特兰大的 9 名学生代表中，有 4 人表示要立刻动身。戴安·纳什是第一个，接着分别是斯佩尔曼的卢比·多丽丝·史密斯、弗吉尼亚联盟学院的查尔斯·谢罗德、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逊 C. 史密斯学院的查尔斯·琼斯。他们和其他几个人起草了新闻稿，称赞那些被囚禁在罗克希尔监狱的学生，结尾部分是这样的：“我们觉得，凭着良知，加入他们是我们别无其他的选择。”

带着艾拉·贝克的祝福，这 4 名学生开车去了罗克希尔。他们坐在同一家商店里，告诉法官愿意效劳。他们的行为使他们瞬间成了 SNCC 支持者眼里的传

奇人物。他们从监狱传出的事迹花絮成了无价之宝——他们在囚室高唱自由之歌，慷慨激昂又富有感染力，以致典狱长为了要扼杀这个声音而单独囚禁他们。已经是传教士的琼斯和施罗德给锁在一起的普通囚犯传教，他们麻利地铲起沙子装进自卸卡车时，自由之歌在河边传唱。可恶的看守最终却吹嘘这些工人有多神奇。据说，学生们是如此的热情洋溢，以至于沉闷监狱习气因学生们自己的信念而为之一改。按照某些标准，罗克希尔入狱行动注定难逃失败，因为既没有店铺取消隔离，也没有进一步的人员补充。但无论如何，对于成千上万的静坐老兵来说，这是一件令人难忘的替代性胜利，因为13名罗克希尔犯人设立了有待辩论和适应的心理承诺新标准。更重要的是，他们引入了游动人员和监狱客交互支持的观念。当学生们开始考虑把任何城镇的任何监狱都当作自己潜在囚室的时候，整个南方就成了他们共同的战场，于是，一种新的休戚与共的伙伴关系就此形成。

罗克希尔和自由行的第一层联系是汤姆·盖瑟服刑期满出狱时确立的。去年加入CORE组织的盖瑟作为英雄受邀前往纽约。法默选择盖瑟完成一次侦察之旅——在华盛顿和新奥尔良之间的公交线路，盖瑟要制订计划、负责联系、沿途侦察公交车站里的种族隔离守军。盖瑟把罗克希尔也纳入这条线路，并在报告中预测，亚拉巴马州的安妮斯顿会遭遇暴力，他这样描述说：“这儿无疑将是麻烦爆发地。”

在亚特兰大，金因为同事的政治灾难而忙得不可开交。最新的罚款50万元的诽谤判决，让弗雷德·夏特沃斯和拉尔夫·阿伯纳斯开始认真考虑逃往北方这件事。在汽车被扣押后召开的第一个伯明翰群众大会上，夏特沃斯竟至于宣布自己在辛辛那提教堂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这促使他那些警觉的信众开始凑钱给他买新车。为获得法律保护，避免汽车再次被扣押，他们计划“以耶稣的名字”注册该车。金私下试图说服夏特沃斯留在伯明翰。他也非常担心阿伯纳斯会去纽约，那样的话，他将失去阿伯纳斯。于是，他给亚特兰大西亨特街浸信会教堂的执事写了一封私人信函。因为那里还没有牧师，所以，这实际上是恳求西亨特教

堂给阿伯纳斯一个职位。

眼见朋友如此动摇，金意识到南卡罗来纳州 13 名入狱学生的意义更加重大。2 月 17 日，他写了一封“向自由斗士致敬”的信，由他最熟悉的纳什和施罗德转交给狱友。“你们所示范的勇气和信念激励了我们所有人。”他写道，并在信中加上了对非暴力充满希望的宣告，“你们超脱了恶人的审判，他们只会诽谤你们使用的权利武器。你们在监狱里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对那个不道德城市良心的烧灼。你们让他们备感羞愧而回归正派。”

纳什维尔的静坐老兵，因同乡戴安·纳什在罗克希尔的牺牲而鼓舞了斗志，他们逐步升级了对种族隔离剧院的抗议。詹姆斯·贝弗尔派出小分队每晚进发市中心，纠察拒绝他们入内的剧院。一些白人客人因为潜在的冲突危险而选择避开，一些人表达了对黑人的支持，而大部分人则装作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会发生。没有因压力而屈服的剧院老板焦虑地想要维持生意，他们希望纠察队离开，但又不想让警察逮捕这些人，因为他们担心那样会招来负面新闻。贝弗尔的小分队夜复一夜地开赴市中心，他们不知道是否会被袭击，也不知道袭击者会是警察，还是他们称为“混混”的敌对白人青少年。这些混混淆一色留着鸭尾发，并且参与恐吓纠察队员的人越来越多。

史密斯第一浸信会教堂召开了一个战略会议，在詹姆斯·劳森缺席的情况下，金的朋友、凯里·弥勒·史密斯牧师成了最重要的成人顾问。从番茄到拳头和飞石相向——初期的暴力行为发展到最近骚乱，这时，史密斯召集了许多朋友前来协助，其中就有著名白人牧师威尔·坎贝尔。令人痛心的是，史密斯、坎贝尔和其他一些成人在一次会议上建议，暂停纠察活动以利谈判。就在詹姆斯·贝弗尔和另外一些口齿伶俐的学生予以反驳的时候，约翰·刘易斯却泰然自若地坐在角落里。但凡被提问，他都无视对方提出的任何理论要点，只简单地说一句话：“我们今晚要出发。”

让神学家坎贝尔陷入沉思的一个问题是，示威者固然遭遇暴力，但冲突因他

们而起，他们是否会承担这个责任？刘易斯为坎贝尔所熟悉始于去年的静坐示威，当时，刘易斯还是个初出茅庐、说话口吃得厉害的学生。而现在，他似乎从其他学生那里得到了指挥权。最终，因为恼火于刘易斯嘴里蹦出的几个单词，坎贝尔终于失去了耐心。“如果今晚再有示威，那么很容易发生暴力事件而且是极其严重，这一点你清楚。”他尖锐地对刘易斯说，“我只能认为这是你的傲慢问题，还有你的固执。你现在拒不同意我们，无非是因为你自己的傲慢和罪过。”

坎贝尔的训斥刺痛了在场的人们，房间顿时陷入了沉默。刘易斯温和地对坎贝尔笑笑，像是表示同情。“好吧，我是罪人。”他淡淡地回答说，“我们要出发。”

听到这样直截了当的话，坎贝尔无言以对。学生们追随着刘易斯的领导，采纳了贝弗尔的战术，他们继续对剧院老板施压，同时忍受着每天晚上如雨的暴力袭击。2月20日，纳什维尔警察开始当场抓捕示威者。勒夫剧院外积雪的街道上，在纠察圈里刘易斯被警察发现并被带走送进了监狱——这是他第四次被捕。

因为拒绝保释，刘易斯无法完成神学院的高级布道。出狱后，因为重新加入进军剧院的队伍，他又修改了布道计划。在3月份新的SNCC简报上，刊发了一篇名为《学生之声》的文稿，刘易斯从中得知在弗吉尼亚州，从达拉斯到夏洛茨维尔，有10多个城市正持续开展着剧院运动。在CORE为1961年“自由之行”刊登的第一个招聘志愿者的广告中，他也看到了同样的内容。刘易斯迅速做出回应。CORE申请表强调暴力和长期监禁可能的危害，但刘易斯毫不畏惧，他表示，他心甘情愿牺牲神学毕业课程以及其他任何要求。“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写道，“为了自由之行，如有必要，我将放弃一切，正义和自由应该来到南方腹地。”

在亚特兰大，学生仍在谋求获得去年在纳什维尔所取得的胜利。静坐和抵制运动在持续，结果导致13家公司的白人业主关闭市中心70余家店铺，时间长达3个月，直到1961年2月。公司业务难以为继，包括500名黑人在内的员工被

解聘。解决问题的压力来自双方。因为无力在秋季大选后斡旋达成一份协议，哈茨费尔德市长在政治上感到很受打击。所以，当白人商家同意与黑人领袖直接谈判时，市长大人便退到了一边。首轮谈判，商会主席伊万·艾伦在他的办公用品公司接待了沃尔顿——一名老资格的律师和也是奥本大道商务兄弟会的牧师。沃尔顿是保守派头面人物，人们称他为“上校”“法官”。当沃尔顿询问洗手间的时候，棘手的问题出现了。艾伦迟疑了片刻，他知道，他不可能让沃尔顿这一级别的人物使用黑人专用的又脏又乱的隔离厕所，但他又知道，如果带沃尔顿去白人厕所，自己的白人雇员会造反。机智而亲切的艾伦本能地带沃尔顿去了自己的私人洗手间。

许多坚决抵制隔离商店的学生可能已经把洗手间的故事当作是亚特兰大地区的黑人领袖寓言故事。他们认为像沃尔顿这种老顽固们，这辈子已经形成了安然独享特殊待遇的习惯；年长者则认为年轻人在试图削弱他们公众场合中的影响，双方的曲解在3月7日急剧恶化，当时，拟议中的交易条款在谈判小组的最后一次会议被披露了出来。亚特兰大商会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成了南北各方的头条新闻。声明中小心翼翼地强调，要保护签字白人商人免受向黑人投降的指控，其核心前提是“长久以来，亚特兰大地区各种族间的关系一直维系良好，应该在各方面加以重新恢复”。这份声明回避了任何明确提及整合的字句，它以令人费解的文字隐藏了白人的责任与义务，只是承诺采取“相同模式……就像最终在亚特兰大公立学校问题上所做的决定一样”。这样模棱两可的表述并没有避开签署协议的10名黑人，他们当即誓言：“取消所有抵制、报复、纠察和静坐活动，尽可能及早恢复完全正常的状态。”

无论这种偏向性的语言对亚特兰大白人可能产生怎样的舒缓效果，在黑人方面，它带来的是政治成本的抵消。学校集会的演讲者谴责说，午餐柜台的整合被成功取消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所绑架，并警告说，如果白人找到拖延整合学校的方法，就像布朗案裁决近7年以来他们所做的那样，午餐柜台整合的延迟，可能

不会只有6个月，而是遥遥无期。一名学生组织的主席建议继续示威活动，他说策划协议的黑人领袖们最开始就不是真的支持抗议活动。大批的成年黑人在学生的反对下也动摇了。鉴于街头巷尾的议论纷纷，老金、沃尔顿还有伯德斯被迫想办法为自己辩解，借此力求其传统的权威不被掏空。第二天，《世界日报》的头版头条通告了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标题十分扎眼：“沃伦教堂今晚召开澄清群众大会。”

沃伦神学教堂满满当当地挤进了2000人，都是为了解决方案的激烈争辩而来。在情绪明显紧张的人群中，忧虑的伊万·艾伦是为数不多的白人之一。伯德斯用他对白人商界领袖的个人理解，试图做出保证，无论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午餐柜台都将在9月份废除种族隔离。学生和成人演讲者都质疑他讲话的价值，并且嘲笑那份字面意思都很模糊的协议。两名学生谈判代表分别是莫尔豪斯和斯佩尔曼学生团体的主席，他们拒绝维护当前的解决方案。于是，为了在乌压压满心怀疑的青年人面前证明自己，老金大步走上讲坛（对老金来说，实在不习惯为自我申辩而走上讲坛）。“多年来第一次，也是我印象中第一次，商会同意承担起与商家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的责任，”他说，“我们必须给予和接纳。”起初，还有零星不满的声音。但当他说“30年来，这样的事情我见多了”，一个学生突然大喊起来：“这就是问题！”教堂里哄堂大笑。老金随后的话惹来嘘声四起。他变得慌张起来，试图更加坚持地强调他经验的分量，结果这样的战术反倒引来更多的质问者，并将他淹没在此起彼伏的嘘声中。

金在城里参加一个旨在为选民登记提供基金会资助的SCLC会议。他习惯性地迟到了群众集会，但恰好见证了父亲受到的羞辱。他本来没有发言的计划，但在这种情形下，他拨开过道上拥挤的人群向讲坛跑去。当人们看到金出现在教堂中时，顿时平息了喧哗，当他到达讲台时，他慢了下来，有意审视了面前众人的脸庞。他一脸难过的表情让期待的人们更加安静，此时的金双眼满含泪水。

“你们让我吃惊。”他说，就这样，他以一种委婉的语调开始，抨击高尚奋斗

人士的投降；他将这种投降称为“不团结的癌症”。慢慢地，金开始发表即兴演说，他赞扬长者的智慧、青年的创新，还有每个人的勇气。他充满激情地描述他们的目标，并以此将争斗中的各派维系团结起来。对他来说，这个目标比自由和尊严更高远，因为他们能告诉全世界，实力和道德结合在一起将超越原始的憎恨。在给自己内涵丰富、充满激情的美景做了结语后，他最终转回到相对较小的争议问题——亚特兰大白人屈尊与他们签订的、他称之为“第一份书面合同”的和解方案。“如果合同被破坏，那将是灾难也是耻辱。”他用近乎愤怒的声音宣称道，“如果有人想破坏合同，那也得是白人。”说完，他离开了寂静的教堂，留下脱困的父亲、如释重负的朗尼·金（尽管遭受血性溃疡的折磨），以及对其肃然起敬的伊万·艾伦，最后，和解方案得到了切实的认可。

肯尼迪总统任职初期，种族问题没完没了的骚扰令人侧目。在宣誓就职前，他原来视阿肯色州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为国务卿第一人选，但因为富布赖特在种族隔离主义问题上的投票记录，他被迫放弃了这个打算。类似的例子还有州长欧内斯特·范迪弗，当助手们意识到，范迪弗本身是一个公开高调向种族整合宣战的人，如果让其在已经整合的军队中任职，媒体必然会对他的任命大肆嘲笑，为此，肯尼迪放弃了任命范迪弗为陆军参谋长的计划。不过，幸运的是，因法庭下令佐治亚大学录取首批两名黑人，白人学生发动了暴乱，范迪弗作为争议性事件的核心人物出现在电视上，而肯尼迪认为事件有损美国的全球形象，因此，他在事件发生之前宣布搁置范迪弗的提名计划，可谓动作迅速及时。

总统认为种族隔离就像殖民主义一样，是一种可被现代观念稳步推进所治愈的不合时宜的顽疾。对他来说，要达成这个结果，需要在公众平和的氛围中，锻炼冷静和超然的理性。然而，这样的要求并不能见容于白人或黑人的情绪化示威活动。和所有总统一样，肯尼迪本能地反对在他的领导下的国家发生“动荡”，但在民权问题上，他尤其强调将冷静当作推动进步的条件，而这样的一种姿态必然在其雄心勃勃的总统任期内边缘化民权事务——没有哪一位总统，当然也没有

哪一位浪漫如他的总统，能够或者打算在韬光养晦中实现其主要目标。

2月7日，肯尼迪首轮会晤还在继续，他接待了约翰·汉纳和神父西奥多·赫斯伯格。这两人是艾森豪威尔党任命的民权委员会领头人。肯尼迪的目标是说服他们在自己任期继续留任。他认为两人具备较高素质，不希望看到民权政策因两人的辞职和更替而新增内容。两人同意留任，但要求总统帮他们纠正对他们工作造成障碍的小问题。其中一个是人手问题——自从1958年西西里罗科突然辞职后，一直缺少白宫专职人员正式负责民权事务，他们希望有人确保总统能接受委员会的意见。结果，没等他们提出第二个要求，肯尼迪就先驳回了第一个请求。“我已经有一个特别助理全职负责此事。”他说，“哈里斯·沃福德。”

汉纳和赫斯伯格离开白宫前没再多说什么，但迅速给沃福德打了电话。由于后者曾在委员会工作过，还曾在赫斯伯格担任校长的圣母大学任教，因此汉纳和赫斯伯格相当熟悉他。事实上，他们在去见肯尼迪前已经向沃福德咨询了几分钟。当时，沃福德虽然还没有在政府任职，却早已是天才的搜索员，他正和萨金特·施赖弗一起计划创建“和平队”。当沃福德从汉纳那里听到总统的说法时，瞠目结舌的他向汉纳保证，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但几分钟后，他就接到了肯尼迪办公室的加急电话。当他在办公室外坐着等待引见时，一个陌生人把一本书推到他面前说：“是沃福德先生吗？请举起右手，跟着重复我说的话。”

“为什么？”沃福德问道。

“我要你发誓。”那人回答说。

“可我都不知道工作是什么，而且我也还没跟总统谈过。”沃福德说。在该男子驳回了无关其命令的问题后，沃福德还在哀怨地问：“你知道工作是什么吗？”

“这不重要。”那人干脆利落地回答道，“总统知道就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宣誓拥护《宪法》而已。还有问题吗？”

疑惑的沃福德在面见总统前就已经宣了誓，而总统只是简单地说需要沃福德为他供职，其工作的一般授权是“最低限度的民权立法，最大限度的行政行为”。

肯尼迪本来有一个紧急外交政策会议，眼下已经迟到了。沃福德问到了在白宫和司法部与索伦森共事的权限概要，总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微笑着说：“你是专家，动手干吧。”他让沃福德在办公大楼找一下，在“剩下的办公室里挑最好的”一间。

理论上来说，沃福德占据的是男人个人信念中最理想的政府工作，在白宫工作。几乎直接听命于总统，特设的民权职位。但事实上，他知道，相比司法部的拜伦·怀特，自己更喜欢和索伦森或白宫其他核心要员保持本身就不多的融洽关系。怀特认为，即使是在司法部处理，种族政治的激情都将会破坏对法律的尊重。而肯尼迪最亲密的助手则担心，如果风头涉及白宫，那就会伤及总统。所有这些人与肯尼迪总统的关系都比沃福德亲近得多。所以，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他的职位是特别设置的，肯尼迪对他的任命几乎是轻率的，然后，他们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在可能沦为白宫摆设的重大危险中，沃福德开启了他的白宫职业生涯。

抛开被察觉到的政治危险不说，光是民权问题就已经令那些与总统最亲近的人退避三舍，他们认为，由于要引起总统的关注，种族争议问题已经被宣传得过于平淡乏味、鸡零狗碎，而且成了古怪兮兮的个人问题：爱达荷州的立法机关正讨论一项法案，要求理发师学会如何为黑人理发；在佛罗里达布雷登顿的棒球场上，每年春训中的大量争议像连载故事一样传出来，比如，那儿最好酒店老板同意，在鏖战过后，密尔沃基勇士队的明星、外野手汉克阿伦和其他黑人球员入住酒店，但他们必须同意在餐厅特定区域后面就餐。在华盛顿，这样的种族隔离纠纷经常被提出评论一番，但也只是被最精明的顾问们轻而易举地打发掉，因为这些事情本质上就是对总统的轻视。

肯尼迪总统就民权的争议问题公开站队的情形只有一次，那是就职的第一个冬天。如今，他也后悔了。在内战百年纪念的方法上，南加州的查尔斯顿麻烦不断。那儿的记者们听说，国家内战委员会的一名黑人代表将不能留在主办萨姆特堡战役纪念活动的酒店里。为此，在这名黑人代表的家乡，新泽西州的立法机关

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所有州联合抵制纪念活动的开幕仪式。肯尼迪总统迫于压力，给委员会主席尤利西斯·S. 格兰特三世将军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指出作为政府机构的一员，所有代表都当之无愧地享有平等对待的权利。这次冒险只为肯尼迪招来了南方代表的冷嘲热讽。他们坚持认为总统无权干涉南加州酒店的内部事情。

这场争议迅速升级。格兰特将军支持南方，反对肯尼迪。他的发言人声明委员会的工作是纪念战争，不是干涉“种族问题”。而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则加入新泽西州的队伍，呼吁联合抵制活动。对于总统在这件事的权限问题，舆论也是一片纷乱嘈杂。政府官员们最终承认，就任何适合举办纪念活动的查尔斯顿地区的酒店而言，他们都不可能强迫其临时废除种族隔离。为了挽回颜面，他们拉到足够的选票，决定将纪念晚宴从酒店转移到美国海军基地，那里距离查尔斯顿只有3英里。这样的移动无非是希望南方人可以兴高采烈地告诉记者，海军在军事基地内仍然对自己的士兵实行种族隔离。后来，在萨姆特堡纪念仪式前夕，一名南方代表对委员会发表讲话，谈到了故去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血统、种族，以及其他问题，他的演讲被北方代表视为对林肯的侮辱。在你来我往的侮辱不断升级之后，委员会的代表们重演了混乱不堪的内战政治戏码。北方代表以格兰特将军未能维护联邦政府的荣誉为由，呼吁肯尼迪总统“解除”其委员会职务；而南方代表则反过来强烈支持格兰特将军——他的祖先当年率领军队荡平了从夏依洛到阿波马托克斯的大片土地。

从白宫顾问的角度来看，第二次萨姆特堡战役就是一个单身女黑人在旅店留宿闹出来的滑稽风波，它证明了一件事：如果总统试图在种族政治中摆出高姿态，那么他可能就会显得愚蠢无能。肯尼迪是幸运的，这次事件造成的只是有限的政治损害，因为民众对内战的事情兴趣不大。百年的历史在倒退中开始了4年的跋涉。查尔斯顿办公室报道，城市旅行交易量仅在纪念活动当天就减少了一半。萨姆特堡的新闻与艾希曼案件开审相比，显得相形见绌，更不用说和苏联

尤里·加加林第一载人航空大新闻相比了。这件事就像人造地球卫星的二重奏一样，又一次震惊了全美。5天后，这些轰动一时的新闻被猪湾事件中真实军事灾难冲刷得一干二净。

抛开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不谈，肯尼迪总统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极为反感——那个家伙人格化了他珍视的许多特质如青春、活力、敢于克服重重困难等。卡斯特罗愉快地行走在生存的边缘。崇拜者和谩骂者都简单地称他为“菲德尔”。他有一种肯尼迪所仰慕的、海明威式的“爷们儿气”，他以这种气质有意识地在西方世界面前，将自己呈现为理想主义和存在主义恰到好处的混合物。

同样是卡斯特罗，他不仅粉碎了猪湾的突袭，还撕开了美国不介入的幌子，揭露了中情局编造的拙劣谎言，肯尼迪总统因此而被羞辱，这种刺痛迅速在数百万美国公民中蔓延开来。就在千余名幸存的猪湾旅士兵被卡斯特的胜利之师关押时，还有另一个人被关押在苏联——U-2 侦察机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因为在苏联领空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判刑。美国总统在一年中第二次向全国公开致歉，这是一个折磨人的政治举动。尽管总统优雅地承担了责任，他的盟友也把责难向其他地方转移，但没有一个肯尼迪的维护者为他的决定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尤其是，出于秘而不宣的希望，他坚持裁减入侵部队的军力。

然而，肯尼迪总统没有从国际斗争中退缩，也没有改变他对相关术语的定义。相反，肯尼迪总统更加沉浸在外交事务中。他以灵活应对、反叛乱战争和经济援助的新学说更加坚定地推进整个西方世界的防御网络。在猪湾事件一个月以前，肯尼迪总统启动了一个 170 亿美元的核导弹项目，一个月后，他提交了一份特殊的国情咨文，要求增加 1.2 万名新的海军陆战队员，训练新的反游击部队——后来被称为特种部队或绿色贝雷帽、把 3 倍于原计划的资金用于建设防空洞以及其他民防项目，此外，他宣布了令人振奋的消息，美国将“在 10 年内”把人类送上月球。

在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肯尼迪的官员们只对本土的颠覆问题表现出矛盾心

理或者回避策略。民主自由和镇压颠覆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它在参议员乔·麦卡锡职业生涯中已经得到了痛苦的验证。约翰和罗伯特·肯尼迪仍然容易受到指控——唆使或者容忍麦卡锡政治迫害，但他们都知道，最好不要重复麦卡锡含糊定义的安全风险。然而，要团结整个国家与共产主义一决高下，同时又不采取措施应对本土的外来威胁，这并不容易。对约翰·埃德加·胡佛的名义上司罗伯特·肯尼迪来说，这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尽管胡佛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时间比肯尼迪活的时间还长。肯尼迪在明确自己检察总长特权的同时，试图以奉承和其他个人的关注来安抚胡佛。他试图承认胡佛作为国家内部安全专家的巨大力量，但也提升了新边疆的后麦卡锡态度。

胡佛和罗伯特·肯尼迪之间的个人关系，表面上是东方式的礼节性尊重，暗地里却上演着一场私下羞辱和不相称怪癖的戏码。从一开始，肯尼迪的人就谈论调查局局长干脆而效率极佳的“好日子”，以及卡通般精神错乱的“坏日子”。在约翰·席根塔勒首个私人拜访过程中，胡佛对报纸发表了激烈的言论，并用《纽约先驱论坛报》准备刊登的一份已知的共产党人名单加以强调，然后，他又突然转入到对阿德莱·史蒂文森是个“臭名昭著的同性恋”的长篇大论中。席根塔勒惊讶地眨了眨眼，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其他 FBI 官员也在用相同剧情的相同细节嘲笑前外交官萨姆纳·威尔斯。当席根塔勒回到司法部，司法部部长肯尼迪看了他一眼说：“他（胡佛）今天是不是有点反常？”胡佛多变的情绪变成了一个笑话，而这个笑话被胡佛本人在风格上（如果不是表演的话）就是一个同性恋的假设变得更加离奇。听说胡佛的主任助理及本科室友克莱德·托尔森住院动了手术，司法部部长讥讽道：“什么手术，子宫切除术吗？”尽管上述种种，但是，针对来自心怀不满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提示的疯狂阴谋——胡佛窃听司法部部长的办公室，肯尼迪还是坚称，他的下属将不遗余力地与调查局合作。对他而言，这不仅仅关乎政治必要性。父亲曾经为胡佛提供一年 10 万美元的资金，使其成为肯尼迪利益的保安总长，他说。在罗伯特·肯尼迪看来，他父亲对胡佛价值的评

价意味着一些东西，而且这也是对胡佛为调查局所做贡献的一个衡量——尽管他拒绝提供。

从联邦调查局，肯尼迪的司法部也收到对外尊重和私下嘲讽的类似混合物。甚至地方分局的基层特工也经常把罗伯特·肯尼迪的办公室称为“婴儿护栏”或者“娱乐室”，拿司法部部长穿着袜子到处走的工作方式、他的触身式橄榄球聚会和办公室墙上的儿童画开玩笑。这些不拘小节的特点得罪了一丝不苟的胡佛，后者更加怨恨肯尼迪这位实质上 and 名义上的老板。当肯尼迪让哥哥的助手拒绝接听胡佛的电话，从而打破 FBI 和白宫之间的珍贵联系后，胡佛做出的报复是，让司法部部长的电话无法接听。肯尼迪则应对以安装一个连接胡佛办公室的直线电话。在全局上下，特工们都很愤恨胡佛的这种厚颜无耻，但又笑话这种礼貌的战争。他们说，老家伙仍然可以让肯尼迪很不好过，比如黑人特工问题。当肯尼迪温和地敦促胡佛融合他的精英部队时，胡佛首先声称这是联邦调查局的内部事务，然后说，联邦调查局已经融合好了。在近两年里，胡佛延长了司法部部长的怀疑，也让司法部部长越来越恼火地要了解调查局的融合详情。胡佛巧妙的官僚撤退是局里广为人知的骄傲欢乐的源泉，“黑人特工”包括胡佛在华盛顿的司机、他的穿着白色外套的门卫、他的万能信使，加上在迈阿密和拉霍亚办事处的、局长假期专用的司机。所有这 5 个黑人家臣已经成为特别特工，他们没有公务员保障也不用服兵役，因而在个体上依赖于胡佛。

埃德加·胡佛的 FBI 高级官员第一次对金引起注意是在肯尼迪就职后仅半个月，当时《国家》杂志刊登了金的一篇文章，题为“现在就平等”。在给新政府提出的一长串建议中，其中有一段加了括号的关于 FBI 的内容：“如果，例如，FBI 的执法人员进行了整合，很多藐视联邦法律的人现在就可能受到约束，而现在，这些人对法律视若无物。”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一直在留意公共领域出现的批评，而金的这句话则从这些批评中突然火箭般蹿升出来。调查局内部辩护者把金打上了“错误”的标签，他们理所当然的理论是，哪怕是一个“黑人特工”，

都能在技术上令隔离的指控归于无效。一份备忘录提交给了副局长、胡佛的政治监护人卡萨·“德克”·迪洛克，在这份备忘录中，建议调查局不要“插手这件事，因为他（金）显然只会欢迎可能随之而来的任何辩论或者由此产生的宣传效果”。

以任何合理的标准来看，相对于胡佛的联邦调查局，金这篇文章的内容给肯尼迪新政府造成的威胁要更大。杂志提到，金不愿意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降低期望值，甚至不愿意在通常的新总统就任“蜜月”期里保持沉默。金简单的一句断言作为开头——“原则再也不能被质疑”。金撇开了所有种族融合道德律令的限定，也无视十几个州种族隔离法律的主张。对于这一切，金代之以一个问题——新总统如何才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实现整合？“我们必须面对的悲惨事实是，联邦政府是全国种族隔离的最高授权者。”金写道。他的语气像往常一样积极，他提出的议程对政府就像是一个“机会”。尽管如此，对肯尼迪新政府的官员来说，文章可能只会被理解为射向政府舰首的警告，或者更准确地说，打到了舰尾。

3月6日，在司法部部长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民权领袖大型会议，金没有被邀请参加，在这次会议上，请愿者提出要约见南方巡回联邦检察官，肯尼迪则反过来强调投票的重要性。被作为威胁排除在外的金，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寻求更高级别的会面。过了10天，在亚特兰大的“澄清大会”后，他给白宫写信，寻求与肯尼迪总统本人的私人会晤。约见秘书肯尼斯·奥唐奈于3月25日拒绝了他的请求，理由是“当前国际形势”让总统忙得分身无术。

肯尼迪的高级官员中，有6个人尤为关心民权，金的问题成了他们谈话中的子主题。哈里斯·沃福德每周都在民权司召开跨部门会议，但会议总是翻来覆去地充斥着犹豫和算计，更保守一些人普遍担心和金这样的人建立政治关系存在危险。新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路易斯·马丁最终提出了打破僵局的建议：他们应该秘密邀请金，让他到华盛顿来召开一次“不做记录”的会议。如果金同意这个条件，履行他的承诺，并且保证事情不会泄露给报纸，那么，从他运作这

件事本身来看，将是一个令人放心的信号。如果该计划奏效，马丁认为，肯尼迪的人将有机会在政治环境下实行金的措施，同时，不张扬地鼓励金的公民权利计划。如果计划不奏效，他们需要尽快找到解决办法，并且宜早不宜迟——相对公开会议，秘密会议带来的政治损害要容易控制。

直到猪湾入侵事件后，秘密会议的安排才完成，保密工作渗透到每一个细节：金只能带一个随从；地点在五月花酒店的包房里，而不是在政府办公大楼里；食物事先摆放在餐桌上，而不是由侍应端上，目的是避免被侍应向记者泄露谈话花絮。各方与会人员次第到达：来自白宫的是沃福德和肯尼斯·奥唐奈；来自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是路易斯·马丁；来自司法部门的是司法部部长肯尼迪、约翰·席根塔勒、伯克·马歇尔和其他两三人；再加上金和他的助手。与会人士总共不到12人，并且没有正式的介绍。当司法部部长赶到时，各人自助服务，然后在午餐时分坐下来举行了一个肯尼迪式的会议。

通过事先指定，伯克·马歇尔代表肯尼迪方面做了大部分的讲话。马歇尔向金解释了他的观点，他认为，联邦政府因《宪法》联邦制的影响而受到严重制约，比如，相较于其他领域事务的管理，对公民权利的管理所适用的联邦法律就要更加严格。马歇尔解释说：司法部几乎没有权力干预学校里的种族隔离案件，甚至不能干预警察施暴的案件，除非在非常狭隘的定义情况下，而迄今为止其最宽的范围止于投票权的保护；司法部现在正借用政府的口号，通过常规和非常规的方法来向前“移动”；民权司的律师都在提起诉讼，力图禁止南方各县对黑人登记进行骚扰或阻止，例如约翰·多尔刚刚从密西西比州哈蒂斯堡完成卧底任务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正在努力推进亚拉巴马州塞尔玛的另一个案子。通过马歇尔的陈述，公民权利的所有道路都指向选民登记，在这条道路上，联邦政府的最明确的法律授权可以保护南部黑人最显著的政治机会。司法部部长肯尼迪和其他人在这个中心主题上也不时插话帮腔。

当肯尼迪第二次走到自助餐桌边时，哈里斯·沃福德特意在他身后落座，一

脸略微满意的温和的微笑。“你还记得那个我自己都忘了，你却担心和我有关联的家伙吗？”他低声说。

“谁？”肯尼迪答复道。

“斯坦利·利维森。”沃福德说。看到肯尼迪不置可否的样子，他补充道：“好了，你现在更加记得他了，因为他就坐在你旁边。”

“哦，是的，”肯尼迪干巴巴地说，“有意思。”他没再多说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在利维森旁边坐下——在这场和肯尼迪的人会晤的高度不寻常的介绍会上，金所选择的随从正是利维森。就沃福德本人而言，他高兴的是，司法部部长似乎已经意识到具有讽刺意味的形势和沃福德的隐含信息——这个和金在一起的温和白人似乎在骨子里并没有这么危险。

利维森在会议中没说太多，金也一样。在肯尼迪的人眼中，事实上，金的私下行为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安静。他没有说教，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摆出姿态。当被要求回应时，他衷心地赞同政府在投票权领域的所有计划，承诺通过诉讼加快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登记工作，并指出他完全理解政府隐瞒简化登记工作的需要。尽管金的确说过投票并非黑人争取权利的唯一康庄大道，因为静坐、大规模集会、立法、抵制和一系列其他的策略也能发挥作用——他强调这并没有区别。金通过抑扬顿挫的演讲、寓意深远的表达，以及他和蔼可亲的举止，给肯尼迪的人留下他是一位圣人或易于击败的对手的印象，或两者兼具。他们认为他并不要求别人的感谢，而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对金了解不深的路易斯·马丁在那天就认为：“金是我认识的最不爱出风头的民族领袖。”他永远不会改变对金的这种看法。后来，布克·马歇尔修改他对于金的政治潜能的想法时，称他是个“容易被低估”的人。

金注意到路易斯·马丁为午餐抢着埋单。散会后他走到马丁那边，冲着马丁要付的账单，不再拘谨地问：“谁付的账单？”

马丁有片刻犹豫，对金如此直接有些惊讶，他答道：“我付的。我有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的户头。”

“谢谢。”金说，并点头同意，向着马丁微笑了一下，又像是眨了一下眼。马丁把这看成是金乐意让他自己付账，而并非通常扮演的为白人主子做家臣的角色。马丁简单地说：“不客气。”连同点头认可，他希望由此表达他同样欣然看到金对于这个微小但重要的细节的重视。这个短暂的一刻标志着屋子里仅有的两个黑人的友谊由此萌生。

金的总体表现让肯尼迪的官员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本能地，他们一致认为要在政治上培养他，而不是让他脱离政治。金认为工人进行选民登记时受到了骚扰和迫害，但常常苦于无法得到联邦调查局的协助。对此，司法部部长肯尼迪定下了回应的基调，他写下约翰·塞根塔勒和伯克·马歇尔的电话号码，并交给金。“任何时刻，无论白天或晚上，”肯尼迪说，“你都可以打电话。”从五月花会议中，沃福德找到了带金回白宫谈话并做一游的理由，其间，总统“发现”了金（这件事几乎确凿无疑地在肯·奥唐奈的报告中，他在开会前就已经非常怀疑金），并突然向金表示敬意。“很高兴见到你，”肯尼迪总统说，这是自7个月前的助选活动开始以来，他首次与金握手。肯尼迪说他通过司法部部长，一直关注着金的工作。他大略地提到了促进南部黑人登记的秘密计划，并承诺提供支持。当金礼貌地问他做得如何时，肯尼迪说一切皆好，除了自古巴的灾难以来，他要顶着全世界的压力。

在以个人名誉担保为五月花会议保密后，金在当时及之后都没有向公众提及这个会议。直至在达拉斯的刺杀事件后，他甚至没有承认有与肯尼迪总统会面的机会。由此产生的唯一有关金的新闻是，一份黑人八卦专栏精确地提到，他计划夏天在玛莎的葡萄园“加入橡木崖的侨民”，时间为期一个月，在那个19世纪卫理公会信徒野营地放松一下自己。金对于声誉和奢侈品仍然有很强的欲望，但是与之抗衡的是足够强大的自负，这种自负使他不需要喋喋不休于肯尼迪家族对他的关注。也正是由于这种自负，在自由之行运动的磨炼中，让政府对于与他达成

温馨和私密关系的希望落空。

约翰·多尔在司法部门内面临着新的竞争。在有关南方民主党人推荐中，伯克·马歇尔雇用了来自阿肯色州的杰罗美·海尔布伦。这位来到民权司的律师持有劝说比诉讼更为有效的论点，他辩解道，那些知道南方人的语言和习惯的人从未正确地对待过南方人。海尔布伦认为，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是可行的，而诉讼的效果却会适得其反。

多尔对此非常理解，而不是予以嘲笑。他是局外人，是司法部里的共和党人。司法部部长已经开始戏弄他了，他说：“你是共和党人拥有的最好的武器。”暗指多尔的民权诉案离间了民主党的南部选民。多尔知道，他有足够的法律理由去认真对待海尔布伦。即使是最热情的民权自由主义者也承认，司法部门在诉讼方面面临严重的障碍，其中最让人烦恼的是斯克鲁斯判例。在喝了数不清杯的咖啡后，多尔的律师们与海尔布伦在一个法律观点上达成一致，对于斯克鲁斯，没有简单的方法。就如名称所描述的那样，这个案例成了他们肩上的一只怪物。

一个晚上，警长克劳德·斯克鲁斯在酒后和两个随从一起进入市民罗伯特·赫尔的家中，斯克鲁斯逮捕了赫尔，然后将戴着手铐的赫尔带到佐治亚州贝克县法院的院子里。此后，斯克鲁斯在众目睽睽下用拳头击打赫尔，又用棍棒打了至少 15 分钟，最后把受害者的尸体拖入监狱。尽管州政府没有谋杀的指控，但联邦检察官提供了严重暴力的证据，在一个保护黑人民权的重建法案下，一个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证明这名警长有罪。此后，斯克鲁斯提出上诉，并承认他有意杀害赫尔。他辩称《宪法》保护他免受任何的指控，除了佐治亚州法律下的一种谋杀指控（“辩护得并不出色。”最高法院大法官拉特利奇写道）。最高法院为斯克鲁斯翻案，理由是并没有提供辩护律师。政府无法证明斯克鲁斯攻击赫尔时，带着剥夺后者的民权的特定意图。检察官只是证明斯克鲁斯意图杀害他。这是法院对于法规中“故意地”一词的严格解释。令人难以置信，这意味着今后在这类案件中，联邦检察官必须证明被告在犯下令人发指的恶行时，脑子里是在

想着违反《宪法》。这就斯克鲁斯判例，于1944年由自由派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做出的判决。在民权检察官小圈子里，这个决定是对于德雷德·斯科特的不愉快的回应。不管他们多么渴望把这个案例作为战时的特例而遗弃，就如挽留日本人集中营的案例，但如今这仍是适用的法律。

有关特定意图的相同标准适用于《1957年民权法案下》(b)章节对选民威胁的民事诉讼。民权检察官简称之为“b类诉讼”，多尔比大多数人更清楚斯克鲁斯的案例使得b类诉讼变得几乎不可能。需要用客观证据，而主观意图简直就是噩梦。为保护投票权，这使得检察官进行“a类诉讼”，而这些沉闷的诉讼也是个噩梦。《1957年民权法案》的(a)章节规定，如果联邦检察官能够证明存在种族歧视，他们可以获得对地方官员的禁止令。实事求是地说，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获得、并向法庭提供选民的登记申请，然后证明个别的黑人被拒绝登记，而同等或更低能力的白人却没有被拒绝；他们还要另外证明种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唯一因素，之后再证明该差异在足够数量的个体中发生，并造成了歧视的一种“模式”。这必须逐个县地在多个法庭中缓慢地完成，过程中要遇到重重阻力和受到对手的拖延。而在当时，仅仅在佐治亚州，就已经拥有159个县。

对于这个艰苦的方案，多尔发现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也就是海尔布伦的备选方案或者其他的方案，之所以受到伯克·马歇尔这样的业内新人欢迎，他对此完全能够理解。当然，如果可行的话，海尔布伦的计划会更加便捷。对于被抽选的试验，多尔不可能抱怨其严密性，因为海尔布伦自愿到斯克鲁斯家乡，在那个偏远而被人遗忘的地方试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他在“糟糕”的贝克尔县就黑人投票权进行谈判。在这个县，也就是这几年，警长L.沃伦·“盖特”·约翰逊才接替了退休的斯克鲁斯警长，同样也是在贝克尔县，黑人没有投票。

多尔继续他已选择的道路，无情地制造a类诉讼。他知道地方联邦检察官在南方根本不提供帮助，而联邦调查局只是一把钝器，于是，尽管存在一些阻碍，多尔和他的同事还是创造了加快进展的体系。首要的原则是他们必须亲自与黑人

见面——他们必须建立互信；必须知道如何在因为恐惧而面临崩溃的人中，辨识出可靠的证人；他们必须知道先选择哪些县份，以及如何出去寻找支持证人的支持。他们必须在完全无法从现有的地方机构中获得协助的条件下，完成上述，以及许多其他的任务。而事实上，他们不得不避免和当地的白人在一起。到1961年春天，多尔的所见所闻已经足以使他知道，他无法坐在华盛顿的办公桌旁完成工作。做一个常规的法律官员，就要变得盲目和无能。

4月初，多尔匿名飞到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同行的还有一位名叫鲍勃·欧文的同事。他们身着卡其裤、工作服和旧靴子，并希望联邦调查局不知道他们的来访，以免因越界调查而触怒调查局。不过，他们的伪装大半是用来愚弄当地白人的：为把引起好奇的可能性降至最低，他们在偏远的乡村驾车，并在廉价汽车旅馆过夜。在次日黎明前，他们向梅加·埃弗斯（美国一民权运动者）自我介绍。多尔坐在他厨房的桌子上解释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埃弗斯几乎认识过去几年投诉受到选举歧视的每名黑人。不久，埃弗斯在他们特别发行的大比例尺地图上标记号。多尔和欧文以这些标记作为导引，到了某县里的一个只通泥路的农场，最后到了克拉克县。他们在那里到处敲门拜访，在玉米地里留下足迹，面见被否决的黑人选民，逐个询问其他人的名字。他们将把新的名单发送给联邦调查局供其与当事人面谈。

密西西比州的勘探之旅开启了此后他们完善a类诉讼的流水作业的序幕。他们不需要访问白人选民。鲍伯·欧文可以扫描批准表格上的笔迹，传唤二十来个目不识丁的人，基于法庭外的一分钟访问就选择证人，并把最好的几个带到庭上供多尔提问。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更需要有影响力的农场众多的乡村县镇，因为在城市里，教师和其他中产黑人对做证感到有很大的经济压力。与小县镇相比，大县镇提供了更多潜在的可供选择的证人，而且歧视的程度直接根据县里黑人的比例而有所不同。

使用这些和其他临时的导引，多尔和欧文的调查遍及南部地图上的县份，着

眼于在每个联邦法庭地区发起一宗 a 类诉讼。在亚拉巴马州，根据地图，他们锁定达拉斯县。通过这种选择方法，早在美国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或马丁·路德·金之前，司法部门就到了当地县政府所在地塞尔玛工作。从面对民权委员会所做的证词中，一个名字进入了多尔和欧文的视野，她就是达拉斯县选民联盟的阿梅利亚·博恩顿。于是，在下一个行程中，他们立即就找到了她。博恩顿经营一家小型的保险事务所。在她事务所的墙上，律师们发现了一个标有星号的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是曾尝试登记的达拉斯县黑人。这一大批证人的发现是博恩顿的功劳，民权司的工作因此而进展迅速。在 4 月底，多尔提起了一宗 a 类诉讼。

正如罗伯特·肯尼迪之后满怀渴望地说：“在这些日子里，我们认为我们成功了，由于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着。”在 5 月初，达拉斯县的司法常务官 J.P. 梅杰斯辞职，以避免把他的登记记录移交给联邦检察官，这就迫使多尔回到塞尔玛修改他的答辩，以便让这个 a 类诉讼继续下去。多尔没有察觉到的是，一场把他卷到了附近的蒙哥马利风暴正迎面而来。与此同时，金正飞往底特律联合汽车工人大会准备发表演讲，罗伯特·肯尼迪正试图弄清楚猪湾事件的问题所在，还决定到佐治亚州大学发表一场重要的民权演讲，他们也都没有察觉风暴的来临。在那时，对这场将上述人等都带到蒙哥马利的剧变，约翰·刘易斯有着最清晰的预感，他认为他将要去新奥尔良。

第十一章 车轮上的洗礼

约翰·刘易斯错过了纳什维尔的公交车，于是，他的牧师朋友詹姆斯·贝弗尔和伯纳德·拉斐特便开车带着他全速直奔田纳西州的莫非斯堡，好让他在那里上车。自那时，刘易斯独自乘车前往华盛顿，和詹姆斯·法默以及另外 11 个新成员，于 5 月 1 日参加自由乘车运动的培训。参加培训的人形形色色——3 个白人女性，3 个白人男性，还有 7 个黑人男性，最小的 21 岁，最大的 60 岁。他们中有两个学生、一个民歌演唱者、几个种族平等大会的成员、一个退休的教授、教授的妻子、一位牧师还有一个自由作家。詹姆斯·佩克也是其中一员，他是佩克呢绒公司的继承人。1933 年，他选了一位黑人作为自己在哈佛大学新生舞会上的舞伴，全场为之沉默。此后，他蹲了三年多监狱，还因为无视与自己的理念背道而驰的法律条文和社会惯例而多次被捕。阿尔伯特·比奇洛也参与其中，他身材魁梧，下巴扁平，在哈佛学过建筑，后来当了船长。比奇洛参加过“二战”，也因此成了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曾指挥自己的船只“黄金法则”号冲进位于太平洋上的原子弹试验区。刘易斯在他们之中年龄最小，也是参与其中的两个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学生之一。另外那个学生是华盛顿霍华德大学的亨利·托马斯。

华盛顿官方对此置之不理。种族平等大会的新闻办公室只找到了 3 个愿意报道自由乘车运动的记者，而且都是黑人。为了缓解自己的不安，《黑玉》杂志的西蒙·布克将种族平等大会危险的计划告诉了联邦调查局。接着，布克偷偷

来到司法部，参加了那种随时开始的 30 秒对话，告诉了司法部部长及其助手约翰·席根塔勒混乱可能发生。“好的，如果发生了就告诉我，”肯尼迪马上回答了他，“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去。”现在布克知道美国司法部部长已经提前知道自己要和那些堂吉诃德式的自由乘车者们一起，布克松了口气，但肯尼迪语气中的不假思索让布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把意图表明清楚了。肯尼迪很快就把自由乘车运动抛之脑后了。

5 月 4 日，13 名乘车者分成两组出发了，一组坐灰狗长途汽车，一组坐旅途公司的公交。按照计划，他们在每辆车上的位置各不相同——有的白人坐在了后面，而黑人坐在了前面，至少有一组黑人与白人并肩而坐，还有几个自由乘车者不动声色地坐在传统安排的座位上观察。华盛顿以南 52 英里处，公交车在弗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的第一个休息点停下来。等候室和餐厅依旧挂着“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指示牌，但除了冷冰冰的眼神，乘车者们再没遇到其他无礼的行为。再次登车后，他们在里士满的境遇也差不多。随后他们继续前往彼得斯堡，怀亚特·沃克之前待过的教堂前面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对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在这里，他们在当地人家中住了一晚。在从起点到位于新奥尔良的目的地，他们经过了几十个公交车站，花了 13 天，全程 5000 英里。大部分公交站附近，人们都很少谈及最高法院和甘地。

第二天，他们经过了爱德华王子县的法姆维尔，那里既是弗农·约翰斯一家的家乡，也是布朗案弗吉尼亚部分的发生地。为了回避种族融合法令，县政府将大部分学校设施都转移到了匆匆组织起来的私立学校，专供白人学生使用。几乎所有的黑人学生都已有两年没有上过学了。爱德华王子县的僵局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于是，前不久，肯尼迪的司法部就决定在这里首次推行学校去隔离化，尽力重新开办公立学校。灰狗和旅途公交车停靠在法姆维尔时，自由乘车者们发现，当地车站“有色人种”的指示牌才刚刚被重新粉刷过。所有 13 名乘车者没遇到任何障碍就得到了应有的服务，因为爱德华王子县的大

人物们不想让“大规模抵抗”扩展到州际交通方面。晚上，自由乘车者们离开林奇堡，到了丹维尔。在那里，公交车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拒绝让他们上车。然而，没有人被捕，也没有暴力事件的发生。

在高层，艾伦·谢泼德和罗伯特·肯尼迪也都在路上，相较于自由乘车者们的默默无闻，被视为先锋的他们则正在大放异彩——谢泼德是美国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而肯尼迪则正走向佐治亚大学，就民权问题进行首次演讲。“西方国家之幸”是第二天《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那天《纽约时报》上有6篇报道谢泼德，庆祝50分钟的太空之旅，认为它足以抵消猪湾事件以及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影响。谢泼德安全降落后，肯尼迪总统马上就举行了振奋人心的新闻发布会。

罗伯特·肯尼迪要经受的考验也让人备感紧张。他和助手们为了演讲稿已经连续忙碌了5周，因为肯尼迪认为，如果不能在民权政策应用最广且最不受欢迎的地方得以施行，那么自己就成伪君子了。肯尼迪双手微微颤抖，而他在公众事件中的前途也有风雨飘摇的迹象。罗伯特·肯尼迪感谢了佐治亚州，因为在支持其兄长方面，佐治亚州给予了“全美最大的支持”。

在民权问题上，肯尼迪坚持自己的强硬路线。“南方人非常喜欢坦率直接的对话，”他说，“如果你问：我们会施行民权法令吗？答案会是：会，我们会的。”出于个人信念，肯尼迪主动说自己同意布朗案的判决，他诚恳地表示愿意在自己的司法部废除种族隔离，而且至少要和其他地方废除种族隔离的节奏一致。至于在南方饱受诟病的爱德华王子县的案件，肯尼迪表示，无论是谁担任司法部部长，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都会采取一样的行动。“我不相信，”他说，“所有人都会支持阻止千万美国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原则——尤其这一举措还会违背法庭命令。”肯尼迪将之与艾森豪威尔的形象比较，说这一充满希望的行动将以公平为前提。“我们不会坐视不理，冷眼旁观，”他说，“我们会采取行动。”

最后，肯尼迪迟疑地坐下后，1600名佐治亚州听众一言未发，随后则爆发

了掌声，对肯尼迪的说服力和勇气表示赞赏，据一位记者判断，掌声持续了整整半分钟。这一结果以及佐治亚州重要政治家的缺席都非常引人注目，新闻报道也称赞了肯尼迪在民权方面“坚定的讲话”。至少在余下的周末时光中，看上去司法部部长通过有力地表达国家政策而创造了奇迹。然而，周二，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便宣布总统否认了自己曾在竞选期间支持的民主平台的两种立法方案。几乎在同时，佐治亚州州长范迪弗也宣布，约翰·肯尼迪为了让自己在 대선中支持他，承诺永远不会动用联邦力量在佐治亚州支持反种族隔离法案。报刊背页上到处都是充满恶意的关于政治交易的讨论，罗伊·威尔金斯将肯尼迪否认《民权法案》的做法比喻为“献出了一束仙人掌”。

塞林格发表声明当天早上，第一辆搭载自由乘车者的公交车停靠在灰狗公交车的终点站：南卡罗来纳州的罗克希尔。当时，“入狱”行动已成为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学生们中的传奇，而罗克希尔正是该事件的发生地，约翰·刘易斯努力转换角色，要成为首批试验者。他从公交车走到白人等候室时，之前的紧张感与其说是减弱了，不如说是被压抑了。罗克希尔的位置比大多数终点更为“低级”，弹球游戏机随处可见，一群白人青年正在乐此不疲地玩着——他们正是之前静坐运动的根源。有个白人青年站在门边，他身后还有二十多个人。

头两个白人青年走到刘易斯面前，挡住入口。其中一个一边说“去那边”，一边伸手指着旁边的有色人种入口。

刘易斯想到了应有的说辞。“根据最高法院对博因顿案的判决，我可以从这里进入。”他说。

对方先是没有回应，接着说了一句“放屁”，就推推搡搡地把刘易斯挤到了门前的路上。有个袭击者一拳打在刘易斯嘴角，那是自由乘车运动经历的第一拳。刘易斯倒下了。听到暴力事件开始后，更多白人涌过来。站在刘易斯身后的阿尔伯特·比奇洛走过来，站在刘易斯和施暴者之间。比奇洛身材魁梧，却站着不动干挨打，这架势在打架时可并不常见。然而这并没有让攻击者退缩，反而脑

袋和身体还挨了好几拳。三四下重拳打得比奇洛单膝跪地，有个施暴者突然朝比奇洛打过来，却把第三位自由乘车者吉纳维芙·休斯打倒在地。

罗克希尔的几位警察大喊着，施暴者依旧愤怒，不过暂时平息下来。警察局局长赶紧过去扶起刘易斯和比奇洛。他们两个人浑身瘀伤，不停流血，可意识十分清醒。之前众多少年犯罪案件早就让警察局局长认识了那伙施暴者，现在，局长厌恶地指着那些人，问刘易斯和比奇洛是否愿意针对袭击提起诉讼。刘易斯和比奇洛都拒绝了——因为那样做不符合非暴力抵抗的精神。他们的拒绝让警察局局长有些不满，因为他冒着政治风险逮捕白人的好意被浪费了。他把所有嫌疑人都赶走了，而自由乘车者们也走进等候室，没遇到任何麻烦就点了餐。

两个小时后，旅途公交车到达终点时，发现那里已经大门紧闭。当地联系人带他们驱车前往接收罗克希尔“入狱”行动学生的友谊专科学校，对他们讲述了另一组人遭遇殴打的事情。当晚，自由乘车者们因在第一场危机中保持了镇定，且表现良好而备受表扬。第一位受害者约翰·刘易斯当晚接到了一条来自纳什维尔的紧急消息：美国公益服务委员会已将他列入一份奖学金的终选名单，获得者将前往印度与甘地主义者一起生活工作两年。1954年获得这一奖学金的是詹姆斯·劳森。问题是，如果接受，那刘易斯就不得不退出自由乘车运动，马上飞往费城参加面试。美国公益服务委员会给他电汇了飞机票款。信念坚定如刘易斯，这实在是两难之选。不过，第二天，他还是与同伴们像军人一样告别，独自北上。剩下的十几个自由乘车者则向南朝哥伦比亚和奥古斯塔走去。

金当时正在蒙哥马利参加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董事会议。自从一年前的所得税案以来，这是他头一次回到蒙哥马利。为了展示接连不断的官方迫害——诽谤案、刑事诉讼以及在亚拉巴马州被解雇——都没能影响自己的行动，金在州长帕特森的首府主持了为期两天的会议。金给司法部部长肯尼迪发了一封电报，称赞其在佐治亚大学的演讲，还宣布已组成18人的全国律师委员会，在4位传教士的诽谤案中辩护。亚拉巴马的4位被告分别是阿伯纳斯、夏特沃斯、洛厄里和

西伊，金与他们就是否应该忍受个人资产总被扣押的情况还是应该离开亚拉巴马州谈过。夏特沃斯刚刚接受了辛辛那提的新工作。阿伯纳斯决定到亚特兰大的西亨特街浸信会教堂去，但他还没准备告诉蒙哥马利的会众。

5月13日，周六，金和怀亚特·沃克刚好赶上了与自由乘车者们的晚餐。他们庆祝了穿过南方诸州北部近700英里旅程的成功，同时高度评价了他们深入种族隔离最猖獗的南方腹地各州的意愿和榜样作用。然而，在尽可能地鼓励他们之后，金把记者西蒙·布克拉到一边，说自己刚从亚拉巴马州回来，那里的公众情绪非常激动，足够的报道已经让亚拉巴马人意识到自由乘车者们即将到来。“你无法在亚拉巴马获得成功。”金激动地小声说，而不知如何回答的布克则告诉金自己将跟随高大的法默，试图缓解气氛。“他是唯一一个能被我打败的人。”布克嘲讽道，还说他们准备把法默留给想要追捕他们的白人流氓。

那天晚上，由于母亲打来的一通紧急电话，法默辗转难眠。母亲说，他父亲那晚在华盛顿医院的病床上要求看一看“小法默的日程”，得知小法默第二天将到亚拉巴马州去，就突然陷入昏迷，继而离开了人世。而在法默的记忆中，父亲还是一位教授，在柯立芝时代中，坐在树下，阅读希腊语的书籍。法默夫人坚持认为丈夫是希望自己的离世能挽救儿子的性命，因为那样他就不得不回家参加葬礼。法默对自己感到有些懊恼，但知道自己无法参与之后的活动后松了一口气，于是向其他人说明情况后便离开了。剩下的人一直认为要按照计划进行。在亚特兰大，十来个学生也加入了他们。法默不在的情况下，密歇根的学生约瑟夫·珀金斯成了灰狗公交车上的负责人，而詹姆斯·派克则负责旅途公交车。两辆公交车沿着美国78号公路一路向西。亚拉巴马州便衣调查员们也悄悄加入了乘客之中。

经过塔拉普萨和赫夫林站之后，灰狗公交车的司机悄悄告诉团队负责人珀金斯说，朝东边开的司机警告说前面的安尼斯顿聚集了一伙暴徒，而种族平等大会的侦察员汤姆·盖瑟则预感到那是个大麻烦。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公交车慢慢驶入位于安尼斯顿的停靠处时，新的终点标识上写着“白人州际旅客”和“黑鬼州

际旅客”的字样，表明某些懂法的人已经狡猾地做好准备应对以《宪法》为后盾的自由乘车运动带来的挑战了。（最高法院已禁止州际旅客服务设施的种族隔离）然而，与带着木棍、砖头、铁棍和刀子的大批人马相比，这些标语并不算什么。这伙暴徒大喊着让自由乘车者下车时，9位自由乘车者以及5位普通旅客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有些人试图破门而入。这让两位亚拉巴马州的调查员不得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们冲到前面，紧紧抵住拉杆，保持车门紧闭。暴徒的怒火燃烧起来，开始用棍棒敲打车体，还猛砍轮胎。车里的人让司机赶紧开车，免得车坏掉走不了了。司机没有多说，他发动引擎，倒了车。乘客们已经不知所措，深陷在恐惧中，看着安尼斯顿的警察们过来，挡住暴徒，指挥公交车出城，仿佛他们刚刚被唤来解决一起交通事故。

灰狗公交车在78号公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总有报告称后方的暴徒正穷追不舍。很快，随着自由乘车者们前往伯明翰，约有200名暴徒坐着50辆小汽车紧紧尾随。刚离开安尼斯顿不远，公交车就开始侧滑，司机意识到被击打过的轮胎正渐渐漏气。司机没办法，只能把车开下公路，关掉引擎，惊惶地逃到荒野之中。用力砸门的声音和聚集过来的人的喊声，让公交车更显安静了。

这次，暴徒们使用了砖块和大斧头，挨个儿砸碎公交车的窗户，大量玻璃碎片划到乘客身上。攻击者们破开行李舱，用棍子再次猛打车体。同时，另一组人则尽力想打开车门。最后，有人从后车窗丢进了一枚火焰弹。地板上都是火光，有些座位着了火，车厢里很快就充满了黑色的刺激性气体。被呛到的乘客们意识到火势难以控制，便惊慌失措起来。前面的州调查员E.L.考林意识到，暴徒们现在已不想破门而入，反而想挡住门，把他们留在着火的车里。浓烟让考林无奈而脆弱，他举起枪，逼得攻击者们退后。终于，考林费尽力气打开门后，阿尔伯特·比奇洛就和其他人一起指挥乘客们走出车厢。这一情景让攻击者们非常愤怒，然而考林的枪却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他们站在车门附近没有浓烟的地方，对逃出来的人挥拳相向。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学生亨利·托马斯踉跄着走到

空气清新地方，脑袋却挨了一拳，倒在了地上。其他人也跟着托马斯跌跌撞撞地走下车。最后，亚拉巴马州警察对空鸣枪示警后，攻击才算告一段落，乘客们才在警察们的护送下前往安尼斯顿医院。一位摄影师拍摄了火苗从破车中喷出的照片，浓烟滚滚，从各扇窗子中冒出来。晚上，这张照片将通过国内及国际媒体而家喻户晓。

一个小时后，旅途公交车继灰狗公交车停靠在安尼斯顿。吉姆·派克和其他自由乘车者们穿过站点，走进白人专用的餐厅购买三明治时，遭遇了诡异的沉默。大部分旁观者都转移了目光。有几个则嘟囔着“种族暴动”之类的话。自由乘车者们带着三明治重新上车，注意到这是第一次当地白人比他们自己更激动。莫尔豪斯学院的新生查尔斯·珀森和莫里斯·布朗学院的二年级学生赫伯特·哈里斯坐在公交车前排。他们坐下后，公交车司机便和安尼斯顿的警察们以及几个看起来很壮的人进行了交谈。之后，有8个人赶在司机之前上车，司机打开导游话筒时，那些人就站在过道里。“我们得到消息，有辆车被烧毁了，乘客们都得坐货车到医院去，”一个人紧张地说着，首次报告了灰狗公交车上乘客们的情况，“一伙暴徒正等着我们的公交车开过去，除非我们把这些黑鬼从前排座位上弄走，否则下场就是一样的。”

一个迷茫自由乘车者打破了这充满恐惧的无言，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回答说任何州际旅行乘客都有权坐在公交车的任何位置，但话还没说完，一个站在前座附近的白人就一拳打在了珀森脸上。之后，另一个白人开始殴打赫伯特·哈里斯。白人们将两个学生弄到过道上，在有限的空间内对他们拳打脚踢。这时，团队负责人派克和密歇根的退休教授沃尔特·博格曼都吓坏了，一下从后面的座位上站起来，冲到前面抗议。可他们根本没能靠近。有个正在殴打学生的白人转过身，给了派克一拳，派克一下被打到了两排之后。博格曼也挨了一拳，被打倒在地。突然，暴徒们的愤怒转移到两个倒在地上的自由乘车者身上。有些人把派克从座位上揪起来，雨点般的拳头砸在他满是鲜血的脸上，另一些人则猛踩仰面倒

地的博格曼的胸口。

“别再打了！”博格曼夫人大喊，“他是我丈夫！”

有些人怒骂博格曼夫人“跟黑鬼一伙”，另一些人则告诉朋友们不要打死博格曼，而此时躺在地上的博格曼已经不省人事了。很快，人们停止殴打，把珀森和哈里斯拖到后面，越过博格曼，扔到后座其他乘客的身上。他们把派克扔到两个学生身上，把博格曼拽到后面。沉着脸做完一切后，他们就坐到中间的座位上，免得还有黑人想坐到前面。打斗中一直不见踪影的公交车司机此时和警察们一起上车了。一番简短而沉默的查看后，新的座位安排似乎很让他们满意，于是警察们下了车，司机则发动汽车，从小路出城，以期神不知鬼不觉地避开等在通往伯明翰公路上的暴徒。西蒙·布克周围都是呻吟、震惊和鲜血，他坐在后座上，想吸引白人们的注意力，好让他们收起让人难以承受的恶意目光。而布克能想到的只是给他们一份《黑玉》杂志准备刊登的有关自由乘车运动的报道。

在伯明翰是藏不住秘密的。两周以来，弗雷德·夏特沃斯一直对金和他人说，三 K 党会埋伏在公交车终点攻击自由乘车者们。盖里·汤马斯·洛维是联邦调查局在三 K 党总部的线人。他告诉自己在联邦调查局的上线说伯明翰警方同意给三 K 党 15 分钟，让他们殴打联合起来的自由乘车者们。自 5 月 5 日起，联邦调查局伯明翰办公室的特工主管将警察与三 K 党之间的约定向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部汇报过多次。此外，他还就三 K 党意图进行的攻击提醒了警察局至少 5 次——出于正常的安全考虑，他并没有提及警察局在报告中的共谋关系，以免在警察面前暴露洛维联邦调查局线人的身份，这样三 K 党也不会知道。尽管官方通知认为警察局应负责此事，伯明翰特工主管还是传达了一系列警告。对执法者来说，提前知道犯罪的发生不是好事。特工主管的懊恼显而易见，他通知华盛顿的胡佛局长说，自己有责任在 5 月 14 日周日时向汤姆·库克探员发出最后一份警告。据其所知，库克与三 K 党关系密切，因为库克是“唯一在值班的人”。

约翰·路特兰牧师是布尔·康纳的卫理公会牧师，那天早上，他和康纳一起

在市政大厅请求不要让他们殴打公交车上的孩子们。白人媒体人非常关注此事，因此六七名记者、摄影师和电视转播人员刚过午后就聚集在了市中心的公交车终点附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霍华德·K. 史密斯经伯明翰回纽约，听到的传闻非常不妙，于是便驱车前往市中心，亲自调查此事。

在即将到来的戏码中有多方参与，具有多种合法进行干预的身份，但大部分都直接有利于三 K 党的行动。布尔·康纳最信任的情报警探库克告诉 3 位记者公交车马上就要来了，接着，他突然走向警察局，留下记者们猜测他离开的原因。灰狗公交车预定的停靠点是灰狗车站，盖里·汤马斯·洛维从警察局打来的电话中得知，第一辆公交车将停靠在旅途公交车终点站。洛维听到附近响起了向周围几十个三 K 党传递消息的信号，于是所有人便从灰狗车站朝 4 个街区外的旅途车站冲去。

旅途公交车停在伯明翰的终点站时，先下车的是在安尼斯顿等车的 8 个白人——他们似乎已经混入了终点站的人群中，早已预见到当局要进行的检查和盘问。吉姆·派克的脸上和衬衫上已经血迹斑斑，他和查尔斯·珀森首先走出了公交车。作为被指定在伯明翰进行测试的人，他们静静地站了一会儿，觉得逃跑似乎比留在终点站要好一些。派克认为自己不能开口要求珀森承担自由乘车运动的目标，他看了一眼珀森，表达自己的意图。“我们走吧，”珀森简单地说完，便按照计划，慢慢朝白人等候室走去。派克跟在他身后。沃尔特·博格曼和其余几个人也跟着。

他们走近挤满了三 K 党、记者和因暴力事件而惊呆的旁观者们。黑人们走过来时，一个迷惑不解的三 K 党成员嘟囔着说应该杀掉那个黑人珀森，因为显然他伤害了那个受伤的白人派克，但他们走过去时，派克却说那些人不应该伤害珀森。这一跨种族的友谊点燃了人们的愤怒，三 K 党成员推推搡搡地把珀森弄到了黑人等候室。珀森转身，想再次穿过人群时，一个三 K 党成员把他推到旁边的水泥墙上。剩下的人都出现在那个三 K 党成员的身后。“打他！”一个人喊

了一声，于是一个三 K 党成员便不由分说一下打在珀森脸上。珀森抬起头，鲜血从嘴里流出来，但等着他的是另一拳。这一次，他倒退靠在了另一个三 K 党成员的身上，那个三 K 党成员按住他，让他挨了第三拳，这次珀森跪倒在了地上。派克走过去，想扶起珀森，可连续五六拳也把他打倒在地。接着，12 个三 K 党成员围住这两个人，拳打脚踢，用了棍子，还有在被吓坏的旁观者霍华德·K. 史密斯看来像是巨型钥匙环的东西。联邦调查局线人洛维在这场打斗中也是毫不留情。

跟在珀森和派克身后的自由乘车者们想逃离这场殴打，却发现三 K 党成员已经封锁了退路。几秒钟后，记者西蒙·布克望向终点站时，发现浑身是血的沃尔特·博格曼正趴在地上，手脚并用，摸索着出口，极力想从暴徒们的腿之间爬出来。布克退缩了，他把报纸戳了两个洞罩在脸上，贴着车站边逃到了大楼外面。或许这次，幸运比伪装更眷顾他，布克确实找到了一个想尽快离开现场的黑人出租车司机。布克跳上出租车后座，把弗雷德·夏特沃斯的地址告诉了司机。

终点站的暴力事件蔓延开了来，闷棍很普遍，而且经常不看对象。一个伯明翰的白人之前一直都在男士洗手间，他无辜的眼神激怒了暴徒们。最终，他成了因受伤严重不得不被送往医院的 7 位旁观者之一。一个到车站接女朋友的黑人也被打了，另外，几位记者也未能幸免。一名来自《伯明翰邮报》的摄影师拍摄完对派克的攻击后，刚想把胶卷从相机中拿出，就被人用铅管打在头上，他的照相机也被打坏了。等候室外，一个从安尼斯顿登上旅途公交车的女性乘客正歇斯底里地大喊着：“公交车上开始了！车上开始了！”——十几个三 K 党成员扑到一个黑人自由乘车者身上，把他按在一排垃圾箱上猛打。接着，看到有个人在标有 WAPI 新闻的车内正通过车载设备广播，便砸碎了汽车的所有窗户，把新闻主播克兰西·莱克从主播车中带到街上，抢下他的麦克风后逃走了。这时，约定好的 15 分钟结束了，一大群伯明翰警察迅速走进旅途公交车的终点站，而三 K 党的成员也带着兴奋、乖戾的面孔散开了。一辆撤退的货车离开终点站一英里后，看

到两个站在街角交谈的黑人。他们立刻停车，扑向黑人，将其痛打了一顿。

记者布克将第一条让人难过的消息带到夏特沃斯的家中时，这位传教士便召集了所有理事以及亚拉巴马州人权基督教运动中几个身强力壮的成员。他还没来得及组织几个志愿巡逻者营救自由乘车者们，几个受害者就搭乘出租车来到了他的家。查尔斯·珀森到的时候，脸已经肿胀不堪，头上的开放性伤口说明，当天他在安尼斯顿和伯明翰都遭到了殴打。一个吓坏了的黑人医生拒绝为珀森疗伤。就在一个女人给珀森做急救时，吉姆·派克奇迹般地从出租车里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他整个头到处都是红色，牙齿在嘴里晃荡着，由于肋骨部分的伤，他不得不弯着腰。“你得去医院。”夏特沃斯迎接他的时候说。他们等着急救车时，派克挣扎着走到珀森身边，握了握他的手。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夏特沃斯接到了很多警告，还接到了一通安尼斯顿医院打来的电话。而灰狗公交车就是在安尼斯顿被围攻烧毁的。电话中称，一大群白人暴徒追到了医院，而被暴徒们威胁的医院工作人员则要求自由乘车者们离开，称他们的出现会给其他病人带来危险。前有暴徒的愤怒，后有医院的要求，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自由乘车者们聚在医院的角落里，可总是被人赶走。在伯明翰，夏特沃斯给志愿司机打了一通电话，说自己愿意带领车队完成 60 英里的开车任务，往返于安尼斯顿医院。夏特沃斯说，不得携带任何武器，“牙签也不行”。很快，8 名司机就到位了，他们吵吵闹闹的，坚持认为自己不能允许像夏特沃斯这样的优秀领导人暴露在危险当中。他们很真诚，但也有可能是认识到，这种紧急情况下，直觉告诉他们非暴力只是奢望而已。很快，8 辆由黑人牧师驾驶的汽车就带上手枪和步枪启程了，他们行驶在 78 号公路上，到安尼斯顿接回不知所措却满怀感激之情的和平主义者。

经过多番努力，布克终于在夏特沃斯家联系到了司法部部长的特别助理约翰·席根塔勒。布克上来就说自己早就料到会有麻烦，接着向席根塔勒讲述了白天的血腥事件，还说自己担心自由乘车者们永远无法安全地离开伯明翰。席根塔

勒记下了夏特沃斯的电话，很快便带着鼓舞人心的报告打了过来。席根塔勒称，司法部会在周一首先处理这件事，还保证说会保护安全进行州际旅行的权利。席根塔勒建议说，如果布克和其他记者暂时对这一事件轻描淡写将更有利于事态发展，可布克却说那不可能。这件事太严重了。白人记者们一直在四处收集消息。况且，有些记者本身也被袭击了。

那天晚上，在夏特沃斯的贝瑟尔浸信会教堂，饱受摧残的沃尔特·博格曼向一小部分人解释说，种族平等大会是坚信种族平等的非暴力行动组织。夏特沃斯讲述了为寻找失踪、走散的自由乘车者们所做的努力，还告诉他们布尔·康纳威胁要以在自己家中进行跨种族聚会而逮捕自己。然而，夏特沃斯的语气中透着勇敢，他大喊着说，他们肯定能撑过去。“白人们和黑人们都被打了，”他宣布，“他们携手并进的日子就要来了。”

搭载着吉姆·派克的救护车没有开往卡罗维卫理公会医院，他现在正躺在希尔曼医院急诊室的手术灯下。派克头上的伤口缝了53针，最严重的是额头上4英寸长的马蹄铁形伤口。站在医生们身边的摄影师拍摄了这次缝合的照片，提供了当地报纸。接着，一群记者向仍旧头晕恶心的病人抛来了一堆问题。尽管派克很虚弱，但还是连贯地回答了问题，不过有时要停下来区分一下发生在安尼斯顿的袭击和发生在伯明翰的袭击。最后问及他的计划以及经受残暴的袭击是否值得时，派克简单地回答：“前路碰到阻碍，但我明天仍将登上前往蒙哥马利的公交车。”记者们难以置信地看了看派克，又带着同样的表情相互看了看。记者们离开后，一个警察说派克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听到这句话，一个穿着得体的黑人——跟随夏特沃斯的人——走到手术台旁，往派克的手里塞了一块钱。“如果他们来找麻烦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来救你的。”他悄悄地说。

周一午夜两点时，紧张不安的医院负责人蛮横地让吉姆·派克连夜出院。夏特沃斯过来接上他，他们一起驱车走过同样战战兢兢的伯明翰，后面跟着很多警车。路上他们被盘问了一次，最终，夏特沃斯回到了家，把派克安顿在床上。

在纳什维尔，詹姆斯·贝弗尔主持了一次光荣的周日野餐，庆祝电影院运动中的胜利。贝弗尔提到连续进行了40个昼夜的游行，高兴地通过《圣经》中描述的大洪水、耶稣的诱惑以及著名的“40个故事”布道。正在大家通过吃饭、聊天、享受释放压力时，有人听到了收音机里有关灰狗公交车的报告。几乎同时，戴安·纳什建议贝弗尔担任纳什维尔运动的临时主席，组织紧急会议，讨论学生们的回应。贝弗尔回答说野餐结束后再商讨发生在遥远的亚拉巴马州的事也不迟，因为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但纳什坚持己见。纳什说，运动是无私的。个人并不重要，距离、时间和野餐也不是问题。她一直不停地说，设想着自由乘车者在燃烧的公交车上等待帮助的情景，而纳什维尔的资深成员们却留恋着自己的炸鸡和蛋糕。贝弗尔让步了，开始和最亲密的伙伴商讨。“她会一直说我们坏话的。”贝弗尔遗憾地说。贝弗尔知道，无论如何，野餐也无法顺利进行了，就往第一浸信会教堂走去。

每个人都知道自由乘车运动。刚结束在费城的面试回来的约翰·刘易斯当天刚好和他们在一起，他在回到种族平等大会团体的路上停在了纳什维尔。纳什维尔学生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公交车被烧毁这一事件是否预示着罗克希尔事件的重演。自由乘车者们会被关进监狱吗？他们自己是否应该过去加入自由乘车者们？然而，随着一份比一份严重的报告涌入伯明翰，讨论从被监禁转到了牺牲上。自由乘车运动中是否会产生第一位非暴力的殉难者？如果如此，这到底会给自由乘车运动带来益处还是坏处？纳什维尔的学生们是否应该迎接这一风险，甚至主动参与？一场马拉松式的辩论一直持续着，争辩的主题是：掌握着组织资金的纳什维尔基督教领导委员会的成年领导人们是否会同意支持可能导致年轻人死亡的危险举动。

纳什维尔的辩论持续了一整晚，直到周一仍未停歇，再次聚集在伯明翰夏特沃斯家的自由乘车者们也在商讨着。第二天到处都是令人动容的公开报道。夏特沃斯看到当地报纸上都是对袭击事件的同情，而这些文章的作者一直被他视为种

族隔离主义者，他被深深震撼了。《伯明翰新闻》发表了一篇非常痛心的头版文章，题目是“人们四处询问：‘警察在哪里？’”标题下方，与一些殴打的图片并排的是警察局局长康纳的说法：“过去 20 年里，我一直都在说如果他们继续干涉南方事务，那么外来的干涉者们早晚会引发流血事件……这件事发生在周日，发生在母亲节，我们当时尽可能让警察们休假，让他们回家和家人一起度过母亲节。”《伯明翰新闻》并不认可康纳的说法，认为这一借口没有说服力，还指责他与三 K 党共谋此事。伯明翰的龙头商人在《华尔街日报》上称暴力事件是这座城市的“丑事”。在纽约，这则新闻登上了头版，《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决定分别刊登霍华德·K. 史密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收音机中播报的“目击者证言”。在华盛顿，詹姆斯·法默早上看到《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灰狗公交车燃烧的照片后，他召集了纽约种族平等大会的员工，指示他们在自由女神像下再次集会，为自由乘车运动再颁发一枚徽章。

在遥远的东京，各家早报让即将成为伯明翰商会主席的西德尼·斯迈尔最为震惊。带领该市商业代表团参加国际转缸发动机大会的斯迈尔看不懂日文，但他认出了公交车站暴乱的不堪照片。《伯明翰邮报》的摄影师被殴打后，小心地保护了胶卷，将其中的内容公之于众。结果，斯迈尔发现日本接待者对自己冷眼相待，还问出了许多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而聚集而来的各国商人突然之间因伯明翰的大环境而失去了投资兴趣。斯迈尔无言以对，而他来自伯明翰的朋友们则极力解释这个突发事件不能代表整个城市。代表团觉得自己就像被展览的动物一样。尽管斯迈尔是坚定的种族隔离主义者，自 1948 年也是美国南方民主党人，但他告诉来自伯明翰的同事们，必须得对布尔·康纳采取措施。

在夏特沃斯家，传闻说上午 10 点时，美国司法部部长打来电话，要求与西蒙·布克对话。这名《黑玉》杂志的记者告诉肯尼迪，自由乘车者们认为自己被怀有敌意的暴徒“困”在了伯明翰，而有报告称暴徒们正在公交车站聚集。布克把电话递给一些团队领导人，最后，夏特沃斯接听了电话。夏特沃斯告诉肯

尼迪目前急需的是警方在前往蒙哥马利路上的保护。肯尼迪的第一条建议是所有人乘坐同一辆车。他一字一顿地承诺说安排好公交车安保后再打过来。夏特沃斯将对话转述给聚集在一起的自由乘车者们时，大家都高兴极了。自由乘车者们的脸依旧肿胀，手术缝线清晰可见，肺部因浓烟而依旧刺痛，他们都不想面对另一伙暴徒。

在华盛顿，肯尼迪的工作也在相当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着。他在民权方面的左膀右臂伯克·马歇尔因流行性腮腺炎在家卧床两周了。肯尼迪在自己的办公室、马歇尔的公寓、联邦调查局总部的联络人和夏特沃斯的家之间架起了电话网，很快就再次和那位伯明翰牧师联系上了。“好了，”肯尼迪对夏特沃斯说，“康纳先生将在车站提供保护，护送你们到达城市边界。”这是康纳通过联邦调查局传来的消息，因为前一天的暴力事件让伯明翰的领导人向康纳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夏特沃斯思考了一下。“他们也被护送到了安尼斯顿的边界，”夏特沃斯尽量礼貌地回答，“但就是在那里，公交车被烧毁了。”很快，他和肯尼迪就达成了一致，对自由乘车者们的保护要一直持续到亚拉巴马州的边界。

“等一下，”肯尼迪说，“我会再打给你的。”这就是州长帕特森要解决的问题了，而他自1956年民主党人大会时就是肯尼迪政治上的支持者。司法部部长给帕特森和他的助手打了很多电话，而帕特森则抱怨说自由乘车者们不是“善良的”州际旅行者，因此，作为州长，他不能帮助人们违反亚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法律。肯尼迪和伯克·马歇尔坚称如果州政府不能保护自由乘车者们，联邦政府就将采取行动，而由于没人希望联邦的干涉，所以各方应该协调配合，让自由乘车者们尽快离开亚拉巴马州。

在记者、警察、支持者和几车怀有敌意的白人的包围下，夏特沃斯带领18位自由乘车者走到位于布尔·康纳的监狱对面的灰狗公交车站，准备搭乘3点前往蒙哥马利的公交车。他们一路上听到的广播公告不是自己的确切位置，就是等在车站的暴徒数量，还有州长帕特森与司法部部长肯尼迪之间个人交涉的报

告——这本身就是重大新闻。在车站，他们走到上车区等车。伯明翰的警察们尽职地拦住了愤怒的白人，但憎恨和暴力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甚至在他们的安排开始被打破之前。广播报告中称州长帕特森更正了之前的说法。“我拒绝保证其安全通过，”他很快又说道，“亚拉巴马州的公民愤怒非常，我无法保证对这伙暴民的保护。”州长的发言人说，从伯明翰到蒙哥马利的路上，愤怒的白人在公路上随处可见。

这些报告让夏特沃斯再次与肯尼迪通话，而灰狗公交车的工作人员也报告说公交车司机拒绝开车。“让黑人来开车。”肯尼迪告诉灰狗公交车的负责人。他被这些人一遍一遍说有困难、做不到烦透了，便说如果灰狗公交车找不到勇敢的白人完成工作的话，自己可能会派一架空军飞机接走自由乘车者——他两个小时内就能办到。夏特沃斯想继续对各方官员施加压力，同时说自由乘车者们将安静地坐在车站，等待僵局打破的时刻。

自由乘车者们也颇感压力，越是暴露在恐惧中，他们的决心就越不坚定。他们再次被困住了，成为公开的目标，于是 18 位自由乘车者便聚在一起讨论返程的可能性。他们已经将全国的注意力吸引到种族仇恨上，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夸张。更多的殴打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而更长时间的延误将让他们无法在 5 月 17 日周三时到达新奥尔良，那样，他们就无法参加布朗案胜利 7 周年的大型集会了。他们告诉夏特沃斯说决定跳出反对者的包围，搭乘飞机直接前往新奥尔良。他们刚刚订好机票，离开车站，广播就报告了这一变动，给大型破坏活动发送了信号。暴徒们比自由乘车者早一步到达机场，将包围圈转移了过去。

在纳什维尔，大批静坐的资深运动参加者们对自由乘车运动的探讨已经持续了 24 小时。得知种族平等大会团体放弃公交车后，他们讨论的方向也变了。突然之间，讨论的重点不再是帮助自由乘车者们，而是将他们替下来；不是如何让自由乘车运动走向更大的胜利，而是想法避免其失败。戴安·纳什很快就到了华盛顿，找到了在那里参加葬礼的詹姆斯·法默。她问法默如果纳什维尔的学生们

到伯明翰完成自由乘车者们未竟的事业，种族平等大会是否会反对。纳什的要求一时让法默难以回答，但他表示同意。

在华盛顿，罗伯特·肯尼迪回到了司法部，他之前正在伯克·马歇尔的公寓里就灰狗车站的谈判进行最后一轮的努力。马歇尔和他一起回到了司法部，宣布自己的流行性腮腺炎彻底好了。两个人同罗伊·威尔金斯见了面，敦促他支持选民登记计划。之后，肯尼迪走进直属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南方人——约翰·席根塔勒的办公室。“你看，”肯尼迪说，“他们到了机场，却无法起飞。我们能把他们带出得差不多7点了。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过去帮忙？”

席根塔勒眨了眨眼。“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他问道。

“我想他们只是需要有人过去抓住他们的手，告诉他们我们很关心这件事。”肯尼迪说。肯尼迪声音中的急迫让席根塔勒马上动身前往机场。经过在亚特兰大的短暂停留，两个小时后，席根塔勒与肯尼迪通了电话，说自由乘车者们仍在伯明翰，由于炸弹威胁而无限期滞留。

席根塔勒在路上时，350名黑人涌入金斯顿浸信会教堂参加大型集会。夏特沃斯到达前，一位牧师正试图说服大家捐款，为夏特沃斯购置新车，因为沙利文诽谤案中，夏特沃斯的汽车被扣押了。听众中有个人站起来讲话，他明显很清楚伯明翰运动的新动态。“假设《纽约时报》知道我们6个月前才给他买了辆新车会怎样？”这是他说出的唯一一句。夏特沃斯是他们的代表。夏特沃斯的形象越发高大，他们随之膨胀，而他们也相信，夏特沃斯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凭借的完全是勇气。他很可能被说服不去辛辛那提。

9点刚过，夏特沃斯就走进来了。他发表了演讲，说明了白天发生的事以及针对其的努力。“我和鲍勃·肯尼迪谈了6次，”夏特沃斯宣布，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多次详细说明了国家最高法官对自己是如何礼貌和焦急，而这位法官官员还是一个白人。这时，别人悄悄送来消息，夏特沃斯便对听众们说了一句：“不好意思，身在远方的鲍勃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匆匆离开，回来时带来了完整

的报告，“因为鲍勃和布尔谈过了，今晚机场将有无数警察，”夏特沃斯总结道，“在车站时，警察们没找我麻烦……鲍勃告诉我：‘如果你没在办公室找到我，就给白宫打电话。’这就是他的原话。”

夏特沃斯走下讲台后，另一位牧师用一段浮夸的呐喊结束了这次集会：“我们的主席真的很伟大，他既有勇气也有信念，不是吗？F.L.夏特沃斯独一无二！”

城市的另一端，席根塔勒在伯明翰机场看到受害者们挤成一团，既因为斗争的疲惫，也因为自身的伤口。晚上，在不断传来的炸弹威胁下，有些人已经开始出现精神错乱的迹象，需要他人进行控制。席根塔勒和西蒙·布克谈过之后，就找到警察负责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们不希望出现任何麻烦，”席根塔勒说，“我们就想让这些人离开。”

“我们也一样，”警察重复了一下布尔·康纳的命令。他带领席根塔勒见到了客机管理人员，而空管人员正心烦意乱，因为每报告一次有班机飞往新奥尔良，炸弹威胁就会如期而至。他们3个人想出了一个计划，包括转移机场方面的注意力和不通知就让飞机起飞等，最关键的是，命令机场人员在飞机离开地面前不得接听电话。很快，席根塔勒就和自由乘车者们一起登机了，警察部队也关上了他们身后的大门，午夜时分，飞机起飞了。种族平等大会的成员们在亚拉巴马州停留了两天，也就是在南方停留过11天后，安全到达了城市上空。

4个小时后，伯克·马歇尔的一通电话打到了新奥尔良的酒店中，吵醒了席根塔勒。“你知道戴安·纳什吗？”马歇尔已经失去了一贯的镇定。

“知道，我认识她。”席根塔勒说。

“那好，你马上离开那个该死的地方，”马歇尔说，“又一拨儿人准备到伯明翰，登上公交车，完成那些人没做完的事……如果你能让他们回心转意，我会很高兴的。”席根塔勒给出无力的回答后，马歇尔说：“戴安·纳什也在其中。”

席根塔勒起床了，给连续两天早上举行危机会议的纳什维尔教堂打电话，电

话正占线。接着，各大新闻媒体在早报标题上宣告自由乘车运动的终结后，《早间新闻》播报员便宣布肯尼迪总统将于当天前往加拿大，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席根塔勒开始给自己在纳什维尔认识的人打电话，而那些人可能向纳什施加压力。席根塔勒描述了伯明翰糟糕的现实。“我刚从那里来，”他说，“那里是人间地狱。纳什会害得所有人被杀的。”

5月16日，周二，到处都是令人恼火的细节。行动方面最微不足道的问题——他们是应该分别乘车从纳什维尔前往伯明翰，还是应该冒着接替之前的自由乘车者之前就被逼停的风险坚持原则？——这带来了涉及哲学及个人信仰的大问题，而一个问题看似解决后，总有人会提出之前的疑问，或者带来新的问题。席根塔勒打来了电话，刚看到有关吉姆·派克可怕新闻的父母也或抽泣或愤怒地打来电话。人心本就不稳，这一下之前的共识就更岌岌可危了。那天晚上，仍有分歧的纳什维尔资深成员同意从静坐的资金中贡献900美元，可却没有明确支持学生们的计划，这时，戴安·纳什被众人推举，给夏特沃斯打了最后一通电话。“学生们，”纳什说，“已经决定不能让暴力占上风。我们要到伯明翰去，继续自由乘车运动。”

“年轻的女士，”夏特沃斯用最权威的声音回答，“你知道吗？自由乘车者们差点在那里被杀。”

“我知道，”纳什已经快没有耐心了，她简短地回答道，“这正是我们不得不停下的原因。如果他们暴力阻止我们，那这场行动就完了。我们要过去。我们是想知道您是否能和我们一起。”

她回到学生们中间，准备做出最后最艰难的决定：应选择哪些志愿者参与运动。这被当作是性命攸关的问题。资金购买了10张公交车票后还略有剩余，他们决定由主席詹姆斯·贝弗尔选择10个人。贝弗尔首先选择了约翰·刘易斯，这是为了保证有效领导，并维系与之前自由乘车运动的延续性。贝弗尔说自己不会指定戴安·纳什，因为她对纳什维尔备受关注的人们来说相当重要。最后，贝弗

尔选择了6名黑人男学生、两位黑人女性、一位白人男性和一位白人女性——他们都是来自被贝弗尔称为“非暴力常备军”的老兵。贝弗尔本人并不参加行动，他解释说这是因为自己早已答应要开车到纽约，帮助朋友搬运家具，好在朋友婚礼后帮忙布置婚房。纳什和其他一些人反对的正是这种与资产阶级的联系，但他们的反对没有影响贝弗尔其他的选择。

纳什将细节转告给了夏特沃斯时，用上了刚编出来的暗号。她提到多名“小鸡”正要在特定时间被送往伯明翰，有的带有斑点，有的则是罗德岛红鸡。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通知夏特沃斯说警方正在窃听其通话。10点，纳什维尔的学生们终于解散了。被选中的自由乘车者们与其他人深情告别。有些人还写下了遗嘱。有些通知了亲戚、朋友、老师和学院院长。所有人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打包行李后，想尽量睡一觉。

塞林·麦科勒姆错过了凌晨的灰狗公交车，于是，这位白人女性便搭车以超过5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飞奔在31号公路上，在田纳西州的普瓦斯基追上了其他人。除了对白人吉姆·茨威格和黑人保罗·布鲁克坐在一起是否违反大家都同意的计划进行小声争论外，再没有其他麻烦产生，直到伯明翰警方挥舞旗帜，让汽车在纳什维尔以南约200英里处停下。警察们很快以违反亚拉巴马州种族隔离法律为由逮捕了茨威格和布鲁克。接着，有些警察就表情严肃地留在了车上，其他警察则开着巡逻车，护送公交车前往终点站。快到车站时，更多警察跳上了公交车。他们守住前门，在所有窗户上贴上报纸，还检查了每位想要下车的乘客的车票。车票上表明途经蒙哥马利和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且始发终点为纳什维尔和新奥尔良的乘客被默认为自由乘车者，不得下车。那些坚持认为自己有权下车的人都受到了粗暴对待，警棍顶着他们的肚子，把他们抵在座位上。塞林看到自由乘车者们被隔离在阴暗的公交车上，便开始利用自己车票上始发站为普瓦斯基而不是纳什维尔的这一事实。“我和他们不是一起的。”她拿出车票说。警察允许她离开后，塞林便穿过聚集在一起的暴徒们，给在纳什维尔的戴安·纳什打了电

话。于是，纳什给伯克·马歇尔在司法部的办公室打了电话，询问为什么自由乘车者们被强留在车站。

公交车内，自由乘车者们遵守着习自吉姆·劳森的原则。他们坚持自己有权离开，要从座位上站起来，直到被警察按下去。此外，他们还试图与警察进行沟通。自由乘车者们挨个儿询问警察是不是“二战”老兵，如果是的话，那么他们在“二战”中又为何而斗争。自由乘车者们还问警察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是的话，他们是否相信基督是为了全人类而死。大部分对话都不值得铭记，但随着事件的推移，自由乘车者们确实消磨了警察们的耐心，于是警察们便开始威胁自由乘车者，但并未伤害他们。僵局持续了一个小时后，警方长官确定这9位自由乘车者不可能像两天前的那些一样撤退到机场去，同时新的命令也下来了，允许自由乘车者们离开公交车。很快，自由乘车者们就下了车，忍受着聚集在终点停车场附近人群的嘲笑。警察们站在走廊两旁，戴着蓝色警盔，像罗马守卫一样别着警棍，纳什维尔的学生们走进走廊，穿过人群，走进了终点站大楼，塞林·麦科勒姆和弗雷德·夏特沃斯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周一在伯明翰灰狗公交车终点站的围攻在周三再次上演。警察们处在保护与反抗的脆弱交界线上，既要维持和平，又要保护种族隔离。现在，在自由乘车者们看来，警察们是在保护自己免受愤怒的白人暴徒的伤害。警察们说，如果自由乘车者们不到白人等候室，和白人们搅在一起，他们的工作就简单多了。面对这种说法，还有一系列相似的奉承话，自由乘车者们坚定地说，根据最高法院对博因顿案的判决，自己决定在这里等着搭乘5点前往蒙哥马利的公交车。

僵局又持续了3个小时，这段时间里，人群的敌意转向了警察们，因为警察总是不断将他们推后。最后，自由乘车者们登上前往蒙哥马利的公交车时，布爾·康纳亲自出现了，命令手下逮捕那些人。警察们把手铐戴在10名自由乘车者手腕上时，旁观者中爆发出了欢呼声。而当康纳的强硬对手弗雷德·夏特沃斯要求他给出理由时，康纳也逮捕了夏特沃斯，人群中的欢呼声更大了。康纳通过

行动满足了种族隔离主义者后，转而对记者们说自己是将自由乘车者们置于“保护性监禁”下，以此抚慰注重自身形象的市政当局。学生们被送往伯明翰监狱的途中，高唱着自由歌曲。他们安慰自己说这一晚总不会比纳什维尔警戒线那次更难熬。

自由乘车者们走向监狱时，肯尼迪总统从加拿大回国了。第二天早上，未经官方宣布或登记，罗伯特·肯尼迪在拜伦·怀特和伯克·马歇尔的陪同下，走进了白宫的总统私人区域。司法部的3个人进去时，总统正穿着睡衣，面前还摆着早餐。司法部部长跟兄长打了招呼，仿佛要继续之前被打断的事务会议一般。“你知道的，亚拉巴马的形势越来越不好了。”罗伯特·肯尼迪说。新一拨儿自由乘车者在伯明翰监狱绝食，要求重登公交车。灰狗公交车的官员们对自己的车辆被烧毁一事非常懊恼，拒绝在没有警方保护的前提下搭载任何自由乘车者。而州长帕特森则拒绝重复自己周一半否认的决定。司法部部长说，实际上，州长的意思模棱两可——几乎是在逃避，免得落入政治陷阱中。如果帕特森通过宣布自由乘车者为州际旅行乘客对其进行回护，那么亚拉巴马州的选民们可能会说他向联邦政府让步，牺牲了亚拉巴马州种族隔离的法律，成了跨种族挑事者这一令人憎恨的团体怯懦的喽啰。相反，如果帕特森宣布自己无法保护自由乘车者，或不愿意保护自由乘车者，就等于他承认了州管辖权有局限，只会让联邦政府在亚拉巴马州插手警务。对帕特森来说，任何一条路无疑都会是政治自杀。

目前僵局仍未被打破，这是联邦政府最不能接受的结果。司法部部长没有说明——他也没有必要说——自己高调将第一批自由乘车者转移出伯明翰的行动已经让这个事件在全国沸沸扬扬，而且记者们现在还在亚拉巴马，等着联邦政府化解第二次危机。对罗伯特·肯尼迪来说，这一困境是种族问题上神秘的非常规力量的一次让人耻辱的示威。通过搭乘公交车，十来个和平主义者就攫取了他们的注意力，那些人不为人知、默默无闻，还带有半自杀的决心。肯尼迪曾经的承诺振奋人心，说要践行民权方面的法律——“我们会采取行动”，而不到两周的时间

里，现实就将严苛的考验放在了他面前，他是否能让一辆公交车开出伯明翰车站决定了政府的声誉。

司法部部长说，他们已经来过白宫，报告自己已经开启了在亚拉巴马进行直接联邦干预的紧急计划。如果事态恶化，总统本人可能被要求公开行动。3位司法部高官一致认为，最激烈也是最不堪的选择是“小石城方案”——出动正规军保护自由乘车者们搭乘的公交车。这种选择有很多不利之处，其中一个肯尼迪总统的竞选说明中抨击了艾森豪威尔，指责他放任1957年小石城校园危机，以至于最后必须出动联邦部队。肯尼迪曾承诺通过更有力、更具远见卓识的领导，避免此类悲伤事件的再次发生。现在肯尼迪上台不久，猪湾事件也才刚刚过去，若是在这一点上动摇可能会让人们质疑总统是否有基本的执政能力。南方的愤怒肯定会压在肯尼迪身上，而与艾森豪威尔不同的是，肯尼迪政府依靠的是南方选民坚定的支持。

与这些负面影响交织在一起的是总统政治生涯上最有趣也是最富有戏剧性的新事实。两天前，白宫透露肯尼迪总统将在本月内与苏联前主席赫鲁晓夫于维也纳见面，私下里商讨东西方分化的全部问题。对总统来说，在猪湾事件的影响下进行这种关乎命运的对话已经非常糟糕了。自由主义之花盛开的国度中，种族冲突的背景下，与赫鲁晓夫见面的同时还要指挥军队对抗自己国家的人民，这会让肯尼迪成为苏联领导人公开的笑柄。显然，选择出动军队会带来多场灾难，也是可怕的最后手段。除了调动军队外，肯尼迪另外的选择是出动国民警卫队，不过这也强不了多少。到目前为止，最佳选择是动员美国法警以及联邦的民事执法机构保护自由乘车者们的公交车。

这些都用不着跟肯尼迪总统说，在需要同时对多件事情进行考量时，他的脑子转得最快。罗伯特·肯尼迪请拜伦·怀特向总统报告自己为聚集民事执法机构力量所做的努力。怀特指明除法警外，自己联系了很多机构——包括美国边境巡警、财政部烟酒枪械管理署（即非法酿酒商口中的“缉私船”），甚至还包括监狱

管理局。联邦监狱管理局同意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出借监狱守卫。怀特流利地说出不同部门、不同地点可以调动的特工以及根据其与蒙哥马利之间的距离，他们预计能开始行动的时间。此外，怀特还说明了从伯明翰到蒙哥马利一路上的人员部署计划。

怀特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临时指挥，简要地向总统说明了自己将如何统一指挥各不相干的部门。怀特报告说，陆军同意出借飞机、卡车、营房和口粮，以帮助解决严重的后勤运输问题。他还直言不讳地说，在听到手下的士兵们不愿意压制国内暴乱之后，军官们都长舒了一口气，我们与它的合作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怀特最后不快地说，整项任务看似不可能完成，但并非毫无办法。他希望不要动用军队。为了这一目标，之前进行的准备已经通知了帕特森州长，以加强政府最后通牒的可信度。如果帕特森未能通过州政府的权力保护合法旅行者免受暴力伤害，联邦政府将别无选择，只能插手。

怀特说完后，罗伯特·肯尼迪请伯克·马歇尔概述了法律赋予总统的权力。马歇尔很紧张，因为他之前从未见过总统，但总统警惕的神态让他感到安慰，想起了将复杂的法律纠纷摆在显然已精通此道的法官面前的感觉。马歇尔告诉肯尼迪，按照法律要求，无论是出动军队还是国民警卫队，采取这种选择前，总统都应发表公共秩序彻底崩溃的声明。因此，上述选择实际上会加深国家危机，从而更让总统自己的声誉处在不利地位。令人高兴的是，马歇尔朗读了《美国法典》的第10卷第331、332和333章，他由此确信动用拜伦·怀特的代理法警们只需要向司法部部长签发书面通知，说明公共安全已受到威胁，并命令司法部部长动用所有力量践行联邦法律即可。马歇尔说，这一通知不必公布，也就意味着政府有权在不影响总统声誉的情况下执行怀特的计划。此外，司法部的律师们正准备要求亚拉巴马州强硬的联邦法官小弗兰克·约翰逊出具法庭命令，要求亚拉巴马州的三K党不得干涉自由乘车者和平旅行的权利，并要求亚拉巴马州的警察部门在自由乘车者们面临公共威胁时提供足够的保护。如果成功，这一命令即可成

为出动代理法警的法律依据。

肯尼迪总统问了几个问题，大多是关于时机的。出于其自己未说明的原因，他问马歇尔周一之前不做决定是否可行。马歇尔回答说僵局可能不会持续到周一。自由乘车者们被非法拘禁，没有涉及任何诉讼，而律师们正在争取他们的释放。总统回到最佳解决之道这一点上，想知道如何能最有效地让州长帕特森承担责任。因为总统与帕特森有个人交情。是否已经到了自己直接联系帕特森的时候？若是如此，是应该通过电话、电报还是信件？最终，大家决定往帕特森位于蒙哥马利的办公室打电话。片刻之后，苦恼的接线员报告称州长正远在墨西哥湾某处的渔船上。连白宫都联系不上帕特森。这种过分的冷落让肯尼迪兄弟认识了与之前有天壤之别的帕特森。

总统参与的消息将不会为人所知。司法部部长会说自己是在与顾问们会面，商讨如何维护亚拉巴马州的法律与秩序。3位司法部的官员将实行当天早上制订的紧急计划。安排好各项事务后，总统就先行离开，为当天的工作整理装束了。伯克·马歇尔离开时，回头看了一眼房间，被桌子上的早餐盘震撼了，因为里面的早餐还一点未动。

这3个人一整天都在司法部处理混乱的局势。他们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支法警队伍，唯一能帮到他们的就是前司法部部长罗杰斯在小石城事件后进行的反动乱训练课程。律师们匆忙穿行于走廊之间，带着他们所谓的亚拉巴马州“现场地图”。他们讨论了武器、战术以及新法警们的着装。他们拒绝了记者们的采访。而高级官员们则与美国军需部队的指挥官们说着模棱两可的话。

在伯明翰，喧闹的晚间审讯过后，夏特沃斯妨碍公务罪名成立。午夜过后，在布尔·康纳奇迹般恢复健康的消息到达之后，司法部的电话就响个不停。布尔·康纳的手下将跛着脚却仍在抗议的自由乘车者们拽出监狱，扔到没有标记的警车上。康纳亲自向联邦官员保证说不会伤害他们，称自己将带着两位记者做见证人。康纳说，自己的妥协将在符合亚拉巴马州法律及亚拉巴马州选民意见的前

提下保护自由乘车者们。他将亲自“陪护”自由乘车者们，趁夜离开亚拉巴马州，进入田纳西州。他的计划立刻转达到了司法部，继而转达给了席根塔勒，大家都认为虽然这一计划并非常规手段，而且不合法，但对噩梦一般的僵局来说已经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至于华盛顿方面提出的问题——他如何向自己的监狱人员解释这次对自由乘车者们的释放，康纳只是一笑了之。“我忍不了他们的歌声了。”康纳语带讥讽地答道。

沿着 31 号国家高速公路一路向北，约翰·刘易斯就坐在布尔·康纳的后面。他非常害怕警察的殴打，甚至怀疑有提前安排好的私刑，渐渐变得和经常被人提到的自由乘车者凯瑟琳·伯克一样胆怯。凯瑟琳开始和可怕的逮捕者进行了友好的谈话，说愿意为逮捕者做早餐，而且，如果逮捕者愿意陪她回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她就会带着基督徒的善意让他闭嘴。康纳听完之后只是和善地说自己非常愿意享受凯瑟琳的厨艺。随着旅途的进行，两个人非常开心地交谈起来，这让刘易斯和其他人都非常惊讶。

康纳突然在田纳西州的边界小镇阿德莫尔让车队停下。手下们将自由乘车者们的行李取出放在路边时，他指着黑暗中自由乘车者身旁的铁轨，告诉他们车站就在前面。“你们可以从那里搭上回纳什维尔的火车。”康纳说完就走了。自由乘车者们孤独地在黎明前的寂静中抱作一团，他们所处的位置距离伯明翰有 100 多英里，距离纳什维尔则有不到 100 英里。

自由乘车者们发现，他们在一起的只有 7 个人。监狱的隔离让他们无法提前得知塞林·麦科勒姆的父亲已从纽约布法罗搭飞机而来，要求对女儿实行个人监管，他们也不知道吉姆·茨威格和保罗·布鲁克早已被分别释放。试探性地拥抱和庆祝后，他们只说了几句话便了解到，他们在阿德莫尔或附近都没有熟人。这些人两天没有吃东西了，饥饿感越发强烈。此外，他们觉得，身处黑暗中的不毛之地比在伯明翰监狱的狱室中更不安全。最终，虽然他们害怕三 K 党成员会在前面的大楼里等着，却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过去。他们没找到火车站，也没找到什

么鼓舞人心的东西，但他们找到了一部付费电话，于是便给纳什维尔运动总部拨打了对方的付费电话。

戴安·纳什一夜未眠，她基本没怎么听他们离奇的消息，然后提出了一项紧急事务。“另有11个人通过别的交通方式到了伯明翰，”她说。这意味着另有11名学生被招募参与自由乘车运动了，以免前10个人因蹲监狱而难以继续参加运动。“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纳什问道。在阿德莫尔局促不安的自由乘车者们说会再打电话，因为他和同伴们除了食物和救援外，想不到更多了。

7个人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住处。他们拖着行李箱，排成一队，沿着铁轨寻找阿德莫尔城里的“黑人之家”。黎明第一道曙光透出来时，他们发现了一个黑人的家。前来应门的是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妻，他们都是头脑简单、远离世事的农民，并不太了解外面的世界。然而，当时每个南方黑人都听说了自由乘车者，而突然意识到这些革命者就出现在家门口寻求帮助，这对夫妻就如同遇到火星入侵一般而极度害怕。老人大喊一声关上了门。7位自由乘车者恳求了很久，还多次背诵了《圣经》中的句子才被允许进屋，但最终，战战兢兢的夫妻二人还是帮助了自由乘车者们，因为保护的本能战胜了恐惧，骄傲战胜了疑虑。实际上，那位年长的男人很有冒险精神，同意出去给自由乘车者们买食物。为了最大限度地打消别人的疑虑，他长了个心眼儿，去几家不同的商店才买齐了大量食物。他说所有的白人商人都知道自己和妻子每次最多只会买两打鸡蛋或两磅腊肠。

在这个简陋的避难所，约翰·刘易斯给戴安·纳什打了电话，告诉纳什他们共同的决定。刘易斯说，一旦安排好交通，7个人就会回到伯明翰。纳什早已找到了一个名为利奥·利拉德的人，他自愿担任司机，几分钟内就可以出发。等司机的时候，他们通过自问自答非暴力的信条，更坚定了信念。他们一直在说，如果逃回到纳什维尔，他们就会让种族隔离主义者们顺心遂意。他们由于恐惧而退缩了。可他们不得不回去。利拉德的车出现在约定的地点时，他们全都挤了进

去，前排后排各坐了4个人，还让利拉德沿着布尔·康纳带他们过来的路，向南往伯明翰开去。疲惫让7个人有些头晕，但他们身上依旧洋溢着乐观精神，他们坚信，看到康纳这样的老古董身上都会闪耀着人性的光辉，那么暴徒们的怨恨也不会持续太久。听到收音机中传来亚拉巴马州白人广播员轻松地宣布“所谓的自由乘车者们”已经不见踪影，由布尔·康纳送到了纳什维尔后，他们都很兴奋。车里的笑声常常被令人害怕的沉默打断，因为一切好得难以置信。突然之间，他们不只是上了新闻，还走在了媒体之前。他们带领了种族隔离方面的游行。

在周五早上的华盛顿，伯克·马歇尔正忙着解决因流行性腮腺炎而没有工作的日子里堆积起来的日常工作。他的工作人员整理发送了罗伯特·肯尼迪写给马丁·路德·金的信，感谢他支持司法部部长在佐治亚大学演讲的电报。“我希望您继续让我知道您的看法，”信上如此说道，最后一行，肯尼迪的结语相对比较有亲和力——“十分感谢您。”

马歇尔的另一项工作是处理写给蒙哥马利市市长厄尔·詹姆斯的信。马歇尔为詹姆斯整理了3次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进行的联邦调查的结果，3次调查均明显涉及蒙哥马利警方进行的非法种族迫害。其中两个案件中，警方街头报告称，在接到报告称黑人空军军官进入了白人社区之后，警方就闯入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的白人住所中，将所有人以扰乱治安罪逮捕。在第三个案件中，一队警察以妨碍治安为由逮捕了一名伊利诺伊州的白人教授、教授夫人以及他的13名学生，而这些人不过是在南方进行社会学实地考察时，到亚拉巴马州附近的一家黑人餐厅享用了午餐。“如果能有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马歇尔告诉詹姆斯市长，“我们不希望采取任何联邦行动，也不希望将之变为公共问题。”马歇尔补充道，联邦政府想要的是：“保证此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这样既避免了联邦政府在这些事件中采取行动，也避免了对您的城市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给您写了这封非正式信件。”

马歇尔的信实行了政府私下劝说的政策。在种族问题上，联邦法律与各州法

律针锋相对，司法部部长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南方的各位官员以更多的自主权。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希望南方人会认为，公开保护过度的种族隔离比私下里放弃更令人尴尬。然而，马歇尔也不得不暗示，联邦政府也沉浸在政治安慰中。马歇尔写这封信全基于政治考量，他自己并不情愿，这给了詹姆斯市长一丝希望，即联邦的威胁也有与此相对的另一层意思。他可以寄希望于这一点，肯尼迪和马歇尔宁愿私下里容忍过度的种族隔离行为，也不愿公开攻击它们。

出于策略考虑，戴安·纳什开始对自己的支援只字未提，但她在南方的同盟得知布尔·康纳在亚拉巴马州取得的胜利后逐渐丧失了信心，于是纳什不能再继续隐瞒了。她通过电话四处暗示自己为康纳先生准备了一份大惊喜。纳什的说法很快传开了，利奥·利拉德的车还没开到伯明翰，那个消息就已出现在公告上。8名学生听到广播中说自由乘车者们——也就是他们自己——不会回到纳什维尔，而是会乘坐私家车回到伯明翰重新战斗时，跑在公路上的汽车也减速了。突然之间，他们不再是去领导游行，而是朝着虎口进发。焦躁烦恼的他们伏在车内的地板上藏身。恐惧之下，他们认为关上所有车窗会更安全，可他们很快就全都被汗水浸透了。利拉德离开了大路，取道贝瑟默，绕路前往伯明翰。利拉德怀疑路上所有的车辆，便说自己会甩掉所有可能跟踪自己的车。

最后，在夏特沃斯的家里，学生们高兴地和先他们一步到达的增援者聚在一起。增援者中有斯佩尔曼学院的鲁比·桃瑞丝·史密斯，她是当年响应罗克希尔入狱行动的4位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学生之一，在学生们中非常有名。看到鲁比，大家感觉到这整个使命更加宏大了。既然他们身在伯明翰，前方任何痛苦都将达成自由乘车运动的目标，他们也不再怯懦，而是兴奋地渴望着重返公交车站。他们围坐在夏特沃斯的桌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三明治，之后，聆听了祷告和最后的指示，便走向市中心，准备搭乘5点钟开往蒙哥马利的灰狗公交。

记者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看到了约翰·刘易斯的脸，还有其他几张熟悉的面孔，于是意识到之前所有疯狂的报告都是真的。在布尔·康纳的压制下而顺从

多年的黑人们，不仅蔑视了他，还在最灼人的公共监督下胜他一筹。这太富有戏剧性了——这是母亲节那天殴打事件以来，自由乘车者们第三次试图从这里出发。自由乘车者们坚忍地穿过极度愤怒的人群走向等在上客区的公交车，然而灰狗公交车公司的人很快就因为没有司机而取消了那趟车。自由乘车者们一起回到车站时，人群中爆发了一轮欢呼声。自由乘车者们称，无论要等多久，他们都要在这里等着搭乘前往蒙哥马利的公交车。伯明翰的官员们切断了公共电话线，关闭了零食摊点，让这场等待越发艰难，而警察也在此逮捕了夏特沃斯，这次是因为布尔·康纳说夏特沃斯“与未知人士密谋”而使暴徒们在母亲节聚集在伯明翰。

警察们带走夏特沃斯时，防暴警察发现必须要在服从非暴力命令的同时，对越来越多的白人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因为据估计，当时的白人约有3000名。起初，警察们只是斥责径直走向自由乘车者或者故意将饮品倒在自由乘车者大腿上的白人们，但警犬最终还是将白人赶出了终点站的大楼。自由乘车者们高唱着《我们终将胜利》。约翰·刘易斯和其他人站成了前后两排，开始祈祷。学生们更为虔诚，其中一个还情不自禁地说恐惧似乎加深了几个怀疑主义者的敬畏感，那几个持怀疑态度的人之前对宗教事务总是敷衍，现在，这位学生感到非常满意。晚上，偶尔有旁观者越过警察，把石头扔进终点站大楼的窗户里。

在华盛顿，危机再次上演。那些被告知可以放下警惕的人被要求再次打起精神。罗伯特·肯尼迪无法让亚拉巴马州州长走下“渔船”，便让肯尼迪总统亲自打了电话。这次，帕特森没有抛出钓鱼的借口，他直接拒绝接听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电话。冷落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记者们耳中，《纽约时报》及其他报纸的头版标题几乎都是“总统无法找到州长”之类的。愤怒的罗伯特·肯尼迪告诉帕特森的助理，总统将公开发布最后通牒，威胁说除非州长现身讨论保护自由乘车者的问题，否则联邦就将介入。这让帕特森与司法部部长进行了长时间且充满恶意的对话。肯尼迪提出的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与帕特森所有的政治目标都背道而

驰。肯尼迪说，如果州长不敢宣布亚拉巴马州将保护自由乘车者们，可以宣布说自己要保护“公路”。可这一巧妙的建议只是激怒了帕特森，他认为司法部部长在对待亚拉巴马州州长政治生涯这件事上只是表面上表示了尊重，然后便开始了长篇大论的讲话。帕特森说自己曾发誓保留种族歧视的权力。“你不用通过电话给我发表政治演讲。”帕特森担心自己被卷入了一场交易，最终将不得不放弃种族隔离。他宣布自己只愿意与总统的个人代表面对面讨论这一问题。

约翰·席根塔勒很快就飞奔在从伯明翰前往蒙哥马利的公路上，兜里还有一封白宫的电报。在踏上表达善意之旅的第五天，他不得不进行更高等级的服务，成了总统的信使。他直接冲到了亚拉巴马州首府。在他人的陪同下走进州长办公室时，他看到的不只是帕特森，还有所有亚拉巴马州内阁成员警惕的面孔，那些人正围坐在长桌前，准备开始特别晚间会议。

“很高兴见到你。你是个南方人。”帕特森听出了席根塔勒的田纳西口音。真诚的欢迎过后，帕特森开始了愤怒的讲话，而席根塔勒认为他的话不过代表了聚集在此处的亚拉巴马政客们的利益。“除了我，整个国家再没有人挺直脊梁对抗黑鬼们，”帕特森如往常一样大胆，用了“黑鬼”这个词，“我告诉你们，那张桌子的抽屉里有无数信件赞扬我采取的措施，我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做斗争……我正与马丁·路德·金，还有那些惹是生非的人做斗争。我要说的是，我认为凭我的所作所为，在这个国家里，我比约翰·肯尼迪更受欢迎。”随后他还说了一大套更漂亮的场面话，急切地在什么才是把自由乘车者弄出亚拉巴马这个问题上讨价还价。就这么过了一阵，帕特森让席根塔勒用自己的私人电话，在亚拉巴马州人的见证下，向罗伯特·肯尼迪汇报结果。

“他是这样跟我说的，”席根塔勒看着笔记对肯尼迪说，“亚拉巴马州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人民以及自己的装备，足以保护亚拉巴马州的所有人，无论那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还是在其他地方。他说他‘不需要联邦政府的帮助，也不想要’。”

“他真这么想的？”肯尼迪问席根塔勒。

“我认为是，”席根塔勒回答说。接着，席根塔勒问帕特森，“州长，他想知道你是不是认真的。”

“我是以州长的名义说的这番话，”帕特森回答，接着他又大声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声明，就算席根塔勒的手捂住了话筒，电话那边的肯尼迪还是听得一清二楚。进一步转达了相关细节后，席根塔勒很快就用州长的电话联系了灰狗公交公司的主席，而主席也和肯尼迪一样因为保护的事焦头烂额。州长帕特森不吝其词地表达了自己对灰狗公交车上周日在安尼斯顿被烧毁车辆的遗憾。最后，一切尘埃落定时，席根塔勒对亚拉巴马公共安全部部长弗洛伊德·曼恩有了更为亲近的关系。曼恩的行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例如，州长坚持认为曼恩的高速公路巡警保护黑人，还有不要过分捍卫城市警察的特权，那可是很受人嫉妒的。但他给席根塔勒留下了既有同情心又专业的印象，此外，曼恩还决定要保护自由乘车者们，避免其受到公路上的伏击。

联邦政府官员和州长一直争论到深夜。帕特森州长甚至一面不情愿地做出让步，另一面还是想要点花招阻止自由乘车者们。帕特森州长自己的司法部部长麦克唐纳·加利恩从蒙哥马利的法官沃尔特·B. 琼斯手里得到了一张禁止令，禁止“进入或在亚拉巴马州范围内旅行，或参与所谓的‘自由乘车运动’及其他将破坏和平的行为或做法”。虽然法默人仍在华盛顿，而且自周一一起已经没有种族平等大会的人参与自由乘车运动了，但这张禁止令是正式写给詹姆斯·法默和种族平等大会的。从亚拉巴马州的角度看，这张禁止令将作为因蔑视法庭而进行逮捕的法律依据，至少暂时如此，并与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5年的禁止令一样，将整个争端转移至法庭系统的迷宫中。亚拉巴马州的律师们赶紧完善了禁止令的相关修订，使之适用于自由乘车者。

第二天早上6:05，禁止令还未到达伯明翰，灰狗长途司机的乔·卡维尔诺站出来向记者和19名睡眠惺忪的自由乘车者（14名增援者中有2人熬不住漫漫

长夜退出了)发表了讲话,当时他们正聚集在一辆标着“圣彼得堡快车”的双层公交车前面的上车区。“我本应该开车经由蒙哥马利,前往亚拉巴马州的多森,”卡维尔诺紧张地说,“但我知道前面路上有护卫队。我能奉上的只有自己的生命。但我不想将生命奉献给种族平等大会或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就是所有我要说的。”说完,他穿过终点站标有“司机专用”的门,他对流传于众人口中的高层安排进行了雄辩的否认,让听众们颇为不解。困惑从一动不动的公交车中渗透出来,布尔·康纳的手下也和其他人一样困惑。这时,唯一的白人男性吉姆·茨威格独唱起来:“噢,上帝,把目光放在这个奖品上吧。”

在华盛顿,刚刚发生的混乱毁了罗伯特·肯尼迪的周六清晨。他给灰狗公交车在伯明翰的负责人打了电话,要求他做出解释。“司机们拒绝开车。”恼怒的乔治·克鲁特说。

“你会开车吗?”肯尼迪用异常平静的声音问。

“不会。”

“好的,但你们破公司总有人会开车,对吧?”肯尼迪说,“我认为你应该,或者说你最好联系一下灰狗先生或者那个领头的,最好有人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那帮人不能继续履行,我本人——还有政府都将非常失望。”

最后一句话被亚拉巴马州置于电话线上的窃听器听到了,很快就作为罗伯特·肯尼迪暗中帮助黑人们的证据,出现在南方各大报纸上。越来越多持阴谋论的南方人认为肯尼迪是整个自由乘车运动的幕后主使。与其司法部部长任职期间的任何语言或行动相比,这件事对肯尼迪在南方政治地位的破坏作用都要大得多,“鲍比”这个名词将成为他在南方的诨号。肯尼迪的话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引起了双方直接且更为激进的对话。布尔·康纳出现在车站,加入了私下的谈判中。最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阴着脸的卡维尔诺和当地公交车司机工会主席以及灰狗公交车调度主管一起走了出来。警察们让受到惊吓的自由乘车者们跟在3个人后面上了车,而记者们则坐到自己的车里跟着,圣彼得堡快车在呼号

着警笛的警车陪同下冲出了伯明翰。高速公路巡警在城市边界接到了他们，于是，在整个护送队的陪同下，包括联邦调查局调查员、亚拉巴马州便衣侦探、高速巡逻飞机以及跟在后面的记者在内，公交车以约 90 英里每小时的速度朝蒙哥马利驶去。

自母亲节殴打过后停滞不前的自由乘车运动于 5 月 20 日早上八点半恢复了。其间，约翰·刘易斯和其他来自纳什维尔的学生们在过山车式的喜悦与恐惧、兴奋与无聊中度过了六天六夜。大部分时间中，他们都在睡觉，而其中几个在这一时刻则以困倦表达兴奋。终于松了一口气的司法部部长走到户外，在弗吉尼亚的乡间策马奔腾了一段时间。

蒙哥马利联邦调查局办公室的特工主管向总部报告说，警察署长承诺要在自由乘车者们到达首府时给予保护，而他自己对此一字不信，这份消息最终传到了司法部马歇尔的手中。于是，华盛顿方面下达了命令，提醒沙利文有关州长的承诺。特工主管表示服从，告诉沙利文说公交车正在离开伯明翰的路上。弗洛伊德·曼恩也不相信蒙哥马利警方，他给沙利文打了电话，确定其对恰当的通知没有异议。曼恩告诉沙利文说自己刚刚接到高速巡逻飞机的报告，称公交车离蒙哥马利已不到 14 英里，而不得在城市范围内行动的高速巡逻队即将离开。沙利文回答说，公车站处已有大量蒙哥马利的警察把守。当时来看，沙利文说得没错，然而，警察们很快就散去了。

蒙哥马利的别处，席根塔勒刚刚和约翰·多尔共同享用完早餐，此前，他们一直在附近的塞尔玛共同致力于选举权的工作。席根塔勒很想向多尔这位有经验的顾问征求意见，但也知道要避免与之公开接触。由于多尔的案件已经让其成为亚拉巴马州支持种族隔离的各位官员的敌人，伯克·马歇尔只好命令多尔远离自由乘车运动这场危机。因此，两位司法部同事直到席根塔勒拜访帕特森的前夜才恢复了私人联系，但依然非常审慎小心。他们决定在自由乘车者们到来之前分别。多尔想继续处理塞尔玛的案件。于是，穿着从多尔处借来的运动服的席根塔

勒就把他带到了市中心的联邦大楼，正好可以俯瞰灰狗车站。之后，席根塔勒就独自开车，在各个街区中穿行，寻找停车位。席根塔勒根据正常的公交车班次错误地估计了到达时间，以为圣彼得堡快车还有半个小时才会到。实际上，这辆开得飞快的公交车已经到站了，只是席根塔勒没有看到而已，他看到的是骑着摩托车的警察快速撤离了该区域。

约翰·刘易斯被选为团队发言人，公交车停靠后，他首先下车，站在月台上，面前的记者围成了半圆形。其他记者蜂拥而至，站在刘易斯面前，而自由乘车者们则站在他身后。刘易斯观察了一下车站区域，他很熟悉这里，之前他曾多次搭车从这里回到附近的特洛伊，而也正是在这里，他曾给新参加运动的人布道。现在，所有的站台、街道和停车场都非常荒凉。除了几个把车停在远处的计程车司机，他只能看到车站入口阴影处藏着十几个白人。刘易斯有种不祥的预感。“这看上去不对劲。”他对一个同伴小声说。

面对一排摄像机、麦克风和记事本，正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刘易斯说到一半就忽然陷入了沉默，被记者们身后走过来的人吓坏了。亚特兰大《时代生活》的总编辑诺曼·里特尔看到刘易斯的脸色，一回头就看到那十几个站在门口的白人。他张开双臂，想划出采访的界限，但那些人挥舞着棒球棍、酒瓶和铅管，推开了他。其中一个暴徒扇了全国广播公司的莫伊·李维一巴掌，也正是这第一巴掌引发了一系列对摄像机和其他设备的打砸。

“我们站在一起。”自由乘车者们在封闭的上车区里往后退时，刘易斯对众人说。他们退到了墙体前面的栏杆处，无助地站着，眼睁睁地看着白人们涌过来。刘易斯团队中的有些人跳了下去，有的人被推了下去，还有一些是直接被扔了下去，摔在下面停在邮局停车场里的车上。没有带行李的人们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行李箱也被丢了下來。月台上，反对这种行为或者想拍摄攻击图片的记者们也被刚刚爆发的一小伙儿暴徒袭击了。愤怒的白人们用《生命》摄影师唐·乌尔布洛克的相机反复砸他的脸，他们用棍子把诺曼·里特尔打倒在地，殴打了伯明翰的电

视记者，还追赶那些已经逃跑的记者。

而被扔下去的自由乘车者意识到早就在各个观察点等着他们的白人正从四面八方走过来。有些跟在后面，有的还带着武器，前面一个穿着黄裙子的女人不断怂恿他们，高喊着：“抓住那些黑鬼！”一阵恐慌后，自由乘车者在附近找到了两辆黑人驾驶的计程车，想先把7位女性安全送走。5位黑人中的4位跳上第一辆计程车的后座，因为前面坐着一个小男孩。“不行，我只能带4个人！”司机看到自己吸引了走过来的白人的注意，不禁大喊道。没时间争论了。自由乘车者们把第五位黑人女性塞进了前排。“不行，我真的没办法带她们走！”司机看着两个白人学生——苏珊·韦尔伯和苏·哈曼恩说。门一下被关上了，司机一下启动车子开走了，而那两个白人则被塞进了另外一辆计程车里。那位司机还没来得及说搭载白人是违法的，暴徒们就拉了他一下，拔下了车钥匙，不让汽车离开，接着，就把两个白人从后座上拽了下来。其他人则追赶着自由乘车者中的男性——其中有一些正试图按照约翰·路易斯喊出的指示，先绕道哥伦比亚大街，爬上山路，到拉尔夫·D.阿伯纳斯的教堂避难，可惜这是徒劳的。

第一辆计程车里充满了尖叫和喊声，司机发现停车场两个出口中的一个被愤怒的白人挡住了。他迅速掉头，一堆相互冲突的意见涌进司机耳朵里，可他却发现另一个出口被汽车堵住了。司机再也无法承受，便告诉自由乘车者们自己准备弃车而逃了。几位乘客极力想让司机平静下来，剩下的则害怕地看着身后的上客区。和几个站在附近的亚拉巴马州记者一起，他们看到十几个人围住了吉姆·茨威格，那个从威斯康星来到纳什维尔菲斯科的白人交换生。其中一名暴徒夺过茨威格的手提箱，用它打在茨威格脸上。另外几个把茨威格弄倒在地，他因头晕已无法反抗时，有个人用膝盖夹住茨威格的头，让别人轮流殴打他。暴徒们打掉了茨威格的牙齿，把他打得满脸是血，胸口也是血迹斑斑，有几个前排的成年人让自己的孩子坐在肩上，看着这种暴行。有个小女孩问那些人在做什么，她的父亲回答说：“这个，他们只是在发泄怒火。”坐在附近出租车里的几个自由乘车者尖

叫着转过身去。

透过联邦大楼的某扇窗户，正在观察的多尔早已没了坚强的姿态。他正在与伯克·马歇尔通话，描述突如其来的灾难。“噢，都是拳头，都是！”多尔大喊，“一个满脸是血的人带领一群人正在打他们。根本没有警察。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根本没有警察。人们都在喊着：‘黑鬼们在那边！抓住他们，抓住他们！’真是糟糕透了。”罗伯特·肯尼迪的一个秘书正在电话分机后记下多尔的话。仍在听多尔描述的马歇尔让人叫来了司法部部长。公交车车门在蒙哥马利打开后不到5分钟，华盛顿官员们就知道了，棍子和拳头已经毁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艰难达成的约定。

席根塔勒开着车，慢慢穿过旁观的人群，到达了事发现场，首先看到的就是远处被扔得到处都是的手提箱。当时，他并不知道那是自由乘车者们的手提箱——像奖品一样被砸开——只感觉到暴乱的蔓延。他继续向前，看到了上客区，几百人出现在视线中。他们朝各个方向跑出，有的跑向暴力的发生地，有的则奋力想跑出来。在席根塔勒看来，这仿佛是在近距离观察着举行蚁丘保卫战。他看到一个穿戴整齐的黑人在追捕者面前狂奔，之后，他又看到，在自己的汽车旁边，一群人正朝着一个年轻的白人女性包围过来。那个白人女性就是苏珊·韦尔伯，她在被拽出计程车后座后极力想逃走。白人女性们拿着笔记本正从苏珊的身后打她，而一名少年则像职业拳击手一样，跳来跳去，从前面攻击她。

席根塔勒决定试着救她。他把车开到路边，冲出去。就在此刻，一位女士用很重的手提包一下把苏珊打到席根塔勒汽车右前方的保险杠上。席根塔勒过去扶起苏珊时，尖叫着的白人们相当愤怒，把他们紧紧围住，席根塔勒根本没办法走到汽车后门处。他抓住韦尔伯的肩膀，打开了右前门，大喊着：“赶紧！坐到车里！”接着就回到了驾驶位上。突然，他看到了另一个白人学生——苏·哈曼恩坐到了后座上，之前席根塔勒从未见过哈曼恩。

韦尔伯走下了车。被打的伤口仍旧隐隐作痛时，她大喊着：“先生，这不关

你的事！赶紧离开！你会被杀的！”

席根塔勒再次冲出去，人们正朝他的车围过来。“赶紧上车！”他朝韦尔伯大喊着。

韦尔伯不知道席根塔勒是谁，但斗争中一直说自己坚持非暴力的原则，不想让任何人受伤。正在此刻，两个男人站在席根塔勒和车门之间，其中一个吼道：“你是哪根葱？”席根塔勒疯狂地让他们退后，说自己是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这时，另一个人就拿棍子一下敲在席根塔勒头上。接着，人们便涌过来抓住了苏·哈曼恩，还把席根塔勒不省人事的身体踢到了车底。

暴徒们一直跑来跑去，不停大喊，不断庆祝着，席根塔勒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打倒的人。茨威格脸朝下栽倒在人行道上已经热化了的柏油上；约翰·刘易斯倒在墙边，被一个装可口可乐的木箱打得不省人事；刘易斯在神学院的同学威廉姆·巴比则倒在他身边不远处。后来，巴比被踢到了人行道上，弗洛伊德·曼恩突然出现在人群中时，一群施暴者还在对巴比拳打脚踢。“退后！”曼恩举起上了膛的手枪，高声喊道，“我们要维护法律与秩序。”他赶走了围在巴比周围的袭击者，又赶走了围攻电视台摄像人员的暴徒。作为州官员的曼恩，在城市管辖范围内孤身行动，既无人支持，也没有合法的权威。

第一波暴力事件过后约10分钟，警察局局长沙利文才带着警察们赶来。当时，自由乘车者们不是被打倒在地就是已经逃走了，但仍有数以百计的人聚拢过来，不是神情呆滞，就是在寻找新的目标。沙利文身后是亚拉巴马州司法部部长加利恩、加利恩的助手以及副警长。他们找到了约翰·刘易斯，因为有人告诉他们那个人是自由乘车者。于是，沙利文等人就站在刘易斯身边，宣读了琼斯法官的禁止令。

刘易斯挣扎着站了起来，找到了巴比和茨威格。安全起见，他们3个一起跟在拿着禁止令的警察们身边，而警察们则认为他们应该对暴乱负责。3个自由乘车者血流不止。尤其是茨威格，更是让人不忍直视，于是刘易斯和几位记者便央

求警察把茨威格先送到医院。警察一直说茨威格随时都可以走。刘易斯和巴比小心翼翼地把茨威格放在一辆白色计程车的后座上，司机明显已经逃跑了。茨威格坐着一动不动，根本无法思考，这时副警长向他宣读了琼斯法官的禁止令。片刻之后，一位黑人计程车司机自告奋勇，带刘易斯和巴比去了医院，但种族隔离的法令让茨威格不得不留在这里。警长沙利文告诉不断询问情况的记者，所有为白人准备的救护车由于故障已全部无法使用。一位记者鼓起勇气，走近茨威格所在的计程车，向他解释了为什么这么久他还没能离开。“你无法带我离开，”茨威格神情茫然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也不知道我怎么来的。”

大约 20 分钟后，一位警督找到了半藏在车底的席根塔勒，而席根塔勒才刚刚清醒过来。“老兄，你好像遇上麻烦了。”警督说。

“没错，我是遇上麻烦了，”席根塔勒说，意识到身上的疼痛，“出什么事了？”

“是这样，发生了一场暴乱。”

“你不觉得最好应该给肯尼迪先生打电话吗？”

“哪个肯尼迪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的司法部部长。”

警督皱了皱眉头。“你到底是谁？”他问。

“我是司法部部长的行政助理，”席根塔勒呻吟着回答，他的举止让警督相信自己正在和一个真正的大人物对话。警督跑去寻求帮助，立刻引来了大批记者。席根塔勒又昏了过去。再次醒来时，席根塔勒正躺在医院的 X 光室，身边的一位医生正在跟华盛顿的拜伦·怀特打电话。

当时，警察已经允许茨威格搭乘黑人救护车到一家天主教医院去，而那家医院也同意接治他。暴乱现场聚集的人群数量已达到上千人，时不时还会出现小范围的暴力事件。五六个白人围攻了离公交车站半个街区的两名黑人少年，他们在其中一人身上点燃了煤油，踢断了另一个的腿。其他参与暴乱的人把自由乘车者

手提箱里的物品堆在一起点着了。警察开始逮捕人，最后，7个人因扰乱治安被捕，两个人因疑似醉酒被捕。上述事件发生时，警察署长沙利文坐在汽车后座，躲避着媒体关于警方准备及暴乱原因的问题。“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沙利文说，“我到这里的时候，就看到3个人倒在路上。两个黑鬼和一个白人。”

苏珊·韦尔伯和苏·哈曼恩在逃跑的路上还不停地被人殴打，最后她们跑进了一所教堂，报了警，而警察让她们登上了开往纳什维尔的列车。“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让我们走，”韦尔伯对记者们说，“也许因为我们是女孩吧。”同时，挤在同一辆计程车中的5位自由乘车者闯进蒙哥马利一户黑人的家，给伯明翰的夏特沃斯打了电话。其他自由乘车者都在城市各个角落找到了藏身之处，给戴安·纳什打了电话，汇报了自己的位置和情况。在纳什远距离的指挥下，散落在各个地方的自由乘车者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S.S.西伊牧师的家中。西伊是《纽约时报》诽谤案中的一位被告，而且在5年前，公交抵制运动达到顶点时，他已经挺身而出，愿意将所有黑人牧师保释出狱了。

现在，西伊欣然接纳了新的自由乘车者。每个踏进他家门的新人都被当作是幸存者而受到热情欢迎——他们远离了痛苦，清楚地讲明了自己何时在车站最后一次见到其他人的。每次有人到来时，大家的精神就会振奋一次，而且纳什也常常带来消息，说他们如何震动了外面的世界。纳什还说，夏特沃斯和阿伯纳斯正在过去帮忙的路上，而她自己将亲自前往蒙哥马利，准备回俄亥俄州探望生病的母亲。吉姆·劳森也是。马丁·路德·金可能也会去。肯尼迪总统的个人代表也在车站被袭击了，而肯尼迪兄弟可能会派出军队。《纽约时报》等媒体也不再满足于电波传来的消息，而会派出自己的通讯员。自由乘车者们为了冲出伯明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现在已不可阻挡。刚出院的约翰·路易斯走进西伊的家，头上仍缠着纱布的他因为伤口和决心而受到了相当热情的欢迎。他宣布，就连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两名学生也已经准备好继续了。威廉姆·巴比将这一消息以声明的形式告诉了床边的记者，很快大家就都知道了。“我们一旦恢复，就

将再次上路。”巴比说。吉姆·茨威格就在圣犹大医院白人病区，在巴比的楼上。已经从脑震荡中恢复过来的他告诉了记者们6天前在吉姆·派克位于伯明翰的手术室中听到的话。“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我们都将继续，”茨威格说，“我们已准备赴死。”

第十二章 自由乘车运动之夏

总检察长的行踪难以捉摸，据传，他还把骑马改为参加一场联邦调查局的棒球赛。周六晚，他步入自己的办公室，参加与拜伦·怀特、伯克·马歇尔及另外10位司法官员的紧急秘密会议时，仍旧只穿着衬衫。发生在席根塔勒身上的暴力事件使肯尼迪感觉遭受了背叛，他致电帕特森州长，要求其对当天早晨缺乏警方保护的情况做出解释。帕特森的助手搪塞说无法联系上州长，这样的托词让肯尼迪愤怒不已，以至于他觉得是时候派出法警了。在通告肯尼迪总统于周末返回弗吉尼亚州米德伯格镇后，他又分派律师起动了他们已筹备了整周的临时军队。随后，他致电在蒙哥马利市医院病房内的席根塔勒。“你还好吗？”他问道。

“真是头痛欲裂。”席根塔勒回答。

“我们正把法警派到那儿去。”

“听你这么说实在是太遗憾了。”席根塔勒说，他知道这意味着麻烦，并讲了一个不好笑的笑话，建议肯尼迪绝对不要去竞选亚拉巴马州的州长，然后结束了通话。

尽管席根塔勒的伤势没有严重到危及生命，但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本来只有在一种极为紧急的状况下，才会促使总检察长于当天下午就叫他返回工作岗位。但准确地说，肯尼迪只在一或两小时后就这么做了。另一方面，派出法警这一举动正造成负面影响。在亚拉巴马州，帕特森正公开发表声明，说该州已经恢复了秩序，但肯尼迪的法警在骚乱过后不请自来，他的这一决定被斥为一桩政治侮辱，会导致自由乘车者在联邦政府的保护下，继续甚至加剧他们的行动。肯尼迪意识到派他的法警部队赶去阻止蒙哥马利市的第一次暴动已经为时已晚，但

若发生第二次暴动，他们就正好会是被谴责的对象。这时，有消息称马丁·路德·金正打算即刻赶赴蒙哥马利市鼓励那些自由乘车者，这对肯尼迪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总检察长知道金的名字就如同联邦政府的干预一样会吸引记者，并增加被新一轮白人暴徒袭击的危险。更糟的是，肯尼迪的律师告诉他，由于美国联邦法警正准备执行一项保护州际旅客的任务，而金本人也会是一位州际旅客，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让法警也为金提供保护。总之，金会在联邦政府的武装警卫保护下，到亚拉巴马州来支持自由乘车者，并且没人要告诉肯尼迪帕特森州长会做何反应。肯尼迪和马歇尔都试着通过电话说服金不要去亚拉巴马州。他们失败后，肯尼迪不得不去尝试一些他原本不屑于采用的小伎俩；席根塔勒的伤口可能会软化他原本坚定的决心。

“我在想，若你去和金谈，你觉得会起作用吗？”他狼狈地询问着，知道他正在让席根塔勒利用金的同情心，通过游说让金选择一个能得到帕特森赞同的方案，而不是自由乘车运动参加者要求他做的。席根塔勒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拨打这通电话，但计划在他联系到金之前就搁浅了。弗洛伊德·曼恩稍后出现在了他的病房里，打断了怜悯而沮丧的哭泣声。

当晚在华盛顿，詹姆斯·法默命纽约的全体员工开始募集一支由种族平等协会会员组成的应急小组，于亚拉巴马州从事自由乘车运动，以免纳什维尔的学生彻底成为一场改革运动的指挥部。这将使种族平等协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全国的认同。半夜时分，约翰·多尔开车行驶至蒙哥马利市以北 50 英里处，搭乘一艘小船不紧不慢地来到弗兰克·约翰逊法官的湖滨别墅。他带着一摞书面证词，内里满是支持司法部通过针对亚拉巴马州三 K 党集团的临时限制令的请愿。约翰逊拒绝了多尔将伯明翰市也纳入限制范围的请求——尽管多尔关于三 K 党在暴动中的阴谋的最佳证据就来自伯明翰市——但他同意签署在蒙哥马利市生效的限制法令。这对一位亚拉巴马州法官来说是大胆而危险的行为，约翰逊随后接受了多尔的提议，由美国联邦法警来保护他的生命安全。

金于第二天，即5月21日星期日的大约中午时分抵达了蒙哥马利市，距离他警告自由乘车者发起人这场运动绝不可能在亚拉巴马州取得成功才过了一周多的时间。美国联邦法警——州警估计有50人——在机场迎接了金，并把他护送到了老友阿伯纳斯家的附近。7年多以前，金就曾在这里与弗农·约翰斯一起点燃了蒙哥马利市的星星之火。正当他在筹划当晚的大型集会时，屋外的法警却拒绝向记者或州警透露为什么在此执勤。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在保护金，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而对帕特森州长来说，这透露出了总检察长肯尼迪鬼鬼祟祟、胆怯懦弱的背叛行为。帕特森还意识到了他突然面临的政治机遇。帕特森在与底层人士——主要是参加自由乘车运动的黑人——为敌的过程中收获甚微，后者在与亚拉巴马州白人的一次次对抗中逐渐积累起了名望。于是，转而抓住这次机会，把自己塑造成了受联邦政府压迫的受害者形象。他召拜伦·怀特来到州议会大厦，因为那儿就相当于一个公开的战争大会。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法警，”帕特森对怀特说道，两人身后就是亚拉巴马州内阁和一大群记者，“我们既不需要他们，也没有求他们来。可联邦政府还是派他们到这儿来平定骚乱，结果反而是在助长、制造动乱。”

怀特以冷静的辩解回应了州长的怒火，他们对维护公共秩序的共同使命有相同的看法。“今早一切看起来都非常平静，”他说道，“不过，昨天的暴力行为表明了它的爆发会多么迅猛。”

帕特森带着些许讽刺询问了怀特，鉴于联邦法警是忠于法律与秩序的，那他们是否会协助州警执行琼斯法官的法令，以违反禁止令的罪行逮捕那些自由乘车者。帕特森仍抓住这点不放。“关于昨天闹事的自由乘车者，你能提供你知道的所有信息吗？”他问道。

“不能。”怀特回答。

“你知道其中一些自由乘车者在哪儿，对吧？”

“是的，”怀特答，“在医院。”

“那你知道其他人在哪儿吗？”

“不，我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了他们其中一些人的下落，你会知会我们吗？”

“我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些人在哪儿。”怀特闪烁其词地回答道。

帕特森警告怀特，亚拉巴马州把美国联邦法警视为在这个州内没有特权或特许的“闯入者”。“尤其是，”他一本正经地补充道，“你们的人不能侵犯该州的任何一项法律、权利或职能，因为我们会像逮捕其他人一样逮捕他们。”州长结束了这45分钟令人不快的会面，让怀特离开了。

这些谈话内容，与金和他的支持者们将于当天晚上在牧师阿伯纳斯的教堂内会面的消息，一齐通过无线电波传送开来。那些自由乘车者早就藏身于那间教堂的地下图书室中，希望警方不敢在那里逮捕他们。帕特森州长可是个狡猾的人，他收到了一则监听报告，报告称拜伦·怀特在结束了对峙后，立即给华盛顿打了电话，建议将那些法警撤出亚拉巴马州。怀特选择致电给他的老朋友肯尼迪总统，而非他的上司总检察长，这一点使帕特森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通过在各个渠道散播对在亚拉巴马州启用法警是否为明智之举的质疑，怀特发出了一个警告，即小肯尼迪可能能力不济。

大约下午5点，距离这场大型集会的计划开始时间还有三个多小时的时候，人们就开始缓缓进入阿伯纳西的“众志成城”教堂了。在既没有牧师，也没有管风琴师和钢琴师的情况下，他们互相吟唱、祷告，将乐观的情绪依托在这熟悉的赞美诗上。这提前的仪式是蒙哥马利市旧时精神的象征，自联合抵制公车运动以来就消失不见了，但这一次，学生们像英雄一样参与其中，暴徒的受害者、州长，甚至还有总统都在报纸上对他们争论不休。那些为他们开路进入教堂的人中，可以看到12名左右拿着警棍、戴着印有“美国联邦法警”字样黄色臂章的白人，站在第一浸信会教堂外守护着它。

在街对面是一座因蒙哥马利市改进协会的取消种族隔离诉讼而关闭的市立公

园，有一小群白人聚集在那里，而另一群则集合在奥克伍德公墓边上的拐角处。一位站在杰斐逊街和莱普利街拐角处的妇人，一边摆手催促一边喊着“下车”，动员着来往车辆中的第三群人。在黑人群体中，年长者和最虔诚者如往常一样是最先抵达的，他们通常一只手拿着些许食物，另一只手则牵着孙辈的手，对经过时的目光注视或偶尔的诅咒之语毫不在意。然而，白人集会者越来越多，越来越放肆，一些黑人犹豫着该不该回应那些奚落和讥讽，而那些回应了的人则总是步履轻快地小跑进教堂的圣殿。黄昏时刻，1500人挤进了第一浸信会教堂，而至少有两倍的白人聚集在教堂外和街区周围。

在赞美诗的吟唱间隙，牧师所罗门·斯诺登·西伊为教堂内的人们讲述了自由乘车者的勇敢事迹——他们前一天晚上是如何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他家门口，虽然受挫却依然不屈不挠。他向众人介绍了戴安·纳什，她当时坐在大平台的贵宾席上。他还表明自由乘车者们就坐在他们中间。他无法为大家介绍他们，甚至不能让他们坐在一起，因为他要减少他们被逮捕的风险。约翰·刘易斯和其他人分散在楼厢的唱诗班成员中。就算他们想，也还是不能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每当西伊明确地请某位包扎着绷带的年轻陌生人说两句，或引领他们吟唱《我们一定会胜利》时，这公开的秘密就把一波又一波的敬意传遍教堂，用歌声和“阿门”压制着从街上传来的嘈杂之声。

金还没有进入会场。他在楼下阿伯纳斯的办公室内修改着方案，为后台的细节问题发愁。阿伯纳斯、夏特沃斯及怀特·沃克带着现场情绪的最新反馈，在牧师身后的楼梯上来回穿梭。看门人把从后来的人口中听到的消息传了进来，看来情况越来越可怕了。晚到的人说看到了外头被砸碎的车窗，或是躲避石块的攻击。一些白人一边嚷着“黑鬼的小曲”，一边等着从教堂里出来的黑人们。夏特沃斯留意到詹姆斯·法默可能无法穿过那人潮，便自告奋勇为他接机，等詹姆斯从华盛顿赶来后，再亲自把他从机场带过来。正当外面的黑人放弃了进入教堂的希望时，夏特沃斯无视所有的反对意见，冒险冲进了人群。

“我们得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过了一会儿，金这样说道。那些围在他身边的人立即异口同声地反对。一位来自亚特兰大市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的年轻助手弗雷德·本内特告诉金，他的长相在蒙哥马利市家喻户晓，这样出去面对一群暴徒无疑是自杀。而伯纳德·李，这位自从被逐出亚拉巴马州后，就对金越来越忠实的人，则告诉金说他实在是太重要了，不该去冒这个险。金坚持己见，于是传话人跑上楼去找沃克和阿伯纳斯，希望他们能劝一劝金。几位领导人窃窃私语，就金这样做的目的提出了好几种看法。有些说他仅仅是想在计划下一步行动前，亲自去看看那群暴徒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还有些人则说他试图用他的耐心奇迹般地让那群暴徒蒙羞，身体力行地展现出他和教堂内的其他神职人员毫无畏惧。还有一种更夸张的解读，认为金想把性命交给暴徒，好拯救教堂里的人们。沃克和阿伯纳斯并没有时间弄清楚所有的缘由，只是冲到地下室入口处金的身边。金十分焦急，他打断了身边所有的嘈杂声。“我们走，”他对他们说，“这是领导者必须做的。”

几个牧师走了出去，本内特和李则像保镖一样，警惕地围在金的身边。金一行人绕着教堂周边的广场街区缓慢移动着审视一群暴徒，这些暴徒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远远地站在大街的另一端。这是因为对暴乱行为尚有些脆弱的抑制因素——可能是法警的存在和他们的广播，可能是教堂的尖顶，也可能仅仅是缺一个触发点。奚落声和偶尔扔出的投掷物发出的声响，在傍晚时分的空气里清晰地传播着，很快，人群中辨认出金的一些人就呼喊起来。“黑鬼金”的喊声传扬开来。“过来！”金缓慢地向着这些挑衅的人走去，可是，石块开始落在他周围的地面上。随后，一个金属圆罐滚动着停在了金的脚前。弗雷德·本内特猛地抓起这个圆罐，向一片空地扔了过去。随行人员推着金撤退时，还激烈地讨论着那个圆罐是炸弹还是催泪瓦斯，如果是催泪瓦斯，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视线内并没有警察；还是说警察可能已经和暴徒狼狈为奸了。退回到教堂后，金登上了小讲坛。他强调了积极的一面，宣称法警仍旧守在那儿，外面的人群聚集在街对面的

边界后。随着一位男中音独唱者领着所有人唱起《靠主膀臂》，教堂内的气氛就像在与外头暴徒的喊声竞赛一样高涨了起来。

在华盛顿，总检察长的办公室变成了一个周末指挥部。罗伯特·肯尼迪刚结束了一场星期天的触身式橄榄球比赛，穿得很随便，在这里设立了一条长久开放的电话线路，与蒙哥马利市外围地区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拜伦·怀特的集结待命区联系。这个集结待命区已经陷入了混乱之中。怀特约有400名警力，包括80名来自亚特兰大市安全性最高的联邦监狱的不当班狱警，可是似乎这些从亚特兰大市或其他监狱赶来的狱警刚刚抵达，就更改了轮班时间，而监狱长们也开始抱怨这些狱警缺席时监狱暴动的风险。其中一部分狱警已经回归本职了，取代他们的则是得克萨斯州和墨西哥湾岸区移民局及边境巡逻的职员。怀特的帮手们在抵达时即宣誓担任代理联邦法警。威廉·欧瑞克，一位担任民事部总检察长助理的旧金山市律师，就在他被只身调至亚拉巴马州数小时之后，得知了席根塔勒在当天早晨被殴打的消息，然后与办公室取得了联系。现在他正在拜伦·怀特的集结待命区四处奔走，他想起了在军队中的经历，试图把那些法警组织成即时编队。伴随着位于第一浸信会教堂的法警通过无线电发来的警报，欧瑞克和他的同僚发疯般地筹措起来。由于军队指挥官没有接到上级的指令，便拒绝用军用卡车运送法警至一场紧张的平民冲突现场，于是司法部队找到了当地的邮政局局长，要求调用邮车。

拜伦·怀特当时并没有与教堂内的黑人们沟通，或多或少是因为他不想看来像是在协助那些自由乘车者。怀特和肯尼迪对帕特森州长关于亚拉巴马州正在维持秩序的强硬言论极为敏感，他们已把仅有的、由法警组成的象征性部队派往了整个城市中可能有麻烦的地点。他们知道用大批人力增援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过去的3小时中，暴徒的人数已经激增，但在第一浸信会教堂却看不到一个警察，唯一的州政府官员是两位由弗洛伊德·曼恩悄悄安插进入的便衣警察——但是没有帕特森的命令他们不会采取行动。州政府的官员正在拒绝保护自由乘车者

和拒绝寻求联邦协助之间徘徊逡巡；而联邦官员虽有保护自由乘车者的意愿，却苦于没有人提出请求。

在这场紧张的较量中，拜伦·怀特与亚拉巴马州相关部门进行的唯一交流，是来自警察局局长沙利文的一通意外电话提问：沙利文想知道，如果当晚蒙哥马利市所有的警察和消防队员都罢工去反对联邦干预，那么联邦法警们会为交通管制和火警负责吗？这个棘手的问题很快把司法部的律师们卷入了卡夫卡式的荒诞谜团中——若蒙哥马利市的市民放任部分的城市被烧毁，那么对教堂一事进行干预是否会为联邦政府带来数以百万计的债务呢？

弗雷德·夏特沃斯曾警告法默要提防那些放肆的暴徒，但他却在返回教堂时发现了一群更加无法无天的人。当时他们正驾车缓慢地从人群中通过，挤到街边，就在距离第一浸信会教堂一个街区的地方，这群白人把他们的车团团围住，抓住它左右摇晃。司机换挡，迅速向后倒车离开。在一位黑人出租车司机的建议下，他们弃车改为步行穿过奥克伍德公墓走到教堂，结果却遇到了另一群愤怒的人墙。“他们把教堂包围了，”夏特沃斯犹豫片刻后说道，“好了，吉姆，跟着我。”说完，身材矮小、体格健壮的夏特沃斯咆哮道：“让开！快点！让他过去！让开路！”他粗野地挥舞着手臂把吓了一跳的白人从路上推开，而法默则缩在他身后从被分开的人群中走了过去。

安全回到教堂地下室后，他们像阿拉莫的援军一般受到了极其热情的对待，其中两人利用牧师专用梯上楼进入教堂。金高兴地向教堂会众介绍了法默，说他是种族平等协会的国民总监及最初的自由乘车运动的发起人。法默还被介绍给了戴安·纳什，然后拥抱了这段经历中唯一不在医院里的元老约翰·刘易斯。在听了象征联合时刻的赞誉之词，并做了一段简短的演讲后，法默被请下楼，来到阿伯纳斯的办公室里参加领导人秘密会议。会上，他听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的牧师仓促分析了身处远方，却能掌控今晚他们的安全的多位白人——肯尼迪、帕特森、怀特、沙利文、曼恩。

总的来说，法默是一位孤军奋战的领导人，一位新来的人，身处一大群崇拜金，而且基本从没听说过种族平等协会的人之间。他蔑视神坛，并在20年前永远抛弃了混迹于官僚、放荡不羁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南方生活，他被触动却远离危机核心，有太多要表达却帮不上忙。在借耶稣得救赎的赞美诗和“叛军呐喊”的背景中，他聆听着陌生人激动的言论，减轻了些许恐惧，开始堕入混乱的现实中。距离埋葬他的父亲才过了几天，飞机上的餐点服务也才结束一个小时，法默几乎还沉溺于夏特沃斯在穿过暴徒包围时发疯似的往前冲的情景。

刚过8点，金和其他人又跑去核实了一些令人害怕的消息，据称在莱普利街和杰斐逊街的拐角处附近有一辆车被掀翻了。透过玻璃窗，他们确定这是真的：那辆车四轮朝天，一群扬扬得意的暴徒围着它转圈，当一位老人把一根点燃的火柴扔到油箱附近时，这群人就散开了。这辆车很快就爆炸起火，如篝火一般照亮着这原始、野蛮的景象。类似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此时金的周围人心惶惶：恐惧正影响着教堂里的人们。人们都在说仅仅一辆被毁的车绝不会让人数众多的暴徒感到满足。有几群规模更小的暴徒已经在那一周焚毁了一辆公交车，还打伤了两队自由乘车者，而现在教堂会众被困在了教堂里，就像被困在了一辆巨大的无轮公车里。

三三两两的暴徒成员飞奔过莱普利街，在更近的地方向教堂投掷石块。他们很快就退回去了，但不久后，人群开始沿着整条莱普利街慢慢地前进，呐喊着“把这些黑鬼从这儿赶出去！”美国联邦法警立即行动，迅速各就各位，在莱普利街沿着教堂——间隔20英尺左右——分散开来。他们举起手中的警棍构成一道屏障，而两位州警则沿着暴徒的队伍前行，把他们推向路边。他们面对的是数千个被仇恨煽动刺激了数小时，因燃烧的汽车而冲动起来的人，他们也知道臂章和警棍只不过是一张有约束力的薄纸。法警们通过无线电把窘境报告给了拜伦·怀特，经过一场与罗伯特·肯尼迪的紧张交流后，他召来了美国联邦法警指挥詹姆斯·麦克肖恩。“让这些法警上车，赶过去！”怀特命令道。麦克肖

恩当即领着 3 辆邮车呼啸着向教堂赶去，掉队的人则只能开着随便找到的车跟在后面。这位老兄以前是个不爱受拘束的警员，在干起现在这份工作后，曾因在约翰·肯尼迪竞选期间为其驾车护航而受到嘉奖。

教堂里的人们正在吟唱一首古老的、关于庇护的赞美诗《主爱救我》：

主爱救我

主爱救我

走投无路之时

主——爱——救——我——

合唱声连绵不绝地飘荡出来，这时，法警向逼近的人群掷出了第一个催泪瓦斯。每一轮攻击都会使咳嗽的暴徒们慌乱地后退，让法警得到几分钟的喘息时间，但随后，越发愤怒的人群卷土重来，法警们只得后退。石块开始满天飞，其中一位法警被一块砖击中了颈部而倒了下去。手工制作的简易燃烧瓶向着教堂高高抛起，在空地上熊熊燃烧。拜伦·怀特通过无线电听着愈演愈烈的骚乱现场，用开放电话线路联系了罗伯特·肯尼迪。“他们越来越近了，”他说，“非常危险。”

牧师西伊站在小讲坛上，时不时地中止赞美诗的吟唱，规劝人们保持冷静，随后再发起另一次合唱。“我想听到每个人的声音，我是指每一个字！”他喊道。大多数人照做了。从外面看来，这间教堂仿佛要在歌声中升离地面，但一些为这一刻有备而来的人，悄悄起身离开了长凳，伸手去拿他们外套口袋里的小刀、棍子和手枪。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牧师说，他们不会看着暴徒烧伤或打伤自己的家人而无动于衷，即使是在教堂也要大战一场，教堂两翼的人则激烈地私下交谈起来。教堂会众有大量武器的消息传到了金的耳朵里，与之而来的还有暴徒中的突击人员已经在教堂紧闭的门前。“好吧，我会打电话给他。”金说。

怀亚特·沃克的外交能力是在国家浸信会磨炼出来的，他口述道，作为金以下的二号人物，应该由他与罗伯特·肯尼迪联系，这样金就可以与他平级的政府官员，即总统对话了。于是，沃克以他个人的名义给司法部的罗伯特·肯尼迪打了一通紧急电话：“我是金博士的代理。”总检察长接起电话后，沃克告诉他只有联邦立即采取行动才能拯救他们的性命。

“我知道，”肯尼迪说，“我们正在竭尽所能。我能和金博士通话吗？”

沃克不得不交过了听筒。正当金愤怒地描述着种种危急景象时——被烧毁的汽车，燃烧弹——肯尼迪打断了他。“代理法警正在去那儿的路上。”他再三重复道。他正在金身上找寻着相似点，不由得回想起从外祖父约翰·“甜心菲茨”·菲茨杰拉德那儿听来的故事，说的是19世纪时的波士顿市，反天主教的暴徒是如何焚毁修女院的。

金搁下了电话，要沃克和阿伯纳斯跑上楼去，告知大家总检察长肯尼迪本人承诺提供援助的好消息。随后他又问援助何时会到，对此并不清楚的肯尼迪只能维持一个充满希望的政府权威姿态。“很快就到，”他自信地告诉金，“马上就到。”当听到电话里响起唱起赞美诗的背景声时，他用他们家的招牌黑色幽默转移了话题。“只要你还在教堂，金牧师，而我们的人也赶到了那儿，你也许也会为我们祈祷的。”他说道。

金并没有笑。他暂停通话，从看守那儿得知了并未看到任何营救人员的最新情报。金用紧迫的语气告诉肯尼迪，守备者正在教堂的入口处挥舞着武器。“如果他们不立即赶到，我们就会爆发一场流血冲突了，”他说，“因为暴徒就在门口了。”

就在这时，送信人带着已经看到援军的消息赶来了。麦克肖恩的手下离开邮车，正挥舞着警棍，以一系列纵队在暴徒中前进着。金急忙飞奔前去确认，然后返回来拿起电话连声道谢。“你说得对，”他对肯尼迪说，“他们到了。”

新一批法警聚集在教堂前，发射了大量催泪瓦斯，那些暴徒则一边咒骂着一

边东倒西歪地往后逃。教堂会众爆发出了快乐的叫喊声，祷告声紧随其后，赞美诗再度唱起。这简直就是一场好莱坞式的戏剧性救场，只是那些催泪瓦斯散出的大量烟雾缓慢地飘回到了教堂里。一些惊慌失措的人向暴徒逃去，阿伯纳斯的几位助力不得不尽力阻拦他们，而其他的人则冲向附近的窗户。突如其来的通风不畅，加上对5月来说异常温暖的夜晚，还有1500个惊恐之人的体温，迅速把第一浸信会教堂转变为一个气味刺鼻的桑拿场。而门外，由于几乎没人戴着面罩，法警也沦为催泪瓦斯的受害者。待瓦斯散尽，一伙愤怒的暴徒就重新集结了起来，先头部队已经冲了上去。进攻者猛砸着教堂的几扇前门，一些法警从地下室的后门进到内里，听到了门被打破后教堂里的叫喊声。他们及时地从水泄不通的过道上跑了过去，用警棍和肩膀把暴徒们推回到外面。新一轮的催泪瓦斯挡住了大部分的暴徒，但其中一个设法拿起了一块砖，把它扔进了一扇彩色玻璃大窗里，被溅了一身碎玻璃的人们恐惧地四散开来。砖块击中了一位老人的头部，当一队护士赶来照顾他时，牧师西伊如雷般的声音试图抑制住其他地方的骚动。他要助祭们把孩子带到地下室，并要求所有人尽可能地趴在地上。石块砸碎了较小的窗户，催泪瓦斯则从任何漏洞灌进来，直接打断了赞美诗的吟唱。一轮又一轮的催泪瓦斯发射了出去，与教堂的距离却越来越近。它们对攻击者伤害甚微，反而害苦了防守的人。这场营救带来的欢快情绪成了人们的一段残酷回忆。

罗伯特·肯尼迪接通了身处五角大楼的赛勒斯·万斯的电话，他命令佐治亚州本宁堡的陆军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在是否将这件事委托于他们的痛苦抉择中，他比以往更认真地争取一些州里对联邦政府行动的认同。唯一一位与他进行了友好交谈的州政府官员就是弗洛伊德·曼恩，结果后者还几乎因双方相互冲突的职责而崩溃。曼恩违背了州长坚决反对与联邦官员联合起来保护自由乘车者的意愿，亲自担负起责任致电位于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集结待命区的拜伦·怀特，命他“投入一切后备力量”。

“我们已经派出了所有可用人员，”怀特回复道，“他们随时听你调遣。”这场

对话对总检察长办公室而言是一个重大进展。尽管曼恩不曾要求代表州长一方的部队的援助，但至少他要求了点什么，而随着从蒙哥马利市不断传来新的沉痛消息，这通电话的意义也就越发被夸大了。一位法警被砖划开了前额。在教堂附近4个不同的街区，数个黑人家庭遭受了枪击。一个燃烧瓶崩掉了教堂的屋顶。催泪瓦斯就快要用完了。

当新一轮大规模进攻的消息传到了拜伦·怀特的耳中时，他几乎哀恸地报告说他不知道这次猛攻是否能被压制住。他痛苦的语气把罗伯特·肯尼迪推过了进退两难的抉择边缘。“就这样吧。”他说，他会给总统打电话。对于一则动用军队的指挥声明书而言，需要的就是在细节问题上追加一条合法的依据。他们已经有了声明书，但肯尼迪总统远在米德伯格镇，去了弗吉尼亚州北部的马场。在派出直升机带着声明书赶去米德伯格镇获得总统签字批准之前，他们就启用军队从本宁堡奔赴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会是合法的吗？

肯尼迪对马歇尔的建议犹豫不决。很快，齐射的新一轮催泪瓦斯逼退了暴徒的消息传来了，伴随着这个战况缓解的消息而来的还有另一个戏剧化的新闻，帕特森州长宣布戒严。蒙哥马利市警察们组成了一个方阵，在他们的指挥官们“好了，我们出发”的喊声中向教堂跑去。方阵后面是15名亚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士兵，他们头顶白色头盔，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快速行进着。另外100名警卫队士兵立即赶了上来。警察把暴徒赶离了教堂前的周边区域，警卫队士兵则在那儿各就各位。在拜伦·怀特的命令下，法警指挥麦克肖恩立即找到了统领警卫第一分队的上校，并将联邦部队转入州武装部队的统领下。那位上校命法警撤离现场。在教堂附近的其他地方，警察局局长沙利文终于在当晚首次亮相。数个白人少年向他的车投掷了砖块。

一见到外头的士兵，教堂内就爆发出了赞美的呼喊声，他们以为那是肯尼迪总统派来的联邦军队。牧师西伊和其他演讲者登上小讲坛，说联邦政府先是派遣法警，继而又专程调动士兵来对抗白人暴徒，保护黑人平民，这真是一个具有历

史意义、得神庇佑的拯救之夜。尽管教堂里只剩破碎的玻璃、焦虑的情绪、精疲力竭的孩子和催泪瓦斯的刺鼻味道，但这一次骚乱终于还是被镇压了下去，这些磨难的标记只会让教堂会众对他们来此的目的更加坚定。在赞美诗和引见进一步把他们与自由乘车者连接到一起后，10点后的某个时刻，金开始发表了他的重要演说。

他事先准备好的演讲遵循着标准的金式历史、爱和不公的主题，但这场危机促使他对帕特森州长在自由乘车者首次进入亚拉巴马州时的表现进行了谴责。“上周在亚拉巴马州发生的那起耸人听闻的行动，其根本责任就在该州州长身上，”他断言道，“他蔑视法律的一贯言论、刻薄的公开声明，以及不负责任的行为创造出了能让暴力蔓延发展的氛围。”这条背离了预定演讲稿的言论被记者们保留了下来；其他的则都没流传下来。这件事情对教堂会众带来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当然，既然有像金这样杰出的牧师，而且所处的情景就好像来自《圣经》传说一般，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与他的支持者因一个深植于他们信仰之中的事业，遭受了火焰、石块、拳头和催泪瓦斯的洗礼。午夜降临时，距离第一批会众抵达教堂大约过了7小时，他低头看到的面孔依旧被汗珠滋润着，但激情却几近干涸。

与此同时，在总检察长的办公室里，罗伯特·肯尼迪的判断力可能因被耗尽的轻松情绪而下降了，他做出了那个让他十分后悔，同时被认为是那一周最严重政治错误的决定：允许一位合众国际社的摄影师拍下一张他穿着随意、脚跷在桌上打电话的照片。这张照片将成为亚拉巴马州包围战国内新闻的配图，结果收到一大批愤怒地斥责肯尼迪在工作中看起来邋里邋遢、不成体统的来信。从那以后，除非肯尼迪穿着西装，否则他都极力避免拍摄工作照。

就在那个时候，金再一次陷入了绝望。在刚刚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情之后，人们趁机从各个门夺门而逃，却发现军队不允许他们离开。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们用刺刀向内对着教堂的各个门，向外则对着离去的暴徒。尽管这些变故在这个疯

狂的夜晚中显示出了某种对称性，但教堂里的人实在是太累了，以至于无法理解。对他们来说，他们的营救者已经转变为了看守者。所有正在保护他们的人竟然听命于无法无天的迫害者，帕特森州长，而视线内再也找不到一个联邦法警。一些试图挤出去的人被步枪枪托击退了。有些人说，这是州政府俘获、关押自由乘车者的阴谋。有些人则说这个突转太过苦涩，不会得到上帝的庇佑。咒骂和更为刺耳的言论不绝于耳，直到金走出去与戒严指挥官陆军副官亨利·万斯·格雷厄姆谈判。

金抗议道，被关在教堂里的人急需回家——吃饭、洗澡、服药、治愈伤势、安抚心存忧虑的亲人们——格雷厄姆则回复说目前的情况太不稳定了。这个坏消息使金设法让格雷厄姆亲自去看看，这位长官终于带领着一列副官进入了教堂，其中一位副官还向教堂会众朗读了帕特森州长宣布的戒严令。就如帕特森的所有公开声明一样，它无情地否定了他们的事业。格雷厄姆将军随后声明道，教堂会众应待在教堂里，“目前来看，可能要等到早上。”

格雷厄姆与其随行人员离开后，金跑下楼给罗伯特·肯尼迪打了另一通紧急电话，后者则借口自己在后半夜要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准备中断连线。“你本不该撤走法警。”金抗议道，大吼的声音迫使肯尼迪把听筒拿离了耳边。金的懊恼情绪失控了，他说肯尼迪抛弃了他的支持者，使他们沦为帕特森州长手下国民警卫队的人质，然而现在却表现得一切尽在掌握。那么多人在如此的压力下被塞在教堂里，很可能会引发心脏病或中风。他追问道，当局允许上教堂的人被人胁迫，然后又强迫他们在非人道的条件下整晚挤在一起，什么样的正义会存在于这样一片土地上。他说他觉得被出卖了。

肯尼迪恼羞成怒——他厌倦了被要求采取更多行动，并对立即屈从于帕特森却无视州长对那些自由乘车者权利的明显蔑视而感到生气。“嘿，牧师，”他说，“别跟我说这些。你和我一样清楚，如果不是美国联邦法警，你的尸体现在就跟凯尔西的螺母一样僵了！”

电话里是漫长的静默。金无疑是在苦苦思索“凯尔西的螺母”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肯尼迪从波士顿政界听来的晦涩用词。总之，肯尼迪观点的冲击力是毋庸置疑的，而金，把许多反驳的话生生咽了回去，在妥协中消沉了下去。“好吧，”他叹息道，“好吧。”他挂断了电话，回去协助西伊筹划最乐观可行的让步建议。一个“一分钟规则”确定了下来，它让数百人排队通过教堂内的一条电话线给家里打电话。孩子们睡在了地下室的桌子上，老人们则优先安坐在阿伯纳斯的酒红色教堂长椅软垫上。

金挂断电话没多久，帕特森州长就致电肯尼迪，他曾经不得不假装拒绝与肯尼迪通话，如今他打破了持续两天的僵局。“现在你得偿所愿了，”他激动地说道，“你得到了一起冲突。你还使国民警卫队出动了，还有戒严令。这就是你想要的。”他因这所有的暴力行为斥责肯尼迪。肯尼迪则坚称对于防止暴力一事，州长只表现出了不情愿的一面。在两人激烈的争吵中，肯尼迪设法询问，既然一切都在帕特森的掌控之中，那么是否能允许那些黑人离开那间令人窒息的教堂。州长回复道，国民警卫队能确保除了金以外所有黑人的安全。他们不能确保金的安全。

“但我不相信，约翰，”肯尼迪说，“让格雷厄姆将军给我打电话。我要让他亲口对我说。我要听一个美国陆军将军对我说他不能保护马丁·路德·金。”

帕特森在电话里尖声说道，肯尼迪没有抓住要点。问题不在于军事实力，而在于公众的看法，帕特森把援军派给了在亚拉巴马州最受厌恶的那个人。“你正在从政治上毁灭我们。”他说道。

“约翰，教堂里的那些人活下去可比我们下不下台重要多了。”肯尼迪抓住他先前打发金的制高点，这样说道。

快天亮时，拜伦·怀特派威廉·欧瑞克去国民警卫队迪克西师的战地指挥部，寻求与格雷厄姆将军停止冲突的机会。欧瑞克被领入一个充满了紧张感和邦联旗帜的房间，他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个前来求和的俄国官员。“将军，我是来协商

的，”他说，“我们想知道你的部队是否会撤离教堂，并让那些人回家。”格雷厄姆回答这是一件应由州长决定的事，但当欧瑞克脱口而出说自己实在是累了，而且为了制止联邦和州发生战争，必须得到一个答复时，和解很快便达成了。

凌晨四点半，第一批国民警卫队上车撤离了教堂。对劲头十足的夏特沃斯来说，当晚的教训就是在对抗亚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时，亚拉巴马州被迫保护起了黑人。带着欢乐而又怨恨的情绪，夏特沃斯开始把帕特森州长称作“帕特”，以纪念他们的新伙伴关系。“那天早晨我离开教堂后，”当天晚些时候，他对一位教堂会众夸口时这样说道，“是帕特的士兵送我回家的。”

星期一早晨，约翰·席根塔勒在华盛顿的家中忽感疼痛不已，于是被医生要求卧床两周。而这场持续不断的围攻中的其他参与者则在电话旁坚守岗位，大部分身处蒙哥马利市。在其他地区，数百万人在日常活动中度过了这个5月的周末，并通过深受公关影响的新闻，得知了发生在亚拉巴马州的冲突事件。拜伦·怀特告诉记者，星期天的骚乱“远没有”达到他认为要启用美国军队的地步。总检察长肯尼迪的版本则在粉饰太平，说联邦和州围绕着弗洛伊德·曼恩那唯一一次要求动用后备部队的电话而展开了合作。《纽约时报》接受了肯尼迪的说法，在头版放上了一篇题为“新一轮暴力事件爆发时，亚拉巴马州寻求联邦支援”的报道。帕特森州长在第二天一场得意扬扬的新闻发布会上，拿着一堆电报展示了对于他反对联邦干预和反对自由乘车者的立场有75票赞成和1票反对意见。一群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发来了“祝贺你！”的电报，鼓励种族隔离主义的声音远从加利福尼亚州和加拿大传来，淹没了亚拉巴马州首府。

由于笑容满面的帕特森没有提到他的国民警卫队小队仍然在驱赶在长途汽车站附近闲晃的白人，同时仍旧在黑人居住区巡逻防范投弹手，这为批评传统信仰的格罗弗·豪尔留下了向蒙哥马利市读者提起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的机会。“起初，帕特森说他会帮助那些煽动者，而且会逮捕美国联邦法警，”豪尔在《广告报》中这样描述道，“但是在一切结束前，帕特森却像保姆一样整晚看护着一

间教堂里的煽动者，而高速公路上的巡警也与联邦部队共同合作。”豪尔对州长使亚拉巴马州成为南方唯一一个与自由乘车者“有麻烦”的州一事大加讽刺。罗伊·威尔金斯则在这一点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在黑人新闻界这样说道：“自由乘车者直到抵达了这个查禁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州才遇上了麻烦。”

自由乘车者全部隐居在了蒙哥马利市药剂师理查德·哈里斯的家中。金也在那儿，陪伴着他的是怀特·沃克、詹姆斯·法默及戴安·纳什。黄昏时分，詹姆斯·贝弗尔和詹姆斯·劳森从纳什维尔赶了过来，贝弗尔还终止了他的纽约家具托运之旅。总计超过 20 名来自各个主要的美国非暴力抗议行动组织的人，聚集在了这个进行联合抵制公车运动的城市中的同一片屋檐下，就在金曾居住了 5 年的德克斯特牧师楼的街对面。让这些自由乘车者在两天内的大部分时间中公然隐退的原因，不是逮捕许可令或暴徒，甚至也不是一次新联合的领导技巧。相反，这种缄默掩盖了要求金作为见证者加入行动的新一轮学生运动。“你们的人呢？”他们用标准的口头禅问道。怀特·沃克、伯纳德·李和其他与金关系密切的人则反对道，金现在的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筹款演讲、高层谈判，还有其他那些由于一个公交车座位而不能解决的工作都少不了他。

戴安·纳什几乎每小时都致电亚特兰大市与艾拉·贝克协商，艾拉已经结束了在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不愉快的任期，转而成为一名静坐学生的密友，发挥着亲密而深入的作用。贝克对金不愿加入自由乘车运动一事始终表现得像是一位失望的母亲。“噢，他只担心他的小团队。”她说，意思是金全神贯注于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的形象和财务状况。贝克对法默也是相同的看法，后者正宣布自由乘车运动将立即与 5 位来自新奥尔良市的种族平等协会志愿者一起继续进行下去。然而，纳什维尔的学生了解到志愿者们还没有抵达，且法默把自由乘车运动说成“我的事”也让他们愕然，实在是既无诚意又狭隘。20 位强壮的纳什维尔学生已经就位，准备去乘车了，他们充满了主张平等的热情，募集资金、忸怩作态、政治算计对他们来说都是可鄙的、应当蔑视的行为。就连温和的约翰·刘易

斯也视法默为浮夸世故之人。纳什维尔的学生们甚至懒得去问他是否有意加入乘车行动。

金不一样。戴安·纳什——这位由于艾拉·贝克的说教而对金有一些敬畏的人——直截了当地要金跟他们一起去。他将为领导层树立榜样，或许能增加他们对各地非暴力活动的贡献，她这样说道。金回答他赞同她的观点。他想去但又有些犹豫，他说。金老爹和其他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的董事曾向他灌输届时要谨慎的观念，而他的助手们在与亚特兰大市的律师们交流后，提出了另一个观点：金仍处于1960年佐治亚州的那次因无照驾驶而被逮捕事件的假释期内——就在肯尼迪与尼克松竞选之前，法官加重了对他的判决。若此时因自由乘车运动被捕，金则会在佐治亚州监狱内多服6个月的刑期，沃克和其他人说道，如果金因为一起交通诉讼蹲监狱，又能让这场运动得到什么好处呢？

追随纳什的学生们无视这个异议。“我也在假释期内，但我要去。”一人说。“我也是。”另一个说。金在这压力下明显局促了起来，就像去年10月一样，当时亚特兰大市的学生们恳求他参加里奇百货的静坐活动。最后，他抑住压力的折磨说：“我想我可以自己选择受难地的时间和地点。”一些学生退缩了，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成为耶稣，而只想当肉体凡胎的基督徒。金和学生们都在这种被自己显露出来的无法忍受的紧张感中抽身而退，金单独对沃克说道：“我是唯一一个必须对所作所为担起责任的人，我不去！”沃克立即回到学生那里，当这个问题再度被提及时，他打断了他们。“听着，”他厉声道，“如果金博士决定不去，那就不会去。他不需要任何理由。”他眼中的怒火抑制住了所有进一步的异议。沃克习惯于直截了当地谈话，便突如其来地转用起街头行话的双重否定句——在场的都是黑人，无须润饰辞藻，也不需要无意义的废话。

学生们大多对沃克专横的态度感到愤愤不平，但他们对金有不同的看法。在年轻的牧师队伍中，詹姆斯·贝弗尔支持金的决定，因为金可以把自由乘车运动的消息带给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他告诫同学们不要让这些象征性的东西约束

了自己。曾经在伯明翰市外第一辆纳什维尔的增援汽车上被捕的保罗·布鲁克斯说，他觉得要是金直接承认自己害怕了会更好。“我本可以更尊重他一些。”布鲁克斯吐露道。约翰·刘易斯即使发现自己只是在保守地重复劳森的教诲，说不要一直强求或迫使别人做出超出自身的承诺，但仍然对任何针对金的公然批评感到不满。他正温和却痛苦地回顾着金的过去，维护着他敬爱的这个人。

当这些人于周二下午全部离开哈里斯医生的家，去面对一场记者招待会时，他们此时在情感上受到的伤害都消失不见了。蒙哥马利市仍在实施戒严，街上还有千名戴着头盔的国民警卫队士兵，一支庞大的美国记者团也聚集在那儿，想要查明黑人是否会发起战斗。法默、阿伯纳斯和刘易斯发表了简短声明之后，金朗读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无论是否实施戒严，无论政府是否提供保护，乘车运动都将继续进行，直达密西西比州的心腹地。这已经够激动人心的了，但接着，金就把准备好的发言稿搁置到了一旁。“自由乘车者们必须为了理想鼓起安静死去的勇气，”他说道，把在私下争论中曾撕扯着他的情感咽了回去，“我们不希望看到有人牺牲……我们都热爱生活，这里也没有殉道者——但我们都十分清楚，可能会出现伤亡……我相信如有必要，这些学生愿意直面死亡。”

围困阿伯纳斯教堂那个周日的大约午夜时分，罗伯特·肯尼迪给他的哥哥发去了一份总检察长助理欧瑞克对蒙哥马利市联邦调查局探员行动懈怠的诉状。除去在可怕的动用军队声明书上签字以外，肯尼迪总统终于有别的事可做了，在同一时刻，他把这份诉状转发给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过了一会儿，蒙哥马利市特工主管就出现在了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欧瑞克的面前，发誓会热切配合，并恳求欧瑞克不要再苛责调查局。

星期一早晨，胡佛接受了总统的劝说后，下令要得到一份即时报告——一份关于被认为是这次蒙哥马利市危机的直接原因的金的报告。粗略报告在当天就送到了他的桌上，里面含有一大堆含糊的猜测。报告指出，金就1958年遇刺一事感谢了来自纽约的前市议员本·戴维斯，感谢他为其献血。报告还正确记录说金

于1957年在高地民众学校发表了闭幕演讲。这份联邦调查局报告在语言、细节方面对金充满敌意，像极了一年前由警探汤姆·库克所写的关于布尔·康纳的报告。库克是康纳的下属，是一位与三K党有联系的安全局局长。胡佛翻看着这份报告，发现调查局并没有全面调查金，便在旁边潦草地加上了质问式批注“为什么不？”

星期一早上，胡佛的探员以在安尼斯顿市焚烧灰狗长途汽车为由逮捕了4个人。在遭到欧瑞克的投诉后，他们正工作勤勉地支持约翰逊法官的禁止令捍卫其法令。这些都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联邦调查局是不可或缺的，但以肯尼迪为首的司法部高层官员十分清楚胡佛的做派，也知道在这次突发事件中他会拒绝任何新任务。尤其是，如果自由乘车者继续从蒙哥马利市行动，他将会坚决反对让他的人像美国联邦法警一样直接保护他们。胡佛陈述的理由是，若与自由乘车者联系在一起，联邦调查局就不能客观地做好调查工作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联邦调查局是一个像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机构，不干低贱的“保镖活”，连总统的保镖都不干，更遑论那些煽动暴乱的黑人了。

这样就只能让法警来保护自由乘车者了，但罗伯特·肯尼迪在拜伦·怀特为紧急磋商而飞回华盛顿之前，就已经在重新考虑这个想法。他认为法警极为缺乏训练与管理，以至于无法有效地抵抗态度坚决的暴徒；另外，他们的出现会引来帕特森和其他南方州长普遍的抵制之声。蒙哥马利市噩梦般的经历不禁让拜伦·怀特担忧起该如何撤回那些法警，而不是再次起用他们，但伯克·马歇尔说，若联邦政府不打算建立一支长期部队来保护所有州际公路上的长途汽车乘客，那也就不能保护其他人了。因此，在经过一番考察后，肯尼迪的第一步便是不考虑启用怀特的法警或正向密西西比州行进的军队。他要依赖各州。这真是个最“艰难的决定”，马歇尔回忆道。星期一，罗伯特·肯尼迪与总统进行了45分钟的会面，对他不保护自由乘车者的决定苦恼不已，正如金正在为不加入他们的决定而焦虑着。

随后，肯尼迪面对的是看起来不可能成功的任务，即劝说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当局履行他们曾极力拒绝的治安义务——而且不提出可靠的保证说可以要求联邦法警来填补缺口。他现在需要超常的新颖策略，于是在与他们进行谈话的期间，他详尽阐明了武力和暴力之间的重要区别。事实上，肯尼迪同意让州级官员采用强制、违宪的方式逮捕自由乘车者来维护种族隔离政策，只要那些官员不让暴徒通过暴力达到同样的目的即可。拜伦·怀特于周一公开支持这个协议，他告诉记者，若自由乘车者入狱，联邦将会袖手旁观。“届时那将会变成自由乘车者与地方官员之间的问题，”他说，“我相信会有称职的律师为他们代言的。”数年后，在一份机密的口述历史中，肯尼迪对这个处理方法仍感到难受。“所以我，事实上，我想，对他们将会被逮捕一事表示赞同，”他说，“尽管我对此没有任何权力。”

周二整晚，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当局进入了一种与肯尼迪热切合作的状态，谋划着要为自由乘车者搭乘的长途汽车提供武装护卫，那架势简直和北约军事演习有一拼。肯尼迪也想对那些袭击者展示一下力量，他们据称会埋伏在蒙哥马利到密西西比州杰克逊——也就是预定的逮捕地点——的258英里公路沿线。州官员一经同意预防暴力事件，就想要上演一场盛大表演，以便展现出不同种族的旅行者少了任何一点准备都无法生存的样子。到了午夜，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内特对合作协定热情高涨，甚至开玩笑地邀请拜伦·怀特搭乘被护送的长途汽车来杰克逊市与他共进晚餐。“你将得到最好的搭乘体验，”巴内特的欢声笑语通过电话传到了怀特那里，“你将会像待在婴儿车里一样安全。”

那些自由乘车者并不知道这些计划。对他们来说，周二是一个充斥着紧张、劝说和特殊庆典的夜晚。一辆满载着纳什维尔支援者的车抵达了，还有一些来自新奥尔良市种族平等协会的新成员。当天夜里，一队静坐运动的元老用各种方式从首都华盛顿赶来——最初的自由乘车运动就于9天前发生在那里。队伍中包括了霍华德大学的学生约翰·穆迪、威廉·马奥尼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除此之

外还有一位名叫保罗·迪特里希的白人神学学生。他们蜂拥至哈里斯医生（Dr. Harris）的家中，在那里争论的主题就是他们是否应该从蒙哥马利市长途汽车站出发。自周六的骚乱以后，传言暴徒们为了再次遇见自由乘车者，又开始时常出现了。一些与会学生写下了遗嘱和通告名录，其他人则把他们的贵重物品存在那些留守的人那里。保罗·迪特里希把自己的翡翠戒指交托给了决定不去的詹姆斯·法默保管。

黎明时分，自由乘车者离开了哈里斯的家，这时，一辆亚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的吉普车出现了，开始为他们的车护航。在长途汽车站，有超过 100 名警卫队士兵把一小撮不知所措的围观群众挡在距离候车室相当远的地方。这是保卫计划中的第一个受人们欢迎的标志，但是这不过是表明当局官员已经下定决心，决不允许再次出现类似周六的骚乱。阿伯纳斯、沃克、金和从亚特兰大市赶来的金的弟弟阿尔弗雷德·丹尼尔，都和自由乘车者们一起走进了白人的候车室，并从速食店点了咖啡或小吃。长途汽车站经理告诉蜂拥在后的记者，他们是第一批享受服务的黑人。尽管联邦法庭近期已批准了相关法令，但即使是这些细微的举动，在亚拉巴马州的刑法中也属于违法行为。正因如此，他们在佐治亚州就以在假释期间违反条例为由逮捕了金，但这一次金决意至少分担当天一小部分的风险。他跟随队伍走出去，来到长途汽车的登车平台，在那里他们惊讶地发现 7 点开往杰克逊市的长途汽车上空无一人。士兵们正拒绝让自由乘车者和持证明文件的记者以外的人上车。共有 16 名记者登上了汽车。最后，仅有 12 名自由乘车者走上车去，他们几乎都来自纳什维尔。他们选择了非暴力抗议运动中的导师詹姆斯·劳森当这次旅行队伍的领导人。

突然，跟在这 12 名自由乘车者之后，与之数量相当的国民警卫队士兵全副武装，带着装了刺刀的步枪上车了，而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指挥官格雷厄姆将军。他站在车的前端对自由乘车者说话，看起来与那个曾踏进第一浸信会教堂的冷峻敌人截然不同。“这可能会是一趟危险的旅程，”格雷厄姆温和地说道，“我们已

经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来保护你们。我真诚地祝愿你们所有人一路顺风。”当他走下车，几个学生激动地为这和谐的气氛向他道谢。车外，就在汽车于早上 7:06 出发之前，金来到一扇开着的车窗前，与保罗·迪特里希握手，祝他好运。

一队骑摩托车的警察给长途汽车开路，带领其穿过了拥塞的车站周边路段。这队警察在城市边界处一一散去，让这辆长途汽车行驶在一列奇怪的，编号大约是 42 的车辆中——大部分是警笛大作的高速公路巡逻车，还有十多辆采访车跟在后头。协助主力护卫队的是位于战略检查站的联邦调查局监察车，直升机护卫队和美国边境巡逻队的飞机在进行高空侦察——通过返回到蒙哥马利市的拜伦·怀特所在的集结待命区，向总检察长肯尼迪的办公室递交报告。在车队飞驰过位于塞尔玛市的第一个停靠站后，车上的警卫队指挥官透露道，所有的中途停靠站都已经被取消了。在整个前往杰克逊市的 7 小时旅途中，将不会有中途停靠站、小吃部和休息室。

除了两次短暂的停车，车队保持着将近每小时 70 英里的速度。恐惧和消化不良让一位自由乘车者生病了，当他在高速路边呕吐时，警觉的警卫队士兵围着他站了一圈。第二次停车发生在亚拉巴马州的边界城镇斯夸奇山，在山顶处可以看到一长列的密西西比州警卫队士兵和州警察部队，他们正准备接管这辆长途汽车。这支队伍甚至比亚拉巴马州护卫队更长。斯夸奇山山顶的交接正在进行时，心烦意乱的詹姆斯·劳森从车上跳了下来，对乱转的记者们举行了一场即兴的记者招待会。他抗议道，规模庞大的军方护卫队与自由乘车者的整个理念背道而驰。他告诉记者这根本就没必要，记者中的大多数人对在进入密西西比州之前收获到爆炸性新闻内幕而感到惊恐不已，都认为劳森疯了。“我们宁愿冒着遭受暴力袭击的危险，像普通乘客一样旅行，”劳森继续说道，“我们将接受暴力和憎恨，承担伤害而不进行反击。”

此时已经接近中午了，由 14 人组成的第二批自由乘车者已经买好了 11:25 从蒙哥马利市开出的灰狗长途汽车票。这其中有两位来自新奥尔良市种族平等协

会的学生杰罗姆·史密斯和多丽丝·卡索，另外，亨利·托马斯是在10天前遭遇了安尼斯顿市汽车焚烧事件的元老，他此次为参加第二次自由乘车运动而来。这支队伍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卢克雷蒂娅·柯林斯的纳什维尔学生，她从伯明翰市起一直进行着自由乘车运动，并在路上进行非暴力抗议活动研讨会。

第二批自由乘车者消息的到来对罗伯特·肯尼迪来说是个巨大的冲击。在劝诱和调用两州武装护卫车队的过程中，他曾断言和保证他们只需要出动一次。相反，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政府脆弱的信任也再次破碎了。他们把这件事看作是种族隔离政策的一个让步，与肯尼迪合作的动机只是用一种让以后的自由乘车者泄气的方法来终止这场危机。在亚拉巴马州护卫车队返回蒙哥马利市之前，新一批的自由乘车者就出现在了车站里，他们感觉被欺骗了，简直荒谬。这一次，曾疯狂地努力促成这个协定的肯尼迪愤怒到了极点，发表了他的第一份正式声明。他在华盛顿的助手告诉记者，第二辆长途汽车“与自由乘车者毫无干系”。

肯尼迪的声明传到了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政府耳中。他称赞了两州政府到目前为止为维护秩序做出的努力，然后他使各地都支持他发出的警告，即联邦不会再进行保护。“那些学生团体的领导人在考验种族隔离法令，”他宣告道，“据悉，今天不会有联邦法警护送他们。”肯尼迪为恢复常态而做的呼吁，其关键在于他哥哥即将前往欧洲，与夏尔·戴高乐和尼基塔·赫鲁晓夫进行会谈。肯尼迪总统准备要求国会通过登月计划和提高核武经费这两项决议——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他在首脑会议上的底气——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进行关于南方各州丑陋的种族骚乱的国际化宣传，将会给从自由世界进入欧洲宫廷的领导人抹黑。“我想我们应该牢记总统即将开始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总检察长最后说道，“此时无论我们在美国做什么，都会为我们国家带来耻辱，对这个任务有害无益。”

肯尼迪在他的办公室里密切关注着第一辆长途汽车驶入密西西比州方面的消息。拜伦·怀特、詹姆斯·麦克肖恩、肯尼迪的助手乔·多兰、伯克·马歇尔及联

邦调查局副局长艾尔·罗森几乎一直连续不断地从不同岗位汇报着情况。他们交流了一些传言——据说，马丁·路德·金搭乘下午2:25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离开了蒙哥马利市前往亚特兰大市，又说被耽搁到了第二天，另外，还说有25辆车显然已经做好了埋伏，在杰克逊市还有一名拿着自制炸弹的人——还有在各个车站等候的人群的规模。默里迪恩市的人群看上去十分愤怒，而警察对肯尼迪下达的让车队完全避开这个城市的命令极不配合。在蒙哥马利市，詹姆斯·法默在长途汽车站吃了一顿早午饭，14位自由乘车者坐在他旁边，身后是全副武装的亚拉巴马州士兵。总检察长发出公开警告，说不会有联邦法警全面保护他们，而外面一群怀有敌意的人也吵吵嚷嚷，人数在2000人以上。一大批国民警卫队的士兵正在拦着他们，但当法默护送自由乘车者们登上灰狗长途汽车时，前方旅程的不祥之兆动摇了他们前进的脚步。上车后，法默沿着汽车的外侧走着，透过车窗与他们握手告别，就像金之前做的那样。来自新奥尔良市的19岁大学生多丽丝·卡索——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与法默握手时脸上写满了困惑。

“我的祈祷与你同在，多丽丝。”法默说。

她压抑着惊恐直到低声哭了出来，“你会跟我们一起，对吗，吉姆？”

法默把他曾经说给自己听的那些话都告诉了她——他怎么会离开办公室长达4周之久，信件已经堆得老高，还有某个人不得不出去筹钱以确保这个运动持续进行——但即使他这样做了，他仍感觉到自己洪亮的声音正是空洞心灵的回响，而且在他看来，卡索的双眼睁得大大的，仿佛小鹿般惊恐。一怒之下，法默避开了她的视线。“把我的行李拿来！”他向正站在他车旁的一个新晋种族平等协会助手喊道，“把它放到车上！我也去。”不知为什么，他在跳上车前并没有忘记把保罗·迪特里希的戒指转交给怀特·沃克保管。接着士兵们依令上车，记者们也坐了上来，最后一刻后备直升机也加入了编队，然后第二列车队在距第一列离开大约4小时后出发上了高速公路。

然而，车队的离开既没有终结当天在长途汽车站的戏剧化场面，也没有中断

它对罗伯特·肯尼迪的猛烈抨击。蒙哥马利市聚集的人群中在被驱散前就已流言四起，说一辆长途汽车正从东向本市驶来，车上是一队兼有黑人和白人的自由乘车者，从亚特兰大市出发后，他们就在沿途的各个小城镇进行试验。流言传开没多久就驶来了另一辆灰狗长途汽车，从车里走出来一群很能说明问题的人——衣衫褴褛，挤作一团，看起来昏头昏脑。这群人中有两位是来自康涅狄格州卫斯理安大学的宗教学教授，两位来自耶鲁大学，还有三位黑人学生，其中包括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查理·琼斯。怀特·沃克和弗雷德·夏特沃斯迎接了他们，这9个人聚集在那儿的景象，就像要突破那群从士兵组成的压制线后面投掷了20分钟石块和其他东西的人的容忍极限一般。最终，他们驾驶两辆车开了一条路，来到被国民警卫队清理出来的空地上。阿伯纳斯从其中一辆车里跳下来，把那几个人护送到了车里。一位记者靠近车旁，向他们大声提问。问题是关于总检察长透过广播发表的声明，声明中说应停止自由乘车运动，因为与赫鲁晓夫的首脑会议近在咫尺，而该运动正使美国难堪。阿伯纳斯从车窗探出身来回应道：“那么，难道总检察长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一直很难堪吗？”旁观者一看到亚拉巴马州的警察部队又在护送另一支多种族的队伍进城，就不相信似的摇着头。“真他妈的丢脸。”其中一个这样说道。

法默一行人继劳森一行之后，正在前往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路上，后者已经被赶出了杰克逊市长途汽车站的白人专用休息室，并被送进了市立监狱。科芬一行人正在蒙哥马利市阿伯纳斯的家里与金会面，考虑是否也该前往杰克逊市，而伯克·马歇尔则收到了南部各州组建的新学生队伍正接踵而至的惊人消息。对肯尼迪来说，科芬一行人代表着抗议者构成中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抗议者不再局限于公谊会教徒、疯子、学生、和平主义者，甚至是黑人甘地主义者。自由乘车者的阶层突然包括了著名的常春藤联校教授。危机无止境地发展着，于是，愤怒的罗伯特·肯尼迪发表了当天第二篇新闻声明，这份声明特别采用了能吸引这些人注意的有利宣传手法。“除了在这些州之间旅行的自由乘车者小队之外，还

有想满足好奇心、想出风头和想满足各自目的的人们，”肯尼迪声称。“现在需要一个缓和期。”他补充道，警告自由乘车者“推迟他们的旅行时间”。帕特森州长称赞这则声明说：“这些天里，联邦政府头一次表现出了一点常识。”

肯尼迪在接下来的几小时内变得更加愤怒了。法默一行人步劳森一行后尘，也被关进了杰克逊市的市立监狱，他还得知所有 27 名自由乘车者都拒绝保释，并打算在定罪后待在监狱里，而不是缴纳罚金或上诉保证金。鉴于伯克·马歇尔和拜伦·怀特都不能得到满意的解释，肯尼迪当晚就给金打了电话，要求知道为什么那些自由乘车者不愿意接受保释。

“这是良心和道德的问题，”金说道，这是在受到抨击后更为正式的说法，“他们必须用生命和身体来纠正一个错误。良知告诉我们现行法律是错误的，而我们必须进行反抗，但我们也有道德义务去接受惩罚。”

“那对政府在这方面或其他方面正在进行的作为不会产生丝毫影响，”肯尼迪厉声说道，“他们待在监狱的事不会对我有任何影响。”

“若有上百——成千上万的学生被关在那儿，也许会有所帮助。”金说。

“这个国家不但属于我，也属于你，”肯尼迪说，“你可以和我一样决定怎样做才是最好的，但不要发表听起来像恐吓的声明。那可不是和我们打交道的方式。”

金本能地退缩了，害怕他对肯尼迪施加的影响会引起反效果。“我对政府正在做的事情非常感激。”他说。然后，对争论丧失信心的他崩溃地发出了一段牧师的呼喊：“我看到了一丝希望，但我与我父亲不同。现在我感觉到了对自由的渴望！”

肯尼迪没有理会。“这都取决于你和监狱里的那些人的决定，”他不耐烦地说道，“如果他们想出来，我们可以把他们弄出来。”

“他们会待在那儿。”金答道，然后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肯尼迪又致电哈里斯·沃福德，并把他的怒火发泄在了监狱里的自由乘车者

身上。“太过分了，”他说，“我想知道他们是否把国家的最高利益放在心上。你知道他们当中有人反对原子弹吗？”沃福德咕哝着给出了一个安慰性的回复。他对非暴力抗议活动的同情心尽人皆知，当政府在他负责的事务上第一次出现危机之后，他就完全游离于电话交流圈子之外了。

蒙哥马利市，金在结束了试图改变肯尼迪想法的交流后，返回了阿伯纳斯的起居室。“你知道，”他说，“他们不了解正在天底下进行的社会革命，因此，他们也不懂我们正在做什么。”他所说的并未驱散笼罩在威廉·斯隆·科芬和其他6位加入自由乘车运动的人身上的黑暗。除了恐惧，其中一些人还对罗伯特·肯尼迪的暗示感到沮丧，说他们的使命并无爱国之心，还认为会在总统试图与苏联进行世界和平谈判的非常时期削弱总统的力量。这些对习惯于校园生活的人来说是令人警醒、胆怯的想法。“事实上我们面对的问题很简单，”金说，“你们还想继续进行下去吗？”他带领他们做了一段寻求指引的祷告。有些人在恐惧和矛盾的爱国忠诚的冲击下哭了出来，最后，他们分发了纸片来进行匿名投票。投票结果显示一致赞成继续进行运动——对总检察长的建议不予考虑——于是他们下定决心前往长途汽车站，互相拥抱，欣喜若狂。

阿伯纳斯、沃克、夏特沃斯及伯纳德·李陪同他们一起进行这次短途旅程。当他们坐在速食店，在警卫队士兵的围绕下品尝旅行前的种族融合餐时，治安官麦克·西姆·巴特勒走到他们身后，并逮捕了全部11人。治安官随后解释道，他已经无法再容忍保护这些自由乘车者发起人了。“我气愤极了，”他说，“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最终放这些蛮横暴徒的首要成员离开，那就全完了！”

总检察长肯尼迪当天下午让600位联邦法警中的500位撤离了蒙哥马利市。他通过可靠的记者公开了一些曾私下对金吐露的怨言——抨击其智慧、动机，甚至还有新加入自由乘车者的刚勇。“第一队成员离开时需要大量的勇气，”他这样告诉《华盛顿邮报》，“但对其他人来说就不需要多少了。”他猛烈地抨击着，把自由乘车者称作“美国最安全的人”，并揶揄他们待在监狱的决定，称其为“对

美国敌人的绝佳宣传”。总检察长向《华盛顿邮报》总结道：“在这些时候，不认为司法部可以与一个对宪法规定的权利有质疑的团体或其他人站在一起。”这距离他在佐治亚大学的演讲只过了18天，那些冠冕堂皇的，关于司法部将如何迅速行动，迫使联邦法庭做出保障黑人宪法权利的决定的话，便这样不复存在了。

肯尼迪的怒火未能压制住纽约种族平等协会总部的热情。在法默与杰克逊被逮捕的第二天，一位种族平等协会的发言人宣布捐款正通过邮件源源而来，且还有超过100名群众自愿开始自由乘车运动。“我们相信能在今年年底前终结种族隔离制度。”他这样告诉记者。

在埃比尼泽的教学楼内，金主持了自由乘车运动协调委员会的成立大会。种族平等协会的戈登·凯里代表仍在杰克逊市监狱内的法默出席了会议。两位纳什维尔的牧师代表与法默同在监狱的贝弗尔和劳森，一位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的助理则代表被关押在蒙哥马利市监狱的怀特·沃克。连同一位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的代表和全国学生协会的官员，这6个人承诺要“加强”自由乘车运动，直到南部各州的长途汽车隔离制度瓦解。他们计划在4个南方城市开放招募办公室，筹钱购买长途汽车票和聘用律师，还要求与肯尼迪总统会面。他们将“向总检察长争取一个有利裁定，通过对州际商务委员会下达一条法令的方式，明确州际旅行者的权利”。他们要“填满蒙哥马利市和杰克逊市的监狱，确保在公众面前清晰地反映出这些问题”。

那是5月26日周五，种族平等协会的自由乘车者发起人彻底悄无声息地离开华盛顿的3周后。在经历了一段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吸引到百万人目光的冒险旅程后，他们正式与联合抵制蒙哥马利市公车运动和学生静坐运动的后继者结为同盟，沿着与联邦政府及南方各州的意愿背道而驰的道路前进着。

随后，自由乘车运动突然从各大头条中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看起来这个对南方各州而言最好的解决办法已经潜移默化地传播了开来，他们以与司法部休战的方式，在法律的名义下秘密地守护着种族隔离制度。于是，新一批自由乘车者

几乎是保护性地，被井井有条地聚拢起来，投入了密西西比州的监狱系统。他们的命运慢慢褪色，成为遥远的传说。

第二波自由乘车者抵达密西西比州时，肯尼迪总统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递交了非比寻常的第二份 1961 年国情咨文。“我要在这里推广自由主义，”他于 5 月 25 日宣告道，“如今捍卫和扩张自由的宏大战场就在整个南半球——亚洲、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就在这些人民正在崛起的地方。他们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变革。寻求结束不公、苛政和剥削。”但总统的演说并未提及本国内的种族歧视，更别提自由乘车运动了。他向国会申请近 20 亿美元“把军队的战斗力翻一番”，并开启登月竞赛。刚刚结束了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颇具争议的首脑会议，肯尼迪就已经把征兵人数增加了 3 倍，并向国会另外申请了 32 亿美元扩充军备和修建防空洞。总而言之，他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向围绕争夺柏林领土而展开的战争，在这样的氛围里，他也比以往更不愿承认自由乘车者引发的烦人问题。在 6 月底的新闻发布会上，此时入狱的自由乘车者数量正逼近 200 人，但总统对此并未发表任何言论。也没有人向他提起相关问题。

舆论领导们看起来是过于急切地想要帮助总统摆脱密西西比州的麻烦了。《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曾对金和民权运动表示普遍支持，现在却反对扩大自由乘车运动。“他们不但正在对根深蒂固的习俗发起挑战，而且还抱着激昂的情绪，”文章宣称，“蓄意挑起暴力行为的非暴力策略本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同一天一篇题为“金博士拒绝中断乘车试炼”的新闻报道从最负面的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一些开明的南方黑人和白人，今天加入了温和派和其他人的队伍，坚持主张应阻止自由乘车者。”它开始把再次掀起的战役推向舆论支持的遥远边界。这也是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最后一则关于自由乘车运动的头版报道。一项 6 月份的盖洛普民意测试显示，全美 63% 的民众反对自由乘车运动。

罗伯特·肯尼迪在周四和周五用最严厉的措辞公开指责了金和自由乘车运动后，于 5 月 29 日周一早晨，带着截然不同的心情抵达了司法部。他对工作人员

说，关于金所说的要求一项对州际商务委员会的裁决的建议也许并不是那么幼稚，尽管那是个臭名昭著的官僚机构。事实上经过再三琢磨，这个主意实在是太棒了，于是肯尼迪把司法部律师送进了这个未知领域。他们提出了一个新奇的想法，即由总检察长给名义上独立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出具一份“申诉书”。他们调查、起草、批准了这份文书，得到了肯尼迪的签名——都在同一天内。司法小组把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委员们和各类官员搅得鸡犬不宁，直到他们下达了那条肯尼迪想要的裁决，并将于9月进行宣布。就在这时，他们还把一个通常要耗时数年的工作流程——就算委员们喜欢这个提议也要这么久，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喜欢——缩短至4个月内。专家们认为这样的游说技巧简直就是个官僚体制下的奇迹。

早期的自由乘车运动结束后，不同的是司法部官员出乎意料地继续着秘密策略。他们立即全力以赴地构建了一个资金充沛的免税机构登记南方各州的黑人选民。在税收方面，这次秘密行动简直和给那些替因猪湾事件入狱者缴纳保释金的人提供财政补助如出一辙。肯尼迪则亲自插手帮助国税局局长莫蒂默·科普兰为设立于亚特兰大市南区市政局的新选民教育项目取得免税申请。当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莱斯利·邓巴为免税申请来到国税局进行协商时，伯克·马歇尔和其他的肯尼迪手下的官员都陪同着他。

马歇尔、哈里斯·沃福德和基金会管理者斯蒂芬·科里尔同时进行工作，把各种各样的民权组织纳入统一管理和中央财政预算内。鉴于罗伊·威尔金斯与金之间的恼人过往，这项工作早在初春时就已经够棘手的了，但现在还要再加上种族平等协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学生，使得这件事的复杂程度呈几何数地增长。理论上来说，这两个组织看起来都没有注册登记希望。种族平等协会在南方各州只有几位成员；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甚至都称不上是一个组织，只有一位全职工作人员。然而，这些缺点对司法部来说并没有什么要紧的。无论如何，种族平等协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都必须组建起来，因为肯尼迪的其中

一个目的就是把他们从那种正在塑造其形象的对抗活动中劝诱出来。

6月初，马歇尔参加了一个包括了部分未被捕入狱的种族平等协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领导人的小型会议。在弗吉尼亚州卡帕侯希克一座曾经属于布克·T·华盛顿的接班人罗伯特·拉萨·摩顿所有的种植园内，马歇尔坐在约克河畔的一棵橡树下，提出了选民登记的问题。在座学生中最专注的听众是今秋刚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蒂莫西·詹金斯。詹金斯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内部他所谓“痛苦与磨难的学校”极为不满。他并不支持他们的宗教热诚，且认为直接通过学生运动达成目的是行不通的。他预言无论这股热忱何时消亡，学生运动将再无政治保障；而且对詹金斯来说，所有这些保障都是在为选票服务。他对此深信不疑，所以他已经准备去赢得他认为能影响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内部平衡的3人的选票了。他把这3人——谢罗德、琼斯、迈克德鲁——称作“三个查理”。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领导层，再也找不到像他们3个这样天差地别的人物了——来自乡下的神秘主义者谢罗德是个生性固执的虔诚教徒；老练世故的花花公子琼斯是一位著名的南方牧师之子，衣着花哨，嗓音抑扬顿挫，俨然一位年轻的金；而北方的运动健儿迈克德鲁既勇敢又“酷”，对劳工史和犹太先知抱持着微妙的欣赏态度。对詹金斯来说，极有希望以一致运动来吸引3个这样的人，更有希望的是，他们在无数个通宵讨论后会了解选民登记的好处。

6月16日，总检察长肯尼迪在办公室内收到了一份来自自由乘车运动协调委员会的委托。其中包含了那“三个查理”，外加被保释出蒙哥马利市监狱的怀特·沃克，以及曾被詹金斯描述为“因虔诚而头昏脑涨”、对非暴力运动“无可救药的忠诚”的戴安·纳什。他们都希望为自由乘车运动取得来自联邦的更多支持，但得到的却是总检察长的反对意见。自由乘车运动不再有效了，他说，委员会成员能通过登记为黑人选民的方式来获得更多民权，如果他们同意往那个方向努力，他将愿意做任何事，他可以保证他们会受到全力支持和保护。他还提到确保获得免税申请和大型基金会资助的机密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了。

查理·谢罗德站在那儿既紧张又愤怒，这些话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直白了，他把其视为引诱他放弃正当行为的贿赂，并气急败坏地反驳起来。“你可是位公职人员，先生，”他说，“你不能凌驾于上帝或法律之上，来告诉我们如何信守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在我们行动时给予保护才是你的职责。”谢罗德一边说一边向总检察长走去，怀特·沃克怕他因说教激动起来，进而去攻击肯尼迪，便把他拉了回来，死死按在座位上。紧张的气氛消散后，肯尼迪只穿着袜子踱来踱去，继续进行争辩。他说，对黑人选民进行培养和登记的效果也许不会立竿见影，但他们会改变南方政界。

后来，肯尼迪和他的助手又反复强调了他们的观点。他们甚至做出秘密承诺，保证政府将会为学生们安排兵役豁免权——只要在政治活动上加以克制。哈里斯·沃福德极为生动地把选择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可以让自由乘车者填满监狱，或者把试图阻碍联邦保护投票权的南方白人官员关进大牢。他们可以选择被压迫或被保护。那些对选民登记有兴趣的人可以致电伯克·马歇尔或约翰·多尔，并获得了保证，若他们前往南方时遇到了麻烦，可以随时向司法部拨打电话，电话费由司法部出。

这些谈话效果显著。当时罗伯特·肯尼迪因强力介入早期的自由乘车运动而受到黑人领导层的信任，那时夏特沃斯一边告诉教堂里的黑人们事情在肯尼迪政府的干预下已经取得了进展，一边喊着“我们感谢杰克、鲍勃，还有上帝！”甚至对那些注意到肯尼迪粗暴批评的人，或那些怀疑他的政治动机的人来说，总检察长也因积极干预而受到赞赏。他并没有袖手旁观，而且看起来他似乎觉得如果他在某一方面欺骗了民权团体，他就需要从另一方面补偿他们。

在他的结婚纪念日上，肯尼迪邀请了哈里·贝拉方特来到他位于核桃山的家中，再次请他利用他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学生中的重要影响支持选民登记。贝拉方特马上邀请了一个自由乘车者代表团来华盛顿，当时他正在那里进行演出。他们会面的那天晚上，肯尼迪和马歇尔在《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上展现

了他们推波助澜的本领：《黑人选票预计将在南方各州激增——政府专家确定将会迎来政治突破》，实际上，这篇报道归纳了肯尼迪方面的私下谈话。“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及新一轮激进运动的其他领导人——静坐运动者和自由乘车者——都认同选票即是关键，”报道中说，“相信政府会尽全力保护那些想要登记和投票的人，也会鼓励黑人进行尝试。”贝拉方特鼓励学生们不要理会报道中富有政治意味的暗示——报道中说“黑人漠不关心”，且黑人领导人的不良“做派”之前已经阻碍了选票革命的进程。最终，学生们表示他们愿意召集自由乘车者提议进行选民登记计划。贝拉方特自掏腰包，赠予了他们一万美元启动资金。

肯尼迪当然允许这种发展。至7月底，所有主要的民权组织首脑都对此极为关注，便参加了沃福德和伯克·马歇尔代表政府出席的纽约全天会议。刚离开密西西比州监狱的法默曾确信他并不会在这荣耀的时刻舍弃种族平等协会的整体目标。罗伊·威尔金斯也曾相信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似乎不会抛弃种族融合的旗帜。这些还只是其中最不重要的问题。然而一个月后，还是这些人，带着“工作报告”回到了第五大道塔康尼克基金会的办公室。他们分割了南部各州的管区，对迥然不同的基金分配比例做出了表决。他们又物色了行业基金会和斯坦恩基金来支持塔康尼克基金会的资金运作。他们还找到了被授予人、授予人和中间人满意的管理人员和中转人。他们又拟订了上百种折中方案。第二个月内，基金会的行政官员把那些交易转变为含糊的语言，而律师们则核对组织架构流程图以保证符合税法。

选民教育项目基本上是因为一场与自由乘车运动背道而驰的强力游行示威活动而诞生的，虽然可能在精神上并不是有意为之。这场游行示威活动同样发生在1961年夏天，当时自由乘车运动仍在进行中，而游行是向任性固执的肯尼迪司法部，以及比让州际商务委员会痛苦的汽车法令更令人赞叹的壮举致敬。这些活动对南方政界有着深远的影响。知情人立即主张这些阴谋是整个阶段内的重大事件，并争论起联合抵制蒙哥马利市公车运动的出现，讨论其发展的要素是法律

还是对抗，是理性还是愤慨之情，是因为法令还是思想上的转变。而在密西西比州，自由乘车者内部正在发生截然不同的转变。对其中一些被羁押的人来说，幸存下来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他们曾遭受了无数次暴徒袭击，看到了许多相关新闻报道，从那么多狂怒人群中经过，脑子中浮现过无数次假想的偷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自由乘车者极为坚定虔诚，于是当他们被毫发无损地送入监牢时，其中几个似乎因失望而崩溃了。其他的则不安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刚从海恩兹县立监狱的地下牢房经历中恢复过来，他们所有人就开始唱歌。汉克·托马斯领着他们唱《我们一定会胜利》，歌声嘹亮，使得对面的女性囚犯也跟着唱起了同一首歌。他们把运动中的全部歌曲都唱了一遍，歌声最终消失，变成了隔着牢房交谈，他们能听到詹姆斯·贝弗尔大声宣讲着《使徒行传》第16章，关于上帝是怎样向腓利比降下一场地震，来震开关押保罗和塞拉斯的监狱地基的，以及他将如何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降下一场类似的地震，在两天内解放自由乘车者。

贝弗尔满怀激情地宣讲着，几乎没有间断，让那些能听到宣讲的人相互激励消遣，并为他天赐越狱不断增长的期望担忧不已。两天后，贝弗尔似乎陷入了绝望，詹姆斯·法默等人担心他可能崩溃了。大部分自由乘车者并不太了解贝弗尔，而那些了解他的人，比如他的神学院同学约翰·刘易斯和伯纳德·拉斐特，都知道他一直游走在圣人和疯子的边缘。巧合的是，由于表现良好，贝弗尔牢房的滑动铁门并没有完全锁起来，而贝弗尔看准了这个机会，请拉斐特再次祷告求得一个他们的目标会实现的征兆。祈祷时，贝弗尔悄悄地溜出自己的牢房，站在拉斐特的牢房前，而拉斐特睁开眼睛看到这幅重获自由的景象，惊恐地尖叫着从床上倒栽了下来。贝弗尔放声大笑，回到了牢房里。他和拉斐特分别用不同的故事解释了尖叫的缘故，让在其他牢房里的同伴们对他们的镇静疑惑不已。然而毫无疑问，贝弗尔也有头脑清醒的时候。由于自由乘车者高声歌唱，狱卒便不再给他们提供香烟和零食了，于是贝弗尔建议与监狱里的其他人秘密交易。

其他囚犯为适应监狱生活显露出了各异的状态，有的温顺，有的狂暴，有的

淡漠，还有些已经歇斯底里了。有些人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在这里待到“天荒地老”，可没过几天就假释出狱了。那些仍留在监狱的人里，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大学学生，四分之三是男性，黑人占一半以上，剩下的则是公会会教徒和犹太教教徒，还包括了几位拉比，他们代表着为数不多的白人。10年前的经验使詹姆斯·劳森成为公认的监狱文化专家，他教他们如何与监狱里的窃贼和酒鬼相处，并警告他们除了自己的坚强内心，不要依靠任何事物，因为所有一切都由不得他们控制。很快，监狱官员就给予了他们严酷的考验，大部分自由乘车者被转移到了海恩兹县立监狱乡下农场。每12个年轻囚犯挤在一个厕所堵塞不堪、面积为195英尺的牢房里。食物变质生虫，还会因为唱歌被关进幽闭恐怖的“干燥箱”。唯一令他们感到安慰的是没有足够的箱子一次性关押住所有唱歌的人。

6月15日午夜刚过不久——正是他们的代表远赴华盛顿与总检察长肯尼迪接洽的前一天——守卫把45个男性囚犯从牢房赶到了紧闭的货运拖挂车里。货车带着这些被关押在黑暗中的囚犯摇晃着驶出了杰克逊市。当他们终于跌跌撞撞地看着黎明之光走下车时，他们发现正站在一大片围墙环绕的铁丝网门里的一座瞭望塔下，身旁是带着猎枪的狱警。监狱长欢迎他们来到帕奇曼监狱。“这里有作恶多端的黑鬼，”他警告道，“那些被判了死刑的黑鬼一看到你们就会把你们痛殴一顿，并用利刃伤害你们。”他命他们排成一队跟着他进入一幢用水泥块加工过的大楼里。

他们动身后，狱警发现两个从芝加哥来的年轻白人仍待在一辆货车的拖车里。“我们拒绝合作，因为我们被非法羁押了。”特里·沙利文说着劳森和其他人曾劝他不要说的话。狱警们把这两个芝加哥人从货车上扔了下来，拉着他们的脚把他们拖过泥地和草坪，越过水泥地扔进接待室，在那里囚犯被命令脱去衣服。但这两个人仍不配合，于是狱警们用赶畜棒进行电击，直到他们倒在地上滚来滚去，发出痛苦的喊叫声。最后，狱警扯掉了他们的衣服。

囚犯们被扔在了接待室里，在等候了仿佛无穷无尽的时间后，他们来到了浴

室，在枪口的凝视下洗了澡。他们当中不止一个人突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就像纳粹集中营里的囚犯。随后，他们又继续赤裸地沿着水泥走廊行进至高度戒备区，两人一间被关押起来，在经历了另一段漫长的等待后，狱警们拿来了他们唯一的囚服——一件T恤和一条豆青色的短裤。终于只剩下他们了，他们大声抱怨着暴露且不合身的服装以获得些许宽慰。“为什么要对衣服抱怨不休？”詹姆斯·贝弗尔的声音盖过了所有的嘈杂声，“甘地只以一块破布遮体，却让整个大英帝国屈服！”

他们唱起的赞美诗、灵歌和自由之歌，再次成为与监狱管理层冲突的焦点。为了能重新掌控监狱的氛围，监狱方威胁道，若自由乘车者不安静下来，就要拿走牢房里所有床垫。汉克·托马斯随即大发雷霆，把牢房栅门摇得啪啪响，还冲着狱警大喊大叫。“来拿我的床垫啊！”他喊道，“我要继续唱灵歌！”这股冲劲激励整个牢房的人高唱起《我们一定会胜利》，一个接一个的囚犯开始把床垫向牢房栅门扔过去让狱警来收。

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乘车者都甘愿做出这样的牺牲。其中狱警在没收一个人的床垫时不得不把他推开。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牢房里的宗教氛围。其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就对这些宗教仪式表现得漠不关心，另外还有很多自由乘车者嫉恨纳什维尔学生们推行的甘地主义思想。监狱内爆发了关于甘地的争论，讨论着在监狱禁食该取决于囚犯们的内心信念，还是该取决于对外界的政治影响。监狱内还发生了不太高尚的争端，例如因不禁食的囚犯们在那些试图禁食的人面前故意大声进食而引发的隔着牢房栅门的殴斗。

由于这些冲突，随着自由乘车者的人数在帕奇曼监狱激增，他们却保持了一种惊人的团队精神。只有几个人请求要回他们的床垫。晚上他们睡在钢丝弹簧上，坚定地歌唱着，克服所有为击垮他们而设计出来的惩罚。当寻常的监狱恐吓不再起作用，懊恼的监狱管理层试着用消防水管给他们洗个澡，接着在夜里用巨大的风扇让他们挨冻。他们还试着关上所有的窗户，让他们享受密西西比州的夏日高温。所有这些惩罚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其中的大部分甚至适得其反。7

月7日，首批自由乘车者经保释出狱以进行上诉。他们知道自己深入虎穴，而且幸免于难，于是都是兴奋地冲出了牢房。

从联合抵制蒙哥马利市公车运动到静坐抗议运动，再到石山入狱运动，以及现在对密西西比州监狱的大规模冲击运动，这些词中都有一个相同的内容，即“运动”——一种主动、崇高的经历，其范围也在持续扩大。战斗的舞台正蔓延至整个南方。一场孤立的战斗已经被数不清的零星战斗所取代，而此时在密西西比州各个监狱内，他们正在把相似的经历转变为一种共有的体验。学生们开始把这场运动看成一种使命。监狱里的约翰·刘易斯利用信件告知公会教徒，说他想要在南方全职工作，因此打算退出去印度的计划。

詹姆斯·法默刚飞抵纽约市，就在机场遇见了摄像机和高喊着“法默是我们的领导者”的赞美种族平等协会的支持者人群。这样的欢迎仪式并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因为法默在种族平等协会的地位已经立即让他如一位国家领导人般，登上了各种黑人杂志的封面。更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回到洛杉矶市、芝加哥市、波士顿市和分散在这些城市之间的小城镇的家中的人，也受到了类似的迎接。以往由信徒们组成的小型集会，也被大批赶来向一位自由乘车者——任何一位——致敬的陌生人所取代。

自由乘车运动的激情与肯尼迪的选民登记计划发生了冲突。就在他们从帕奇曼监狱被释放一周后的一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会议上，自由乘车者学生听到他们的一些同僚提议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优先”采纳之前与哈里·贝拉方特讨论过的选民登记运动时都震惊了。他们正在讨论的是一场涉及约20万学生工作者的浩大运动——人数规模是自由乘车者的千倍以上。激烈的争论爆发了。那些刚离开监狱的人反对道，选民登记毫无甘地主义精神，他们认为其是随波逐流的政治行为，且极有可能是肯尼迪政府为了把“直接行动”的示威者从街道赶走的一个手段。选民登记的拥护者则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承担起登记的繁重工作了，并暗示自由乘车者已经沉迷于殉道的吸引力中无法自拔。最后，争论的双方

只能认同在一个月后高地民众学校召开的摊牌会议上做出这个重大决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态十分紧急，而我们都期望各州代表能参与进来，”地方联络员查理·谢罗德在他的召集函中这样写道，“这次会议的结果可能会确定未来数年民权运动的方向！”

巧合的是，当月，鲍勃·摩西正在前往密西西比州的路上，打算开始一段新生活。这位哈佛毕业的哲学家曾负责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首次在南方腹地进行招募旅行，随后又自愿在令人生畏的密西西比州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工作了“2~3年”，因此在自由乘车运动之前，摩西已经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小有名气了。由于大家都知道他策划的工作正是围绕着选民登记而进行的，于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查理·迈克德鲁、查理·琼斯、蒂姆·詹金斯，以及主张选民登记的其他领导人，便请他在内部斗争中支持自己一方。摩西对这场钩心斗角感到十分为难，他表示自己的选民登记计划既非宏伟蓝图也非哲学幻想。他们只是响应阿姆泽·摩尔在密西西比州最好采取何种行动的分析结果而已。摩西拒绝出席高地会议，也不愿参与到这场争端中，但他请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把他的密西西比州登记计划纳入所有展开的招募行动中。迈克德鲁和其他人愉快地为他提供了约翰·多尔在司法部的私人电话号码。摩西离开后，詹金斯评价道，他似乎过于谦卑理性，在对抗密西西比州的种族隔离主义上没有半点希望。

摩西终于来到了位于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市的阿姆泽·摩尔的家门前，发现这位主人正处于不寻常的分神状态。所有的密西西比人都被正发生在杰克逊市的自由乘车者逮捕事件搅得心烦意乱。摩尔说，此时并不是开始选民登记工作的大好时机。这些理由让他摊开了手中的日报，回避与对方的交流。而摩西此时既不愿去质疑这位良师对于本地种族之间关系的判断力，也不想永远在摩尔家的客房里待下去。最终摩尔提出了一个建议来化解两人之间逐渐增长的尴尬气氛。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州南部边境小镇麦库姆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领导人，曾在看过一篇黑人新闻界的报道后给他写了一封信，想知道摩尔是否愿意派几个“学生团

队”来麦库姆镇登记选民。摩尔向摩西建议道，在麦库姆镇事态不像附近的德尔塔镇一样紧张——没那么敏感。也许他应该从那儿开始。摩西痛苦地启程了。一趟向南行进 200 英里的车程把他带到了麦库姆镇，在那里他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领导人 C.C. 布莱恩特解释道第一支学生团队里只有他一个人。

高地会议持续了 3 天，一直是针锋相对，这只不过给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内部的各州代表带来了一个僵局。查理·迈克德鲁突然宣布他打算通过让赞成选民登记计划的主席投票的方式，来打破这个僵局。一些直接行动的支持者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艾拉·贝克不顾一切地想阻止她宝贵的学生们服从领导层的决定，这些决定曾让她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感到恼火，于是她提议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暂时分成两派合作行动——由戴安·纳什领导的直接行动派，和查理·琼斯领导的选民登记派。她的折中建议勉强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除了少数支持直接行动的顽固分子。伯纳德·李永远离开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就像亚特兰大市静坐运动的前任领导人朗尼·金一样。会议结束时，一则糟糕的笑话流传起来，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昏暗的办公室应该有两道门，这样冤家对头就能各走各的路了。

然而双方的计划进行得都不顺利。直接行动派通过了由纳什维尔的学生牧师保罗·布鲁克斯发起的一项名为“继续向密西西比州前进”的决议，打算从首府杰克逊市开启一轮持久的非暴力攻击，就像有一间黑人大学，并拥有该州大部分的黑人中产阶级市民的蒙哥马利市行动一样。詹姆斯·贝弗尔和伯纳德·拉斐特负责寻找愿意进行示威游行的当地学生，但市里的警察进行了精明的反击。他们没有逮捕示威者，却以煽动 18 岁以下的学生违反密西西比州种族隔离法为由，以“唆使未成年人罪”逮捕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他们被审判、定罪并判处了最高 3 年的刑罚。他们随后假释出狱提交上诉，并拜访了克利夫兰市的阿姆泽·摩尔以重新进行部署。这样的量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参与运动的学生进行的最严厉的判决。除此之外，还有白人的怒火不断上升的种种迹象，这些

都使阿姆泽·摩尔惶恐不安。

至于选民登记派，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直接来到司法部，想讨论对象选择、人口统计、法律和战略部署问题。从约翰·多尔办公室墙上的地图来看，他们留意到大头针被钉在了那些对选民登记提起诉讼条件最成熟的南方各县上。据多尔估算，最有希望的两个地方是亚拉巴马州达拉斯县和佐治亚州的特雷尔县，也就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据1957年《民权法案》赢得第一场投票权诉讼的地方。查理·谢罗德移居到了佐治亚州，在特雷尔县开始了试点项目，但他很快发现当地大多数黑人对任何讨论民权的人都恐惧多疑。他大胆地提出进行示威和登记活动，结果就连他那几个好不容易结识的朋友也拒绝和他说话了。于是谢罗德不得不退居到奥尔巴尼市的邻近城市从头再来。

这些恼人的开端即使在民权界看问题的夸张方式下也几乎无人察觉。这场运动的计划者实在是太多了。谢罗德正与多尔及另外100人商谈；摩西和贝弗尔在密西西比州工作；自由乘车运动仍在进行中。学生们听说在帕奇曼监狱管理人员在对亲友们进行毒打。尽管悲伤的眼泪连绵不绝，鼓舞人心的事情层出不穷，但基金会正讨论的是数百万美元的大事。自由乘车者们的心理状态正进入鼎盛期，简直就是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刚出现后的3个世纪的缩影。濒临分裂的危机层出不穷，非暴力之爱的倡导者正分散到各地的监狱里，而他们的同盟却在与统治者协商，争取完全公民权，希望如国家官方声明一般，制定出别具一格的新信仰。

金独自承受了这些截然不同的压力。殉道者和统治者都被他吸引着，在自由乘车运动期间，他受到了甚至对他本人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极端蔑视和赞赏。他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学生们的关系突然变得亲密起来，但又敏感而复杂，就像他们与罗伯特·肯尼迪的关系一样。金的名字在公开辩论中是那么敏感，以至于白人的南方浸信会——在气冲冲地对在白宫中安插一位天主教徒一事发出警告后，正试图与肯尼迪总统言归于好——迫使其神学院就允许金在路易斯维尔校园讨论宗教一事公开道歉。而在教徒内部，这普通的邀请就是一种种族与神学上

的异端行为，所以南方各州的教徒取消了他们对神学院的定期捐款。“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来防止这类错误再次发生。”南方浸信会神学院董事会的牧师 J.R. 怀特宣称道。怀特是蒙哥马利市第一浸信会的牧师，自联合抵制公车运动谈判起，就与金意见不合。

另一方面，洛克菲勒州长把金当成了一位政界名人，特意去与他交往。6月的某一天，他让金登上了他飞往奥尔巴尼市的私人飞机，带他去私宅会餐，在一场议会大厦前的自由乘车运动集会上介绍他，命他的员工用洛克菲勒的财富传播金的激情演讲，并送金去参加他随后在纽约一家洛克菲勒雇用的电影摄制公司的演讲。洛克菲勒后来还制作了一部电影，灌了一张黑胶唱片记录演讲。他送了电影拷贝给埃比尼泽，又怕教堂缺少播放设备，便在礼品包里加了一台投影仪。州长写信告诉金，他正利用这部电影“激起电视网对你的工作进行缜密研究的兴趣”。洛克菲勒突如其来地大献殷勤，其动机归根到底一部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 1964 年的大选策略，就是通过采取在民权上更宽容，在军事政策上更具侵略性的立场，从两方面夹击肯尼迪总统。但洛克菲勒和金之间仍有很多的共同点。这位州长的一个女婿就曾因身为一名自由乘车者而被捕。洛克菲勒经常在黑人大学发表演讲，他还是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的河畔教堂主日学校的一名教师。他不寻常的家世也让他比其他政客更接近金的世界，但除了上面所做的事，他并没有对两者的亲密关系大肆声张，这一点尤为难得。

金乘飞机返回了亚特兰大市，在此逗留一或两天出席基金会高阶会议，并在印第安纳波斯利市、匹兹堡市、圣路易斯市、哈特福德市、旧金山市、迈阿密市、锡拉丘兹市和威斯康星州的白水市进行的自由乘车运动上发表讲话——这样一种惊人的方式，使他对全国的机场熟悉到断言能通过它们的特殊气味分辨出是哪个机场。7月6日，他又冒险来到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迎接法默、劳森、贝弗尔、刘易斯、多丽丝·卡索、杰罗姆·史密斯及其他从帕奇曼监狱出来的人。“我们会用忍受磨难的能力来瓦解你们。”他告知密西西比州的白人，还补

充说“种族隔离已死”，以及剩下的唯一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为吉姆·克劳举办一个“多么昂贵”的葬礼。

金仍渴望一种享誉盛名，理性平静的生活，正如他曾叼着烟斗，在研究生院度过的日子那般。杰克逊市集会的两周后，他在来年的日程表上，加上了一条莫尔豪斯研讨课的承诺，他要在课上讲授他最爱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洛克、康德、黑格尔和尼采。在一封标明为“机密”的信件里，对金钱十分慎重的本杰明·梅斯告诫金不要对科雷塔以外的人提及学院支付的1500美元酬金，以免梅斯面临一场莫尔豪斯教授们因不那么慷慨的课时酬劳而发出的抗议。随后，金突然离开，来到时髦的玛莎葡萄园，在斯坦利·利维森为他安排的别墅里，度过了他的第一次8月假期，多才多艺的利维森正勤勉地与哈里·贝拉方特一起，帮助金调解自由乘车运动双方的争议。他们正在推动肯尼迪发起的选民登记运动，此举会减少游行示威的精力，但他们同时也在为继续自由乘车运动筹款。“我往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的户头上存了一张100美元的支票，”那个夏天利维森写信告诉金，“由于开票人突然死亡，所以我想在银行冻结他的账户之前兑现这张支票。”对于这位目光敏锐、精明能干的利维森来说，死亡让他想到的是遗嘱检验法庭，而不是什么葬礼演说。

不过，受金委托代他向《时代周刊》的读者们做出关于自由乘车运动的个人说明的正是利维森。这个不寻常的委托需具备一种敏锐的、跨文化的悟性，因为金希望围绕黑人抗议者阶级传递他的要旨。利维森的草案以金对“波拉德妈妈”的回忆开始，首先讲述了这位妈妈在联合抵制公车运动期间曾说过“我的双脚十分疲累”的话，然后话锋转至5年后，指出如今的自由乘车者们并不是“不通文法的老妇人”，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穿着常春藤大学校服，青春年少，口齿伶俐，坚定不移的”学生们。

许多读者无疑对这个脱颖而出的奇怪要点——此外，或许还是个势利的观点——感到不解。但金只是不希望为他或他的目标列举出各种凭据——他迫切地

想要传达出那些抗议者有多么愿意做出牺牲。与有着类似教育程度的白人不同，他们坚守的中产阶级身份是极为脆弱的。任何失误——失业、触犯法律、心理崩溃、个人丑闻——都能轻易地让他们重新埋在黑人下层阶级中。黑人们冒着如此高的风险，已经倾注了几代人严格训练，投入毕生努力，一味地模仿白人的精致风尚。他们已经把自己变成了社会学家冈纳·米达尔描述的那种“故作姿态的美国人”，执着于炫耀性消费和身份象征，正如金告诉《时代周刊》读者们的那般。

正是这种文化背景让自由乘车运动对金来说那么有革命性。“如今，模仿已经终结。”他说。白人学生们史无前例地正在模仿黑人。“见到迷人、衣着时尚、魅力和个性能为迎新舞会锦上添花的年轻女孩时，”金几乎不知所措地继续说道，“听到他们用毋庸置疑的真挚语气说‘金博士，如有必要，我已经准备好牺牲了’时，我不再感到惊讶了。”身份和感情曾被视为比生命更珍贵，但这些学生甘愿拿它们来冒险，慢慢了解到了金确信要更为珍贵的东西。

就在金于玛莎葡萄园为接下来与约瑟夫·哈里森·杰克逊的教堂斗争养精蓄锐时，这种思虑与他的内心是息息相通的。他于8月3日起在那儿休养，当密西西比州政府试图向自由乘车者收取大约30万美元的保释金以作为罚款时，他派遣怀特·沃克出席紧急会议。8月7日摩西和一位自愿参加自由乘车运动的人在密西西比州开办第一所选民登记学校时，8月9日南方浸信会神学院让金就演讲一事对其教众道歉时，还有8月11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学生们在高地会议上爆发冲突时，他都在葡萄园。8月13日，正当精疲力竭的学生们接受了艾拉·贝克的折中提议时，金进行了一天的纽约之行，去河畔教堂进行宣讲。东德突击队正布下带刺铁丝网，把它作为第一道柏林墙阻断了与西柏林的联系。超级大国对此的密切关注使这场冷战大戏的光芒遮蔽住了该年所有其他争取自由的事业。

第十三章 麦库姆的摩西，堪萨斯的金

C.C. 布莱恩特和 E.D. 尼克松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脚踏实地，坦白直率。和尼克松一样，布莱恩特也要经常东奔西跑。他的薪水来自遥远的圣城芝加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不必参与麦库姆的白人经济。尽管布莱恩特是位伊利诺伊中央填装起重机厂的工人，但从传统领导地位来说，他的独立已经超越了教师、牧师和为数不多的几位当地黑人。布莱恩特是执事、主日学校的教师、童子军军团领袖，也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派克县分会会长。此外，他也是共济会的高官，因此，他才能批准鲍勃·摩西将黑人共济会会堂的二层作为选民登记学校。会堂一层租给了一位屠夫。

8 月烈日炎炎下，摩西挨家挨户敲门，告诉所有愿意听他说话的人自己是 C.C. 布莱恩特负责选民登记的人。在阿姆泽·摩尔家学到的东西让他成了密西西比晦涩难懂的登记法方面的专家。密西西比的《登记法》要求申请人翻译一段州宪法，直到登记员满意为止。单这一障碍就让密西西比黑人的梦想遥不可及，但摩西认为，如果自己能让麦库姆的人想象自己出现在很少有黑人敢踏足的县政府大楼，就已经是取得了初步胜利。这种心理障碍的背后还潜藏着好几重恐惧：被打上叛徒的标签还有对识字能力、自我价值以及权力的严重怀疑。

霍利斯·沃特金斯来自密西西比州萨米特的一个小村庄。一天，他伸头探进摩西的办公室，说自己听说马丁·路德·金来镇上进行某项神秘的工程——问摩西是不是马丁·路德·金。摩西感到沃特金斯年轻的天真背后有着坚定的勇气，便说自己不知道马丁·路德·金要来麦库姆的事情，不过现在镇上有一门新课程，教黑人选举投票，好让他们成为一等公民。沃特金斯很感兴趣。他之前“计划”

过上大学的事，可既没有钱也没有工作。由于和父母住在一起，沃特金斯并没有一下陷入成人不可避免的烦恼里，所以他有的是时间。很快，他就和另一个情况相似的少年柯蒂斯·海耶斯成了这个项目最初两个志愿者。两个人分发小册子，四处宣传登记课。

对摩西来说幸运的是，参加8月7日第一堂课的人中有一些是向布莱恩特承诺过要登记的人，此外，第一节晚课后，有4个人说愿意登记。第二节晚课后，又有3个人愿意这样做，其中两个在第二天都成功登记了。他们的成功和第三节晚课又激励了9个人在第三天登记。这时，登记员警觉起来，认为自己办公室里蜂拥而至的黑人并非偶然事件，于是，9个要登记的人里只有1个成功了。

派克县的种族晴雨表非常敏感，接连3天有16个黑人出现在政府大楼是值得《麦库姆企业学报》大费笔墨的新闻。报道不仅警醒了当地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也让密西西比南部这个萧条农业小镇上的黑人们兴奋不已。几天时间，周围郊县的农民都来到了麦库姆，聚集在共济会会堂属于摩西的那个角落里。听他讲过非暴力、基本民权以及《密西西比宪法》后，农民们都请求摩西将他羽翼未丰的项目扩展到相邻两个县，有史以来，那里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没有一个投票选举过。相对于荒野农郊的阿米特县和沃尔索尔县来说，1.2万人里有250个黑人选民的麦库姆县简直让它成了进步的大都市。

摩西鼓足勇气告诉农民们那样做很危险，或者说从战术上讲，把注意力转移到麦库姆之外的其他地方并不明智。与布莱恩特商量之后，摩西认为，如果不深入所谓的“深水区”，就无法获得未登记的人的信任。因此，摩西便说除了在麦库姆以外的地方，如果没有资金会遇到的问题：进行长距离往返，摩西需要借一辆车，他还需要一个住的地方。此外，在备用车辆很少且受过教育的北方人很可疑的远方，需要时间和耐心来安排一切。可是，很快，阿米特县一位叫E.W.斯特普托的农民说愿意给摩西提供住宿。斯特普托和妻子养育了9个子女，7个都已成年。他本人曾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阿米特县分会的会长，直到警长

两年前取消了他的会籍。也是自那时起，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阿米特县分会也不再活跃了。

8月15日早上，摩西和阿米特县最初的3位志愿者开车到了位于利伯蒂的县政府大楼，那里距离麦库姆约25英里。草坪上的一块石碑声称这里是密西西比最早的县政府，建于1839年，还吹嘘说塞西尔·波登的浓缩牛奶和提契纳的抗生素软膏都是在这里发明的。4个黑人绕过石碑和联邦纪念雕像，走进了白色砖石建造的巨大建筑，直奔县登记员的办公室，而登记员却非常严肃地问他们来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

一个很老的黑种男人无助地等着两位白种女士志愿者回答，但那两个人都被吓得说不出话来。最后，站在后面的摩西开口了。“他们想来试着登记选举。”摩西说。登记员问了摩西在这件事中的角色后，就让他们等着。好奇的办公人员从他们身边默然走过，看着给自己的一天带来谈资的古怪事。警长走进来，后面跟着副手、税务办公室的职员以及驾照考官。一位密西西比高速公路的巡警踱着步子走进来，坐下了。

6个小时后，摩西终于逃出了政府大楼的紧张气氛。跟着的那3位志愿者都知道自己肯定会被拒绝，但都得意洋洋的，因为毕竟登记官允许他们填表了。这对那3个人来说是第一次，他们一直在庆祝，直到发现登记员办公室里的高速公路巡警跟在他们身后。巡警一直用自行车的速度在回麦库姆的24号高速公路上跟了他们10英里。他们越来越害怕，就开离了高速公路，走上辅路，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觉得巡警的跟随不过是巧合。巡警和他们势均力敌，还是跟着。最后，巡警打开了警灯，让他们靠边停车，还让他们跟着自己走。现在，黑人们满是恐惧和后悔，而阿米特县的志愿者们都发誓再也不会踏进登记员办公室一步。

到了麦库姆，只有摩西一个人被捕。当天晚上，派克县的律师慌忙从马格诺利亚赶来。开始，律师以为摩西被捕的原因是扰乱治安，但后来，他不这么认为，因为他想到了被捕的只有摩西一个人。律师在履行自己职责的过程中发现

并不是干扰治安的问题，就叫来了一位治安法官，问摩西是否做好了上法庭的准备。摩西要求打个电话，这是众所周知的行为。

得到允许后，摩西从钱包中摸索出一个紧急号码。他从没跟约翰·多尔讲过话，也不知道这么晚了，多尔会不会还在办公室。为了增强气势，摩西用着重的气语对接线员说：“华盛顿特区，美国司法部。”之后，多尔不只同意接电话，还同意付费后，摩西感到一阵轻松。看着周围惊讶的表情，摩西把当天发生的事都告诉了多尔。摩西讲得很详细，语气冷静，丝毫没有掺杂个人感情，但他的结论是自己被捕是被人陷害的，目的明显是借由肤色的相关法令打击想登记的人，然而，1957年和1960年的《民权法案》已经禁止了上述行为。和多尔就联邦调查的前景协商后，摩西挂掉电话，说自己准备好受审了。

当晚，治安官认定摩西有罪，并处其50美元的罚金。也许是考虑到了囚犯与美国司法部如此明显的关系，治安官提出如果摩西愿意支付5美元诉讼费——只是作为没让法官享用完晚餐的象征性收费，就可以先不交罚金。摩西平静地说自己不会交这5美元，因为它也是这场不公平的起诉的一部分，于是，法官就把他关进了派克县监狱。摩西度过了在监狱里的第一晚。他是除了自由乘车者之外第一个在密西西比被捕入狱的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成员，而自由乘车者还不断地从杰克逊巴士站被送到监狱来。

两天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名律师从杰克逊赶来，为摩西付清了罚款，把他救了出来。律师这样做是得到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高官们勉强同意，高官们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次既不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赞助的也不是它支持的而陷入法律麻烦中的活动。摩西对他们的慷慨毫不领情，丝毫没能安慰高官们闷闷不乐的心情。能出监狱，摩西当然很高兴，但他坚持原则，拒绝自己支付罚金，而且对别人支付罚金的态度也感到很矛盾。

摩西回到了麦库姆，发现共济会会堂在自己短暂的离开时完全变了模样。十几个自由乘车者从杰克逊赶过来，对贝弗尔和拉斐特在煽动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

让那里暂停了对静坐新成员的招募，此外，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领导人在高地民众学校进行了激烈辩论后，也融入了麦库姆。摩西被捕的新闻模糊了横跨在高地人对“安全的”选民登记及“夸张的”非暴力示威二者明确的界限。一夜之间，麦库姆成了那个夏天最新一个吸引人的镇子。鲁比·多丽丝·史密斯是参与石山二月“留在狱中”活动的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4位元老之一，她和一些自由乘车者一起来的；查尔斯·谢罗德放下自己在佐治亚州尚未成熟的登记项目而来；查尔斯·约翰斯和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前主席莫里森·巴里也在路上。了解了摩西挨家挨户登记的方法，大家又采用了从杰克逊那里学到的方法——招收高中学生来帮忙。

摩西错过了麦库姆大部分新动向。他很快就回到了斯特普托在阿米特县的农场，希望能修复因前3个志愿者痛苦经历带来的创伤。关于摩西被捕的消息已经在阿米特县传开。斯特普托说，在政府大楼附近工作的黑人无意中听到了白人公民理事会开会时是如何讨论摩西的计划的。这个可怕的消息在黑人之间流传，让摩西和斯特普托连续几天费尽口舌也没能说服一个人参加登记课程。就连有勇气给摩西提供住处的斯特普托都没下定决心去登记。斯特普托也不希望很多人在自己的农场附近来来往往，因为马路对面就是密西西比州众议员E.H.赫斯特的家。斯特普托告诉摩西，赫斯特是支持种族隔离的支柱，但真正的威胁是赫斯特的女婿比利·杰克·卡斯頓，那个人的名字让阿米特县的黑人心惊胆战。卡斯頓可是既疯狂又暴力的恶棍。

斯特普托马不停蹄地为摩西安排好了登记课程的教室，就是森林深处浸信会教堂的一个单独的房间——就是在那个教堂，治安官一下没收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阿米特县分会的记录。（另一点福克纳式的事实是，治安官是比利·杰克·卡斯頓的表亲。）阿米特县几个胆子最大的黑人参加了摩西的晚课，听他讲关于登记的事。摩西没再给他们压力，也没再问谁愿意登记。这个没问出口的问题就不了了之了。最后，第一节课后快两周时，一个名叫柯蒂斯·道森的农民决定南

下，一位诺克斯牧师也站出来要和他一起。他们两人的举动得到了大家热切的赞美，那天晚上，摩西和斯特普托就这件事讨论到深夜。他们两个人一致认为道森很坚定，但从诺克斯牧师三分钟热度的热情和很多人的背书判断，他有些反复无常，不坚定，还有些愚蠢。摩西开始想过是不是应该拒绝诺克斯，如果他拒绝了诺克斯，是否应该让道森独自去登记。不过，摩西最终决定让诺克斯同去。

第二天，也就是8月29日，摩西、道森和诺克斯发现3个白人封锁了政府大楼附近的人行道。道森认出了站在前面的是比利·杰克·卡斯顿；剩下的一个是治安官的另一位表亲，一个是治安官的儿子。双方简单说了两句话。卡斯顿问摩西要去哪儿。摩西回答说要去登记员办公室。卡斯顿说你不能去之后，就用自己的刀把猛打在摩西的额头上。

比头上的痛更清晰的一个感觉是，摩西觉得自己在人行道上摇摇晃晃地正逐渐脱离了身体。他跌跌撞撞地摇摆了几步，才逐渐适应了自己身上的伤。他的恐惧似乎和卡斯顿的咕哝声一样遥远，时间慢慢停滞，卡斯顿再次掴打摇晃自己时，摩西听到了诺克斯跑开的声音。摩西投降示弱后，卡斯顿再次朝他右侧太阳穴猛打，他看到自己跪在了地上，脸朝下，又感到头上被一通猛打。不停的击打过程中，摩西清楚地听到了柯蒂斯·道森乞求卡斯顿停手的声音。

打自己的人离开了，摩西能动之后，他不顾自己的伤口，第一个最要紧的想法是走进政府大楼。“我们必须去登记。”摩西说，而此时道森正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摩西头上的伤口正不停冒血，这场景实在吓坏了他。“不能让这种事阻止我们，”摩西说，“这才是重点。”道森勇敢地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诺克斯牧师也这样说。摩西被他们的勇敢深深感动了，尤其是诺克斯牧师莫名的勇气。但他们3个人穿过马路走向政府大楼时，摩西在震惊和混乱中，忽然很好奇，不知道诺克斯是否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县登记员用一种老练的表情看着过来的黑人们，一副“好吧，看看谁来了”的样子，但这副表情一看到摩西就消失了。摩西浑身是血，表情平静，声音沉

稳，他的出现就好像是班柯的鬼魂。登记员马上就换上了有条不紊的冷漠，过度的礼貌和装出来的不耐烦。他本想鼓起勇气躲在这些后面，可很快，他绷紧的神经就压垮了官僚主义的做派。登记员说办公室要关门了，让3个黑人离开。

摩西他们3个人走出政府大楼，周围三五成群的人都看着他们。道森开车回到了斯特普托的农场。摩西越来越糟的身体状况激起了大家的愤怒。之后，由于阿米特县没有黑人医生，他们就开车回到了麦库姆，那里有一位刚从纳什维尔菲斯科大学来的医生。那位医生之前从未参与过选民登记，他给摩西头上的3处伤口缝了9针，其间一直在和摩西交谈，最后还把自己的车提供给了登记事业。

摩西回到共济会会堂时刚好赶上了麦库姆历史上第一次大型集会，集会后，还进行了第一次因静坐而被捕的事件。摩西不在的时候，查尔斯·谢罗德还有其他跟着自由乘车者来的人遵循着非暴力的准则，一直在办学讲课，就像詹姆斯·罗森的工作室一样；麦库姆的年轻学生们——还不到能投票的年纪，被自己游说的那些人的被动性感到很失望——就决定像自由乘车者一样，借着这股热情做些事情。莫里森·巴里要麦库姆的学生在镇博物馆前示威，因为图书馆不让黑人进入。静坐期间，麦库姆的警察以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了摩西的两个志愿者——霍利斯·沃特金斯和柯蒂斯·海耶斯。

摩西头上的伤还没好就回到了麦库姆，而那两个人此时还在派克县的监狱里，镇上的黑人非常愤怒，连詹姆斯·贝弗尔也从杰克逊赶来，在有差不多200人参加的大型集会上演讲。他声音高亢，还有流星般的形象，鼓动着非暴力运动见证者心中的烈火。讲述白天在利伯蒂发生的事情时，摩西并不太情愿，声音小得几乎让人听不到，和平常一样，他的中心思想没有变：必须要将重要的事做下去。他说自己打算第二天再去利伯蒂的政府大楼，这毫无预兆的宣告带给人们的震惊不亚于贝弗尔激动人心的布道。当地报纸的一个白人记者警告读者说黑人们可能是认真的。

那天晚上，摩西思考良久，决定自己必须行动，因为他 and 所有黑人都应该与

密西西比的白人享有同样的法定权利。因此，他第二天又开车去了利伯蒂的政府大楼，告诉阿米特县的律师自己想控告比利·杰克·卡斯顿暴力殴打。检察官感到相当不安，就像前一天摩西的出现让那位登记员惊讶不已。这个请求相当严肃，检察官便说自己也听说了殴打事件，那实在是太糟糕了。看上去，检察官越说自己的法律职责和摩西理论上的权利就越困惑，最后，检察官同意了，说会立案，以阿米特县的名义组织陪审团。但他也强调了实际情况，如果摩西非要进行诉讼，那面对当地白人的愤怒，谁都无法保证摩西的生命——还有他自己的法律事业。他建议摩西思考一晚再做决定，之后，摩西就离开了检察官的办公室，觉得律师是个正直的人。

那天晚上，摩西在斯特普托的农场，他很惊讶，因为即使殴打事件几乎让所有想登记的人都非常害怕，但一个叫威瑟斯比的老农民却突然决定到政府大楼登记。这位老农民非常蔑视被吓破了胆的邻居，说如果摩西陪他去，那他就愿意登记。对斯特普托来说，摩西要控告卡斯顿这件事比威瑟斯比要去登记更让他惊讶。因为摩西不可能胜诉，还会激怒县里的每个白人，就连疯掉的黑人都不会有那种想法。

律师似乎被摩西的出现和两位证人激励了，与治安法官一起安排了一次乡村风格的诉讼。他们打电话传唤了比利·杰克·卡斯顿，选了6个人组成了陪审团，还通知了政府大楼里的每个人。两个小时后庭审开始时，县里各个地方的白人都蜂拥而至，很多还带着枪。有些人看到像比利·杰克·卡斯顿这样的名人因为黑鬼的一句话就被叫到了被告席而感到很可笑，有些人则非常生气，更多的人两种感觉都有。白人们挤满了小小的审判室，有的还站到了政府大楼外面的草坪上。摩西、道森和诺克斯牧师做证之后，发现100多个黑人正虎视眈眈，在一定程度上被法庭另一端的冒犯点燃了。

威瑟斯比要去登记。摩西庭审时，从纽约来到麦库姆的自由乘车者特拉维斯·布里特和他一起去了。登记员让布里特等在外面，让他独自一人饱受嘲讽之

苦。摩西穿过人群，去找布里特，这时，几声枪响引得大家纷纷退避。没人中枪。这可能是恶意的玩笑，但震慑力足以让治安官告诉摩西，他和朋友们将在警察的紧急陪同下到县区边界去。第二天，他们从报纸上看到，陪审团宣布卡斯頓无罪释放。

麦库姆的黑人和白人都陷入了狂热的骚动中。詹姆斯·贝弗尔请当地学生参加非暴力直接行动，学生们受其激励，就在灰狗巴士午餐柜台前静坐。警察逮捕了3个学生，但让黑人白人争论不休的是，3个学生中那个名叫布兰达·特拉维斯的只是个16岁的女孩。白人指责黑人不负责任，竟让小孩子参与如此既危险又违法的活动，而黑人也很愤怒，因为白人竟把布兰达当作成人关进派克县的监狱里。因为不能保释，于是布兰达只好在监狱里服刑30天，错过了开学之后的第一个月。

8月的最后一天，布兰达的审判在麦库姆进行，同一天，对卡斯頓的审判也在利伯蒂进行。摩西来到密西西比后的第一个月随着这两件事结束了。阿米特县还是没有登记成功的黑人选举人，而在派克县，也只是多了几个而已，但摩西不再孤立无援。他和《圣经·旧约》中那个著名的人物同名，单这一点就在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中让他戴上了如基督一样的光环，委员会中纷纷流传着摩西被卡斯頓殴打时，还紧握双手说着“原谅他们”。这个虚构的故事属于信仰的范畴，如摩西混杂着孤独、神秘和倔强的温柔牵动着密西西比的心。奇妙的事情正在不可能的边缘快速发生。刚刚兴起的自由乘车者传奇中，摩西自己才崭露头角。

南方各地同时爆发了静坐和冲突，尤其是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县爆发了相当混乱的小规模战斗。怀亚特·沃克跑出门罗县和金会面，当时金就要结束在马沙文雅岛的假期了。教会危机取决于这两个人。金准备在堪萨斯城提名加德纳·泰勒而不是J.H. 杰克逊。他和追随者们花了一年时间招募牧师到堪萨斯城支持泰勒，致力于保证泰勒在费城的选举有效。他们还印制了自己的“官方”证明文件和文学作品，和杰克逊相抗衡。他们打算把选举的合法性带到堪萨斯城，之后，再就

选举规则和权力分配与杰克逊商讨。支持泰勒的人竭尽全力在大会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金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董事会的一位同僚筹集了2.5万美元的“闪电款项”，广告天下泰勒的财政状况非常好。

即使如此，这一策略也有不足之处。一次民意测试表明，尽管一半的牧师都愿意投票给泰勒，但他们中只有不到1000人反对杰克逊作为现任管理者。这还不够，泰勒的困境让金几乎绝望。金咆哮着，同样的圈套自1957年他在分裂的南方发表了《给我们选举权》之后就一直限制他更大的野心：金知道投票会带来一场政治变革，但如果没一场变革让投票作数，那一切都没用。金想要动员黑人教堂的力量打破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在选举方面的霸权，可这个想法却受制于父亲最好的伙伴J.H. 杰克逊的教会霸权。

金进退两难，便推迟了去堪萨斯城的计划，还曾暗示朋友自己也许就不去了，这让朋友们非常震惊。9月5日周二大会开始时，加德纳·泰勒和顾问们心照不宣地放弃了对大会实际控制权的争夺。他们让律师到理查德·H. 柯尼希斯多尔夫的法庭申请禁令，要求同时禁止J.H. 杰克逊和加德纳·泰勒参加选举。作为势均力敌的两位教皇，这一和解的举动被视为示弱的表现。而柯尼希斯多尔夫法官能为泰勒做的只是指定一位84岁的牧师监督计票。

金的心是和泰勒站在一起的，他的余生都将哀悼未能成功获得民权运动的制度基础，但实际上，金知道他越是与公开支持泰勒，他自己的名誉就越会受到损害。然而，另一方面看，如果金没能为泰勒做提名演讲，他担心朋友们会认为自己已经站到J.H. 杰克逊一边了。这个想法让金害怕极了，如果朋友们这么想——如果朋友们认为自己拒绝演讲是出于自私——那他的缺席将在朋友们心上刻下永久的烙印。因此，金不想提名泰勒的决心越坚定，他越觉得自己无论有多不舒服，都应该支持泰勒和朋友们。这些考虑在怀亚特·沃克看来毫无意义，他接到了电话，知道泰勒会落败后，感到很满意，却也不想参加杰克逊胜利时那个尴尬的场合。沃克躲在了亚特兰大，而金午夜后才飞往堪萨斯城，杰克逊和泰

勒两股势力的总部分别位于密苏里河的两岸。

金的同盟们至少装作听懂了他的解释。他们准备孤注一掷，让加德纳·泰勒站到演讲台上——视野开阔，靠近麦克风——在 J.H. 杰克逊发表年度主席致辞前。杰克逊的再次竞选很可能会在他充满感情的布道后进行，随后会是暂停那些规则的提议以及一锤定音的通过。如果泰勒没能立刻发起挑战，要求法庭指派的监督人计票，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大会的安保措施让他们明白偷偷进去是不可能的，因为门口都是支持杰克逊的人在把守。因此，让人目瞪口呆的是，泰勒主义的支持者们把加德纳·泰勒挤进有几百位牧师组成的“楔形攻势”中，直接从大会最大的入口冲了进去。几百位牧师推开因文件不符而不让他们进去的官员们，大喊着落选主席的名字，浩浩荡荡地朝演讲台走去。金留在了会场外面。

楔形攻势让礼堂沸腾了，但 J.H. 杰克逊并没有完全措手不及。他稳坐在几百位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之中，泰勒的人冲过来时，几十位支持杰克逊的人便跳出来阻止他们靠近。在旁观者吵吵闹闹之下，两拨儿牧师就在平台处相撞冲突。先是如橄榄球大混战一般的肩膀相撞，接着就爆发了斗争。双方的交锋之处，势如水火的双方推搡着、扭打着、搏斗着。

泰勒略占几分优势之时，前进的力量将杰克逊的捍卫者都挤到了平台的边上。芝加哥的本·F. 帕克斯顿牧师被杰克逊退后的政要挤得跌跌撞撞的，一下撞在了底特律 A.G. 莱特牧师的椅子上，莱特牧师是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也是 J.H. 杰克逊的密友。莱特往后想靠住墙，可没想到身后只是一幕布帘。“抓住我！”莱特惊慌地喊道，掉下去的时候一下抓住了帕克斯顿的胳膊。帕克斯顿被他带着也跌了下去，全身的力量一下压在了莱特刚刚磕到礼堂地板上的头上，莱特的头骨立时裂了。

呼喊救护车的声音让堪萨斯城的警察们步履匆忙，但他们却未能平息平台另一端不断升级的冲突。相反，莱特受伤的尖叫更激怒了双方。这场打斗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莱特早已被送到门罗医疗中心进行紧急手术了。平台的楼梯不堪踩

踏坍塌了，十几个人都受了伤，总算暂时制止了斗争。有位牧师在打斗中被打掉了3颗牙。80位堪萨斯城的防暴警察最终绕着平台拉起了警戒线，但直到警察们为堪萨斯城300磅的市长H.罗·巴图清理出一条宽敞的路时，秩序才算恢复。巴图借着麦克风，请求大家保持冷静，希望最终他这个还算受人尊敬的门外汉的布道能激起上帝之爱，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之后，音乐家们便带来了平和的背景音乐，稳住休战的状态。

门罗的外科医生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给莱特牧师的头止了血。和金的父亲一样，莱特也是公认的全国浸信会大会的支柱，他教众甚多，还掌管着一个小型商业帝国，是响当当的人物。莱特的律师估计他在底特律的房产价值已经超过了50万美元，他另外的投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额。莱特和杰克逊中尉一样，是个强壮高大的南方移民，身穿深色西装和吊带裤，戴着金表，但那天下午，莱特的生命开始休眠。

在密西西比的利伯蒂，堪萨斯城大会开始的那天，鲍勃·摩西和自由乘车者特拉维斯·布里特再次来到政府大楼。那天有4个黑人想注册，被勒令在外面等候。很快，十几个白人就围过来，毫不客气地问了一些带有敌意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纽约的黑人会一路到这里来找事。连珠炮似的问题中，摩西陷入了沉默的忧愁，几乎要再一次经历当初被打时，思想从身体中抽离出去的感觉。但一个很瘦的老人浑身颤抖着，再也控制不住愤怒，开始对布里特挥拳相向。摩西想叫治安官来，但旁观者挡住了他的路。摩西之后拉住了布里特的腰部，想把他从痛打中拽出来。那个老人还在不停地打，他的恨意太强烈，似乎要用尽全身力气才肯罢休。布里特最终还是在摩西的帮助下逃了出来，他被打了二十多拳，不过都是瘀伤，脸也肿了。摩西带着他跳进借来的车里，朝东边的麦库姆开，留下那4个黑人被拒绝后自己回家。连续3次的打人事件让摩西在阿米特县登记学校想要登记的人望而生畏。

泰勒镇位于麦库姆的东边，与利伯蒂的方向相反。两天后，纳什维尔的自由

乘车者约翰·哈代第四次来到了泰勒镇政府大楼。那里正是其他边远县区的黑人恳求摩西开办登记学校的所在地。哈代刚来泰勒镇的时候穿着平常的卡其色旅行短裤，瘦瘦的腿上还套着长及膝盖的黑色高筒袜，自告奋勇地当了登记学校的教师，很快就成了引人注意的争议人物。作为挑剔且书生气十足的学生，哈代因扎根于自由原则学习中的勇气而闻名。在这个特别的周四，他带着伊迪斯·彼得斯和卢修斯·威尔逊一起来到了政府大楼。那两个人都六十多岁了，各自拥有颇具规模的农场，是县里黑人农民中相对富裕的两个。

登记官约翰·Q.伍德拒绝把登记表给彼得斯和威尔逊。哈代站出来问为什么时，被伍德生硬地打断了。“约翰，我早想见你了。”说着，伍德若无其事地走到桌子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左轮手枪。枪的出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屏气凝息。伍德命令哈代离开，而就在哈代转身走向门口的时候，他抡圆了胳膊，用枪托打在哈代头上。

彼得斯和威尔逊赶紧从伍德身边冲过去，扶住步履不稳、血流不止的哈代，之后，3个黑人走出了政府大楼。一个白人建议他们先去看医生，但哈代脑子里都是摩西被卡斯顿殴打后的场景，说自己想先向当地治安官报告这次伤人事件。他刚下定决心，治安官埃德·克拉夫特就从马路中间朝他跑过来。哈代要求治安官逮捕登记员，但这一说法却冒犯了治安官，因为那是在动摇泰勒镇的基本政治结构，于是治安官反而痛斥哈代，还几近慈悲地责备他把这种事带到密西西比来。因此，克拉夫特没有因殴打逮捕伍德，反而因为扰乱治安而逮捕了哈代。夜幕降临时，治安官把犯人转移到了马格诺利亚的派克县监狱，因为私刑派人士散布的流言让人深感不安。在派克县监狱，哈代就被关在麦库姆因静坐而被捕的学生旁。

约翰·哈代被殴打的那个早上，莱特牧师在受伤两天后去世了。始料未及的死亡让很多牧师、唱诗班的歌手和涉世未深的崇拜者们都镇定下来。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家把超越了可耻的自相残杀的希望全部寄托在D.A.赫尔姆斯身

上。赫尔姆斯是选举监督专员，他穿着正式的黑色西装，打着白色领带，很快就在警察的护送下走进礼堂。在法庭指定的助手帮助下——其中一位还是法官，那位严厉的八十多岁的老人走上演讲台，公布了一项折中之策。公告中认为杰克逊一方履行了技术责任。堪萨斯城的警察只会允许那些用自己的证明文件与杰克逊签署的证明文件交换了的泰勒派代表，而且仍将由杰克逊发表主席致辞。同时，赫尔姆斯也安慰泰勒一方，保证无论耗时多久，都将使用计票器，监票员以及其他一切手段来保证选举的公平。“我们循规蹈矩，”赫尔姆斯说，“从头至尾都要诚实。”

杰克逊站到讲台上布道。礼堂里有1万名浸信会教徒，他们中的很多都渴望一次能带他们摆脱世俗整治的不快的布道，因此回应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积极。赫尔姆斯召集有权选举的代表时，全国各地的杰克逊一方的代表都被算作亚拉巴马州的——第一个被叫到的州——那里也因金和夏特沃斯而成了泰勒的大本营。这一做法让杰克逊十分不解，于是他便强迫赫尔姆斯将按州计票改为按人数计票，于是庞大的计票工程把这件事拖到了晚上。接着，杰克逊便让自己的代表记录，说这次决议不具有约束力，因为赫尔姆斯篡夺了主席的权力，而且这次选举也是在抗议中进行的。泰勒这方的代表对此表示不满。金和其他泰勒一方的领导人认为，如果选举结果对杰克逊不利，那这就是他赶走赫尔姆斯的前奏。

然而，金在最后一刻决定既不提名泰勒，也不会发表支持他的演讲。他鼓起了全部勇气向泰勒解释说莱特牧师刚去世的这周，自己的出现太具有煽动性。于是，泰勒便请阿伯纳斯代替金发表了支持自己的演讲。之后，泰勒和杰克逊严肃地就座，相距不过3英尺，每个人身后都坐着几个亲信。牧师们挨个儿走过投票箱，整个过程很漫长，一直进行到凌晨时分，而阿伯纳斯和本杰明·梅斯作为泰勒的监票人，则警觉地站在选票箱旁。

结果无可争议，杰克逊以2732票对1519票赢得了选举。之后，他迅速开始反击。运用口头表决的无限权力，杰克逊将金从大会主日学校董事会中除名，剥

夺了其颇有威望的副主席身份。这对金来说是最严酷的惩罚，带着简易军事法庭或者说被逐出教会带给他的痛苦。金如此杰出卓越，是会堂里包括杰克逊在内的在白人之中最有影响力的牧师，对他的这种非难让整个大会都因敬畏而一片肃静。金目瞪口呆，走向加德纳·泰勒，问道：“你能相信他刚才做了什么吗？”

杰克逊没有就此住手。在宣告胜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向记者们讲述了那个星期发生的悲剧，此前，记者们都对牧师间的暴力事件感到很不解。杰克逊说，验尸官判定莱特律师的死是意外事件，这从技术层面讲也许是正确的，但在他看来，那是有人策划的叛乱。宣告了加德纳·泰勒不是罪魁祸首后，他指责马丁·路德·金才是“导致一位代表死亡的周三暴力事件的始作俑者”。之后，他就启程去了底特律，在莱特牧师盛大的葬礼上更严厉地指责了金。“这种为了获得自由而不尊重法律的行为，为犯罪分子的加入打开了大门……”杰克逊宣称，“很多牧师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没有丝毫信仰。现在神职人员中已经混入了太多流氓和骗子。”

公开指明金是几乎被他称为谋杀案的元凶后，杰克逊的陷害太明确太引人注目了，已经跨越了种族的鸿沟。这一消息被媒体传播，都在《纽约时报》的背页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对金来说，这件事点燃了灾难的导火索。如果南方的白人报纸注意到的话，就会引发多个旷日持久的丑闻：非暴力运动领袖成了杀人犯还引发了暴乱，随之而来的就是追随金的黑人牧师们拒绝他的种族融会议程。金回到了亚特兰大，紧急召集了由律师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顾问组成的小组，商讨对策。怀亚特·沃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网络，投票决定最有影响力的泰勒派人士。金想给杰克逊施加压力，让他撤销指控，但如同大多数可能是在诽谤别人的原告，金意识到那样做可能只会把目光吸引到最初的指控上。更糟糕的是，金知道任何涉及自己的争议，都会自然而然地引起白人媒体的关注，就算大多数白人记者从未听说过 J.H. 杰克逊。

所有上述因素都不利于诉讼，但金不能任由杰克逊诋毁自己。他从亚特兰大

给杰克逊发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暗示了一场诽谤的诉讼，但同时也暴露了金在公开这件事上谨小慎微。“如你所知，”金说，“我毕生的哲学和社会活动都与爱和非暴力有关，说我是不在乎他人生命和安全的恶棍的人，意在中伤并破坏我的公众形象。因此，我要求你秉承基督教精神，立即收回之前的言论，并敦促媒体关注你对诽谤之词的撤销，如其当初关注你的诽谤之言一样。请将撤销声明寄送一份给我。”

预计杰克逊会对那份电报置之不理，金和支持者们便拼命劝说 25 个州的黑人浸信会领导人联名签署一份与金那份相似的电报。电报最终版断言，杰克逊的说明“只会达到美国种族隔离力量的目的”，并总结道：“如果人格诋毁未被更正，这将让浸信会、基督教家庭、美国的黑人社区以及上帝都受到伤害。”本杰明·梅斯签署了，加德纳·泰勒也是。这些签名中最珍贵的当属 D.A. 赫尔姆斯牧师的，正是他监督了堪萨斯城的选举。这封电报想让杰克逊稍稍让步，暗示他可以说是记者曲解了他的话。

然而，这一精心安排也是白费力气，因为杰克逊没有收回任何话。他完全胜利了。和金不一样的是，除了在大会之中，杰克逊无须保护自身形象。涉及他的最卑鄙的争议在白人眼里就如同恶棍混战一般，不会激起一丝波澜。

金陷入了痛苦的讽刺中。他曾奋力破除的种族隔离现在却成了一把让他免受因第一次惨败而丑闻缠身的保护伞。他不得不用自己并不引以为傲的不在场证明否认莱特的死与自己有关——他在最后一分钟从支持泰勒的前线撤退了——而为了掩饰自己撤退的真实目的，他给出的理由有点不真诚：“我繁忙的日程使我难以抽身参加泰勒团队的任何一次战略性会议。”他在电报里就是这样对杰克逊说的。但金的道德讨伐和权宜之计双双未能奏效。经年累月反暴政运动的苦果反而洗清了杰克逊，让他得到了民主的胜利。正是最后一点让金的悔恨最终显露出来。他自责竟轻易地向政变和阴谋的逻辑投降。“我从未想过杰克逊会允许进行公平的投票。”金反复叹息着。

金一家人被组织驱逐了，而自金的父亲出生前，金一家在教会中的身份就一直处在组织的中心区。无论是金自己还是他父亲，有生之年都不能再次在大会上发言了，而 J.H. 杰克逊就像巨石一样，阻断了金利用有组织的全国教会进行民权运动的希望。“尘埃落定，”怀亚特·沃克在给朋友写的信里说，“邪恶再一次稳坐在皇冠之上。”

在肯尼迪政府司法部的干涉下，原定于 9 月 22 日进行的约翰·哈代案的审理取消了。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举动。挑战国家根据其法律展开刑事诉讼的权利，尤其是在要求联邦政府认可黑人的证词而非白人官员的证词的大环境下，这既是合法的，也十分顺应政治的需要。但民权司的律师们发现联邦投票权关系简直是臭名昭著——登记员竟在办公室殴打哈代——而哈代随后对国家的控告又非常不当，因此，这个案件就是对联邦政府推行投票权不力的嘲弄。约翰·多尔把这个案件交给了伯克·马歇尔做紧急处理，后者则授权他代表哈代和美国政府对密西西比实施诉前禁令。

然而，对司法部来说，不幸的是，多尔在联邦地方法院哈罗德·考克斯法官那里被拒绝了。考克斯是肯尼迪政府在南方任命的第一位司法人员，也是森弗劳尔县治安官的儿子。而森弗劳尔县正是他强大的支持者——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詹姆斯·伊斯特兰的家乡。考克斯支持种族隔离，因在法庭上把黑人称为“狒狒”而臭名远扬，他不愿意支持司法部这一大胆的提议，拒绝了它。于是，伯克·马歇尔就飞去亚特兰大，寻求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审查。

现在是程序问题了。根据联邦程序法规，对诉前禁令的否定并不是申请司法审查的“决定性”理由。马歇尔知道怀有敌意的考克斯法官有时间出席永久禁令的听证会之前，这个问题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就辩称非同寻常的情况下，撤销是合理的。于是，遵照民权运动的管理，两位艾森豪威尔派的法官同意司法部的决定，一位政府的民主党法官不同意。他们发布了法庭命令，先发制人，阻止了对哈代的审判。之后，密西西比州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

两位民权部的律师带着初步报告回到了华盛顿。两位律师中的一位是约翰·多尔的门生，也来自威斯康星州，他自己的第一次实地考察带给他的影响不亚于多尔一年前到田纳西州进行的。对杰克逊的政府大楼和泰勒镇、麦库姆以及利伯蒂进行了探访后，多尔的朋友觉得恐惧挑起的怒火如鲠在喉，难以言喻。如多尔一样，他也到黑人县区教堂与对登记一事不满的人见了面，被他们没有保护时还坚持不懈的勇气深深打动了。而他对摩西最主要的印象就是那个人有让人难以忘怀的平静。

多尔回到密西西比自己调查，9月24日是周日，金正在埃比尼泽介绍特别客座牧师——著名的莫迪凯·约翰逊，而多尔开车去斯特普托的农场见摩西——那是距离接受摩西从派克县监狱打来的对方付费电话已经有5个星期了。一见面，多尔首先注意到的就是摩西头上被卡斯顿殴打后尚未愈合的伤口。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没提到伤口或缝合，也没有按调查局对重大伤害事件的规定附上照片，因此之前多尔推测摩西只是受了点瘀伤而已。而且摩西在说明那次事件的信中也并没有详细阐述那次血淋淋的事件，多尔便觉得摩西作为案件的原告，夸大殴打事件的严重性也是可以理解的。看到刚形成不久的伤疤，多尔不仅对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质量有了新的衡量，也对摩西的品格有了新认识。

听过摩西和斯特普托又长又详细的报告后，多尔确信，他们认为的阿米特县选举登记员工暴力事件进一步升级的不祥预感很有可能变成事实。斯特普托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赫斯特议员和卡斯顿家族带来的威胁最大。因为斯特普托害怕他们对自己和另外两个当地农民展开报复。那两个农民中有一个叫赫伯特·李，他偶尔会自愿开车送摩西去其他地方。和斯特普托一样，李也有9个孩子，但他自己还很年轻，勤于劳作。李的妻子从未参加过登记课程，但非常担心自己的丈夫。李是一个警觉的小个子男人，参加过很多次登记课，但很少说话，也没打算去登记。至于李为什么会受到威胁，摩西的猜测是白人曾看到他坐在李的车里。或许是因为李有一次上课迟到时，遇到了一群拆卸教堂外汽车车牌的白人。摩西

将李的发现报告给了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而消息有可能从那里泄露给了阿米特县，也有可能是有人在教堂认出了李，所以传开了。无论如何，摩西说，赫伯特·李被满怀恨意的白人孤立了，把他当作黑人的探子，或者说是“间谍”。

多尔非常重视这些话，便要求摩西和斯特普托带他去李的农场谈谈。然而，李并不在农场，而多尔那天晚上不得不动身去华盛顿，只好作罢。第二天，多尔走进自己在司法部的办公室时，收到了一条电话留言，说赫伯特·李被杀了。

这条消息是摩西留下的。那天早上，摩西正和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主席查尔斯·麦克迪尤一起工作，这时为摩西缝合伤口的安德森医生打来了电话。安德森医生的声音很冰冷，他说麦库姆的殡仪馆有一具无名的尸体，之前躺在利伯蒂县轧棉机停车场的地上，被人围观了好几个小时。利伯蒂的白人和黑人都没碰过。麦库姆的灵车接到艾米特县当局的神秘消息，跨过县界带回了尸体，当时现场的人甚至都不敢说出受害者的名字。这些细节让安德森认为这个人可能是选举登记班的人。很快，摩西便认出了那正是赫伯特·李。他躺在桌子上，左边太阳穴有一处枪伤。

葬礼上，李的遗孀不顾孩子们，直接朝摩西和麦克迪尤走来，捶胸顿足，愤怒地大喊着：“是你杀了我丈夫！你杀了我丈夫！”她的喊声回响在摩西冰冷悲惨的沉思中。摩西从哲学角度看，把这次事件归咎于自己，承认自己也是这次杀害事件的“参与者”，因为要是他没开始登记课程，也许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然而，除非摩西永远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阿米特县的黑人只要对选举有兴趣，就会被杀，且行凶者永不会受到惩罚——否则，他无法说服自己不开班。

行凶者的身份不容置疑。E.H. 赫斯特议员开着比利·杰克·卡斯顿的小卡车，跟着赫伯特·李来到轧棉机这里，在他身边停了下来。李躲开了赫斯特，穿过自己卡车的前座，从副驾驶那边下了车。赫斯特便绕过卡车过去对付他。根据赫斯特所说的，李想用撬胎棒攻击他，于是他才用手枪打了李的头，而那时枪意外走火了。治安官卡斯顿和镇警长很快就过来了，说他们在李的尸体下发现了一根撬

胎棒。两位目击者——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在同一天跟验尸官说了同样的话，之后，这件事便被裁决为正当杀人。

摩西最后在县城一个小房子里找到了那个黑人证人。路易斯·艾伦是个42岁的伐木工，受教育程度达到了七年级。他有妻子和3个孩子，第四个孩子夭折了，艾伦说是因为癫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伦在新几内亚服役，得了溃疡，此后，伐木和运送木材的繁重工作变得无比艰难，但比起耕作，艾伦更擅长伐木。因为他没有资金，也见不到密西西比3位黑人律师中的任何一个，便依靠白人在设备贷款方面“解决文件问题”，好购买或租赁伐木的刀片。他之前为朱厄·舒格曼先生伐木，直到舒格曼打坏了他的背。现在他为罗伊·纽曼先生伐木。纽曼的律师是乔·戈登先生。

艾伦开诚布公地说明了自身的情况，也坦率地告诉了摩西自己在轧棉机那里看到的事。李没有撬胎棒，也没有其他武器，他说。李对赫斯特说，只要赫斯特拿着枪，自己就不会跟他说话，接着就跳下了自己的卡车，正好靠近艾伦站着的地方。赫斯特跑着绕过卡车，大喊“我今天早上可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之后，赫斯特就站在几英尺之外，朝李的头打了一枪。艾伦之所以做证说有撬胎棒是因为有人告诉他要那么说，而他得保护自己和家庭。但艾伦非常不愿意在李这件事上说谎，因为他知道李是县里正直的黑人农民。艾伦告诉摩西自己曾对妻子说：“我不想说逝者的坏话，因为一个人永远无法求得死者的原谅。”

摩西相信路易斯·艾伦说的是实话，就如同他坚信谨慎的赫伯特·李绝没想过要在周一早上公开袭击县里最有权势的白人之一。然而，摩西也意识到，在这场凶杀案中，事实并不能给赫伯特带来正义。困在受害者和刽子手之间，摩西也明白，强行让艾伦做证的话，可能艾伦也会被杀。但如果沉默，摩西自己就在李的凶杀案中成了非正义的共犯。

回到华盛顿的约翰·多尔希望能得到证言之外的证据，无论是黑人的证言还是白人的证言。“请检查李的尸体，并在葬礼前给伤口拍照片。”凶案的第二天，

他这样指示联邦调查局，“也许子弹入射的角度以及火药灼痕的性质和位置会确定或者驳斥证人的描述。”安德森医生告诉摩西，尸体上根本就没有火药残留。这一事实的确认为联邦调查局开展全面调查提供了足够的客观理由。然而，密西西比没有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多尔的指示从联邦调查局总部传达到新奥尔良办公室再到联邦调查局在纳奇兹唯一的调查员那里时，李已经被安葬了。多尔从未收到关于李的伤口的官方报告。他没有直接证据，只能像当地报纸上说的那样，认为李的死不过是疯狂的黑人正常的下场。

斯特普托还是如常让摩西住在自己与赫斯特家一街之隔的房子里，但摩西因为家里的枪而觉得不舒服。斯特普托的农场就像一个小弹药库，而他本人本就因为善于藏枪而为人所知。李被杀之后，摩西总能在枕头下或者床头柜里找到一两把枪。气氛因可能射出的子弹而变得很紧张。摩西不想把自己非暴力的想法强加在斯特普托身上，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出现点燃暴力之火，便暂时回到了麦库姆。这次凶杀案的余波波及范围很广，也让那4个因为静坐而被捕的学生更为紧张。

摩西和C.C. 布莱恩特有很多要回应的事，后者更是因为民权运动太过偏离原定计划而心烦意乱。布莱恩特简洁地提了提自己被邀请到麦库姆做选民登记工作。现在一个农民在阿米特县的荒郊野外死了，而由于静坐，麦库姆的登记活动也暂停了。摩西同意布莱恩特的分析，但他自己也控制不了局势。10月4日早上，两个参与静坐的学生被释放了，但回到学校后，威严的校长杜威·希金斯准将却通知他们因犯法而被停课了。这一宣布引爆了大家对希金斯的怨恨。在种族隔离的学校，黑人校长是能一手遮天的人物，控制着如教学工作、文凭和大学推荐信等稀缺资源。通常，他们会把学校系统变成经济的封地——通过收取学校活动的入场费中饱私囊，此外，只要他们能扼杀学校的种族激进情绪，也会收到白人学校董事会的酬金。希金斯校长赶走布兰达·特拉维斯和艾克·路易斯的那天早上，反抗席卷了所有教师。100多位学生都跟着他们离开了学校。

学生们进行了一场即兴游行，一路朝共济会会堂的选民登记办公室走去。几

个自由乘车者力劝他们进行一场抗议游行，好让人们关注李的凶杀案，也关注静坐处罚的不公。摩西和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主席麦克迪尤反对游行，认为希金斯让他们停课只是形式，过几天就会取消，但游行会引起激进的白人们更大的反对。然而，这种谨慎被学生们的热情淹没了。学生们决定游行到马格诺利亚的派克县政府大楼时，摩西和麦克迪尤又觉得有责任给予支持。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出发去 8 英里外的马格诺利亚，但刚过县界天就黑了，前面荒凉的高速公路让他们止步不前，掉头回到了麦库姆市政厅。刚到市政厅门口，他们就看到一群白人聚在一起讨论黑人的去向。在警察和旁观者的注视下，一个学生发言人盯着临时的标语牌，走上台阶，开始祈祷。还没说几句，警察就打断了他，威胁说没人给他在台阶上祈祷的权力。那个学生没有听，警察就逮捕了他。另一个学生走过去祈祷，也被逮捕了——一个又一个学生被逮捕了，也包括布兰达·特拉维斯，这变成了一场冗长的仪式。警察们明白这是一场动乱，最终缩减了程序，将剩下的游行全都逮捕了。

他们走向监狱，几个人冲过来攻击鲍勃·泽尔纳——一个刚从亚特兰大来的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成员。作为游行中唯一的白人，泽尔纳是个明显的目标。摩西和麦克迪尤还没挤到泽尔纳身边，用非暴力保护的方法保护他，就有个人掐住了他的脖子。他们替泽尔纳挨了几拳。攻击者们想把他们拽出来时，麦克迪尤抱住了泽尔纳的胸膛，摩西则抓住了他的腰。泽尔纳想抓住市政厅台阶旁的金属栏杆时，《圣经》掉了。一个攻击者跑过来，朝泽尔纳眼睛打了一拳，另一个直接一脚踢在他脸上。泽尔纳一下被踹倒了，带着摩西和麦克迪尤一起摔得仰面朝天，滚下楼梯，直到警察过来赶走了攻击者，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之后，警察就把这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三剑客和 119 位学生关进了监狱。

这件事唤醒了农业小镇上沉睡的当局，他们第二天就带着警察局局长签发的逮捕令，直奔伊利诺伊中央铁路调车场逮捕了 C.C. 布莱恩特，因为局长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布莱恩特是“这次种族争端的幕后之人”。警察还逮捕了纳

什维尔来的年轻自由乘车者科德尔·里根以及谢罗德因石山事件入狱的狱友查尔斯·琼斯。琼斯吓坏了，他穿上满是血迹的白色罩衫，蜷缩在共济会会堂肉铺的角落里，希望被当作屠夫躲过一劫。利用公共电话，琼斯将密西西比有史以来民权运动引发的规模最大的逮捕告诉了媒体。此外，因为害怕摩西和其他人被拖出监狱处以私刑，琼斯还给哈里·贝拉方特和约翰·多尔打了电话求救。多尔马上就赶到了麦库姆，夜里悄悄走进肉铺，说应该拉好所有窗帘。听琼斯向无所不能的联邦政府讲完后，多尔便认定这是自己政治生涯和种族教育中最重要时刻，它最重大的意义就如同他对三 K 党监视的担心一样。

C.C. 布莱恩特没参加学生的游行，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如果他知道，肯定会强烈反对，但自己被捕这件讽刺的事让他在白人面前的巧言论辩变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布莱恩特认为这些事跟危机相比并不重要，此外，他还惊讶地发现很多父母成了被捕儿女的坚强后盾。霍利斯·沃特金斯的父亲在第一次大型集会时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支持演说。有的父母则表现出对登记课程的兴趣。在获得保释后的一次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会议上，焕然一新的布莱恩特声明：“学生带我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他作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领导人的坦白，再加上他被捕这件事的随意性，让他成了逐渐进入麦库姆的记者们视野的新焦点。治安官克莱德·西蒙斯面对《时代周刊》的通讯记者时，把制裁归咎于布莱恩特的态度，因为“他竟把自己当成了白人”。

法庭上，汉斯福德·西蒙斯法官判处布兰达·特拉维斯无限期监禁在管教所，此外，他释放了 100 名比较年轻的学生，还说摩西、麦克迪尤、泽尔纳以及其他几个年纪较大的学生以扰乱治安之罪待审。警卫把犯人们移送到位于利伯蒂的阿米特县监狱，跨越了县界的管辖，解释说这样做是因为得让他们在惹出大麻烦之前想象赫伯特·李的命运。几天后，哈里·贝拉方特花了 5000 美元把他们保释了出来。

摩西和新释放的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开车到亚特兰大，举

行员工紧急会议，讨论他们是否应该继续之前这种法律成本颇高以至于几乎让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活动受到限制的策略。农村社区尚未觉醒的神当时已经习惯了麦库姆潜藏的紧张感。黑人们似乎很了解白人公民理事会会议讨论的内容，但白人们只是模糊地知道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活动。领导人们离开亚特兰大的早上，有人在麦库姆共济会会堂前的窗上发现了手写的胜利宣言：“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受够了。”

9月26日，也就是赫伯特·李被谋杀的第二天，金到纳什维尔参加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为期3天的年会。摩西的计划带来的凶杀案和其他牺牲为自由乘车者夏日庆祝的气氛添了一丝暗淡。詹姆斯·法默和詹姆斯·劳森都没提出将自由乘车运动扩展到密西西比。法默依稀认为黑人们总有一天不得不从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州那里扣下所得税才行。劳森宣称尽管自由乘车者们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人数还挤不满杰克逊的监狱。他委婉地否认了非暴力直接行动已经强大到足以攻击密西西比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主要市县的說法。那样做成本太高，带来的镇压也必然严苛，这样不仅不会促进运动的发展，还会浇灭运动的热情。詹姆斯·贝弗尔和戴安·纳什被施以重刑后，年轻人不太愿意游行，如同赫伯特·李被谋杀之后，他们也纷纷退出了登记课程一样。因此，劳森让那些希望他将纳什维尔的经验花费数年移植到密西西比的人失望了。没有他的指导方针，非暴力直接运动绝不会有立锥之地。事实证明，在密西西比，直接行动从没有对最难的测试做出反应，这样如摩西一样的选民登记专家们不禁怀疑劳森是否能扭转乾坤。

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领导人们私下里谈论自己的担忧时更为坦诚。他们需要时间巩固自由乘车者的果实和筹集资金。北卡罗来纳州游行带来的法律债务和为自由乘车者进行辩护的费用已让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不堪重负，但燃眉之急是《纽约时报》与苏利文诽谤案，这个案件还在进行中，已经到了亚拉巴马州上诉法庭。为支付律师费，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租下了老大歌剧院，举办“向自由乘车者致敬”的音乐会筹集资金。哈里·贝拉方特是首席，他还请来了米瑞安·马

卡贝、查德·米歇尔三重唱以及其他几位著名的表演者组成了“贝拉方特剧团”。然而不幸的是，贝拉方特自己在音乐会前病倒了。他不能参演的消息一经公布，就相当于扼杀了门票的销售，而且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也因失去了一大笔钱而受到重创。

财务困境让金与肯尼迪政府的微妙而多层次的关系更为复杂了。伯克·马歇尔、哈里斯·威福德和其他几位肯尼迪政府的官员仍是选民教育计划复杂安排里的重要任务，而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通过该计划可为选民登记筹集大笔不必缴税的资金。政府要求金对这件事严格保密，因此金就算在纳什维尔举行的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小型董事会议上谈论选民教育计划的进展时也要谨小慎微。怀亚特·沃克对1962年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选民登记计划的报告没涉及那个话题，而纳什维尔的董事会逐渐演变成了金的朋友劳伦斯·雷迪克所害怕的那样——牧师们的演讲仪式，“每个出席的‘显要人物’都要阔论一番”。正式的会议记录上写的是“对大会（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应如何表现其对主席马丁·路德·金的欣赏而进行的非常非常冗长的讨论”。最终，在拉尔夫·D.阿伯纳斯的提议下，董事会提请金指派一个决议委员会，为金打造一次介绍会。之后，有人建议说应该包括柯瑞塔。阿伯纳斯又建议将董事会决议发表，让J.H.杰克逊知道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不会弃金于不顾。董事会中一个非牧师成员认为对杰克逊的人身攻击是个错误，他对此表示反对后，阿伯纳斯的提议被移交到了委员会。

金给罗伯特·肯尼迪立刻发了电报，对发生在密西西比的鲁莽事件表示抗议，包括殴打、李的谋杀案以及大规模逮捕——说他们是“明显的高压统治”。可尽管这一请求如此直接，还是因政治利益问题被扣下了。发生在华盛顿的事实是，罗伯特·肯尼迪还是从记者口中才第一次听说了金自密西西比发来的电报。这一羞辱让肯尼迪对自己和金私下工作的信心削弱了一些。金也如此认为。怀亚特·沃克之后又给肯尼迪发了一封无助的电报，自责说前一封电报是“我自己个人管理的错失”。他建议肯尼迪“任何信息呈送您之前，金博士或南方基督教领

袖协会绝不会泄露给媒体”。

金很快就得到了一个他认为可以与肯尼迪政府重修旧好的机会——哈里斯·威福德邀请他与总统私下会面。如春天与罗伯特·肯尼迪在五月花酒店共进午餐时一样，这次会面也不会记录在案。简而言之，至少在自由乘车者备受争议后，这是对金是否愿意循规行事的又一次测试。金很高兴，但他刚在白宫看到威福德不同寻常的严肃面孔，就知道有事正在酝酿之中。威福德说总统和司法部部长命令自己发布一则关于斯坦利·利维森的官方消息。

这则消息原本出现在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关于5月的自由乘车者的备忘录注释里（“为什么不？”），要求得知为什么联邦调查局没有对闹事者金进行彻底调查。他的下属们对这一问题口口相传，他们从调查局的档案里获悉，金和哈里·贝拉方特是利维森的密友。关于利维森的总结评述在司法部的伯克·马歇尔看来对他很不利，于是他便要求查看联邦调查局关于利维森的所有档案。联邦调查局说那些档案太过敏感，因为利维森是苏维埃间谍组织安插在美国的重要特工，所以不宜交给马歇尔。此后不久，马歇尔在哈里斯·威福德的办公室逗留良久，并举行了一次两个机构之间的会议，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商议此事。

在威福德看来，对利维森的指控是麦卡锡主义不符人心的回归。他反对马歇尔说金与组织同流合污的说法。作为对威福德要求提供证据的回应，马歇尔将联邦调查局的简报拿给威福德看，上面明确表明了利维森这件事上，他能说和不能说的话。从根本上说，威福德什么都不能说，因为证据已经归档，以保护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来源。按照间谍案件中颠倒的逻辑，指控越重要，证据就越会被保密，而政府采取行动时也会更受限制。

威福德不太高兴，他对金说的话都是由上级小心选择的，美国政府也认为斯坦利·利维森是重大安全威胁。因为美国政府高层已经认定利维森是苏维埃间谍网的关键人物。“与莫斯科有直接联系。”肯尼迪政府用最有力的措辞秘密警告金，让他停止与利维森的一切联系。

金惊呆了。他说这种事会发生在利维森身上简直难以置信，因为利维森不辞劳苦，为金无私工作了近5年。金问威福德政府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是不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发现利维森接受苏维埃的卢布或者将消息秘密送给间谍？威福德也问过马歇尔同样的问题，但他现在是政府的人，只能说相关证据都是保密的。和马歇尔不一样的是，威福德对金说他自己的经验让他怀疑联邦调查局所怀疑之事的真伪，但他没说自己的怀疑跟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话相比根本没有说服力。

金在威福德的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终于，他开口说道，政府把这当作信任问题，但比起信任J.埃德加·胡佛，金自己更有理由信任利维森。金觉得被暗算了，这也许是故意的，从他满怀希望地将那份日程送到白宫起就开始了。对金来说，新的指控是他努力提高种族问题中心士气的外部困扰，尤其针对他。一群人把利维森的重担压在了他身上，他们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从神秘的委屈中逃了出来，还用描述崇高目的的语言解释卑劣的请求。对金来说，一切都归结到一个事实上，他在政府中最好的朋友告诉他要疏远另一个朋友，把那个人当作异类，却没有比怀疑本身更令人信服或者更坚实的理由。

金非常沮丧，告诉威福德自己不知该如何回应这个警告。他镇定了一下才去参与与肯尼迪总统的会面。这次会面实际上是在白宫生活区与总统以及杰奎琳·肯尼迪共进午餐。这样的安排非常微妙，尤其听到了威福德说的话之后，因为这种保密性可能是一种荣誉，也可能是隐藏金来过这里的方式，而肯尼迪夫人的参加可能是对金示好的社交礼仪，也可能是表示最好不要谈论正事。金已经习惯了这种矛盾情绪，也适应了与第一家庭一起吃饭时，肯尼迪一家的魅力。饭后，3个人一起在重新装修过的白宫里走了走，重新装修后的白宫体现了肯尼迪夫人考究的品位，也展示了很多让各大杂志趋之若鹜的收藏。

他们经过林肯房间的时候，金想到一种既能打破这种客套又不会冒犯总统的请求，这种请求很自然却意义重大，可能也会唤起肯尼迪的历史感。他们经过壁炉架上林肯被框起来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副本时，金说：“总统先生，我

想看到您在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00年后的这个房间签署《第二份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您可以用第十四条修正案做基础。”肯尼迪积极回应了这个请求，让金准备一份宣言草案。金说自己非常愿意提交一份这样的草案。这件事让金在离开时带着总统的授权，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结束利维森生命的迫切。

摩西在亚特兰大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会议上没怎么发言，他总是和一群南方来的年轻学生在一起。学生们羽翼未丰，带着对静坐以及自由乘车运动的程式化记忆，还被总在身边的导师艾拉·贝克在年长一代的面前解释了一番。他们的想法昭然若揭，而且现在正处于被灌输的阶段。他们有着超过年龄的成熟，其中大多数都是明星学生，最近都进过监狱。他们曾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从长辈那里感受到的不只是极度的恐惧，也有最大方的表扬。他们越来越明白历史性的现在。詹姆斯·劳森当时正在为某本杂志写文章，题目为“非暴力革命的前夜”。

每个人都要对信仰进行一个简短的发言，并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为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奋斗终生。有人祈祷，有人讲了一些夸张的证词，摩西突然拒绝就此发言，这个活动便停下来。摩西只说自己非常想回到密西西比，认为学生们是在哗众取宠，辞藻相当华丽，但他不会这么做，他不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头上，最多只是想让密西西比的农民登记。摩西是神秘的纯化论者。他重视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因为他为志同道合的人提供了帮助，但并不直接参与一个组织更为实际的功能，比如筹集资金、指导方针以及宣传事务等。他在密西西比的尽力让他更怀疑命令，而注重言传身教的道德领导力。

沉默可能比摩西的任何演讲都更有作用，这表明他非常愿意回到密西西比的荒郊野岭。人们之前对运动的良知现在变得越来越危险，摩西似乎常常感受到这一点，总被生活中的琐事烦扰。他逆转了紧张和悠闲之间的心理平衡。除了是自己的坚定力量，摩西更是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中流砥柱。他的沉默有个直接效果：通过让这个问题看起来微不足道或没有实际意义而抑制了内部权力倾轧。

讽刺的是，正是摩西的粗心大意和自我提高塑造了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早期的公众认知。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形象不再是静坐的学生或者自由乘车者，而是多年来深深自我隔离在种族隔离的底线下​​的牧师，唯一的武器只是非暴力。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被公认为不畏牺牲的形象，反对所有传统的雄心壮志。学生非暴力委员会的神话不仅来自早期的基督徒，也来自劳工运动，它关注不关心舒适和认同感的“组织者”，那些人被拒绝时，仍会高兴地拂去脚上的尘埃，走向下一个岗位。这种描述之所以被放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与富有的领导人马丁·路德·金的形象截然不同，因此，它把“草根”变成了20世纪60年代政治上流行的词汇。

摩西从亚特兰大带着一车密西西比州的退伍军人回来了，他一下就明白了，麦库姆的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并没有偃旗息鼓。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希金斯校长拒绝让10月4日被捕的学生复课，除非他们先签署一份以后不再参与此类种族活动的同意书。每天，与希金斯僵持不下的学生们都会游行到学校，进行演讲或谈判，之后，拒绝签署同意书后，又一起游行回家。黑人教师害怕前所未有的学生罢课会让自己丢掉工作。要抗争的黑人和对整个争端都怀有敌意的白人剑拔弩张，暴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为保护学生的士气免受时间的侵蚀，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领导人临时开办了紧急学校，他们称之为“非暴力高中”。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老师的知识比普通教师要渊博，而学校的建立更是触碰到了争议引发的无数争论点之一。这种兴奋感赶走了教室的沉闷，老师们则发现自己是和学生们一起学习。历史课上，一个年轻的男孩站起来问查尔斯·麦克迪尤这门课是否包括“南方独立战争”。

“什么战争？”麦克迪尤问。他很迷惑，后来才明白这是顽固的南方联邦支持者对内战的称呼，就连他班上的年轻黑人小十字军都不经意间吸收了这么多南方的观点。摩西、麦克迪尤以及其他教师都意识到面前的困难既难以察觉又根深

蒂固。他们明白非暴力高中之所以能成功开办，一部分是因为白人掌权者还顾不上反抗。

临时学校的第一周千头万绪，一天晚上，一个极度慌张的人来共济会会堂找摩西。路易斯·艾伦说自己被传唤了，大陪审团想要验证验尸官对赫伯特·李谋杀案的发现。艾伦说他不想要再撒谎，想知道如果自己指证 E.H. 赫斯特，摩西能不能让联邦政府保护自己的生命。摩西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喜忧参半，尽管阿米特县沉浸在一片恐惧中，摩西仍为了谋杀案的解决及正义回归阿米特县的希望而感到兴奋。摩西建议艾伦三缄其口，自己先和华盛顿那边商量一下。

摩西把艾伦的提议告诉了约翰·多尔，这掀起了一场官僚式的争吵。自 3 周前多尔在自己的桌子上找到了那张纸条后，就对李的谋杀案很有兴趣。10 月 19 日，他第三次请求联邦调查局调查李的谋杀案，要求当局再次探访目击者，询问治安官卡斯頓关于所谓的撬胎棒并获得验尸官陪审团证词的记录。当局拒绝了这些请求，争辩说重开民权谋杀案调查徒劳无功，因为国家各大机构以及各个目击者都说赫斯特的行为是自卫。多尔便透露说艾伦要改证词，因此案子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

联邦调查局调查员最终回到了利伯蒂，按照多尔的要求调查。路易斯·艾伦走上命运的台阶，很正式地说自己没看到撬胎棒，赫斯特是直接愤怒地朝赫伯特·李开的枪。调查员还询问了除艾伦之外的唯一一位目击者——一个之前说看到赫伯特·李朝赫斯特举起撬胎棒的白人。现在，这位证人也让步了，说从李的尸体下，“撬胎棒被拿出来”前，他从未见过那个东西。这个被动表达在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出现了 4 次，可调查员却从未想过要问一下是谁拿出了撬胎棒。这种逻辑上的疏忽以及紧急调查线索让多尔几乎绝望。按照多尔的要求，负责调查验尸官的法官也被询问了，但调查员却并没有记下那次询问，也没报告多尔曾提出这种要求。

多尔向摩西简要说明了一番，认为司法部不会就赫伯特·李提起诉讼。这一

残酷的结局再加上道德难题让他们心头难安。两个人都知道如果联邦政府不予起诉，那么就没法为路易斯·艾伦提供有效的保护。因此，之前所做的一切不仅是枉费心神，而且艾伦如在大陪审团面前指证赫斯特的话，也将十分危险。摩西和多尔发现境遇不妙，便告诉艾伦小心说实话的后果——警告他说最好还是撒谎。不过摩西认为，这样做不仅挫败了艾伦的勇气，而且对自己到密西西比为完成任务而采用的哲学方法也是一种打击。

更糟糕的是，现在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看上去，似乎县里所有的人都知道联邦调查局要重新调查，也知道艾伦想要在大陪审团面前控告赫斯特。如今，尽管艾伦不愿意，他还是成了众矢之的。多年以来一直从他这里买木材的白人突然说自己不再需要了。多尼斯·霍金斯的加油站削减了他的信用额度，达里尔·布莱洛克也这样做了。艾伦不祥的境遇让多尔和摩西非常为难：他们让艾伦陷入了道德困境中，却未能争取到丝毫正义。为了艾伦的福祉，他们本应该让艾伦撒谎或者保持沉默——遵循密西西比黑人良民的惯例。路易斯·艾伦自谋杀案发生的那天起就预见了一天，但运动哲学家和美国司法大臣只在艾伦被哄骗着说出决定性的事实后才来。

多尔试图让摩西克制一下对联邦调查局的批评，争论说摩西如果既和种族隔离做斗争，又和当局做斗争的话，是不会取得进展的。联邦调查局的关键从它的名字就体现出来了——局。联邦调查局里官僚主义作风错综复杂，被 J. 埃德加·胡佛品行深为影响的非凡统治力可作为民权斗争的杠杆。比如，联邦调查局痛恨难堪及众所周知的失败。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看不上当地人的乡下方法。多尔强调那是研究并劝诱联邦调查局的可行之法，这还可以将联邦调查局巨大的国家机构骄傲感与施行民权法规的新工作紧密联系起来。

尽管对摩西说这种话并不容易，但多尔还是坚持了自己一贯的简洁。多尔不得不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状态，也是告诉摩西错处并不都在联邦调查局身上。多尔不能告诉摩西的是，由于李的谋杀案及密西西比西南一系列小

问题的出现，他和同僚们准备了一套强有力的“二套方案”。多尔个人欣赏路易斯·艾伦，相信艾伦的直白坦率和相当程度的诚实能让他成为可靠的证人。多尔还知道，看到赫斯特被捕受审，无论陪审团是否对其定罪，对种族隔离主义者来说都有醍醐灌顶之效。按照司法部的规定，多尔没对任何人说起，因为他不想承认伯克·马歇尔拒绝了这个案件。马歇尔害怕混乱，觉得需要维护政府掌控全局的姿态。多尔勉强接受了这一说法，但他的几个助手——尤其是那些在密西西比工作的人——却依旧公开表示了自己的异议。反对声中，他们争论说司法部一直努力说服民权团体，联邦政府将保证其选举登记，而政策却曲解了司法部的努力。多尔说除了马歇尔，他们这个案件在别的地方都不能自由抗争。因为其他地方都不能将检察官与上层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应该继续努力办事。

麦库姆的一些学生接受了希金斯校长的要求。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领导人们匆忙把其余数十位学生转移到一所教授高中课程的黑人学院中。10月31日，所有参与10月4日抗议游行的人都已受审。迅速审判后，摩西、麦克迪尤、泽尔纳以及另外15个人都被戴上手铐关进了马格诺利亚县监狱的醉汉监禁室，刑期自4个月到半年不等。在偷偷写就的文章上，摩西说布鲁姆菲尔德法官不仅将自己监禁，还说他领导黑人儿童杀戮而加以责备：“‘罗伯特，’他写道，‘你们学校的人不是有几个能在不引发暴力事件的前提下在派克县登记吗？’我暗想，南方人最自负之时，就是其最暴露本性之日。”

囚犯们让当地白人颇为好奇，那些人就在县监狱附近工作，有些甚至还特意到监狱去看他们。有些人要求狱守指出摩西，大家都听说了，摩西是他们的领导人。一个商人冷静地说，俄国人把美国U-2飞行员弗朗西斯·格雷·鲍尔斯关了多久，就要把他们关多久。查尔斯·麦克迪尤跟一个女孩说了几句意第绪语，而那个女孩一下子就兴奋起来，说自己的请求实现了。

拜访者们既无辜又无知，而且怀有敌意，这种像游览动物园一样的娱乐活动对他们来说非常新鲜。大多数情况下，挤在一起的犯人们不得不独自克制自己的

无聊和绝望。他们相互交流了非暴力高中课程的先进思想。摩西和麦克迪尤用类似火柴的东西做成棋子一起下棋。“到吃饭的时间了，”摩西写道，“我们吃的饭是装在平盘里的米饭肉汤、干面包及‘大块城镇蛋糕’。我们没什么餐具，自来水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直接流进一个洞里。”

“这就是密西西比，冰山之中。霍利斯·沃特金斯唱起了男高音：‘麦克，划船到岸边，哈利路亚；基督教兄弟们，别落后，哈利路亚；密西西比就是下一个，哈利路亚。’这是冰山之中的震颤……”

第十四章 圣诞节前的奥尔巴尼

查尔斯·谢罗德以及科德尔·里根特意搭公交车到麦库姆参与摩西一案。他们看着自己的朋友被关进了监狱，就回到了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新岗位。自从10月中旬在麦库姆被捕的刑事诉讼被撤销，他们就一直努力工作想在密西西比西南佐治亚奥尔巴尼附近的棉区、山核桃区及花生产区重新恢复登记项目。他们带着满腔热情而来，却空手而归，还不时要睡在汽车后座或走廊上。这两个人在密西西比待了一个夏天，认为奥尔巴尼就像放大版的麦库姆，而特勒尔县就像阿米特县一样，是个被人遗忘的暴力殖民区。

谢罗德从亚特兰大的南部区域市政局那里知道了C.W. 金的名字。C.W. 金是奥尔巴尼的一位富裕的黑人，也支持自由事业。作为名门望族的家长，C.W. 金有7个儿子，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还有几个留过学。他最大的儿子克莱农于1958年被当成了疯子，因为他居然疯狂到要申请密西西比大学。他最小的儿子普雷斯顿是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大学的哲学教授。剩下的5个儿子中，两个留在了奥尔巴尼，成了年轻黑人机构的中流砥柱。斯莱特·金和他父亲一样是个建筑商，也是房地产经纪人。C.B. 金是亚特兰大佐治亚州3位黑人律师之一。（他将自己的兄弟克莱农从密西西比惠特菲尔德精神病院保释了出来。）C.B. 金的胡须修剪得很整齐，穿着定制西装，谈论所有事都用多音节词，有抑扬顿挫之感。然而，尽管他一贯装腔作势，但只能为女佣、手工艺者或者醉汉打官司。当地的白人律师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

古怪的C.W. 金允许谢罗德和里根占用他家里的一个空房间。两个年轻的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工作者看上去有些衣衫不整，不太像政治领导人。里根只

有18岁，是纳什维尔的一个高中生。詹姆斯·劳森说他年纪太小，不适合参与非暴力运动工作，他便怀恨在心，破坏了几次在纳什维尔进行的游行示威。据他自己说，直到自己和自由乘车者们一起搭乘卡车到了帕尔希曼监狱，见到狱守毒打、电击并鞭打两个趴在地上的芝加哥和平主义者，才真正认识到了运动的重要性。里根毫无畏惧，但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长者都把他当成心急的孩子。

谢罗德是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里唯一能容忍里根的长者，对奥尔巴尼的金一家人来说，谢罗德本身就是个德才兼备的年轻人。他的很多做法都既危险又天真。还是年轻人时，他宣布自己打算找到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附近的白人亲戚，并介绍自己，惊恐的黑人本赶紧扼杀了这一打破禁忌的想法。他第一次参加完多种族交流团体后，对白人并非无所不知这件事感到很惊讶。谢罗德总是走极端，似乎既羞涩又敏感，既懒惰又积极，既可高居庙堂，也做得布衣之士。最初几天，谢罗德和里根只是在黑人高中的操场上打篮球，有人问问题就回答一下。里根很快就成了同龄人眼中的明星，他讲了自由乘车者的故事，很多人都非常兴奋。打了一周篮球后，有十几位学生都积极想参加在教堂的会面。大家都明白，如果他们不知道《圣经》中对非暴力抵抗的直接描述，就不能明白静坐和自由乘车者。

谢罗德组织了几次室外会议。他说自己只是附近高中教堂里牧师的传教士，于是，示罗浸信会的牧师H.C.博伊德便同意让谢罗德使用教堂的一个房间。博伊德自己参加了最初几次会议，听到了《圣经》中关于兄弟情谊与正义的篇章段落。后来，博伊德明白自己被骗了，因为谢罗德通过强调基督教美德和更好的奥尔巴尼，同时对监狱和抗议一笔带过。但博伊德安慰自己说谢罗德正在做的事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奥尔巴尼的牧师都做不到的——他能吸引大批的年轻人每周来教堂两三次，甚至是四次。

奥尔巴尼第一个强烈反对谢罗德和里根的黑人领导人是当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青年理事会的成年监督人——汤姆·查特蒙。查特蒙毕业于莫尔豪斯，刚过

30 便已在商业方面崭露头角，作为黑人化妆品的分销商而赚得了几桶金，可他嗜赌成性，吞掉了他赚得的一部分财富。查特蒙有赌徒的幽默，是奥尔巴尼黑人企业里广受欢迎的人物。他在全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地位就和白人的国际青年商会的主席一样，是走向高级领导人的垫脚石。作为与奥尔巴尼年轻人联系最紧密的成年人，查特蒙早就感到漂泊而来的两个局外人偷走了青年理事会最优秀成员的激情。出于自保，他便说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这两个人可能是共产党。

查特蒙的担忧让奥尔巴尼最大胆最不安分的黑人领导人都深感不安。标准俱乐部颇负盛名，一些成员建议把谢罗德和里根赶出去，或者，就像 C.B. 金对谢罗德说的那样，“有人发表意见说，有他们在，社区可能会分裂”。奥尔巴尼一个杰出的黑人给亚特兰大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区域总部打了“一通紧急电话”，警告两个年轻的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活动分子想要引诱当地青年参与自杀式示威活动。3 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官员马上冲到奥尔巴尼，试图针对这种可能恢复纪律。

随着 11 月 1 日的临近，查特蒙发现，要拦住想在美国政府州际商务委员会新的废止种族隔离条例生效日当天到小径公交站白人候车室尝试一番的青年理事会成员越来越难了。查特蒙并不否认，自由乘车者争取这一条例所付出的痛苦并不比奥尔巴尼的年轻人践行一番所付出的痛苦少，此外，他热切赞同，正义和联邦法律都支持黑人在车站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然而，他还是痛陈了自己的底线。如果查特蒙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内寻求支持，很可能被拒绝，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会因冲破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底线而备受谴责；如果他未获支持而一意孤行，就会引来等级分明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内部的责难；可如果他什么都不做，青年理事会就会跟着谢罗德走向公共汽车站，损害查特蒙的声誉，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懦弱胆小，而他则是个傀儡。尽管不情愿，查特蒙还是就 11 月 1 日在公交车站进行“测试”的事与谢罗德进行了协商谈判。参加青年理事会的高中学生将参与“测试”，但不是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名义，这

样就不会被逮捕了。谢罗德离开参加密西西比进行的摩西案审判前，一个试验性的秘密协定达成了。

这一消息渗透了种族的界限，传到了当权者耳中，促使市长阿萨·凯里在10月30日召集了一次奥尔巴尼市委员会特别会议。在此次非公开会议上，警长劳里·普里切特报告说“某种示威游行即将发生”。尽管他是个笨重的前足球运动员，嘴里还总是叼着雪茄，但普里切特是个勤奋好学、目光长远的警务人员。涉身此次危机之中，他对自由乘车运动期间亚拉巴马州当局的表现做了一番研究。普里切特认为自由乘车运动的最大缺陷在于允许暴力的发生，因为这引来了公众的注意力，迫使联邦政府进行干涉，于是他便教给自己手下的警察如何在不使用警棍或枪械的情况下践行种族法律。普里切特在市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自己指示手下只能根据保护公共秩序的法律捍卫种族隔离，而根据种族隔离法律不能逮捕任何人，否则容易引起法律上的问题。他说自己已经让奥尔巴尼的所有警察部队“在可能发生的紧张事件期间”进入警戒状态。

11月1日早上，科德尔·里根和查尔斯·谢罗德走向小径公共汽车站，他们是要让奥尔巴尼成为南方进行测试的十几个城市之一，作为对自由乘车运动的后续活动。种族平等大会的戈登·凯利为7个州的700多位志愿者下达了指示。在奥尔巴尼的计划是一种钳形手段：谢罗德和里根作为乘客测试小径公共汽车站的设施，而查特蒙青年理事会的学生团队则跟过去，从外围测试公共汽车站的设施。然而，谢罗德和里根走进白人候车室时，不能有任何学生出现。他们只见到了六七个绷着面孔的奥尔巴尼警察。谢罗德和里根因失望而冷静下来，他们快步走出车站，发现黑人们人心惶惶，因为有人警告说车站可能会发生殴打甚至是屠杀事件。两个人花了一整天才让9个青年理事会的成员振奋起精神来，鼓起勇气在当天下午到小径车站去。谢罗德和里根等在外面，而学生们则走进了白人等候室。警察让学生们离开，于是他们便顺从地退出来了。

尽管以自由乘车运动的标准看，这是最温顺的示威，谢罗德还是报告说“这

一刻起，种族隔离死了”。“孩子们”敢于冲撞劳里·普里切特的消息在奥尔巴尼的黑人心头一闪而过。除了当地最保守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领导人，所有人都认为，如果想找个警察打破新美国政府州际商务委员会废止种族隔离条例的测试案例，总会有人在车站被捕。谢罗德鼓吹着劳森的主题，即最高法院的布告堆积如山，可如果奥尔巴尼的黑人自己在警察面前退缩，在自己身上实行种族隔离的话，那么，那些布告就半点作用都没有。高中学生成群结队涌入谢罗德组织的会议，还带着年纪大的亲戚一起来。大学生也来了，一些传道士，甚至一两名学校老师也来了。每周六，谢罗德和里根还会主持选民登记工作室，但全镇上下对公交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更感兴趣。

C.B. 金正忙着一个刑事案件，它触碰到了种族最原始的激情。暴力在臭名昭著的斯科鲁斯案发生地——“败坏的”贝克县——爆发了。那里正属于奥尔巴尼。贝克县的高级金融被一个大字不识的养牛大富豪和可口可乐公司主席罗拔·伍德夫控制着。前者在杂货袋的碎片上签支票，还要画个“X”；而后者则坐拥30万英亩名为伊楚威的种植园。

每年7月4日，伍德夫的种植园监工都会为黑人举办免费的大型烧烤会。那一年，有3000个黑人参加了圣会，其间，一个名为查理·韦尔的黑人农场工人犯了个错误，竟和白人监工的黑人女仆调情。监工向警官L. 沃伦·约翰逊投诉后，警官就像县里的黑人奉承自己一样奉承了白人监工。韦尔和约翰逊警官都只接受过5年的教育，也都喜欢喝酒。“短吻鳄”约翰逊还是出了名的卑鄙，传言说在他的监管下，四五个黑人都被杀了。作为声名狼藉的克劳德·斯科鲁斯警官的继任者，约翰逊也是个“老派”的人。1961年烧烤会的晚上，约翰逊开车到查理·韦尔家，间歇地殴打韦尔的妻子，直到韦尔回家。接着，约翰逊一拳打在韦尔头上，逮捕了他还对他搜身。之后，他们就开车去了牛顿镇，那个镇很小，甚至没有一家餐馆。车在贝克县监狱外停了下来，把韦尔铐在副驾驶座位上后，约翰逊拿起无线电对讲机说：“这个黑人拿着刀朝我扑过来！我不得不开枪。”他



将两颗 3.2 口径的子弹打进了韦尔的脖子。“他还在逼过来！我还得开枪。”约翰逊说完，又开了第三枪。

无论怎样，枪击是医生奇迹般地让韦尔起死回生后联邦调查局调查员应该调查的事。除了留在渗入脊髓液的腰椎碎片，韦尔并没有受到永久性的伤害。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几乎完全相信查理·韦尔的说法，可他的调查在贝克县没什么说服力。大陪审团立即就以对约翰逊警官进行严重暴力人身伤害起诉了韦尔。7月下旬，警察们将韦尔从医院转进了监狱。11月时，韦尔仍在狱中，而 C.B. 金对此上诉，以韦尔并没有逃跑的可能且枪击案后身体与精神均受到了创伤，甚至耳朵仍在渗血为由，请求法官释放他。法官拒绝降低保释金，迫使一贫如洗的韦尔在监狱中待了一年，直到开庭审判，然而与此同时，C.B. 金也在联邦法院对约翰逊警官提起了民事诉讼，争辩说约翰逊的说法听上去就很荒谬。警官比韦尔高出整整一头，比韦尔重 100 多磅，还有白人警官在封建主义盛行的黑人聚集区所有的心理优势。C.B. 金宣称警官的行为是对韦尔民权的极大侵犯。

对佐治亚西南地区来说，新鲜的是查理·韦尔拒绝向约翰逊警官提出的所有指控认罪。根据所有以前的标准，韦尔和 C.B. 金一下跳进了深渊，而对手只有一个。然而他们的宣传攻势煽动了奥尔巴尼刚刚萌芽的叛乱。C.B. 金一周后向贝克县提交了保释查理·韦尔的请求，20 多个人涌进斯莱特·金的家，进行周五晚紧张的首脑会议。代表们分属奥尔巴尼 7 个黑人组织和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大家聚在一起，竞争和猜忌削弱了极度兴奋的期待。焦虑使得他们强调各自的协议要点。从联邦妇女俱乐部到部长级联盟，所有代表都同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官方目标，即结束奥尔巴尼的种族隔离。大家还同意要达到这些目标，最好采用协商的方式，而非他们委婉称作“积极行动”的游行示威。但在谁应该在万不得已时决定进行积极行动这个关键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各个组织都不想承担这份责任，尤其是甚至谢罗德的青年干部已经头脑发热的情况下，但大家也都不信任其他组织。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大家想起了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最初的日子，

于是，代表们决定创立一个新的组织，叫作奥尔巴尼运动。

斯莱特·金推荐名为威廉姆·G. 安德森的医生为主席。安德森4年前从家乡佐治亚州阿梅里克斯来到奥尔巴尼。在精英聚集的标准俱乐部里，安德森因其毅力和外交手段而名声在外。他长相英俊、言辞得体、雄心勃勃且毫无指摘之处。奥尔巴尼运动的创始人当晚选举安德森为主席，选举斯莱特·金为副主席。休会前，组织成员们写就了谨慎的宣言。宣言透露了C.B. 金起草文件的才能，文件上说：“这是我们的间接经验，万一迫不得已必须依靠积极行动实现《宪法》赋予的权利，将从经济方面、社会方面及道德方面损害所涉及社区的最大利益。为避免这种损害，我们希望这种积极行动将不会在奥尔巴尼发生。”很快，市长凯里和警长普里切特就各拿到了一份。

谢罗德和里根很高兴。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他们赢得了更广泛的领导力，比之前在麦库姆获得的任何领导地位都高。受人期待的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游行示威是团结不言而喻的原因，而当地领导人的疑虑与学生情感的爆发相比可谓相当微弱，第一次“积极行动”就在奥尔巴尼运动组织成立后5天——也就是11月22日——爆发了。查特蒙青年理事会里的高中学生走进公共车站的白人区，与持续在那里“警戒”的警察对峙。拒绝离开的命令后，警长普里切特本人当场命令也没有效果，于是，学生们就在几十个旁观者的注视下被拖进了监狱。汤姆·查特蒙不到一个小时就把他们保释了出来，但奥尔巴尼第一次逮捕就发生在感恩节前一天。

同一天傍晚，奥尔巴尼州立学院放假，让学生们回家度过节日的周末。数百名黑人学生，或走或乘车，到了弗林特河对岸，走向奥尔巴尼市中心的小径车站，从那里回家。由于之前的逮捕和关于种族问题久未散去的谣言，教导主任已经先到了车站。他站在车站外，指挥学生们走进有色人种等候室。只有两个人没有听从指挥——布兰顿·霍尔以及柏莎·戈伯。这两个人挤出一条路，“走到干净的那边”——当地黑人这样形容走进白人等候室。心急如焚的教导主任不能追过

去，只能跟着一群带着敬畏而且惊呆了的学生从外面看。一名警察很快就走到了霍尔和戈伯旁边，靠着白人售票区的窗户说：“你们休想从这里买到票。”两个学生紧张而有礼貌地坚持着，问为什么。有个侦探为逮捕做了铺垫，说他们的出现“意在扰乱治安”，可学生们还是没离开队伍，于是，劳里·普里切特就把他们关进了监狱。晚餐时分，消息已经在奥尔巴尼的黑人中传遍了：一天之内有两组人被关进了监狱。早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两名奥尔巴尼州立学院的学生在远离家乡的监狱里度过了感恩节。尽管他们的名字不为人知，但他们身处异乡，这种困境和那3个青年理事会成员一起激发了人们的同情心。陌生人在盘子里装上火鸡，送到监狱。

两个学生在狱中度过了感恩节的夜晚，很多人前来探望，他们也收到了很多食物。关于他们的境况，通过电话和口信频繁向外公布。如在麦库姆一样，父母和其他成人的关心让他们大受支持，于是新奥尔巴尼运动组织的领导人们周五决定第二天晚上召集第一次大型集会。校园危机、高中危机再加上与种族隔离有关的暴力行为越来越有发生的可能，他们有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机会，好向公众介绍自己。E. 詹姆斯·格兰特牧师同意安德森和斯莱特·金借用锡安山浸信会教堂。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大突破，因为锡安山是浸信会精英教友的教堂。

周六早上，狱中的布兰顿·霍尔和柏莎·戈伯收到了奥尔巴尼州立学院的官方通知：“由于你们被捕，所以无限期暂停你们的学生身份。”如果说之前晚上的集会不一定会成功，那表明丹尼斯校长决定与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站在一起的宣传页和传信人就确保了它的成功。一时间，谣言四起——学生眼含热泪；格兰特牧师顶着压力不撤回允许安德森和斯莱特·金使用锡安山教堂的决定；而丹尼斯也不敢在自己的教堂露面。

安德森医生主持了会议。斯莱特·金、C.B. 金以及其他几个人都做了演讲。A.C. 瑟尔斯是当地黑人周报的编辑，他报告了那天下午与丹尼斯校长的紧急会面。瑟尔斯认为让学生听课不仅是错误的，也是不恰当的——这个决定在法庭

定罪之前既没有发出通知也没有组织听证——丹尼斯只是简洁地回答，学生们的停课是“永久”的。瑟尔斯宣称，丹尼斯过度激动，自己也不得不难过地称丹尼斯——他的老朋友、同道执事以及标准俱乐部会员——为“最黑心的白人”。犀利的言辞朝丹尼斯砸来，激动人心的话语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对抗种族隔离。

科德尔·里根是个外向的表演者，有着一副高亢的嗓音。他在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工作室发现了两位颇具天赋的歌手——鲁莎·哈里斯以及柏妮丝·约翰逊，她们两个都是牧师的女儿，一直研习歌唱，希望成为剧院明星。几周以来，三重唱一直歌唱赞颂自由的歌曲。那天晚上，她们就站在锡安山的布道坛上领唱。按照预先的安排，歌唱自由歌曲还有教堂赞美诗时，既没人弹钢琴，也没人演奏风琴。和声和高亢部分让毫无装饰的声音成了奥尔巴尼运动的标志。集会上，从女高音独唱家嘹亮的赞美诗曲调到雷鸣般的掌声，都只源于人本身，毫无装饰。歌声让人想到被奴役的灵魂。有《哦，自由》这样悲怆而甜蜜的，也有像《我小小的光亮》一样欢乐喜悦的。起初，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领导人们接受领唱角色，是因为这是他们对运动的颂扬，而长者容许他们则是因为音乐对常规教堂仪式的作用无足轻重。但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领导人们很快就研究出了一套操纵音乐的计谋。他们的小组演唱将仪式从牧师或风琴演奏者业已建立的控制中夺了出来。歌曲的精神席卷了人心，年轻的领导人明白通过歌曲，他们能让平民百姓说出并感受到那些之前超出他们理解的事。通过颇具反抗精神的《我不可任人摆布》一曲，谢罗德和里根呼喊出了“我不可任由警长普里切特摆布”的诗篇。让他们惊讶的是，人们踌躇着缓步走进教堂，高声喊着这句话，表明反对令人畏惧的权威之心。

歌曲间歇，安德森请5位被捕的学生告诉会众他们为什么决定在公共汽车站与种族隔离对抗，以及之后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5个学生一个接一个地讲了，最后一个站上布道台的是柏莎·戈伯，她是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士，声音小得像个孩子。她描述了自己被捕的经过、看守她的狱卒以及她那个监牢里的肮脏细

节。“我觉得有必要让人们知道，即使在受苦受难或者被虐待时，也应该保持人类的尊严，”戈伯说，“任何时候，我都愿意为了崇高的事业，在监狱里度过的那两个夜晚，让我觉得自己赢得了体面与自尊，让我感受到了，就算身处奥尔巴尼最肮脏的狱墙之内，就算是学院的所作所为，也无法带走我的一身洁净。”她演讲的简洁十分震撼，直击听众内心。“我别无所言。”谢罗德写道。他和其他人都眼含热泪，那些“坚强、成熟的男人”也是如此。他们都唱起了闭幕之歌——《我们定会胜利》，大约三分之一的人都留下来继续歌唱，乞求上帝恩赐。歌唱家们也留在台上，直至午夜过后，希望那一刻永不会结束。

周一，500多个人聚集在市政大厅外，等待对5个被捕学生的快速审判。谢罗德先大致向查尔斯·琼斯、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同事以及刚从亚特兰大过来的前石山狱友介绍了一下外面嘈杂的人群。审判过程中，琼斯将人群慢慢推回到示罗浸信会教堂里。警长普里切特站在人群外围，在善意的笑话和驱散人群的命令中摇摇晃晃——似乎就在逮捕的边缘。第二天，谢罗德冒险来到了动荡不安的奥尔巴尼州立学院的校园，在学生的集会上演讲致辞，可警察拿着丹尼斯校长及另外两位教授签署的非法入侵证明书逮捕了他。谢罗德当天晚上在监狱度过，后来才被保释出来。

谢罗德、里根和琼斯发现自己处于悬空的境地。他们像催化剂，在最近的公共集会上膨胀起来，但他们觉得很不安稳。如果再发动一次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那新加入运动的人就会把他们当作煽动分子而群起反之；然而，如果他们按兵不动，那运动就会在恢复期间士气低落。为了打破僵局，他们想了个主意——从亚特兰大引些火花。这既能让他们重燃运动的激情，又能尽可能避免强烈抵制危险。因此，他们就给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新任行政秘书詹姆斯·福曼打了电话，建议他组织自由乘车者们来奥尔巴尼火车站探探情况。

福曼赞同这个想法。他是从芝加哥来到南方的政论作家，准备写一些关于运动的文章。福曼为人生硬粗暴——曾因“党派主义”被赶出了佃农们在田纳西州

菲也特县的“帐篷城”——此外，他还给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秋季会议带来了一股末日英雄的气息，让鲍勃·摩西觉得很是有趣。但福曼激进的能力弥补了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不足。他筹到了钱，还掉了早已过期的账单，还通过电话和文章扩大了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作为新闻人的影响，而记者们也急于寻找门路，以便了解南方难以预料的学生示威运动。福曼在占主要地位的白人国家学生联合会表现积极，通过鼓励纽约精英院校莎拉·劳伦斯学院的学生给在密西西比少年感化院忙碌的布兰达·特拉维斯发电报以表支持，福曼制造了一些小新闻。在去麦库姆的宣传之旅上，福曼还趁着汤姆·海登被拖出车厢痛打的机会，招募了这个国家学联的白人积极分子。

鉴于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总部实在是环堵萧然，拿不出管理费用，于是，福曼认为离开这里，组织一场到奥尔巴尼的自由乘车运动也没什么损失。他组织了一些身份不同的人——他自己、新任办公室经理、一个学生志愿者、一个丹麦作家、纳什维尔自由乘车运动参与者塞恩·麦科勒姆以及3个在麦库姆饱受折磨的白人：鲍勃·泽尔纳和刚结婚的汤姆·海登及凯茜·海登夫妇。这些人人都没钱买火车票，因此，福曼便对伯纳德·“杰利”·李进行了一番试探。自从因为夏天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内部的明争暗斗而渐渐远离这一组织，李就一直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模仿马丁·路德·金。离开了妻子、儿女以及两所学院后，李住到怀亚特·沃克家中，多少有点像个看守。李直接把福曼的想法告诉了沃克后，沃克便同意承担这几张火车票的花费。李也就参加了这次乘车者运动。福曼跟谢罗德说了自己的行程。谢罗德转首就告诉了奥尔巴尼运动组织，而有人反过来就提醒了警长普里切特。

12月10日是周日，那天下午，火车停在了奥尔巴尼联合铁路站。警长普里切特只允许查尔斯·琼斯和柏莎·戈伯接车，不过A.C.瑟尔斯也因宣称自己是黑人媒体编辑而可以一起。瑟尔斯不经意地摆弄着相机和媒体证件，用开玩笑式的语气和普里切特讲话缓解紧张的气氛：“警长，您不会逮捕我这样的新闻人，对

吧？”福曼、李以及其他7个自由乘车者出现在这个被抑制的欢迎会上了。面前的车站几乎空空如也，因为一队警察封锁了白人区。普里切特和几个警察想赶紧陪着这些人走出车站，然而，这些人却突然转身，坐在了白人等候区。普里切特简明地命令他们离开。他们听从了命令，跟着戈伯和琼斯，朝白人区出口走去。

走出出站口时，自由乘车者们还毫发无损。几百个奥尔巴尼运动的支持者们都松了一口气，爆发了欢乐的呼声。警长普里切特立刻变得烦躁不安。那些人一起拥抱、握手、欢呼，冲破了警察的警戒线，普里切特大声喊叫，想把他们挤到人行道上。人群聚在一起，朝等着的车慢慢挪着。看起来，要想说服呆呆看着的白人以及市委员会的代表们说这些快乐的人不会严重影响种族隔离主义是不太可能了。

普里切特的脾气爆发了。“警察，站出来！”他朝后备队喊道，而对那些正在欢庆的人则吼了起来，“别动！你们都被捕了。”他挤进人群，揪出自己要逮捕的罪犯——9个自由乘车者还有戈伯和琼斯。有些人已经登上了等在路边的车，可这突如其来的事件，让大家一起陷入了震惊之中。逮捕的警察只犯一个错误：混乱之中，他们错抓了奥尔巴尼州立学院的学生，放走了一个自由乘车者。11位犯人很快就被塞进了警车。警车朝市政厅驶去，犯人的罪名是妨碍治安、阻塞交通以及不服指挥。被警车甩下的车队成了挽歌，撤回了示罗浸信会教堂。

这次，不需要再费心组织集会了。200多个见证者一起成了现成的会众，而他们的亲朋好友也很快赶来了。他们的歌声高亢激昂，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次席卷奥尔巴尼运动的大事件，会把它带到未知的领域。回到市政大厅后，劳里·普里切特试着向记者们解释自己的行动，说：“当时的情况很紧张，随时可能爆发大型骚乱。”

周一早上，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聚在一起，制定解决危机的策略。斯莱特·金的妻子玛丽森·金加入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决定不能虚度这一天，必须有所行动。他们来到市政大厅外，祈祷正义，但很快就被关进了监狱，罪名和自由

乘车者的一样。尽管从警察使用的术语来看，这两次事件本质上是一样的，但留在示罗浸信会教堂的人却发现，年轻外来者的游行示威和奥尔巴尼最受尊重的黑人进行的守夜祈祷有很大不同。玛丽森·金是斯佩尔曼的毕业生，是理疗学家，帮助残障人士恢复，把她关起来这一点让很多保守的黑人颇为震惊，反而都赶来参加那晚的集会。结果，人群一直从示罗浸信会教堂蔓延到了锡安山浸信会教堂。奥尔巴尼运动投票决定早上一直游行到市中心，支持被逮捕的人。

那天晚上，谢罗德离开了一会儿，和他由年轻高中生——多数是女生——组成的“冠杰团队”在小型会议上歌唱。谢罗德说，警察似乎会逮捕任何拒绝解散的人，这意味着他们也许有机会挤满整个监狱。全体出发的时刻到了。“你们必须得走进监狱，取出正义，”谢罗德接着说，“你们必须留在监狱里，做出牺牲。你们将成为这个镇上尽人皆知的英雄。”谢罗德私下里告诉科德尔·里根，自己也将亲自到监狱去，告诉里面的人下定决心留在监狱，而里根则应该留下来组织下一拨人，直到谢罗德或者查尔斯·琼斯被放出来。谢罗德很兴奋。学生运动进行了两年，一直想找机会挤满监狱，现在在奥尔巴尼，他们终于能做到了。里根怀疑这样兴师动众的行为是否真的能瓦解种族隔离，谢罗德则对这种怀疑大笑不止，说：“我叔叔常说，压力足够大的话，猴子也会吃辣椒。”

12月的雨绵绵不绝，可第二天早上，400多个黑人还是在示罗浸信会教堂集合了。他们跟在谢罗德身后，排了3队，朝市政厅走去。市政大厅里，对自由乘车者的审判刚刚开始，于是，人们便围住市政厅，高唱着《我们不害怕》。他们绕着市政大厅转了两圈，警察的巡逻车就跟在后面。可后来，人们越聚越多，不仅有黑人，也有白人——人数是游行的人的三倍多——都围着市政厅，大部分人手里还举着伞。第三圈时，普里切特强行止住了大家。大家以为又要逮捕领导人，可这次，普里切特却让手下呈扇形散开，把所有游行的人都赶到监狱后面一条小胡同里去了。一排警察站在胡同口，其他的则每次带几十个人出来登记监禁。查尔斯·谢罗德意识到大家全部被逮捕后，高兴地大喊起来：“我们要把牢底

坐穿！我们终将胜利！”警察们冒着雨，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清理了整个胡同。

12月13日星期三的《纽约时报》第51页刊登了一篇美联社的文章，题目是“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监禁267名黑人青年”。报纸传遍曼哈顿大街小巷前，已经有约100人被保释了出来，但还有包括谢罗德在内的150个左右仍关在里面，他们不仅挤满了只能容纳30人的市政监狱，还挤满了县监狱和劳改农场。警长普里切特前一晚熬到深夜，忙着和殖民地县区的警察们安排牢房。凌晨时分，临时车队开始将众多犯人运往佐治亚州西南地区。玛丽森·金知道自己和另外40个女人要被卡车运到约翰逊警长所在的贝克县监狱时而恐惧不已。去科勒尔监狱的路上，谢罗德想到了一件讽刺的事，安慰自己说终于能在一直想待着的地方住一晚了——那里的黑人太过畏惧，之前都不敢留他过夜。

在示罗浸信会教堂，早上的第一丝慌乱随着犯人们要被转移到臭名昭著之地的县区而传播开来。奥尔巴尼运动的战略家们目睹了白人警察的强烈反应后，是在该示弱还是该逞强之间犹豫不决。市政大厅里也弥漫着同样的气氛，警长普里切特和市长凯里进进出出，忙着参加市委员会一场接一场的会议。普里切特认为大规模的逮捕也许恰恰会为奥尔巴尼运动招募到新的游行，从而起了反作用，但委员们却说毫不动摇的高压措施将最终摧毁反叛。普里切特立刻告诉记者，自己本想同意奥尔巴尼运动新提出的几条和解要求，比如雇用黑人警察等，但市委员会对游行非常愤怒，让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了。然而，普里切特对委员们的说法很有信心，于是，只有75个人组成的小团体那天早上在市政大厅里进行对自由乘车者们的审判时在外进行祈祷示威，普里切特并没有逮捕所有人。实际上，他只是和那些人的领袖——斯莱特·金搭上了话，把他带进市政大厅，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审判法官解释为什么要在法庭外祈祷。斯莱特详细说了奥尔巴尼运动的不平之处，但艾伯纳·伊斯雷尔法官并未被他打动，还因藐视法庭判处他5天的监禁。这样，辩护律师C.B.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法警把自己的兄长带进了监狱。

抗争者们的心再次坍塌了，像扭在一起的两个摔跤手一起滚落山坡一样。在示罗浸信会教堂，斯莱特·金的命运点燃了一大群人，起初，他们想组织大规模游行，并进行守夜祈祷，但越来越多保守的黑人认为白人肯定会严惩祷告的行为。科德尔·里根决定激活自己的秘密交流系统。收到他的消息后，志愿者们就分别给自己的姐妹和表亲打了电话——那些人都是与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合作的老师，之后，老师们又悄悄让值得信赖的学生们在某个时候溜走。大批学生赶到示罗浸信会教堂时，刚好巩固了随罗根向市政大厅出发的力量。警长普里切特让他们围着市政大厅走了一圈。接着，在市委员们的压力下，他再次下令把人们都赶到死胡同里去，因为委员们都认为这次游行就是政府前一天太过宽容而种下的苦果。

傍晚时分，202名游行者又被关进了监狱，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涌入奥尔巴尼，频频向普里切特和凯里市长抛出问题。凯里宣布市委员会认为允准奥尔巴尼运动再次集会或者释放犯人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普里切特说奥尔巴尼“随时可能爆发暴力活动”，点燃暴力的不是愤怒的黑人，就是三K党。他发誓，如有必要，他会把游行示威的人“塞满佐治亚州的监狱”。普里切特还说：“我们绝不容许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或任何黑人组织通过大规模游行占领奥尔巴尼。”

那天下午，伊斯雷尔法官因非法集会的指控当庭具结周日自由乘车运动被捕的11人。福曼、鲍勃·泽尔纳以及其他4个人仍需收监。其余3个人得以保释。汤姆·海登前往纽约为一个学生团体做演讲；查尔斯·琼斯代替了科德尔·里根的位置；而伯纳德·李迫不及待想到亚特兰大向怀亚特·沃克汇报。李告诉沃克发生在奥尔巴尼的事前所未有。黑人女仆顶着假名走进监狱，还向白人女主人隐瞒逮捕的事；孩子们也会去两三趟监狱。李报告说：奥尔巴尼运动组织的人每天都能在自己身上发现新奇迹，他们的热情达到极点时，就会提到马丁·路德·金。那种吹捧简直令人惊讶。李发现，无论何时提到自己是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青年

方面秘书，人们几乎就会因崇拜而眩晕，抓着他充满希望地问：“你和马丁·路德·金是一起的？”于是，李认为马丁·路德·金应该考虑到奥尔巴尼来，但他同时警告沃克说，几个当地的领导人对马丁·路德·金很有意见，所以可能会反对这个想法。听完，沃克只是干脆地问那些人都是谁。

奥尔巴尼运动酝酿的6周里，筋疲力尽的金不经意间在飞机上路过了奥尔巴尼的监狱。11月1日，国际商会的法规生效。正是在那天，马丁·路德·金刚刚从伦敦回到了家。当天，包括亚特兰大的所有南方城市都爆发了巴士危机。在田纳西州，州拍卖师们正在拍卖高地人的土地、建筑以及所有被没收的财产，甚至包括迈尔斯·霍顿图书馆的书。马丁·路德·金把抗议的电报留给怀亚特·沃克，自己大部分时间则在机场和布道坛之间奔忙。他作为神秘嘉宾出现在蒙哥马利，进行了《忠诚与奉献的服务证明》的演讲，作为拉尔夫·D·阿伯纳斯离开第一浸信会教堂的标志。金去了西雅图、波特兰、明尼苏达州的曼卡多学院以及克利夫兰后，就进了医院检查身体，还休息了两天。之后，金在加利福尼亚待了3天，就马上到了佛罗里达州的巴尔港，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第四届制宪会议上演讲。

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面前演讲实现了金最近一段时间的几个互补目标。这对他来说是一次成功——那是劳工运动最高峰的荣誉论坛——也是标志着他从堪萨斯城的个人灾难中恢复过来的迹象。针对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亚拉巴马诽谤案以及《纽约时报》都说明金的演讲在组织劳工方面有紧急且实际的作用。诽谤案上诉初期的费用已经超过了27000美元，之后的开销更大，马丁·路德·金对劳工团体强调说，最高法院的败诉会威胁到工会的组织以及公民权利。金还警告说，如果维持原判，那么诽谤诉讼将不能为工会宣传册或者资金筹措的请求赢得一席之地，尤其是在充满敌意的南方。将这一主题作为不成文的辩护，金招募了一批以纽约律师西奥多·基尔为首的劳工专员。斯坦利·利维森希望金能参与到重新焕发出活力的劳工运动中，为公民权利而战。他很兴奋，亲自为金撰写演讲稿，之后还跟着他到迈阿密，见证演讲的效果。

“黑人几乎都是劳工，”金说，“黑人富翁和黑人雇主少得可怜。”他将静坐与20世纪30年代先锋们的静坐示威作比。金因兰道夫被迫害一事温和地责备了劳工代表们，号召他们“承认”工会中的种族隔离“这些让人羞愧的情况”，并且“勇敢地将每个种族歧视的表现根除。我非常清楚，这样做并不容易，也并不受欢迎，但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也不受欢迎，要做到也不容易”。有关雇用童工的法令及最低工资的法律也是如此。“争取这样的民主权利，你不仅将获得经济利益，还将赢得国家的尊重，”金说，“此外，如果你为黑人的权利做出巨大贡献，那你将再次赢得这两样。”

这是一场黑人所做的“白色”演讲，克己而正式，但那时，金已经缓和了观众的怀疑，甚至是他们的敌意。聚集在一起的切肉工、管道工、木匠和钢铁工像过去一样站起来了。演讲之后是乏味的抚恤金计划报告和薪金增长目标，后来取而代之的是个演说家，他从官僚主义作风尚不盛行的时代汲取了能量。那天早些时候，有些黑人工会领袖与乔治·米尼激烈地争吵起来，当场就在大厅里放声大哭。每个人马上就明白了，这次演讲绝非烈酒之后的淡啤酒，金通过其沉甸甸的政治地位，撬动了劳工组织的重心。专业政客中，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演讲被认为是1957年金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以及1960年选举前亚特兰大的逮捕以来最重要的进步。这样的事让金的影响力跨越了已有的选区。就算那些分析家想弱化黑人投票的意义，现在也不得不考虑金在劳工组织中的重大影响了。

金的演讲并不是当天最大的新闻，相比之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定罪、肯尼迪总统飞往南美、刚果的暴乱以及祖鲁主席艾伯特·卢图利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和平奖要轰动得多。同样在那天，美军两个直升机分队降落在越南南部，这是美国首次公开参与越南反对独立同盟游击队的斗争。对金来说，上述所有消息的紧迫性都比不上他从巴尔港大会回到家后在电视上看到的：亚特兰大以南200英里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黑人们排成长长的队伍，正在冒雨游行。他马上给拉尔夫·D.阿伯纳斯打了电话，阿伯纳斯在亚特兰大负有盛名的西部建立了教

堂，刚刚与金重逢。金知道阿伯纳斯是 E. 詹姆斯·格兰特牧师（他曾是蒙哥马利第一浸信会教堂的成员，11 月还和金一起褒扬了阿伯纳斯的品行）的朋友，就问阿伯纳斯是否能弄明白奥尔巴尼究竟发生了什么。阿伯纳斯已经和格兰特以及奥尔巴尼运动组织的主席——也就是他在亚拉巴马州立大学上学时的朋友威廉姆·G. 安德森谈过了。阿伯纳斯记得，大学时，安德森曾是很有抱负的音乐主持人，但他也是个能言善辩的人。阿伯纳斯答应金通过电话了解奥尔巴尼的动向。

周三很晚时，奥尔巴尼运动中未入狱的领导人集会在在一栋私人住宅中会面了。大规模逮捕连续进行了两天，这让他们讨论下一步的计划时，兴奋之外的紧张感暗流涌动。每个领导人都知道，仍在狱中的 300 多个人里，有几十个都渴望出来，保住工作、保持清醒以及家庭的完整。已经释放的 200 人，每个人的保释金都是 100 美元，这已经吸干了奥尔巴尼运动组织的资金。没人知道还怎么把剩下的人救出来。从另一方面看，抵制城市商人以及巴士的运动已见成效，符合奥尔巴尼运动的预期要求，但领导人们并不知道如何能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组织其他的交通方式。简而言之，很多领导人承认他们在抗议活动方面仍没有经验，提出要向那些已经取得了传奇性胜利的人寻求帮助。安德森医生在伯纳德·李的热情支持下，建议请教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当地主席建议请教罗伊·威尔金斯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没人提到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因为那个组织也没什么资金，甚至负担不起志愿者平常的车费以及面包圈的花销。

那天晚上，在这种困境的压力下，奥尔巴尼运动组织陷入了政治的泥潭。不久前刚从监狱中保释出来的詹姆斯·福曼不同意邀请金来奥尔巴尼，称他们已经是很强大的“人民运动”了，请金那样声名远扬的牧师来只会削弱自己的影响力。人们会把金当成弥赛亚，而不再重视自己。查尔斯·琼斯一直沉默着，知道这些反对的声音对热情的崇拜者来说作用不大。他从福曼的演讲中也感到了与金激烈竞争的意味。正因如此，C.B. 金也指责了福曼，说自己相信，真正的问题并

不是金所谓的缺点，而是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们身不由己。奥尔巴尼运动组织的秘书马瑞安·佩奇大声说，无论是金还是其他城市来的领导人，他都不同意。这也是佩奇反对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前来的原因，但现在，佩奇和福曼结成一党，反对金这个比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成员更新的新来者。作为强壮而保守的退休铁路邮差，佩奇告诉大家，种植有奥尔巴尼特殊味道的土豆花费了大量时间，所以应该对自己的土地有耐心。尽管他十分反对，但通过电报寻求金帮助的提议还是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第二天早上，凯里市长鼓起勇气开车到贝克县种植园的旷野里寻找地方长官范迪弗。为打断地方长官们猎鸟聚会表示极度道歉后，凯里说危机让他不得不要求国民警卫队立即出动，阻止或者平息自己城市里因种族而起的暴乱。凯里还更秘密地要求范迪弗派出便衣税务员——也就是爱喝威士忌的男孩们——潜入愤怒的白人团体中，因为有消息称，这些团体将在城郊集会。凯里警告说，如果白人团体中的任何一个朝游行者开了枪，就相当于点燃了炸药桶。范迪弗不情愿地答应了凯里，之后，市长便顺便到访了范迪弗的家，告诉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到在布莱克希尔湖度过周末的房子里，直到有人告诉他们可以回家为止。在市政大厅，凯里通过电话向华盛顿司法部的伯克·马歇尔介绍了自己。两个人就同一主题令人忧虑的变化交换了意见——不使用暴力、联邦不干涉。

在示罗浸信会教堂，女性委员会的成员们正忙着安排装满食物的小面包车开往各个监狱。一个从监狱回来的探访者报告说治安官 Z.T. “齐克”·马修殴打了关在特勒尔县监狱的查尔斯·谢罗德，至此，关于暴力活动发生的流言达到了最高峰。连续 5 天的逮捕后，这则消息引起了恐慌。奥尔巴尼运动组织内部的间谍们将大家的惊慌告诉了警长普里切特。于是，普里切特便提出让大家与谢罗德公开见面，这让人们都很惊讶。周四傍晚过后，一大群人都赶来参加集会。这就是奥尔巴尼运动的核心——将志气和信息灌输给奥尔巴尼的每个黑人。送信员们忙进忙出，演讲者和歌手们也走马灯似的轮流上台。一个结实的信徒从座位上站起

来，站在家人中间，大声说道：

哦，上帝，我们祈祷

镇压就要终结

统治就要终结

偏见终将逝去

那些

批驳法老的人

批驳巴比伦人的人

批驳希腊人、罗马人的人

你，本身就是上帝

一直都是

你是人类之神

你是大爱之神

愿苦难施我们以援手

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使我不至缺乏

使我躺在……

之后，所有人都自发地加入进来，诵读《诗篇》第23节。接着，有人站起来，唱起了赞美诗；最后，年轻人讲述了蹲监狱时悲喜交加的生活。突然，一阵模糊的骚乱打断了大家——查尔斯·谢罗德在教堂的后面出现了，接着，就被人们热切地拥到前面。

“他们打你了吗？”一个声音问。

“没有，他们打了我几个耳光，”谢罗德说，含混不清的声音中透着一丝轻

松，也夹杂着几分痛苦，“那几个耳光打破了我的嘴唇。有个叫齐克的人想让监狱里没有歌声，也没有示威。”

“你祈祷了吗？”又一个声音问。

“我向自己祈祷，”谢罗德回答，人群中发出一阵赞同的低语，“我用‘是的’还有‘不是’回答他。我没怎么放在心上。他想让我说‘是的，先生’和‘不是，先生’。他们没下狠手。在监狱里，他们朝我脸上打了两次。”

大家都知道了，谢罗德能站在这里，是和警长普里切特有君子协定。不一会儿，谢罗德得回奥尔巴尼监狱了，等在外面的狱警再次扣押了他。谢罗德走后，有个人站出来说了一番话。“真是不可理喻，”他说，“就算奥尔巴尼是我们逃不出去的地狱，我还是爱它。这里是家。我喜欢钓鱼，喜欢摘下木兰花，喜欢采摘蓝莓。我爱花生。我喜欢山核桃。”

那天晚上，城市的别处，150名国民警卫队在军械库旁待命警戒，同时，间接谈判通过核心会议和信使一直进行。城市长官们拒绝与黑人直接谈判，就找了3个白人公民传话作为折中方法，那3个白人比较孤僻，避免了因与黑人同处一室而带来的社会风险。其他妨碍这一棘手的安排的因素还包括语言中明显的不明确。奥尔巴尼运动要求执行国际商会反种族隔离的法令，白人谈判者则称政府充分尊重上述法令，逮捕他们只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自此，双方便围绕着定义、先例、管辖权等展开了谜语般的辩论，直至深夜休会。马瑞安·佩奇宣布“只要对方守信”，就不会再有游行示威活动。

12月16日星期五带来了一周以来第一个既没有游行也没有逮捕的早上。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们意识到大型集会的精神难以为继。支持者们都被关进了监狱，丢了工作。为了妥善处理此事，他们通过谈判者们提出了4项自己尚能容忍的最温和的条件：一是30日后，黑人可以自由使用巴士、火车等设施；二是除现金外，政府要接受财产债券，以便出狱的人得到退款，并保证释放其他人；三是政府应无条件地指派由黑人和白人组成的委员会讨论奥尔巴尼种族隔离其他各

方面问题；四是永久暂停游行示威活动。政府对上述条件迟迟没有回应，有人害怕奥尔巴尼运动组织提出的条件太过软弱，助长了白人认为奥尔巴尼运动会垮台的希望。

午间新闻在焦虑中到来——斯莱特·金在奥尔巴尼监狱被打了。大家在示罗浸信会教堂为他唱起了歌。奥尔巴尼运动将三重唱从陷入僵局的谈判中召回，来回跑动的记者们很快也拦住了往返于示罗浸信会教堂和市政大厅的普里切特警长。普里切特说，好像是因为斯莱特·金绝食，狱守便粗暴地把他扔回牢房，他的脑袋就重重磕在了栅栏上。普里切特还说，斯莱特的伤势并不严重，但他建议开除狱守。“我不希望我的监狱里有这种人。”普里切特说。他允许奥尔巴尼运动组织代表们跟斯莱特·金核实自己说过的话，此后，谈判恢复了。但尽管有些人说普里切特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示罗浸信会的气氛还是凝固了。每个人都认识斯莱特·金。没人知道到底为什么奥尔巴尼运动的谈判条件中没有坚持释放他那一条件。转而深思后，每个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谈判条件要默许对两位奥尔巴尼州立学院学生永久停课的事实。现在看来，他们的条件似乎略显软弱，于是，谈判者们当天就将复课和释放斯莱特·金这两项加入了谈判条件中。

奥尔巴尼运动组织主席安德森明白了，自己最大的敌人并不是眼前的混乱局面，而是时间默然流逝的沉重感。压力不断促使他给自己在亚特兰大的朋友阿伯纳斯打电话。安德森说，他们迫切需要马丁·路德·金博士的鼎力支持。他们是否能让奥尔巴尼的官员们相信如果拒绝自己的谈判条约，那黑人宁愿坐牢的说法，将决定这次运动的成败。金结束了在新奥尔良的演讲回来后，安德森向阿伯纳斯和金本人讲述了自己的境况，强调必须在那一天见面，必须是那一晚，否则就太晚了。

麦克里·哈里斯在门罗高中听到消息就立刻做好了决定。她提前结束了拉丁课，3点刚过就偷偷溜进示罗浸信会教堂，确保自己能在马丁·路德·金8点到来时有座位。

连续不断的冲突只持续了 72 小时。距离肯尼迪与尼克松竞选前夜、金从雷德斯韦尔周礼监狱搭飞机北上刚刚一年多，金就从亚特兰大一路向南前往奥尔巴尼。阿伯纳斯和怀亚特·沃克依旧与他一起，此外，同行的还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区域主管鲁比·赫尔利。到奥尔巴尼后，阻塞的交通延缓了他们走向集会的脚步。1500 多人聚集在示罗浸信会教堂以及锡安山浸信会教堂。由于匆忙装好的音响系统朝向锡安山浸信会教堂，所有人都知道了金会首先在示罗浸信会教堂露面，于是，锡安山浸信会教堂里的会众很多都从窗户中探出头，想看他一眼。几个街区内，汽车都堵在路边。一小队警车也停在了示罗浸信会教堂旁边的某个停车场里。警察不是为了指挥交通或者完成什么明显的目标，不过，他们的出现还是制止了几车围着这片区域绕圈的白人。对参加集会的人来说，警察似乎是在悄悄监视情况。如果哪个黑人回答了警察偶尔提出的问题，那他就有可能被当作警察的线人。

歌声将大家凝聚到了一起，尽管两个教堂里同样的歌声在时间上并不同步，但大家同样的心跳让回声回荡在惠特尼大街之间。金走过附近的街道，就像穿过传播歌声的河流。金一行人刚下车时，歌声刚好踏着《阿门》调子，是自由形式的精神圣歌：

自——由

自——由

自——由，自——由，自——由！

他们走进教堂，金在万众瞩目下走向布道坛时，歌声爆发了，如瀑布般：

马丁·金说了自由

马丁·金说了自由

马丁·金说了自——由

自——由，自——由！

让白人口中说出自由

让白人口中说出自由

让白人口中说出自——由

自——由，自——由！

接着，唱到最后一节时，来自谢罗德工作室成立的歌唱团中的自由歌手鲁莎·哈里斯走到平台中间，喧闹声戛然而止，这位女低音唱起了另一首歌：

早上醒来，我的脑海里

锡安山浸信会教堂隐约的回声成了这首歌过渡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唱出了后半句：

满是自由。

早上醒来，我的脑海里

满是自由。

哈里斯领着大家对唱了三次后，所有人就一起唱出了一个词：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歌声绵绵，不绝于耳，直到毫无预兆地骤然停下。虔诚的灵魂久未散去，他们认为上帝亲临，心怀崇敬。持怀疑态度的人们也都目瞪口呆。帕特·沃特斯是

《亚特兰大日报》的新记者，他被自己第一次参加的黑人大型集会震撼了，疯狂地写写画画，保持镇定。之后，他在笔记本封面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留给后人们：“内有马丁·路德·金博士走进教堂的那晚。”

金缓慢有力地讲到了此时正发生在非洲的独立运动。他告诉会众，道德事业的历史不会多姿多彩。他们不能坐视不管，眼睁睁地等着游行到了不可避免的时候——如卢图利主席所说 1948 年南非开始种族隔离以来出现的情况，种族关系可能急转直下。民主道德刚好就是民主与道德，既代表内部状态也是外部情况。金继续说，开始讲述爱与正义、转变的内心与规定的行为之间的区别。接着，他说非暴力是基督教道德在世俗政治上的应用。他的演讲让人们的意志更沉重了，这种严肃的历史感和强烈的责任感一直持续到金委婉地讲述奥尔巴尼运动遭受苦难的目的。“他们可以把你丢进地牢，也能成就你的光荣。如果他们要杀你，就做好赴死的准备。”金这样说。

接着，节奏越来越快的演讲消融了金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他讲到“不要带着对白人的憎恨”走进监狱时，人群爆发了一阵掌声。“对白人说：‘我们将靠着容忍的能力战胜你们。’”金敦促道。“还有多久正义才会降临？”他大声喊着。一个深沉沙哑的嗓音喊出“我万能的上帝”作为回应。记者沃特斯立刻抬起头，发现那个声音属于一个皮肤黝黑的老人。那个老人的喊声不时打断金一长串的“多久……不久”的祈祷，于是，就算沃特斯穷尽所能，都再不能完整地记下金说的每个字。讲到苦难的救赎和殉难的可能时，金的声音都已经像咆哮一般。“但我们终将胜利。”他大声喊着，两所教堂也都传来喊声：“终将胜利！”

《我们终将胜利》的歌声在金雄辩的血统下悄悄地四处发芽。“不要放弃，”金告诫大家，“继续努力。孩子们，并肩前行吧。不要因疲倦放弃。信徒的野营聚会即将到来……”突然，还没等到平常赞美诗或预言之后的欢呼，金的声音就渐渐消失了。金走下布道坛，仿佛连自己都已被会众的力量震撼了。大家一边唱着《我们终将胜利》，一边坐在长椅上晃动。他们轻轻挥着白色的手帕，教堂看

上去就像清风拂过的棉田。唱了几节后，喜不自胜的安德森医生举起胳膊，示意大家安静。他先不吝其词地感谢了金的到来，保证奥尔巴尼运动一定会进行到底。之后，在这一辉煌的时刻，他邀请金和大家一起冲破种族隔离的堡垒。

大家都非常赞同这个提议，领导人们聚集在平台上安排出发的事项。由于他们相互之间听不清楚，就干脆到博伊德牧师的书房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安德森认为只要金一直在，就能达成和解，这样就不必再游行了。尽管另有安排，尽管周日还应该替父亲宣讲，但金还是同意留下来。这件事确定之后，有人对提前公开金的行踪表示担忧，因为有传言说急红眼的白人和黑人密探都想杀了金。领导人们赶紧构思了一份公告，既能鼓舞会众，又能在最大限度上降低安全风险。接着，他们走出书房，回到音乐中。安德森容光焕发的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金同意留下来的事。大家安静下来后，安德森眨着眼睛，高兴地说：“早上7点到这里来。好好吃一顿早餐。穿得暖和些，穿上适合走路的鞋。”

那天晚上，示罗浸信会教堂和锡安山浸信会教堂通宵未关。午夜过后，安德森带着金安全回到自己家后，就给市长凯里拍了一份电报：“12月15日晚上我们没能等到令人可以接受的答复，机会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虔诚地希望早上10点之前能在示罗浸信会教堂得到恰当的回复。”

结果，事与愿违。凯里和其他委员不习惯周六上午处理政府公务，最后期限前不久才打开电报。他们觉得受到了冒犯，尤其是警长普里切特报告称情报显示金和安德森前一天晚上的演讲暗示了如果政府不同意，他们还会再次游行示威后。凯里市长没有回复安德森，而是给马瑞安·佩奇发了一封简洁的拒绝信，也许是想表达政府对安德森最近的行为极为不满。他召集了记者们，宣布奥尔巴尼的谈判已有破裂之兆。

最后一次到市政大厅的经历让安德森十分绝望，他灰心地回到了示罗浸信会教堂。“我们双方没有共同立场，”他沉重地说，“我们要跪下来祈祷上帝降临，为我们和世界所有人指引走向自由的道路。”怀亚特·沃克站出来，说该正经对

待了。随后，他让愿意跟随金一起游行到市政大厅的人举手示意，大约有 150 人举了手。“不够。”沃克尖锐地说。激昂的演讲后，又有一些人表示愿意前往，但其实最具有奉献精神的人都被关进了监狱。现在举手愿意游行的人数，远远不及金这周前几天不在时进行的两场游行时多。

沮丧的沃克回到牧师书房，看到金正和惠特尼大街上两家教堂的牧师们谈天。博伊德和格兰特都跟金一样，是莫尔豪斯的毕业生。前者是金的弟弟 A.D. 金现在的同学，后者则是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金父亲的同学。金拿他们两个在堪萨斯城支持 J.H. 杰克逊的事打趣说笑。从社会角度看，他们在奥尔巴尼的集会很像蒙哥马利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及第一浸信会教堂，也像埃比尼泽教堂和阿伯纳斯在亚特兰大亨特西街新的浸信会教堂一样。阿伯纳斯津津乐道地说自己和金现在的社会地位跟在蒙哥马利时颠倒了，自己现在掌管更负盛名的西区会众，比自己的朋友金“更有说服力”，也“更为专业”。沃克颓唐地把志愿者人数不足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于是，牧师们都赶紧回到正事上，决定最后再号召一次。

《纽约时报》的克劳德·西顿记录说，下午 4 点 16 分，金和安德森相互挽着走出教堂，阿伯纳斯和安德森夫人以及 265 名会众都两两跟在他们身后去游行。这些人中，100 多个都未滿 17 岁，其中 30 个左右还是那周前几天被捕后刚保释出来的，还跟着一些步履蹒跚的老人。这群人中只有一个白人，他是佐治亚大学的学生。（很想对他的单独出现刨根问底的记者们，紧紧抓住他说自己最近到访俄亥俄州的说法不放。）那个白人学生在朝哈莱姆行进的长队中非常显眼，因为哈莱姆区是黑人聚集区。他们走过了为星期六晚上准备的小酒馆和台球厅，也走过了加油站和食品商店。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他们——头发花白的酒徒看着，小孩子们也看着。有一些游行想从旁观的人群中招募几个一起游行，但大部分旁观者都只想隔岸观火。

那天的奥尔巴尼相当清冷，很可能下雨，所以游行从杰克逊街转弯走向市

政大厅时，穿着雨衣过来的骑警们远远看着就是一大片黄色。许多黑人把《圣经》紧紧夹在胳膊下。喃喃祈祷的人中，身材高大、相貌不凡的安德森医生非常显眼，因为他带着平常高贵的做派和神秘的笑容。“上帝保佑你，”安德森并没有特意说给谁听，“上帝保佑你们每个人。先朝我来。上帝保佑你。”

反对的人聚集在奥格尔索普街的两侧，隔开了黑人区和市中心。两个骑着摩托车的警察停在路边，挡住了游行者的去路。金带着黑人队伍走到警察面前时，警察也没挪动半步，但警长普里切特拿着扩音器走过来，走到中立地带。“你们有游行示威的书面同意吗？”普里切特的声音透过细雨传出去。

“我们只是想到市政厅祈祷。”金回答道，还说不认为以祈祷为目的的游行需要书面同意。普里切特不同意这个说法，命令游行队伍解散，随后宣布逮捕所有人。他的手下——复合警力、副警长、州警察——一起走过十字路口，将游行的人们赶到大街上。骑摩托车的警察们断开了各个方向的交通，其他警察也已经封锁了监狱周围的各个区域。游行变了形式，从杰克逊大街直入市中心，穿着黄雨衣的警察们站在人行道两旁。摄影师们在队伍前倒着走，镜头对着与大家同唱《我们终将胜利》的金，拍个不停。围观者们看着这幅景象，各有感悟，有的迷惑，有的愤怒，有的则抱着看好戏的心态。然而，有的人就参不透这样做的意义，包括刚从电影院看完洛克·哈德森和吉娜·劳洛勃丽吉达主演的《金屋春宵》的白人夫妇们。游行队伍群情激奋，却井然有序，如排练一般，黑人们和警察们都是一副严肃却并不冷酷的表情。初看上去，这有些像4月斋戒前的狂欢游行，也像大规模的处决。

警察们把游行的人引进监狱后面的死胡同后，事情的真面目也终于显露出来了。金和其他领导人第一批被关进监狱，身后跟着阵阵悲叹声和祈祷声。一位游行的大声喊道：“神圣的上帝之子两千年前就生于这个时节，为世界带来了和平。而我们现在身处两千年后的现在。”突然，伴随着拥挤人群中发出的惊叫，十几个人向外拼命挤。他们抬着一位年轻女士，那位女士喘息抽搐着，嘴里还咬着一

把勺子。人们连连呼喊要水，可警察们也只是闪开，任由他们抬着不省人事的女士疯狂地冲出去而已。呆呆看着的旁观者也闪出一条路，直到那些人沿着街道跑了一会儿后，那位女士的抽搐平稳了一些。那十几个人看她完全恢复过来才放下心来，于是，他们便大义凛然地折回了死胡同中，等着被关进监狱。被赶到巷子口等着登记的人与那些走出来准备被送往其他监狱的人擦肩而过。帕特·沃特斯被他们的歌声——“我们决不屈服”打动了，歌声如此低沉坚定，追随着渐渐走远的囚车。帕特生动地用超现实主义手法让这一细节见诸笔端，刊登在第二天《亚特兰大日报》第十页上，这则消息之前是参议员亨利·“斯库普”·杰克逊的结婚照，之后是爱达荷州的飞机坠毁事件。

警察普里切特禁止所有的酒馆和鸡尾酒酒吧当晚开放，还增派了一倍巡警。军用卡车在大街上转了一晚上，喇叭里宣布休假士兵回到海军陆战队补给站和特纳空军基地的公告也响了一晚上。市政大厅里还剩下零零散散几个旁观者和主流媒体的记者们，他们都等着看金身上会发生什么。和安德森、阿伯纳斯一起，金从拥挤的拘留室里被提出来带到了普里切特的办公室里。稍后，这3个地位较高的囚犯在武装警察的护卫下出现了，非常惹人注目。有个便衣警察还带着汤普森冲锋枪。他们3个挨个钻入警长锃亮的别克路霸里。之后，别克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朝北方开去，普里切特透露说是要开到阿梅里克斯县的萨姆特县监狱去。这件事后，白人公民尖刻地抱怨让金乘坐路霸这件事，还严厉地批评了政府给金的特殊待遇，认为他作为一个黑人囚犯，享受到的特权比白人还多。普里切特开脱说自己这样做是开明的种族隔离政策。他说，如果金在奥尔巴尼被杀，“那战火永不会消停”。

弗雷德·查普尔是个强硬而独立的警长，只要是有色人种，无论是否声名在外，他都会直呼“黑鬼”。他说“黑鬼”的时候皮笑肉不笑，带着挑衅的神色，仿佛在强调自己对礼貌的藐视。和副手一起，查普尔“砰”的一声，用牢门锁住了金参与奥尔巴尼运动的完整第一天。金成了上周被捕的750多个游行者的

一员，成了至今还在狱中的400多个里的一员。这是民权运动从未达到的巅峰。从蒙哥马利到自由乘车者，奥尔巴尼运动融合了之前所有运动的维度和战略高度——现在金也进了监狱——奥尔巴尼运动更是占据了全国的头版头条。

游行之前，安德森就已有了一丝恍惚错乱之兆，自言自语就是失常的表现。现在，他被投进了家乡阿梅里克斯县的监狱，回到了他父亲因作为黑人保险公司旅行推销员而声名鹊起的地方，这让他非常紧张，如果不能自我救赎，就会坠入深渊。“耶稣，感谢你。”安德森对金说。他在昏暗不堪的狱室中来回踱步，直到幽闭恐惧症和警察查普尔的恶行击垮了他最后一根神经。之后，安德森再次跟金打了招呼。“你是耶稣。”他说，好像这一直以来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安德森深谙自己的《圣经》——每个人都感受得到的示罗那个救世主的高贵灵魂，直至耶路撒冷的游行，还有地下城和斥责之音。“而我们都是圣人，”安德森大喊，他的眼里不只有金这个狱友，还有千千万万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的同道之人，“无人能超越的千万人。”

起初，在金看来，这种行为不过是多年来他救世主式的奉承再次登场而已，可安德森的偶然症状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变成了欣喜若狂的教堂人物。然而，身陷牢狱之中，频繁发生的怪癖会演变成狂躁症。金试着让安德森安静下来，隔壁狱室的阿伯纳斯和伯纳德·李也是。然而，安德森的能量似乎用之不尽，反而愈演愈烈。他上蹿下跳，四处宣告看到的新奇景象。深夜，安德森筋疲力尽，终于进入了断断续续且不安稳的睡眠，经常被阿伯纳斯震耳欲聋的鼾声打断。就这样，阿伯纳斯跟金在监狱的第一夜，他响彻云霄的鼻音小号就成了经久不衰的传奇。那天晚上，安德森的情况不容乐观。每次阿伯纳斯将他从梦中惊醒，他都会觉得超自然的现实甚至比监狱的床铺还真实，击碎了他狱友想靠睡眠让他恢复神志的希望。

第二天早上，体弱无力的金在狱室里宣布了自己的计划。“我拒绝保释，”金对前来探访的记者说，“如果对我定罪，我将拒绝交付罚款。我宁愿在监狱里度

过圣诞节。我希望千万人都如我一样。”一个黑人记者引用了他的话，把这当作金的承诺，为了迫使奥尔巴尼的种族隔离境况有所改变，“需要他在监狱里待多久，他就待多久”。监禁的紧张在金对萨姆特县狱卒崇高而哀伤的评价中有所显露。这些狱卒把金的尊严逼到了它最后的避难所：布道坛。“我希望有些人能更有礼貌一些，”金说，“这里的狱守叫我‘男孩’。在这里，我要说我是拥有4000教众的牧师。”

阿伯纳斯一早就被保释了，好主持亚特兰大的主日礼拜，并从外面“团结整个国家”。期盼日光能让安德森的情况好转的希望落空了。安德森对超现实的事件产生了幻觉，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无法自拔，就连金和伯纳德·李当着他的面讨论自己的担忧，他都无动于衷。有件事一直萦绕在他们心头：20世纪60年代的静坐示威期间，曾有个黑人圣公会牧师在蒙哥马利去往国会山的周日大游行后突然精神错乱了。消防员拿水管对准了那个牧师，虽然没开水，可那种景象让牧师一下子崩溃了，他再也没清醒过来。那件事就发生在阿伯纳斯、李和艾拉·贝克的眼前，而随后赶到的金也见识了老朋友的失态。现在的情况让金和李无比忧虑，担心安德森也会精神错乱。大家建议安德森先接受保释，但安德森认为那样做是对金的背叛，被吓得不轻。他决不能做第二个西蒙·彼得。

那天早些时候，怀亚特·沃克趾高气扬地走进阿梅里克斯监狱，几乎因兴奋而浑身发抖。前一天晚上，沃克代替金成了集会的主要发言人，他布道、劝解、祈祷还漏接了几十个电话。他宣布：“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将全力支持奥尔巴尼运动。”沃克的电报将金的父亲、詹姆斯·劳森以及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董事成员都召集到了奥尔巴尼，准备周一晚上进行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自周日步伐加快后，沃克几乎未眠未休——口述全国性的筹款请求，请金签名后发送出去、发表新闻公告、为董事成员们安排行程、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有限资源用在保释囚犯身上，还得告诉其他留在监狱里的人说亲戚希望他们能在监狱里挺住。沃克说，到了出击的时候了，因为金已经将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了奥尔巴尼。大

家应该考虑的事情不是把囚犯们救出来，而是让更多的人进监狱。

沃克说的所有内容都浓缩在了他给金写的一份简报中。在萨姆特县监狱，金刺痛了沃克激昂的计谋。“怀亚特，你得想办法让我们出去，”金说，“安德森撑不住了。”

这些话让沃克预见灾难，他的脑袋“嗡”的一声大了。提前出狱将会打破运动的愿景，让沃克协调支援的努力付之东流，触发人们要求跟随金出狱的要求，更会极大地打击金的可信度，因为他刚承诺过要在监狱待到圣诞节。金觉得，安德森可能还能再撑一夜。

沃克走向奥尔巴尼，心中的宏图伟业已然坍塌，只知道有一件事势在必行：虚张声势以求快速和解。他还没从第一场震惊中恢复过来，第二场就已经在等着他了。这次是反叛。沃克下令召集最后一次大型集会前，他专横的作风已经让一些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不满。接着，那天在示罗浸信会教堂里，C.B. 金和当地几个牧师正对沃克希望各方款项送至亚特兰大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而非奥尔巴尼运动的请求信颇为不满时，有人冲过来说拉尔夫·D. 阿伯纳斯在亚特兰大上电视了。他们马上冲进去，听到阿伯纳斯正在讲述自己在萨姆特县监狱的那晚，还代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号召全国到奥尔巴尼进行“朝圣之旅”。这两件事凑在一起，让很多参与奥尔巴尼运动的人心中不免酸楚。他们之前天真地用金的形象估计他的财富，期盼着他能带来足够的资金，好把之前沦入监狱的人保释出来。现在，发现必须先筹钱，再加上从亚特兰大传来的消息，他们都觉得这是当头一棒。再说阿伯纳斯，他们原本以为阿伯纳斯都还待在阿梅里克斯县的监狱，却亲眼看到他在亚特兰大冒出来，还要从那里对奥尔巴尼的事指手画脚。一时间，他们眼中阿伯纳斯和沃克作为运动“支持者”的尊贵光环暗淡了一些——那些陷入磨难的无辜之人也如此认为。他们感觉自己就像草莽匹夫一般。

没人当着沃克的面表达不满，因为沃克太过让人生畏，走过示罗浸信会教堂的地板就像被刮断的电线一样噼啪作响。沃克前一秒刚刚出发去拜访待在阿梅里

克斯监狱的马丁·路德·金，查尔斯·琼斯就专门组织了一场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记者招待会。经过当年早期的民权抗议运动，琼斯私下里结交了不少记者，他跟记者们保证，自己要说的是重磅新闻。琼斯和其他几个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领导人都小心谨慎地站着，马瑞安·佩奇站在他们前面宣读艾拉·贝克起草的声明。声明中称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掌控了奥尔巴尼的说法是“对事实令人遗憾的曲解”。佩奇说：“沃克先生和其他人都无疑想夺取奥尔巴尼的领导权。”他宣布全国性的“朝圣之旅”以及奥尔巴尼进一步的游行示威均属无效，希望能和政府的白人领导者恢复谈判。一个大吃一惊的记者问这种说法是否意味着奥尔巴尼运动已经脱离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佩奇回答说：“我们从未联合。”

沃克刚从阿梅里克斯县监狱回来，公众的敌视就向他袭来。沃克聪明机敏，虽然记者们连珠炮似的追问让他举步维艰，他还是从对自己权威的刻薄责难中找到了战略优势。即使没有举办记者招待会，沃克自己也会被迫让步，好把金和安德森救出监狱。金不让沃克把安德森的状况告诉任何人——那已经成为奥尔巴尼运动组织内部公开的秘密了——沃克又不得不为退让找个借口。现在，沃克不用费心找借口了。实际上，他咬紧牙关，匆忙送出一封封电报，取消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董事会议，建议奥尔巴尼的运动者们寻求其想要分裂的高层能掌控的最佳条件。对沃克来说，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以及佩奇联合起来做下的让人憎恶的恶行给了他一个绝佳的机会。

那个周日晚上，詹姆斯·格雷面向佐治亚州西北地区发表电视演讲时，成群的记者还是留在了奥尔巴尼。作为奥尔巴尼的一等公民，格雷对当地观众说话似的方式如同近几位总统发表全国演讲一样。格雷是镇上唯一一家电视台的大股东，同时，也控制着那一地区的主流报纸——《奥尔巴尼先锋报》，那天晚上，借由电视台的力量，他的形象大放异彩。格雷在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长大，离诺曼·洛克威尔家只隔了3户，20世纪30年代时还在达特茅斯学院打过篮球。篮球赛后的舞会上，他和对手哈佛队的小约瑟夫·P.肯尼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小约瑟夫牺牲在“二战”战场上，诺曼·洛克威尔和小约瑟夫·P·肯尼迪多次陪格雷一起到棕榈滩肯尼迪家的度假别墅。之后，格雷南下同《奥尔巴尼先锋报》所有者的女儿结婚后，又认识了肯尼迪的另一个儿子——杰克。

接下来的十几年中，杰克从约瑟夫的小弟弟长成了英俊潇洒的参议员，还要竞选总统，而各类的媒体帝国让他赢得了佐治亚州西南这片小区域的支持。1958年，格雷派出私人飞机将参议员和肯尼迪夫人接到奥尔巴尼度周末，他们烧烤、打高尔夫，还进行了乡村风格的政治活动。其间，格雷自己证明了北方人也能在南方深受欢迎。后来，肯尼迪成功当选总统，奥尔巴尼很多杰出公民的办公室里都挂着自己和总统在格雷的招待会上握手的照片，他们也都知道，格雷私下里称呼总统为“杰克”。1960年末，作为佐治亚州民主党主席，格雷要和马丁·路德·金进行电视辩论，但总统当选人知道了黑人的选票造就了自己的胜利，十分震惊，便让朋友为了詹姆斯·J. 基尔帕特里克退出辩论。

但格雷认为他不能对金和种族隔离问题坐视不理。他告诉观众们，“一监狱的专业煽动者”正在策划一场叛乱。“更带有列宁和斯大林的风格，而非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或亚伯拉罕·林肯的样子。”格雷深知奥尔巴尼运动内部的分歧，便利用了其弱点加以攻击，同时，他还支持白人们认为任何黑人叛乱都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有关的说法。说到金时，格雷只是说他身上有肤浅的投机主义：“他已经学会了，筹集金钱方面，殉难是产出很高的方法。”格雷颂扬了种族隔离，说“经多年证明，它是和平且有益的制度”，最后，他发出了终止混乱的号召作为结束。“我们需要的是宽容，而非怒气。”格雷说。

私下里，格雷建议市长凯里和警长普里切特在不必妥协的情况下，答应能让金和其他抗议者出狱的任何条件。同时，格雷还告诉自己在华盛顿的朋友，说联邦政府的任何干预，都不利于佐治亚州的白人尽早结束这场危机。他的建议被采纳了，因为罗伯特·肯尼迪非常谨慎，不想卷入奥尔巴尼的危险之中。这堂政治课是肯尼迪在1961年早前民权运动的严峻考验中学到的，当时的他还

未成熟，鲁莽而冲动。现在，作为司法部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召集了道格拉斯·凯克和其他几位值得信任的记者，宣布采取春天自由乘车运动后采取的“不干涉”政策。

12月18日是星期一，黎明到来前，怀亚特·沃克以金的名义给白宫发了一封言辞悲切的电报，要求肯尼迪总统“立刻颁布第二次解放黑人的行政命令，将黑人从二等公民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那天早上，各大周刊的头条告诉纽约的读者们“黑人组织在佐治亚州抗议后分裂了”，罗伯特·肯尼迪和拜伦·怀特、伯克·马歇尔在司法部交流了情况后，发出了一系列消息，称自己正密切关注发生在奥尔巴尼的各大事件，奥尔巴尼已成为他日程上的“首要问题”，且无论哪一方征求意见，他都欢迎。

金和安德森一起被送到奥尔巴尼受审，那时，记者们都说安德森十分“憔悴”。法庭一片混乱，记者们和旁观者们拥挤不堪，还有官员们，也是跑进跑出，低声传递着消息。法官艾伯纳·伊斯雷尔在庭审开始前就宣布休庭了。法警将金和安德森带到拘留室，而奥尔巴尼运动女性委员会的成员们则为他们带来了食物和古龙水作为礼物。楼上，传言说谈判业已恢复。马瑞安·佩奇和他的律师C.B.金在市长办公室和代表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唐纳德·霍洛韦尔碰面，而市长凯里和其他城市长官则为了和黑人保持距离而待在另一间屋子里。警长普里切特在跑来跑去，通报休战协定的补充条款。

当天上午10点30分，白人们丢下无权干涉法庭事物的伪装，决定只要金离开奥尔巴尼且人们不再游行示威，就可以在不交纳保释金的前提下，释放所有因奥尔巴尼运动而被逮捕的人。但他们认为自由乘车者们是专业的煽动者，所以要交纳的保释金很高，此外，白人们拒绝与黑人代表签订任何书面协定。C.B.金和霍洛韦尔——他们属同一法律团队，还在努力争取查理·韦尔的释放，好让他7月脖子上的枪伤得到医治——一整天都在争取城市委员会政策具有法律效力的声明，但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份未签署的说明，授权警长普里切特在某些事务上可代

表委员会处理。当天下午，市长凯里请伊斯雷尔法官批准新的协议。于是，法官便在法庭上宣布了一系列新裁决，包括金的案件推迟 60 天审理。

金被关了 48 小时后，突然出现在法院的台阶上，重获自由。安德森还沉浸在幻想中，情况很不稳定。沃克一直搀扶着他，而金则告诉聚在一起的记者们，尽管自己对奥尔巴尼的口头协议并不满意，但也要离开奥尔巴尼了。“我不希望阻碍任何有意义的谈判。”金这样说是在暗示自己的离开是谈判的条件。

被逮捕的人纷纷走出佐治亚西南地区的监狱。黎明时分，这些人才全部走出监狱，那时，有关他们长达一周的苦难评估已经传遍全国，取悦那些对此有兴趣的读者。金对这份协议的态度非常积极，告诉在示罗浸信会教堂里欢呼的人们，自己像承诺的那样留在监狱是“没有必要的”。金说，巴士和铁路货站已经“全部联合”。几百位受冤被捕的抗议者们不必交纳保释金就能出狱，而且城市委员会还保证指派一位混血儿整体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然而，金高谈阔论的同时，警长普里切特却否认政府批准了任何一点。他坚持认为奥尔巴尼政府遵守了包括国际商会反种族隔离法规之内的所有法律。所有针对游行者的指控，包括针对斯莱特·金和被停课的学生们的，都依旧待审。至于混血儿长官的事，普里切特坚持说城市委员会会像对待任何当地公民提出的及时而恰当的建议一样，同意考虑。在示罗浸信会教堂大型集会上，马瑞安·佩奇让听众们不要在意白人对胜利的欢呼，把注意力放在奥尔巴尼运动组织的“官方”公告上。

他们宣布，“为了感谢对奥尔巴尼困境的精准报道”，奥尔巴尼的领导人们把白人们当成“国家及国际媒体警察”对待，邀请他们周一在詹姆斯·格雷和约翰·肯尼迪打过高尔夫的镭泉俱乐部参加牛排晚宴。市长凯里宣布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不到一个小时前刚刚打电话说了下午的和谈，庆祝奥尔巴尼政府成功阻止了一次暴力事件的爆发。也许政府世故的款待为描述奥尔巴尼危机的新闻奠定了基调，说这次危机已经在明智的克制下安全解除，还批评了金的抗议方式，说那种方式既危险又无效，还会引起人们的不满。记者们有理由刻薄地挑剔

金的不作为。因为很多记者花费巨资、长途跋涉来到奥尔巴尼，就是因为金承诺要进行长期的且有报道价值的对抗，结果，他们刚刚抵达，整件事就以失败告终了。从其他方面看，人们对金的不满也长久不散：佩奇、查尔斯·琼斯和其他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们私下里都说和谈草草了事都是金的责任。

《纽约先锋论坛报》称奥尔巴尼的休战让金“颜面扫地”，对他的事业更是“最令人震惊的失败”。大多数记者都采用了体育记者的方法，认为本质上说，这一周的事件后，种族隔离记一分，金记零分。更详细的媒体报道对黑人运动中，奥尔巴尼官僚主义部门的认识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官员们提供了很多秘密信息，但他们很小心，并未透露主宰其内部交流的狭隘动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官员们私下里承认其在奥尔巴尼的分会近十年来一直都“如行尸走肉”一般，他们一意孤行，巧妙地诋毁其他各个与之竞争的组织。他们提出只要威廉姆·安德森能以不必要为理由化解奥尔巴尼运动，就派他担任奥尔巴尼分会的主席。他们也对斯莱特·金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这些人意在阻止游行示威，对奥尔巴尼运动歌声的大受欢迎十分恼火。这种人尽皆知的自私也影响了密西西比，那里的秘书梅德加·埃弗斯总向上司吹嘘强大的有色人种协进会章程成功组织了学生登记项目的进展。埃弗斯向总部保证，金为密西西比自由乘车运动筹集的资金很少，并强烈暗示摩西·约翰·哈代以及其他登记工作者在“与流氓、执法者及选民登记员所有瓜葛后”，就相当于引火烧身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即使埃弗斯和其他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雇员们都根据上司的期望撰写报告，但对抗之意，本本皆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放出消息，公开嘲笑学生活动分子，接着，又巧妙地确认了有些积极分子对金的批评。这些争论的概述不见诸白人媒体的笔端。克劳德·西顿在下周日的《纽约时报》上，又重复了奥尔巴尼的事，标题是“整体运动备受竞争困扰”，一直追溯至1960年静坐时的不和。在另一篇题为“令人困惑的运动”的文章中，《时代周刊》引用了罗伊·威尔金斯对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进行了尖刻的批评：“他们听不进任何

意见。他们不和任何人商量。他们如在真空中行事：游行、抗议、静坐……各路消息销声匿迹后，问题还得到法庭解决。”金小心翼翼地回复——“我认为有些民权运动领导人做得不对，他们不应该把学生们排斥在运动之外。小摩擦在所难免”——可在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匿名领导人们的交火中，金说的根本是无为之言。此外，那些人还抨击金，说他追名逐利，演讲如旋风一般，还“懦弱地”缩减了在奥尔巴尼蹲监狱的时间。《时代周刊》上的交火让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公共认知超过了之前所有运动。詹姆斯·福曼是4位名声在外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憎恶金的资产阶级习惯和寻求媒体认同的做法，便穿着上了浆的白衬衫，打着领带，拿着烟斗，出现在《时代周刊》的摄影师面前。

斯坦利·利维森再也无法容忍这些心怀恶意的说法，他立刻写了一封信，抗议《时代周刊》上的文章“有失偏颇”。利维森说：“通常，就算刑期有限，追名逐利的人也绝不愿入狱一刻……讽刺的是，那些认为金极有自我牺牲精神，想要殉难的人反过来却说他不愿牺牲。金做了，他该死；他不做，也该死。”不过，《时代周刊》并没有发表利维森的信。

在奥尔巴尼，查尔斯·琼斯和科德尔·里根比谢罗德有过之而无不及，提到金的时候更为伤人。他们说金是“全能上帝”，那是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取笑金的自负和普通教会会众的顺从时的暗语。他们还恐吓说奥尔巴尼的谈判在其精心安排下，恰恰朝着预定的方向发展：将金赶出奥尔巴尼，是履行不尽如人意的协定里的责任。这是查尔斯和里根的秘密，就如同安德森的精神状态是金的秘密一样。他们私下里为了促进强有力的运动，也赞同那份不尽如人意的和解协定，想先不知不觉地把金放出监狱，再责备他不肯多在监狱留几天斗争。他们用尽明争暗斗的花招，想证明没有金的参与，目标也能最终达成。这是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时常面临的革命困境。为了反对同盟，他们变成了自己之前反对的样子，开始了模仿与排斥的循环。

怀亚特·沃克晚年承认自己对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学生们的态度或许太

“铁石心肠”了，但当时，他还责备学生们因嫉妒而不服从，从而破坏了奥尔巴尼运动。但查尔斯·琼斯首肯哈里·贝拉方特认为沃克的独裁正在分裂运动的说法前，他根本不会费力解决那些人的不满。这引起了沃克的注意，因为他知道贝拉方特攫住了金的注意，但就算在当时，他还是抱怨琼斯用有关奥尔巴尼的谎话给贝拉方特“洗脑”了。而贝拉方特引起了针对金的争端，发现金心态轻松，十分镇定。金说，沃克和学生们并不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

为了缓和沃克对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学生们的粗暴，金希望伯纳德·李帮忙，可显然大家都认为李与金过于亲密，所以并不能胜任。李的穿着打扮模仿金，步履姿态模仿金，甚至还会模仿金长篇累牍、精心考量的词句。和贝拉方特谈过之后，金给詹姆斯·贝弗尔打了电话，请他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和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之间斡旋。

贝弗尔在密西西比，靠着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小笔津贴生活，是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学生中最重要的牧师，也是那些最不羁的自由灵魂中最重要的牧师，他绞尽脑汁想让杰克逊来到纳什维尔。最恰当的例子当属他最近与戴安·纳什结婚的事。这两位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领导人的结合不亚于社会对立。纳什在“美国小姐”的选拔赛中位列亚军。她大方得体，肤色如雪，几乎和白人一样。她生长于中产阶级天主教家庭。后来，纳什在密西西比州伊塔比纳遇到了一个疯狂的男人，一个将自己描述成“喝酒、吃鸡、追女人的浸信会牧师们”传奇榜样的男人。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恋通过运动的热情紧密相连，带着莎士比亚式的丰富多彩，打破了美国黑人文化的传统：纳什是上层阶级的凯特，而他则是流浪王子哈尔。

鲍勃·摩西在杰克逊北边克利夫兰埃姆西·摩尔的家里见到了这对新婚夫妇。12月6日，摩西因10月在麦库姆的学生祈祷游行时扰乱社会治安而被关了37日后，才交纳了1000美元的上诉保证金从派克县监狱被放出来。杰罗姆·史密斯是新奥尔良的一个学生，他刚从帕尔希曼监狱出来不久，就在麦库姆警戒部队

报告的启发下，响应了詹姆斯·福曼进行第一次自由乘车运动号召，11月组织了一次到麦库姆灰狗车站的自由乘车运动。在灰狗车站，有个白人暴徒痛打了自由乘车者们，浑身是血的史密斯发誓还要再组织一次自由乘车运动。12月1日，他组织了第二次自由乘车运动，结果，40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一队警察、一批记者和500个白人暴徒都闻风而来。警察们拉起的警戒线让黑人乘车者们赢得了密西西比州历史上第一次共同和平使用巴士车站等候室的胜利——这种和平只持续了3分钟，他们把包也都放下来了——但白人暴徒们却把怒火发泄在旁观的白人记者身上。西蒙斯·芬特雷斯是《时代周刊》亚特兰大分部的主席，他被扔进了玻璃窗，另外还有几个人不是被擦伤就是被割伤了。这次袭击让记者们极为愤怒，在《纽约时报》上群起而攻之，而《纽约时报》的驻地记者克劳德·西顿觉得自己逃过一劫，是因为暴徒们错把他当成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了。于是，西顿转而报道在奥尔巴尼的金。

同时，美国地方法院法官西德尼·迈兹禁止自由乘车者进一步活动，行之有效地取消了麦库姆的集合。哈罗德·考克斯法官支持这一决定，还对其进行了扩展，裁定迈兹的做法并不违反联邦法律，因为国际商会裁定只适用于那些教唆别人的黑人们。伯克·马歇尔有责任逆转这样明目张胆的诡辩。

殴打记者事件刚过了没多久，摩西就出狱了，那时，种族暴力已让麦库姆的黑人们屈服。摩西在登记工作站的同事约翰·哈代也死里逃生，他住在麦库姆镇中心的一间房子里，子弹打到了卧室，可他却幸免于难。哈代和摩西都无法说服别人参加登记课程。连共济会会堂都对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关上了大门。摩西见斯特普托等人都不想休息一段时间，就决定不在密西西比州西南进行无意义的工作了。和哈代、柯蒂斯·海耶斯、霍利斯·沃特金斯以及其他几个年轻人一起，摩西离开了埃姆西·摩尔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家。不过，他们在摩尔的家也见到了和摩西一样刚出狱不久的贝弗尔和纳什。

尽管3个人性格迥异，还是在一起摸索出了一份修正计划。由于在这片土地

耕耘比想象中的更困难，他们决定放弃与黑人教堂或黑人商人联合的希望，准备与白人自由主义者联合。3人决定缩小规模——只依靠少数几个年轻干部。贝弗尔的想法是让黑人在两个三角洲地区竞选国会代表。他并没期望黑人能胜利——实际上，这样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白人不会阻止这种荒唐的做法——但摩西希望这场运动能将投票的种子种在黑人公民心中，因为他们之中尚有90%没有注册。接着，年轻干部们将自己的登记课建立在这个想法上，用活生生的候选人和崭新的梦想做例子。摩西同意作为非正式竞选经理留在杰克逊，为R.L.T.史密斯牧师效劳。贝弗尔北上经过三角洲地区到了离他家乡伊塔比纳很近的格林伍德，为希欧多尔·特拉梅尔牧师工作。“我们不能失败。”史密斯在白人允许的情况下，多少作为异类，在电视上宣布了他要竞选的消息。

在全新的领域从头做起的摩西，他对自己在麦库姆经历的磨难很是镇定，就像在奥尔巴尼经历了磨难后的马丁·路德·金。“我们不得不婉转地说，身先士卒，”摩西写道，“我们现在知道了，要在密西西比州进行登记运动，选民应该做些什么。”

在亚特兰大的怀亚特·沃克很快就从奥尔巴尼混乱的激情中恢复过来了，他给非洲裔美国人的报纸递送了自己对过去一年的评价。除了他对民权运动内外斗争的频繁且激烈的批评外，沃克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整整一年后，也为政治中心培养出了公正而专业的眼光。至于1961年的美国年度人物，沃克提名的是司法部部长。沃克在写给肯尼迪的信上说：“在蒙哥马利暴力运动中表现果敢，强硬地请求国际商会通过新的裁定，这已经明确证明了他的部门举足轻重。”

沃克沉着地感谢了几位同道中人，但在金非凡的个人魅力前，他表现得非常谦卑。就连他们在奥尔巴尼经历了第一次考验后回来时，金还拿对他狂轰滥炸的紧张对抗感开玩笑。“我见到了世界上最卑鄙的人，我很不高兴。”他幽默地提到了警察查普尔。尽管因媒体的批评、同盟者的内斗和朋友们（一个脆弱而在疗养中的安德森医生几乎躲在家里不出门，而脱离了奥尔巴尼运动的学生们还因

他未能恢复游行而朝他扔番茄)的疏离而倍感苦楚,金依旧对痛苦的未来和随即而来的荣誉十分镇定。堵在他心头的那块比奥尔巴尼更沉重的石头是堪萨斯城的滑铁卢之战。离开阿梅里克斯县监狱不到48小时,金就坐下来给身在纽约的家族导师O.克莱·麦斯威尔写了一封长信。麦斯威尔是国家浸信会大会主日学校议会的国家主席,而作为副主席的金刚刚被除名。为了留在国家浸信会大会而做出丢车保帅之举的麦斯威尔,想知道金是否愿意因这次除名而对抗得意扬扬的J.H.杰克逊。而杰克逊此时正在欧洲访问,还要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私下会面。

金曾考虑过起诉杰克逊和会议大厅里抗议的人们,因为他认为“只要没人公开反对他,那杰克逊博士会继续其不符合基督教教义、不道德且独裁的策略”。但深思熟虑之后,金决定放弃,这样麦斯威尔和他自己都会免受进一步叛乱的折磨。“此时,我并不想掀起一场斗争,”他写道,“我认为,若我此刻为自己打抱不平,别人会认为我是想保住自己的地位,这会让我看起来渺小而非高大。而若我想为人民权利而斗争,就绝不能渺小。”

第十五章 胡佛的铁三角，金的组织

接着到来的是战后纯真年代的最后一年。约翰·格伦绕着地球转了一圈后大声说：“你说一天看到4次美丽日落的感觉如何？” 米基·曼特尔赢得了最有价值球员奖；约翰·斯坦贝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学富五车的人和好莱坞的导演们依旧把香烟的烟雾当作正面形象，并不在意英国皇家医学院的健康警告。第一次婴儿潮出生的孩子们已经16岁了，抓起自己的驾照，跳进底特律崭新锃亮的创造物里，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福特汽车公司为了与德国大众公司竞争，设计出了微型车，但亨利·福特公开称这种车不符合美国人的气质，放弃了这一设计。

美国成了巨头，尽管欧洲业已存在的精致文雅让一些刚刚强大起来的公民感到隐隐作痛。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宣布自己已经安排将米开朗琪罗的《圣母怜子图》送到纽约展览，而华盛顿的权势之人也不甘落后，为国家美术馆借来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电视方面，新节目《豪门新人类》出人意料地打破了西方世界在评级榜单上独占鳌头的局面，结合了肥马轻裘的财富和暖人心房的天真，社会讽刺节目取代了边境冒险节目。约翰·肯尼迪和杰奎琳·肯尼迪言传身教，成就了《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普通美国人更明白拥有所有意味着什么》。未来作家们把1962年当作怀旧之年，为冲浪喜剧和无忧无虑的浪漫故事提供了完美的背景。然而，意识形态分裂的先兆在成就、新舞步、小发明以及和平变革下暗流涌动。

1961年10月1日，W.E.B. 杜波依斯申请加入美国共产党。“我竟耽误了这么久才做出这个决定，”杜波依斯在公开声明中写道，“但我最终下定了决心。”但是杜波依斯93岁，比莫汉达斯·甘地大一岁。他生于1868年，正是安德

鲁·约翰逊弹劾案受审的那年。杜波依斯比名垂青史的蒙哥马利第一浸信会教堂（有色人种教堂）年轻一岁。成为哈佛第一位黑人博士 60 多年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立 50 多年后，将心头至宝《危机》杂志拱手送到“体育新闻记者”罗伊·威尔金斯 30 多年后，也就是因推进朝鲜半岛和谈而被戴上手铐送到联邦法庭 10 多年后的 1961 年，这位老先生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做不到自我革新，注定会走向自我毁灭。普遍的自私永远无法将社会福利带给所有人”。杜波依斯依旧举止高傲，崇尚自由的学术思想，所以可能并不太适合工人阶级政党的纪律。在他申请加入美国共产党的申请书上，他向美国共产党主席格斯·霍尔大谈特谈了自己一生对共产党员的不认同之处。

杜波依斯的声明到了金的办公桌上，也到了 J. 埃德加·胡佛的办公桌上。金在一篇对黑人耐心限度的警告中，提到了这次“美国最卓越杰出的黑人学者”的背叛：“毫无疑问，如果种族歧视这一问题不能在并不遥远的未来解决，有些黑人就会因挫折、不满和绝望而投向其他意识形态的怀抱。”此后 6 年，金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到过杜波依斯。

胡佛认为杜波依斯的声明恰恰证明了联邦调查局长久以来认为的颠覆倾向，但他并没有将这件事广而告之。对杜波依斯来说，这是尖刻的指责——他对美国价值观的最后一击都没能引起主流政治的注意——却毫无掩饰地说明了他在白人世界中无足轻重。尽管胡佛准备全力打击美国共产党带来的安全威胁，但杜波依斯的背叛对他来说无关大局，他需要的是能引起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以及大部分公众注意的大事件，杜波依斯不是。

肯尼迪与胡佛之间的持久战在各个领域进行着。肯尼迪希望彻底改变联邦调查局从国内情报到有组织犯罪等各项事务的优先顺序。肯尼迪认为联邦调查局巨大的国内安全网实际上是麦卡锡时代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的浪费之物。肯尼迪知道负责有组织犯罪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只有十几位后，倍感震惊，因为负责政治安全工作的特工有 1000 多个。肯尼迪希望这两个数字可以调换，而更让他恼火的

是联邦调查局居然否认有组织犯罪的存在。

作为胡佛指定的负责人，罗伯特·肯尼迪第一年任期结束时，联邦调查局的弊端已开始渐渐显露。12月，肯尼迪告诉一位英国记者，说美国共产党“日渐式微，构不成威胁，况且大部分共产党员都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下一个月的内务委员会上，胡佛尖锐而迂回地反驳说美国共产党是“特洛伊木马，装满了纪律严明的狂人分子，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给这个自由的国家套上国际共产主义的枷锁”。胡佛为了让警钟长鸣，秘密向国会议员和选出来的参议员们公开了一则消息，说纽约一位名叫斯坦利·利维森的律师既是美国共产党中直接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成员，也是马丁·路德·金的指导顾问。胡佛的意思很明白：困扰人多时的黑人革命是莫斯科的散兵线，只有无所不知的胡佛了解全部细节。“外部威胁不能成为内部威胁的挡箭牌。”胡佛写道。在1月8日给罗伯特·肯尼迪的机密备忘录中，胡佛更尖锐地拓展了自己这一怀疑的深度。他警告说，通过利维森，共产党不仅影响了金，而且通过金，利维森和共产党员们也能“接触”到司法部部长本人以及白宫。因为金和肯尼迪兄弟私交甚密——最近甚至还和总统共进午餐——所以可以说美国共产党已经伸向了美国高层。

肯尼迪的反应并没有记录可查，也许是因为他并不接受自己在共产党的操纵下并非无懈可击的说法。然而，并非司法部的所有人都认为胡佛的警告无关紧要，这一点自肯尼迪2月1日出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世界亲善之旅后，就已浮出水面了。2月2日，代理司法部部长拜伦·怀特给联邦调查局的联络官打了电话，特别说明要讨论一下胡佛1月8日有关利维森的备忘录。“怀特认为一定要采取某些措施。”联络官之后向联邦调查局报告时说道。怀特想要复审联邦调查局关于利维森的文件，以检查可能置肯尼迪政府于险境的苗头。

对联邦调查局来说，怀特的热情主动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嫌。他复审利维森文件的要求带来许多棘手的问题。首先，关于利维森拥护共产党的情报资料都是5年前的，均是杰克·查尔斯和莫里斯·查尔斯两兄弟的一面之词，而这两兄

弟则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派系动荡时被清洗后作为联邦调查局情报员渗透到美国共产党内部的。更糟糕的是，利维森的资料显示联邦调查局曾两次想将其招致麾下，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联邦调查局现在却认为他罪恶滔天。最后，尽管联邦调查局能证明利维森和金在民权运动方面是密友，却没有证据表明二人中的任何一个服从美国共产党的命令或意愿，更别说克里姆林宫的了。简而言之，1 月 8 日的备忘录夸大了颠覆性的说辞，好让肯尼迪得到消息。而拜伦·怀特对胡佛这一警告的欢迎，现在却让联邦调查局尽数摊牌。这一状况下潜藏的难堪立刻摆到了 J. 埃德加·胡佛的桌面上，要求他做决定。“反正金没什么利用价值，”他在备忘录上随手写道，对问题做了大概说明，“绝不能威胁到情报员的安全。”

有鉴于此，在对金的首份书面评估中，胡佛指明了联邦调查局对金的敌意应超越任何调查。这一简短的评论虽然很残忍，却行之有效，联邦调查局的下属们都明白了应如何与怀特周旋。这一重要的信号所传达的信息是金被自己与利维森的联系连累了。至于怀特索取证据的要求，胡佛则将劣势转为优势——他命令说，由于信息至关重要，所以决不能公开。利维森的文件事无巨细，都应保密。

考特尼·埃文斯是联邦调查局的联络员，几天后，他将胡佛的回答告诉了怀特。怀特说自己充分理解自己不能查看利维森档案的原因。然而，为了约束怀特，埃文斯甚至进一步降低了胡佛 1 月 8 日备忘录的重要性。埃文斯提醒怀特说，与司法部部长和白宫交流的并不是利维森本人，而是金。美国共产党的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间接的。这一保证引得怀特一番讽刺。“怀特说，从白宫高层一些人的品性来看，如果有报告说利维森确实与白宫有直接联系，他也不会惊讶。”埃文斯写道，他给联邦调查局总部递送了刺耳之言，无疑是针对哈里斯·沃福德的。

从联邦调查局的角度看，埃文斯与拜伦·怀特达成了理想的谅解，而且在这一谅解中，代理司法部部长似乎对胡佛的说法偏听偏信，很认同联邦调查局对金和利维森的怀疑。此外，这一事件也帮助胡佛重新建立了与白宫的直接联系。罗

伯特·肯尼迪坚持认为联邦调查局应通过司法部的渠道澄清消息，曾切断了联邦调查局局长与总统办公室之间宝贵的联系。2月14日，胡佛给拜伦·怀特提供了一份文件，总结了金与左翼事业支持者各种各样的联系。同时，他还通过使用联邦调查局重要文件的文件袋，向白宫的肯尼斯·奥唐纳提供了一份相似的文件。“尊敬的奥唐纳先生，”胡佛说，“文件的内容与杰出的南方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有关，我想您应该感兴趣。”

同时，罗伯特·肯尼迪正进行着他特别的环球之旅，自信地传达着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及远非司法部管辖范围内的事，与之同行的大批记者都认为这些访问预示着肯尼迪时代的到来，因为罗伯特将跟随其兄长的步伐，走进白宫。在相对贫穷的国家，人们对美国在殖民主义方面的看法不停发问，让肯尼迪疲于应付。印度尼西亚人更是拒绝接受肯尼迪对其为新几内亚脱离荷兰而进行独立谈判一事所做出的中立评论。肯尼迪尽量做到不冒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同盟国，便摆出一副他在应对佐治亚州奥尔巴尼事件时的态度：这是地方政府自己应该做的决定。由于这一说法暗含着肯尼迪对荷兰殖民主张的默许，于是枪林弹雨般的批评朝他疯狂袭来。凭借隐晦的幽默和顽强的毅力，肯尼迪在不同国家面对情绪同样激烈的质问者时，都表现得极为勇敢。肯尼迪后来说：“我到过的每个角落，都有人问民权的问题。”

2月27日，J.埃德加·胡佛用一则丑闻迎接司法部部长回国。当时，那个丑闻太过不可思议，就连最容易被超市小报蒙蔽的读者都会因胡佛的令人惊讶的不切实际而略过不看。胡佛的备忘录基于之前展开的一项调查，当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因有人在歌手菲利普·麦圭尔的家非法安装窃听器而逮捕了一些参加私人派对的人。窃听器诉讼的初步成果表明安装窃听器的人受雇于罗伯特·马休和萨姆·“莫莫”·吉安卡纳，前者是为霍华德·休斯效命的前联邦调查局特工；而后者则是艾尔·卡彭犯罪集团芝加哥的继承人。这对整个司法部来说是件好事——胡佛把马休当作是联邦调查局的叛徒而憎恶他，而一直以来，肯尼迪都想

定吉安卡纳的罪，就像想给吉米·霍法定罪一样。不过，第一个坏消息是马休和吉安卡纳声称自己安装窃听器是中央情报局同意的，所以应该免于起诉。而中央情报局的员工也咬牙切齿地确定了马休和吉安卡纳确实曾参与一系列高级机密的工作，试图借用吉安卡纳与黑帮的关系，暗杀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吉安卡纳谋划这些任务时，曾要求马休和中央情报局保证自己的情妇菲莉斯·麦圭尔在自己不在的时候依旧一心一意，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认为这是无法拒绝的请求。

这仅仅是个开始。进一步的调查，再加上窃听器这件事，揭示了菲莉斯·麦圭尔对这段情人关系颇为不满，包括吉安卡纳又在加利福尼亚包养了一位名为朱迪斯·坎贝尔的情妇。歌手弗兰克·辛纳特拉将坎贝尔介绍给了吉安卡纳，还介绍给了与自己交好的其他黑帮成员。后来人们发现，辛纳特拉还将朱迪斯·坎贝尔介绍给了约翰·肯尼迪，尤其是在一系列交换情妇的情况下，也将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介绍给了玛丽莲·梦露。实际上，看起来辛纳特拉主业不仅有唱歌，还有引荐，他放荡的社交网络里有各种各样万众瞩目的人物——那些人有的来自政界，有的是黑帮成员，还有的涉足演艺事业。至于吉安卡纳，他是个老派的黑帮成员，不仅表现在他有窃听女性友人的同时与另一位调情的特权上，也体现在他看待问题时的实际角度上。吉安卡纳与坎贝尔风流完全是公事公办，这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隐性力量，因为他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共有一位情妇。

J. 埃德加·胡佛用尽浑身解数才将热气腾腾的纸浆浓缩成了掷地有声的政策：电话记录证实，自肯尼迪入住白宫后，朱迪斯·坎贝尔打过70多个电话。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反对针对吉安卡纳或马休的刑事起诉，唯恐会危及针对卡斯特的安全行动。这次横生而出的拉斯维加斯逮捕案可能会给政府带来灾难。这意味着中央情报局以及肯尼迪兄弟破坏了美国政府对吉安卡纳以及相关黑帮成员们其他恶行的去除。这些事不仅暴露了美国政府与黑帮合作谋杀他人，使政府颜面尽失，还暴露了总统与黑帮女子有瓜葛，让总统面临被勒索的风险。胡佛用

专业的理性总结了整件事，但私下里，他的满足感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这就是把联邦调查局排挤出对外情报工作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吗？这就是对自己施压要求对吉安卡纳一般的黑帮成员宣战的肯尼迪兄弟吗？这就是轻视自己高瞻远瞩的关于国内颠覆警告的人吗？

胡佛并不害怕责难，给肯尼斯·奥唐纳寄送了一份有他2月27日备忘录的副本，继续重新建立他与白宫之间的联系。同一天，他命令纽约及亚特兰大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彻底翻查各自关于马丁·路德·金的消息。一周之后，胡佛正式向司法部部长肯尼迪请求授权，要求在斯坦利·利维森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器。肯尼迪同意了。于是，根据司法部官员们心照不宣的奇怪惯例，胡佛亲自授权安装室内窃听装置——与电话窃听器相照应的窃听装置——而且，肯尼迪同意安装电话窃听器前，他就已经有了安装窃听装置的想法。3月15日晚上，纽约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潜进利维森的办公室安装窃听装置，特工们称之为“麦视”，也就是联邦调查局对“麦克风监视”的标准缩写。3月20日，技术人员又在电话里安装了电话窃听器。

3月22日，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白宫参加私人午餐会，他向肯尼迪总统报告联邦调查局发现辛纳特拉、黑手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对利维森全方位的监听就已准备就绪了。就胡佛本人而论，他受不了针对自己的对抗。胡佛非常倚重抚慰人心的说法——他是总统的忠仆，特意对未来潜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履行自己的职责。此外，面对总统的婚外出轨问题时，胡佛便拿出那是20年前的旧事当作挡箭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监视名为因加·阿尔瓦德丹麦记者（她因认识希特勒、戈培尔、戈林以及其他纳粹高层而被当作间谍）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发现她与当时还是海军中尉的肯尼迪总统之间有过床第之欢。基于联邦调查局的指控，海军惩处了肯尼迪，将肯尼迪调职他处，而胡佛则因怀疑肯尼迪的忠诚拒绝了肯尼迪书面赦免的请求，甚至也拒绝了朋友约瑟夫·肯尼迪大使私下的请求。之后，肯尼迪中尉并没有与阿尔瓦德断绝联系，于是，联邦调查局的

特工便窃听了他们的幽会，录音磁带上满是夹杂着枕边私语的海军事务。胡佛没有忘记这段插曲。1960年，肯尼迪成为总统后，胡佛还要求助手卡萨·“德科”·迪洛克从联邦调查局档案中调取肯尼迪与阿尔瓦德的录音，以备审查。迪洛克听说过这些磁带，认为涉身其中的是约瑟夫·肯尼迪，而不是约瑟夫的儿子，但联邦调查局局长斩钉截铁地说：“不，是那个男孩。”

现在，那个男孩成了总统。肯尼迪总统与J.埃德加·胡佛涉及性的谈话非比寻常，因为胡佛就像来自外太空一般。1941年，也就是肯尼迪开始与因加·阿尔瓦德私会的那年，胡佛就警告美国人说，如果任由汽车旅馆沿高速公路蔓延，那么美国人就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睡在因“不正当关系”而余温尚存的床上。一代人之后，汽车旅馆已随处可见，而胡佛却又到了白宫，讨论如何能让博尔吉亚以及梅第奇有宾至如归之感。讨论结束后，肯尼迪总统悄悄命令肯尼斯·奥唐纳说：“赶紧摆脱那个浑蛋，他真是大煞风景。”

至于胡佛到底对肯尼迪说了什么，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结果强有力地表明，胡佛一定强调了与辛纳特拉联系的危险。胡佛的特工偷听到了吉安卡纳和其他“暴徒”密谋通过辛纳特拉求得政府广开便利之门的事，而辛纳特拉不只是情妇们的中间人，更是致力于威胁总统的黑帮成员们的中间人。关于这两点，胡佛的看法的确令人信服。根据记录，同一天下午，总统和朱迪斯·坎贝尔进行了最后一次通话，显然是为了断绝关系。而肯尼迪也决定在之后对棕榈泉的访问期间，也不会探访弗兰克·辛纳特拉，反而要和辛纳特拉的竞争对手宾·克罗斯比见面，并断绝与辛纳特拉的一切联系。

其间，纽约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员们在3月16日上午10点10分打开了新近安装在利维森办公室的窃听器的接收装置。此后，美国政府的耳目在金余下的生命里，一直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围绕在利维森和金的周围。

对金来说，那一年的开始与结束并无二致：被带向伯明翰。胡佛和肯尼迪在共产主义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时，金正在恳求政府释放弗雷德·夏特沃斯。

1月8日，夏特沃斯从辛辛那提的新家飞往伯明翰。当天，由于美国最高法院拒绝重审他1958年在伯明翰搭乘公交车时坐在前面的案件，之前一系列针对他的诉讼均以对他不利而告终。尽管法庭最终认为这并没有违反种族隔离法令，但法官以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了夏特沃斯的请求，因为夏特沃斯的律师没能根据亚拉巴马的法律，在最初判决后6日内提交庭审记录的副本。夏特沃斯的犀利、直率和雄辩一如既往，他在伯明翰的例行大型集会上谴责了自己的律师亚瑟·肖尔斯和奥兹尔·比林斯利——他们可是亚拉巴马最卓越的黑人律师。“他们都是卡尔霍恩，”夏特沃斯借用《阿莫斯和安迪》中多音节的笨蛋尖锐地说，“从现在开始，我要告诉那些律师该怎么为我打官司。”

1月15日，金给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拍了电报，要求任命一个人来讨论司法部的紧急干预事宜。伯克·马歇尔给金打了电话，用关于联邦限制的理论给了他答复。马歇尔在后续的书信中写道，由于宪法大幅削减了联邦政府在警察行动和执法方面的权力，他“未找到任何司法部能介入这些案件的基础”。此外，马歇尔还提到了金想到的小步骤，比如把夏特沃斯关在伯明翰之外的地方。这些想法很可能不能成形，马歇尔想为更有利的安检保留司法部的公共权威。司法部部长不会容许金在这个话题上讨价还价，免得他心生妄念。

连带时间经常打断金对这一回复的失望。金和马歇尔谈话之后的第二天，联邦法官霍伯特·格鲁姆斯宣布让6个人在伯明翰服刑，联邦调查局因他们去年5月在安妮斯顿外毁坏自由乘车者的第一辆巴士而对他们提起诉讼，对此，这6人供认不讳。但其中6人获得了一年的缓刑，而且格鲁姆斯还允许剩下的那个服兵役，抵消之前因强盗行径而获得的刑期。从法庭传出的消息是被告6人不用因其对巴士的恶意攻击蹲一天监狱，可夏特沃斯却要因为乘车而被监禁90天。

当天晚上，炸药严重损毁了伯明翰3座最近刚刚进行过大型集会的教堂，包括夏特沃斯之前待过的那座。对前两次爆炸进行紧急播报的警察刚好开车经过第三座教堂时，最后一次爆炸发生了。爆炸的冲击波将几百码外巡逻车的玻璃都震

碎了，而那位警察也因为割伤被送到了医院。布尔·康纳开始还否认爆炸与种族问题相关，稍后却改口了，说：“我们知道这是黑人干的。”康纳还宣布了今年竞选州长的消息。他声称，自己步入政坛的第一步就是买 100 多只新警犬，用以打击胆敢来到亚拉巴马的自由乘车者。

1 月 25 日，夏特沃斯妥协了，和 1958 年一起搭乘巴士的 J.S. 菲佛牧师一起被关在了伯明翰的监狱。于是，金便恳请罗伯特·肯尼迪的保护，他写道：“很明显，对于数百名种族隔离主义者，无论是在监狱里的还是没进监狱的，伤害夏特沃斯是他们最想做的事。”金马上就派怀亚特·沃克到伯明翰去，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得到了 28 个民权组织的背书，给肯尼迪发了一封联合邮件。高额的费用和新的法律费用让金不得不在绝望之中向黑人牧师中最信任的朋友们发出迫切的恳求：

“我们都没想到他（夏特沃斯）真的会服刑。为了让他重获自由，我们必须寻求额外的咨询，以保证法律步骤的完整。我们已经就此事聘请了纽约的威廉姆·孔斯特勒先生。夏特沃斯夫人的状况不太好，为了让她和弗雷德免受不必要的担忧，我们需要在夏特沃斯不在的时候，留住他在辛辛那提的布道坛。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负责所有的花销，可自由乘车运动的庭审费用以及律师费仍有很大缺口。针对拉尔夫·D. 阿伯纳斯、弗雷德·夏特沃斯、约瑟夫·洛厄里以及年老的 S.S. 西伊的 300 万美元的诽谤案还会继续，日常运营也必须继续。但这一突发事件耗尽了我们的资金，我们难以为继。您是否愿意在本周日安排一次捐款？”

“亲爱的麦克，”刚与金就黑人浸信会教堂分裂的痛苦经历交换过意见的 O. 科雷·麦斯威尔牧师在回信中写道，“上一周的后几天，我收到了你的信，我深感忧虑。你在信中说希望我捐款 100 美元，我不知道其他教会会怎么做，但我知道橄榄山教会能做的不止这些。”麦斯威尔给了金 500 美元。

“维护各地的法律与秩序是当地官员的首要责任。”马歇尔在月末给金的信中

写道。C.O. 辛普金斯是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什里夫波特分会的董事会成员，他的家在爆炸中被夷为平地，金要求联邦政府对此进行调查时，马歇尔也给出了类似的回复。公众批评似乎比金的请求更有作用。有些黑人记者很想知道司法部为什么没有授权联邦调查局对3座教堂爆炸案进行调查，对此，马歇尔承认司法部不允许联邦调查局积极主动地参与此类案件。马歇尔很不自在地说自己正在考虑这个政策，他还说，这一政策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留下来的。金对政府的冷漠深感愤怒，但不愿意冒险。“尽管总统还未获得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支持，”他在《民族报》上写道，“但他也未被拒绝或者失去已有的支持。”

林肯生日当天，金飞到了伯明翰参与一次大型集会，支持被监禁的牧师——夏特沃斯和菲佛。十六街浸信会教堂里的人过多，都挤到了街上，随后收集大家的捐款就花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尽管迈尔斯学院的校长卢修斯·皮茨认为夏特沃斯是个恪守细枝末节的人，而且是个危险的煽动分子，他还是来参加了集会。就在他告诫黑人青年们，说如果他们继续穿着尖头、颜色奇怪的鞋和紧身短裙，或者继续跳着粗俗的新舞步而不顾学习的话，就永远无法成功时，金走了进来。

金满怀热情地讲着经济秩序和奖学金，但警告说，这些并不足以以为伯明翰带来自由。“我希望我可以告诉你们前路坦荡，”金说，“我希望能告诉你们，我们身处应许之地，不必再受折磨，也不必再做牺牲，但那不是现实。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警察不会再保护我们，市长和（警察）专员们神志不清时，就到了那个时刻。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我们想要自由。”为了抵消那些不祥的预感，金向大家讲述了他与总统夫妇未公开的会面——肯尼迪夫妇如何与他共享美妙的餐点，如何带他游览白宫，以及他如何在林肯的房间要求总统签署第二个解放宣言。面对伯明翰难以缓和且意志坚定的对手，金将自己对肯尼迪政府的失望一笔带过，而强调了自己的希望。

两周后，美国最高法院一致决定，如果亚拉巴马州5日之内没有释放夏特沃斯，那么格鲁姆斯法官应在夏特沃斯交纳上诉保证书后释放他。“白人们阻止

不了我们了，”3月1日被释放的夏特沃斯得意扬扬地宣布，“黑人们要逐渐意识到，伯明翰究竟没那么强大——至少赢不了联邦法令。”怀亚特·沃克来到伯明翰，准备在下一次大型集会上发言，他说：“对黑人来说，世界局势掌握在3个人手里：肯尼迪、赫鲁晓夫和金。”第二周，罗伊·威尔金斯随沃克前来了。那时，学生们和夏特沃斯的支持者们抓住了监禁引发的愤怒，开始抵制伯明翰里支持种族隔离的店铺。传单上还印着“为了自由，穿着旧衣服”。菲佛牧师在下次的大型集会上号召大家在复活节的周日，都穿着旧牛仔裤去教堂，以表决心。“布尔和老派艺术（市长亚瑟·黑尼斯）的得意之日屈指可数了。”菲佛说，他在布道时兴奋异常，许多人都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一起喊起来，好几位牧师好不容易才让他们平静下来。

这次抵制引起了布尔·康纳的注意。“我不打算微笑着按兵不动。”他4月3日在市委员会的会议上说。接着，康纳中止了伯明翰市向有需要的人分发联邦政府余粮，理由是大部分受惠人都是黑人。第二天，他的手下发现夏特沃斯和菲佛走在路上，就以阻塞交通为由逮捕了他们。获得保释后，夏特沃斯便宣称康纳的报复会让人们对新运动的支持不降反升。带着一股挑衅的意味，夏特沃斯说这次抵制就像“象牙皂——纯度为99%和44%”。

伯明翰并非金活动的重点。他在别的城市花费的时间比在伯明翰多一些，不过，他在哪个城市停留的时间都不会太久。在他混乱的追求中，要说新鲜的事情，当属逐步积累的证据终于表明过去5年的梦想终于酝酿出了生命。仿佛一夕之间，许多方面都已经有了突破——比如资金筹措、选民登记和专业骨干的招募方面。曾经一贫如洗、毫无收益的委员会和令人惋惜的延误，现在摇身一变，为注册工作带来了充足的资金。大体来说，是金点燃了火花；新来的安德鲁·扬监督下的选民教育计划补助金填充了燃料；塞普提玛·克拉克开办的培训注册工作人员的公民学校提供了场地；而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纽约办公室斯坦利·利维森直邮业务经理杰克·奥德尔更是带来了不可或缺的细节和方法。

很快，奥德尔就因其共产党员的背景引起了肯尼迪政府的高度重视。奥德尔比金年长5岁，由祖父母抚养长大，他的祖父是底特律公共图书馆的看门人，而祖母则把他培养成了严格的天主教徒——奥德尔非常虔诚，就算到新奥尔良泽维尔大学上学时，还担当着祭台助手的角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护航驱逐舰的保护下，为海岸警卫队商船运送战争物资。此外，如哈里·贝拉方特一样，他首次接触政治历史，也是因为黑人水手将W.E.B. 杜波依斯的作品介绍给了他。在大约6年间，他在甲板底下都是靠阅读杜波依斯有关美国重建、世界历史、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以及征服非洲的书籍来打发时光。接着，他回到了新奥尔良，并自己在全国海员工会里找了一份组织者的工作。全国海员工会在黑人之中非常有名，因为它是第一个打破种族界限的海员国际组织。航运工作岗位并不受种族的影响，而其国际高管之一也是所有贸易公会中第一个坐到这个高位的黑人。全国海员工会之所以在种族方面走在了前沿，则是因为它贯彻了共产国际的政策。1950年，反共产党派系在全国海员工会进行政治清洗时，奥德尔因传播和平请愿而被除名了。

后来，他在伯明翰找到了一份卖丧葬保险的工作。到了1957年，由于奥德尔在账目方面表现较好，成了公司在蒙哥马利办公室的经理。作为背弃了天主教的人，他多次到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聆听最近风生水起的马丁·路德·金的布道。之后，他在纽约准备毕业作品时，自愿为拜亚特·鲁斯丁的综合学校进行的1959年青年游行工作。通过鲁斯丁，奥德尔结识了斯坦利·利维森。后来，利维森还邀请他出席1961年在卡耐基大厅为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而举办的萨米·戴维斯与弗兰克·辛纳特拉慈善音乐会。那天晚上是奥德尔一生中的巅峰时刻，他成了不同寻常的人物。奥德尔结交了很多共产党的朋友，也因共产党为黑人船员所做出的努力而感到深深的感激。同时，他还与兄弟会保持着联系，仍能感受到天主教信仰的挣扎，也非常珍视听到弗兰克·辛纳特拉在卡耐基大厅歌唱《佛蒙特州的月光》时的回忆。



利维森带着奥德尔汇报卡耐基大厅音乐会的净收入时，奥德尔遇到了金，那一刻，与其说金是一位名人，不如说金是他的同事。财务上的成功让那个场合的氛围非常喜庆，利维森也趁热打铁，希望金能够建立一个更长久的集资体系。由于奥德尔在业务管理方面很有经验，利维森便推荐他担任通过直邮筹措资金这一试验性计划的理想监督人。金同意了利维森的计划，而通过邮件恳求捐款这种方式也大获成功。不久，奥德尔就成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哈莱姆邮件室的全职主任，从这一过程中赚得微薄的薪水。奥德尔在新式技术中看到了巨大的潜力，便在纽约大学商学院学习营销课程。到了1961年8月，利维森和奥德尔骄傲地向金报告说，他们的小事业在过去一年中为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筹集到了8万美元——超过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预算的一半——而成本还不到1万美元。他们向金报告说，按照直接寄送邮件的方法，他们每天积累的“总清单”上已有了12000名“实际捐款者”。

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纽约办公室像是忙碌的蜂巢。在那里负责打字、装填信封的经历让鲍勃·摩西想到了与亚特兰大总部相似的情况，当时在亚特兰大，他就发现了教堂社交的慵懒氛围。这种差别让利维森和摩西都有些失望，而最终，金自己总结道，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亚特兰大办公室的组织有严重缺陷。1962年1月，将大笔选民登记款项用于选民登记计划确立后，金便请奥德尔在纽约与亚特兰大之间奔波。奥德尔的新任务是将自己在筹措资金时的经验教训应用于选民登记上。奥德尔身兼两职，成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第一个航信士官。他负责保管名单、统计选票和设计系统。

奥德尔开始往返两地前，安德鲁·扬就作为塞普提玛·克拉克公民学校的菲尔德基金会新任主管去了南方。扬负责将纽约的慈善家与民权运动联系起来的重任，让不必上缴的税款用于选民登记中。大半年以来，扬都在一个职业决定上犹豫不决：他是否应该离开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青年工作部费用账户的舒适，转而到种族隔离盛行的南方投身于艰难险阻不断的民权运动中？“我现在必须做决

定了。”他在写给金的一封信中说，还向金征求意见。金从未见过扬，便让利维森到纽约与他见面，再做出评价。利维森发现扬是个能力强但不专心的人。加德纳·泰勒给了金一份更为具体的报告，因为他知道扬出身于新奥尔良最有名望的黑人家庭之一。他们都是富有的公理会教徒，来自等级最高、“肤色最浅”的教堂，而且扬很多堂兄弟的肤色都很浅，也很受人尊敬，曾经混迹于白人世界中。安德鲁·扬比金小3岁，他开始想通过教导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文化水平不高的牧师们，加入南方运动的理想主义。“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成员大部分来自浸信会教堂和下层阶级的黑人，”扬给纽约一位朋友写信时说，“这些神职人员不尊重受过教育的黑人，而且，尽管他们非常需要彼此，却几乎没办法团结起来。这就是我的目标之一。”

随之而来的几个月里，调整和选民教育计划的建立同时进行着。高地民众学校的迈尔斯·霍顿因延误向扬道了歉。扬也因选民教育计划概念的模糊性向慈善家们道了歉，还向怀亚特·沃克承认说：“我们有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可以回到斗争的中心了。”扬、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几个基金会以及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最终分工是一次头衔与责任的复杂变换，只有基金会的专家们才懂。菲尔德基金会负责支付扬的薪水，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却要支付他的旅行花销及其他预算项目。迈尔斯·霍顿提供了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废弃不用的公理会学校作为公民课程的上课地点，将第三个机构加入了整体计划。

多尔切斯特离佐治亚州的萨凡纳不远，扬在教会学校将之前的公民教育计划与选民登记结合到了一起，并接受塞普提玛·克拉克作为两项计划无可争议的教师，用自己40年来积累的使用方法，克拉克每周招收一次学生，每次招收的成年学生可以坐满一辆公交车。在数学课上，她教给学生如何计算种子与肥料的分配。在识字课上，她按照州宪法选民登记的要求，充分利用了大街上的标志和报纸上的消息。尽管她的教学法需要像扬这样专业人士的关注，但她非常擅长在未受过什么教育的自耕农阶层中——助产士、老农民、运货马车车夫以及得把孩子

和孙子送到学校的祖母们——发现天生的领导者，并告诉他们自己不可动摇的信心和尊重。但克拉克心里横贯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克拉克是奴隶的女儿，她对此依旧非常敏感。她很快就察觉到了什么是自己人口中的自尊心——例如，有针对性地，金的母亲从未邀请她到亚特兰大家里的“会客室”，还提到运动中强势的牧师们往往都很自负，经常忽视女性的贡献。

起初，克拉克将自己的新老板视为珍宝——知道安德鲁·扬在和自己见面之前，就几乎奇迹般地完成了自己筹措后，她更是如此。一次，又一批学生到达多尔切斯特后，扬搭乘包机过来参加开学仪式，而克拉克在去食品贮藏室的路上拦住了他。克拉克耐心地告诉扬，他将食物与新来的人分享之前，不应该先吃，因为那些人一整夜都在坐车，已经很饿了。扬眨了眨眼，他解释说预算中没有钱提供往返路上的早餐，而且没人说他是那个不称职的主任。克拉克则说扬必须记住这些人会把沙子装进可乐瓶子中，好向家乡的乡亲们证明自己是来过海边的人。他们从不敢想象走进埃比尼泽的教堂，更别说参加扬的精英聚会了，因为那些崇拜者的穿着对于他们来说太过正式、精致，如果这些人在这些小事上都觉得不舒服，那么他们怎么会觉得自己的投票对反对白人的意愿来说非常重要呢？克拉克说刚刚招募的这些人会注意到一切。扬的预算优先项以及他与新人谈话时热情的缺失和他的演讲一样有说服力。“如果你能支付马歇尔·菲尔德基金会让我们租飞机的钱，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两三美元买早餐？”克拉克问。做不到这一点，扬就能体会那些人的不安了。

“塞普提玛，你是个圣人。”扬说。

“不，我不是圣人，”克拉克回答道，“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圣人，但我知道你的做法很不明智。”

“你知道的，地狱里也有圣人。”扬说，他在神学辩论中一向能言善辩。

“好吧，那我可能是其中一员，”克拉克回答。她已经毁了扬的胃口，而最终，这位来自纽约基金会的主任发现自己松开了领带，和公民课程的学生一起享

用了装在袋子里的午餐。

到了2月，工作调整进行得很顺利——对克拉克和扬来说是这样，对杰克·奥德尔和即将上任的选民教育计划主管威利·布兰顿也是。1962年2月2日，所有人聚在亚特兰大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附属单位开会：金做了演讲；塞普提玛·克拉克和多萝茜·科顿作为公民课程的新老师出席；詹姆斯·劳森负责管理非暴力工作室；安德鲁·扬作为菲尔德基金会的代表参会；而杰克·奥德尔作为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选民登记的主任，负责业务会议部分。奥德尔描述了一幅登记的新流程图：首先，金要进行巡回演讲，利用他的名字和思想吸引新的志愿者们；接着，奥德尔和扬将把入选的志愿者们送到多尔切斯特，学习塞普提玛·克拉克的公民课程，最有天赋的学生将把克拉克的方法带回自己的家乡，成为新老师；最后，奥德尔将把受过训练且能力强的工作人员的记录送到威利·布兰顿处，为持续进行的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登记项目下选民教育计划资金筹集工作。

金立刻出发了，踏上了他所谓的“面对面”巡回演讲，他还称之为“泛南方”演讲和“自由军团”行动。按照惯例，金先在密西西比克拉克斯代尔第一浸信会教堂开始集会，他在詹姆斯·贝弗尔工作的德尔塔第三国会选区奔走操劳了3天。之后，为了让人明白他看重的不只是大批听众和沉甸甸的捐款箱，金不仅在教堂开会，也在乡村杂货店集会，此外，他既会去铺有道路的村庄，也会去极小的村庄。詹姆斯·劳森在陶格鲁学院开办非暴力工作室的同时，金则在琼斯镇向心怀敬畏的农民们宣传登记政策。在面积不大的谢拉德，金的动员演讲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那个老人骄傲地宣布自己走了13英里就为了见金一面。在怀亚特·沃克和多萝茜·科顿的帮助下，金在3天内招募了150人左右，他们都愿意长途跋涉到佐治亚州塞普提玛·克拉克的公民学校去。

金后来也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进行巡回演讲。2月22日，威利·布兰顿宣布选民登记计划终于“开张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鼓足干劲争取新的可用资金。很快，1000多个人就登记参加了自由军团。他们之中的几百个都通

过了塞普提玛·克拉克在多尔切斯特的培训项目。泰康利基金会、菲尔德基金会以及斯特恩基金会为选民教育计划的首次捐款达到了162000美元，还承诺之后还会为之捐款，而几乎在同时，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比第一年要求的60000美元多收到了11000千美元。黑人最大的周刊《黑玉》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金博士联合了自美国重建以来最大的力量”的文章，认为金在南方的巡回演讲，“在某种程度上说，更像是谋求官职的人，而非非牧师……这遵循了政治机器的惯例。”

其他民权组织也都注意到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领先之举，而金也着意修复与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关系。3月，他同意在纽约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资金筹集专门活动上演讲，那次活动是由哈里·贝拉方特主持的。学生非暴力委员会陷入了极大的财务困境中，就连很少走出密西西比的鲍勃·摩西都赶来参加了。琼斯和谢罗德从奥尔巴尼来；提姆·詹金斯从耶鲁法学院来；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主席查尔斯·麦克迪尤最后一分钟也从路易斯安那赶来了——去路易斯安那探望被关进监狱的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同事时，他自己因流浪被关了一个月，这显然是欲加之罪。金到来之前，贝拉方特和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代表团在客厅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试图说服他们对金领导力的批评不过是混淆视听之言。学生们普遍抱怨金远离前线，认为金的名声让他过于谨慎，颇为分心。摩西没说什么，但他专心投入密西西比的活动，与金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在代表团成员中，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领导人们也因贝拉方特对金的忠诚而颇有微词，但他们并没有说，因为演艺业有一条规则——每场表演都得有颗明星。贝拉方特争辩说真正的金并不像表面那样贪图享受，关于这个说法，人们都暗自取笑着柯瑞塔的珍珠和圆礼帽、金父亲以自我为中心的咆哮还有金的假期和丝绸睡衣。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有件事看上去是这样，表现出来是这样，吃起来是这样，闻起来是这样，感受一下还是这样，那你应该明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不得不说它就是这样的。”

那些人笃定地谈论着那些自愿抛下名利的人，但他们并没有公开挖苦贝拉方

特。他们尊重贝拉方特，因为贝拉方特是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主要捐助者之一，而且，他们也承认只有贝拉方特能容忍自己的粗暴武力。晚上的鸡尾酒会上，金和大家只待了一会儿，接着就站在贝拉方特身边，热情洋溢地讲述自己从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中敢于奉献的学生们身上学到的东西。他把每个学生都当作一个例子，证明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一直进行的工作的本质，敦促宾客们予以支持，此后，金并没有提到自己的组织就离开了。

3月24日，金又展开了一次“面对面”之旅。“我们开始吧，博士！”天还没亮，床头闹钟响起时，怀亚特·沃克对妻子喊道。他们把金的日程提高了一个档次，把他推向政治运动狂乱的步伐中。早上10点左右，沃克、金、阿伯纳斯、多萝茜·科顿和伯纳德·李都从亚特兰大搭飞机到了里士满，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迎接了几位黑人政要，并跟着车队一起到彼得斯堡，在午餐会上致辞。那天下午，他们挨家挨户地游说，接着就向西开了几百英里，参加约有3000人的大型集会。这次旅程横贯弗吉尼亚，尽管有沃克的催促和他的笔记本，一行人还是比计划落后了，以至于有些地方的观众得空等上两三个小时。于是，沃克不得不派出传教士，提前过去留住群众。

关于选民教育计划以及新登记行动的新闻根本没有进入白人媒体的视线中。选民教育计划极力避免公开，以免引起政治风暴，不利于其税务安排。城市联盟的惠特尼·扬由于对资金的分配不符合他的预期，便拒绝出席公开的声明。出于外交原因，金强烈要求罗伊·威尔金斯成为选民教育计划所有公告的中心，但威尔金斯却拒绝参与。这些抑制因素让刚刚成功的登记运动成了秘密，就连民权运动组织的活动分子都不太了解。斯坦利·利维森听说怀亚特·沃克报告多尔切斯特的学员已经在南方建立了61所小公民学校后非常震惊。他大喊着，这太了不起了，但是怎么没有报道？新闻段落对他筹集资金的信件来说非常重要，能帮他带来资金，支撑整个计划。金同意对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行动进行低调的发布会时，各地的学校已经达到95所，多尔切斯特的学员也已经多达930位了。那

次发布会并没有引起太多记者的注意，因为记者们早已对黑人大张旗鼓的登记行动持有怀疑态度了。

在极力避免与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持久战中，利维森一直事务缠身。3月9日，他前往亚特兰大参加苏利文一案的紧急会议。案件的前景暗淡。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4位被告原本想推迟对自己财产的没收，但最高法院拒绝将此案移交至联邦法庭，扼杀了他们最后迫切的希望。结果，夏特沃斯、阿伯纳斯以及约瑟夫·洛厄里的汽车在政府要求的拍卖中被卖掉了。S·S·西伊的部分房产也被查封，要尽快出售。至于阿伯纳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土地，苏利文保留了留置权，而律师们也在四处寻找其他可以依法占有的财产。弗雷德·夏特沃斯依旧对在伯明翰静坐案中自己无能的律师耿耿于怀，他几乎是前脚刚踏出伯明翰的监狱，后脚就走进了紧急会议。作为金指派的会议秘书，夏特沃斯在会议记录中冷淡地指出，这场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律师和其效率”。

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4位被告的心中翻涌着抑郁的恐慌，对他们来说，破产已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了。此外，蒙哥马利市市长詹姆斯还在上诉法庭得到了判处苏利文50万美元的裁决；州长佩特森之后还赢得了更大一笔罚金。对这4位被告来说，他们可以在筹集款项时树立自己被政府打压的谦逊黑人牧师的形象，但岌岌可危的是相对富裕家庭的财富。洛厄里公开告诉自己的同事说，自己的损失在15万到20万美元之间。这是实实在在的钱，是在种族隔离经济的包袱下，牧师们与生俱来的新权利。经济迫害和监狱、暴力一起，让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不得不从南方最棘手的地方撤走了。夏特沃斯转移到了辛辛那提；他的狱友菲佛接管了纽约的教堂；而非佛家最近发生的爆炸也说服C.O.辛普金斯离开什里夫波特到芝加哥去了。面对严酷的现实，金运用巧妙的外交手段，从北部带来了白人律师，替代之前南方的黑人律师。斯坦利·利维森一如往常，目光敏锐，脚踏实地，他认为南方的律师要价过高而且效率低下，以至于利维森在筹集资金时困难重重，所以他非常支持金的举动。之后，利维森便带着新的任命

回到了纽约。

自始至终，利维森都认为苏利文一案既是威胁，也是机会。由于诉讼严重影响了以报纸广告筹钱的机制，利维森便率先践行了直接寄邮件的方法。此外，诉讼也威胁到了南方的劳工组织者和黑人们，于是，利维森也和金逐渐建立了工会支持。反过来说，劳工利益也帮助金吸纳了劳工律师以及宪法专家们。这如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演讲一样，吸引了专业政客的注意。2月，西奥多·基尔主持纽约律师午宴时，尼尔森·洛克菲勒听说了这件事后，给金寄送了一份友好的消息，称“个人非常支持金”。

参加完基尔的午宴，金独自和一位华尔街的律师在酒店房间里见面，那位律师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可脸上却尽是懊悔之情。哈里·瓦赫特尔44岁了，因作为现在企业集团发明家之一的以色列移民梅书拉姆·瑞克里斯的法律架构师而扬名。梅书拉姆·瑞克里斯完善了一种名为融资买入的技巧，并通过这种方法构建了价值5亿美元的商业帝国，其中包含的公司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关联，从贝特斯文胸公司到申利蒸馏室都有。瓦赫特尔善于经商，并不像是会同情金的人，但他用忏悔的语气道出了自己素简的生活。瓦赫特尔说自己的父亲是犹太商人，20世纪30年代时就作为学院激进分子发誓要运用自己的法律学位为受压迫者抗争。但事情并没有像他预计的那样发展，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能与天使共事”。对瓦赫特尔来说，最残忍的讽刺当属他的企业集团——快速美国，拥有几家支持种族隔离的午餐柜台，而这些柜台——包括格尼的、麦克罗力的和麦克莱伦的，至今仍是南方静坐示威者的目标。瓦赫特尔的女儿无情地鞭笞了他的良心，问他如果他不能在瑞克里斯的公司建立最基本的公平，那他的钱岂不是一文不值吗？

备受折磨的瓦赫特尔说自己一直很敬仰金，现在听到金的演讲后，他决定重新抓住年轻时的理想主义，遵从女儿的意愿：他将快速从美国辞职。此外，他还要制造轰动——公开发表声明，抨击北方各种商店业主的虚伪。“只听你一声令下，”瓦赫特尔激动地对金说，“我将辞去工作。”

金犹豫片刻。之后，他平静地说：“我不认为你应该辞职，你不应该为了一个信号离开这样的高位。”金说自己相信，瓦赫特尔留在现在的位置比站在大街上更能帮助民权运动，而因不必放弃事业而深感安慰的瓦赫特尔很快就提出给金提供一些资金，作为第一步。“我愿意贡献 7000 美元。”说着，瓦赫特尔拿出了自己的支票簿，问金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免税机构的名称。

“我们没有那样的机构，”金承认道，“我们让想捐款的人把钱捐到我的教堂。”

瓦赫特尔惊讶地皱起了眉头。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认为这样做很危险后，写下了几个人的名字，说这几个在华盛顿的人能帮金得到豁免，这样就方便了。金应该成立一个基金会，促进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工作中争议较少的方面的发展。在瓦赫特尔提供更多帮助之前，金问他是否愿意进行这项工作。瓦赫特尔回答说自己不仅乐意这样做，而且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把这件事做到最好。

“你明白了吧？”金笑着说，“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瓦赫特尔的热情一下就爆发了，和金一起热烈地讨论起了刚刚酝酿出的工程，说到“那个基金会”时，就仿佛它已经存在了一般。金问是否能为苏利文的上诉安全地筹集资金，说那个案子“尚无定数”，瓦赫特尔回答说这是个很理想的目标。实际上，瓦赫特尔对苏利文案的辩护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如果金同意的话，他很愿意让自己的公司接下这个案子。

瓦赫特尔和金仿佛一见如故。他和利维森这两位犹太律师，注定之后要成为金的左膀右臂。之后几年，瓦赫特尔和利维森形影不离，成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南方员工间的笑谈。他们共同进退，十分和谐，但利维森积极鼓励瓦赫特尔与金的关系，是因为他知道瓦赫特尔能打开更广阔的新世界。利维森认识很多美国犹太人大会的工会职员、空想家和活动家，而瓦赫特尔知道如何联系到政府高官，也知道如何接触公司职员，把 5 位数的捐款带到圣约之子会。瓦赫特尔可谓功勋卓著。

4月10日，利维森在金面前表扬了瓦赫特尔。24小时之后，一份窃听对话记录的总结就摆在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桌子上。“他是谁？”胡佛简单地问了关于瓦赫特尔的情况，他的好奇让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们立刻开始了调查。这个问题以及所有导致这个问题产生的东西，都是金不为人知的生活的一部分——窃听记录、调查、敏锐的政治敏感度让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亲自费神浏览窃听记录的总结。

在监听利维森的技术员以及监督员看来，这件事尤其让人觉得痛苦。电话窃听器的记录器可由来电自动激活，但这种窃听装置需要连续不断的人工监控。根据利维森距离墙体里窃听装置的远近，有时窃听装置传来的声音很大，有时又小到令人发狂。此外，监听人员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由于拜访者们是面对面相见，所以并不会像打电话的人那样说出自己的身份。这项工作很枯燥。联邦调查局严格的报告规定要求监听人员记录每个声音出现的时间——就连咳嗽声、纸的沙沙声以及椅子蹭地的声音都要记下来。就算办公室里很安静，每隔一段时间也要记录。所有的声音都不容忽视，因为其中可能会包含着某种线索。每次监听人员换班时都不得不对利维森办公室中的各种声音进行分辨。他们很快就能分辨出利维森的声音、他秘书的声音以及正常业务往来和闲聊的声音。不久之后，监听人员们就知道了，很多个下午在利维森办公室大谈政治的“克莱伦斯”就是那个从加利福尼亚回到纽约后，就渐渐因金的需要而与利维森逐渐熟络的克莱伦斯·琼斯。他们还发现“杰克”就是杰克·奥德尔。由于联邦调查局的记录显示，琼斯的背景非常可疑，而奥德尔则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共产党员，因此，监督员对这两个人与利维森谈话的内容有着非比寻常的兴趣。克莱伦斯和奥德尔都在调查范围内。他们和利维森的谈话记录在标记了危险记号后，被送到联邦调查局总部，以便分析美国共产党的影响。

沿着这个方向的调查结果简直让人失望透顶。利维森的谈话中满是关于房地产的土地租赁、租金支付以及城市税务上诉等。他和奥德尔和琼斯无休止地谈论

的都是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资金筹集。利维森说的都是可能帮助苏利文一案的工会、捐款者名单、测试邮件以及其他对邀约的润色等。和奥德尔一起时，利维森感叹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亚特兰大办公室的效率之低下以及工作人员的不足之处。和琼斯一起时，利维森则会争辩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诸如哈里·瓦赫特尔一样富裕的支持者——他毫不知情，这些话两天内就促使J.埃德加·胡佛亲自下令采取行动——利维森还反复斟酌可能愿意为瓦赫特尔提出的免税基金会董事会服务的名人。基金会已经成了他的首要工作，由于害怕可能的工会捐款人会认为“基金会”这个词听上去更像是个公司，他还暂时性地以圣雄甘地为之命名，称为甘地基金会。最后，这一基金会成了甘地人权协会。

尽管利维森非常执着，但他代表金做的事却成了被认为是美国共产党代理人处理的世俗之事。对联邦调查局来说，缺少克里姆林式的阴谋并不代表监听毫无用处，实际上，监听能提供可用的政治情报。比如，3月30日，墙里的窃听器 and 电话窃听器同时监听到了怀亚特·沃克打给利维森的电话。电话中，沃克说金想知道利维森对填补最高法院空缺的人选的意见。查尔斯·伊万·惠特克大法官前一天辞职了，而晨报中说肯尼迪总统正在考虑由一位黑人上诉法官——威廉姆·亨利·海斯蒂填补他的位置。金敬重海斯蒂，向利维森寻求建议，想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通过公开声明或通过打电话等“一些渠道”为海斯蒂游说。

“我倾向于让马丁发表一份声明，说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是我们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利维森告诉沃克。在黑人们都在特别期盼有领导人能在这件事上出头的时候，金让肯尼迪总统感到有些难堪也无可厚非。沃克说，由于金对政府的示好收效甚微，所以自己倾向于同意他发表公开声明。之前，金对政府施加的小小压力都直接落在了罗伯特·肯尼迪的身上，而总统没感到什么负担，所以，这次是个好机会。沃克说，还有一件事困扰着金，他担心如果发表公开声明，别人会认为金支持海斯蒂仅仅因为海斯蒂是黑人。对此，利维森争论说，比起报纸上提到的其他候选人，海斯蒂“远远优于他们”。（亚伯拉罕）雷比科夫不过是个

小丑，”利维森说，“他不算是个律师。（亚瑟）戈德伯格在联邦法庭的任职时间有限，且司法不公。而有个人（海斯蒂）却不同，他来自上诉法庭，能力强且资历高。他是合格的人选，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不明白马丁的意思……就算海斯蒂有紫色的皮肤，他也能胜任。”

下午，这次对话约4点钟结束时，负责监听电话和墙里窃听装置的监听人员立即向纽约联邦调查局发出了警报。监听人员征用了速记员，并迅速将部分谈话记录发送到了华盛顿，当天晚上，这份记录就已经堆在联邦调查局高高一摞行动备忘录上了。这可谓闪电般的行动，但它到达时还是晚了：白宫已经宣布肯尼迪总统任命拜伦·怀特为惠特克在最高法院的继任者。胡佛以及他的高级助手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能体会到这种讽刺的人——就是刚刚上任的拜伦·怀特帮助他们拦截到了金对最高法院任命的想法（他鼓动联邦调查局针对利维森采取行动），而也正是他，通过把自己的名字放进最高法庭，宣布了这些想法根本不切实际。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高管决定，“就算已经宣布了对怀特的任命”，也要使用自己拦截到的材料。经胡佛的同意，一份报告就立刻到了司法部部长手中，提醒海斯蒂法官已经和列于多个颠覆性组织名单上的十几条共产党阵线“联系”上了。这份报告还称金就“尝试影响总统任命海斯蒂法官为最高法院法官”一事征求了利维森的意见。这样，利维森机智的形象和其他人文作用都已被削弱，徒留下危险的芒刺——共产党特工利维森曾给黑人领导人金提建议，进而敦促总统提名一个忠诚度值得怀疑的黑人法官。

对利维森的监听给联邦调查局在政治情报方面立刻带来了好处，而胡佛表面上也是无所不知。他似乎知道金曾做过的事，也能出人意料地预测金接下来要做的事。得知副总统约翰逊4月将在司法部与金会面之后，胡佛立即让快递员送出了一封以“亲爱的副总统先生”开头的急件，提醒约翰逊说联邦调查对此事了如指掌。“我想您有兴趣知道，金与利维森和……奥德尔交往过密。”胡佛如此写

道。他还在信中附上了联邦调查局关于利维森和奥德尔的两份简要卷宗。

一周之后，胡佛的快递员又给白宫发了一封以“亲爱的奥唐纳先生”开头的信件。这封信也很讲究措辞，暗示了流言和应对之策。“我想您有兴趣知道，共产党秘密分子斯坦利·大卫·利维森对金施加的影响。”胡佛写道。他公开了联邦调查局通过“秘密渠道”——也就是监听——获得的消息，以及利维森正忙着为金创立新组织“甘地人权协会”。胡佛还说，金和利维森计划5月17日，也就是布朗决议8周年的日子，在华盛顿高级午餐会上宣布甘地人权协会的存在。此外，他还警告奥唐纳，利维森等人准备邀请司法部部长肯尼迪、总统以及无数位高权重之人。胡佛提到的这些名字，都是克莱伦斯·琼斯和利维森讨论时，利维森办公室里的窃听器告诉他的。

收到甘地人权协会相关消息的政客们都对金的邀请函有一丝警觉，他们知道，联邦调查局正盯着这件事。金并没有收到拒绝的回复——只是罗伯特·肯尼迪、林顿·约翰逊、大法官沃伦、休伯特·汉弗瑞议员以及其他很多人的道歉信——但在很大程度上，联邦调查局的影响并非主要原因。对身处高位且崇拜金的人来说，金已经很难说是一个威风凛凛的政治人物了。事情发展得很快，人们情绪波动很大，而焦点则是全球性的。金的道德主义与冷战中期的流行风潮背道而驰。在这种大背景下，胡佛认为，对金的崛起予他人以警告比发起反对金的运动更为必要。实际上，联邦调查局有时也很有约束力。

当然，3天后，当医院内部安全委员会传唤斯坦利·利维森4月24日简短会面时，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非常不满。有些人抱怨说那个“老头”1月时在议会面前提到利维森时太不注意了，公开刺激了参议员内部安全委员会里的种族隔离认识——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和约翰·麦克莱伦。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反对传唤利维森，因为这既危险也非成熟之举。这一举动传达了一种警告，让利维森知道政府正在针对自己，因此他可能会在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装置听到任何有关其行动的重磅消息前销声匿迹。可无论如何，委员会还是发出了传唤令，希望

利维森能说出关于其共产党员这一指控的真相，并详细解释他与金的关系，他的说法可能公开，以排除金这个对南方各机构来说都是威胁的人物。

然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能从参议院同盟那里得到的最多只是严格保密的承诺和商讨推迟3天的决定——商讨中，参议员们同意，只要利维森没有承认颠覆性活动，就绝不会问他关于金的问题。然而，事实证明，委员们却无法从利维森的嘴里撬出有用的信息。在保密的参议员听证会上，面对对自己的指控，利维森只说了一句话：“未解决造成当前这一局面的问题，我要说，我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我自始至终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之后，他便援引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五条，一直保持沉默。他的抗拒让参议员们气愤难当，因为他们极不愿意向联邦调查局承认自己虽然承担了风险，却一无所获。

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装置之前录下了警察局副局长给利维森传唤令时，利维森惊讶的反应，之后也记下了他与律师商量如何应对听证会的商讨过程，现在，一切结束时，窃听装置中传来的是利维森的轻松。第二天下午回到纽约的办公室后，利维森对来电话的人形容了自己的感恩之情——因为根本没人提到金的名字，此外，他还描述了充满敌意的老参议员们生气时，表情是多么的可笑。“麦克莱伦比我更烦心，”他回忆着参议员给他贴上有史以来进出参议员最糟糕的证人这一标签的情景说，“这就是说我比吉米·霍法强多了。”

哈里斯·沃福德正要走出白宫。仅仅是他的地位就足以说服金，由于肯尼迪政府的神经中枢已经对民权运动越来越警觉，所以华盛顿的反对派并不局限于政府中的种族隔离分子。对沃福德来说，这意味着他非正式顾问团中民权团队的会议上有数不尽的事务要办理。很快，与会者就意识到沃福德的白宫发言不代表他是总统的发言人，而是因为总统几乎把所有的民权事务都留给司法部处理了。非正式顾问团一级的权利无可阻挡地流向了伯克·马歇尔手中。

沃福德成了数千支笔的保管人。这些笔都是参与“给杰克墨水”抗议运动的人定期邮寄来的。肯尼迪总统竞选时承诺废除住宅歧视，后来由于“笔的问题”

而延迟签署该项政令，随着这一延迟进入第二年，民权运动的说客便督促其追随者们将“给杰克墨水”的笔邮寄到白宫。他们希望能吸引睿智的总统，但白宫的谄媚者却未能很好地领会这份幽默。看到总统被当作笑料，他们便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沃福德——于是，沃福德变成了任何人的笔没有墨水时首先想到的人。最终，整件事以将剩余的笔捐赠给智力障碍家园而告终。

肯尼迪总统同意沃福德日程上的所有项目，但他如往常一样，并不参与事务的执行。对肯尼迪来说，这些事务远不够吸引人，还让他这个习惯依赖于个人魅力和镇定的人颇感不适。肯尼迪和其他白宫助手在一起时，总会非常愉快，自发加入政治讨论中，但对沃福德，他只是随便挥挥手，带着淡淡的笑意，问：“你们的人满意吗？”沃福德对种族隔离非常热心，所以倒很享受这种微妙的对话。到了1962年春天，萨金特·施瑞弗尔和平部队的融洽气氛对他来说比在白宫谋得机会更为重要。“你这届政府的精神和你的精神让我想离开，开辟自己的阵线。”沃福德在写给肯尼迪总统辞去埃塞俄比亚工作的信中说。沃福德临别的这番话出自真心，因为他相信肯尼迪“在民权运动方面，会继续创造历史”，但首都的权利专家却只看到白宫的民权运动专家都准备动身去非洲那片遗忘之地。肯尼迪总统很抵触沃福德、金、罗伊·威尔金斯和其他人精心策划的请求——想让他派人气颇高的路易斯·马丁前去任职。相反，肯尼迪总统取消了这一职位，并把沃福德的职责分配给了索伦森的油气律师李·怀特。比起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罗科·西西利亚诺，沃福德更了解民权运动，但他们的工作遇到了同一种命运。

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监督董事会议于5月15日及16日在查特努加市举行，31位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董事会成员中有13人参加，金迎接了他们。由于夏特沃斯也在其中，金还提醒每个人参与9月举行的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大型集会，以表示其挑战伯明翰这一冷酷无情城市的决心。之后，他便让自己的助手们就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新任务做报告。怀亚特·沃克描述了“面对面”之旅；杰克·奥德尔具体罗列了选民教育计划补助金及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目标区域新

注册选民的数字；奥德尔非常支持最高法院对贝克与卡尔一案的决定——即命令说在政治代表的分配方面实行“一人一票”制，因此，他预言这一决定对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投票事业是天赐良机，就如同当年教育界的布朗案一样。

塞普提玛·克拉克、安德鲁·扬以及多萝茜·科顿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从“面对面”巡回演讲中招募新成员，并让他们参与登记计划的。他们放映了一段影片，展示了多尔切斯特学校里克拉克的教学过程，其中一个片段还记录了一组中年黑人学习写自己名字的过程。影片播放完毕后，董事会成员亚伦·亨利站起来说公民计划早已在他所在的密西西比区建立了6所小学校，现在看到人们能很快成长，从一字不识到能够登记，真是让人备受鼓舞。

综合讨论时，罗兰德·史密斯牧师把焦点引向了金。“如果想让一个人全力以赴，就应该给他更高的薪水。”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说完溢美之词后，史密斯建议给金涨薪。很多人附议，但一片喧闹中，金站起来表示反对。史密斯打断了他，问道：“你想扼杀我们现在做的事吗？”

“不，”金回答，“我是要证明我的哲学。”

史密斯毫不让步：“我站在这里，表达一个渐渐老去的人的看法。你达到了你父亲曾经的辉煌——你的优势就是年轻。公众不会永远支持你，你必须牢记收益递减的法则。留着你的哲学吧，让大家为你做他们想做的事。我的教众向我表达感激之情时，我从来都拦不住。我知道，如果你是白人基金会的领导人，他们就会付给你薪酬。”

金想借此开个玩笑，说自己确实能从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拿到薪水：每年一美元，足够他健康计划的开销了。但对参与会议的牧师们来说，这并不好笑，而金也立刻严肃起来，说金钱是黑人领导人以及其他领导人的“要害”之一。金说：“人无完人，我经常请求上帝帮助我。我想，金钱并不是我的弱点。”

金的父亲站起来，郑重地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同意我儿子的看法。我想强调几点。我们应该写下来，公之于众。我的儿子有个家庭——3个孩子还有

他的妻子。我的儿子们将得到我所拥有的一切。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与他们一起面对。我知道你们有时会寻求大家的支持，之后再推翻。所以，我想这一点也应该被推翻。”

气氛有些紧张，因为金的父亲竟公开反对自己的儿子。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不仅是因为埃比尼泽教堂的预算可以从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得到额外支持，也是因为金禁欲主义观念下的领导让他的父亲以及其他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牧师们不得不进行防御。董事会成员都默不作声，金将整件事移交给了委员会。接着，他提议选几位“年轻人”到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董事会。金提到的“年轻人”中包括来自萨凡纳的36岁的何西亚·威廉姆斯。何西亚比金大3岁，说他年轻是因为他既没有自己的教堂，而且在这一事业中根基未稳。金还提名了约翰·路易斯，说他让纳什维尔有了新面貌。路易斯沉着缜密，成功地领导了一次次纳什维尔学生反对支持种族隔离的机构的行动——教堂、百货商店、图书馆、餐厅还有剧院。路易斯领导的行动几乎席卷了纳什维尔黄页上列出的机构。

金的父亲站起来，担保这些人肯定会参加董事会选举，不会让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蒙羞。于是，关于年轻人角色定位的讨论触碰了另一根涉及金钱和权威的敏感神经，最后，阿伯纳斯将整件事交由另一个委员会研究后，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董事会会议至此结束。与巨人们沟通的协商进展不大，金便立刻离开，赶去参加第二天在华盛顿举办的甘地人权协会的成立午餐了。

“非暴力这一理念经过席卷南方数百次抵制运动，已经深入人心，”金在演讲中说，“这一理念刻在数千名自由乘车者待过的监狱墙壁上……非暴力抵制对人们来说不再陌生，也不再让他们觉得匪夷所思。”说到议会中的南方代表时，金提出对种族隔离的痴迷不仅在经济上惩罚了白人，也在道德上折磨他们。“实际上，坦白直率地讲……”金说道，“很多南方领导人都被禁锢在自己的手段中，这很可悲。他们很清楚，坚持这种古老而奄奄一息的秩序是在阻碍南方的发展。然而，他们不能说出真相——他们囚禁在自己的谎言中。黑人争取到自由后，那

些压迫他们的人也将初次品尝自由的滋味，这是历史扭曲的悖论。”

为了给这一普通的资金筹集场合增添一抹色彩，金宣布他当天早上已经把《第二次解放宣言》递交到了白宫。《第二次解放宣言》的封面由上等皮革做成，纸页工整地躺在里面，保护大家期望中的历史价值。这份文件不只是纪念林肯的礼物，更蕴藏着雄心壮志。此外，金还说这份宣言将林肯战争时代的勇敢应用到了一个世纪后的当时。他希望肯尼迪总统能像林肯废除奴隶制一样打破种族隔离：出台一份令人震惊且有象征意义的法案，使之跨越权威，超过白宫的控制。金说：“我们要求他宣布所有南方各州所有种族隔离的章程违宪，且他的政府将竭力避免其生效。”

这样的宣言将震动美国政治界，并将让世界为之一震。对金来说，这在争取种族正义方面是符合逻辑且令人叹服的捷径，于是便让志愿律师们——克莱伦斯·琼斯、西奥多·基尔、哈里·瓦赫特尔以及斯坦利·利维森——花费6个月来起草这份文件。此外，金一直要求内政部部长确保新年前夜林肯纪念堂无人占用，以进行林肯《解放奴隶宣言》生效100年的纪念仪式。

然而，金并不走运，在甘地人权协会上的演讲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他仍未能做到明确定义公共议题，因此其他人都无法响应他的号召。那些出席演讲的人不过都是之前崇拜金的人，而他们的反应有时会让毫无防备的金受到打击。比如，金在基督教世纪的朋友们就将甘地人权协会视作金对美国基督教基础的背离。他们在公共场合对金尖锐的批评，迫使金写了一封长篇累牍且痛心疾首的辩白信。“你们认为甘地人权协会是由放弃了上帝和教堂的基督教领导人领导的，”金说，“这简直是荒谬至极。”金一边拐弯抹角地在追随者中保卫自己的基督信仰，一边坚称甘地人权协会是有基督教本质的非基督教组织。他认识到了甘地人权协会在作为公共支持的结合点方面有致命弱点，但为时已晚。这一协会的捐助者大多数是工会，而这些工会的领导人人都知道这一组织是在免税资金的支持下，为苏利文案抗争的工具。

肯尼迪总统组织了一次募捐会，庆祝自己45岁生日。募捐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大约有15000人参加，而玛丽莲·梦露更是出人意料地独唱了“总统先生，生日快乐”。总统并没有答复金起草的宣言，私人信件中也没有提及，但他之后不久就邀请金到白宫参加塞浦路斯马克里奥斯大主教的纪念午宴。金却借由事务缠身拒绝了。

对纳尔逊·洛克菲勒来说，这一年十分艰难。去年11月，洛克菲勒宣布离开相守32年的妻子，纽约政治界和社会界都为之震动，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更是对这次离婚事件津津乐道，将之长留史册。洛克菲勒坚持认为离婚不会影响他入主白宫的可能。面对政治记者对上述说法落于报端的质疑，法律专家们从中找到了洛克菲勒州长最棘手的难题：在纽约州，离婚的唯一理由是通奸行为，而承认这第一点无疑是断送了政治前途；而如果他想在纽约州之外的地方离婚，则必须先成为该州的公民，而根据纽约州的法律，这样做必须放弃州长的职位。洛克菲勒最终说服妻子搬到内华达州生活，并让她同意以“残忍对待”为由申请离婚，尽管她声称这并非其所愿。媒体将洛克菲勒妻子的镇定沉着与洛克菲勒的政治手腕和苛刻无情相比较——他指使手下将官方传记中提到他前妻和二人孩子们的部分全部删除。

屋漏偏逢连夜雨，洛克菲勒的儿子迈克在新几内亚海岸溺亡了。这位州长6月4日到亚特兰大斯佩尔曼学院发表开学致辞时，俨然已成了历经沧桑的模样。然而，不幸似乎追随着他一路向南——他到达时，亚特兰大刚好经历了自内战以来最具破坏性的灾难。一架法航的喷气客机在巴黎附近坠毁，100多位包机游览欧洲之都的亚特兰大优秀市民遇难。一批艺术赞助人都在机上，他们的离世让整个亚特兰大笼罩在阴霾之中，就连原本应举行盛大庆典的黑人区也是阴沉一片。洛克菲勒在斯佩尔曼致辞时，埃莉诺·罗斯福正在亚特兰大大学的兄弟学校演讲，哈佛大学校长也得到了莫尔豪斯学院的荣誉学位。“要求并得到你生而为美国人的平等机会吧！”洛克菲勒对斯佩尔曼的毕业生说。纽约记者们都提到他

批评肯尼迪总统和民主党成员都是民权运动的江湖骗子——说他们竞选时满口承诺，但“缺乏兑现承诺的勇气以及完全而忠实的信仰”。

之后，洛克菲勒去参加了学院校长的午宴，坐在金旁边；晚上又参加了佐治亚州州长共和党候选人爱德华·史密斯的政治性纪念晚宴。洛克菲勒曾要求史密斯在佐治亚州两党民主方面有所保留，但史密斯在回家的路上却由于车祸意外去世了。由于佐治亚州共和党一直以来都是南方各州的政治笑柄，于是佐治亚州共和党成员极力想找到另外一位具有牺牲精神的候选人。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主席在虚假身份的掩饰下建立第二家庭的事实也在夏天浮出水面，让他本人颜面扫地。

洛克菲勒刚刚离开亚特兰大，哈里·贝拉方特就来了，还吸引了目前为止最为广泛的媒体关注。洛克菲勒只是一位在城市各个无名圈子（共和党、黑人以及黑人共和党）中来来回回的富裕州长，但贝拉方特则是一位国际明星，自布朗案那年以来就一直在南方巡回。副市长萨姆·马塞尔将他介绍给了亚特兰大的重要人物。媒体发布会结束后，贝拉方特就带着自己由多种族混合的表演团队到亚特兰大最棒的新城旅馆——卡班纳汽车旅馆入住，他们办理入住手续时也非常顺利。这一极为公开的举动打破了酒店种族隔离的状况，完成了金与贝拉方特众多目标中的一个。

贝拉方特音乐会之前，金曾私下里要求新任市长伊万·艾伦废除市政礼堂针对多种族观众同时出席的限制。艾伦照做了，还清扫了另一障碍。艾伦上任第一天就移走了市政大厅饮水处“有色人种”和“白人”的标志；此外，他还在庞塞·德·莱昂棒球场两个种族联合棒球赛上投出了第一个球。相反，在伯明翰，肤色区别标志依旧高挂着，而且棒球公园也关闭了。那个春天，伯明翰的男爵们不仅没有配合棒球南部联盟联合棒球赛的要求，反而解散了棒球队。金希望传达一个消息——通过教导，亚特兰大拥有了棒球、贝拉方特以及繁荣，而伯明翰则失去了这三样。

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办公室以为会有麻烦，然而亚特兰大卡班纳豪华餐厅国王旅馆的经理们本打算拒绝向任何想在这里用餐的黑人提供服务，无论他是否是名人。警报电话打到了联邦调查局总部，总部又打给了司法部的伯克·马歇尔，而这位金和贝拉方特都不认识的马歇尔则给国王旅馆的主任打了电话，强烈要求他不得拒绝接待这些人。未能成功后，马歇尔又发起了私人游说攻势，以免出现出镜率如此高的领导人被捕事件以及由此而来不可避免的舆论。马歇尔向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报告说：“除非绝对不可避免，警察不会逮捕任何人。金博士以及贝拉方特很快就会离开餐馆，因此，没必要采取警察行动。”

金和贝拉方特满心欢喜地以为音乐会前的午宴早已安排妥当，而发生在国王旅馆的对抗却出乎他们的意料。在匆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金宣布他本应采取静坐的手段反对国王旅馆，但鉴于亚特兰大人民仍为法航的灾难而悲伤不已，便决定推迟进行示威活动，“直到更为恰当的时机”。这一外交姿态让他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了对贝拉方特音乐会积极态度的影响。窘迫的酒店经理也在尽力避免冲突——他邀请金一家人、阿伯纳斯一家人以及贝拉方特表演团队到自己的办公室享用免费的午餐。“我简直兴奋到了极点，也失望到了极点，”歌手米瑞安·马卡贝说，“我从南非来，这让我觉得亚特兰大就像是民主的摇篮。”

对贝拉方特到访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角度——比如这次到访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否受人瞩目以及豪华白人餐厅接待黑人明星是大事还是小事等。金认为国王旅馆的拒绝有非常重大的象征意义，其他黑人可能因此避免同样的羞辱。对金来说，这既是一次失败，也是一次动员，值得就此进行媒体发布会并发表公开声明。然而与这一想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并未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因为他收到了三K党的直接威胁，称“黑鬼金”将在贝拉方特音乐会后他的下一站——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被暗杀。根据种族政治的特殊逻辑，金高调呼吁餐馆应有的礼仪，同时，他平静地接受了死亡威胁，把它当作工作的危险之一。

怀亚特·沃克的确就什里夫波特死亡威胁给伯克·马歇尔打了电话，而马歇尔也立刻给什里夫波特的警察署署长以及地方治安官打了电话。而警察署署长和地方治安官却直白地说当地执法官员并不在意对民权运动领导人严重的威胁，这样马歇尔的处境十分尴尬。然而，勤勉的马歇尔还是一一游说了什里夫波特地区的法官，直到找到了两位愿意调解的法官。最后，法官们都对马歇尔保证：警察们尽管不愿直接对华盛顿长官说，但他们承诺将恪尽职守。同时，金和沃克都不顾什里夫波特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领导人们让金取消出面的要求，一起搭飞机来到了什里夫波特。

什里夫波特的黑人们聚集在小联盟浸信会教堂，面对把C.O.辛普金斯吓出城的爆炸案，他们表示了自己对选民登记项目的支持。怀亚特·沃克看到教堂周围有一队警察，于是便向伯克·马歇尔表示了感谢。赞美诗过后，有人开始对金进行一系列介绍，这时，沃克走出去和当天下午刚与马歇尔进行过不愉快对话的警察署署长厄尔·唐斯聊天。唐斯命令沃克回教堂去。“好吧，长官，”沃克回答道，“但我得告诉你，教堂后面也应该有警察在。”也许是沃克高官一般的举止，也许是他随身带着的各种细节的书写板，反正一下就惹怒了唐斯。于是，唐斯命令手下以在教堂台阶上逗留为名逮捕了沃克。教堂里的集会仍在进行，可沃克已不知所终。当天晚上以及第二天大部分时间，沃克都被单独监禁在囚室中，之后，他接到了一份吓人的通知——他只能和地区验尸官斯图尔特·德利联络。德利来了两次，按照对外宣称的目的对沃克进行询问，以评估其精神状态。他问沃克相信取消种族隔离是正确的已有多久，还有他是否认为有人要对他不利。

沃克刚被释放后，他既没有时间抗议，也没有时间反思，而是直接飞去芝加哥，与比利·格拉汉姆代表进行为期两天的探索性交谈。这几次私密谈判无疑会让政治界及宗教界的大部分专家倍感讶异，因为在公众的意识中，白人福音传教士和黑人运动是不同的两个部分。自布朗案决定以来，关于种族隔离的争论从未休止，而格拉汉姆却一直勤勉做事，相对泰然自若，将副总统尼克松应用于政治

上的方式用在了宗教上。实际上，格拉汉姆和尼克松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逐渐熟识，以一种共生的关系出现在对方的领域中。这种共生关系是金之前期盼能与两个人建立的关系，尤其是与格拉汉姆。但格拉汉姆会对尼克松敞开心扉，却不会这样对金。他认为金的信条是金自己的，而金也以一种专业的态度尊重格拉汉姆不涉及教义信条的布道。尽管两人从未在公开场合共事，但他们私下里会通过各自的助理人员合作。

金让沃克和昌西·艾斯克瑞奇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格拉汉姆如何在宗教外的领域获得如此受人欢迎的公众形象，以及他如何能在公开露面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保证其大型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即将进行的芝加哥改革运动的总部公民歌剧院大楼里，格拉汉姆的媒体顾问沃尔特·本纳特直言不讳，说金的整个方法都是错的。格拉汉姆每年只参加几次改革运动，但不只吸引了宗教界的媒体，也极大地吸引了其他媒体的目光；而金将自己的经历分散在无数演讲中，可听众却相对较少。本纳特说，金飞快地穿梭于城市之间，他的知名度几乎完全取决于那些极富同情心而且能跟上他脚步的记者。这种宣传基础对任何牧师来说都很薄弱，对黑人牧师来说更是如此。据本纳特的判断，金追求下一次转变以及下一次小型资金投入的做法可谓是目光短浅，因为这会让金打破与媒体之间的联系。本纳特说以自己的专业眼光看，按照目前的节奏，金 5 年之内不是会心脏病发就会过劳而死。沃克和艾斯克瑞奇在写给金的报告中，特意强调了这一可怕的预言。

第二天，比利·格拉汉姆的参谋长沃尔特·史密斯详细讲述了格拉汉姆在福音派情报技术方面的历史创新，为沃克和艾斯克瑞奇提供了更为实际的建议。沃尔特·史密斯说员工们提前一个月就开始为芝加哥改革运动做准备了。他们拟写了一份名单，列出了 8000 名住在芝加哥附近的牧师，而这些牧师给出的反馈帮助员工们选出了改革运动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 10 位“船长”牧师，每位“船长”还配有 5 位“副官”牧师。同时，女信徒组成的平行组织负责到芝加哥每家每户进行游说，为改革运动招募听众，还选择在格拉汉姆专门进行广播

祈祷时拜访。同时，格拉汉姆的其他员工负责安排城市公交系统，以便晚上开会时，与会人员的往返。史密斯解释说，一次成功改革运动的背后大概需要 100 万个工时来准备。他安排了一位助理向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传授格拉汉姆团队积累起来的专业经验。然而，助理讲到的所有方面都没有提到要如何超越最重要的种族障碍，但无论如何，沃克还是向金提供了许多实际的方法。

有时，金仍会希望，通过模仿格拉汉姆的福音派方法，他能偶尔在某种程度上避免自蒙哥马利抵制运动以来那种让人心动的方式。怀亚特·沃克与格拉汉姆的代表共聚芝加哥时，金飞到了纽约，在 39 大街搭乘出租车到了第五大道附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听到斯坦利·利维森办公室的窃听装置中传来绝不会弄错的马丁·路德·金本人的声音时，肯定惊讶得坐不住了。

没提前约定就来了的金立刻和利维森攀谈起来，仿佛两个人每天都在一起工作一样。他们谈论的都是业务上的事——资金筹集活动、演讲，还有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中的人员问题。金告诉利维森，有个员工经常与怀亚特·沃克针锋相对。他说上次贝拉方特音乐会的花费只使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纯利润降至 9600 美元，还问利维森由贝西伯爵主演的晚餐，一盘餐点 25 美元是否要价过高。利维森说 25 美元确实“很夸张”，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年度晚宴上每盘餐点的价格为 50 美元。利维森说金能接受自己的建议，出于对亚特兰大飞机坠毁遇难者的尊重而没有对国王旅馆的对抗进行抗议，他感到很高兴，而金也承认说那种做法是明智的。

金通常会对新的支持者或潜在的支持者说尽溢美之词，然而金给利维森的评论非常简短，只是简单的同意或批评。利维森问及金是否喜欢自己为其在 7 月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言准备的草稿时，金回答说自己觉得还可以。两个人交流时言简意赅，根本没有提及危险、精神创伤或激励性的信念等，仿佛早已心照不宣。他们坦承金现在需要获得更高的公众认可度。金充满希望地说自己可能会上电视，利维森也问了《新闻周刊》的记者们有没有再次采访他。他们两个人像在牧师书

房中谈话的朋友一样，只不过和公事公办的利维森在一起，缺少一些轻松的氛围和讲坛故事罢了。

对联邦调查局来说，双方会面的重要性是金受一个美国共产党员的影响这件事确凿无疑。第二天，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命令联邦调查局在纽约州、佐治亚州以及亚拉巴马州的办公室确定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是否符合慈善组织的合法登记条件。他还命令调查员们调查利维森或奥德尔的名字是否出现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办公用品上。此外，胡佛还指示纽约办公室的调查员调查“通往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大门上是否也印有奥德尔的名字”。一开始，胡佛对证明利维森案或奥德尔案的实质并没有什么兴趣——无论是记录他们听命于苏维埃特工的文件还是他们参与了针对美国的背叛、暴力及明显是报复的密谋，胡佛都没有在意。但从一开始，也正是胡佛发出了保密的警告，暗示说几十年来，他对民主责任的看法向王室狡猾的虚荣让路了。“所有关于这件事的调查报告都必须通过最秘密的方式提交，”胡佛命令道，“以免泄露线人的身份或让联邦调查局陷入尴尬的境地。”

那一年春天，利维森的重点一直放在怀亚特·沃克身上。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器听到了他与克莱伦斯·琼斯通话时说沃克“比马丁手脚更快”，也就是说沃克已经做好了破釜沉舟承担苦难的准备，而且他不像金那样在意会使人麻痹的衍生物。利维森回忆说自己和金在自由乘车运动，决定让沃克进监狱时，他们都知道沃克会毫不犹豫地同意，因此，利维森对沃克的勇气大加赞赏。然而，尽管如此，利维森还总是提到沃克是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经验不足的行政长官，因为他“尽管十分杰出卓越，但情绪上并不成熟”。与利维森谈过话的人也如此认为：沃克雄辩机智，却反复无常，而杰克·奥德尔则可以称得上是苦难中孕育的奇迹。

利维森建议金给沃克和奥德尔调动工作，让他作为金的公关人员或者履行助理——金同意了，因为那是沃克的天赋所在——而奥德尔可堪担当管理亚特兰大办公室的重任。利维森刚刚通过了参议院关于忠诚度的听证会，说考虑到

奥德尔与共产党员的关系，他不想这样高调地与之会面，但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中，奥德尔是管理亚特兰大办公室的不二人选。利维森后来给奥德尔打电话说金支持自己的建议时，联邦调查局听得一清二楚。利维森说，金在处理与美国共产党关系时采取的是道义之法，至于麦卡锡式的攻击，用金的原话说就是“无论他是什么人，只要他能站出来说自己并未参与其中，那在我看来，他就可以为我工作”。

这样的态度对胡佛来说难以忍受，因此，胡佛立即将监听到的对话给司法部部长肯尼迪寄送了一份。抛开利维森对奥德尔和沃克的个人评价不谈，胡佛暗示说利维森绞尽脑汁想让奥德尔获得金的信任，唯一目的就是扩大美国共产党的影响。表面上看，胡佛的备忘录不过是情报工作，但其中却饱含着额外的警告。胡佛写道：“利维森还说如果奥德尔和金会达成协议，那金很可能要与您会面，让您‘解雇这个人’（奥德尔）。”这最后一行既让司法部部长受益，也向他指明了联邦调查局情报在美国共产党意图方面的调查对象。如果肯尼迪答应了金的请求，“解雇”了奥德尔，那他就和金一样，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利维森控制下，明知故犯的骗子。间谍的世界与法庭不同，利维森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让肯尼迪堕落，而肯尼迪在面对与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共谋或放纵其行为的指控时，将会毫无反抗力。

7月上旬，罗伊·威尔金斯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会议地点改在了亚特兰大，这是金从克劳泽学院毕业那年——1951年以来的第一次。来自42个州的1000多名代表继哈里·贝拉方特之后来到了亚特兰大。大家进行了一些抗议活动——代表们围住了“约翰·雷布”餐厅，有秩序的团队还举起了写着“南方已有12个城市建成了‘开放’酒店，亚特兰大为什么不照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字样的牌子——但威尔金斯给《危机》杂志奠定了基调，说这次大会是“勤劳的大会”。“我想强调一下，我们到亚特兰大是来开会的，要讨论的正事很多……”威尔金斯对记者们说，“尽管在一家餐厅进行静坐示威有其心理上的重

要性……但这并不是本次大会的主要任务。”

詹姆斯·梅瑞狄斯作为可能被密西西比大学录取的第一个黑人出现在了大会上。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纳布里特在7月4日的烧烤晚会上发表了主要致辞。金也作为午夜演讲人之一进行了发言。尽管C.A.斯科特的《世界日报》刊登了十几张大会的照片，但一如既往，金的照片并没有出现。此外，金也是唯一一位照片没有出现在《危机》杂志中一周要闻上的主要演讲人。以上皆是一种信号——一些人觉得难以捉摸，另一些人觉得明显直白——金依旧是前辈领导人的眼中钉。金本是杰出非凡之人，按道理讲，至少应该拥有一个布道坛，而且布道坛就是他唯一需要的。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说金是美国“唯一一位指纹比照片多的名人”。

“真正的和平不只是紧张局势的缺席，而是正义的出席，”金对听众们说，“我想这就是耶稣某天看着自己的信徒们说‘我来非施和平、乃兴戎耳’的含义。显然，耶稣并不是说他带来了真正的刀剑。显然，他并不是说自己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但耶稣实际是说：我的意思是无论我何时到来，新旧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无论我何时到来，公平与否的敌对在所难免。现在南方的紧张状态是必要的，因为被压迫者正在崛起，朝着永恒而真实的和平进发。”

片刻后，金将主题转移到了内部敌对情绪上，说公开讨论民权运动内部的角角之争的“时刻已经到来了”。金向代表们回忆说自己“已在20多个州宣传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章程”时，十分悲痛。金还说，很多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领导人同样也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导人。游行运动和抵制运动“应通过法庭减少工作量。但法律和法庭命令只会宣布权利，而他们永远不会完整地传达权利。只有人们自己开始实施权利时，一纸文章才会变得鲜活生动”。

金试图用自己个人信仰的热情燃烧所有分歧。他指出非暴力运动就是解决之道。这是超乎寻常的钥匙，是联结鸿沟的桥梁。“这就是非暴力运动的美好之处，”他说，“你可以抗争而不心怀仇恨，你可以抗争而不必使用暴力。这就是

站在运动的中心，我们感受到的爱的本质。”金的方法坦率直接。这一方法可谓民主，因为它尊重了民主的信仰，即人人生而平等。“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一个人的良心告诉他某项法律是不正义的，而他也决定要破除这条法律并接受由此而带来的后果，那一刻，便是他对法律表达最崇高的敬意之时。这并非开天辟地第一例。如果你愿意，请随我回顾《旧约》。看，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站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的面前。他们清楚明了地说：‘我们不会鞠躬。’再翻开《柏拉图对话录》的《克里同篇》或《申辩篇》，看，苏格拉底就在践行非暴力反抗，而当今的学术自由当归功于此。再来到早期基督教时期，看那些基督徒宁可葬身虎口也会坚持信仰。听，彼得说：‘我们遵从上帝而不是个人。’请放眼当今世界。不要忘记，希特勒在德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安慰并帮助犹太人才是违法。我想，如果我带着现在的态度生活在当时的德国，我肯定不会遵从希特勒的命令，我会鼓励人们安慰并帮助犹太兄弟们。如果我现在生活在南非，我将与卢图利主席共进退，做到他对人们说的那样——‘打破这条律法。不要背负着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去到你必须要去的地方。反抗这些法律，撕碎它们，把它们丢在风中’。”

之后，金慷慨激昂地用3个词结束了自己的讲话：“所有人；在这里；现在。”掌声排山倒海而来，群情激奋之间，金只能插进一句话。“我们想得到应有的权利，”金大声喊道，“我们希望就在这里得到自由——在美国、在密西西比黑人区、在亚拉巴马州的棉田中、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大地上得到自由。我们受够了渐进主义，都知道那不过是无动于衷主义，是逃避主义，最终只会变成停滞主义！”这句仿学究式的黑人人权主义话语让大家不禁笑出了声。“不，我们不想再等了，”金高声说，“我们现在就要自由！”这句话引发了一阵混乱，金对迫害和死亡之间相似性的郑重重复才让人们渐渐平息下来。最后，他用先知们华丽的激励之语结束了自己的演讲。金再次做到了——走进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会堂，带走了一群人的心。尽管他的召唤在精神和方向上都引起了全国有色人种

协进会领导人们的反对，但无可指摘，因为其中蕴含了巨大的能量和微乎其微的异端邪说。

金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在白人世界中引起太大反响。如他生活中许多触目惊心的场景，这仍取决于在新闻工作者看来，它是否跨越了种族界限。此外，唯一能调动双方听众的戏剧性的事就是看到白人警察抓住金的身体。尽管民权运动的追随者们对金是否曾参与自由乘车运动的印象并不深刻——因为金并未因此而逮捕，但普通公民和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们都知道金去里兹维尔的危险之旅。金进监狱可是一桩新闻。

金被关进监狱的事可能发生在什里夫波特或“面对面”登记之旅的任何一站，但金以为这一重苦难会发生在奥尔巴尼。日程表上，自去年12月在奥尔巴尼的大街上被捕后，金又在7月10日上画了圈，因为当天也要出庭。通常，如果有收入的人犯了这种小错，德登法官都会对其免于处罚或延迟审判——如果不是出于仁慈，那就是让奥尔巴尼免受把金关进监狱的议论之苦。然而，从过去7个月中奥尔巴尼政治界突然面临的严峻情绪看，这似乎不太可能。金刚进监狱不久前，佐治亚州民主党主席詹姆斯·格雷就给《奥尔巴尼先锋报》专门写了一篇封面文章，抨击奥尔巴尼黑人们的抱怨是“‘弥天大谎’下希特勒式的策略，黑人们都在说谎。司法部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卑鄙的行动定会失败，就如黑人煽动者密谋数月的狡猾奸诈之法会失败一样。而他们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动机是邪恶的”。

金几乎无法期望能从这样的城市中得到宽容。他和沃克、阿伯纳斯开车参加听证会——重新走过尘土飞扬的街道，再次听到示罗浸信会教堂里清唱的赞美诗时，金对自己的秘书多拉·麦当娜说，自己很可能无法参加华盛顿的全球新闻俱乐部的活动了。德登法官的判决证明了金是正确的——他判决金和阿伯纳斯要么上缴178美元的罚款，要么就在监狱里度过45天。金和阿伯纳斯都不愿意向非正义的事妥协，说愿意蹲监狱。他们两个人在监狱中初尝苦难时，多拉·麦当

娜则在亚特兰大撰写报告，记录下自金被捕的消息发出后，淹没了金办公室的电话。她写道，一个华盛顿的记者听说金被捕入狱后，“震惊到无以复加”，而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位成员只想知道为什么金不能等到7月19日讲完话之后再进监狱。麦当娜告诉金自己已经安排好了，金能在狱中收到《亚特兰大宪政报》，而阿伯纳斯则可以收到《纽约时报》。“您和阿伯纳斯牧师今天一定会为我骄傲，”麦当娜写道，“我没哭——一滴眼泪都没掉。”

第十六章 救火队员最后的缓刑

金和阿伯纳斯进监狱的那天刚好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天——通过电星1号通信卫星，人类首次实现了跨大西洋电视直播。晚间节目上，法国以及美国的三大电视网络同时播出了一幅画面：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与激动的科学家坐在小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盯着电视里的自己，缅怀纸媒时代的衰落。信号回传时，法国当局只是简单地选择了伊夫·蒙当演唱《一首小歌》时的照片。与歌曲节奏相比，电波传来的照片确实微不足道，《泰晤士报》的文章称赞“其重要性可与100多年前塞缪尔·F.B. 莫尔斯拍发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电报比肩”。

这一先进的科技还未普及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在奥尔巴尼的电视记者仍旧不得不在午后时分停止工作，好带着刚曝光的照片搭乘专机回到亚特兰大，通过那里的设备将新闻胶片传送到纽约，以备晚间新闻之用。只有重大事件才配得上如此昂贵的方式，也就是说偏远地区的戏剧性事件必须要达到足够紧要的程度，而金被捕入狱的时间还不够成为电视新闻。

但这一事件的确引起了传统阵线的震动。《奥尔巴尼先锋报》的头版用辛辣的标题《金在牢狱中备受折磨》报道了这一消息。此外，电星公司发行全国的报纸也对此进行了报道。《纽约时报》中的消息则提醒了读者，金上一次入狱对196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有重大影响。而《先驱报》和《泰晤士报》都着重提到了谋求总统之位的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已经发了电报，敦促司法部部长肯尼迪“必须保证金博士及其同伴的人身安全”并“调查其行为是否违反了宪法关于和平集会的规定”。第二天一早，几位新闻编辑就给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打来电话，《纽约时报杂志》的哈维·夏毕洛就是其中之一，他希望能刊登一封金“在狱中

写的信”。多拉·麦当娜立即将夏毕洛的请求汇报给了昌西·艾斯克瑞奇，而中午时，艾斯克瑞奇已在和比利·格拉汉姆的公关专员一起分析此事了。公关专员的建议是“人在狱中时万不可发表任何言论，一切都要等到被释放之后”——这一建议使得接下来一年内反复出现的金的《伯明翰狱中书信》推迟了发表。

当天上午，安德森博士将奥尔巴尼运动的支持者召集至示罗浸信会教堂，为其打破种族隔离“不可错失”的机会做准备。然而，他的演讲却遭遇了冷待。前一年的游行示威情绪几乎已被几个月的等待消磨殆尽，而且他的听众或许早已对严酷的现实感到麻木——这个城市竟敢把名声在外的金关进监狱，而对金的指控正是这里 700 多个人仍背负着的。无论如何，只有 32 个人站了出来，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金的朋友以及 C.K. 斯蒂尔的劝勉激励。金在蒙哥马利领导公交抵制运动时，斯蒂尔就在塔拉哈西进行同样的事。出发之前，身材并不高大的斯蒂尔牧师在教堂内进行了最后的祷告：

旧日时光里

两个人

并肩前行的画面

让我们倍感亲切

我们要围绕

监狱的围墙游行

因为那是隔离的象征

我们将围绕它游行

像约书亚一样

直到这堵围墙

轰然坍塌

请照拂我们

请照拂警察们

请照拂普里切特警长

请照拂市长

还有城市委员会

我们要祈祷

让他们看到虔诚而和平的心灵

感动他们的内心

亲爱的上帝

我们将为世界献身

上午 10 点 53 分，大家在斯蒂尔的带领下朝关押金和阿伯纳斯的监狱走去，那两个人正在狱室中探讨因入狱而取消的行动。在记者们和旁观者的注视下，这 30 多人被捕了，他们高唱着《我们终将胜利》，希望被关押的人们能振奋精神。

在华盛顿，晨会时，记者们都纷纷询问白宫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总统会为金采取何种行动。新闻角度非常明显：已成为总统的肯尼迪是否会比 1960 年还是候选人的他做得更多？这一天结束时，塞林格宣布肯尼迪总统已要求司法部部长准备关于金的完整报告。私下里，总统给正在宾夕法尼亚州波科诺山鱼塘度假的伯克·马歇尔打了电话。对马歇尔来说，与总统这一难得的联络值得庆贺，但肯尼迪却倍感困扰。在当天的几次通话中，总统要求马歇尔与在亚特兰大的柯瑞塔和在奥尔巴尼的政府工作人员通话。本质上说，这一策略是让马歇尔扮演 1960 年竞选时富有同情心的角色，而肯尼迪兄弟则置身事外。

肯尼迪总统还接听了詹姆斯·格雷的电话。詹姆斯曾是他的大学好友，现在则是佐治亚州民主党的主席。格雷在电话中说，州长凯里就站在他的办公室里。“杰克，我们把马丁·路德·金关进监狱了，”他说了这件众所周知的事，“媒体今天可谓大显神威。我们不想把金关进监狱，但我们能做什么？他毕竟违背了法

律。我想对你说，如果你能派人过去把他带出来将再好不过。”

总统也认为把金关进监狱并非好事，但他并不愿意运用总统特权把他放出来。面前的僵局在政治上非常微妙：金拒绝向种族隔离妥协；奥尔巴尼运动拒绝向种族隔离妥协；而政府却决定要保持老练的控制形象，不受任何一方强加而来的干预。这些束缚就要求必须有信任和秘密地计谋。肯尼迪总统答应派一个人到奥尔巴尼，还让格雷立刻与司法部部长商谈此事。中午时分，匆忙选定的代表格雷的特使就已经搭上了到华盛顿的飞机。

B.C. 加德纳是市长凯里的三人法律公司中的元老人物，负责贝克县附近、伊楚威种植园以及同事不愿负责的大部分事务。加德纳的父亲是位法官。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 1958 年他在格雷的私人派对上与参议员约翰·F. 肯尼迪握手的照片。作为奥尔巴尼非官方大使，加德纳带着罗伯特·肯尼迪完全同意的信息。他们认为，金的入狱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难堪——对奥尔巴尼来说是，对肯尼迪兄弟来说是，对佐治亚州来说是，对举世关注的美国来说更是。因此，必须要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终止这件事。加德纳当晚飞回家，心里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示罗浸信会教堂里正进行着一次大型集会。大约 600 人重新找回了去年 12 月多次集会时的激情，现在，夏日炎炎，人们拿着印有《圣经》图案的扇子扇风，还不时用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示罗浸信会教堂外面，一小群在酒吧间的黑人和傍晚出来喝酒的人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警察们赶出哈莱姆区，便开始朝警车扔砖头和酒瓶。打在金属车体上发出的第一声巨响吸引了周围几个街区的注意。出于潜规则，当局对城市里黑人们在哈莱姆区的某些行为予以默许——金和其他游行示威者是越过了奥尔巴尼黑人白人的分界线才被捕——但现在，面对出现在黑人住宅区的警察们，敌意自然而然地爆发了。尽管警察们全副武装，但人数上很不占优势，于是只能在随机的攻击中寻求庇护之所。暴力行动的喊声和攻击声引得示罗浸信会教堂中的人鱼贯而出，他们高声喊着，试图让那些人冷静下来。

普里切特警长和自己被围攻的手下挤在一起，手下们早已在摩拳擦掌。普里

切特命令手下控制反击的情绪，然后让自己最信任的手下埃德·弗兰德队长跟着自己一起走进充满敌意的黑人中。“就算你被打了，也别停下来还手。”普里切特对弗兰德说。之后，两个人奋力走到示罗浸信会教堂中的前门附近。普里切特大喊道：“老兄，我要进来了。”艾曼纽尔·“布”·杰克逊——奥尔巴尼运动非官方会议警卫官也大声回答说：“进来吧！”接着，两位警察就穿着全套制服、腰上挂着枪走进了黑人的会议室。斯莱特·金的声音压过了这片混乱：“我看到普里切特警长进来了！”当他让出示罗浸信会教堂的首席讲坛时，人们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普里切特慢慢往里挤，一个声音喊道：“我们给他一点掌声吧！”接着，热烈的欢迎持续了整整半分钟。外面的人本以为会听到愤怒的言语，甚至是枪声，但现在他们不明所以，只能面面相觑。

普里切特走到讲坛时，脸都红到了耳根。“感谢你们给我站在这里的机会，”他半笑着说，“经常有人告诉我，我很受欢迎。但我却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记者派特·沃特斯尽管很钦佩警长的勇气，但还是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了复杂的情绪。沃特斯认为，那个声音里蕴藏着感激和尊重，甚至还透着些许友谊，不过其中还有一丝半幽默式的讽刺——在沃特斯看来，那只是普里切特维护种族权威的保护伞而已。“我从未打断你们和平的机会，”普里切特开始讲话了，“很多人误解了你们非暴力的哲学，但我们尊重你们的政策。我请求你们一道共筑和平的奥尔巴尼，但扔砖头并非友善之举。”人们再次鼓掌。普里切特一直提心吊胆，直到再次回到教堂外警察们中间。弗兰德队长双腿直颤。“警长，再也不要让我进去了，”他试图挤出一丝笑容，“只有洗衣工才知道我有多害怕。”

扔石头的人逐渐离开后，斯莱特·金回到了示罗浸信会教堂的讲坛，发表了带有冲突的评价。一方面，他对大家秉承非暴力的宽容精神而欢迎普里切特警长的做法表示赞许，这证明了在教堂里的奥尔巴尼运动人士和外面的暴徒不一样；另一方面，有些人已经显露出对普里切特奉承式的崇拜，他对此表示遗憾。他说，这就是种族隔离的根源。毕竟，他们示罗浸信会教堂开会的目的就是劝说人

们挑战普里切特的权威，自愿到他的监狱里坐牢。“我们要尊重他，”斯莱特·金说，“但不是像尊重上帝那样。也许这件事错在我。这是我们不得不适应的体制——就如同我们已经被洗脑了。”

那天深夜，普里切特和奥尔巴尼卓越的白人公民都在自我反思。B.C.加德纳从华盛顿带回一个可怕的建议：他们应该悄悄替马丁·路德·金缴纳罚金，接着把他带出监狱。加德纳解释说，这是唯一的办法，他们必须做好说谎的准备。如果奥尔巴尼的管理者先把金投进监狱，接着又花钱替他缴罚金的事为人所知，那么城市的管理者就会沦为别人的笑柄。对以南方荣誉典章自豪的人来说，说谎令他们难受——但更令他们难受的是，他们竟是因为一个黑人而不得不接受这一糟糕的做法。然而，他们并不能在释放金这件事上向肯尼迪兄弟施加压力，否则奥尔巴尼就是彻底败在了联邦政府手中。他们为了金，并没有干预，也没有走漏消息。从战略角度出发，他们同意了这一计划，保证绝不泄密。罗伯特·肯尼迪说请他们记住，金在监狱里的每一天，国家安全以及美国的声望都备受煎熬。肯尼迪的一席话让他们成了爱国主义的奴隶，显然让这场骗局变得可以忍受，甚至都有些高尚了。普里切特警长就减少计划中谎言成分征求了市长凯里的意见。接着，他叫来了接待警员，严肃地指示他要如何释放马丁·路德·金。

第二天是7月12日，早上，B.C.加德纳带着356美元出现在监狱冷清的接待台前。“这是马丁·路德·金的罚金，”他说，“把他带出来。”在预先安排下，那位警员没有把收据给加德纳，而是带给了金和阿伯纳斯。之后，加德纳走了，因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早上7点30分，普里切特派人到监牢区找金和阿伯纳斯，让他们换好衣服到自己的办公室会面。金和阿伯纳斯以为换衣服是为了见身份尊贵的中间人，但到了后，普里切特却说他们的罚金已全部交清，他们可以走了。实际上，不是可以走，他们是不得不走。

两位目瞪口呆的牧师要求普里切特给出解释，但普里切特为避免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暴，只给出了常规反应。他说自己只知道狱守说“一个身份不明、穿着得

体的黑人男性”交了罚金，要求不得透露身份，所以普里切特也没有继续追问，以免狱卒受到报复。普里切特的两名侦探开车把金和阿伯纳斯送到了安德森博士家。他们刚到，怀亚特·沃克就重重关上了门，把闻风而来的记者们挡在了外面。不过，记者们还是偷听到了关于事情真相的激烈争论。是否奥尔巴尼的白人与这里某位颇负名望的黑人勾结？如果普里切特在说谎，那谁能证明？

上午，金在示罗浸信会教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这次被释放，我很不高兴。”金说。他谴责了释放他的这种“偷偷摸摸而且视而不见的手段”。但他还安慰大家说，无论如何，普里切特警长已经保证针对去年12月另外700位示威者的指控均已撤销，且由黑人和白人共同组成的委员会将解决更大的争端。然而，在城市的另一边，普里切特却在他的发布会上说“并没有关于任何事的和解要进行”。凯里市长说自己不知道是谁缴纳了罚金。接着，为了让自己更心安，他换了一种说法，说“关于此事，无可奉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凯里都顽强地坚持这一说法。

华盛顿方面，罗伯特·肯尼迪对记者说：“金博士的释放使奥尔巴尼人民能在相对缓和的气氛中解决自己的问题。因此，我非常高兴金博士被释放了。”他的说辞暗含着对那些把种族隔离视为地区事务的奥尔巴尼白人的默许和认同。肯尼迪的新闻发言人埃德·格斯曼对记者们保证说替金交罚金的人并不是罗伯特·肯尼迪——不是肯尼迪总统，也不是联邦政府中的任何官员。为了与1960年金被捕入狱后肯尼迪的表现保持一致，格斯曼披露说伯克·马歇尔给金的夫人和其他人打过电话，他说可能是这样才有了现在这种结局。

在奥尔巴尼，只有那些最为愤世嫉俗的人才没有对金的释放感到震惊。《先锋报》称有关之后将进行谈判的小道消息并不属实（“政府永不会在黑人问题上妥协”）。为了消除自己与华盛顿方面对立的嫌疑，市长凯里公开批评了司法部“与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合作密谋，违反奥尔巴尼现有法规”的行为。他的谴责引来司法部的一片否认之声。私下里，司法部官员们已经因联邦调查局的过度

曝光以及管理范围的官僚主义之争而精疲力竭了。

走出监狱的金很快就失去了影响力。肯尼迪政府把他当作陌生人，而一直批评他的人长久以来积攒的冷嘲热讽现在也铺天盖地而来——他被排挤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纽约时报》发表简报称金已经游离在政治圈子之外了。《泰晤士报》的消息称“不幸的是”金的“组织能力不足”，此外，通讯员还说金的“主要问题”是他下定决心把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打造成独立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组织。全国的媒体都纷纷猜测金那位神秘的匿名资助人。《新闻周刊》称这一事件是“佐治亚州的侦探事件”。《奥尔巴尼先锋报》则拟写了这样的标题：“市长成了哑巴”和“谁把金捞出来的？”，得意地嘲笑这种无赖的手段。大多数媒体都接受了官方对这一交易的说法，开始探求谁才是“穿着得体的黑人男性”，谁才是同谋。没人想过要详细查证官方的说法。B.C. 加德纳的名字从未浮出水面，而普里切特警长的说法则成了真相最行得通的解释。

金花了整整两周才再次回到监狱。他认为自己回到监狱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因为为了他游行的 32 个人中的大多数依旧被关在狱中。看上去，仿佛是他自己把他们带到了陷阱中，却只身逃了出来。但由于奥尔巴尼的支持者们已经麻木，不想再跟随他，所以他并没有马上回到监狱。6 个月平静的示威只带来了滑铁卢式的挫败，而当地白人似乎也到了最强硬最不肯妥协的阶段。詹姆斯·格雷宣称，奥尔巴尼运动只带来了城市公交系统的瘫痪、圣诞庆典游行的取消、“黑人工作和钱财的损失”，还致使了“近 800 个人进了监狱——其中很多人都是黑人社区长久以来受人尊敬之人的孩子——现在却有了犯罪记录。这就是教导年轻人认识自己国家的方式吗？”有些奥尔巴尼的黑人，向失望或恐惧屈服了，被格雷的说辞打动，认为金才是问题的根源。

为了恢复失去的动力，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们首先签发了一份名为《奥尔巴尼宣言》的文件，声称在过去 6 个月中，奥尔巴尼的领导人以一种恶劣的态度对待黑人。白天，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派出几个小组，分别到市图书馆和各个公

园检验种族隔离的情况。所有人都被警察拦下了，其中很多还被捕了。每件事情都表明打破黑人的种族界限并不像格雷和其同事们说的那样容易。晚上，人们越聚越多，大有超过去年12月聚集人数的趋势。

金7月19日飞回了华盛顿，到全国新闻俱乐部演讲。记者们记下了确切的时间——午夜12点35分——那时，金走进已有54年历史的新闻俱乐部，成了第一位美国黑人演讲人。俱乐部里的听众非常欢迎他，自发地站起来致敬多次。尽管金在关于非暴力运动的好处等方面的演讲相对坚定生硬，但很多人对于打破种族隔离这件事都感到很高兴。而且，能听到如此崇高的演讲，大家也都很骄傲。这件事明显说明了发生在金身上的讽刺：他甚至能激励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成员，却无法让自己的运动在报纸上占据一席之地，除非发生流血事件或政治奇迹。媒体对这次演讲的报道不多，更没怎么提到金的演讲。但有篇报道确实提到说，没有一个人因为抗议金的出现而离开新闻俱乐部。

金缩短了北方资金筹集之旅，发现奥尔巴尼陷入了紧张的博弈之中，愚蠢和仇恨交织在一起。一个穿成除虫者的人给检验城市野餐场所种族隔离情况的黑人喷上了杀虫剂。查尔斯·琼斯比那些试图把黑人赶出公园中白人休息区的巡警更胜一筹，城市中早已流传着管理者们要通过一纸法庭命令扼杀这次运动的说法。“我理解地方检察官到亚特兰大申请禁令，以避免不好的后果，”金在7月20日的大型集会上说，“现在，我假设他说的不好的后果就是拉尔夫·D.阿伯纳斯、詹姆斯·贝弗尔、伯纳德·李、安德鲁·扬、怀亚特·提·沃克、查尔斯·琼斯还有谢罗德，我还能说出很多人。”他告诉听众障碍不足为惧——法庭、市长、州长，甚至是联邦政府都不足为惧。金说，如果奥尔巴尼人民能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一切都无关紧要：“佐治亚州奥尔巴尼黑人的救赎就掌握在黑人自己的手中，植根于黑人自己的灵魂中。”他讲述了自己最喜欢的印度故事：甘地的食盐长征，说甘地开始只是孤身一人，最后到海边时，却可谓和之者众。他还讲述了甘地是如何通过捏起一点免费且不必交税的实验而改变了历史。“那一刻，”金大声说，

“我似乎听到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的男孩们说：‘一切都完了！’”这番话让人们议论纷纷。金又回忆了另一次著名的食盐长征——联邦将领 W.T. 谢尔曼领导的那次——他炽热的火焰燃烧了整个佐治亚州，解放了很多听众中的直系先辈。“让我们穿上远征的鞋子，”金对大家说，“我们要进行奥尔巴尼的食盐长征。”

第二天是周六，他们计划下午游行，但那天早上，美国地方警察副警长带着由肯尼迪总统刚任命的顽固种族隔离分子——美国地方法庭法官 J. 罗伯特·艾略特签署的法庭命令敲开了门。听取了善于评论的律师们口中对奥尔巴尼长官所谓空想的新论断，艾略特法官推翻了民权运动珍视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艾略特法官不仅未裁定种族隔离是对黑人平等法律保护权利的践踏，反而认定黑人的抗议游行占用了白人区大量警力以及其他公共资源，践踏了白人享受平等保护的权力。因此，有关政府申请永久禁令的听证会举行之前，法官命令奥尔巴尼抗议运动的领导人停止进一步游行。

那天早上，副警长敲开了安德森博士的门。他直接走进了主人的卧室，而那里正聚集着紧急商讨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副警长认出了安德森博士，把法庭命令递给了他，之后，他又从一沓文件中抽出一张，问马丁·路德·金是否在场。尴尬的沉默随之而来。金就坐在床上，一眼就可以看到，但副警长竟没有认出来。金和其他人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他们都对法庭命令的后果感到恐慌。副警长走到安德森家外站着时，金和其他被告赶紧从窗户跳到后面的小巷中逃走了。他们很快重新考量了自己本能下的逃跑。尽管他们厌恶那份会对自己事业带来灾难的命令——因为它让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以及联邦法院的法官们都站在其针对种族隔离而进行的抗议的对立面——但再三思索后，他们认为躲藏没有任何好处。

金是否应该遵从命令是另一件事，也是更难以抉择的问题，围绕这件事的讨论进行了整个下午，直至深夜。威廉姆·孔斯特勒建议说那份限制令显然是违法的。但金是应该遵从还是恭敬地等待更高级别法院撤销这一命令？根据联邦法

令，无视这份法令要冒着对抗联邦法官的风险——甚至会冒犯赞同金关于废除种族隔离的益处的法官们，然而，遵从法令则要冒着在关键问题上向时机无限期妥协的风险。后者是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查尔斯·琼斯、查尔斯·谢罗德和詹姆斯·福曼再三强调的一点。他们说，任何联邦法官都可以发出限制令，但现在民主派的总统根据种族隔离支持者和美国本土参议员的建议任命法官，就会导致白人官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获得限制令。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领导人们争论说也需要等上几周甚至几个月，更高级别的法院才会推翻这一命令，而在此期间，一次成熟的抗议肯定会衰落下去。如果运动的领导人们在此不利时刻向白人反对者们让步，从而取消抗议活动，那他们将再也无反抗之力。抗议是他们唯一的武器。

在金看来，这些理由很有说服力。当天下午，满怀期望的游行者们逐渐聚集在示罗浸信会教堂时，金从安德森家里告诉罗伯特·肯尼迪自己觉得游行“势在必行”。亲自接起电话的肯尼迪听到流言成真，倍感惊讶。司法部部长对非暴力反抗一直很敏感。他想知道，南方各位州长和学校官员们都在祈祷寻求不必遵守联邦发出的要求学校废止种族歧视法令的借口时，金怎么竟然要违反法庭命令？

金毫不退让。尽管金深知肯尼迪说的话是正确的，但他说运动的全部意义在于站起来直接反抗违宪的种族隔离法律。金抗议道，无论如何，人们总会想出口说运动是不合理的，而种族隔离是合理的。“我们试过了，很努力地试过了，”他说，“我累了。我们厌倦了。”肯尼迪一再强调，金无法承担抛开联邦法庭的善意的后果，因为这些运动正逐渐取得联邦法庭的支持。通过把金的不顾后果与政府在保证废止种族隔离命令方面的稳步前进对比，肯尼迪彻底惹到了金。“有些麻烦是你自找的，”金说，“是你任命种族隔离支持者做联邦法官。”通过这种暗示，金指明了真正制造麻烦的人不是自己，而是政府。肯尼迪非常烦乱，不再想继续争执下去，便把电话给了伯克·马歇尔。

那个周六的下午，马歇尔与金争论了将近两个小时，双方经常会停下来与顾

问们商量几秒钟。马歇尔的强项是耐心以及对细节的把握。他指出，如果金不顾艾略特的法庭命令而游行，就会因蔑视法庭而被关进监狱。种族隔离问题就将无法解决。金也会把自己逼到两难的境地——就如同詹姆斯·梅瑞狄斯一案中，政府试图对密西西比州州长巴奈特做的那样。对马歇尔说的这几点，金用一些严格遵守法律的观点予以回复。他说，巴奈特拥有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的权利并未被践踏，而艾略特的命令却显然践踏了自己的权利。巴奈特面对的法庭命令经过了多次听证和上诉，符合正义和最高法院的法律，而金则相反，他的命令只是由一位法官决定的。马歇尔承认艾略特的法庭命令在法律方面确实有一些弱点，但他也强调说种族隔离主义者都在看着，如果容许金出于不情愿而打破艾略特发出的第一条联邦裁定，“那么平起平坐的位置将不复存在——这就是法律”。

金和马歇尔争论到精疲力竭，陷入了僵局。可此时，示罗浸信会教堂的传信人给金带来了紧迫的消息——人们已经按捺不住了。金独自思考了一会儿，接着，就让克莱伦斯·琼斯向聚集在安德森家里的所有人传达自己的决定：他决定遵守法庭的命令，直到律师们能推翻它。之后，他又因一个新的问题而倍感痛苦——自己该如何告诉聚集在示罗浸信会教堂的人？经验告诉他，他的出现能让人们的热情掀开房顶，而看到他们的热情衰退将让自己非常痛苦——他甚至开始反思自己对马歇尔的让步了。但不行，金必须坚持自己的最佳判断，因此也许他应该干脆不出现在教堂。他再次否定了这个想法，他无法忍受大型集会在没有自己参与的情况下进行。金思绪万千，在晚风中走了走后，最终决定还是要去示罗浸信会教堂，只是他仍不知道如何把推迟的消息告诉大家。在律师们、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们以及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学生们的注视下，金努力走到了博伊德牧师的书房。

在书房中，他们能听到 700 多人在教堂中歌唱自由的歌曲和圣歌。歌声停止后，就会有演讲者带来豪言壮语，以及运动推迟的最新消息。由于平常的领导人都和金在一起，演讲的任务就落在了萨缪尔·B. “本尼”·威尔斯牧师的身上。威

尔斯健壮结实，皮肤黝黑，所受教育也不多。他的肩膀非常宽阔，所以才能胜任在美国海军仓库货物搬运工的工作。周末，他会在蓝色春天浸信会教堂布道，那是一座离奥尔巴尼约 25 英里的沃思县里的小教堂。威尔斯在城市牧师的会议上觉得有些拘束。他的长处是言辞通俗，有质朴且有说服力的气场，不过，他还缺乏抑制性的事业目标。

“带领我们前进吧！”集会中的某个人喊道，威尔斯也尽力约束了他。威尔斯从未面对过如此多的听众。他的布道先带大家达到情感的巅峰，希望混乱能引起金的注意从而走进教堂，但金并没有出现时，他便不得不压抑大家的情感，带领大家再次祈祷与演唱。接着，威尔斯就会飞奔到讨论室中。有一次他直接闯进书房说：“金博士，所有人都在等着，大家都期盼今晚的消息。”金点了点头。金的助手则告诉威尔斯尽量拖住人们，因为他们还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威尔斯深感责任在肩，等到人们情绪激昂时，他就会再次布道，将他们带到情绪的制高点，之后再次克制大家。如此反复三四次后，威尔斯再也无法忍受了。“我听说有一张法庭禁令，但我没亲眼见到！我听说了有些人被传唤，但我没有！”他大声喊，“但我知道谁在呼喊我的名字。自由之路上传来呼唤我的声音。我听到了爱默特·提尔的鲜血就在大地上咆哮！”这段话让教堂中爆发的勇气再也无法遏制，威尔斯便提议大家一起游行。“我们要去市政大厅，”他说，“我们将和平抗议，抗议 99 年来把灵魂碾轧出我们生活的魔鬼们！”

将近 200 人跟着威尔斯走出了教堂，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他们踏上通往白人区边界熟悉的道路。警长普里切特带着一队警察在车站挡住他们的去路时，威尔斯便跪在了街道上。浑身是汗、过度紧张还有些害怕的威尔斯大声祈祷以获得勇气，后来普里切特再也忍不住了。普里切特站在威尔斯面前，酸酸地说：“好了，牧师，站起来吧，该死。我们去监狱吧。”113 人跟着威尔斯走进了监狱。其他人退缩了，但很快，一阵热情感动了另外 50 人，他们穿过奥格尔索普大街，加入了之前被捕的人群中。

远处，坐在安德森博士小汽车里的金看着这一切。尽管金得避开正在做记录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以免他们以违反艾略特法官的限制令而鼓励游行为由逮捕自己，但他还是非常高兴，因为奥尔巴尼运动中的普通人都在自发游行。“他们能阻止领导人们，”金高兴地说，“但他们无法阻挡人民。”另一方面，奥尔巴尼的白人官员们认为并未参与此事的领导人们一定在某种程度上谋划了这件事，破坏了禁止令。他们要求联邦调查局调查，而老谋深算的局长胡佛则坚持要求司法部的直接命令。之后，联邦调查局总部指示每位特工告诉被讯问的黑人——也包括金——这涉及司法部部长特别调查的刑事案件。

从国家政治角度看，主要一点是金和其他被提到的被告人并没有违反禁止令。一场法律危机就这样被避免了。金没有进监狱，而且，由于威尔斯领头的游行并未引起法律纠纷也没有破坏公共秩序，因此政府可以把这次游行当作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黑人们最终还是决定遵守禁止令了。”伯克·马歇尔向司法部部长汇报时说。《纽约时报》的社论也相似地只能重点关注了金与艾略特法官的对抗。“我们很高兴，他（金）没有不顾联邦法庭的禁止令而领导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运动。”《泰晤士报》称，“无论南方腹地当地的司法有什么不足之处，金博士比任何人都清楚，联邦司法是其追随者们经常否认的宪法保障的支柱。”

周日，关进监狱的人被转移到了邻近各县的监狱时，金和安德森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说明艾略特法官的禁止令“既不公正，也不符合宪法”。他们告诉记者，律师们已经在努力工作，希望由艾森豪威尔任命的阿尔伯特·塔特尔领导的联邦上诉法庭能推翻这一命令。对金来说，这次新闻发布会很让人烦心。尽管他可以随意抨击这一禁止令，但不得不说自己尊重它。他不能再主张任何游行，而且，除了等待，他不能让追随者们做任何事，否则就会被视为藐视艾略特法官的法庭。奥尔巴尼的白人记者们还让他解释为什么没有采取更多措施阻止威尔斯的游行。

当天傍晚，金坐在奥尔巴尼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领导人闭门批评会上时，一场极为痛苦的折磨拉开了帷幕。谢罗德、琼斯、里根以及福曼，再加上专门为这场危机搭飞机而来的耶鲁法学院的学生蒂姆·詹金斯都来了。这次会议在斯莱特·金家的后院举行，开始还算客气，学生们只是陈述自己为什么认为金向艾略特法官的禁止令妥协是个错误的原因。这些话金已经听过很多次，他自己也多少赞同，但批评迅速升级，演变成了对金的品行和方法的攻击。

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领导人们处于困境之中。他们想要一场“人民的运动”，就如同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自身一样。然而，没有金，威尔斯的游行对外界基本没有影响力，而没有影响力就几乎无法鼓舞更多的奥尔巴尼普通人参与改革运动。他们需要金的影响力，但不想要他耀眼的光芒，于是他们便提出了令人很恼火的要求——让金改变自身。在政治分歧方面，每位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领导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刻薄地抱怨金。查尔斯·谢罗德说是金的实用主义，是他对运动神秘大潮事后诸葛的习惯导致他犯错误；蒂姆·詹金斯认为是金的宗教信仰和磨难的光环导致了这一切，他还认为宗教信仰和磨难给黑人们在强硬的政治面前扣上了手无寸铁且情绪激动的黑帽子；而詹姆斯·福曼则说金年纪渐长，却被自己深受信任的名声所累，变成了懦弱的小孩子。

学生们说金不切实际，缺少民权运动要求的老练；同时，他们还说金太看重自己世俗的地位，无法做到热情地献身。他们说自己憎恨金对媒体的控制——每当奥尔巴尼的记者们给在芝加哥或纽约的金打电话询问发生在奥尔巴尼的事情时，他们都愤恨难当。福曼批评金在艾略特禁止令面前的小心翼翼，说金只想保护自己在阅读《纽约时报》的白人面前“筹集资金的基础”。他们详细讲述了自己对运动资金分配的不满，认为钱款不应该由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保管，而应该交给奥尔巴尼运动组织。他们抨击怀亚特·沃克，说他是伊阿古，是严格服从纪律的人，还指责金竟然会雇用他。此外，他们责备金太有中产阶级做派。用贵族和无产阶级中咒骂他人的流行词汇，他们说金是“市侩小资”。

批评会一直继续到深夜。金并不反驳，只是为自己辩驳，但从未发火。愤怒的助手们跳出来帮他说话时，金也只是挥挥手让他们离开。整个争论期间，斯莱特·金的夫人玛丽森·金会不时送来餐点，每次她从厨房过来都紧皱眉头，几乎就要大声喊出那些刻薄之人的名字。然而，她还是克制住了，她的丈夫和其他旁观者也都没有说话。金和学生们共筑了自己的控辩空间。讽刺的是，对抗渐渐带来了亲密感。自省逐渐取代了气氛和政治诽谤，于是，金便和查尔斯·琼斯交谈起来，说学生和自己很像。琼斯离金在院子中的位置很近，两个人几乎是在耳语。

“马丁，你是精神信仰的代表，”琼斯说，“你说这个禁止令对运动合作的策略性举措，所有人都听了你的，准备跟你去蹲监狱，可你却改主意了。你之前就这样做过，可现在到了你对肯尼迪兄弟展示领导力的时刻了，运动也需要你的领导。所以，兄弟，我们去蹲监狱吧。我会去的。我们一起。”

金笑了。“琼斯，我必须如此吗？”他问道。金开玩笑说在监狱里刮胡子太难了——他得用很刺激的粉末软化坚硬的胡须——他还开玩笑说，作为一个牧师，他已经习惯别人为自己准备好一切。金和琼斯聊起了各自在监狱的感受，但似乎他们也是在谈论具有象征意义的屈服。琼斯刚决定要放弃布道坛。然而，作为年轻的上层牧师，他自相矛盾地说金看重信仰更胜于事业。

“就算你比我年长一些，”琼斯对金说，“也请听我一言吧。我敬爱你，你自己也知道。无论你何时召唤，我都会随行。但现在，我要说，你已经落后了。你不得不承认。”最后，大家已疲惫不堪，琼斯和金相视而笑，默然无语。之后，蒂姆·詹金斯恍惚中突然提起琼斯，说他太看重宗教信仰了。

周日深夜，金离开了斯莱特·金的的家，到一街之隔的安德森家与律师商议事务，柯瑞塔正好也来拜访。被批评摧残过，又因限制令而陷入僵局的金很是疲惫。后来几年，金还轻松地感谢了这个周末，奥尔巴尼的活力还真的让他收获了一些——柯瑞塔有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柏妮丝。

第二天下午，玛丽森开车离开奥尔巴尼，到卡米拉的米歇尔县监狱去，因为她女仆的女儿也因周六威尔斯的游行被捕了。玛丽森带着几盘刚刚烤制的食物来到了粗陋的监狱，监狱外墙涂成了白色，她和其他从奥尔巴尼来的黑人一起站在锁链围挡的外面，等着探望时间的到来。大家齐声唱着表达自由的歌曲，从窗户看向监狱里面，巴望能看到熟悉的脸庞。人们所做的一切让米歇尔县警长和副手们很厌烦，因为他们早已适应了更阴郁的气氛。（这座监狱中一直被关押的人中，他们认为查理·韦尔最悲惨，自贝克县警长朝他脖子开了3枪后的一年多里，他一直等着庭审，被控罪名是谋杀未遂。）外面的歌声预示着另一次不可忍受的探访阶段，黑人们会对通信特权及丢失的小笔记本而焦急万分，而警察则会因这种情绪而烦乱不堪。暴躁的副警长们为了克制噪声和烦扰，开始轰赶等在锁链前的人们。所有人都快速后退，只有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稍稍慢了一些，她一言不发，似乎对这场混乱并不知情。

玛丽森·金退得比较慢。她身上的某种东西促使警长和一位身穿制服的副手猛地走到外面。“说你呢！”一个声音吼道。玛丽森赶紧往后退了退。她从监狱的窗户那里看到了埃拉·梅的脸，不想被当作因害怕而胆怯的懦夫。刹那之间，警长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3岁的阿蓓娜一下从她的臂弯掉到了人行道上。1岁的杜波依斯也尖叫起来。警长又打了玛丽森一巴掌，副警长踢在她小腿上，还砸她的脚，接着，又对着倒在地上的她踹了几脚。玛丽森一下失去了意识，昏了过去，下一刻她感受到的就是膝盖上尖锐的疼痛，因为她当时一下跪在了地上。警察们都回到了监狱里，外面的人们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那天晚上，斯莱特·金崩溃了，哭得像个孩子，对攻击之后的无助感到极为愤怒。而他的哥哥C.B.金更让他失望，因为C.B.金拒绝对施暴的警察们提起民事诉讼。C.B.金说，韦尔案一年的痛楚让自己相信，黑人针对地方警察的诉讼不过是自我折磨。午夜过后，联邦调查局特工根据联邦警察暴行律例来调查案情。马里森·奇客比普里切特警长更高大些，是亚特兰大当地人，他问了

一些关于玛丽森·金的问题。他疏离的语气以及对细节的坚持让玛丽森·金和她的亲属们认为联邦政府不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于是受伤的他们愤怒地爆发了。还是马丁·路德·金维护了奇客，说：“这位绅士只是在履行职责，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吧。”

金之前给司法部拍的电报已经有了厚厚一沓，那天晚上，金又多加了几封。然而，他收到的不过又是两封伯克·马歇尔形式般的回复：一封保证采取“适当的措施”，另一封指明“国家惩罚性机构的内部管理，如未标明违反联邦法律，则不属于司法部的管辖范围”。

亚特兰大方面，艾伯特·塔特尔法官第二天撤销了临时限制令，因此，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至少可以在艾略特组织正式听证会前自由游行了。凯里市长称塔特尔的裁定“令人难以置信”。《奥尔巴尼先锋报》对这一背叛（“塔特尔法官的判决支持黑人领导者”）表示震惊，编辑格雷撰写了题为“奥尔巴尼永不放弃”的社论发表在头版上。另一方面，金和安德森博士给凯里市长发了一封彬彬有礼的电报。“我们不认为撤销禁止令是一种胜利，”他们写道，“我们再次请求您，以民主、人类品格以及奥尔巴尼的福祉之名，再给我们一次向城市委员会直接表达不满的机会。”

在奥尔巴尼黑人区，亚特兰大令人欢欣的消息与在卡米拉发生在玛丽森·金身上的报道碰到了一起，而后者更能激起人们的情绪。一则消息报道了冷漠的律师们正在争论复杂的事务，而另一则报道了警察在大庭广众之下，厚颜无耻地对奥尔巴尼一位非常特殊的妇女进行殴打的事。玛丽森·金很严肃，但很高兴，也很有修养，并不盛气凌人——就像她一路开车到县监狱看望女仆的女儿一样。去年12月，她出人意料地被关进了监狱，从而引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游行。每个人都知道，玛丽森穿着孕妇服装，已经有六个多月的身孕了。每个细节——她在怀孕期间被殴打的事实、小女儿被打出她怀抱的事实——都放大了这次冲突中的罪恶。这则新闻极具说服力，奥尔巴尼的黑人领导人们本能地绝口不提。通常情况

下，暴行或威胁总会在大型集会上多次重复，让人们团结一致，但那天晚上，面对自示罗浸信会教堂蔓延到锡安山浸信会教堂的密集人群，只有阿伯纳斯提到了玛丽森·金被殴打的事。对安德森、马丁·金和斯莱特·金来说，这一话题令他们刺痛，让他们怒火中烧。

领导人们推迟了立刻游行的计划。他们说，想给凯里市长时间回应自己谈判的请求，但他们都知道，人们已经失控，心烦意乱，处在使用暴力的边缘。然而，领导人们刚出发去市政大厅等待接见时，纽约的杰出人士——来自种族平等大会的马尔文·里奇就力劝人们当晚进行抗议游行。40个人追随了他。大家沿着熟悉的街道穿过黑人区时，遇到了期盼着决战的大批游荡者和旁观者。游行的人们刚穿过奥格尔索普大街就被捕了，于是愤怒的黑人旁观者们便抄起酒瓶朝冷漠的警察扔去。

片刻间发生的事如果不算暴乱，也和暴乱差不多。整个过程没有打架，没有抢劫，也没有枪战，但被丢来的石头和砖块很快就加入了酒瓶之中，成了发泄怒火的工具。警笛声传导的兴奋感、人们的喊声还有玻璃的碎裂声把黑人酒吧和桌球房里的人都吸引了出来，而警察的增援也从城市另一边赶来了。记者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惊慌失措且几乎已经厌倦这种行为的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们赶紧从教堂赶到聚集在一起扔石头的人中间，拼命想阻止这场攻击。安德鲁·扬请求人们不要给运动招来骂名，不要让所有努力付之东流。劝说不奏效时，他便歇斯底里地奚落他们，大声喊着：“你们竟懦弱到不敢去游行！”其他从教堂赶来的衣着考究的人和扬一起拉起了一条线，努力把这些散兵推回到黑人区。

普里切特警长是指挥官，到处巡逻，派出十几队警察和州警察对各个街区进行梳理，而且要求警察们除非被棍子或手枪击打，否则决不能使用警棍或手枪。警察们出发后，普里切特便要求所有黑人夜总会闭店，还张贴了安保要求。那天晚上，普里切特是非暴力运动的领导人，金不是。此外，普里切特让所有迟钝的警察都知道了这一点。“塔特尔法官应该看看这场景，”普里切特在飞来飞去的

武器中，用嘲弄的语气对记者们说，“看到他们丢过来的‘非暴力石头’了吧？”一切结束后，普里切特在匆忙举行的媒体发布会上指出：“我们一方绝没有使用暴力——警察们根本没把警棍拿出来。”他说自己的一个手下被酒瓶打中，但伤势不重，而且一块石头还打掉了州警察克劳德·希尔的两颗牙。第二天，希尔拿着那块石头的照片登上了《奥尔巴尼先锋报》的头版。此时，为了让奥尔巴尼的白人们采取守势而不肯发表任何声明的州长范迪维尔非常恼怒。他宣布：“我要让每个闹事的人知道，我将不遗余力地制止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暴力活动。”范迪维尔保证说，必要的时刻会把全部 12000 名国民警卫队部队派到奥尔巴尼去。

饱经磨砺的金也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中午 12 点，我们将开始为期一天的忏悔日。”金说道。同时，他还号召“所有支持奥尔巴尼运动的人为我们尚未领悟到非暴力运动阵地的黑人兄弟们祈祷”。这是一场悔悟并净化心灵的公共仪式，与甘地取消 1912 年及 1922 年的大型抗议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金的同僚们也认为这一举动的争议性与甘地的举动不相上下。詹姆斯·福曼对金的做法尤感恼怒，认为金是在责怪黑人，是在分化他们不言而喻的领导力，是准备退出斗争的行为。他争论说金应该责备对玛丽森·金施暴的警察们，应该责备为了维护种族隔离而逮捕非暴力抗议者的顽固官员们。金则回答这些理由都不够充分，暴力足以淹没他给出的解释。

奥尔巴尼运动的危机已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刻，一些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领导人决定公开支持金的忏悔日。在阿伯纳斯、伯纳德·李和一群记者的跟随下，查尔斯·琼斯跟着金踏上了到奥尔巴尼黑人小酒吧的和平之旅。琼斯穿着蓝色牛仔，而其他人都穿着西装。他们出现在诸如“蜂窝”和“南方大露台”等桌球厅和小酒馆，就像天外来客一般。“我带来了非暴力运动的标志。”阿伯纳斯对既吃惊又乖戾的顾客们说，但金则试图消除这种趾高气扬的效果。“我不想打断你们的桌球赛，”金说，“我之前也是个桌球高手。”说着，他松开领带，拿起球杆，展示了他在克劳泽神学院学到的技巧。融冰之举过后，金告诉他们，扔酒

瓶正中种族隔离主义者的下怀。“我们不需要枪械子弹，我们需要灵魂的力量。”他说。查尔斯·琼斯更有计谋，采用了更为低等的方法。他宣称自己清楚地知道有白人偷偷给黑人告密者塞了钱，让他挑起争端，而那个人必须得对此暗地交易守口如瓶。琼斯正说着时，他崩溃的神经告诉自己，他很快就要离开这次运动了。琼斯还没从与金的个性之争中回过神来，但很快就安排好去墨西哥的长途旅行了。

7月25日晚，奥尔巴尼正在24小时的忏悔中经历着无奈的闲散时，查尔斯·谢罗德开车深入了“可怕的”特勒尔县附近的边远地区，参加在一个在名为橄榄山浸信会教堂中举行的选民登记会议。这次会议只吸引了38个黑人和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两个白人员工参加，却造就了可能是整个民权运动一代人最令人瞩目的新闻。在两天后出现在《纽约时报》头版的文章上，通讯记者克劳德·西顿的报道这样展开了：“‘我们希望有色人种保持过去那100年的状态。’特勒尔县警长Z.T.马修斯说。”西顿接下来描述了马修斯如何带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副手闯进教堂，以及副手们阴沉着脸，把玩着手枪，还威胁似的掂着手里拿的大手电筒时，站在布道坛上的马修斯如何教导听众说为什么全县8209位黑人只需要有51个人登记投票就可以了。

西顿的报道几乎都是在叙述，穿插着被执法人员的威胁吓坏了的登记工作人员的圣歌和祷告。教堂外面，聚集而来的乌合之众关车门的声音清晰可闻；教堂里面，谢罗德坚定地祈祷着：“请赐予我们理解世界的智慧。”警长马修斯宣布12月前不可进行登记。西顿记录下了对话的片段：“‘我认识你，’一个警察对一个黑人说，‘我们会抓住好多你这样的人。’”恶意的威胁后是友谊的虚伪之言，西顿带着预言生动地描述了那个场景：“高处，”他写道，“成群的虱子围着3个发亮的球体乱跳，听众不时会将目光从松木地板上移开，畏惧地瞥一眼门口。之后，谢罗德先生开始朗读经典著作。”西顿和其他记者终于冲出教堂后，发现有人扎破了他们汽车的轮胎，还往油箱里灌满了沙子。

肯尼迪总统读到了这篇报道，司法部部长也是。这篇报道是一种愤怒，从《纽约时报》的字里行间喷薄而出，对民权法案中选举权保护的条例进行了嘲讽。这击中了罗伯特·肯尼迪的两处软肋。他对首席诉讼协调员约翰·多尔大喊道：“行动！”几小时后，由司法部律师以及联邦调查局特工组成的特别小组就到了特勒尔县。他们工作进展很快，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很快，伯克·马歇尔就向肯尼迪报告说，司法部“在克劳德·西顿发表报道两周内”，就已经呈交了针对马修斯警长破坏投票权的诉状。

然而，周四早上的奥尔巴尼——西顿刚逃离了苦难，忏悔日也已结束——政治事态却并不明朗。主流报道铺天盖地都是“非暴力石头”的暴乱，丝毫没提到对玛丽森·金的殴打，也没提到这件事背后的原因。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应该因塔特尔法官的决定庆祝胜利的黑人反而掀起了暴乱。领导层的混乱让事情更为扑朔迷离：在过去一周的两次游行中，马丁·路德·金对第一次坐视不理，对第二次持有反对态度——或者说不知道它的发生。现在，他为暴力事件道歉，《纽约时报》也发表了一篇赞扬普里切特警长的文章。

埃比尼泽教堂的理事 C.A. 斯科特选择这个周四在南方唯一的黑人日报上发表一篇指责性的社论。“如果金博士和其他人优雅地离开这里，可能会使情况好转……”他写道，“我们希望其他各方不要邀请他出现，以免延误奥尔巴尼的状况，或者让奥尔巴尼的状况更为复杂。”在示罗浸信会教堂，富有运动经验的人不禁激动地咆哮起来——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周五宣布城市领导者直截了当地拒绝谈判后，便号召志愿者进行到监狱的抗议游行，但竟没有一个人回应。激励并没有作用。安德鲁·扬乞求他们，举起了一沓由自愿蹲监狱的人签署的保证卡。查尔斯·谢罗德指责他们选择舒适而不是自由，威尔斯牧师也怒吼道：“世界落入水深火热之中时，每个有信仰的人都会站出来，举手！”但所有人仍旧安稳地坐在长凳上。

反对情绪下的胡言乱语盖过了金的声音，于是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形象

能比话语更有说服力。7月27日，克劳德·西顿的手表显示下午2点15分，金到达了市政大厅外的人行道，同行的还有阿伯纳斯、安德森、斯莱特·金和7位女性支持者，他们一起祈祷，希望进行谈判。怀亚特·沃克拿出了新闻稿，解释了金的决定，而普列切特警长却说游行人数这么少，已经证明了金失去了奥尔巴尼黑人们的支持。传信人将普里切特暗淡的话带到示罗浸信会教堂时，查尔斯·琼斯想方设法凑足了15位志愿者，又组成了一小拨游行队伍。他们到达时，金已经不见了。自“穿着得体的黑人男性”干涉后两周，金走到了曲折之路的终点——狱室，劳里·普里切特的监狱大门“哐当”一声把他锁在了里面，这是8个月以来的第三次了。

傍晚之前，这次逮捕就在国家政治方面掀起了狂风暴雨。洛克菲勒州长给司法部部长肯尼迪发了一封电报，敦促他“必须保证金博士及其同伴的人身安全，并调查其行为是否违反了宪法关于和平集会的规定”。白宫记者们一直纠缠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想知道总统对此的回应——金反对种族隔离并为此祈祷，现在他被捕了，肯尼迪会采取何种措施？

当晚，普里切特警长锁上门，给金打过招呼离开后，金和阿伯纳斯就带领狱友们唱起了表达自由的歌曲，还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据说劳伦斯·斯皮瓦克给金打了长途电话。斯皮瓦克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节目的主持人，承诺要把金救出监狱。很快，金就发现自己与斯皮瓦克热络地交谈起来。斯皮瓦克希望金能在周日早上参加《与媒体见面》节目。而金回答说可能不得不留在监狱而不是为了节目被保释出去时，斯皮瓦克先是惊讶得目瞪口呆，之后则陷入了愤怒之中。很多公共人物都乞求得到出现在最负盛名的电视访谈节目上的机会，而斯皮瓦克也没想到金会因为监狱而拒绝自己。只有对种族政治难以理解的扭曲才能解释金的谦逊：他留在监狱中，比出现在万众观看的电视节目里，更能吸引人们的眼光，自己的表现也更为强而有力。普里切特警长和斯皮瓦克一样希望金赶紧离开监狱，不断地保证金可以随时轻易地回到监狱，不会受到任

何蒙蔽或欺骗，但金坚持认为那样做风险太大。此外，金费了好一番周折才进监狱，如果这么快就离开，那别人就会把他当作某种贵客。这些以及其他考量孕育了一种巧妙的解决方法：金会请求斯皮瓦克让安德森博士代替自己参与节目。这既能让金继续留在监狱，他也能用无懈可击的理由把安德森博士救出监狱。金的顾问们把这个换人的想法当作天赐之机，而斯皮瓦克尽管相当不情愿，还是接受了安德森，因为这是让肯尼迪和金这一热议话题出现在电视上的唯一方法。

第二天，刚保释出来的安德森立刻投入《与媒体见面》的紧急彩排中。沃克、克莱伦斯·琼斯、C.B. 金和其他人扮演了专门的小组成员，对安德森抛出了一些不怀好意的问题。然而，C.B. 金的紧急彩排因县监狱传来的消息而不得不中止——晚上，犯人们殴打了奥尔巴尼运动的支持者之一。被打的人叫威廉姆·汉森，是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唯一一个因为前一天的游行而入狱的白人。送信人只知道监狱窗户里传出几声大喊说有人的下颌被打掉了，还说有几处重伤。所有人都不得探视汉森。

C.B. 金很快就以汉森律师的身份出现在县监狱，要求与自己的客户见面。76岁的警察D·C·“卡尔”·康贝尔知道律师总能发现问题，非常反感这一法律要求，便让他赶紧离开。金离开的时候稍微慢了一些，康贝尔还轰赶他。警察室里有一排盲人雕刻的木棍，还有信用制度下购买物品的一火柴盒的硬币。愤怒的警察走过那排木棍时，他顺手抄起一个，用尽全力砸在C.B. 金的头上，后来金匆忙逃跑时，警察还打了金的后背。金觉得天旋地转，鲜血不断流下，很快就浸透了他的衬衫，流到腰上。这时，刚刚逮捕了另一小拨奥尔巴尼运动游行者的警察和随行的记者看到了金，他们大吃一惊。“C.B. 金，谁干的？”普里切特警长大喊道。金强压住怒火说：“是多尔蒂县的警察D·C·康贝尔。”记者们蜂拥而至，康贝尔本人戴着圆冠阔礼帽，对金的说法毫不否认。康贝尔是个守旧的奥尔巴尼人。他的儿子自1937年就在美国地方法庭担任副书记员，而他本人参加完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国后，就在多尔蒂县警察局任职了。

普里切特警长显然苦恼万分。他派了一辆警车把 C.B. 金送去医院。“这就是我们极力想避免的状况。”他对记者们说。康贝尔让警察们探视了因被打掉了下颌、面部挫伤和肋骨断裂而被送到医院治疗的汉森。当晚，汉森被转移到了市监狱，离马丁·路德·金很近。汉森被转移之前，联邦调查局特工马里森·奇客与康贝尔进行了面谈，已完成该事件的官方报告。“没错，我打了他的头，”康贝尔对奇客说，“我告诉那个狗崽子滚出我的办公室，但他没听我的。”之后，奇客把自己的面谈记录交给了华盛顿方面。

汉森和 C.B. 金被打的消息在奥尔巴尼的黑人之间迅速传开了，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当晚举行的大型集会上，一大批人都流露出了同情，但尽管有激动人心的歌曲和充满愤怒的布道，仍只有 5 个人站出来愿意参加第二天的游行。“没有士兵就无法打仗。”怀亚特·沃克请求道。那 5 个游行者出现在市政大厅外的人行道上时，普里切特警长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们可以随意祷告。尽管有几个愤怒的白人不断催促，但老谋深算的普里切特警长都拒绝逮捕这些人。他告诉记者们，这些游行者不会打扰到任何人。

第二天，一张 C.B. 金浑身是血的照片刊登在了《亚特兰大宪政报》周日的头版上。克劳德·西顿对该事件的报道也成了周日《泰晤士报》的头版。就连《奥尔巴尼先锋报》也破天荒地对警察的行为表示了批评，但标题并不太正式——“警察康贝尔敲了 C.B. 金”。奥尔巴尼不时发生的暴力事件组成了新闻媒体的不祥之篇，给安德森在《与媒体见面》上的出现创造了不安的氛围。斯皮瓦克抛出了毫不留情的问题：黑人们缺乏支持，运动收效甚微，组织者是局外人，已经没有机会和奥尔巴尼的白人们和好以及并非真心谈判等。其他小组成员则以新闻为中心提出了有关国家政治的问题：肯尼迪政府的行动是否充分？安德森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说，尽管“已有足够的迹象表明《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被破坏了”，但联邦政府并未在奥尔巴尼采取任何措施；总统要求司法部部长准备一份金上次入狱情况的报告，但现在毫无进展。“此外，”安德森说，“我觉得总统

本人可以就此事件给出强硬的声明。”安德森还补充说，联邦调查局曾调查了暴力事件以及非法逮捕，但总统尚未对“越来越多的案例”给出直接回应。

那个周日，肯尼迪正在休假，他的单桅帆船行驶在海恩尼斯港，离马沙文雅岛不远，肯尼迪打算在那里度过整个8月。当天正好是杰奎琳·肯尼迪的生日。肯尼迪夫妇的大部分亲属都在船上，总统在港口附近开船，可众目睽睽之下，却只能恼怒地看着自己的主帆倒在了路易斯湾附近。家庭成员们无情地取笑了他。对金周五被逮捕做出回应还未列入总统的日程，但这件事已经牵绊了他。

周一，怀亚特·沃克正同时举着两部电话说话，这时，有人过来打断说洛克菲勒州长想和他通话。“和我？”沃克反问道。他接起电话说：“您好，州长，我是金博士的行政助手怀亚特·沃克。”洛克菲勒说自己很担心金，想知道该如何帮忙。“州长，您真如及时雨一般。”沃克回答。他说过去几天里有很多紧迫的问题——要组织几次游行还有已经入狱的近300人仍有一些个人要求。“我面临的问题是保释金。”沃克说。洛克菲勒干脆地问沃克需要多少钱，沃克闭上眼睛，把自己期望的数目增加两倍后说：“其实，有25000美元就足够了。”洛克菲勒说第二天早上沃克就会收到这笔钱，而且自己还打算再为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日常工作捐出相同的金额。沃克放下电话，喜不自胜。而洛克菲勒对运动实际的“兴趣”也传到了记者们耳中。

周二早上的记者发布会的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萨利多胺药物丑闻以及核武器的秘密测试，然而一位记者突然问肯尼迪总统他将如何处理奥尔巴尼的事务。肯尼迪先是一怔，说由于地方管辖和联邦管辖错综复杂，所以应给予关注。之后，肯尼迪停顿了一下，又加了几句话，仿佛不吐不快：“我想说，我自己很难理解为什么奥尔巴尼城市委员会不能坐下来和奥尔巴尼的公民好好谈谈，就算其中有黑人也是一样。此外，我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以一种和平方式保护公民的权利。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都能和苏联共聚日内瓦。我不明白奥尔巴尼政府以及奥尔巴尼城市委员会为什么不能为美国公民做同样的事。”

安德森博士立刻就抓住了肯尼迪要求谈判的号召。“我们真心希望奥尔巴尼的和解，而不是胜利。”他在给市长凯里的另一封要求会面的电报中说。但凯里拒绝和“违法者们”对话，并说肯尼迪总统的声明“令人难以置信”。由于肯尼迪与奥尔巴尼领导人的说法不一致，他的言论引起了南方众议院议员的极度不满。参议院里，理查德·拉塞尔哀叹总统给了黑人违法者们最高级别的“认可”，说总统的言论将“怂恿更多专业人士以及声名狼藉的人涌入，让本就不好的状况变得更糟”。拉塞尔推断，肯尼迪的真正动机是为弟弟爱德华在即将到来的马萨诸塞州的选举中拉选票。参议员塔尔梅奇抨击金领导了“一场有预谋的暴力运动，破坏美国的外交事务，并造成了人种之间的对立”。塔尔梅奇还注意到，总统是号召奥尔巴尼与当地公民谈判，而不是和金，于是便说如果“外来的煽动者”被赶出去，那么城市的种族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奥尔巴尼先锋报》上，詹姆斯·格雷称赞了“赶走黑人的政府”，还挖苦地悼念了自己的朋友——肯尼迪兄弟的政治灭亡，说他们是“两个有野心的波士顿人，如爱斯基摩人和刚果民主党人一样，终生与美国的黑人相勾结”。就在罗伊·威尔金斯领导一群人走进司法部部长办公室进行首脑会议前，伯克·马歇尔告诉罗伯特·肯尼迪，威尔金斯和其他人得说自己为奥尔巴尼做出了贡献。马歇尔向罗伯特·肯尼迪保证说那些人并不太在意奥尔巴尼的游行，以为那“不是罗伊的风格”。会议按照马歇尔的预期进行，然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华盛顿的说客克莱伦斯·马歇尔却说自己被政府的故作姿态深深困扰。马歇尔要求司法部对奥尔巴尼采取措施——要么逮捕几个人，要么提起诉讼，要么保护游行的进行——什么都可以。他出人意料的直白激怒了罗伯特·肯尼迪。“克莱伦斯，你和我都明白，我们已经做了现行法律下能做的一切，”肯尼迪说，“如果没有束缚，我们能做的更多。”

斯坦利·利维森刚在南美度完了年假，给还在监狱里的金邮寄了一份声明草案。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装置听到他说威尔金斯的会议是双方行动的替代品。“很

有可能，”利维森对一个朋友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政府都愿意看到金自杀。当然，这样的用意是让他消失在狱中，接着，如果这样没能激起大规模的支持，那么人们就会渐渐气馁，他们就赢了——城市官员们就赢了。”利维森还说，金的任务就是维持士气，明白来说就是“这是联邦政府该强硬的时刻”。多疑的白人媒体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进行了百般批评，而金的力量则是一剂解药。《时代周刊》报道说金“未能让奥尔巴尼的黑人们”领悟到非暴力抗议的价值，认为“太多的成功已经将他成名的迷人热情消耗殆尽”，该杂志还引用了一位匿名黑人的话，说金“已经不再为浸信会教堂说话，更别想他会为2000万黑人说话了”。而另一个黑人则说游行到监狱并不是在奥尔巴尼废止种族隔离的好方法：“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我们可以少做一些无用功。”

金在监狱里与世隔绝。普里切特警长以安全原因为由，不允许金和阿伯纳斯接触工作上的事。同时，普里切特同意给他们额外的食物和探访特权。每天早上，一位奥尔巴尼运动女性委员会的成员都会给他们各带来一套干净的丝绸睡衣和几盘食物——作为对监狱粗糙饮食的补充。阿伯纳斯很享受柠檬派。想到金穿着丝绸睡衣，《奥尔巴尼先锋报》的编辑詹姆斯·格雷就很恼火，然而，他认为对奢侈的抗议可能会让白人轻视自己而让黑人更崇拜金，因此，他决定秘而不宣。

在监狱中，金也努力奉献，他经常给大家朗读《约伯记》。有几天，普里切特的手下会把他们带到阳光下，根据塔特尔法官的法令，按照城市发出限制令的要求，参与艾略特法官的听证会。其他日子里，金都留在监狱中，忙着写一本关于布道的新书，之后这本名为《爱的力量》的书确实出版了。金在监狱中第一周的最后一天，奥尔巴尼的政治和司法官员开始逐渐接受一个不符合他们心意的事实：金不想被保释出狱。然而再次暗度陈仓式的让金出狱或者再推迟他占用人行道的审判并不可行，时间无情地带着他们走向了残酷的选择。他们可以给金定罪，把金关进监狱。但这样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大规模游行，上诉法庭也可能会

推翻这一判决，使奥尔巴尼法庭再次蒙羞。最糟糕的是，这样做金就会留在奥尔巴尼，还会留在他们的监狱中，招致来自远方的压力。他们也可以公开放了金，但这可能会造成种族隔离整个堡垒的坍塌。

普里切特警长只是单纯地很高兴自己不必做决定。8月4日是星期六，又一拨勇敢但颤抖着的游行者从示罗浸信会教堂朝市政大厅走来，其中有9位女士和4位男士。他们依旧在老地方遇到了警察，记者们也在人行道上分配的媒体区域观察着。普里切特很轻松地出现了，他等游行者们观望了将近半小时，才干巴巴地说他们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时刻。普里切特说，他们已经没什么歌可以唱，也没什么祷告要进行了，如果他们再不散开，自己就会像导游一样带领他们到监狱去。监狱里很昏暗。为了刚被关进来的人，普里切特把之前的犯人都叫出来歌唱他们刚为自己改编的自由歌曲——《我不可任由普里切特警长摆布》。后来，金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他很喜欢听这首歌。”

8月4日晚上，美国另一端的玛丽莲·梦露在自己的卧室香消玉殒。第二天早上，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旁吉尔罗伊的圣玛丽教堂，司法部部长肯尼迪参加了弥撒。关于梦露最后几小时里的神秘电话和传闻早有报道，而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好莱坞的小道消息也带来了更多证据。鉴于之后公开的肯尼迪总统与弗兰克·辛纳特拉朋友们的关系，也就是J.埃德加·胡佛截获的内容，联邦调查局调查员们挖掘了很多作为明星的梦露与肯尼迪兄弟的联系。

参加完弥撒后，肯尼迪离开旧金山，前往西雅图出席世界博览会。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就一份苛刻的智库报告向其发问。那份报告指责J.埃德加·胡佛使用“言简意赅的废话”夸大了美国共产党的小威胁。尽管这份报告明确表达了肯尼迪个人的观点，但他为了维护胡佛，避开了这个问题。肯尼迪说，美国共产党人数不多的原因完全在于胡佛对其颇有技巧的掌控。肯尼迪还说：“我希望他可以一直为美国效力。”

在白宫，震惊的亚瑟·施莱辛格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对5月出席肯尼迪生日的

梦露的生动回忆：“我绝对没见过比她更美的人。我为她的举止和智慧着迷，她那样神秘、那样直率、那样摄人心魄。但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她的不真实——就像同水里的人说话一般。我和鲍比进行了一场追求她的模拟比赛：梦露欣赏他，但更喜欢我——不过，梦露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灿然炫目的薄雾中了。”亚特兰大方面，多拉·麦当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在奥尔巴尼监狱的金。“可怜的玛丽莲·梦露，”多拉写道，“她需要生活的勇气。对任何人来说，在36岁时就觉得生无可恋，是一种遗憾。”

那一个星期中，奥尔巴尼没有任何游行，因为谁都无法再从示罗浸信会教堂的大型集会中找到一个志愿者。后援用尽后，只有仍在监狱里的金能给奥尔巴尼的官员们带来巨大压力。威廉姆·孔斯特勒准备了人身保护提议，强迫政府撤销指控或者迅速审判金。司法官法庭把庭审日期定在周五后，安德森和怀亚特·沃克就把那一天定为了新一轮运动的日期。如果不是庆祝金在法庭上的胜利，就是对金的定罪进行游行抗议。

做好这一重大决定后，奥尔巴尼运动、城市政府和司法部的三方谈判也愈加胶着。周三，司法部终于迈出了旷日持久的争议中公共行动的第一步。来自阿肯色州的杰瑞·海尔布伦举止温和，他应该说服南方人废止种族隔离。海尔布伦走进艾略特法官的法庭，发表了非当事人的陈述意见，支持奥尔巴尼运动，说走进法庭的奥尔巴尼政府并非“廉洁正直”。海尔布伦认为，政府官员靠着警方的力量和当地的规定，否定了联邦法庭的法令，因此不应该再获得联邦禁止令作为武器，阻止“将宪法权利带到奥尔巴尼的游行”。

罗伯特·肯尼迪认为采取这种措施有切实可行的动机。毕竟，如果发出并施行了联邦禁止令，镇压反对种族隔离游行的后果就该由肯尼迪承担，而非劳里·普里切特。肯尼迪当然不希望如此。此外，在这件事带来的所有影响中，非当事人的陈述意见在媒体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泰晤士报》发表了题为《美国的干涉站在黑人一方》的文章。金也发表了声明，庆祝政府对奥尔巴尼运动“法

律及道德上的支持”。示罗浸信会教堂大型集会上的志愿者们高举手臂，再次精神焕发。怀亚特·沃克计划了一次“母亲游行”，所有领导人的妻子——柯瑞塔·金、胡安妮塔·阿伯纳斯、简·扬、诺玛·安德森、安·沃克、洛特·孔斯特勒、玛丽森·金、卡罗·金（C.B. 金的母亲），甚至是戴安·纳什·贝弗尔和她的小女儿——都会参加，这将给劳里·普里切特的监狱带来另一个巨变。

8月10日是星期五，那天早上，金和阿伯纳斯在警察的护送下从监狱来到了当地司法官法庭。那天自他们上次放风已经过了整整两周，而且离他们上次在同一个法庭因去年12月奥尔巴尼逮捕而受审过去了整整一个月。德登法官的庭审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头上仍缠着绷带的C.B. 金站着为自己的委托人辩护，称委托人并未扰乱秩序，而且针对他们的指控不过是对政府实际目的的托词：实行种族隔离。政府律师宣布奥尔巴尼将根据联邦法令不再实行种族隔离，C.B. 金因此颇受鼓舞，但德登法官不久之后判决跨越在政治围攻根深蒂固的界限之上。法官认为金、阿伯纳斯、安德森和斯莱特·金罪名成立，判决每人缴纳200美元罚金，并再坐牢60天。接着，他说如果被告不会再做出违法行为，则可以延缓执行。

C.B. 金欣喜若狂，但依旧谨慎，他问法官上述条件是否意味着被告必须遵守城市种族隔离的规定。德登法官说既然最高法院已公开推翻了那些规定，所以被告无须遵守。之后，被告鱼贯而出，进行庆祝。奥尔巴尼政治的两大支柱都已抨击了种族隔离。金宣布自己周日将回到家乡，在埃比尼泽布道。而市长凯里只知道金的离开是妥协方案的一部分，弥补了政府做出的让步。“我认为司法部部长的干预能让金博士放心离开，”凯里对记者们说，“他已经达到了目的。”

当天下午，联邦调查局放在斯坦利·利维森办公室电话里的窃听器听到了一通打到他家里的电话。利维森的秘书听起来很紧张，她对利维森说自己不想打扰他的周末，但法庭刚刚送来传票，说他租用的一处不动产发生了经济纠纷。利维森说什么事都不能影响自己的周末，“因为他们给了马丁缓刑”。这是“真正的胜

利”。利维森说，而且不只是奥尔巴尼的胜利，因为金的影响力覆盖了整个南方。利维森还说，反对金的人之前还认为他这是不自量力，但如果他们让金待在监狱，那么造成的影响将无法预计。现在，就连奥尔巴尼也得承认在保护种族隔离这件事上，他们也无法承受把金关起来带来的“风暴”。利维森和秘书并未担心钱或传票。利维森对奥尔巴尼那次宣判的分析在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看来，是一份关于利维森但不宜转述给司法部部长的情报。

利维森对金个人影响的极度乐观并没能保证奥尔巴尼运动本身的胜利，很快，问题就开始显现。周日，人们成群结队地走在奥尔巴尼，检验城市撤销种族隔离法令的誓言时，劳里·普利切特和他的警察部队就跟在他们后面。政府遵守了诺言，警察没有因种族隔离逮捕一个人，但他们也没允许黑人对传统的一丁点破坏：他们关闭了图书馆，拦住了第一个想要借书的黑人；黑人们结伴想到白人的公园打网球时，他们就关闭了公园；而黑人们到黑人专属的乔治·华盛顿·卡佛公园进行双打比赛时，第一球还未分胜负，政府的雇员就剪断了球网。威廉姆·孔斯特勒颇感挫败，生气地将网球高高打向空中。种族争端已经进入了幼儿园级别的僵局。“无论金在不在，”《奥尔巴尼先锋报》宣称，“政府绝不会妥协。”

金回到了亚特兰大，在埃比尼泽教堂布道。那天早上，聚集在教堂的人们一直蔓延到了地下室的会堂。金的父亲高兴地主持了布道。在儿子布道的过程中，他的好心情不时显露，不是用手杖敲地板表示赞同，就是粗声粗气地下命令：“执事们，你们听好了！”年轻的金宣布，由于最近形势的逆转，他必须回到奥尔巴尼。

第二天晚上，金出现在示罗浸信会教堂，但詹姆斯·贝弗尔正在对蔓延至锡安山浸信会教堂的众人布道。新一次的游行推迟了两天，因为城市委员会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委员会愿意在周三晚上接待第一批当地黑人代表团，倾听他们的不满。对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期望无可非议的低。到了预定时间，奥尔巴尼运动的一群人聚集在市政大厅外，在暴雨中等待，凯里市长认出了马瑞安·佩奇。“我是

M.S. 佩奇，是奥尔巴尼的守法公民。”佩奇开口道，强调自己避免了参与抗议游行。他朗读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委员会考虑奥尔巴尼运动最初的要求。佩奇读完之后，市长礼貌而坚定地宣布关于种族问题的诉讼掌握在艾略特法官手里。凯里说，因此，委员会认为讨论或评论上述问题并不合适。之后，他让佩奇离开了。

同时，金正在从附近李县回来的路上——夏末暴力事件的第一次震动加速了奥尔巴尼运动的衰退。纵火者向荫凉丛浸信会教堂投掷了燃烧弹，而4天前，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志愿者们刚刚在那里进行了登记会议。李县的警长用了不到两小时就完成了对这件事的调查，认为可能是雷暴引发了火灾，但联邦调查局调查员根据线索追查，清楚地指出这是政治迫害。这座小讲堂的仅存之物是孤零零的烟囱，金到的时候，烧焦了的墙板和松木长凳还在冒烟。金穿着平常的西装皮鞋，小心翼翼地踏上195号公路旁的土路，加入了参与即兴纪念活动的悲伤的教友中。

回到奥尔巴尼后，金面对着惨淡的策略性现实。显然，政府官员做出了必要的让步，缓和监禁金带来的公共压力，但同时也对奥尔巴尼运动发出了严酷的挑战。白人们是在示威，表明羞辱和痛苦之下他们也会反抗。这种情况下不能进行大型游行，因为大型集会上饱受摧残的灵魂早已不愿进监狱。金可以通过游行回到监狱以吸引媒体的注意，但他能得到的顶多是另外一个缓刑的判决，而且效果也会大不如前。于是，金发出了呼吁，请全国的神职人员都来增援。

两周之后，74位牧师——包括9位犹太拉比、芝加哥的8位天主教信徒以及超过40位清教牧师便从示罗浸信会教堂出发，朝劳里·普里切特和他的手下走去。然而，他们的被捕并没有激起人们广泛的兴趣，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只会被监禁一天，这不过是紧随更具戏剧性事件而来的反应。这次大范围逮捕启发了《奥尔巴尼先锋报》的作者，他写出了含有头韵的标题——“普天同庆，警察将牧师关进监牢”。这篇文章确实在美国参议院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佐治亚州的参议员对纽约州的参议员说，无论是否逮捕神职人员，奥尔巴尼式的执法让

那座城市比中央公园更安全。

各方对金在奥尔巴尼表现的评价非常无情。劳里·普里切特公开表明，自己知道——而且金也知道——由于发生在奥尔巴尼的事，种族一体化进程“至少倒退了十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鲁比·赫尔利辛辣地指出“如果目的是为了进监狱，那奥尔巴尼运动很成功”。斯莱特·金认为奥尔巴尼运动的目标太过宽泛，而且运动的批评者也列出了一长串金的策略失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危机》杂志请斯佩尔曼的两位民权运动教授——斯陶顿·林德和文森特·哈丁撰写了文章，几乎涉及了所有相互矛盾的批评：金作为缺席的媒体明星的缺点、他太过倚仗法庭而带来的失败、他对当地白人的麻木、他不愿意多进几次监狱、他未能妥当处理公交罢工等。尽管运动批评者们都匆匆下结论，认为如果有更合格的人领导，那么奥尔巴尼运动可能会大获成功，但主流媒体的批评人士只是言简意赅地认为金输了，而奥尔巴尼赢了。《纽约时报》说“奥尔巴尼的公共生活依旧处于隔离状态”，断言金最耗费精力的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普里切特颇有技巧的反抗、黑人中的“内部竞争”、黑人造成的“策略性失误”以及敌对的白人越来越凝聚的团结力。

对金来说，除批评者们的多重批评外，更令他难以承担的是他们的疏离。金把奥尔巴尼看作普遍的道德问题的一部分，爱达荷州的白人记者们和他自己不得不承认，只有一个明确且公正的解决方法。看到持有各种观点的人们隔岸观火似的分析结果，仿佛自己在奥尔巴尼的表现证明了种族隔离是正确的，非暴力运动是错误的一般，金感到非常愤怒。他感觉旁观者们亲手扼杀了自己。金不相信在奥尔巴尼坚持种族隔离会削弱自己观点的正义性，就如同获得第二名的杰西·欧文斯也无法证明希特勒理念的高尚一样。然而，金知道，最好还是坚守美德。世界通过战斗检验动机，而且，金在蒙哥马利的时候就知道，最纯洁的灵魂进行的运动，如果没有胜利也无法存活。

离开奥尔巴尼监狱6周后，金在伯明翰道出了对奥尔巴尼的政治观点，坚

持认为斗争本身就是一种胜利。金告诉伯明翰的听众，黑人选民登记人数比1962年翻了一倍多，仅佐治亚州就增加了3万人左右。金宣称，由此而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种族温和主义者卡尔·桑德斯在最近州长竞选中的胜出。他说运动已经战胜了普里切特和其他奥尔巴尼的杰出白人，因为那些人正在保护的是他们自己相信且注定会失败的体制。重要的问题已全然暴露，人们的心为之一震，脊梁也挺直了。

不得不积极面对奥尔巴尼（普里切特不得不否认自己想过采取缓和之策）的金，转而从自己的角度分析奥尔巴尼运动的不足之处。谈到策略时，他说自己希望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能参与“基础性工作”。金知道要想吸引外界的注意需要时间，因此他想控制下一次运动的时机和节奏。在奥尔巴尼，他是一个新人，在大型逮捕的高峰过去之后才来，但他毕竟背负了大部分的批评。没有一个人说奥尔巴尼运动对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或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来说是一次战略性失败。

从公交抵制运动到自由乘车运动再到奥尔巴尼运动，金总是多少在无意间就参与了颇受瞩目的运动。现在，金的公众形象已经让大家对其原则进行了公投，那么接下来金的实用主义就要求他设计自己的测验。他需要对具体而非宽泛的目标领域提前计划、训练并进行鼓舞。简而言之，金需要专注，为了巨大的成功，不仅要最大化其风险，更要最大化其机遇。金对员工们宣布自己决定不再进行临时的拯救任务。“我不想再做一个救火队员了。”

第十七章 密西西比大学的陷落

摩西在密西西比的第二年，新的暴力事件总是影响登记运动，而且，神秘的巧合之下，每次暴力事件发生的时间都和在东边 300 多英里的奥尔巴尼的爆发相呼应。奥尔巴尼获得虚假胜利的那个周六，政府关闭网球场和游泳池时，摩西和萨姆·布洛克带着第一批想要登记的人——共有 25 位，来到了位于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的法院。这在莱福勒县还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更令人惊讶的是后面还跟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影制作团队和一群记者。之后的那个周一，3 个愤怒的白人趁布洛克走出摩西的轿车时抓住了他，在中心商务区把他痛打了一顿。

格林伍德的紧张感越来越强烈，8 月 14 日，星期三——佐治亚州荫凉丛浸信会教堂陷入火海中的那天，两位年轻的职员教师到达时，发现阴影已经覆盖了宽街上的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里，来上课的黑人们都小心翼翼地选择自己的座位，小声谈论着射击角度。摩西离开了办公室到临近的玻利瓦尔县处理登记工作，但午夜时分，他接到了萨姆·布洛克惊慌失措的电话。布洛克说几车带着武器的人正监视着办公室。然而，让大家更恐惧的是，每个人都很清楚请求警察的保护是不可能的——布洛克看到警车就停在暴乱分子的车前面。之后几通紧急电话打给了联邦调查局当地特工以及约翰·多尔和伯克·马歇尔在华盛顿的家里。布洛克打来的下一通电话说，他看到那些人下了车，有些人拿着枪，有些人甩着铁链，摩西便往格林伍德赶去。清晨之前，摩西回到格林伍德，发现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了，办公室里也一片狼藉。他不知道布洛克和其他两个新来的志愿者是否从窗户逃到了隔壁大楼的房顶上，然后顺着电视天线躲到后面的小巷子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布洛克他们回来了，发现摩西昏昏欲睡。对摩西来

说，困倦是自然的——他无处可去，也不知道如何找到其他工作人员——但在别人看来，他出现在恐怖之处的举动更增加了他非暴力姿态的传奇性。“我不明白，鲍勃·摩西是什么人，他竟敢直接走进一个暴徒刚洗劫过的地方，还敢收拾床铺睡觉，就好像这种情况很正常，”一个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写道，“我想，我又学到了一些。”布洛克和其他两位志愿者留在了格林伍德，但恐惧让他们必须得换个办公室。而寻找下一处办公地点就花了整整5个月。

自那年春天，摩西就努力在杰克逊北部的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开展小型登记项目。那里是殖民地区，大部分潜在的黑人选民都分散地住在农场中，极度贫穷，且一字不识，对白人殖民者有一种半封建的依赖。6月，摩西带着同事到高地民众学校进行为偏远地区非暴力登记工作面临的困难的专题讨论会。志愿者们不得不在6个三角洲地区分头上课，而摩西也要四处筹集经费。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选民登记负责人是杰克·奥德尔，摩西在纽约时，贝亚德·拉斯廷介绍他们两人认识了。奥德尔提出将密西西比招募的人直接用巴士送到黑人区塞普提玛·克拉克在奥尔切斯特的公民学校去上课，此外，他还在密西西比地区分发了无数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登记手册——《南方的改革：选举》以及《为什么选举？》等——以及其他认字的材料。“我们用的是《讲习班手册》，年纪稍大的人非常重视它们，”萨姆·布洛克7月在写给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材料中说，“他们告诉别人说：‘这是我们学校的书。’”为了帮助摩西的登记活动，奥德尔还要求詹姆斯·贝弗尔带着妻子戴安和刚降生的女儿从奥尔巴尼回到密西西比。

格林伍德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办公室遭洗劫后不久，关于密西西比登记资金问题的峰会就举行了。选民教育计划的负责人威利·布兰顿从亚特兰大赶来；詹姆斯·贝弗尔代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参加；大卫·丹尼斯代表种族平等大会出席；亚伦·亨利、埃姆西·摩尔和其他人代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密西西比分会参加；詹姆斯·福曼代表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国家办公室出席，而摩西则带着几个密西西比的组织者参加。从格林伍德往西北方向走，开车一小时就到了克

拉克斯代尔，他们在那里一座教堂的地下室见面，布兰顿开诚布公地说明了自己的政治困境。作为选民教育计划的负责人，他负责对所有为基金会捐款的人说明钱款的去向，而那些人都与肯尼迪政府关系很近。同时，布兰顿还要对几大民权组织的领导人负责，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对政治上微妙、法律上脆弱的选民教育计划的运营有否决权。上述很多人根本不愿意把登记的钱花在密西西比。此外，罗伊·威尔金斯不想通过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花钱，他认为这样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当然更不会通过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密西西比分会花钱，因为他认为那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应该负责的事务。

如果威利·布兰顿并非最不同寻常的官僚主义者，那么上述问题就很好解决。布兰顿和出现在教堂地下室的每个人都知道，为了不让登记活动成为形象工程，选民教育计划就必须支持敢于招募并训练先锋选民的学生们。这些学生中的很多通过摩西，为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工作。为了绕开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反对，布兰顿同意按照蒙哥马利进步协会及奥尔巴尼运动的传统，通过新的掩护组织筹集资金。因此，与会各方可以相互信任而行动，同时还能在国家领导中政治反对者面前形成保护伞。当晚，在克拉克斯代尔，他们成立了联合组织委员会。之后，他们制定了章程，划分了负责范围，还对未来的资金做了分配。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亚伦·亨利当选为主席，以便缓和威尔金斯提出的各种异议。摩西当选为选民登记负责人。

这是相当复杂而巧妙的政治工作，之后，他们一起走进了密西西比的晚风中。这样一群黑人一起出现在三角洲的城镇上必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尤其是在登记计划的紧张感几乎让暴力运动处在爆发边缘的时刻。警长的助手在城外拦住了福曼的汽车，但命令他离开克拉克斯代尔后就放行了；一个巡逻警察以交通违章为由逮捕了大卫·丹尼斯；另一个警察以街头滞留罪为名逮捕了萨姆·布洛克和其他5个人。威利·布兰顿毫发无伤地离开了克拉克斯代尔，不过第二天又不得不返回来，对当局说以在移动的汽车内滞留街头为名逮捕一个人毫无说服力，

但他也交纳了一笔数目相当大的拖车费。布兰顿离开后，动用选民教育计划的资金交纳了拖车费。当天，布兰顿在去杰克逊机场的路上，听说布洛克以及摩西和其他3个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学生在森弗劳尔县被捕了。他们都被关进了监狱，针对他们的刑事指控是未经允许分发小册子（宣传选民登记会议的手册）。这次逮捕从法律角度看无懈可击，像布兰顿这样的律师也无法靠三寸不烂之舌改变这一个结果。詹姆斯·贝弗尔只好到监狱保释了他们。

摩西决定暂时不在森弗劳尔县露面，但他感到对鲁尔维尔的黑人们责任重大。鲁尔维尔是森弗劳尔县北部的一个殖民小镇，来自它周围的18个上过登记课的人，第二天即将成为第一批到印第安诺拉登记的人。18个人中的大多数都是知识有限的佃农，摩西非常欣赏他们的勇气，于是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便租了一辆车，从外县请了一位司机专门接送。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摩西亲自陪同他们从鲁尔维尔到了位于印第安诺拉的郡政府。尽管没有一个人成为新选民，但所有18个人都参与了登记测试，也没遇到什么麻烦。然而，在回鲁尔维尔的高速公路上，一个巡警让他们停车。摩西再次被捕了。未能成功登记的人们回到了鲁尔维尔，给全县的人带去了他们试图登记的消息。当晚，种植园所有者马洛威开车来到了佃农法妮·洛·哈默的家。法妮44岁，有20个孩子，是个矮小结实的妇女。马洛威告诉法妮，三K党和白人公民理事会肯定要来找自己的麻烦，因为自己手下的农民干预了政事。马洛威听上去如愤怒的困兽一般，他说法妮如果不放弃登记申请就得离开她住了18年的种植园。法妮立刻离开了，到为学生非暴力委员会登记课程的老师们掩护的人家住。

8月的最后一天到了。同一个晚上，自发组织的治安维持者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附近的李县朝4户人家开了枪。这4户人家都是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选民登记的支持者。在李县运动主席一家20口住的房子里，州调查员找到了24个弹孔，没有人受伤。《纽约时报》的克劳德·西顿特意指出李县运动主席就是7月在荫凉丛浸信会教堂被警长副手威胁的那个人，当时自己和派特·沃特斯都听到

了。4天之后，治安维持者们又朝特勒尔县一位妇女的家开了3枪，因为她夏天的时候让登记志愿者们住在了自己家。这3枪没有打中睡在床上的查尔斯·谢罗德，却伤到了一个白人学生的胳膊，还擦伤了另外两个人。

当时，来朝圣的犹太拉比以及牧师们已从奥尔巴尼的监狱离开。金一直没再参与奥尔巴尼的事务。起初，他这样做是抱着一丝希望，即如州长范迪弗到司法部部长肯尼迪以及C.A.斯科特批评的那样，没有自己在场，谈判可能会更有成效，而且敌意更少。然而，谈判破裂后，他因没有建设性的其他选择，仍未插手奥尔巴尼的事务。金曾承诺“要让奥尔巴尼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扶持正义的一方”，但他现在并没有得到这种支持。金知道，运动的打击力逐渐减少。此外，金还要面对各方施加的压力。他在奥尔巴尼的两个月，不仅牺牲了自己的假期，而且失去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资金筹集人的收入，而这笔收入对扩大整个南方的选民登记运动非常重要。

金在纽约发表资金筹集演讲时，电话带来了另外两座教堂——玛丽山浸信会教堂以及橄榄山浸信会教堂——被烧毁的消息。这两座教堂都位于特勒尔县，都举行过登记会议，而在这次灾难中都被彻底烧毁了。艾略特法官拒绝了司法部对马修斯警长7月对橄榄山浸信会教堂的突然袭击发出禁止令的要求。这次，马修斯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两座教堂起火的原因是故意纵火。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找到了大量证据。调查员们穿着联邦调查局制服，在教堂废墟中四处查看时，惹恼了聚集在一起见证这场毁灭的白人们。维吉尔·帕克特突然发狂，挥拳向一名调查员打去，把那位调查员的眼镜打掉了。之后，维吉尔因袭击他人被捕。

第二天晚上，在密西西比鲁尔维尔，夜晚骑马而来的蒙面人朝为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登记运动志愿者提供住宿的两三户人家开了枪。赫尔曼和海蒂·西森正和自己的孙女和一个上大学的路上要在这里住一晚的朋友聊天，这时，一阵爆裂的声音吓到了他们。“我觉得是枪声。”西森镇定地说，但下一秒，两个上大学的女孩都从沙发上跌到了地板上，不停打滚。西森夫人后来描述说，屋子里

的每个人都趴到了地上，大喊着，但还有子弹打穿墙壁而来。两个女孩被送到医院时——一个重伤在脖子和头上，另一个胳膊和腿受了伤——地上已血迹斑斑。鲁尔维尔的市长多拉夫在西森家来回踱步，看上去很不安，说话也断断续续的。他命令手下把西森夫人带到医院，处理玻璃割伤，接着就开始查看弹孔。“幸好海蒂没被打中。”他说。接着，多拉夫给森弗劳尔县的警长打了电话，说：“鲍勃·摩西是罪魁祸首。我知道这种事迟早会发生。这就是我日夜奔忙的原因。”一个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暑期志愿者冲进来，歇斯底里地给在杰克逊的摩西打了电话，接着，安静下来后，他把摩西的指示做了笔记，告诉了众人。这位志愿者惹恼了在医院的多拉夫市长，于是，市长以这位志愿者为了给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筹钱而公然开枪为名逮捕了他。摩西的车路上抛锚了，他第二天早上赶到时，那位志愿者已经进了监狱。

摩西像往常一样，写出了详细的报告，单倍行距下，写满了9页纸。他分别给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联邦调查局、司法部、新闻媒体和马丁·路德·金寄送了一份，希望白人官员能采取措施，巩固由恐吓得来的优势。鲁尔维尔当地报纸公布了所有试图登记的黑人的名字。市长多拉夫命令城市供水系统切断对鲁尔维尔的威廉姆斯教堂的供水，因为那里是整片区域唯一敢举行登记会议的教堂。美国忠诚与保证保险公司从遥远的巴尔的摩中止了教堂的意外伤害保险，摩西试图说服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不过只是枉然。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志愿者们最终还是无法在教堂上课了，便想在家里或帐篷里上课，然而，没有一个人敢来参与。志愿者们只好砍柴跑腿，咬牙坚持着。“因为让黑人们觉得你……不会被所有困难打倒很重要，”摩西解释说，“总体上说，恐惧越深，问题就越大，志愿者们就得待更长时间说服人们。”

鲁尔维尔枪击案发生后不久，肯尼迪总统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公开抨击了苏维埃为古巴提供武力援助的做法，还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宣称的古巴只是为了在美国“迫在眉睫的侵略”时自我保护的说法不予理会。之后，为了回应金

抗议针对选民登记员工的暴力事件的电报，总统对南方的恐怖分子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很多个月以来，甚至很多年以来，我都没见过这个国家发生过比烧毁教堂更令人发指的事，就因为黑人们想要登记选举，竟然就烧毁了两座教堂。”他接下来也提到了鲁尔维尔的枪击案，说那次攻击“既是懦夫的行为，也让人怒不可遏”。“我命令，想要登记的每个公民，”总统继续说，“都应得到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保护，都应得到各个州的保护。如果这需要另外立法或者额外的强制，我们就应该都做到。”

这是肯尼迪总统目前为止在民权运动方面最强硬的声明。这是在政府民权政策层面解决民权运动问题的良机——暴力及选举权——肯尼迪的回答毫不含糊。“我们感谢国家总统强有力且直截了当的言论，”金第二天晚上说，“我们需要他的精神支持。我们祈祷这些话语能变成强有力的行动。”带领夜间车队从奥尔巴尼来到橄榄山浸信会教堂后，金在废墟中进行祷告仪式时说了上述一番话。车队本身就是大胆之举，在奥尔巴尼运动改革之前是难以置信的。金宣布尼尔森·洛克菲勒承诺提供 10000 美元用于重建 3 座被烧毁的教堂，他自己也从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中拿出 3000 美元平分给 3 位牧师重建教堂。

3 天后，特勒尔县的我希望浸信会教堂因煤油炸弹陷入了火海，证明了肯尼迪和金的声明不过是夸张的插曲。这次，第一批联邦调查局调查员到现场时，发现 4 个纵火的人竟厚颜无耻地看着火焰喝啤酒。被捕后，4 位嫌疑人对联邦调查局供认不讳。司法部的律师们仔细查看了他们的陈述材料，发现这个案件并不适用于 1944 年最高法院对斯科鲁斯案晦涩难懂的判决，但整体上说，他们还需要与愤恨的黑人周旋，而非投票权。无论如何，华盛顿方面让律师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司法部已经公布自己在一天内解决了这起案件，并将嫌疑人移交至马修斯警长，让嫌疑人们在州法院受审。司法部的声明如此解释了这一举动：“由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证明，教堂焚毁案嫌疑人的目的并非特别为了恐吓黑人不去投票，因此，该案件中的证据已移交至地方当局。司法部部长肯尼迪说，司法部以

自身名义致电胡佛先生，并要求调查此案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员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讽刺的是，纵火案的4位被告竟被州陪审团定了罪——这是佐治亚州众多类似案件中的第一次。所有的主要案件的“解决”方式是，联邦调查局出具一份报告，指明责任方，但很少有人需要在联邦法庭受审，且部分由于联邦基层法院中艾略特法官的阻挠，所有人均未获罪。

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在南方法庭及三K党控制的县区均面临着相当紧张的境况。有时，双方均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整体上看，在办公室工作两年后，司法部的员工对自己负责范围内涉及选举权的刑事案件越来越畏怯。9月，伯克·马歇尔在一次与弗雷德·夏特沃斯和其他民权运动领导人举行的专门会议上，他警告司法部没有对在南方进行登记计划的人提供“保护保障”。马歇尔说，联邦权力有限，所以从根本上讲，大家必须自己小心。听到这里，黑人们开始无情地抱怨起来，马歇尔和其他人当初让他们涉足选民登记领域，是因为这显然是联邦管控的范围。

我希望浸信会教堂被烧毁后的10天内，又有4座佐治亚州的黑人教堂被烧毁了。金当时在纽约，正在消化让肯尼迪总统发表第二次解放宣言的希望破灭。这对金来说很难，因为长久以来，总统针对种族隔离具有重大代表意义的行动对他自己和肯尼迪政府内的官员来说都异常珍贵。例如，美国新闻署署长爱德华·R.默罗自从上任第一天，就不断对肯尼迪强调此事。默罗说林肯打击奴隶制的百年纪念是白宫竭尽全力反对种族隔离的绝佳时机。

1862年夏天，林肯宣读了自己宣言草案，让内阁成员为之震惊，也在邦联军的反叛下废除了奴隶制。林肯认为那是战时措施，不仅会削弱南方的经济，而且会强迫杰佛逊·戴维斯分散兵力，镇压奴隶的反叛。此外，林肯还说，这一措施给联邦军带来了公共目标，让欧洲列强插手邦联的事务。出于上述原因及其他原因，林肯无视一些内阁成员的反对，在联邦军获得胜利的那一刻宣布了自己的宣言。时机对林肯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不希望别人把这份宣言当作挣

扎之举。第二次牛奔河的耻辱让林肯不得不等了一个月，但在安地谭虎视眈眈地僵持了几天后，联邦军就迫使罗伯特·E. 李撤退至弗尼吉亚州，林肯也就此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现在，100个9月过去了，肯尼迪政府中的讨论事宜与第二次宣言毫无关联，而是肯尼迪总统是否应出席百年纪念官方仪式。一次白宫会议上，肯尼斯·奥唐纳宣布自己从未听说肯尼迪打算进行重要讲话，而且实际上，总统的安排是在华盛顿外演讲，这让很多计划员都颇感惊讶。“我们很吃惊。”代表团内一名众议院议员在一封列出了十几项白宫当年年初的承诺信中指出，信中还有与总统本人两次谈话的内容。这封信的副本很快就到了主要策划百年纪念的3位总统助手的手中——亚瑟·施莱辛格、泰德·索伦森以及李·怀特。内部游说的最后一轮继续着，但奥唐纳毫不让步。总统出席百年纪念会让这一场合引人注目，人们会将肯尼迪的表现与林肯的对比。

金正在纽约为佐治亚州被烧毁教堂的重建筹集资金，他不得不平衡肯尼迪对《解放奴隶宣言》庆典的冷漠与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热情。那天是属于洛克菲勒的，是向他们共和党总统致敬的日子，也是唤醒洛克菲勒家族将近100年来对奴隶福祉所做贡献的日子。洛克菲勒理所当然地保管着林肯《解放奴隶宣言》最初的羊皮卷。他邀请金一起出席纽约州内战百年纪念委员会为宣言而举行的晚宴时，金的顾问们详述了这样做的不妥之处。毕竟肯尼迪掌权，他们说，而且众所周知，肯尼迪对洛克菲勒想当总统的野心非常敏感。如果金与洛克菲勒来往过多，可能会把肯尼迪推向南方民主党人一方。

联邦调查局在斯坦利·利维森办公室的窃听装置听到了对洛克菲勒邀请的讨论。顾问们问纽约州内战百年纪念委员会的晚宴会不会太“共和党”。克莱伦斯·琼斯发现纽约州内战百年纪念委员会中有民主党人，这让顾问们宽心不少，他们转而开始讨论钱这一微妙而复杂的问题。目前为止，怀亚特·沃克说纳尔逊·洛克菲勒承诺给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以及甘地人权协会的5万美元只到位了

十分之一。现在，洛克菲勒再次承诺捐款1万美元以重修教堂。他向金发出的邀请与金在纽约资金筹集安排冲突，所以，实际上，这是在要求金为了取悦虚假承诺的制造者而放弃实实在在的钱。这是依靠慈善的人都会面临的困境：是否应因一个人的承诺而把他当作富人。顾问们还探讨了他们是否能安全地转而请求宣言晚宴的宾客——洛克菲勒的政界朋友。从法律角度讲，他们不能在晚宴上募捐，因为那是纽约州的盛大集会，但他们是否能索要信箱地址或者甚至邀请客人们到街对面参加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招待会？“我认为这样做很难，就算你们再努力也一样，”利维森建议说，“洛克菲勒州长老练成熟。他知道你们需要资金，而钱就在那些人手里，拿不到就可惜了。我知道的所有腰缠万贯的人都希望自己捐款的时候，别人也捐款。他们最讨厌的就是独自捐款。我觉得，除非直说金博士在确定（能得到钱）的情况下才会出席，否则不会有什么不妥。”

那天的晚宴上，金批评肯尼迪总统在民权运动方面的迟疑，还指出由于“笔的问题”，他在住房歧视上未能兑现的承诺。洛克菲勒也批评了肯尼迪，内容和金的差不多，接着，他整理了一下《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动身到华盛顿，参加9月22日举行的百年纪念庆典。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台阶上，洛克菲勒加入一小群热情的人中。阿奇布尔德·麦克利什读了一首关于林肯的诗；安德莱·史蒂文森赞扬解放者是伊利诺伊州的骄傲；罗伯特·肯尼迪代表政府，却没有发言；此外，扩音器里传来肯尼迪总统提前录制的声音，而总统本人正在罗德岛的新港度周末。录音的演讲——即所有游说的最终成果——是非常高明的讲话，带来了历史的重重呼唤。肯尼迪总统对林肯宣言后各个事件的总结让民权运动专家不满，因为大体上说，他的总结将种族问题全部推给了过去。“种族隔离体制将黑人从美国公民中隔离出去，”肯尼迪的声音说，“黑人们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失去了平等的机会。在很多地方，黑人无法选举。长时间以来，黑人们都暴露在暴力和恐吓之下。那是耻辱而困窘的岁月。回首过去可以说，我认为，亚伯拉罕·林肯解放了奴隶，但从这个世纪开始，黑人公民将自我解放。”接着，洛克菲勒对《解

放黑人奴隶宣言》本身做了简短的演讲。这一国事活动压制了政客间的分歧，接着，马哈里亚·杰克逊对《共和国战歌》的演唱将之完全消解了。

金没有出现在林肯纪念堂。自从他将自己的梦想宣言交给肯尼迪总统后又两次入狱，现在他饱受摧残的希望转移到了1963年1月1日——《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生效百年纪念日，即禧年第一天。他希望那天之前能说服肯尼迪做出更大的实际行动。于是，金选择了更直接的方式，他直接到了伯明翰，因为肯尼迪总统在那里“值此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第六届年度会议之际”给他发了一封热情的电报。肯尼迪赞扬了金的“个人品行及互动的领导方式”，赢得了“美国大批人民的尊重与敬仰”。这封电报是那次大会的奖品，9月在种族隔离的心脏地带，公开朗读给了400位代表。

接踵而至的官方电报成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大会颇受欢迎的主题。伯明翰的新事件是庆祝宴会表面的平静下，潜在的冲突暗流涌动以及冗长的委员会会议。联邦调查局第一次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中安插了线人，而且还将每天的汇报送至总部。同样也是第一次，金按照安排要去一个施行种族隔离的城市，而那个城市已和白人领导者们进行了前所未有——同样也是初有成效的——一轮谈判。从这一角度看，金的飞机还没到达地面，他在伯明翰收获的就比在奥尔巴尼连续折磨几个月得到的还多。

这种紧张是两股潮流缓慢啃噬着布尔·康纳以种族隔离维持稳定这一做法的结果——一股潮流团结了城市中抗议的黑人们，另一股分化了城市中的白人们。伯明翰的公园关了一整年。棒球队也解散了。三K党的暴力活动不时发生。自1月逮捕了弗雷德·夏特沃斯后，黑人们就开始支持学生对城镇商店的抵制活动。抵制活动达到巅峰时，有些商人甚至会抱怨销售额下降了40%。金一年都想来伯明翰——不只是为了大会的事宜，也是为了这里可动员的人力，好在夏特沃斯在等待已久的与康纳的对决中表示支持。此外，金打算1963年回来，“对民权力量进行真正的动员”。他在9月初写给威廉姆·萧瑞吉的信中说。萧瑞吉是金父亲

那个年代在霍华德 23 号工作的雷厉风行的丧礼负责人，也是金 APA 兄弟会的成员，负责夏特沃斯的财务事项，也充当他的“外联人员”。3 月，夜晚骑马而来的蒙面人用枪弹洗劫他家时，萧瑞吉躲在前廊的墙后面，安全地躲过了第一波子弹，还一把把听筒从妻子手中打掉了。此后，萧瑞吉就在门廊边上建造了一间卧室，给那些晚上来保护他的志愿者住。

在白人看来，商会会长西德尼·斯迈尔已经缓慢探索了 18 个月——从伯明翰暴徒攻击自由乘车者的照片登上日本报纸头版引起的震惊至今——为扣人心弦的谜题找答案：如何在不提及布尔·康纳名字的前提下摆脱他。康纳的当选在政治上无懈可击，于是独立警察局局长、斯迈尔以及他的同盟就准备采取与会措施，取消整个办公室，而不针对个人。与律师、教师、公民学教授以及各种社会改良团体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会面之后，他们研究出了一套方案，即伯明翰急需一个现代且是“市长与市议会”形式的政府，就像亚特兰大和其他几个繁荣城市所做的那样。

改革的表面下隐藏着现实政治。人们可以在非公开挑战康纳或种族隔离的前提下为新的体系奔走。他们甚至可以吹捧康纳即将成为新任市长。然而，如果新的城市政府得到了认可，改革者们就可以寄希望于伯明翰的边缘选民，希望他们愿意选择一位更完美的市长，而非警察署署长。为了实施这一计划，斯迈尔首先试图招募一个由 25 位“奢华人士”组成的委员会代替公共委员会，可惜的是，所有被提名的人都拒绝了，因为他们知道斯迈尔的小手段瞒不过康纳。接着，斯迈尔决定建立一个由粉刷匠威廉姆·A·詹金斯带头、500 位“随便什么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有小商人、流行音乐播音员、工会员工，甚至是上一届选举时，尼克松当地竞选活动的负责人。9 月上旬，委员会实现了第一个奇迹——12000 名公民签署了请愿书，这早已足够发起为改变城市结构而进行的特殊选举了。

改革者们正等着法官确认请愿书并确定特殊选举日时，有人提到说马丁·路德·金就要到伯明翰了。大家认为这是非常不好的兆头，便派了一位使者悄悄前

往亚特兰大，请金取消大会。使者说，情况非常关键，取消布尔·康纳的办公室绝非易事，因为他再次当选警察署署长时，得到了61%的支持率，而种族对立将让边缘选民坚定地支持康纳。金礼貌地听完之后，把使者引荐给了夏特沃斯。

这些压力促成了夏特沃斯与西德尼·斯迈尔的结识。在六年多的静坐示威、抵制运动、法律诉讼、爆炸袭击以及自由乘车运动中，夏特沃斯从未获准与当地“权利集团”见面，或者就此而言，从未获准与伯明翰杰出的白人神职人员见面。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大会前几天，伯明翰首屈一指的黑人商人A.G. 加斯顿带领夏特沃斯参加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走进的时候，夏特沃斯还开玩笑说就连加斯顿这种富甲一方的人都不能走进伯明翰的白人酒店。他们到达后，斯迈尔握住夏特沃斯的手，称他“博士”，暗示了伯明翰前途未卜的改革运动。斯迈尔先是请求夏特沃斯说服金避开，当这一提议被搁置后，他又请夏特沃斯保证不会发生麻烦。夏特沃斯禁不住讲了一番话，说自己长久以来，经历了很多，一直盼望能得到这种谈判的荣幸，但接着，他说不值得为这种荣幸本身停战。城镇商店愿意放松多少种族隔离的做法以避免游行示威？斯迈尔说他不能代表城镇商店发言避开了这个话题，这时，夏特沃斯走到门口说：“你们不应该让我参与这次会面。”

就在第二天早上，斯迈尔把阴着脸的各大商店代表们召集到一起，包括西尔斯的、罗夫曼的、纽贝里的、格林的、伍尔沃斯，还有皮特兹的。会面在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开始，直到夏特沃斯打破沉默，说自己来这里是想听听他们的想法。又是一阵沉默之后，罗夫曼的代表说：“我不介意对我的水（喷泉）解除种族隔离。”

“噢，不，先生们，”夏特沃斯回答道，“我们现在说的不是水。我们说的是洗手间。女士们在你们的商店里总要整理梳妆。”

接着，令人痛苦的沉默再次降临，双方都嘀咕了一会儿后，A.G. 加斯顿试图打破僵局。“你知道的，你父亲和我基本是同时开始做生意的，”他对罗夫曼

说，“而且你也知道，你和我一样，是首先从黑人中找到了市场。我们一起得到了金钱，而且我们大部分客户都是黑人。似乎你应该做些事情。我们也不想游行，但我没有权力，我阻止不了。而这个人可以阻止游行。”他是说夏特沃斯有这种能力。

片刻沉默之后，夏特沃斯站了起来，说他们最好祈祷能有个好结果。准备走出房间时，他对伯明翰最大的百货商店所有者路易斯·皮特兹说：“皮特兹先生，上次他们在你的商店里逮捕了两名学生。这次就不一样了。我和马丁·路德·金将坐在你的长凳上，绝不离开。你在亚拉巴马州的生意就全完了。事情就是这样。”

夏特沃斯和皮特兹怒目而视时，罗夫曼赶紧站起来。“等一下，”他说，“我可以给保养人员打电话，重新粉刷洗手间门上的标志。”他指的是“白人专用”的标志。

这是突破的开始。在共同用水和共用洗手间的前提下，作为交换，夏特沃斯同意大会期间不进行游行示威。接下来是对细枝末节的探讨争辩。比如，“白人专用”的标志只能重新粉刷而不能取下，这样商店所有者在布尔·康纳过来说他们违反了当地种族隔离法律时，他们可以轻易地拒绝承担责任。最后，一场脆弱的讨价还价停滞了。双方都担心对方会出尔反尔。

联邦调查局的压力也不断增大。被奥尔巴尼大型逮捕的重复现象极度警惕的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从萨凡纳办公室的报告中摘录到夏天被关起来的黑人都在塞普提玛·克拉克在多尔切斯特的避难所“接受过训练”。这份报告不仅极度夸大了事实，而且还提供了误导性信息——奥尔巴尼游行中只有一小部分到过多尔切斯特，而且克拉克的课堂主要教授识字以及选民登记内容，不是抗议。无论如何，联邦调查局的长官们倾向于相信这份报告，认为这种前所未有的动荡肯定是干部们煽动的。这是隔岸观火的人们的看法，他们从未真正靠近过大型集会。这种说法剥夺了游行者们令人欣赏的人类动机，把他们当成了机器人，从某种程

度上说还是狂热分子。简而言之，他们在联邦调查局眼里更像是美国共产党，而且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多尔切斯特学校的负责人是杰克·奥德尔。

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把消息告诉司法部部长肯尼迪时说，根据从利维森处窃听来的消息，奥德尔对伯明翰来说是个威胁，肯尼迪应该通过助手约翰·席根塔勒悄悄处理这一问题。作为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前编辑，席根塔勒认识了凯利·米勒·史密斯牧师，詹姆斯·劳森、戴安·纳什以及约翰·路易斯就是在他的教堂组织了纳什维尔第一次静坐示威活动。史密斯是金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董事会成员。他离开参加伯明翰大会时，史密斯接到了席根塔勒正式而秘密的消息：政府非常关注金与一个已知是共产党人士之间的联系。金应该断绝与奥德尔的一切联系，而且金决不能允许奥德尔出现在伯明翰。

史密斯立即将消息告诉了金，金却说这件事是个吸引人的小麻烦。金相信，在当前背景下，这一直接警告意味着肯尼迪政府内部有一股麦卡锡主义的力量正在起作用，同时还暗示了金相对安全的解决方法：奥德尔不能去伯明翰。金亲自给奥德尔打了电话通知他。奥德尔被这一消息激怒了。按照安排，奥德尔在伯明翰大会上要主持几场专题会议——实际上，他是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选民登记的中心力量，也是联合组织委员会及其他组织的配合力量，是目前为止，在上一年中获得最大胜利的领域。奥德尔非常不满，抱怨说承认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接着又不许他参加会议是荒谬的妥协。金说自己见过政界中更愚蠢的事。

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9月24日周一开幕时，奥德尔留在了亚特兰大。伯明翰市中心的商人一直拖延，直到最后一刻才重新粉刷了“白人专用”的标志牌。无论如何，他们做到了，令黑人们惊讶不已。遵照协议，双方均没有将这一变化告知媒体，以免激怒布尔·康纳。然而，胜利让夏特沃斯比以往更斗志昂扬。周一晚上在圣约翰教堂的大型集会上，他介绍了金的先锋怀亚特·沃克，夏特沃斯的介绍热情洋溢，沃克一登上布道台就大声喊道：“我来伯明翰是为了骑在布尔头上！”刚刚入选棒球名人堂的杰基·罗宾逊当晚也赶来参加大会，但伯明翰的警

察拒绝让他骑摩托车去教堂。夏特沃斯让聚集的人群听从警察的指挥。“没人知道接下来的几天会发生什么。”他说。

从公众角度看，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伯明翰大会引起的轰动不亚于扶轮俱乐部的午餐会。的确没有游行活动。那一周，新闻版面铺满了发生在密西西比的事件——J.H. 梅瑞狄斯就读密西西比大学的申请到了关键阶段。罗斯·巴内特州长曾在一次引人注目的肢体冲突中阻止了梅瑞狄斯。（密西西比法律规定巴内特本人是紧急教务主任，作为阻止法庭约束常规登记的手段。）很快，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就传唤了教务主任和大学信托人，以蔑视法庭要挟他们，让他们保证梅瑞狄斯能顺利入学。

9月25日周二，刚到伯明翰，美国联邦执法局局长詹姆斯·麦克沙恩就和约翰·多尔一起到新奥尔良的迪拉德大学接梅瑞狄斯。多尔是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志愿传信员，负责传达反对规避和阻碍方面的最新命令。梅瑞狄斯跟妻子和梅德加·埃弗斯告了别。埃弗斯一直在独自走向密西西比大学这件事上给梅瑞狄斯建议。在新奥尔良机场，梅瑞狄斯下楼到有色人种使用的零食吧台和洗手间时，多尔和麦克沙恩只能尴尬地等着。之后，他们3个人就一起搭乘隶属于美国边境巡逻队的塞斯纳220型飞机飞往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密西西比州高速公路巡逻队的飞机全程护航。在华盛顿，阿尔·罗森告诉伯克·马歇尔，联邦调查局一连串报告显示，巴内特、学校信托人以及几个当地警察威胁说只要梅瑞狄斯稍有不慎，就逮捕他。

梅瑞狄斯3个人坐车到杰克逊中心的联邦大厦，教务主任罗伯特·埃利斯同意行使自己令人憎恶的责任，接收了梅瑞狄斯。然而，3个人发现州长官们并不在场。多尔将最新消息告知华盛顿时，马歇尔发现他们在几街区外的伍尔福克政府办公大楼。受托人主席告诉马歇尔他们会尽力遵守法庭命令，不过受到了限制——实际上，他们在巴内特和立法机关的监管之下，而立法机关还传唤他们为大学危机作证。另外一位信托人告诉马歇尔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命令并不适用，

因为梅瑞狄斯到联邦大厦时已经晚了。马歇尔给新奥尔良的塔特尔法官打了电话，简要叙述了上述争端，而他也通过电话让最后期限得以延长。信托人最终不情愿地放下了时间上的计较，却对地点毫不松口，坚持认为延长令指明联邦大厦的部分并不适用。那时已经快到晚上了。罗伯特·肯尼迪决定让步，把梅瑞狄斯送到了伍尔福克大楼。

“为了避免吸引太多注意，你可以清场吗？”肯尼迪问巴内特州长。

“你们应该准备一个大地方，”巴内特说，“那些人不会把他怎么样。”

很快，长时间的等待就结束了。多尔、麦克沙恩和梅瑞狄斯在伍尔福克大楼外聚集的2000多个窃笑的人中挤了过去，接着搭电梯到了10层，从走廊中另一群人中走过。巴内特沐浴在电视灯光下，堵住了1007房间的入口。里面的立法者们坐在高高的座位上，桌子也很高，以便获得更好的视野。多尔走上前向巴内特解释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命令时，电视机及收音机将这一对密西西比人的反抗带到了全国。就如他本人体现出的那样，巴内特“干涉了”密西西比的统治权，他横在梅瑞狄斯和大学负责人之间，而大学负责人非常愿意遵从命令。

“谁是梅瑞狄斯？”巴内特的问题引发了几声轻笑，因为尽人皆知的梅瑞狄斯就站在他面前，是在场的唯一一个黑人。巴内特向梅瑞狄斯宣读了自己的第二次干涉宣言，以“因此，不可接纳你为密西西比大学学生”结尾。反叛的欢呼声从10层以下围在收音机前的人群中传来。巴内特拒绝多尔入内，一些立法者唱起了歌：“走吧！走吧！”一个声音大喊着：“为州长高呼3次！”人们轰赶着梅瑞狄斯3个人，接着又回到房间里庆祝去了。一个州参议员称赞巴内特的做法是“密西西比有史以来最棒的发言”。另一个人发誓坚守立场：“无论要花费多少时间、精力、金钱和人类的生命。”

当晚，梅瑞狄斯回孟菲斯的路上，愤怒的罗伯特·肯尼迪给欢呼雀跃的巴内特打了电话。“他明天会出现在教室。”肯尼迪说。

“密西西比大学的教室？”州长惊讶地问，“没注册怎么可能上课？”

“我想有人已经安排好了，”肯尼迪说，“一切都解决了。”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做到的，”巴内特说，“他们要给他特殊待遇吗？部长，他们不能那样做。”

10分钟后，肯尼迪又给巴内特打了电话，因为马歇尔和其他司法部的官员说服他必须先提前通知巴内特梅瑞狄斯到达密西西比大学的事情。否则，巴内特就可以对发生在梅瑞狄斯身上的暴力事件撇清一切责任。肯尼迪不仅向巴内特传达了这个消息，还严肃地给他上了一课，告诉他联邦法律的威严。“州长，但无论如何，”肯尼迪说，“他们10点会过去。”

“10点正好。”巴内特礼貌地说。晚上，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3位法官签署了一份命令，要求巴内特周五到新奥尔良出席听证会，讨论巴内特是否应该因蔑视法庭而被捕。即将到来的种族冲突，以及甚至可能的武装力量一直占据着接下来几天的新闻。《纽约时报》发表了3篇关于梅瑞狄斯的头版文章，通栏大标题是：《密西西比州州长蔑视法庭》《不准黑人学生入学》《美国政府准备派兵》。

多尔、麦克沙恩以及梅瑞狄斯第二天早上乘坐同一架塞斯纳飞机回到了密西西比，不过这次是要到牛津镇去。他们的到来就没有部队跟随，也没有其他支持力量，因为罗伯特·肯尼迪希望尽力避免联邦政府必须采取非常规手段执行法律的情况。密西西比州高速巡警出人意料地让他们留在大学门口就走开后，3个人只能独自上前面对副州长保罗·约翰逊，而约翰逊身后跟着大批州警察和地方警察。第三次对峙的结束方式和其他两次差不多，只是这次麦克沙恩局长站了出来，因为之前他通过电话得知密西西比人想通过展示武装力量挽回面子。“副州长，”麦克沙恩对约翰逊说，“我想我有责任走过去，把梅瑞狄斯先生带进去。”

“你不能进去。”副州长约翰逊回答。

“副州长，不好意思，我必须这样做，我必须进去。”麦克沙恩说。几次口头拒绝后，麦克沙恩明白了，关于让步的谣言不是真的。他和多尔带着梅瑞狄斯再次离开了，让密西西比的情绪更为高涨。

当天晚上，金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大会上发言，尽管朋友和敌人都认为奥尔巴尼运动是失败，但金还是辩白说奥尔巴尼运动在政治上是成功的。幸好媒体对此并不感兴趣，金能把大量时间用在策划另一次协同突击中，避免发生在奥尔巴尼的失误。和夏特沃斯一起，金召开了一次亚拉巴马领导人的特殊会议。他们安排了新年的面对面招募之旅以及运用选民教育计划资金进行选民登记事业的事项。抵制圣诞节购物为计划“在亚拉巴马某地”进行对抗的第一阶段。金知道有人渗透到了组织内部，所以并没有说明目标城市。此外，他还担心在伯明翰进行的同时，会影响谈判的进行。但夏特沃斯并不在乎这一点。“你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收起那些标语，”他告诉金，“你走了他们马上就挂上去了。”

巴内特省长发誓无视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命令以及两帮政府公开以武力支持梅瑞狄斯的威胁，于是，评论者将这次对抗与小岩城和萨姆特堡正在发生的事做了对比。罗伯特·肯尼迪先发制人，通过连续不断的电话向巴内特施加压力。从他们的声音中可以知道，虽然同为美国人，但听上去却像两个陌生人。肯尼迪音调较高，是带有鼻音的波士顿人，声音中充满能量，但经常被停顿和断断续续的旁白打乱思路；巴内特声音较低沉，带有密西西比人的不紧不慢，语句几经雕琢，语法更为清晰，将他的勇气掩藏在朴素的亲切感后。他们中的共同点就是相信政客们承受风险的最佳方式就是为对方的利益着想——避开共同的争议，照顾对方的想法。由此，肯尼迪从未用蹲监狱的可能和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给巴内特施加压力。他没有像1865年，立法机构试图将有偿《黑人法令》强加在刚解放的奴隶身上时，《芝加哥先锋报》做的那样，发誓说“把密西西比州改造成青蛙池塘”。巴内特也没发誓说堵住学校的大门或者像反叛英雄一样死在烈火之中。相反，巴内特关注肯尼迪想在尽可能不公开动用联邦力量的前提下，让密西西比大学接收梅瑞狄斯的需要，而肯尼迪则关注巴内特每个密西西比敌对者都会说的那样维护种族隔离的需求。

不可避免地涉及公共关系时，他们会设想在校园门口佯装进行决战的协议。

两大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将支持梅瑞狄斯，而虽然不情愿但不得不屈服于强大武力的巴内特将转而致力于让密西西比大学接收梅瑞狄斯。讽刺的是，肯尼迪说这话时支支吾吾，想表现出自己为巴内特考虑的样子，但并没有满足巴内特希望看上去自己是被摆布的一方的需求。

“部长，你好，”巴内特某天下午说，“我听说他们按捺不住要拔枪了。这真是让人尴尬的情况。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人，如果有个人拔出了枪，我们就全体转身，那就更让人难堪了。他们会全部拔枪相向吗？”

“我不希望他们拿出枪，”肯尼迪说，“我想这会带来不好的气氛。不过有一个人拿出枪来其他人都不动不就够了吗？”

“他们必须都拔枪，”巴内特坚持道，“他们应该用枪指着我们，这样我们会站到一边去。”

傍晚时分，多尔和麦克沙恩准备陪同梅瑞狄斯再次到密西西比去，第四次尝试登记入学——这次他们从孟菲斯开车出发——巴内特和肯尼迪还在设想那个场景。巴内特害怕肯尼迪假装两人之间达成了协议。这样他自己在密西西比的政治生涯就断送了。肯尼迪将对梅瑞狄斯的武力支持减少到让巴内特不舒服的程度，还安慰他说可以将两个人假想的对峙变成现实。

“你知道我们之间没有协议。”巴内特说。

“没错。”肯尼迪答道。

“我只想告诉你——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在妥协。”巴内特接着说。

肯尼迪安慰巴内特说自己还没看到妥协的迹象。“我就是告诉你我们要过去，要带着武力过去。”肯尼迪说。

实际上，两个人都知道，联邦力量不会跟随梅瑞狄斯而来。关于牛津暴徒的数量报告堆积在肯尼迪桌子上，计划中这个部分实现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密西西比陷入了挑衅似的兴奋状态中。号角的巨响随处可见。联邦旗帜随处可见。广播台的紧急节目在密西西比大学电子公告板轮换的间歇就播放关于“迪克西”的

报道。联邦调查局流传着自发组织的维持治安的人带着武器和啤酒冷却器从遥远的其他州赶来，发誓保卫密西西比州。梅瑞狄斯的小车队离开孟菲斯了，肯尼迪担心对他来说人数很少但对巴内特来说够多的联邦陪护队可能并无法处理暴力冲突事件。他希望巴内特保证密西西比州官员能在小部队离开校园后确保梅瑞狄斯的人身安全，但那时巴内特却说州警察的力量微弱且很容易屈服。“他走进校园后，”巴内特对肯尼迪说，“你肯定不能指望我们随时保护他。”

“州长，任何必要手段，”肯尼迪说，“采取任何必要手段维护法律和秩序。”

“部长，但是，”巴内特抗议道，“我说我觉得自己无法同意一个人入学后还要保护他。他入学了，就只是一个普通男孩。”

“我想最好先不让他去了，州长。”肯尼迪尖锐地说，但他让车队继续前进。

一个小时后，刚刚在拥挤且武器到处皆是的大街上转了一圈的巴内特又给肯尼迪打了电话。胆怯带走了他声音中的花招。“肯定会有 100 多个人被杀。这会毁了我们的。请相信我，很多人都会因此而死。这会让我很难堪。”

“我不知道这会会不会难堪，”肯尼迪说，“应该不会的。”巴内特直白而自私的评论让肯尼迪摆脱了剧作家的角度。

“这对整个国家来说都不好。”巴内特说。

“我会让他们回来。”肯尼迪回应道。他的命令立刻通过军用联络通道从司法部传达到了通信飞机上。梅瑞狄斯的车队正以差不多每小时 100 英里的速度飞奔在密西西比刚建成的洲际高速公路上，而肯尼迪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随车而行的多尔那里。他们在密西西比州牛津镇西边贝茨维尔的一家加油站停下来，多尔和麦克沙恩亲自给罗伯特·肯尼迪打了电话，确认撤退的消息是否属实。梅瑞狄斯坐在车里，对坚韧而不安的他来说，贝茨维尔看上去很荒凉——所有人听到了收音机里的报道，都跨上摩托车前往密西西比，参与反对自己的行动了。他们掉头回孟菲斯的时候，梅瑞狄斯倍感轻松。

冲突不断升级，事件不断。杰克逊县《每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数千人称愿

意为密西西比而战”的文章，力劝读者们学习反抗之歌《不，绝不》。除了密西西比州，新闻关注点也落在肯尼迪政府上。那一周《纽约时报》上第三套三层标题是《美国政府避免冲突》《梅瑞狄斯入学应采取新措施》以及《增派了数百位士兵》。周五，在新奥尔良，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全体陪审团在巴内特州长缺席的情况下审理了案件，认为他蔑视法庭罪成立。副州长约翰逊很快也收到了同样的判决。3位法官决定如果他们未能在下周二前保证梅瑞狄斯的登记以改正错误，那么周二开始将开始无限期的牢狱生活。罗伯特·肯尼迪被认为是这个判决的幕后操纵者，现在，他面临着新的政治困境。午餐后，巴内特给肯尼迪打了电话，得到了黑人士兵不会出现在第二天登记现场的保证。

尽管几天前肯尼迪还说巴内特是个“疯子”——有报告称巴内特被飞机螺旋桨打到过脑袋，而且尽管他现在把巴内特的追随者当成疯狂的当代褐衫党，但他还是没有使用武力支持梅瑞狄斯，因为那样做不仅会暴露国内权利的枯竭，也会影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私下与巴内特合作，制造一种官方授权的戏剧性效果，最好可与莎士比亚剧作相媲美。只有天才才有希望将常态和管控按照所希望的幻觉一样谱成乐曲，尤其是肯尼迪和巴内特同时听到了大众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引得大批游民掀翻了他们的舞台。把州长关进监狱的威胁为剧本添加了新的素材，5点时，五角大楼向自得克萨斯州到新泽西州的部队发出了三级戒备状态信号：4小时内准备出发。

相比之下，金的大会枯燥无味。周五下午，300位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代表们在闭幕会议上通过了几项决议。一项决议号召司法部改进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周围宪法权利保护方面的不足之处。另一份称赞了詹姆斯·梅瑞狄斯到密西西比大学注册入学的勇气。在不紧不慢的闭幕发言中，金提醒听众参与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接下来的其他主要活动——比如12月威廉姆·孔斯特勒夫人在纽约城郊举办的节日性基金筹集活动，小萨米·戴维斯以及彼得·劳福德将作为主角出席——这时，听众中的一个白人走上讲台，猛挥右拳。这一拳打在金的左脸，发

出很大的声音。金连连后退，还转了半圈。

所有人都沉默地看着，头脑发蒙，不知所措。有些人知道金介绍那个人是白人高官，很隆重地欢迎他参与伯明翰第一届全体会议。有些人认为那是非暴力研讨会提前安排的示威。但那个人并没有停手，还在殴打金，这次他从后面打到了金的侧脸，还两次把拳头砸在金的背上。人群中的尖叫声不绝于耳，就像一位代表写的：“有一会儿听上去就一个人在喊。”朝着讲台的方向。人们回忆说暴力的力量已经把自己震慑住了——不仅是对金的袭击，还包括会堂内憎恨的突然爆发。

袭击者挥拳的频率下降了，他后来说，自己以为会被人们撕成碎片。但他打得很用力。被最后几拳打得连退几步的金，转过头来面对着袭击者，双手下垂。金脸上的表情让很多人难以忘怀。塞普提玛·克拉克听很多人私下里抱怨过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牧师们自负的方式，就算看到尊贵的领导人释放怒火也不会震惊，但金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平静，让她很惊讶。金的手“像新生儿的”一样垂下来，她描述道，从那一刻起，她相信金所说的非暴力不只停留在他演讲的热情上，也不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非暴力是金天性带来的反应。这一印象让其他人也颇为震惊，甚至包括袭击者——他盯着金看了很久，直到怀亚特·沃克和其他几个人站到两个人中间。

“别碰他！”金喊道，“别伤害他。我们应该为他祈祷。”他的话宣告了一场即发性危机的终结，激起了一片吵闹声，有些代表大声重复着金的指示，其他人则憎恨地朝袭击者高声叫喊。几位牧师围住了袭击者好保护他。沃克、安德鲁·扬、伯纳德·李以及伯明翰的牧师爱德文·加德纳则在悄悄商议处理之法。有个人赶紧走过去对着麦克风说：“我们可以现场处理这件事。”好稳住众人。其他人看到有人想冲出去将这一消息告诉外界，便赶紧下令关上每个大门，以免黑人暴徒或者第二拨袭击者的出现。金一直小声和那个白人说话，说没人会伤害他；那个人说得不多，只是含混不清地提到自己信仰白人的权威，而小萨米·戴

维斯却和一位白人女性结了婚。金和牧师们陪他慢慢走下讲台，到一间私人办公室去。匆匆组织的四重奏歌手们赶紧走到麦克风前，为了稳住各位代表，唱起了《希望耶稣与我同行》和忧郁的奴隶圣歌《悄悄走向耶稣》。詹姆斯·贝弗尔打断了他们，说事态并不严重——金博士没有大碍，他们经受住了对非暴力的严峻考验。贝弗尔宣布这是愉快的时刻。接着，就带领大家唱起了《我踏上了到自由之乡的旅程》，大家的声音越来越大，整个教堂都为之震动。

金再次出现时，脸上按着装满冰块的手帕，众人也停止了歌唱。公交抵制运动之母罗萨·帕克斯拦住他，把自己最喜欢的缓解头痛的方法递给他：两片阿司匹林和一瓶可口可乐。接着，金宣布自己和袭击者在办公室里进行了心平气和的谈话，那个人说自己是为美国纳粹党完成任务的士兵。金拒绝对其提起诉讼，这激怒了到达会堂的伯明翰警察们，因为这种做法会让他们的长官布尔·康纳陷入违反常理的困境之中。允许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大会在伯明翰召开，康纳违反了自己重要的政治法则——尤其是他曾因此拒绝过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本人，现在，他毫不犹豫地指出一个白人不可以黑人合法举行的种族隔离的会议上攻击金。康纳同意这次大会的召开如同他同意商店摘下“白人专用”的标志一样，都是迫于无奈，希望商人们也能支持自己，反对新的城市法规。他所有的隐忍换来的只是一个疯狂的“纳粹分子”以及公开这件事后并不受人拥戴的前景。由于金拒绝提出诉讼，康纳只好让自己的部门提出诉讼。伯明翰警察说服罗伊·詹姆斯认罪，让他去蹲30天监狱。

想把消息告知外界的怀亚特·沃克却发现自己暂时无法达到目的，因为几个早就来到伯明翰的记者已经离开去报道密西西比大学发生的事了。最后，他找到了《纽约时报》的一名年轻记者，那个记者很有同情心，也值得信赖，他写了一篇以伯明翰为发稿地的文章，仿佛自己亲临现场一样。记者害怕自己被骗，只能将袭击者描述为“自封纳粹分子”。更切实的报道没能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然而联邦调查局特工几个小时之内就报告总部说詹姆斯是美国纳粹党的议员，他的住

址位于华盛顿特区外纳粹“控制区”。联邦调查局关于罗伊的前科调查档案显示他之前因暴力行为曾在新奥尔良以及出生地纽约州被捕。几乎就在同时，警方拦截到一封纳粹党指挥官乔治·林肯·洛克威尔的信，信上称詹姆斯“中尉”，“你的英雄行为为数百个人带来了新的力量，他们都很愤怒，抗议因其打了黑人共产主义煽动者就把美国白人关进监狱的做法”。此外，洛克威尔还说：“罗伊，我知道你不想待在监狱。”便承诺马上就将詹姆斯保释出来，这封信以“希特勒万岁！”结尾。洛克威尔的信以及其他针对金的有组织暴力事件报告都掩藏在文件堆中。

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与会代表离开后，伯明翰的一位法官同意11月对新的城市法规进行公民投票。玷污了自己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信条却未能换来政治奖赏的布尔·康纳终于对政治改革的哄骗失去了耐心。他立即派手下通知各大商店主人，说他们违反了城市法令，于是，“白人专用”的标志陆陆续续又挂了出来。

下巴肿胀、后背青紫的金在亚特兰大的家中看到了电视上播出的密西西比大学事件的结局。9月29日，詹姆斯在伯明翰攻击金的第二天，电视上播出了牛津前少将埃德温·沃克到达牛津的消息。埃德温·沃克由于不服从命令，辞去了在美国部队的职务。埃德温·沃克已经在广播节目上召集了志愿者，承认自己曾“站在错误的一方”，5年前执行艾森豪威尔在小岩城中央高中废除种族隔离的命令并不妥当。“支持巴内特，反对卡斯特罗！”他宣布道，“带上你们的旗帜、帐篷和平底锅！是时候了！机不可失！”其他几个镜头显示卡车和小汽车已经在牛津的街道上巡行。情报报告发现三K党支部已经从遥远的佛罗里达州出发了。巴内特的桌子上堆叠着大批表示愿意保卫密西西比州的电报。

周六下午，罗伯特·肯尼迪认为情况已经严重到必须请总统本人与巴内特进行密谈的地步了。在总统办公室，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也加入了肯尼迪、伯克·马歇尔以及肯尼斯·奥唐纳之中，所有人都期待地坐在总统身边，等着打给

巴内特的电话接通。“拿下他，强尼。”司法部部长朝兄弟不自然地笑了笑说，仿佛在鼓励一个拳击冠军。总统轻松地演练起会议进行的情形：“州长，我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不是路人甲，不是路人乙，也不是拉齐维尔公主。”这时，电话接通了，肯尼迪总统严肃起来，一下就被带离了方向。巴内特问总统早上是否已经和司法部部长讨论过司法部部长与巴内特的助手之一汤姆·沃特金斯最近的谈话内容。尽管总统有兄弟的帮助，还是没能跟得上这种辗转多次的对话。于是，巴内特便借机说，让肯尼迪总统等一下，自己的助手——州长口中的“一流律师”——会把自己未详细说明的想法亲自带到华盛顿。肯尼迪总统同意让司法部部长亲自接待他，又问起巴内特打算如何对待周二的最后期限。

“我想多思考几天。”巴内特回答。

“这是当然，”肯尼迪说，“州长，问题是，我和你一样，也有自己的职责。”

“我明白，”巴内特答道，“我非常欣赏这一点。”他说到最后两个词的时候拖着长长的尾音，谈话一度中止。再次强调自己希望汤姆·沃特金斯的方法能成为解决方法后，巴内特准备结束谈话。然后，巴内特出人意料却真诚地说：“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家禽项目以及其他类似项目的关注。”

肯尼迪总统强忍住笑，直到电话挂断，之后又因为巴内特竟在面对宪法危机时还能提到家禽而惊讶，轻笑不止。“你这一周都在和沙发靠垫打交道。”总统对司法部部长说。总统说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巴内特热情简单的方式让他看上去像个容易被欺骗的人，但从客观事实看，州长绝不是能轻易被打败的人。总统的个人权威——小心地保留至今——并没有对解决危机起到太大作用，只是批准了一次推迟而已。支持种族隔离的人们快速涌入牛津，司法部官员甚至来不及召集他们由狱警、巡逻特工以及二等兵组成的自由乘车式的民众力量。这股力量聚集在孟菲斯外的海军航空基地，是从3家监狱和墨西哥边境抽调的联邦力量，但最多也只有500人。

白宫里，与会者认为要采取比语言更强有力的行动才能改变巴内特。他们决

定把密西西比国民警卫队收归国家所有，尽管这些人不一定会站在詹姆斯·梅瑞狄斯和肯尼迪政府一方而对抗其他密西西比人。司法部部长立即就让律师们着手准备必要的总统公告，而总统本人也给自己的首席撰稿人——泰德·索伦森打了电话，让他打起精神为自己写一封电视发言稿。索伦森因白宫事务繁忙而得了溃疡，当时正在医院疗养。他同意为肯尼迪写发言稿，说会根据“共和党人都和罗斯·巴内特站到了同一阵线”这一事实拟写几个要点。

“除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笑道。他很欣赏索伦森的讽刺，能让人现在更正面地看待小岩城事件。“艾森豪威尔基本没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他说。

“不，我指的是在亚拉巴马的共和党人。”索伦森说着，指出至少在南方腹地，肯尼迪能免受党派斗争的困扰：两个党派都会攻击他。

距第一通电话一个小时后，总统办公室拨出了第二通打给巴内特的电话。这次，罗伯特·肯尼迪清除了障碍。他告诉巴内特他们不用等汤姆·沃特金斯来华盛顿了，因为“那只是浪费他的时间，他没有任何建议，”肯尼迪说，“州长先生，他刚才告诉我了。”

“我想他确实有个主意。”巴内特说，听上去很疑惑。

“不过，他没有，”肯尼迪说，“我的意思是，他说了一些关于把梅瑞狄斯送到，呃，偷偷带进杰克逊，让他注册，而那时你们所有人都在……”

“哪里？”巴内特问。

“在牛津。但这都是胡说，对不对？”

“好吧，我不知道，”巴内特慢吞吞地说，“怎么会？为什么不行？你知道的，杰克逊就是他们最先让梅瑞狄斯去的地方。”这个主意是说巴内特将继续领导种族隔离主义者到位于牛津的密西西比大学进行提前安排好的对抗；同时，肯尼迪等人可以偷偷将梅瑞狄斯带到已经成了空城的杰克逊，按照之前登记时的法庭命令，安排梅瑞狄斯登记。通过这个狡猾的计划，巴内特可以向密西西比人民发誓自己在种族隔离方面没有做出任何让步，而梅瑞狄斯之所以能登记，完全是肯尼

迪等人暗中密谋的把戏。

果不其然，巴内特一直拖延，等肯尼迪开口说出这个计划。肯尼迪说出来之后，他欣然接受了，说那是一个相当棒的建议。他的热情让肯尼迪重新考虑了这一计划。计划中明显的不足是，就算梅瑞狄斯可以跨越注册入学的巨大障碍，他离位于牛津的校园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而这段时间里，巴内特就可以召集密西西比的力量，阻止他踏足校园。也许注册入学只是“愚人计”而已。想到这里，肯尼迪便要求巴内特保证州警察将维持牛津的秩序。后来，总统接电话时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

“噢，他们会那样做的。”巴内特保证说。他说 220 位高速公路巡警作为当地警力的外援，将“采取积极行动，尽力维护法律与秩序，总统先生，他们绝对不会带武器”。

这一意外转折让肯尼迪有点踌躇：“我以为——”

“他们每个人都不会带武器。”巴内特骄傲地说。

但问题是，肯尼迪总统继续说：“他们要怎样维护法律与秩序并阻止暴徒，他们能做什么？”肯尼迪希望州警察在镇压暴徒的时候全副武装，对待梅瑞狄斯的时候采取非暴力的方式就可以了。但巴内特拒绝这种太过精明的打算。他高兴地坚持之前的谈判方案，当时罗伯特·肯尼迪提到了报纸标题上的现实——州警察统一战线，反对梅瑞狄斯。总统意识到自己是在之前的协议中逆流而上，而保密的要求让他的困境更为恼人。他觉得自己像个农夫，试图告诉一头狡猾的驴，要想让全家吃饱就必须耕地。然而，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都认为巴内特的计策确实是前进的一步。一旦梅瑞狄斯注册入学，事情的发展就掌握在他们手中了。巴内特下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总统再次提到，他不要有对牛津暴徒采取非暴力方式的想法。

之后不久，关于运动的消息就在白宫传开了。皮埃尔·赛林格给电视台打了电话，取消肯尼迪总统当晚计划的演讲。伯克·马歇尔给司法部打了电话，告诉

律师们不必准备紧急宣言了。“我们和巴内特达成了协议。”他说。尽管起草文件的人知道这个消息意味着自己周末可以回家了，所以很开心，但还是对此心存疑虑。诺伯特·施莱的预感很强烈，所以留下自己的秘书加班到深夜，把要求的总统文件打成定稿。与此同时，罗斯·巴内特到杰克逊的纪念体育馆观看了密西西比大学反叛者队与肯塔基大学野猫队的比赛。政治危机的狂热将橄榄球仪式的正常情绪推向了极度热情的高度，比赛进行到一半时，人们竟大喊着“我们需要罗斯”，声音震耳欲聋。巴内特努力走到50码线的地方，举起反抗之拳，通过扩音器高声喊着：“我爱密西西比！”人们再次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声，都快压过了巴内特的声音。巴内特等声音小了一些时，又大喊道：“我爱密西西比人民！”接着到达了情绪的最高峰：“我爱我们的传统！”这3个简短的句子足够点燃战前强烈的情绪。人们可以为之赴死。和黑人在种族隔离主义者到来时的狂热相比，这种情绪既非常相似又相差甚远。没有一个人预见到那场橄榄球赛是之后至少一代人中，令人敬仰的白人们最后一次激进的种族集会。

华盛顿方面，诺伯特·施莱刚刚回到家，伯克·马歇尔就打来电话说协议再次取消了。巴内特没能将之进行到底。“总统想签署文件。”马歇尔说。于是，周六午夜，施莱赶紧将文件带到白宫，又带到楼上的居住区。肯尼迪总统查看着宣言中召集军队的必要性时，问道：“这和艾克1957年在小岩城事件上签署的差不多吧？”得知确实如此之后，肯尼迪就签署了。他将文件交给施莱，站起来时还敲了一下桌子。这一刻激发了他的历史情感。“你知道吗，”肯尼迪说，“这是格兰特将军的桌子。”之后，肯尼迪跟施莱说了晚安，但很快，他又拦住了带着文件准备面对白宫媒体大军的施莱。“别告诉他们关于格兰特将军桌子的事。”肯尼迪叮嘱说。他不想因为内战时的事情再次激怒南部各方人士。

周日，罗伯特·肯尼迪和巴内特再次商讨解决之法，而此时五角塔楼已将通知传达到了密西西比警卫部队——他们现在必须听从总统的指挥。巴内特告诉罗伯特·肯尼迪他需要一场真正的武力展示作为撤退的伪装时，很难说种族隔离主

义者的情绪膨胀是巴内特的堡垒还是绊脚石。巴内特提出了一幅拔枪相向的大场面，这次要有 300 名左右的密西西比执法者和 300 位“士兵”（显然是从自发组织的治安维持者中招募的仪仗兵）分别在密西西比大学的门口站成 3 队挡住梅瑞狄斯。巴内特就站在最前面。巴内特说，如果肯尼迪能派出联邦特工中的优势警力，并用枪对准他们，那么自己在保有颜面的情况下就能命令大家撤退了。

现在肯尼迪犹豫了。巴内特提到的部队人数比 1861 年萨姆特堡卫戍部队的还要多，他在耍花招，这样和林肯不同的是，肯尼迪就将成为挑衅者。州长不停地说所有密西西比人都不会带武器，但肯尼迪并不太相信。他告诉巴内特，大撤退计划太危险了，根本不可接受。根据伯克·马歇尔对谈话的记录，司法部部长“说自己认为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政治的范围”。

肯尼迪的意思是整件事已经无法用政治礼仪解决了，他立刻瞄准巴内特的政治神经中心，射出了一支利箭。司法部部长告诉巴内特，总统决定当晚进行全国演讲，不得不说自己已经派出了部队，因为罗斯·巴内特州长没有按照昨天的约定让梅瑞狄斯注册入学。

“绝不可以！”巴内特大喊道。

“是你没有遵守对他的承诺。”肯尼迪没有让步。

震惊到难以置信的巴内特问：“你的意思不会是总统今晚将进行全国讲话吧？”

“当然是今晚。”肯尼迪回答，说他们有一份完整的记录，包括通话次数、通话背景以及通话内容。“我们全部有记录。”肯尼迪说，突然拿出自己悄悄汇总的电话内容作为威胁。

巴内特十分痛苦地咆哮起来。他无法抗议，肯尼迪兄弟郑重承诺会保密，但司法部部长只是说巴内特也说谎了，一次谎言可以抵消一个承诺。巴内特开始恳求肯尼迪。政府工作人员不能至少在校园周围设置围栏或者路障吗？司法部部长可不可以劝说总统不要提到之前的约定？肯尼迪拒绝了他，扩大自己的优势。他

知道数百万美国人都会认为欺骗总统是弥天大错。他还知道州长的畏惧恰恰相反：巴内特害怕的是他与总统私下订立的废止种族隔离的约定公之于众。巴内特宁肯接受一万个谎言，也不想让这件事为人所知。

深陷苦恼中的巴内特突然想到了一个新主意。“您下午何不和他一起搭飞机来？”巴内特突然问。这个主意是改变注册地点的变体，巴内特建议从梅瑞狄斯注册的时间上做文章。周一或者周二，巴内特召集密西西比所有力量准备一决胜负时，他们可以把梅瑞狄斯悄悄带进位于牛津的校园。巴内特可以说自己被蒙蔽了。这个主意成了新协议的焦点，尽管讨论中常常伴随着谎言和拆穿谎言的争吵。伯克·马歇尔和汤姆·沃特金斯接了电话以缓和气氛，并完成了详细的计划安排。肯尼迪同意维护巴内特在反对梅瑞狄斯运动中的形象。反过来，巴内特同意让肯尼迪去掉声明中对巴内特专横的说法以及反对废除种族隔离的请求，并承认梅瑞狄斯的登记是既成事实。

之前自由乘车运动时，司法部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所以便立刻行动起来。那个周日，任何偶然出现在走廊的律师都可能被带上军用运输飞机。几小时内，税务部部长发现密西西比州牛津镇邮局的地下室变成了“指挥中心”，自己正在那里发号施令。媒体发言人埃德·格斯曼在电话和部队驻扎地之间来回奔忙，法律文书起草人诺伯特·施莱也是一样。坐在飞机上的法律突击队发现他们中的一员还是罗伯特·肯尼迪在哈佛时的橄榄球密友，那位律师刚好周末到华盛顿参加白宫关于麻醉剂的会议。他们刚下飞机，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就成了公众力量的现场指挥官。他刚要走出司法部时，肯尼迪拦住他说：“嘿，卡岑巴赫。如果你被打中了也别担心，总统正好需要道德事件。”卡岑巴赫对着他温暖的讽刺和僵硬的笑容不禁笑出了声。这就是肯尼迪的派头——雄赳赳气昂昂上战场的机灵新手。

正通过孟菲斯机场电视观看专业橄榄球赛的詹姆斯·梅瑞狄斯不得不登机，和多尔以及麦克沙恩一起飞向南方。大约下午6点，他们从塞斯纳飞机上往下看

时，被牛津小机场的变化惊呆了。场地上满是军用卡车、大巴车、吉普车、小轿车和政府专用飞机，还有成堆的帐篷以及制暴设备。其他物资还包括很多诸如巨型探照灯的大物件。飞机降落时，卡岑巴赫和格斯曼在地面迎接，他们搭乘的捷星航空两个小时前从华盛顿抵达了这里。梅瑞狄斯3人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让300位美国士兵中的大部分围住了密西西比大学的行政楼，也叫学园楼。卡岑巴赫之前认为梅瑞狄斯将在那里注册，但多尔说，校方官员表示出于宗教原因，已和伯克·马歇尔谈过周日不宜注册入学。这一变化冒犯了卡岑巴赫，因为他不得不决定是让士兵们整晚留在学园楼等着第二天早上的注册还是让他们离开。卡岑巴赫说无论怎样选择都不容易处理，因为牛津镇中心挤满了人，而且气氛紧张。士兵们头戴白色头盔，手臂上戴着黄色臂章，他们刚一出现，广播台就发出了警报，人们也纷纷口耳相传。深怀敌意的人们聚集在学园楼外，挤满了名为小树林却只有几棵树的草坪。学生们唱着《去死吧，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还喊着其他不友好的口号。

唯一的好消息是对协议很认真的巴内特让阴着脸但很配合的高速巡逻警察提供了全程陪护。有些人帮助拦住学园楼的人群，其他人则陪同那个颇受重视的人从小路进入校园。周日傍晚六点半左右，梅瑞狄斯的飞机刚刚降落半个小时多一点，他就已经走进了没有一个人的巴克斯特学生宿舍中的一间屋子中。卡岑巴赫给罗伯特·肯尼迪打了电话，汇报胜利的果实，接着就安排了士兵站岗，还命令说可以对任何试图走近梅瑞狄斯房间的人开枪。他和多尔回到学园楼与校方官员第二天注册流程时，梅瑞狄斯从手提箱中拿出书本，开始学习。

肯尼迪总统将全国讲话推迟到华盛顿时间10点——即密西西比时间8点进行，希望确保梅瑞狄斯已经安全走进了密西西比大学。罗伯特·肯尼迪给在杰克逊的州长巴内特打电话说梅瑞狄斯已经安全走进宿舍时，还有将近一个半小时的空闲时间。唯一与计划不同的是，梅瑞狄斯是坐车来的，而不是搭乘直升机，肯尼迪建议州长对起草的声明进行相应修改。巴内特则闷闷不乐地回答说现在更正

这些小错误已经太晚了。他身边没有秘书，无法重新再打一份新闻报道。仅仅过了几分钟，巴内特就用他悲伤的公告震惊了密西西比，他说密西西比州的保卫者在牛津镇“实际上已经被制服了”。

随着复杂计划最后一环的顺利完成，事态急转直下，跌入谷底。卡岑巴赫和多尔到达学园楼时，外面聚集的人数已经有一千多了，大部分都是学生。夜幕渐渐降临，他们的愤怒却慢慢上升。有些人有节奏地喊着“滚去古巴，支持黑鬼的人，滚去古巴”时，其他人则朝站在外面的美国士兵扔鹅卵石，后来就开始扔大石头。最糟糕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位参议员也在学园楼，手里拿着一份州长巴内特签署的宣言。巴内特授权他负责指挥高速公路巡警。参议院乔治·亚伯勒对自己的目的毫不遮掩，让高速公路巡警撤出了现场。现在，联邦政府“入侵”了密西西比大学，还因为梅瑞狄斯亵渎了这里，他告诉多尔和卡岑巴赫，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可以自卫。有些四处转悠的高速公路巡警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但多尔和卡岑巴赫从人们恶劣的心情中知道，巡警们的撤退会引发一场灾难。学生们对着停在外面的军用卡车轮胎撒气，甚至有人还用灭火器对准卡车司机喷射。夜晚让士兵们更难躲开扔过来的石块。

多尔请求更多时间。希望学生们到了耗尽力气的一刻，但也是徒劳，他请求亚伯勒让高速公路巡警留到9点，但亚伯勒并未同意。外面传来的每一份惊悚的报告都让多尔极力想争取时间，而亚伯勒却迫不及待地想压缩时间。同时，卡岑巴赫把紧急情况报告给了在白宫内阁会议室的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立刻抓起电话，亮出了自己手里唯一有杀伤力的王牌：高速公路巡警的撤退说明密西西比打破了之前维持秩序的约定，这种情况下，即将发表全国性讲话的肯尼迪总统将宣布密西西比领导人先与政府达成了协议，接着却食言了。这一生硬的警告既传达到了在学园楼的密西西比长官那里，也告诉了身处杰克逊的巴内特。最终，罗伯特·肯尼迪让巴内特同意下令让高速公路巡警留下。多尔和其他人掩饰了自己的轻松感，以免激怒受到羞辱并且难以控制的密西西比人，这时，士兵们连连大

喊，说高速公路巡警正在慢慢散去。现在，掩饰着自己的满足感的密西西比人都感到难以置信。他们指着一些仍然坚守岗位的高速公路巡警。

这时，联邦警察和密西西比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然也更不相信对方，很快，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谣言就传开了。起初，多尔和卡岑巴赫更愿意相信电话中的报告，而不想相信学园楼外发生的一切，因为电话中的另一端是权威人士。撤退成了赤裸裸的事实，消息从学园楼里的付费电话传递给了内阁会议室中的罗伯特·肯尼迪、伯克·马歇尔或者司法部指挥中心的拉姆齐·克拉克，然而却被同时与远在天边的领导人通话的巴内特或密西西比大学信托人驳回了。这种情况下，初期暴乱愈演愈烈，抓住了这一绝佳时机，奋力向前。历史学家沃尔特之后拼凑出了一份文件，指明联邦调查局特工第一次通过高速公路巡警无线电听到撤退命令是7点25分。9分钟内，这一令人吃惊的消息就从邮局“指挥中心”传到了学园楼以及白宫，一次次驳回了与之相反的报告。7点40分时，基本可以确定，绝大部分的高速公路巡警都已消失。

已是华盛顿时间9点40分了，离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还有20分钟。电视台技术员正在总统办公室调试设备。内阁会议室中，泰德·索伦森正与总统一起润色讲稿，而罗伯特·肯尼迪则在处理通过电波从学园楼传来的越来越多的担忧。埃德·格斯曼说士兵们可能会使用催泪瓦斯时，肯尼迪说自己希望能避免这种情况。格斯曼赶紧抓住亚伯勒参议员以及高速公路巡警上校伯德桑，而伯德桑直接与肯尼迪争论起来，说很多高速公路巡警收到了巴内特的命令，留在了学园楼。当时，每一分钟里都充斥着喊声、暴徒的最新进展、新的伤员以及暴乱的新形势。

和自由乘车运动一样，第一场肢体冲突中的受害者是媒体记者。一位来自达拉斯的电视台摄影师被学生们殴打后，认为自己的轿车是避难所，便奋力冲到自己的车里，然而，汽车的玻璃和挡泥板也没能躲过一阵攻击。这种不良影响蔓延覆盖了学园楼前的草坪，学生们又攻击了两位记者。密西西比大学的一位教授

试图帮助其中一位记者时，自己也被打倒在地了。燃烧弹——也就是装在可乐瓶子中的汽油——在几位士兵脚下燃烧着。亚伯勒参议员扔下与司法部部长的电话冲出去，却惊恐地发现士兵们已经戴上了防毒面具。士兵们穿着普通军装出现的情景让他们看上去少了一些军人气概，对密西西比大学的学生们来说也没什么震慑力，但现在他们看上去就像令人毛骨悚然的宇宙战士。亚伯勒绝望地承诺将亲自乞求暴力活动的停止，于是，主帅麦克沙恩便命令士兵们摘下面具。亚伯勒冲到令人目眩的暴徒中，但他的叫喊声并不能压过其他嘈杂的声音。学生们离学园楼越来越近，现在已经开始扔砖块了。第一块大钢管砸中一位士兵时，麦克沙恩喊出了投掷催泪瓦斯的命令。围着学园楼站成一圈的士兵们把催泪瓦斯扔到人群中。双方都往后退了退，因为有些士兵忘记戴上防毒面具，还有一些丢了防毒面具，所以也吸入了毒气。由于提前没有向留下来对抗暴徒们的高速公路巡警发出警告，所以这些最忠诚的密西西比警察们只得到了后方直接扔过来的一剂毒气作为“奖赏”。一位巡警被扔过来的管子打昏了，而毒气差点要了他的命。因此，密西西比警察们都愤怒地朝自己的联邦同盟大喊起来。

学园楼里，伯德桑上校还在与罗伯特·肯尼迪通话，肯尼迪认为伯德桑让巴内特从杰克逊赶回来对暴徒们讲话的建议并不妥当。这时，站在伯德桑旁边的埃德·格斯曼听到了第一罐催泪瓦斯落地的巨响，便一把抓过电话说：“鲍勃，很抱歉，不得不说我们使用了催泪瓦斯。我们别无选择。”

牛津时间7点58分了。一分钟之后，伯克·马歇尔离开内阁会议室，带着密西西比大学事件已经发展成全面暴乱的消息冲进总统办公室，但总统已经坐在威风凛凛的电视摄影灯下了。“晚上好，我的同胞们，”肯尼迪总统坐在办公桌后，面对摄像机开口了，“梅瑞狄斯与费尔案的法庭命令正在执行。”梅瑞狄斯已经安全到达了校园，肯尼迪总统说。国家警卫部队并未涉身其中。法律的权威占了上风，学生们和教授们都已回到了正常活动中。“这就是事情本来应该的样子。”总统继续说。他向美国人民两次强调联邦政府并未参与梅瑞狄斯一案。他

公布了第五巡回上诉法院那位让梅瑞狄斯到密西西比大学注册的法官姓名和所属州，还说他自己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执行他们的命令。“我担负了责任。”肯尼迪说。

这篇讲话措辞严谨，直接指向犹豫不决的南方白人。讲话中没有提到巴内特，肯尼迪总统既没有抨击种族隔离主义者，也没有夸奖梅瑞狄斯的目标。他尤其赞颂了密西西比州，说那里孕育了卢修斯·拉马尔、“朝鲜战争中独自获得4枚荣誉奖章的人”以及1945年“在国会特殊联席会议上接受奖章”的杰克·林赛。接着，他将话锋直接转向了密西西比大学：“尊重是你们伟大的传统，荣誉和勇气也是你们的传统。你们不仅驰骋战场，还在橄榄球赛中叱咤风云，更是屈指可数的名校之一。全国的目光，乃至全世界的目光今晚都集中在你我身上。我确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会尊重这份荣誉。简而言之，记载这一案件的书页一定会按照法庭指示的方式很快翻过。”

肯尼迪总统的讲话中透露出对梅瑞狄斯案处理情况的笃定，因此，有些部队指挥官就撤销了二级戒备状态（随时准备行动）的命令。然而，希望和通告被事实推翻了，总统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回到内阁会议时，他和司法部部长、索伦森、奥唐纳、马歇尔以及国会顾问拉里·奥布莱恩一起，严峻地观察着会持续整晚的围攻。他们中的两三个立刻开始打电话，暂停报告的转交。“他们开始扔铁钉了，”罗伯特·肯尼迪告诉总统，“他们也扔可乐瓶子还有石块。”聚在一起的领导人们接到了一份错误报告，称那位吸入毒气的高速公路巡警已经离世。此外还有几份准确的报告，称受伤的士兵们几乎无法冲破暴徒的阻挡到医院去。最初的想法之一是请密西西比大学的圣人——橄榄球教练强尼·沃特讲话，力劝学生们离开。关于这一提议的定时报告不时打断大团毒气只能驱赶暴徒们的初期报告：“他（沃特）说希望所有橄榄球队队员都退出，那是一支非常出色的队伍。他妻子说他不在。听着，为什么不让鲍勃直接给他打电话？他的妻子可能在对你说谎……”

总统演讲一个小时内，第一声枪声响彻牛津镇。一位士兵脖子受伤，血流如注，而他的战友既没有急救装备也找不到救护车，对他的生命感到绝望。几分钟后，第一颗大威力步枪中射出的子弹打在一个边境巡警的腿上。受伤人数不断增加，士兵们便把伤员抬到学园楼里，让他们靠着墙。外面，很多学生暴乱者四散奔逃，躲开子弹，给聚集在密西西比大学的成年暴徒让路。学园楼周围的暴徒人数已达到了2000，还有很多在校园周围徘徊——有的步行，有的开车。

白宫弥漫着黑色的幽默，总统嘲讽地说自己想到了“哈佛大学类似的暴乱”。电话间歇，领导人们都愁容满面，坐立不安。他们讨论了该如何应对詹姆斯·莱斯顿打算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指明肯尼迪政府比苏维埃人士更急切地想见面的文章。总统抨击了这篇报道，简单概括了记忆中苏维埃的会面邀请。“我们今晚必须解决这件事，”他说，“这会正中莱斯顿的要害，对不对？你想给他打电话吗？还是这只会让他疯狂？”

被围攻的卡岑巴赫再次打来电话，坐在内阁会议室里的人只能听到罗伯特·肯尼迪的对话部分：“你想派兵？……他被什么打中了？……他还能活吗？……州警察离开了？”马歇尔冲进来说自己刚和巴内特通过电话，巴内特说警察们“不可能撤退”。肯尼迪说，他们确实撤退了。接着，马歇尔重复了巴内特的保证，说巴内特刚和高速公路巡警谈过，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内阁会议室中的领导人们倍感受挫，开始谴责暴动者对沃克将军的长篇大论，接着又开始讨论那本讲述了美国军事政变的小说——《五月中的一天》。肯尼迪总统说自己认为书中的那位总统“相当茫然”，但那个策划政变的将军是“非常不错的人”。电话中，马歇尔问沃特教练是否“起到好作用”时，带着一种哀伤的情绪。另一部电话前，司法部长轻声安慰着约翰·多尔，说自己认为密西西比大学的状况“离威斯康星的情况还差得远”。

“猪湾事件之后我还从未度过如此有趣的时光。”肯尼迪总统叹息道。他的兄弟认为自己对这一新的灾难也有类似的责任，挖苦似的为自己的解雇准备了一份

新闻发言稿：“司法部部长今日宣布，他将到普林斯顿大学，与艾伦·杜勒斯一道——”他的话被紧张的笑声打断了。

学园楼的士兵用尽催泪瓦斯后，试图驱车去取补给的志愿者们也停下了——害怕迷路——内阁会议时的领导人们决定让孟菲斯的常备军部队搭飞机到密西西比大学，并让密西西比国民警卫部队从牛津的地区兵工厂出发前往密西西比大学校园。由于并不确定部队军官的忠诚，总统焦急地等待着确认部队出发的消息，这时，他想到了伊朗国王。“这就是他们在德黑兰每天都必须做的事。”他冷冷地说。接着，截然不同的消息传来：卡岑巴赫通过学园楼里的付费电话绝望地大喊着，而相应的支援命令却像消失在广播联播中一般。“是这样，他们必须先给司法部部长办公室打电话，让司法部部长办公室给陆军部部长打电话，”马歇尔恼怒地解释道，“再由陆军部部长给孟菲斯当地打电话，然后……”他报告说一支部队已经接到命令正在集结时，索伦森反对说那支部队10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前就已集结完毕了。“我在电视上看到了。”索伦森说。马歇尔则回答说他们必须重新集结。

午夜前不久，罗伯特·肯尼迪的声音让房间里的人一下消沉了。“他们正在攻击梅瑞狄斯所在之处，”罗伯特·肯尼迪说，“他们正在攻击梅瑞狄斯待着的地方。”一拨暴徒发现梅瑞狄斯在巴克斯特学生宿舍，而学园楼受到重创的士兵们也无法穿过校园保护他。华盛顿的人们随时准备接电话，开始努力想办法。奥唐纳说他害怕暴徒们对梅瑞狄斯施以私刑。总统马上紧急呼叫了在杰克逊的巴内特。罗伯特·肯尼迪试图通过付费电话找到卡岑巴赫，但卡岑巴赫正冒着新一轮的枪林弹雨在大楼外指挥自己的手下。司法部部长在哈佛时橄榄球队的好朋友迪恩·马卡姆说士兵们不能只靠催泪瓦斯自卫，这让肯尼迪非常紧张。肯尼迪正听着，奥唐纳给内阁会议室的人带来消息：“士兵们要开枪了。”他们带着随身武器。

肯尼迪总统回来说巴内特回避了自己要求高速公路巡警出动的要求，巴内特

说营救梅瑞狄斯的最佳方法是把他带出密西西比大学。

“我不能把他带出来，”罗伯特·肯尼迪听到总统的话，痛苦地说，“我要怎样才能把他救出来？”

“我也是这么告诉他的，”总统回答，“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他能维持法律与秩序……”总统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好，如果他能维持秩序，我们就让梅瑞狄斯离开。”

这一营救梅瑞狄斯的决定几乎无法实现，所以肯尼迪这样做决定才更容易。新一轮的混乱取代了巴内特的谈判。拉里·奥布莱恩宣布又有3名士兵受伤了。一边旁听电话的肯·奥唐纳说，埃德·格斯曼“已经害怕到说不出话了”。罗伯特·肯尼迪想要说服卡岑巴赫，不让士兵们开枪。“如果有瓦斯你们能顶住吗？”肯尼迪问。“你们能想到什么把他们吓跑的方法吗？”卡岑巴赫极度痛苦的回答让司法部部长收回了最后一条建议。“对不起。”肯尼迪怯懦地说，但士兵们确实没有开枪。

就在这时，格斯曼的一位助手打来电话。事务缠身的领导们都不愿意接听下属的电话，于是肯尼迪总统的秘书伊芙琳·林肯便同意将消息转达给司法部部长。接着，她听到了那位助手明确而空洞的声音：“一位伦敦《每日见闻报》的记者保罗·吉哈德，吉——哈——德，刚刚在牛津被枪杀了。他的遗体是在女生宿舍旁边发现的，脖子上有子弹的伤口。”

华盛顿午夜时分，卡岑巴赫告诉罗伯特·肯尼迪他需要常备军部队——有多少要多少。如格斯曼一样，他的语气中也有军人般的悔恨，自责最终还是没能避免事件的恶化，让肯尼迪失望了。肯尼迪承担了过失，派出了部队，还让格斯曼接电话，讨论该如何面对媒体。“我们得面对一堆责难，他们会问我们为什么没能更好地处理这件事。”他说。

暴乱持续了一整晚，暴徒们不屈不挠，让人惊讶。他们先是开来了推土机，然后是汽车，像破城锤一样撞击着学院楼。暴徒们造成160名士兵受伤——28

名受了枪伤——一颗流弹还打中了当地一位点唱机修理员的头部，造成了他的死亡。内阁会议室中，领导人们看着一份接一份的伤亡报告，直到凌晨。他们听说学生们组成了进攻阵形，正在攻击巴克斯特学生宿舍楼，而士兵们也组成了进攻阵形，准备带着伤员突出重围。罗伯特·肯尼迪强调了“让梅瑞狄斯活着是何等重要”。坚忍的领导人们接受了两人死亡的事实。奥唐纳说政府应该把吉哈德死去的消息“告知伦敦媒体”，吉哈德作为一名记者，一直致力于传播新闻。“一篇好的报道结束在欧洲了。”一个声音说。

等待几乎让人崩溃。罗伯特·肯尼迪自责没有及时使用武力，不停地开玩笑、发牢骚、生闷气，夜色越来越浓，而部队却一拖再拖，没能按照将军们的承诺到达时，肯尼迪甚至咒骂起来。陆军部部长塞勒斯·万斯以及师长克赖顿·阿布拉姆斯向白宫方面保证，他们在一小时之内就能让士兵们搭乘飞机从孟菲斯抵达密西西比大学，但一个多小时后，65名密西西比州国家警卫部队人员才从牛津的地方兵工厂到达密西西比大学校园。虚假情报和无休止的拖延之后，国家警卫部队终于卖力地跑向学院楼，站在饱受摧残的士兵们身旁。（“他们的一个只是受了点伤，”拉里·奥布莱恩最终向在内阁会议室中的人宣布，“所以他们知道那些人还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左右里，再没有增援到来，在这3个小时里，晚上受伤的大部分人情况已经稳定。肯尼迪兄弟对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大加斥责。“我有预感，赫鲁晓夫很快就会派兵了，”奥唐纳叹息道，“这就是整件事里最让我担心的。”

精疲力竭的卡岑巴赫正与肯尼迪总统通话，这时，兴奋的声音传来——常规部队已出现在学院楼外。“总统先生，请等一下，”卡岑巴赫说，“他们应该到了。请不要挂断电话，我确认一下。”卡岑巴赫冲了出去，一边跑一边下令说不许任何人碰电话，因为总统还在等消息。几秒钟后，卡岑巴赫回来了，很没面子地发现有人拿着听筒站在那里，但那个人不是他的助手，而是一位记者。然而，这位本想抢到独家新闻的记者被电话那端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事实吓坏了，既

无法挪步，也无法说话，更问不出问题。卡岑巴赫一把抢过电话说：“总统先生，他们到了。”

几个小时后，多尔来接梅瑞狄斯，发现梅瑞狄斯的房间里都是催泪瓦斯的味道。与格斯曼和麦克沙恩一起，他们走进了 11 天前第一次尝试注册入学时乘坐的边境巡逻车。当时这辆车崭新发亮，现在，这辆车车门上布满了凹坑和弹孔，窗户也被砖块砸得粉碎。麦克沙恩往后座铺了一张军用毛毯，以免玻璃割伤他们，接着，他们就去学院楼注册入学了。士兵们站在小树林草坪上，拦住想要见证这场投降的学生们。梅瑞狄斯——是个默默无闻、沉默寡言、脚踏实地的性情中人，有着军人风度，偶尔也会多愁善感——他说，就是那时，他一生中第一次听到有个密西西比白人叫他“黑鬼”。一个小时之后，在士兵们的陪同下，他上了《殖民地时期美国史》的第一堂课。

士兵们证明了，一旦开始行动，那么想停下来比开始还难。校园中嘲弄梅瑞狄斯的声音以及破坏行为销声匿迹后很久，新的部队逐渐到来了，最后，总共来了差不多 23000 名士兵——是牛津镇人口的 3 倍。海军来了，空军也来了。10 月 11 日晚上，至少有一万名士兵因暴乱警报而凑到一起，包围了最后证明是预先安排好的活动——把小夜曲“钉”在女生联谊会所的走廊上。普通士兵们尽管被石块打中了几次，还要微笑面对女生的咒骂，但他们也发现了不少趣事，足以排解这种烦闷。他们把自己的帐篷命名为“安德森维尔”和“三 K 党总部”。还在共用洗手间挂了一个很大的标志牌，上面写着“州长宅邸”。

政治分歧让部队常驻密西西比，认为任何一位将军或政客都不想被别人认为他们败在了巴内特州长的狂怒之下。所有密西西比州的官员都加入了州长的阵营，谴责说暴乱完全是“好战的士兵们”以及其他联邦入侵者引起的。参议员伊斯特兰控诉说士兵们“挑衅了学生们和其他人”。有人将副州长约翰逊私下里的抱怨偷偷告诉了伯克·马歇尔，约翰逊指责说催泪瓦斯“影响了我的肺和嗓子，医生说，造成了我的肺部出现阴影”。密西西比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表达了

密西西比州“对肯尼迪政府及其傀儡法院完全、彻底、十足的蔑视”。拉法叶县的大陪审团起诉主帅麦克沙恩挑起暴乱。密西西比州立法机构的官方报告充斥着自哀自怜之情和对美德被践踏的不满，控诉士兵们对密西西比大学的学生们进行了“计划好的人身折磨”和其他暴行。这份文件引起了肯尼迪总统的注意，他说如此恬不知耻、颠倒黑白的报告总有一天会被历史学家认真对待。与密西西比大学打交道的第一手经验让总统不禁怀疑自己在哈佛念书时的教授们。教授们说北方的狂徒内战之后践踏了南方那片圣洁之地。“我很好奇，”肯尼迪私下里对索伦森说，“我所知道的美国重建时期的恶魔是否真的存在。”

尽管肯尼迪总统从历史本身的角度看，对种族情感的效果有着深刻的见解，但还是朝着新的神话走去。为了保护密西西比州的种族理智，他撤走了驻扎在密西西比大学部队中的黑人。和巴内特州长一样，他极力避免提到梅瑞狄斯是个黑人这件事。总统和他的兄弟对巴内特大多数诽谤性的话语忽略不计，实际上，他们让司法部最优秀的律师想方设法避免收取巴内特和约翰逊应负担的蔑视法庭的罚款。肯尼迪兄弟这样做可能有很有说服力的策略原因，比如他们不想重蹈宪法危机的覆辙，但这样的小举措一贯示意政府弱化密西西比大学的重要性及其种族结构的事。

肯尼迪总统对密西西比大学最有力的政治回应就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他几乎从未在讲话中提到这件事，也没在非正式访谈中显露出他在回顾并解释政治事件时人人皆知的天资。他定义什么是新闻的能力让密西西比大学事件很快成了旧闻。士兵们在未被人注意的情况下，仍驻扎在密西西比大学，直到1963年夏末，梅瑞狄斯拿到自己的学位后，最后500位士兵才离开。时代的大气候帮忙掩盖了真相。如果暴乱晚一些在“直播网络覆盖”的时代发生，在肯尼迪总统发表全国讲话前、讲话过程中以及讲话之后同步播出密西西比大学的暴乱，那么效果将令人目瞪口呆，总统就会被认为是过分乐观或者是能力不足的人。然而，正如事实一样，事件的发生时间成了总统的优势，让暴乱看起来像是

对总统适时呼吁的野蛮回应。《纽约时报》甚至还报道说肯尼迪在演讲中“非常小心地表现了自己的乐观主义，而且确实清楚地表达了政府正焦急地等待密西西比州官员和人民的表现”。

密西西比大学危机让人们觉得，从各个方面看，自己都被伤害了。密西西比人和其他南方领导人对这次入侵非常不满。之前受伤的士兵们养好了伤，回到了平常在监狱或边境地区的岗位上。肯尼迪的政治顾问们，知道自己所有迎合密西西比的努力最终成了南方所有车辆车尾贴上叫嚣的“联邦政府占领了密西西比”以及“肯尼迪的匈牙利”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认为推进废止种族隔离的努力是政治自杀。黑人领导人们无一例外，都公开称赞肯尼迪总统采取所有必要步骤让梅瑞狄斯注册入学的事情，但胜利的感觉很空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中独立处理梅瑞狄斯案件将近两年的律师们觉得自己被司法部的律师们推到了一边，因为司法部的律师们不仅抢走了他们手中的案件，还对梅瑞狄斯实施了人身监护。

马丁·路德·金私下里抱怨说肯尼迪总统告诉全国的不过是对法律冷酷的服从。肯尼迪的全国演讲中提到了负担和已结束的计划 and 行动，却对自由、全新的开始以及崭新的希望只字未提。相反，对金来说，这件事已经超越了他对梅瑞狄斯的认同感，触碰到了他的核心信念，即人类可以跨越敌对的思维。处于紧要关头的完全是减轻邪恶影响并按照世界的要求展示正义可能性的能力，对金来说，这一点就是对上帝的存在领悟。在这方面，金的道德强度足以让肯尼迪显得狭隘沉闷。另一方面看，金已经听到了太多关于密西西比州橄榄球传统的热情讨论——也读了太多密西西比州与政府之间争论的内容——他陷入了极度消沉中。尽管金非常欣赏肯尼迪总统对现代社会潇洒的指挥，但他知道，肯尼迪和巴内特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可他们两个人却和自己都没什么共同点。金写道，牛津镇的表现“让黑人觉得自己就是白人政治棋局上的棋子而已”。金把自己的痛惜写进了1962年暗淡的评估中，因为民权运动已经处于国家政治中的不利地位了。

民权运动不再是国内辩论的“主要问题”，自由乘车运动以及肯尼迪政府发出初期呼喊的那一年起，民权运动的气势就减弱了。“我们将会前进！”金也衰落了，因为他在奥尔巴尼并未发挥作用，而且他对政府的批评无疑反映出他的恐惧——他害怕无论自己呼喊的声音多么大，无论自己做出多大的牺牲，他仍不过是肯尼迪这片大海中的一块软木，只能随波逐流。

第十八章 伯明翰

1962年10月，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得到情报，获知苏维埃核导弹正航运至古巴。“密西西比，他们会袭击牛津吗？”总统问道，此问正是开玩笑地暗指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俄罗斯人所能做的，比他们毁掉自己当下的苦恼之地还要糟糕。在危机时期，总统虽然不总是保持幽默感，但从未失去信心。他把他的长官们召集在一起，讨论是不是应该轰炸古巴、进攻古巴，或是与古巴断交，以让其彻底根除导弹。到了该给国会领导介绍情况的时候了，狂热的紧急情绪非常高涨，空军战机先是丢给失踪的国会议员黑尔·博格斯一个在塑料瓶子中的紧急求救信号，想要把他从墨西哥湾中的渔船中找回来。

C.B.金在华盛顿，恳求对坎贝尔警长进行联邦起诉，指控他在7月鞭打他，却以失败告终。肯尼迪总统宣布对古巴采取海上隔离。金开车前往东海岸，回家途经倒闭的工厂和荒废的村庄，听到一些有关军事动向的公告以及祈祷仪式。他发现了妻子留在门上的便条，上面写着她已经和家人都搬到了克拉伦斯·乔丹的考恩那尼亚农场，因为担心奥尔巴尼附近的军事基地将是苏联导弹的主要攻击目标。十几个国家的亿万人民都承担着相似的恐惧感。当然，如果不是过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永远不会有这么多人能立刻如此切身地经历世界政治。

10月28日是个星期天，赫鲁晓夫总理同意从古巴撤出苏联的导弹。在伯明翰市，布尔·康纳和其他两个城市的市政官员正与消防部门的领导举行秘密谈判会议。世界还没有被炸掉，这让他们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很快转向切实的地方政治：市政长官们承诺，如果消防人员在公投中投票反对公民新的市政宪章，将会获得共计百万美元的加薪。谈判继续欢乐地进行，没人知道他们中的一位改革

支持者正在秘密操作着一台录音机。其结果是在一系列非凡的电台广告中，人们听到一名消防队员询问：“是不是无论下周二的选举结果如何，我们都会得到那份增长的工资？”市长亚瑟·黑尼斯回答说：“当然不是。除非我们在这里提供给你们，否则你们的工资不会涨。”这时，广播中突然传出播音员催促伯明翰要通过投票支持新宪法，以“阻止市政府腐败”的声音。此广告暴露了肮脏赞助的种种情形——以及人们要不可避免地为其付出更高的税务。这种市政府的尴尬正是改革者所需的一种冲击，用以埋葬在公民投票权方面的种族隔离因素。大选日当天，投票人员都出乎意料地赞成市长议会提议。这个奇迹萌芽于母亲节那天最初的自由行车者的殴打事件，上升到另外一个阶段，即布尔·康纳被免职。如果他想要继续在伯明翰市掌权，就必须在接下来的3月举行的那场特别选举中竞选市长。康纳的势力摇摇欲坠，让这个城市中略微弱势的巨大种族隔离联盟展开了与夏特沃斯和金所部署阵营的斗争。

在其他地方，人们热情洋溢地做出了新决定，仿佛获得了新生。一批新生的政治分析家，一面摸索一系列秘密安排，一面在有关赫鲁晓夫撤退的消息已经十分可靠的情况下，坦率承认肯尼迪总统已经在世界末日时的善恶大决战中胜出了。椭圆形办公室变得更像是座神圣的宫殿，繁荣昌盛之地终于回归。机缘巧合之下，就在肯尼迪总统宣布与古巴断交的当日，一位颇具才华的肯尼迪模仿者录了一卷名为《第一家家庭》的喜剧专辑。那人名叫沃恩·米德，他的那张专辑卖了100万张，超过了“彼得、保罗和玛丽”民谣三重唱组合的第一张专辑，直达流行音乐榜的榜首，与女子组合“水晶乐队”的《他是个叛逆者》及雷·查尔斯的《你是我的阳光》并列居于榜首。在导弹危机事件的余晖下，总统的幽默成为全国风尚。甚至连他在密西西比以外的政治反对者，都会嘲笑米德对肯尼迪缺点的模仿：总统式的平腭口音，他的阅读速度，他围着椭圆形办公室追逐女儿卡罗琳，连躺在床上的一些话语也模仿肯尼迪（“晚安，杰基……晚安，鲍比……”）。在成名的极端下展现出的矛盾，幽默有助于使肯尼

迪传奇既充满人情味，又很不可思议。

令人瞩目的成就让总统更加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然而这些断然是国际化的，而不局限在国内，并且在全球竞争中最重要的是导弹危机所强调的实质性问题。国家救济犹如一剂补药，让人们更容易脱离困境，还让种族困境根深蒂固。民权“不应再操纵国家的良知”，金写道，他发现善变的良知在这种恐惧或无知的气氛下并没有很好的作用，也不会是在极度的热忱下有所成长。白人世界过度高兴地去争取民权。在他想要带领白人和黑人看到同样真理的斗争中，这种观点的错位激怒了金。即使是最痛苦的黑人，他说，也必须研究跨种族的视野。这可以称为“额外的恶魔”，对他们在白人主导的世界能够幸存下来非常重要。想要试图立刻向黑人解释白人，再向白人解释黑人，金感到剧烈的“焦虑和敏感”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一场骚动……是另一场永无止境的情感战”。“这位黑人，”他说，“在他清醒的时刻，桎梏着直到踮起的脚尖，永不知道下一步期望的是什么，在他的潜意识里，他与增加的恶魔搏斗。”

10月26日，一份新奥尔良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报道，断然声称杰克·奥德尔是一位“在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渗透到高级管理层的美国共产党员”。该文引用了“一个高度权威的来源”，未签署的文章鉴定奥德尔是位全国共产党委员会的“秘密成员”，多年来一直在民权工作中“从事美国共产党事业”。

这种突然袭击造成的纠纷，在金自己的阵营中爆发。金早已知道，奥德尔已经被逐出国家海事联盟，并且就在他作为疑似共产党员被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传召之后，已经丢掉了在蒙哥马利的保险工作。他想要确定奥德尔的背景没有什么需要更加深入挖掘的，他没有什么暴力背景或者见不得人的背景。奥德尔疲惫地告诉金，他不像文章所声称的那样是一名党员，更不用说是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但他认识那里的人。过去，他曾参加过他们的会议。1956年，他写过一篇关于路易斯安那州种族政治的文章，刊登在一本期刊上。奥德尔认为这次传

唤归根到底跟这些有关系。仅仅在4年前，国会调查员们丑化奥德尔为魔王机器人。这嘲弄的不仅是他理想主义的事业，还有他的黑人身份。

非美行为委员会律师：你有没有诚实地去感受，有没有试着让此委员会和本国人民相信你是同谋，你响应克里姆林宫的意向，是事实和真相，并且还关系到本国黑人的福利？

奥德尔：我没有试图让你们相信任何事情。

金并不怀疑奥德尔为南方基督教领袖会所付出努力的真诚性。一切都可以理解，而一切又是那么无关紧要。奥德尔诚实地坚持认为，该计划应该和其他计划一样进行讨论，像在法国或者意大利一样，应忽视白人文化中冷战政治的残酷现实——其中一派的敌对思想很容易就和另一派勾结起来。在政治上，报纸上所刊登文章最要紧的是它的公众影响。这从何而来？意味着什么？金把这则故事看作是这两个月以来第二个“信号”——从华盛顿而来，通过凯利·米勒·史密斯传达的第一个友好警示，而如今是报纸上发表的恶意攻击文章。这些都是详尽的，听起来很官方的颠覆性指控。在这种宣传的持续攻势下，四面楚歌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虎口脱险的希望十分渺茫。金告诉奥德尔，整个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委员会情绪都很低落。“我该怎么做？”他问道。

奥德尔分析这篇文章就好像新奥尔良的警察和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埋下的一个伏笔。文章提到一个事实，即他在新奥尔良的家已经被搜查过。他对金的建议是无视这场攻击。只有一份小报似乎获得了这个故事，整个事件很有可能就此止息。奥德尔警告说，接受拥有一定程度上思想纯正，又令人满意的种族隔离者给出的这个挑战，就等于宣告提前失败。如果金觉得回应这篇文章比较勉强，奥德尔可以发誓说他不对任何国外势力效忠，也不提倡以武力瓦解美国政府，然而在其他方面，他会拒绝回答所有关于他政治信仰的审问。他拒绝谴责共产党和他的共产党朋友，即使是在事实允许的情况下。“我没有什么好道歉的。”他说道。

尽管金很赞同奥德尔的观点：监管信条让自由社会出卖了自身。然而他不能

下决心不对这篇文章做出回复。为了打破公众质疑的枷锁，他决定反驳奥德尔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联系，而不是反驳奥德尔和共产党员的联系。11月1日那天，他并没有力图宣扬此事，而是应允根据要求做出辩护陈词。“陈述奥德尔是南方基督教协会的东南部领导人完全错误，属于虚假消息。”他宣称说，“他不仅从来不是领导者，也从没考虑过让他担任这一职位。”从那里，金不惜说谎来将奥德尔的联系减到最小，称奥德尔“只是单纯作为一名技术人员行使职责，90%的工作是在北方进行，他住在那里，参与我们在邮寄程序方面的机械化操作”。并且他只是暂时填补空缺来参与选民登记活动的某些工作，但在此宣传开始很久以前，他就已经不再行使职责了。奥德尔已经辞职，“以避免给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带来尴尬”。接下来的声明说，金已经“接受它并对此做进一步的调查和澄清”。

私下里，金向奥德尔保证，这仅仅是设计给公众消费的，所谓“进一步的调查”已经结束了，奥德尔回到了他们的队伍中——事实上他从未离开片刻。奥德尔尽可能优雅地做出妥协，尽管他是非常骄傲和独立的一类人。这只会让金变得软弱，让他自己卷入这场充满否定和半真半假的陈述游戏，他不断抱怨，并且被否认的人定会非常痛苦。在纽约邮件收发室工作和处理选民教育项目的文书两份工作之间，奥德尔算来可不只怀亚特·沃克，有更多的人都会向他汇报，然而金还是假装不认识他。

新奥尔良市报纸上那篇文章让金非常不愉快地分了心。他强烈希望这个话题会逐渐消失。政治恐惧使他开始做掩饰并且含糊其词。事实上，他的行为已经和肯尼迪总统在民权问题上的行为过程相似。如此伤害自己的同伙，金内心也十分痛苦，在对待奥德尔方面，他甚至比他的盟友所期望的更加严厉。比方说，当一位在新奥尔良的律师把这条消息的剪报送给纽约的罗特·孔斯特勒，孔斯特勒当即的反应就是害怕这项指控，会毁掉她的捐募者萨米·戴维斯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在12月11日的募捐活动。她不认为这些恐惧没有根据，也不认为自己杞人

忧天。与之相反，她已经看到两位斯卡斯代尔的妇女同年早些时候为自由车手提出较弱的指控而折损收益。那些女人是股票经纪人的妻子，她们的丈夫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交往甚密。她们已提起诉讼，想要停止作为颠覆分子领取救济金，在那方面失败后，只好找来纠察队，举着写有“为斯卡斯代尔左转弯”和“扭曲莫斯科”的标志。

她的担忧在11月初稳步堆积起来，奥德尔继续为了萨米·戴维斯的利益着手做很多财务方面的准备。他代表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签署了租赁协议和保险债券，并一直关注预售票的销售。当孔斯特勒听说奥德尔本应被要求从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辞职，她要求其给出一个解释。斯坦利·利维森不断给她讲那个故事是对奥德尔过去的一个曲解，永不可能浮出水面。但孔斯特勒坚称“这件事会反弹到我们身上”，并且还说如果有钱人怀疑美国共产党员介入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他们“会让我滚到一边去”。当利维森建议她只要停止提及奥德尔作为一位负责人的种种事宜就可以，她却拒绝了，并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理由去使用任何托词，如果你想把它称为托词的话”。她说这会让她自己的廉正毁于一旦，因为“很多人都会回来找我，说我蒙蔽了他们的双眼，欺骗了他们”。他们正在经营的是个人品质与想象之间的谜题，她告诉利维森：“有人想要嘲笑这个，但是其他人也许深深受伤……聚光灯是个强大的东西。”

联邦调查局的搭线窃听器窃听了利维森纽约办公室的电话，截取了所有这些情感交流的信息，转发至总部。利维森对奥德尔的辩护无疑是一位共产党员对另外一位的担保。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内部纷争也充分证明，局里对金初次主动的一击已经有了一些效果。联邦调查局特工散布一份未签署的新奥尔良文章，并且把实际上完全相同的文章发表在其他分散在圣路易斯及长岛的4份报纸上。

胡佛在同一时期对金展开了全面调查。联邦调查局在收集涉嫌不当行为证据之前就对金进行处罚，看起来有些不合逻辑。胡佛非常精明地抓住机会，在那周给出两个命令——当时举国上下都因害怕被苏维埃导弹毁灭而乱作一团。

导弹危机激发并让应变措施合情合理，比如报纸上出现了攻击金雇用奥德尔这件事的言论。由于这样的运动在美国国内是禁止的，局内行政人员便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操作这件事。他们知道可以依靠可信的新闻联络人，进行谨慎的合作。为了实施对金的第一场秘密攻击，讽刺的是，他们召集了在华盛顿的5份美国报纸的代表。

卡撒·德克·迪洛克负责监督5篇文章的宣传，同时进行游说以避免肯尼迪为美国共产党方的“白人报纸”的最新提议，那将显示出美国共产党员对颠覆政府做出的只是极小的威胁。美国司法部部长想要发行一份公文，作为减少联邦调查局国内机构组织成员的第一步——背景调查员、窃听信息记录员、危险分子思想鉴定专家、警厅情报处理人员诸如此类的人——在他看来是对人力巨大的滥用。11月7日，迪洛克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肯尼迪对白人报纸所做的最新要求。因这里存在一个“重大威胁”，他写道，任何这种关系网的描述都会“危害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肯尼迪陷入了一个典型的间谍陷阱：他不能为避免线人们陷入危险中而减少他们的任务，因此他必须继续完成这场使命。

胡佛和肯尼迪之间展开了无休止的斗争，明确了为与金对抗活动的升级拉开的更大政治背景，联邦调查局官员保护他们的反共者情报组织人员。对金的敌意是一种驱动力，而奥德尔是新的根本原因。导弹危机是一场鞭策，也是一场时机。最后，利维森原始的窃听装置准备进行为期6个月的更新。所产生的官僚主义压力证明了过去通过扩展它所进行的监管，无论这些始发因素混合起来是怎样的，在联邦调查局的角度，金的第一批操作看来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据窃听装置的记录，不仅没有秘密报纸的攻击所回荡的心理困扰，窃听内容还显示，金根本不知道谁在幕后操作。金和其他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成员并没有意识到新奥尔良的报道仅仅是5个当中的一个。他们对其不正当行为的怀疑集中在当地警方。金和其他民权运动中的人一样，认为联邦调查局是一位同盟——有时虽是最勉强的一位，但也是联邦存在的保守派。尽管如此，武装力量让种族隔离主义者

紧张起来。在南方，金寻求联邦调查局更加积极地介入。

那年 11 月，罗伯特·肯尼迪签署了一份申请书，由 J. 埃德加·胡佛授权联邦调查局，在斯坦利·利维森事件上增加四分之一的窃听装置。此次行动的范围覆盖了利维森家，实现了特工截取他和金在深夜通话的愿望。这种没有限制的窃听让金完全无法察觉。即便再“小心翼翼”，他也不会为这做准备。他看到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文档，由状态完全不同的肯尼迪于当日签署：肯尼迪总统发布他拖延已久的关于住房种族歧视行政命令。金非常清楚，它已被削弱，从而使其勉强和 1960 年竞选时的肯尼迪“大笔一挥”的承诺类似。反歧视命令不包含所有现有房屋以及新住房，除了由联邦政府直接出资的住房。金还知道，这条命令尽可能平静地发布于感恩节前夕发出——“故意夹在中间”。特德·索伦森后来写道，在有关苏联轰炸机的戏剧性总统公告和中印边境战争之间。白宫拒绝记者参加签约仪式，这场事件的参与者仅限于民权工作人员。尽管如此，由于所有这些缺点，金看到肯尼迪更像是位潜在盟友，并非敌人。金公然盛赞新命令是“带领全国前进，实现美国梦”的一步。

感恩节的那个周末，学生为全美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在纳什维尔的南部各州会议聚集起来。其中，詹姆斯·劳森的运动在非暴力示威活动的第三个年头完成。会议结束后，从遥远地区前来的学生一拨一拨参加反对种族隔离主义顽固派确立的制度。滴答餐厅的所有者朝着山姆·布洛克的脸喷射灭火器，他就是在密西西比州绿林区和鲍勃·摩西斯参与过选民登记项目的人。一周后，两名警察把约翰·刘易斯从同一所餐厅拉去监狱。每天的示威游行都继续上到大标题报道并且吸引了大批群众。私下里，有些流言蜚语关于沿着警戒线的文化鸿沟。刘易斯担心非暴力纪律的崩溃，有着装随意、抽烟行为、对某些示威者来宾缺乏整体的崇敬。作为答复，一些老练的北方学生窃笑纳什维尔的女老师政体，称呼刘易斯为“方块”。不过，他们都一起进了监狱。

关于这场运动的流言集中在金在奥尔巴尼的表现上。这是奥尔巴尼运动成形

的第一年，周年纪念由一系列为期一周的夜间群众集会组成，模仿教会复兴。金在第三浸信会教堂，显得局促不安，他宣布，他打算“在国家的经济水平上”组织一场对种族隔离企业联合抵制。这一建议在那个时期不过处于胚胎期，而且注定要因不切实际而被拒绝，但自豪感和情感细腻敦促金要为自己创造一些深刻的重大印象。毕竟这一切已在奥尔巴尼说过和做过，他不能让自己告诉那些人他要离开他们前往其他城市，比如伯明翰。他也不可能承认他已经放弃了在奥尔巴尼有所突破的希望。相反，他退居到一些宏伟却渺茫的计划之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愿回到奥尔巴尼去坐牢。”他向他们保证道。

与奥尔巴尼运动周年纪念相一致，在南区市政府公布的一项研究中，克劳德·西顿准确地概括《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为“总统斥责佐治亚州奥尔巴尼：无法保障黑人权利”。这项研究批评了几乎每一个涉及奥尔巴尼的长达一年危机的主要政党——司法部、当地警方、联邦调查局和黑人领袖本身——并把政权未能保护宪法权利的主要责任强加在了肯尼迪总统身上。西顿援引这项研究的说法，即联邦政府“从一开始就徘徊在奥尔巴尼，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它一直没有采取行动”。该记录与肯尼迪总统的竞选所承诺要大胆行动形成鲜明对比，清楚地表明，“在种族争议方面政府不会轻举妄动，除非出现不可控的暴行”。西顿的报道出现在头版上，点燃了轻掠过不平衡种族观念的导火索。

在感恩节前夕的那个礼拜天，即西顿报道发表的3天后，金离开奥尔巴尼去纽约的河畔教堂。仪式过后，《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找到金，那时他正在牧师房间中脱自己的牧师袍。记者向他就南方区域市政局在奥尔巴尼研究上的问题征求意见。在第二天出现的报道中，金被描绘为在所有细节上都赞成认可这项研究，包括他对自己战略上缺点的批评。然而大标题疾呼有一场有关阐述的巨变：“金博士说在美国佐治亚州奥尔巴尼赞成种族隔离者。”突然，批评家变为了金而不是南方区域市政局。更为重要的是，批评目标也由肯尼迪总统变成了联邦调查局。

金还是气到了极点，并来到了胡佛的办公室。胡佛的高级助理立即去交流了一番愤慨的备忘录，就像每次联邦调查局被公开批评时他们所做的那样。助理主管亚历克斯·罗森解释这一番言论归结为金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他正是在共产党的“支配”之下。从局里职位第三高的官员和第二高的官员，艾伦·贝尔蒙特和克莱德·托尔森再到胡佛自己，报复的建议不断增加。颇具意味的是，他们选择了让报道立足于白人世界，在那里冒着扰乱种族隔离的白人以及肯尼迪政权的危险公开做出挑战。由于战术原因，局内把报复的回响引导到黑人世界。金十分清楚，美国联邦调查局从不缺乏和上层黑人记者的友好往来。局内官员说服了《乌木》和《黑玉》两本杂志的代表，说服了4个非裔美国报纸的出版商，以及约翰·森斯塔克和罗伯特·雅培在《芝加哥卫报》的继承人。立刻的结果便是在全国最大的几本黑人杂志上一系列对金的反驳。所有的文章都集中在《泰晤士报》上的一则陈述：“在南方，我们所面临的与联邦调查局的巨大问题，即局内特工是被社会习俗所影响的南方白人。为了保持他们的地位，他们必须和支持种族隔离的当地警察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每当我看到联邦调查局的人，他们都和当地的警务人员在一起。”

从这条投诉中，联邦调查局官方授意的报道扯出了一场出身问题：他们指出，联邦调查局在奥尔巴尼的5位正式成员中，有4位是北方人。接着，在事实争论点上反驳了金之后，这些报道全盘否认了联邦调查局的错误。《黑玉》杂志称，准确来说，耽搁对坎贝尔警长殴打C.B.金一事的起诉，是司法部门的责任，而不应归咎于联邦调查局。编辑们警告金，不要把联邦调查局当成“替罪羊”，并且还奉劝他：“小弟，找总统和总检察长算账吧。”更加尖锐的是，《芝加哥卫报》一则报道引述德科·迪洛克的指责，即“金博士的言论暴露了他不仅是对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的真实性格一无所知，还对局内保护民事权利记录一无所知”。

局内5位奥尔巴尼特工确有4位是北方人，但其中唯一的南方人马里恩·奇

克，亲自负责有关民事权利的投诉。就其本身而言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因奇克以曾经为种族隔离者实施的暴力过激行为案件所做的记录而感到自豪。作为即将到来的查理·韦尔诉讼的关键证人，他会滔滔不绝地讲述支持他结论的事实，即谢里夫·约翰逊残忍地射杀查理·韦尔一事实，并会对宣称盖特尔·约翰逊清白的、高尚的奥尔巴尼种族隔离者嗤之以鼻。从坏处想，奇克是位修正的种族隔离者，从前和金相处得非常好。现在金的言论让他心怀怨恨，不只是对他的职业操守的诽谤，也侮辱了长官。奇克近乎崇拜胡佛，告诉大家一次他的妻子生病了，这位老人曾允许他换乘车辆。

金对于这些特工的出生地犯了一个错误。这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错误，却被卷入到底是胡佛，还是肯尼迪政府应该在奥尔巴尼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的争论。根据胡佛的指示，迪洛克打电话到金的办公室寻求一个立即的约见，这样他和威廉姆·沙利文，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可以直接找金对质。多拉·麦当娜拒绝了他，说金正闭关致力于一本布道书的工作，迪洛克要求亚特兰大战略空军司令部为他安排一次会面。亚特兰大战略空军司令部第二天回复说他实在运气不佳——金正忙着旅行。虽然他的要求以一种非正式的请求提出，没有涉及任何官方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迪洛克非常生气，怨恨金未能安排时间和他见面。他再也没有给金打过电话。他没有给金写信来阐述联邦调查局对《泰晤士报》上文章的异议。迪洛克没有尝试验证故事的准确性以及平衡性，也不认为金对他的评论存有任何哪怕是最拙劣的动机。两个月后，他却突然以如此尖刻的散文了结了这件事，以暗示他很满意保留和金作对所留下的最纯粹的牢骚。“似乎很明显，金牧师不希望被告知真相，”迪洛克写信给他的上级，“很明显，他采用欺骗、谎言和背叛手段作为宣传，以进一步促成他自己的动机。”备忘录中其余两个段落，在谈到金时，迪洛克用了5次“谎言”这个词。

这一切都发生在政府内部，由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和两个未回的电话促成。这隐秘的愤怒，反过来，部分归因于南部区域市政局在协商选民教育项目过程中的

隐秘角色。在那段漫长的过程中，莱斯利·邓巴和其他南部区域市政局官员传授给民权领袖的是肯尼迪政权的保证，即选民登记将会是联邦保护的避难所。如今邓巴，虽然是肯尼迪的支持者并且本性非常谨慎，认为自己对这场由在密西西比州的摩西计划引发的未答复的暴力行为，以及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阿尔巴尼附近的登记计划有责任。他自己的挫折加之政府帮助推动奥尔巴尼的研究进入公众视线，但邓巴必须向摇摇欲坠的在选民教育项目上的税务安排做出妥协，才能明确提及那些未被履行的承诺。至此种族政治的公众形象显示出决定性的虚伪：一切都如黑白般分明——如此沉闷乏味——然而重要的戏剧性事件显而易见。

当他们迈入新的一年，从不同的世界，金、胡佛和肯尼迪互相采取措施。他们每个人都看到了其他人隐瞒的东西，而忽视的东西也是显而易见的。金自己知道他们前往伯明翰，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立场，以提醒大家注意他所定义的自由。12月，他派怀亚特·沃克和安德鲁·扬去招募、计划和准备。12月9日那个礼拜天，金在飞往纽约去找非常成功的筹款人萨米·戴维斯之前自己在伯明翰布道——他成功了，没有越过杰克·奥德尔的警戒线，接着参加了甘地学会的董事会会议。周五，炸弹在伯明翰伯特利浸信会外引爆，让整个教堂惊慌失措，彩色玻璃和所有其他易碎品都碎开，锯齿状的断层布满了墙。这场震荡撕毁了牧师隔壁的屋顶，摧毁了牧师的车，中断了供电，切断了电话线，并把其他3间房子炸开了洞，把因玻璃割伤的两名婴儿送到医院。布尔·康纳如今整装待发竞选市长，和消防员、警探、警犬一起负责调查事件，却一无所获。“该死，抓到他们以后应该把他们吊死。”康纳告诉记者们。《伯明翰新闻报》指出，伯特利浸信会是著名的萧特沃的教堂，在1961年5月为挨打的自由车手提供避难所。它从前两次遭到过轰炸，但两次都使报纸和康纳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有人要在夏特沃斯已经启程前往辛辛那提市近一年后炸它。新牧师感到茫然和动摇，也感到困惑，因为他并未获准那里举行任何民权会议。“再一次，我们为伯特利浸信会教堂的爆炸事件感到震惊。”金打电报对肯尼迪总统说。他在伯明翰呼吁帮助，他

形容伯明翰为“迄今为止在种族关系最为严重的美国大城市”。“很多正在进行的事情上已有高层政府官员的默许。”

过了3个晚上，也就是在12月17日，金和其他几位领袖与肯尼迪总统商谈了非洲之事。黑人领袖要求实施“马歇尔计划”来对那里贫困的新独立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他们也要求美国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施行制裁，施以更大的外交压力，来解放非洲大陆上其余殖民地。特别有争议的是在最近一份联合国的提案中提到要削减葡萄牙在莫桑比克、安哥拉、葡属几内亚殖民地镇压独立运动的武装力量。美国是7票中唯一反对这项决议的国家，其他6国包括南非和其他欧洲5国。

肯尼迪总统通过分享他们的情感让他的客人感到放松。北大西洋公约的义务不可能单纯对葡萄牙终止运送武器，总统解释说，但他怀疑葡萄牙的承诺不会将北约运送的武器转来镇压非洲反殖民运动。事实上，肯尼迪确信黑人领袖在这一点上并不相信葡萄牙的话，至多只是他们自己相信。有效政府的任务是设计保障措施，将支持北约不会允许葡萄牙靠武力来支撑它的殖民活动。这些都是在每一个细节上理解总统的复杂分析。虽然他与黑人领袖举行的私人会议仅仅持续了半小时，他短暂地溜出来点亮白宫圣诞树，返程又消耗了另外半小时——这样就是两个多小时。这一次，总统的助手们发现他们仔细处理了行程表，让民权领袖得益，从而缩短了总统与其他政要的会面时间。黑人报界拥立此事为“黑人与美国总统在白宫所召开的最长会议”。

那天晚上，肯尼迪总统录制了一卷随心所欲的访谈，人物便是三大主要关系网的联络人。他处于自己的最佳状态——坦率爽直、清晰条理、机智诙谐。他反复地，明显津津有味地讨论古巴导弹危机的转折点。他强调在政府权利顶峰决策的变幻性，列举出历史上导致20世纪每场主要战争的种种“判断失误”。他只有一次提及了种族问题，抱怨密西西比大学危机使得教育法案更加难以通过。

自从这场对抗轴心国的战争以后，总统强烈意识到他的国家在世界政治上起

主导地位。“我认为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他说道，“我们有1万名美国人在国外效劳。自打世界之初，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承受这样的负担……希腊、罗马、拿破仑和其余所有的征服者都不例外。我们有100万人在外，正在试图捍卫这些国家。美利坚帝国和之前令人敬佩的前辈国家相对照的时代来到了，而像那些国家一样，它设想它的势力为仁慈的力量。美国曾两次起着‘保卫世界上伟大手段’的作用，他说，第一次是对抗纳粹，第二次是对抗苏联。现在，我认为对这个占世界人口6%的国家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战绩，并且是对一个非常不愿意承担这些负担的国家来说。我想今年圣诞节我们大家应该是相当高兴。”

12月初，《国家杂志》发表一篇题为“肯尼迪：不情愿的大救星”的文章，文中引用了南部区域发展委员会上奥尔巴尼市的报告。这是连接肯尼迪和林肯之间一个小小的公众提示，经历了令人失望的一年，这句话一直在金的心中。新年前夜，奴隶的后代庆祝百年的自由。通过宣告南部邦联内的奴隶“永远自由”，林肯把南北战争当作是一场解放战争。金比任何时候都想让肯尼迪说有关隔离的类似的话。它会带给这场运动一个道德俱乐部，并带到伯明翰。

在整个1月份，他都和一些诸如非裔美国人遗产协会的组织一道，为了第二次黑人解放宣言进行私人游说，早期前景暗淡，因为内战百年委员会拒绝安排任何仪式纪念解放日。出于诸多“实际的考虑”，这些必然围绕对南方国家百年委员会进行抗议的威胁，该机构的预算管理处得出的结论是，这将“使用内战百年委员会作为仪式庆祝工具十分不可取”。这样的遗漏，也许是政府在为期4年的百年纪念中最为耀眼的撤出，让金不需要一个时机就可以与总统会面。白宫对他建议的兴趣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威廉姆·孔斯特勒建议他在新年那天前往白宫。在必要时要穿过大门第二次向肯尼迪总统陈述他的第二次解放宣言。孔斯特勒认为他可能说服研究林肯的历史学家卡尔·桑德伯格一起去，但金并不喜欢把解放运动当成抗议活动。12月17日，他在白宫的非洲会议后，再度恢复了乐观心理，因为他发现自己和总统有共鸣，显然都是说话简明扼要，并且“消息非常灵通”。

金和他的助手几乎每天都与路易斯·马丁、李·怀特、阿瑟·施莱辛格和民权委员会的贝尔·伯恩哈德谈话。

像往常一样，白宫内部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做决议。政府正专注于罗伯特·肯尼迪的疯狂努力，他要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筹集 6200 万美元的赎金，来换取猪湾囚犯从古巴的归来。另一场疯狂复兴政府的马拉松中，肯尼迪派遣他的助手在各个时间赶到各个地点，违反税法，征用飞机，收集药品和医疗用品，以让卡斯特罗满意。检察长打给波士顿红衣主教理查德·库欣的紧急电话，让他们又获取了最后 100 万美元，那时是周末，银行都关门了。1100 名囚犯离开古巴监狱，在迈阿密共度圣诞节。第二天，在棕榈滩，李·怀特提交给皮埃尔·塞林格公告草案，最终由总统做最后决定。在种族隔离问题上，金不再进行正面进攻，因为他的建议有些浮夸，有些修饰，而新总统的承诺只在一篇短小的文件中保存了下来：

鉴于黑人公民仍被剥夺了宪法和美国法律保障的权利，保障这些权利成为我们一项未完成的伟大民主任务之一：

因此，现在，我，约翰·F.肯尼迪，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此发布《解放宣言》，来明确我们国家的政策。这政策建立在正义和道德上，整个 1963 年都在纪念历史上著名的《解放宣言》百年历史，这是非常合理及恰当的。

白人给塞林格的工作意见为：“不要发布一些会被视为小灾难的声明。”

在华盛顿，民权阴谋策划小集团聚集在贝尔·伯恩哈德的办公室，讨论从棕榈滩传回来的保留意见。那些和总统在说的东西相近，都是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第二次《解放宣言》绝不能半途而废。比什么都不做好得多，他们说，特别是自公众对内战纪念活动的期望几乎已经不复存在。面对这一推论，伯恩哈德办公室的顾问们探索一个能从他们一年努力中挽救些什么的办法，他们知道奥德尔和其他跟总统一起的人都有些残存的责任意识。他们抛出并丢弃很多想法后，马丁开始沉思：关键要想到一样东西使得肯尼迪总统觉得他是利用了他的个人力量。在

马丁看来，这些都更倾向于社会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被南方民主党人所桎梏，肯尼迪总统在宣言草案中的政治含意前有所退缩。另一方面，他与肯尼迪夫人在黑人的社交聚会上完全感到自在。这就是肯尼迪和他的上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之间的鲜明对比。在种族方面他能做出最有利的比较，马丁认为。他们应该想到比如要为黑人政要准备一场白宫接待。

马丁说完他的想法，阿瑟·施莱辛格振作了起来。“我认为路易说的有道理。”他说。他们提议盛大白宫招待会将于2月12日——林肯生日那天举行。特定的时间会阻止很多可能来自两个政党中白人的批评，并转化这次事件为纪念神圣的共和党总统。马丁相信，这样的接待会提高肯尼迪总统在黑人中的信用——对他来说除了象征意义上的几次，白宫一直是社会意义上的禁地。黑人名人在白宫的到场吸引了黑人报界，登上了头版头条，可能超过宣讲会本应该有的吸引力。就此推理，马丁同其他人一起在棕榈滩和白宫达成协议，用一份宣言来换取一场接待。

肯尼迪总统在那之后的几天里去过两次迈阿密橙碗。12月29日，他和夫人检阅了从猪湾刚刚释放的士兵。肯尼迪夫人用西班牙语向他们致敬，总统许下了感人的承诺，要“在自由的哈瓦那”把破烂的战旗归还给他们。元旦那天，总统又去往橙碗的足球比赛，他一口一口抽着雪茄，他看到年轻的四分卫队员乔·纳马思带领亚拉巴马大学战胜俄克拉何马州代表队。总统在接受《纽约时报》的汤姆·威克的新年采访中，预计卡斯特罗政权被推翻，他说，美国将不会对下届古巴政府预先施加任何先决条件。

在哈瓦那，卡斯特罗抨击肯尼迪的橙碗承诺为“粗俗海盗首领”的胡言乱语。他夸耀自己拥有猪湾事件的赎金，他宣称：“历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支付了战争赔偿金。”切·格瓦拉发表了有关财经纪律更加冷静的讲话，指出古巴管理者要讲究利益地去进行业务操作。同在元旦那天，北越的炮兵在部队运输机队击落15架美军直升机中的8架。同天纳尔逊·洛克菲勒宣誓连任纽约州州长，

开始自己的第二段任期。“这是一个历史纪念日，”他开始了他的演说，“就在100年前，在1863年1月1日，《奴隶解放宣言》成为法律。”

新年过后，金立刻行动起来，因为没有什么需要等待的。首先，他召来怀亚特·沃克询问他是否已经为伯明翰运动起草好计划。确定已经起草好后，金让沃克帮他为一场秘密计划会议编制一张小名单。这是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拒绝接纳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董事会成员，知道他们会把这件事扼杀在摇篮中。他没有邀请金爸爸，也没有邀请任何编外的牧师，除了肖特沃和约瑟夫·洛厄里两位外，因他们在亚拉巴马州的经验是至关重要的。肖特沃是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因他在活动中的地位不亚于金。除了来自亚特兰大的三大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成员——阿伯纳斯，安迪·扬和多萝茜之外，他只选择了4人——克拉伦斯·琼斯、杰克·奥德尔、斯坦利·利维森和詹姆斯·劳森。这样包括金和沃克在内总共11人。金打电话对克拉伦斯·琼斯说时候到了。他希望琼斯安排3个纽约人在1月10日来多切斯特的休息寓所，琼斯并没有被告知此行究竟关于什么。不经意地，他打给利维森的电话让J.埃德加·胡佛警觉起来。

他们在亚特兰大集合后，都搭乘清晨的航班飞到萨凡纳。那个场合的基调严格地强调实用性，但按照其中牧师的理 解，萨凡纳地区植根于宗教，是个合适的革命地点。自1738年，在萨凡纳，英国的宗教复兴领导者乔治·怀特菲尔德发起了第一场美洲殖民地惊人之旅，让大规模的群众极度兴奋——这被称为“大觉醒”，此行横扫佐治亚州直达新罕布什尔州。他在1740年吸引了3万人到波士顿公园，那时城市的总人口还不到那个数量的三分之二。萨凡纳是约翰·卫斯理从英国而来首先到达的地方，带着他被怀特菲尔德在航行中的讲道所动摇的英国圣公会神学理论，怀特·菲尔德的影响力催生了众多浸信会教会会众，后来又催生卫理公会教派成员。格鲁吉亚疟疾肆虐的小海港成为两个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新教教派的发源地，吸引了早期美国做礼拜的人。在萨凡纳本地，改变信仰的精神是如此强烈，许多白人都能接受在奴隶中宣扬宗教的观念。非洲第一浸信会成立于

1788年，它是在北美大陆的最早的黑人教会之一。谢尔曼将军率领的大军朝海边前行去到萨凡纳，非洲第一浸信会的牧师带领奴隶传教士与谢尔曼将军谈判。近一个世纪之后，马丁·路德·金为庆祝解放日在非洲第一浸信会教堂布道。在这个历史厚重的教堂，金发表他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说的早期版本，就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前。

金等一行人从萨凡纳出发，到达旧公理会教友休息寓所，就在多尔切斯特这座处处洋溢着萨凡纳丰富历史奇特变化的小镇。它作为唯一已知的南方奴隶清教徒废地存留了几十年，于1752年转移到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正值原来的清教徒逃离英格兰多切斯特之后，在斯图亚特国王统治时期。这个镇保留了这样严格遵守秩序的虔诚——南北战争后的游客惊讶地发现，在最近释放的奴隶中没有一个黑白混血儿。北方的家庭即使在种植园枯萎之后依然和多切斯特保持紧密的联系。西奥多·罗斯福的母亲是多切斯特当地人。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和塞缪尔·F.B.莫尔斯两人的父亲都曾在中途岛公理教会做过牧师。其中在中途岛南部的牧师是神学家C.C.琼斯。他是位富有的农场主，一生都在从事有关奴隶之间的牧师职业。琼斯因他试图把奴隶制和基督教调和的学说而出名。作为一个提倡自由主义的奴隶主，他遭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毁灭性的攻击。最终他成为美国宗教历史上的悲剧人物。1840年，他们为了维护奴隶制度的体面性，反对黑奴制废除，这预示着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民权辩论的展开。琼斯的曾孙子，亚拉巴马州的圣公会主教，横在金在伯明翰途经的道路上。

金在多切斯特主持商务会议，但最初是沃克来进行情况介绍。他提出了一个计划，把活动分成4个阶段。首先，他们将进行小规模静坐，此举为他们建立的废除种族隔离平台吸引注意力，同时通过夜间群众集会来攒足实力。其次，他们将组织对市中心商业区的全面抵制，并会进行稍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再次，他们将上升到进行大规模民众游行——既实施抵制活动，又填补了监狱。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会在全国范围内号召外来人士突袭伯明翰，如同那次自由乘

车活动一样，在宣传、经济抵制以及监狱超员的重压下一并削弱城市力量。

作为一个总体原则，沃克宣称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如果他们展现出实力，那么外界的支持也将会成比例地增长。然而他们一旦开始，无法不加失落和沮丧的退却，还要在伯明翰冒着黑人暴力毁灭性爆发的风险。沃克说，无论如何，在伯明翰的竞选规模比奥尔巴尼小。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做好准备，一次性往监狱送多于 1000 人，也许更多。他们必须保持去监狱的人平均五六天的时间就要保释出来。沃克为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计划出各种保释费用，以和城市中的监狱花费做对比。对黑人周购物力做出估计，他根据抵制运动在不同程度上的成功情况，计算出市中心商家损失的钱财和损失率。为了奏效，该计划需要大量的准备、完美的时机和大量的钱财。

沃克有戏剧性的天赋。他把自己整个计划称作 C 计划——字母 C 是单词“对抗（Confrontation）”的首字母。假设布尔·康纳窃听电话，他会分配给主要领导者名字代码，反映出他对白人权威极度的尊重。金可能会是“JFK”，沃克说。阿伯纳斯可能是“迪安·腊斯克”（其实并不符合阿伯纳斯的喜好）。沃克自己可能是“RFK”。约翰·德鲁，伯明翰保险员，金曾经在他的家中待过，他的代号可能是“教皇约翰”。夏特沃斯，这次运动的长官，可能是“麦克”，这个名字是从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而来的。沃克的陈述是那么突如其来的惊心动魄，还有些不切实际。他设想出一个精心组织的跨入历史行程，花了 4 年去找到如此一台油印机。

然而，那是沃克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最辉煌的时光。他完成的那份计划上没有有一个句号被改动。相反，秘密会议花了近两天的时间，不断讨论和祈祷，这计划是可行的。有一条优势便是他们在伯明翰的竞争对手相对真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亚拉巴马州不合法，这本算不上是一条因素，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在伯明翰市也没有任何计划。夏特沃斯是亚拉巴马州基督教人权运动中毫无争议的大师，他在将近 7 年中一次周一集体会议都没有错过。只要金和夏特沃斯相处

得来，就没有陷入瘫痪的分裂。另一个潜在的优势是伯明翰的经济结构。这座城市基本上是一个在美国南北战争后利用南方不稳定的局势投机谋利的城市，在北方倾向于钢铁利益和其他企业力量。沃克和奥德尔已经列出了公司的名单，使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支持者可以在他们的根据地发挥杠杆作用。

另一方面，亚拉巴马基督教人权运动将会提供一小部分他们需要的人力。然而他们承认支持力量质量上参差不齐，充其量是大部分的伯明翰的黑人领导。A.G. 加斯顿有可能反对他们。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就支付教堂中燃烧蜡烛所用的钱财问题，发生了纠纷。那些是在之前9月的集会上燃了两晚上的蜡烛——这几乎不是全心全意给予支持的迹象。安德鲁·扬说他在伯明翰牧师中的游说并没有多么令人鼓舞。沃克承认保守的黑人牧师协会也许正在积极地反对他们。他们跑着穿过所有的牧师，经过其中每一名牧师，直到夏特沃斯打断了他们：“不要担心，马丁，”他说道，“我可以应付好这些牧师。”

金勉强微笑着回答说：“最好你可以。”

布尔·康纳酝酿着这场谈话。他已经把伯明翰当作他自己的私人隔离封地，其中有着严厉的警察策略，所作所为和阻碍治安暴力的传统毫无关系。黑人伯明翰处处散布着炸弹爆炸后的废墟，这情景证明了这一点。暴力的种种景象不会对金构成伦理道德问题。“倘若它来了，我们倒要将把它彰显给世人看。”他说。问题在于C计划是否可以承受体系的镇压。那11人中的大多数表示，他们需要迅速采取行动，而伯明翰的改革运动让他们把白人划分开来，把康纳摆在防御状态上。

就在第二天快要结束的时候，金严肃地向奥德尔询问情况，“杰克，告诉我关于钱的事情。”他问道，“如果我们接下来几个月还是没有钱的话，新闻界将会说我们去伯明翰只是为了还债。”

奥德尔已经根据自己的推测准备好应对事情的发展。在1962年的最后一个

季度，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已经开始净盈利 25000 美元，他说道，这还不包括从萨米·戴维斯那里筹集来的 12000 美元。从纽约办公室而来的广泛吸引力承诺在 1962 年的收入将会翻倍甚至 3 倍。“现在有 20 万美元都已经分批邮寄了出去。”他说道，根据可证明的回报率单。基于这些邮件已经从纽约办事处发出去，有些还在准备阶段，奥德尔自信地预言说直接邮递的收入将超过通过上半年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常规费用。

听了奥德尔的话，金不再讨论有关只是为了广泛筹集资金巡回活动而推迟伯明翰行动的问题。他转而在桌旁走来走去问他的同事能想出的结果，有些人给出了乐观的想法，有些人则避而不谈。斯坦利·利维森则让他们回想起布尔·康纳在 19 世纪 30 年代所发生的影响深远的政治经历，那时他作为钢铁公司的一位员工打破了伯明翰的劳工运动。相对而言，他说，30 年代的劳工运动比现在的民权运动要更加强大。因此，他们现在不能犯错误。他们注定要参与一个粗暴的斗争。

金严峻地宣布会议结束。“这里的 11 位与会者评估了我们将来会面对的敌人类型，”他说道，“我必须告诉你们我的想法，这场运动过后，今天坐在这里的有些人将不会活着回来。我想让你们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之后没过多久，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从萨凡纳办公室而来的就拍摄了这一队 11 位心事重重的队伍排队进入飞机场时的情形。像联邦调查局这样的官僚机构，短时间内备好监视工作并不是一件随意之事——要从其他任务岗上调来人员，和机场经理实施安全联络工作，处理相关人员的情报，弄到、放置、操作隐秘地方的相机。所有这一切俨然都是负责人胡佛本人专横命令的产物。他关于此次撤退的进度报告已经放在了总检察长肯尼迪的办公桌上。局内黑人线人的快速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一个人知道有关会议的任何内容，并且局内也不知道究竟什么已经被讨论过了。这个十足的秘密让人们把多切斯特的撤退看起来对胡佛十分凶恶，即使是在利维森和奥德尔并不在场的情况下。因为事实上，胡佛见到金秘密会见

了两位共产党人，其中包括一位本来打算要辞职的。在这一点上，他的报告引起了总检察长的怀疑。“伯克——情况并没有好转。”肯尼迪在对胡佛备忘录的其中一份中写道。

肯尼迪的关注让局内一股胜利的义愤加深了。他们在间谍的巢穴诱捕金；多切斯特会议倒不如在红场举办得好。就在那时，德科·迪洛克，曾在胡佛在任的联邦调查局有分辨变换情绪的职业经历，由金的失败写出了愤慨的备忘录，来为他在11月的电话留言做出回应。“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进一步联系金牧师，因为他显然不希望给我们提供真相。”迪洛克总结说，“事实上，他是一个骗子，从他和斯坦利·利维森的频繁交往并根据其指导行事的行为就可以充分看出来。斯坦利·利维森可是纽约共产党的秘密成员。”

“我同意。”胡佛在备忘录的最下面潦草地写道。就这样，在金的34岁生日的那天，联邦调查局正式把他列入不适合进行调解和协商的人选。此后，在收到显示有人试图杀害他的情报时，主席团将不再对金做出警告，像他们警告其他潜在目标常规行为那样，如夏特沃斯。联邦调查局把金完全摆到了敌人的位置上，金把自己的生活和信仰都压在了一次机会上，而这次机会可能会被敌人的思想所胜过。如此一个情报机构相信了金是自由的敌人，完全无视金刚刚开展美国百年以来引起的国内最大的自由风暴，这简直是美国历史上最悲惨的讽刺之一。

金耽搁了3个月的时间，其间一直有不好的预感，直到后来到达伯明翰。这一年初，他就和司法部部长肯尼迪一起赶去华盛顿参加未经宣传的私人会议，此次行程没有可查的记录，但是情况证实罗伯特·肯尼迪越来越像金和J.埃德加·胡佛的中间人。他们彼此适应每一个人，同时又强调指出对方的缺点。金离开了，在勉强认识到他不能轻而易举地巧妙处理奥德尔的指责，像他曾尝试在秋季尝试的一样。他无奈地通知奥德尔说，他需要一份“纸质证明”来表示，他已经认真对待奥德尔参与过共产党的指控。他还要求出示一份奥德尔的共产党社团文件证明，还要重申他对无暴力的坚持并且效忠于美国政府。当奥德尔答应了这

些后，金请求克拉伦斯·琼斯写信给司法部部长肯尼迪，要用奥德尔的言论来证明金的决定正当合理，要保留他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员工身份。琼斯，面对金和肯尼迪官员的秘密指控反映出毫无经验的偏执，取消了凡是出现在他草案上奥德尔的名字。

金保护奥德尔相对只付出了很小的代价，但是对他来说对品行的拷问，是一场偷偷摸摸也是非常不庄重的偏离事件，并且肯尼迪政府对它的关注度无论是在基调上还是实质上都标志着正与这场运动相距越来越远。肯尼迪总统在一次和黑人报界的背景访谈中推进了一项观点，即国家在种族问题上并没有所要面对的“严重分隔”。黑人问题包括在通往教育和经济增长的整个行政机构中。李·怀特，他的民权助手，告诉总统他想要听的——黑人人口“相对非常稳定”。金直接从司法部部长的办公室内电话告知肯尼迪总统，恳请他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演讲中包含公民权，这样正好可以标志着肯尼迪在白宫第三年政权的开始。迄今为止，肯尼迪从来没有问过1960年在民主讲坛上承诺过的司法。然后他再一次决定要推迟民权立法。它将永远不会通过，总统说，他坚持说他会做比民权问题更多的事情。他要通过任命职位和行政命令而不是这种无效花费巨大的动作来向国会递交这种没有通过的议案。

提到的总统命令只能够让金更加失望，因为他知道肯尼迪总统只是含蓄地拒绝任何林肯似的反对种族隔离法律的宣告。最后一次象征性的机会来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已经过去了，并且行政机构正在准备在林肯生日那天路易斯·马丁的白宫接待会。马丁和他的盟友给一大批黑人精英阶层发出了1000份邀请函。霍华德大学校长纳布里特会在那里的大学校长名单中，J.H. 杰克逊也位列牧师名单。该名单中还包括文艺复兴的幸存文人之一兰斯顿·休斯哈莱姆。在他热情的驱动下，马丁吹嘘肯尼迪总统将主持一个晚上，此次会是历史上白宫聚集黑人数量的最高峰。

同时，白宫严格保留所有对己的新闻言论。正在计划的盛会特意最大化地对

黑人嘉宾进行个人奉承，同时尽量减少其他方面的政治接触，尤其是在白人之间。大部分客人都毫不吝惜公共关系。他们明白对自己的邀请，无论是个人恩惠还是政治恩惠，在卡米洛特的那个晚上都标志着肯尼迪保密联盟的建立。黑人记者扼杀热心的支持来淡化事件，甚至爱讲闲话的《黑玉》杂志骂夜总会名人迪克·格雷戈里，因他试图利用他的专业优势进行邀请：“宝贝，你不发出会见肯尼迪总统提前宣传，当你是联欢会上的客人。”

仅仅在6年前，金曾巧妙地让自己被邀请到艾森豪威尔所在的白宫，而他随后的发言中透露了他对卷曲的礼服和皇家宫殿的渴求。现在，他是其中极少数对去白宫这个事件怀有疑虑的人。他在2月4日还犹豫不决，他和沃克开车到了乡村荒地，到“可怕”的特雷尔县旷野中，在突破性仪式的教堂之一，为去年夏天被烧毁教堂的重建而发言。金从佐治亚州南部飞到纽约，在美国犹太人大会上发言。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讲话，因为斯坦利·利维森帮助使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成为在沙利文诽谤案的主要支持者。美国最高法院刚接受对50万美元的陈述判决的审查——最初几项处罚与金的伪证罪起诉一起进行导致在1960年初的静坐——在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法律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宪政学者中，法院的未决诉讼给沙利文带来了广泛的关注。

经过和利维森的秘密协商之后，在美国犹太人大会募捐集会之前，金决定抵制肯尼迪的林肯生日接待会。他的拒绝恰逢最后一分钟变化，使得这件事华盛顿标准几乎不可抗拒。肯尼迪的社交秘书鲍德·瑞奇告知客人，他们不要为此次接待会去东大门报到。按照他们邀请的指示，但到了西南门，他们可以到总统夫人和肯尼迪白宫楼上隐秘的生活区来，先做一次“特别呈现”。金发了份彬彬有礼却有些虚伪的电报，表达了自己的遗憾。事实上柯瑞塔真是就要“有了我们第四个孩子”，而金要“出国”做演讲。但宝宝还要再过接近两个月才能出生，金听起来很重要的海外讲话只是想要逃离的借口而已。在纽约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讲道并且暗讽了几位募捐者之后，他便飞去了牙买加度假。

他变得爱沉思了，当他在计划着前面的飞跃时显得有些忧愁。在伯明翰之前的演讲，金回归到了那些对他信仰形成的影响，仿佛寻求安慰。从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这位洛克菲勒的河滨教堂幸存下来的创办人，他引用了其强制执行义务和不可强制执行义务之间的区别：“人为的法律保证公义，但更高层次的法律产生爱。没有任何一项行为准则不断迫使一位父亲去爱他的孩子。”他引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马丁·布伯的话。在谈及人性的宗教自由和心理自由的必要性时，他提到蒂利希：“人之所以称为人，是因为他是自由的。”在社会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必要性，他引用了康德伦理学原则的绝对命令，然后加上一段自己的观点：“两个彼此隔离的灵魂永远见不到神。”他引用了圣·奥古斯丁的警告：“那些在其他人的时候，自己却要休息的人是娇嫩的乌龟，用耻辱来换取自己的宁静。”在他标准演讲稿中的手写补充中，金恳求教会在自由危机期间放弃他们的这种宁静，以把自己从“尼布尔最近所称的”“平凡之罪”中挽救出来。

金对圣公会的恼怒已经逐渐扩散了好几个月。在历史悠久的有关宗教和种族的芝加哥会议上，在多切斯特战略会议结束后，他告诉 800 位尊贵的牧师说：“高尚的声明扩散的速度太慢。”他呼吁牧师要乐于牺牲，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宗教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尘世的痛苦和挣扎，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他传达给所有神职人员的信息，高贵或低贱，黑人或白人。他为芝加哥的自由主义白袍神职人员讲道，讲道时带着对家乡埃比尼泽教会生硬的愤怒。

“我厌倦了看到黑人牧师坐着大轿车逛来逛去，住着大房子，从不关心那些人的问题，却是那些人让他们获得了这一切。”他站在布道台上说，“我仿佛可以听到全能的上帝说：‘停止你的大声讲道吧，在我的面前大声号叫那些毫不相关的杂事，因你的手上满是污渍。对于这些我派给你，让你来服侍的人都是有需要的，而你做的一切却表明，你只关心你自己。’”我似乎听到上帝在说，现在是时候起来反抗了，要明确妖魔鬼怪必须被去除的目标。并且上帝不打算自己亲手来

做所有的事情。忽视这一点的教堂一定就是那些处于险境、毫不相关的教堂。

金把内部的暴风雨带到了牙买加，在那里，怀亚特·沃克仅仅在几年前已经教给他如何打高尔夫球。然而在自由行车手运动之后，金开始批判高尔夫运动太过资产阶级、太过轻佻，沃克养成了银行家一贯的习惯，说周三下午是他的“高尔夫球日”，无休无止地和金争论，金的这项运动是否干涉了太多他的私人生活。金越发心事重重，他非常愿意逃往牙买加，他迫切地需要在一水之隔的他国分分心。在洛杉矶进行发行工作的杜图唱片公司——里德·福克斯和其他喜剧演员的录音都是在那里首度在国内传播开来的，那是一个为黑人所有的录音公司，正在贩卖金演讲的盗版专辑。金担心对这家公司提起诉讼会显得他非常贪婪，也破坏了他今后与杜图唱片公司签订合同的机会，但沃克说服了他，告诉他如果他想为了这场运动，来保护他赚钱的能力，如今他别无选择。金要求那家公司赔偿 20 万元，并承诺把所有收到的款项都给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然后，纽约第五大道的斯蒂芬·柯里尔寄来一封优雅的信，告诉金，他的泰康基金会正“重审我们的主要保证”。比如它为选民教育项目和在多切斯特的公民学校提供津贴。柯里尔邀请金加入泰康受托人行列，和其他选定的慈善家进行非正式协商。“到现在为止，所获得的黑人的评价……和同样灵通和复杂的讨论加在一起，在可预见的未来范围之内进行预期。”金不喜欢扮演恳求者的角色，但他却不得不忍受基金经理的变幻莫测——无论他们扮演了杜图的松散还是泰康受托人的生硬。

2 月 8 日，那时金在牙买加，罗伯特·肯尼迪的助手，负责国内安全部门的 J. 沃尔特·耶格利，用一份备忘录让 J. 埃德加·胡佛吓了一跳。备忘录中指出国内安全部门希望能考虑对斯坦利·利维森作为颠覆组织的成员一事进行刑事检察。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建议，因为司法部门长久以来已严格限制“会员”起诉违宪。史密斯法案，让赫尔伯特·菲尔伯里克（《我过着三种生活》的作者，作为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人员在 19 世纪 40 年代晚期的共产党员被公开审判），在全国出了名，直到在 1956 年才逐渐销声匿迹。司法部部长赫

伯特·布劳内尔裁定，该部门拒绝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寻求起诉书，设定目标将要按照“暴力革命的实际计划”执行。根据1950年的麦卡伦法案，该部门通常只批准那些未能登记为共产党的人提出起诉。尽管利维森不符合以上任何一条标准，然而，根据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描述，耶格利也宣称，实际上如果正像胡佛不断在分类公告中说的那样，他和一位刑警一样危险，那么司法部应该要准备好放弃诸多限制。这会是值得的，政治压力迫使利维森彻底垮台——不是蹲监狱，便是被起诉和审判。在他的备忘录中，耶格利向胡佛要求出示一份“当前检举的总结报告”。

在联邦调查局，尽管胡佛和迪洛克差一点就要在1月对金宣战，耶格利决定要做的事情仍然非常不受欢迎。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主席团将不得不确证指控利维森。另外，还要不得不承认指控就只是来自蔡尔兹兄弟，胡佛将不得不让有价值的线人出庭进行盘问。前景不是多么有吸引力，因为比起执法的残酷和风险，胡佛更倾向于有政治情报的特许。想要找到一条其他的出路，他命令纽约办事处的情报人员，找寻其他可能会对利维森提供不利证据的线人。局内特工人员仓促地采访了他们最出色的14位线人，却发现没有一人见过利维森的姓名或照片，他们告诉胡佛这都是无用功。作为最后的希望，胡佛命令罗德岛的特工去口头审查路易·布登兹。在20世纪40年代同时期和莫里斯·蔡尔兹一同在《工人日报》的同僚布登兹，跟随着菲尔布里克，在史密斯审判案中一直是最出名的头号证人，然而布登兹也不认识利维森。

胡佛再一次使用间谍的逃生门：没有补充证据恰恰说明是因为利维森的工作甚至在共产党工作人员中间都是秘密。2月12日，肯尼迪总统的林肯生日接待会的当天，胡佛写给耶格利，联邦调查局可能不会提供有关利维森的“检举摘要”，因为信息来自“高度敏感的来源，那人不会接受审问或出庭作证”。

耶格利的选择是闪烁或抗议直言皇帝没有穿衣服，而且，面对J.埃德加·胡佛自己的权威，他眨了眨眼睛。这是赤裸裸的最后威胁。耶格利的选择要么是忽

视，要么仗义执言，皇帝没有穿衣服，然而，面对 J. 埃德加·胡佛自己的权威，他选择了忽视。利维森和金的调查仍在政治情报的范围内，这是胡佛想要的结果。此后不久，联邦调查局关于取证工作所做无用功的内部报告被束之高阁，上面标志着“禁止宣传”。

在白宫，肯尼迪的政党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总统在楼上生活区拥挤的人群中发现小萨米·戴维斯。肯尼迪大吃一惊——“绝对是吓坏了”，当他的助手李在一年之后提起来。他个人并不反对戴维斯，而事实上，他已经在弗兰克·西纳特拉和彼得·劳福德的陪伴下和戴维斯有所交往。但那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事情了。如今让总统感到受刺激的事实是，戴维斯，作为在美国最有名的跨种族夫妇中的丈夫，注定会吸引等在楼下的新闻摄影师军团的集中关注。肯尼迪担心他和戴维斯一起的合照，将对他的初选运动涂上致命性的污点。此外，作为一名颇具天赋的新闻观察员，他感觉到萨米·戴维斯在白宫的照片将吸引新闻界足够多的兴趣，突破皮埃尔·塞林格在接待会上精心策划的媒体小寐。

肯尼迪很快利用他旁屋和衣柜里面的帮手，他想要知道萨米·戴维斯究竟是如何通过大门的。每一次戴维斯的名字消失的时候，这名字都会被顽强地重新插进入境名单上，然而却没有一位帮手，包括路易斯·马丁，都不承认自己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每个人都默默地就官僚主义的奥秘耸耸肩，直到总统平静下来，着手处理如何不让戴维斯出现在照片上的实际问题，还要做到不激怒戴维斯或吸引新闻界的兴趣。他们暗中讨论问题，肯尼迪继续迎接宾客。就在摄影师进入的时候，一个策略需要肯尼迪夫人把戴维斯拉到一旁进行私人谈话。没多久肯尼迪夫人便接到了指示，但是，恐慌的话语蔓延开来，该计划如一场羞辱般冒犯了她，也侮辱白宫的礼节，并且冒犯了戴维斯或是戴维斯夫人——助手们也不确定到底冒犯了哪个人。无论如何，第一夫人都拒绝下楼接待。肯尼迪总统本人不得不为了确保操作继续进行而采取补救措施。

对于李·怀特、路易斯·马丁和其他肯尼迪的助手，都对总统为戴维斯到场

的愤怒产生了令人难以忘怀的震惊，但那天晚上在表面上看来风平浪静。从萨米·戴维斯的脸色上也看不出什么。在林肯全国范围的生日庆祝活动中，共和党不得不摒弃最知名的黑人发言人——算是白宫那晚附属的党派福利，会为某些人所感激。塞林格的新闻办公室设法把此次接待打造成肯尼迪总统的一次微不足道的事件，比他收到的来自民权委员会的林肯百年纪念报告次要得多。塞林格引导记者把重点放在报告的威胁较小的方面，比如黑人学生在市区的学校人满为患。《纽约时报》发表标题为“公民权利斗争转移到北方”的文章，指出这场接待是一场“民权领袖和政府官员”以及被约翰逊副总统点到名的宾客的聚会。对路易·马丁来说，这种掩饰就是摧毁白宫为对抗黑人筑起的社会壁垒所付出的代价。认同的种种线索避开了黑人社会的隐私——《新闻周刊》称这场非正式接受的接待本身就是一座“里程碑”——即使是作为一个秘密，马丁仍然珍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毕竟其确保了整个一代的领导的入场。大约在金从牙买加回来的时候，他动身前往迈阿密养伤。

那些和金一起参加过抵制肯尼迪总统政党活动的人很少，但都非常出名。A. 菲利普·兰多夫和克拉伦斯·米切尔拒绝前来，在被告知他这么做是为了抗议肯尼迪的胆怯，两人其实都比金更加清楚。兰多夫不耐烦了好几个月，他一直在与贝亚德·拉斯廷讨论关于恢复他 1942 年打算在华盛顿游行的计划，并拿整个国家的军事工业来恐吓罗斯福总统。米切尔，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在华盛顿的首席说客，留在家里，因为肯尼迪没有派他在国会上游说。他认为肯尼迪的新边疆方针远远没有他的老同僚罗伊·威尔金斯做得有利，他强烈反对，以至坊间流传着他们两人长期不和的传闻。一连几个月来，米切尔已经随口说出隐晦的警告，告诫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可能会叛变到共和党那边。他认为，在国会的共和党已经提出反对种族隔离、反对就业歧视以及反对选民恐吓的法案——履行在 1960 年两个政党许下的所有承诺。

2 月下旬，肯尼迪总统提出投票权法案的反抗警告做出了反映。他的决定来

得如此突然，李·怀特等人彻夜未眠，起草立法。该法案，用书面信息催促国会，充其量吸引了一片适度的掌声。自由派共和党人说，他们的立法要好得多。令人失望的民权领袖认为尽管这很有价值，但仍是一个狭隘并且受限的马后炮。即使是那些曾在林肯的生日接待会的光芒下沐浴的人都无法让自己去热情地赞美这次初步行动。肯尼迪总统为他自己的意愿以及他政党中的南方人所约束。他使得自己陷入一场困境之中，那里到处都是批评他关于民权方面不做实质性工作的声音，然而更多人批评他只做了那么一点。

洛克菲勒州长抓住时机来攻击肯尼迪的民权记录。有一次在纽约州北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集会上，他宣布了克拉伦斯·米切尔私下里所说的话。洛克菲勒尖锐地抨击了肯尼迪通过总统权力的任命来大力宣传促进种族进步的计划，还指出总统最关键的任命是4名南方法官，个个带着著名种族隔离者的观点。这指出了在1964年主导的总统竞争对手发动的攻击促进了肯尼迪在下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的唯一人权问题。总统回答时，称赞他手下的4名法官“在履行就职宣誓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把它们和艾森豪威尔在南方的任命工作相比较，然后转向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问题。

第二天，肯尼迪叫来司法部的尼古拉斯·卡岑巴赫。“确实是不好吗？”他问，把卡岑巴赫摆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一方面，卡岑巴赫很清楚地知道洛克菲勒的攻击，实际上是低估了共和党对抗对肯尼迪法官的案情。南方最好的民权法官都是艾森豪威尔任命的人，而事实上是该部门通过法院换来种族平等的唯一希望。最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者都是肯尼迪的人手，并且他们在数量上不止4人。在另一方面，卡岑巴赫是美国总统的下属，可能已经盯上了早上《纽约时报》的头版。在那里对他的“丰功伟绩”的引文一边满是法官令人讨厌的描述——想要再次保证，危险的尼尔逊·洛克菲勒并没有愚弄他。卡岑巴赫闲聊说有一项肯尼迪的任命“一直不可能”。他勇敢地封锁了一些最坏的消息——即密西西比的法官考克斯“一直不怎么好”。但是当总统近乎哀怨地表示，“我们其他的任命都已

经，嗯，嗯，做得相当不错”，然后他等待一句评论，卡岑巴赫把残酷的事实化为甜蜜。“我不认为对于那件事，我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说。

1963年3月初，这场就肯尼迪法官的冲突忽然爆发。两个星期前的礼拜天，金在埃比尼泽教会布道。在家庭集会之前，他总有些私人的、质量似蚕茧的布道。现在，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后，为伯明翰运动净化自身，他的语气比平常更加固执。他就他一生专注于邪恶世界的本质进行讲道，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作为标准文本，讲述信徒们无法从一个疯子体内中驱走邪灵，因而动摇了信念。“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赶出去？”他们问道。

在他的布道中，金回答说，罪恶是超出了神的责任，同样也超出了人的责任。他讥笑那些伪君子懒散地把这些正义事业留给了神仙。这些人便是在凯迪拉克的“黑人大大人物牧师”和所有胆小伪善的灵魂——他们允许一切舒适物或习惯来颠覆良心的要求。金一再强调他的主题，展现出驱使他去伯明翰的激情，并且相关的情绪也同样强劲。他们之所以无法驱除恶魔，他告诉会众，因为恶魔太深地植根于人性。人类的能力，已知或未知的，开发或未开发的，都触不到它。不是十几场启蒙运动的自由理性可以促进的，也不是实现所有取得科学进步的疯狂梦想所能达成的。“人文主义的希望是一场幻想。”金说道。

接着，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并没有向外拓展些有关奴役、大屠杀，或是原子弹这些常规意义上的堕落。他邀请会众和他一起向内看一些一开始看起来很简单癖嗜，那些会慢慢变得非常顽固，直到最后会压倒一切良善。它们出现时纯洁得如同不能征服的罪恶——陌生，仿佛是牙痛般贴近人自身。“你们中许多人在某种意义上知道是什么在和罪做斗争。”

年复一年，你意识到了可怕的罪行正占据着你的生活。它可能已是饮酒的奴役，谎言的奴役，不洁的利己主义的奴役或是性滥交的奴役。随着岁月的流逝，罪恶越来越大胆地被展现出来。你一直都知道，这是一种不近人情的入侵。你绝不可能根据事实做出调整。你一直都知道，这是错误的，它已经作为不近人情的

入侵者侵犯了你的生活。你对自己说：“有一天我会起身驱除恶魔。我知道这是错误的。它毁了我的性格，让我的家人蒙羞。”最后的日子到了，你做了一个新年决议，决定彻底摆脱这个卑鄙的恶魔。然后接下来的一年来临的时候，你像从前一样在做些邪恶的事情。你能否还记得困扰你的惊讶感和失望感，当你发现毕竟你已经付出了真诚的努力——你发现毕竟你下定决心要摆脱它，但是你的旧习依然在那里。然后出于惊讶，你不禁发问：“为什么我不能驱除它呢？”在这绝望的一刻，你决定把你的问题交托给神……你发现罪恶还是和你在一起。上帝不会把它驱逐出去。

金表达了另一种特别真实的热情——一种对罪恶的同情感，最终成为无情的自卑感，一声对忏悔的恳求。卑微而平坦，不屈从于任何人的敏锐感觉，这种来势汹汹的卑微感和崇高的正义感相碰撞产生的一股合成的激情，是金所特有的。

在一个层次上，他只是单纯地为会众解决冲突。既不是神，也不是人类可以单独去改变人类本性；人类必须让神攻击他们内心的罪恶。“这是将累积的罪恶从体内释放出来的唯一途径。”他说道，“我们只有允许神的能量在我们的灵魂中释放才能做到。愿我们今天走出去能有如此大的信心。”从那里，他开始使用一个以人类需要的传统神学理论作为结束词，邀请神来建立合作关系。就连最粗陋的埃比尼泽成员都可以理解，并且最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也不会反对这样的结论。大多数成员都知道，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浸礼会说教。金对凯迪拉克里的牧师进行猛烈的攻击，是履行一项真正争议的可怕承诺，也是他对罪恶的冥想而传达真实的绝望。

金所滔滔不绝讲的关于希望的例子，不是来自每天生活的斗争，而是来自不朽者的万神殿。他谈到“沙子般的西蒙转而变为‘磐石般的彼得’”“迫害者索尔而成为传道者保罗”“充满欲望的奥古斯汀成了圣人奥古斯汀”。他引用了托尔斯泰彻底改造的主张：“好的和坏的调换了位置。我以前做的那些事，我现在不再做。我从前经常去的地方，我也再不去。我从前脑中的思想，我如今也不会再

想。”金提到传说中的罪人饱受内心告白的煎熬，扭转痛苦局面以产生历史奇迹。其转换的证据是一个变化的世界。因为金本人设想在伯明翰创造一个历史奇迹，他的布道透露了在公众人物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之间要发生一场动荡的冲突。也许会倚靠非凡技艺和公众人物的牺牲来救赎个人。也许私人的恶魔，不仅会驱动公众人物也可以帮助他——影响他的傲慢，让他看到对手，而不是敌人。如果金感觉到愤怒，这不是冲布尔·康纳来的，也不是对最恶毒的种族主义者，因为有更多比他们的罪更加深不可测的罪，然而要对抗那些冷漠盲目的温和派伪虔诚教徒，他们拒绝看到金正为他们提供一条出路，让他们从令人发狂的明显又比较容易驱逐的罪恶中走出来——那罪是对抗弟兄的罪。

这是金的目标，但既不能缓和痛苦，也不怎么清楚明确。没有哪个人一生都在吞噬罪恶，让自己被推举为圣人还能非常安逸，并且他的进程和金所持有的有关邪恶的根本观念相悖。以19世纪辩证学家的方式，金似乎是在把尼布尔问题放到自己的头上：个体中存在的恶比社会的不公正棘手程度相差无几。在伯明翰，如果像金这样的罪人能产生公众道德的奇迹，后来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又会发生些什么呢？那么，尼布尔的神学又会发生什么？埃比尼泽教会的崇拜者往往识破了这种混乱状态。金似乎十分郁闷、心情不佳，他们离开他的布道，为他那强有力的低沉讲话连连摇头，纷纷议论说，他是一个“被神困扰”的人，想必已在撼动白人世界的边缘了。

在关于“邪恶”主题的讲道之后，金在当天在伯明翰急忙去为夏特沃斯在亚拉巴马州基督教人权运动的首席助理在周二的特别选举布道——那人正是“火球”牧师尼尔森·史密斯。按照怀亚特·沃克的原C计划，游行示威活动在接下来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6日举行。但是伯明翰黑人的投诉已经迫使其推迟到3月14日。当时的想法是，在选举后他们需要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为竞选做准备，并且还要找出大选是否在伯明翰产生了更为有利的政治气候。3月14日妥协的目标保留了整整一个月，就是在复活节前被沃克称为“黄金购物季”的那月。在

此期间出现的经济抵制和不断升级的游行示威活动，将会在城市创造不得不打破隔离的最大机会。

3月5日的选举并没有明显有优势的人选产生。然而，布尔·康纳和艾伯特·鲍特韦尔之间的决定性竞选定于4月2日。伴着无人过问的伯明翰政治从而另外延长4个星期，支持延迟的理由在金和夏特沃斯的联盟中重新浮上了水面。所有的伯明翰对是否要结束布尔·康纳时代的重大决定非常敏感。康纳让自己成为商会以及民权运动的主要障碍，已经团结了受压迫的人并和精英联合在一起。里面有靠不住的、不言而喻的反对他的联盟——黑人、工会、白人报纸、改革运动家、形象意识很强的商人如西德尼·斯迈尔——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做到最好。在他们的心目中，1963年的春天突然变成可能在伯明翰开始种族示威最糟糕的时刻。A.G. 加斯頓极力反对那场运动。浸信会部长联盟主席J.L. 威尔牧师，几乎要打破公共沉默，就金的计划上通过一条决议，要求金远离这座城市。黑人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意见是那么强烈，即使是夏特沃斯。通常都小看竞赛选手之间的差别，称鲍特韦尔仅仅是一个“有尊严的康纳”，正犹豫着逆潮流跨越。毕竟，他在伯明翰流亡，并住在辛辛那提。

在反对推迟计划的几个人中，詹姆斯·劳森算是位名人。自从1月在多切斯特撤退后，他便总是从他在孟菲斯的教会前来，定期到伯明翰进行突袭，参加主持夏特沃斯的亚拉巴马州基督教人权运动成员研讨会，用非暴力的方法为其成员探讨问题。劳森的工作就是为了C计划而训练步兵，他从前已经为了拖延的反对种族隔离活动在纳什维尔等城市训练了那些步兵。在教堂的地下室和私人住宅露面，都是由怀亚特·沃克引见的。劳森在招募新兵，讲授说教，全面改为采取非暴力的方式。他的目标便是要找到尽可能多的志愿者，愿意在伯明翰监狱忍受10天。如果他们最初的妙计在研讨会上的实践检验中幸存下来，他们便签署由劳森设计好的非暴力承诺卡。到3月为止，沃克在他的“监狱文件”中已有200张卡。劳森反对延期，理由是这200人决定这么做绝非因伯明翰政治而一时兴起

的念头，应该进行决策指导。他们的意愿和士气是最重要的。

沃克听到有人引用他早期的嘱托，即复活节销售旺季的极端重要性。但是，他们说，因如今他们不得不等到4月2日后的决定性竞选后，并且，复活节前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组织一场成功的运动；而且由于伯明翰的黑人本来应该花光所有的钱，因此在圣诞购物季之前将无法有效地进行抵制。也许他们应该将其推迟到1963年底。这些评论的要义把劳森的观点驱逐回起点，所有这些自称是实用性，其实无非是抑制任何大规模抗议外在恐惧的标志。要知道总有很好的理由推迟。但伯明翰的严峻现实令人们集中注意这些禁止命令，他们威胁将不再支持当地黑人领袖——这是金不可忽视的一个损失。虽然他同意劳森的观点，然而在长时间的拖延后，会使得再次招募监狱的人的难度翻倍。他也看到了广泛涌出的相互指责与关于推迟的争论。牧师们不再对夏特沃斯有所憎恨，称他是缺席的独裁者。即使是约翰·波特——金的亲信，也是从前在德克斯特大街教堂的助理牧师，金刚刚亲自让他在伯明翰布道台就职，他却违背了C计划。他说夏特沃斯是一位不稳定的独裁者。他们在往前冲的冲动下和推迟的压力间摇摆不定。上周六，即3月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员收到杰克·奥德尔和斯坦利·利维森之间极其森严的电话交谈。其中利维森问这场运动是否在“无名的城市中”仍如期进行。奥德尔回答说是的。然而，就在第二天，金亲口告诉利维森说，他已决定“推迟那件事到选举后，因为布尔·康纳也在选举中，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在那之前做出行动，他可以用它作为自己选举的有利条件”。另一个让金退缩的原因是，金向利维森坦承，伯明翰的白人将“尽一切可能去破坏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形象”。他特别提到了《伯明翰新闻》和其上发表的对金雇用共产党颠覆分子的指控，例如他雇用奥尔德。

这段截取而来的对话让联邦调查局第一次注意到金正在预谋一场新运动。联邦调查局在国内传播了一条呼吁，即有关“金来伯明翰的目的”的消息。与此同时，在埃比尼泽教会的周日那天，金借鉴了弗农·约翰的题目，布道了自己版

本的“死后的隔离”关于穷人和富人的寓言。他第二天并没有照常去伯明翰参加群众例会。然而夏特沃斯却从辛辛那提飞往了那里。尽管大选在即，尽管金有自己的想法，这个立刻发起运动的主意仍然存于他的心中。那天晚上的会议上透露出交织的期待和羞怯。“不会有什么黑奴了。”一位发言者承诺说。“还会有黑奴，先生。”夏特沃斯说道，没有给在观众席中康纳的侦探透露任何细节，告诉在座的人，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检察长肯尼迪会保护他们的安全。第二天，怀亚特·沃克和伯明翰的领导人继续就拖延的智慧进行辩论。还不到周五，夏特沃斯终于也同意了延迟，从前他反对他的整个角色，从他的承诺到他著名的虚张声势，以及对伯明翰黑人牧师控制的强大保证。他写给金和沃克的信掩饰了他对此让步在一片模糊不清的前景背后的忧虑和逆境。

金的承诺所触及的范围正在沦陷：他必须改变伯明翰，否则伯明翰的过去将会是他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被毁掉的。为了实现目标，如今他似乎孤立无援，除了一连串的厄运，还要面对比平时都要多的国内问题。各派律师都在就C计划的预期法案进行争吵。一位心怀不满的前工作人员，因未授权便使用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差旅费而被责备，他随后离职，公开指控金“为谋利向州长洛克菲勒出卖立场”牟取私利。简而言之，一切都没有头绪，所有的缺陷把金带到了紧张的边缘。在3月，他用了最后两周的时间对计划做出补救：如果在伯明翰的其他一切都失败了，运动的势头坍塌，他将呼吁局外人注入伯明翰帮助填补监狱。当他远去华盛顿，金感到自己强烈需要这样的应变力，向值得信赖的朋友求助来招募志愿者中的秘密干部。沃克在神学院的老朋友沃特·方特罗伊，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越来越多的储备军报告，给了金内心很大的安慰。

3月27日，金从华盛顿飞回亚特兰大的家中。恰好带着柯瑞塔去医院，迎接他们第四个孩子柏妮丝·艾伯丁的出生——那个在奥尔巴尼怀上的孩子。他停顿的时间足够长，和他妻子孩子一同摆姿势，让《黑玉》杂志的记者拍照，然后在3月29日返回了伯明翰。从那里他于当月31日飞往纽约。这场秘密

会晤部分是哈里·贝拉方特的想法，还有一部分是利维森的主意。注意到金的习惯是在危机中趋向于他的北方支持者，他们认为对金来说，能够给予他们信任，带这些支持者参与进秘密会议中更加明智，并且提前通知他们有关C计划的内容。那样，金会显得更有条理，而这些支持者，感觉更像是戏剧的一部分，可能更容易对所寻求的帮助做出回应。怀亚特·沃克留在伯明翰，轻视这个计划是为名人举办的“安抚会议”，称它为“一个小噱头”，但金却不遗余力地礼遇。和夏特沃斯、阿伯纳斯、利维森和克拉伦斯·琼斯一样，他挤进了贝拉方特拥挤的公寓，经过安东尼·奎因和弗雷德里克·马奇两位演员，经过威廉和洛特·孔斯特勒，经过州长洛克菲勒的新闻人休·莫罗，经过《纽约邮报》的詹姆斯·韦克斯勒和其他70名记者、高官、朋友和陌生人——所有人都宣誓要保密。当晚的发言中金表现得非常好，但在伯明翰在夏特沃斯充满情绪的描述中，金的头轻微地抽搐着。贝拉方特认为是紧张带来的痉挛。他从前还没有看到金表现出紧张的身体表征。

天还未亮，每个人都认为阿伯纳斯已经回家了，金开始感到放松了。朱莉·贝拉福特拿出了她私人储藏的夏威夷雪利酒。自从她把雪利酒引荐给他喝，金一直保留了一个笑话，关于他能品尝出几分最优雅的纽约人的睡前饮料。每当他来到贝拉方特的家，他煞有介事地检查酒瓶，以确保雪利酒没有低于他最后一次喝酒时仔细在商标上标出的线。那天晚上，喝着夏威夷雪利酒，他以取笑他的战友来征服伯明翰。“我一定确保那些被逮捕进监狱的人不打鼾。”他吟诵道，虎视眈眈盯着阿伯纳斯。阿伯纳斯强烈抗议说，他确实没有做过打鼾这样的事。

金的眼睛因为喜悦而圆睁，“你真折磨人，”他说道，“和你不一样，白人不会创造任何我们可以得到的东西。任何他们要我承认的，我都会承认，只要他们能把你的和你的鼾声从我的牢房中带走。”

他和阿伯纳斯大笑着，手舞足蹈地说着话，直到困意来袭。他们返回了蒙哥利特，然后，他们飞到亚特兰大，在那里等待着金的却是所有城市大剧院的票被

抢购一空的消息。周二，他带柯瑞塔和宝宝从医院回家，那天是4月2日，他们当天下午就去往了伯明翰。他们潜入那个城市，那城市的心思全在当天的决选选票计数上。金无视加斯顿汽车旅馆，去寻找在那里等待着的怀亚特·沃克，他正带着写字夹板和他所有清单——监狱名单、电话志愿者列表单、交通委员会名单、食品明细表以及邮件室列表，还有市中心午餐柜台位置的布局图，他在街道地图标出了到那里的最佳路线。还有，沃克确切知道一位老人走到麦克罗力参加静坐抗议所花的平均时间比一位青年来说长多少。然而所有他成山的单子和计算数据比起一座美国城市的核心身份来说似乎都小得可怜。到最后，C计划算不上符合什么社会科学准则，而是接近于一场政治风险，或者说是某种形式的一场理性操练，没有任何精神方面的指导——是一场冷冰冰的冒险。

第十九章 绿林镇和伯明翰监狱

一场罢运活动让伯明翰的这个周三比往常都要安静，那天是4月3日，正是金的生日。当时，沃克正动员他电话清单上的人，号召他们响应自己的计划，去填补监狱——根据他的统计，他共打电话给350人；但金后来记得是250人——然而在这些人中，共有65人履行了承诺。在A.D.金的教堂地下室中，沃克向他们简要叙述情况，宛如一位正面对轰炸任务的空军指挥官，他还在黑板上勾勒出勤务工作的流程。接下来，金和詹姆斯·劳森最后重申了非暴力的理念。然后，他们动身去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去和夏特沃斯会面。教堂坐落在凯利·英格拉姆公园的对面，穿过公园就是金位于加斯頓汽车旅馆的总部。夏特沃斯已经派遣了两位最彪悍的亚拉巴马基督人权运动人员，去请求示威许可。那两人与布尔·康纳本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据他们报告说，康纳把他们从办公室里驱赶出来，并咆哮着说：“我会把你们送到城市监狱，送进罢工纠察队中！”夏特沃斯还亲自向记者们散发他《伯明翰宣言》的印本。“被压迫的人民不能永远忍耐下去，”声明这么开始，“……正义缺失、毫无进步的伯明翰要求我们做一个道德的见证，给我们社会团体继续存活的机会。”

然后，65人排成5队分别出发，踏入常规玻璃门，去往爱情男子餐厅、必兹斯餐厅、克雷斯餐厅、伍尔沃斯餐厅和布里特餐厅的午餐柜台旁。他们已锻炼好自己的心理素质，以待逮捕监禁，但在前4家餐厅里，柜台后精心排练过的服务员只是劝告白人顾客，说他们已经打烊了，并关了灯，留下黑人们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仅在布里特餐厅，管理人员召来了警察，警察用囚车拉走了21名示威者。布尔·康纳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在那里，他郁闷地想着艾伯特·鲍特韦

尔是如何狠狠打败他的。此刻他正制订一个孤注一掷的计划——不理睬已出的选举结果，努力保住自己的工作。康纳公开抨击那4家封闭午餐柜台的业主，未能配合他的计划，来监禁每一位挑战种族隔离的黑人。他重申了他的公众承诺，即“让监狱爆满”。

金和康纳一同感受到了对监禁人数之少的失望。起初，他希望可以开始得更惊心动魄，特别是如今，眼看复活节就要过去了。他和他的助手们感知到了在黑人活动家中涌起一股惊人的反对态势，他们中许多人都在庆祝康纳的失败，而不是谈论监禁计划的事。在当晚的特殊群众集会上，夏特沃斯宣布，他将和大家每晚碰面，直到整场运动结束。阿伯纳斯和400名会众一同就时间的紧迫性开起了玩笑。他说道：“白人能在两周内学会‘扭跳舞’，但他们已花了200年的时间学习如何相互适应……你们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他劝导75位新的志愿者自告奋勇加入监狱名单，但第二天，被他们成功送进监狱的却只有其中的4人。一切似乎出错了。少数记者一直关注着结果和金所承诺的在种族隔离方面的“全面进攻”之间的巨大差距，记者们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在伯明翰危机初期的障碍中，也许影响最严重的障碍是金作为顽抗的、失败的改革者形象。自从他从奥尔巴尼撤退后，在很大程度上，已有8个月淡出公众视线。他的名字已经褪色。他似乎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自量力地去试图做一名成熟政治领袖当之无愧的象征形象。

一切就好像重新开始。金曾计划在第三天亲自去坐牢，但他又决定，还是要继续巩固运动的内部力量。在艰苦的补救工作中，他几乎不断地遇到成群的牧师，他向他们说教，回答他们那些充满怀疑，甚至怀有敌意的问题。静坐计划被店主的防御性战术复杂化了，运动领袖转而在市政厅举行抗议游行。弗雷德·夏特沃斯在4月6日星期六那天，领导了第一场运动，带领四十多人跟他一起被关进了监狱。这是一个值得敬畏的数字。沃克坚决认为此情况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有缺失，示威游行活动和要求午餐柜种族融合之间有着清晰联系——而这一切

被整场运动中生命的信息大大抵消。然而，在私人战略会议上，若要他们找到一些有一定权威的传教士，跟随夏特沃斯在第二天进监狱，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自从1月起，金一直在自己的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中寻找志愿者，但唯一在那里，并愿为之效劳的人是詹姆斯·劳森，他无法从他的研习会中幸免。通过减少常规义务讲道中拖拉的谈话，金转向“火球”史密斯，他是亚拉巴马基督教人权会议上夏特沃斯的副主席，并说：“史密斯，我要你去坐牢。”——对方极不情愿地同意了。金也让他哥哥 A.D. 同史密斯一道去监狱，然后他招募约翰·波特，完成了一组传教士的招募，带领第二天的游行队伍前往市政厅。

布尔·康纳和他的“冲锋九号”兵团在人行道上，面对着一大群围观者。一位名叫勒罗伊·艾伦拉的19岁示威者，被眼前一群警犬弄得烦躁不安，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陶土管，于是两只狗冲向他，在人行道上开始对他撕咬起来。工作人员终于拉开了狗，把艾伦拉拉上了警车，同其他20多位示威者和3位牧师一样。那晚，警犬的故事原原本本地伯明翰的黑人中迅速传播，这个故事和身着极其华美的圣枝主日长袍的3位牧师率先进入监狱的故事形成了鲜明对比。

可是监狱运动的志愿者仍然很少。所有被沃克珍视的细节都没有将整场运动从偶然自发性的表象中拯救出来。与金以往的冒险相比，伯明翰陷入了消息相对真空的状态。即使当地黑人两周一次地把金的运动当作令人不安的传言，也并没有任何关于示威运动的直接报道。一篇社论攻击这场直接行动“浪费并且没意义”，并以鲍特韦尔当选市长为安慰。几天后，有100多名示威者进入伯明翰监狱，而报纸的头条报道却是罗伊·威尔金斯在肯塔基州的午宴演说——沃克和金都期待从伯明翰世界中得到这样的待遇，此报作为亚特兰大《世界日报》的姊妹报，为金在埃比尼泽教堂的劲敌 C.A. 斯科特所有。

他们没在其他媒体上做得更好。金推出 C 计划，正如这个城市突然充满了乐观主义和公民革新。社论漫画常常表明，刚来到城市的领导急切地摩拳擦掌，摆出准备大干一番的架势，而白人报纸把种族隔离主义者连同金一样，作为公民

改革运动的污点排除在外。布尔·康纳和其他两位城市特派员宣布，他们将拒绝在4月15日离开办公室——这构成了暴乱的威胁，也可以说是敌对政府之间的战争，他们不得不在报纸上购买广告，来发表他们的意图。有些得意的是，《新闻报》上发表了有关州长乔治·华莱士和弗雷德·夏特沃斯两位抱怨对静坐事件“新闻封锁”的一则小故事。他们持以赞许态度。白人报纸传达了市长当选人鲍特韦尔所宣布的对金政策：“我呼吁大家，无论白人还是黑人，请冷静地去忽视，他们如今正企图在伯明翰所做的一切。”

尽管金的名字和城市的公共形象就像种族隔离运动的巴士底狱，外界观察员却也忽略了这场在紧要关头的对决。肯尼迪总统没有就这一系列的示威活动做出任何陈述，也并未回答问题，因为华盛顿记者根本没有询问。政府的唯一举动是一通伯克·马歇尔打来的电话，他按照《伯明翰新闻报》出版商的要求行事，号召金继续推进他在计划上的延迟。马歇尔告诉沃克说，罗伯特·肯尼迪本人反对游行示威活动，认为那不过是一场对还未执政城市政府中改革所要做的“不合时宜”的伏击。国家出版物反映出了白宫的情绪。伯明翰的消息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最后几版上，对第一场C计划行动的内容提要为“集体驱动力减小……静坐和示威活动计划未遂……游行示威活动并无进展”。金抱怨说，他的工作在北方从没得到过如此负面的新闻评论。

反正大多数人对伯明翰都没有心情。在古巴第一场大决战冲突后，第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里，大众文化的激励机构促进了几乎所有乐观的事情。《生活》杂志庆祝政府使用氢弹爆破建立新港口的计划，称将会建成巴拿马运河的翻版。该杂志还预言迷幻药以及有致幻作用的仙人掌佩奥特掌和其他致幻剂会被很快利用，以使人们“更多产，普遍高效”。这种对奇迹的敬畏颇具感染力——如DNA分子的发现般既意义深远——是“生命本身的钥匙”，又平淡得如同啤酒易拉罐的发明。年轻的杰克·尼克劳斯在大师锦标赛中对抗阿诺·帕尔默，那个4月，最流行的歌曲是薄纱合唱团快活热情的《他是如此之好》。

待到金的志愿者终于开始慢慢有所行动，民权方面不佳的新闻胃口却在其他地方稳定下来。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登记领导，几乎在不知不觉中精心设计完成了金想要达成的希望，构建一场能吸引全国关注的运动。他们是如此成功，让肯尼迪政府在民权问题上的内部消息集中在密西西比州，而不是伯明翰——即使是在金的追随者开始填补布尔·康纳的监狱之后。梦幻的天赋让密西西比州的学生编造了一场关于暴力和纯真的诱人故事，这样克劳德·西顿等主要记者和鲍勃·摩西一起在绿林镇留了下来。

对霍利斯·沃特金斯和柯蒂斯·海斯，这两位最初从麦库姆招募的新兵来说，摩西增加了15位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成员参加选民登记项目，这些项目如今分散在三角洲富饶的农园之乡，在密西西比河河流和亚祖河支流之间，超过6个之多。团体标签对成员们来说无关紧要，戴安·纳什·贝弗尔为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工作。她的丈夫詹姆斯从亚特兰大的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领取一份半常规的薪水——这激起了大家轻微的羡慕，然而没有任何轻蔑之感。艾姆斯·摩尔和艾伦·亨利，两人都是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员，经常作为领袖参加夜间议会。

经历了1962年的挫败之后，他们在1963年的现实目标没有超越出生存的范围。密西西比州的白人统治阶层已经表明他们对黑人投票非常不满，即使在那些只有少于5%有资格的黑人已经登记过的县中。对政治危险一度十分敏感的密西西比州立法机构补充一项条件，报纸上需要在可能接受前两周刊登新选民申请人的名字。另一项新法律允许目前的选民对新申请人的“思想品德”进行反对评议。面对这些法律，加上几起枪击事件和大门紧闭的教堂，密西西比州没有哪个黑人有望悄悄进入法庭，或悄悄从法庭中溜走。

登记活动在一间小玻璃房中进行。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通常没有超过30美元一个月，来支付为全县试点项目的所有个人开支和办公费用的。工资支票，至多零星地发了出去，经常发错了地方或发错了人。贫困和内部混乱严重限制着运动的一系列运作，并且，邮局、电话公司，以及所有其他公共设施

都控制在敌方手中。运筹方面的挫折达到幽默的极限。发送消息是一门艺术；搭趟便车是个考验；找到聚会场所是一个传奇。即使当志愿者可以走动和说话，黑人中的恐惧会为他们关上大部分的门。20 个小佃农出席的会议便会被认为是一场群众大会。1962 年 12 月，摩西向选民教育项目做出让步，“我们对在国家的任何地方大规模登记人数都无能为力”。他列出了改变此状况的 3 个条件：(1) 去除白人公民委员会在密西西比政治上的控制权；(2) 由司法部采取行动，以确保黑人安全登记；(3) 忧虑的文盲黑人大规模起义，要求立即拥有投票权。“取得突破之前，所有这 3 个条件将很有可能是必要的。”摩西写道。

绝望驱使他疯狂地孤注一掷。1 月 1 日，在马丁·路德·金的认可下和甘地协会的支持下，摩西在华盛顿对罗伯特·肯尼迪和约翰·埃德加·胡佛提起诉讼。他加入山姆·布洛克、霍利斯·沃特金斯和其他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中年轻的原告，要寻求一项指令，命令肯尼迪和胡佛执行 6 处不同章节的联邦法律，将骚扰或恐吓那些试图投票的行为列为罪行。他们希望有例证来打破格局。不管有没有随之而来的定罪，他们希望白人孩子去问父母为什么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位司法官或一位登记员。这样的执法行为可能预示着现行做法的明显改变，要求联邦调查局特工只收集民事诉讼可能会使用得上的相关信息，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在若干年后导致法院颁令。

摩西天真地、不诚实地将这场起诉的特点概括为：胡佛和肯尼迪为了其目标群体的利益而进行的友好示威行为。该诉讼“没有体现对被告人的任何反感以及对司法部民权司为期两年的记录鉴别缺失”，他在一份声明中说道。相反，根据表面来判断，在所有司法部的关于联邦制限制的免责声明中，原告试图证明肯尼迪和胡佛“其力量大到不可估量，远远大于他们所能想象到的”。意料之中，肯尼迪看到了诉讼对整个政府威信所构成的威胁，目前，因它是在明确的前提下建立的，司法部已经“系统地拒绝采取行动”。司法部门的律师成功地操纵，以阻止此诉讼作为一项逞强的方案。

通过切断联邦食品在三角洲两个县的供给分配，密西西比州官方机构更加积极地去攻击选民登记项目。联邦组织理事会的工作人员，面对在他们登记区域核心地带的饥荒，向全国范围发出紧急呼吁援助。起初仅特定的几个圈子有所回应——自由乘车运动的老兵，民权团体成员，开车载着捐赠罐头向南方驶去的学生——但该项目即将面临一场寒冬般的严峻事实，即此行为加固了密西西比州的令人厌恶的声誉。此次切断影响了向日葵县，那是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的家乡，还影响了邻近的勒弗洛尔县，埃米特·提尔的家乡一直是他们的总部。中断停止了对 22000 人的粮食援助——数量占近一半的县人口，大多是黑人，三分之一的人仅有低于 500 美元的年收入。在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于 2 月 1 日的第一次重大募捐活动中，救济活动呼吁组织卡耐基音乐厅晚上以哈里·贝拉方特和奥尔巴尼自由歌手为大标题。几天后在芝加哥，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宣布，这些故事让他去支付可以载 7 吨食物去密西西比州的包机。

6000 多名佃农在绿林镇上的韦斯利礼拜堂外排队，希望领取一些救济品。对黑人中间的美国印第安人一知半解，证明了三角洲地带印第安文化遗产正缓慢消失。（勒弗洛尔县和它主要的城镇绿林镇，以乔克托族群最后一位高官格林伍德·勒弗洛尔命名。）即使在一些飞机和卡车运来了 30 吨货物之后，奶酪和毛毯只够其中七分之一排队的人员，他们中超过 90% 的人是文盲。作为最没有可能采取或者通过登记测试的黑人，在客户选择方面，这些贫困的佃农客户对联邦组织理事会的工作人员似乎是糟糕的选择。无论如何，登记活动停滞不前，只有 50 位黑人已经在前面的 8 个月采取了测试；小佃农已经开始慢慢渗透到深夜登记会议中来。按照三角洲地区的标准，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当时 75 人在 2 月 11 日露面，倾听詹姆斯·贝弗尔的讲话。他高唱自由之歌，然后就选民登记工作所做的努力和食品切断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教。“不要让白人欺负你的孩子，像他从前欺负你那样。”他恳求道。

第二天，远在白宫，密西西比州小佃农的痛苦闯入了林肯生日接待会的仪

式。民权委员会的成员利用他们与肯尼迪总统相处的私人时间，向总统说明他们觉得调查在密西西比州种族条件是项迫切的责任。主席约翰·汉纳说，让他很不好意思的是，在其5年的历史中，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从未有一人提出这个来，这次却比其他任何时候提出的都多，叫喊出来是为了要政府委员完成事实收集和公众教育的目的。汉纳知道他正提出一个敏感的话题，正值司法部游说，让委员会不在密西西比州出现。肯尼迪告诉他说，他认为密西西比州的听证会没有一点用处，并且还有可能毁掉司法部门在县城之间诉讼的仅有一点的胜诉机会。

在密西西比州问题上的私人争论，由一条不同的路线抵达威利·布瑞腾那里。他已经寄出了选民教育项目一部分补助资金，资金流入联邦组织委员会登记项目。让布瑞腾感到很震惊的是，鲍勃·摩西在他的官方报告列出要用选民教育项目的资金购买很多食物和衣服。布瑞腾要求知道公然违反选民教育项目规则的意义何在。任何半智能的美国国税局审计师都可以看这些报告，并知道选民教育计划已经超越了其所规定的状况，以达到免税的目的。他严厉地告诉了摩西。

“我了解，威利，”摩西回答说，“但是当你面对所有那些站在那里排队的人，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在他对救济排队队伍的描述中，首先责备了布瑞腾，他说得头头是道，说服了他。“好吧，但是不要将其记录下来！”他告诉摩西，“不要把它放到报告中。”布瑞腾刚放下电话，就有第二个想法。他知道他更偏向于密西西比州计划。学生们和其他地方的计划相比，形成了焕然一新的对比。成人领导经常对所持补助金的分配问题争论不休。布瑞腾去年8月在联邦组织委员会的创立大会上的惨痛经历，带给他对笼罩在密西西比州登记工人不断威胁的直接感知。尽管如此，他本性很顽固，还不至于这么容易感情用事，涉足黑人法律的危险领域。他大脑战略上的一面告诉他，罗伊·威尔金斯是正确的——选民登记的边缘资金在密西西比州浪费了。布莱顿意识到，他必须要么把更多资金投入密西西比州，要么一分钱也不投入。他派他的选民教育项目现场主管兰多夫·布莱克威尔进行调查。

绿林镇在布莱克威尔到达那里之前就爆发了。早在2月20日，一通匿名电话告诉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志愿者，她不会在绿林镇工作了，因为办公室“已经有人打理”。她赶到市中心，发现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办公室附近的4所黑人企业在火灾中被摧毁。虽然办公室逃过一劫，但当地的许多黑人认为，那场火灾是反对登记运动以及救济项目的纵火行为。山姆·布洛克在两天后的小众聚会上也表示说，绿林镇警方以“蓄意破坏和平”为由逮捕他。

作为一名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学生，在绿林镇曾连续参与9个月的登记计划，布洛克已经在当地获得了声誉，是一位倔强的、孤独的人物，属于特立独行，又虔诚蛮勇之人。他已经向火灾当天受灾的600人分发了食物。几个月来，他曾陪同那些想要成为进行登记者的人来到法院，他还为此承担了官方报复性冲击。他在绿林镇的第七次逮捕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他要在监狱里过周末。有些人被他纯粹的执着所吸引，其他人则是由他小型群众集会表演吸引过来，他在那里率先采用启应唱法唱灵歌，用一种特别欢快的基调，其显著特点是里面有些卡利普索切分音。在周一，关于他最近被捕引发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百余位绿林镇的黑人涌入了警方法院，参加了对山姆·布洛克的审判。

发现他有罪后，法官提出，如果被告同意停止在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放弃选民登记项目，并且离开城镇，则进行缓期处刑。“法官，”布洛克回答说，“我是不会做那些的。”当布洛克接受6个月的牢刑并附加500美元的罚款，人群中发出敬畏的低语。据记录，那一夜有250人挤入绿林镇群众大会。鲍勃·摩西支持布洛克欢快地受难和救济粮活动，作为那些想要自由的人的启示。而对于是免费领取的最低要求，他补充说，就是能够投票。

活动和情绪互相涌动起来，逐渐膨胀，结果是摩西计算出清晨超过50位绿林镇最穷的黑人在登记办公室外面列队排开，另外还有150人在他们结束前加入。通过延迟和回避，登记员设法测试的只有极少数人，这其中大多数人最终会了解到，他们已经被拒绝了。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坚守阵地，即使是当警察让他们

回家。密西西比州黑人的自信从现实中熄灭，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近百年的想象中熄灭。第二天是2月27日，这种情况驱动摩西给芝加哥的支持者写了一封信。“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会出现这种平稳状态……”他吐露说，“让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的是，在法院没有直接暴力事件——但谁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就在那时，选民教育项目的副主席兰道夫·布莱克威尔来调查三角洲的登记前景。2月28日的晚上，他曾在绿林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举行会议。尽管布莱克威尔有点像花花公子——是一位35岁左右的社会学教授，他还是经济学和商业教科书的作家。布莱克威尔凭借自己的指挥型人格和他的业余时间法律学位聘请了员工，他的礼节未能让那些兴奋、急需认同感的登记人员打消念头，他们的激情把他内心中大胆的阴谋家驱赶了出来。现在他们一个县接着一个县，讨论了关联项目的需要，直到深夜。直到吉米·特拉维斯打断了谈话，警告说3名白人男子正从一辆无牌的别克车中监视着办公室。

他们的反应几乎成了一种训练。摩西宣布，他们最好结束这场会议，以免成为过于集中的目标。然后，他们分散走向自己家所在的县城，和布莱克威尔一道，摩西去往他的住处，距离向日葵县大约有40英里远。特拉维斯，一位20岁的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学生志愿者担当了布莱克威尔的司机，他已经学会了怎样在密西西比州的道路上开夜车。布莱克威尔和摩西在他身边，他缓缓跟随詹姆斯·贝弗尔的车子出城，密切关注着四周的埋伏以及警察。他在后视镜中看到了可疑的别克，特拉维斯先停在一个加油站，希望它会与他们擦肩而过。然而那辆汽车只是在街对面等待他加油，于是特拉维斯关掉了车头灯，从加油站后面的出口逃到了黑暗中，到没有灯的小巷中。经过几分钟的逃避驾驶，他终于摆脱了别克车，同时也找不到贝弗尔的车了，那车向着他在杂木林区的临时住所开去。

特拉维斯回到了82号公路，继续朝向日葵县的方向驶去。他们刚稍微松了一口气，然而别克突然又出现了，开始还朝相反的方向前进，看到他们后急剧掉头继续跟在他们身后。然后，特拉维斯屏住气要做出所面临的选择：第一是尝试

超过别克；第二是减速，抱着最小的希望让别克超过他们；或者直接停下来，面对别克车上的3个人。他做出了折中的选择。这两辆车一前一后地前进，直到离开绿林镇大约7英里处，别克终于超了过去。希望和恐惧刺痛着特拉维斯和他的两名乘客的心，忽然，他们的车玻璃爆炸了。

“我被袭击了！”特拉维斯哭喊着。他松开方向盘，栽倒在摩西的腿上，该车急转驶离了高速公路。

“踩刹车！”布莱克威尔大叫道，“踩刹车！”摩西一手抓住方向盘，另一只手撑着特拉维斯的身体，一面用脚摸索着踩刹车。

摩西把车停下来的时候，别克车不见了。可怕的炮火喧嚣声和轮胎的震鸣声很快代替了碎玻璃嘎吱作响的声音，仿佛它们都在扭动着，检查自己的伤口。挡风玻璃和所有的窗户都震碎成了几千片。特拉维斯有两处中枪，一处是在肩部，另一处是在颈部。他们把他小心翼翼地抬到后座，摩西开着敞篷汽车载着他，寻找接受治疗黑人贱民的医院。两天后，在杰克逊医院，医生从特拉维斯的脖子中取出了45口径的子弹。

吉米·特拉维斯的中枪事件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成员聚在绿林镇投票，以证明恐怖袭击事件不能驱走登记项目。他们还确定，不识字的黑人拥有不可思议的勇气，他们迫切需要公民资格。对塞普蒂马·克拉克从前在汉兰达的教学合作伙伴柏妮思·罗宾逊的上诉，把她也带到了密西西比州。虽然安德鲁·扬拒绝了这项毁灭性的提议——即在密西西比州建立另一个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公民培训中心。他的确同意了阿内尔·庞德，一位新培训的店员去多尔切斯特找寻塞普蒂马·克拉克，来接手其在绿林镇的住所。她在枪击事件一周内就搬了过来，正如三角洲的黑人教堂第一次敞开大门给登记的人，詹姆斯·贝弗尔很快和她所载的第一汽车的绿林镇镇民去到多尔切斯特，他们在一周之内掌握了基本的阅读能力，报名参加了为期一周的“高级”教师培训。

绿林镇突然出现在全国各地的黑人报纸头版上，而《纽约时报》刊登了威

利·布瑞腾发给肯尼迪总统的电报摘录。“这个不可以再继续被容忍，”布瑞腾声明说，“我们今天据此宣布一场集中的浸透式竞选登记活动，来为勒弗洛尔县每位合格的黑人登记。”布瑞腾还向总检察长肯尼迪和民权委员会的约翰·汉纳发出呼吁，在政府内部触动了痛点。汉纳冒着和罗伯特·肯尼迪公开长期斗争的风险，加速了对密西西比州报告的准备过程。肯尼迪派律师去绿林镇调查当地粮食救援的暂停情况，他认为这是激烈冲突的直接原因。

来自绿林镇的消息不仅通过肯尼迪政府传播，还通过不断增多的民权亚文化散布。来自纽约的咖啡馆，民谣歌手皮特·西格很快带着鲍勃·迪伦踏上他第一次通往南方的朝圣之旅。那时，伯明翰和数百个其他城市也都爆发了示威游行活动，但迪伦只出现在绿林镇一个黑人小型集会上，他唱着他的《飘在风中》。这首歌曲由彼得、保罗和玛丽三重唱录音，刚刚取代了流行音乐排行榜上情爱主题的流行歌曲。

从一开始，勒弗洛尔县的白人当局就公开谴责外界关注。在联邦调查局的压力下，他们逮捕了3名因枪击特拉维斯而声名大噪的白人。但他们无限期地推迟审判，面对当时自发组织的治安团体声势浩大的支持，官员们依然坚定不移地敌视登记项目。黑人的数量超过白人的数量，数量比是3比2，任何接近公平登记的措施都至少提出了一个构成威胁的黑人决定票问题，甚至可能重建幽灵般的黑人政治控制。一位白人选民向记者解释了他直觉上的评定：“我们杀了两个月的印第安婴儿来接手这个国家，而现在他们希望我们把这个国家拱手让给黑奴。”

绿林镇的政客，安置了那些保持他们执政的白人治安团体，还试图突出自己的统治权控制形象。他们对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所做的掩饰，达到公然扭曲的程度，差劲到远远看去会被视为无知南方种族主义者的一类标志。3月6日，夜幕车手开枪射击了那辆山姆·布洛克和威利·皮科克所乘坐的汽车，绿林镇市长查尔斯·桑普森用他所能的唯一方式，同时谴责了枪击事件和黑人：他建议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必须射杀自己的成员，以刺激出更多的宣传效应。他一直持有这

种可屈可伸的阴谋论，整个3月里暴力升级。纵火犯在3月24日破坏格林伍德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办公室。两夜后，攻击者朝老杜威·格林开了枪，正当他进入家门的时候。

一位健壮的中年裱糊工人格林是每日登记队伍中的一名志愿者。他的儿子已经申请接替詹姆斯·梅雷迪思，作为第二任在密西西比大学的黑人学生。对他的感情在绿林镇的黑人中散布得如此之深，第二天一早，一大群人聚集韦斯利礼拜堂外。“我们唱啊唱啊唱啊。”摩西回忆说。最后，他们围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唱着《我们终将胜利》，然后摩西向他们演说。“我们现在不能停下来，”他说，“我们昨晚有一个群众集会，里面挤满了人。”对于平日轻声细语的摩西，这无异于一篇很激昂的长篇演说。他对众人说，因为他们都在那里，无论如何，他们还不如尊重杜威·格林，作为一个整体，走过去看一下法院县城登记的情况。有150人跟他前往。

在他们可以离开之前，詹姆斯·福曼进行干涉表明：他们到市政厅游行抗议缺少基本的警察保护。众人欢呼说福尔曼的想法也是如此，这促成了领导阶层短暂的混乱场面。摩西把福尔曼的抗议游行视为一心一意对登记事务的转移，还是一个绿林镇的白人当局不会遇到的挑衅。福尔曼回答说，人民必须允许有一个对暴力不满的发泄口。在数百名示威者的压力下，摩西和福尔曼设计了一个仓促的让步：他们会在去县法院的路上路过市政厅。传闻在他们行动之前就散布开来，这样，当纵队走近市政厅，市长桑普森和12名警察来到外面摆好架势对付他们。其中一名警察拉紧手中一只德国牧羊犬。市长桑普森朝人群大喊，让他们必须立即回家。“如果你们不这样做，”他说，“我们会松开狗的皮带。”

摩西大喊，他想与警察局局长谈一谈，然而除了一道继续列队前进的指令，他没有收到回应。警察涌入游行的人群，德国牧羊犬猛咬并撕毁了摩西的裤管，直接撕到摩西的大腿处。那只狗接下来扯住一位名为马修·休斯游行者的腿，肌肉撕裂严重，休斯不得不住院治疗。那时，观众开始从骚乱中撤退。有位女人后

来回忆，当时有个警察不停喊着“肯尼迪是你的上帝”。领导者们大叫他们不能逃跑，他们必须着手去做在法院的事务。

摩西帮助他们撤回韦斯利礼拜堂。歌声再次响起。会众们重振了他们的决心，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领导人开始帮助人们进入汽车，在法院门口来一场不那么脆弱的登记者排队行动。然而跟随他们一路撤退到教堂的警察，进入他们中间，逮捕了摩西和其他7个他们认为是在三角洲登记计划的工人，以对抗他们这场行动。不久，他们都在绿林镇城市监狱中重聚了，福尔曼在那里和他的同伙兴奋地谈论着走私的一卷胶卷。整个世界都会看到咆哮的警犬，他说道。

上午警方袭击的消息通过电话传得如此之快，《纽约时报》的克劳德·西顿及时冲进政府部门来整理绿林镇当天的文件。其他的记者凭着认为这个故事意义重大的直觉加入这场行动。他们的直觉得到了嘉奖，第二天，警察增加了更多的狗，还从周围县城调来将近100名执法人员。他们从法院走向韦斯利礼拜堂，要对抗一支42名黑人组成的队伍。白人旁观者大喊“向他们进攻！向他们进攻！”一只狗在6名摄影师的注视之下跳入列队中，咬了韦斯利礼拜堂的牧师，血流如注。一些游行者把他带走，而其他人在恐惧中散开了。官员们没收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摄像师的胶卷，另外威胁了那群吃惊的记者。他们立刻担心起市长桑普森要问，为什么警方袭击了手无寸铁正在回家路上的黑人。“他们那里有一个报告，说黑奴们要去爱丽丝咖啡厅静坐。”市长回答说。似乎更像是绿林镇的警察已经召集他们的同行们来作为储备力量，对抗叛乱带来的巨大威胁，仅仅是不允许让尝试登记方面任何的安静侮辱逍遥法外。

到了早晨，绿林镇是一个新闻快讯的交叉口，那件事被搬上了周五白人报纸和黑人报纸的头版。《芝加哥卫报》推出了珍珠港事件字形发表的两行公告：狗再一次击败了密西西比州的选民。撕咬牧师。《纽约时报》则较为内敛，头版标题为“警方松开狗袭击黑人团体，牧师被咬”，但《时报》也刊登了一幅绿林警察在狗身后下令的照片。更糟的是，从肯尼迪政府的角度来看，狗跑着的照片正

出现在整个共和党国会领导阶层的照片下面，聚集在一起促进属于自己的一套崭新、系列、强有力的公民权利。纽约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称，共和党不会再等待来自肯尼迪总统的领导。

对司法部的伯克·马歇尔来说，3月29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周五。肯尼迪总统已经询问了对密西西比州的狗可能要做出的举措。马歇尔不断为休战协定讨价还价。他威胁要对联邦禁令提起诉讼，命令绿林镇官员遵守基本的法定保护制度——选民候选人所应得的基本宪法保护。然而他的影响力减少，因他的虚张声势。马歇尔知道这一套不会成功，至少在最开始不会，因为这将走在密西西比州一名联邦法官的前面，马歇尔已经向罗伯特·肯尼迪描述，那人为一个无良种族隔离者的、密西西比州的联邦法官去之前。即使这一套可以获胜，马歇尔和肯尼迪也不想为军事和警察力量的种族关系所引起的这场革命负任何责任。这是他们从自由车手和密西西比州那里学来的政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摩西要求他们这么做的诉讼反应得如此冷冰冰。

同一时间，马歇尔被民权委员会的后卫战斗所打击，其成员措话说，他们必须就密西西比州问题立即发声明。6位委员被激怒，因他们对当局安静的服从已经延伸到共谋的可耻记录。所有马歇尔可以做的就是来提出一个承诺，如果他们不再次给总统一个与他们在白宫见面的机会，委员们在公开场合不会什么都不会做。“至少有4名成员都非常值得怀疑，但是，要做长远打算，”他那天晚上写信给罗伯特·肯尼迪说道，“我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不得不面对来自约翰·汉纳、西奥多·赫斯伯格、欧文·格里斯沃尔德和罗伯特·斯托的辞职。”

整个周末，民权领袖涌进了绿林镇，其中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麦德加·埃弗斯、詹姆斯·法默和民族平等协会的大卫·丹尼斯，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查尔斯·麦克迪尤。周五，威利·布瑞腾从亚特兰大飞来，代表摩西、福尔曼，和其他6位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登记工人参加他们的审判。所有8个人很快就被判行为不检，并给予最长4个月的监禁，布瑞腾向法庭宣布，己方委

托人服从宣判，而不再继续上诉。他们8人继续在监狱中，面对着联邦政府要给绿林镇基本公平的压力，8名囚犯始终是焦点。摩西感觉到嗡嗡声传入他的牢房中，而这一切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让他勉强朝向一个意见，联邦政府的反应是更加乐意让他们感到不适，而不是倾向于合作、法律，或逻辑。

4月2日那天是周二，这天是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加入绿林注册登记游行连续的第五个运营日。“我无法向你们说出上周我是多么悲伤，当我坐在纽约市阅读来自绿林镇的报告。”他对即将在韦斯利礼拜堂前游行的群众说道，“倘若俄罗斯让西柏林的恶化情况仅仅是你们上周情况恶化的一半，”他开玩笑说，“我们就到那里去好了。”那一天，他3次走到法院，不料只是被警察强行赶走。作为第一位绿林镇游行的全国知名人士，他把每一场对立都变为一场有着非常大胆注释的表演，被疯狂或升华的灵感所触动。“这里有你的故事！”他向国内的记者喊叫道。“把枪支和棍棒给那些想要登记的老妇女！”一些警察正把黑人推出法庭，他朝混杂的警察队伍挥舞着双手。“看看他们，”他大声说，“一帮不识字的白人，自己甚至也都无法通过测试。”不久，市长桑普森滔滔不绝地说，是由于严重的性格缺陷，使得黑人没有资格投票。格雷戈里挤着穿过人行道上的记者。“好的，现在，市长先生，”他粲然一笑，打断了市长的话，“你昨晚真的吃了你的黑鬼药片了，是吗？”市长完全缺乏克制力，让勒弗洛尔县的黑人感到很惊讶，就好像白人官员的被动应对一样。这种厚颜无耻大家前所未闻，当地黑人无人能够逃脱得了——但格雷戈里的明星气质似乎让他有些捉摸不透。在那晚，他认真热情还点缀着幽默的简短讲话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们将穿过你的狗前进！”他喊道，“如果你们有一些大象，我们穿过它们游行。带一些老虎来，我们也将穿过它们继续前行！”

格雷戈里为期3天的宣传推动了司法部的进程。第二天一早，约翰·多拉探望了摩西和其他囚犯，那是他们在绿林镇监狱的第8天。他宣布，他们必须在第二天联邦法官克洛德·克莱顿的法庭听证会上呈现出最好的一面。多拉打算要求

一项命令，下令要绿林镇官员做3件事：(1)8位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领导人必须离职，因其非法干扰投票权活动；(2)停止骚扰或恐吓想要登记的黑人公民；(3)在法院登记机关提供公正和充分的警力保护。如果不服从这样的命令将会增加更多的美国司法官员。多拉表示了他会在上级法院胜诉的信心，虽然不是从法官克莱顿那里。

这天是4月3日星期三，紧张的志愿者去参加在伯明翰午餐柜台的第一场静坐活动。在绿林镇，消防部门通过将消防车停到通往法院的路上，试图帮助警方镇压登记示威队伍。担心被大功率消防水带砸伤的恐惧让行军路线瘫痪下来。直到詹姆斯大胆地走到消防队长面前说：“我们的内心中有一团火苗，宝贝，但你们不能把它熄灭。”在纽约，迪克·格雷戈里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早版《泰晤士报》的头版上，他的胳膊被格林伍德警察扭在背后。在华盛顿，绿林镇的故事在肯尼迪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上浮出了水面。问及司法部是否会为选民登记的驱动做更多的事，肯尼迪回答说，该部门已经在绿林镇提出一项新的投票权诉讼。“应该很快就有听证会——可能是在这周。”他说，他希望多拉的行动将表明，“这里出现了一个对权利的拒绝，这在我看来很明显，但法院必须做出裁定。”

绿林镇监狱里面的新美国客户中存在着很强的陶醉感。人们在早上已经听取了多拉简短的发言，他们得知肯尼迪总统本人当天晚些时候明确同意在全国电视上支持他们的案子。那天晚上，美国司法官来把他们从国家权力机关中带走，这似乎又向胜利迈进了一步，直到官员们开始继续为他们戴上手铐，并把他们拦腰绑在一起。虽然他们只被转移到联邦拘留所，去参加第二天的听证会，这种待遇对政府的盟友来说似乎过于苛刻。几个戴着手铐的学生挖苦地讽刺着保护者如何为了获取赞同，迎合绿林镇种族隔离者。与往常一样，福尔曼的反应立刻不那么微妙，却还是要比其他人更微妙。他奋力苛刻地想要对警长或高级元帅说话，他还密谋，以在“联邦链”中获得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囚犯宣传照片。面对福尔曼无法抑制的图谋、一副飞扬跋扈的受害者的样子，摩西和其他几个学生只能

好笑地摇摇头。关于他们许多正当的抱怨，福尔曼还要求见警长——医疗待遇、缺乏毛巾和监狱的食物质量。“没有理由不给囚犯提供均衡的饮食。”他说。

监狱政治的讽刺曲折对摩西来说微不足道，在整整两年都被密西西比州事件蹂躏之后，他终于看见了较大矛盾的突破口：黑人没有权利怎么可能获得自由，没有自由又怎么能获得权利。到了第二天早上，听证会前，摩西一改往日的沉默，在牢房大声欢呼。“他以一种罕见的姿态，站在监狱围栏后面，独自唱歌。”福尔曼说。在囚犯不时的敦促下，摩西开始高歌：“你想要你的自由吗？你准备好去坐牢了吗？”甚至他周围的盗贼和流浪汉把那高歌理解为希望的启示。然后，突然之间，狱卒打开了他们监狱的门，他们收到了不可思议的新闻，说绿林镇已经在预审谈判期间屈服了。所以他们的判决已经被延迟，文件已签署，他们自由了！唱着《我的微弱之光》，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8位工人走到监狱外面，参与胜利的新闻发布会。“我们互相对峙，对方只是有些闪躲。”其中一人告诉记者，呼应国务卿腊斯克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著名的大话。

庆祝活动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摩西一直沉浸在忧郁情绪中。他了解到，那天不会有对诉讼的另外两个目标举行听证会。联邦政府命令停止骚扰，并为人们在绿林镇登记排队时提供保护。多拉首先告诉记者，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他的案件。接着他说，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让摩西和其他人离开监狱，而不是继续匆忙推进案件发展。最后，记者们证实了传言：多拉在华盛顿的上级已将案件搁置到一边，换来了8名囚犯的释放。记者们没有弄清有关另一个契约的情况，即让勒弗洛尔县恢复救济活动，联邦政府同意负担全国的分配成本。这部分结算让勒弗洛尔县的领导说他们会勇敢地面对华盛顿，不恢复一分钱的当地税务。实际上，他们是让联邦政府支付他们已经关闭了的食物救济活动。

多拉在绿林镇的黑人社区寻找摩西。作为亲自被民权政治暴行所撕扯的官方人员，他想要试图去做解释。多拉对伯克·马歇尔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尊重是如此强烈，他已经接受了他们对此政策的论证过程——政府不能将其权威放到选民

登记的公民权利之后，而不准备承担广泛的警务责任——不只是在勒弗洛尔县，还有可能跨越整个南方。如果他们赢得了禁令，马歇尔推断，那么当地警方可能只是简单地放弃自己的责任。这将使联邦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武力介入。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可能会发现自己要在绿林镇指挥交通，应答火灾报警，为押车中像吉米·特拉维斯一样的 1000 多名登记工人保驾护航。

多拉理解肯尼迪和马歇尔不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步子的原因，但他也知道摩西为了与联邦政府合作所做出的努力——他是如何认真遵循政府的建议，来继续进行登记活动而不是示威游行活动；他是如何精心撰写对殴打事件、枪击事件和较小骚扰情况的详细报告。他知道摩西看到华盛顿政府用计谋逃出，而不是参与绿林镇的计划是多么倍感失望，但他仍然没有准备好应对摩西脸上抑郁的表情。他终于在一条小街上找到了他，他孤独地在庆祝从监狱释放的黑人队伍中。对多拉来说，摩西似乎凭直觉在与格林伍德达成协议的过程中进行策略推断，迷失在有关密西西比运动可能造成一些影响的绝望想法中。外观情况是如此深远，摩西如果不提出这个主题，多拉无法自己做出解释，他们含着几分麻木的幽默道了再见。此后，礼节上的障碍出现在多拉这个政府人士和摩西这位机警的请求者之间。

大量迹象表明摩西已经了解绿林镇运动正在瓦解。迪克·格雷戈里离开了镇子。群众集会无能为力。回到亚特兰大家中的途中，詹姆斯·福尔曼在伯明翰驻足，迫切地想要鼓舞萎靡的运动士气。那里有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一个联合项目，不料他却被自命不凡又讨人厌的怀亚特·沃克粗暴地开除。（“如果我割过谁的喉咙，”沃克回忆说，“就是那次。”）在一个戏剧性的改变主张过程中，绿林镇的桑普森市长提供了一辆城际公交车来运送那些确实想参加登记测试的黑人。此举是联邦官员不断催促的结果，他们终于让勒弗洛尔县的政客们相信维持政治控制比炫耀它更加重要。作为他们收掉警犬的回报，他们保留战后重建的特权来决定符合选举条件的人。在接下来的 6 个月中，勒弗洛

尔县登记项目中不知疲惫的工人带来了 1500 位黑人进行了登记测试，其中只有 50 人通过了测试。虽然黑人的数目远远超过白人，黑人已登记的选民比却仅仅是 300 比 10000。在选举日当天他们仍然是不起眼的。

克劳德·西顿，只有一次让他的同情超越了他的献身精神，以事实告诉《纽约时报》的读者，登记运动“势头已经回升”。他宣布勒弗洛尔县是民权“主战场”，但这是他从绿林镇最后一个重要调度。新闻的消失很快迫使他离开城镇。在亚特兰大，威利·布瑞腾怒气冲冲。他并没有把绿林镇运动的突然消亡归咎到密西西比州的抵御能力上，而是归咎在马丁·路德·金身上。他恨恨地向他的同事们抱怨，他指责说，充满嫉妒的金看到密西西比州没有他便开始做反抗，获得了打破种族隔离的好机会，便快速向伯明翰分流。

在 4 月 3 日金生日那天，绿林镇的洞察力或是例子启发了金，让他宣布：“他们可能会放疯狗咬我们！”6 天后，金专注于不那么戏剧化的威胁，他在特别会议上面对 100 多名持怀疑态度的黑人商人。在金后来回忆的“紧张和冰冷”的气氛中，那些人用对运动的批评言论痛击他。有些人说，他们并不需要局外人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有些人说，金并没有给鲍特韦尔一个公平机会。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更倾向于与危险的、令人讨厌的戴手铐的纠察队员和生气警察的合作事宜。金用尽所有的修辞力量进行回答，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处于危险中来进行说教。他试图用自己对全面计划的描述压倒他们。他试图用名人的看法诱惑他们，许诺将杰基·罗宾逊和小萨米·戴维斯带到小镇上来。

结束后，人们鼓掌，让金说，至少要把他们中立化。A.G. 加斯顿后来发布了一份声明，说金的支持者声称这是对这场运动的认可。种族隔离也称赞加斯顿，然而，白人报纸刊登了他的口号“伯明翰所有的公民和谐相处，共同努力，团结友爱，以解决我市的问题，认可我们中的当地有色领导”。加斯顿的声明没有注意到金和示威活动。金知道自己对商人的影响将是短暂的，其中有些曾当面称赞他的人已经开始抱怨说他应该离开小镇。在当晚的群众大会上，他宣布，他已经

推迟了自己去坐牢的计划。希望他自己的关押将会为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增加最后的势头，而不是作为最后的手段，以抵御运动的灭绝。

金的销声匿迹恰恰是亚拉巴马州的白人官员同一天在蒙哥马利与州长华莱士所要密谋的。了解到保释资金已经很低了，他们起草了一份法案，把轻罪最高保释金的数额从 300 美元提高到 2500 美元，仅在伯明翰适用。他们还补充了一项决议，宣布伯明翰“已经被外国人入侵，他们通过武力和暴力企图推翻他们可能不喜欢的法律”。有了这些分配到立法机关的措施，白人政客开始就警察战争争辩。布尔·康纳和华莱士州长想要派遣 100 位强壮的州警察来恐吓并击垮黑人游行示威者，但伯明翰组织的改革派——警长、报纸、商业巨头和鲍特韦尔管理机构，赞同阿尔巴尼警察局局长劳里·普里切特的“天鹅绒拳头”战术，他们之间都已经商讨过。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使冲突更加暴力或戏剧化的步骤都会让事态事与愿违。

政治充满了这些幕后的争议。双方都有助于亚拉巴马州的法官裁决布尔·康纳的诉讼，推翻或者延迟新的城市宪章。这将让近期的城市选举无效。康纳需要种族的戏剧变化，如他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强人，近代的石壁杰克逊。其确立需要一个窒息的安静环境，他们仍然作为公民尊严的担保人。双方在周二妥协让步：到现在为止不派州警察，但康纳将获得奥尔巴尼的法院命令来禁止黑人的抗议。这样的禁令，要么会削弱运动，要么给予更多政治家风格的目的以对布尔·康纳的群众进行大规模逮捕。

即将到来的那个命令是周三全天即将公开的秘密，全市的律师争相准备宣誓书。金听说它要来了。唯一的好消息是，康纳适用于州法院，而不是联邦法院，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一位可靠的法官。这对金来说是一个受欢迎的区别，因为现在他要面对的是亚拉巴马州种族隔离者的命令，而不是美国的。“每个人都要在这场运动中勇于牺牲。”金在那晚告诉群众大会上的人，但他的困境让他情绪十分暴躁。他谴责那些打破市中心购物抵制的人为“黑人种族的叛徒”。阿伯纳斯

随后听了感人的承诺，在耶稣受难日坐牢，然后领导人恢复了他们的战略会议到深夜，一分钟一分钟地接收紧急禁令的进度报告。法官威廉·A. 詹金斯大约在9点钟签署那些文件。第二天中午一点钟多一点，一位副警长走进加斯顿汽车旅馆的餐厅，为了相当于战前所举行的仪式。他在一张桌子上坐了下来，服务员招待他，他的两旁是阿伯纳斯和夏特沃斯，金默默念法院命令，一大群记者都在摄像头和麦克风后面等待着他的回应。金的名字是这场广泛的命令中他最熟悉的对象名字。为了维护公共秩序，防止预料的“流血和暴力事件”，法官詹金斯明确下令133人不能参与或促成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游行、示威、抵制、非法侵入和纠察活动”，甚至是“通常被称为白人教堂中黑人的祈祷示威活动”。

对3位黑人领袖来说谴责这项命令公然违反宪法很容易。对他们来说让他们在第二天宣称，他们“不能都凭着良心服从这种禁令”相对比较容易，并且这场运动不会停下来。最后一步异常困难：设想一个计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反抗这条禁令带来的痛苦，这条禁令还承诺着积极成就。他们隆重的伯明翰活动显示出晚期状态下的疲软迹象。在8天里，他们送进监狱的人少于150人。相比之下，近两倍的这个数字已经在第一天群众抗议后进入在微小的奥尔巴尼的监狱中。即使那些威胁加斯顿的支持者都为这项在耶稣受难日游行到监狱的承诺欢呼。只有7名志愿者在周四，4月11日前去参加示威活动，不到50人参加陪同金去监狱的活动。通过远离第六大道浸信会教堂周四晚的群众大会，金不再给予更多的承诺。在危机面前，金爸爸从亚特兰大冲了过来，代替儿子来布道，就像一个承诺的新发展，以保证他的儿子终究要出狱。城市通知了活动的保释担保人，那人已经达到了既定的信贷限额，这无异于是监狱计划的破产通知。活动将提供保释金的担保再也不能让志愿者们放心，并且现在他们中最穷的人可能要面临6个月的监禁，而不再是6天。金和他的顾问们围绕着百种分歧讨论问题直到深夜。他们能否预先提醒前去监狱的人这种悲惨状况，而不毁坏存留的精神？金履行的第一项义务是承诺去坐牢吗，还是他应该作为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唯一

久经考验的募捐者来为全国巡回布道获得充裕的保释资金？如果他采取了后一种举措，在他回到伯明翰的时候还会有任何运动吗？

“让我们好好想一想。”金不停地说，但更加活跃的怀亚特·沃克总是在他滔滔不绝的讨论中忽然插上一句话，来监督他的各项计划。他有一组志愿者带着1500封信件，另一队分发5万份传单，支持市区抵制。沃克在组织细节的过程中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迷失方向，仿佛为了避免这个运动会出现普遍的无效性。整个伯明翰，黑人自己洗衣服，坐在门廊，在球场打球，固执地忽视总体规划。沃克的图解不能让整座城市飘浮起来。当金派遣了一个送信人去请他太多次，沃克把他的笔记本奋力地摔在桌子上。“我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无处不在！”他向金喊道。震惊的金试图让他平静，他说：“等一下，等一下。”在耶稣受难日的上午，4月12日，诺曼·阿玛克，来自纽约的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律师，为金和20多位运动领导人做委托辩护。挤在金301房间的客厅中，那是加斯頓汽车旅馆唯一的一套客厅，他们听到阿玛克说，詹金斯的命令可能是违背宪法的，然而无论谁违反了那条命令，无论如何都会受到处罚。无论金如何做决定，阿玛克说，当天庭审关闭时，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法律辩护基金会都会在法庭上作为他的后援。金自己把随之而来的一切都设定在一个阴郁的基调上，他说他不想花他的余生在监狱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在相互冲突的义务之间，他感到非常困扰。虽然他不想让那条禁令使他违背了自己关于伯明翰运动许下的诺言，并且他也不想带领新一批的人盲目入狱，尤其是自从他不知道这场运动将如何保释那些已经在监狱的人。然后他召集他的朋友来给他建议。经过一阵沉默之后，一个人说金不能进监狱，因为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支持的话，这场运动将会消亡。金爸爸建议说他的儿子不应该破坏禁令。有位牧师难以置信地自信地夸口说如果金进到监狱，他会去救他，让这条禁令无效。安德鲁·扬和其他几个人表示，无论金如何做决定他们都将全力支持。意味深长的是，包括夏特沃斯在内，没有任何人建议其他领导代替金入狱。他们形成了一个螺旋式下降的恶性循环，金后来回忆

说：“我们最敬业、最奉献的领导人也被绝望感压得不堪重负。”他没有对他们任何一条建议做回复。当他们都沉默以后，他只是退回到卧室，关上了门，敏锐地意识到，此刻他最亲密的战友正在形成一股惰性质量。在他面前一面是监狱的深渊，言过其实的殉道者希望他的逮捕可以激发肯尼迪所在的白宫和伯明翰的黑人的情绪。另一个方向是新闻发布会，详细解释了筹集资金绕道而行的原因是组织一场更加安全的运动非常必要。带着有个胜利扭转的夸大希望，和对这就是结束产生的沉默恐惧，一位领导人不能够避开他的追随者。当金退入另一个房间，几分钟后，他穿着一件工作T恤、一件很新的蓝色牛仔裤，卷着裤腿，脚上蹬着一双“乡巴佬”的新运动鞋。这是一个惊人的景象，房间里的有些人从未见过金这么穿过，他们只见过他穿深色西装。

这一天是他第一次宣布他要去坐牢，这情况让整个房间鸦雀无声。“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说道，“我也不知道钱要从哪里来。但是我必须做出充满信心的一举。”

他转向阿伯纳斯，尽管他发表过要为了复活节坐牢的演讲，但他还是打算回西部的家参与教会年历中最重要的事件。他曾经私下里一直抱怨，对金说自己不在准备复活节仪式要比金本人不在他自己准备简单得多。毕竟阿伯纳斯在西部是孤身一人的，而金身旁永远有他的父亲支持。什么样的牧师才能替代阿伯纳斯在复活节前两天就要进行通知呢？金在做出一个很有分量的请求之前，想到了这些理由。“我知道你想在复活节那天让我出现在你的讲坛上，拉尔夫，”他说，“但我要求你和我一起去。”

阿伯纳斯没有回复，金爸爸出面来解释这个僵局，表明这一决议还没有最终决定。他再次建议他的儿子“在这个时候”不要违反禁令。这是优柔寡断，明显在兜圈子，他掩饰了自己的想法，说他认为金无论如何都要做自己想做的事。金坚定地说他必须参加示威游行活动。“如果我们遵守这个禁令，我们就出局了。”他说。金爸爸脸明显垂了下来，在座位上移动着，好像要在地上找什么东西。

“好了，你没有从我这里得到非暴力的理念，”他说，“这一切你一定是从你妈妈那里得来的。”“我得走了，”金反复轻声道，“我要去参加游行示威，如果我必须亲自参加的话。”

“等一下，”阿伯纳斯说，并站了起来，“让我看看是否能和我的执事取得联系，因为我要在伯明翰监狱度过复活节了。”

阿伯纳斯让这次集会再次陷入了沉默之中。他们开始无话可说，便唱了《我们终将胜利》，并陆续提出了多项任务，只留下金爸爸在 301 房间。

怀亚特·沃克偶然在竞选策略上的失望之中有了新发现：他了解到报纸估计参与示威运动中的人数和所有现场附近的黑人合在一起了。实际上，和游行人员及纠察队一样，记者为旁观者提供了运动信贷。新闻业务的这一特点让沃克喜出望外，更是因为它使运动的美德习惯性地延迟了。一个媒体战略的推论法则认为，后来一个事件落后于预定计划之后，会有更多的围观者聚集。

这条规则在耶稣受难日那天发挥到最好。金和阿伯内西终于从第六大道浸信会教堂走出来宣布游行示威活动开始，在游行示威近 3 个小时后，他们带领大约只有 40 名去监狱的人，因为饱含情感的讲道词没能说服更多的人加入。但是中午黑人人群沿着预期的路线游行，兴奋地谈论金是否真的要面对布尔·康纳。期待已久的对金的初见触发了庆祝和鼓励的喊声，游行沿着几条街区的人行道而行，喊声越来越大。前进的队伍碰到了警察的封锁，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报道称：“千余人喊叫着，唱着歌的黑人加入了示威队伍。”金来了个意想不到的转弯，警方急忙骑着摩托车、开着警车疯狂地掉头，后面是穷追不舍的记者和白人行人。警察队伍重新沿着金的路线在第五大道成形，壮观的对抗戛然而止。没有任何警告，一位侦探从金背后提住他的腰带，四脚朝地把他拎了起来，猛地把他们推向囚车。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官员把阿伯纳斯推向同一方向，一把抓住了他的衬衫。摄影师们按快门的声成了一首小合唱。黑人旁观者看到逮捕的情形，愤怒地呼喊或祈祷，在如此接近的情况下看着军官们，不知道下一个要逮捕的游行

者是谁，他们的心都要融化了。掉队的人和自发的反抗者振奋起来，加入了 52 名在金和阿西纳斯陷入监狱之后的队伍。布尔·康纳告诉记者们金已经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关于金在监狱里的待遇，康纳持有和劳瑞·普里切特不同的想法。在伯明翰监狱没有订报也没有丝绸睡衣。看守监狱的人把他隔开，把他孤立起来。锁起来之后，他们把他和其他人分开，并拒绝了他打电话或和他的律师交谈的请求。金在单独拘禁中销声匿迹了。“神秘洞穴”，把他和他的狱友们，连同外面的世界一样都隔离起来。沉寂让他被逮捕的骚动渐渐消逝在记忆之中，一个习惯于新闻和情感强烈轰击的男人，一跃来到这个昼夜都无法辨认的真空地带。他对伯明翰运动持续危机的唯一线索是那些他想象中从他的牢房的门缝中过滤进来的阳光。

那一天，其他具有隐匿意义的事件在别处发生。在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中断了圣彼得的一场耶稣受难日的仪式，下令把对“背信弃义的犹太人”的引用从祷告文中去除掉。就在前一天，教皇刚发表了他空想的通谕赐福。最近他一直大胆行动——几近鲁莽，有人说，在癌细胞杀死他之前，他要为在顽固的梵蒂冈官僚机构内部进行普遍改革而斗争。在佐治亚州的哥伦布，一个陪审团用了不到 90 分钟的时间，来明确警长 L. 沃伦·约翰逊的民事赔偿责任，因其在 1961 年殴打并对查理·韦尔开枪。韦尔是警长车中的囚犯。然而迅速的无罪释放震惊了韦尔的律师，他本来认为那件对抗约翰逊的案子是无法攻取的，即便面对的都是白人的陪审团。卡尔·史密斯在陪审团中站了起来，确认判决，他要求在陪审员中进行一项民意调查，这吸引了从奥尔巴尼开车来参加为期 5 天审判的几位黑人的特别关注。史密斯是 3 位位于哈莱姆、奥尔巴尼的黑人住宅区的杂货店白人业主中的一位，奥尔巴尼运动一直纠察他们拒绝雇用黑人职员和收银员这一行为。现在，他宣誓声明，警长约翰逊并没有剥夺查理·韦尔的公民权利或对他造成任何可诉讼的伤害。在那一刻，两股独立的公愤融合起来。

在裁定下来 8 天之后的另一个周六，奥尔巴尼运动中的学生在卡尔·史密斯

的商店外组成了纠察队。他们举着他们常规的纠察队标志牌，敦促史密斯店里所有黑人顾客拒绝光顾这家不为黑人提供工作的商店。像往常一样，他们只持续了一个小时，就被劳瑞·普里切特的警察逮捕了几人的举措驱散了队伍。然而，这短暂的努力却注定要成为整个民权运动成效最显著的一条纠察线。这让种族政治有些极端化，让其传播非常广泛，吸引了那些从来没听过查理·韦尔或卡尔·史密斯的人。可以追溯至韦尔的陪审团中史密斯仪式的热情，几乎毁掉了接下来8月在华盛顿的伟大游行。

B.C. 加德纳在运动中点燃了白人的反应。他代表史密斯，向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提起了民事诉讼，指责他们的非法抵制，驱使史密斯歇业。在一次类似的袭击中，加德纳联系了当地的律师协会以及他在联邦调查局的熟人、初审法官，在华盛顿的伯克·马歇尔，声称黑人陪审团已经通过惩罚史密斯为韦尔对抗约翰逊案表决来阻碍正义。形势突然扭转——一名白人男子，作为民权运动中犯罪行为的牺牲品出现。执法官员一直在拖延、争吵，或彼此立场中立，现在发现他们都正一致朝一个方向努力。初步结果在星期六警戒线事件的10天后就落在总检察长肯尼迪的办公桌上。“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我们收到投诉，关于有组织的黑人抵制白人所有的杂货店。那名白人曾是陪审团中的一员……”伯克·马歇尔写信给肯尼迪说，“看起来似乎要组织盛大的陪审团队，起诉才将会被驳回。并且有一位被控告的人将会是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者 W.G. 安德森博士。”

有超过30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被指派去访问很多奥尔巴尼的黑人。各级执法官员看到了取胜的机会，以解决个人恩怨或种族恩怨，或证明该制度的公正。然而他们的目标，把搜索网当作是证明整个黑人联邦制已经陷入贝克镇水平的证据。对付黑人，正义是一个快速通往监狱的水上滑道；为了黑人，这是逃避的蜜罐。

查尔斯·谢罗德没有出席在哥伦布的审判。在耶稣受难日那天，他带着他的几个最有前途的奥尔巴尼学生来参加亚特兰大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第四次常规大会。在那里，尽管去年大规模示威令他失望，他仍宣布他的决心，以保持奥尔

巴尼运动继续运行。为了在逆境和国家政策晦涩不明的情况下坚持下去，谢罗德承诺说：“我们愿意采摘棉花、擦地板、洗车和擦窗户、看孩子，等等，只要为我们提供食物和住宿。”

在发布会上特定的讲话中，鲍勃·摩西温和地对他的听众谈起格林伍德运动的衰退，他评论说：“你们需要的不是 500 人的减少，而是 5000 人的减少。”然后，他开始闲聊，他通过自己的抑郁状态的思想，进行抽象的自我批判。他们必须要求普选，他说，就像开始在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中的“人票”竞选活动。在奋力争取普选的过程中，他们必须承认，他们要求三角洲所有白人来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他们不在任何地方向任何白人询问……并且那是允许黑人在一个地区投票，他们是在受教育程度上逊色，但数量却超过白人，因此构成了严重的政治威胁。因为在这个国家其他地区，黑人选票少数集中，黑人选出他们自己的领导人，但他们所选的领导人不能来管理我们称之为那群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教育程度上卓越的白人精英。我一点也没有认为这个国家是有能力，或者是愿意把这个强行灌输给三角洲地带的白人，然而它不得不强行灌输，因为他们认定尚未完成它。

摩西继续从事困难的普选权工作，敌方看起来不再好像是无知的乡下人，甚至都不再是政治方面的普遍力量。民权的目的不再那么倾向于基督徒启蒙——教人以慈善和公平处事——更像一场政治革命。虽然摩西看不出如何实现普选权，他也不会从它的需要性撤出。为了寻求更少的东西，他说道，要排除南方大片黑人并且保持政治关系基本完好，这意味着该运动至多将获得象征性的特权。在警告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直接行动的倡导者，并极有可能考虑到金的伯明翰运动，摩西说：“我想我们在争取一些事情的过程中陷入危险，将会以只是帮助‘黑资产阶级’作为结束。”

压力和困惑在亚特兰大会议上 350 名学生中间歇地爆发。在有些讲习班中，参与者高唱充满阳光乐观的自由之歌，而在其他讲习班，分享着殴打、隔离、恐

惧的故事，发出了痛苦和反抗的呼喊。有些学生扔椅子，在自己非暴力的宁静中爆发。有一个把自己的拳头砸穿窗户。虽然有许多人赞成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应该“挑战国家的政治体制”，像福尔曼说的那样。其他人则要哀悼它损失了其本质的朴素性。在像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这样的告诫性机构，学生们和其互相催促继续深入挖掘。他们发现了在种族情谊共同愿景背后的东西，他们是一个多样化的集体，里面有圣人、骗子、知识分子和逃亡的农民，他们都摆脱了从前传统的支撑，悄悄地围绕着文化和种族之间展开差异。许多领导人在运动中已经进入非常有信心的状态，他们闪亮的理想主义重新调整了外面的世界，而现在他们自己的身份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查尔斯·谢罗德走到甘蒙神学院所在的地方，并抓住了一棵树。突然，他憎恨他胳膊的深色。他卷曲的头发让他憎恶，和自己有关的一切都让他憎恶，包括他说出来的话。羞愧活活噬咬着他。他为他母亲感到羞愧，他再次成为偷看白人世界完美的流浪儿，非常向往他的白人祖先。这耻辱让他再次感到羞愧，然后当他再次想到这些年来他一直有区别地教导年轻黑人，装腔作势地说些运动的措辞让大家接受自己。把那些信任他的年轻黑人送入监狱，而现在却确信一切似乎停留在幻想和虚伪之中，谢罗德觉得自己的行为十足的不检。当他恢复过来的时候，他只能把这种苦难比喻为《旧约》中的一次次形象的转化。他对此感觉更加强烈，但从此却再没有如此流畅地匆忙陷入一个新的种族态度。

在金的召集下，詹姆斯·贝弗尔从绿林镇回来，正好赶上周五晚上，4月12日在伯明翰的群众大会上布道，也正在金入狱后的几个小时。他说他听过伯明翰的情况并了解布尔·康纳的生平。伯明翰生病了，他说道。那里白人的症状是盲目仇恨，黑人的症状是，他们从来不会采取行动迈向自由。贝弗尔望着300多个人，他们似乎个个都迷失在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的洞穴中，他宣布这么重大的一个日子来的人却少得可怜。他非难地指着两位坐在听众中拿着录音装置的白人警探。“警察能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把他们的枪、徽章和小麦克风带到教堂来，”贝

弗尔宣称，“但如果你想获得自由，他们也无能为力。”

当贝弗尔开始用他一贯的狂热来布道，人群中开始沸腾起来。两个种族都必须停止忧虑他们的方便性，他喊道：“如果上帝给蟑螂一口饭吃，他也能给黑人一口饭。”现在打开他们的眼睛来接受灵性治疗，很简单就可以成为完整，他宣称道。自由就在那里，任你攫取。他引用耶稣在贝塞斯达池对瘸腿人说的话：“起来，拿你的褥子，去走一走路！”贝弗尔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讲。用自由来医治他们自己，他大喊道，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走一走路，走进群众大会，走进法院，走进监狱。围绕这个主题，他“把自己和集会群众带入一种他所说的我们无法理解的狂热中去”，警方侦探后来向布尔·康纳坦诚说。然而人们理解，贝弗尔是精神上的神风特攻队员，来解放他们的。“黑人300年来一直坐在这里等死，”他宣称，“是时候起身走开了。”周一下午，金极度欣喜地看到克拉伦斯·琼斯的英俊面孔出现在他的牢房门口。琼斯希望能避免伯明翰监狱故意的待遇，用他最好的纽约律师服装扮起来。他用金最想听到的话来问候他：“哈利已经筹集了5万元钱作为保释金。”并且贝拉方特已经说他还能出更多，“无论你们需要什么”。金在后来写到的那几句话“提起了我心中1000磅的重量”。按照他们的意思，谁想要出狱，都能出来，但他们认为金应该预测一下出狱之后会发生什么，而不是筹集资金。

琼斯还告诉金说，贝拉方特和沃克正在组织一个电话和电报活动，以迫使肯尼迪政府为金提供像样的监狱待遇。到目前为止，金仍然孤独地待在他的牢房里，不被允许打电话。他没有床垫或床单，睡在金属板条上。从怀亚特·沃克那里了解到这些条件，贝拉方特打电话给罗伯特·肯尼迪。据金所知，总检察长强烈反对整场伯明翰活动，更不用说金去坐牢这件事，并且肯尼迪更有理由感到被欺骗，因为他知道金可以缓解他这种痛苦，只要在任何时间靠着支付保证金并且离开监狱。在这种情况下，琼斯称，肯尼迪对贝拉方特的回应已经非常暴躁了，但还是充满着幽默感。“告诉金牧师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去做，”肯尼迪告诉贝拉方

特，“但我不确定在这一刻我们就能实施监狱改革。”

琼斯离开后，狱卒让金从牢房中出来打囚犯付费电话，说现在是时候让他跟他的妻子通电话了。金有足够的监狱经验，知道监狱看守通常不会鼓励一个犯人与家属沟通，他恰当地去怀疑，这突如其来的善良肯定是为了方便警察局的窃听速记员。当柯瑞塔立即告诉他，总统刚刚打电话给她，金没有回答，停顿——卡在他对她消息的渴望和他不愿让布尔·康纳知道肯尼迪总统在做什么之间——金和他两个年龄较大的孩子闲聊，他的避重就轻让柯瑞塔警惕起来。

“你现在正被监视着吗？”她问道。

“是的。”他回答说。

“他们有没有给你规定时间限制？”

“不确定，但是他们能听到所有内容，要知道，”金直截了当地说，“你说谁给你打过电话了？”

“肯尼迪，”柯瑞塔说，“总统。”

“他直接给你打的电话吗？”

“是的。他告诉我，你要给我打几分钟的电话。就在大约 30 分钟前。”

这是一条重大消息。可能是肯尼迪总统在 1960 年大选前著名电话的重现。“让怀亚特知道，”金做出指示，“……现在就去做。”

柯瑞塔重述了她和肯尼迪总统的谈话：“他告诉我，昨晚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和你谈过了。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金回答说。他再一次告诉她把肯尼迪电话里说的话告诉沃克，这样沃克可以发出一份声明。柯瑞塔不同意全部照做，她感觉到自己处于困境之中，因为她已经向《纽约时报》发表了自己的声明，而金却希望沃克来处理此事。她一直补充说肯尼迪所表达关心的种种细节，和罗伯特·肯尼迪早前两个电话，而金不停地让她把所有的这些都告诉沃克。

消息确实传到了伯明翰，沃克非常希望白宫涉及伯明翰运动第二阶段宣告开

始的声明中来——国家阶段。群众会议外部的反应结果远没有那么狂热。新闻报道指出，肯尼迪总统并没有像1960年运动所做的那样，发起电话联系。相反，是肯尼迪回了柯瑞塔打给白宫总机的紧急电话。这使得肯尼迪似乎不再那么坚决地同情金，因此让金的事业似乎也不那么可敬。其他一些不那么微妙的差异出现了。伯明翰警察局否认联邦调查局特工曾访问过金，也否认肯尼迪总统的影响力可以为金提供更好的待遇——并且摩尔警长甚至声称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是警长本人的主意，因为他，摩尔，担心科瑞塔产后状况——大多数报纸都把他们的怀疑集中在最没有权威的一方——科瑞塔。报告倾向于把她描绘为一位焦虑的新妈妈，可能混淆了有关白宫的幻想与现实。她首当其冲纡尊降贵，即使她的版本情节最接近真相。在华盛顿，《星报》发表了有关驳回她整个故事的头条社论，题为“实在有点假”。

伯明翰运动的普遍新闻反应都不再有利。《时报》称它为一场“不合时宜的抗议”，对太多伯明翰的黑人来说，金的驱动在某一时刻加剧了紧张形势，这个城市似乎取得一些进展，“在种族关系上，无论进步多么小”。《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社论攻击金的伯明翰策略在“实效性上很可疑”，并且推测它“领导竞争比情况的实际需要所促进得更多”。《纽约时报》使得肯尼迪总统打给柯瑞塔的电话不再那么重要，给新闻发布会留了很大的空间，会上伯克·马歇尔说，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在伯明翰采取行动。相比之下，《纽约时报》洋溢着在新市长的管理下对伯明翰前景的乐观态度，艾伯特·鲍特韦尔在4月15日宣誓就职，就是克拉伦斯·琼斯去监狱探望金的那天。“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纽约时报》报道。宣誓就职仪式就“好像是一场野餐”，里面有“小女生咯咯的笑声”，比起从“过去13天进行示威的声音”来，有一个可喜的变化。两个种族的伯明翰公民大多数都期待鲍特韦尔，“减缓，如果不能结束，在过去几天里呈现出种族关系紧张程度令人担忧的加剧局面”。一篇社论中宣布，它没想到伯明翰的启蒙运动在“一夜之间”就来临，《纽约时报》还补充说，马丁·路德·金“不应该有任何指

望了”。

对于伯明翰白人，北方新闻报道的基调算得上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那一周出现了被誉为“华盛顿自由派思考示威的智慧”和“伯明翰形象得到更好的新闻报道”。所有方面似乎趋同于一个前瞻性模糊的共同点，《时代周刊》称为“相互尊重和机会平等”，而市长鲍特韦尔称为“相互尊重和理解”。这种观点拒绝了金和布尔·康纳，把他们归为同一类危险的极端分子。

克拉伦斯·琼斯把报纸偷运到他的牢房，金飞快地阅读这些新闻的报道。这些新闻让他极度失望，特别是因为各类朋友和敌人混杂在一起，却正使用着几乎可以互换的批评性短语。金本来也可以写封“从伯明翰监狱来的信”给所有这些人——给市长桑普森、伯克·马歇尔、A.G. 加斯顿或者给《伯明翰新闻报》和《纽约时报》。然而，当他看到4月13日《伯明翰新闻报》第2版后，他顾不上世俗的目标了。在那里，就在他和阿伯纳斯在耶稣受难日游行到监狱的两张照片下，出现一个题为“白人神职人员敦促当地黑人从游行示威中撤出”的故事。就在攻击伯明翰示威活动为“不明智和不合时宜”之后，还赞扬新闻媒体和警方“在处理这些示威活动的相关事宜时态度冷静”，神职人员援引他们的宗教权威来反对公民温和抵抗。“正如我们从前所指出的，‘在我们的宗教和政治传统中，仇恨和暴力都不被认可’，”他们写道，“我们还指出，像这种煽动仇恨和暴力的行为，无论在技术层面上可能有多么和平，依然不会促进我们有关当地问题的解决。我们不认为，充满新希望的日子就是伯明翰有理由采取极端措施的日子。”

这13篇短文深深刺痛了金。他在自己所选择的立场上被责难了，并且那些人还是自由主义派的牧师。他们大部分人都冒着毁掉名声的风险，批评华莱士州长在1月就职仪式上发表的“永远隔离”言论。他们属于少数近来同意安德鲁·扬和其他黑人专门用绳索隔开周日教堂聚会地点的白人牧师。但在金看来，在夏特沃斯被炮轰、刺伤并且被捕的这些年里，这些牧师永远不会让他们的真实品行毁于一旦，他们甚至不会让自己站出来坦诚地说这一切是公义的。相反，他

们躲在禁令和狱卒后面，不理睬他的精神连同他的身体。金不能任其发展。他坐下来，开始在报纸边缘上涂鸦。“很少，如果有过的话，我会停下来回应对我工作和思想的批评。”他开始说道。

那个周二，克拉伦斯·琼斯再次到监狱中探望金时，金已经用墨水信手写满报纸上每一处空白角落。当他从他的衬衫里掏出那张报纸，把琼斯吓了一跳。“我写了这封信，”他说，“我要你尝试把这信弄出去，如果你可以的话。”对琼斯来说，这封“信”是夹杂在害虫控制广告和园艺俱乐部新闻中难以辨认又混杂不堪的天书。他把这个惊喜当作是一种来自金带给自己一堆紧急事务的消遣——关于金即将面对的刑事审判，再加上金钱问题，贝拉方特和肯尼迪的报告，许多沃克搜集的关于运动的抱怨。拒绝接受这些，大部分的探访时间金都向不知所措的琼斯表现出如何跟随箭头和环节来从死局重新走向新开始。“我还没有被毁掉呢。”金说道。他从琼斯那里借了一些便条纸，琼斯把那张报纸藏起来，还带着加斯顿汽车旅馆几个亟待解决问题的珍贵答案离开了监狱。

金写了几篇分散的文章来回应说他游行“不合时宜”的批评。他告诉白人牧师说：“时间是中立的，等待绝不可能产生必然进步。”并说：“我们必须创造性地利用时间，要意识到做正确的事情时机永远成熟。”他担心“不怀好意的人利用时间比善良的人有效率多了”，并指出黑人已经为了正义等待了300多年。“我认为，对那些从没感觉到种族隔离带来的刺痛感的人来说，等待很容易。”然后，在一个有着300余字的句子中，他试图向白人牧师传达堆砌不同方式、感觉上的时间感：

“但是，当你看到恶徒对你的父母随意使用私刑，一时兴起便溺死你的兄弟姐妹；当你看到充满仇恨的警察诅咒、踢打、残酷地对待甚至杀死你的黑人兄弟姐妹却不受任何惩罚；当你看到即使是在富足社会中，你2000万名黑人兄弟中的大部分都困在一个不透气的穷困牢笼中；当你试图向你6岁的女儿解释，为什么她不能去刚刚在电视上做广告的公共游乐园时，突然发现你的舌头扭曲和你讲

话结巴。你看到她眼中噙着泪水，当她被告知儿童乐园不对有色儿童开放。你看到压抑的劣等观念云朵开始在她小小的精神家园中形成，看到她无意识发展对白人的仇视，自己幼小的人格开始扭曲，你不得不为你6岁的女儿捏造出一个答案。当你的孩子痛苦地发问：‘爸爸，为什么白人这么恶意地对待有色人种？’当你开车横越全国的时候，发现必须一夜又一夜地睡在你车里不舒服的角落，因为没有汽车旅馆接纳你；当你日复一日地被牌子上让人不得安宁的‘白人’和‘有色’字眼所羞辱；当你的名字变成‘黑鬼’和你的中间名变成‘男孩’（无论你年龄有多么大），你的姓氏为‘约翰’，你的妻子和母亲都从来未被给予过‘夫人’的尊称；当你白天饱受折磨，夜晚忧心忡忡，只为你是一个黑人的事实，不断地小心翼翼地生活，却永远不知道下一步等待你的是什么，内心的恐惧和外界的憎恶让你饱受折磨。当你永远都要与一种‘非我性’这种堕落的感觉做斗争——然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等待很困难。”

金假设了一大堆前景，总是根据不同的措辞来变换不同的语气。他表达了他对数百万人永世的同情，包括在某一个时刻出生的一个特定孩子的生命。他不仅试图通过黑人的眼睛看白人牧师，而且还通过白人牧师的眼睛看黑人。（“黑人有许多被压抑的怨恨和潜在的挫败感……所以允许他有时游行，允许他进行祈祷朝圣。”）对白人牧师，他多方面展示了自己作为一位“饱受困扰”的苦难黑人。（“当你独自一人连续几天里在狭小的牢房里忍受无聊，除了写长长的信，想些奇怪的想法，并做很长的祷告，还能做些什么？”）一位保守派，“到处的不公就是对所有公平的威胁”。一位恳请者，“我希望，先生，您可以理解……”同代的权贵，“如果我试图回答所有铺在我的办公桌上的批评，我的秘书将会没别的可忙了”。他还像一位老师那样说：“怎样才能判断法律何时是公正还是不公正？……把它放在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条款上说，一条不公正的法律绝不是植根于永恒和自然法则……所有关于隔离的法规都是不公正的，因为种族隔离扭曲灵魂，损害人格……我再给出另外一个解释……”他像一位同学般亲切地说，找寻

着共同点：“你要求探讨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不在乎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每个人都已经有了一些鲜明立场。”

逐渐地，金开始采用一种普遍的声音，这声音超越时间、超越种族。他同时作为不起眼的囚犯和强大的先知作为父亲、忙碌的旅客、走投无路的领导者，他所投射出的人格拥有几乎无懈可击的宽度。当他直击他案件的中心时，他采用了真实的亲切声音来攻击触动他怒气的目标——朝向那些谴责他却绝口不提他名字的人。

几乎在窃窃私语页面上，他提出了他最严厉的指责是一个告白：仿佛是在纸上的低语，他把自己最严厉的指控用告解的形式呈现出来：

“我必须实实在在地招两个供，对我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弟兄们。首先，我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对白人温和派深感失望。我已经几乎可以得出一个可悲的结论，黑人巨大的绊脚石不是白人公民理事会成员或三 K 党成员，但比起司法来，白人温和派更专注于‘命令’，他们更喜欢一种消极的和平，对司法存在下，积极的和平缺少紧迫感，他们不断说：‘我赞同你们所寻求的目标，但我不赞同与你直接行动的种种方法。’他们搞家长统治式，认为他们可以为另一个人的自由设定时间表……”

回到加斯頓汽车旅馆，来辨认他称之为金那“鸡爪印”般的书法。怀亚特·沃克对这些文章明显感到非常兴奋。“他的心中确实充满了白人牧师！”沃克大叫道。在他看来，这是金的过度宽容，让他长期饱受困扰，沃克非常兴奋地看到这种刺痛的愤怒忽然间释放了出来。他知道，早期基督教教会的历史让监狱成为精神审判的合适布景——埋葬在最虔诚美国人中间的是在被迫害的灵性上萌芽的信仰，那灵性是他们信仰的自然代价。这就是早期教会的转生，有金对帝王责难，这责难出于憎恶，出于对世俗依恋的可怕抵抗。为此，沃克把他的笔记板放到一边。到深夜，他口述金的话，让他的秘书打字。

金的目标在政治上和宗教文化上的痛处上。自 1441 年起，教堂一直在黑人

政治中处于中心地位。航海家亨利王子从非洲亚撒哈拉地区带来了第一群史上记载的奴隶，共 10 名，作为礼物全部送给教皇叶夫根尼四世。400 年后，美国两个最大的新教教会并没有按照神学上的学术扭转有所划分——尽管也有很多是这样——但都有针对性地指向对两位从佐治亚州的蓄奴牧师应得的个人尊重。当北方人对基督教的合适度提出质疑，南方浸礼宗教徒和循道宗教徒气愤地大步从教会中列队出去，形成自己派别的教堂。贯穿整个 19 世纪 40 年代和 19 世纪 50 年代，萨凡纳的著名牧师 C.C. 琼斯试图避开基督教长老教会中类似的分裂。被关于奴隶制自己得出的推论困扰（“我多长时间想一次，他们所雇用的黑奴的数目是多少，才能提供给我生活中的种种便利？”他在 19 世纪 20 年代写道，“在终将被剥削的这些人中，有多少位知识分子，可能有多少个灵魂，要永远为这个目的凋零和枯萎！”）他一生都致力于有争议的主题，也就是基督徒的第一个任务是扩大对黑人的宗教利益。他深信，“救赎一个人的灵魂比俘虏和运输他们所带来的全部痛苦和灾难有价值得多。”随后居住在我们中间，从多切斯特清教徒集会开始，琼斯扩充了一个奴隶的使命。这个黑人教堂还在襁褓之中他就一手培育，不料却被出自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几句格外有毁灭性的言论为自己下了咒。“哎呀，小滑头！”道格拉斯喊着，“嗯，愿小偷高兴，强盗唱歌，奸夫喜悦地拍拍手。”基督教蓄奴者已经厌倦了反对琼斯的标志性区分邪恶制度和凭良心做事。道格拉斯坚持认为奴隶制存在仅仅因为它值得尊敬，它之所以值得尊敬，是因为如琼斯的人们被错误地认定将基督徒和绅士风度的尊重相匹配。琼斯用愤怒的蔑视来到捍卫他一生的使命，呼吁废除主义者“最糟糕的那种狂热，对抗蔑视人性和神性的所有律法”。当南方长老会终于在内战期间分裂了，琼斯呼吁教会采取奴隶的宗教指令作为崇高的号召。

就在 100 年后，当他写给琼斯曾孙子，名义上为 C.C. 琼斯·卡彭特主教信时，宗教性的社会地位仍然是激怒金的关键问题。作为始作俑者和第一位签字人，卡彭特主教随身携带文书信件，来攻击黑人示威到伯明翰报纸，他行事非常

谨慎，反对断章取义或做编辑修改。爆发性的种族性紧张给每个字眼增加了严峻性，因卡彭特作为美国高级圣公会主教而更是如此。在种族隔离方面，他是一位非常富有经验的批评家，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最好的朋友威尔·斯嘉利主教终身保持通信，他经常恳求卡彭特利用自己巨大的声望愤慨地说出反对种族隔离的话。然而，卡彭特只需要拣出和金在计划上或者重点要躲闪的地方上最微小的区别，就足以让他名声的分量在这场运动中减少。金寻找一场革命来翻转惰性所带来的负担。卡彭特指责金的理由是抗议缺乏基督教的尊敬，没有意识到金心里有一场对抗的风暴——他不会像卡彭特本人这样的牧师抱以基督教式的尊重。

“我需要更多的纸。”金对克拉伦斯·琼斯说道。他有时候直接提出，有时候在老黑人模范囚犯私下的帮助下得到些纸。他用新的手写稿原件来换打印好的草稿。在那时，偷运的补给激怒了琼斯，对他来说，这封信是对无关轻重的白人牧师毫无权势的呼吁。但他可以看出写信是金精神健康运作的表现。“我认为他是有资格写信的——要知道，他是个在监狱里的人，”琼斯后来回忆道，“但求主怜悯，我认为他已经丧失了他自己的观点。”在琼斯设法从金那里掠夺的少数商业决策中，有一项命令是从加斯頓汽车旅馆驱逐何西亚·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已经响应了金的求助，从萨凡纳开车带走一车帮手，那些人曾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案台上提出了一项汽车旅馆法案。沃克发现这不仅会耗资巨大，而且还很不合时宜，因为外面的工作人员要远远多于伯明翰每天进入监狱的志愿者。金也同意了。

这两份告白写满了20多页信的后半部分。起初，金正式谴责白人牧师的种种缺点——好像从布道台上讲出的那样。“我已经听说南方有很多位宗教领袖呼吁他们的礼拜者，要按照种族隔离的决议做，因为这是法律，”他写道，“但是我一直渴望听到白人牧师怎么说。”“遵照这项法令，因融合在道义上是正确的，黑人是你的弟兄。”他继续沿用他一贯探讨教会失败的几个主题，他的愤怒慢慢转为悲叹：“我已经为教会的放纵而流泪。不过我敢担保，我的眼泪一直是爱的眼

泪。”最讽刺的是，在牢狱中困着的囚犯在亚拉巴马州哀悼最受尊敬的神职人员时，就像迷途的羔羊无法找到他们信仰中最明显的信条。

“我一直过于乐观，这一次又是这样，”金补充说，仿佛抱着更好的期待一直是件很荒谬的事，“……也许我应把我的信仰变为内在的精神教堂，教堂内的教会，为真真正正的教会和世界的希望。”即使高级教士也要从正义事业中排除自己和他们所有的权威，金说他不会感到绝望，因为他内在的教会是一连串涌动的信仰，混合着美国信条中宗教核心。如果所有人都生来平等，那么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那些根本信仰颠覆了倾向历史的既定结论——即宇宙站在正义这一面。“我们将在伯明翰乃至全国范围内实现自由的目标，”金写道，“因为美国的目标是自由……如果奴隶制难以形容的残酷无法阻止我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反对派注定会失败。我们将赢得自由，因为我们国家的神圣传统和上帝的永恒意志都体现在对我们要求的呼应。”

在这封信中，像在他的布道中一样，金从夸夸其谈中撤回来。几乎是作为悄悄话，他提到了卡彭特声明中表达对伯明翰官方感谢的部分，他感谢他们对游行示威活动不予重视，还进行了消声限制。“如果你看到了在城市监狱中对待黑人的邪恶残忍行径，我不认为你会这么快地赞扬警察。”金写道。对警方公开执行处罚所做出让步，他提出这个问题，认为应该想到白人牧师。“但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他问他们，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保持种族隔离的罪恶制度。”有关用不道德的手段达到道德目的是大错特错的，在他所有非暴力的说教中，金写道：“它只是错误地，甚至更多地来用道德的手段达成不道德的目的。”他引用T. S. 艾略特的话达到效果。接着他充满深情地又回到了他的悲叹上。“我希望你们称赞伯明翰黑人静坐抗议者与示威者崇高的勇气，勇于承受痛苦的自发性以及在残忍挑衅中令人惊叹的纪律性。”他写道，“总有一天，南方会认识到它真正的英雄……总有一天，南方会知道，被剥夺继承权的上帝孩子，在午餐柜台坐了下来，他们在现实中拥护美国梦中最好的部分，以及我们同犹太基督教所共有传统

中最神圣的价值观。正是如此，把我们整个国家带回到承载着民主、被开国元勋挖得很深的井。”

夜深了，疲惫不堪的威利·玻尔·麦基毫不夸张地在她的打字机上睡着了。唤醒不了她，怀亚特·沃克用手臂抬起他的秘书，把她搁在另一张椅子上，自己在打字机前坐了下来。对他定义清晰的执行层级，只有在最稀有的紧急情况可能会迫使他陷入文书义务，但这一次，沃克到最后仍吹毛求疵。他不会《新约》中恩典和《旧约》中愤怒如此精致的融合置之不理。在就要结尾时，金有意识地探索这种融合物。“如果我在这封信中说了些夸大的或不合理的急躁话，恳请你们原谅我。”他写信给卡彭特主教和其他人说，“如果我说这封信的内容是对真实情况的轻描淡写，并表明我有耐心，让我对任何小于兄弟情谊的事情有耐心，那么我恳请上帝原谅我。”

这封“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并没有迅速收获很多喝彩。基本上一段时间之内，它只是被保留在私下交流中，尽管怀亚特·沃克非常努力地去吸引目前世界的注意。这封信中甘地般的主题的确打动了詹姆斯·劳森的联络人，他们愿意把这封信刊登在6月出版的《教友》杂志上，但普通记者没有看出有什么新鲜感，似乎只是金的一个特别冗长的讲道。整整一个月，无论在白人还是黑人新闻出版界都没有人提及这封信。回想起来，这似乎是金在用笔杆子拯救伯明翰运动，却出现了实实在在的反转——伯明翰运动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迹以后，把金的这封信从充满急切希望的无声呐喊变为道德胜利的著名宣言。

怀亚特·沃克急需未来的这一切。没有膨胀的期待，他的无意识的天才正在一点点碾碎。10年里的第一次，金肉体上的迫害没有引起旋风般的政治压力。肯尼迪政府，在慎重应对柯瑞塔的举措之后，选择保持沉默。其官员反应对金来说也只是中立的，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对金进行压制，并私下批评他的运动非常讨厌。金进了监狱4天后，沃克默认，金的名字已经失去了它的一些象征性权利。在给伯克·马歇尔的信中，他通知了司法部，自此以后的伯明翰活动“将分

散逐步建立的选民登记努力的热情”。虽然沃克偶然呈现的变化作为“我们竞选活动的第二阶段”，这实际上意味着，通过商议好的直接行动，废弃所有庄严的决心，来打破伯明翰的种族隔离。沃克给马歇尔下了通知，期望展开一场从伯明翰的奥尔巴尼式撤退。这也向肯尼迪的人民发出信号，金迫切需要他们的支持，来采取他们所首选的方法。

卡彭特主教在他的书房坐下来，带着一份文件，那是来自金很厚重的解释。他把那封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转向副主教乔治·默里，长叹一声准备放弃，“你尝试去做，这就是你所得到的，”他说，“你从双方得到它。乔治，你必须忍受这一点。”卡彭特感到金滥用和误解了他的努力，把它充当了种族关系进步的力量。情感冲突转向让他像他的曾祖父一样变为一位更尖锐的同盟。

对肯尼迪政府来说，金在伯明翰的监禁与密西西比州内部斗争的高潮不谋而合。当公民权利委员会提交了专题报告的提前草案，伯克·马歇尔从给肯尼迪总统备忘录中的一份报告中选定词句。发现黑人在登记队伍中已经“惨遭恶狗袭击”，马歇尔报道说一只狗咬伤了绿林镇的一名律师。“警犬的使用不是一项禁止的活动。”他补充说。然而发现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因为想要获得选举权，而被咬还被施以恐吓”，马歇尔告诉肯尼迪，他“不知道具体情况是什么”，但一位黑人登记工人确实已经“被沃尔索尔县的登记员用手枪抽打”。接着，将遍及全州的选民恐吓缩小为一个事件之后，马歇尔让肯尼迪放心，说司法部“带来了案例中的一项成功实例”。他并没有提到对于成功种种匪夷所思的限制：联邦政府已经阻止密西西比州以扰乱治安罪起诉约翰·哈迪——他曾被手枪击打过。密西西比州噩梦般的压抑现实是，这确实是从疯狂行为中大胆迈出的显著的第一步。马歇尔备忘录中改变了的现实给肯尼迪总统创造了一个印象，司法部门惩罚了用手枪击打人的暴徒，让可能成为黑人选民的人恢复正常。

在白宫，一定程度上，李·怀特把马歇尔的备忘录变为对公民权利委员会进行的直接攻击。对于每一个不公正的“控告”，他从马歇尔那里剽窃了一个“回

应”，从而得出结论——该报告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建议是一项暗示，并且总统和政府都没有为密西西比的局势做到力所能及的那种程度，”他写给肯尼迪总统，“这个，当然，显然是错误的。”怀特接着暗示了可能在总统催促委员会放弃或修正它们报告过程中所产生的几处“不良影响”。其中有一些等同于威胁：该报告可以“扼杀这条法案以延伸委员会的生命”。怀特说道：“并且还会破坏委员会及其个别成员的合理性声誉。”

肯尼迪总统召见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帆尔·伯恩哈德，探讨一系列片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多都带有嘲讽的怀疑。他想知道，到底不同的委员起初是如何做出如此之坏的判断，并且为什么他们不理解这份报告“会破坏监狱中本来已经相当坏的气氛”？带着怀特的备忘录，总统就委员会对摩西登记计划的断言进行了激烈争辩。至于对委员会附加的发现，联邦政府正在资助密西西比州的隔离计划。肯尼迪告诉伯恩哈德，他的信息还另有所指。他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明确否认，在杰克逊的新机场将有隔离休息室和午餐柜台。

伯恩哈德假装避开肯尼迪的办公室，他不希望和总统发生正面冲突。他汇报给委员们的好消息是总统并没有命令他们撤回专题报告。肯尼迪基于自己的立场，按照事实情况进行表述，获得了委员们的一致同意。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们逐步向司法部门揭露他们的秘密武器之一——他们手中有杰克逊新机场的建筑图纸，上面清楚地表明午餐室分区以及白人和黑人双套休息室。等到约翰·汉纳主席陪同伯恩哈德到白宫后，就报告做出最后摊牌，政府官员承认，他们确实在休息室和午餐柜台设置了隔离措施，然而他们又说如果联邦政府对机场进行补助就没有那些部分——飞机跑道和控制塔。因此，政府不会直接支持隔离。

进行了一番谦恭有礼的坚持后，汉纳和伯恩哈德赢得了他们自认为的完全胜利。肯尼迪总统对事实说了些遁词，并没有下令做任何改变。他仅仅为其要求了处理新闻公告的权利，但通过这个机会，他设计了一个陷阱，大大抵消了委员会机场蓝图事件。在周二，也就是4月16日那天，金正在伯明翰监狱兴奋地写信，

怀亚特·沃克通知马歇尔退回选民登记计划——肯尼迪总统亲自就发布委员会报告一事，私下与白宫记者谈论相关事宜。他为最后的阶段吸引注意，从委员会成员中“全体一致得出结论：联邦政府只有迈出更长远的步子，才可以阻止密西西比州宪法颠覆行为”。对肯尼迪总统来说可行的一步便是“探讨他的法律权威”，将联邦开支作为杠杆来反对种族隔离。总统说，这是有着强烈暗示的新闻，暗指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建议，确保报告揭发的重点是一些最具煽动性的想法。“总统力促切断密西西比基金。”《纽约时报》宣称。

白宫的助手们散开在记者当中，以确保他们领会到广大官员的不屑。切断资金来惩罚种族暴行是不切实际的，并且也违反宪法。他们说，单挑出密西西比州这个想法暗示出，类似的侵权行为在其他州是可被接受的。更糟的是，该提案对密西西比的黑人非常残酷，联邦政府做出任何削减，都将受到最严重的惩罚。这些异议在各个媒体扎根，包括最受大家支持的民权发泄口。这样的公众反应让肯尼迪总统在3天后平稳地驳回了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委员会报告中涉及的事件，”他在一封公开信中告诉会长汉纳，“我仔细考虑过，要成功解决每个问题，而不能仅仅解决一个问题。”在民权委员会上，他提交了有关良知的重大宣布，却被从华盛顿中驱赶了出来，悲惨的震惊降临到控制讨论民声管理力量的演示中来。

在伯明翰监狱中待了9天之后，金和阿伯纳斯在周六联系上，金出现在即席发布会上，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蓄着很密的胡须——因为在监狱独居室里是不允许刮胡子的。他解释说，他出来是来和他的律师协商，从周一开始对审判的蔑视一事。（他没有提及他写的长信，但是他的确提到他成功看完两本偷偷运到监狱里来的书，拉尔夫·麦吉尔的《南方和南方人》和杜波依斯的《黑人民众的灵魂》。）4位控方证人中竟然有3位是新闻记者，他们作证说听说过金和其他被告敦促黑人在示威游行期间无视禁令。在周一晚上的群众大会上，金用挑衅的言论预言了自由，并完整背诵了《星条旗永不落》作为结束。实际上他并不引人

注意，他似乎像一个疯子般在现实的折射中疾飞。可怕的巧合是，一个更加隐蔽的疯子正在进行相同的艰苦跋涉。金在周六离开监狱时，一位来自巴尔的摩的白人邮递员出现在了白宫门前，用信件通知肯尼迪总统——他打算用10天的假期，佩戴着两幅写有“在美国结束种族隔离”和“所有人要求同样权利”的招牌，一路从查塔努加走到密西西比州。“如果我可以在我的行程中为你们递送任何信件，我会很乐意的。”那位邮递员——威廉·摩尔提议说。然而他遭到了断然拒绝，警卫们拒绝接收他的信，摩尔潦草书写了给肯尼迪总统的附言：“继续对抗古巴的好战分子。仔细阅读关于越南的参议院发言！”摩尔接着挂起他的标示牌，在两轮的邮政车上推动自己的个人影响，在去公交车站的路途中，投递那封信前，在白宫人行道上进行一段时间的纠察，他还增加了一块写有“密西西比州或被捕”的标牌。

周一晚上，金背诵《星条旗永不落》之时，摩尔在路上，在日记中记录着他迄今为止的冒险经历。他收养了一条狗，把它送给一个小男孩，他写道，一位查塔努加的黑人把“黑人”这个字眼从他写着“在乔家餐厅吃饭，黑人和白人”的新招示牌上扯掉，并且生气地告诉他，应该用“有色人种”这个词。摩尔还写道，他曾得到一些令他感到气愤的绰号，路边的种族隔离者向他扔石头，还有专题记者要求采访他。他确实是一道奇怪的风景区——一路沿着高速公路，推着小车从田纳西州到佐治亚州，经过各个角落，来到亚拉巴马州。他的脚长满水泡，肿胀不堪，这迫使他赤脚走路，只有走进商店买食物时才穿上鞋。

摩尔在周二晚上一共走了大约70英里，位于加兹登的广播电台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记者拦住他的去路，对他进行采访。问及他的目的，摩尔说：“我打算直奔密西西比州州长的官邸，敲响他的门铃。然后，把我的信交到他的手中。”这封信是对民事权利的请求，要求巴尼特“大方地给予比立刻要求你做的还要多。他将永远不会让大声疾呼的示威重生”。摩尔说，他从小生活在密西西比州。“我不认为南方人是那样的。我想很多东西只是杜撰的。”

记者在美国 11 号公路靠近阿塔拉的延长线上和摩尔道别。路过的司机在沿道路一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他的尸体，他头部中了两枪，两个枪口挨得很近。从农家打来的电话拉响了警报，在凶杀案现场招来了记者。摩尔仰面倒在地上，仍然挂着他的标牌。他的口袋里装了 51 美元、给州长巴尼特写的信、日记以及他所寄出钱的邮政收据，那些钱将供他在伯明翰和他旅途中的其他城镇使用。他旁边是邮车，里面有他的鞋子、额外的衣服和写给肯尼迪总统信的副本。

就在摩尔去伯明翰道路上的最后时刻，夜间群众大会正向黑人宣传以获年轻人支持，尤其是白人年轻人。弗雷德·夏特沃斯大肆从伯明翰南方学院推出 3 名白人学生，他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怯怯走上平台。金宣布，这 3 个人中有两人是传教士的孩子。夏特沃斯搂着那两个女学生，大部分观众都定在那里，为这种公开展示跨种族、跨性别友谊的惊人情形欢呼。警方观察员相对感到受羞辱，并且很反感。两位侦探在第二天和伯明翰南部的官员见了面，很快承诺要对两位女性在黑人教堂的行为进行纪律处分。他们安慰地说，山姆·西拉已经退学了。

那周三，路旁死刑的消息在全国各地飞速传开。记者没花多长时间就调查清楚了摩尔，从前和家人住在纽约宾厄姆顿，是位高大的水军，曾在纽约精神病院被拘禁了一年多，之后他在 1955 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囚禁的心灵》。“我把我的教诲逐字地记了下来，”他记述他在密西西比州的童年，“世界不同于理想，我认为世界是错误的，所以不会按照现实世界调整自己的行为。”故事讲述了摩尔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他对堂吉诃德的认同，他在巴尔的摩静坐时被逮捕的情形，在邮递员同事中有着“讨人喜欢的怪人”的名声。他们引用了他书中结尾的话：“因此是这个梦让我进到州立医院，这个梦仍然牢牢掌握着我……我的未来在你们的手中。我只能交出我的生命。除非你们帮我实现梦，抑或为我打破它。”

在华盛顿，摩尔给肯尼迪总统的信交到了李·怀特的手中，他确信他的首领在那天要有关这件奇怪的恐怖事件召开电视新闻发布会。然而，发布会上没有人问起摩尔，也没有记者提问有关金连续 21 天在伯明翰示威的问题，一个也没有。

大部分问题都与老挝和古巴的强国紧张局势有关。在唯一提出的民权问题中，一位记者询问在这种情况下，在建立密西西比州的黑人权利上，增添更多联邦行动上有没有什么优势。“是的，”肯尼迪总统回答说，“公民权利委员会说明的所有案例，美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法律行动，以提供补救。”在这方面有了几个更多的评论后，总统亲自提起了前一晚上威廉·摩尔的枪击事件，也许是为达到更有力、更真实的立场。“现在非常困难，”他说道，“毕竟有一项令人发指的罪行发生了，据各种说法了解到，亚拉巴马州受枪击的这位邮递员，正以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将我们一些公民的困境戏剧化。我认为他在路上被暗杀——”他在句中停顿了一下，然后重新用更正式的口气说，“我们已将亚拉巴马州的相关事宜递交给联邦调查局……”

总统这番有关威廉·摩尔的言论刺激了新闻媒体，开始纷纷讨论这个幼稚的邮递员到底比可接受的世界更加疯狂还是理智。在运动中，有关他“反对种族歧视的游行”令人吃惊的消息重新燃起了两年前牺牲性的能量，即第一次自由车手在伯明翰汽车站遭到野蛮殴打。从菲斯克礼拜堂出发，约翰·刘易斯率领125名学生组成的队伍游行到在纳什维尔的联邦大厦。他们举着指示牌，上面写着“威廉·摩尔，谁会是下一个？”以及“摩尔为爱而死，让我们在爱中生活并行动”。保罗·布鲁克斯，刘易斯同行的自由车手之一，宣布他要重走摩尔的路一路到他被枪击的地方，他说，他不能容许暴力取胜。在纽约，詹姆斯·法尔默召集开展种族平等大会指导委员会，计划对第一位被杀害的成员做出反应。从亚特兰大，学生非暴力委员会的詹姆斯·福尔曼打电话给摩尔在宾厄姆顿的遗孀，问她是否认为她丈夫本来想让学生们参加他的行军。在伯明翰，戴安·纳什激活她的电话网络。她与她的丈夫，詹姆斯·贝弗尔，回忆起在1961年的野餐时，他们听到安尼斯顿外自由乘坐巴士燃烧的声音。

贝弗尔下午的学生讲习班人数如此之多，超过了平时集会的人数。那天下午，在肯尼迪新闻发布会之后，贝弗尔和安德鲁·扬邀请讲习班学生继续留到

深夜。其结果是群众大会非常拥挤，校方局长进入圣詹姆斯浸信会教堂，试图下达强制占用条例进行管理。弗雷德·夏特沃斯欢快地戏谑他，会议高涨的气氛激发了夏特沃斯，他发誓称第二天出席蔑视审判的所有黑人将使用市政厅“只供白人使用”的喷泉。人群中发出一阵赞同的低吼。对威廉·摩尔的悼念让大家潸然泪下，运动合唱团高唱自由之歌，震撼了教会。然而，当再次进行第二天进入监狱的号召时，士气低落下来。金花了半个多小时来进行说服，希望巨大的人群中能出现志愿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许多来自研习班，学生从高中，甚至小学都有。金一再解释说，他深深感激那些愿意去承受的人，而他希望他们树立的崇高榜样会激励他们的父母，伯明翰监狱不是孩子应该去的地方。尽管金这么说，有些三年级、四年级的学生却拒绝坐下。

罗伯特·肯尼迪和伯克·马歇尔第二天在蒙哥马利与州长华莱士召开紧张的特别会议。在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弗雷德·夏特沃斯告诉拥挤的群众集会，他“很高兴鲍比失势”。“我希望他能来到伯明翰，”他补充说，“但他能听到我们在百里之遥发出的声音。”夏特沃斯宣扬在市政厅的水战，他语气欢快，即兴地开着玩笑，报告说，绝望的政府官员已经把白人喷泉和黑人喷泉都关闭了。“所有的厕所也都被锁了起来，”他说，“所以，如果看到法官局促不安，他并不比任何在法庭上的人舒服。”响亮的笑声响起，夏特沃斯告诉他们他是如何为了上厕所，不得不步行到公交车站，以及他如何发现厕所中有白人警察，他们一起忍受缺水带来的麻烦。“隔离是一件愚蠢的事！”他喊道，“……我们在这里，为完全免费的事情争论！”为了阐述他们为什么一直在坚持，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小男孩问：“爸爸，为什么萤火虫亮着呢？”夏特沃斯描述这位父亲是如何陷入沉默，结结巴巴，抓耳挠腮，直到最后，他还是不知道怎么作答，于是他说：“好吧，我告诉你真相，孩子。东西就在它体内，仅此而已。”咆哮般的欢笑和异口同声的欢呼。夏特沃斯补充说：“对黑人的自由精神来说，那些东西也正在他们体内！”

上周五，也就是4月26日，法官詹金斯宣布他发现金、夏特沃斯、沃克、阿伯纳斯等7位伯明翰领导人犯有藐视法庭罪。他判处他们每个人最高5天的刑罚，若公开威胁进一步侵犯他的禁令，可能会导致更严厉的民事上藐视法庭罪的惩罚，其中规定，法官可能会让被告无限期坐牢，直到他们通过道歉“清洗”自己并撤回自己的言论。对于这些被告来说，活动反应带来的烦恼比这个裁定气馁多了。因为审判必要插曲的出现，在市政厅的饮水区不可能再设有娱乐区了。下一步行动落到领导者身上，每次都面对群众的热情和进入监狱的人数不足的严重落差。领导者不能确切预料到起义究竟能不能通往胜利，还是会带来伤痛，但知道若不做出决断性的一步就会失去很多。于是，在判决的当天，夏特沃斯上书伯明翰市政参议院，让他们许可在下周四，5月2日上演大规模抗议游行。

这给了领导者们5天的时间去准备。最开始，他们是公开效仿1960年游行活动中詹姆斯·劳森在纳什维尔静坐的高潮。事件过去了3年，给伯明翰带来了新灵感。自从贝弗尔一直在全国广播会议上的专题报道中放映有关纳什维尔的电影拷贝开始，据切特·亨特利和大卫·布林克利陈述说：“4000名黑人在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市政厅游行。”安德鲁·扬在群众大会上宣布道：“我们希望在伯明翰能有这个数量的人。”然而在他们的私人战略会议上，领导者认识到，他们面临会产生严重后果的种种不利条件。纳什维尔没有监禁任何示威者，而伯明翰一直保持着关押全部游行者的纪录。在纳什维尔没有反对示威游行的禁令，也没有布尔·康纳出面阻挠。最关键的是，纳什维尔游行队伍大部分是学生，而伯明翰运动一直是黑人成年人在参与严酷战争。

贝弗尔想改变这种状况。那些每天在研习会上看有关纳什维尔电影的都是年轻人。在伯明翰，只有极少数的成人志愿者逼迫金的同事来设计不在场证明和编外计划。游行唯一的希望落在了对大批学生的激励上。在密西西比州，贝弗尔和戴安·纳什已经开始招募学生精英——帕克小姐高中的篮球明星，两个星期内，研习班已经变为了集会规模。一整批新的学生领导阶层以自己在学校来去自由的

能力著称。每天越来越多的学生突然出现在研习班中，他们越来越年轻化，个个虚张声势，准备向监狱游行，每晚金主持辩论，讨论他们中哪些人应被允许去。约翰和迪尼·德鲁兹、A. G. 加斯頓和牧师约翰·波特坚决反对让还没到上大学的年轻学生，按照几乎每一位伯明翰领导者所建议的那样去做。学习成绩以及一生的希望就这样毁了，年轻的生命受到强奸、殴打还要饱受监狱不可告人的丑陋，从而伤痕累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远离这场游行，德鲁兹派他们 11 岁的儿子去到一个遥远的预备学校，要保护他不受他们房客“迈克”·金所制造的危险。没有哪个自尊尚存的成人可以利用他们的孩子去做战斗素材，他们说，因为即使是早期基督徒也不鼓励自己的孩子去面对斗兽场的狮子。

在压制黑人抗议方面，伯明翰的白人领导变得对它的韧性更加自信。《新闻报》发表了指导性文章，题为“绿林中了拳——但是赢了”。同时，伯明翰两个市政府之间维持着值得注目的休战，因为他们在等亚拉巴马州法院来决定其中哪些合法。对手们分享着一切，从记事簿到停车位，并且在每个星期二，他们都要表演一场展示统治权平等的仪式。布尔·康纳和他的委员会同事从市政府中鱼贯而出，市长鲍特韦尔和新市议会提交采取了相同的业务更新措施。在 4 月 30 日第三组双边会议上，两个组织都否决了夏特沃斯周四想要获得游行许可的请求。

在加斯頓汽车旅馆，金和他的助手们面临被否决的暗示。这意味着，任何游行的人都将遭到逮捕，并且领导人会再度因违反法官詹金斯的禁令被监禁。此外，凡是敦促孩子游行的人都将以促进未成年人犯罪受到起诉，金却认为，这种情况给了伯明翰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刑事定罪附加在上诉中。他提心吊胆地就这场豪赌和贝弗尔开玩笑，说这只会让他们冒险，让所有人成为长期囚犯。“嗯，贝弗尔，你已经促成了 80 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正在杰克逊审议。”他说。

“嗯，这就是问题所在，”贝弗尔回答说，“我还没做够。如果我有 8000 人，他们就不会烦我了。”

自由行车活动年轻老兵逼着金跳下悬崖，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但没有人像贝

弗尔这样。他从密西西比州归来，头戴圆顶小帽，下面是他刮过的脸，他有时解释说这标志着他对希伯来先知的尊重，其他时间作为一个保护装置，以让自己出狱，说密西西比警长对黑人牧师戴着“犹太小圆帽”，感到非常困惑，说他们宁愿让他独自一人待着。贝弗尔拥有独特魅力，有点像小弗农·约翰斯。对金来说，比起他与生俱来的创造力，他对自己的判断更有把握，贝弗尔呼吁自由精神——如同鲁莽的亚里士多德。他甚至推崇贝弗尔想要听到的“声音”。在紧张时刻，贝弗尔提醒人们，运动中会有疯狂的基本要素，像威廉姆·穆尔的谋杀案。在决定是否送孩子到布尔·康纳的监狱的时候，金不能侥幸逃脱所罗门的合理的休息。

在金的许可下，贝弗尔向群众大会致辞，就在周二那天，游行许可被拒绝的几个小时后。对着人群以及其中引人注目的警方侦探，他宣布周四或许要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上演一场大规模游行。这将是高中生游行，贝弗尔和沃克称为“进攻日”的那天。贝弗尔顺便说一句，他的妻子戴安当晚离开，去参与了被杀害的威廉·摩尔的自由行活动。

两支分开的摩尔行进军在5月的第一天，周三上午出发。意料之中，这两支队伍吸引了大量的新闻报道。沿着死人的足迹前行，已经威胁到三K党徒，以及亚拉巴马州官员，司法部还拒绝提供保护，步行小队毫无疑问成了即将上演的悬疑故事。《纽约时报》的克劳德·西顿离开伯明翰，去采访10名志愿者组成的一个小组，在种族平等协会和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推迟的协商会议之后，被选择出的那些人沿着摩尔的路线从查塔努加到杰克逊步行了整个旅途。这个小组包括鲍勃·泽尔纳、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比尔·汉森、参与绿林运动的杰西·哈里斯，以及伯明翰南部的白人学生山姆·西拉，他曾在伯明翰群众大会上造成很大轰动。詹姆斯·福尔曼作为观察员一同前往。同时，《时代》杂志的福斯特·海利离开伯明翰去报道戴安·纳什·贝弗尔的小团体，其中还有保罗·布鲁克斯，以及其他6人，他们从摩尔的尸体倒下的地方启程，向伯明翰行走。亚拉

巴马州警官很快抓到了在这两个队伍中包括工头在内的 18 人。

在伯明翰，对记者的部分疏散，金为进攻日游行的内部政治提供了言语保护。对约翰·波特和其他人来说，对用高中孩子的这个决定感到非常沮丧，金说，他不得不在伯明翰做一些戏剧性的事情，因为新闻界已经失去兴趣了。这些话对伯特来说，似乎既令他感到震惊，又让他觉得这些话也太愤世嫉俗了，伯特在运动中的每一步都掠过一场困境，这些困境更加扰乱了他的情绪。然而，记者的说法却使送孩子到监狱这件事变得模糊，金具有倾向性的要旨要让波特等人几近中风。与沃克、夏特沃斯、贝弗尔和其他亲近人的私人会谈中，金允许监狱志愿者的最小年龄继续稳步下降。

在他的研习班中，数百名伯明翰孩子争相参加进攻日游行，贝弗尔给金提出一个简单的准则：任何一个在年龄上有资格参加教会的孩子就应该有资格向监狱游行。几乎所有青年志愿者都是浸信会教徒，像金本人，浸信会的教义需要有意识地接受基督成员和个人救赎。按通常的做法，教堂允许最小的学龄儿童也成为会员。它就是那么规定的，贝弗尔坚持说。他和金怎么能告诉 6 岁的教会成员，他们的年龄已经足够大，能够来决定他们永恒的命运，而不是说他们对抵制隔离的游行来说还太幼小？他们怎么能让教会成员免除非暴力活动，像基督教教义中体现的那样？

金知道贝弗尔有非常好的理由做得如此过分，因为他妻子是在那一刻在 11 号公路加入进威廉·摩尔的路线的。他也知道，基于教堂教义给来生的注解而形成监狱游行队伍是荒谬的。尽管如此，他感觉到贝弗尔想要真正表达的内容，以及他对改造所抱有的希望。该教堂已经为运动铺平了道路，所吞噬的不仅是对死亡的恐惧，还有所有种族年龄的差距，以及每个头脑清醒之人的妥协。贝弗尔说得很明白：如果他们可以，他们应该派遣志愿者们去监狱，尽管志愿者的父母反对。“反抗你的妈妈，”他告诉金，“你有权做这个见证。”

届时，伯明翰警察局接到联邦调查局的情报，说有传单正在散发，上面的内

容为黑人高中敦促所有学生在周四中午离开学校。大规模逃学的威胁对黑人伯明翰迹象只是一个提示。“肉丸”和其他贝弗尔的新兵也在响应这些小学的叫召。高保罗，摇滚电台主持人，广播出一场带有隐喻的公告，周四凯利·英格拉姆公园有一场摇摆舞“大聚会”，伯明翰几乎每一个黑人孩子都知道他的意思。夜晚充满了痛苦和兴奋，因一些年轻人纠结于悄悄溜进还是溜出游行队伍，而其他人则勇敢地吐露给他们自己的亲人，说马丁·路德·金希望他们游行到监狱。

对金来说也是一样，这一瞬间充满着紧张感。巴士抵制运动过去8年后，他就一直处于没有任何回报的边缘。伯明翰的南方基督教协会大会已经过去8个多月之久，他开始盘算着要做出更激烈的行动，这行动持续的影响要比他从市政府的屋顶跳下来或刺杀布尔·康纳的行为还要长。把自己的名望和躯体送入监狱，把他内心深处的激情抛出来对抗美国白人牧师令他们自己感到疏离的社会地位，而这一切都没有显著效果。金在学生的见证下开始进一步致力于他的事业。

第二十章 孩子们的奇迹

伯明翰警力分队都期待着5月2日周四“进攻日”那天的青年游行军，他们在沿着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出发的各条市区路线，加强了日常的路障。由黑人围观者组成的常规性队伍直接聚集到凯利·英格拉姆公园对面的教堂，窥伺着警察的举动。两个团队都听到了从砖墙和彩玻璃窗里传出来的自由之歌。下午一点钟刚过不久，前门便立刻被打开了，50名青少年两两并肩出现在门口。昂扬的歌声和拍手声交织起来，把那首名为《我们终将胜利》的歌曲，从一支伤感的挽歌变成滑稽的进行曲。

官员们疲惫地投入工作职务中，他们让队伍终止行进，告知人们有关示威游行的法院禁令，警告他们若继续这样做将会被逮捕，还把青少年们指引到警车中去。要不是由于队伍里没有成年人，这完全就好像长达整月围攻中的另一天，直到突然间，第二队两两并肩来的示威游行者们在教堂前门中涌了出来。不久，紧接着又跟着来了一群——一群接一群。怀亚特·沃克通过对讲机和他的助手们对话，传达给其中一些团体转向不同的路线。警方的无线电设备噼啪作响，纷纷要求派出更多辆警车。调度员们放下了自己部门的骄傲，呼吁贝利警长派出县级代表。示威游行者们仍然不断涌出来继续前行，其数量超过了官员的数量，把他们都包围了起来，这样一组20名的青少年还是顺利突出重围，到达市政厅。他们几乎都要消失在繁华商业区里，一支警察分遣队才开始追了上去。

在一支打着旋儿般前进的黑人儿童队伍中，在一片蓝色制服、纠察标记中，一位焦急的警察在横跨第十六大街的休战线对面，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喂，弗雷德，”他打电话问道，“你那里还有多少人？”

“至少还有 1000 人！”夏特沃斯喊道。

“全能的上帝啊！”那位警察感叹道。

记者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乔治·沃尔是位看起来不好惹的警长，面对 38 名儿童，他尽最大努力去劝说、恐吓他们离开队伍，但是孩子们都说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问及一位爬进警车的小女孩年龄，那个瘦小的女孩大声回答说她 6 岁了。城市消防员也来帮助控制这场游行示威活动，有一队游行的儿童看到那些高压软管后，恐慌地沿着第四大街四散逃开，然而接着他们又成功重新组成队伍。在英格拉姆公园欢呼着的旁观者中，一位老妇人突然跑出来，沿着被逮捕的队伍疯跑，口中欣喜若狂地喊着“唱啊！孩子们，唱起来！”4 个街区之外，警察们追上了 20 名绕过封锁线的学生。他们带着写有“隔离是一种罪”和“不吃，不用美元”的标牌。他们此时此刻的出现，对限制城市黑人区动乱的目标是一个打击。

在警车和治安人员的巡逻警车都用尽之后，指挥官们召集来校车，带走了一车车逃学的学生。一切到了 4 点钟才结束。街道清出来之后，那股能量又创造了消失到监狱之中的惊人现象：有 75 名之多的学生挤进了 8 人间的监狱。等到不再有队伍从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中走出来，早起的鸟儿们开始排队进入在弗雷德·夏特沃斯老教堂举行的群众大会中，那教堂就在几个街区之外。牧师埃德温·加德纳是负责做开场的牧师，他调动起所有人热情洋溢的情绪——大家一起唱歌、祈祷和献祭。“如果你们身无分文，那么会后来见我。”他说道。督查刑警在 6 点钟就座之后，教堂中有 1000 人；而在夏特沃斯和金抵达之后，教堂中的人数接近刚才的两倍之多。“今晚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伯明翰。”沙特尔沃斯说。

教会中充斥着传言。像所有其他牧师一样，沙特尔沃斯心烦意乱，没办法做出正常的演讲。群众的热情被常规计划的瓦解激发起来，丧失常态这种现象本身就昭示着情感巨大的波动。“我今天一直深受鼓舞，并且很感动，”金宣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采用怀亚特·沃克监狱登记的数字，他宣布在那一

天已签署入狱的儿童数目精确到 958 位，其中约有 600 人还在拘留中。出于策略上的原因，他说自己坚信一个消息——好几次有一大群新的年轻人补充进狱志愿者队伍。“如果他们认为今天是结束，”他说，“就大错特错了。”他介绍种族平等委员会的主席詹姆斯·法尔默，他参与过由种族平等委员会和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共同组织、为纪念威廉·摩尔的自由行活动。“我们已经准备好，团结在你们身后。”法尔默告诉伯明翰的群众。

金透露说，迪克·格雷戈里刚同意参加周日那天的伯明翰运动。欢呼声响起来——给这位为绿林镇带来全国宣传效应的喜剧演员喝彩。金还宣布说，戴安·纳什和参加摩尔游行的其他成员都已被逮捕。最后，他介绍了当众跳到讲道坛上的詹姆斯·贝弗尔。“周一晚上没有会议，”他喊道，“因为每一个黑人都会在星期天晚上坐牢！”在无休止的狂野欢呼声中，贝弗尔发誓要在周二尽快结束在伯明翰的种族隔离，要“尽快回到密西西比州摘棉花”。在对孩子的勇气进行讲道时，他忽然唱起那些自由之歌，那些歌正是孩子们在进入警车的路上所唱的。300 多人自发站起来，期待一场去向监狱的游行。他们无法等到第二天，于是纷纷在教堂里的过道中走来走去，教堂中回荡着雷鸣般的歌声。

那场较量在 5 月 3 日，周五那天变得愈加激烈。中午，焦急的父母和好奇的围观者挤在凯利·英格拉姆公园围观，而千余位年轻人在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内接到了出发令。在他们对面，伯明翰穿制服的当局官员集合在校车、消防器材和警察巡逻车前面，阻塞了向东去的交叉路口。第一组的 60 名学生唱着歌从教堂中列队而出，队长 G.V. 埃文斯在第五大道和第十七街的拐角处和他们碰面。这次并没有谈到逮捕的事。城市监狱和县级监狱都已爆满，因此这次的目标是让这些游行离开市中心商业区，而不是逮捕他们。奉布尔·康纳之命，埃文斯队长指着身后的消防软管，让 60 名学生赶紧分散开来，并说“否则的话你们会被打湿”。

学生们不断唱歌，于是埃文斯队长示意消防员用喷雾嘴喷射他们。水打湿了

游行者的身体，他们震惊不已，几乎所有人都撤退了。在他们身后，英格拉姆公园的旁观者面对被打湿的威胁，本能地退缩了。埃文斯通过扩音器，下令让人们从该地区撤离，而水柱仿佛是在有效地执行他的命令，直到他和其他人都开始注意到仍在顽强抵抗的学生。60人中大约有10个人仍旧坚守阵地。他们已经湿透了，全然顾不上自己的体面，他们用“阿门”的调子只唱“自由”这一个字眼，由于消防员集中消防软管朝向那些唱歌的人，那些撤退的人群又重新回到了较量的边界。随即消防员又向那些坚持抵抗的人进攻，用水近距离攻击他们。那些顽抗的人在人行道上坐定。这是民权运动洗礼的时刻，是伯明翰洗去曾对抗种族隔离的污点所做的最后努力。对于埃文斯队长和消防员们来说，增加足够的水压对抗人行道上的物理抗性，这纯属机械问题。特别监测枪非常适合这项任务，它被安装在三脚架上，通过单喷嘴的水流强行从两根软管中射出来。消防部门把这些附属装置宣传为远距离灭火的奇迹，这些能够让砖块从砂浆中松动；在100英尺的距离，就能够从树上把树皮剥下来。

A.G. 加斯顿是数以百万计被监测枪转变的第一人。城里主要的黑人商人在与大卫·范恩电话交谈，大卫是布尔·康纳城市宪章运动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们经常这么做——两个人低声抱怨着，说金沿街示威游行活动暗中破坏他们缜密又非常隐秘的改革联盟，毁掉了他们的时机。如果成功的话，金将迫使加斯顿和其他有名望的黑人领袖赞同他的战术，此举将与城市中紧张的白人温和派相疏离。如果不成功，金将会让种族隔离者进一步加强。无论哪种方式，游行示威活动对范恩和加斯顿来说都是一个诅咒，他们已经摸索出一种方式，用计谋让金悄悄出城，以免给予布尔·康纳安慰。那个周五下午，加斯顿突然让范恩原谅他。从他在加斯顿大楼的办公室往下看，可以俯瞰英格拉姆公园，他看到有让他百万富翁夸口失效的东西。

“范恩律师！”加斯顿大喘着气说，“他们已开始把消防软管对准一个黑人小女孩。他们把那个小女孩卷到了街中央。”

监测枪让人们的四肢因失重而痉挛着，令整个身体好像狂风中的碎片一般。就这一瞥让加斯顿停止了电话广播。外面勇敢的高歌转而变为阵阵惨叫，围观者向软管投掷砖头和石块。水把他们驱逐出界后，其中一些人潜入建筑物中，这样他们能够从上面丢掷投射物。最终，他们击中了两名消防员，还有一位是《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查尔斯·穆尔。

在石头和软管不定时的嘈杂对决中，年轻的游行开始从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中陆续涌出。沃克、贝弗尔、安德鲁·扬，以及其他监管人员都指示出远离冲突的路线，以躲开消防软管及与暴力的污染性关联。他们的策略让警察指挥官进退两难，软管被他们猛烈的投掷和旁观者的击石行为所压制，而游行者们却从英格拉姆公园的另一端逃向市区。而且没有足够的软管可以覆盖应用到两面，特别是在监测枪数量减半的情况下。警察分队确实成功拦截了游行，并让他们登上了通往监狱的校车，但这意味着当局的计划失败了，因为他们原本是要击退示威者，并非逮捕游行示威者。更糟的是，从指挥官的角度来看，城市集中的武装力量也正分崩离析。在与布尔·康纳协商时，他们决定，把黑人再一起开车载回来。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一种更具威慑力的武器，这武器还要比软管更好移动。

警方指挥官在英格拉姆公园距离教堂最远的一角，部署了8个K-9单位军。大家一看到狗，混乱的人群中立刻发出恐慌和愤怒的尖叫。很多人立刻逃跑开来，有些人朝狗和牵着狗的人扔石头，有几位鲁莽的少年像斗牛士般挥舞着湿透的衣服。接到命令后，官员们牵着狗冲向前，距离人群更近了。然而由于人群聚合得过分密集，很难驱散开来，咆哮着的德国牧羊犬突然朝踉踉跄跄、畏畏缩缩往后退的人们冲了过去。那群狗咬伤了3名少年，孩子们伤势严重，需要住院治疗。其他目标人员惊恐地尖叫着，变得毫无秩序，有的消失在西部黑人区，有的躲到教堂中避难。大部分K-9单位军依旧紧追不舍，但其中有几个掉转方向，驱散大批冲回空地的黑人——那些黑人正盯着全套救护车、警棍、警车，看着逮捕

场景、遥远的示威游行以及从监测枪上悬下来的粗水管。在赛马士饭店外面的街角，两支警犬队紧紧跟随在一群敬畏的围观者后面，围观者们丝毫没注意到后面的那群狗，直到有一位牵狗人捉住一位 16 岁的男孩，并且把他飞快地带到一只德国牧羊犬的尖牙下。一位美国联邦通讯社的摄影记者站在一旁，捕捉到了这象征伯明翰的一幕：一位戴着墨镜的白人警察紧抓住一个黑人男孩的衬衣领子，另一只手松开牵狗的绳子，让狗可以向前冲，狗的牙齿咬进男孩的腹部。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男孩本人——他又高又瘦，穿着时尚，向那只正袭击他的狗方向前倾，一只胳膊顺从地耷拉在一边，朴实无华的脸上带着镇定的表情。这幅照片所具的形象力量，隐藏了极大的讽刺。受害人是年轻的沃尔特·加兹登，虽然他并没有沉浸在非暴力的纪律中，也并没有打算成为示威游行队伍的一员。他身上所穿的帅气开襟衫是他在 C. A. 斯科特兴盛大家庭的地位象征，他的大家族非常蔑视金的游行示威活动。他的家族在亚特兰大还有伯明翰发行的《世界报》都无视 C 计划，其坚决程度甚至超过了伯明翰的白人报纸。虽然这残暴攻击的意象如闪电般击中了美国人民的心，沃尔特·加兹登的反应仍埋在种族更深层次的涡流中。他十分忠于自己的家庭，随后他说，德国牧羊犬把他吓了一跳，他在旁观时，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和一帮黑人“坏群体同流合污”。他决定离开这些街道，准备上大学。

下午 3 点钟，警方巡视员冒险进入教堂内进行谈判。从战略家的视角看，迄今为止这番努力受相对温和的小规模冲突所限，K-9 单位部队已经转向消防软管的控制向量，并把黑人驱赶出英格拉姆公园，一直赶到对面的教堂中。只有一半的黑人团体离开了他们的监狱游行队伍，其中约 250 人已被逮捕。警犬和警察部队又重新聚集在外面，严密封锁那些在 500 名示威者中，仍然试图形成队伍的被打湿的大量愤怒旁观者。在那种不确定的情势下，金非常乐意休战一天，因为他知道政治动荡已经开始了。他在混乱中抓住了时机，亲自向在纽约的克拉伦斯·琼斯与一长串应当面被告知这天发生的事件的人致电。下午 3 点 57 分，联

邦调查局窃听记录显示，琼斯对斯坦利·利维森气喘吁吁地做出概要总结，并从金那里得到一个紧急要求：即要在“一小时之内”，利维森为肯尼迪总统和罗伯特·肯尼迪起草电报。利用孩子去游行让利维森焦虑不安，他的良心饱受谴责。他非常慌乱，着手写下一篇有些尴尬又过分深奥的电报，金全然用不上。结尾说“你会允许伯明翰暴力复发，来威胁我们的生命并剥夺我们的权利？”

伯明翰的白人领导争相阻止公众对金抱以同情感，强烈谴责他利用儿童。市长鲍特韦尔告之市民：“不负责任又轻举妄动的煽动者”把孩子当作“工具”，威胁了生命和财产安全。“凡人格高尚的伯明翰人，无论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都不会去创造这一危险，”他宣称说，“我们不促成它。我们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能容忍，你们也不能容忍，利用这些孩子来达成目标的行为。”法官塔尔伯特·埃利斯的少年法庭充满了年轻的黑人被告，他说，那些“误导这些孩子”进行示威游行的人“应该进入监狱”。在华盛顿，罗伯特·肯尼迪则用更加和谐的语气发表言论。“继续拒绝给予黑人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会造成越来越多不可避免的动荡事件，”他宣布，“不过，目前示威活动的时机仍有待商榷。学龄儿童参加街头示威是危险的事情。若造成孩子受伤、致残或死亡，没人能担负得起。”肯尼迪强调，伯明翰的不公正属于地方问题，而不是联邦政府的责任，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真诚地进行谈判，而不是在街头进行解决”。这些抨击来得太晚了，已不能再让金感到慌乱。在这些刻薄的评论中，金和其他牧师都发现，对黑人儿童的温柔牵挂从来没有引起过如此之多的忧虑，就是他们从前说很糟糕的学校或种族隔离所造成的伤害时也没有像如今这样。

伯克·马歇尔曾在那天早上打电话要求游行示威活动暂停，又再次打来电话，更加迫切地进行呼吁，还代表肯尼迪政府让金必须现在叫停，因为黑人投掷石头的事件已经促成了暴力行为。金拒绝了。尽管他非常憎恨马歇尔的态度，但与此同时，他感受到马歇尔声音中的痛苦要比确信多。金把这种痛苦理解为华盛顿巨大政治压力的预兆，进一步确证伯明翰运动正渐渐减退。惰性的包袱正在转

移。马歇尔听腻了 A.G. 加斯顿关于小女孩被喷倒在街上那件事的牢骚声，很快便感知到对金的异议在伯明翰黑人世界中的蒸发。一股汹涌而来的内部力量让一条国内消息传播开来，即 1000 名黑人儿童已在两天之内游行到监狱中去。在广泛的美国公众可以开始吸纳令人不安的新颖性、暴力、普遍报信者前，这股力量带着消防水管和朝孩子们放出狗的照片飞速奔向了人们的起居室。马歇尔的痛苦和伯明翰白人领导人的强硬一样，都反映出潜在的防御性，他们对黑人儿童福利的呼吁把这些都朝向金的战场。期待并经历这些复杂变化，是历史运动的构成要素，已让他们产生了传奇般的甜蜜兴奋感。

金知道最关心孩子的人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都在下午涌进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加入数以百计的游行者和围观者中，只为等群众大会的开始。还远不到晚上，大教堂就已经挤满了人。奉献盘的传递花去了整整一个小时，会众的精神如此之高，安德鲁·扬走出来做了一个劝诫的讲话。“我们开展一个非暴力的运动，”他说，“但它还不那么足够的非暴力。”他警告说，再多挑衅也无法让投掷石块合情合理。“我们不能蔑视警察，即使他们带来了狗，”他补充说，“……必须称赞他们。毕竟警方不知道如何处理，用爱和上帝的力量来控制局面。在这些示威游行活动中，我们必须告诉人群要守规矩。”

金走进来之后，全场响起了狂暴的欢呼声。他也宣扬非暴力，但一开始，他的演讲确实是不同寻常的随意和活泼。他对牧师们开玩笑说，试图用水管击退黑人信徒是徒劳的，还预测布尔·康纳甚至会来承认“他们不但在水中站了起来，还走到水正下方站着”。“那么狗呢？”他问道，“嗯，我会告诉你。我长大以后，会被狗咬，”他停顿了一下，发出了令人惊恐的高呼，“白白被狗咬！所以，我不介意因站起来为自由战斗而被狗咬！”

他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白人都充满敌意，他们的运动触及遥远的人群。“不，我们在战斗中并非孤立无援，”他向大家保证说，“你们不要受任何人影响，觉得我们是孤立的。”伯明翰已经在全国广播公司录制了亨特利·布林克利新闻

节目，他说道：“救援正在路上，它们就要来临。”接着，他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扫除了终止示威活动的压力：“昨天是进攻日，明天将是双倍进攻日！”

监狱游行将在周末继续进行的公告引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接着金继续用几乎平稳的语调说了下去，中间不时带有雄辩的波澜。他重复他的意愿，来对他最终重审的运动4项基本要求进行交涉；只是在最后，他才提到曾点燃城市情绪的小小催化剂。“现在，最后，你们的孩子，”他说，“你们中很多人的女儿和儿子都在监狱里，我敢肯定，今晚许多家长都在这里。”然后，他只简单说了一句：“不要担心孩子们。”单单那一句话便让绝望的恐慌和散布的谣言忽然止住了——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关于老鼠、殴打、混凝土床、溢出的脏马桶、监狱袭击事件以及性病的粗鲁检查。“他们在为自己所信仰的一切忍受，”他说道，“他们如此承受，是为了让这个国家成为更好的国家。”人群安静下来，似乎不只因为他的话，还有他的淡定从容。把所有事情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他触到了他信仰的核心。事实上，他的伟大冒险看起来那么有希望，让他几乎陷入了一场白日梦中，他向孩子们的父母保证，孩子可以忍受伯明翰监狱，并且一场“精神历程”是孩子们大受欢迎的，甚至是他们渴望已久的。“监狱环境可以帮助你们升华到日常生活中的瘴气之上，”他说道，忽然一个想法让他岔开话题，“如果他们想要一些书，我们会带给他们。”他承诺说：“我每次去坐牢的时候都会阅读。”

午夜过后很久，金和他的顾问们都还没有睡，策划着周六的游行活动。幸运的是，有这么一大批志愿者，计划着如何区分并绕过布尔·康纳的封锁线。他们的目标是再把至少另外500位年轻人弄进监狱。整个夜晚，外部世界的注意力都强有力地集中在他们身上。发怒的伯明翰市民将一座摆在天主教堂庭院内的金的雕像摆成受绞刑的姿势。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都在大幅报道周五暴力事件的照片，早间的《纽约时报》精选其中的3张照片叠放在两列宽的头版上：底部的照片上，美国州警察正拉着种族平等委员会和美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的“自由行车手”，前往位于亚拉巴马州佩恩堡的监狱；中部的照片中，伯明翰的消防员努

力把监测枪对准示威游行；最上面的照片，警犬的牙齿陷进沃尔特·加兹登的腹部。加兹登那张照片的视觉冲击力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和肯尼迪总统一样，数以百万计的读者除了这张照片，看不见其他的。那张照片让他感到“恶心”，在白宫，他告诉一位早晨的召见者，那是位白宫中防空署的自由党成员。虽然他对伯明翰事件上缺乏法律权威，肯尼迪补充说，就在那一天，他派伯克·马歇尔和乔·杜兰去做调解人。这项总统的使命，加上已有的暴力威胁，赋予了伯明翰对抗性的地位，极大地刺激了记者的涌入。像《亚特兰大日报》的帕特·沃特斯一样，《时报》的克劳德·西顿放弃了威廉·摩尔的游行，转而去支持伯明翰。对于曾在绿林镇的西顿来说，这标志着伯明翰运动在一个月内第二次让一个进行着的故事泄了气。沃特斯不情不愿地来到伯明翰，他对在威廉·摩尔死亡之路上跋涉着的孤独学生拥有最初的同情，还连同他对对手的了解，让他坚信孩子们的游行是愤世嫉俗及反复无常的金为削弱民族平等会议和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势力而进行的又一次攻击。

周六下午，集中警力的民警队伍等待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的第一次突袭，怀亚特·沃克在5个街区之外的地方设计了一场惊喜。作为信号，几组长相很普通的年轻人出现在市政厅外，就在那时，才有一个女孩举起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爱上帝和你的邻居”。布尔·康纳亲自出面调查，他被诡计激怒，命令所有25位黑人撤离到监狱中去。几乎就在同时，一名女子和一个小女孩没有带横幅，跪在市政府的台阶上祈祷。她们也打算动身前往监狱，于是康纳命令他的手下逮捕并且驱散在市政府附近的各个“巡回黑人”小组，无论他们有没有纠察标志。他这么做，不但不会让黑人填满他的监狱，还创造了一张种族的法网，远远超出了詹金斯法官的法院指令。

金身边的策略家们采取转换为游击战躲避的方式来达到战术优势，然而康纳很快进行了打击报复。当他的手下发现年轻的游行示威者们从两所不同的教堂中三三两两地溜出来时，他便派他的人手把两所教堂都封锁起来。在150个人相继

被捕之后，封锁让走向市政厅的志愿者供应枯竭了下来，对抗从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转到了对街的凯利·英格拉姆公园。围观的黑人成年人看到警察把年轻的示威游行锁在里面。当他们看到监测枪向几位从里面逃出来的年轻游行扫射时，愤怒一下子蔓延开来。一连串石头很快像雨点般砸在了身穿制服的官员身上。

现在原本的运动优势转为劣势，运动的领导人意识到他们年轻的游行饱受“非暴力”观念的教育，而如今他们被锁在教堂内，外面的成年人用石头、刀子和枪武装着自己在附近自由行走。詹姆斯·贝弗尔发出警报，说有一场暴乱，将破坏他们引起反对种族隔离民意的所有努力。他设法说服一位警察中尉借他扩音器用。“全体人员撤离这个地区！”他喊道，“如果你们不打算以一种非暴力的形式游行，就马上离开！”贝弗尔像一只牧羊犬般到处飞奔，有效地驱散了制造麻烦的人。那些人中有些人把他当成了组织少年们游行的狂妄年轻牧师。愤怒平息之后，他冠冕堂皇地宣称，他要为接下来的一天暂停所有游行活动。这样这场运动可以为了让周一产生巨大推动力净化自身。那天晚些时候，贝弗尔和怀亚特·沃克之间私下里传了些激烈言论，沃克认为贝弗尔是位不顺从的卖弄者。金开始安排他这两位急躁的助手休战。他在理智上支持沃克的同时，赞许贝弗尔的一天中止计划实为紧急情况下的明智之举。然后金飞回家去埃比尼泽教会布道，逃离了这种紧张局势。

伯明翰在一个周末里就膨胀起来。和伯克·马歇尔以及许多记者一行，各行各业的活动家都前来紧紧跟随这场震撼人心的儿童游行活动。同和平主义者戴夫·德林格所做的一样，艾拉·贝克从纽约飞来。在威廉·摩尔游行中被捕的全国学生统一委员会成员詹姆斯·福尔曼，被保释出来后直奔伯明翰，就像一个月前离开绿林镇监狱时那样。迪克·格雷戈里从芝加哥前来，混杂在新来之人中间的还有两位民间歌手盖伊·卡拉万和琼·贝兹。卡拉万此行的明确目的是为“民间之路”唱片公司来记录这场群众大会，而贝兹是来做一场音乐会的，他们在加

斯顿汽车旅馆偶遇。贝兹为对民权运动的好奇心所煎熬，这就是她预定了一场南方黑人大学音乐会旅程的原因，但她对跨越城市里蓄势待发的种族障碍感到非常顾虑。尽管周日是休战日，佩戴头盔的警察仍然大规模沿街巡逻，围绕在那些想要在白人教堂中做礼拜的黑人周围。

贝兹非常乐意在卡拉万的陪同下去参加早祷以及下午在新朝圣者教会举行的群众大会。在那里，贝兹作为2000位黑人中少数的一位白人，首先听到了黑人灵乐。伯明翰运动的唱诗班与阿尔巴尼教会自发组成的无伴奏歌手们相比，算是一个优雅的团体。团队中有一位指挥，卡尔顿·里斯，一位风琴手，里面还有些颇具名气的明星，比如玛米·布朗和克莱奥·肯尼迪。但其自由音乐仍然让一位如贝兹的民谣纯粹主义者感到大为吃惊。那里有甜美的灵歌、无节奏感的蓝调独奏和雷鸣般的福音歌曲——都被即将来临的去向监狱自首行动所加强。这股力量融化了贝兹外族人的分离感，所以她喊啊哭啊。她近距离观察了欢快情绪的发作，还简单地注意了来来回回的招待员。司机载着她到达避风港般的全黑人学生迈尔斯学院时，贝兹又惊讶地发现她演唱会的观众根本不关心城镇里炸开锅的抵抗运动。伯明翰世界，并不掩饰这场示威活动，派出自己的一位记者到第一场由白人名人在迈尔斯学院所开的演唱会，评论员称赞她的表现，虽然刻薄地指出，该歌手居然在舞台上非常随便地脱掉了她的鞋子。

回到群众会议之后，心烦意乱的安德鲁·扬打断了会议进程，宣布伯明翰警方已在教堂的台阶上逮捕了盖伊·卡拉万和他的妻子坎迪。“在运动中唱的那些歌，就是他们教给我们的。”扬哀悼说，并补充说，警方越来越紧张、下流并且行事不可预测。也许布尔·康纳会把这场停战理解为运动软弱的象征，并且试图恐吓黑人投降。警察把卡拉万拖进监狱，詹姆斯一副生气的样子，和伯纳德·李飞快地大踏步走到讲坛上去。“我们厌倦了这个烂摊子！”他喊道，“让我们都振作起来！”他挥舞着双臂，指挥着拥挤的教堂内四处游走的会众，让他们去往几个街区外的城市监狱。他们鼓励运动中被囚禁的人，同时也向警察们展示他们并

不害怕。贝弗尔几乎咯咯地笑了起来，认为这种自发的示威游行活动不会违反他自己所强加的休战协议。“我们不要游行，”他大喊，“让我们走。”

所有会众都没有明显异议，他们站起来的时候音乐忽然飘升起来。在讲道台两侧，牧师们簇拥在一起争论问题。怀亚特·沃克对贝弗尔不合常规的最新突击感到十分气愤，贝弗尔曾取消了当天的示威，如今却又呼吁要恢复它。沃克认为眼下每种情况都十分不利：金不在镇里；会众大部分是身着节日盛装的成年人，完全没有做好去监狱的准备；并且康纳警力的粗暴对待会打击他们第二天监狱游行高潮的士气。最糟糕的是，从个人角度来看，贝弗尔已经傲慢地绕过伯纳德·李，回归到他叛逆的自发性情中去，由于在过去的两年中，李从前一直是沃克的保卫员，这反映了沃克不良的准则。贝弗尔坚称他们必须不能允许警察在非暴力运动中植入恐惧感，周围的牧师一直催促他们，要为了紧迫的现实把争端放到一边，群众集会在毫无领导者的情况下穿过教堂大门。沃克通过下令不允许贝弗尔领导队列，挽回了一些管理权——他不能冒着在周一青年游行之前就被监禁的危险。从牧师志愿者中，他选择了夏特沃斯工作多年的同事查尔斯·比卢普斯，随后比卢普斯跑着赶上了队伍领头。

他们在受惊警察的众目睽睽之下走出了新朝圣者教堂，警察刚从第六大道前的人群中撤退出来，听候命令。警报声响起。好奇的人们坐在门廊上，穿过城镇的黑人区，望着庄严的队伍走过了5个长长的街区。警车及消防设备全部到位，只差将人们逮捕到城市监狱中。消防员迅速妥当接洽，几个警察单元阻挡住交通，其他人则草草地驱逐了这个地区所有的旁观者，包括义愤填膺的记者。黑人队列的最前端触到了路障，布尔·康纳亲自走出来，走到缠结着的消防软管中来抵抗他们。

待靠近后，比卢普斯在人行道上跪，2000人中的许多人也在他的带领下跪了下来，那情形如同一排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伸展着一路回到新朝圣者教会。在一场简短的祈祷后，比卢普斯站起来，大喊道：“打开你们的水管！松开你们

手中的狗！我们会一直站在这里，到死为止！”声音大到远远站在一边的记者都能听到。在射程范围内的许多黑人颤抖起来，一个女人翻身晕了过去，但几秒钟后，有些人便注意到，三脚架附近的消防员们仍然没有行动，因为在近距离平射射程中根本攻击不到那位牧师。为了挽回颜面，康纳愤怒地咆哮着重复他开火的命令，大家立刻安静下来。有人听到他说：“该死的！打开软管！”很快沉默把他也吞噬了。又过了好几秒钟，怀亚特·沃克小心翼翼地接近康纳身旁的两位警官，低声说黑人不需要游行到伯明翰的白人世界中，甚至不需要到城市监狱去。他建议说，他们应被允许到街对面只为黑人开放的公园中做祈祷仪式。

“我们继续前进！”比卢普斯拖长声音说道，他仿佛处于恍惚之中，继续朝前走着。远远望去，迷茫的记者们感受到紧迫感消失了，然后看到沃克正朝他们走来。他轻描淡写地解释说他准许了一项常规要求，让游行者们在种族隔离的公园中进行祷告，但是对于游行者本身来说却无异于一场奇迹。比卢普斯带领那支纵队经过消防车和可怕的监测枪，跨过消防软管。在他身后的队伍中，怀疑变为喜乐，于是大家高喊“哈利路亚！”沿原路线返回。非暴力主义触动了消防员的内心，他们说，这些人已经抚平了布尔·康纳的内心，就像摩西分开红海一样。

度过兴奋并且秘密的两天之后，伯克·马歇尔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跨越种族鸿沟的事态发展。弗雷德·夏特沃斯正为从华盛顿而来的注意感到沾沾自喜，反对马歇尔在黑人和白人之间摇摆不定的行为，因为这帮助白人维持种族隔离的谈判。在城镇的另一边，马歇尔发现城市的白人领导人中充斥着如火如荼的内部斗争。他们不顾一切地消除种族无知和暴力的耻辱，想要主动去恢复城市的繁荣和声誉。这就是白人权利组织的“全部渴求”，马歇尔告诉肯尼迪总统：“他们想要伯明翰看起来像亚特兰大一样。”然而，另一边他们的骄傲让其深深憎恨黑人示威游行者，把他们当作麻烦的直接原因。在上街游行示威活动的压力下，与之进行谈判的想法非常冒犯城市的主要商人和政客。保守党拒绝与任何黑人说话，马歇尔发现，自由主义者拒绝坐下来与“局外人”交谈，尤其是金。

在那个周日晚上，马歇尔所能做到最好的事情便是把分别由温和派白人和保守派黑人的侦察队聚集起来。改革领袖西德尼·斯迈尔和大卫·范恩，再加上几位白人商人，在市区见到黑人领袖亚瑟·肖尔斯和 A.G. 加斯顿所率领的黑人。双方都感叹游行示威活动的危险性，但黑人们都支持金最初包含 4 个意图的方案，认为该方案为阻止其行动的一项必要条件。最后，白人拒绝所有那 4 个意图。但至少这是一个开始，伯克·马歇尔在方方面面继续采用他最生动和最坚持的论证，“他们应该保持谈话，”他说，“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挑选出金混乱或是不合理的要求。”他说金并不知道他想要的。在进攻日公众宣传的余震影响下，这种观点让马歇尔在战术需要方面，要促成对金目标的考虑，来平衡他对种族隔离的批评和他对金类似的攻击。政治上，它为肯尼迪政府提供了威严地位。把伯明翰的失败归咎于金这方的发言，马歇尔投射出问题解决者的权威理解，不冒险牵扯任何政府机构。

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一特征大大惠顾了金，并呼吁了从抗争中退缩的人，几乎都是因为黑人激情深不可测的爆发。这在伯明翰尤其受到欢迎，因为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并不喜欢在严峻的自由形势下公然承认无助，并且这自由还赢得了全世界的注意。甚至在私下里，马歇尔和他同行坚持他们自身的形象，把自己塑造为穿入金苦恼迷雾的引导者。过了几天之后，罗伯特·肯尼迪在白宫强调了他和全体内阁的脑力隔阂，并说“黑人领导人不知道他们示威游行的原因。他们不知道他们游行是否为了摆脱布尔·康纳，他们游行是否为了商店……我觉得有些游行的人一定不知道是为什么而游行，也没有一个白人团体知道他们游行的原因”。一年后，在与肯尼迪共同口述历史的时候，马歇尔说他去伯明翰时，“我跟金谈话并问他所追求的是什么，而他真的对此一无所知”。20 年后，马歇尔回忆说他非常难以和金协商，因为他没有具体行动方案。他想要的只是达成某种目的。

5 月 6 日周一早上，在约翰·德鲁的家里，马歇尔花了两个半小时，试图说服金，下午的示威游行活动将会阻碍目前正在进行的谈判，绝非起到帮助作用。

那是事实，马歇尔承认说，白人商人会通过自己的权利，同意金的一些要求；但如果他们去做的话，城市将会在种族分隔的法令下告发一些商人也会是事实。因此，在此时和其他所有的危急时刻，商人有正当理由感觉不情愿，因为他们不知道妄提要求的政府会认为哪一项是合法的。法院从开始裁定鲍特韦尔与康纳的案子，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几天了，所有的当事人，包括联邦政府在内，会有些偏袒的盲目性，并且在此期间很多游行只是激起别人对重大暴力危险的怒火。对于这一切，金回答说他认为伯明翰的商人有能力说服任何城市政府，包括康纳的政府。在奥尔巴尼，他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他一直把他的游行对准政客，而那些政客并不需要黑人的投票；他们需要商人，需要和黑人进行贸易。既然示威游行得到了更好的专注，他会在任何时间进行谈判，但他不会仅仅基于后来谈判的承诺便停止伯明翰运动。每次马歇尔都引用一条操纵商人地位的逻辑，金回答说，那种压力，甚至恐惧，一直在提高他们的动机。在大约中午的时候，马歇尔离开德鲁的家，记者们探出关于这场一直很有意义，但本质上却十分徒劳的会议的评论。

红色消防卡车和监测枪摆在适当的位置，金阻止了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的行动，但警方部署另外透露，布尔·康纳已经改变了他的策略。为了减小与不在运动中黑人暴徒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他命令部下封锁凯利·英格拉姆公园的交战区域——那里如今是片饱受践踏的方形草坪，被头戴钢盔的警察包围。几乎非常彬彬有礼地，通过补偿的方式，康纳已允许大约 2000 名黑人观众聚集在教堂附近的人行道上。虽然几行备用校车表明康纳正打算试一试劳里·普里切特的“欢迎到监狱策略”，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金对在教堂内部形成队伍做非暴力方面的讲道，詹姆斯·贝弗尔则到外面去进行最后的会谈。贝弗尔伸出手，来握手达成协议，公开命令警长证实如果商人们整齐有序的话，他们不会把消防软管对准商人。警长在那时和贝弗尔发展了一段跨越鸿沟的了解，他注视着他伸出的黑色手掌时，不禁生硬地笑了一下。他回答说警察不会采取极端的武力，如果采取

的话，他甚至都不会握手言和。

接到信号后，迪克·格雷戈里带领第一批共 19 位孩子走出教堂。警长在下常规的逮捕警告之后，召唤一辆警车，于是年轻人在格雷戈里身后，高唱一曲英勇的鼓励之歌。他们按照歌曲《老灰母马》的调子，高唱：“我们不怕监狱 / 因为我们想要自由 / 想要自由 / 想要自由……”他们排成一队蜿蜒前行，进入警车，而另一组人从教堂中走了出来。自那之后，他们连续不断地出来，歌声非常响亮。警察指挥官只是朝他们示意警车和巴士的位置，省掉了一切对话。

自进攻日之后，年纪大一点的人第一次加入庞大的队伍当中去，其人数超出了示威游行的一半。有些父母也和孩子一起进入了监狱。其他人要么被恐惧所困扰，要么持反对意见，他们把孩子们从队伍中强行拉了出来。最初，孤立的悲痛和愤怒爆发只呈现在少数迹象中，看起来被警棒夹击下的游行队伍根本没有在列队行进，而旁观者的欢乐正逐渐消退。看着朋友和亲戚们走向监狱，连续两小时内都是以每分钟 10 位的速度，一部分人变得忧郁、愤怒，这中间或许还混杂着他们不能把自己交付于监狱的愧疚。人行道上放置着一些瓶子和石块，距离那些接到阻止命令后在高温下劳作的官员们很近，他们不止一次脾气大爆发。在新闻摄影记者的面前，其中 5 个人把一位过度疲劳的黑人妇女推倒在人行道上，并用膝盖顶她的喉咙和手臂来压制她。

金的助手，担心一场暴动的发生会让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暴力一日逮捕蒙羞，于是在下午 2 点 40 分跑出去，命令一切停止下来。“今天到此为止！”有一个人喊道，催促黑人和警察都回家。已经有几乎 800 人从教堂中走出来行进到监狱，200 多人从位于城市商业区令人惊讶的纠察线上出发，到达同一目的地。第二天出现了一条大标题——“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震惊伯明翰！”《芝加哥卫报》说——金的手下开始多次召集新人向监狱进发，来替代已经在监狱的人。贝弗尔说他们已经为第二天准备了 6000 人。他和其他领导者指挥人群进入圣詹姆斯浸信会教堂的群众大会中，那里在夜幕还未降临之前就已经聚满了人。

整场运动即将变为一场动乱。一个事件的过去搅动到其他事件的后果，以及涟漪般扩散长远的大众传播。

在纽约，自从1960年，广告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沙利文和《纽约时报》诽谤案起，斯坦利·利维森就开始致力于建立第一个报业募捐集会。在那两天假期中，从他第一眼看到《时报》刊登的照片中，警犬正在攻击沃尔特·加兹登，利维森就与杰克·奥德尔不断谈到要如何利用这个机会为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赚钱。奥德尔说他大量邮件已经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民意转变。邮件列表已经多次产生了预期回报。10美元的捐赠突然转而成为大手笔的捐款。皇后区的一名女士寄来3000美元；还有一张单子是从加拿大寄来的一大笔钱。这些早期迹象让纽约收发室陷入混乱状态，也让奥德尔肃然起敬。在他的赞同下，利维森准备好一则广告，但在周一下午——就在第一批游行去伯明翰监狱的几分钟前——广告公司的员工打电话给利维森告诉他：“那帮《时报》的浑蛋不肯刊登那则广告。”

利维森让克拉伦斯·琼斯参与进一场电话谈判，琼斯在和他认识的、参与过沙利文案件的《时报》律师们谈过之后，记录说：“他们想要开始采取涉及暴行以及伯明翰所有关于种族隔离和歧视的种种。”尽管这些已发表在《时报》新故事的大标题和副本中有所缺失，利维森非常实际，不会浪费时间去做争取。他说律师事务就是要有所保守，并且《时报》非常害怕再次因为金那有争议的广告而被诉讼。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发出去一则广告，他说道——几乎任何提到金、伯明翰和捐赠地址的广告都可以。那天下午的逮捕行动结束没多久，利维森继续和《时报》律师就一则广告的妥协事宜进行电话协商，那则广告提及伯明翰为“西半球最大的种族隔离城市之一”。联邦调查局窃听专员费力地对所有这些情况进行转录，连同他断断续续关于股票价格的对话。这样《时报》商业版和利维森达成交易，新闻编辑同意在第二天的头版发表另一篇从克劳德·西顿而来、吸引人的特别公告，大标题为“伯明翰监禁1000多名黑人”。

在伯明翰，周一群众集会上充满圣詹姆斯浸信会教友，部分人从那里一路来到圣路加教堂，最后到圣保罗教堂。5000 ~ 10000 人同时挤满了 4 个教会，被歌曲和有关监狱的褒奖所鼓舞。即兴表演在伯明翰牧师中广为流传，就像独唱者和运动的财务主管威廉·肖特里奇，其助理们都纷纷对 40000 美元的捐款记录感到非常吃惊。那笔钱的大部分都来自有名望的黑人牧师，他们在周日晚祷中把这个特别的礼物“运送”到伯明翰，他们来自遥远的匹兹堡和洛杉矶。那天晚上，弗雷德·夏特沃斯正和白人一同召开谈判会议，会议由斯迈尔和范恩共同主持，伯克·马歇尔在幕后进行操纵。同时，烦恼的亲戚们用关于孩子们被关进户外露天场所的恐怖故事连续轰炸领导人。在一场暴风雨中，詹姆斯·福尔曼突然打断金的谈话，坚持说他要亲自查看营地里的条件。金看到成群的亲戚把毯子和糖果棒丢到链环栅栏中，扔向打湿了的年轻犯人。他要求警官们给他们提供住所，叫伯克·马歇尔施压，好为这些“政治犯”施以更多联邦关注——他们称为这些人“政治犯”，然后离开前往群众集会。

他和阿伯纳斯在一起，身边围着一群送信人和恳请者，金挤进那 4 所教堂中。在圣路加教堂，活动唱诗班演奏《让我摇滚吧，上帝》，这让一位妇女非常天真地尖叫起来，布道台上的牧师小声低诉是否应采取什么行动。她在阿伯纳斯为金接过布道台后安静下来，他在舞台后面用电话密谈。阿伯纳斯一直是位非常逗乐的伙伴，宣布他可以说从伯克·马歇尔的紧张程度看出他们已经“在伯明翰自由的门槛前”。“今天，”他宣布，“我坐在这个房间，和司法部门的一位最高层人士在一起，他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无法坐下，一个椅子接一个椅子更换。”他用一种自豪又夹杂着欢快的语调，阿伯纳斯安慰大家说他们已经让白人紧张起来。“前天我们就把监狱填满了。明天他们查阅时就能看到已经到达的那个数字，不知道他们到底会做什么！”所有会众鼓掌并为阿伯纳斯自我意识的滑稽膨胀而轻笑。他告诉人们不要担心自己在监狱里的亲戚，因为他将要打电话给伯克·马歇尔商议他们的安全事宜。“如果他不去做任何事情，我会打电话给警察，”他宣

称，大家哄堂大笑，“如果警察也不作为，我会打电话给总统。”那时他看到金从一侧走过来，阿伯纳斯让整个会众为这场运动的风险一笑了之，甚至包括死亡本身。“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太畏惧死亡了，”他说道，“并且太害怕去能导致我们死亡的地方。不要去担心伯明翰监狱，”他建议那些非常害怕的人，“今晚回家你最好站在角落里，不睡觉，因为据我所知，没有地方比床上死过更多人了。”

金带着喜悦的尊重提到了监狱游行，群众大会里里外外挤满人，所以那天“你不能接近教堂”的经历比他所了解的还要深远。“还有那些谱写历史的人，”他说道，“有的人创造历史，有的人经历历史。我不知道今晚在伯明翰我们有多少位历史学家，我也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写出一本历史书，但你们注定会创造历史，你们正在经历历史，并且你们非常有可能会让未来的历史学家谱写一段辉煌篇章。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捕——为了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事业！”当欢呼声逐渐平息下来，他几乎有些难以置信地说：“要知道，现在监狱中大约有 2500 人了。”

他诚挚地，又几乎小心翼翼地把话题转到“爱”上面。现在我们要说在这场非暴力的运动中，你们必须要爱这位白人，他告诉他们。大家大呼“好！”他又说：“上帝知道，他需要我们的爱……我要对你们说当我谈论起爱这个字眼，我不是在探讨情绪上的胡思乱想。”他恳请他们包涵，再次列举出关于“爱”的 3 个希腊词汇。这一次他增加了一个小小的新扭转，他陈述了关于性爱和恋爱有关的世俗甚至败坏的内容。“罗曼蒂克的爱必然有点自私。”他宣称说，“你打动你的爱人，因为你的爱人有能打动你的特质。”窃笑声不时打断他那有些忸怩作态的表述，直到他继续谈到教友之爱。“当你的爱上升到这个层次，”他宣称说，“你就会爱那些打动不了你的人。你会爱那些你并不喜欢的人。你爱那些做出让你反感之事的人。你爱每个人，只因神爱世人！”

几秒钟后，金匆匆离开，赶往最后一场群众集会，唱诗班匆忙唱起一首失控版本的《九十九个半的人将不会做》。为了让这一时刻圆满结束，并代替金的离

场，阿伯纳斯再次接过讲道台，嘲笑金擅自教给诸如他自己的亚拉巴马本地人关于爱这个字眼。“我一直告诉他，我们知道他所说的‘性欲’的意思。”阿伯纳斯说道，用非常夸张的语气发出这个希腊单词的音，“他说‘性欲’是那种可以打动您的爱。”阿伯纳斯说这些话的语气如此诱惑，勾起了阵阵笑声，代替了观众对福音的狂热。并且他继续说可能会发生的情形，他恶作剧般地提醒他们：“它可能是你爱人走路的样子，可能是你爱人说话的样子。我很庆幸他没有告诉你究竟是什么样子！”接着，人群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阿伯纳斯不动声色地耸了耸肩。“但那是佐治亚州人的说话方式。在亚拉巴马州，我们的字典里没有‘可能’这个词，只要让大家明白地知道究竟是什么。”很快他在金之后匆匆离开，留下了非常心满意足的群众，他们认为这场运动万事俱备：有宗教、音乐、戏剧、温柔的友谊、希腊语课程、政治大变动以及全套的消遣，包括牧师开的色情玩笑。

金的策略性谈话平衡了他在加斯顿旅店的夜晚。从谈判前线赶来，夏特沃斯和他的同事们至多报告了最适度的发展情况。然而在示威游行前线，他们被庞大又几乎完美的监狱游行活动所鼓舞。除此之外，其中有些人注意到了关键性的标志：市中心商业区实际上已宣告着是座废弃商区，不仅没有黑人顾客，也没有白人顾客。他们不确定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是200名年轻纠察员所造成的景象，还是仅仅是意识上的累积让大家认为这里是日常“黑人麻烦”市区——然而无论如何，白人妇女都是待在家里的。对金身边的战略家来说，这是经济的杠杆作用，超出了任何最美好的希望。同时这也是意外的新发现，甚至怀亚特·沃克承认C计划从没计划过会有一场由白人发起的抵制活动发生，包括黑人发起的。他们抓住新机会，对伯明翰零售业展开一场涉及两个种族的全面停工，认为带领人民去向监狱或是纠察部分商店，都不如让大批抗议的黑人涌入商业区来得重要。为了做成此事，他们需要逃过消防软管和警车。做计划的人连夜进行方案策划工作，在5月7日周二早上6点钟——肖特里奇和他的助手们刚刚在临近的汽

车旅馆的房间中完成了对所提供记录的整理。那间房屋是他们为了办公舒适特别租下来的——青年领导者们开始呈扇形散开去往家和学校，去鼓舞他们非常信任的新成员。

在城镇的另一端，白人谈判代表很早就碰面了。他们知道黑人会在那天下午发起猛攻，但是布尔·康纳没地方可以监禁更多示威游行者了。对伯明翰发生的种族冲突，全国范围内的敏感性很快将迫使无论是肯尼迪总统还是华莱士州长在内的人员都向城市派兵。他们不确定哪一个会是更大的灾难，但是他们可以预见到，所有的路径都会引发经济和社会大灾难，只是时间问题。这会是西德尼·斯迈尔称之为让伯明翰蒙羞的一场“沉重打击”。他们认识到自己内部缺乏躲避灾难的能力，于是下决心对整个白人营业处所拉响警报——对整个处于半秘密状态的长者委员会中的“大骡子帮”们。他们已经排除万难完成了对抗布尔·康纳的改革。就在那天早上，谈判代表匆匆赶到电话前，号召所有成员在商会召开紧急会议。

10点钟，金在加斯顿汽车旅馆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女士们，先生们，”他告诉身边一大群簇拥的记者，“我想要简单说一下前几年发生在伯明翰的活动，在我看来已标志着非暴力运动的成熟。这是我们奋斗历史上第一次能够正确地填补监狱。”甚至就在他说话的时刻，年轻的游行者不引人注目地去向散落在商业区的12个汇聚点。志愿者往汽车行李箱中装了一些纠察标志。多萝茜·科顿、艾萨克·雷诺兹和其他人都对50人或更为少的人组成的先锋团体交付了最后的指令；而贝弗尔、沃克和较知名的领导人都像往常一样聚集在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出场。

在商会上，“大骡子帮”中的70位成员在中午之前聚在了宴会室内。受斯迈尔会长的号召，警长贝利递出了一份残忍的汇报简要叙述了法律的实施：监狱中塞满了造反的人员，这一年的预算已严重超标；街道警官即将因为不间断的重压而失控，他们没办法再进行逮捕活动，深陷嘲弄的示威游行者、无所不在的

相机镜头，包括布尔·康纳在内不稳定又分裂的最高指挥官所下达的具有冲突的命令。一位年老的前任州长，商会委员会的主席，为伯明翰吸引新产业，也站出来严肃宣布如果情形真如此之差，他们应该就在那时打电话给华莱士州长，让他宣布戒严令来“镇压全部商业”，把事情了结。一大波支持他观点的演讲发表出来，在此期间警报的响声穿过墙壁。

中午之后不久，一群由 14 名黑人儿童组成的队伍，列队走出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直奔市中心，其中一些人还拿着教科书和便当袋。这幅场景让警察指挥官十分震惊，游行示威活动直到一点钟才开始。很多警力单位仍然在吃午餐，其他人都直到十二点半才做报告，但是闲着的警察仍然设法执行他们的命令。他们阻止了学生们的去路，没收了他们的纠察标牌，指挥他们返回黑人区，并说他们可以在那里随便游行。马路对面，运动领导研究警察们的反应，随即派出“诱饵”队伍，并等待混乱的爆发。几个街区以外，受过最好训练的非暴力学生先锋团体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快步沿着人行道从四面八方赶来。不出几分钟，他们便从靠近特定区域路口的运动汽车上取来纠察标志重新戴上，总共 600 人的纠察队伍沿街上行，去到商业区中心。

警方的无线电设备噼啪作响，对准在不寻常地方小步跑的黑人构成的怪景象。教堂中，大规模记者聚集，警察单位仍然会聚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后，人们才完全接受这些暴怒的队伍和马丁·路德·金那彬彬有礼的军队没有什么关系——金的那些军队仍然从教堂往外出。即使在那时，总指挥部气愤地诉苦说这种卑鄙的突击集中在他们队伍的尾部，指挥官们仍不愿相信主要较量有可能在别处进行，但最后他们还是在警报声中把警力撤离商业区。

从史密斯大厦的观测点看去，怀亚特·沃克看到警察的封锁逐渐退去，最后只有非常少的警官逮捕并驱散他的游行队伍，然后他用对讲机下达了一个总命令。忽然，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的所有大门都打开了，涌出了十几支年轻黑人组成的队伍，全力冲刺着越过圈套，去到街对面，包围在警察身边。他们完全不

顾人行横道和交通信号，无止境的人流熙熙攘攘地拥挤着经过目瞪口呆的白人行人，阻碍了仅剩一点通行能力的交通。贝弗尔称之为他们的“自由冲撞”。第二天《伯明翰新闻报》为这场混乱发布了一个颇具诗意的标题：“警报哀号，喇叭鸣响，黑人歌唱。”

商会内部，有关戒严令的谈话让外面现实存在的伴随之事冷却了下来。斯迈尔严肃要求肯尼迪总统的代表讲话。伯克·马歇尔说道，他在伯明翰的很多谈话让他相信，戒严令在州长华莱士的带领军队的实施下，最多只会呈现出一场危险的休战。他认为黑人迟早还是要继续示威游行，因为“关键问题”和“示威游行的根源”是出于对基本宪法规定权利的否决。马歇尔轻声慢语地说话，当侵入的嘈杂声更大的时候，他的声音却越发温和了。似乎对他来说，紧迫的责任落到了年长者自己身上，他说，因为他们有力量提出一项持久的解决方法。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做零售商的后援，全力帮助他们和黑人协商解决问题。马歇尔在简短又勇敢的发言后坐了下来，他的发言至少检查了阿拉巴马人面对戒严令的混乱情况。有些声音毫无保留地为那个选择进行辩护，有些声音是为马歇尔，包括就此加入的问题，斯迈尔认为要谨慎地去进行午餐休息。

所实施的就餐没有一次如同这次一样。大骡子帮去到他们在市区最喜爱的饭店中，齐声唱着《我们终将胜利》，歌声震耳欲聋。接着，那歌声被相当于伯明翰巴士底狱的情形吞噬了。不仅是年轻的黑人闯入了市中心，他们还挤满了人行道和大街，在那里狂乱地庆祝胜利和占有。他们基本没有注意到必须围绕他们的威严商人，他们偶尔遇到那些仿佛铺满在人行道上的一片静坐者，还跨过他们。转过第一个街角，长者们观察到金曾骄傲地称之为“一面方形块黑人，一片真正的黑脸大海”的情形。报纸估计他们的数量将会突破3000人次。欢乐地曲折行进的队伍突然冲出种族隔离的商店，然后再冲进去。警察在各处有些胆怯地撕掉警戒标志。畏缩着的指挥官向商业领导解释，说他们不能继续逮捕人，因为监狱装不下更多人，另外他们只能用催泪性毒气或朝市中心场所包括商场开枪射

击，来驱散人群。

这些轰动都因充满革命暴力打击到这些长者。他们中的其中一人，便是《伯明翰新闻报》发行人克拉伦斯·B. 汉森，他匆忙走向办公室，给肯尼迪总统撰写了一封电报。即使在那时，他坚持认为那些美妙的新闻限制阴谋就埋藏在报纸里一连串新事故中，就好像“黑人暴徒突破警力，结队穿过市中心区域”。汉森把这封危机电报显著刊登在那个下午的末版上，他特别向肯尼迪呼吁，打破了为期5周的不在头版上提到对抗金言论的禁令。这透露出，即使是强有力的美国白人都认为自己是种族问题的无助受害者：“总统先生，这些若是白人游行……我认为您的政府就会采取有力措施来打击他们。”汉森反对伯克·马歇尔的号召，提倡自我责任，由于它为免除肯尼迪总统本人的责任提供了便利。虽然对金和其他黑人的抱负大加鼓励，汉森却说，肯尼迪还是有义务停止他们的示威活动：“这是命令并且是对法律的尊重……那么您，先生，必须就是要带来它的那个人。”

一部分动摇的商业领导者彼此互相倾诉后，同那天的那位发行人一样坦白，但是当他们再次在商会集合时，他们重新考虑了他对肯尼迪总统介入的要求。因为必然地，那将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参与、强行进行融合，以及和州长华莱士的持久冲突。然而，除了此举之外，单靠军队之力，怎能将他们所看到的黑人河流干涸呢？紧急会议整整召开了一下午，伯克·马歇尔继续为罗伯特·肯尼迪提供关键执行官员的名单，那些是要由内阁成员和肯尼迪总统亲自游说的。总统打了几通电话，称除了庭外和解外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了。这些努力都使在暗处。虽然总统在伯明翰问题上不断努力——多次在白宫与特德·索伦森、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李·怀特、约翰·多尔、贝尔·伯恩哈德和路易斯·马丁接洽会谈，他仍指示他的新闻发布官要强调说他的权力并没有参与进去。他们宣布说总统正“严加监管这些事件”，并且“继续希望这情况可以由伯明翰的人亲自来解决”。白宫收到汉森的电报，作为“我们对此事的一部分研究”。“我们不会袖手旁观，”助理新闻秘书安德鲁·哈彻说道，“只是我们必须保持缄默。”

在加斯顿汽车旅馆，金经历了一位指挥官的巨大狂喜，他的部队刚刚奋力越过山顶。他们从前在哪里？现在又在做什么？一如既往，突破性进展的切中点就是危险最大化之时。胜利的象征，比如警察无力拘留，将行为良好这一重大责任转移到诸如运动方面，比如分散、混乱攻击严重削减了金的管理。更糟糕的是，他知道一半多如今让零售区瘫痪下来的黑人只是旁观者，他们看到没有被捕的游行完全失控后，便自发加入了队伍。很多人没有一点教养，并对非暴力运动一点都不感冒。这么一大群肤色混杂的人群到底能在市区庆祝多久呢？他们没有对布尔·康纳和种族隔离的恐惧，难道这种情况没有警力和其他人参与的斗争爆发——也没有暴动、抢劫，以及肆意破坏？另一方面，如果金试图把他们拉出来，只有非暴力的人可能跟随他的助理人员，留下来的其他人更有可能胡作非为。

混乱吞噬了金想要挽回一场非暴力运动完全胜利的希望。数以百计的游行示威者在用尽了自己的肾上腺素，完全丧失了勇气后，都回到了英格拉姆公园。在一个小时之中，领导人和跟随者四面八方地互相追逐。弗雷德·夏特沃斯闯入金的房间喊道：“马丁，就是这样！”夏特沃斯坚持认为，市区另外一场突袭将会彻底摧毁城市的意志。就在他冲出去想要进行“第二波”活动时，福尔曼突然大喊，继续示威游行活动是非常愚蠢的并且是毁灭性的残忍。金不愿继续支持夏特沃斯，然而从市区中撤退，以便更好地接受命令的计划太过复杂。命令几经修改、否决、延迟，甚至忽略。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占据市区的剩余人员并没有什么暴力行为，也没有遭到暴力攻击，然而在教堂附近出现的一场激战证实了顽固记者的敏锐新闻判断力，记者们几乎都无视市区惊慌逃跑的大批人群。处于一片困惑之中，怀亚特·沃克拼命为“第二波”进攻开出一条道路，他背着金，使用了一条秘密战术。首先让他们发誓保密，然后沃克派遣他最信任的信差，在城市遥远的角落，鸣起假的火灾警报。沃克本人没有成功击退可怕的 K-9 军团，他溜进一条小巷中，吹起了尖声的唤狗哨，这是他从北方学来的。

在黑人之中，数以千计欢快的新来之人，没有心情顺从于聚集起来的白人消

防员和警察密集方阵，反过来他们也没有心情忍受黑人的庆祝活动或是对他们阵队的再次破坏。一场石头和消防软管的决斗在3点钟逐步升级，记者们称这是一场暴乱。消防官兵非常激烈地操纵消防软管，意外的是，居然打断了一位警察的肋骨。当夏特沃斯带着一群唱着歌的孩子出现时，消防官兵立刻用监测枪把他猛击到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墙上，并把他固定在那里，直到他彻底垮下来。一辆救护车把他带到了医院，那时布尔·康纳宣称：“我真希望他们是把他抬到棺材里。”就这样又过了一个钟头，消防软管不仅猛击了公园里扔石头的人，在詹姆斯·贝弗尔的兴奋催促下，还攻击了从教堂出发的孩子组成的队伍。怀亚特·沃克对贝弗尔的疯狂感到非常气愤，并说他的疯狂行径把这场达到顶峰的示威游行变为一场“幸灾乐祸”的行为，但是贝弗尔认为这是对惩罚的幽默屈从，是崇高并富有感染性的非暴力表现形式。“明天我们打算继续调用消防部门抽水，”那晚他在布道台上宣称，“如果你们愿意的话，穿泳衣来。”

在3个教堂一同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一天的愤怒终于平息下来，演变为充满温情的演讲和风琴音乐。“这是场伟大的运动，”金说，“我们不会停止这场运动，直到把种族隔离从这座城市中赶走为止。”他继续宣扬非暴力，同往常一样，他发誓不会退缩，即使在这个非常时刻——“州长——愿上帝保佑他”，他如今正把阿拉巴马州的州警察调到伯明翰。他的声音中仍有些许的忧郁。金感到非常疲倦，他没有了早上因运动的成熟力量而产生的激动情绪，这次他似乎需要世俗的帮助了。“联邦政府是时候在美国种族隔离问题上采取明确立场了。”他说道，“我没有在批评总统，只是我们不得不去帮助他。”

几乎有些伤心地，金回忆了他对肯尼迪总统漫长而又徒劳的说服行动，他想要说服肯尼迪总统做一场林肯式的声明。他告诉群众，当他和肯尼迪家族在白宫林肯间里碰面时，有一次甚至觉得肯尼迪要“同意签字”了。尽管解放纪念日那个富有情感的时机已经过去很久，金又回到了他对那种较为简单方式的向往。“我们需要呼吁总统签署一份文件，说种族隔离是违反宪法的。”他说道。

那晚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弟弟正在吃晚餐。他们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大骡子帮”讨论的话语。电话终于在8点钟时打进来，一位助手认为这是个需要做记录的重要时刻，需要记录伯克·马歇尔最先对肯尼迪总统说的疲惫话语：“会议奏效了。全部商人参加的会议奏效了。如果这是在黑人之间的会，我们就已经渡过难关了，他们这一天表现得极其出色——我们对此表示认可。”只有少数人投出了反对票，马歇尔补充说。长者们授予委员会权力，来以他们之名和黑人达成协议。

由皇冠可乐董事长领导的白人委员会，立即投入和黑人的协商中，会议由亚瑟·肖尔斯、A.G. 加斯顿和迈尔斯学院院长 L.H. 皮茨主持谈判。午夜时分，他们放弃了一开始想要不经过金的同意就完善出一份妥协方法的构想，从秘密的遮匿中退出，到德鲁斯的家中去寻找金。市长鲍特韦尔的首席助理，比利·汉密尔顿，是在关键阶段退出的白人中的一位；如今鲍特韦尔根本不能冒险去公开披露，他的人手也在晚上进到黑人社区，亲自和那些大反派本人面对面拿种族隔离做交易。对于其他人来说，午夜会议是私人的，又是政治性的分水岭，如此一来，粗暴无礼的西德尼·斯迈尔，经常夸口说“已经给那个婊子养的打了多次电话”，带领团体进行祷告祈求神的引导。然后他们开始要面对终结种族隔离的细节行为。普遍来说，白人想要模糊性并且进行延迟，来最小化报复行为带来的危险性；而与此同时，黑人们想要精确度和立即性，来减少争吵和欺骗的可能。双方在晚上继续拖延，他们都打算信任文雅镇定的安德鲁·扬，他主张说要综合推进融合步骤的进行。对黑人们来说，立即就会有废除种族歧视的市区试衣间，这对白人来说相对简单，因为本来就已所剩无几。对白人们来说，午餐柜台的关键隔离将会在60天之后彻底整理好，公立学校的整合也将是在那个时间完成，不管哪一个先做好。凌晨4点钟，金、斯迈尔还有马歇尔以及其他的人，都认为至少要为问题的解决制订好一份计划，然而即使不睡觉也没有做出来。

就在快要天亮的时刻，两颗火焰炸弹落到哈特曼·特恩鲍位于密西西比州迈

尔顿郊区的农舍，位置就在杰克逊和绿林镇之间。特恩鲍从床上一跃而起，试图扑灭大火，他的妻子和女儿向他喊叫，他们没办法逃跑，因为外面有全副武装的白人。特恩鲍抓起他的一支来复枪，一场英勇的枪战过后，便把入侵者赶跑了。

鲍勃·摩西天亮没多久便来到了。这场袭击威胁到他的农村登记计划，因为就在几天前，特恩鲍作为 20 世纪第一位为大家所知的黑人，试图在霍尔姆斯县登记。像 E. W. 斯特普托一样，特恩鲍是一位自耕农，他橡树般强壮，拥有 70 英亩“清白干净”的田地。作为对他黑人英勇民间智慧的报答，全国学生统一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愉快地无视他所藏匿的小型枪炮兵工厂——这些他的私有物品在十几处地方藏着。（“这些暴力玩意儿一点不好，”特恩鲍随后告诉马丁·路德·金说，“它会要了你的命。”）

警长安德鲁·P. 史密斯下午来到了那所农舍，摩西为了自己的报告拍摄了一些火灾现场照片，还亲自整理了目击者的口述。（“他们来到这里，朝厨房里的一切射击。”特恩鲍太太声称）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被约翰·多尔派过来调查此案，在摩西的急迫要求下，他把墙板上的子弹取了下来。这种细节性调查，让史密斯警长陷入一场难以解决的政治困境中。如果他接受了特恩鲍的言论，继续追究白人的火焰炸弹，他作为霍尔姆斯县的警长一定会失败。而若他止步不前，或宣告自己无法解决这个案件，他就必须将这个调查移交给联邦调查局。这些选择都不能被接受，因此史密斯警长控诉特恩鲍用火焰炸弹攻击自己的家，并且射击得满是洞眼是为摩西登记活动建立同情心。

特恩鲍为自己辩护，以松鼠捕猎手的身份解释发射学的知识。“怎么可能呢，我一辈子都根本没有过 45 颗子弹，”他指着他房子中的弹孔反驳道，“那些是 45 颗子弹和 45 个弹孔，我可没那么多。”

然而，这强烈的被鄙视感和挫败感，更强化了史密斯警长的阴谋论，他以纵火罪和相关犯罪情况为名逮捕了特恩鲍、摩西和 3 位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组陪审团很快为他们定了罪。摩西被罚款 50 美元，因他独立审理

这桩案子，还拍摄了照片，此举妨碍了史密斯的调查。整个状况乍看起来有逻辑，实则非常荒谬，这状况还让多尔继续持久做出努力，以避免国家的起诉。这一切都发生在密西西比郊外一个安静的不起眼角落里，与绿林镇一个月前就传开的骚动，并很快传到伯明翰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金在周三早上提议终止一天修行的一番言论，立刻让弗雷德·夏特沃斯火冒三丈，他坚决不同意此项提议。夏特沃斯在病床上，尽管还有些因为镇定剂的“三大刺激”而头晕眼花。他暴跳如雷，对他身边来自伯明翰的忠实牧师说，心慈手软的金放弃了他们解决布尔·康纳的机会。“只烫猪的一面皮岂不是没有用！”他怒喝道，“要趁着水烫，把他两面都剥了皮，把他弄干净。如果水一旦凉了，你们就再也弄不干净那只猪了！”除了对金策略的不同意之外，夏特沃斯说得很明白，他作为和金平辈的红衣主教被冒犯了。金应到医院看望他。和在街道压力第一次崩塌的重要性等同，有件重要的事要做，金本应召开黑人层级会议，围绕在夏特沃斯的病床旁来做决定。

夏特沃斯闯入德鲁斯的家中时，身上仍然带着医院的标签。夏特沃斯就仿佛一架气压锅，他非常尖锐地批评金对休战事宜的解释：“再说一遍……我不听对了吗？……那么，马丁，谁决定的？年轻人，你现在麻烦大了。”金根本没办法让他平静下来，这时一位助手指出这件事情仍然未决议，因为金已经安排了一场记者招待会。而这更加招致了夏特沃斯的讽刺言论。“哦？你们要举行一场记者招待会？”他有些嘲弄地问道，“我想我们不如来一个联合声明。”大胆的金宣布休战，他承诺要让这项提议无效，继续带领孩子回到大街上。

窘迫的旁观者站在德鲁斯家的客厅内，夏特沃斯的威胁让伯克·马歇尔受到了强烈的惊吓。一直以来，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安慰华盛顿说那天肯尼迪总统会在电视记者招待会上向全国宣布伯明翰的停战。只有这样的可怕危机，才能迫使马歇尔突然把自己专业的声音插入黑人牧师之间充斥的愤怒情绪中。他警告夏特沃斯，有一项历史协议将危在旦夕，即诺言将被许下，承诺将被做出。“什么诺

言？”夏特沃斯大喊道。谈及这些未知的协议，不禁有些适得其反。阿伯纳斯安慰地建议说或许夏特沃斯毕竟是个病人，应该回到医院。他应该离开，夏特沃斯怒骂起来，然而他们更明白无论金还是肯尼迪总统自己，都会取消下午的示威活动。

“等一下，弗雷德。”金柔和地说道。越过他的肩膀看向马歇尔，他正强调着国家少数人的领导者所面对的明显弱点。“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伯克，”他说道，“必须团结一致。”

听到强加给他有关团结方面的言论，夏特沃斯十分鄙视。“你要有这种想法我就该去死！”他向金吼叫道，“你是头儿，但是你将是一堆狗屎，先生！”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在他们去往一间后屋后，金对夏特沃斯说了些什么。最有可能的是，他强调说联合抵制仍然进行，但是白人谈判代表已经在方方面面做出让步，从前一天起悲剧的爆炸事件发生后，有一天的休息非常有益。也许金只是消磨时光，让他安定下来，认为他这么做，是因为夏特沃斯发现自己被一大群记者忽视了——总共 178 名记者，据怀亚特·沃克最新的计算。那些记者从日本和苏维埃远道来到这个小镇上，对沙特尔沃斯在伯明翰的来头一无所知。无论金说了些什么，似乎都非常奏效，两位领导人都心满意足地走出来。在随即的新闻发布会上，夏特沃斯带头宣布赞成他曾私下里强烈反对的休止游行建议。“我们坚信诚实进行努力的真诚协商正在进行中。”他告诉记者说。

伯克·马歇尔曾经一度警告过华盛顿那意外障碍，如今经过司法部门，无异于一声长叹。半小时后，肯尼迪总统站在相机前。“下午好，”他说道，“我非常高兴地注意到黑人市民和白人市民为结束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丑恶形势，所做出的努力。”他赞扬了马歇尔，因他在调解方面的不懈努力“止住了会严重破坏伯明翰和整个国家名声的场面”。他提到黑人领导已让示威游行停止下来，并且即将到来的鲍特韦尔政权已经“承诺全心全意继续促进这片区域的进步活动”。总统说他希望在一天之内做出最终解决。

肯尼迪总统没办法在记者招待会上完成他精巧的表演——他第一次受制于种族问题——一个新障碍让停战活动从反方向陷入危险中。这一次是州长华莱士宣称自己不知道任何向种族隔离妥协的谈判，他也不认为亚瑟·黑尼斯和布尔·康纳同意这样。黑尼斯立即向“另一位”市长鲍特韦尔发出挑战，让他承认自己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同黑人的谈判中。州长华莱士的州警察队伍开始在凯利·英格拉姆公园进行军事演习。而布尔·康纳派他的人手锁住了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的门。种族隔离强硬派最具有决定性的打击便是开始对金和阿伯纳斯进行攻击——在对他们自耶稣受难日起的非法游行定罪的审讯会上，一位当地法官出其不意地提出上诉状，要按照新的法律规定，对每个人处以最高限额 2500 美元的罚金。在整个法庭诧异的观众面前，被告人宣称自己不愿意，也没能力支付这笔钱，于是守卫们把他们拖到伯明翰监狱，此事就发生在肯尼迪乐观的新闻发布会之后不久。

如今狂怒的 A.D. 金跳到了伯明翰记者团面前，宣布这场叛乱将会使暂停游行的计划无效。他预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将会在这天的晚些时候进行，封闭教堂，据怀亚特·沃克说，也是差不多会在那个时间。仅仅司法部部长肯尼迪的个人调解阻止夏特沃斯率领贝弗尔的预备军向市区游行。肯尼迪的理论是，布尔·康纳正试图挑起一场暴乱，作为在他党派联盟督管下实施戒严令的借口。华莱士州长想要破坏达成协议的可能，肯尼迪没必要立刻说出猛烈的辩驳，在他总统的位置上进行激烈的辩驳，可能对整个政权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他认为有必要为解决方法进行辩护，他知道金的监禁将会僵化黑人条例，正当总统试图软化双方的条例之时。此外，马歇尔看到了和夏特沃斯的生动对抗，而逮捕行动会导致一个人的缺失，这人在任何黑人联合持久处理问题的背后都必不可少。

再一次，比从前更加紧急，罗伯特·肯尼迪需要让金出狱。他立刻打给纽约的哈里·贝拉方特，提出一项紧急要求，贝拉方特能不能保卫这场运动，保护这个国家，保护金博士，突然筹集 5000 美元的保释金——并且以现金的方式，在

同一天，因现在每时每刻都非常宝贵，能不能呢？贝拉方特同意试一试。纽约的银行都已经关闭了，但是方便行动的有钱朋友可以攒集很多散钱。到晚上，贝拉方特打电话给肯尼迪说那笔钱已经在去往机场的路上了。然而在私下里，贝拉方特补充说他仍然在等从怀亚特·沃克那里得到的证实，确定金博士确实想要出狱。这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大错。从那天所有意外的曲折来看，最令人烦恼的是那些到达马歇尔的信号——金想要继续被关押。

对金来说，这待解决问题最难之处便是 2000 名运动的囚犯仍然在伯明翰关押着，他认为布尔·康纳关押他是犯了个错误，因为公众的轰动加强了他的影响力，要求他同伙的示威游行者和他一同离开监狱，并且撤销某些认为是不公正的指控。还有，至少要对保释金进行下调，这样他们可以依靠己力缴纳保证金而获得释放。对罗伯特·肯尼迪来说，他被金想利用他自己作为人质的想法所困扰。但愚蠢的是康纳已经为金设计了整个监禁过程，肯尼迪认为金冒着伯明翰种族暴力大爆发的危险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并且这问题在肯尼迪看来，不过是种族隔离争端中的次要问题。他告诉贝拉方特不要再参与筹钱一事，但要秘密采用其他方法释放金。

在伯明翰，谈判小组在晚上会面，他们共同回味了肯尼迪总统的公开支持，这更加激发了他们完成这一切的热忱。然而，相同的国民公众注意让商人本能地谨慎起来，黑人战略家在金离开后产生了分歧。群众大会上，只有詹姆斯·贝弗尔向群众发表演讲，并且，仿佛要示范一下人们一旦屈从于这场运动将可能发生的事情。一行 19 名白人组成的队伍走进教堂，有些人留着胡须，身着犹太教祭司的装束。他们沿着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的走道而过，走上讲坛，在那里拥抱了牧师和唱诗班的人。“我们前来是为你们在为大家的斗争中所表现的勇气和尊严喝彩。”一位从新泽西而来的拉比说道，并介绍了从田纳西州孟菲斯市以及加拿大新斯科省舍远道而来的同人。还说他们是在一场犹太教祭司大会中被挑选出来的，为响应配合有关伯明翰的宣传，自发进行朝圣之旅。“我平生从来没有如

此之深地感动过。”名叫亚历克斯·夏皮罗的拉比宣称说。他说他见证了德国犹太人在欧洲的繁荣，他们希望总是能向任何有压迫的地方伸出援手。“我们将做你们要求的任何事情，”他说道，“我们的人就是你们的人。”讲道台上，一位合唱指挥者教给他们一首关于手足情谊的简单希伯来语歌，接着指挥摇摇晃晃的会众一个接一个在座位上相互拥抱。对于无时不在的伯明翰警探，这欢乐拥抱是当晚监督工作的最糟糕部分。“当然沃特金斯警官和我自己坐在两个黑人之间，”艾利森警官向布尔·康纳报告说，“他们真的给我们如此礼遇。”

许多黑人谈判代表都认为让金去蹲监狱是不对的。在司法部部长肯尼迪的积极鼓励下，他们说服 A.G. 加斯顿出现在监狱，带着从自己银行账户中提出的 5000 美元。10 个月前，在奥尔巴尼，金和阿伯纳斯发现他们被驱逐出监狱。这一次没有什么神秘的了，他们对于团结的要求，让金不再公然抱怨这个陷阱。然而，就在金那晚返回到加斯顿汽车旅馆后，他很不开心。他认为，他自己被误导的同盟已经剥夺了他的优势，这优势还是合作的敌人布尔·康纳提供的。这一天由暴怒的夏特沃斯从医院中逃出来开始，以生气的金想要把自己隔离在监狱中结束。在中间，斗争中的党派曲折地路过一系列挫败的新闻声明。天黑之后，农民夏特沃斯开始彬彬有礼地谈论尽自己的职责，充满都市风尚的金开始想要烫猪的另一面。那天深夜，金告诉记者说，如果周四上午 11 点还没有进行庭外和解，运动就会上升到迄今为止最大的游行。

截止期限就这么毫无结果地溜过去了。那天是 5 月 9 日星期四，距离孩子们游行的进攻日那天，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在莫斯科，《真理报》刊登了一则故事，标题为“种族主义者在美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不那么刻薄的故事已成为重要题材，在欧洲遍及开来。《纽约时报》报道说，伯明翰的动乱正和海地的叛乱争上非共产主义亚洲国家的头条。大多数新闻媒体，都认为黑人事业的功绩显而易见，不知道为什么肯尼迪政府未能进行公开声明以加快事情的解决。

在伯明翰，有关游行示威者还在监狱的问题，谈判陷入了僵局。白人指出，

作为对金提出暂停一天游行的回报，他们安静地设计了对 500 名最年轻的囚犯进行释放待审。此外，他们说问题解决之后，就在鲍特韦尔政权确立下来之后，他们让其余人员的保释金急剧下降，甚至可能会撤销指控。但他们坚称自己只不过是商人而已，即使他们可以控制城市法庭的傀儡和检察官，他们也不会为公众解决机制夸下如此海口。金当然可以理解，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就是许诺齐心协力共同把示威游行释放出来。

这对金来说还不够好。本来他想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他要对那些孩子的父母说，他们已经让伯明翰的种族隔离彻底溃败下来，而他们的孩子必须待在监狱——然而他从这个想法中退缩了。他坚持认为那些人起初就不应该被逮捕。这事无论于情于理，还是关乎个人名誉，金都不愿意就此解决。如果长者们不能让囚犯全部被释放，也许他们能筹集 25 万美元做保释金，让他们获得自由。如果他们不能做或者不愿意做，那么也许联邦政府可以筹集这部分钱。毕竟，罗伯特·肯尼迪曾经为猪湾事件的战俘筹集了超过 60 万美元的资金。响应肯尼迪的声明，马歇尔称，政府的角色是调解员和中介者，绝非保释证人。金回答说，联邦政府在肯尼迪举办记者招待会之前，在罗伯特·肯尼迪迫使加斯顿违背自己意愿，把他保释出来之前，一直没有作为冲突的一方，然而事已至此，就应释放更多的人。

这当然是一系列令人棘手的言论，还带有几分含沙射影。金急迫的警告信息是说黑人问题应该解决下来，在州长华莱士的骑警执行戒严令，摧毁他们的希望之前。金暗示如果肯尼迪那边拒绝的话，洛克菲勒州长可能会帮他们筹集保释金。党派叛乱的威胁触动了肯尼迪脆弱的地方，这不仅涉及总统政治，还涉及整个民主党派，那里听证会仅在共和党草案宣布种族隔离为不合法之后才会开始。过了几天后，在白宫一次对整个内阁成员的发言中，罗伯特·肯尼迪说他已告诉金多次，他的顽固行为“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

金对肯尼迪的烦恼做出了回复。在周四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宣布了第二

天延长中止游行的计划。这是金第一次在伯明翰公然反驳管理机构。“总统说这场斗争的大部分方面都没有联邦法的参与，”他说道，“但是我认为有些地方已经公然违反了基本宪法原则。我还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有些已经逮捕起来的人是因为一直去登记投票而被捕，但联邦政府对此什么都没有做。有些人是在联邦大厦的午餐柜旁被捕的。然而联邦政府什么都没有做。”他继续声称说有几条既存的立法，明白地规定联邦干预的合法化。

也许是故意的，金只是给出一条暗示，把他谈判的热烈情绪从长者们转到肯尼迪政府，只有少数诸如斯坦利·利维森的人对这种冲突知情。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器装置记录了利维森坦率同意罗伯特·肯尼迪的观点，称囚犯是“次要问题”。这是个“遗憾”，利维森说道，金非常不想看起来像一位享有特权的领导——他应该去应对这件事，为那些囚犯感到焦虑。“即使人们必须进入监狱，”利维森说道，“赢得的其他东西会让他们成为殉道者，并让成功变得更加指日可待。我非常确定这种行为所呈现出来的成功类型，人们一定会非常乐意去服刑，因为这是一场巨大的成功。毫无疑问，成功一旦来临，就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利维森说他很高兴金因为肯尼迪政权的冷漠态度而对其进行责骂。利维森认为，肯尼迪正采取一项“新政策”，即在公众报以同情的中立立场后加以个人策略。“这是对的，又是错的。”他说道。这场运动“不得不准备做项不倚靠华盛顿的工作”并且它是“不允许华盛顿不参与进来”。在另外一个电话里，利维森告诉克莱伦斯·琼斯，他认为在伯明翰说“政府不进行干预算是犯了个错误”更加强有力。

金和肯尼迪都向自己各自的助手喃喃讲述着彼此，言语越来越刺耳。然而伯明翰的紧急情况又不允许他们两个完全受制于彼此的敌意，因为政治灾难会威胁到他们两个人。肯尼迪接受一项观点，金宁可让人们继续留在监狱里，也要继续游行，于是下决心筹集到保释金。而金认为肯尼迪提供的帮助是唯一的出路，放弃了保证金立即减少或让犯人们释放希望。他们一起下决心买通他们的路，好走出僵局，默许的联盟在隐匿的合作中引起了一股狂乱。金给哈里·贝拉方特打电

话，说他需要9万美元的现金，还说这一次他是毫无保留地与司法部部长共事。肯尼迪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沃尔特·路则，他随后很快从底特律发号施令给他在华盛顿的律师，约瑟夫·劳。“劳，”他说道，“明天我们需要筹集16万美元到伯明翰。”劳大笑，接着却哽住了。

罗伯特·肯尼迪那晚在白宫吃晚餐，总统从他的客人，《新闻周刊》总编辑本·布莱德里口中探出一条情报，下一期封面故事的主题，将会围绕在1964年，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机会。“我不相信我们居然如此幸运。”肯尼迪说，他希望能够与戈德华特进行竞选。“我不相信巴里也会那么幸运。”司法部部长几乎错过了所有晚餐闲谈，那些在电话里私下进行了密谈。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乔治·米尼承诺，将从自己的两个分部账户中提取16万美元的一半。他直接从钢铁工人联合会大卫·麦克唐纳那里得到了四分之一的份额，4万美元。沃尔特·路则承诺，剩下的份额会从汽车工人基金中出。肯尼迪成功地开始进行立即交付。这牵扯行贿基金和小包的问题，正是那种肯尼迪自己在反对联盟令人讨厌的行为之战中所反对的。不亚于国家安全的危机让整个事务的处理过程变得合法化，肯尼迪和劳工部部长亚·高柏还就物流问题进行过讨论。

司法部部长现在开始计时，等待着现金到手。他内心十分焦急，打给哈里·贝拉方特来确定金那一边的解决机制并非失败了。他正迫切要求再次保证时，贝拉方特的门铃响了起来。贝拉方特说可能是送钱的过来了，肯尼迪焦虑地坚持让贝拉方特去查看，他还在电话线一端等着。听从了他的话，贝拉方特放下电话打开门，看到一位身穿制服的黑人送货员，他递给他一个小黑袋子，里面装有5万美元的现金，那是从他老板，纽约交通工人联盟迈克尔·奎尔那里取来的。对金来说，这种恩惠某种程度上是他的回报，因为他几年前曾经在奎尔的工人面前发表演讲。对贝拉方特来说，在罗伯特·肯尼迪的声音和送货员的脸之间快速巡游，成了他政治生涯中重要的记忆。

赶回纽约的家中后，琼斯听从金的指示，去找哈里·贝拉方特报到。然后又听从贝拉方特的指示，在洛克菲勒广场和州长洛克菲勒的助理休·莫罗见面。到那时，纽约银行已经在周末关门了，但是琼斯很快发现自己和莫罗以及谨慎的副主席站在洞穴般的大通曼哈顿，洛克菲勒银行的保险库中。洛克菲勒州长本人刚从委内瑞拉回来，他和当时的未婚妻哈皮·墨菲各自离婚后，紧接着便立刻结婚。主持这场结婚仪式的牧师受到了长老会高层教会的强烈谴责；在对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洛克菲勒在婚后的一周内支持率便下降了13个点。这立即助推了他的竞争对手巴里·戈德华特的发展前景。这些情况也促成了银行保险库的秘密气氛。洛克菲勒想要避免公众指控，说他试图“收买”黑人投票，而金想要避免让大家认为，全靠洛克菲勒的捐款来保护他和肯尼迪的关系。对银行本身，保密的常规性做法让这不正规的交易变得正当合理。作为对那张借据的报答，琼斯只是冷淡地答应，一有要求就立刻归还全部金额，副主席交给他一箱装满现金的公文包。琼斯就如同间谍小说中的某位角色一样，在他们返回伯明翰之前，走出库房，去到贝拉方特的公寓。他回去后，发现一封函件，里面有一张“匿名”收据，通知说他的借款将会被全额还清。

在加斯顿汽车旅馆，一队记者已被承诺说在中午要有一场重大的公告。金一直拖延到周五下午。他首先等待一个证实，即乔·劳已经通过电报，转来了在华盛顿联合汽车工会银行的钱。然后接着为伯明翰的白人实现他们的承诺，为城市的保释人支付这笔资金，从而可以源源不断地把监狱中的游行示威者释放出来。他还在等待着贝拉方特告诉他，琼斯正在去南方的路上，还带了足以释放最后一批囚犯的钱。伯克·马歇尔和白人谈判者一道，金一直在交流着最终版本条款的修订，条款关于在伟大时刻来临之时，多方当事人应该如何表现——他们将要签署什么，他们将要公然说什么，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一直以来，金都在撰写并且在心里预演黑人这方的表现。最后记者们威胁说要暴乱时，金、阿伯纳斯和夏特沃斯严肃地走到镜头前面。出于内部外交的原因，金确定了谁先说第一番言

论。夏特沃斯说道：“伯明翰市政府要和它的道德心达成一致。”

尽管夏特沃斯宣布了解决问题的条款，记者们并没有感到很满意，直到他们听到金亲自说出，因为大部分听众都对夏特沃斯的来头一无所知。金走上前开始发言。他通过警告的评论——“我们面前还有非常艰辛的工作，有些仍然很未知。”他还投射出对国家传播第一波愉快预测，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夏特沃斯倒了下来，不省人事。看到他晕倒的这一幕，以及消防软管在他身上带来的瘀伤，尖叫声响起来。即便如此，医护危机只是让大家暂时把注意力转向夏特沃斯，待到救护人员把他带到圣家医院，记者招待会便继续召开下去。

在圣约翰教堂，牧师们进入那周五晚上的第一场群众大会时，一群 2000 多人组成的队伍爆发出欢闹版本的歌曲《哦，自由》。胜利激发了阿伯纳斯在领导位置上狂喜。“阿门！”他高喊，“给我一双手！今晚是胜利之夜，你们应当为我站起来！”他说如果他就要死去，他想要金握住他的一只手，夏特沃斯握住他的另一只手，他的妻子轻轻捧住他的头。“所有这些牧师都非常伟大，”阿伯纳斯宣称道，“但无论如何，只有一个马丁·路德·金！上帝派他来带领我们走向自由！你们会跟从他吗？他是我们的领导人吗？”在有节奏的大喊“是”中，阿伯纳斯喊道：“那你们说‘金’！”这为金的出场做了导入，金在震耳欲聋的对他的呼喊中登上了布道台。

他平息了大家对他的低声奉承，开始诵读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正式发言稿。然后为了建立一种亲切感的基调，他给群众读了一则手写协定中独家的小新闻，里面的细节会有所保留，以免惊动三 K 党。“起居室将在周一之前被整合使用。”金宣布说。他继续根据各个阶段发生的时间顺序说 15 天后会召开两个种族之间的会议，30 天后将会整合使用休息室和饮水机，60 天后将有午餐柜台和提升的黑人职员。所有运动囚犯都要“出狱或者即将出狱”。他承诺说，并且还告诉大家“要保密”，因为白人商人计划得要比指定时间表的行动还要快。

他警告大家，世人试图最小化、否认并忘记他们的功绩。事实上，鲍特韦尔

市长已经宣布，他不会被协议所约束。哈恩斯市长称协议为“没骨气的白人面对蛊惑人心的黑人做出的暴力威胁所进行的有条件投降”。《伯明翰新闻报》发表了一篇具有倾向性的辞别文，“黑人终结了废止种族歧视的活动，不能撤销起诉”，并且几乎非常悲惨的是，编辑们把在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布兰迪斯大学和耶鲁大学发生的春季小暴乱做了生动摘要报道，强烈暗示当地动乱不比北方的“抢短衬裤”活动重要到哪里去。“现在不要让任何人耍你们……”金告诉群众说，“不要低估这场运动的力量！这些东西不会给予你们，如果你们不把躯体和性命，在这座城市的警犬、坦克和消防水管前奉上！”

“还有一件事情，”他说道，他的声音现在因为情绪而有些颤抖，“美利坚合众国非常在意它自己的形象。有事情在这里发生，肯尼迪先生就受到干扰了。对肯尼迪先生来说……为亚洲和非洲的广大人民而战斗——为世界上中立主义区域的10亿人民而战——然而如果美国只因肤色的不同，而不去尊重他们自己国家男人和女人的基本权益，他们不会尊重美国。肯尼迪先生深知此事。总统的担心为这场运动提供了影响力，用以改变如同伯明翰一般的种族隔离堡垒中的现实。”金说道，现在头目已经触碰到连接权力和良知的敏感话题。他告诉人们他已被提供支持的电话淹没了——不只是从拉比那里打来的，还有最强大的黑人牧师，以及从丹佛、洛杉矶以及匹兹堡搭乘飞机而来的整飞机客人，还包括美国浸信会教友的头目，以及杰基·罗宾逊和弗洛伊德·帕特森。哈里·贝拉方特在那天早上打电话说，如果必要的话，3000名纽约市民会准备好纠察白宫，以达成协议。“此时此刻这就是件美好的事情！”金高喊道，“这应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幸福。”

像往常一样，自从蒙哥马利公车抵制之后，民权胜利后接踵而至的便是最大的危险，并且国家支持的真正衡量标准会滞后于早期涌起的热情中。金在周六到家之前就知道此事了。在亚特兰大，所有的黑人报纸和白人报纸都蔑视伯明翰的协议，认为那会是闹事者造成的一场僵局。《亚特兰大日报》大动肝火地关注金“和他那以正义为名、派头十足的煽动暴乱政策……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僵局，

并且抱有的十足恶意足以延续一代的时间了。对他来说，是时候上路并且再次去募集资金了”。在奥本大街上，C.A. 斯科特写了一封题为“伯明翰悲剧代价”的讽刺社论，从中他摒弃了协议中反对“灾难”“惨痛代价”，以及“整个国家和世界面前的丑陋画面”所产生的微薄利益……“很快所有伤痛都会痊愈，不幸的时代将会被遗忘”。

在南方其他地方，仅有的黑人日报中，斯科特促进了一项非凡的事件：那一周在亚特兰大，“超声波的吸引”是一场由耀眼的黑人音乐家参与的音乐会，其中包括吉米·里德、迪翁·沃里克、迪伊·克拉克、汉克·巴拉德、“夜行者”乐队、所罗门·伯克、“漂流者”乐队、小艾斯特尔·菲利普斯（代表作为《放了我》）、水晶乐队、杰里·巴特勒和山姆·库克——这一切门票只要两美元。庞塞德莱昂公园将会挤满人，不只是黑人还会有年轻的白人——对他们来说最好的黑人流行音乐不那么正式，关注世俗之事来让他们释放有关性、无聊活动、爱情和悲伤等最基本的情绪。黑人灵乐和布鲁斯的明星，都支持金作为神秘黑人教会的模范人物——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是福音歌手——但他们面对的观众群仍跨越到白人团体。他们释放共有的情感，并不是渴望达成理解。

发生在伯明翰促进性的起义需要对混乱做出最后冲击。不寻常的是，两名热心的年轻黑人记者从河畔无线电公司而来，这家公司由著名的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和小约翰·D. 洛克菲勒的著名美国教堂所有，它总是领先于每一次暴乱进行报道。周六晚上，他们带着麦克风大胆冒险进入三 K 党在位于伯明翰市郊的慕斯·克拉布公园举行的集会。有超过 1000 名戴头罩的三 K 党成员燃烧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还发出了敷衍的呼喊“打倒黑鬼！打倒黑鬼！”佐治亚州的大龙头透露说亚特兰大大学正在制作一部舞台剧，里面一位黑人克利欧佩特拉“在结尾将会得到一个白人男孩的吻”。“那就是正在发生的，”他严肃地说道，“密西西比州的大龙头谴责州政府为‘好时巧克力小镇’——90% 的巧克力和 10% 的坚果……我们和你们在一起。不要为那个担心。”三 K 党成员的头目，亚拉巴马州

的皇家巫师罗伯特·谢尔顿惊叹马丁·路德·金没有在伯明翰获得一样东西，因白人不会忍受这些专业商人干涉、纵容又具有操纵性的出招！像所有的三K党发言人一样，谢尔顿就像说出一个邪恶的诨名般恶狠狠说出“商人”这个字眼。他介绍了一位匿名的三K党成员卡格勒，明显是辅助军事的首领，他大喊他们要战胜“这个国家面对的前所未有的最大黑暗”。要依靠“上帝的力量，和一些高贵的人一道，愿意肩负起重担，来为耶稣基督出征”。卡格勒尖叫发出了著名的反叛者的呐喊，传出的声音是那样迟钝和虚弱。

回到伯明翰以后，法律实施的指挥官，担忧地在凯利·英格拉姆公园缩成一团。其中一人是首领劳里·普里切特，他从格鲁吉亚开车前来，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查明金是否真正打算返回到奥尔巴尼，一方面也是提醒他的同僚，要对抗黑人庆典和三K党集会构成的致命组合。他迫切建议警长摩尔在金位于加斯顿汽车旅馆的总部周围着重安置通宵警察单位，那地方就在公园的对街。布尔·康纳否定了这项提议，还说他拒绝“守卫那位婊子养的黑鬼”。于是，摩尔把普里切特叫到一旁，参与激烈讨论。作为普里切特在伯明翰军方的主要密友，摩尔试图解释他没有资格对康纳强加一场直接对抗，因为康纳已经雇用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下属指挥官。普里切特暴躁地回答说摩尔不适合当警长，因他缺乏部署自己手下的权威。接着他便扬长而去了。待到河畔电台的记者从三K党的集会中回来，凯利·英格拉姆公园几乎空无一人了。

A.D. 金牧师从群众集会回到家中之后，那场集会中贝弗尔是主要演讲人。他躺在牧师住所的床上，在那晚的10点45分发生了第一次爆炸。他穿过烟雾，发现他的妻子内奥米在起居室里头晕眼花，但是并没有受伤，他们两人一起把他们的5个孩子从后门中疏散出去。这时第二个更大的炸药弹正冲砖头正门，炸出一个8英尺高的洞口，把大门炸飞成好几大块，直冲起居室的后墙面。消防部门随后大概损失了牧师住所价值的三分之一，但是金当下担心的是会有更多的炸弹袭来。待到警察和火警都宣称附近没有未引爆的炸弹时，1000多名黑人已经聚

集起来，他们都不同程度的衣冠不整。他们中的一些人威胁要向白人发起报复，尤其要向那些命令他们回家的警察，但是 A.D. 金抓起一个喇叭对他们宣扬非暴力。他派出教堂中的一些执事，进入群众中带头唱起自由之歌。当他进去通知他在亚特兰大的亲属有关轰炸的事情，他抓起电话让他的弟弟马丁听到外面响着的鼓气歌曲《我们终将胜利》。

在 A.D. 金内在冥冥之中的某处——喜怒无常，喝酒成瘾，在他出名哥哥的阴影下毫无安全感——而这天晚上的冲击成了他运动岁月中最美妙的时刻。还不到午夜，另一次爆炸的爆裂声传到了牧师住所中，从距离有几公里远的伯明翰市区而来。这一次爆炸发生在加斯顿汽车旅馆，消息迅速传播，A.D. 金牧师住所周围又围满了人，数目直达 2000 人。对轰炸的仇恨很快酝酿为愤怒。石子如雨点般落下来，砸在了警车上。有一块砖头砸在了一位侦探身上。河畔电台记者距离现场非常近，把喇叭筒中传出的喊声都录了进去：“这是 A.D. 金牧师和你说话！请把手中的砖头放下！”后面一个尾随的声音响起：“那是你们的领导！把它们放下来！”

河畔记者开车回到市区，他们挤着进到凯利·英格拉姆公园。救护车带走了 4 名被炸弹炸伤的黑人伤员，然而没有人伤得很严重。人们努力挣脱警察队伍，为了看一眼破坏的场景：就在加斯顿汽车旅馆的接待区，炸出一个门那么大的洞，位于马丁·路德·金二层套房的正下方，还炸出了主水管和电力线路。3 辆家用拖车已经扭曲，因受热而坍塌下来，还落到了距离汽车旅馆很远的地方，比原来停放的位置要远得多。超过 2000 名黑人挤进公园中，这场景令人回忆起前 9 天里发生的大规模对抗。除了现在所有黑人都从周围商业区的酒馆和舞厅中来，如今里面没有了欢度周末的客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个人大喊道。石头在天空中乱飞，很快一辆停在第十六大街浸信会教堂的车就翻过来被焚烧了。

砖头砸碎了公园附近的玻璃店面。在汽车旅馆内，怀亚特·沃克意识到，进一步炸弹攻击的危险，已被暴力的威胁所替代，这威胁即将彻底摧毁伯明翰来之

不易的收获。他抓起了一只喇叭，告诉伯纳德·李他们，必须出去驱散人群。李在瓶子和石头乱飞的一片纷扰中走了几步，便突然止步不前了。“我们不能无动于衷！”他抗议道，但他还是跟随沃克进到了公园。“请你们不要再扔砖头了！”沃克喊道。一个砖头飞过来砸在了沃克的膝盖上，他随后一瘸一拐地走到了人行道上。K-9 警力单位部队从汽车中爬出来，到达警察队伍前列，这些家伙因大规模游行示威而有些声名狼藉，招来一阵投掷物的攻击。怒气冲冲的警察追逐扔石头的人，直逼进一个黑暗的小巷子中，一阵袭击之后，有位警官摇摇晃晃退走了，背上带着3处刀伤。在中间地带，警官和黑人牧师开始不顾一切保持着联系。他们同意牧师努力把暴徒驱散的主意，而警官们要试图撤回他们的警力队伍，但是他们有比控制更合理的选择。一间燃烧着的杂货店点燃了公园，不时有打劫事件发生。

那时，河畔记者陷入了火、警报、石头和暴徒包围的困境中，比起观察员来，他们更像是人质。他们把录音麦克举得非常高，就好像在暴风里举着的火把，录下来的内容都是让大家安静下来的请求，还把旁边一个歇斯底里男人的声音录了下来，那人高喊：“为什么每当他们开始暴动，我们必须回家啊？”河畔记者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空洞，没有经过任何广播的润饰，能听出来他们在那里坚持只为得到消息。“难道没有人要打扰你们吗！”不断有人对他们说。杂货店的房顶在火焰中坍塌下来时，一个男士的声音呻吟道：“哦，伙计，现在看看我们做得过头了吧。”另一位男士说：“我们做过了头，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一位生气的妇女说道：“是啊，是他们误导我们去做的。”

A.D. 金在大约深夜一点半到达了加斯顿汽车旅馆。他家周围的暴动终于平息了下去。他带着音量最大的喇叭筒跑进凯利·英格拉姆公园，很快听到他的声音把其他牧师的声音压了下去：“我们的家刚刚被炸……若我们现在仍处于被杀的危险状态中，如果我们不生气就离开，不扔砖头；我们可以去做并且我们正处于危险之中，你们为什么必须起来破坏我们的事业呢？你们正在伤害我们！你们

没有帮助我们！现在难道不请你们清空这个公园吗？”加之暴徒们已经疲惫不堪而警察相对克制，金自发允许黑人牧师组成方阵前来驱散人群。怀亚特·沃克一瘸一拐地走回汽车旅馆，去看望他的妻子安，那晚他带着他的两个孩子，乘飞机从亚特兰大前来，然后回到了公园中。他和其他所有人在一小时内驱散了几乎所有群众。

A.D. 金，已经引诱将近 300 名不守规矩的落伍者进入停车场，他们高唱着《我们终将胜利》，从停下来的一辆凯迪拉克车上下来，陆军上校阿尔·林戈的架势就仿佛陆战队员登陆一般。林戈带领一群 250 位州警察组成的军队和州立机构不正规志愿者组成的队伍横穿亚拉巴马州，他看到了眼前的灾难：闪耀着的火焰、许多从巷子中丢掷石头的黑人、对抗监测枪的砖头袭击战，那些监测枪是火警为了特定目的而带来的。警察局局长摩尔看到了林戈率领的人又重新恢复了骚乱，那群人手中挥舞着卡宾枪和警棍。“你们要是离开的话，林戈先生，我会感激不尽的。”他尽量友善地说道。

林戈回答说他在这里，比州长华莱士的权力还要大。

“我们并不需要那些枪支，”摩尔严厉地说，“请你们把它们收起来好吗？有人会被杀死的。”

“你真他妈的对，是有人会被杀死！”林戈好像在激烈的战争中爆炸了般，举起了他的霰弹枪。几分钟后，他带领第一队州警察沿着大街进行冲锋。警官们在人群前面高声呼喊，让每个人最好进去，骑兵用棍棒殴打那些还没有进去的。他们把一位乞求的人打倒在地，紧关到门外，那个人发出尖叫；然后他们又把门一脚踢开，把他丢了进来，继续殴打。从加斯顿汽车旅馆中，几位黑人牧师喊叫说骑兵不需要用枪，而他们得到的回响是林戈非正规军蜂拥进入汽车旅馆的大院子中。《纽约时报》的克劳德·西顿写道：“整条街上都能听得见棍棒敲打头部的‘锤击声’。”《新闻周刊》的卡尔·弗莱明称，此次暴行比密西西比大学的暴乱事件还要令人厌恶。怀亚特·沃克发现自己的妻子躺在地板上，被一位骑兵的来复

枪枪柄击晕了。

林戈的残暴攻击很快让晚上发生了最严重的恣意破坏行为。数以百计的黑人被驱散回家，他们要在大范围地区发泄对攻击目标的新一轮愤怒。在华盛顿，约翰·多尔被很多联邦调查局观察员打来的疯狂电话所提醒，他在深夜两点半断定这场危机已经发展得非常严重，严重到不得不叫醒罗伯特·肯尼迪的助手。在黎明之时，暴乱渐渐结束：6家企业、数间房屋、一座两层公寓楼已被大火夷为平地，几十辆汽车被毁，大约有70人被送往大学附属医院。就在怀亚特·沃克离开了他妻子的病榻之后，心烦意乱的他做出一个错误决定：他想要返回加斯頓汽车旅馆，拿回他妻子的衣服，然后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送回亚特兰大去。一个路障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想要步行走过去，于是有两位州警察和一位非正规兵打了他，把他丢进一辆警车，把他的手腕弄骨折了，他们猛地摔上车门，把他的脚卡到了外面。最后那些人把他丢到了汽车旅馆，那里有骑兵看守，严密封锁，没有水、电话和电。数小时过去了，直到正午，沃克一直处于消失状态。在华盛顿，一架白宫直升机突然飞出去，去伯克·马歇尔的农场带他来，马歇尔刚刚回到那里，经历了伯明翰的严酷折磨后，他正打算休养生息。

应急战略会议在五角大楼和司法部召开，用掉了整个周日。金从亚特兰大飞回伯明翰，罗伯特·肯尼迪抵达白宫，坐在自己户外的福特敞篷车中，由伯克·马歇尔、艾德格·斯曼、尼克·卡岑巴赫和他的狗布鲁莫斯陪伴着。肯尼迪总统刚飞到大卫营来度周末，在他的安乐椅上等待着，两侧是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陆军部部长赛勒斯·万斯，上将厄尔·惠勒，即军队总参谋长。司法部部长对充满危险的复杂政治困境做了精确概述。就在轰炸和暴动动摇了运动中黑人、当地警察、包括温和派白人的一片友好意图后，他说道，华莱士·康纳的武装力量已经移入与反对黑人暴力决定性表现的混淆之中。他们的目的是用以下3种方式中的一种，破坏伯明翰的协议：(1) 直接威胁对已经进行认可协议的白人商人。(2) 激怒黑人来令他们反抗州警察，或去游行示威，让他们自己声

明放弃协议。(3) 强迫联邦政府进行干预，这将让伯明翰商人和北方联邦士兵形成在政治上站不住脚的联盟，和黑人的联盟也一样。

“支持派部队来的理由在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肯尼迪说道，“……州长事实上已经接管了整个州。你们将要让他们的人手把刺刀刺向人民，用棍棒、手枪等殴打他们。在全国各地你们都将有集会……人们请求总统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然而，那些反对派兵的声音中却非常难以解释。除非美国政府想要把州警察归为对公共秩序构成威胁的一支队伍——实际上，对亚拉巴马州发动进攻——这会证明使用联邦军队镇压黑人在手段上的合理性，而非镇压白人。在人种上，这将会和密西西比大学事件和自由自行车手事件相反，军队巡逻黑人社区，伯明翰顽抗的白人中立派可能会寻求联邦庇护。

肯尼迪总统不需要被告知这种糟糕结局。“他们可能会撕碎那些人制定的纸质协议，”他很快打断说，“因此，你要再次打倒黑人，达不成任何协议。”

这前景导致伯克·马歇尔开始发言了。“如果那项协议失败了，”他非常疲惫地说，“黑人就会，嗯……”他慢慢沉默下来。

“无法控制。”总统提示说。

马歇尔点头同意。“并且我认为不仅是在伯明翰。”他补充说，作为分享金关于C计划向外扩散影响之预告的少数白人。

他们开始偏向附近美国军队的初步部署，但绝非在伯明翰进行部署。这种调遣呈现出国家自由主义者支持此项协议的运动表象。配置军队进行干涉的过程中，如果正如肯尼迪总统所担心的，“今晚那里将会有暴乱——那明显是华莱士州长所期待的。”这种调遣也警告了华莱士的武装力量，并不为他们取消此项协议而提供政治影响力。对肯尼迪总统来说，对他们这些人未知的领导者最接近的推测便是马丁·路德·金了。他可能对伯明翰各个市区的黑人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也包括成千上万如今一心一意对媒体对危机事件报道进行关注的美国人。金有关政府表现的公众言论可能会非常残酷。金的神秘感让肯尼迪总统心事重

重，他打断了惠勒将军的话，向伯克·马歇尔询问：“你跟金聊了多少？”

“我跟他说了很多，”马歇尔回答说，“我要告诉你他打算怎么做，总统先生。他想要去教堂，号召人们远离街道，就像司法部部长说的那样，然后第二天，他打算在城市四处走动，去到台球房、酒吧，和黑人说说话，宣讲反对暴力行为的言论。这些就是他的意图。”

这条消息未经核准，缺乏深刻评论的掌控。几秒钟后，肯尼迪总统说金必须有自己的政治预期，因为他已经要求政府发表声明。总统翻阅着报纸，浏览着报上对金言论的引述，总统想要知道金是否期盼他派兵；如果不派兵的话，金会不会对他进行攻击。但罗伯特·肯尼迪警告说，他们不能把这个问题抛给金，甚至都不能秘密地进行询问，以免金公然说出政府曾向他询问意见，如果这样的话党派“太太团”可能会嘲弄自由世界的指挥官，因为他们居然向一位不赞成暴力的黑人询问军事决议。为了避免这类风险，肯尼迪总统让马歇尔在总统办公室就立刻打电话给金，“要像是你自己愿意去和他聊天的那样”。马歇尔没有提及军队的事宜，来探寻金所要达成的预期。

马歇尔到外面接通了这个电话，新闻秘书塞林格冲出去，让那些记者平静下来——一直以来肯尼迪总统亲自许诺给他一份关于危机的声明，惠勒将军带着写有堡垒采购清单以及攻击路线出现，“告诉你我能做什么，总统先生，”他说道，“我在本宁堡有一个战斗群，那里经由陆路——要用六个半小时的时间到达伯明翰。”人们想要知道为什么越过100公里需要花这么长时间，一段时间之后，惠勒模糊地解释说本宁堡为何没有运输机时，马歇尔回来了。

“他说了什么？”肯尼迪总统问道，打断了惠勒将军的话。

“嗯，”马歇尔说道，“他说，如果他认为没有其他事变的话，他能控制他自己的人手。当然，他只要实现目标，并且他……将试图组织黑人在他社区周围走动。他还说那些人中有很多都在昨晚喝醉了。那是星期六晚上。”

“是啊，”肯尼迪说道，“他没说什么有关军队的事，是吗？”

“不，他没有，”马歇尔回答说，“嗯，我没提，他也没提。”一阵官方的沉默，让政府没有了解到金已经明确告诉记者他没有要求联邦军队。他未明确说明的目的是，不去对抗伯明翰商人，不惜任何代价保护脆弱的废除种族歧视协定。基于这一目的，金和肯尼迪政府比他们所意识的还要高度一致。对马歇尔来说，金的确强调说，这协议对暴力行为来讲是终极抵押品。“如果这回导致商人违背了他们的协议，”马歇尔向肯尼迪总统报告说，“他说游戏就结束了。并且我认为那完全正确。”一幅种族冲突开战的恐怖景象侵入了美国总统办公室。

认识到达成协议的极端重要性，马歇尔再次避开接到西德尼·斯迈尔打来的一个电话。作为唯一一位公开知道他的角色的长者，斯迈尔在当地种族隔离者的残酷攻击下，要求他告知其他“叛徒”的名字。哈内斯市长正尽可能地煽动去诽谤其他政党和协议“有牵连”，还宣布说“金这个黑鬼应该作为一名革命者接受调查”。他嘲笑摩尔警长懦弱无能，还说罗伯特·肯尼迪“我希望每一滴洒下的血都在他的喉咙里供他品尝，我希望他因那些血而窒息”。面对所有这一切，斯迈尔冒险向马歇尔许诺说，长者们会继续坚持立场。他们将连续好几天保持沉默，他说道，因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问题，但他们仍然要坚持金的协议。他的坚定让马歇尔很放心。那之后不久，斯迈尔就召集伯明翰的记者来揭示，在对黑人暴徒迷雾般谴责的背后，是怎样一种现状。那些城市中有名望的人士正积极促进种族骚乱，他们要“把市政府推进戒严令”。在任何戒严令的执行下，无论是华莱士的还是肯尼迪的，斯迈尔警告说：“团体在军队的掌握之中，过不了多久我们自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

在白宫，惠勒将军继续说：“对了，总统先生，我还有另外一支在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警备战斗群。”肯尼迪总统关于军队单位会去到的地方做了笔记，就在马歇尔返回之后，他派惠勒和万斯去准备3000名士兵到伯明翰陆军任务队“橡木操作站”。直到他们离开，再也听不到说话的声音，肯尼迪才发出一连串笑声，嘲笑这军队官僚机构的精准性。“他们说飞行时间是一小时，”总统讽刺说，

“你们总犯的错误是你们老是想当然——他们要在一小时后才到那里啊。”

麦克纳马拉、卡岑巴赫、马歇尔和格斯曼去到了内阁会议室，起草一份主席声明。在维护公共秩序的名义下，为军队运动正名，这强烈暗示了他们的任务也是保护废除种族歧视的协定。他们每写完一页声明，就送去让总统秘书伊芙琳·林肯打印，但随后到来的特德·索伦森和肯尼迪总统却反对其内容，认为它“太过倾向于黑人那面”。即使如此，当肯尼迪总统在晚上 8 点 48 分走出去面对成群结队的记者和现场直播的新闻报道时，他所读到的版本巩固了他对这具有重大意义的协议所做出的承诺。“伯明翰协议从前和现在都一直非常公允，”他宣称道，“……联邦政府不允许任何一边的少数极端分子对它采取破坏行动。”

拉尔夫·D. 阿伯纳斯在汽车收音机中听到肯尼迪总统的声明，当时他正在去往伯明翰新朝圣者浸信会教堂的路上。这场会议不能在市区举行，因为州警察已经封锁了加斯顿汽车旅馆附近 28 条街区的区域，其中，怀亚特·沃克和二十多个住户一直处于监禁状态。即使是在新朝圣者教堂外面，好战的军队和夜间发生的暴乱也让黑人们十分惧怕，他们穿着最好的衣服冒险外出，个个踏着小心翼翼的步伐。那是一个很长的会议，会上大部分时间安德鲁·扬面对这项要随侍前来拜访的显要人物的任务时，都困难到无法进行下去。那些人中有多萝茜·海特和一位来自黑人妇女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他们做出和组织任务有关的演讲，拘谨地把他们自己推到更新冲突的风口浪尖，“来自各方面尽我们所能加强我们国家的道德品行”。他们还赞美创立者玛丽·麦克里欧德·贝颂，他们终于引证“她临终遗嘱的美妙话语”。

阿伯纳斯闯进教堂，省掉了做作的礼仪。他宣布肯尼迪总统对此项协议的支持。但他的喊声压过拖长的欢呼声，他把他的希望寄托在比美国陆军以及白宫更大的权势上。他正寻求全能的上帝，上帝已经垂听了腓立比监狱的保罗和西拉、狮子坑中的丹尼尔以及尼布甲尼撒的火热熔炉中 3 位虔诚的犹太人。在集会中传来的间歇叫喊中，阿伯纳斯大声呼喊，他要寻求上帝的帮助，上帝曾在大马士革

麦丹区寻找召唤摩西，而马丁·路德·金“在状况复杂、资金充裕的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里……他就是领导！他就是摩西！……我们现在要听从我们的领导人”。

金周日的发言被来自河畔广播电台不知疲倦的朝圣者们录了下来——他们自前一晚的三K党集会起，已经录满了将近5卷录音带。周一那天，他们跟随金游走到黑人酒馆和台球厅里，在此期间，一个小痞子是撞球高手，他把金打得落花流水，让金自克罗泽之后，再次担心他的球技不如从前。当河畔电台的记者走到外面局势紧张的街上，他们录下了来自布尔·康纳本人的一段气急败坏的恶骂。“好啊，这个婊子养的，”康纳冷笑着说，“他是唯一导致暴力的人。你可以引用我的话说，如果你能让‘婊子养的’面对这个事实……他是史上攻击美国最大的骗子、勒索大师……他现在正在那里的台球厅中，宣讲非暴力。”

那个周一晚上，河畔电台记者再次跟随金来到群众大会上。两天里动摇的平静有所减轻，加之有些名人的到来，第六大街浸信会教堂挤满了人。前重量级拳王弗洛伊德·帕特森，正准备7月与了不起的新冠军桑尼利·斯顿再度比赛，带着颇具感染力的谦卑告诉他们，伯明翰电视新闻的镜头是如何感动了他。“我在我的集训营，”他说道，“我感到非常愧疚……我坐在集训营里看着你们大家，我的同胞，经历这些……我想要从我内心深处感谢你们。”帕特森坐下以后，带着绷带却仍然衣冠楚楚的怀亚特·沃特也走上前来。“介绍杰基·罗宾逊花不了多少时间，”他厉声说道，“你们可以像介绍杰基·罗宾逊那般快地去行动。”这位白发的棒球史不朽传奇引来了大家一片叹息声和欢呼声，甚至让金都黯然失色。

“我认为你们没意识在伯明翰的你们对在纽约的我们有怎样的影响，”罗宾逊说道，“并且我不认为美国白人理解伯明翰对整个国家所有人的影响。”通常，作为一位温和的演讲者，罗宾逊犹豫地说他不能表达好自己，不能解释好，然而他唯一能想到的便是告诉他们，离开纽约时，他的3个孩子想要跟他来，也一起进到监狱中，因为他的孩子们看到伯明翰的孩子们因为自己的信仰进到监狱中。

“我不能不因这件事情而变得情绪化，”他说道，“……并且我希望这种热情不仅可以表现在今晚的教堂，也可以在整个美国的黑人中有所表现。”

“我坚信已经做出的协定终将达成。”金对会众说道。亚拉巴马州的骑兵和军队士兵都陷入困境，运动的追随者可以再次心怀希望，但一连串的严酷考验已把金的乐观心态打磨成了猛烈的决心。“我们必须对这场运动有信心，”他充满激情地宣称道，“而且，另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场种族冲突。在这里，我想让你们理解我。我们不允许让这场伯明翰的冲突发展为一场黑人和白人间不愉快的斗争。伯明翰的紧张局势发生在正义和非正义之间。”他们的目标是赢得“道德心”，而非肤色，他说道，因他们的事业像宗教和民主般宽泛。他坚称伯明翰的有些白人在秘密支持他们，或是说在精神上支持他们。有个人甚至打电话来，想要为A.D.金重建牧师住所。“我不知道，”金缓慢庄重地说，“他们可能还想要多炸一点地方。”他屏住呼吸宣布一位走在库萨街上名叫普林斯·格林的黑人行人，他被那晚经过身边的车中射出的子弹伤到，被送往医院。他们将继续经历枪林弹雨。“对不起，”金大声叫着说，“但是我不想教你们任何人去憎恨白人。”

拉尔夫·D.阿伯纳斯劝一个名为“爱的奉献”的集会，来为夏特沃斯捐赠600美元。夏特沃斯到周五的记者招待会成功为止，仍然卧病在床。夏特沃斯没再出现，直到金离开小镇，但在周三，他在两名家丁的搀扶之下进门，说话时恢复了从前的活力。“我已经差不多花了布尔两倍的时间！”他咆哮道，“我不知道会不会花上7年的时间。”那时金在克利夫兰。那天是5月15日——他女儿在C计划开始时出生，现已“过了六七个星期”，他这么记录，也是自孩子们在5月2日的第一场游行后过了将近两周。只有当他从伯明翰长长的昏暗隧道中走出来后，他才看到这一切是多么戏剧化，就连他自己的生活也已经改变了。

第二十一章 大风暴

在机场被暴徒殴打后的金坐上汽车，像宇航员一样飞奔在克利夫兰的大街上，朝圣保罗主教教堂走去，参加民权运动第一次大型白人集会。忽然之间，他分散的支持者们融合到了一起。在旋风般的12小时里，金发表了6次演讲，还接受了一次电视访谈。同俄亥俄州教堂主教合影之后，金听从黑人摄影师的坚持，让怀亚特·沃克掀起自己的衣服，严肃地指明自己肋骨处的瘀伤。在克利夫兰，金要去的第二个地方附近交通严重拥堵，由犹太教堂转变而来到科里卫理公会教堂附近，20个街区范围内全都是人，有些热心的女教徒带着野餐篮子已经等了9个小时。让金挤过人海是不可能的了，于是，赞助者们便将大批群众引导至周围的3个黑人教堂中，克利夫兰的警察分队则护送金前行，同时，阿伯纳斯和沃克负责挡住人群。一所教堂中，一个很有事业心的男人卖光了延长线，还把连接装置卖给那些想录下金的演讲的人。那天晚上的现场群众有10000多名，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也筹集到了15000美元的资金。“这是我见过的最激昂的回应。”金站在讲台上高兴地宣布。

仿佛是伯明翰运动奇迹般地转移到了克利夫兰。金根本没时间休息，他白天在伯明翰维持休战状态，晚上则在纽约与哈里·贝拉方特见面。贝拉方特说，好莱坞和洛杉矶的人们正积极行动，准备一场比克利夫兰更热烈的迎接。马哈里亚·杰克逊说芝加哥的群众正在为超越伯明翰而努力，她认为自己可以让芝加哥所有人都来听金的演讲。她还发誓一周之内就能做到这一点。

那个周日，《纽约邮报》发现了金一个月前写的《伯明翰狱中书信》。让斯坦利·利维森颇为遗憾的是，这篇长达两页的独家新闻扼杀了《纽约时报》对它的

兴趣，之前《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告诉金和利维森，他们已经将其“剪辑，准备排版印刷”，发表在《周日杂志》上。尽管《纽约时报》很快撤销了发表安排，名气不大的报纸却没有被竞争的陈腐阻挡，《伯明翰狱中书信》占据了《自由报》《基督教世纪》《见证者》以及《门诺派报》的封面。几天之内，利维森以600美元的价格将再版权卖给了《大西洋月刊》，而克莱伦斯·琼斯很快就发动了一场运动，阻止其盲目流通，保护金在图书出版谈判方面的版权。威廉姆·孔斯特勒很愿意和金共同写作出版一本书，但斯坦利·利维森却不同意，称孔斯特勒是一个“投机分子”。伯明翰的疯狂甚至渗透到了纽约文学界，有个出版商给利维森提了建议，说金的第三本书的最终标题应该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等待”。

在伯明翰，金阻止了康纳想要开除2000名学生的粗暴行径后，就赶紧搭飞机到了洛杉矶，好在下周末参加有近5000人的集会。听众们紧紧抓着印有伯明翰警犬龇牙咧嘴照片的框架，挤满了老瑞格利球场的的所有座位和各条通道，连停车场都站满了人。这是目前为止最大的民权运动集会，也是第一次由黑人白人共同参加的大型集会，自我意识深藏在了兴奋感之下。白人和黑人都很害羞，对对方都相当彬彬有礼，就像新生舞会上的陌生人。带着一种古怪的诚恳，保罗·纽曼读了一份名单，名单上的都是“对此很有兴趣，表示关心”的演员和加利福尼亚的政治人物。用颤音演唱《好极了，耶稣一样的金》中史诗般的R音阶时，女高音紧张地轻轻咳嗽了一声。怀亚特·沃克在自己的早期演讲——《我是美国的新奴隶》没达到预期效果后马上坐了下来。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萨姆·布洛克本想发表一篇关于格林伍德的演讲，但他怯场了，只说了一些“想要给民主带来安全”之类的话。

所有的演讲人中，只有金最放松。他赋予伯明翰以人性，几乎符合所有人的预期。此外，他不必对演讲风格做过多改动，就能让在场的黑人和白人听众满意。金的演讲通常会针对普遍的问题，于是，他以自己在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时第一篇演讲中的句子为“导火索”平静地开场——“总有一天，人们会摆脱

压迫这一铁蹄的践踏。”3段结束词之后，人们都站了起来。演讲要结束时，人们甚至听到了一个全身心投入的女人如狼嚎般颤抖的声音。“亚拉巴马州州长曾说，6月10日要亲自站在学校门口，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大学，”金说，“我认为，如果亚拉巴马州州长要以这种方式亲自保护一种邪恶的制度，那么肯尼迪总统就应该前往塔斯卡卢萨，亲自护送学生走进校园！我想，对于这个国家所支持拥护的，那将是强有力的证明。”最后，金讲到《共和国战歌》时，所有听众几乎都在怒吼着应和他。

集会之后，波特·兰卡斯特和诺玛·兰卡斯特夫妇在贝弗利山举行了一场接待会，而这场接待会的邀请函正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艾德蒙·G. 布朗发出的。席间，一个面色发黄的好莱坞律师说起了正经事，声称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每天的花销是整整1000美元。保罗·纽曼开出了第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歌手波莉·伯根紧随其后，第三个是演员托尼·弗兰西奥萨。演员约翰·福赛斯、劳埃德·布里奇斯和篮球明星埃尔金·贝勒的妻子也捐了款。马龙·布兰多就“我们做了什么主义”咕哝了几句，捐出了整整一周的花销——5000美元。小萨米·戴维斯的捐款数额与其他人的捐款总额相等——20000美元。再加上瑞格利球场捐助的35000美元，那天晚上，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总共募集到了75000美元。明星和金钱令人震撼，《黑玉》杂志的一位记者在文章中称，《我们终将胜利》从兰卡斯特的家中传出，像是“贝弗利山长了翅膀的乔丹”。

接着，金马上给中心地区带来了另一种震撼——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中，他坐在敞篷车里，飞快通过芝加哥的街道，前面开路的是警察车队的警笛声和市政大厅的鸣笛——那是戴利市长准备的官方欢迎仪式。看上去有点不自在的市长加入了车队，一起驶向密歇根湖湖畔的市属麦考密展览中心。马哈里亚·杰克逊嘘寒问暖一番客套时，戴利市长和金一起在后台站了将近一小时，其间他整理领带，还对舞台工作人员和在这一重大场合迟到的音乐家大呼小叫。最后，市长戴利欢迎了诸位伯明翰的英雄。在自己的演讲中，戴利称金很难与相互较量的两

位明星相媲美——赞美诗皇后马哈里亚·杰克逊与其主要对手蓝调女王黛娜·华盛顿一起出现了一次。这3个人把拥挤的人群留到深夜两点，之后，年轻的艾瑞莎·弗兰克林献上了最后的赞美诗。艾瑞莎年仅21岁，却已经是一个饱受摧残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6岁。作为一流唱诗传教士C.L. 弗兰克林（“嗓音价值百万的人”）的女儿，她早已见识到教堂魅力下的阴暗面。被称为灵魂歌后的艾瑞莎·弗兰克林整整4年都未曾靠近跨界明星的生活，但她的歌声让白人听众看到了一丝光明。演唱着托马斯·多尔西的经典歌曲《亲爱的主，牵起我的手》，她把观众们的内在情绪全部表达出来了。毫无疑问，也正是在那时，她让人们相信自己站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地方。艾瑞莎·弗兰克林本人因为能在金的集会上唱歌而深受感动，在舞台上就往马哈里亚·杰克逊的手里塞了4张100美元的钞票。

怀亚特·沃克留在了芝加哥，帮助整理当晚大家的捐助，最后统计结果显示，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得到了整整10万美元的捐助。金本人先去了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市长先陪同他一起去了市政礼堂，后来又带他去了圣路易斯，参加另一场大集会，号召肯尼迪总统签署结束种族隔离的《第二份解放宣言》。单单这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就收到了15万美元的捐款，早已足够支付伯明翰贷款的款项。从资金角度看，这场运动收获了好运。斯坦利·利维森说自己“大吃一惊”，没想到《纽约时报》上一次中立的广告带来的收益竟是成本的10倍，而发表之后的数周，回应还在不断涌来。

金的助手也纷纷出差演讲，满足人们对伯明翰事件的关注。大西洋城想请金演讲，后来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承诺由阿伯纳斯前往，可最后实际去演讲的却是费鲍尔·史密斯。怀亚特·沃克则赶到遥远的奥尔巴尼和旧金山做演讲。伯纳德·李追随着沃克的脚步也到了旧金山，在市政中心领导了一次约有两万人参与的集会——参与者既有黑人，也有白人。那次集会上，警察局局长托马斯·卡希尔带头捐了5美元，“帮助伯明翰的人民”。李还对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四面楚歌

的运动发表了演讲。“他在这里振臂高呼！”安耐尔·庞德给金写了信表达感激，说格林伍德需要支持。

伯明翰事件意外地让金摆脱了电话里不知疲倦的唠叨，成了蜂巢中所有蜜蜂的明星。除了来自遥远的英格兰伯明翰以及古巴哈瓦那的集会支持，一系列自发的行动也引起了轰动。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整齐的白人郊区里的牧师们团结起来反对种族隔离。杜克大学宣布接受第一批黑人学生。5月里的北卡罗来纳州，游行示威活动几乎每天都会把逮捕带到新的城市：34人在罗利被捕；将近100人在奥尔巴尼被捕；400人在格林斯博罗被捕；1000人在达勒姆被捕。

凝聚的力量让金走出幕后，给了肯尼迪政府正面一击。情报指出，苏联在伯明翰危机解决后的两周内播报了1420条反美评论——这一数值是密西西比大学梅瑞狄斯危机最严峻时的7倍，是自由乘车运动顶峰时的9倍。肯尼迪总统5月21日参加非洲独立各国的峰会时强调了团结在自由世界中的重要性，而乌干达首相米尔顿·奥伯特则对伯明翰事件中的消防水龙头和“龇牙咧嘴的警犬”提出了正式抗议。肯尼迪总统甚至还在遥远的南达科塔空军基地看到自己的士兵们正参与游行，支持伯明翰运动——而这一微不足道的事件却成了重大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肯尼迪总统向李·怀特寻找答案。

5月20日和21日，肯尼迪总统私下里就各方对伯明翰事件的上述反响进行了咨询。司法部部长对全体内阁成员说，问题之一在于种族隔离就体现在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构成上。在伯明翰，“黑人们的职位都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商人们想知道“为什么要雇用黑人？他们不雇用黑人”。肯尼迪请文官委员会主席约翰·梅西对其他地方的人数进行简要总结：纳什维尔美国财政部的405名雇员中，只有4个黑人，而且都只是办事员；纳什维尔美国农业部的249名雇员中，只有2个黑人办事员；而美国商务部的114名雇员中，根本没有黑人雇员。在南方其他城市，数据也大致相同。因此，梅西同意司法部部长的看法，最好在“他们突然爆发”之前解决问题。

肯尼迪总统还在更秘密的情况下，与伯克·马歇尔以及最得力的政治顾问一起，评估了一系列伯明翰式的爆发。“现在，肯定已经有很多地方出现了严重问题。”司法部部长提出，他还说伯明翰的情绪已经更影响到北方的黑人。他报告说，就在前一天，芝加哥市市长戴利就已经预感到了“很多麻烦”，报告说身处社会底层小酒吧里的黑人们看到白人警官走进来居然没有跑，反而窃笑起来。司法部部长肯尼迪汇报称，戴利说“黑人们毫无来由地全都疯了，他们想要抗争……他说温和的黑人完全消失了”。关于这一点，劳伦斯·奥布莱恩说亚当·克莱顿曾坦诚地告诉过他，黑人领导新的斗争性“很好解释”——“黑人们会说：‘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游行队伍从我面前经过。我要领导这场游行。’”在与迪克·格雷戈里进行的保密会议中，马歇尔和罗伯特·肯尼迪报告称黑人领导人的竞争和憎恶已经让他们丧失了理智。“罗伊·威尔金斯讨厌马丁·路德·金。”司法部部长说，他回忆起了格雷戈里的嘲讽，就连自己的女仆都敢顶嘴了，还开玩笑说是自己建议格雷戈里解雇她的。

肯尼迪的顾问们厘清了困境：如果黑人中暴动的人们毫不让步，而且就连黑人领导人都抑制不了，那他们该如何避免伯明翰带来的一系列噩梦般的后果？肯尼迪总统随便提了一下立法，“合理限制游行示威的权利”，但很快就转移到了为公民权利立法的想法上。他所有的助手都认为，在黑人基本需要方面立法，是“咬紧牙关的忍痛之举”——通过艰难而彻底的方式结束困境。然而，他们对这个法案应该包含的内容方面产生了分歧。索伦森、奥布莱恩和肯尼斯·奥唐纳强调和解法律的政治责任在于其明确地将午餐柜台等公共设施列为共有。比起《第三条》，他们更倾向于参考1957年《权利法案》中的条款，这样司法部就能在法律下平等保护案件的诉讼有更大权力。然而，《第三条》中让政治顾问们称赞的地方恰好是会让司法部畏缩的原因——它零碎、任意且不够明确。压力集中到司法部部长身上，他会因保护每次黑人游行、推动泳池共有而饱受诟病。在鲍勃·摩西一案中，这种权威已被否定，而马歇尔也对肯尼迪总统表示，说自己也

不想要这种权威。罗伯特·肯尼迪同意了。他说,《第三条》会让黑人们“在外列队……每个人都会提起诉讼,而我们就会成为负责处理案件的人”。他说《第三条》“帮不上忙……简直糟糕透了”。

奥唐纳和其他人认为《第三条》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是民权法律方面业已建立的决定性考验。此时,肯尼迪总统问:“我们如何能在不涉及《第三条》的情况下逃过一劫?”另一方面,总统同意马歇尔的说法,认为《第三条》很杂乱,公共设施法律会吸引黑人的原因是它“对黑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用”。总统尖锐地问这样的法律是否会包含电影院。得知答案是肯定的时,总统坦率地说:“这样,我们就得同意这一点了。我的意思是,这是基本的。我们必须得同意。”肯尼迪总统倾向于认为,共同使用电影院这种事,会消解南方白人的痛苦。对总统来说,共同使用学校是棘手的问题,因为它触碰到了等级与地位最真切的恐惧,而工作和选举也是如此。但在现代社会,与黑人坐在一起最多不过是公共文明要求。他怀疑南方人在公共设施方面真正的“恼火”程度与其宣称的并不相符。“而且,我不关心他们会不会恼火,”总统说,“我是说我们不可能到处宣扬说你不能游行……而且这些事也没办法解决。”

会面要结束时,肯尼迪总统已经倾向于提出一项公民权利法案。然而,几乎所有的事都在不断变化中,他自己的政治顾问们也不会公共设施方面让步。在不远的将来,罗伯特·肯尼迪将会匆忙在白宫与各位州长、市长、电影院所有人、连锁店店主、律师、牧师、民权运动领导人以及其他人员召开一系列非正式会议——不仅是为国家行动做游说工作,更是在其立场上征询意见。总统同意与马丁·路德·金的会面应该排在上述一系列会面之后。“否则,看起来就像是他要求我这样做的,”总统说,“关于金的问题是别人都以为他是为我们效力的。所以,别人会说他做的所有事都是我们逼的。我们应该让他被围住……这段时间,金炙手可热,就好像马克思要来自宫一样。我宁愿先和南方的各个州长,或者市长,或者商人们见面。我的计划应该抢占先机。”

公开场合中，政府仍在继续思考更轻松的事，比如宇航员戈尔登·库勒的降落。不得不对种族游行做出回应时，官员们都只会说自己呼吁理智的进程。直到一代人后，随着肯尼迪的白宫中隐藏录音系统的公开，这些有关实际考量的卑鄙旅程才为人所知。而据透露给《纽约时报》的消息称，当时，对神经紧张及精神戏剧的唯一暗示是罗伯特·肯尼迪与作家詹姆斯·鲍德温之间痛苦的相遇。迪克·格雷戈里曾在自己的保密简报中建议罗伯特·肯尼迪与鲍德温进行商讨，而需要捷径的肯尼迪在介绍时，冲动地要求鲍德温召集一组深刻的思想家，解释公众的愤怒，说明黑人领导者无法制止这种愤怒的原因。第二天是5月24日，鲍德温随意召集了一些人组成一组，其中包括他的兄弟、律师、秘书、文学经纪人、电视制片人、一名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工作的白人女性、《芝加哥城市联盟》的导演以及导演带来的一名来自种族平等大会的年轻朋友。肯尼斯·克拉克作为重要学者出席，而艺术界出席的杰出人士则包括哈里·贝拉方特、莲纳·荷恩以及《日光下的葡萄干》的作者——剧作家洛林·汉斯伯里。这些客人秘密聚集在广场酒店附近约瑟夫·肯尼迪的家庭公寓中时，困惑的贝拉方特很想知道伯明翰政治危机后，罗伯特·肯尼迪为什么不和黑人民权运动领导人会面，反而要和各类人士进行紧急会面。

结束了与哈里·瓦赫特尔北方连锁店店主紧张的阴谋集团的秘密会议后，罗伯特·肯尼迪和伯克·马歇尔以及他的媒体助手埃德·格斯曼一起出现了。刚开始，鲍德温组织的会议非常坦率，司法部部长说政府对公民权利有着史无前例的忠诚，此外，与会的宾客们提出了一点挑战，认为肯尼迪应该做得更多。对于这一质疑，司法部部长回应称，黑人们越来越急躁，已经到了他无法控制的地步——尽管能想到的措施都已经权衡过，而且更多的行动正在筹划之中，但黑人们还是会听从诸如黑人穆斯林等危险极端主义分子的话，而那才会带来真正的麻烦。这时，来自种族平等大会的年轻人像打碎鸡蛋壳一样动摇了客厅内所有人的心情。“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麻烦，”他对肯尼迪说，“再这样我就要拿枪了。”

这个人是杰罗姆·史密斯，他和桃瑞丝·卡斯尔一起，曾在第一次自由乘车运动从蒙哥马利发展到密西西比的过程中，詹姆斯·法默极度需要志愿者时，响应了他的号召。从密西西比州立监狱被释放后，他致力于在密西西比的麦库姆推行公共交通设施的共同使用，就连鲍勃·摩西因为暴力事件多发而放弃麦库姆时，他还在坚持，因此，他被殴打过多次。此后，史密斯就成了种族平等大会在南方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卡罗来纳州，有时能拿到种族平等大会的薪水。这间屋子里的大部分黑人都不清楚史密斯的具体工作，肯尼迪就更不知道了。史密斯有语言障碍，他生气时，程度就会更加严重，而现在，他情绪激动，说话不太利索，但他还是告诉司法部部长，黑人穆斯林对任何人都不是威胁，因为他们没有发出任何挑战。在伯明翰，孩子们面对警犬和消防软管时，某个耶利米就在旁边看着。史密斯说，黑人们知道谁身处危险，而如果那些愿意赴死的人厌恶非暴力的时候，真正的麻烦才会来临。“我开枪时，”他说，“就准备吻别吧。”

会议没能按照之前的样子继续。肯尼迪试图把史密斯的生硬当作无业游民的打扰，想略过不谈，可鲍德温却问史密斯是否愿意为美国而战。“绝不！绝不！”史密斯大喊道。鲍德温希望这次交流能向肯尼迪展示史密斯和平主义的严肃性以及他深深的愤怒，可司法部部长却认为这种说法缺乏爱国主义精神。“你怎么能这么说？”他责难道。史密斯和肯尼迪一言一语，互不相让，史密斯大喊着关于监狱和殴打的事，而肯尼迪则极力想让他明白军事义务的严肃性。最后，史密斯说和肯尼迪坐在一起让他觉得反胃。透过这句话，鲍德温感受到史密斯谜样的表述背后是对在这里开会的绝望，是用夸张的方式向司法部部长表明非正义的迹象；而肯尼迪感受到的则是对他本人以及他的机构的羞辱，于是便让史密斯离开。这让洛林·汉斯伯里也站了起来，说待在这里，自己也觉得恶心。“司法部部长先生，这个房间中有很多很多有成就的人，”她狡黠地说，“但你最应该听的话出自刚才那个人的口中。”

贝拉方特因为担心肯尼迪会以某种方式利用表演者们来削弱黑人的抗议或者赢得1964年的选举而随行，可突然之间，他的担心变成了谩骂会让肯尼迪永远多了一个敌人。他试图消除不良影响，便回忆说自己曾和司法部部长一起，在肯尼迪位于核桃山的家中游泳池旁不带任何敌意地讨论过同样极富争议的话题。当时作为鲍德温律师出席的克莱伦斯·琼斯顺着贝拉方特的引导，提出了一些他确定马丁·路德·金会珍视的建议，比如与总统就种族以及有关种族隔离的行政命令进行“炉边谈话”等。但一切都太迟了。肯尼迪嘲笑他们不实际，很愚蠢。琼斯提到，金希望肯尼迪总统能用甘地在印度反对贱民身份时运用的激动人心的姿态反对种族隔离——颁布新的《解放宣言》或者亲自陪同第一批黑人学生走过华莱士州长发誓在学校门口设立的障碍，而司法部部长听到这些话，竟大声笑起来。伯克·马歇尔也笑了。而肯尼迪辩称哈罗德·考克斯以及其他被任命的种族隔离者是正直的法官时，黑人们全都笑了。此外，马歇尔说到司法部“专门人员”帮助联邦调查局保护公民权利工作者时，黑人们又笑了。肯尼迪认为黑人们对一流政治有一种无可救药的天真，而黑人们则认为肯尼迪在种族问题上过于幼稚。双方相互争论，失望和怀疑之后又耗尽了疯狂的情绪，开始互相嘲笑。汉斯伯里带头离开了被肯尼斯·克拉克称为“最具有戏剧性的经历”后，一切才算告一段落。

事情尚未完全平息时，克莱伦斯·琼斯试图圆场，便在午餐时，带着对方律师那种轻松的亲切感向肯尼迪做了自我介绍。琼斯握了握肯尼迪的手，说自己是在伯明翰认识的马歇尔。作为金的律师，琼斯听说过一些在司法部工作的人。“我希望你之前站出来，说了刚才那些话。”肯尼迪说。局面注定有些尴尬。琼斯从马歇尔处听说司法部部长说他是伪君子，没能为政府说话后，他向斯坦利·利维森抱怨了肯尼迪的傲慢，说肯尼迪竟然认为政府在伯明翰扮演的是积极的秘密角色，而琼斯则可以用肯尼迪自己的话反驳他。“他每次说话都不深入。”琼斯告诉利维森，而利维森则说肯尼迪和马歇尔“正处在疯狂的想象之中，认为

是自己而不是黑人们赢得了伯明翰一战”。

另一方面，懦弱成了肯尼迪对克莱伦斯·琼斯的第一印象。詹姆斯·鲍德温将那次灾难性会议的消息透露给《纽约时报》时他说：“罗伯特·肯尼迪没能在那次秘密会议上动摇黑人。”司法部部长反而进行了反击，以琼斯为例，对《泰晤士报》的詹姆斯·莱斯顿和其他人说，“稳健的”黑人在压力下退却了，让肯尼迪政府独自夹在两个种族的激进分子之间。琼斯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辩白后，肯尼迪在分发给伯克·马歇尔的那份报纸上草草写了一句刻薄的话：他是个好人，你真是有个好朋友。联邦调查局很快准备了一份报告，内容包含鲍德温在那次会议上邀请的客人，肯尼迪一下就会发现琼斯是3个与白人结婚的黑人之一；便小声说他们舒服地脱离了自己的种族而快乐地生活，肯定备受精神“合体”的折磨。几乎可以肯定，肯尼迪的个人敌意促使他几周后决定授权联邦调查局对琼斯的家进行监听。时机弄人，监听让J.埃德加·胡佛首先知道了马丁·路德·金的个人生活细节。

罗伯特·肯尼迪对鲍德温组织的会议也有其他反应，只是没有很强硬。横眉冷对各自散场几天之后，肯尼迪对古斯曼说，如果自己是黑人，肯定会强烈反对自己的国家。起初，肯尼迪的愤怒让亚瑟·施莱辛格有些害怕，但这位历史学家发现肯尼迪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也许肯尼迪最突出、最明显的回应是较为中立的一种——把愤怒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几天之内，肯尼迪在讨论雇用黑人这一话题的沉闷的跨部门会议上爆发了。他对缺乏行动的训斥相当尖刻，也相当有针对性，他们一起羞辱别人，尤其是林登·约翰逊。副总统负责总统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任务和他大多数的工作一样，并不涉及总统。约翰逊被彻底排挤出了政府的内部核心，商讨如何让参议员中的南方人接受紧急民权法案时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劳伦斯·奥布莱恩还向肯尼迪总统报告说约翰逊值得注意，因为他在立法会议上的表现很温和。之后，肯尼迪直接向约翰逊征求意见，而副总统却小声说，由于自己没见到该法案的任何草案，只是“从报纸上了解”种族问题，所

以“我无法为您提供建议”。对曾经叱咤风云的约翰逊来说，半公开的斥责让他对年轻一点的那个肯尼迪有了更多不满。

鲍德温组织的会议是一场真正的灾难，罗伯特·肯尼迪成了20世纪60年代在跨种族方面不成熟的代表人物。在伯明翰事件以及之前有关公民权利的考验后，那次会议由司法部部长摇摇欲坠。沾染上政治后，相当私人的事情不再如之前那样明确，公私之间的界限也已不再分明。司法部部长对联邦政府雇用黑人的事情很着迷，然而，如果公开提及这件事，必然会让大家注意到令人尴尬的事实。肯尼迪需要新的陀螺仪，学习对不同时代的听众来说什么才是合适的，也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与黑人“感同身受”。讽刺的是，这些焦虑让肯尼迪有了杜波依斯的“两面性”和金“踮着脚尖的姿态”——就连金本人都带着一种卡米洛特的感觉。

下一场大规模的风暴出人意料地发生在了密西西比的杰克逊，相互冲突的压力几乎要把梅德加·埃弗斯撕成两半了。金宣布伯明翰事件胜利后的第三天，埃弗斯就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中公开要求杰克逊市任命由黑人和白人共同组成的委员会，商讨同样的问题。市长艾伦·汤普森坚决反对，于是杰克逊当地的电视台就请埃弗斯在节目中做出回应，而直接让黑人上电视的新鲜感（“涉及种族问题，事情永远不会像之前那样，”埃弗斯说，“历史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杰克逊和整个世界都要在此时转变。”）让埃弗斯成了两个种族之间紧张感的汇聚点。很快，他在纽约的顶头上司格罗斯特·B.科伦特就对埃弗斯进行了一系列阻挠，还下达了偏执的指示。“我怀疑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将成为下一个被金的力量影响的地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分支领导人提醒道，“……但无论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工作都难以有效展开。”科伦特指示南方的各位代表，“伯明翰危机一旦过去”，就进行“猛烈”而迅速的“打击”。对埃弗斯来说，这些都是不值得羡慕的命令。他要独自尝试伯明翰事件中被监狱折磨后，实验性的奇迹——既没有大型游行和非暴力演讲，也没有金能采取的其他方法。

在5月余下日子中的大型集会里，埃弗斯带头要求进行谈判。汤普森市长轻易地避开后——他曾宣布将与亲自选择的由黑人和白人共同组织的委员会见面，指定曾赞扬他在种族隔离方面立场的黑人——埃弗斯试图加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对几家当地公司的抵制，因为那些公司都公开宣称支持白人公民委员会。最后，5月28日，杰克逊的黑人高兴极了，因为汤普森市长同意指定合法的由黑人和白人组成的委员会，还要在公共设施方面废止种族隔离，此外，杰克逊的工作机会也会面向所有人开放——包括警察的职位。这几乎是搬了伯明翰的计划，只是午餐柜台并没有成为白人与黑人共用的设施，但汤普森几个小时之内就否认说上述意见只是误会，镇压了这场庆祝。同一天，在失望的刺痛之下，直接行动爆发了。

陶格鲁学院的4名学生和1位白人教授在杰克逊伍尔沃斯的午餐柜台进行静坐示威。静坐持续了3个小时，闻讯赶来的记者们有足够的时间记录各种细节。年轻白人们组成的暴徒轮流往示威者身上涂番茄酱、芥末酱和糖——下一期的《新闻周刊》刊登了这一场景的照片。白人们把示威者拽下凳子，看到他们坐回去后，便朝他们喷漆。后来，越来越烦躁的白人们开始殴打示威者。教授被棍子打倒在地后，暴徒们还冲过去把盐撒在他头上的伤口处。之前曾是警察的本尼·奥利弗厚颜无耻地踢得示威者孟菲斯·诺曼满脸是血，直到后来警察出现逮捕了两人。第二天，踢人的照片就出现在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上。

在杰克逊，人们的情绪十分激动，一个没有穿鞋而且满身污垢的示威者待在美容店旁，而等着的顾客们一下就带他冲了进去，忙乱的侍者为她洗了头发和袜子，还近乎神圣地将她腿上干了的芥末酱擦掉了，这样，她就可以差不多得体地参加大型集会了。当晚，梅德加·埃弗斯走进珍珠街A.M.E教堂时，大批的人给了他长时间的热烈欢迎，他介绍伍尔沃斯的英雄们时，所有人再次爆发。最后，长时间的鼓掌似乎没了尽头——持续了二十多分钟，甚至更久——因为埃弗斯宣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要对杰克逊的种族隔离正式进行“大规模对抗”。埃弗斯

自己仍旧被钉在启示和顾虑之间。他并未同意之前的静坐，更没有参与它。除了他自己对年轻人纪律的怀疑和对密西西比严酷考验下自杀式暴力的担忧外，监督人的严密监管更让埃弗斯百上加斤。示威者们都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青年委员会中的活跃分子，对此，埃弗斯颇为赞赏，但埃弗斯也清楚，示威者们静坐的关键动机来自他们的同僚。有些人自3月起就在杰克逊和格林伍德之间不断往返。那个接受了紧急美容援助的人承认自己对鲍勃·摩西有一种近乎膜拜的感觉，而摩西那一周正好在陶格鲁学院教授选民登记课程。这些人并不满足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对巴尔克软饮料及哈特面包的抵制。

埃弗斯跨坐在这种分歧之上。他在演讲中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战略（“不要在国会山大街上买东西”）与学生们的精神（“我们将在此示威，直到自由到来”）结合起来。私下里，埃弗斯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标准的说法阻止学生们再次游行，他们还没有以实际为基础确定自己的目标，而且别人也不会因为他们的行动承担后果。但第二天，当一群学生不顾埃弗斯的建议再次来到市中心时，19人在越过警戒线后被捕了，埃弗斯在大型集会上赞扬了这些人的勇气。种族平等大会的大卫·丹尼斯和其他年轻领导人让杰克逊年轻的黑人们“带上牙刷”参加第二天的游行时，埃弗斯没有反对，而且他也没反对站上讲台的高中生的建议：“我们想对父母们说，我们希望你们一起参与，但如果你们不来，至少不要阻止我们。”在5月31日的游行中，埃弗斯眼睁睁地看着警察在城市露天广场逮捕了600名学生，还把其中很多塞进垃圾车里带到监狱。

有些学生羡慕埃弗斯的角色。埃弗斯很亲切，不像大多数成年领导人一样生硬，而且就算在爱默特·提尔事件后，他也没有退缩。埃弗斯是备受尊敬的领导人——他可以独自直面汤普森市长，对保释金进行谈判，收到的死亡威胁也最多。此外，学生们看得出，埃弗斯对自己事业的认同深深刻在他的脸上——埃弗斯的确狡猾，但并不虚伪，也不懦弱。他抗拒自己作为发言人而远离战略的虚伪角色。爆发的杰克逊运动显然与伯明翰事件极为相似，因此，埃弗斯私下里向马

丁·路德·金寻求建议。之后，他又给罗伊·威尔金斯打了电话。当时，600名黑人被捕入狱，整个杰克逊也因此沸腾，因此，他们无法继续假装直接行动在这次斗争中是偶然事件了。威尔金斯认为是学生们的静坐，而非抵制行动，让杰克逊连续4天登上了各大新闻报纸的头版。6月1日，威尔金斯搭飞机到了杰克逊，和埃弗斯一起在伍尔沃斯的警戒线边上被捕了，这让杰克逊再次登上了报纸头版。

5月30日，金给肯尼迪总统和司法部部长发了电报，要求见面，“以避免不必要的全国性灾难”。金原本希望举国上下对伯明翰事件的抗议能让他最终说服肯尼迪总统颁布反对种族隔离的行政命令。斯坦利·利维森同意金的策略，认为肯尼迪政府正在经历的黑人问题是前所未有的。联邦调查局在斯坦利·利维森家电话中安装的窃听器让J.埃德加·胡佛能派出情报员，提前提醒总统有关金的电报的事——以及金希望“给总统施加压力，让他签署行政命令”的事——联邦调查局还指出，金是与一位“共产党的秘密分子”共同制订的这一计划。当然，金并不知道窃听器的事，也不知道肯尼迪早已下定决心不在他“人气颇盛”的时候同他见面。金知道的只是李·怀特以肯尼迪总统太忙为由拒绝了自己的请求。

6月1日快到午夜时，金和利维森和克莱伦斯·琼斯进行了多方通话，讨论自己的回应。他向这两个人透露了一丝消息，说罗伊·威尔金斯被关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监狱中。金还说，梅德加·埃弗斯又打来了电话，但由于埃弗斯认为杰克逊警方对他的电话进行了窃听，所以并未透露任何计划。对金来说，威尔金斯近30年来的第一次是既严肃又充满希望的。“是我们为威尔金斯兄弟洗礼的。”他说。利维森说他希望像那样的新事物能席卷南部城市，还建议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应对之策。琼斯则谈到了他参加纽约教会组织时的动员讨论。

金打断了他们。“等待我们的是一次突破，”金郑重地说，“我们需要组织大规模抗议。”他们必须利用面前影响颇大的热情。金的计划是在华盛顿举行“大

规模游行”“并且在美国一致进行游行示威”。金说“肯尼迪的人”保罗·纽曼和马龙·布兰多答应施以援手，整个国家的工会也愿意贡献力量。利维森紧跟着金的思维，插嘴道菲利普·伦多夫也愿意加入。为了让肯尼迪总统“真正推动”民权立法，他们一致认为华盛顿的游行“可能需要十万万人”，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至少到8月才能完成筹备。

金说自己要给菲利普·伦多夫打电话，便挂断了电话，留下琼斯和利维森赞赏他突然之间的大胆。之后几天，他们都认为这通电话是数千通电话中最有价值的。一次与平时不符的热情谈话中，利维森对琼斯的妻子安说，金说到历史性机会时的方式“让人刺痛”，他还承认自己的想法“落后马丁一步”。琼斯一直说“那次谈话让他十分兴奋”。“我们都知道马丁非常谨慎、思虑周全，”琼斯声称，“而他说那一刻到来了。”联邦调查局的窃听速记员总结了他们洋溢着热情的话语：“他们认为所有令人兴奋的事情正在进行之中。”

威尔金斯搭乘飞机从杰克逊监狱回到纽约后，把与金在伯明翰的谈判要求相似的内容放在一边，转而采用了一种改进过的策略。埃弗斯和其他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发言人宣布小规模示威游行的“第二阶段”开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会最棒的律师们为了表示支持，也进行了一系列诉讼。为了保持晚上大型集会的士气，威尔金斯还招募了一些包括莲纳·荷恩在内的名人，而之前经受了詹姆斯·鲍德温——罗伯特·肯尼迪会面的精神打击后，荷恩就已经成了游行的志愿者。汤普森市长总是将会议延期或者撤销，打乱他们的计划。一天，埃弗斯宣布汤普森承诺在30天内雇用第一批12名黑人警察。然而这一承诺最后不了了之，汤普森转而宣布他已签署了法庭命令，禁止进一步的游行示威活动。反对这件事的律师们还在讨论其合法性时，勇敢的学生们就已因盲目游行而被捕入狱。那天晚上，梅德加·埃弗斯非常紧张，他听到了某种动静，便拿着来复枪在屋子里巡查，却发现那是9岁的儿子在浴室弄出的声音。

6月的第一周里，僵局让杰克逊消失在报纸的头版上，因为约翰二十三世教

皇在罗马去世了，而肯尼迪总统也将前往檀香山进行政治之旅。对于政府在民权立法中应包含内容的内部讨论，政治评论家们有很多猜测。在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针对电影院种族隔离而进行的不间断游行中有 257 人被捕，而且还使用了催泪瓦斯，这也成了新闻。在北卡罗来纳州，有 6 座城市都在进行大型游行示威活动，其中还包括莱克星顿和格林博罗，6 月 6 日，警察们还逮捕了以北卡罗来纳州农业技术州立大学学生会主席杰西·杰克逊为首的 278 名学生。新的种族闹剧也影响到了纽芬兰——那里的 40 名黑人士兵不满战略空军飞行站附近的查理快餐店对他们的拒绝。然而，事情还是将大部分运动人士吸引到了密西西比，仿佛是在为梅德加·埃弗斯的暗杀做准备。

约翰·多尔已经到了杰克逊。自从 5 月 14 日他在医院告别了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后，他就没机会回到华盛顿，也很少有时间给家里打电话。多尔的紧急案件很多，不仅有伯明翰学生面临被开除的危险的案件，还有针对哈特曼·特恩鲍以及鲍勃·摩西密谋炸毁特恩鲍家的案件，此外，他还要为预期的大学共有战争进行一系列法律和军事上的准备。正是这些准备让他不断往返于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之间。6 月 5 日，多尔成功地陪同第一位黑人学生走进了密西西比大学的法学院。

交纳了保释金后，鲍勃·摩西再次获得了自由，回到了北方。杰克逊事件爆发时，他正和查尔斯·谢罗德以及蒂莫西·詹金斯一起在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6 月 3 日的演讲中，摩西说如果司法部没能撤销其在格林伍德进行的保护性诉讼，“黑人们今天仍要将游行进行到市中心的法院去”。然而，下一句话刚出口，摩西就说明了自己不愿进行自主服务或夸张的言论。“当时的黑人们——伯明翰事件之前的——没有做好大规模游行的准备，”摩西承认，“承担这些的应该是成年人，而非孩子。因此，我们没有进行人民的游行。”金在塞尔玛组织大规模游行之前将近两年中，摩西已经预想到将大型直接行动的压力施加在选民登记事务上。“现在，伯明翰事件之后，组织这类活动的可能性出现了，”他对一小群

听众说，“我不确定。当然，伯明翰对杰克逊正在发生的事负有直接责任。”摩西回到了密西西比，及时在6月10日周一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培训班。领导人原本包括高地民众学校的柏妮丝·罗宾逊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安耐尔·庞德，然而周日早上，庞德却不见了踪影。

庞德搭乘旅游公司的巴士到了威诺娜。和她识字学校的另外5名学生一起，庞德再一次去了塞普提玛·克拉克的学校。那一周，他们在教师培训班上学习——连学校的菜单都是“自由斗争卷”“完全公民权烤鸡”“识字土豆沙拉”以及“兄弟情谊宾治酒”——之后，他们往回走，经过佐治亚和亚拉巴马，到达离格林伍德不到30英里的最后一个休息站。看到庞德走进威诺娜巴士站白人等候室，柜台后面的服务生便把她的支票簿揉成一团，厌恶地甩到墙上，大喊着：“我受不了了。”警察和一位高速公路巡警立刻赶来，不顾庞德提出的州级商务委员会1961年的规定，把黑人们赶了出去。庞德刚刚往学生们脑子里装满了自由主义歌曲和领导人课程，站在外面人行道上的她无法忍受这种羞辱，便决定记下巡警的车牌号，准备投诉。这让年长的警察无法接受，便逮捕了庞德和学生们。

警察们在警局拘留室中一个接一个地审问被逮捕的人们。首先被审问的是来自格林伍德的16岁的琼·约翰逊，他们问琼是否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员，琼给出肯定的答案后，一名警察就开始扇她耳光。警察们问她是谁雇她来的，还问她的上司准备在威诺娜做什么，激动的情绪愈演愈烈，另一个警察拿起棍棒一下打在琼的后脑勺上。警察们把呜咽的约翰逊带到一间狱室后，就把安耐尔·庞德叫进来了——庞德个子很高，有着女校长的气势，而且带着一种庄严感，说自己和学生们不恨警察，而且只要警察们称自己为“黑鬼”或“贱人”，就坚定地拒绝称呼警察们为“先生”。庞德向那位公路巡警坦承自己记下了他的车牌号，准备向联邦政府投诉。庞德的所有回答让已经越过暴力界限的警察们愤怒不已。他们一边咒骂着博比·肯尼迪，一边把庞德打到了地上，之后，警察们拽着庞德脚，直到把她打得满头是血，头部肿胀不堪。庞德的一颗牙被打掉了，一只眼

睛也快被打出眼眶了。警察们推推搡搡地把庞德带到去狱室的路上，庞德一直跌跌撞撞地扶着走廊的墙。在她的学生们看来，这样的场景让人十分恐惧，更是吓坏了下一个被叫过去的法妮·路·哈默尔。那时，复仇的心态已经占据了警察们的心。他们把哈默尔带到了一间空狱室，一下把她扔到小床那里，按住她的头，命令一个黑人囚犯拿着棍子打她。哈默尔尖叫时，警察们却问她那天是否见到了马丁·路德·金来奚落她。后来，警察们又带来了一名囚犯，让他坐在哈默尔的腿上，之前那个囚犯打累了，就换他来打。最后哈默尔保护头部的手指都被打成了青紫色，后背的肿胀已经硬到像骨头一样了。接着，警察们不仅关上了狱室的门，还关上了警察局的门，开始盘算面对不可避免的调查时要如何自保。

午夜时分，也就是威诺娜警察局中殴打事件发生约12小时后，怀亚特·沃克与金以及他身处全国各地最亲近的顾问进行了多方通话。金对要在华盛顿进行的游行征求意见。游行可行吗？菲利普·伦多夫会同意把他10月准备进行的针对工作的游行与8月为了自由而进行的游行同时进行吗？金问这些问题时，已经透露了自己的倾向——“必须要用大行动”支持民权法案，在众人期待下，肯尼迪总统随时可能宣布。“否则我想这件事不会过去，”金说，“这能让总统摆脱困局——他一直知道这件事不会过去，所以可以在政治上利用一下，说自己努力过。”

对金来说，首要问题是把游行的“中心”放在总统肯尼迪身上还是国会身上。“我对总统的感情很复杂，”金说，“我只是不确定。”长久的讨论得到了两个意见。第一，他们可以将一位参议院中阻碍办事的南方议员确切的立场作为目标。然而克莱伦斯·琼斯并不赞同，他说参议院的时间表难以预测，而大规模游行的后勤工作十分复杂，可能无法协调。第二，他们决定不与罗伊·威尔金斯提前结盟，以免威尔金斯拖延，甚至在相互冲突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会议上公开声明，抢占先机，之前他就是这样对待伦多夫6月针对黑人事业的游行的。他们反而要先获得伦多夫私下里的同意，再公开宣布游行的消息，迫使威尔金斯支

持。斯坦利·利维森要求金那一周在纽约时至少先进行初步声明。通话快要结束时，安德鲁·扬突然说安耐尔·庞德可能已经被捕了。“20分钟之前别人告诉我的，”扬说，“我正努力说服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

南方非暴力统筹委员会的学生劳伦斯·盖约特之前曾和鲍勃·摩西一起在格林伍德被捕，他问警长朋友们出了什么事时被带到监狱，再无音信，实际上他被捕了，也被殴打过，威诺娜的秘密越来越扑朔迷离。外人还不知道威诺娜是暴力的捕蝇器，于是恐慌便在运动的内部人士中蔓延，因为沉默就是恶兆。亚特兰大的威利·布兰顿几度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被告知除非他是代理人才能得到信息，而他不去监狱就无法找到代理人。联邦调查局答应调查，但联邦调查局在当地没有办公室，而调查员们也在杰克逊忙着。周一一整天都没有特工到达威诺娜，而最有可能对这一危机做出回应的联邦长官约翰·多尔已经离开密西西比州前往亚拉巴马州了，因为亚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周二将“站在学校门口”，阻止黑人入学。

几周以来，华莱士和肯尼迪政府在这一紧要关头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肯尼迪有早已动员好的亚拉巴马军队支持伯明翰方案，而且，之前密西西比大学事件也让他有了经验。而华莱士则在校园里指定的注册地点旁边设立了临时办公室安顿下来，一群士兵和刚安好的空调的嗡嗡声背后隐藏着他的计划。最后，尼古拉斯·卡岑巴赫独自走来与华莱士见面。卡岑巴赫的媒体顾问在地上画了一条线，作为种族隔离的临界标志，卡岑巴赫便站在线后面的讲台处。他说自己有一份肯尼迪总统的宣言，要求华莱士放弃非法抵抗，遵从联邦法庭在取消种族隔离方面的命令。华莱士朗读了一份挑战性的宣言作为回应：“无可否认，中央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我们敬畏上帝，而不是政府。我们今天践行的自由是开国者们为我们留下的遗产。”华莱士说完后，卡岑巴赫象征性地4次冲向他，让他直接关上了门，之后，卡岑巴赫就走了。同时，摄像机看不到的地方，两名黑人学生静静走向自己的宿舍，而之后华莱士也没有阻止国民警卫队小队进入校园保护他们。

华莱士和政府之间心照不宣的交易暗藏着某种后果。通过在公众的反抗面前支持两位黑人学生——只派出了卡岑巴赫一个人而不是平常的护送人员——罗伯特·肯尼迪确保了华莱士没有真正反抗自己的命令，没有阻止两位学生入学，这让肯尼迪避免重蹈“密西西比”的覆辙，不必烦恼因州长蔑视法庭而起诉他。这样做的代价则是华莱士可以发表带着轻蔑的全国性讲话，而且面对的人不是颇受争议的两位黑人，而是联邦政府的代表。这种差别提升了华莱士的形象，将他从罗斯·巴内特一样的边缘形象变成了总统候选人。他反对华盛顿方面的立场以及行善的官僚形象设定了保守的标准，这一有关种族的内容被进一步公开洗涤之后，主宰美国政治长达一代。

一个不太重要的影响是肯尼迪总统感到有必要做出补偿性的表现。就在前一天晚上，总统在美利坚大学就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核武器需要承担风险方面发表了重要演讲。他宣布了当时情况下对核试验的暂时终止，这是与苏联保持禁止核试验协定的新举措，也说明了“所有政府和社会系统均没有堕落到让他的人民承担没有美德这一恶名的地步”。周二，那次演讲立即获得了成功，大家高兴地认为这是远离冷战的一步，也是在已故的教皇约翰的《和平于世》的精神下做出的和平之举。然而，头版还报道了最新的种族冲突——马里兰州剑桥法庭外有25人被捕，而且在弗尼吉亚州丹维尔发生了比布尔·康纳事件更严重的袭击案，当天在市中心抗议种族隔离的65名黑人中，有48位被消防水管和警棍送进了医院。（“我们会用软管浇退所有的示威游行，准备填满所有的监牢。”丹维尔市市长朱利安·斯廷森扬言道。）

肯尼迪总统和司法部部长焦急地等待着与华莱士州长心照不宣的表演带来的结果时，马丁·路德·金关于“在丹维尔暴力执法的禽兽行径”的电报送来了。金再次断言“黑人的忍耐随时可能达到爆发的边缘”，请求政府寻求“公平而道德”的解决。“我以庄重以及基督教兄弟情谊为名，请求您想尽办法，努力克服丹维尔以及整个国家最令人痛苦的困境。”金更粗略、更公开的消息出现在《纽

约时报》的头版上。金警告说，如果肯尼迪总统介绍了法案后就按照计划前往欧洲，那么这个历史性的新法案可能会被浪费了，因为这个法案的支持者们准备在华盛顿进行游行。《纽约时报》强调了金的论断，说法案的通过需要“总统及其名望的全力支持”。此外，《纽约时报》还引用了金的请求——首先，肯尼迪总统必须把种族问题当作道德问题，认为“我们很少，甚至从未听过”白宫的说法。

鉴于总统最近对金的意见很是敏感，很可能是这些刺激的话促使肯尼迪总统做出重大决定——就民权问题即兴发表全国性电视讲话。总统这样做的原因尚不明确，因为总统本人提出要演讲时非常突然，政府内部都不像之前一样有酝酿的时间。总统周二对顾问们说自己可能在当晚的电视讲话中宣布民权立法的消息，受惊的顾问们都不赞同。政治顾问肯尼斯·奥唐纳和劳伦斯·奥布莱恩很是反对，认为民权法案本身会招致重大的政治危险。他们认为总统不宜用个人承诺带来更大的危险。对讲稿撰写人泰德·索伦森来说，比起上述弊端，肯尼迪突如其来的匆忙更让他难以应对，因为之前从未有过这类演讲稿。关于总统想要表达的内容也从未与参议院或其他人商讨过。在如此敏感的话题上盲目出击似乎是总统最不合适的突发奇想，但肯尼迪拒绝放弃。伯克·马歇尔后来回忆说是罗伯特·肯尼迪自己想出了演讲的思路，而司法部部长则记得是他的兄长“在那天刚决定的……他给我打了电话，说准备当晚行动”。大约傍晚6点时，肯尼迪总统要求8点时占用15分钟的电视时间。肯尼迪向索伦森提出了一些大致想法，还给了他一些自己欣赏的路易斯·马丁的只言片语，就让索伦森在两个小时之内写好演讲稿。

离8点还有几分钟，索伦森带着草稿走进内阁会议室，肯尼迪总统认为草稿总体还可以，只是太僵硬了。他自己加入了一些热情而华丽的段落后，便口述给伊芙琳·林肯，同时，索伦森则念给格洛丽亚·李夫特曼听。她们重新录入了篇章段落，为了符合讲话的目的，观点会有所变化，这时她们就要把新的段落加进去。房间里的其他人人都知道这篇演讲稿永远不会写好，因此都害怕极了——自由

世界的领导人即将在全国性电视讲话上即兴演讲——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总统看上去渐渐达到了最佳状态，既热情又冷静。“好了，伯克，”总统突然说，“你肯定有一些想法。”

总统面对镜头说的第一句话中有“这应该有可能”一句，听上去有些不合适，但他接下来引用了一句路易斯·马丁的话，对比了美国黑人新生儿和白人新生儿的人生，缓和了气氛。“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道德问题，”总统说，“这一问题如《圣经》手稿一般古老，如《美国宪法》一样清晰。这一问题的中心是，是否所有美国人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我们是否能像自己被对待的那样对待其他美国同胞。”

这些话沿着宗教的路线继续，显然不是滔滔不绝的总统意料之中的。这席话甚至改变了他面对全球斗争的方法：

“我们在全世界推行自由，我们是认真的。我们珍惜国内的自由。但我们要对世界——更重要的是对他人说出下面这番话吗？这是一片自由的土地，但对黑人来说不是；我们没有二等公民，只有黑人才是；我们没有等级或种姓制度，没有贫民区，没有优等民族，除了面对黑人的时候。

“到了国家兑现承诺的时刻了。发生在伯明翰以及其他各处的事情放大了呼唤平等的声音，没有一个城市、一个州或一个立法机关可以谨慎地选择忽略这些……因此，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国家的道德问题，也是人民的道德问题……巨变即将发生，我们的任务和责任就是让这次革命、这次改变为所有人带来和平与帮助。”

肯尼迪脱离演讲稿继续说着，概述了他即将推行的法案。他不断地插入一些短句，说明种族问题不再是外部慈善机构或外部偏差的问题：“我们应该给他们和自己一个更好的国家。”肯尼迪说完之后，笨拙地做了结尾。不过，那不重要。

在亚特兰大的金立刻起草了一份回应，由于打字问题和拼写问题，错误很多。“我刚刚听到了您对整个国家的演讲，”金写道，“这是总统为所有人的正义

和自由发出的最动人、最深远也是最明确的呐喊。您慷慨激昂地谈到了种族融合斗争中涉及的道德问题。”同样兴奋不已的斯坦利·利维森给金打电话时，说肯尼迪总统做到了“你长久以来要求他做的事”。对利维森来说，这篇历史性的演讲强调了他们把华盛顿游行的重点放在国会而不是肯尼迪总统身上的重要性。

在杰克逊，埃弗斯的3个孩子——包括蹒跚学步的凡·戴克，都在父母的床上爬来爬去，争论着该看哪个电视节目。他们的母亲允许他们午夜过后再睡觉，好问问父亲对总统精彩发言的看法。听到父亲的车回来时，3个孩子就一起朝家门口跑去。梅德加·埃弗斯刚刚参加了一次沉闷的策略会议。700名入狱的杰克逊游行示威者中，只有9人出狱了。当地白人警察炫耀着胜利并未被让步玷污。此外，白人媒体和黑人媒体都认为杰克逊运动规模较小、情绪低落、意见不合。私下里，埃弗斯曾想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同意邀请金加入行动，然而上司却不同意这个旁门左道的观点。终于回到家后，埃弗斯走出他的奥尔兹莫比尔牌汽车，手里拿着一摞印有“黑人必须行动”字样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汗衫，闷热的6月，这些汗衫在密西西比州的销量并不好。他穿着白色的男式衬衫，正好能让躲在街对面金银花香气中的杀手看清目标。一声枪响后，一颗子弹从30-06猎鹿枪中射出，打穿了埃弗斯的背部后，从他的胸口穿出，最后打破起居室的窗户，停在厨房的冰箱上。屋子里的4个人在民权运动准备过程中接受了严格训练，像在狐狸洞口的士兵们一样趴在了地板上，察觉到没有更多枪声后，他们全都跑了出去，发现埃弗斯跌倒 in 门边。“父亲，求你了，快起来！”孩子们大喊着。接着，一切就陷入了血海和尖叫之中。邻居和警察一起把埃弗斯放到垫子上，抬进警车之前，他没有说一句话。“扶我起来！”埃弗斯大声喊，“放开我！”这就是梅德加·埃弗斯最后说的话，一个小时之后，医生宣布埃弗斯离世。

伯明翰事件的解决方案提出10周之后，统计学家们发现其间进行了758次游行示威活动，美国186座城市中有14733人被捕。恰逢此时，埃弗斯谋杀案

发生了。两个要求种族融合的人将自己绑在俄亥俄州立法机构的走廊上。一个亚拉巴马州的暴徒朝一位白人牧师的家扔石头，因为那位牧师同意黑人到自己的教堂祷告。讽刺的是，少数平静的城市中有一个是密西西比州的格林伍德——鲍勃·摩西和柏妮丝·罗宾逊正在那里开办培训班，“不受外界动乱的干扰”，也包括不理睬朋友们长达4天的失踪——埃弗斯遇害的当天，失踪的人终于走出了威诺娜监狱。“那情景太吓人了，”罗宾逊向迈尔斯·霍顿报告时说，“安耐尔·庞德的眼睛肿得很厉害，由于殴打而充满了血丝，一边的臀部肿到比另一边大两倍。哈默尔夫人的头部都是瘀伤，臀部也都肿着。”那周，他们提前一会儿结束了培训课程，这样所有人就都能到杰克逊参加埃弗斯的葬礼了。恐吓没让任何人退缩，反而又有来自格林伍德周围的人前来担任登记课程的老师。罗宾逊的报告到达高地民众学校时，霍顿面前已经堆起了许多难题：10名警察突然袭击了他在诺克斯维尔附近的新校园，还以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进行跨种族行为为由逮捕了那周参与课程的全部27名成员。当地警察宣布他同意袭击的行径，是为了阻止愤怒而可怕的分子采取治安行动——有一个人曾威胁说“要带上枪，杀得黑人们血流成河”。警长封锁了高地民众学校校园，4天后，有人纵火把那里烧毁了。

单单在威诺娜，约翰·多尔就同时面临着3起联邦诉讼。一起诉讼是要求当地警察不得干涉巴士站的种族融合行动；另一起是要推翻针对黑人们的犯罪判决；还有一起要求惩处在监狱中施以暴力的警察们，可这起诉讼只是白费心力。多尔挤出了一点私人时间参加在杰克逊举办的葬礼——自两年前秘密的探查之旅起，他就把梅德加·埃弗斯当成了朋友和同盟——然而，就在参加葬礼时，他还是遇到了紧急情况。市中心沉默的纪念游行快要结束时，显要人物便走进柯林斯殡仪馆参加小型私人仪式，留下5000名游行者的独自散去。5000名游行中，有100名年轻人不顾法庭命令，把公众的沉默当作自己聚集的机会。他们唱起了《哦，自由》作为挽歌。接着，有人唱起了快节奏版本的《我小小的光亮》，人们便拍着手，回到了大街上。“现在，他们正朝市中心走去，”一个敏锐的电台播音

员告诉旧金山的听众们，“我认为一场游行开始了。”

警笛声和喊声盖过了歌声，黑人们停下来，对面是很多消防车和一群佩着手枪的警察。那天的气温有 103 华氏度。一些黑人大喊着：“我们要凶手！我们要自由！”自 6 月 1 日的游行后，两周以来，这些年轻人都不被允许参加游行。6 月 14 日，美国国旗纪念日当天，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因为随身携带小版美国国旗被捕，因为杰克逊的白人警察不允许黑人出现在任何公开场合。警察们认为这场即兴游行是城市自酿的苦果，自城市允许黑人悼念梅德加·埃弗斯的决定做出后，这场游行就在意料之中。警察们带来了消防车和警犬，年轻的游行者们开始扔石头时，他们就把手枪上了膛。突然之间，有个人很像电影中关键时刻出现的贾利·库珀一样讲话，于是，警察们用警棍打伤了几个，还逮捕了 30 多个。

万分惊讶的克劳德·西顿在《纽约时报》中写道，多尔走到暴乱的中间，“瓶子和砖块不断扔过来时”，他还用双手护住头。多尔大喊着自己的名字，告诉人们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话让人群暂时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一个愤怒的年轻女人朝多尔冲过去。“我们太愤怒了！”她当着多尔的面大喊，接着，由于反感，她磕磕绊绊地说：“他们准备怎么做……我们准备怎么做，我们就等着司法部行动吗？”“这个，给我们一点时间。”多尔请求道。有个杰克逊的警察看到后面的黑人犹豫不决，就向多尔喊话，让多尔确保黑人们都知道他是谁。“我叫约翰·多尔，”多尔大声说，“多——尔。我在华盛顿的司法部工作。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支持正义！”他走上前，喊出了戴夫·丹尼斯和其他几位运动领导人的名字，说出了那些人的入狱次数，还说那些人也希望人们能散去。如奇迹一般，人们都走了。那天，多尔并没来得及停下脚步。他在华盛顿刚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还没有名字，后来，多尔的同事让他抓紧时间，终于想出了一个名字。

在杰克逊，对美国种族关系已有改变的州来说，梅德加·埃弗斯还未下葬的遗体被认为是十分神圣的。对他的谋杀颇有蹊跷，却也恰到好处，在历史的节点上有种违背常理的恰当感——肯尼迪总统把种族民主当作道德问题的当晚，一

颗子弹从背后射出。这件有关种族的事很神秘，也是自爱默特·提尔葬身塔拉哈奇河后第一个全国性事件。在微妙而重要的认识转变中，人们认为这次事件是政治谋杀，而不是私刑，还添加了种种个人或历史性推测。从未听说过梅德加·埃弗斯名字的白人不断念叨着他的名字，仿佛那几个词带着传奇的光环。骨灰盒放在缓缓走过南方的火车中似乎很合适。火车的目的地是华盛顿，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埃弗斯下葬前吊唁了。埃弗斯的离世引发了大量重新评估、转化以及夸张的言辞，然而特别的情绪也让领导人们有了新的判断。送葬火车离开杰克逊前，有些领导人就已经在激烈争吵了。

埃弗斯被害的第二天早上，多数党领袖卡尔·艾尔伯特给肯尼迪总统打了电话，为背叛民主党的人出人意料地拒绝政府4500万美元的公共工程法案而道歉。“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好。”艾尔伯特说，于是总统立刻就明白了。“是公民权利造成的。”肯尼迪回答道。艾尔伯特则表达了自己的惊讶之情，说就连委员会的高官们，也就是“众议院中地位最高的人”，都已脱离政府，转而致力于种族政策的修正案，争论是该加强还是该削弱。这一问题分化了民主党人士。“我深感遗憾。”艾尔伯特很是怯懦，而总统则试图安慰他。“是事情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总统疲惫地说，“上帝啊，你知道的，就好像在密西西比杀了那个人的是他们……我是说，所有事都掺和进来了。我的意思是，所有事都变得跟它有关。”艾尔伯特也认为民权运动的喧嚣“压倒了整个计划”。他告诉总统，要想通过农业法案和公共交通资金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从国外援助到空间预算，与之相关的问题上，公民权利就是失败的界限。

第二天，3000名反对种族隔离的示威者出现在他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办公室外时，罗伯特·肯尼迪几乎就快要被压垮了。为了说服游行，肯尼迪发表了演讲，称游行示威没有必要，因为总统的电视讲话已经说明，政府的立场和他们一样。但这些游行粗鲁无礼，喧闹的人们大声问肯尼迪有关格林伍德枪击案以及威诺娜殴打案的情况。让司法部部长更为困扰的是，他无法反驳指责司法

部在自身雇用方面就存在着种族歧视的公告。肯尼迪知道自己已经在尽力解决这一问题了。他要求进行内部调查，还进行了招募活动，面对官僚主义的怠惰，肯尼迪还曾大发雷霆。然而，公开这些努力只会带来痛苦的结果——伯克·马歇尔刚刚报告说民权事务部雇用了约10名黑人办事员，但没有一位律师或行政官的行政等级超过11级。更糟糕的是，这些事实会给肯尼迪在自己部门的命令招来严厉的质疑。看上去不可避免的是，忏悔的政客都没有权力，而且办公室的名望并不是靠司法部部长对游行者们说些无关痛痒的话而积累的。司法部部长试图摆出高过艾森豪威尔时代的雇用数据以巧妙过渡这一问题时，一个大喊着的游行则反驳说自己很少看到有黑人从司法部的大门里走出来。肯尼迪突然崩溃了，不想再妥协，反而想表示轻蔑。“是否能被雇用取决于个人能力，而非肤色。”他冷冰冰地说，却只引发了人们大声的嘲笑。

确定梅德加·埃弗斯离世的消息时，金正在纽约参加甘地人权协会这一周年资金筹集活动。通过克莱伦斯·琼斯传给金的消息中，有一条从杰克逊运动中转送来的建议——甘地人权协会应该用埃弗斯命名自己的保释资金。毕竟，埃弗斯为改革运动献出了生命，把非暴力直接行动带到了核心之处的密西西比——一天之内，600名密西西比人被捕。金赞同这条建议，恰好他自己的甘地主义导师之一莫迪凯·约翰逊也出席了这次资金筹集活动，而且莫迪凯很愿意带头进行这一计划。于是，在同一天，两个人在午宴后一起宣布了甘地人权协会“梅德加·埃弗斯纪念保释基金”的设立。

对罗伊·威尔金斯来说，这就如同金偷走了埃弗斯的遗体一样。金害得埃弗斯被杀已经够糟糕了——是金将游行的狂热从伯明翰带到了密西西比，迫使埃弗斯采取措施，结果果然如威尔金斯预料的那样，很快便招来了白人的暴力报复。而现在就更糟了，因为金竟想通过保释资金的形式，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员成为直接行动的代表，甚至是所有事务的代表。尤为糟糕的是，金竟如此急切地要从自己的入侵中筹集金钱。其他独立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而以埃弗斯

命名的基金也纷纷出现——包括《芝加哥卫报》，它在奇迹的头版做出了如此请求——却使金的基金达到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等级制度的愤怒。威尔金斯指示下属在谋杀案发生的当晚联系埃弗斯的夫人，他们让埃弗斯夫人签署了书面协定，同意纪念她丈夫的基金应该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控制，而不是由“金的组织”控制。

甘地人权协会很快就同意了这项要求，然而，憎恨业已释放。在一封虚情假意的条约书中，甘地人权协会主席西奥多·基尔巧妙地指责了威尔金斯通过报纸进行报复。斯坦利·利维森刚听到这些消息时，便对朋友弗兰克·蒙特罗说：“你说的愤怒由来已久，根源很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对金的反对一直都是一 种耻辱。”蒙特罗是威尔金斯的老朋友，但也是他在金的甘地人权协会午餐会上，带来了莫迪凯·约翰逊，他说争端不过是双方部下超强竞争的结果，试图平息事态。但利维森坚持认为不可以，因为恶意和诽谤“全部来自其中一方，尽管我承认这听上去不太正常”。蒙特罗很惊诧，于是利维森便向他详细讲述了对威尔金斯的不满。“罗伊和他除了约翰·莫塞尔之外的员工……一直针对马丁。”利维森说。多年以来，他们不断使用“卑鄙手段”，传播关于金的谣言——举例来说，他们扩散过“恐怖的”谣言，说金1960年搬去亚特兰大是因为黑人保险公司每月给他100万美元，让他“阻止黑人们”。利维森还说，尽管如此，金还是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各个机构讲话，开设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分支，在演讲中称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利维森不知道金为什么“能在别人诋毁他的时候保持耐心”。实际上，利维森继续说，金的耐心“让我很恼火”。利维森不停地走下去，这段话成了联邦调查局窃听到的利维森最长、最激动的话。

金本人生怕自己的出现会激化矛盾，差点不去参加埃弗斯在杰克逊的葬礼。最后，他还是去了，但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或声明。公共悼念阶段时，悼词在葬礼严肃性允许的最大限度上尖锐地对金的方法表示轻视，而金都默默承受了。“未免忘记——似乎有的人已经忘记了，1952年，就是在这里，在密西西比爆发了

第一次遍及全州的非暴力抗议活动。”T.R.M. 霍华德说，“……我们分发了约4万份汽车保险杠标记，标记上写的是‘不要在不允许你使用卫生间的地方购买汽油’。我们的英雄人物梅德加·埃弗斯就是首先践行这一做法的人之一，这一行动比金博士在蒙哥马利组织的游行早4年。”从那所共济会教堂开始，金就和罗伊·威尔金斯一起穿过了杰克逊，以示团结，之后就启程去机场了。6月15日周六，约翰·多尔在那场即兴游行中单打独斗时，金已经离开了。

金的谨慎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好处，也许是因为对前来参加梅德加·埃弗斯葬礼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领导人来说，杰克逊僵局的本质让金成了持久而令人烦恼的对手。将游行示威拖延到埃弗斯离世之后，接着又推迟到葬礼之前，现在，示威活动终于要进行了。汤普森市长表示在共同使用午餐柜台和其他事上，自己绝不会让步。在通过伯明翰式的大规模游行保障伯明翰式的结果方面，这次暗杀带来了比以往更大的行动压力，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导人们认为这种策略是对金自杀式的礼敬——此外，由于他们可能采取金的非暴力方式，但也有可能无法让杰克逊的白人改变想法。令人痛苦的是，他们的困境如此明显，就连一直置身事外的詹姆斯·梅瑞狄斯都站出来，提出了折中的建议——以梅德加·埃弗斯的名义举行大罢工或停工斗争。他认为这种策略也许会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同意的抵制运动施加压力，但他提出的方法被格鲁斯特·科伦特严厉地拒绝了。“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斗争，这种情况下，不用一个业余人士告诉所有了解情况的人该怎么做。”这是虚张声势，因为科伦特无法确定他们是否会恢复游行。埃弗斯葬礼之后的第二天，科伦特和其他全国性长官便离开了华盛顿。

威尔金斯见到了自己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律师的侄子罗杰。发现叔叔一直以来的气度都改变了后，罗杰很是震惊。通常情况下，罗伊·威尔金斯很有条理，言简意赅，很少向他人表露心迹，更不会对晚辈倾诉，但那时，威尔金斯不停地诉说自己的困境，尤其是金带来的折磨。“你能想到吗？”威尔金斯问自己的侄子，“梅德加一直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员，而金却走过来，想带走那些钱。”年

轻的威尔金斯从没见过自己的叔叔如此愤怒，如此挫败。30年来威尔金斯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中一直有的强烈的组织自豪感被悲痛、压力以及残忍的“圈地战争”带走了。梅德加·埃弗斯的送葬火车还在路上时，威尔金斯就在一次公共演讲中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其他组织带来了噪声，得到了关注，”他说，“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直在默默努力，承担后果……他们今天存在，明天就会消亡。而只有一个机构可以处理持久而艰苦的斗争——那就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威尔金斯贬低了其他组织的规模，敦促人们不要迷失。“不要把应该给我们的钱送到他们手里，”威尔金斯劝告说，“别太兴奋。”

在华盛顿的时候，威尔金斯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肯尼迪政府，埃弗斯家乡的民权危机最为严重，如果未能在种族隔离方面达成协议，那么两个种族的极端分子都会走向暴力或示威活动。肯尼迪政府的官员们同意这一看法。他们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导人们一起寻求解决杰克逊难题的方法——如何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利用政府的影响。最佳方案就是小心翼翼。罗伯特·肯尼迪总统先后接见了来自杰克逊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牧师们，邀请他们参加白宫会议，赞扬他们是梅德加·埃弗斯的继任者。同时，司法部部长还对汤普森市长施加了压力，说除非他对黑人牧师们做出让步，否则一直想游行的年轻人就会采取行动。最后，肯尼迪总统亲自给汤普森市长打了两通电话。

汤普森很爱唠叨，而且非常乐观，他一直说总统很好，还说自己有可能在政治场合说一些让人反感的事，比如总统与华莱士州长那天的联盟，如果他说了，希望“你不会难受，因为我很看重你”。肯尼迪大笑起来，给了汤普森“公开诋毁我的许可，只要你肯露面就好”。至于谈判，汤普森曾拒绝在城市商店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认为那是积极的成果，现在他似乎有些动摇：“我告诉商人们……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如果他们想卖给白人或者卖给黑人，卖鱼或者随便什么东西，完全取决于他们，我将竭尽所能保护他们。”汤普森还告诉肯尼迪自己还“回答了”黑人牧师列表上的“所有问题”，“除了成立由黑人和白人共同组成

委员会的事，我现在还不能那样做。”总统问到名单上的一件事——雇用第一名黑人警察时，汤普森的满足感似乎都快从电话线里冒出来了。“噢，我做到了！”他宣布。他告诉总统，自己准备进行包括雇用黑人警察在内的几次大动作，但强调说“我们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

汤普森要求肯尼迪总统说服黑人“通过法庭，不再进行游行和恐吓”，以保证计划顺利进行。他还说杰克逊“局势危机”，因为年轻的黑人们“被当作挡箭牌，他们都疯了。那些人占据了他们的思想，人民控制不了，无可奈何”。说到这里，肯尼迪总统便问汤普森市长对那些来到白宫的杰克逊牧师们的评价——问他自己该和谁谈话，谁最有威信，R.L.T. 史密斯“是杰克逊的大头鹅”吗？汤普森回答说“权力”不在史密斯手里，而在 G.R. 何顿手里，何顿“才是带来麻烦的人，他很聪明，别人都很佩服他”。

第二天晚上，何顿牧师在自己珍珠街上 A.M.E 教堂举行的大型集会上宣读了谈判的最终结果。他还没读完全部 4 点约定，抱怨声和咒骂声就已从四面八方传来：(1) 6 位黑人警察“在黑人区执勤”；(2) 8 名黑人保安在黑人学校负责护送小学生过马路；(3) 8 名黑人提调至城市卫生部门；(4) “城市将继续倾听黑人的诉求”。为什么没有由黑人和白人共同组成的委员会？有人问。为什么黑人警察也要被隔离？为什么没有提到在城市商店废除种族隔离？面对猛烈抨击，何顿辩称这套解决方案只是出发点。他先是布道，接着又说了司法部部长肯尼迪的支持，最后摆出了自己作为牧师的荣誉。“我没拿一分钱，”他大声喊，“我的头发每天都会变白一些。我有时没时间吃饭。我的家人很担心我，在各方面。我们中的有些人只是想制造重要新闻，但我们是为了谈正事！”

大批的支持者为何顿欢呼。另一位牧师扩大了何顿的优势，只要有人反对，他就会说指导委员会会背离运动。接着，亚瑟·琼斯作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授权的发言人站出来说这个解决方案是对刚刚埋葬于华盛顿的梅德加·埃弗斯的纪念。他提醒人们，埃弗斯一开始就说自己不希望把杰克逊变成第二个伯明翰，

“以梅德加的名义，如果我们想要自由，就不能照搬伯明翰模式”。

那份拼凑而成的解决方案抵挡住了所有不满。周日，黑人牧师们和城市领导人们在汤普森欢迎杰克逊第一位黑人警察的仪式上相互鼓掌致意，强调市长重达 250 磅的身体和他值得信任的行动都是他的优点。对曾被捕的年轻活动家来说，这完全是淡而无味且毫无意义的胜利，但他们还是接受了，回到了密西西比乡下，继续开办工作室，进行登记项目。种族平等大会的大卫·丹尼斯告诉人们他们为什么没有通过游行反对那套解决方案：“我想每个人都明白，组织的分化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从耶鲁法学院回来的蒂姆·詹金斯在一次演讲中称，比起组织的竞争，五角大楼和和平运动在公民权利方面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与罗伯特·肯尼迪在纽约会客室发生的冲突还不到一个月，杰罗姆·史密斯就带着他备受打击的热情回来了，到密西西比州最无法无天的城市之一——坎顿实施种族平等大会的计划。“我们的宗教信仰不能只停留在空洞的祈祷上，”他在一次大型集会上说，“我们的信仰必须成为活生生的选举。因为如果教会是正确的，如果教会没有听从病态社会的呜咽……我们可能就不会在这里了，而梅德加也不会天上。”

6月19日，在华盛顿，综合部队的士兵们最后一次开枪致敬后，就以完整的军队礼仪将梅德加·埃弗斯安葬于地下了，那时距离暗杀已过去了8天。在为期两天的游行中，25000人告别了遗体，而且在阿林顿国家公墓进行的安葬仪式也是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后最郑重的。肯尼迪总统没有出席仪式，但之后，他为埃弗斯的遗孀和两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安排了一辆豪华轿车。总统表达了自己深切的悼念，还在伊丽莎白女王休息过的床上摆放了送给孩子们的鱼雷快艇纪念品以及一辆轻便摩托车。

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来说，兴奋与打击交替出现，逐步构筑了意义深远的历史性顶点。就在埃弗斯被害的第二天早上，肯尼迪邀请金在下周一，也就是6月17日到白宫共同讨论公民权利。金立刻同意了，但第二天就发电报称自

已反悔了。短短的时间内，一直以来关于埃弗斯保释基金的不和爆发了。要在华盛顿进行的游行还在讨论中，金希望先找机会平息内部斗争，再与总统见面。此外，金还知道，在 250 位宗教领导人中，他是唯一一位要在白宫东厢与总统见面的。了解到听众如此之多后，金想与总统成为工作同盟的希望被刺穿了。写好电报后，金拒绝了肯尼迪的邀请，用一条直截了当的建议作为结尾：“我希望我们能在不远的将来私下会面。”

金和肯尼迪如同一对命运不济的恋人，有着共同的兴趣，但热情程度却并不相称。肯尼迪曾在电视上接受，甚至是重复了金的诉求，现在他却有些退缩。参议院中，地位稳固的南方人都在反对他。参议员中爱夸夸其谈的共和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认为肯尼迪新法案中公共设施部分违反了财产权，所以宣布自己反对那一部分。肯尼迪的讲话没能遏制黑人抗议的爆发，几乎每天各地发生的运动都会演变成大规模的抗议。萨凡纳的何西亚·威廉姆斯把 200 多个孩子送进了监狱，之后自己也进了监狱。在亚拉巴马州的加兹登，警察逮捕了 450 名试图再次进行威廉·摩尔纪念游行的学生。丹维尔的警察冲破教堂的大门，抓住了几位抗议活动领导人。在奥尔巴尼，劳里·普里切特的手下一周内逮捕了将近 150 人。黑人们跨过堪萨斯城警察局附近的警戒线，而纽约的头版刊登的照片则是关于当地政客争相阻止黑人们针对房屋隔离和就业隔离的游行的。所有这些都让肯尼迪倍感痛苦。通过国务卿腊斯克，肯尼迪秘密命令所有美国大使做出一致的外交辞令，消除海外的“极端恶劣影响”。（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是美国驻印度大使，他辛辣地回复说“这种应急措施是丧失信心的表现”，他建议政府不要惊慌。）同时，总统竭尽所能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

金正理首于自己世界中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事情中——伯明翰的资金之争，为了反对赞助人中有黑人亚特兰大的娱乐城关门了，《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文章称金“傲慢且投机”——金很受伤，差点就提起诽谤的诉讼。金仍是个局外人。但从伯明翰事件解决后到目前为止，总统一个月内已经邀请了超过 1500 名国家

领导人探讨民权问题，金也无法再拒绝白宫的会面邀请了。肯尼迪的助手最终安排金与总统在周末早上单独见面。接着，确定金同意见面后，他们在金之前安排总统与罗伊·威尔金斯见面，之后又安排了总统与包括美国联合汽车工会主席沃尔特·路德在内的主要民权领导人的会面。直到那时，肯尼斯·奥唐纳才通知金说自己希望他能留下来参加大型会面。大型会面上，白宫的媒体官员将作为重要部分公开出席——总统与金和威尔金斯的会面是一种行政上的准备。这些痛苦反映了金的优势以及同盟者中的反对之声。金接受了自己能得到的最佳安排，决定6月22日周六到白宫参加会议。

罗伊·威尔金斯与肯尼迪总统会面时，伯克·马歇尔悄悄与金和几位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的助手凑到一起，其中包括安德鲁·扬和沃尔特·方特洛伊。马歇尔安排金的助手去参加紧急的保密政府讨论，之后金才发现这是当天第一次悄声伏击。马歇尔警告说，金不能再纵容美国共产党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中的渗透了。具体说来，金必须断绝与斯坦利·利维森的来往，因为利维森是美国共产党官员；金也不能再和杰克·奥德尔有联系，因为他是利维森“安插”在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中影响民权运动的人。金的第一反应是耸耸肩，表示不相信。他很困惑，夹在马歇尔预期中的郑重和自己对这些言论直觉性的不相信中。显然，金觉得自己像被鞭打得迷失了方向。到了获得胜利的最终时刻，国家自由运动的胜利就在眼前时，金却遭遇了先发制人式的控告——自己成了自由和平最大敌人的避风港。他想跟马歇尔解释说其中一定有误会，但马歇尔反驳了他。他说，这不是偏执的话语，是美国政府每个小尖塔处收集到的确凿情报。利维森不只是纽约激进分子，他更为危险，因为利维森是“被苏联共产党机构收买的特工”。马歇尔告诉金，他不能再多说了。金要求看证据时，马歇尔强调说无论是自己还是金，都无权质疑美国最高国家安全专家，如果他们质疑的话，当前的政治情形也会认为他们的怀疑无关痛痒。最强有力的事实是肯尼迪总统准备“把自己整个政治生涯置于危险之中”，与民权法案一起，因此总统只是单纯地不能让自己在面

对美国共产党的诘难时变得脆弱无助。

从金的表情看，他并没有完全相信，马歇尔只好把他直接带到罗伯特·肯尼迪面前，让肯尼迪告诉金。当初就是司法部部长先得到了这些情报，他上周一曾让 J. 埃德加·胡佛准备一份特殊的联邦调查局简报，说明自己如何能简明地解释，让金意识到严重性，同时不必泄露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来源——主要是柴尔德兄弟二人。胡佛非常愿意做这件事，知道这能削弱肯尼迪想要将联邦调查局的人力排挤出内部安全领域的做法。只有这一次，肯尼迪敦促胡佛调查内部颠覆的威胁，而非外部威胁。而司法部部长也认为，为了获得控制金的一种方式，向胡佛致敬也并非不可。现在，有个与白宫有关系的人，威胁要改变或是毁掉其内部政治根基，然而他没有公职，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利用的个人的野心，通过进监狱、助长任何可以让美国不安的巨变来获得成功。尽管第一眼看上去，平淡无奇的外在事实可能会让金误以为他是华盛顿某个企业的雇员，但他上述各项情况让肯尼迪难以用政治或社会语言解释。金说到了可能会把华盛顿变成伯明翰的游行时，罗伯特·肯尼迪便追问起了游行的影响力。如果金承认那次游行遭到破坏，那么肯尼迪就有了讨价还价的借口；如果金退了一步，承认政府有单方面定义什么是遭到了破坏，那么肯尼迪就占了上风。

但金也对罗伯特·肯尼迪耸了耸肩。他一直要求看证据，说有关间谍的说法让人很害怕，放在自己相当了解的一个人身上，金认为听上去很不真实，所以不能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让他们退出行动。多年来，金认识的所有参与运动的人都被称作共产党，他自己也被当成过共产党员。南方人甚至还说罗伯特·肯尼迪是共产党，一位记者最近还当着司法部部长的面问他是否真的是共产党的一员。肯尼迪坚持认为这是有区别的。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肯尼迪指出了很有分量的两点：第一，利维森的本质相当恶劣，已经超过了能告诉金的程度；第二，证据来自美国情报机构最高级别同时也是最老练成熟的机构，那个机构里的成员都和詹姆斯·邦德差不多，他们的说法不容置疑。肯尼迪暗示说胡佛自己不同意

再向金透露更多，但依然暗示说利维森听命于苏维埃，通过操控民权运动削弱美国。然而，对金来说，国家秘密只是增加了自己的怀疑。肯尼迪提到的权威越高，他就觉得那些描述与自己平时知道的利维森很不相符。肯尼迪越是说政府的中枢机构无所不知，那个机构听上去就越像普通的种族隔离分子。

肯尼迪看出自己无法说服金。在第二年他和伯克·马歇尔共同录制的口述历史中，肯尼迪回忆说僵局之所以难解决，是因为金顽固地拒绝严肃对待那些说法。肯尼迪说金“总是对整体概念不予理会”。肯尼迪理解不了。“好吧，那只是金的另一面，”肯尼迪评论说，“在很多类似的事情上，金总会大笑不止，还用它们开玩笑。”口述历史时，伯克·马歇尔说金“肯定已经相信了”，尤其是同一天，他们带金与肯尼迪总统会面，让总统给他最终警告之后。马歇尔总结说：“我想金还只是没能接受而已。”除了金让人难以理解的轻率，让口述历史采访人更惊讶的是肯尼迪总统竟然不顾利维森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而亲自游说民权运动领导人。“总统和金谈话了？”他难以置信地问。听到罗伯特·肯尼迪回答说“没错”后，采访人倒吸了一口气说：“我的天哪！金对此做何反应？”

整件事发生的过程中，金至少是惊呆了。内心斗争的一部分原因是金自己并不确定肯尼迪兄弟俩是真的相信斯坦利·利维森是美国的威胁还是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金上钩。3人轮番上阵之后，金就更怀疑了。金走进总统办公室后，肯尼迪总统邀请他一起到白宫玫瑰园散步。他们两个独处时，总统说：“我想你应该知道自己受到了严密监控。”对此，金并没有多说。金想弄明白这种出人意料的防范措施是因为总统担心自己被窃听还是因为对自己的监控已经延伸到了白宫之中。无论如何，总统在玫瑰园的说法将威势和亲切感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提醒金他没有秘密。参议员中的保守人士说华盛顿的游行是美国共产党的策略，因此对其进行了猛烈抨击，肯尼迪也透露说J.埃德加·胡佛也有相似的担心，也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来，尤其是在联邦调查局早已知道有两名共产党员为金工作之后。

金后来回忆时说，记忆中最生动的就是总统把手放在他肩上，几乎是耳语般

地让他“摆脱”利维森和奥德尔。“他们都是美国共产党员。”肯尼迪说。金说胡佛认为很多人都是共产党员，说他们两人是共产党员也没什么特别，于是肯尼迪总统立刻就回到了细节上，杰克·奥德尔是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中的高级官员，而斯坦利·利维森的地位太高，不能透露，但总统可以说的是利维森是奥德尔的“上线”，这样金就可以自己推测利维森的地位了。肯尼迪告诉金，这些都是铁的事实，奥德尔全面参与了“美国五号共产党员”的阴谋。

金想缓解压力。“我不明白他怎么有时间做这些，”金挤出来一句话，“我给他安排了两项任务。”金无力地笑了笑，但他尝试性的幽默并没能让总统轻松一些。肯尼迪宣称利维森和奥德尔都是“外国的特工”，强调了国际方面的威胁。这一下让金越过了反抗的界限。他本想用自己的个人看法激烈地否认，然而面对总统的表情，他只能温和地反驳说自己不这样认为。金说要让自己相信这件事，就得看到证据。

肯尼迪总统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你在报纸上读过关于普罗富莫的事吧？”他问。金说自己读过。时任英国陆军大臣的约翰·普罗富莫在一次敏感的丑闻中身败名裂，他先是否认与一位美丽的应召女郎克莉丝汀·基勒有婚外情，之后又承认了这件事。而后来人们发现，这位应召女郎同时还与多人有染，其中一位是苏联外交官。对这件事的持续揭发让肯尼迪总统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他命令国务院准备所有普罗富莫案的资料，而且不要简报，要全部信息。现在，肯尼迪并不清楚这个例子对金和自己会产生多大影响，也不知道多久才会产生影响，然而，他仍然提醒金说，下层社会中性与间谍活动的突然爆发能毁掉公众人物。“（首相哈罗德）麦美伦很可能因为自己对一位朋友（普罗富莫）的忠诚而下台，”总统说，“因此，你也得小心自己的事业。”真相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在英格兰，这一低俗的问题到了庸俗小报的手中，很快就与英国军事机密是否通过普罗富莫而从极乐的枕边到了苏联外交官的耳朵里无关了。肯尼迪的意思是金为了个人尊严，不能被利维森蒙蔽，承担过大风险，也要看到事实，无情的对手可以将真理

的火苗变成丑闻的烈焰。“如果他们打倒了你，也就打倒了我们，”肯尼迪对金说，“所以我们才让你谨慎一些。”

为了确保白宫与民权运动之间至关重要的完全伙伴关系，利维森和奥德尔的生命似乎微不足道，然而，金说公平起见，自己还想看到一些证据，尤其是关于利维森方面的证据。肯尼迪总统同意了。他没再请求金的信任，而是中断了讨论，准备从玫瑰园回到总统办公室中。

内阁会议室中听得到几声干咳，民权运动领导人们正小声问着肯尼迪总统出席时，应该各自坐在哪里。有些人轻声嘲笑着身材矮小的沃尔特·方特洛伊，因为他说肯尼迪总统旁边的那把椅子是自己的。接着，最后一刻才出现的金则鼓励他坐过去。所有旁观的人之中，乔·劳尔意识到，这种幼稚的抢凳子行为，可能带来长远的政治影响。也许，当天最重要的实际竞争就是决定白宫联络人的人选，以对民权法案进行游说。劳尔知道沃尔特·路德对那一角色垂涎已久，罗伊·威尔金斯也是，两个人都曾让他帮忙卡位，争取总统的首肯，因为他们认为肯尼迪总统会把游说的权利交给第一位申请者，而不会涉身激烈的争论中。劳尔很不情愿地羡慕着金的影响，因为金能抓住策略优势，得到肯尼迪可即时运用的权力。

约翰·路易斯是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新当选的主席，是较量中不被注意的人之一。第一次见到肯尼迪总统的情景会让他刻骨铭心——肯尼迪总统高兴地笑着，与围坐在桌子边的人握手时，连连说着“你好，你好，你好”。罗伯特·肯尼迪抱着自己的一个女儿坐在旁边，而总统则在发表欢迎词，欢迎历史性的新民权法案背后的合作关系。总统说，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让参议院通过该法案，详细谈起了对于种种困难的分析——包括复杂的委员会、主要立法者们地方性的及个人的问题以及参议员中可恶的南方反对派。总统说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自从自己站出来强烈支持公民权利，支持率已经从60%下降到了47%。房间里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份可怕的民意调查出自哪里——总统很擅长拿出新鲜的东西

制造引人注目的效果——但他们却相当明白，参议员中的争斗会异常激烈。“我可能会输掉下一届选举，”肯尼迪说，“我不在乎。”总统致力于此，也需要在场各位的帮助。

看到这一信号，内阁会议中立刻活跃起来，像教室也像总统的新闻发布会，大家纷纷举手。总统注意到有几个人喊着“要选罗伊”，而威尔金斯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自己的奉献后，宣布民权领导人会议已做好了与白宫合作的准备，提供支持。这是很精明的选择，威尔金斯领导着受人尊敬的组织，而其他领导人作为董事会成员也不会抗议。肯尼迪总统只是点了点头，于是游说的人选就确定了。接着，城市联盟的惠特尼·扬得到了赞赏，便问总统是否真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反对在华盛顿进行游行。他的问题让总统表明了自己坚决反对游行的立场，总统有了绝佳的机会阻止游行，如果黑人无论如何都要游行，那就再没有体面的撤退之路了。“我们希望在参议院获得成功，”肯尼迪说，“而不是在国会大厦进行大型表演。”

A. 菲利普·伦道夫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黑人们已经站在大街上了。”他说完，又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认为游行应该进行。对伦道夫来说，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他说情况已经和1941年游行时的不同了。“我们将要游行。”他用低沉的声音大声说，尾音很短促。唯一的问题是采取何种形式，是采用暴力手段还是非暴力手段，是要得当的领导还是听之任之。詹姆斯·法默支持伦道夫的看法，参加过纽约干部核心会议的人们也是。作为回应，副总统约翰逊向他们解释了为什么自己认为总统有更好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标。他说自己了解众议院议员，只能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说服他们，行政干预、促成协议、示好以及走廊政治。任何其他方法都可能适得其反。约翰逊的说法起到了很大作用。有些人说，一系列的民权会议让他重新焕发了生机。这时，在两个小时的会议接近尾声时，金才第一次开口，称游行与传统政治并不冲突。他认为二者互补。金说，游行对扩大民权问题有积极作用，“可以在不知道问题所在的地区提供动员支持。我认为有一

定作用，”金继续说，“也许时机并不合适。坦白讲，我参与的直接行动运动中，这次是时机最不合适的。可也有人认为伯明翰事件的时机也不合适。”

“包括司法部部长。”总统打趣道。

其他人支持游行是因为组织内部的政治关系，他们说如果取消游行，自己的领导地位就会动摇。肯尼迪总统刚好借此机会离席。“好吧，我们都有自己的困难，”他说着，站了起来，“你们有自己的难题，我也有我的难题。”总统说自己的难题来自参议院、俄国、北约以及戴高乐总统，说到这里，他想起自己就要错过欧洲之前的最后一次简报了。总统说，他们应该互相帮助，用尽一切方法保持联系。很快，总统的客人们就见到了等在白宫外的记者们。金对会面的描述让报纸写出了带有偏见的新闻，激怒了政府——“黑人告知肯尼迪新游行的计划”——《泰晤士报》拟定了这样的标题。“如果参议院中有人反对，我们将在华盛顿进行非暴力的和平游行。”金说道。他还说总统没有明确反对这一想法。罗伊·威尔金斯没有得到太多注意，因为可靠的消息指出他“当时没有参与”。关于游行方面，威尔金斯说：“那个小男孩不听我的。”

领导人和记者说话时，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南草坪搭乘直升机朝中途停留地点总统行宫大卫营飞去，接着他将搭乘空军一号飞往德国。金则搭飞机去了底特律。对总统和金来说，各自的旅程都将改变他们的一生。和肯尼迪一样，金希望摆脱政治的枷锁，表明自己支持巨大而持久的权力；而和金一样，肯尼迪希望证明自己的意图已经超越了文化、语言以及种族的障碍。这两个人都深深记挂着对方，都立即在可怕的维度上获得了成功。仿佛他们给对方撒上了魔法粉末一样。两种奇迹之间的相似性已经足够惊人了，但对比让这一点更为明显。金和肯尼迪争执的是自由最深层次的含义。在玫瑰园的较量成了秘密而基础的平局，之后，他们在重大公共场合展示了各自难以忘怀的才能，如同忏悔之后的雷鸣。

肯尼迪总统在两党强烈的反对中去了欧洲。参议员们和媒体批评家称总统不顾深陷危机的国家转而访问另外3个国家——德国、意大利和英国——而在上述

国家并没有安排实质性的总统对话，而且由于这3个国家的政府不是已经坍塌就是在陷落中，所以也不可能有总统对话，此外，罗马新教皇也尚未确定。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尽力维护了这次旅程，在电视讲话中称取消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涉及美国目的明确性”。私下里，肯尼迪总统对部下们说，这趟旅程确实重要，因为自己可以从让美国人和外国人气馁的美国棘手问题中分散一下。肯尼迪意在接触人民，而非政府。于是，他在德国降落带着保护者的姿态，而非征服者。让人惊讶的是，100万人在法兰克福迎接了他的车队，而在德国其他城市，美国总统也受到了相似的礼遇，因为他发誓说自己愿意冒险牺牲美国的城市来使他们免受战争的苦楚。在希特勒的总部西柏林——那个被上一次大屠杀变成空城后，又因下一次大屠杀的威胁而支离破碎的城市，肯尼迪发表了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讲。

如果说讲话可以撼动世界，那么这篇就是。要震破耳膜的回应都让肯尼迪有点担心。听了他的话，或者可能只是他举起一只胳膊，极度兴奋的人群就可能用手拆掉柏林墙，这种想法不禁让他打了个冷战，因为权力再次在德国失控了。登上空军一号要离开时，肯尼迪说：“我们余生再也不会见到这样的一天了。”

被华盛顿三连击深深打击后，金要求杰克·奥德尔以及他的手下在48小时内——也就是金到达纽约时，准备一场简易审讯。接着，金和沃尔特·方特洛伊一起搭飞机到底特律参加被不良竞争影响的大游行。集会已经推迟过一次，一部分是因为领导人对在当地最密切的同盟——C.L.富兰克林怀有敌意，而埃弗斯保释基金更是让当地的竞争激化成了公开的争执。支持富兰克林的人指责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导人是“一群逆来顺受的美国黑人”，而公开声明中对此的回应则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黑人团体唯一真正的声音”。与组织性合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5月的洛杉矶事件获得了巨大成功，底特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分支机构抵制了金的集会。把金介绍给底特律的黑人议员查尔斯·迪格斯要求金起草一份声明，“得体地退出”华盛顿游行的全部计划工作。面对这种敌意，

金可能会再次受到公开谴责，这次还是在自已组织的事件上。

底特律的第一缕空气吹散了金的担忧。警察署署长在机场门口迎接了金，承诺说“您在这里不会看到警犬和消防水管”，还向金报告说市中心的游行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前进的人群十分密集，城市的警察甚至无法靠近其游行护送站。在没有金和其他领导人的情况下，游行区域已占据了21个街区，朝市中心走去。无穷无尽的游行几乎挤满了城市主干道伍德沃德街。人们情绪高涨，自发地唱起了《我们终将胜利》和《共和国战歌》。有位女士戴着一顶华丽的帽子，形状如给鸟儿洗澡的小盆，上面还写着一句话“任何颜色的鸟儿都可以在这里沐浴”。昂首阔步的游行者们朝旁观者大喊着：“来吧，离开那里。你不是在密西西比。来游行吧！”数不清的海报都以纪念梅德加·埃弗斯为名，有一队白人还举着写有“生在迪尔伯恩是我的耻辱”的条幅大喊着——而迪尔伯恩则是一个全都是白人的富饶之地。金的车队最终在凯迪拉克广场遇到了游行的人们，他们大喊着金的名字，一起涌过来，冲破了金周围的警戒线。震耳欲聋的混乱中夹杂着愤怒的警告、害怕的尖叫和兴奋的喊声，金和C.L.富兰克林、沃尔特·路德以及杰罗姆·卡瓦纳市长挽着手，以免被自己的崇拜者挤散吞没。人潮在他们周围推推搡搡，领导人们的腿来回蹭着，快速在街道上移动，可脚根本没有碰到地面。卡瓦纳市长回忆说，自己那天与金的对话只是“坚持住，坚持住”。

据估计，那天的人数至少有125000人。后来，有26名孩子的家长在失物招领处找到了自己走丢的孩子。记者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式的文章，无论是底特律的白人报纸还是黑人报纸，新闻几乎都是关于这件事。在科博大楼，喘不过气来的金宣布那是“美国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最浩大也是最伟大的游行”。他就常规主题发表了长达48分钟的演讲，几乎每一句话后面都跟着人们的欢呼声，这让金觉得被抬高放大了。几句符合当时时间地点的段落间，金发出了新的呼吁：“1000多个强壮的人都应该去华盛顿游行”，支持民权法案。“让我们不再欺骗自己，”金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不施加带有决

心的压力，法案就无法通过。”在含蓄的说辞中——也许是对斯坦利·利维森说的——金提醒参与运动的人们会“被误解，被冠以恶名”，甚至会像梅德加·埃弗斯一样被害，于是金要求人们不要允许“严重的新交战状态”演变成误会。“这个国家中的有些白人，决定看到黑人得到自由，因为我们本应享有自由。”金宣布。结束语中，金将《梦想》一文充分丰富，两个月后，这些词句在华盛顿变得尽人皆知。金引用了阿摩司对正义的看法、杰弗逊的民主直觉，最后还加入了以赛亚对事物真谛的顿悟，结尾是这样的：“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今天下午，我有一个梦想，手足之情终将实现……”

那几天里，带着爱尔兰口音的总统出国到了德国，而带着非洲口音的牧师则走到了内陆城市底特律——他们都搅动了美国身份分裂的核心。地方总督保护了领土的自由，先知则引领了它的灵魂。两个人激励了数百万有着同样情感的人，却没有公开显露任何本质上的不同。他们一起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们解读了自由，相互交错的部分，织就了那10年最明确的希望；而相互矛盾的部分，则产生了如越南战争时不可跨越的鸿沟。

金觉得脖子上架着一把刀。第二天晚上，他与杰克·奥德尔、怀亚特·沃克、安德鲁·扬、托马斯·基尔戈、克莱伦斯·琼斯以及沃尔特·方特洛伊在纽约一家酒店的房间中见面了——与那场大集会的狂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气氛凝固如冰。那天是6月24日，星期一，据贝弗尔在伯明翰进行的第一次儿童游行已经过去了54天，据梅德加·埃弗斯遇害也已经过了12天。斯坦利·利维森没能参加那场审讯，他前一周就离开了，到厄瓜多尔度过为期一个月的年假。有人鼓起勇气开玩笑说，没有苏联特工会在下属为资本主义者奔波的时候离开，但这个笑话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金严肃地说出了困境。“我刚从底特律回来，很明显，大批的人很愿意参与本次运动，”他说，“但辩证地看待这件事，我知道达到顶峰的那一刻也是衰落的开始。”接着，他讲述了在华盛顿进行的3场扭曲的谈

话，回忆说自己可以忍受所有的事，就是不能接受肯尼迪总统在玫瑰园中最后的论断——利维森和奥德尔是外国势力的特工。“在这一点上，我反驳了他，”金坚定地说，“我告诉总统那不可能，然后总统的脸就红了，还摇了摇头。”

向大家讲述3个政府官员试图用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动名称震慑自己时，金笑了起来。每当金要看证据时——表明利维森和奥德尔受共产党控制的证据，或者他们想让金做他不愿做的事情时，肯尼迪兄弟就会避开，说出更多滑稽的东西。这让金觉得很好笑——高大的白人就像承诺还钱的乡村牧师一样。金精准地猜测到，背后真正的用意是J.埃德加·胡佛正在收集证据，如果真的有的话。说到这一点，安德鲁·扬说在自己印象中，伯克·马歇尔不经意间看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文件。扬回忆道，马歇尔曾建议说，利维森和奥德尔应该起诉联邦调查局诽谤，迫使联邦调查局在法庭上拿出证据，只要联邦调查局敢这么做。

“起诉？为什么要起诉？”奥德尔插话道，他现在就如同深思的死刑犯，“我不认为那是污蔑！”他说自己因与共产党的关系而骄傲，因为共产党员致力于反对种族歧视。房间里所有人都认识其中大部分人——他们中的一些之前都追随杜波依斯和走强硬路线的共产党副主席本·戴维斯——而戴维斯现在已到了癌症晚期。奥德尔说自己没有做过任何背叛金博士的事。作为这里唯一不用名字称呼金的人，他已经觉得自己不像同事，而像被告了。很快，奥德尔就火冒三丈。“让胡佛见鬼去吧！”他说，“问题不在我身上！”奥德尔说，这个问题是运动的关键，无论金博士做何决定，他都不会欺骗自己，相信胡佛和肯尼迪会因这一次的结果而罢手。

其他人都表示赞同。这是典型的政治清洗。这次清洗从金的左膀右臂开始——奥德尔是直接邮件资金筹集的核心，也是选民登记记录的核心；而利维森是金最亲密、最不顾迫害的教徒，被白人们用作试探意见的人。一旦金承认政府的说法，默认自己与颠覆力量有联系，那还有什么能阻止政府伤害包括金自己在内的这些人呢？克莱伦斯·琼斯说这也是困扰哈里·贝拉方特很久的事，因为贝

拉方特和他们一样，与利维森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贝拉方特说决不能容许运动中出现政治迫害这种事——这就是事务如何一点点自行瓦解的原因，也是希特勒上台的原因。

金不停地说这一原则不可否认。问题是政府想迫使他们牺牲这条原则以实现其他种种，包括民权法案等。如果他们拒绝，可能的代价就是宣传的崩塌和关系的断绝。金回忆说，周六早上，马歇尔和肯尼迪兄弟像连珠炮似的谈论这个话题，自己甚至没有机会说到其他内容。金决定征询他人的意见，与贝拉方特谈话拖延这种苦恼，但压力已经让他的神经隐隐作痛。“你们明白，司法部民权事务部门的领导斥责你是一回事，”金沉思着，“我可以应付。我甚至可以应付司法部部长。但伯克·马歇尔、司法部部长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在同一天接连抨击你时，你就得好好考虑了，肯定要多少重视一些。”

第二十二章 向华盛顿进军

金用一种新的方式说出了自己惯常的叠句“时机已经到来了”，最后还反驳了一种讥诮，即这场运动已经被自己的成功或肯尼迪政府磨去了锐气。“如果这个国家最后还是回到以前的话，那些觉得黑人可以偃旗息鼓，对现状感到满意的人应该好好醒醒了。”他写道。在一段写给最初的黑人分离主义者的话中，他简短地提到自己已经转变思路了——不仅仅是与马尔科姆·X，还要与自己暴烈的同路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划清界限了，后者在不久之前一直四处鼓吹黑人如何需要将白人的影响力清除出民权运动组织。金号召建立起一支“双种族联合大军”，再次呼吁非暴力的宗旨。“最近这场新的宏大斗争运动已经将黑人隔离开来，我们一定不能在它的引导下对所有白人报以不信任。”他如是写道。金从当年春天就感觉到，应当在白人中发展盟友，而不是一味谴责他们，就像他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说的那样。这是一场全国性重大转变的一项举措。这条种族政治路线无疑是复杂而微妙的。在第三段，他的语调又变得激烈起来，写下了一段冗长的新叠句：“我们不能沾沾自喜……我们不能沾沾喜喜……只要还有一个密西西比州的黑人没有投票权，只要还有纽约的黑人还相信自己跟投票没有关系，我们就不能沾沾自喜。”

这几个主题花了他7分钟的时间。整晚金都在尽力精练语言，以挤出时间说出自己常见的叠句：“抱着这个信念……抱着这个信念……”结果这次演讲大量删减了原定讲稿内容，还有些旧瓶装新酒的表达。它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远称不上“历史性”——在某些点上一带而过，在其他一些地方则啰里啰唆。金把手写讲稿交给了怀亚特·沃克，让他打下来去印刷；而此时在司法部

大楼外面整夜戒备的摩西纠察线也才刚刚撤去。当天早晨，罗伯特·肯尼迪约见了欧博伊尔大主教，重新开始讨论是否应接受约翰·刘易斯演讲的问题。同时，在胡佛的命令下，联邦调查局探员们在查尔顿·赫斯顿和其他知名人士在华盛顿的旅馆房间里见了面，警告他们不要出门，因为政府认为可能会出现暴力事件。互相竞争的各方都还没有找到一条塑造或定义“华盛顿大游行”的思路。这项殊荣属于那些在火车和公车上度过了那一晚的无名群众。

这是第一次上了全国电视广播频道的大型集会，而且也是最后一次。要说这次在中央机关举办的活动，黑人里都没有多少见识过这样的阵势，更不用说白人了。公车抵制运动和自由乘车运动时不是这样，在这之后的奥尔巴尼、伯明翰和格林伍德的教堂中也不是这样。当朝圣者们唱响自由之歌时，“大型集会”这个词就显得太轻描淡写了。有一列火车到达了华盛顿的联合火车站，车上高唱着《我们终会克服困境》，它之前曾停在萨文那儿，当时车上唱的则是《我们不会动摇》。安德鲁·扬当时就在那儿，听见好几百个来自另一个城市的运动参与者高唱：“今早醒来时要换上自由的头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根据记录下这次集会过程的托马斯·詹太尔说，当天上午共有 21 辆加次列车进站，而每小时通过巴尔的摩隧道向南而来的公交车约有 100 辆。一位富有活力的年轻黑人刚刚结束了一周的滑雪旅行，随后就马不停蹄地从芝加哥赶来，系着一个闪亮的腰带，上面写着“自由”。一位 82 岁的老人是从俄亥俄州骑自行车来的，还有一个岁数小一点的从南达科他州骑了过来。若干小型高中乐队在大堂的角落里进行即兴演出。坚定而欢欣鼓舞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就像一次盛大的新奥尔良葬礼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现在他们抱有消除痛苦根源的希望。在这里，只是由于国会山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那一大片开阔地带，人群的激动才不显得那样翻涌。在成千上万涌来的白人，既有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和其他工会中直言快语的工人，也有学生和极其真诚的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在这越发扩大的黑色海洋中感到非常舒服，但也几乎全都放下了自己的忧惧。他们被

人流冲得七零八落——当然，这实际上只是无数群众集会的常态而已——那些搞运动的老手则充分利用了白人荣耀的外在标志：电视摄影机、电影明星，还有那最宝贵的美国民主法典。众多电视摄影者记录下了詹姆斯·加纳与黑人女演员戴尔汗·卡罗尔手拉着手在人群中穿行的镜头；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几十人乘着好莱坞的“名流专机”而来，这是由哈里·贝拉方特和克莱伦斯·琼斯组织起来的。马龙·白兰度当时就站在一个巨型舞台上，在全世界面前高举着一个由嘉德斯顿赠送的赶牛棒——它象征着对种族隔离者的仇恨。这种景象就算是参加过上百次大型集会的人也没见识过。

在华盛顿纪念碑的舞台区，10点之后不久就有了一个广播频道，里面传来了胡安·贝阿兹的歌声，让早来的人一饱耳福。他唱的是《哦，自由！》一歌，这是一首随着奥黛塔一炮走红的灵乐。后一个节目就是奥黛塔自己演唱的《我正在路上》。在她浑厚嗓音的带动下，乔什·怀特也在她唱完后跳上了台。他的事业期是在二三十年代，当时年轻的共产党人白亚德·罗斯汀是他的助手。他请求贝阿兹把自己算上。很快，彼得、保罗和玛丽也加入了他们。这个三重唱组合唱的是自己的一首新曲——鲍勃·迪伦的《迎风鼓浪》。然后迪伦自己也和他们一块唱了起来。他当时刚写完一部关于迈德加·埃弗斯之死的民谣。那是民谣史上罕见的一刻，演唱者在舞台中成为名人，而且是因为他们公开的跨种族传统。为了强调他们对这场运动的敬意，他们还从奥尔巴尼请来了SNCC自由歌手组合。贝阿兹之前曾说服了其中的一员，伯妮·约翰逊放弃歌剧学业，后来她成为一名著名演奏家和研究非洲起源音乐的专家；而露莎·哈里斯也刚刚回绝了一份录制合同，因为她答应过妈妈要在奥尔巴尼完成学业——她最后还为此感到后悔。在歌曲的前奏之间是一系列美国怀旧风的乐曲。第一位黑人空中小姐领着大家一同欢呼。诺曼·托马斯，这位贵族气的老社会主义者在人群面前满含热泪地说：“能活着看到这一幕发生真是太好了。”

暖场的音乐并没有让每一个人满意，大批的人群在预定时间很早之前就朝着

林肯纪念堂进发了。有些人是要为下午的游行找一个好位置，另一些人则只是急不可待地想游行而已。丹维尔来的小青年们穿着白色汗衫戴着黑色腕带，以表明在家乡因种族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另一群年轻人从宪法大道上蹦蹦跳跳地下来了，打着标语，上面写着自己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普拉克敏教区被逮捕。罗斯汀布置来控制人群的人数量太少，也无心阻拦人群。提前出发的人群数量非常庞大，以至于后来为了营造出金和其他支持者走在他们之前的假象，几乎不得不发起一场军事行动。人群有足够的力量暂时打开一个缺口，维持秩序者也不得不退却。领袖们挤了进去，将胳膊紧紧缠绕在一起，以免被后面越聚越多的人群冲散。人流的长度刚好足以让新闻摄影师们从一辆平板卡车上拍下这一幕。

当时 CBS 有一架直升机就在华盛顿纪念碑上空，在他们的镜头下，波光粼粼的半英里长的水池两侧以及林肯纪念堂基座周围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到正午时分，也就是游行开始不到两个小时之前，警方估计人数超过了 20 万。根据这个官方数字，抱有善意的观察者们声称最终来的人约为 30 万，从如此高的密度来看，这个估计是很有道理的。添油加醋更是常见，这个数字竟飙升到了 50 万。不管具体到底是多少，这样的人数已经让观察者们只能发出一个字的欣悦感叹了。在这场运动中，不断集聚来的海报和面孔都带来了最让人感到麻木的景象——这是自从大量无人乘坐的空公交车在蒙哥马利街头穿行以来从未有过的。

当时从世界另一边传来了一个人的死讯，让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回到了正轨，W.E.B. 杜博斯于加纳去世。罗伊·威尔金斯在巨大的扩音器中朝行进人群发布了这个消息，他轻描淡写地说起了这位以前曾让他备受煎熬的共产党变节者：“现在，虽然杜博斯博士在人生的后半段中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毫无疑问，在 20 世纪初正是他的声音召唤着你们在今天加入这个事业。”对于那些尊敬杜博斯的人来说，当天早晨他的死讯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转折点。终于，这位黑人知识分子，泛非洲主义和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之父，走了。杜博斯极尽哀荣，在阿克拉他得到了国葬待遇，葬礼上发表了悼文，最后葬在克里斯汀城堡外。

一些琐屑的紧急事件让游行领导人分了心。金正疲于应对弗雷德·萧特沃——还有詹姆斯·鲍德温和其他名人的纠缠，他们对没被列进发言者名单而很不高兴。领导者们刚从人群中挤到林肯纪念堂台阶下，就遇到了关于约翰·刘易斯演讲最近一次草稿的新一轮争论。沃尔特·鲁特暴跳如雷。他说，虽然刘易斯痛击肯尼迪政府是对的，但贬低人权法案是很愚蠢的。伯克·马歇尔乘坐在警方摩托的挎斗里从司法部飞奔而来，手持一份修改后的草稿，上面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政府。欧博伊尔大主教对肯尼迪的形象兴趣寥寥，但也认为这种“焦土政策”式语调的火药味太浓了，不可接受，因而除非再次修改，否则不会致开场白。

白亚德·罗斯汀临时用音乐盖住了后台混乱的争论，可流言依然四起，拉尔夫·D·阿伯纳斯还是四处跑着让大家保持镇静。和事佬在激愤的发言者之间说着折中妥协的话。在混乱的人群中央，刘易斯和罗伊·威尔金斯跳了起来，用手指着对方的脸，直到罗斯汀介入，指定了一个由鲁道夫、金、刘易斯和欧仁·卡森·布莱克牧师组成的危机和解委员会才消停下来——后者是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一名杰出白人神职人员。虽然这个委员会在林肯雕像巨大基座下的一个由人墙护卫起来的圈内进行磋商，罗斯汀还是说服了欧博伊尔继续致开场白，向对方保证会及时把刘易斯讲稿的终稿给他，要是他觉得不合适可以随时走下讲台。让金感到很宽慰的是，罗斯汀把萧特沃打发去进行不怎么重要的填场临时演说去了。

布莱克牧师曾在巴尔的摩被捕，这让他有了一个特殊地位——游行中唯一一名曾因人权示威活动进过监狱的白人发言者。而且为了展示自己的坚定，他还忍气吞声地认可了金在伯明翰的白人教堂中发出的控告（“我们来晚了，太晚了。我们怀着一颗和解与忏悔的心。”布莱克当天向人群如是宣告）。当然，布莱克还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是艾森豪威尔的私人牧师——不管如何忏悔，他都并不是一名易与之辈。在混乱的人群中，他激烈地反对刘易斯对“革命”和“群众”的提法，称它们是异国教条的词汇。当鲁道夫起身辩护说这些词完全合适，还说自己在之前40年里一直这么用的时候，布莱克转而开始攻击“谢尔曼进军”的

那一段，坚称这与整个游行的精神不符。在这一点上他还比较成功。刘易斯退缩了，开始捍卫自己选择措辞的权利。在开场中，金怀疑这“焦土政策”式的语言是不是刘易斯自己的——他是正确的。“约翰，你我是最了解的，”他说，“这不像是你说的话。”最后勉强达成的协议中满是讽刺。金改了几个词，但是坚持说这只是在对风格和语境进行了一点调整，没有实质性改动。詹姆斯·福尔曼疯狂地敲着一台便携式打字机，删去了几条他自己加上的短语。围绕着文字的改动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与此相比，最后的改动反而是微不足道的了。

林肯像基座下的秘密争论在 SNCC 内成为一个饱受珍视的苦涩传说，其中满是针对那些默认需要团结并“阉割”刘易斯演讲的人的指责。一些 SNCC 的忠实信徒以命令式的语调鼓吹着分离观念，嘲笑着毫不现实，就像沙漠中的湖泊那样的乐观看法。实质上，争论的焦点就是在这样一个机遇中，要将哪些情感投射到世界中才合适的问题——是愤怒、爱、悲伤，还是希望。在时间的压力下，原本非凡的美德开始败坏了，就好像由于人的本性，这些从早期的静坐和自由乘车运动时就参与进来的年轻人的圣洁美德一定要有坏的东西来平衡一样。学生们开始对游行沉闷的氛围感到无聊，于是开始朝里面退，与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希望疏离了开来。

这些新的暗流并没有触动刘易斯本人。当轮到他面对庞大的人群时，他在长时间的嘈杂掌声中走上了台，向参加运动的学生们致以敬意。他一开始很紧张，有的地方还掺了英国式的腔调来掩盖缓慢的亚拉巴马土话，但是在热情的群众中，他很快找到了节奏。就算是那些从没听说过 C.B. 金或詹姆斯·法莫的人也能从他说话的方式中听出来，他跟这两名曾被殴打监禁的人物是亲身认识的。他真挚的话语让人群激动了起来，他们本来听着一下午自说自话的演讲都要睡着了。在他口中，生活在“一个警察国家永恒的恐怖中”听上去并不极端，而他反复说的“联邦政府都做了什么？”这句话也是一缕富有现实意义的清风。他超前地放弃使用“黑鬼”这个说法，而只对听众使用“黑人”和“黑人大众”。在他激烈

而雄辩的大声斥责与冷峻的理想主义中，群众给予了热烈的回应：

我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我们正身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中。总体来说，美国政治是由那些利用违背道义的妥协来往上爬的政客们主导的，他们与公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剥削站在一边。

当然也有例外。我们要向他们致敬。但是有没有一位政治领袖能站出来讲“我的党坚持道义原则”？肯尼迪的党是美东的党，贾维兹的党是戈德沃特的党。我们的党在哪里？那个能让朝华盛顿进军毫无必要的政党在哪里？那个能让朝伯明翰街头进军毫无必要的党在哪里？

刘易斯呼吁要将进军进行到底，“直到真自由到来，直到1776年发起的革命完成”。他列出了一长串要进行进军的城市。通过这样做，他成功地完成了几年之前对谷仓前的鸡群进行过的布道节奏。

当时还有一些关于妇女在行军中地位的争论，虽然它被掩盖了，但仍然预示着另一场运动的到来。组委会禁止柯瑞塔·金和其他男性领导人的妻子与自己的丈夫一同参加运动，而且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对。组委会让她们去参加独立大道那边的另一场游行，结果在整整3小时的过程中没有安排哪怕一个女性发言人。但是女性为那个下午留下了历史性的回响。在《向女性致敬》中，鲁道夫列出了一长串参加运动的女性的名字，并向她们鞠躬致意：罗莎·帕克斯、黛西·巴特斯、戴安·纳什·贝弗尔、来自马里兰州剑桥县的格劳瑞·理查森。听众中很少有人认出赫伯特·李羞涩的遗孀，后者在两年前参加SNCC在密西西比州第一次选民注册运动中被杀，但是那些认出她的人欢呼得非常热烈。鲁道夫还介绍了约瑟芬·贝克，她是一名流亡海外的歌手，特地从巴黎返回来参加这次进军，还穿着自己的“自由法国人”制服。他为大家介绍了玛丽安·安德森，后者演唱了《他将全世界握在手中》一曲。最后，在漫长的发言让那些本已在烈日下一直听下来的听众疲惫不堪之时，他请出了马哈里亚·杰克逊。她一开场便是源自于最深厚的文化源泉的呐喊。这首歌的名字是《我被震撼，亦被嘲笑》，这是一首源于奴

隶生活的灵乐，但是在杰克逊的演绎下，它同样在白人心中激起了不可抗拒的情绪。人们纷纷掏出手绢擦拭眼泪，回应的哭喊与她无伴奏合唱般的声线一同回荡在大地上。

在美国犹太人联合会的约阿希姆·普林茨拉比在杰克逊之后拿起了麦克风之后，他得到了一些礼节性的掌声。同时还掺杂着一些对金的呼唤——他是下一位发言人，也是最后一位。虽然由于白亚德·罗斯汀的天才安排，活动进程比预计提前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但是人们还是开始伸懒腰和找遮阳的地方。他们已经准备好回家了。鲁道夫介绍金时称他为“我国的道义领袖”时，一波波掌声持续了将近一分钟，这既是向这位声名鼎盛的领袖致敬，也是为这欢乐一天的结束而感到高兴。然后听众就陷入了沉默。

由于场合和听众情况的要求，那是一次很正式的演说。就在这之前，ABC和NBC暂停了下午的肥皂剧，也开始直播这个事件。CBS则一直在进行直播。金面对的媒体人和听众数量众多，而且差异甚大：既有运动最热烈的拥护者，也有大厅另一端顽固的国会议员们。在确定是否达到法定人数要求时，阴着脸的立法者们“在名册上记下了”92位缺席议员的名字——他们本来可能会被这场游行干扰了日常事务的处理。为了这一切，金用最清晰的语言和最庄严的声音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次演讲中不常出现滔滔雄辩，但每次出现总是引来热烈的掌声；而在那些大胆的段落时会有人小声叫着“没错！”和“接着讲！”，就好像为听到这样的话语感到感激和骄傲一样。在金谈到自由的支票遭到了拒付时，人们能听见前排的一个女人放声大笑，高喊“太对了！”。5分钟后，金宣称“只要旅途劳顿的我们不能在高速公路旁的汽车旅馆，或者城里的宾馆安歇”，这场运动就绝不会停止。这时人群中央爆发了一阵呐喊，距离之远让金直到一两秒之后才听到。

在快结束时，他一字一顿地说：“我们不会满意，除非公正顺流而下，除非正义如滔滔江水。”人们对此报以热烈的回应，就好像从《圣经》里的阿摩司先

知那时一路传来一般。这让金根本无法开口说出他备好讲稿的下一句。跟前一句比起来，这简直是最懦弱，也最装腔作势的一段（“所以，在今天，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园，成为推动创造性不满运动国际大联合的一员”）。他临时换词，呼吁人们重返战斗前线（“回密西西比去。回亚拉巴马去……”），要他们相信变化一定会“会以某种方式”发生的，他们不会“在绝望的谷底沉沦”。

现在只能接着布道下去了。他身后的一些人知道他已经偏离原稿太远了，但还是鼓动他继续下去。马哈里亚·杰克逊就像在教堂里那样脱口而出：“马丁，跟他们谈谈梦想。”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听到了她的话。不一会儿，金就说自己忘掉了讲稿后面的部分，于是就想到什么说什么了。在说出了“绝望”这个词之后，他马上顺下来说：“朋友们，今天我对你们说，在此时此刻，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和挫折，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是深深扎根于美国梦中的……”

考虑到听众的情况，他克制了自己，采取的方式比在底特律，或前一周在芝加哥的演讲审慎得多。在这里，他没有大喊或微笑，也没有机会像在群众集会时那样唤起连绵不断的回应声浪。他的节奏缓慢而坚定，这无比清晰地表明了这个梦想之上的激情。它突破了语言和文化的局限，表现出的东西不是纯粹的愤怒，也不是纯粹的喜悦，而是传达了一种普世性的，能够化苦为甜的力量。他有7次将白人和黑人作为两极对照了起来，而每一次都又回到了那引人注目的庄严中，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这一系列的“梦想”让他从阿摩司成了以赛亚。在这一段的结尾，他说道：“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之后的几句话来自原讲稿的结尾，但不到几秒钟，他又开始脱稿了，吟诵着诗作《我的祖国》的第一段，以“让自由的钟声从每一片山坡响起来”收尾。在仅仅一句话的间断之后——“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就一定要成为现实”——他又来了一遍：“让自由的钟声响起来吧。”到此为止，马哈里亚·杰克逊都很高兴，唱着“我的主啊！我的主”。金在新罕布什尔到加利福尼亚把自由之钟敲了个遍，最后又回到了密西西比。在这个

过程中，他坚实稳妥的框架发生了动摇，而他的庄严之情几乎很自然地延伸到了那个他自己已经很熟悉，而外界听来却耳目一新的结尾：“那时，上帝的所有儿女，黑人和白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手携手，合唱一首古老的黑人灵歌：‘终于自由啦！终于自由啦！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啦！’”这么说着，金突然走到一旁，而游行队伍也迅速开始接受本杰明·梅斯的赐福仪式。

就像大多数电视观众一样，肯尼迪总统也是头一次听全金的演讲。“他说得太好了。”总统在白宫里对助理如是说。让肯尼迪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金的即兴演讲，而且他很快就能说出最具原创性的叠句。在各个重要领袖从游行队伍中走进内阁会议室时，他微笑着对金说“我有一个梦想”，就好像是一个与他同台的发言人在品咂他的金句一样。这个恭维让金略微感到有些不舒服，因为在从林肯纪念堂走过来的一路上，只有他自己得到了“和撒那”（译者注：赞美上帝之语）的欢呼。马丁突然岔开话题，问肯尼迪总统是否听了沃尔特·鲁特的精彩演讲。后者确实做了一次演讲，而且是当天对肯尼迪总统最激烈的抨击（“只要我们在伯明翰否认了自由，我们就不能在柏林包围自由！”），总统在提到鲁特时也岔开了话题。“哦，我听过他很多次演讲了。”他这样答道。

总统与金没有那种闲聊的感觉。罗伊·威尔金斯要好些。就在肯尼迪四处握手的时候，威尔金斯发表了一段直言不讳的独白，巧妙地指出这次成功的进军会改变美国人民根深蒂固的偏见，减少他们对黑人及其事业有内在缺陷的疑虑。威尔金斯还奉承了总统一下——“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先生，这是你政治上的灵活”——在快结束时，他还加了一段自怜之语：“在这个雄辩滔滔的下午里，我却要学究气地、缺乏想象力地处理立法问题，这实在是很大的压力。其他先生们大可以代我一飞冲天。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直到此时，他才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肯尼迪政府应当加强民权法案。他声称，国会早就准备好通过更完善的法案了，一切就等着白宫点头。

大嗓门，操着英式口音的鲁道夫很快接上了威尔金斯的茬。他说，总统至少应该在法案中加入一节，禁止在雇工时排除某些种族。他这是在强调自动化和失业日益加剧的威胁。城里的青少年们发现以后找不到工作，于是越来越多地开始辍学。“我要告诉你，他们带来了一个令人警醒的问题，”鲁道夫告诉肯尼迪，“因为他们不相信任何白人。他们不相信黑人领袖。他们不相信上帝。他们不相信政府。换言之，他们相信整个社会都在针对他们。”

沃尔特·鲁特随后说出了另一个想要进行的修正案：恢复被剔除出1957年法案的原版第三节。根据这一节，总检察官有权发起诉讼，以纠正对民权的严重否认。在肯尼迪的法案中，只有在学校隔离的情况下才可以，而且一定要有私人律师提请诉讼，且当事人家庭贫困。鲁特说，扩展这项权力迫在眉睫，而且非常公平。他还说，现在他们已经有能力这样做了，因为这次进军的一个实际效果就是“我们已经建立起了我们有过的最广泛的有效立法联合体”。

肯尼迪总统插进来，打断了众口一词的有力呼吁。他说，在就业和辍学问题上，他已经和总检察长谈过哈勒姆和芝加哥南城区的情况了，两人都认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黑人领袖们如果仿照犹太人的例子，也许会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与我们正在谈的事情无关，”他说道，“但是就我看到——鉴于各位先生在黑人群体中的巨大影响力——我们要强调一下……犹太群体在教育孩子、督促孩子学习、让他们继续学业以及其他各种事情上所做的事情……”然后，肯尼迪就列出了自己的法案当时已经面临的各种困难。他朗读了劳伦斯·欧布莱恩预测的投票结果：在众议院是一个州一个州数，在参议院则是一个人一个人念。在众议院，支持和反对者势均力敌，而在参议院则前景渺茫。此外，当前的法案对参议院来说要更为顺耳——在那里这个法案一定要突破阻挠者的干扰。

威尔金斯拿出的数字则要乐观得多，包括来自约翰·麦克科马克发言人的私人保证，说一个强得多的法案会在众议院得到通过，从而对参议院施加影响。而一个较弱的法案不会赢得参议院的感谢，那些种族隔离最起劲的支持者还是一副

要将任何新法案撕碎的架势。鲁道夫站起来说，如果遇到的障碍真的像肯尼迪总统说的那样强大的话，“很明显，除非发动一场圣战，否则是无法让人们赞同这些维护民权的措施的”。肯尼迪对此表示同意，同时鲁道夫告诉他，“只有你能领导这场圣战”，他还呼吁对方绕过议会的头头脑脑，直接发动选民。

肯尼迪总统在这个两难的陷阱里很不自在。“这个，我们正在，呃，我们，呃，我认为，如果各位先生能在这里表明这是一件，呃，那个，呃，同时涉及两党的事情，会很有帮助，”他回答道，“我相信，就像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那样，共和党……会一直追随林肯纪念堂前的诸位……就像你们期待得到其帮助那样的形式。”在一位领袖直截了当地问，这是否意味着总统认为这次进军不会带来任何影响时，肯尼迪更坦率地表达了自己政治上的担忧。共和党人在做的，只是“试图打南方牌——近来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全国来看，他们也没什么可损失的，因为民主党已经得到了大部分黑人的选票。如果他们能够推动总统发动一场圣战，那么他们在民权这方面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而且还可以将所有黑人其他的不满推到民主党人头上。在当时和之后，肯尼迪总统都暗示他们在玩弄奸诈的政治游戏——支持种族隔离的民主党人在积极为有利于黑人的修正案努力，结果却只是让温和派更容易投票反对整个法案，而秉承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则威胁要投票反对法案，因为它太软弱了。总统被激怒了，他争辩说，民权人士需要推动两党的共识，而不是民主党的圣战。他宣称，让大部分共和党人支持民权已经非常难了，还提到了自己与“美国业界的那些大佬”在白宫的会面。肯尼迪抱怨说，这些商人“如坐针毡”，对示威感到非常忧虑。“我们最多也不过让他们如此了。”

鲁特插了进来，要纠正总统的思路。“你应该拿下这伙人里的一些小团体。”他急切地说。在底特律，他提到了汽车业的重量级高管。“我那时说：‘看，你们没法逃避这个问题，摆在你们面前的就两条路：要么讲理，要么揭竿而起。现在一触即发的内战不会发生在葛底斯堡，而是在你家后院，在你家工厂，在你们孩子长大的地方。’”鲁特还宣称已经组织了一个紧急劳资联合团体，以将汽车行业

团结起来。他强力推介自己的方法——林登·约翰逊式的密谋方案——是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方法，而且大肆抨击肯尼迪总统坐下来谈一谈的呼吁。“你要召开庞大的会议，”鲁特说，“而你没有一个组织完善的小团体来指导它的方向，推它一把，这样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

在游行后的峰会上表面礼貌实则针锋相对的辩论过程中，金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快结束时，他才问道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是否可能会由于个人的道义诉求而对众议院少数派领袖查理·哈洛克施加影响——后者是众议院中最具批判性的共和党人。

“不会，”肯尼迪总统很快就回答道，“不会的。”

为了澄清那种好像他想要自己承担这个使命的印象，金告诉肯尼迪，他的意思是“某些团体”应该做这件事，就像“艾克（译者注：艾森豪威尔的简称）恰好处在另一教派里”一样。这个涉及种族和宗教的打趣引起了一阵阵笑声。金接下来还是在小会议室中活跃着气氛——这可不像他做的事——又转向了宗派问题。他嘲讽说一定有某些方法把艾森豪威尔拉上船的。“他去教堂的时候不正是—一个民主党人吗？”

艾森豪威尔的私人牧师布莱克没有跟着大家一起笑，而是宣称实际上艾克“可能与他们站在一起”。然而，布莱克不建议由他进行单独的呼吁，警告说前总统“如果认为我想要向他施加压力”，那他可能就会暴躁起来的。布莱克认为最好是派出一个由社会各个团体的精英人物组成的代表团，由他们去向艾森豪威尔说明道义的问题，那样就不会显得太指手画脚。肯尼迪总统很欢迎这个想法，还鼓动布莱克去尽快组织这样一支秘密朝圣团，去艾森豪威尔在葛底斯堡的农场拜见他。他建议布莱克要加进一名天主教徒，“也许还要有一两个业界人士”。他朝火气一直很大的鲁特笑了笑，加了一句，“还有别让沃尔特直接去”。

下午6点12分，会见已经持续了72分钟。肯尼迪总统为这个不严肃的玩笑对各位领袖表示歉意，许诺会随时就立法投票情况与其保持联系。在此之前，罗

斯汀已经组织志愿者团队去打扫空无一人的大堂了，而各个新闻组织也已经急着赶回去，抢在晚上收工之前报道这个世界性的大新闻。活动全程都得到了大量的报道，这表明这次游行规模空前，而且非常平和，蕴含着一个强有力的潜台词：这次大众政治整合过程的第一次活动令人极其愉快。并不是所有的白人报纸都从一开始就将金的深意表达了出来。比如说《华盛顿邮报》就只强调了鲁道夫的演说，而没有提到金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纽约时报》的报道题为“金博士的《我有一个梦想》为这个首都会永远铭记的一天画上了句号”，作者为詹姆斯·拉斯顿。这篇报道放在首版，包含了不下5个关于这次游行的故事，分别放在两张大幅群众照片周围。《纽约时报》是关注民权运动的先锋之一，而这可能就是其顶峰。黑人媒体的报道则是一片骄傲的欢呼。就算是《亚特兰大世界日报》也宣布，这次游行“永远”改变了对种族的认识，而且还临时放松了自己的原则，把金的照片放到了头版（虽然是与肯尼迪总统的合照）。摩城唱片在几周后发布了一张专辑，随后很快就出现了非法的《我有一个梦想》录音流传，它们都出自迈斯特罗唱片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唱片的手笔。克莱伦斯·琼斯很快就代表金把这些非法传播者告上了法庭。

在时事评论员中，只有斯坦利·利维森对金演说中微妙的政治信息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利维森为当天的成功感到无比骄傲，告诉来电者“马丁在演讲中非常精彩地把握了白人和黑人的问题，彻底地驳斥了亚当·鲍威尔、穆斯林和其他所有人的废话，看问题的方式非常积极”。他称赞金“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当时的明星”，还说他为罗伊·威尔金斯公开表现出来的大度“倾倒”——后者曾经拒绝邀请金参加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15年周年纪念晚宴。

“梦想”那一段话很快出现在黑白双方的各个媒体上，从而奠定了金在公众中的形象。批评者会指出，这个梦想是空中楼阁，而那些向往单纯的正义的人则会反对说内容太单薄了。在几百万人中，还是有几个人觉察到了演讲中的不切实际与天真，这是很宝贵的。与此相对，这次演讲的情感感召力让金拥有足够的权

威重新诠释民主正义最核心的直觉。不仅仅是言辞，他的声音本身也使他跨过了种族隔阂，俨然新国父的气派。他能取得这样的政治家地位，是靠撇开高高在上的讲稿，去大胆随意地发言取得的——就像他在每年 200 场的演说中常做的那样。这可真是针对黑白两种族的一个恰到好处的玩笑。

第二十三章 翻越：梦魇与梦想

那年9月，联邦法院命令伯明翰当局接收第一批5名黑人学生进入3所不同的公立学校。华莱士州长带头掀起了一场公众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鲍特韦尔市长暗中周旋于华莱士与伯克·马歇尔之间，分别对二人说他希望另一方的军队能一直驻扎在城外。鲍特韦尔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成功地拖延了时间，使法庭能够考虑“先天种族差异”的新证据。当晚，亚瑟·肖尔斯的家又一次遭到了炸弹袭击，这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游行，持续了一整夜，警察以防爆柜、扔石子弹压，最终武力镇压成功，造成了一位黑人被杀，另有21位黑人受伤入院。截至第二天上午，华莱士已成功说服鲍特韦尔关闭了预计要接收黑人学生的融合校。金向肯尼迪总统发出了另一封抗议电报。

在9月9日这天，肯尼迪总统专门出席了NBC的《亨特利—布林克利报道》节目，这实现了电视台夜间新闻的时长从15分钟延至30分钟的大跨越——这3家伯明翰学校最终复学，但华莱士将国民警卫队部队派驻进这些学校以隔离这几名黑人学生。由于一时疏忽，华莱士并没有派军包围该州亨茨维尔市内的另一家有相同情况的学校，这使得亚拉巴马州在当天出现了第一位在白人学校入学的黑人小学生——6岁的索尼·W.海福特四世。到了早晨，肯尼迪总统已将伯明翰的国民警卫队收归联邦指挥，并将其从伯明翰撤出，使这5位黑人学生在当地能开始上课，这导致大部分白人学生鱼贯而出，以示抗议。在本周余下的几天里出现了颠覆性的紧张局势，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在西尾高中，白人啦啦队队长和橄榄球选手组织了一场运动，支持黑白同班上课的班级，对抗主张实行种族隔离学校的同学，后者进行了游行，还四处扔石头，导致了一场罢课运动。其他的白人学

生在鲍特韦尔市长的办公室里进行着一场静坐抗议活动，以抗议同黑人学生一起上课。华莱士州长公开谴责了联邦政府的干预行为。在9月13日周五，他乘机抵达巴尔的摩，宣布自己将参加1964年马里兰州的总统预选。

那个周日是第十六大街浸礼会一年一度的青年节。主日学校的校长玛米·H. 格利尔来到地下室女洗手间外面，发现4名年轻女孩从《圣经》课早退，现在正热烈地讨论着刚开始的新学年。这4名女孩从头到脚都身着白色衣物，因为在当天11点时，她们将为成年人主持礼拜仪式。格利尔催促她们快些离开这里，之后她上楼自行进入女性的主日课程。她们正就课程话题“宽恕的爱”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就在此时，整座教堂发生了剧烈的震动，教室里到处散落着泥块、碎屑。格利尔的第一反应是这里就像是刚结束一场抛纸带游行。学校老师玛克辛·麦克奈尔就坐在她身边，她反射性地全身僵硬了起来，她也成了唯一一位还能开口说话的人。“噢，我的天哪！”她说道。她同格利尔逃出来了，但向下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却被堵住，毫不夸张地说，外部巨大的石质楼梯几乎已经看不见了。她们跌跌撞撞地穿过教堂行至前门，然后再穿过逐渐聚拢起来的声声悲鸣和警报声来到了室外。一位歇斯底里的教会成员向格利尔叫嚷着，说她的丈夫已被第一辆到达的救护车送去医院了。麦克奈尔绝望地搜寻着她的独子，直到最后她不经意间撞见了一位啜泣的老人，不禁尖叫道：“爸爸，我找不到丹妮诗！”老人无望地回道：“孩子，她死了。我找到了一只她的鞋子。”他手握着一只小女孩的白色礼服鞋，而他女儿脸上的表情不禁使他吼道：“我要把整个镇子都炸飞！”

在当时，10岁的莎拉·柯林斯从原本石质楼梯所在那面墙上的大洞踉跄逃出来了。她的眼睛部分失明，由于脑震荡，她的鼻子和耳朵一直在流血。她的哥哥一边到处跑，一边尖叫着说他的妹妹死了，在这场混乱的冲击中，人们花了些时间才明白过来他说的不是莎拉，而是他的姐姐，14岁的爱迪·梅尔。救护人员迅速将莎拉·柯林斯抱起来送到救护车上，连同其他约20位伤员一同送至大学医院。从玛米·格利尔的表情隐约能猜出，丹妮诗·麦克奈尔和爱迪·梅尔·柯林斯

就是几分钟前她曾在女洗手间遇到的那4名女孩中的两位。尽管格利尔车上的车窗已完全粉碎，挡泥板卷曲了，半扇车门也被炸飞，她还是冒险试着启动了车。她晃晃荡荡地开走，最后停在一个警方路障前，现在全城都布满了这些路障。警官雇了一名白人为其代驾，将车开往医院，她在医院内的轻伤员区中找到了她的丈夫。医院里充斥着惊心的尖叫声、唱诵赞美诗声、电视台摄像机的拍摄声，还有警卫们为了控制人群而吼出的命令声。医院里到处传颂着暖心的事情：牧师年仅4岁的女儿苏珊·克劳斯在这次事故中也受伤了。人们在推她坐的轮椅穿过附近的走廊时，她勇敢地笑着。格利尔除了默念“那些可怜的女孩们啊”也没说别的，在接下来两周内她一直反复念叨着这句话，神情镇静却又茫然若失。

路易斯小学的校长克劳德·韦斯利此前并不经常参加主日学校的课程。把养女辛西娅送至教堂后，他便自行外出享受美好的周日早晨。爆炸声打断了他手上的擦鞋活儿，他立刻奔到教堂、医院，最后来到了太平间，那里他和妻子凭着女儿的一只脚、一个手指上佩戴的戒指辨认出了女儿的遗体。克里斯·麦克纳尔也绝望地走了一遭韦斯利的路线，最后也来到了太平间。麦克纳尔不仅是路德教会成员、学校老师，还是一位自由摄影师。爆炸发生时，他在自己教会的教堂里，那里距离这儿有几个街区。在前往调查的路上，他停车取来了自己的相机，但当他在医院找到自己的妻子和岳父时，那列队诵念祈祷文的景象让他感到了一丝异样，恐惧感油然而生，他的手不禁颤抖起来，更无法对准镜头。由于悲恸，祖父的情绪变得麻木，从最初的愤怒转向自己的信仰。“或许这孩子的逝世也是好的。”他说。克里斯·麦克纳尔很快踉踉跄跄地返回了市中心，调查各家避难所接收对象及情况，寻觅着准备一场家庭葬礼所需要的物品，这令人备受折磨。他所到之处，身披白色衣物的员工都不禁放声大哭起来，说自己曾在电视上见过他。陌生又奇特的情绪焦灼着眩晕的他，疼痛与镇痛软膏对他来说都已经麻木了。麦克纳尔确认其中一些白人就是杀害教堂里他女儿的凶手，但当天下午，一些表情凝重、极度紧张的白人陌生人上门向他志哀。其中一些人专门开车前来，

而且车牌号是南方的。

教堂爆炸事件的余波在伯明翰白人群体内疯狂传播。一位牧师中断了卡丁车赛道上的种族隔离集会。在从集会地回家的路上，两名雄鹰童子军向两名共骑自行车的黑人男孩开枪，杀害了握着车把手的13岁黑人男孩。这两名雄鹰童子军告诉警察，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开枪。直到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先前在爆炸现场警察中弥漫着的客气的同情在现实面前早已变得麻木，警察已预判街上的黑人将会做出报复行动。华莱士州长派林戈上校率领300名政府士兵进驻该城。通常来说，当警察前来镇压白人青年同黑人青年之间的互扔石子暴动的话，黑人们都会逃跑，而白人则会欢迎救援队伍的到来。警察开枪射中了一名逃跑黑人的后脑勺，致其死亡。在整体白人群中，反应要温和些，但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先是一阵同情和大而无当的悔恨，但很快就变成对夸张指控的憎恶和越发高涨的无罪感。白人律师查尔斯·摩根激情飞扬地宣告着他及其他所有白人对此次爆炸事件感到愧疚，因为他们一直容忍，甚至鼓励着种族仇恨的发展。“我们都参与其中。”他说。为此，他被白人们所鄙视，而他的演讲也掀起了一股愤愤不平的自我辩护风潮。“我们所有人都是受害者。”鲍特韦尔如是坚称。

由教堂爆炸现场产生的厌恶情绪迅速地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肯尼迪总统派一架直升机前往伯克·马歇尔的假日农场将其召回，并再次将其派往伯明翰。马歇尔发现这座城市确实充斥着各种枪支，并公然出现在公共场合。商店关门。白人警察在黑人街区里设置路障阻挠黑人的行动，而黑人游民则挥舞着手枪和棍棒驱逐白人闯入者。警察与当地的FBI探员都拒绝冒险护送马歇尔前往约翰·德鲁家同金见面。最终，一群身穿“民防组织”自制制服的强悍黑人从联邦政府大楼将马歇尔接来，把他摁到车后座，让他低着头，还戴了一顶头盔，然后被带到炸药山，一路都很难熬。在炸药山，黑人富豪雇来了保镖以保护其居所的安全，避免遭受后续的轰炸。马歇尔在一群激动的牧师、顾问和伯明翰当地领导中找到了金。上一一起爆炸所带来的急迫情绪同发生另一起爆炸的潜在威胁在各处疯传，二

者都夹杂着大量其他的紧急措施，比如白人学校每小时查验一次这5位年轻黑人的感受。金驳斥了A.G. 加斯顿及其他伯明翰保守派的言下之意，他坚称，这次爆炸案是因为在民权事业上胆子太小，而不是太大。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向记者们泄露了这场讨论的一点玄机：“是什么造成了这4个女孩的死亡？是大多数黑人们的冷漠和自满，他们宁愿坐在凳子上无所事事，也不会主动参与新的抗议活动以摆脱这个恶魔。”马歇尔在听到金没有立刻举行游行活动的计划时松了一口气，并保证说司法部部长早已命令FBI全员参与教堂爆炸事件的调查，可以无视此前引用的守法主义及管辖权方面的障碍。就观察到的第一手信息来看，马歇尔同意金的担忧，即公开的种族冲突随时可能爆发。

马歇尔返回华盛顿后，金留下来处理下葬工作。他与其他军事指挥官不同，并没有减少同幸存者在电报或相关葬礼上的联系。身为一名牧师的他更有义务前往举行葬礼的家庭向其志哀，在尚未合棺的棺材旁直接发言。尽管金现在对策略问题毫无头绪，也缺乏切实想法来让伯明翰重新成为民权进步之所，但他并未将自己同爆炸事件撇清关系，或是将这些死亡视为运动中的偶发事件。相反，他认领了那些支离破碎的尸体。当他听说举办多场分开葬礼的计划时，他要求第十六大街浸礼会的牧师约翰·克劳瑟对其做出解释。“为什么不举办一场大型葬礼？”金问道。

“唉，马丁，我本来是这么想的，”克劳瑟回答说，“我也是想举办一场大型葬礼，但有一家人不同意。”

金并不满意他的解释，独自前往拜会痛失卡罗尔·罗伯森的父母。他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劝说他们同意他们的女儿同其他人共同举行赞美仪式。他这么做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表明自己用于面对领导事业前进过程中生命的丧失。然而，他仍无法改变罗伯森夫妇的想法，二人都是学校教师，坚决抵制一场“哗众取宠”的大型葬礼。“我们明白是这场运动使卡罗尔失去了生命，”罗伯森夫人说，“但失去她的痛苦对我们来说却是我们家自己的事。”她允许夏特沃斯在她女

儿的葬礼上布道。

金的劝说仅仅让伯明翰教堂爆炸事件逝世的4户家庭中的3户来参加这个葬礼。“人生有时很艰难，”他说，“就像是坩埚中熔制的钢水那般令人焦灼不堪。”8000人勇敢地自发组成治安委员会和吉普车巡逻队，并出席了挤满牧师约翰·波特所在教堂的大型葬礼。在职官员无一人出席。在送葬者中有800名伯明翰黑人与白人牧师，纵观这座城市的历史，此次出席的人数远超伯明翰历届异族牧师聚会的人数。他们在9月18日周三聚首，而这天距华盛顿游行过去了整整3周。结合在一起来看，这两次事件鲜明地刻画出了一种像在神话中一般清晰的矛盾：纯粹但盲目的善良目的和好人的受苦，对抗巨大的邪恶势力。这些现实的极端情况天生不稳定，但它们却打开了新的视角。

当夜，戴安·纳什所采取的行动使她决定在1965年于塞尔玛进行了一场为获得选举权而抗争的运动。当时的她很愤怒，私下里告诉金，她不能招笼一群被虐到无力的人来参与非暴力活动后，就让他们无所事事。教堂爆炸案发生后，她和贝弗尔觉得，就连像他们这样一群热烈信仰非暴力信条的人都差点被这场令人发指的活动逼到想杀人的地步。他们决心采取行动进行下面两个方案中的一个：破案并惩治作案者，或是在亚拉巴马州全境内为黑人赢得选举权，迫使华莱士、林戈从办公室前来此地。在之后的几天里，纳什制订出了一份实现第二个目标的书面计划，有了经过严格训练并形成旅、师规模的非暴力队伍支持的话，他们将能包围华莱士在蒙哥马利的政府并对其造成严重损失，“切断州议会大厦建筑的对外通信……躺在火车轨道、飞机航道和公车车道上……封停电力公司”。她的计划实际上是一场与华盛顿游行规模相符的长时间静坐抗议活动。“这是一支军队，”她给金的信中写道，“应制定一面旗帜，还有徽章、胸针徽章或是圆形小徽章吧。”当晚，她为这个计划据理力争，金却几乎无法认真看待这份计划。他刚刚参加完一场葬礼。他关注的是他能为伯明翰的明天做些什么，而非6个月后的蒙哥马利。而且，华莱士会很乐意这一支队伍发起突袭的。金差一点让纳什离

开，还有约翰·路易斯，当时他也在那里，他很赞同纳什的想法，但拒绝了她举行特别战略会议的要求。他的兴致却惹恼了纳什，她认为金过于渴望到华盛顿同政治家们进行一场空谈。

第二天下午，当金联系到华盛顿政府时，他遭到了前后夹击，他的建议均遭到了否决。他并没有为活动制订任何额外的计划，例如有具体目的的游行或示威活动。同他一起出行的有 A.G. 加斯顿、J.L. 韦尔牧师及其他伯明翰黑人的主要支持者们，他们在春天时还曾一直反对他的示威活动，但现在在面对残酷的灾后之境后倍感沉重。他们不会接受关于大型示威活动的建议，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座城市正处在毁灭的边缘。金此行前往华盛顿仅仅是为了获得联邦政府的支援，但马歇尔警告称，肯尼迪政府早已否定了此类希望。白天早些时候，罗伯特·肯尼迪宣称在他看来，派遣法警或是军队至伯明翰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就在下午 5 点之前，皮埃尔·塞林格称肯尼迪总统已任命了两名私人密使斡旋伯明翰的种族纷争：一位是前任陆军部部长肯尼思·罗约尔，另一位是前任西点军校橄榄球教练厄尔·布雷克。金一行人刚抵达白宫的前几分钟，政府就对伯明翰爆炸事件做出了公开回应。

一阵迷雾笼罩着在内阁会议室进行的密谈。一开场，金就直截了当地就伯明翰 28 起尚未解决的爆炸案件，以及现阶段种族隔离主义戒严令的潜在威胁发表了一段气氛沉重的演说。“现在的黑人群体感到了深深的沮丧、绝望和迷茫情绪，”他向总统说道，“人们现在感到孤立无援。走在街上，不安全。待在家里，也不安全——都有爆炸的威胁。现在在教堂里也不安全。因而，黑人觉得不管他去哪里，甚至是压根不动都处在人身危险之中。”肯尼迪总统一直保持沉默，直至 A.G. 加斯顿打断金的陈述，抱怨保险公司正采取措施准备取消对黑人公司的商业保险，而迈尔斯学院的校长皮茨指出他已无力为其新建的学生活动大楼获得保险的保障。肯尼迪一听到这点便重新振奋起来，表示他们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校长先生。”伯克·马歇尔自信地说。

但当夏特沃斯继续陈述金的主张，即派遣联邦军队并取代州军队进驻伯明翰时，总统再次陷入了沉默。他想知道一座黑人占总人口40%的城市缘何要遭受一群白人的威胁，而且这群白人曾犯下各种赤裸裸的暴行及未破案件。韦尔进一步借题发挥，称当地警察几乎已堕落到与华莱士军队无异的地步。肯尼迪总统并未质疑这些论断，但对他而言，他们仅仅是表明一个人数众多的白人强势群体对黑人有着难以调和的憎恶。他打断了韦尔的话并表现出明显的愤怒。“如果当地警察在那里，州警察也在那里，那伯明翰还有什么希望？”他反问道。而当韦尔喃喃说着关于戒严令的事情时，总统坚定地表达出他的观点：“伯明翰还能指望什么长远的希望？”

其他人在听到肯尼迪总统不悦的话语时不禁畏缩。金安静地站起来，放弃了关于军队的讨论。“我仍坚信伯明翰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他说，“伯明翰也有许多善良的白人。他们也需要帮助。我认为我们现在所报告的情况就是紧急情况……军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我们也知道这点。市长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不够强势。”

肯尼迪总统回复说他对他们的沮丧感同身受。“现在对黑人而言是很艰辛，”他说，“……而我也知道这次的爆炸事件造成了极其艰难的局面。但你也知道，你随便看看全世界范围内在一段时间内进行的任何一场斗争，你都会发现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因而，每个人都不得不保持冷静。”他称赞他的两名新任命的密使，他们的美好声望让他们有机会打开种族之间的沟通。“罗约尔十分出众，”他说，“而布雷克上校是我所见过最出色的人之一。”

金很快就见识到了白宫外面庞大的联合报道组。“这是联邦政府所关注问题的需要。”他说。《纽约时报》及其他主流媒体直白地报道今天的进展：“肯尼迪被指名了两次……黑人鼓励运动，否决了对军队进驻的呼吁，并接受成立考察小组的建议。”然而，即便在金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迅速产生了许多异议。记者们的提问很尖锐，尤其是一些黑人记者，质问他是否真的相信成立一个“考察团”

就是对第十六大街浸礼会教堂大屠杀的最好回应。他是否认为两名“被隔离的”白人军队退休人员就能够促进种族之间的和谐？金是否知道罗约尔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企业律师，还有“红发”布雷克在西点军校所带领的著名球队从未允许黑人的加入？金是否听说过这两个人或是知道他们的任何事情？他是否认为这次任命是刻意安排在这个时间点，以表明他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并未发挥任何作用？金为自己的辩护根本站不住脚，不得不逃到司法部以避开记者。第二天他对“奥尔巴尼九君子”的起诉提出异议，但并未获得支持。克莱伦斯·琼斯警告金说詹姆斯·鲍尔温及一群纽约学者怒不可遏，他竟允许肯尼迪总统如此无耻地耍计谋获胜。然而，鲍尔温一群人对一场圣诞购物季抵制活动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反应，但几乎就在宣布这一活动开始时他们就失败了。金在现实与嘲笑之间忧心忡忡。

截止到那个周日，至伯明翰教堂爆炸事件发生已过去了一周时间。直至当时，到处流传着这次惨剧的具体细节——教堂的时钟停摆在上午 10:22，耶稣的面部从东墙上仅存的彩色玻璃窗户完整地掉落。在一个纽约电视节目上，詹姆斯·鲍尔温同雷茵霍尔德·尼布尔讨论了“遗失的基督面庞”。他们的讨论充满了对公民权利运动长期累积的情感，尼布尔将该运动称为一场“变革”，而这正让他有机会重新出山。鲍尔温争辩说那场苦痛使黑人成为“这个国家仅存的希望”，不是因为他们的种族或是天生的美德，而仅仅是因为在极端环境下人们“找到了他们真正能赖以生存的基础”。他补充说，大多数美国人“不再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有具体的感知。我真的觉得它可能是可口可乐”。尼布尔赞同鲍尔温的看法，称“历史会阐明这点”。“我们处于变革的环境之中，”他说，“纵观历史，这是一群被轻视的少数群众——无产阶级、农民、贫民——而他们现在重新占据了信仰的高度和深度。这个国家现在正承担着过往曾犯下种种恶行的报应，而我们也即将承担自己的报应。”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视节目——这个节目让乏味的老日耳曼神学家同饱受折磨的年轻贫民艺术家同台，他们之间看起来不太可能的合作自然且充满激

情。他们之间的分歧点在于对难解的非暴力运动的看法。鲍尔温对非暴力运动的局限性表示愤慨，他批评这是黑人特有的一种心理苦难，而这贯穿了美国历史始终，“非暴力运动只有在黑人参与时才会被推崇”。尼布尔驳斥了作为弱势贫民的鲍尔温却对非暴力运动采取了常见的鄙视态度。“人们问我，”尼布尔说，“我既然如此反对和平，又是如何对和平支持者抱有一份尊重的？好吧，我的回答很简单……金的非暴力抵抗教条运动并不符合和平主义。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主义是指你要关心你自身的纯洁，无关责任。而这巨大的道德鸿沟横亘于人与人之间，一类人想保持纯洁，而另一类人想承担责任。在我看来，金的言行已体现出了这种差别。”

金可敬的对手中似乎已经出现了对抗情绪。在9月23日周一，一行5名伯明翰高官长驱直进入肯尼迪总统的办公室，陈述己方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并未表现出质疑或是防御的态度。“总统先生，我们是肩负重大责任来到这里的。”鲍特韦尔的代言人威廉姆·汉密尔顿首先发言。他说伯明翰负责的白人们莫名地因教堂爆炸案而被污蔑，他们对此感到了深深的厌恶，与此相反的是他们在此之前早已采取了措施来解决种族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却无法为此而获得赞扬”，最后阻碍他们进程的却是和平工作氛围的缺失，尤其是因北方批评家和外部挑唆者如马丁·路德·金此类人造成局面的停滞不前。

肯尼迪总统执拗地坚持应执行之前司法部部长和伯克·马歇尔拟定的简要议程。他迫使这些高官至少在以下3个能在最低程度上改善现状的具体措施中选择一种，以缓解爆炸案发生之后产生的全国性压力：（1）遵守五月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少雇用一些黑人售货员；（2）同当地的黑人领袖之间开始白人与黑人的沟通；（3）最起码雇佣一名黑人警察，即便做到像密西西比州杰克森曾经那样也可以。“我想知道你们的选择，”总统说，“尽管你们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够多了。”伯明翰代表成员们认为哪一个措施都不妥。至于一名黑人警察，汉密尔顿说肯尼迪并不知道单就为了替换布尔·康纳，他们就需要承担何种人身攻击。

“我光是走进市政厅，还有市长走进市政厅就耗费了我们早上 50% 的警力，如果我主动伸出我的手，他们会拒绝握手，”汉密尔顿说，“如果我开口说话，他们会拒绝应答。”他说至少三分之一的警察宁愿辞职，也不愿同一名黑人共事。兰顿·米勒博士兼牧师是伯明翰教士联合会的主席，他告诉肯尼迪说稳健派已被“抹黑”。“昨天我们离开飞机场时，我们头上竖着牌子，上面写着这些自由党并不能代表我们的心声。”他说。

肯尼迪总统对此表示同情，说人们也在辱骂他，但这就是活在困难时期公众生活中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他们不能采取措施，局势只会越来越糟糕。每隔几分钟，他就果敢地重复着：“现在是不是来不及补救了？……能否做些补救？……我只是试着思考两三件能补救的事情……现在你还能做些补救吗？”他的话最终刺激到了电信公司的副总弗兰克·牛顿，牛顿称其为“坦白却又令人尊敬的回应，”而这些措施将只会鼓舞“那些人”，可事实上，“许多人……认为你正给那些人鼓励。”

“我明白。”总统回复说，他的语气中有明显的防卫性。他告诉他们，他并未鼓动任何一种在伯明翰的挑唆活动，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并不认为所有的挑唆活动都是毫无根据的。“让我来解释清楚，我认为获得一支警队是合法的要求，”他说，“我也认为人们在商店里做售货员是合法的行为。而且，我认为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你唯有选择这个立场。我的观点是如果你能整合各方武装力量，并在整合之地你们能做到同住、同吃、共用洗手间以及所有其他的事情，那你也能在这些情况中共事……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些相当有限的事情。”牛顿反驳说在他看来，肯尼迪的公共设施法案并没有那么多的局限性，肯尼迪总统听到后相当愤慨。“噢，公共设施什么都不是！”他说，然后开始了激情陈述，同公立学校令人痛心的问题相比，公共设施可以说是正义的底线。“这里没人对此还抱有天真的幻想，”他说，“或是不理解这个问题，或根本不知道华盛顿现在的情况，在华盛顿，黑人占 54%，而其中 85% 的黑人在学校中，白人正逃离华盛顿。没有

人会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公共设施毫无用处！天哪，这是关乎于你能否进入一家商店还是酒店的问题。他们不会住进斯塔特勒……他们也不会住进伯明翰的酒店。”他告诉他们，他不愿同亚拉巴马州起争执，然后结束了他的劝诫，“但就这个问题的现状而言，你现在难道没有任何可以补救的措施吗？……你应该有能力扭转局势”。

“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扭转了局势。”牛顿带着喜悦的神情回答道。在此之后，肯尼迪总统再也没斗胆提出情绪化的要求。他确实警告他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把金赶出伯明翰上，说 SNCC 和更多的种族团体会来找他麻烦。“金从非暴力运动中受益良多，”总统说，“而 SNCC 在暴力活动中也获益颇丰，这就造成了双方的冲突。”但肯尼迪自己却未做出任何威胁，未提出任何交易，未进行任何谈判。他又老调重弹，说起自己在代议制下当一个总统是多么无助，说他希望他们最起码采取一种措施的次数不少于 25 次，“哪怕是一次公关行为……任何能预示未来会变得更好的事情”。纯粹由于身心的疲惫，肯尼迪总统回到了唯一可以进行的积极措施：支持布雷克—罗约尔的调查行动。领会到这层含义后，伯明翰高官们说他们已准备好如此行事，并为此次交流意见而感到欣慰。

虽然并未参与这次白宫会见的内部纷争，但金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看到了公开宣布的结果：“肯尼迪称伯明翰能自行解决目前的问题。”此类报道让他倍感焦虑煎熬，当周他在里士满参加 SCLC 组织的第七届年会。这场持续 4 天的盛事吸引了 500 名代表成员，为了庆祝这场运动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罗莎·派克斯都进行了简短的演讲，弗朗西斯·格里芬也是，他是一位牧师，12 年之前他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了芭芭拉·约翰斯在法姆威乐镇上领导的学生罢课活动。伯明翰运动合唱队举办了多场歌颂自由的夜间演唱会。一个就“非暴力运动的影响力”的专题讨论以组织者为主，现在又吸引来了一群传奇人物——贝亚德·拉斯廷、詹姆斯·贝弗尔、詹姆斯·劳森和 C.T. 薇薇安。大会听取了加斯顿、丹维尔以及另 10 座城市的汇报，它们受到了伯明翰的鼓舞，也正处于紧要关头。明星演讲

人包括迪克·格雷戈里、罗伊·威尔金斯、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以及两名美国参议员。

他们全部涌入里士满的约翰·马歇尔酒店。这家酒店富丽堂皇，历史悠久，勉强以礼接待，屈从于它所举办过的第一场种族融合大会。对代表们而言，因教堂爆炸案而压抑了过多的情绪，些许不同的争执氛围都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就连维持这场运动的理想主义门面也变得十分困难。金认为，成功的阴暗面与失败的统治阶级相抗衡在暴动的中心。基于 SCLC 惊人的增长，怀亚特·沃克要求拿到几乎为之前 3 倍的工资，然而多人指责金的无能使得 SCLC 毫无业绩。金的名句“我有一个梦想”招致了拉尔夫·D. 阿伯纳斯长期的嫉妒，使得他愤愤不平地抱怨自己的酒店房间不如金的房间那般精致，而且最后，喝醉的他还在电梯里同一名白人扭打起来，起因竟是这名白人不同意他对客房服务的不屑评论。赛普提玛·克拉克跟随着阿伯纳斯进入了他的房间，坦白地告诉他，他这个人其实糟糕透顶，浑身充满了不相宜的怨恨。虽然她很忙，但她还是批评他故意不按时参加教堂礼拜并炫耀自己高人一等的毛病。她特别提醒阿伯纳斯自己在他的教堂里的演讲时间，而阿伯纳斯坚持要带她参观他的花园，同时放话称，教堂里的人会一直唱赞美诗直至他出现。阿伯纳斯反驳称克拉克并不了解一切情况，但他很有可能愿意容忍任何人的责骂，除了 SCLC 那所谓的母性良心。（克拉克拒绝接受在大会上宣布为她加薪的提议，在写给金的信中她说自己“接受这个提议的话是无法感到绝对自由的”。）同时，在大会举办地，放荡的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继续他对威尔金斯和 NAACP 的羞辱，称其为“控制欲强的白人”，而他也粉碎了人们对通过民权法案所持有的希望，他说白人给黑人的已经太多了。

原定为 3 小时的理事会议最终持续了整整 4 天。所有的牧师认为为了从教堂爆炸事件的伤痛中恢复过来，金迫切地需要施行一场新的运动。难就难在如何确定运动开展的方式和地点。之前，大多数人支持选择丹维尔，但现在一些人反对，提出放弃伯明翰将会是致命的错误。在他们讨论期间，从伯明翰传来消息，

鲍特韦尔市长在一场全为白人的欢迎仪式上劫走了布雷克和罗约尔并将其隔离，鲍特韦尔早已安排好这一切，布雷克和罗约尔早就同意秘密组织隔离会议进行调查，而最终皮茨及其他黑人领袖因无从知晓肯尼迪总统派来的特使情况，而且无法联系到他们而变得愤怒。

这一切都让金倍感耻辱，都怪他过早地相信了肯尼迪对此次爆炸事件的态度。夏特沃斯的财务主管威廉姆·萧瑞吉告诉理事会伯明翰黑人正在收集枪支，于是理事会的态度骤变，支持继续为黑人售货员和警察进行非暴力示威游行。金同意了，但表示要注意这3点：（1）伯明翰的许多黑人将会野蛮地反抗他们；（2）伯明翰警官仍持有 SCLC 从上个春天开始支付的 30 万美元保释金；（3）如果游行示威的规模不能超过在 5 月份举行的游行规模，那示威不会取得任何效果。本杰明·胡克斯提出要在蒙哥马利进行一场游行，这是改头换面的戴安·纳什方案。这场示威针对华莱士州长和选举投票特权表现出了极强的攻击性，但它指出了新方向，而金在蒙哥马利的多年经历让他深知 MIA 尚未健全。正当他们争执时，又传来了新的消息，伯明翰的炸药山上又发生了两起爆炸，然后是约翰·路易斯因在法院外携带“一人一票”的标语在亚拉巴马州赛尔马被捕。当 SCLC 理事会在里士满开会时，约有 200 名追随者跟着路易斯游行。在监狱里，SNCC 的领袖们计划举行一场在赛尔马的“自由日”运动，这场运动融合了纳什的新想法和鲍勃·摩西在密西西比州获得自由选举权的计划。

SCLC 理事会对各种备选方案犹豫不决，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对提振士气毫无助益。金雇用了哈里·波蒂，曾任主管的他与红十字会有长期合作。后者计划进行一次俗称活动，以减少 SCLC 成员的拼写错误、爱传八卦，以及其他被他称为“没文化、不专业的员工队伍”的缺陷。这直接触及了怀亚特·沃克，他认为不会有任何白人经理比他更严苛了。在混乱的管理系统斗争中，员工们对蛮横的沃克的愤懑浮出了水面。沃克在大会上以“不負責任、不服从安排”为理由解雇了 4 名 SCLC 高级职员，以此作为反击。金之后成功说服他收回解雇的命令，仅

仅以扣工资作为惩罚。沃克让步接受了，部分原因是他想羞辱的其实是贝弗尔。金的协调理事会也建议他同贝弗尔重修旧好，沃克勃然大怒，进而提出了他的第一份辞呈。“我简直无法忍受，”他说，“我要离开这里。”

金试着让沃克冷静下来，就薪水的问题对他进行安抚。直至深夜，他们仍在进行着博爱的说教，努力净化心灵。SCLC的高级牧师们聚在一间套房内，房间里有香烟和几个瓶子，牧师们互相取笑，讨论着世间最伤人的是什么——死亡、世仇、当今的迫害，还是他们正经历的种族不安感，那从未消失的不安感。几乎每一句妙语都会博得应景的《圣经》金句，某人还会兴致勃勃地来一场讲道。他们在伐木季的深夜像爵士音乐家一样纷纷唱着即兴创作的独奏，展现他们歌剧家般的歌喉，还有他们永不枯竭的隐喻、神话及寓言故事。贝弗尔和沃克以著名的血仇之意互相讲道。沃克保证当他挣到他的第一个100万美元时，他会给“圆嘟嘟”阿伯纳斯买一枚钻戒，而这引得了就名利、对金钱的热衷的简短讲道。他们取笑金那形似肝脏的嘴唇和犀牛般的耳朵，还取笑了安德鲁·扬那卷曲的头发和毛茸茸的“白人”鞋子、沃克的绸缎领带和他又高又黄的颧骨、伯纳德·李那到处乱瞟的眼睛。

但直至迎来了新的一天，他们仍未找到任何一种能缓解这场运动目前所处窘境的解决办法。金极度渴望能重新开始非暴力运动，为对两个种族产生深远影响留下一些希望，但他也明白，再发生一场伯明翰爆炸的话，将会引发一场完全摒弃非暴力运动的种族间战争。他认为自己应该前往丹维尔，但他又无法离开伯明翰。他的理智告诉自己，他不应冒险破坏同肯尼迪政府的关系，毕竟它在黑人中获得了90%的支持率，而这对反抗民权的白人来说早就是脆弱不堪的。然而他再也不会对布雷克和罗约尔的调研抱有任何希望了。

“我一直保持沉默，”他在9月27日大会闭幕词中说道，“……我这种行为让那些一直与我在危险中为自由进行游行运动的人们失望了，这并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太过天真，幼稚地相信人们会看见善意的存

在。现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错误。”他还谈到了尚未侦破的爆炸事件、政府的回避以及华盛顿游行上莫名的善意。他谴责政府大概认为一场安静的游行就意味着改革的结束。“他们所犯的错误中再也不会比这个更离谱的了，”他说，“……我们比以前更加坚信唯一的出路就是非暴力运动。就让他们继续犯案吧。就让他们怀着种族隔离的邪恶来破坏我们的进程吧。我们终将获得自由。”最后，金做出了一段匆忙之中创作的新声明：“‘二战’期间，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一场为公平而抗争的运动中被驱逐，而他退缩了——就像你们这些卑微的仆人那天在白宫听说总统派来两人调停后就退缩一样。但今晚我正式通知，除非在某个特殊的日子，我才会返回伯明翰……”而他也必不可少地提到同样最不可能的情况，即肯尼迪总统在白宫早已试着出卖汉密尔顿集团。

白宫无视了这个演讲，但在伯明翰的 A.G. 加斯顿和亚瑟·肖尔斯立刻公开指责金。他们同皮茨及其他黑人保守派领袖断交，发声明宣布对布雷克和罗约尔团队抱有信心对示威游行或“外部干预”持有一贯的反对意见。伯明翰当地白人和黑人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加斯顿和肖尔斯的声明。现在摆在金面前的就是：一旦行动就有危险在伯明翰引发公开分裂，除非他行动否则白宫会一直保持沉默，而且对他像麦克阿瑟那样胜利重组的宏大承诺也只有很少人附和。金感受到了队员的士气低下、疲惫感，于是命令昌西·艾斯克瑞奇前往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进行一项秘密任务。

艾斯克瑞奇明白这次外出任务对金来说很重要，无论如何，他很乐意接受这个找寻弗尔农·约翰斯的冒险活动。自从他与金在 1960 年相识，艾斯克瑞奇就已听说了一堆关于弗尔农·约翰斯的传说。早听说这位老牧师又开始了漂泊生活，而且在这些年里他偶尔才会与阿尔托纳·约翰斯住在一起，因而当他听到金说电话联系不到弗尔农，而且他大概住在距离里士满 30 英里以外“彼得斯堡某处”等信息时并不惊讶，金建议他随便走进一家教堂或到一处街角，然后随便问一个黑人这个人在哪里。然而，艾斯克瑞奇意外地在一处废弃的天然气管旁空着

的停车场上发现了一个摊位。这个摊位的四周被绳子隔离起来，防止车停在此处，或是防止陷入赤泥之中。里面有一位长满白色胡茬、脚穿硬底靴却没穿袜子、靴子也没有鞋带的老人在照看着一个寮屋居民的菜摊。艾斯克瑞奇怀疑是有人在恶作剧，把他引来后只找到当地的一个酒鬼。

弗尔农·约翰斯听到这位衣着合身的芝加哥律师的话后感到吃惊。“金博士让你为那件事来找我？”他问道，说出的每个字都透着一股不信任。

艾斯克瑞奇坚称金确实极其需要约翰斯的一些建议——迫切到他愿意自掏腰包付艾斯克瑞奇的差旅费，同时还急切地请求他一路追到底。“他希望你能给我所有你用于主日布道的笔记本。”艾斯克瑞奇重复说道。

约翰斯花了些时间才明白这个要求的严重性。等到他确实明白之后，他开始列出布道题目，然后背诵布道的片段，最后他开始全情投入地传道讲解喝法老王之酒的危险。艾斯克瑞奇在泥地中一块较稳固的地方站了一个小时，深深地被这个老人感动。稍后，他又恢复了法律人的怀疑精神，他没猜错，约翰斯承诺寄出的笔记本根本就不存在——他的布道事先没有讲稿，事后也没有记录。金并没有轻易接受这样一个结局，这么一个孤寂的现实。他坚持相信笔记本肯定存在。即便是在约翰斯逝世后的几个月里，他仍问艾斯克瑞奇是否收到过任何邮件。

金并不知道联邦政府的密室内正策划着种种陷害他的阴谋。就在华盛顿游行开始之前，FBI的情报长官已通知了局长胡佛，一次详尽的分析结果表明有极少甚至根本没有共产党参与这场游行。FBI副局长威廉姆·苏利文大力夸赞这场纯粹美国人自己的反抗游行，其中不免带着一股扬扬得意。

胡佛以整个调查局的力量挑战情报部门的这个评估，这具有决定性。“这份备忘录鲜活地提醒着我当卡斯特罗夺取古巴时我所遭受的一切，”他在苏利文的信上胡乱写着，“……除我以外，无法忽视这些重新修订的备忘录的人还有金、奥戴尔、利维森和拉斯廷。”胡佛并不乐见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自由之游行，而且就他所知，这些参加游行的人一辈子都只能是女仆、车夫及犯罪嫌疑人，而这场

游行的领导人也是他所厌恶的人。而更加现实的情况是他也正面对着一个悲惨的制度问题：这里是否具有颠覆现实的因素存在——成百上千的黑人和白人支持者突然聚集在首都，要求美国所有的政府机构，包括全为白人的 FBI 内进行改革，改变现有状况——那这种颠覆因素又可能在哪里呢？如果共产党在这些黑人中没有权威，那他们肯定是微不足道的；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胡佛也无法将大量局里的人手派去对抗内部颠覆的威胁。这位局长早就忘了自己曾经赞许地说苏利文有资格接任局长一职。

对苏利文而言，胡佛的言论昭示着一场失败的赌局，接着是一次职场危机。整个联邦调查局从上至下直至普通职员都习惯只交给局长他们知道局长会认可的话（一般是正好说出了局长之所想），而这名异教徒只是证明了“疯子比利”苏利文已经疯了。苏利文公然地转变了他的立场，试图拯救自己。“局长是对的，”他在游行结束后就写道，“我们完全错了。”即使保守派评论家承认了“我有一个梦想”演讲的爱国价值观，苏利文告诉胡佛“鉴于金昨天深入人心又具有煽动性的演讲，他超越了所有其他黑人领袖……我们现在必须关注他，如果我们之前没有这么做的话，从共产党、黑人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他是这个国家未来最为危险的黑人”。

胡佛并没有宽恕这个受到惩罚的情报长官。首先，当苏利文提议调查局发动反间谍计划来对抗金的运动，胡佛假装他听不懂“你是怎么如此敏捷地转换你的想法的……现在你想加重局面负担，扩大覆盖面，不管你最近的报告是如何低估共产党在种族运动中的影响力。我并不想浪费时间和金钱，除非你能下定决心”。事实上，胡佛在要求苏利文摇尾乞怜，而苏利文却也怯懦地顺从了。通过这个榜样，胡佛好好地整肃了一遍 FBI 的情报部门。游行结束两天后，胡佛命令纽约分部确认斯坦利·利维森十几岁儿子的电话上能否安全地安装一个窃听器。一周之后，他下令准备在纽约和亚特兰大的 SCLC 办公室内安装窃听器，还有金的家里。正当这场游行向几百万美国人展现这场运动合法性的时候——不然的话，这

是一场违背种族主义者的权力和感受的令人瞩目的运动——胡佛将其定位为彻头彻尾的威胁国家安全事件。

司法部官员们察觉到 FBI 正对金的共产党关系喃喃抱怨，预兆不祥。从政治上来说，这个威胁是一个漏洞，可能会导致怀有敌意的国会调查人员破坏金的名誉和民权法案，并透过他们破坏美国政府的声誉。为了弥合 FBI 同司法部可能为人利用的分歧，伯克·马歇尔写出了一份司法部部长提防奥戴尔的总结记录。马歇尔不得不把司法部部长刻画成一个不惧危险但也从未暴露过 FBI 任何秘密的人，还是一个在清除威胁之后也不会停下来休息的人。他亲自把一份秘密草稿呈递给了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在考虑了一周之后，发生了伯明翰教堂爆炸事件惨剧，这打断了肯尼迪的思路，他做出决定，认为马歇尔自己应有能力同胡佛停止冲突。为此，马歇尔把这份草稿送给胡佛的助手，同时要求胡佛应同意收到这般措辞的文件。如此，马歇尔没有直接拒绝司法部部长肯尼迪，但暗示胡佛看在奥戴尔的分上照顾司法部的业绩。调查局的官员们抱怨马歇尔的总结并不完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看不够强硬，但在这方面又不足以向他挑衅。有了胡佛的首肯，他们狡猾地告知马歇尔“不用担心，他们当然会提交由他起草的纪要”。

苏利文痛改前非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他的情报处对情报的感知越发具有选择性了。官员们轻而易举地解读出了胡佛的指示，即继续用奥戴尔或列维森的任何一点新动态去挑肯尼迪的毛病。一旦监视特工发现奥戴尔走进纽约 SCLC 办公室，调查局就飞速地将这个发现递交给司法部，作为“金表里不一”及奥戴尔持续进行破坏的证据。从另一方面来说，调查局根本没有报告从窃听器里听到的对话，金的助手抱怨这个受伤、被拒的奥戴尔已“孤立无援地”离开了 SCLC，带走了邮寄名单和文件，导致 SCLC 的直邮筹资活动完全停顿。

这些引人注目的政府来往表明了调查局和司法部之间逐渐聚集的怀疑气氛。对金的热点问题谈论最多的就是不信任和缺乏交流，但这两种情绪也至少在两个平行轨道上不断变得强烈。其中一个轨道就是有组织犯罪。那年秋天，这两

者的区别在一个名为乔·瓦拉齐的平头职业杀手身上展现出来了，他因自身原因愿意公开证实黑社会的内部事务。对肯尼迪来说，瓦拉齐提出的对“分支头目”和“军师”进行第一手揭露的建议将会证明那些关于美国黑手党老大卡朋特的旧日传奇依然存在，而且规模进一步壮大，适应了现代的新形势，演变成了一个拥有巨大力量的根深蒂固的犯罪密谋组织。然而，这样的披露又会威胁继而否定胡佛局长的公众地位，使得之前所建立的犯罪理论都成为“胡扯”。如果公开描述纽约这五大犯罪家族的大规模运营模式，胡佛无法长期抵抗肯尼迪对重新调整局内工作优先事项的要求。

由于之前刻意走漏的消息和事先安排好的国会要求，罗伯特·肯尼迪确信瓦拉齐会进行公开披露，胡佛则努力为其打掩护。在华盛顿游行结束两天之后，他向全国的执法机构发布了一份名为“FBI公报”的文件，称长久以来，FBI一直致力于建立“能成功渗入位于犯罪神祇最深处的密室的渗透网络”。正当肯尼迪在到处宣称瓦拉齐即将公开的声明将会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时候，胡佛却极力贬低它的信息含量，称“早在1961年FBI就已发现、证实这些并对其加以修饰”。更进一步的是胡佛写道在很大程度上，举报人在公众眼中的形象用以夸大接下来需完成的庞大任务。记者们抓住了“夸大”一词并将其用作含蓄的指控，指责罗伯特·肯尼迪让FBI的工作越发艰难。肯尼迪要求胡佛发布一份澄清声明，但胡佛拒绝了这项要求，说自己的言论是发自内心的。

乔·瓦拉齐被荷枪实弹的美国法警们层层围绕，他先于9月27日出席了参议院委员会及一场全国直播的电视节目。他所讲述的具有喜剧色彩的恐怖事件、教父、贩卖海洛因的意外障碍及黑手党的行为举止（“我该如何向你解释呢，参议员？”）扣人心弦，成为造就新一代娱乐的原型。肯尼迪私下说，由于瓦拉齐的声明，“FBI改变了他们对美国境内犯罪的整体概念”。《纽约时报》发出了一篇包括瓦拉齐所介绍的“黑社会术语表”。开幕当天的报道使所有当时的活动黯然失色，包括肯尼迪总统的日程及金在里士满 SCLC 大会上那令人痛苦的“麦克

阿瑟演讲”，而之后瓦拉齐的新闻占据了接下来一个月里新闻的大额篇幅。罗伯特·肯尼迪发表了一个全国通知，号召抵抗“策划有组织犯罪的私人政府”，其中他对 IRS 和麻醉药品管理局大加称赞，却草草带过 FBI。肯尼迪只是暂时地停止他对胡佛的悉心栽培，很有可能出于自尊心或恼怒。这位司法部部长很快便又重新开始如朝臣般阿谀奉承。

肯尼迪在对待赢得胡佛及他所重视的内部安全机构的胜利时态度温和，其中有着特殊的原因：他知道他们在某个令人震惊的丑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个丑闻有可能会毁了肯尼迪总统的职业生涯。FBI 探员们已发现在总统的众多情人中有一位名为艾伦·罗梅奇的女性，她在 1955 年逃离家乡东德，在 1961 年以一位在西德大使馆站岗的士兵妻子的身份进入华盛顿。而对调查局来说，这使得罗梅奇具有东德间谍的嫌疑。即便如此，由于总统在这些问题上的隐私需要，这种暧昧关系可能早已被封锁起来，除了她曾合谋参与的一桩丑闻，这件事实在没法盖住。她曾是众多与鲍比·贝克有关联的妓女和交际花中的一员，他是参议院中林登·约翰逊的宠儿之一。

贝克一直藏匿的身份即将因一位自动售货机承包商而大白天下。这位承包商曾经贿赂贝克，结果被摆了一道，于是愤而状告贝克。这个突然事件引发了大量后续事件，最终将贝克送进监狱。更早以前，人们确信此次事件将会揭露出更多有关他骇人听闻的行径，他一个人撑起了幕后交易，他竭力安排好合同、付款，还有安抚活动。罗伯特·肯尼迪知道这条揭露之道定会由艾伦·罗梅奇引火烧至肯尼迪总统。在 8 月，他将罗梅奇偷偷地驱逐出境，但在整个 9 月里，当律师们和侦查员们私下聚集在贝克周遭时，而这被遗忘的信息成为极为敏感的威胁。事实上，这是约翰·肯尼迪在 20 世纪 40 年代里鲜为人知的茵夏·阿瓦德绯闻的重演。这两次与外国女性的异国浪漫故事都记录在胡佛那可怕的档案中，比起其他任何人来说，胡佛都有权决定是让罗梅奇绯闻如阿瓦德事件那般沉寂，还是如英国普罗富莫丑闻那般喧嚣，而该事件最终以自杀和政治耻辱画上句号。

大众所不知道的是，金窃听器事件与贝克丑闻是紧密相连的。在10月4日周五，威廉·苏利文正式建议胡佛再一次向肯尼迪申请批准在金于亚特兰大的家中安装窃听器，“由于斯坦利·利维森领导的运动及金与他的关系所表现的共产党对种族运动的影响”。这份提案对胡佛来说具有分水岭的意义，特别是由于肯尼迪已在7月份时拒绝了他的提案。“我不希望你在这方面耗费精力。”他草草地写给苏利文并酸涩地提及他短暂的叛党行为。他很有可能是想警告如果肯尼迪再次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与调查局公然对抗，苏利文要做好被责难的准备。

鲍比·贝克在同一个周五当天藏匿起来了，逃开了他的上司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的传召命令。曼斯菲尔德同少数党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和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罗素几乎等了一个下午，后来特拉华州参议员约翰·威廉姆斯也加入其中，他是一位保守节制的共和党，从杜鲁门时期就开始经办各种丑闻，早已赢得了参议院道德节操“守门人”的称号。通过细致不懈地研究美国国会同FBI之间流传的谣言，威廉姆斯已发现了许多十分惊人的结果，以至于他想要在参议院领导层面前同贝克当面对质。可贝克未能出现，曼斯菲尔德承诺一旦能找到贝克，将会重新召开本次会议。

胡佛将苏利文请求新设金的窃听器的草稿文件带回家，在周末进行最后的思考，之后在周一将文件发给司法部部长。当天下午，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告诉他的私人领导小组，喝醉的贝克早已现身，但他是为了重获他在参议院的职位，而非为了与参议院威廉姆斯对质。贝克宣称这完全是由于他们之间亲密的关系而旨在伤害副总统约翰逊的党派政治迫害。流言四起，谣传罗伯特·肯尼迪因对约翰逊的讨厌正鼓动秘密进行对贝克的调查，但是贝克、威廉姆斯和胡佛都知道司法部部长害怕丑闻是有自身原因的。

周四，在知晓贝克辞职后所产生的早期公众影响中，参议院一致同意下令法规委员会就贝克行为进行调查。当天下午，罗伯特·肯尼迪发出一个简短信息——“考特尼，来见我”，他私下约见了他的FBI联络员考特尼·埃文斯。他

仍未签署同意对金安装窃听器的委任书。肯尼迪向埃文斯强调了这个问题的政治敏感性，称公众一旦发现任何关于此次窃听事件的端倪都会演变成最大的灾难。正常来说7月份是最需要监视金的时期。想要获得利维森与金之间的联系就要监视利维森，而调查局正竭尽全力进行监听，包括暗设窃听器。连续两年的监听结果都无法证实对利维森与任何共产党员之间有共谋行为的重大指控，更不用提与苏联的关系了。而且，利维森与金之间的沟通内容仅仅因FBI认为利维森有罪便被定为危险级别了。以稍微变通的角度来看，利维森表现得多少有点理智，如这次民权运动一般。

从政治上来看，也没有比7月份更需要监听金的时期了。自当时起，金于3月份在华盛顿发表的演讲已经树立起了他代表少数白人要与大多数黑人的全国发言人形象。而且，伯明翰教堂爆炸案早已明显提升了全国人民对黑人的同情，也间接地提升了对金的同情。如果窃听事件被曝光，肯尼迪就绝无希望在增加对金的迫害手段一事上获得公众支持。在如此之多抵抗金领导的运动的犯罪尚未破案之时，没有一个执法部门能轻易地愿意承担监听金的责任。就在那一天，伯克·马歇尔通知罗伯特·肯尼迪说，华莱士州警察们已以轻微犯罪的罪名逮捕了3名教堂爆炸案的嫌疑人，马歇尔说这是有意为之，是为了使他们避免被指控一级谋杀的罪名。马歇尔所获得的信息直接来自亚拉巴马州的弗洛伊德·曼，当然是私下联系。因以自己高标准的改革运动抵抗刑事腐败行为，肯尼迪更有理由去监听州长华莱士，而非金。

虽然不管是肯尼迪还是考特尼在自己的私人回忆录里都没将此事一笔带过，但是支持对金进行监听的最好理由还是与获取政治情报有关。讽刺的是大多数情报因肯尼迪坚持金应当停止同利维森的联系而被封锁，这减少了从利维森那里获得的信息量。肯尼迪在此刻尤其迫切地需要知道金的意图。国会对民权法案群情激昂。站在肯尼迪的角度来看，一次突发的游行或对政府的谴责都是不幸的。为了对付金——或引诱，或控制，或在十分严重的紧急情况中完全抛弃他，肯尼迪

必须了解每一个可能的细节。这是胡佛抛出的无声诱饵，他对以政治谣言粉饰他的情报报告这一行径表示不齿。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是一个陷阱。如果肯尼迪交给胡佛已签署同意的对马丁·路德·金实行窃听行动的授权书的话，那他们关系间岌岌可危的平衡将被打破。胡佛将会掌握可挑拨肯尼迪同总统特殊关系的把柄。从此以后，肯尼迪将会越来越难以限制胡佛提出任何反对金的行动。因此，未来向胡佛提出任何实际建议都会变得更加艰难。肯尼迪一旦同意对金实施监听，他又怎么能奢望控制胡佛呢？肯尼迪所处的困境迎来了一股浮士德式的影响余波，而他觉得自己毫无抵抗之力。过了一段时间，当他完全被这件事制约后，他简洁地告诉他的一位助手，如果不签署这份授权书的话，那与调查局就“没法打交道了”。

金试着整理出在里士满大会后他所遭遇的困境。巨额的保释债务及其他种种阻碍表明了游行示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最后一搏”，他做出了如是总结，特别是在伯明翰的时候。他给全体工作人员写道：“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保持足够的灵活性，才能使游行示威所产生的威胁之火不息，为的是让本地及全国人民看到我们的决心和持续不断的战斗性，但还是要可能在可能的情况下不断寻找为保全面子的撤退可能性，以避免进行游行示威。”他开始进行一场牧师巡回之旅，在面对着不断升级的威胁恐吓时，他彻底明白了自己好像是在踩着刹车的状态下给车加油。

在10月，他4次穿过伯明翰，又一次同纳尔逊·“火球”·史密斯搭着顺风车一路向南到达塞尔玛。艾米莉亚·博因顿女士为当地人，她所指定的预备登记者“荣誉榜”已促使约翰·多尔在那里整理关于投票的诉讼，而她已经邀请金为自己备受围困的选民登记活动助威打气。直到当时，金已在那里参加了许多场会议并致辞，紧接着去了蒙哥马利，之后返回至伯明翰。亚拉巴马州的侦查员们已证实那辆曾在金的旅途中必不可少的车已被一位司法部的观察员租走。华莱士州长愤怒地谴责联邦政府支持金违反州法律的阴谋。两组州级大陪审团与美国第五上诉

法院之间的争论最终白热化，而这场争论也迫使金不得不进行几场公开演讲。国会的调查及相互矛盾的证据都逼迫伯克·马歇尔为早前坚决的否认而道歉。马歇尔开除了一名此前保管这辆车的年轻的黑人法务专员来掩饰他的恐慌，而就在近几日，他因监管疏漏而开除了约翰·多尔。

过度敏感影响到了民权的公共讨论，尤其影响了金。在白宫，密使布雷克和罗约尔承诺至少会暴露一份他们递交给肯尼迪总统的报告的总结，这些报告描述了自教堂爆炸案之后他们在伯明翰的调查经历，但他们就没有开始写过一篇总结报告。他们给伯明翰开出的药方是保持冷静。他们就目前种族间关系说出或做出的任何事情都一定引发骚动。所以，他们保持沉默。私下同肯尼迪家族在一起时，他们会谈论橄榄球。他们模棱两可的态度变得如此明显，竟使得某些稳健的伯明翰白人向司法部递送秘密的抗议纸条。而且，厄尔·布雷克自己还偷偷地向马歇尔抱怨他的同伴罗约尔，说他“对我的报告根本没兴趣”，而且，他赞成以“温和的公共关系方式”接近伯明翰。最后，这两名老兵要求政府准许不以报告、建议或公开评论的形式终止他们的任务，让这件事仿佛从未发生过一般，而他们也如愿了。

当金在塞尔玛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来到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全员面前，要求删除在小组委员会上已添加到民权法案中的增强修订条款。为此，他不仅受到罗伊·威尔金斯严厉的谴责，就连自由派的共和党人也对他进行了公然指责，他们抗议肯尼迪没本事把他自己党派的票投出去，现在却来删除所有能够归功于共和党人的修订条款，同时，还来恳求获得两党的支持。立法机关的混乱像是漫画家画出漫天飞舞的拳头一样。有政客宣称，为了在将来通过一个较强的法案，现在需要一个比较弱的法案；也有人的观点正好相反。当时既有很多人指控他人装腔作势，也不乏政客大肆褒扬政治天才的降临，因而小心灵活的手腕是极其重要的。“为了理解这场匪夷所思的争论，”《纽约时报》宣称，“回顾过往，展望未来都是有助益的。”

斯坦利·利维森逐渐地深入参与编辑金即将出版的关于伯明翰的书。起初，当被金的代理和出版公司问道为什么要退出编辑环节时，他编出了一些奇特的理由，但当他们抱怨阿尔·达克特的修订版本并不令人满意时，利维森找来了另一位作者。在抱怨过该版本的新问题后，利维森同意第二位作者犯了“致命的错误”即“以高人一等的语气向读者描述”。在当时，各家出版公司都在施压，要让这本书尽快完成，害怕公众对伯明翰事件的好奇已经开始衰退。金的代理人琼·戴维斯告诉利维森说克莱伦斯·琼斯就像金的编辑中介那样无能。在寻找第三名作家同时，利维森自己来写手稿。他让琼斯给金带话，说这本书就像是运动中持续发生的事件的人质。利维森警告称如果金为了丹维尔从伯明翰中抽身的话，那他就无法让他的读者们对去年春天发生的转折事件而兴奋。金会表现得“好像是一个发现不能完成某事之后又转移到其他游戏上的小孩子”。直到十月份，利维森早已同金就这份草稿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当面交流。他不再告诉朋友们自己无法联系到金，转而开始说他不得不“写完这本已经开始写的书”。

所有这一切都被FBI的监听设备收到，但在罗伯特·肯尼迪批准在金的家中及纽约办公室里安装窃听器后，调查局对此类关系并不是那么兴奋。早在获得了任何结果之前，胡佛就提出一个补充请求，要求在金位于亚特兰大的SCLC总部的所有4条电话线上都安装上窃听器。在10月21日周一，考特尼·埃文斯发现司法部部长情绪低落，踌躇不定。他虽然批准了这个进一步的要求，但保留了在30天内回顾所有对金的监听信息的权利。在那个周五，肯尼迪又一次叫来埃文斯，但这次的情绪“明显带着怒气”。他刚刚发现调查局在政府内散播一份关于金的丑闻报告，将其形容成“毫无原则的人”“经常刻意听从美国共产党的引导”的人。

肯尼迪的话语充满了嘲讽与愤怒，他说五角大楼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份报告。“司法部部长质问陆军在同马丁·路德·金的共产党背景的联系中承担了何种责任。”埃文斯向他汇报道，并提及他对陆军安全职能的技术解释“似乎无济于事”。埃文斯离开后，肯尼迪又给胡佛打了电话。他向胡佛要来了一个承诺，即

胡佛将收回这些报告来阻止消息泄露，但他并没有威胁要给出任何教训。危害已经造成。“我已联系过了司法部部长，他表示满意。”胡佛草草地写着，听起来他自己也很满意。

在那个周末，肯尼迪努力挣扎着，试图一次将两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堵住。正当这群不服管理的FBI探员将政府描绘成黑人共产党运动的同盟时，艾伦·罗梅奇丑闻突然处于爆发的边缘，岌岌可危。一位同参议员威廉姆斯共事的记者写出了首个独家报道——《美国驱逐与官员有染的女孩》。该报道揭露了艾伦·罗梅奇与国会领袖和一些重要的《新拓荒者》报社成员有染。文章称艾伦·罗梅奇的名字在对鲍比·贝克的调查中浮出水面，而“由于其男伴的地位之高”，让人产生了关于安全甚至是间谍方面的担忧。参议员威廉姆斯想要弄清楚如果她不是一个安全隐患的话，为什么会被驱逐出境，而如果她是的话，为什么又被安排在周二参议员法案委员会内部会议上出现。文章中称罗梅奇是一名“陪侍女郎”，并强调了她的诱人的外表：“那些与她熟识的人说她‘极为漂亮’，并将她和电影明星伊丽莎白·泰勒相提并论。”

罗梅奇对罗伯特·肯尼迪来说，这场危机中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这篇报道刊登在一份爱达荷州当地的报纸上。这一不起眼的新闻来源能让他眼下稍作缓和，因为全国性的媒体要到过了周末之后才会关注到它。这为肯尼迪争取了一点时间。他的第一反应是给拉·佛恩·达菲打了个紧急电话，达菲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一位参议院调查员，他最近刚刚完成了沃洛奇的听证会的工作。司法部部长严肃地请他搭乘第一班飞往西德的航班并留在那里。他的任务是找到罗梅奇，让她冷静下来，不要对外发表任何言论。爱达荷州报纸报道中一个令人不安的细节使得达菲的工作显得更为重要：据说罗梅奇对于她那些“重要的朋友”允许她被驱逐出美国表示十分愤怒。达菲就像电影中的詹姆斯·邦德一样出发了。肯尼迪随后给总统打了电话。他们都认为唯一能够在周二之前控制威廉姆斯议员的办法就是通过参议院领导层的影响力。但不幸的是，想要动用参议领导层来摆平这类事

件，只能通过 J. 埃德加·胡佛。

10月28日周一一大早，罗伯特·肯尼迪就提醒了参议院领袖德克森和曼斯菲尔德。之后他给科特尼·埃文斯打了电话，向他声明了自己和总统对于罗梅奇事件十分担忧。这可能会对美国造成很大伤害。为了强调情况之危急，他当着埃文斯的面给总统打了电话，电话里两个人又重复了同样的意思。然后他让埃文斯去通知胡佛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转眼之间，肯尼迪就出现在胡佛办公室的门前，胡佛很高兴看到这位高傲的司法部长能屈尊来访，而不是传唤他，就让自己的随从先退下了。两个人独处时，肯尼迪告诉胡佛，自己和总统两个人都希望他能尽快通知曼斯菲尔德和德克森关于罗梅奇一事的严重性。如果这个事情被捅出去，当局行政部门内外的许多官员都要受到牵连，整个美国也要因此蒙羞。

胡佛故意让肯尼迪难受了一会儿。他表示自己非常反感这件事情，之前调查局已经给他提供了一份关于事件中所受牵连的个人资料的备忘录。如果司法部部长愿意的话，可以自己读给参议员们听。肯尼迪只能回答说参议员们主要是对安全方面比较关心，而胡佛的个人权威是必不可缺的。他的意思是之后胡佛可以说服这些议员，这件普罗富莫式的丑闻（英国政治家，也是1963年普罗富莫性丑闻的中心人物，该事件对当时麦美伦的保守党政府构成很大打击，更导致了保守党政府在一年后垮台）如果对总统造成影响，任何党派在中间都得不到好处。他必须借由这一事件攻击总统，不管是对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派议员都将造成同样的伤害，而胡佛本人是支持这一观点的。

胡佛没有给出直接的回复。他只回答说他已经收到参议员曼斯菲尔德的电话留言，他会跟他谈一谈。肯尼迪就把话题转向了伯明翰教堂爆炸案和马丁·路德·金。他的话语中带着愁闷的情绪和责备的口吻，一种混杂着高傲与恳求的心情，胡佛意识到他来求助 FBI 所承担的风险。肯尼迪说他很遗憾没能解决教堂爆炸案的问题；胡佛回答说如果不是亚拉巴马州阻挠，联邦调查局一定能够破解这

场阴谋，但他们还没有放弃。至于金，肯尼迪解释了为什么周五时他看到FBI关于金和美国共产党的关系的报告时会如此愤怒。胡佛并没有让步。当肯尼迪提到仍然有责难和留言从五角大楼传出时，胡佛回答说这份报告已经传到了CIA和国务院，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当肯尼迪说他担心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但人们很容易一下子就将金当作共产党分子时，胡佛回答说，报告中的每句话都是“准确且有事实依据的”。

肯尼迪刚走，胡佛就在11点钟时给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打了电话。这位多数党领袖说他和德克森急须在接下来几小时内跟局长单独会面。他提醒说，国会现在已经被报道爱达荷事件的记者包围，任何人看到他们3人在一起都将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因此，曼斯菲尔德建议3人到他家里碰头，胡佛同意了。

之后，胡佛给司法部部长打了电话。几乎同时，肯尼迪总统收到了第一份来自参议员曼斯菲尔德的报告，曼斯菲尔德说他得知胡佛的调查后极为震惊，并附上了姓名、时间和地点：罗梅奇、鲍比·贝克的其他陪侍女郎、不同党派的参议员、外国女人、黑人情妇；巡游、争吵、交易。曼斯菲尔德残缺不全的汇报意味着已经对这场沸沸扬扬的事件实行了封口，但真正的考验是第二天早上那场罕见的参议院法案委员会听证会上头版的时候。在成为委员会唯一的证人之前，参议员威廉姆斯发表声明说爱达荷事件不在自己的议程之内。在内部会议上，他告诉议员们说自己不会对罗梅奇事件发表看法。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就相关问题询问FBI。随后威廉姆斯就详细讲述了贝克在财务方面的违规行为，并提供了宣示证词。会议结束后，委员会主席对等待的记者说：“我们并没有去西德。”3天后，也就是11月1日，罗伯特·肯尼迪批准了FBI对贝亚德·拉斯廷的监听申请。行政部门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胡佛的控制，但这一事件成为另一个普罗富莫丑闻的危险已经大大缓解。国会的调查已经展开，并且主要是针对鲍比·贝克的财务问题。游走在剃刀边缘，肯尼迪总统十分自信地拿胡佛对艾伦·罗梅奇所了解的事情跟记者们开玩笑：“哦，不干净的是那些议员，”他鲁莽地说道，“真是不可思议。”

就在11月1日当天，叛军在西贡推翻了南越政府，刺杀了吴廷琰总统及其担任秘密警察首脑的弟弟。这场血腥的政变震惊了美国人，许多人由此开始关注越南战争。新闻媒体隐晦却固执地追问美国是否秘密支持了这场政变。尽管战争在1963年取得了突破，越南危机仍然成为国外对国内民权运动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响。5月8日，在伯明翰贝弗尔所领导的“儿童圣战”大游行进行到了高潮，而这一天在越南顺化，士兵在执行政府关于禁止在佛祖诞辰庆典中展示佛教圣色的禁令时，杀害了许多僧人和平民。佛教徒抗议者在一个月后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一天美德加·艾佛斯遇刺，一名叫释广德的僧人也在西贡市区自焚。越南信奉天主教的统治者将之后一系列的自杀抗议轻蔑地称之为“佛教烧烤”，并指控这些抗议者都是受了敌人的蛊惑。

开始关注越南危机的美国人被双方的行为搞糊涂了。令人不适的宗教和种族隔阂在肯尼迪政府主管对越关系的官员中间如同瘟疫一般，就像《纽约时报》记者马克思·弗兰克尔所写的那样，大家“很久以前就已经决定”“尽可能不去讨论这些问题”。但私底下，整个政府内部因为这个问题有着巨大的分歧：为了维持越南反抗暴政的战争而推翻吴廷琰政权是不是道德、是不是民主或者有没有必要。在华盛顿游行的前一天，肯尼迪总统宣称：“我的政府都要分裂了！”两天后，西贡的驻越大使发回电报，说事态已经朝着政变发展：“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整个9月和10月，越南来的电报从即将胜利的狂喜到血淋淋的哀悼急转直下，就像是麦克白的台词一般。在结束之后，美国官员尽全力试图和一个由受过法式教育、信奉天主教的军队领袖所主导的全新政权建立新的关系。

在亚特兰大，另外一条地下线索完全被隐蔽了。特工R.R. 尼克尔斯，表面上身份是一家电子工程公司的老板，在桃西街租用了一间宽大的办公室，用于存放监听金的设备。通常情况下，监听线是直接通过电话公司接到当地FBI办公室的，但这次任务极度保密，以至于一些FBI特工都认为胡佛可能没有拿到司法部部长的批准。尼克尔斯讨厌这个任务。他的这种挫败感在FBI探员身上十分常

见。在1947年第一次参与调查伯明翰的任务之后，尼克尔斯被送往华盛顿参与一项新的考验忠诚的大型项目。这项任务是进行枯燥的背景调查，而更糟糕的是这项调查是针对出生在国外的为政府工作的木工的。

1955年当尼克尔斯调到亚特兰大时，他的身份已经是一名安全专家了，这意味着他将不能再参与犯罪调查。少数几个高级安全官员在总部享有特权，但普通探员在地方办公室可调配的资源却不多。尼克尔斯在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招募黑人大学生到亚特兰大新的黑人穆斯林清真寺里记录演讲的内容。这些学生不停地退出，因为这些演讲实在是过于重复和枯燥。慢慢地，尼克尔斯对于唯一可以做的工作也开始懈怠——建议雇主解雇穆斯林员工，或者将穆斯林赶出自己的社区——因为一旦成功的话，之后他还必须重新找到这些人的下落。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可怕的怀疑，并且一次也没有参与过他觉得有意思的任务。负责调查罪案的特工嘲笑他的工作，包括这次对金的绝密监听。他们完全没有可能抓人。甚至约谈金或者金身边的人都被严格禁止，因为这可能会带来争议。但工作依然繁忙——既要训练更多轮班的耳机监听员，也要监督速记员。尽管尼克尔斯作为FBI探员并没有什么离经叛道的看法——比如说关于金是共产党这一点，有的探员认为他只是一个自由派，并不理解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危险——但他还是希望有人能代替他完成未来几年这项艰巨的任务。11月8日，他告诉上司对金的监控已经开始了。

一开始并没有监听到金，那时候他在底特律的领导层正在经历一场分裂。C.L. 富兰克林神父在6月份金刚刚完成一场成功演讲的科博展览馆安排了一场为期两天的会议，是为了在北方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和南方的SCLC分庭抗礼。但这次会议在计划阶段就被扼杀了。一开始是富兰克林和其他牧师之间有了纷争，自从美国全国浸信联会有了内讧以来，许多牧师对富兰克林专横的作风心生不满。一群看似毫不相干的穆斯林、好战分子和J.H. 杰克逊的忠实信徒走到一起，举办了另外一场名为“基层群众领导会议”的聚会。让他们走到一起反对富兰克

林的原因是对非暴力运动的憎恶和对金急于与白人联合的反感。其中一位牧师声称：“我对唱《我们终将胜利》感到烦透了！”保守派浸礼会信徒宣扬种族优越感，SNCC的资深分子，例如格洛丽亚·理查德森认为与白人融合将会使黑人放弃自我抵抗的权利，而运动的发言人马尔科姆·X则声称种族融合是白人主导的对黑人的驯化。“白人说要流血，你就要去流血。”他教训一群沾沾自喜的人说。

在基层群众会议内部，新的力量感和旧的受伤感产生了冲突，也预示了该组织之后数年的隔离主义政策。虽然其中很大部分还是一时冲动的个人情感，但马尔科姆·X的一个主张还是给金的运动和他的教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马尔科姆·X将摩西描述成穆斯林和犹太教共同的先知，同时也是黑人基督教会一个教父式的人物。“你在《圣经》中绝对找不到摩西对他的子民说，和你的奴隶主信奉同一个神，或者与你们的主人融合的内容，”马尔科姆·X常常这样说，“摩西的教诲之一就是隔离主义。他对法老说：‘让我的人民去吧’。”马尔科姆·X向金发起挑战，是为了证明他能将种族融合的教派联合精神与黑人文化的部落凝聚力结合起来，而这种黑人文化是与摩西密不可分的。

在与C.L.富兰克林秘密会见之后，金暂时逃避了底特律混乱的局面。回到佐治亚参加奥尔巴尼运动两周年纪念活动时，他炮轰了司法部门的“不公正待遇”，并给罗伯特·肯尼迪发去电报，敦促他撤销对“奥尔巴尼九君子”的指控。用安德鲁·扬的话说，那个时候一大群成员试图“在丹维尔发起新的运动”，而夏特沃斯又在伯明翰施加新的压力。这两个地方的各种摩擦使得金不愿去其中任何一处，但他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平息运动中令人厌烦的种种争端。11月16日他对克莱伦斯·琼斯说他现在深受反复发作的打嗝困扰。在新美利坚丛书公司，金的编辑们正为被炒掉的作者和严重滞期的伯明翰手稿而抓狂。金的图书代理感到“极度不爽”，她的火气几乎都发到了斯坦利·利维森身上，因为跟他联系要比跟琼斯或者金容易得多。最终利维森和琼斯在纽约国际机场安排了一次紧急会面，当时金刚参加完一场改革派和保守派犹太人的联合会议，正要从这里乘机回

家。FBI的各种监听措施完整监听到了这次计划，在约定的那个阴雨连绵的周三，他们提前在会面地点部署了大量人员。特工们偷听到了谈话的部分内容，他们确实是在为伯明翰的书而担忧。另外还有金让利维森把之前为《奔向自由》这本书工作过的一位女士重新找来。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更重要的成果是安全部门在总部所鼓吹的：“尽管我们面临着恶劣的环境，不管是天气还是安全的角度，但我们纽约的特工还是成功拍摄到了之前提到的3个人的照片。”沙利文的一位助手根据此前史密斯法案判决异教的案例推测，这些照片有一天或许会成为审判他们的证据。

就在同一天，罗伯特·肯尼迪在司法部举办了一场小型生日聚会。他站在桌子上，朋友们嘻嘻哈哈围在桌子旁，他心情愉悦地说道，虽然自己在任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但斗争还是要继续。在白宫，肯尼迪总统召唤李·怀特前来确认事情是不是像报纸上报道的那样，华盛顿的理发师们已经不再抱怨为黑人顾客服务了。另外一件更棘手的种族问题现在也需要总统来处理。佐治亚奥尔巴尼的国会议员约翰·L.皮尔彻狡猾地想从宗族隔离政策里面争取地方建设经费。如果特纳空军基地附近的医院仍然执行种族隔离政策，那么在五角大楼的新政策之下，就没有办法为民众提供平等的服务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特纳基地有机会建造一个新的军用医院？热切想要看到皮尔彻提案结果的预算官员们，坚持说对于政策的这种解释需要得到总统的认可，但是肯尼迪一直到起身前往得克萨斯解决民主党内部争端时都没有做出最终决定。总统一走，一队装修工人就利用总统不在的时间，对椭圆办公室进行了一次快速装修。

斯坦利·利维森搭乘火车前往华盛顿参加肯尼迪的葬礼。他回来后说“整个城市人们说话的音调都不正常了”。人们都在窃窃私语，缓步前行。在这令人恐惧的痛苦之中，他看到一个大众情感转折的希望：新闻评论并没有变得歇斯底里，而是在谈论过去人们之间存在多少仇恨。他对秘书说：“全国人的这种感觉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重要。”他给金的图书代理打电话，说伯明翰的那本书要再

次延期了。“这本书好像一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他说，从美德加·艾弗斯，到4个女孩，再到肯尼迪总统。有时候利维森会长篇大论地说肯尼迪是继杰斐逊总统之后的第一位知识分子总统。他还对杰克·鲁比枪杀凶手的动机做出各种摇摆不定的猜测。有一次他说鲁比杀死凶手哈维·奥斯瓦尔德是因为鲁比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而他觉得哈维这个右翼分子诋毁了左翼的名誉。另外一次他说奥斯瓦尔德一定是一名“极左分子”。后来他又说奥斯瓦尔德是一个容易受两个派别中极端分子蛊惑的人。为了重申他的政治现实主义，他评论说自己对林登·约翰逊处理公民权利问题上“毫不悲观”，因为在他看来，约翰逊内心深处是一个新政拥护者。金很喜欢约翰逊，这一点很不错，而在某些方面，约翰逊要比肯尼迪更有能力。

金也参加了这场葬礼，只不过他和利维森互相都不知道对方也来了。金是一个人来的，甚至他平时出行总会带着的伯纳德·李也没有一起来，他一个人站在街上，并没有引起路人的注意。和罗伊·威尔金斯一样，对于没有被邀请参加在圣马修使徒大教堂举办的葬礼弥撒，金感到十分受伤。他仍然对于肯尼迪兄弟有着深深的共鸣，尤其是肯尼迪总统。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比如粗鄙专横的父亲和对高贵浪漫的爱情的渴求。他们都偷偷地抽烟，都爱打瞌睡，也都爱追求女色。他们各自发表了战后美国历史中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演讲。

金所羡慕肯尼迪总统的地方是他的自尊和他没有明显的苦恼。尽管政治上处于守势，但每次金与肯尼迪总统交流时，他总是保持着一种独立的良好状态。相反，金却总是充满了忧虑。他担心自己的书，自己粗糙的皮肤，担心人们对他的看法，害怕人们发现他的书是影子写手代笔的。尽管种族是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约翰逊总统和金一样，是一个充满焦虑的人，正因为这种原因，金个人对他并没有特别的敬仰。他们第一次在白宫会面时，约翰逊总统紧张地拒绝了和金合影，这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只是偶尔让金对他心生同情，但从来没有仰慕过他。

肯尼迪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只属于他自己，没有办法转嫁到金身上，但反过来

却并非如此。遇刺后，金生前所领导的运动想强加给肯尼迪的各种主张，却成了这位前总统的成就。没有别的人的死像他这样——尼布尔称他为“选举产生的帝王”。在仇恨、偏见与暴力的狂潮中，这位牺牲了的总统成为与这些丑陋事物完全相反的象征与希望，而这些本属于金身上的特质，却似乎只能在死人身上才可能实现。约翰逊总统对全国人民说，对肯尼迪总统最好的追悼，就是要快速通过他生前所提出的民权法案。在这一悼念及其他追悼活动的影响下，肯尼迪变成了一个林肯式的人物，一个为了打破种族藩篱而流血牺牲的烈士。诚实的传记作者后来发现，肯尼迪个人的品格完全配不上这些殊荣。因为肯尼迪担任总统期间，这种与所谓肯尼迪精神相关的种族议题并不在他的审议重点之内，而在对他生活最私密、最带有敬仰之心的论述中，这个议题也一直并非内在的重要内容。一本名为《一千个日子》的肯尼迪传记影响深远，这本书在全国运动最高峰时期发行，作者小亚瑟·史列辛格只是在全书37章的第35节，介绍了民权运动的内容。

至于罗伯特·肯尼迪，金与他之间的恩怨很大程度上已经结束了。两个人的关系从最初的同志之情演变为最后的互相轻蔑。与后来在伯明翰相比，自由乘车者运动时期的肯尼迪与金更像是一种盟友关系，这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他们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观点是相反的。他作为司法部部长的经历，尤其是与金所打的交道，或许改变了他最初所认为的改变社会就是最大限度减少政客的不便的观点，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几乎完全气馁了。他为改变FBI基本架构和工作目标所做出的令人尊敬的努力并不为人所称道，最后也无疾而终，他本人也为此承受了许多痛苦。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的当天，胡佛就彻底撕掉了披在身上的专业职责或者职业礼节的最后伪装。没有肯尼迪总统的牵制，两个人很快就变得互相憎恶。站在金所受的个人伤害的立场上来看，罗伯特·肯尼迪或许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在FBI彻底不受控制的情况下，以代理司法部部长的身份工作了10个月。

联邦调查局第一时间就把目标锁定为“金与美国共产党的同盟”，并将金描

述成“一个道德败坏的机会主义分子”。沙利文将特工尼克尔斯和其他人召唤至华盛顿参加了一个9小时的军事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个6点原则，要“揭露金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机会主义分子，毫不诚实，是利用种族矛盾来获取个人利益的伪君子”。所有上层官员都签署了一个决议声明，加入了调查局常用的4条宣言，宣誓“不让调查局蒙羞”。这些官员隐藏的敌对状态在各自单位的同人中间十分常见，而像胡佛这样古怪的人会在自己所执着追求的常态上如此固执也并不奇怪。种族，就像是权力，先让人变得盲目，然后使人堕落，在胡佛看来，金或者利维森身上一无是处。最让人不能原谅的是一个建立在麦迪逊模式上的民主国家，竟然会允许秘密警察在超过40年的时间里逐渐壮大，以至于真实存在或者想象中的异端可以被以秘密的方式处置，甚至比塞勒姆审巫案更要恶劣。这一神秘的奇观更加荒诞的原因是，金和利维森是罕有的为自由而奋斗的英雄，却被一帮侵犯民主原则的鼠辈加以迫害。

对金来说，美国自由派的崛起有得也有失。许多他的仰慕者很快感谢运动让全国人民认识了宗教布道，但同时也很快地将他仅仅视为一名浸信会布道者，看不到他的深层思想，不再认真对待他。他同时收获了同样多的认可和蔑视。结果，新的自由主义运动成员开始胡作非为，因为他们完全低估了敌人的复杂性与约束力，并失去了对对手最起码的尊重，而正是这些让金、摩西和其他许多人得以扛过最艰难的岁月。在将一个被鄙视的少数民族从被人遗忘的角落拯救出来的运动面前，反战运动和其他一些活动看起来简直像是儿戏。

SNNC年会于肯尼迪遇刺一周后在华盛顿召开。纯真的理想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失败。约翰·刘易斯是那些想要组织一场官方的SNNC游行，前往阿灵顿墓园悼念的人之一，但是这一提议被投票否决了。一些人反对这一活动，觉得考虑到他们与总统生前的各种分歧，这件事情显得十分虚伪。另外一些人则说应该通过运动本身来向前总统致敬。

和平时不一样，鲍勃·摩西今天在讲话时好像梦游一般。“总体上来说，这

个国家的白人还没有想清楚要不要给黑人自由。”他说。这个月“自由投票”是为了给黑人运动一定的通道，但不至于过度影响白人——这是一场跟正式选举极度相似的模拟投票，一次全方位的演练，有投票箱有候选人，只是让人感受一下投票的感觉，同时暗示平时那个将黑人排除在外的选举是非法的。差不多9万密西西比黑人参加了“投票”。他们中有许多人之后表达了注册成为选民的意愿，而全国媒体对“自由投票”的报道，让人意识到，如果被允许的话，将会有大量的黑人参加投票。不过摩西仍然说，唯一的希望就是迫使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对峙，这样州政府才会向平权运动做出让步。“确实，黑人是在绑架联邦政府。”他说这话时略微带些忏悔的语气。

强迫联邦政府对峙的方式之一就是“自由投票”的模式延伸到教育系统，建立起“自由学校”，这样就可以大范围地教授文字技巧和宪法权利。有80名耶鲁和斯坦福的学生加入了“自由投票”的志愿者队伍，如果有更多人在夏天回来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做这些学校的职员了。这一提议差点让SNCC分崩离析。密西西比之外的项目负责人抱怨这将会掏空他们的资源。大多数密西西比黑人对任何帮助都表示欢迎，包括来自北方的白人学生，但是SNCC的资深成员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白人学生最后不可避免会发号施令。经过几周的激烈辩论，摩西本人拒绝表态对这个项目是支持还是反对。除了一直与领袖的命令相对立，他补充说这一提案还负有特殊的责任。他说，白人志愿者有可能会被殴打，甚至被杀死，而他们的种族与地位会放大全国的反应。就这一点来说，SNCC是有意识地将这些学生当作祭祀的白羊，他们必须要承担这一政治和道德选择的后果。

当这场马拉松式的辩论在哈蒂斯堡进行时，一个人进来打断了辩论，他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说在阿米特县，路易斯·艾伦的尸体在他的伐木卡车下面被发现，头上被开了3枪。甚至在他找到深受打击的艾伦妻子之前，愧疚就一直困扰着摩西。他们之间此前已经失去了联系。他最后一次给约翰·多尔写信是在一

年多前，那时一个地方治安长官用手电筒打碎了艾伦的下巴：“他们在阿米特抓他……”自从艾伦告诉摩西他看到一个国家立法委员残酷地枪杀了赫伯特·李之后，他就被监视了。那次近距离的枪击和威胁让艾伦吓坏了，于是他多次想逃离本州，有一次穿越州界限进入路易斯安那之后，他说了句：“感谢你，耶稣。”但是离开密西西比之后，他完全不知道要去哪里生活。离开了家庭和自己的伐木工作之后，艾伦策划了一系列未完成的逃跑计划，其中一次失败时他母亲刚好在前一周病重去世了。摩西并不知道后来这些令人悲痛的事情，但他意识到自己没能成为作家加缪理想中的“既非受害者，又非迫害者”的人。他两者都是，尽管他执着于让所有人达成共识，他仍是一名政治领袖。即使他带领路易斯·艾伦走到今天，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除非他带领了其他人。

摩西直接回了海蒂斯堡。“我们保护不了自己人。”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时候他不再顾及自己的影响力和名声，决定执行一个力度更大的计划，让超过 1000 名北方志愿者在 1964 年夏天来到密西西比地区。参加完肯尼迪的葬礼，金回到了家里，回想了自己广阔的生命历程。他不得不将 SCLC 的信用卡注销，因为阿伯纳斯和其他人的开销实在太厉害，账户又一次面临枯竭的局面。罗伯特·肯尼迪在一封简明扼要的信中驳回了他对“奥尔巴尼九君子”案件的申诉。来自塞尔玛的柏恩顿女士请求他帮忙处理一起严重的事件，由于抗议一人在注册选民时被打，40 名老年黑人妇女被锁在了洗手间的外面；柏恩顿想要买一台缝纫机，这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以在家里做工赚些日常开销了。金帮助马哈里亚·杰克逊调停了一起牙科账单的纠纷，又去发表了几次演讲，怀着宏大的梦想，他还与约翰逊总统单独会谈了一个小时。回到家后，金就生病卧床了，这时他收到了第一份白人学生关于他演讲课题的博士学位申请。孩子们在房子里疯跑。“我觉得得让德克斯特出去了，”金说，“他没有自我约束能力，不懂得要安静……我叫一下楼下的保姆。”当这个学生问到肯尼迪之死的影响时，金说这对民权运动是件好事。“因为我相信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民权运动就要不停延迟，每个关键节点他

们都会避之不及，一有机会就想削弱我们，”他几乎是直白地说道，“但我觉得对他给人的回忆，以及他在民权法案上所代表的立场，会让很多人看到充满激情工作的必要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前途还很光明。”

对肯尼迪遇刺的反应对高层政治情绪造成了足够深远的影响，这使得民权运动可以保住之前的胜利果实，不至于得而复失。合法的种族隔离命数已尽。黑人不再被人无视，这些有着正常人能力的人不再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从这个层面来看，肯尼迪的死标志着自由大潮的到来，正好像4年后金的死标志着大潮的结束一样。新的内部世界被开启，全世界对于自由运动有了更多样的理解方式。金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他见证的牺牲比真相更多，在这方面，种族给他上了艰难的一课，但事情远不止如此。非暴力运动的目的已经远远超越了打破种族隔离的界限。它触及了肤色之上的魔鬼，要面对解决比地位或财产更人性的需求。它让金和统治者平起平坐，也让他在孟菲斯的清洁工身边死去。金像摩西那样的先知一样，跨越了被种族分隔的大地。最后他变成一根火柱，照耀着后人继续前行。

致谢

我要感谢公民诉讼组织（Public Citizen Litigation Group）的艾伦·莫里森作为本书的首席顾问，还要感谢凯瑟琳·迈耶，感谢她在寻找 FBI 关于斯坦利·利维森的机密资料时的专业知识和耐心。

感谢我的编辑爱丽丝·梅休，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三本书，是她对这本书坚定不移的信心让我渡过了无数难关。我要感谢她以及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另外几个人，感谢他们工作分内之外的帮助：亨利·菲利斯、乔治·霍启曼、蒂娜·乔丹、大卫·希普利、玛西亚·彼得森、艾琳·考芙琳、娜塔莉·戈尔茨坦和丽莎·彼得鲁斯基。理查德·斯奈德和其他管理层在这 6 年里不计商业回报，在资金上给了我慷慨（却并不铺张）的援助。我还要感谢 J.S. 古根海姆对我一年的研究成果所给予的经济补助。我还要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经纪人，洛杉矶的乔治·迪斯康特，感谢他对我和家人的不懈鼓励。

我们 7 岁的女儿梅西和 5 岁的儿子富兰克林在没有我陪伴时，只是轻声询问爸爸一直在楼上做什么。我的心与他们，与克里斯蒂，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员默默地在一起，但是我还是想特别感谢一些朋友的建议、鼓励和激励：斯科特·阿姆斯特朗、萨穆埃尔·邦德、凯伦·德扬、大卫·伊顿、玛丽·梅西、贝迪金·莫非、丹和贝基·奥克朗特、查尔斯·彼得斯、约翰和苏珊·罗斯柴尔德、迈克尔·斯隆，以及尼古拉斯·范·霍夫曼。

在注释中提到的图书馆与档案馆的员工，我要提出特别的感谢，有一些现在可能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档案馆的路易斯·库克、辛西娅·刘易斯和戴安·维尔；波士顿大学图书馆的霍华德·戈特利布；阿比林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的马丁·迪司利；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的维尔·约翰逊和隆·惠

伦；奥斯丁约翰逊图书馆的林达·汉森和南希·史密斯；霍华德大学穆兰德-斯平加恩研究中心的埃莉诺·星乃特和玛西亚·布雷希；威斯康辛历史学会的哈罗德·米勒；田纳西纽马基特海兰德研究与教育中心的苏·斯拉舍和保罗·德隆；国会图书馆手稿部的J.H.哈德森；尚博克黑人文化研究中心的乔伊斯·李，该组织隶属于纽约市公共图书馆；纽约波坎蒂科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的约瑟夫·恩斯特；纽约A.菲利普·兰道夫研究所的沃尔特·尼格尔；FBI档案管理部的海伦·安·尼尔和埃米尔·莫斯切拉；美国司法部的珍妮特·布利泽、詹姆斯·特纳、纳尔逊·赫米拉、柯蒂斯·格非和威廉·B.琼斯；洛杉矶帕西菲卡电台档案馆的南希·安吉罗；以及伯明翰公共图书馆的马文·怀汀和唐纳德·维西。我要感谢阿奇·E.艾伦、埃德温·古斯曼、C.B.金和W.E.“粉红”绍德里奇女士分享私人的历史资料。还要感谢詹尼佛·巴德和贝斯·泰勒在1983年所做的特别研究。

如果没有其他几百人愿意与我合作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那么这本书就不可能完成。他们的名字大多出现在了注释里。比如艾拉·贝克、塞迪玛·克拉克、C.B.金、D.尼克松和贝耶德·拉斯汀已经不在人世了。有一些是新朋友，我尊重那些在采访中重新回顾了痛苦回忆或保留不同意见的朋友。在这些年来多次打扰的人中，我要特别感谢拉夫·D.阿伯纳斯、哈里·贝拉方特、詹姆斯·贝弗尔、G.穆雷·布兰奇、约翰·杜尔、克莱伦斯·琼斯、托马斯·基尔戈、伯纳德·李、碧翠丝·利维森、博克·马歇尔、罗伯特·P.摩西、肯尼斯·李·史密斯、哈利·瓦赫特尔和怀亚特·蒂·沃克。

同样，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为我开启了新视野，带来了新乐趣和调查资料的作家的作品，我对其中有些人的感激仅仅靠注释标注是不够的：克拉伯恩·卡森、W.E.B.杜波依斯、萨穆埃尔·甘地、大卫·盖罗、托马斯·真蒂利、理查德·克鲁格、莱昂·利特维克、沃尔特·罗德、阿尔东·莫里斯、派特·沃特斯、卡特·G.伍德森和莱蒙特·耶基。